

革命建國八十週年紀念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一八九四)至十五年(一八九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凡 例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爲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爲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爲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爲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爲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爲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案語。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各部會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今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迄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燄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陷危，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而日益蓬勃壯大，滙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從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

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頹預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辭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劃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

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爲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爲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今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爲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

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文化之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之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民國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增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行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西曆一八九四年）

孫先生文自廣東經上海，「北遊京、津，以窺清廷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

國父孫先生文，承先啓後，幼懷救國救民之大志，及長就讀於檀香山，益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中法戰後，憤清廷和戰乏策，喪師失地，乃立傾覆滿清，建立民國之志。

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孫先生就讀於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課餘之暇，縱談國事及救亡之策，人多忽之；惟鄭士良至表欽敬，遂成莫逆之交，乃共同密議革命計劃。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孫先生入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交遊日廣，朝夕以革命相鼓吹，時往來香港、澳門間，公開宣傳，無所顧忌。其後與陳少白、楊鶴齡、尤烈相依甚密，所談者革命之言論，所懷者革命之思想，港、澳親友咸以「四大寇」稱之。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夏，孫先生以第一名之優異成績卒業於西醫書院。初設中西藥局於澳門，旋遷地廣州，易名東西藥局，施藥贈診，結納於官紳之門，用作革命活動之掩護。至是孫先生憂念國事，偕陸皓東北上，擬上書滿清北洋大臣李鴻章，建議救亡之策。孫先生記其事曰：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偕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紉、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朝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

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

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註一）

復據陳少白記孫先生北上之動機曰：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賸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我就隨便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把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字陶齋），託他想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銓，別號天南逸叟），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滙博士（Dr. Legge）翻譯四書五經，滙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爲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

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註二）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引自「國父全集」第二集，頁八十一八一。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六年五月改版，以下同。

註二：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一頁七，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五年六月版。

正月

一日（二月六日）清廷為籌備本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六十壽辰慶典，特預頒賞賜王公文武大臣榮銜，以示慶賀。

清廷以皇太后本年六旬萬壽，晉封妃嬪及宗室外藩王公，並加恩中外文武大臣有差，其中慶郡王奕劻晉封親王，為滿人之首，李鴻章得三眼花翎，為漢人之首。（註一）

按：近人沈雲龍氏曾著「慈禧六旬萬壽慶典之奢糜」（見附錄）一文，述慶典之籌備遠自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十二月初二日，即由光緒帝頒諭旨着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等總辦萬壽慶典。同月二十

一日復諭稱奉太后懿旨一切用款務當力求撙節，內外大臣毋庸進獻貢物綴足。繼而世鐸、奕劻等于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六月初五日奏明慶典之一切籌備係依照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孝聖憲皇太后七旬慶典前例辦理。至于慶典所需經費，則出之于京內外大小臣工之報効，預計共報効銀一百二十六萬六千九百兩。然其後之實際開支，以踵事增華，力為鋪張之故，慶典用銀竟至七百萬兩之鉅。及至本日，清廷以皇太后六旬萬壽，晉封妃嬪及宗室外藩王公，並加恩中外文武大臣、軍機章京、內務府掌儀司、營造司、造辦處各員，及乾清門侍衛等，先後頒有恩旨九道，統計受賞者近千人之衆，名器之濫，一至于此。如奕劻之由慶郡王晉封慶親王，殆即以其聚斂有功。至一人進奉最多之臺灣林維源，字時甫，臺北板橋人，祖平侯，父國華，三世俱以富名。維源慷慨好施，素負盛譽，故獨以捐獻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一月一日

四

萬壽經費三萬兩居一人進奉之首。維源子柏壽，後亦有名于時，世稱「板橋林家」者是也！（註二）

附錄：

一、清帝上諭六通

（一）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內廷妃嬪，平日侍奉謹慎，允宜特晉榮封。敦宜皇貴妃，著封爲敦宜榮慶皇貴妃。瑜妃，著晉封瑜貴妃。珣妃，著晉封珣貴妃。瑤嬪，著晉封瑤妃。瑾嬪，著晉封瑾妃。珍嬪，著晉封珍妃。（註三）

（二）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允宜特沛恩綸，延釐中外，懋賞之典，首重親賢。恭親王奕訢，著賞給御書扁額一方，並賞添頭等護衛一員，二等護衛一員，三等護衛二員。醇親王載灃，著賞戴三眼花翎。睿親王魁斌、鄭親王凱泰，均著賞穿黃馬褂。肅親王隆勳，著交宗人府議敘。莊親王載勛，著賞穿黃馬褂。怡親王溥靜，著賞戴三眼花翎。順承郡王訥勒赫，著每年加賞銀二千兩。貝勒載澄、載澍，均著賞穿黃馬褂。貝勒載瀾，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貝子奕謨，著賞穿黃馬褂。鎮國公載洵，著賞戴三眼花翎。輔國公榮頤、載卓，均著交宗人府議敘。不入八分輔國公載濤，著賞用紫韁。鎮國將軍載濟、頭品頂戴載漪、溥偉，二品頂戴溥倬，均著交宗人府議敘。御前大臣克勤、郡王晉祺，著賞穿四團正龍補服，並每年加賞銀二千兩。慶郡王奕劻，著晉封慶親王。喀爾喀札薩克親王那彥圖，著賞穿黃馬褂，並賞用黃韁。貝勒載漪，著晉封端郡王。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著賞食親王雙俸，並賞添頭等護衛一員，二等護衛一員，三等護衛二員，藍甲二十分。大學士額勒和布、張之萬，兵部尚書孫毓汶，均著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用紫韁。吏部左侍郎徐用儀，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帶膝貂褂。御前行走奈曼、郡王瑪什巴圖爾，著交該衙門從優議敘。貝勒載灃，著賞穿黃馬褂，喀拉沁貝勒熙陵阿，著賞用紫韁。貝子溥倫，著賞加貝勒銜。輔國公載澤，著晉封鎮國公。科爾沁輔國公那蘇圖，著賞穿黃馬褂。科爾沁輔國公博迪蘇，固倫額駙公符珍，均著賞用紫韁。御前侍衛和碩額駙札拉豐阿，著賞用固倫額駙補服。承恩公桂祥，著賞加入八分輔國公銜。乾清門行走不

入八分輔國公載瀾，著賞食鎮國公俸。鎮國將軍載瀛、載津，均著賞加不入八分輔國公銜。鎮國將軍溥侗、頭品頂戴溥儀，均著晉封一等鎮國將軍。頭品頂戴載振，著晉封二等鎮國將軍。內務府大臣大學士福錕，著賞戴雙眼花翎。吏部右侍郎崇光、戶部右侍郎立山、兵部左侍郎巴克坦布、鑲黃旗蒙古都統容貴，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福錕、崇光、立山、巴克坦布、容貴，均著賞穿帶蟒貂褂。（註四）

（三）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推恩懋賞，在廷臣工，克勤厥職，宜力有年，自應一體加恩，以光盛典。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麟書，著交部從優議敘。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徐桐，著賞戴雙眼花翎。戶部尚書熙敬，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交部從優議敘。戶部尚書翁同龢，著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用紫韁。禮部尚書崑岡，著賞戴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禮部尚書李鴻藻，著賞戴雙眼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兵部尚書烏拉喜崇阿，著交部從優議敘。刑部尚書松淮，著賞戴花翎，並交部議敘。刑部尚書薛允升、工部尚書懷塔布，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工部尚書孫家鼐，著賞戴花翎，並交部議敘。理藩院尚書松森，著交部從優議敘。都察院左都御史敬信，著賞戴花翎。吏部左侍郎壽蔭，著交部議敘。吏部右侍郎廖壽恆、戶部左侍郎崇禮，著賞加太子少保銜。崇禮，並賞穿黃馬褂。戶部左侍郎張蔭桓，著交部從優議敘。戶部右侍郎陳學棻，著交部議敘。禮部左侍郎長麟，著賞加頭品頂戴，並交部從優議敘。禮部左侍郎錢應溥，右侍郎景善，均著交部議敘。禮部右侍郎李文田，著賞戴花翎，兵部右侍郎克們泰、徐樹銘，刑部左侍郎阿克丹、李端棻，右侍郎裕德、龍湛霖，工部左侍郎鳳鳴、汪鳴鑾，均著交部議敘。署工部右侍郎英年，著補授，並交部議敘。理藩院左侍郎志顥、右侍郎慶福、倉場侍郎祥麟、許應騷，均著交部議敘。盛京戶部侍郎綿宜，著交部從優議敘。盛京禮部侍郎文興、兵部侍郎啓秀、刑部侍郎英煦、工部侍郎鳳秀，均著交部議敘。鑲藍旗蒙古都統恩佑，著賞加太子少保銜。正白旗漢軍都統定安，著賞戴雙眼花翎。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廣忠，著賞加都統銜。內務府堂郎中文琳，著賞加侍郎銜。（註五）

（四）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所有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各員，供職克勤，宜加恩賞，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嗣，著賞

加太子少保銜。國子監祭酒陸潤庠，著賞加三品銜。國子監司業吳樹梅，著賞加四品銜。翰林院編修張百熙、陸寶忠，均著加五品銜。徐郁、陸潤庠、吳樹梅、張百熙、陸寶忠，並均賞戴花翎。兵部左侍郎王文錦、工部右侍郎徐會豐，均著賞戴花翎。詹事府右庶子李培元、翰林院侍讀高釗中、侍講張仁勳，五品銜翰林院修撰曹鴻勛，均著賞加四品銜。六品銜翰林院編修高廣恩，著賞加五品銜。（註六）

（五）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在廷臣工，業經降旨加恩，因念各省文武大臣，有久膺重寄，卓著勛勞者，允宜同膺懋賞。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著賞戴三眼花翎，伊子李經邁，著以員外郎用。兩江總督劉坤一，著賞戴雙眼花翎。陝甘總督楊昌濬，著賞加太子太保銜。四川總督劉秉璋、閩浙總督譚鍾麟，均著賞加太子少保銜。湖廣總督張之洞，著交部從優議敘。兩廣總督李瀚章，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雲貴總督王文韶，著賞戴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河東河道總督許振禕、漕運總督松椿，均著交部從優議敘。江蘇巡撫奎俊、安徽巡撫沈秉成、山東巡撫福潤、山西巡撫張煦、河南巡撫裕寬、陝西巡撫施傳霖、甘肅新疆巡撫陶模、浙江巡撫廖壽豐、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江西巡撫德馨、湖北巡撫譚繼洵、湖南巡撫吳大澂、廣東巡撫剛毅、廣西巡撫張聯桂、雲南巡撫譚鈞培、貴州巡撫崧蕃，均著交部從優議敘。盛京將軍裕祿，著賞加尚書銜。吉林將軍長順、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西安將軍榮祿、甯夏將軍鍾泰、江寧將軍豐紳、杭州將軍吉和、荊州將軍祥亨、廣州將軍繼格，均著交部從優議敘。福州將軍一等繼勇侯希元，著賞戴花翎。成都將軍恭壽、綏遠城將軍克蒙額、伊犁將軍長庚、定邊左副將軍永德、熱河都統慶裕、察哈爾都統惠銘、直隸提督葉志超，均著交部議敘。陝西提督雷正綰、甘肅提督周達武、烏魯木齊提督董福祥，均著賞加尚書銜。江南提督譚碧理，著賞加太子少保銜。浙江提督馮南斌、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均著賞加尚書銜。福建陸路提督黃少春，著賞加太子少保銜。廣東水師提督鄭紹忠、陸路提督唐仁廉，均著賞加尚書銜。廣西提督蘇元春，著改爲二等輕軍都尉。湖北提督吳鳳柱，著交部議敘。湖南提督裴雲慶、四川提督宋慶、雲南提督馮子材、貴州提督羅孝迎、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均著賞加尚書銜。河南河北鎮總兵劉盛休、廣東南韶連鎮總兵方友升、高州鎮總兵左寶貴、北海鎮總兵王孝祺、廣西右江鎮總兵張春發、柳慶鎮總兵馬盛治、雲南開化

鎮總兵蔡標、昭通鎮總兵何雄輝、貴州安義鎮總兵蔣宗漢、古州鎮總兵丁槐、威甯鎮總兵蘇元瑞，均著賞戴雙眼花翎。直隸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山西太原鎮總兵薛士成、河南南陽鎮總兵崔廷桂、歸德鎮總兵楊玉書、甘肅甯夏鎮總兵衛汝貴、江南淮揚鎮總兵潘萬才、江西九江鎮總兵朱淮森、福建福甯鎮總兵曹志忠、廣東瓊州鎮總兵滕嗣林、湖北宜昌鎮總兵傅廷臣，均著賞給如意一柄，用寶壽字一方。直隸馬蘭鎮總兵文瑞、秦甯鎮總兵志元、通永鎮總兵吳育仁、宣化鎮總兵王可陞、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兗州鎮總兵田恩來、曹州鎮總兵王連三、陝西陝安鎮總兵姚文廣、漢中鎮總兵孫金彪、甘肅西甯鎮總兵鄧增、江南蘇松鎮總兵張景春、福州鎮總兵韓晉昌、浙江溫州鎮總兵張其光、福建汀州鎮總兵宋德勝、湖南永州鎮總兵賈起勝、雲南鶴麗鎮總兵岑有富、臨元鎮總兵姜桂題、長江水師湖南岳州鎮總兵張捷書、湖北漢陽鎮總兵高光效、江西湖口鎮總兵柳金源、江南瓜州鎮總兵謝溶齋、狼山鎮總兵曹德慶、北洋海軍左翼總兵林泰曾、右翼總兵劉步蟾，均著賞給用寶壽字一方，大卷八絲緞二疋。直隸大名鎮總兵吳殿元、天津鎮總兵羅榮光、山西大同鎮總兵程之偉、陝西延綏鎮總兵蔣雲龍、河州鎮總兵湯彥和、甘肅肅州鎮兵李培榮、涼州鎮總兵張永清、伊犁鎮總兵張俊、阿克蘇鎮總兵黃萬鵬、江南徐州鎮總兵陳鳳樓、安徽壽春鎮總兵任祖文、皖南鎮總兵李占椿、江西南贛鎮總兵何明亮、浙江處州鎮總兵陳濟清、衢州鎮總兵喻俊明、定海鎮總兵陳永春、海門鎮總兵孫昌凱、福建漳州鎮總兵侯名貴、建甯鎮總兵秦懷亮、澎湖鎮總兵周振邦、臺灣鎮總兵萬國本、南澳鎮總兵劉永福、廣東潮州鎮總兵劉世俊、碭石鎮總兵鄧萬林、廣西右江鎮總兵董履高、湖北鄖陽鎮總兵何長清、湖南鎮算鎮總兵周瑞龍、綏靖鎮總兵陳海鵬、四川重慶鎮總兵錢玉興、建昌鎮總兵劉士奇、松潘鎮總兵陳金龍、川北鎮總兵何乘龍、雲南騰越鎮總兵張松林、貴州鎮遠鎮總兵和耀曾，均著賞給用寶福字一方，小卷八絲緞二件。前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著晉封一等男爵。前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著開復革職留任處分。（註七）

（六）

又奉懿旨：本年予六旬慶辰，率土臚歡，蒙古王公等，自應一體加恩，以彰慶典。科爾沁和碩圖什業圖親王色旺諾爾布桑保，著賞穿帶膝貂褂，烏珠穆沁和碩車臣親王阿勒坦呼雅克圖，著賞用紫輻。喀喇沁親王銜多羅都楞郡王和碩額駙旺都特那木濟勒，著每年加賞銀一千兩。蘇呢特親王銜多羅都楞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著賞穿帶膝貂褂。

。敖漢親王銜多羅郡王達木林達爾達克，著賞用紫韁。科爾沁多羅郡王那蘭格喀勒，著賞穿黃馬褂。札賚特多羅郡王旺喇克帕勒齊、敖漢多羅郡王察克達爾札布、喀爾喀郡王銜多羅貝勒貢桑珠爾默特，均著賞穿親王補服。翁牛特郡王銜多羅達爾汗岱清貝勒德木楚克蘇隆，著賞用黃韁。阿巴哈那爾多羅貝勒額外侍郎達木定札布，著賞戴三眼花翎。阿巴哈那爾貝勒銜固山貝子多特諾爾布，著賞用紫韁。鄂爾多斯貝勒銜固山貝子札那濟哩第，著賞戴三眼花翎。喀爾喀固山貝子托果瓦，著賞穿黃馬褂。札賚特鎮國公達瓦甯保，著賞戴雙眼花翎。科爾沁鎮國公喇什敏珠爾，著賞用紫韁。郭爾羅斯輔國公圖布烏勒濟圖，著穿黃馬褂。喀喇沁頭等塔布囊多羅額駙貢桑諾爾布，喀喇沁二等塔布囊和碩額駙那木札勒色丹，均著賞加輔國公銜。科爾沁和碩卓哩克圖親王丹色里特旺珠爾，翁牛特親王銜多羅都楞郡王贊巴勒諾爾布，均著賞用紫韁。科爾沁多羅札薩克圖郡王烏泰，著賞穿黃馬褂。科爾沁多羅賓圖郡王敏噶布札布，阿巴噶多羅郡王揚素桑，均著挑在御前行走。阿巴噶多羅卓哩克圖郡王布彥烏勒哲依，浩齊特多羅額爾德呢郡王都昂東僭格，均著賞戴三眼花翎。土默特郡王銜多羅貝勒色凌那木濟勒旺寶，著賞用紫韁。札賚特郡王銜多羅貝勒桑巴，著挑在御前行走。科爾沁多羅貝勒濟克丹達克齊瓦，著賞用紫韁。科爾沁多羅貝勒凱墨阿噶、科爾沁多羅貝勒巴咱爾濟哩第，均著挑在御前行走。蘇呢特多羅貝勒索特那木多布沁，著賞戴雙眼花翎。鄂爾多斯多羅貝勒喇什札木蘇，著賞用紫韁。鄂爾多斯貝勒銜固山貝子察克都爾色楞、喀爾喀固山貝子敏珠爾多爾濟，均著賞戴雙眼花翎。杜爾伯特固山貝子喇什彭蘇克，著賞穿黃馬褂。巴林固山貝子杜莫固爾札布，著挑在御前行走。阿巴噶固山貝子貢多桑保，著賞戴雙眼花翎。鄂爾多斯固山貝子阿爾賓巴雅爾，著賞用紫韁。郭爾羅斯鎮國公噶爾瑪什第，烏喇特鎮國公色楞那木濟勒，烏珠穆沁輔國公圖普欽札布，均著挑在御前行走。敖漢頭等臺吉色凌端魯布，翁牛特頭等臺吉色達，均著賞加輔國公銜。蘇呢特頭等臺吉銜協理二等臺吉察克都爾色楞，郭爾羅斯二等臺吉阿木爾霍畢圖，烏喇特二等臺吉索特那木旺珠爾多爾濟，均著賞給頭等臺吉。郭爾羅斯四等臺吉齊默特薩木丕勒，著賞給三等臺吉，阿拉善和碩親王多羅特色楞，著賞穿帶腰貂褂。喀爾喀多羅郡王晉丕勒多爾濟，喀爾喀多羅郡王多爾濟帕喇穆，均著賞穿親王補服。喀爾喀多羅貝勒車凌桑都市，著賞戴三眼花翎。青海多羅貝勒拉旺多布濟，著賞穿黃馬褂。喀爾喀固山貝子普爾布札布，喀爾喀固山貝子旺楚克察克達爾，均著賞用紫韁。阿拉善鎮國公阿育爾札布，著賞加貝

子銜。喀爾喀貝子銜輔國公達什拉布坦，著賞穿貝勒補服。察哈爾輔國公濟楚克札木蘇，青海輔國公卓林端多布，均著賞穿貝子補服。喀爾喀貝子銜頭等臺吉勒旺喀克津，著賞加貝勒銜。喀爾喀公銜二等臺吉巴保多爾濟，著賞加貝子銜。喀爾喀車臣汗德本楚克多爾濟，著賞用黃纓。喀爾喀圖什業圖汗那遜綽克圖，著賞穿黃馬褂。喀爾喀和碩親王那木濟勒端多布，著賞用紫纓。喀爾喀多羅郡王鄂特薩爾巴咱爾，著挑在御前行走。青海多羅郡王幹柯濟爾噶勒，青海多羅郡王棍布拉布坦，均著賞用紫纓。青海固山貝子棍楚克旺丹忠，著賞加貝勒銜。青海固山貝子吹木丕勒諾爾布，喀爾喀貝子銜鎮國公卓林呢瑪，均著賞戴雙眼花翎。阿拉善鎮國公沙克都爾札布，著挑在御前行走。喀爾喀輔國公德哩克多爾濟，著賞戴花翎。喀爾喀輔國公貢楚克札布，青海輔國公羅布桑端多布，均著賞戴雙眼花翎。察哈爾輔國公車旺哩克靖，著賞戴花翎。伊克明安輔國公巴克莫特多爾濟，著賞戴雙眼花翎。喀爾喀鎮國公銜頭等臺吉卓林端多布，喀爾喀鎮國公銜頭等臺吉那遜布彥濟爾噶勒，均著賞加貝子銜。喀爾喀公銜頭等臺吉呢朗瓦爾，喀爾喀公銜頭等臺吉洞多畢拉布帕喇木多爾濟，阿拉善公銜頭等臺吉勒旺布哩克濟勒，均著賞加貝子銜。喀爾喀頭等臺吉桑旺車林多爾濟，喀爾喀頭等臺吉哈丹，均著賞戴花翎。喀爾喀頭等臺吉卓林多爾濟，著賞加輔國公銜。阿拉善二等臺吉普勒忠呢什爾，著賞給頭等臺吉。（註八）

二、沈雲龍撰「慈禧萬壽慶典之奢糜」（註九）

（一）籌備慶典之上諭

光緒二十年甲午十月初十日，爲慈禧太后六旬萬壽之辰。清帝載灃特先期於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頒發諭旨，命禮親王世鐸、慶郡王奕劻等，總辦萬壽慶典。諭云：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至德光昭，鴻猷普被，勳九重之宵旰，措四海於乂安。歸政以來，朕侍膳問安，長聆懿訓，仰見慈躬康強悅豫，菲祿駢臻，朕心實深歡忭。甲午年欣逢花甲昌期，壽宇宏開，朕當率天下臣民，臚歡祝嘏，所有應備儀文典禮，必應專派大臣敬謹辦理，以昭慎重。著派禮親王世鐸、慶郡王奕劻、大學士額勒和布、張之萬、福錕、戶部尚書熙敬、翁同龢、禮部尚書崑崗、李鴻藻、兵部尚書許庚身、工部尚書崧桂、孫家鼐，總辦萬壽慶典。該王大臣等，其會同戶部、禮部、工部、內務府，恪恭將事，博稽舊典，詳議隆儀，隨

時請旨遵行。」

按：載活以醇親王奕譞長子（編者按：此誤，載活爲奕譞次子。），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入繼大統，改元光緒，時年僅四歲，遂仍由慈安、慈禧兩太后垂簾聽政。光緒七年，慈安逝世，慈禧專主朝政，上木遊宴之風始盛。光緒十五年，載活大婚，慈禧歸政。先一年，詔示天下，重修清漪園，改名頤和園，以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爲慈禧歸政頤養之地，兼備將來六旬大慶稱觴祝嘏之所，至不惜移挪海軍衙門經費，以爲營建修繕之需。此實大舉籌備慶祝六旬萬壽慶典之第一步。

前述總辦萬壽慶典之諭旨既頒，未幾即獲慈禧本人之同意。在同月二十一日上諭中，有云：「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甲午年爲余六旬壽辰，皇帝率天下臣民曠歡祝嘏，特派王大臣等舉行慶典，具見誠敬之忱。……予若却而不受，轉似近於矯情。惟念海宇雖已乂安，民氣亟宜培養。每於皇帝侍膳問安之際，以去奢崇儉，愛育黎元，諄諄訓誡。皇帝當仰體此意，以國計民生爲念，孜孜求治。……此次辦理慶典王大臣等，於應行典禮查照舊章請旨遵行外，其餘一切用款，務當力求撙節，毋得稍資糜費，以副余懷儉節儉體念閭閻之意。中外諸臣，其各勤職守，共濟時艱，內而王公一二品文武大臣，外而將軍督撫都統副都統提督總兵，照例應進貢物綬疋，均著毋庸進獻，以示體恤。」此則純係冠冕文章，所謂一切用款，務當力求撙節，毋得稍資糜費等等，事實上並非如此。

（二）慶典經費之報效與用途

蓋世鐸、奕劻等奉旨總辦六旬萬壽慶典，一切係查照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慶典前例辦理。所有舉行甲午恩科，恭主徽號，以及屆期慈禧自頤和園還宮，蹕路經由西直門外關廟一帶及城內兩旁街道，大加修葺，平治整潔，並搭蓋經壇戲臺分段點設景物等等，無不一一請旨遵行。至於慶典所需經費，如何籌集，則出之於京內外大小臣工之報効，亦經世鐸、奕劻等於光緒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奏明：謂「明歲恭逢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六旬萬壽，普天同慶，凡屬中外大小臣工，皆願祝嘏輸忱，共襄盛典。臣等查照乾隆年間成案，酌擬數日，開具清單，籲懇天恩俯如所請，庶幾體私衷，稍伸萬一。至應交款項，臣等公同商酌，在京王公及文武大小官員，均在戶部呈繳。其外省文武官員所交之款，即於各省藩庫運庫織造關稅等庫就近存儲，統由臣等隨時支取備用。再查乾隆年

間，各省鹽商皆有捐輸款項，由各督撫奏明請旨准其報効，以遂衢歌巷舞之忱。」得旨：如所議行。並附報効清單如下：

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將軍共銀四萬三千六百兩。

侍衛處鑾儀衛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前鋒護軍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健銳營火器領綠步各營滿漢武職各官，共銀六萬八千四百兩。

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騎都衛雲騎衛恩騎衛滿漢襲蔭各官，共銀五萬七千一百兩。

以上共報効銀二十六萬三千九百兩。

此外，直隸省共銀五萬七千兩。江寧省共銀三萬五千八百兩。江蘇省共銀三萬五千六百兩。安徽省共銀三萬三千五百兩。山東省共銀五萬六千一百兩。山西省共銀五萬一千五百兩。河南省共銀五萬八千四百兩。陝西省共銀二萬九千三百兩。甘肅省共銀六萬六千五百兩。新疆省共銀四萬六千八百兩。福建省共銀四萬五千兩。臺灣省共銀一萬三千四百兩。浙江省共銀四萬三千三百兩。江西省共銀四萬一千二百兩。湖北省共銀四萬三千六百兩。湖南省共銀四萬四千九百兩。四川省共銀六萬一千八百兩。廣東省共銀六萬四千五百兩。廣西省共銀三萬一千七百兩。雲南省共銀三萬二千六百兩。貴州省共銀三萬七千六百兩。奉天省共銀五千七百兩。吉林省共銀三千兩。黑龍江省共銀一千兩。熱河省共銀三千二百兩。

以上共報効銀九十四萬三千兩。

統計京外各官共報効銀一百二十萬六千九百兩。

上項報効清單，載諸光緒朝東華錄，原係預計之數，然實際開支，以踵事增華，力爲鋪張之故，慶典用銀竟至七百萬兩之鉅，據傅增湘（沅叔）藏圖書題記：「書甲午萬壽慶典檔案冊後」一文云：

「吳仲樸（重熹）侍郎家，遺書散出，余見抄本六冊於文友書坊，乃錄錄甲午孝欽皇太后六旬萬壽慶典承辦檔案而作也。凡冊文奏書進表詔旨慶賀筵宴典禮樂章諸大端，以及營繕工程，備置物品，報効銀兩，單摺數目，洪纖悉具。其一切成案，皆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慶典辦理，用銀至七百萬兩。其中部庫撥四百萬兩

外，各官報効廉俸銀一百二十一萬餘兩，又京外各官另外報効銀一百六十七萬餘兩。大抵外省扣俸報効，數目有等差；惟另外報効，則不論大小省分，每省三萬兩。報効最鉅者，爲長蘆兩淮鹽商，各四十萬兩；最小者爲欽天監二百兩。即降而內監宮婢，亦不得免。如小太監，太監媽媽，理女子，亦有數百金之進奉。一人進奉者，則爲太僕寺卿林維源三萬兩，林固臺灣首富，以捐金得官者。外臣特進者，爲稅務司赫德一萬兩。且特奉傳旨嘉獎之諭。洵可謂薄海內外鉅細不遺矣！其用途可紀者，如製造金輦費七萬六千九百餘兩。點景六十段，每段四萬兩，共二百五十萬兩。綵棚綵殿費十一萬兩。物品可紀者，如綵紬用至十萬疋，備賞綬疋用至五千疋，令蘇杭寧三織造承辦，又加派四川出二千疋。紅黑毡條用至六十萬尺。備賞醇醇桌子至八百五十張。宮廷苑囿應用門神一千二百對，門對至一千二百八十九對。足見鋪張揚厲，備極一時之盛。」

據上所述，慶典盛況，可以「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二語概之，慈禧享樂生活之窮奢極欲，於此亦可略窺其一端。惟有關慶典用費中各官廉俸銀一百二十一萬餘兩，大致與世鐸、奕劻等原奏報効清單預計之數相符。其籌集之法，則出之以扣俸。據許同華編張文襄公（之洞）年譜云：「萬壽經費，由京外臣工報効廉俸四分之一，慶親王意也。」故光緒二十年正月，清廷以皇太后六旬萬壽，晉封妃嬪及宗室外藩王公，並加恩中外文武大臣、軍機章京、內務府掌儀司、營造司、造辦處各員，及乾清門侍衛等，先後頒有恩旨九道，統計受賞者將近千人之衆，名器之濫，一至於此。如世鐸之賞食親王雙俸、奕劻之出慶郡王晉封慶親王，殆即以其聚斂有功也。至一人進奉最多臺灣之林維源，字時甫，爲臺北板橋人，祖平侯，父國華，兄維讓，三世俱以富名。維源納貲爲內閣中書，歷官至太僕寺正卿。光緒間，林氏先後報効海防經費五十萬兩，山西賑災二十萬兩，臺灣善後經費五十萬兩。劉銘傳撫臺時，曾奏請維源督辦撫墾，大拓地利，而維源亦墾田愈廣，歲收租穀二十餘萬石，慷慨好施，素負盛譽，故獨以捐獻萬壽經費三萬兩而居一人進奉之冠。維源子柏壽，今亦有名於時，世稱「板橋林家」者是也。

（三） 甲午中日戰爭與停止受賀

當光緒二十年春初，所有應祝六旬萬壽之各項部署，均已接近完成，清廷乃詔命於各省將軍督撫副都統提鎮藩臬內，每省酌派二三員，均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到京祝嘏，並各酌帶道府丞倅將備二三人，隨同班列。不幸是年五月

，朝鮮東學黨作亂，北洋大臣李鴻章派提督葉志超率兵赴韓助剿，駐軍牙山；而日本則於此時增兵萬餘，突入漢城，挾持韓王，迫改國政，中日邦交，遂告破裂。七月，清廷下詔對日宣戰。此舉所影響於六旬慶典者，殊為大煞風景。清廷不得已，乃於八月二十六日頒發皇太后懿旨，停止在頤和園受賀。懿旨云：

「本年予六旬慶辰，率土驪歡，同深忭祝，屆時皇帝率中外臣工詣萬壽山行慶賀禮。自大內至頤和園，沿途踴躍所經，臣民報効點綴景物，建設經壇。予因康熙、乾隆年間歷屆盛典崇隆，垂為成憲，又值民殷物阜，海宇乂安，不能過為矯情，特允皇帝之請，在頤和園受賀。詎意自六月後倭人肇釁，侵予藩封，尋復毀我舟船，不得已與師致討。刻下干戈未戢，征調頻仍，兩國生靈，均罹鋒鏑，每一念及，惻悼何窮。前因士卒臨陣之苦，特頒內帑三百萬金，俾資飽騰。茲者慶典將屆，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觀，受臺萊之祝耶？所有慶辰典禮，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

故清宮詞有云：「兩番盛典費周章，萬壽山前點景忙，曾記昇平千叟宴，淒涼猶自說高皇。」「別殿排雲進壽觥，慈懷日夕軫邊情，諸州點景皆停罷，饋餼頻聞發大盈。」即詠此也。

及至是年九月，清陸海軍先後大敗於平壤、大東溝，日軍屢戰大舉有侵人遼東半島之勢，而慈禧六旬慶典仍復規定屆期大內皇極殿舉行，由皇帝率領王公百官，皇后率領妃嬪公主福晉命婦等，分別親詣皇極殿筵宴進舞。其時各省疆吏以及所派司道大員，紛紛入覲祝嘏，所携進奉禮品，無不爭妍鬥巧，以貢諛媚。慈禧因於九月二十六日復降懿旨，謂：

「本年予六旬壽辰，……前經傳旨，內而王公一二品文武大臣，外而將軍督撫都統提鎮，照例應進貢物綴匹，均無庸進獻，以示體恤。茲當慶典屆期，該王公大臣等仍循舊例，呈進貢物，係屬出於至誠，若仍不允准，無以申臣下恭敬之忱，轉若近於矯情，均著加恩賞收。所有此次呈進貢物之王大臣等，著各賞給福字一方，壽字一方，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尺頭二匹，用示行慶施惠至意。」

此時慈禧對於京外臣工所進奉之貢品，極為賞心悅目，遂一改以往之「毋庸進獻」，而為「照單全收」，殆已取消十八年十二月之懿旨，苟非如此將無以填其貪婪之慾壑也。據許繡張文襄公年譜載：「皇太后六旬萬壽，頒賞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一月一日

一四

大壽字一張、大綬二匣、帽綵一匣。又因進呈貢品，頒賞壽字一方、蟒袍一件、活計一匣、福壽字各一方、三鑲玉如意一柄、八絲綢兩匹。」而翁文恭公（同龢）日記中，亦有購辦貢品及賞賜各物之記載，均可參證。故慶典用費雖至七百萬兩，然合內外大吏各項貢品計之，數當在千萬兩以上矣！耗四海臣民之膏血，以奉一老婦之娛樂，此固專制時代之特色，縱窮奢極侈，亦視為理所當然耳！

慈禧在六旬慶典以前，曾兩度垂簾聽政：其一自咸豐十一年七月文宗逝世熱河以後，迄同治十二年正月歸政時止，其間以恭親王奕訢執政，朝列多正人君子，又值洪楊之亂初平，湘淮名將領疆圻者不少，朝野競言模仿西法，頗能勵精圖治，故有同治中興之稱。其二自光緒元年正月至光緒十五年二月歸政時止，其間以光緒十年甲申中法之役，命奕訢、寶璣、景廉、李鴻藻、翁同龢等退出軍機處，改以世鐸、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孫毓汶等在軍機處行走，遇有緊要事件，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又命奕訢繼恭親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訢柄政凡二十餘載，至是罷黜，朝局爲之一變。自甲申以迄甲午十年間，承平既久，侈必漸萌，樞府多將順之人，正臣拂士，或退或逐，湘淮宿將，半就凋零，諸臣媚子，遂進而舉行慶典，以爲希榮固寵之計。況國家號稱以孝治天下，其名甚正，遂無人敢訟言其非。於是特派王大臣籌辦其事，大肆招搖，一切皆援引乾隆成案，糜費在所不恤。孰意歌頌方興，而鼓輦忽動，朝鮮變起，日本肇釁，一經交戰，敗績頻傳，慈禧恍於清議，意興大沮，乃始稍稍斂抑，諭令一切儀文，概從簡略。然秉政者寧置軍國大計於不顧，專爲媚茲一人，所耗已逾千萬。其末流所及，無非爲貪黷者啓侵蝕之端，貪緣者謀保舉之階，如是而已，慶典云乎哉？其後以對日戰敗，屈辱求和，命李鴻章赴馬關議約，割臺澎湖，賠戰費，始得無事。時京中即流傳有「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之譏刺聯語，其憤懣之情，亦可見民心之向背，蓋清室危亡已兆其先機矣！

中日關係惡化，外國軍火商在天津招徠生意。

德國克盧伯(Krupp)、英國阿墨莊(Armstrong)軍火商經紀人探知將有戰事，在天津大肆活動。然僅向李鴻章部下商談折扣生意，實無軍火供應。(註一〇)

註一：「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四），民國五十三年臺灣華文書局影印本，以下簡稱「清德宗實錄」，卷三三二，頁二九六三—二九六八（原頁一一十一）。

註二：沈雲龍：「近代政治人物論叢」（一），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初版，頁七一十一。

註三：「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三二，頁二九六三（原頁一）。

註四：同註三，頁二九六三—二九六四（原頁二—三）。

註五：同註三，頁二九六四（原頁三—四）。

註六：同註三，頁二九六四—二九六五（原頁四—五）。

註七：同註三，頁二九六五—二九六六（原頁五—八）。

註八：同註三，頁二九六六—二九六八（原頁八—十一）。

註九：沈雲龍：「近代政治人物論叢」（一），頁七一十三。

註一〇：Little, Li Hung- Chang. P. 214.

二十四日（三月一日） 清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與英外部訂立滇緬邊界及通商條約。

薛福成與英外部所訂之約凡二十款，其要點凡三：議定滇緬邊界，開雲南之蠻允為商埠，中國船隻可在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行駛。（註一）「福成敘其訂約之經過云：

「余督同參贊馬格理相機理論。……界務于去年三月二十五日定議，商務于今年正月初五日定議。余將約彙撮要電達總署。……十二日總署轉到電旨，著照所議辦理。……是日三點鐘余率清臣等赴外部，……先將洋文約彙撮文約彙各二份，彼此均蓋用關防，余與勞大臣（5th Earl of Rosebury 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各畫押於關防之旁。」（註二）

註一：「十二朝東華錄」（以下簡稱「東華錄」）光緒朝，文海出版社，頁三三二—三三三—三七；「清末對外交涉條約集」（二），（以下簡稱「條約集」）光緒條約，國風出版社，頁二六四—二七九。

註二：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二），華文書局，頁一四一—一四一五。

中華民國紀元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二月二十四日

二月

十七日(三月二十三日) 總稅務司英人赫德(Hart)致送慈禧太后壽銀十萬兩。(註一)

註一：見「字林西報」，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二十日(三月二十六日) 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J.W. Foster)來華訪問，晤李鴻章。

先是，本月初美前國務卿福士德抵華訪問，旋訪李鴻章，至是鴻章答拜，兩百人列行先趨執大旗，繼衛隊持槍持刀，大紅傘下鴻章乘綠轎，由道臺先入宣名，然後入，坐定後，鴻章問福士德是否爲富人？有多少田地？年賺多少錢？(註一)

註一：J. W. Foster; Diplomatic Memoire.

二十五日(三月三十一日) 李鴻章奏請速撥款分期購買克虜伯大炮，替換北洋艦隊陳舊船礮。

李鴻章于本日奏請海軍「定遠」、「鎮遠」二艦擬添購克虜伯炮(快炮)十二尊，以替換已有之陳舊船礮。旋奉諭：「下所司知之」。(註一)而遲未實行。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八，頁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三五。

二十六日(四月一日) 美人發明機關槍，英、美、法旋均大量製造。(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五三一，一八九四年四月六日。

三十日(四月五日) 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臺灣鐵路(臺北至新竹)工程告竣。

本日，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臺灣鐵路工程告竣，所有借墊支給銀兩，懇飭戶部全數准銷。(註一)

按：清廷在臺之交通建設，當以鐵路之興築爲最重要，早在光緒初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撫時代，丁氏即倡議在臺修築鐵路；然以經費無着而罷。及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劉銘傳撫臺，以其對鐵路事業早有認識，主張修築鐵路益力。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三月，奏請修築南北幹線，清廷從其請。是年六月動工，然因經費短絀，加以修路兵弁技術拙劣，且不與洋工程師合作，故築路工程進度緩慢，路未完成而劉氏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離臺。繼任巡撫邵友濂以經費無着，工程進行困難爲藉口，奏請暫修至新竹而停工。清廷從其議，十九年年底始達新竹。至是正式告竣，並奏請准予報銷借墊支給銀兩。鐵路正式通車後，每天行車六次，來回各三次，每日約載客千人左右，而乘客隨處可上市，經常有誤點之情事發生。由此一現象，可知當時臺灣經濟尙屬落後，人民觀念尙在閉塞階段，對於近代交通工具猶不知善加利用，故鐵路築成後，一時並未發揮其預期功能，然而有助於臺灣日後經濟之發展，乃屬無可置疑之事實。

此外，劉氏復慘澹經營航運、築港、郵政、電信等有關之交通設施，現概略分述如下：（一）航運：劉氏經營之航運，不僅可航行于大陸沿海各港，且遠航于西貢、新嘉坡、呂宋等處，使臺灣海運一時頗呈活躍現象。惜繼任邵友濂，將官營航業廢止，臺灣航業遂爲英商所獨占。（二）築港：劉氏爲求臺灣對外交通與商務之發展，及配合鐵路之興築，特派林維源兼任填築基隆港總辦，籌備築港事宜。後因工程浩大，加以經費短絀，築港工程遂半途而廢；然已令吾人看出劉氏目光之遠大。（三）郵政：劉氏在臺創設之新郵政，係以原有之「站制」爲基礎，參酌內地海關郵政創設而成，其服務對象普及于大眾。由于制度健全，經營得法，第一年郵資之收入即達一萬兩。（四）電信：劉氏首于臺灣西部架設電線，續于福州川石山與滬尾（淡水）間，安平澎湖間，裝設海底電線，均于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接通。並于各要地設電局，爲官民服務。如是不僅省內電報聯絡迅速便利，即使與內地、海外互通信息，亦不若以往之遲緩阻滯。（註二）

閩浙總督譚鍾麟、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請移臺灣省會於臺北府城。

本日，閩浙總督譚鍾麟等奏：「臺灣省會要區，地利不宜，擬請移設臺北府城，以定規模。」（註三）

按：臺灣在三國時稱「夷洲」，隋時稱「流求」，已有國人足跡；惟大量移殖則在宋代以後。明初鄭和下西洋曾在臺灣南部停留，中葉後一度為海盜林道乾、林鳳、曾一本等出沒之區。天啓四年（一六二四）荷蘭人侵佔臺灣南部，二年後西班牙人亦在北部登陸。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荷蘭人北征，圍基隆城，西軍勢竭投降，臺灣全境遂為荷人所掌握。

滿清入關後，鄭成功從事復國運動，永曆十三年（一六五九）攻取南京不成，退回廈門，接受何斌建議，謀收復臺灣為根據地，遂於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乘荷蘭兵船他調，守軍力弱，率軍二萬五千人渡海往征，圍赤嵌城，攻戰凡九月，荷人死者千六百人，自知不敵，乃罷兵約降，退回巴達維亞，成功乃改臺灣為東都，作為復國之根據地。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清廷命「靖海將軍」施琅攻臺，次年臺灣正式納入清版圖，清廷明詔設臺灣府，領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另於澎湖設巡檢，置臺廈兵備道，隸屬福建省。雍正六年（一七二八）設臺灣道，統轄臺灣及澎湖，計一府四縣二廳。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稱：「閩洋緊要之區，以廈門、臺灣為最，而臺灣又為該夷欲窺之地，不可不大為之防。」（註四）鄧氏已知臺灣在福建海防上地位之重要性。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日本出兵進犯臺灣，始引起清廷對臺灣之重視，特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在臺通商事務。沈氏深知臺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久為外人所垂涎，因此欲積極建設臺灣，乃于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奏請移福建巡撫駐臺，以專責成。（註五）未幾，部議福建巡撫多春二季駐臺（行署建於臺北），夏秋二季駐閩。此為臺灣建省籌議之端。光緒二年（一八七七）十二月，刑部左侍郎袁保恆為提出臺灣建省主張第一人，曾建議清廷，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常期駐臺，以閩浙總督辦理福建

全省事務。然以李鴻章之反對，終未實行。（註六）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岑毓英奉調為福建巡撫，督辦臺灣防務，先後兩次渡臺，對臺灣建省頗為積極。並親至彰化勘查，認為係建省形勢之地，于是建省之機漸趨成熟。（註七）迨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法軍侵臺。朝野上下益感臺灣地位之重要。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力贊十年前袁保恆建省之議，奏請「將福建巡撫改為臺灣巡撫，所有臺澎一切應辦事宜，概歸該撫處理，庶事有專責，于臺防善後，大有裨益。」（註八）清廷乃命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六部九卿，會同各省督撫議奏。旋經奕譞、李鴻章等會商決定，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並聯銜奏請採行。清廷乃于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九月初五日諭命實行。同日清廷復命設立海軍衙門，此為中國近代史上之兩件大事，亦足見臺灣建省意義之重大。（註九）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分全省為三府（臺灣、臺北、臺南），一直隸州（臺東），府下共十一縣，三廳，而以臺灣府（臺中）為省會。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十月，劉氏以病請辭巡撫，清廷初以布政使沈應奎署理。光緒十七年四月，以邵友濂補授。

劉銘傳治臺期間，設海防，築鐵路，興電報，營商輪，開山林，開礦藏，獎實業，辦屯墾，整建臺北市區，數年之間新政備舉，奠定臺灣近代化之基礎。及邵友濂繼任巡撫，盡反銘傳所為，新政建設大部停頓。至是請求移省會於臺北，旋清廷如所請准行。

註一：「清德宗實錄」（五），卷三三五，頁二九九七（原頁十八）。

註二：「臺灣省通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出版，第二冊，頁一〇〇—一〇四。

註三：同註一。

註四：「籌辦夷務始末」，臺北國風出版社影印，民國五十二年四月，道光朝，卷十一。

註五：吳元炳編輯：「沈文肅公政書」，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卷五。

註六：「清史列傳」，臺灣中華書局影印，民國五十二年，卷五三，大臣畫一傳檔後編九，袁保恆，頁二十五。

註七：同註六，卷五九，新辦大臣傳三，岑毓英。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二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三日

110

註八：羅正鈞：「左文襄公（宗棠）年譜」，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頁八六八。

註九：「清德宗實錄」（三），卷二一五，頁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原頁四一五）。

三月

三日（四月八日） 日韓交惡，日本搜韓國使館，韓國撤回駐日公使俞箕煥。

韓人李逸植奉命于日本謀刺新黨領袖朴泳孝不成，日本拘捕李氏，搜韓使館，韓廷憤而於本日關閉駐日使館，撤回駐使俞箕煥，日本輿論譁然。日人在玄洋社支持下向政府請願對華宣戰，外相陸奧、參謀次長川上操六默允，勸玄洋社人在朝鮮製造口實。（註一）

按：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十月，韓國發生甲申政變，親日黨（開化黨）領袖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等，於失敗後隨日使竹添進一郎亡命日本。韓廷一方慮其求援日本，企圖再舉；一方基于報復心理，亟欲得之以祭甲申政變時被害之六大臣，而諸閥等尤為積極。同年十二月，日外相井上馨至韓談判善後時，朝鮮全權大臣金宏集曾要求引渡金、朴等，井上藉口日、韓兩國無引渡犯罪條約，却之。韓廷目的不遂，乃想利用他法以得之。適有內衙門主事池運永者，昔曾為金玉均之門人，韓廷乃誘以利祿，令主持暗殺陰謀。其時朴泳孝、徐光範已渡美，金玉均則改名岩田周作，潛居東京，主持黨務。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一月，池運永抵神戶，先就韓人張申福探詢金寓東京市京橋區槍屋町旅館，乃于四月入東京，致書金氏，請求會見。金對池甚表懷疑，暗囑同志柳赫魯、申應熙等往探隱情。柳、申等以計誘之，池果吐露真情，並出示韓王之委任狀，「所經大概」（暗殺計劃）、「大事證據」（允事成後酬以五千元之賞金，先給證書為憑）等。金玉均得柳赫魯等報告後，即請求日本當局保護。日政府經閣議決定，訓令金于十五日內離日；並訓令駐韓代理公使高平，勸韓召還池運永，池旋即由日警三人護送回韓。金玉均接獲日政府離境通知後，本擬渡美，但以紬于旅資，未能成行，同年七月，日警強搜

金氏登輪赴小笠原島，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六月復遷至北海道之札幌區，仍由日警所監視。直至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金氏始恢復自由，再移居于東京。韓廷見有機可乘，乃復有第二次刺客之派遣。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四月，韓廷授命于李逸植，命其赴日行刺金玉均、朴泳孝（朴去美後，于光緒十二年七月復回日本），及其黨徒李圭完、柳赫魯、鄭蘭教、李誼吳等六人。李至東京後，伴與金、朴及其黨徒結交，以伺時機；並另暗中物色同志贊助。適有與金、朴者相識之洪鐘宇者，流寓法國已久，以歸國之便，偶來東京，李啗以榮利，並示以所携大院君委任狀，結為黨徒。另復誘日人川久保常吉及旅居東京之韓人權東壽、權在壽兄弟與之同謀。當時金、朴二人以意見不投，不常晤面，李氏知難同時下手，于是決計命洪鐘宇誘金至上海殺之，已則留日圖朴泳孝。本年二月四日金偕洪鐘宇由東京出發，經大阪至神戶，乘西京丸離日，于二十一日抵上海，僑寓公共租界北蘇州路與北河南路之交叉點日商所設之東和客邸。翌日午後三時許，洪槍殺金于該客邸。旋洪為四捕所獲。時韓王急電袁世凱轉請李鴻章將洪氏送交朝鮮酌辦。三月一日韓吏徐相喬至滬，鴻章命上海道聶緝翠即將洪鐘宇及金玉均尸交徐，並稟請兩江總督劉坤一之許可，遣軍艦威靖載運赴韓。既抵韓，韓王傳命處金尸以凌遲之刑，並將金之首級傳示八道，重賞洪鐘宇。此後日韓勢不兩立，日本且怒我歸玉均尸，中日邦交瀕于破裂，是為中日戰爭之導因。

白洪鐘宇、金玉均等赴滬後，李逸植乃積極進行暗殺朴泳孝等之計劃，招權氏兄弟共謀之。二月十九日，李、權等三人由大阪至東京，寓一旅舍，洪招朴泳孝等至該旅舍內禮之。不料朴等屢招不至，蓋朴等已偵知李有謀害之意，反遣使往招李等至朴所設之親鄰義塾內詰之，李毅然應諾，蓋李料定朴等必縛已訊問，屆時正可使權氏兄弟闖入，乘機行刺。二十二日晨李依約前往，既抵該塾，朴等果將李綑縛，訊問之，李虛為應答，以待權氏兄弟之來。但權氏兄弟臨時因膽怯、躊躇，竟不敢來，事遂失敗。朴等雖無法由李口中探悉謀害詳情，但派人往搜其行李，檢獲韓王二敕書，因確知李等係受國王之命，而有謀害之決心，遂將李暫拘禁于親鄰義塾內。事為日警偵知，乃將朴、李等悉行拘留，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三日

二二

又派人往捕權氏兄弟，權氏兄弟聞訊逃往朝鮮使館，本日日警強入韓使館執之。韓廷以其違背公法，甚爲憤恚，正擬撤回駐日韓使，而駐日韓使俞箕煥憤懣之餘，竟不待韓廷訓令，逕自返韓，兩國跡近絕交。（註二）

附錄：王信忠撰「金玉均暗殺事件及其影響」（註三）

（一）暗殺動機之由來

甲申政變失敗後，親日黨領袖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率徐載弼、邊樹、柳赫魯等，隨日使竹添等偕逃仁川，欲亡命日本，以圖後舉，但竹添頗露不悅之色。竹添所以不喜金、朴等赴日之故，朝鮮京城帝大教授田保喬潔於其所著之「近代日支關係之研究」中，謂因顧慮外交上之紛議，但作者以爲或尚有另一可能，即竹添知彼此次舉動輕率，必遭國人之非難，且至仁川後，適又接日廷阻止妄動之訓令，知復不能得政府之諒解，因思歸罪金、朴，以輕責任，若金、朴等至日，則彼不但不能推諉責任，或反因金、朴等埋怨其不從彼輩計劃，因致失敗，而益彰其寡謀乏勇也。金、朴等見竹添不悅彼輩至日，且動輒有離棄之意，大爲狼狽，幸經井上角五郎之斡旋，得日本郵船于年丸船長辻覺三郎之許可，始得搭赴長崎。

金、朴等既亡命日本，韓廷一方慮其求援日本，企圖再舉，一方激於報復心理，亟欲得之以祭甲申政變時被害六大臣，而諸閥等尤爲積極。故當一八八五年一月井上馨至韓談判時，朝鮮全權大臣金宏集於一月八日之會議席上，即要求引渡金、朴等六人。十一日復致照會要求，井上藉口日韓兩國間無引渡犯罪條約，且金、朴等係國事犯，却之。其後韓廷履行漢城條約第一條，遣正副使徐相喬、穆麟德至日謝罪時，又再提出引渡要求，井上仍以同樣理由，加以拒絕。

韓廷見要求引渡既不遂，乃思利用他法以得之，適一八八五年六月，有韓人張申福（又名張殷奎）者由日回韓，詭稱金玉均與日人等謀，將回朝鮮有所舉動，彼爲國家安寧計，願任刺金之責。韓王信以爲真，乃予若干元，命其渡日謀之，張爲韓王宮人張氏之族人，雖籍隸貴族，惟放蕩無賴，不齒於國人，乃於一八八三年末至日逸遊，至一八八五年旅臺告罄，因出此計騙款，本無刺金之意，故回日後並未實行。

一八八五年九月，袁世凱護送大院君李是應回韓，十月十一日與韓王筆談時對於金玉均事亦建議用暗殺方法，謂：「金玉均聞日廷亦甚惡之，此時如購一壯士刺之，日人既不能辦朝鮮人，自必送交外署，加以遠配，搪塞日人，此亦甚易。」韓王應隨機圖之，會不久大井憲太郎等擬韓陰謀發覺，日廷搜捕黨人甚多。

初大井等之謀韓，本擬請金玉均參與，惟以經費不足，且恐彼輕率誤事，因而作罷，故事實上金玉均並未與聞其事。而大井等黨人亦皆未渡韓前就捕，並無一人至韓。但外間謠言則甚盛，有謂日本亂黨已於八九日前用舊式帆船八隻，由馬關私運炸砲軍火等物，赴漢城近處口岸；有謂日兵扮作小商，混入韓京，而韓廷適亦獲得金玉均致李載元信內有「買槍千桿委日人辦理，因時動手，可成大事」等語。張申福、宋秉俊等更危言聳聽，謂金擬先帶千兵犯江華再犯京，續兵三萬綴韓王入江華，得意進，失意守，求英保護，雇船兩隻等語。一時謠言繁興，風聲鶴唳，韓廷懼而請求清廷出兵保護，鴻章電駐日徐使（承祖）詢問日廷，知係謠言，日廷爲見好起見，且特遣使率幹捕二十人至韓，協助日使搜索不法日人，但並無所獲，然清廷對金之留日，終不放心，鴻章復命徐使與口外長井上商議引渡。井上應遣使伴金赴滬，誘其出租界，由中國官廳乘機逮捕，惟切囑勿殺。後井上似因恐遭國內輿論之激烈反對，未行。袁世凱雖代韓廷屢電鴻章，轉請駐日徐使交涉，務使予以便利，俾能拘獲金氏，但日廷終以金氏無犯罪實證，未應所請。

韓廷既爲報仇心所縈繞，又因大井等陰謀之事，深慮金玉均捲土重來，要求引渡既絕望，於是決計用暗殺方法以除之。適有內衙門主事池運永者，昔曾爲金玉均之門人，韓廷乃誘以利祿，令主持暗殺陰謀。

（二）第一次暗殺計劃之失敗

先是金玉均等至日也，懼韓廷之要求引渡，或遣派刺客，潛居於福澤諭吉家中數月。至中日天津條約成立後，不久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三人渡美，金玉均則改名岩田周作，潛居東京，主持黨務。一八八六年二月，池運永自仁川出發，抵神戶後，先就韓人張申福探詢金玉均近狀，知寓居東京市京橋區檜屋町旅館，乃於五月入京，致書金氏，請求會見。金對池甚懷疑，復書拒絕，並暗囑同志柳赫魯、申應熙、鄭蘭教三人探索隱情。某日，柳赫魯等三人往訪池運永於其寓，閒談中詢其來日使務，池答以純屬遊覽性質，赫等不得要領而歸。越日，赫等招池飲於彼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三日

二四

輩寓所，席間復問來日之故，池仍含糊不言。赫等乃曰：君之來日，豈非爲暗殺金玉均乎？果然，請明告我，我等將假以一臂之力。于是伴言金之反常，而怨其疏冷，繼復誘脅兼施，迫其吐實。池知難再緘秘，乃吐露真情，請予贊助。並謂携有韓王委任狀及手資等物，儲於提箱內，可以取信，柳等乃請池遣使至旅邸取提箱，啓視則有韓王委任狀一紙，上書：

池運永委任狀

命汝特差入海捕賊使，臨時計劃一任便宜，爲國事務亦爲全權，勿泛舉行事。

（大君主寶）

此外有手鎗及匕首各一，又有韓人某致池運永及張申福之書簡一封，內謂：「此次刺殺逆賊一事，已由李鴻章通知日本政府，望安心行事，勿懼。」等語。池偏示諸證後，即請柳等相機圖之。六月五日四人同赴娼寮冶遊，柳等予池長文照書一封，伴示刺金決心。池大喜，乃出所作「所經大概」一文示柳等，內叙刺金計劃之始末甚詳。今摘錄其要者於下，以供參考：

「於正月初十夜（西歷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三日）承召入對密奉指處便宜，而奉全權委任狀，諭旨曰：以前統理軍國事務衙門主事池運永如特賜委任全權斬賊大使者，一入大日本斬在逃逆賊玉均事，一斬賊前使隨機便宜事，一斬賊使，賊餘黨勿問盡赦事，一斬賊使請于大日本政府俾有計護及顧助事，朝鮮國君主押（御璽）及金伍萬圓劃給而出，臨發爲閱判書應植所招往見，則閔氏謂，見袁欽差世凱而後行則甚合事宜云，請得閱札往見袁氏，袁氏大樂，即電駐日公使徐承祖先報運永之將入事端，遂別袁氏抵仁川港，二十日（西歷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三日）乘美濃丸……（下略）」

丙戌四月晦（三十）日（西歷一八八六年六月一日）

並應事成後，酬以五千元之賞金，先給證書爲憑，其文曰：

大事證標

池運永親筆

大朝鮮國大君主特命總理軍國事務衙門主事臣池運永以全權斬賊大使委任狀，入大日本國斬在逃逆賊金玉均之意，售用此人以池運永親筆寫委任（此處有印）狀成標出給，而金伍千圓（此處有印），成事後五日內出給爲宜矣。如有過期不給之端，則以此證標送朝鮮政府憑考談辦事。

開國四百九十六年（係五字之誤即西歷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池運永（印）

觀上所述，池運永之行刺金氏，係出韓王密命，毫無疑問，袁世凱干預韓事向嚴，且對金事早有暗殺之建議，故池運永之赴日，世凱與聞其事，似極可能，至謂李鴻章已將此事通知日廷而得其默許等語，雖頗可疑，然日廷此時銳意內治，不願多事於外，對金玉均之留日，本無庇護之心，觀於上節所述井上答覆清使徐承祖要求引渡金氏之態度，及後日驅逐金玉均於小笠原島之舉皆可知。且日廷恐自由黨人及諸反政府者假借金名，或利用金氏，煽惑人心，窘難政府，如大井憲太郎等之陰謀即其一例，故亦頗顧金氏出境，惟恐引起輿論反對，未敢昧然處置耳。朝鮮若遣刺客殺金，日廷內可除反政府者勾結金氏之慮，外可和緩中韓感情，而輿論亦不致過分非難，此在銳意內治之政策下，毋寧極爲有利，因此池運永之至日謀金，鴻章曾通知日廷而得其默許，實亦未始不可能也。

金玉均得柳赫魯等報告後，一面請求日本當局保護，一面致書韓王及李鴻章，有所剖辯。其致韓王書中，除請勿信小人構造誣言外，對日韓之變心，頗表不滿，謂：「日本前曾一度熱心吾邦國事，迨事勢變後，忽棄而不顧，又何足恃乎。然則爲今之計，唯有外以信義與歐美各國親交，內則改革政事，而導愚昧人民於文明之途，振興商業以整理財政，庶幾可以圖存。」其致鴻章書，除對指使暗殺事件委婉詰問外，對自己心地有所剖白，且頗露依賴鴻章之意，爲解釋後口金氏何故毅然赴滬之一良好資料，故不厭繁瑣，摘其要者於下：

「曩日奸黨之要求日廷引度玉均，相傳出自中堂之指使，心實疑之。近又有名池運永者，行止頗可懷疑，其所携之委任狀及諸書類等確證，皆落玉均之手，書類中有謂李中堂爲逮捕玉均之故，曾三度致書日廷，日廷兩次拒絕，第三次雖仍不贊成拿捕引渡，但云若韓人行刺，日廷決置諸度外，不加詰責，中堂據此諭袁氏，使我政府遣力士來日，政府即委任池運永實行其事云云。玉均竊念非閣下之意，當係年少無識之袁世凱所爲。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三日

二六

均頗知閣下之恨玉均，係因往年借助日本兵力之事，然此實因事勢所迫，出於不得已耳。貴國爲東亞大國，與我國唇齒相輔，玉均豈有故意啓衅之理！乃因胸算未及施展，大事中途瓦解，不勝痛歎朝鮮之存亡，關係東亞之安危，閣下何不推大清國皇帝陛下爲天下盟主，希公論於歐美大國，與之聯絡，而使朝鮮爲中立國，以立於萬全之地位乎？……」

日廷接金玉均之請求保護書後，知不能放置不問，經六月七日閣議後，乃以「金玉均滯留我邦，不僅使日本政府與有友誼厚情關係之朝鮮政府起不快之感，且有妨礙我邦治安及破壞外交上和平之虞」之理由，命內務大臣山縣有朋訓令神奈川縣知事沖守固，限金玉均於接得此命令後之十五日內離日，否則強迫執行。對韓廷則訓令駐韓代理公使高平，質詢池運永所攜朝鮮國大君主委任狀之真偽，並以命令金玉均離日爲辭，勸韓廷亦召還池運永。韓廷雖否認國王授池委任狀之事，但應將池運永召還，請日廷派員護送回韓。

六月二十三日，池運永由日警三人，護送回韓，金玉均則自接退出日境命令後，本擬追縱昔日同志徐載弼、徐光範等渡美，但因窮於旅資，不果，故至六月二十六日限期雖屆，仍滯留橫濱。先是當金玉均請求日本當局保護時，槍屋町旅主慮生意外，請其即時遷居，金乃於六月三日離東京而寓居於橫濱市海岸大路法國大旅社(Grand Hotel)內，此旅社因係法人所經營，爲日本法權所不及，於是神奈川知事乃商得橫濱法領事同意，拘致金氏，暫禁於橫濱市外野毛山之三井別墅。日廷本意，若金玉均屆期仍留日本，擬用強迫手段使彼離日，後不知何故，變更原定計劃，而主送彼至南洋羣島中日領之小笠原島。八月六日神奈川縣警部長遵內務大臣命，將此意通知金玉均，金以此種處置與原令中強迫離日之意不符，要求暫緩執行；並致書駐日各國公使，請予贊助。蓋玉均之意，欲日廷予以便利，使彼渡美也。日廷不聽，七日警部長率警士三十餘人，強拽金氏登秀鄉丸赴小笠原島，幽居於隸屬東京府之派出所內，由國庫月給十五圓之津貼。金氏不堪絕島孤寂，屢稱病請求轉移內地，其日本友好亦代爲呈請，日廷不許，至一八八八年七月，金以不勝瘴癘之苦，健康日損，日廷始允其遷居內地，使居於北海道之札幌區，月給津貼五十圓，以示優待，但仍命警士監視。至一八九零年日韓關係漸趨小康，金氏始得恢復自由，而移住於東京。

(三) 第二次刺客之遣派及金玉均在滬之被殺

韓廷第一次遭池暗殺計劃雖告失敗，但謀金之心未棄，而以諸閥爲尤甚。惟自一八八六至一八九〇之四年中，金受日本政府監視，韓廷無法可施。至一八九〇年金氏恢復自由，韓廷見有機可乘，於是乃復有第二次刺客之遣派。一八九二年五月韓廷授密命於李逸植，令其赴日行刺金玉均、朴泳孝（朴去美後，一八八六年八月復回日本），及其黨徒李圭完、柳赫魯、鄭蘭教、李誼吳等六人。李逸植至東京後，伴與金、朴及其黨徒等結交，以伺時機，且因單獨難於下手，暗中物色同志贊助。適一八九三年秋有與金、朴等相識之洪鐘宇者流寓法國已久，以歸國之便，偶來東京，李逸植暗以榮利，並示以所攜大君主委任狀，結爲黨徒。又有僑居朝鮮之日人川久保常吉者適於是時回日，逸植曾與相識，復誘之同謀。此外又有旅居東京之韓人權東壽、權在壽兄弟方欲回韓，逸植告以「若此時歸國，朝鮮政府必目君等爲金、朴之黨，定遭嚴處。」遂亦使其加入。當時金、朴二人以意見不投，不常晤面，逸植知難同時下手，於是決計命洪鐘宇誘金至上海殺之，已則留日圖朴泳孝。

一八九四年二月，逸植謂金玉均曰：「君居日已十年，終難達志，若赴清國，依賴與君相知之李經方，迎合李鴻章而作歸國之計劃，事或可成。」先是李經方任駐日公使時，金玉均頗聯絡，卸任回國後，曾屢次寄言，招彼至中國。金氏以日本朝野對彼同情大減，知事不可爲，亦頗有去清另闢途徑之意，惟懼爲中國乘機拘禁，不果。至是經逸植遊說，心又爲動。且金自亡命日本後，資財全無，一切費用均賴日本友好福澤諭吉、後藤象二郎等資助，金豪邁任俠，得錢任意揮霍，且常周濟黨人友好之窘困者，故生活頗感拮据。逸植乃告以若赴清國，一切旅費彼可代爲籌措，彼與上海某店有交易來往，可命洪鐘宇同往，提款五千元爲金之費用。金以在日既無可爲，生活又拮据異常，若憑李經方之昔日友誼，冒險赴清，或有相當收穫；且上海爲租界地，爲中國法權所不及，至滬後尙可見機行事，決定赴蕪湖會晤李經方與否。因決從逸植言，斷然赴滬。逸植大喜，乃命洪鐘宇伴行，又介紹東京中國公使館館員吳靜軒爲嚮導，而兼華語翻譯。

一八九四年三月十日，金偕洪鐘宇、吳靜軒，及日僕和田延次郎等由東京出發，翌日抵大阪，李逸植命洪鐘宇留宿於其妾宅大阪市外曾根崎村野村家，詳授在滬暗殺方法，並與以便於藏匿手鎗短刀等凶器之韓服一套，三月二十三日，金、洪、吳、和田等四人由神戶共乘西京丸離日，二十七日抵滬，僑寓公共租界北蘇州路與北河南路之

交叉點日商所設之東和客邸。金玉均化名岩田和三，居二層樓一號，洪應居三號，金國不疑洪之圖己也。翌晨洪以自日出發時，李逸植除給現金四千餘元供彼等費用外，復授以偽造之上海小東門外天豐銀號五千元莊票一紙，乃以兌付爲名外出，少頃回謂天豐主人他去，未能領取。金國不疑有他。迨午後三時許，洪忽易李逸植所與之朝鮮服，入金玉均之居室，時金方晝眠西窗口藤榻，日僕亦在房，洪令購物，啗之出，突發鎗擊金，中其左頰，金痛極躍起，洪復發第二鎗，中左胸，金奪門逃至廊下，洪追擊之，中左肩胛骨下背部，金應聲倒，旋即絕命，旅店主吉島德三聞聲上樓，洪以鎗擬之，吉島倉皇下樓逃遁，洪乃乘機逃脫。

吉島見兇手肇事脫逃，急赴日本總領事館報告。總領館以此係朝鮮人間自相殘殺之事，且發生於公共租界，不便審問。吉島乃復報告公共租界捕房，捕房遣員至肇事地點檢驗後，知被害者爲韓人金玉均，岩田和三僅其代名而已，乃以電話通知上海縣及日本總領事館，十九日晨西捕獲洪於吳淞口客寓，解至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午時上海縣知縣黃承誼、日本副領事山座圓次郎、翻譯官加藤義三、速水一孔，及英美捕頭相繼至東和旅邸，乃解洪至，舉行豫審，洪答：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誅之。既又稱係奉國王之命而行，勅書現在東京同伴手中。言詞侃侃，毫無懼容。並謂事後逃匿，係因顧慮金之日僕報仇，並無畏罪之意。黃知縣以若果係韓王授命行刺，則洪不但無罪，且更有功，然事先並未接韓吏照會，洪身亦無韓王令旨，故主暫羈以待訊究，一面將訊問檢驗情形，稟請上海道聶緝綬電稟南北洋通商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當金玉均被害之消息傳日也，朝鮮駐東京代理公使俞寅煥急電韓廷報告，韓王遣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督辦趙秉稷告袁世凱，乞救洪氏。世凱因急電李鴻章曰：「頃趙秉稷遣員告：得日京韓員來電，昨申刻韓人洪鐘宇在滬殺金玉均，洪爲租界巡捕獲囚，其志可嘉，乞飭滬道設法救護。」鴻章接電後，卽於三十日晨致電上海聶道，（此時諒尚未接聶道關於洪刺金之報告）除轉袁電外，並謂：「金係在韓謀叛首犯，來華正難處置，今被韓人在租界刺殺，罪有應得，可置勿論，外人如有饒舌，宜直告之。」旋駐天津韓吏徐相喬奉韓王命謁鴻章，要求令上海聶道代向美領交涉，將洪鐘宇送回朝鮮酌辦。鴻章乃復於三十一日上午致電聶道曰：「……頃駐津韓員徐相喬奉其國王電飭赴滬料理，欲求貴道照會美領事，將洪鐘宇交徐送回本國酌辦，徐卽行，祈晤時妥商，袁屬將金屍解韓。」聶緝綬

接電後，即命黃知縣向美捕房交涉引渡洪氏及金玉均屍。四月六日韓吏徐相喬至滬，聶道即命黃知縣將洪鍾宇及金玉均屍交徐。因是時無便船赴韓，聶道乃稟諸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一之許可，遣軍艦威靖載運赴韓。威靖艦於四月十二日抵仁川，翌日韓廷遣汽船漢陽號載金玉均屍溯漢江而上，至楊花津運上陸地，暫置民屋內。

當金屍將運仁川之際，日廷慮韓廷有戮屍之舉，將益增日本輿論之憤慨，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乃電駐韓公使大鳥圭介加以勸阻。大鳥於四月十一日訪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督辦趙秉稷，促其注意曰：「金玉均罪雖大，誅之已足，如再戮屍，天下各國將謂太甚。」趙執韓例駁之，大鳥不悅而退。袁世凱聞訊，慮將引起日韓糾紛，勸韓廷待金屍來後，不必援例車裂，但聽憑各仇家私自粉碎，如是或可避免日廷公然責問，且勸其遣使告大鳥，謂金屍來不過檢驗而已，並無戮屍之意，以緩和其感情。當時北京各國公使亦有同樣顧慮，深恐韓廷戮金玉均屍，重用洪鍾宇，傷害日本感情，以致引起日韓戰爭，故於會議後，致電韓京各使領，使向韓廷忠告。北京英國公使歐剛納爵士復特遣翻譯官至總理衙門，謂：「聞韓擬戮金屍，重用洪，恐起口畔，請中國電囑韓，速埋金屍，緩用洪。」總署乃移文李鴻章，轉告袁世凱勸阻。駐韓各國使領接北京外交團通牒後，亦於四月十五日舉行會議，席上曾議及暗殺事件因係發生於上海美租界，擬勸韓廷辦洪，以符界章。但議論之中心仍在要求勿加酷刑於金屍。俄代理公使韋貝向大鳥質詢金係何國國籍，大鳥答稱係韓籍，韋貝因謂：「金既屬韓籍，應由韓自辦，我輩只可遣人勸商，未便干預其內政。」各國亦均同意決用勸告方式，促韓廷注意。

韓王初經口使大鳥警告及袁世凱勸導後，對於戮屍及重用洪之主張，頗為動搖，故當四月十三日金屍運至楊花津上陸後，即暫置江岸民房內，由韓兵五十人守候，以待後命，對於洪鍾宇亦應緩用。其後各國使領復加勸告，袁世凱亦接李鴻章電勸阻，韓王允加審慎。但諸閥及其他仇家報復心切，堅主戮屍以洩憤，韓王終於黑夜（約在四月十七日左右）傳命處金屍以凌遲之刑，曝屍軀於楊花津頭，上插「大逆無道玉均」之標幟，首級則懸漬傳示八道。

（四）李逸植謀刺朴泳孝計劃之失敗

洪、金等赴滬後，李逸植乃積極進行暗殺朴泳孝及其黨人李圭完、鄭蘭教、柳赫魯、李誼吳等五人之計劃，招權氏兄弟於其妾宅大阪市外會根崎村野村家，從事準備，先斷髮洋裝，俾便於行兇後逃匿。三月二十五日李、權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三日

三〇

人共赴東京，寓居於常宿之芝區櫻田本郷町雲來旅館內，川久保常吉亦來參與謀劃，決招朴泳孝等來雲來館內，禮之。但朴等似已微知李有不利彼輩之意，屢招不至。李逸植等以洪鐘宇在滬行刺金玉均之期已迫（洪自日動身時，李囑於三月二十八日在滬旅邸下手），倘俟兇報達日後，朴等必生戒心，事益難成，因此頗爲焦急，會朴等已偵知李逸植確有謀害之意，乃決招李逸植至朴等所設之親隣義塾（韓人學校）內詰之，遣使促李于三月二十八晨來晤。逸植雖知此行必無善果，然以事機迫切，若不訴之非常手段，必難有成，因毅然應諾，蓋逸植料定彼至親隣義塾後，朴等必縛已訊問，屆時正可使權氏兄弟闖入，乘機行刺也。

二十八日晨逸植命川久保常吉將豫裝彈藥之手鎗二支及刀劍二口授權氏兄弟，命其於預定時間內來襲，於是倉皇出雲來館，九時許抵親隣義塾，李圭完、鄭蘭教二人出見，未及數語後，兩人果將逸植綑縛。約三十分許，朴泳孝亦來，乃共同訊問逸植。逸植虛與應答，以待權氏兄弟之至。但權氏兄弟事前雖允按時進襲，惟自逸植離館後，驚其手段非常，頗爲躊躇。至十一時左右，鄭蘭教、朴平吉二人突然來館，聲言受李逸植之託，來取行李。權氏兄弟見事出意外，頗爲沮喪，終未敢至親隣義塾，而逸植之計劃完全失敗。

朴等雖不能從李逸植之口供中得悉謀害詳情，但於彼之行李中檢出韓王勅書二幅，皆係繭紬地質，用黑色金泥書寫，其文如下：（文字間有難解處，然爲存真起見，不加改正，句點亦照舊。）

勅託于 李逸植、閔泳翹

朕深知卿等之忠心智力也，卿等熟知朕之大憂也，君父重託之下，君子盡忠於上，天地之常經也，同謀良策滅逆高扶王室焉，壬辰四月初六夜，於長安堂中親製親印。

君父○（此即圓形徑長一寸七分）

重批

或有碍拘先斬後啓宜當向事

詔諭

勅命李逸植討滅甲申漏網逆賊等，息朕之大憂也，用人及用錢，全關釜山港監理署，而生擒戮斬臨時隨機自主

焉，壬辰四月初六夜，於慶福宮之乾清宮長安堂，親製命于閔泳韶安寶璽。

大君主□（此印方形每邊長二寸）

朴等因知李逸植有謀害決心，且係受國王之命而行，乃將彼暫拘禁於親隣義塾內，徐議應付辦法。事爲日本警廳所知，乃於二十九日午後二時至親隣義塾檢查，將朴泳孝、李逸植及有關係諸人悉行拘留，同時又遣員至雲來館中搜查。權氏兄弟聞風逃往朝鮮使館，故僅捕獲川久保長吉一人。其後日外務大臣向朝鮮代理公使俞箕煥要求引渡權氏兄弟，韓使不許，日警廳強執之，與朴泳孝、李逸植等共交東京地方裁判所審判。六月二十六日宣判，鄭蘭教、李圭完二人被判不法監禁制縛毆打，處以重禁一月十日及一月，並罰金各二元，餘均以不在日本法律干涉以內，宣判無罪。

先是警廳拘捕李逸植、朴泳孝等時，獲得李逸植所携韓王勅書二通，在警廳訊問時，即舉以示李逸植，詢其真偽。逸植答稱確係韓王所授。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因於四月二日訓令駐韓公使大島向韓廷質詢。袁世凱力囑韓廷否認，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督辦趙秉稷即以公文回答：「李逸植膺造詔書，僭越於隣國，其罪實不可赦。」以塞責。李逸植至地方裁判所後，亦一翻以前在警廳所述，聲稱勅書係彼在大阪妾宅中所偽造，非韓王所知。然此皆推諉卸責之言，未可置信也。

又當日警至韓使館強拘權氏兄弟後，韓廷以其違背公法，甚爲憤恚，擬撤駐日韓使，並向日使大島質問。而駐日韓使俞箕煥憤懣之餘，竟不待韓廷訓令，逕携印卷回韓，跡近絕交。袁世凱聞訊，以韓員不諳交涉慣例，恐因此引起弊端，急囑韓廷勿多生事，並令趙秉稷照會大島，派金思純代理駐日使務，一面又請韓王申斥俞箕煥，以全日本體面。

（五）金玉均事件之影響

甲申事變後金、朴等亡命日本。日人日爲憂國志士，類與往還，而金玉均豪邁尚義，朋友尤多。此種友誼雖含有若干對於真實亡命志士之同情心，然最要目的則在聯絡金氏以供他日之用。蓋自明治六年征韓論發生以來，朝鮮問題深入人心，在野志士恒憤當局之對韓軟弱，而早蓄雄飛韓島之志也，當金玉均被殺消息傳至日本後，金氏友人

同聲悲悼，不久金玉均從者和田延次郎由滬回日，備述金玉均死狀，並言當三月二十九日上海黃知縣偕日副領事及英美官吏在東和洋行檢驗屍身及豫審洪鐘宇後，黃知縣本已應彼將金玉均棺木運回日本，詎料三十一日正將載運金之棺木於西京丸回日時，突爲清吏阻止不果。（此言不確，後當詳爲討論）。因此金氏故人等頗爲憤恨，即組織一「友人會」，遣齋藤新一郎及岡本柳之助二人爲代表，赴滬調查真相，且設法運回金玉均屍體禮葬，以慰亡魂。但當齋藤等抵滬時，金之屍體已爲租界警察引渡於上海知縣。彼輩無法可施，乃悵然歸國。會不久金玉均屍被戮之消息至日，金氏舊知頗爲憤慨，多方宣傳，鼓動輿論。謂金玉均之赴滬，係出李鴻章子經方之函招，故此大暗殺陰謀實出自中國之指使。又謂金屍經檢驗後，從者和田延次郎已得清吏之許可，將金屍運回日本，臨行清吏忽食言阻撓，其後中國當局反特遣軍艦將金屍運韓凌遲，實爲對於日本之重大侮辱，豈可忽視不問？（關於此兩點，將在下節「中國責任問題之檢討」中詳細討論，茲僅根據日方宣傳，略爲敘述，以明日本輿論憤激之由來）。於是對清宣戰聲浪，震盪全國。五月十八日衆議院會議時，議員守屋此助關於金玉均事件作激烈之質問演說曰：

「日本政府雖認金玉均案爲私人之事，但余則認爲係日清韓三國間外交上之重大問題。……中國政府將一度曾以正堂堂之手續交付日本人和田延次郎之物，（指金玉均屍而言）毫無正當理由，含糊取回，用本國軍艦與洪鐘宇同載赴韓。諸君試思此事非對我日本國加以侮辱乎？非無禮之舉動乎？非無禮乎？非侮辱乎？無禮！侮辱！余確信可名此事爲侮辱與無禮！……」五月二十日

金氏友人等以金氏遺髮舉行盛大葬儀於東京淺草本願寺，執紼者不下數千人，日本朝野對此事之憤激，由此可知矣。

金氏友人所以熱心奔走呼號者，對金友情關係固亦不失爲一原因，然最要目的則在藉機實行排清謀韓之宿願耳。彼輩激動輿論之目的已達，於是進而探詢當局之意嚮，命的野半介爲代表，於葬儀之翌日訪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謂：「清國當局對金玉均之處置，實爲日本之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應斷然向清宣戰，以雪清韓加我之國恥，確立我國在韓之勢力。」陸奧答稱：「若爲一他國亡命客之死而宣戰，決不可能，君等之言皆係書生之論，恐難遵行。」既又謂：「戰之能成與否，悉聽川上。」乃作介紹書命的野携見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當時參謀總長爲有栖

川宮熾仁親王，但負責實際責任者則爲川上操六，故其態度極堪重視。的野得陸奧介紹函後，乃往謁川上將軍於其番町私邸，謂：「閣下從去歲至今春，親察西伯利亞、滿洲、北京等處，對於清國之易與，諒有十分自信，帝國自明治十五、十七年以來，在遭受清國之侮辱豈止一再，況此次清國政府對金玉均氏之殘暴無理，非僅對付一亡命者而已，實可視爲懷抱蠶食朝鮮野心而對日本挑戰之行爲。帝國於此際應發問罪之師，對清採取斷然處置，此實余等之希望，而所以來此謁見也。」川上甚然其言。然以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素主慎重，恐難成事實，乃謂的野曰：

「根據陸奧君之介紹書，知君爲玄洋社中之一人，聞貴社爲濟濟遠征黨之淵藪，豈無一放火之人乎？若能舉火，則以後之事爲余之任務，余當樂就之。然政府實權在非戰論者手中之際，戰爭恐難實現。」

語意中充分暗示：若玄洋社志士能釀成較大之作戰口實，則彼可挺身而出，事必可成也。的野大爲所動，歸與同志等謀，決計渡韓攪動中日間之波瀾，以造成日本作戰之口實。旋告其事於玄洋社先輩頭山滿及平岡浩太郎，二人頗加贊許，決助其事之實現。後日「天佑俠」在韓之勾結東學黨擴大亂事，蓋即發端於此也。的野晤平岡後，復介紹往謁川上，川上對平岡之大陸經營政策頗爲贊同，而對主戰論之主張尤爲傾心，乃喟然嘆息曰：「今之所謂議會，乃一無識老百姓之集團，頗爲遺憾！若得如君等有武士涵養之有志者十人或十五人，佔議會之一角，則我輩軍人常能暢所欲言。」因勸其參與議員候選，俾能於議會中與彼等呼應，以完成經營大陸之宏圖。

觀上所述，自金玉均戮屍消息傳至日本後，志士奔走呼號，輿論憤慨，中日關係已陷危險狀態，戰事所以未即爆發者，第以日本當局認爲未便以一他國亡命客之故而向清國挑戰耳。然挑戰之決心則已確立，觀於外長陸奧及參謀次長川上對的野之談話可知。會不久東學黨之亂發生，中國應韓廷之請，出兵代爲平亂，日本認爲係引起戰事之絕好機會，故雖事實上日本毫無出兵之必要，清廷亦應亂平後立即撤退，但日本當局斷然出動海陸大軍，且設置統一指揮遺囑海陸軍之大本營，儼臨大敵，蓋因早有宣戰之決心也。「福澤諭吉傳」編者石河幹明論金玉均事件之影響曰：「……細考此事之前後情形，誘金至上海出自中國人之計劃，固不待言。事後中國政府復特別以軍艦堂堂護送。此種日無日本之舉動，直將日本帝國之顏面蹂躪殆盡，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此爲日本國民一致之感情，予全國人心以極大之衝動。對清開戰雖爲多年來之宿因，此事確爲一大動機。其後東學黨亂起，我政府聞中國出兵朝鮮之報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三日

三四

，急命回國之大島公使率兵入韓京，此事距金之死僅二月餘。大島成行後，日清戰端不久即起矣。」金玉均事件影響之重要，由此可知矣。中文書籍「中東戰紀本末」卷四朝警記二亦曰：「日本先聞金玉均慘死之報，即營葬其遺髮，朝貴鄉紳及上下院議院人員不下數千衆，皆甘心爲之執紼。及聞戮屍之耗，各新報益警議蜂起，朝鮮外寇之亟，問不容髮，而朝王不悟也。」編者蔡爾康對於事實之先後雖稍有錯誤，然於金玉均事件之影響，見解頗稱得當也。

(二) 中國責任問題之檢討

金玉均事件之引起日本重大物議者，簡言之，約有二點：一爲金玉均之赴滬係出自中國之計謀，一爲中國官吏將金屍一度交付和川延次郎後，無故奪還而特別以軍艦護送朝鮮。報章志士故意誇張宣傳，希望擴大事態，以達對清宣戰之宿願，固然有之；然日本一般國民感情上確信此二事係中國對口之侮辱，而發生仇敵心理則係事實。故茲特稍假篇幅，就此二點略加討論，以明中國責任之所在。

就第一點言，當時日本盛傳金玉均之赴滬，係由李鴻章子前駐日大使李經方之函招，書中謂：「關於東洋之事，我輩不可不互相提携，今朝鮮內政大紊，吾國欲予援助一臂之助力，希來面晤共謀。」云云。但此書係由洪鐘宇手交金玉均者，真偽頗可懷疑。玄洋社史等記載此事，亦多存疑。故若欲根據此種傳說，而謂金玉均之被殺，係出中國之計謀，自難令人置信。然有二事頗可令人注意者，一即李經方任駐日公使時，與金玉均頗有往來；一即金玉均之赴滬，駐日中國公使館確知此事，且命使館翻譯吳靜軒同行。關於此二事，當時日本時事新報因駁斥中國公使館聲明汪公使與金不相識之故，臚列證據甚詳，茲節譯於下，以供參考：

「金玉均氏生前與李公使屢相過從，係不可爭之事實。及李公使丁憂歸國，乃介紹金氏於後任汪公使，爾來汪公使步履前使李經方，與金交際頗爲親密。自去歲九月頃，金氏屢訪公使館，實爲金汪會晤之鐵證。李經方歸國後，在蕪湖屢寄書金玉均，促遊清國，此書曾由汪公使兩度代爲轉致金氏。

今歲二月六日，金應汪公使之邀，參與公使館之新年宴會，（譯者按二月六日爲陰曆元旦日，故清使館舉行新年宴會）從去年八月至七月間，汪公使屢與金氏會晤，稱得李經方來書，頗促赴清一行。

金氏有渡清之意後，爲學習日常華語及充其渡清後之翻譯起見，托汪公使代爲相當人物，公使曾爲介紹二

人。

金玉均渡清之際，汪公使頗表好意，告以吳靜軒之旅費，可由中國公使館作歸國之旅費發給。金固辭而自與之。金玉均定三月十日夜出發，於其前二日晚，設宴於帝國旅館，邀請汪公使及館員數人。汪公使以事辭却，館員劉氏等數人臨席。

金氏一行定於三月十日夜九時五十八分乘赴品川之汽車首途，行前金玉均特赴高輪邸訪後藤伯爵告別，晚餐後方雅談間，汪公使特遣使者持名片來迎，請金氏至芝邊某小飯店作臨別談話，從七時半至九時少過始休。此名片在上海檢屍時猶依然存留於金氏懷中。」

此文雖係贊助金、朴最力之福澤諭吉所作，然證據確鑿，未可因人廢言。且鑒於李逸植、洪鐘宇之以依賴李經方之言動金氏，及金氏之毅然冒險赴滬，至少可以證明李金間必有相當之交誼。

其次就清使館與金氏赴滬之關係言，吳靜軒之隨行，不但日籍記載如此，中籍「中東戰紀本末」及西籍 Ilenn Cordier 所著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亦皆云及。North China Herald 記載金玉均被殺新聞中，曾謂：「兇手究以何法誘金至華，雖不可知，但有一事殊足重視者，即金之伴侶中有一係東京中國使館館員。」並刊登吳葆任（吳靜軒之字）之名片。其後中日啓釁，太僕寺少卿岑春煊奏參汪鳳藻片中，亦有「乃汪鳳藻信其甘言，竟派遣事吳升又名吳靜軒者同赴上海，以致金玉均被刺，日本有所藉口，遂開邊釁」之語。故吳之伴行，決無可疑。吳靜軒係清使館翻譯而伴金赴滬，清使館謂為不知其事，殊難令人置信。故作者以為時事新報所載駁斥中國使館之言，毋寧視為可信也。

總之，李經方在日時之與金玉均頗有往來，及清使館之知金赴滬而加以慫恿，實為不可爭辯之事實。中國當局之視金玉均，不但以彼為甲申事變之戎首，且目為未來之禍根，不但慮其勾引日本，且懼其不得志於日，更轉而求援於俄美，故其欲得金氏之心，並不亞於韓廷，觀於一八八五年間鴻章之屢囑駐日公使向日廷要求引渡金氏可知。李經方為李鴻章之子，且係中國之出使大臣，竟與本國當局所痛惡之金氏相交，丁憂回國時，復介紹於後任汪公使，此種舉動，謂非出自李鴻章之授意或默許，而不含有他種作用，殊難置信，此可懷疑者一。李經方之赴滬係在一

八九一年初，適當金玉均恢復自由之後，經方之與相交，是否含有監視及防範之意？此可懷疑者二。金玉均之赴滬，清使館事實上加以慫恿，且派吳韻譯伴往，中國當局豈有不知之理？但金玉均抵滬被殺後，中國當局對於刺客洪鐘宇不但無膺懲之意，以盡道義上之責任，反向美捕房引渡而加以保護，一若全不知清使館與金氏來滬之關係者，此可懷疑者三。再就袁世凱言，其手腕之靈活，監視之嚴密，韓廷事無大小，彼悉瞭如指掌，王遣派李逸植行刺之事，豈能不知？況袁世凱之對金、朴，早勸韓王實行暗殺，一八八五年復屢電李鴻章飭駐日公使要求引渡，第一次刺客池運永之遣派，據池言袁亦與聞此事，然則李逸植之遣派，韓王焉有對袁秘密之理？此可懷疑者四。因此作者以爲金玉均之被殺，毋寧認爲中國預聞此事，縱非指使或參與，亦必加以默許也。惟可詫異者，細檢李鴻章電稿、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諸書，自一八八五年後及金被殺時止，其間袁世凱及駐日公使與李鴻章及總署間往返之電報，以李與總署或其他官吏間往返電報，絕無一事道及金、朴之事者，即其他奏稿文件中亦復如此。而金氏暗殺事件發生後，李、袁、汪使及總署間之電報亦極少，豈中國當局以恐引起責任問題而加以毀滅乎？觀於事發後袁世凱曾電鴻章飭上海道檢查金玉均行李，悉焚金與韓廷大臣間之通信，免起大獄，而引起朝鮮國內及國際間之重大糾紛，袁氏頭腦之細密可知。故對於不利本國之文件，而請鴻章加以毀滅，亦殊可能。要之，我人不能以中文方面毫未提及，而將日籍所記一概抹殺也。以上所論，係作者客觀之檢討，僅可視爲個人之見解，至於確論之成立，尙有待於新史料之發現也。

其次就第二點言，日人認爲中國官憲從和田延次郎手攘奪金屍，而特別用軍艦載運赴韓，係對日本之重大侮辱。今舉一八九四年五月十八日衆議員守屋此助在衆議院會議時之質問演說，即可代表日人對於此事之見解。其言曰：

日本政府雖以金玉均案爲私人之事，但余則認爲係日清韓三國間外交上之重大問題。蓋因金所購買者爲來回票，且雖至上海，但仍寓居日人所設之旅館東和洋行，可知彼實始終欲立於日本保護之下，且此人既被槍殺於中國之上海，檢屍手續在事變發生之國內舉行，雖屬當然；但檢屍手續完畢後，上海道台非已決計移交日本人和田延次郎乎？此種移交手續一經完畢，則即成爲日人和田延次郎之行李，和田因辦理稅關手續，作爲行李

，欲載於日本郵船會社之船上回國。當將運回之際，上海道台之檢屍手續已畢，中國官吏自宜視為毫無問題而交於日人和田延次郎，則此後即成爲和田延次郎之行李，此物祇爲個人之私有物，與國家交際及外國關係上，毫無關係。若然，則無登此演壇陳述之必要。但此事適已述及，且爲諸君所熟知，實有干涉日清韓三國之重大關係。……中國政府將一度曾交日人和田延次郎之物，以正堂堂之手續交付之物，毫無正當理由，於曖昧模稜之間取回，用本國軍艦與洪鐘宇同載赴韓。諸君試思此種舉動，非對我日本國加以侮辱乎？非無禮之舉動乎？……」

觀此日人認爲清廷之加以侮辱者，一爲截奪金屍，一爲以軍艦載運赴韓。茲分別討論於下：

關於截奪金屍一事，日方解釋已如上述，但此種解釋頗與事實不符，蓋當三月二十九日上海縣黃知縣及日英美官吏同在東和洋行檢屍後，和田延次郎向上海縣黃知縣請求於三月三十一日奉金氏屍棺乘自上海啓碇之西京丸回國，黃知縣因有向上峯請示之必要，謂須停留七日載運，旋又謂日領館速水翻譯官曰：「和田如必欲載回，須俟明日正午本縣函達貴署。」翌三十日黃知縣通知日領館，務須停留七日載運。但先是日領館似因黃知縣並未堅決反對和田運屍回日，以爲此事僅係手續問題，已擅應和田於翌晨奉金氏屍棺回國，且已辦理通關手續，不允。三月三十一日和田將運金屍棺乘西京丸回日之際，上海縣以前日已有通知，遣使命其停止。和田乃將金棺置於路傍，而向日本總領事館請求保護。正交涉中，上海租界警察署以道傍放置屍棺，爲租界規則所不許，即扣留置於警察署，和田見此問題益趨複雜，即單獨乘船回日。租界警察將遺骸一度安置於虹口警察署後，經上海縣之請求，即行移交。上海縣乃將金棺暫厝湖南會館，及該使徐相喬來滬，乃交彼借成靖艦運韓。然則中國官憲根本即未應和田將金屍於三月三十一日運回日本。日本報紙所載「清國官憲將金玉均棺木一度用正堂堂手續交付和田延次郎之後，復毫無正當理由，奪還輸送朝鮮」之說，根本錯誤。揆之慣例，上海縣在未得上峯許可之前，當然不敢貿然應許和田將金屍運日。故此事與其歸罪中國，毋寧視爲日本總領事館之疏忽，與夫日人誤信和田激於情感之宣傳所致也。

關於中國派軍艦載運金屍及洪鐘宇赴韓一事，在日人或認爲有特殊意義，但細檢鴻章與上海道之往返電報，（載李全集電稿第十五卷）用軍艦護送一事，並非出自鴻章之意，實係上海道之主張。蓋因其時上海仁川間定期航路

未開，無便船載運，上海道因請得南洋大臣劉坤一之許可，而派威靖艦載運，一切煤料費用仍由韓廷償付，故此舉並無特殊重大之意義，且金玉均之死雖爲鴻章之所樂意，但故意用軍艦護送以侮辱日本，此種不必要之刺激日本感情之舉動，決非不顧中日多事之李鴻章所願，由此益使作者深信中國之用軍艦護送，實由於無便船之故。因此而激動日本國民之感情，當更非鴻章所料及也。至於中國之應朝鮮引渡金屍及洪鐘宇，在法律上及慣例上更毫無不合之點，蓋金洪皆爲朝鮮籍國民，中國根據中韓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第二條，應韓廷之要求而加以引渡，自屬至當之事。且金氏雖居日本，並未改籍，日廷更無置喙餘地。故日外長陸奧宗光答覆守屋質問中，亦謂：「發生此事變之所在國政府，——清國政府——以一朝鮮人金玉均之屍體及一朝鮮人加害者洪鐘宇引渡於任何人，帝國政府殊無干涉之理也。」

按：「後任汪公使」係指汪鳳藻，鳳藻字芝房，江蘇吳縣人，是時繼李經方後出任駐日公使。「步塵」一語爲由日語直譯而成，似應譯爲「步前使李經芳之後塵」較佳。

註一：「字林西報」，頁五八六，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日。

註二：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五十三年一月，頁一二五——一三五。

註三：同註二，頁一二五——一四二。

二十八日（五月三日） 李鴻章、劉坤一會奏規復上海機器織布局，並另籌推廣。

清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奏明上海機器織布局開辦情形。略曰：

「總廠請辦紗機七萬錠子，布機一千五百張。各分廠請辦紗機四萬錠子至二萬錠子不等。其有兼辦織布者，請辦布機五百張至二百張不等。統共紗機三十二萬錠子，布機四千張。合之湖北辦紗機八萬錠子，布機一千張，共成紗機四十萬錠子，布機五千張。如果紗布暢銷，機器全行開辦，約計每日夜可出紗一千包，出布一萬匹。每紗一包通扯銀六十兩，每年約得紗價一千八百萬兩。每布一匹通扯銀二兩五錢，每年約得布價七百五十萬兩。」（註一）

按：上海機器織布局奏設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李鴻章奏請由道員龔壽圖總其事，鄭觀應、經元善等

助之，因資本不充，人事不協，始終難有發展。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時，上海織布局所設織機僅二三百張，每日開織祇五六百匹，年纔十八萬匹，約當進口洋布八十分之二。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鴻章復添派紳商，增籌資本，每日夜已可出布六百匹，銷路漸暢。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九月十日，該局突焚於火，所有機房付之一炬。鴻章乃奏派盛宣懷會同江海關道聶緝縵，商明前辦紳商，妥爲結束。宣懷抵滬後，經兩三個月之整頓，復集股百萬就原址另設華盛總廠，另在上海、寧波、鎮江等地，分設大純、裕源、華新、裕晉等十廠，鴻章即奏派盛宣懷爲督辦。是以本日鴻章乃合劉坤一有規復上海機器織布局情形之奏。

附錄：李守孔撰「上海機器織布局」（註二）

（一）

鴉片戰後，中國進口貨物除煙土外，以紗布爲大宗。向時每歲進口值銀一二千萬，至光緒十八年漸增至五千二百餘萬兩，其中印度英國紗布將居半數。以致白銀外流，華民失業，是以國人早有設廠製造之議。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九月，張培仁所著「論勸精圖治之益」，力陳紡織之重要，其言曰：

自與西人通商以來，中國之銀溢於外國，而中國口窮。其大宗不過二端，鴉片煙外，厥惟洋布。查近年各省所銷之洋布，每歲不下三千萬兩，外洋之織機日增，中國之行銷日盛，以至中國所產之布滯銷，小民之生計愈艱，其勢已不能杜絕，則惟有自行開局仿辦，潛移外洋之利權，隱維小民之生計。前閱上海織布局新訂章程，所陳中國機器布勝於外洋者約有三利：大段言中國棉花本輕一利也。人工價賤二利也。水脚減省三利也。故以試辦三百張織機計之，每年共需銀三十六萬八千餘兩，可出各種布二十四萬疋，約可售銀四十四萬四千餘兩。除抵本銀，可餘七萬五千餘兩。推而行之，十年之後，中國之漏卮可塞，而局中需用男女工作皆當於近地僱用，小民生計亦不無裨益，是則其利固昭然若見矣。……

抑更善焉者，局中既僱洋工，當選華人之伶俐者從之學習，務致其精，數年之後，華人之精其藝者多，即可分置各州縣設局興辦。如此則洋工之鉅費省，本輕則利愈厚。由此推之，機器織綢之舉，厥利維均。蓋絲本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二十八日

四〇

輕，人工賤，水脚輕，三者與織布同。且織布僅行於中國，不過塞中國之漏卮，若織綢能行於外洋，並可獲外洋之厚利。

王韜則建議「織絨則設於天津、直隸，以取口外之羊毛。織布則設於上海、蘇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織綢則設於湖州、杭州，以購其地之蠶絲。」認為外人之貿易於中國者不過以布匹爲大宗，若我自織則物賤而工省，且無需乎輪船之轉運，其價必貶，西人又何能獨專其利哉。

(二)

先是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李鴻章奏設機器織布局於上海楊樹浦，集股銀四十萬兩，以道員龔壽圖總其事，鄭觀應、經元善等助之。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刊佈章程，由鴻章奏准，十年之內中國不另添設新廠。惟因資不充，人事不協，遲遲未能開辦。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夏，織布局復刊布新章，謂資本虧折將盡，已成殘局。一時輿論譁然，乃有整頓之議。同年十一月初三日，鴻章致電兩廣總督張之洞曰：「鄭觀應經理不實，現甫從新整頓，集股無多，尙難大辦。」是鴻章已著手整頓矣。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七月二十四日，旨命兩江總督曾國荃、江蘇巡撫剛毅、護理江蘇巡撫布政使黃彭年，切實查明奏覆。同年十月十四日國荃奏稱：

竊思北洋大臣李鴻章，當時擬設是局誠以洋貨行銷中國，日增月盛，尤以洋布爲大宗。是以轉令購買機器，設局仿造布匹，所以敵洋產而杜漏卮，用意至爲深遠。奈開辦之初，不得其人，以致股銀虧短，日久無功。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五月二十八日，道員馬建忠爲上海織布局事致電鴻章曰：「織局前奉撥款四十萬，內代前局墊付約二十一萬，付添購已到機價約十三萬，付添造正廠與九十餘間住房約五萬，所餘僅兩萬餘，而一切薪工花本均不在內。」其困難之情形可見一斑。

是時上海織布局所設織機僅二三百張，每日開織祇五六百匹，年纔十八萬匹，約當進口洋布八十分之二。因此建忠建議，或將原設織布局擴充資本，或另設立新局，俾每年所織之布足敵進口貨十分之一，始能收回利權。推而廣之，織絨、織呢、織羽、織氈，皆可次第施行。

(三)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鴻章復添派紳商，增籌資本，努力經營，每日夜已可出布六百匹，銷路漸暢。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九月十日，該局突焚於火，所有機房付之一炬。鴻章乃奏派盛宣懷赴滬，會同江海關道聶緝綏，商明前辦紳商，妥爲結束。宣懷奉命後，將所知廠中情形專稟鴻章。略曰：

伏查織布原局欲圖籌本規復，必須先將前賬結束，庶免人言搖惑，商情疑沮。茲查前布局楊道抄賬，現存銀錢布疋大約僅敷抵還零星欠款。該局實計官款二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兩，商股存銀五十五萬四千九百兩，又仁濟仁和保險局存銀八萬兩，龔升道在江海關任內存銀二萬兩，又楊藕記借墊各款銀十餘萬兩。

現據沈道楊守電稱，全局被焚之後，僅存基地、監工、女匠房屋，及損傷機器、鍋爐、銅鐵、廢料，值銀諒必無多。職道到滬後，自當遵飭會同聶道遴派中西公正人員，逐項估價，籌議難派。惟應如何攤派，章程必須應先請憲示。……此次織布局尙欠官款規銀二十六萬五千餘兩，若以燼餘之地產物料盡數變價歸官，亦是不敷尙鉅，而該局存款股分莫不向隅飲恨。

查該局股分皆係各省紳商仰承憲臺札飭招商，踴躍入股，十年以來無利息。舊股則以百兩折成七十兩，補交三十兩，共計三十三萬四千九百兩。新股則係招商保險局奉飭將暫存生息之款作股分二十萬兩，又前津海關道遵飭附股二萬兩。存款則招商保險局奉札提暫存生息三十萬兩，以二十二萬兩作股分外，尙存八萬兩。

十月二十七日鴻章批覆曰：「（上略）按照商股銀五十五萬四千九百兩，及奉飭之存款銀十萬兩，如數秉公攤派。並查明舊股票摺，將各股應派分之銀數，填發新股票，與新局股分一律分利。舊股票摺均作廢紙，所欠北洋各局欠款二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兩，歸併以後，官商各局廠，按每出紗一包捐銀一兩，陸續歸繳，免其分攤燼餘估價之項，以恤商情。」

宣懷既抵滬，經兩三個月之整頓，復集股百萬，就原址另設華盛總廠。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宣懷致電鴻章曰：

規復織局籌本百萬已有頭緒，股商遠慮他日辦好恐爲官奪，擬改爲總廠，亦照公共章程，請署廠名一律商辦。先舉廠東候補知府盛宣懷爲總管，嚴作霖管銀錢，沈廷棟、褚成煒管工作，許春榮、楊廷果、嚴深管買賣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三月二十八日

四二

棉花、紗布，均稱董事。股票宣懷簽名，撤去批發所，在租界內設立公所，即爲督銷總局，由督辦稟請一提調駐局領置運單，查貨收捐，歸繳舊欠，總分各廠總管均爲公所董事，隨時集議。

宣懷勸告華商另在上海、寧波、鎮江分設大純、裕源、華新、裕晉等十廠，布置年餘，次第開辦，鴻章即奏派宣懷爲督辦。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三月二十八日鴻章奏曰：

總廠請辦紗機七萬錠子，布機一千五百張。各分廠請辦紗機四萬錠子至二萬錠子不等。其有兼辦織布者，請辦布機五百張至二百張不等。統共紗機三十二萬錠子，布機四千張。合之湖北辦紗機八萬錠子，布機一千張，共成紗機四十萬錠子，布機五千張。如果紗布暢銷，機器全行開辦，約計每日夜可出紗一千包，出布一萬匹，每紗一包通扯銀六十兩，每年約得紗價一千八百萬兩。每布一匹通扯銀二兩五錢，每年約得布價七百五十萬兩。英人干德利（R. S. Gundry）所著中國進步之標誌（“Signs of Progress” in China Present and Past, London, 1895）比較宣懷接辦前後上海機器織布局之情形曰：

李鴻章早在一八七八年就已籌劃這個工廠。但是這個計劃一年一年地拖延下去。地買了又圈起來，地基也打好了，碼頭也開始建造。但這事情却就這樣懸著，從美國進來的機器，多年都放在倉庫裏頭。……一八八七年計劃又被熱心地重行推行到底，並獲得了成功。這工廠所出產的布和線紗在市場上暢銷，且獲厚利。但在一年計劃又被熱心地重行推行到底，並獲得了成功。……人們立即向英國訂購十萬錠和一千五百織機的新機器，廠的建築工程不再像第一次拖延了十二年，而是在十二個月的裏頭全部完成。

足見宣懷經營之成效。鴻章乃請准總署立案，今後不再設立新廠。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春，英商怡和洋行新購紡紗機二萬錠，擬在上海設廠製造。正月十日宣懷致電總署曰：

倘不堅持，則連翩而至。我國所設之廠資本艱難，必被傾軋，恐已成者虧折停工，未成者裹足中止，而本國大利獨爲他國所擅。……所有運到之機器，如果不能載回，或由紡織公所給價買存，不令該商向隅，亦足以敦友誼。

總署據以向英使交涉，怡和設廠之計劃乃未實現。於是中國收回利權日多，而紡織業遂因之而改觀。上海字林西報

專載華盛總廠之規模曰：「上海楊樹浦設有紡織局，本華人擬立，辦理者極意經營，不遺餘力，西人初往觀，莫不歎爲奇舉。……該局地面約二百八十碼，後依黃浦，前臨馬路，去西人租界約十餘里，廠房長二百五十尺，寬八十尺，分樓三層，第三層尚未告成。有一大煙，高一百二十五尺，又有棧房。辦事房外另有軋花局，其去子之機器俱爲英國軋輪之法，紡紗機器係美國造者。織布機器尚未造成，爲英國造辦者。大汽機有五百馬力，亦美國造者，現已安置妥當，開工紡織。……當時工作，以早七點鐘起，晚至黃昏止，將來擬用電燈，而晝夜工作。所用華匠人，分檢棉花去其異質，聚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西匠三人教習各工。」其後宣懷雖返天津任所，仍隱操其事。

(四)

甲午戰後，日人據約在華設廠製造，各國效尤，華盛各廠漸感不支。拳亂之後，益不如前。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宣懷奏報華盛諸廠虧累情形曰：

（上敘接辦情形）日本畔生，馬關約定，商股觀望。未交之款，招之不來，機錠已開，勢無中止。商董竭蹶籌款，力已難支，而洋商得在口改製土貨之條，急起直追，來與我角。怡和、瑞記、公茂、鴻源各洋行，運機造廠先後開辦，花價因爭買而益漲，工價因爭僱而益昂，在上海華洋商廠皆聚於楊樹浦一隅，互相傾軋，無不虧本。而華商魄力太微，與各洋廠馳逐於咫尺之地，不待智者而策其必敗矣！裕晉廠見機獨早，稟請將全廠售歸德商，裕源廠亦稟請另招洋商入股，大純、華新均岌岌自危，不可終日。華盛機器倍多，虧折愈甚。……若聽其停工止辦，不特與抵制洋貨本意不符，且機器一經停輟，必致銹損難修，無法收捨。自應准其另招新商，頂替改換廠名，再接再勵，核與商務章程毫無違礙。

其後發展雖不如理想，而宣懷對中國紡織業之貢獻仍不可沒也。（註二）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八，頁十。

註二：節錄李守孔：「雜誌盛宣懷的事功」，原載「傳記文學」卷十四，第三、四、五期。

四月

四日（五月八日） 朝鮮東學黨數千人大起於全羅道，傳四檄方，痛詆吏治腐敗。

東學黨創立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由崔濟愚所領導，取儒家佛老之說，轉相衍授，謂得天主啓示，授以仙藥咒文，佈教濟民。以儒教拘於名節，未達玄妙；佛教趨向寂滅，而絕倫常；道教悠悠自然，缺治平之術，於是融合三教，以「誠敬信」教人，製成咒語，號稱東學，與天主教代表之西學相對抗。其首領稱道主，以下各道有大接主，郡縣有接主。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起於慶尙道之慈仁縣，蔓延忠清、全羅諸道。翌年韓廷擒東學黨首要崔濟愚等二十餘人，殺之於大邱，其族人崔時亨傳其法，信者日多。以朝鮮政治腐敗，財政困難，賦稅繁重，遇有天災，韓王不卹民，人心久思亂也。光緒之後，韓廷剿撫失策，迭失信於黨人，亂事屢伏屢起，勢終不衰。至是全羅道古阜郡民全瑋準乘時托東學而起，逐郡守，奪兵器，開倉濟貧，與崔時亨相呼應。

按：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四月間，東學黨魁崔時亨，自號緯大夫，作亂于全羅道之古阜。……揭藥四項口號，以爲號召：一、弗殺人，弗傷物；二、忠孝雙全，濟世安民；三、逐滅夷寇，澄清聖道；四、驅兵入京，盡滅權貴，大振綱紀，立名定分。韓廷聞警，以洪啓勛爲招討使，統兵八百，偕中國駐仁川之平遠兵艦，率朝鮮之蒼龍、漢陽兩艦，截往格浦海口登岸以剿之，中國駐韓商務總辦袁世凱，遣差弁徐邦傑，帶同丁役，隨往照料。（註一）

註一：參照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冊，文海出版社影印版，頁〇二四六。

二十一日 清廷爲慶賀慈禧皇太后六旬壽辰，舉行恩科殿試於北京保和殿。

本年爲慈禧皇太后六旬壽辰，清廷特於上年詔示舉行甲午恩科考試。先於三月初六日派禮部尚書李

鴻藻爲會試正考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徐郅、工部左侍郎汪鴻燮、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頤爲副考官，舉行會試，取錄陶世鳳等三百餘人。旋於本日行殿試於保和殿，並於先一日簡派大學士張之萬、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麟書、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刑部尚書薛允升、禮部右侍郎志銳、工部左侍郎汪鴻燮、內閣學士唐景崇爲試讀卷官。本日到場應試者，計貢士陶士鳳等三百一十一人。試題爲：

朕寅紹丕基，仰荷昊蒼眷佑，兢兢業業，今二十年，恭逢皇太后六旬萬壽，上維魯頌壽母之詩，俯思大雅作人之化，特開慶榜，策試多士，又嘗恭讀康熙戊戌科，聖祖仁皇帝策問，天子以父安海宇爲幸，是以夙興夜寐，勤求至理，政事之餘，留意經術。

聖訓煌煌，爲萬世法。茲舉河渠之要，經籍之儲，選舉之方，鹽鐵之利，揆時度勢，酌古衡今，爾多士其揚推陳之。治水肇於禹貢，畿輔之地，實惟冀州，水利與農事相表裏，後漢張堪爲漁陽守，開田勸民，魏劉靖開車箱渠，能備述歟？至營督亢渠，引盧溝水資灌溉，能各舉其人歟？唐朱潭、盧暉，宋何承矩浚渠引水，能指其地否？元郭守敬、虞集議開河行漕，其言可采否？汪應蛟之議設壩建牐，申用懋之議相地察源，可否見之施行？能詳陳利弊歟？漢世藏書中秘最善，劉向所校，僅名別錄，至其子歆始總羣書而奏七略，傳注所引，秩然可徵，班志藝文，與劉略出入者何篇？魏晉以後，鄭默中經，荀勗新簿，體例若何？梁華林園，兼五部以並錄；隋修文殿，分三品以收藏。唐承祗柱之厄，始付寫官；宋籍建業之餘，盡送史館。此皆冊府遺文，可資掌錄。明永樂大典，所收之書，今不存者見於何目，能備舉以資考證歟？選舉爲人才所自出，翰林以備顧問，六曹以觀政事，縣令以司賞罰，三者皆要職也。翰林始重於唐，其時學士出入侍從，參謀議，知制誥，能詳其品秩歟？宋儒簡有四，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其選用之制若何？六曹昉自周官，秦漢隋唐，互有沿革，能陳其異同歟？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而後世或掇紳恥居其位，或科甲無不宰邑，豈輕重各因其時歟？抑增重激勸，或得或失歟？鹽鐵之征，始於管子，論者謂其盡取民利，而行之數千百年，卒不能廢，至漢武帝用孔桑之法，與管子異矣。其時所置鹽官二十八郡，鐵官四十郡，能指其地歟？終漢之世屢罷屢復，其年代皆可考歟？唐貞元中檢校鹽鐵之利，其議發於何人？若第五琦、

劉晏、裴休之論。國無足采歟？請引采鹽，而商擅利權，禁民貿鐵，而官多侵蝕，其流弊能指述歟？凡此皆御世之隆謨，經國之盛業也。夫朕以藐躬加於區席之上，受祖宗付託之重，惟思恪遵慈訓，周知民隱，旁求俊乂，孜孜爲治。以濟斯世於仁壽之域，爾多士各抒謫論，毋泛毋隱。（註一）

按：滿清入關之初，爲收攬人心，擁絡士子，特於順治三年因襲明代遺制，在北京先行會試，應試者皆係明代舉人，旋即舉行殿試，取錄三七三名，一甲一名傳以漸，二名呂繼祖，三名李爽棠，即一般所稱之狀元、榜眼、探花，均賜進士及第，並授一名爲翰林院修撰，二名三名均授編修。二甲梁清寬等七十七名，均賜進士出身。三甲單若魯等二十九名，均賜同進士出身。傳臚（放榜）之後，再就二三甲之中，選取若干人，入庶常館研習，稱庶吉士，例須在館三年，散館（即畢業之意）後，視在館成績之高下，績優而原列二甲者，授職翰林院編修。三甲者授職翰林院檢討，餘則以六部主事任用，或以知縣分省任用。

清初考試制度，與明制完全相同，分殿試、會試、鄉試三種。鄉試規定於子、午、卯、酉之年舉行，故子、午、卯、酉稱爲大比之年，會試於大比之次年春日，在京舉行，殿試則於會試後一二月內舉行，此乃例定之考試。惟自康熙五十一年起，每逢國家有重大慶典，如新君即位，皇帝或皇太后萬壽等等，每加科舉行，此種加科，稱爲恩科，所以別正科也。但無論正恩，考試之實質，及錄取者之待遇，則一般無二也。

鄉試例在各省省會所設之貢院舉行，試期爲八月，故稱秋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俱先一日點入，次日放出。應試者以各該省所屬各州縣已入學之生員（即秀才）及監生（監生原須入國子監肄業，其後富家子弟，均可納貢捐取。）爲限。另有在京師舉行之順天鄉試，則爲例外。除順天本籍者外，凡遊宦京師之各省人士之子弟，已具生員或監生資格者，僅須取具各本籍地方官文結，地隣甘結，及同考五人互結，即准一體與試。而此類旅居京師之各省生員，如願返回本省應試者，亦聽其便，不受任何限制。惟非本省生員，則絕對不准參與本省之鄉試，以杜取巧，鄉試

中式者爲舉人。

鄉試之典試官，稱曰主考，例有正副二人，或一正二副，共爲三人。由進士出身之滿漢二品侍郎、內閣學士、三品京堂、未經考試考差之四五品京堂，及翰詹科道部屬中書等官之中欽命簡選，（順天鄉試之主考，有以大學士、尚書簡派者，名省則無之。）另有同考官若干名，（最多不得超過三十人，由進士舉人出身之各該省在職人員臨時派充。）以上正副主考及同考官，均須迴避本籍。

會試應試者爲各省各科舉人，（惟現任知縣及奏改教職之舉人，不准應會試。雍正四年諭准取中鄉試副榜之人，一體會試，則爲例外。）於丑、辰、未、戌之年二月舉行，遇閏因天冷改在三月，故稱春闈。與試者須報由各直省於年前詳覈造冊，限十一月內送達禮部，仍按名給文，並發給旅費，限會試當年正月初十日以內到部投遞，遲則不准參與當屆會試，會試中式者曰貢士。

會試之典試官，亦稱主考，一稱總裁，例爲正副各一人，亦有副考爲三四人者。由禮部開列大學士、學士、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堂官，題請欽名簡派。同考官二十名，內翰林院十二名，六科四名，吏、禮、兵部各一員，戶、刑、工部每科輪用一員，各該衙門推舉資俸優深，才望素著者，移部題請簡命。

鄉試會試之正副主考官，及同考官，辦理命題閱卷，及一應試務，均稱內簾，試前皆須入闈，試畢榜發，始准出闈。其餘試場事務人員，如順天鄉試，用監試御史二員，入場總理諸務，巡察御史二員，搜檢諸生進場，均由順天府咨呈都察院，轉咨禮部，坐名題卷，各省則用巡按御史爲監臨官，（康熙二年以巡按業已裁撤，用巡撫監臨。）並用布政使司員二人爲提調，按察使司員二人爲監試，此類事務人員，稱爲外簾。內外簾各官員，統稱簾官。以上鄉會試內外簾各員，試畢即行銷差，其職務亦即終了。

殿試在京師太和殿舉行，（乾隆五十四年改在保和殿舉行。）與試者爲當科會試已中式之舉人，（即貢士）以前各屆已中式而因愛病未能參加殿試之貢士。及雖未中式會試而由欽命賞給進上准予一

禮殿試之舉人。試期爲會試年之四月初一，初五傳臚。雍正十年改爲四月二十六日舉行，五月初一傳臚。自乾隆二十六年，又改爲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殿試名義上由皇帝親自主持，另行簡派讀卷官，俗稱閱卷大臣，由翰林院、詹事府、吏、戶、兵、刑、工五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門堂官，通行開列，欽點十四員充任。（乾隆二十五年起，以殿試試卷無多，減爲八員。）負責閱卷，並選擇優良試卷十本，晉呈皇帝，欽定名次，然後拆縫放榜。提調官爲禮部堂官，監試由御史充任。試卷於試後第三日起讀閱，第五日，皇帝御殿傳臚，鴻臚寺宣制，賜進士及第有差，張掛黃榜於長安門外。各科進士題名，向均建碑立於國學，按照甲第先後，上刻姓名籍貫，一面將題名錄通行知照各省藩司，留爲案據。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諭：凡新科進士，於引見之前，須先經朝考。朝考由皇帝將四六詩文各體出題。予以試驗。此項考試，不分等第，不計成績，蓋防殿試時或有搶替情事，可以朝考試卷之筆跡，相互核對也。

凡經殿試者稱進士，進士入翰林院者曰翰林。清仍明制，新科進士，除一甲三名，分別授翰林院修撰、編修外，其二三甲進士，經選入庶常館研習者，曰庶吉士。庶吉士非官非職，但依照規定，食從七品俸。按：庶常館爲儲才育才之地，故進士均希望能選入庶常館，以作進身之階。庶吉士散館後授職編檢者無論矣，其分部或分省任用者，例稱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其地位亦較賜進士出身，或賜同進士出身者爲尊貴也。又昔時有稱兩榜進士者，蓋因科舉時代之進士，例須經會試及殿試，會試中式，方可參與殿試，故事凡參與殿試者例皆錄取，僅就與試之成績，作等級及名次之決定，是以進士之稱兩榜者，可表明完全憑真才實學，依正常之程序，考試得來，與賞給之進士，及經特許一體殿試者，大不相同。世人不察，有謂兩榜進士即係二甲進士者，實有未當。此外又有以殿試爲甲榜，鄉試爲乙榜，凡由鄉試及會試而成進士者，稱曰兩榜進士，惟出自賞賜或特准者不預焉。

在昔君主時代，朕即國家，凡百庶政，雖亦定有規章，如考試一項，規定向極鄭重嚴峻，倘有關

節舞弊情事，一種勘實，考官與應考人輒置重典。咸豐戊午順天鄉試舞弊一案，主考官大學士柏蔭之遵樂市，其最著者。但皇帝自享特權，往往以秀才、舉人賞給大臣或功臣之子孫，使其得以至試而能參加高一等之考試。或以秀才、舉人、進士之資格，賞給年老應試人。如舉人何焯、汪灝、蔣廷錫、王蘭生、留保、顧天成、盧伯蕃、李世傑、梁同書、方傳穆、強望泰、溫承悌、蔡本俊、孫慧懌、栗耀、翁曾源（曾源先由監生賞給舉人。）等，均先後賞給進士，准與中式會試之舉人（即貢士。）一體會試。其爲秀才或監生賞給舉人，准予會試者，爲數更多。此外凡應會試而未中式者在八十以上者，均賞編修、檢討、學正等銜。如乾隆五十五年賞九十歲以上之劉湘、胡椿、陳鳳翔等三名，及八十歲以上之吳霖等七十二名檢討銜。嘉慶二十五年賞九十六歲之熊清泰編修。又各省鄉試，亦有賞賜年老生員舉人之例。如乾隆三十五年恩科，江西生員李煒，年九十九歲，廣東生員張次叔，年九十四歲，雖未中式，均賞舉人，凡此種種恩賜，旨在矜恤年老士子，以昭激勸。較賞賜大臣或功臣子孫爲有意義，然亦不外法外市恩而已。

清因明代，各省均有欽派提督學政一員，負責處理各省教化考試事宜，關於生員入學（俗稱進學。）考試，亦分三級，曰縣（州）考，曰府（直隸州）考，曰院考。凡非娼、優、隸卒之子孫，均得依照規定參與考試。（會典載：門子、衣隨、番役、小馬、皂隸、馬快、步快、禁卒、忤作、弓兵之子孫，倡優、奴隸、樂戶、丐戶、簪戶、吹手，均爲出身不正，不准應試。）按照考試程序，先須參加縣考，縣考由知縣（知州）會同教諭（一縣主持教育之官員。）主持，在學宮明倫堂舉行考試。將合格之童生，造列名冊，申送府學（府之學官曰教授，直隸州之學官曰學正。），然後由知府會同府學舉行府考。再由學政按府（直隸州）舉行巡試，亦即院試，巡試中式者曰秀才，亦稱生員。生員經歲科試成績優良准予食廩者稱廩生，入貢者稱貢生。貢生有恩、拔、副、優、歲五種，恩貢乃遇國家有慶典或登極，詔書以本歲正貢作之。拔貢，每十二年（雍正六年，改爲六年一次。乾隆七年，仍改

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學政，就在學生員，每府州縣選拔學識優良，品行端正者，會同督撫咨送禮部，由部奏請欽命大臣考試，旨在廣育人材，特於鄉會試正科而外，增設選拔一科，所以旁撝俊彥，拔取真才。拔貢經朝考（按：朝考，即廷試，在保和殿舉行，與殿試後皇帝親試新進士之朝考有別，且雖在保和殿舉行，但絕不能稱爲殿試。）取入一二等者，引見後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學習，及以知縣教職錄用，較之進士歸班，舉人截取銓選者更速，實爲士子入仕捷徑，不特須較文詞之高下，與大字畫之工拙，器識尤爲重要，各州縣雖有定額，如無文行兼優之士，寧缺毋濫，如有濫保情事，原考之學政，及覆試之督撫，均應照例議處焉。副貢係鄉試成績優良，但限於名額，未能取錄，即額滿見遺者，准以原取五名之數，錄取一名，列爲副榜，錄取者稱副貢，副貢准免入國子監，即與廷試授職。歲貢初定府學每年選送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各省學政將印結單券，由布政使起送，仍由學政將貢生名冊送部，參與廷試。

康熙二十三年始准歲貢免予入京廷試，著各學政挨序考准，咨部補授訓導，優貢初定直省各府州縣學不拘廩增附生，將文行兼優者，大學起送二人，小學起送一人，入監肄業，名爲貢監。雍正十一年題准凡優生由廩增升入太學者，准作優貢。同治二年復以優貢一途，因無錄用之條，多未來京報考，應予變通，著各省學政覈實選舉，會同督撫保題，赴部驗到，在保和殿考試，由閱卷大臣，酌量多寡，比較錄取。其先後名次，仍歸併擬定，由禮部帶領引見，考列一二等者，以知縣教職錄用，三等就經制復設訓導選用。又康熙十八年爲甄拔遺才，以爲國用，特召試博學鴻詞，錄取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人，乾隆元年復二次召試，連二年補試在內，錄取一等六人，二等十三人，各授編修檢討之職，此項特殊之考試，雖出欽命辦理，究與禮例未合，故自乾隆二年之後，即未繼續舉辦。光緒三十年所舉行之經濟特科，亦爲特種考試，而非定期辦理，併附述之。（註二）

有清一代，科舉取士，以八股經義爲範疇，雖係因襲前朝之遺規，實已久爲後世所詬病。然歷屆

科考辦理之嚴，得人之盛，遠出歷代之上。康雍乾嘉四世，民康物阜，宇內昇平者，達一百六十年之久，蔚爲三代以下未有之盛世，論者每多歸功於科舉之得人，詢爲無可否認之事實。

昔日科考，有縣試、府試、學政巡試，以及鄉試、會試、殿試之分，而以殿試爲最高之考試。文官以鼎甲爲最光榮之出身，是以士子孜孜競競，惟科名斯尚，而朝廷獎掖士子者，亦無微不至。如漢員非翰苑出身，不得入閣大拜，非科甲出身，不得充任學政試差，卽司全國銓政文教之吏禮二部，亦非科甲出身者不可染指，凡此種種，咸所以重視考銓，保障正途，在當日可稱公正允洽之措施。

光緒踐祚，海運大開，西洋文化，灌輸我國，歷五百餘年之科舉考試，至斯亦已大有變更。如甲午恩科殿試，卽未再用八股經義，而改爲對策，內容包含河渠之要、經義之儲、選舉之方、鹽鐵之利，所涉及之範圍，至爲廣泛。雖仍嫌其未切實用，要亦非淺學腹儉之輩，所能應對。是以取錄者頗多爲飽學之士，如張謇、梁士詒、熊希齡、劉廷琛、陳昭常、沈雲沛、王瑚、沈鵬、江春霖諸氏，對於興修水利、整理財政、振興教育、整飭吏治諸端，亦多事蹟，垂諸後世。故科舉取士之在當日，未可厚非，後世不察，每加詬病，殊非的論。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三九，頁三〇二—三〇二三（原頁四—五）。

註二：朱沛蓮：「清代鼎甲錄」第一卷「清代科舉制度概述」，民國五十七年七月，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七日） 清北洋大臣李鴻章大閱海軍竣事，返抵天津。

李鴻章于本（四）月三日晨，率隨員三十餘人，自天津登海晏輪，出發校閱海軍，先後校閱北洋九艦，南洋六艦，廣東三艦。並查閱旅順、大連、威海、膠州等防軍要塞。凡二十日，至本日始以校閱告竣，返抵天津。（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四月二十三日

五二

附錄：北洋海軍兵力表（註二）

分職	隊別	（船名）	（船式）	（噸數）	（馬力）	（速力）	（砲數）	（船員）	（進水年分）
主	定	遠	鐵甲	七、三三五	六、〇〇〇	一四、五	一二	三三〇	光緒八 一八八二
戰	鎮	遠	同	七、三五五	六、〇〇〇	一四、五	一二	三三〇	同
艦	經	遠	同	二、九〇〇	三、〇〇〇	一五、五	一四	二〇二	同 一八八七
隊	來	遠	同	二、九〇〇	五、〇〇〇	一五、五	一四	二〇二	同 一八八七
防	致	遠	巡洋	二、三〇〇	五、五〇〇	一八、〇	二三	二〇二	同 一八八六
防	靖	遠	同	二、三〇〇	五、五〇〇	一八、〇	二三	二〇二	同
防	濟	遠	同	二、三〇〇	五、五〇〇	一八、〇	二三	二〇三	同 一八八九
守	平	遠	同	二、二〇〇	一、五〇〇	一四、五	一一	……	同 一八八三
守	超	勇	同	一、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五、〇	一八	一三〇	同 一八八一
守	揚	威	同	一、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五、五	一八	一三〇	同
艦	鎮	東	砲船	四四〇	三五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一八七五
艦	鎮	西	同	四四〇	三五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艦	鎮	南	同	四四〇	四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艦	鎮	北	同	四四〇	四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隊	鎮	中	同	四四〇	七五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一八八一
隊	鎮	邊	同	四四〇	八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艦習練		補助艦				附水雷船	(船名)	(船式)	(噸數)	(速力)
威遠	康濟	泰安	鎮海	操江	湄雲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左隊一號	一等水雷	一〇八	二四	一八
一、三〇〇	七五〇	一、二五八	九五〇	九五〇	五七八	同二號	同	同	一九	一八
一、三〇〇	九、五	六〇〇	四八〇	四〇〇	四〇〇	同三號	同	同	一九	一八
八四〇	一二、〇	一〇、〇	九、〇	九、〇	九、〇	右隊一號	同	同	一八	一八
一一	一一	五	五	五	四	同	同	同	一八	一八
一二四	一二四	一八〇	一〇〇	九一	七〇	同	同	同	一八	一八
一八七	一八七	一八七	一八七	一八七	一八七	同	同	同	一八	一八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四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四月二十五日

五四

兵各五十五人，威遠、康濟練船弁兵各一百二十四人，敏捷夾板練船弁兵六十人，利遠連船弁兵五十七人，練勇學堂弁兵十四人，礮目練勇二百七十人，總計弁兵四千餘人，設提督一員，統領全軍，總兵二員，分左右翼，各統鐵艦爲領隊，副將以下各官以所帶船艦之大小、職事之輕重，別其品秩。並聘英人琅威理(Capt. W. M. Lang)以副將銜爲總教習，專司訓練。琅頗勤事，爲海軍官兵所敬憚。一時軍容稱盛，號曰遠東第一巨大艦隊。然據清史稿兵志海軍篇所載向外國訂購各兵船情形：

「自同治光緒朝廷于宣統初，歷五十年，得船不及百艘，而光緒十二年以前所購者，大小約五十三艘，光緒二十一年以後所購者大小約四十三艘。在光緒十四年至二十年間，並未訂購一船，此爲海軍經費移築頤和園最顯著之證據，是以海軍正式成立之時，亦卽海軍凍結之際。及甲午戰爭爆發，我以七、八年前所購之舊船如七千餘噸之定遠、鎮遠，（船身太重，航速過慢，轉動不易）及其餘兵艦（大多船小砲弱，航行不速）應戰，而日方則以甲午前十十年內新購之二十餘艘船艦接戰，不僅船砲新式，且速率快，轉動靈活。海戰，速率快者，勝則易于追逐，敗則易于引避，雙方遲速懸殊，勝負利鈍立見。李鴻章頗能知己知彼，不敢輕易言戰，然迫于朝野浮誇不實之清議，知其無必勝之勢而勉強應戰，焉有不敗之理。」（註三）

註一：「東華錄光緒朝」內，頁三三八五—三三八八。

註二：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一四—一五，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大公報社出版。

註三：參閱蕭一山：「清代通史」(二)，頁九二九—九三三，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九日） 清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添購兵輪。

李鴻章於校閱海軍竣事後，感中國海軍自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未添一船，實力薄弱，本日奏請添購巨艦，略曰：

「西洋各國以舟師縱橫海上，船式日異月新，臣鴻章此次在煙台、大連灣親詣英法俄各鐵艦，詳加察看，規製均極精堅，而英尤勝，即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以後，迄今未添一

船，僅能就現有大小二十餘艘勤加訓練，竊慮後難爲繼也。」（註一）

旋於同月二十七日（五月三十一日）奉清廷諭，但准其「擇尤保奏」海軍出力人員，而不言購船事。略曰：

「李鴻章、定安奏：會同校閱海軍及沿海陸軍，並查勘各處臺陽等工竣一摺，本年海軍會校之期，現經李鴻章會同定安，周歷旅順等處，調集南北洋輪船，會齊合操，並將水陸各營以次校閱，技藝純熟，行陣整齊，各海口學台船陽等工，亦一律堅固，辦理漸著成效，李鴻章督率有方，著交部議敘，各將領訓練士卒，修建臺陽，不無微章足錄，著准其擇尤保奏。」（註二）

附錄：張蔭麟撰「甲午戰前中國之海軍」（註三）

（一） 沈葆楨之經營

當同治末年（一八七四）日人之借故進兵臺灣也，朝命沈葆楨率福建水師赴臺，觀動靜而守禦。沈葆楨是時方以前江西巡撫之資格，督辦船政於福州。其人既廉正有能，於海軍在國防上之重要復知之切；創立造船廠及水師學堂，延用西洋技士教習，遣派留學生，七年之間，成績燦然。此後奮勇殉身，及臨難苟免之著名海軍將校，與乎折槁裂紱，沉沒海底之敗艦中，頗有爲福州船政之產品者焉。葆楨既至臺，親詣日本司令官西鄉從道，並巡行其營壘，語之曰：兩國海軍方始萌芽，同種間遽構戰，令西人盡見底蘊，益啓窺伺之心，不如各歸大治海陸軍，二十年後相見，庶彼此俱有規模，不爲人藐視。西鄉頗受感動，旋亦不得大逞於臺，遂罷兵歸。甲午戰後，葆楨孫翊清奉派赴日觀操，西鄉猶健在，親款宴之，出妻見子備談前事，曰：「日本海軍之粗有成績，不敢忘令祖之贈言」。

西鄉歸後十年而甲申中法之役，以考驗我國海軍之造詣。時葆楨已前卒，然其於海事也既盡心矣。初，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六月，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奏准於關稅釐金項內，每年分撥於南北洋大臣各二百萬兩，專爲海軍之用。會葆楨移督兩江，兼領南洋大臣，鑒於畿輔海防重要，以爲海軍宜先儘北洋創辦，分之則爲力薄而成功緩，因奏請暫將四百萬兩盡給解北洋海軍，俟其興辦稍有端緒乃已。無何，晉豫告饑，北洋大臣徐朝士請，提海軍款以賑，葆楨以爲大戚，貽書爭之，謂「國家安危所繫，某老病不及見，必爲我公異日之悔」。然鴻章終不省，旋復移用。四

年二月，葆楨奏請將前項協款仍分解南北洋。六年冬，葆楨正力疾調集款項，擬派學生出洋監造新艦，適日本夷琉球爲沖繩縣。庶子王先謙請與師問罪，詔交南北大臣會議。葆楨遺疏言：「天下事多鑒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繼之鹵莽，則其禍更烈於因循。日本自臺灣去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軍全無基礎，冒昧一試，後患方長」。葆楨卒後，以迄甲午，海軍之發展，僅限於北洋，而其規劃組織之任，則專屬於李鴻章。李乃於天津設水師營務處（初以馬建忠主之），水師學堂（始終以嚴復主之），造大沽口船塢，築旅順炮臺，奏調淮軍宿將陸路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延聘英人琅威理爲總查司訓練事，益訂購軍艦於外國。

（二）甲申閩海之戰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夏，在德國訂造之定遠、鎮遠二巨鐵甲艦，及濟遠巡洋艦已告竣工，尙未駛來，而中法在安南之衝突日益烈，朝旨嚴戒海防。五月，李鴻章出海巡閱，值張之洞、吳大澂、張佩綸諸大名士，各奉朝命，聯翩出京，道過天津，鴻章遜之，共預盛典。一時綸巾羽扇，掩映於涵濤飛浪間，意氣之壯，可想見焉。鴻章歸後奏報巡閱情形，略曰：「臣先……檄天津鎮總兵丁汝昌所統超勇、揚威兩快船，康濟、威遠兩練船，齊集大沽口外。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等砲船集烟臺。五月初一日馳抵金州之旅順口，察勘新築砲臺營壘，全倣洋式，燈旗各號令，及槍砲施放之法，尙能整齊靈變。閏五月初一日馳抵金州之旅順口，察勘新築砲臺營壘，全倣洋式，堅緻曲折，頗具形勝。道員袁保齡督挖船澳船池，修建軍械庫屋，工程已及大半，……操演水雷旱雷，均漸熟習。該處……現有提督宋慶等陸軍，與丁汝昌水師互相犄角，佈置已就緒。設遇海上有事，實可憑險固守，牽制敵船，使不遽深入。初二日，過烟臺，會操各船，聲勢略壯。……初三日，抵威海，閱看所延德國副將哈孫敦演魚雷，員弁兵匠齊力操作，放射有準，駕馳雷艇，快捷如風，詢爲制敵利器。道員劉含芳會同哈孫敦督操佈置，諸務甚有條理。惟該處瀕海，南北兩口，地闊水深，若築臺設守，需費極鉅，一時不能措辦耳」。是時我國海軍顯然以北洋一支爲較強，其所屬船艦，什九造於外國（超勇、揚威，及六鎮皆造於英。威遠輪機由英廠承辦，鐵脅由法廠承辦，運歸閩廠鑲配；惟康濟全爲閩製）。南洋及福建兩艦隊，則大部份以馬尾船廠及江南製造局之出品充數。而南洋諸艦，拖船載勇，迎送官吏，習以爲常。訓練既荒，戰備更闕。福建水師之脆弱，則於馬江一戰而盡見。法人之不向北

洋進攻者，殆有見避堅擊瑕之義歟？而惡運遂首先降臨於侍講學士會辦福建軍務，挾積年清望與蓋世英名，而自告奮勇之張佩綸身上。

六月，法艦十三艘陸續抵馬江口。於是張佩綸出駐馬尾，督揚武、福勝、建勝等十一艦，及其他較小之兵船八號，砲船十號以拒守。先是閩督何璟自以書生不諳兵事，屢請解職，朝令楊昌濬代之；旋命大學士左宗棠督閩師，皆未至。軍事皆主於張佩綸。彼實不知兵，而意氣極盛。何璟及巡撫張兆棟，皆曲意事之。彼扭於李鴻章之議，謂和約且夕可成，戒軍事勿妄戰，聽法船入口。而又奮然無備。我方主艦與敵艦密邇而泊，或言此險勢也，敵若先開砲，則我軍立燼。佩綸以爲怯，置不理。敵既照會開戰時刻，起碇換戰矣，我方諸艦猶屹然住碇如故。及敵艦環至，乃始斬錨練而還砲。是役也，閩海軍全部覆滅，造船廠復被毀，而奉命赴援之南洋五艦中，復有二艘爲敵轟沉於浙江海面。

(三) 北洋海軍之經營

經此役後，朝中自帝后王大臣以下，咸知以興海軍爲號召。十一年九月，詔設海軍衙門於京師，以醇親王爲總理，慶郡王與李鴻章爲會辦。李負辦事之責而不駐衙門，醇親王等駐衙門而無事可辦，惟司經費之出納而已。李於海軍，非不盡瘁，然既末之學，復窘於財，在再九年，以迄甲午，北洋海軍，質量上皆大體仍舊。其諸南洋及閩粵艦隊，則更自鄒以下，而又不預甲午之役，可無述焉。

是年十一月鴻章致書醇親王陳述北洋海軍現狀，及其初步發展計畫，略曰：「北洋現有船隻惟定遠、鎮遠鐵甲二艘最稱精美，價值亦鉅，濟遠雖有穹甲及砲臺，船身較小，尚不得爲鐵甲船，祇可作鋼快船之用。此外則惟昔在英廠訂造之超勇、揚威兩快船，船身較小，更砲巨機巧，可備巡防，至康濟、威遠等木船，專作練船，海鏡僅可裝運兵丁，以上三艘皆閩廠製造，舊式也。鎮北等蚊船僅可守口，不便在大洋備戰。……鴻章前在京師面陳俟英德續購四船（按時已定造致遠、靖遠兩穹甲於英國，經遠、來遠兩穹甲艦於德國）到後應歸併操練，庶氣勢較厚，將來餉力稍充須添購淺水鋼快船三艘，魚雷小艇五六隻，合之原有鐵艦雷艇，庶可自成一軍矣。……前在英廠購置蚊船數隻……吃水僅八尺，故先在大沽建陽修理，……此陽木底無石，爲費頗省。嗣購到超勇、揚威吃水十五尺，不能進大

沽，每年赴上海洋商船塢修理已形不便，今又添定遠、鎮遠、濟遠，吃水至二十尺、十六尺，……非借英之香港大石隴、日本之長崎大石隴不能修理。……今年始聘到德國監工名善威者，相度旅順口內地基塹以創建船池石隴，其口門有導海機器挖沙船隨時濬深，鐵艦可入內停泊修洗，估價隔廠庫房各工……約需銀百三十萬兩，限三年竣工。以上之計劃，除添購淺水快船一項始終未辦外，其餘部分，逐漸實現。十二年購福龍魚雷艇於德，十三年購左一出海魚雷艇於英，購右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五魚雷艇於德。十八年八月旅順船塢告成，距甲午衅起纔兩年耳。此外北洋海軍之新建設，則有威海、大連及膠澳諸軍港之經營，威海大連以及旅順之佈置情形，詳各該地戰事之記述中。膠澳軍港之完成在甲午戰役後而又不在于戰役範圍，今不之及（此文爲拙作甲午戰史之一部分故云爾）。

（四）北洋海軍發展之停頓

自十四年春致、靖、經、來四艦馳到後，北洋無復添購外艦之事，船之增者惟十五年閩廠所成之平遠一艘而已。蓋朝廷以發展海軍初無誠意，吝給鉅款。十七年四月，戶部尚書翁同龢甚且提議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砲船隻機器暫停兩年。丁汝昌等以我國海軍戰力遠遜日本，添船不能少緩，力陳於李鴻章，李據以入奏，終以餉力匱絀，戶部之議得行。然而李鴻章後來解嘲之言：「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置」。甲午戰時日本新舊快船推爲可用者共二十艘，其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國諸船定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據說尚未精造至此。致遠，靖遠二船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因後行用日久，僅十五海里，此外各船則愈舊愈緩。黃海戰前，李鴻章「覆奏海軍統將摺」中有云：「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遲速爲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則易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此事是鴻章蓋早已見及之也。然當戶部議與之日，鴻章何不痛陳利害，反覆力爭，以求貫徹己之主見？

周馥者，鴻章幕府內僚，是時方任直隸臬司，一日密告鴻章曰：「北洋用海軍費已千餘萬，祇購此數艦，軍艦實不能再添，照外國海軍例，不成一隊也。倘一旦有事，安能與之敵？朝官皆書生出身，少見多怪。若請擴充海軍，必謂勞費無功。迨至勢窮力絀，必歸過北洋，彼時有口難訴。不如趁此閒時，痛陳海軍宜擴充，經費不可省，時事不可料，各國交誼不可恃，請飭部極通籌速辦。言之而行，此乃國之大計幸事也。萬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鴻

章曰：「此大政須朝廷決行。我力止於此。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奈何？」周馥復力言之，鴻章嘆歎而已。果也，甲午戰起，朝野皆以海軍不振歸咎於鴻章。是年七月初七日上諭：「自光緒十年越南用兵以後，創辦海軍，已及十載，所有購船製械，選將練兵諸事，均李鴻章一手經理。乃倭人自上次朝鮮變亂，經我軍裁定，該軍敗而歸。從此蓄謀報復，加意練兵，此次突犯朝鮮，一切兵備，居然可恃。而我之海軍，船械不足，訓練無實，李鴻章未能遠慮及此，豫爲防範，疏慢之咎，實所難辭」。不知鴻章讀此作何感想也。而周馥亦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五) 西后與海軍

世之談海軍掌故者每致憾於西后移海軍費修頤和園，使海軍發展中輟，爲甲午敗戰之一大原因。王照於「德宗遺事」，羅惇巖於「中日兵事本末」，沈瑜慶於中譯「日本帝國海軍之危機序」，池仲祐於「海軍大事記」中均有此說。至移用海軍經費之數目，羅氏云三千餘萬，沈氏云二千餘萬，頗有出入。王、羅皆曾廣交朝中縉紳，而沈、池皆海軍界耆舊，其言宜非齊東野語可比。惜予寡學，至今尚未能詳細追溯之第一手的文牘證據。按李鴻章「海軍函稿」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有「內提要款請指撥解還」一函，致醇親王者，中云：「奉宸苑承修三海工程款不敷用，奏准於發存滙豐銀行生息船款內，暫提銀三十萬兩」。夫自京師海軍衙門成立後，海軍經費既入於醇親王等之手，鴻章凡有所需，只能向該衙門請領。此所撥用之款乃早已發交鴻章者也。夫既發出之款，尚可提借，則其未發出者更當何如？爲三海之工程可如此，則頤和園之工程更當何如？又按于式枚所編「李文忠公尺牘」，有致兩江總督曾國荃一函，商請撥海防經費爲西后樂頤和園者。以予所知此爲王照等傳說之唯一確證，然其於移用款數，無明文也。

據李鴻章「海軍函稿」北洋海軍經常費，在致、靖等四艦下水之前，歲不過百二三十萬兩，其後當亦不過百四十萬兩。此外臨時之大宗支出，在海署成立後者，不外旅順船塢建築費百四十萬。威海、大連軍港建築費各四百萬，蓋自光緒十一年九月（海署成立）至二十年八月（甲午戰起），凡八年間北洋海軍支出平均每年至多不過二百六七十萬左右。而每年收入，即各省從前分解南北洋之款，撥歸海署，名四百萬，實可得二百萬內外，海防新捐可得二三百萬，自十三年後鴉片加稅解海署年可二百餘萬。出入相比，大有贏餘。惟海署供給東三省餉餉爲數亦頗鉅，即報効園工當不至有二三千萬之多耳！關於本問題，在海署報銷冊（如其有之）發現以前，吾人所得而推論大略如此。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四月二十五日

六〇

(六) 琅威理之就聘與去職

光緒十六年我國海軍界發生一重要變遷，即英員琅威理(Captain Lang)去職是也。泰樂爾(W. E. Tyler)曰：「當時不知此爲關係全世界之大事，實則然也。琅去而(中國)海軍衰壞，日本之政務高麗事與中國挑戰者以此，其後能獲勝者以此。因日本謀佔高麗，故有日俄之戰，因俄國戰敗衰弱，故啓德國席捲世界之心。」斯言雖誇，非無根也。琅威理者，故英國海軍大佐，於光緒八年始加入北洋海軍，主持教練。彼精於所業，而勤於任事，爲僚佐所敬憚，一時軍容頓爲整肅，中外交稱之。先是我軍與駐防外艦向無交際，海上相遇，不通問訊，自琅任事始講迎送慶吊往來之禮。十年中法事起，琅迴避去職。越二年乃復職。是歲丁汝昌率定遠、鎮遠、濟遠、威遠、超勇、揚威等赴朝鮮海巡操，既畢，前四艦入長崎船塢修理，我水兵因戀妓與日捕口角。次日水兵休假登岸，日捕堵塞街巷，聚而攻之，街民亦持刀追殺，死傷甚慘。琅威理從行，力請汝昌，即日宣戰。汝昌不敢從，終受賠款了事。初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銜，以示優崇，本非實職。而軍中上下公牘則時有丁、琅兩提督，而自海軍奏定章程，只有一提督。十六年春北洋海軍艦隊巡泊香港(冬季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丁汝昌以事離船。依例提督外出，則下提督旗而升總兵旂。總兵劉步蟾令照辦，琅威理爭之，以爲丁去我國在也，何得遽升總兵旂？不決，則電質於北洋大臣，復電以劉爲是，琅遂怏然告去。或謂閩籍將校惡琅督操素嚴，而劉(閩人)與琅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之。琅去，海軍紀律大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巡南洋則相率淫賭於上海、香港。

然琅去職後，對北洋海軍始終保持良好之印象。高陞事件之後，黃海之戰以前，琅嘗著論刊於英報，曰：「中國海軍實有不能輕視者，其操陣也甚精，其演砲也極準，營規亦殊嚴肅，士卒亦皆用命，倘與日本海軍較，中國未嘗或遜……至中國考試海軍之道，較諸英國，則似稍遜。所尤惜者，文官每藐視海軍將弁。……世祿之家不屑隸名軍籍。日本則視武員爲甚重，嘗有親王子弟，宗室近支投入水陸軍營願効微力者。以此相較，中國信有不及日本之處。雖然中國海軍之力，四年前已稱充足，時予正握大權，曾於深夜，與其中軍官猝鳴警號以試之，諸將無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從容不迫，鎮靜無譁。而華人聰穎異常，海軍雖練習未久，然於運用砲位，施放水雷等事，無不異常純熟，即如日前英艦操時，不幸域多利亞鐵甲座船偶被他船誤觸，遂至沉溺。中國海軍操演極熟，斷不致此有意

外之憂。……其沿海各砲臺，亦均精整。前聽鄙人計劃，在威海衛砲臺安置克虜伯巨砲三十六門，其砲架皆用活機，便於升降，鄙意堪稱金城之固，日艦斷不能敢於此一逞其能也」。證以後來之事實，琅氏之印象，蓋非誇誕。然孰使其善意之預言，終於不驗哉？

自琅氏去職後，先後加入艦隊之洋員至少有六人：在定遠旗艦者爲英國退伍水兵尼格路士 (Nicholls) (其後死於黃海之戰)，德國工程師亞爾伯利希特 (Albrecht)，在鎮遠者有德國砲術家赫克曼 (Heckmann) 及美國航術教師麥吉芬 (Philo M. Giffin)，在致遠者有英國工程師普非士 (Purvis) (大東溝之戰與鄧世昌同沉)，在濟遠者有德國工程師哈高門 (Hoffmann)，皆威望甚低，不預機要。其後戰時加入之洋員中有德國陸軍工程師漢納根 (Von Hanneken)，及英國海軍後備少尉泰樂爾 (W. F. Tyler)，位望較崇，然亦無實權，只備顧問。丁提督自知於海軍技術爲門外漢，遇事搗謙，然既不能信任洋員，復與之有言語隔阂，大權遂落於其部下最高官佐，英國海軍留學生 (出身爲馬尾水師學堂) 右翼總兵旂艦管帶劉步蟾手。凡戰略之決定，號令之設施，皆彼主之。此事實上之提督，北洋海軍之存亡所繫者，不幸如後來歷史所展現，乃一變態之懦夫也。

(七) 甲午戰前之大閱

今於本文終結之前，當略述甲午海軍大戰之序幕，卽是年四月北洋海軍大閱之壯觀而與甲午戰前之大閱遙遙相對者。此本循例之舉，蓋先是十二年丙戌醇親王等巡閱歸後奏定，繼此每四年巡閱一次也。然是時東學黨之亂既起，日本將侵高麗之流言既興，備戰之需要，朝廷蓋多感覺之矣。大閱起初三迄二十一日，綿亙十九日。李鴻章以年逾七十之老叟，久犯風波，可云健者。惜乎關於是役之報告，吾人所得，唯官樣文章，只記外表。而李鴻章之出巡，亦只能奉行故事，其所得而閱見者，亦只外表而已。茲參據李公奏報及蔡爾康所輯日記 (見中東戰紀本末卷一)，略表一時之感。

初三日 傅相自天津節署出，首冠涼帽，綴以頭品頂戴，身穿黃馬褂，乘紫輦輿，至紫竹林招商局，集諸隨員，共登海晏輪船。旋鼓輪起行，各營站隊兩旁，炮聲隆隆。

初六日 海晏自大沽口出海。諸兵艦左右隨行，帥節巍坐船頭而遠眺之。隨船海軍員弁日間以旗幟爲訊號，夜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四月二十五日

六二

間以燈光爲號。各艦均站桅班，常軍樂，砲聲隆隆。

初七日 入旅順口，接見守將宋慶，李所信任洋員天津稅務司德瑾琳 (Denning) 亦乘官艇來謁。抵碼頭，會海軍幫辦定安，旋答拜。

初十日 帥節乘小杉板出海口，先看演放水雷，次看砲臺營打靶，旋往視水師學堂。是日，英兵艦兩艘，日兵船一艘，來觀操。

十一日 看海軍演陣。各艦放砲三次，演至犄角攻敵陣砲聲不絕。是日美兵船二艘回到。

十三日 帥節在大連灣。申正赴美國兵船，拜會其艦長。入夜衆艦悉張電燈，而諸鐵甲艦懸燈桅頂，其光旋轉，四面可射三十里許。魚雷六艇演偷營法，黑暗中馳入重地，各兵艦疾開槍砲拒敵，山巔砲臺亦啓電燈，其光更巨。

十四日 上午定、鎮等七大艦演放魚雷，均能命中。午後各艦次演習打靶，於馳行之際，擊寫遠之靶，發速而中多。經遠一船發十六炮，中十五炮，廣東三船，中的亦在七成以上。是晨日、法、俄，海軍官來謁，款以茶點。

十七日 帥節在威海衛，挑選各艦水兵槍隊二十名打靶，每名三出均能全中。夜間合操水師全軍，萬炮齊發，起止而一，英、法、俄、日，海軍官來觀者，皆稱爲節制精嚴。

十九至二十一日 帥節經青島烟台山海關以返天津，到處檢閱砲臺及防營。

鴻章於巡視結果，深爲滿意，至少在其奏報中，對北洋軍只有褒譽之詞，絕無指摘之點。鴻章卻忽略一命運所關之事。彼局不一查問各艦中子彈之儲備。最異者，當時軍械局長張士珩，以及卑斯麥自命之德瑾琳均在左右，竟無提醒之者。蓋定遠及鎮遠之十吋口砲，爲本軍最鉅之砲，而日艦各炮所莫敵者，其戰時可用之開花巨彈通共只有三枚，定遠旗艦存一枚，而鎮遠則存一雙，則其練習用之小彈亦奇絀。其後開仗時欲求添補，竟已無及，是爲黃海大敗之一大原因。此事自一九二九年泰樂爾之自傳發表後，世始知其詳。據云前此一年鴻章已從漢納根之議，令製巨口彈，備二主力艦用，爲軍械局總辦所厄，未得實行。此時漢納根已不在場，然鴻章奚竟忘之？

恩科殿試放榜（傳臚），錄取進士三百十四人，張謇得中為狀元。

本日放榜，授一甲三人，張謇爲翰林院修撰，尹銘綬、鄭沅爲編修，均賜進士及第。二甲吳筠孫等一百三十二人，均賜進士出身。三甲宋紹文等一百七十九人，均賜同進士出身。五月十日，引見新科進

士，得旨：

一甲三名，張寶、尹銘綬、鄧沅、業經授職外，吳錫孫、沈衛、李家駒、徐仁鏡、朱啓勳、吳庭芝、李翹芬、李組紳、饒芝祥、梁士詒、陸士奎、鄒毅洪、劉廷琛、夏啓瑜、汪一元、袁桐、于普源、馮恩焜、儲英翰、李灼華、張其淦、王廷鉞、閻冕鈞、林鉞、姚舒密、景霞、黃秉湘、陳昭常、裴汝欽、郭育才、翁成琪、胡矩賢、江衡、沙元炳、張啓藩、達壽、張琨、范溶、張琴、吳敬修、熊希齡、陳君耀、黎承禮、朱錫恩、王英冕、周紹昌、齊忠田、張懷信、王會燾、譚文鴻、程友琦、王恩、沈雲沛、林炳章、洪錦標、蔡琛、夏樹立、蕭立炎、李清琦、葉大可、毓隆、孫鳴皋、陳德銘、余晉芳、譚紹裘、葉大年、梁文燦、沈鵬、吳式釗、張祥齡、桂圻、孫同康、尹春元、張林森、王瑚、江春霖，俱著改爲翰林院庶吉士。胡紹蘇、曾文玉、汪述祖、項芳蘭、譚承元、彭謨庠、龔啓芝、孫國楨、鄭輔東、梁志文、梁秉年、楊裕芬、靳學禮、呂承瀚、方策安、陳品金、樓守恩、陳汝梅、施之東、傅運生、王元慶、張錦春、徐宗源、范公謨、松鐸、張忠、呂志元、郭傳昌、王景濬、孫文翰、熊賓、謝世珍、麥玉華、賀鴻基、沈祖同、楊懋齡、徐樹昌、楊長藻、謝崇厚、郭書堂、趙從蕃、蕭文昭、廉慈、蔡中變、黃汝楫、林怡、李繼沆、續綿、楊增鈺、鍾傑、承霖、齊令辰、蒲明發、孫友蓮、涂翀鳳、莊墀、張叔棟、王熙齡、陶世鳳、王學伊、王之傑、翰屏、錫麟、韓紹徽，俱著以主事分部學習。周祺、莊綸儀、周子懿、陳壽珪、余省三、玉彬、汪聲玲、劉昌言、施有方、馮錫瓊、茹恩彬、楊炳震、孫鏞、葉泰椿、單溥元、胡汝霖、譚先節、周寶清、金文翰、李英、江慶瑞、孫星煜、文溥、黃鳳岐、容益光、修文政、陳永壽、劉慶篤、胡逢恩、周培、李士田、魏達文、吳燕紹、李見荃、祁永膺、保謙、郭家葆、李兆麟、溫聯桂、徐苞、任承允、王璋、胡愷麟、徐鑾、陳培庚、緒儒、張霽、楊鴻勳、涂步衢、韓兆霖、曹中成、續家琮、陶邵學，俱著以內閣中書用。武丕文、張超南、廖鳳章、余毓瑞、徐夔楊、鮑德麟、柴樸、李樹森、李祖蔭、陳介祿、朱紹文、楊錦江、范揚芳、管德泉、馮紹斌、陶聯琬、趙潤生、徐允清、王叔謙、孫愚、莫如管、鄭銘恩、孫文治、楊寅揆、劉懷壽、成象乾、趙怡、夏龔川、李鏡江、林揚光、陳鉞、黎元熙、馬瀛煥、葉芸、鄭炳、趙鴻、蕭逢源、單夢祥、來熊、劉衍茂、彭希祖、杜召棠、曹子昂、王樹中、謝質、羅文繡、李維世、招翰昭、周懋謙、李良年、楊蔚、張肇基、朱寶翰、高積政、啓泰、鄭憲典、萬慶昌、胡慧融、林丙修、章變理、辛可耀、陳世瑞、劉鳳翰、程世杰、李允廉、茹震模、單榮、壽朋、鄒坤、廖允儒、劉寶壽、張斗南、吳貽穀、陳景星、郭雨溪、王永慶、李九烈、廣麟、徐冲霄、劉宜篤、陳仕揚、史堃、林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四月二十五日

煙藩、梁于汶、翁有成、賀錫齡、陳瑞鼎、徐曾、溫亮珠、邱士林、張協中、賀國瑛、李蔭坦、華炳善、高麟超、劉德元、田鴻文、廣勳、李延慶、陳瑞徵、胡傑頤、承厚，俱著交吏部，掣籤分發各省以知縣即用。工部遇缺即補員外郎楊士燮，著仍以員外郎遇缺即補。戶部候補主事張濂經，著以主事即用。分部遇缺即補主事何葆麟，著仍以主事分部遇缺即補。額外主事袁玉錫，著俟報滿作為候補主事後，以該部主事即補。不論雙單月選用郎中劉錦藻，著仍以郎中歸原班選用，餘著歸部銓選。（註四）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八，頁十七。

註二：「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三九，頁三〇二五（原頁十）。

註三：錄自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第一、二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及二十八日。

註四：「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四〇，頁三〇三二—三〇三三（原頁七一十）。

二十六日（五月三十日） 日本開始秘密動員，準備對華作戰。

日本參謀部所派韓亂調查員返國，決定由朝鮮出動以海軍控制渤海，在北直隸平原與中國決戰，萬一海軍失敗，由陸路接濟朝鮮，在本土候華軍進攻。（註一）

註一：日本外務省檔案縮片第六軸東學黨。

二十七日（五月三十一日） 日皇解散國會，準備對華作戰。

日皇于解散國會後，對外宣佈揚言：「中國將乘東學黨亂，合併朝鮮。」日參謀本部明白向日皇及內閣宣示日本間諜能獲得總署及北洋大臣之情報。並謂中國士兵僅五分之三有槍，而一團中有十三種不同之步槍，中國完全無準備，作戰時機已到；于是日皇決定採取步驟迫中國應戰。（註二）

註一：林董「回憶錄」頁一八一；日本天津領事荒川極機密電報。

二十九日（六月二日） 日內閣決議出兵朝鮮。

日本內閣于本日午前十一時許經閣議議決，出兵朝鮮一混成旅團（七千至八千人），另由海軍八艦組織聯合艦隊開往，中日戰端實由此始。（註一）

註一：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一八四〇—一九四五（以下簡稱外交年表並文書）上卷，東京原書房，昭和四十一年一月，頁五三〇—五三二。

三十日（六月三日） 朝鮮請援文到天津，李鴻章即派援軍赴仁川。

鴻章以朝鮮請援文到達，乃令葉志超、聶志成率軍千五百名乘濟遠、揚威兩艦赴仁川，並電駐日使汪鳳藻通知日政府。（註一）時天津日領事荒川來詢鴻章中國是否出兵，鴻章以實告，荒川頗以爲然。（註二）同時日駐朝鮮代理公使杉村亦于本日往晤袁世凱，建議中國出兵平亂。蓋日內閣恐師出無名，特令荒村、杉村藉機挑釁誘戰也。（註三）而袁、李二氏竟不能察，袁氏並于同日電告鴻章曰：「日使杉村與彼有舊，請中國平亂，似重在商民，別無他意。」（註四）爲人播弄如是，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註一：「李文忠公集」，電稿卷十五，頁三十四；「字林西報」，頁八八二，一八九四年六月八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林董「回憶錄」，頁九〇。

註四：「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九五四條。

五月

孫先生文偕陸皓東至天津，上書李鴻章，陳救國大計，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大綱領；並言：「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此為「知難行易」之學說最初見于孫先生之言論者，惜鴻章不能納。

孫先生北上途中，在滬遇同鄉鄭觀應，鄭氏爲其函託王韜介紹於鴻章幕僚羅豐祿。（註一）迨抵天津後，先訪羅，又得徐秋畦爲之先容。（註二）請見鴻章，並以書進。書中首言上書之動機，次敘四大政

，即富強之具體方案也。此四大政，爲孫先生主張採取西方之優點，以改進中國之士、農、工、商之法，每綱更有詳細之說明。附言：「方今中國之不振，固由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尙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于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于成例，輒阻于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註三）而孫先生「知難行易」之學說早已蘊育于此矣，甚值吾人注意及之。末言擬親身前往法國及環球各邦，考究蠶桑新法，並觀其農事，以興農政，希鴻章有以助之也！（註四）鴻章不能納。（註五）惟以羅、徐之關說，爲發農桑會護照一紙。（註六）

按：後人多有懷疑孫先生上此書之真實性，除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所載孫先生上書李鴻章之動機及撰寫之經過外（註七），特將各項有關意見附錄于後，以資參考。

（一）馮自由記曰：「孫子乙未廣州發難之先嘗赴天津上書李鴻章，條陳改革。」（註八）又云：「甲午嘗上書李鴻章，過上海時，就正于太平天國狀元（？）王韜，王爲易數語而已。」此說明上李鴻章書修改之情形。（註九）

（二）孫先生所著「倫敦被難記」文中，述及被拘於倫敦清使館中與清吏之對話曰：「予（孫先生自稱）問曰：『拘予何爲耶？』其人（按：指清吏）曰：『汝前曾上策于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汝，因令余暫相羈留，以待清廷之命。』」（註一〇）此處所謂「上策于總理衙門」，乃指上書李鴻章而言。

（三）另以「上李鴻章書」和孫先生于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所發表之「創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內容比較，前者條陳四大端：即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而歸結到「欲躬行實踐」，以事農業之改良。後書則言「追求積弱之故，不得盡歸咎于廟廟之上，即舉國之士、農、工、商四民，亦當自任其過焉。……以士類而責四民，農夫也有講求耕種之會，工匠也有講求製器之會，商賈也有講求貿易之會。……故于去春，予身數萬里，親察治田墾地新法，以增識見，決意出己所學，以提倡斯民。」此和前書之綱領旨趣如出一轍。（註一一）

四 孫先生于民國元年八月中旬應袁世凱之邀北上，居北京約一月，初蒞北京某日以遷都問題對記者發表談話曾曰：「予不至北京，已二十年，此次重來，未改舊觀。惟國都有外兵駐紮，城頭置各國巨砲，爲可慨耳！試思舉一國之首都，委之他國人代爲守護，是可忍熟不可忍？所以余有遷都之建議也。」八月三十一日在北參議院歡迎會上以「遷都所以脫離外人束縛」爲題發表演講，復曰：「以地勢論，北京本可爲中國首都，故自明至清，俱無遷移。因北有山海關，南有津、沽，砲台林立，國防亦固，此兄弟二十年前北來所目覩者也。」（註一二）可見孫先生于二十年前曾遊北京，此點亦可作爲孫先生于本年五月至津上書李鴻章一有力之佐證。

時人黃季陸氏民國二十年居廣州時，晤及唐紹儀曾親口相告曰：「甲午年春，余（唐紹儀自稱）自香港返朝鮮，適于同一英輪上碰到孫中山先生、康有爲、梁啟超等人，孫先生告以將去天津向李鴻章上萬言書，以挽救中國的危亡。余爲之荐介于李鴻章之幕僚，時任天津海關候補道之徐秋畦，托其設法引見李鴻章。經徐氏之引介，孫先生確曾在直隸總督衙門謁見李氏，惜李氏因孫先生不會講官話（即今日之國語），結果不歡而散。在孫先生臨離去時，曾將萬言書留置于茶几上。當孫先生步出總督衙門之大廳後，曾回頭指著廳門大罵李氏腐敗，表示改革無望，只有走推翻清政府之一途。」近人頗有懷疑「上李鴻章書」是否爲孫先生親撰，周弘然氏曾爲文（見附錄二）詳加論證。大意曰：從孫先生「倫敦蒙難記」中之對話，從「上李鴻章書」中之四大政要，與光緒二十一年所發表之「創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內容比較，從作此書之時代背景看，證明「上李鴻章書」確爲孫先生所親撰無疑。

附錄：

一、上李鴻章痛陳救國大計書（註一三）

宮太傅爵中堂鈞座：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五月

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窳奧。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使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輶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遙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乘可爲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埋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出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無以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勗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

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發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至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廣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學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仕則恪守一途，有降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俱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政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有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恒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口艱。水道河渠，皆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即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汎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尤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夫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能明其理法，則能反礮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農物之生長，電力能速農物之成熟，此又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灌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清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煉爲藥品，煉爲顏料。又煮沙以作玻璃，化土以爲藥精，煉石以爲出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

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水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附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爲用較萬物爲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顧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棄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尙未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以水力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用物愈求精，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面軍國要需，下面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汲泉，得以闢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縲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沿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尙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器機靈笨，與人力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源節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稅。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遍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爲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相與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並澳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爲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之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閭閻。關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廬；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集殊方之貨實，聚列國之商賈。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

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與路之扼要也。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善法，則股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爲工，捐納爲計，吾未見其能富也。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顧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聞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閱之：昔我中堂經營平海軍鐵路也，嘗唇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思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尚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

，而不能除之，則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爲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變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固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才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贊巨款而不惜。遇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爲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文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驚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日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待。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殘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驚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通行，爲力尚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

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聞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硠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檳榔嶼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曩時，覓食農民，尤爲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遂爲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菠蘿。近以憤於英人禁烟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仿效，家家試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烟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爲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比決其能奪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裁，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裁烟之事勸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羣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爲辦法之綱領。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蘊，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遊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成之，況於農桑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尙有不爲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爲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五月

七六

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維垂鑒。文謹稟。

二、周弘然撰「國父『上李鴻章書』之時代背景」（註一四）

一

「上李鴻章書」是否國父親撰問題，引起人們懷疑的大致有兩個原因：第一、關於上書李鴻章這件事，國父生前在自傳裏沒有提到過。按國父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是年國父二十九歲。）正月自粵赴滬，五月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庭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這和上書李鴻章的事似乎相反。第二、是「上李鴻章書」的內容，看起來和國父的革命思想不合。鴉片戰後到民國成立，中國的改革事業，經過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革命運動等三時期。國父是革命運動的領導者，而本書之條陳主張，大都不出「洋務」範圍，尚未具體言及變法維新，遑論革命排滿。總之，如果承認了「上李鴻章書」是國父親撰的話，無異減損他的革命主義和一生的奮鬥事業。而「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是年國父二十歲），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似乎也不是全可憑信的了。

但是，根據國父老同學陳少白先生和革命史學家馮自由先生的著作來看，「上李鴻章書」確是國父的手筆。陳先生說：「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即國父）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賸下幾塊錢。我接到信，暫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了十六那天，他忽然跑回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甚麼地方去的？他說：這件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來一看，紙裏面乃是『上李鴻章書』。我纔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的。」（「與中會革命史要」）這把國父撰寫本書的情況描述的歷歷如繪。馮先生在其所著「開國前革命史」說：「孫於乙未廣州發難之先，嘗赴天津上書李鴻章，條陳改革。」又在所著「革命逸史」說：「甲午營上書李鴻章，過上海時，就正於太平天國狀元（？）王韜，王爲易數語而

已。」這把本書修改的情形也說出來了。

然陳、馮兩先生的著作，從考據的觀點看，只能算作旁證，或不能完全令人信從。我現在直接從遺教本身的文獻裏找出一條來加以說明。就是在「上李鴻章書」後不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國父在其所作「倫敦被難記」（譯文）有一段對話，證明國父確曾上過書。對話是這樣說的：「予（國父自稱）問曰：『拘子何爲耶？』其人（係清使館人員）曰：『汝前嘗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汝，因令余暫相羈留，以待朝廷之命。』」按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中心人物，除領有直隸總督的本職外，並加大學士頭銜，那時的重要外交問題，也大都由他主持，當國父倫敦被難這年（一八九六，光緒二十二年），李派在總理衙門行走，可見使館人員所謂「上策於總理衙門」即是指的上書李鴻章那回事。

另外還有一個很好的證據，即拿「上李鴻章書」和國父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所發表的「創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內容比較，兩書意旨脈絡一貫。前書的條陳有四大端，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而歸結到「欲躬行實踐」從事農業之改良。分析起來，這四大端，即是本著士、農、工、商「四民」的職業來立論的，這種改革隱然以民爲本，原是國父一貫的立場。後書則說：「追求積弱之故，不得盡歸咎於廊廟之上；即舉國之士、農、工、商，亦當自任其過焉。……以七類而貫四民，農夫也有講求耕種之會，工匠也有講求製器之會，商賈也有講求貿易之會，……故於去春，予身數萬里，親察治田墾地新法，以增識見，決意出己所學，以提倡斯民。」這和前書的綱領興趣完全一樣。而且兩書對於洋務運動的批評也一樣。前書說：「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後書說：「若沾沾焉以練兵製械爲自強計，是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也。」這不過在語氣上，兩書有委婉與鋒利之不同罷了。

至於說國父出身醫學，何以要棄醫從農？是否用非所長？良醫猶良相，醫人與醫國之理相通，此乃中國人之傳統觀念。國父既爲良醫，又抱救國之志，自然可爲良相，所以他「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業。」（「革命思想之產生」）因中國以農立國，農民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從事農業之改良，即造福於全國，其貢獻實不下於良相。並且國父雖出身醫學，「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

而尤留心於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上李鴻章書」）同時一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閒嘗閱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於鄉間老農談論種植，膏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同上）這可見國父不僅是多才多藝的醫學家，且是個多才多藝的農學家了。我們相信他果真從事農業改良，一定勝任愉快，且為中國農村建設運動的第一人。這和民國元年國父辭去總統職務後，欲從事民生事業，鐵路建設，出於同樣強國富民的動機。那末，國父欲棄醫從農無論本身的才具和國家的需要，皆屬可能可行的了。

二

「上李鴻章書」既為國父所親撰，信而有徵，了無疑義。如再從本書的時代背景考察，國父在那時所為此種之言論恰與時代的需要相吻合。這並非欲効忠清廷，以為進身之階；實欲以和平建設手段，改革國家使之現代化，甚有其積極的意義。

須知鴉片戰爭以後，滿清王朝在西方列強侵襲之下，它的顛覆無能墮落腐化之種種弱點雖漸被揭露；但它能把一度佔領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消滅，同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乘其戰勝洪秀全的餘威，提倡洋務改革，摹倣西法，實行新政。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也就是在戰勝太平天國之後，甲午中日戰敗之前，這個三十多年間，主要在李鴻章的主持下，做了若干軍事上和實業上的建設，一時呈現出一片中興氣象。亦如國父在本書所言：「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比見國家奮發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駁駁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而行。」在此種情勢之下，排滿的民族革命不易發動，而清廷亦有可能循着日本明治維新的途徑蛻變成一個開明政府。於是那時的深通西學有識之士，有的寫成文章，發表維新救時的主張；有的上書清廷，條陳改革自強的建議。國父當此風氣之會，苟有助於國家之富強，無妨採取這種發表言論或上書言事的方式以達救國之目的。

國父大學時代就讀於香港西醫書院，該書院附屬於雅麗氏醫院，而雅麗氏醫院為何啓所創。何啓學貫中西，留英多年，獲醫學士及法律學士學位，在香港服務約三十年，為當地知名之士。他愛國憂時，常常發表革新的主張，

當他在光緒十三年（一八九七）發表「中國先歷後醜論後」（編者按：當為「書曾製侯中國先歷後醜論後」之誤）時，正是國父轉學西醫學院的第一年。何氏之學之名及其創立醫院的關係，當然為國父熟知，自然他的救時文章，也為國父所愛好的了。據「綱紀慎會」牧師喜嘉里（Rev. Hager）於宣統三年（一九一）追記說：「先生約就學（指在廣州博濟肄業）二年餘，復返香港，時香港醫學堂已設，乃入而肄習焉。其前所學者，皆用華文，至是復用英文，……當是時，先生始倡中國之亟宜革新，而審籌實行革新之計劃。」顯然是國父所倡「中國之亟宜革新」的言論曾受了他何辟的影響。

其次對國父上書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的同鄉鄭觀應。鄭氏幼學書史，長學西文，且游歷西歐，深悉外邦之政教習尚，治亂得失；主張興辦洋務，推行新政。曾在上海倡辦機器紡織事；並撰寫時論，鼓吹革新，言論且及於日本朝鮮。先成「易言」一書，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再擴充篇幅，改名「盛世危言」。自謂「將先後所論洋務五十五篇，……付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自知憤激之詞，不免狂難僭越之罪，且管窺蠡測，亦難舉短略長，蹈舍己芸人之譏。惟聖明在上，廣開言路，登賢進良，直言無隱。竊願比諸敢諫之木，進善之旌，俾人洞達外情，事事講求利病。如蒙當世巨公，曲諒杞人憂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時而善用之，行覲積習漸去，風化大行，華夏有磐石之安，國祚衍無疆之慶，安見空言者不可見諸行事，而牛溲馬勃，毋亦醫國者所蓄為良藥也歟？」（「盛世危言」自序）

鄭氏刊行「盛世危言」的方式是訴諸輿論和上書請願兼而有之的。因為該書係「有觸於懷，隨筆劄記」而成，亦有參考資料性質，不純粹是他自己的作品。據戴季陶先生說：「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戴自稱），『盛世危言』裏也採用了他的兩篇稿子。」（「吳稚暉先生致邵飄萍函」及戴者「孫中山先生著作及講演紀錄要目」）於此可見鄭氏很贊賞國父的革新主張，引為同道。所以當國父決定北上上書李鴻章時，鄭氏作函介紹於李氏幕僚羅豐祿，與以協助。（參閱「革命思想」九卷六期「國父上『李鴻章書』的經過及其價值」）同時李鴻章是國父母校西醫書院名譽贊助人之一，他的直隸總督署，無異是滿清的第二朝廷，已握住了清廷的實權，在他的下面徹底來做正在進行的改革事業，未嘗不是一條可行的救國途徑，這也應是上書的原因之一。

而且還不止此，「上李鴻章書」的綱領也和「盛世危言」有相同的地方。鄭氏自序說：「應雖不敏，幼獵書史，長業質遷，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於是學西文，涉重洋，日與彼都人士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之由，乃知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歛，保商務，使物暢其流。」這「使人盡其才」、「使地盡其用」、「使物暢其流」三項目，國父根據民本立場，進一步加以更正條陳，增訂為四綱領，就是「上李鴻章書」的全部精義所在。所以國父說：「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墨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不過，兩者大綱節目雖屬相同，而見解旨趣亦頗殊致。鄭氏之書純在上書條陳，希望清廷採用；國父之書是「能知必能行」（「孫文學說」）的表現，「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人民者也。」這不僅是垂諸空文，更要見諸行事，是後來國父創立「知難行易」學說的張本。

事實上，「盛世危言」所標項目亦非出自鄭氏，遠在三十年前，中國最早提倡改革維新的言論著述，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已指出中國不如西洋的地方：「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臣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紀綱，一轉念間耳！」鄭氏之說，實脫胎於此，國父之書，又綜合兩者，與以增減損益，再參酌「大學」的章法筆調，系統地解釋了富強四綱領。國父自謂「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此亦見一斑。

再就前面提到的為國父修改「上李鴻章書」的王韜，也是一位主張改革的有力人物，著「弢園文集」，他同情於太平天國，曾於一八六二年上書李秀成的部將，詳論攻取上海及對付洋人的策略。（參閱「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七冊，頁二六四）他影響之於國父，更具直接性質。

總上以觀，國父那時所處的境況，是個維新改革的時代，而直接間接影響國父上書的何啟、鄭觀應、王韜、馮桂芬等人，均為一時之彥，是康有為、梁啟超一派以外最有聲譽的維新改革的知識份子。這些人都主張英國式的君主制度，國父在大學時代受英國教育，自與這些人有不期而合者，所以上書請願的方式，從國父當時所處的時代背

景看，是完全吻合的，富有積極建設意義。

三

「上李鴻章書」就其方式說，是上書請願；就其內容說，是改革維新，這不有減損國父前此九年已立志革命的決心嗎？其實不然。所謂：「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只是種革命排滿的動機，正如他「決意出己所學，以提倡斯民」來從農業改良一樣，也是一種維新改革的動機。此兩種動機一物二面，要視時代需要為轉移。中日戰敗前，在李鴻章所主持的洋務改革下，清廷維持了幾十年小康局面，確有一片中興氣象，上書請願是合時代需要的。中日戰敗後，洋務改革一敗塗地，清廷之不足以有為大白天下，所以國父馬上組織興中會，從事革命運動來推翻滿清。誠如「一大會宣言」所說：「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以後，盛於庚子，而成於辛亥，卒顛覆君政。」這在次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第一次革命犧牲的陸皓東供詞裏也可看出。供詞云：「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為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

國父屢言「革命是不得已而為的事」（「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工具」及「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而且要趁時機，即孟子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所以國父當「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順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孫文學說」第八章）到了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招集同志以謀發動……」（同上）這說明國父第一第二兩次革命，都是當清廷戰敗，弱點暴露愈多的時候纔發動的。像這樣機會，在甲午之前是沒有的。就是有了這樣機會，在甲午之後，「向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按數年僅得同志百數十人），而欲向內地之傳播，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同上）故國父很感慨地說：「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同上）這可知在甲午之前公開提出革命排滿的口號之時機尚未成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五月

最好的證據，是「與中會宣言」。它所載的宗旨是「本會之設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大體和維新派的主張相同，並無革命排滿字樣，所以乃有兩黨聯合之議發生。

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於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曾以布衣上書清廷，開風氣之先。「聚徒講學二十年，其得志前後，廣東學界頗受影響。」（「胡漢民自傳」）梁啟超回憶康氏在「萬木草堂」下講後，「每語及國事阨阻，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歎歎，或至流涕，吾儕受其教，則振蕩忱惕，懷然於匹夫之責，而不敢自放棄自暇逸，每出則舉所聞以語親戚朋舊，強聒而不舍，流俗駭怪，指目之謚曰『康黨』，吾儕亦居之不疑也。」（「南海先生七十壽言」）因為兩黨領袖皆生於廣東，地理上也是一個聯合條件。據馮自由先生說：「丙申（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正月初九日，謝纘泰（與中會）應陳錦濤、梁瀾芬之宴，初識康有為之弟廣仁於香港品芳酒樓，席間謝痛言兩黨聯合救國之必要，廣仁極首肯。」（「開國前革命史」頁四三）又說：「其初兩派對於國事宗旨均頗接近，孫於乙未廣州發難之先，嘗赴天津上書李鴻章，條陳改革，而康之弟廣仁及其徒何章、陳千秋於戊戌政變之前，亦曾詣孫、楊磋商合作，故當日兩派如聯合謀國，原非不可能之事。」（同書頁一）兩黨聯合雖因康氏之梗，未曾見諸事實，却證明那時與中會的宗旨接近維新派；而「上李鴻章書」就是那時稍前的產物。

這樣我們對於國父在「倫敦被難記」之所言，纔有切實的了解。「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與中會』。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之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國為國民利福耳。……中國睡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與中會之所出設也。與中會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或可奮起。……是以吾黨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但中日戰事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加以叱責，且云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不得擅上云云。吾黨於是慨然長歎，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這段話國父後來雖在「孫文學說」第八章予以修正，但文中所謂「請願上書方法」自然包括了「上李鴻章書」在內；所謂「會合全體聯合上書」顯指乙未康有為在京聯合一千三百餘人公車上書之事，

而國父亦以「新黨」自居，這時尚未正式揭出革命排滿的旗幟以號召天下。

革命排滿思想原起於會黨，由來已久；而革命排滿兩個觀念結在一起，公開號召，收大效者，當在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保皇會成立之後，章太炎說：「改制同族爲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其所規劃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命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鄒容「革命軍」序，一九〇三年出版）而梁啟超也認爲「易姓者，固不足爲 Revolution，而 Revolution 又不必易姓。……國氏變革與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釋革」）當時兩黨言論權威如章、梁者，尙以爲排滿與革命非一事，總算經過鄒容把革命「大言之」，纔使革命排滿連在一起。所以國父說：「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期也。」（「孫文學說」第八章）這時國父纔正式揭出革命排滿的旗幟與保皇黨「畫清界限，不使混淆。」（國父「敬告同鄉書」，一九〇四年發表。）

就時代言之，維新運動是中國革命的準備階段，「改革之思想，乃革命之起點也。」（「革命文獻」第三輯頁八）所以「其始也，得歐風美雨之吹沐；其繼也，得東鄰維新之喚起；其終也，得革命風潮之震盪，遂一舉而覆異族之專制，……創立中華民國。」（「民權初步」自序）這裏國父肯定了維新運動的歷史價值和時代使命，因此他把「革命維新」同樣看成「先知先覺」的「事業」。（「孫文學說」第八章）

這樣國父的革命思想就包含着維新改革或和平漸進的意識。看他如次的話吧：「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疑義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革命思想之產生」）「革命兩字，有許多人聽了，覺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與改造完全一樣。」（「改造中國第一步只有革命」）「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談話」頁七）「日本維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

凡此言論，在國父腦海裏，革命與維新是一體二面，相輔爲用。因爲「救國之道多端」（「入京宣言」），不

能拘於一式。在維新時代，可採「和平之手段」，故有「上李鴻章書」之事；及清廷禁止上書請願，改革無望，「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便發起革命運動。而革命又非一味的破壞，在國父看來，建設也同等重要，仍含有維新改革之義。所以戴季陶先生認為「上李鴻章書」「這篇文章裏說話，自然有些時間性的話在內，然於孫先生生平的主義還是一貫的。」（「吳稚暉先生致邵飄萍函」），如此說來，就無損於國父革命精神之發揚了，而且使我們了解於他初期思想的真諦，以及他臨終彌留時所斷續呼出的「和平、奮鬥、救中國」之意義。

註一：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十四。

註二：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篇，頁二。

註三：「國父全集」，第五集，頁十。

註四：同註三，頁一一十二。

註五：吳敬恒：「中山先生年系別傳」，頁十四。

註六：同註五，頁十五。

註七：已詳本年正月第一條，原載「興中會革命史要」，頁十四—十五。

註八：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頁五二—五三。

註九：馮自由：「革命逸史」，頁二一。按：所謂「太平天國狀元王韜」，據簡又文氏集合諸家之考證而作

之結論云：「所謂『長毛狀元——太平天國狀元』的稱謂，乃係那時友朋間所贈予的雅謔，當作取笑他（王氏）的資料，並非真有那麼一回事。因為（一）以時間計之，王氏于太平軍占領區內不過三幾個月。（二）考其在蘇州上書時間，則在壬戌（太平天國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揆諸情理，王如上書前中了狀元，則不必再如此卑躬屈節去上書矣！但若中狀元在後，則青雲直上，既名登太平仕版，又必不至回滬矣！」（見簡又文著：「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上冊，頁二七六）。

復按：討論王韜之生平文章，一為謝興堯「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事蹟考」（載「太平天國史事論叢」，商印務書館民國五十六年二月版。）一為羅爾綱「黃曉考」（載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叢考」，正中書

局民國三十二年八月版），大意謂：蘇州人黃曉，少負大志，屢試不第，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曾上書太平天國「總理蘇福省民務逢天義」劉肇均，請其轉稟忠王李秀成，建議攻取上海策，其計甚萬全，而太平軍不能納。同年三月，清軍合英法軍破上海附近七寶劉肇均營時，檢得此書，呈交江蘇巡撫薛煥，疏聞於朝，清廷大震，江南北爲之傳驚，黃曉遂被通緝，後得外國傳教士協助，逃避香港，改名王韜。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應英人理雅各之邀曾遊英倫，佐譯中國經籍，兩年後復歸香港，自號天南邇叟，主編「循環日報」，鼓吹改革。時太平天國早亡，物議漸息，韜思歸心切，爲文掩飾既往，以辨與黃曉並非一人，而取悅於當局。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得李鴻章奏准清廷，始得返滬，築別墅靈岩山下，名硯園，而入中報館任編輯，不復作激烈之言論。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卒，享年七十歲，遺作有硯園文錄、硯園文錄外編、硯園尺牘、遯齋譚言、硯園老民自傳等作品，今坊間合編爲硯園全集問世。

註一〇：「國父全集」，第六集，頁一六八—一六九。

註一一：同註一〇，第五集，頁十三—十四。

註一二：同註一〇，第四集，頁四八四。又同書第三集，頁五七—五八。

註一三：同註一〇，第五集，頁一—十一。

註一四：全文錄自「大陸雜誌」，第二三卷，第五期，民國五十年九月十五日，周弘然「國父上李鴻章書之時代背景」。

孫先生文偕陸皓東遊北京，旋南遊武漢。

孫先生偕皓東北遊北京，窺探清廷虛實；旋轉道溯長江而上，深入武漢一帶，觀察山川形勢，預爲他日革命發難之圖。（註一）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引自「國父全集」第二集頁八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五月

三日(六月六日) 清駐日公使汪鳳藻奉總署電，以中國保護屬邦，出兵朝鮮事，照會日外務省。

先是，李鴻章接獲袁世凱之援韓電報後，一面派軍援韓；一面致電駐日公使汪鳳藻，根據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中日天津條約，通知日本外務省，鳳藻遂于本日照會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其文曰：

「爲照會事：本大臣承准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李電開，光緒十一年中日兩國訂立條約，載明將來朝鮮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國派兵應先行文知照，及其事定，即行撤回，不再留防等因。今准朝鮮國王來文內開：案照敝邦全羅道所轄之泰仁、古阜等縣，民習兇悍，性情險謫，素稱難治。近月來附串東學教匪，聚衆萬餘人，攻陷縣邑數十處，今又北竄，陷全州省治，前經遣練軍前往勦撫，該匪竟敢拚死拒戰，致練軍敗挫，失去砲械多件。似此兇頑久擾，殊爲可慮。況現距漢城僅四百數十里，如任其再爲北竄，恐畿輔騷動，所損匪細。而敝邦新練各軍，現數僅可護衛都會，且未經戰陣，殊難用以殄除兇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貽憂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兩次內亂，咸賴中朝兵士，代爲戡定，茲擬援案請懇酌遣數隊，速來代剿，一俟悍匪挫殄，即請撤回，自不敢續請留防，致天兵久留於外等因。本大臣閱悉來文，見其情詞切迫，且派兵援助，爲我朝保護屬邦之舊例，以是奏聞後，欽奉上諭，派直隸提督榮，選帶勁旅，馳赴朝鮮全羅忠清道一帶地方，見機防堵攻討，越期撲滅，務安屬邦，使各國人民在朝鮮地方貿易者，皆各安其生業，平定後即行撤兵，並不留防。理合電達貴大臣，請速照會日本外務省等因。相應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註一)

註一：王炳耀輯「甲午中日戰輯」，頁四〇—四一，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以下同。

四 日(六月七日) 日本陸奧宗光照復汪鳳藻，否認朝鮮爲中國屬邦，並聲稱已派兵赴韓護商。

日政府既得汪使照會，立即照覆汪使，否認朝鮮爲中國之屬邦，略曰：「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爲

藩服，然朝鮮王從未自承爲屬于貴國，理合聲明照覆。……右照覆大清欽差大臣汪。」（註一）一面電該國駐北京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于本日照會總理衙門，聲明根據天津條約，出兵朝鮮，略曰：

「大日本帝國欽命署理出使中國大臣小村爲照會事：接奉廷寄，恭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國與貴國訂立條約，若欲派兵前往朝鮮，彼此須互相知照在案。近來朝鮮內亂孔熾，本國不得不派兵前往，朝廷業已命將出師，即合諭知該署使臣，告知中國總理衙門。」（註二）

註一：「甲午中日戰輯」，頁四一。

註二：同註一，頁四二。

六日（六月九日） 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援軍抵朝鮮仁川。

聶士成于本日率清軍前鋒八百人抵朝鮮仁川，越二日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後隊繼之，合一千五百人進屯牙山。（註一）

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慶親王奕劻，照覆日本駐北京公使小村壽太郎，曰：本無須因韓亂特發重兵。

原照會略曰：

「五月四日接准貴署大臣來文內開：……以朝鮮之亂，貴國欲派兵前往。……本爵等查我朝以朝鮮王申請救護，業已派兵前往該國，削平禍亂，此係按照撫綏藩服之成例。……今貴國乃亦派兵前往，度不過爲保護公使領事各官及通商事務而已。……似可不必特發重兵，且朝鮮王初未向貴國請兵，故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至驚民庶，況乎我兵已數行而前，若與貴國之兵，相遇于內地，彼此言語不通，軍律互異，不得不思患預防。」（註二）

註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頁五二，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以下同。

註二：「甲午中日戰輯」，頁四二、四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五月六日

七日(六月十日) 日使大島圭介率兵四百餘人至朝鮮京城。

方大島自東京出發時，日外相陸奧宗光授與機密訓令數件，中有：「若時局急促，無請本國訓令之餘暇時，該公使得施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註一) 是日政府早已蓄意生事，且將啓衅之禍首屬之大鳥矣！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文書，頁一四〇—一四一。

八日(六月十一日) 朝鮮東學黨受撫，退出全州。

朝鮮東學黨聞中日兩國大軍至，且聞清軍出示招撫，本日棄全州遁散。東方兵事紀略一書記其事云：「是時，朝鮮賊黨，聞我兵至氣已懾。……復為朝兵所敗，會我軍出示招撫，遂棄全州遁。」

(註一)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頁二二。

九日(六月十二日) 日外相陸奧宗光訓令駐華日使小村壽太郎，照會中國，正式否認朝鮮為中國屬邦，日本派兵係根據濟物浦條約。

本日日本正式照會總理衙門，宣佈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屬邦，並謂出兵朝鮮，係根據濟物浦條約上之權利行之。照會略曰：

「大日本國署欽差出使大臣小村為照會事：六月初九日，接准貴王大臣咨開，貴國按照撫綏屬國之成例，派兵前往朝鮮，削平禍亂。……本國歷來未認朝鮮為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往，一係按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訂之約，一係按照中日兩國在天津所訂之約，妥慎辦理，文內所稱本國派兵之數，本國自有權衡。我兵之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亦斷不往可以毋庸前往之地。至謂兩軍相遇，或有意外之事一節，本國軍律森嚴，在軍員弁，必能妥為

約束，斷不礙及華兵，惟望貴國統兵將帥，亦共留意而已。」（註一）

日軍第二批抵達仁川，旋赴韓京。

第二批日兵，共約一千五百名，係搭日商輪前往，並載馬二十四匹。甲午中日戰輯一書記其事云：「日商輪船載兵一千五百名，馬二十四匹，至仁川。……初十日，赴韓京。」（註二）

註一：「甲午中日戰輯」，頁四三。

註二：同註一，頁三五。

十日（六月十三日）英籍海軍專家泰樂爾（W. R. Tyler）論海軍應日新月異，而中國船艦砲火皆不合標準，恐難禦敵。

英籍海軍專家泰樂爾語字林西報訪員，論海軍進步，應日新月異。然中國五年來未添一船，而英國重新裝配海軍軍艦五十，法、俄、日共同狂熱修造。日本新自英國購得金剛、吉野艦，速率二十三哩，中國所有船隻不能逃，所有軍火在短時間內不能敵，李鴻章在煙台觀察生的里（Centurian）當知之。無論如何，十年後中國海軍將成爲廢物。（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九二六，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五日。

十一日（六月十四日）日本閣議，決向中國提出共同改革朝鮮內政要求。

日本既注全力於軍事上取得優勢，外交上則苦於無立足之地。蓋日本之出兵，藉口根據濟物浦條約保護使館僑民，然東學黨已風流雲散，漢城、仁川均無被匪之危險，故中國根據天津條約，要求中日同時撤兵，實爲事理之當然，日本殊無詞以辯，歐美各國亦均腹誹其非。日政府鑒於外交情形，如此不利，乃思玩弄狡猾手段，以轉移形勢。日外相陸奧宗光屢以此意商諸首相伊藤博文，伊藤深以爲然。及本日內閣會議，伊藤親書提案一紙，謂朝鮮內亂，中日兩國軍隊，應共同努力，速行鎮壓，亂事平定後，

爲改革朝鮮內政起見，由中日兩國派出常設委員若干名于朝鮮，調查該國之財政，淘汰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吏，且設置必要之警備兵，以保持國內之安寧，並整頓該國之財政，募集公債，以啓發國家公益事項等。伊藤蓋欲以共管朝鮮之難題，以難中國，閣僚均加贊同。陸奧復于伊藤案外，加入兩項：即「不問與中國政府之商議成否，非觀其結果如何，決不撤回目下在朝鮮之日本軍隊。又若中國政府不贊同日本提案時，日本政府須以獨力擔任，使朝鮮政府行前述之改革。」當經閣議決定，奏明日皇裁可決行，于是日本之外交遂由被動一變而爲主動，其手腕不可謂不狡猾矣！（註一）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一四〇—一四一。

十四日（六月十七日） 日外相陸奧宗光，正式照會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主會剿韓亂民，共同整頓韓政，派員教練韓軍。

先是，自本月十一日日本經閣議通過向中國提出共同改革韓政後，陸奧復于十三日約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至外務省，將日閣所決定之條件告之，請電中國政府，以求同意。鳳藻聞日方之提議，至表詫異，因謂：「當講求朝鮮善後方策之前，中日兩國軍隊應同由朝鮮撤退，徐定後圖。」陸奧則謂：「觀察朝鮮現在之形勢，確信禍亂潛伏，本源甚深，非根本改革其秕政，不能求久遠之安寧。故目下僅施區區姑息之術，彌縫一時，我政府以領土接近之故，不能一日安堵。帝國政府非至確然安堵時，不論如何，不能撤原駐朝鮮之軍隊。若中國政府察我真意之所在，果能贊同此提案，則雖可爲帝國政府安堵之一大幫助，然該提案與中日兩國從朝鮮撤回其軍隊之事，可作爲另一問題，再行商議。」（註二）此一談判由是晚八時，繼續至翌朝一時後。陸奧復恐鳳藻忽視其提議，本日更以公文照會汪使，其照會曰：

左：

「爲照會事：關於日下朝鮮事變，及善後方法，昨日面晤時，作爲帝國政府提案，與貴國政府協議之要旨如

關於朝鮮事變，日清兩國從速鎮壓亂民，亂民平定後，爲改良朝鮮內政，由日清兩國派常駐委員若干名，駐紮朝鮮，調查左列事項：

一、調查財政；一、淘汰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吏；一、設置必要之警備兵，保持國內之安寧。合行照會貴大臣，特煩查照，須至照會者。」（註二）

註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頁四七；王炳耀：「甲午中日戰輯」，頁四四。

註二：「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一四一—一四二。

十八日（六月二十一日） 汪鳳藻照覆陸奧，拒絕會剿及共改韓政，仍主雙方同時撤兵。

清廷得日方提議，甚不謂然，經李鴻章與總理衙門磋商後，令駐日公使汪鳳藻于太日照覆日政府曰：

「爲照覆事：本使接本國政府訓電，關於貴國政府所商朝鮮事變及善後辦法，深加考慮，特爲奉覆如左：一、朝鮮之變亂，現已平定，目前中國軍隊已不須代朝鮮政府剿伐，故中日兩國會同鎮壓之議，可作罷論；一、日本政府對朝鮮謀先後之策，其意雖善，然宜使朝鮮自行釐革，中國尚不干涉其內政，日本最初承認朝鮮爲自主國，更無干預其內政之權；一、變亂平定後，即行撤兵，乙酉年兩國所訂條約具在，今無再議必要，合行覆照，請煩查照，須至照覆者。」（註一）

註一：王炳耀：「甲午中日戰輯」，頁四四—四五。

十九日（六月二十二日） 陸奧宗光照覆汪鳳藻，謂中日所見相違，日本斷不能撤退駐朝鮮之兵。

昨日清廷致日本照會之理由十分充足，無如日人已決心挑釁，當然非中國一紙公文所能戢其野心。陸奧宗光接清廷照會後，復于本日照會汪鳳藻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五月十八—十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五月十九日

九二

「爲照會事：接光緒二十年五月十八日貴使照會內開，本大臣依本國政府訓令，拒絕日本政府關於朝鮮變亂鎮定並善後辦法之提案，均經閱悉。顧察朝鮮刻下之情勢，帝國政府與貴國政府所見不同，帝國政府甚爲遺憾。徵諸既往之事蹟，朝鮮半島，常呈朋黨爭鬭內訌暴動淵藪之慘狀，確信可以如斯繼續發生事變者，由於缺乏完成其獨立國實守之要素。慮及疆土之接近及貿易之重要，帝國對朝鮮之利害，甚爲緊切重大，因是不能拱手傍觀彼國內之慘情悲況。當情勢如此之時，帝國政府置諸不理，不僅有背平素對於朝鮮所抱鄰交之友誼，且不免不顧我國自衛之道之誚。帝國政府爲謀朝鮮之安寧靜謐計，實有施行種種計劃之必要，其理由前已述及。今若遲疑無所施設，曠日持久，則該國變亂必至愈益滋蔓，以是非若非協定將來足以保持該國安寧靜謐並保證政治得宜之辦法，則帝國政府決難撤兵，且帝國政府之不遽行撤兵，不僅係遵守天津條約之精神，且爲善後之防範。本大臣如斯披瀝胸襟，傾吐誠衷，假令貴國政府所見相異，帝國政府亦斷不能發令撤去現駐朝鮮之軍隊！合行照會，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大日本帝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註一）

此一照會充分表明日本政府無論如何必不撤兵之決心，而措詞之強硬，尤極明顯，日人視此照會爲對中國之第一次絕交書，陸奧曾自述其事曰：

「以此次之事件論之，畢竟朝鮮內政之改革云者，不過爲調停中日兩國間之難局所籌出之一政策。事局一變，竟不能不以我國之獨力擔當此事。故余自始對於朝鮮內政之改革，並不特別注重；且懷疑如朝鮮之國家，果能行滿足之改革否耶？今已爲外交上之一種活問題，我國政府總不能不試行。故我國朝野之議論，對於事情原因如何，已不問矣。總之，有此協同一致，對於內外，頗爲便利。余假此好題目，非欲調和已破裂之中日兩國關係，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機，一變陰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註二）

于此可見日本政府之野心及其狡猾手段，早已昭著若揭矣！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一四二——一四三。

註二：陸奧宗光「蹇蹇錄」，日本昭和十四年東京慶文堂出版，頁六七。

二十二日(六月二十五日) 俄駐日公使希德洛夫 (Mikhail Hitrovo) 于本日親向日本政府提出，勸告自韓撤兵。

先是東學黨亂初起時，世界各國並未對之特別注意，及見日本出兵，乃相與驚愕，俄、英、美等國紛紛起而調停，其中尤以俄國之態度最爲堅決。當大島圭介率兵歸任之頃，駐日俄使希德洛夫即質問日外相陸奧宗光云：「近頃屢聞日本派出軍隊，不知敵果在何方？」五月間駐北京俄公使喀西尼(A. P. Katenin)，奉命歸國，道經天津，李鴻章托其懇俄政府調停中日爭議，俄因命喀西尼留津，與鴻章談判，一面訓令駐日俄使希德洛夫向日政府提出勸告。本日希德洛夫至日本外務省面晤陸奧，茲錄其對話如下：

希德云：奉本國政府訓令，稱中國政府關於中日事件，求俄國調停。俄國政府希望中日兩國間之爭議，早爲了結。若中國政府撤退其派出朝鮮之軍隊，則日本政府亦同意撤退其軍隊否？

陸奧答曰：大體雖無異議，然現今兩國對峙，彼此互抱猜疑之念，欲渙然冰釋，殊屬爲難。而如斯事情，不特中日兩國爲然，歐洲列國間亦往往有之。加之中國向用陰險手段，干涉朝鮮內治，以表裏反覆之術，欺瞞日韓兩國之事件甚多。故今日我政府不能輕易信賴中國之言行，亦非全無根柢之猜疑。若中國政府(一)承諾由中日兩國共同負責改革朝鮮內政；或(二)若中國不拘有何理由，關於朝鮮之改革，不欲與日本協同，則日本政府以獨力實行時，該政府直接間接皆不得妨害。中國政府能於此二者中，保證任何一點而撤退其軍隊，日本政府亦可撤退其軍隊。(註一)

同時陸奧向俄使保證二事：一、日政府除希望確立朝鮮之獨立及和平外，決無他意；二、將來中國政府雖如有舉動，日本政府不作攻擊之挑戰。若不幸此後中日二國間不得不交戰時，日本當在防守之地位云云。(註二)

世界輿論譴責日本挑釁。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五月二十二日

世界輿論一致譴責日本挑釁，謂：「中國若讓步，鴻章之經營將完，若不讓步亦完。」請聯合與遠

東有利害之國家制止日本。（註三）

註一：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民國五十三年，文海出版社影印版，頁二〇〇。

註二：同註一，頁二〇一。

註三：「字林西報」，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社評。

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七日） 日軍第二批到達仁川。

本日，日軍渡朝者已達八千餘人，皆屯王京據要害。（註一）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卷一，頁十八。

二十七日（六月三十日） 駐日俄使復照會陸奧，如不撤兵，日應負責任。

本日，俄使復晤陸奧，謂奉本國政府訓令，面交一公文，略曰：

「朝鮮政府已通告內亂鎮定之意於駐劄該國之各國使臣，關於中日兩國同時撤兵事件，求該使等之援助，因之俄國政府勸告日本政府容納朝鮮之請求。若日本政府拒絕與中國政府同時撤退其軍隊，則日本政府應自負重大責任，特此忠告。」（註一）

註一：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頁二〇二。

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日外相陸奧向俄聲明，日對朝鮮無領土野心。

先是，陸奧接閱二十七日俄使之照會後，頗為驚愕，經與伊藤商議及閣議討論，均認此時無接受俄國忠告而撤兵之必要。遂于本日致送一覆牒于俄政府云：

「貴國特命全權公使所送致之公文，事勢甚為緊要，帝國政府已經深悉。該公文中有朝鮮政府曾通告該國內亂已鎮定之意於駐劄該國各國使臣云云。然據帝國政府最近所接報告，釀成此次朝鮮事變之根本原因，不特尚未及除

，即日本所以爲之派遣軍隊之內亂，亦尚未絕跡。蓋帝國政府派出軍隊於該國，實屬對於現時形勢不得已之舉，決無侵略疆土之意。若至該國內亂完全消滅，將來無何等危懼時，當然將軍隊撤退。此時不妨對貴全權公使明言，帝國政府對於俄國政府之友誼的勸告，深表謝意。同時希望俄國政府本兩國政府間現存之信義及友誼，對此保證，充分信賴。」（註一）

註一：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頁二〇二—二〇三。

六月

三日（七月五日） 袁世凱自漢城電李鴻章，日決無和意，請速決和戰，並請赴津面稟一切。

世凱對當時朝鮮情況瞭如指掌，故本日急電鴻章，不必寄望于和局之成立。翌日鴻章電復之云：

「頃駐日使金思轍回漢，即告日兵必不能吞併，惟在虛嚇構衅，已力勸王，我以理堅持，不許干預內政，伊亦無奈何？」（註一）

按：袁世凱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生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祖樹三，叔祖甲三。甲三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進士，爲咸、同間名臣，嘗以漕運總督銜節制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剿匪軍事。世凱生父保中，嗣父保慶。保慶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舉人，從甲三征戰，以江寧鹽法道卒於任。世凱幼不喜制舉之文，屢試均不第，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至登州投靠吳長慶。長慶與保慶昔曾共事，時以廣東陸路提督辦理山東海防。明年六月，朝鮮發生壬午之變，清廷命吳長慶率所部六營赴韓平亂，世凱任前敵營務處，俘大院君李昇應，以戰功而爲李鴻章所激賞。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四月，吳長慶奉旨督率所部半數守金州，世凱仍留漢城，以同知銜任教練韓兵事。同年十月，朝鮮發生甲申之變，世凱與記名提督吳兆有，迅速定亂，聲名漸噪。明年，中日天津條約成立，清廷送大院君歸韓，命

世凱以三品銜駐劄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世凱年少氣盛，遇事過問，日人乘機構煽，利用大院君以排華，韓政日非。本年春，東學黨亂熾，世凱力主中國派兵平亂。及日本拒絕自韓撤兵，本日世凱乃電李鴻章，告以日本決無謀和誠意，請速決和戰，並請赴津面稟一切。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六)，文海出版社影印版，頁四四六，以下同。

五日(七月七日) 滬報載中、日雙方在韓之軍隊數目及應援之兵力。

滬報載中國在韓陸軍七千六百五十人，軍艦十一隻，員兵三千八百人，一旦作戰，由鴨綠江進援一萬四千人，天津盛軍一萬七千人。而日軍在朝鮮者九千七百人，在海口奉命待發者萬人，一旦作戰，兩日之內，日于第一線兵力，可達兩萬人。(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五，一八九四年七月六日。

七日(七月九日) 駐中國俄使喀西尼遣人赴天津告李鴻章，俄只能以友誼勸日撤兵，未使用兵力強勒。

李鴻章在天津晤俄參贊巴布羅福(M. Pavlov)，知俄無助華抗日誠意，大失所望，乃致電總署。略曰：

「頃略使遣巴參贊、來領事過晤，稱頃接俄廷電復日韓事，明係日無理，俄只能以友誼力勸日撤兵，再與華會商善後，但未使用兵力強勒日人。至朝鮮內政應革與否？俄亦不願與聞等語。鴻話以五月二十二日喀遣爾等來告，俄廷要勒令日撤兵再議，如日不聽，尚有第二層辦法，是前後語意不符。……」(註一)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六)，頁四四八。

九日(七月十一日) 葉志超自牙山電告李鴻章，進兵為上策，撤兵為中策，守此不動為下策。

時日軍在韓已增至萬餘人，積極備戰，我軍仍僅葉部一千五百人，故葉有此電，鴻章旋覆之曰：「總署現與日使議商，我軍應暫靜守勿動，日仇華時思挑畔，切戒弁兵勿與計較，如議和不成，再另調度。」（註二）據此，可知鴻章仍未有戰守準備也。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內，頁四四九。

十日（七月十二日）駐京英使歐格訥（O'Connor）向慶親王奕劻提出韓事四項調停方案：改革內政，派員赴韓商辦，中日共保朝鮮，兩國在韓商民一律看待，奕劻未允。

先是，英使歐格訥斡旋中日朝鮮之爭，與總理衙門約定本月七日（七月九日）與日使小村相晤，屆期小村往議，慶親王奕劻等並無任何新建議，祇謂日本必先自朝鮮撤兵，然後再商韓事，遂無結果而散。小村離總理衙門後往晤英使，謂中國違約，英使甚為詫異。本日歐格訥復親往總理衙門詢問究竟。王芸生記歐格訥與奕劻問答如左：

歐云：我上次來所談朝鮮的事，貴衙門並未定有辦法，失此機會未免可惜。答以本衙門之意，總要日本先撤兵，後商量，並非未有辦法。歐云：本國替貴國催日本撤兵，即是商議之頭一端，從此自可接下去商量別的。答以初七日小村來問我們甚麼意思，却未提及日本擬的詳細節目。歐云：本國政府派我調停其事，祇為兩國交情，並無別意，務請放心。恐有失和，與貴國無益。答以我們深知此意，如有失和，自然兩國皆無益。歐云：現在貴衙門尚未定有辦法，莫非仍候俄國調停的信麼？答以並無此事。歐云：有中日俄三國會議之說，俄國與議一節，恐怕不行。這是別人的議論。答以俄國與朝鮮比鄰，日本不撤兵，故欲合議。歐云：本國政府催日本撤兵，日本不以為然，本國政府大約另有辦法，問以如何辦法？歐云：由本國政府照會歐洲各國，協力催其撤兵。昨本國來電，問日本駐朝鮮兵數，據我看來，日本兵已及萬餘，立時令撤，原不易做到，或令日本先撤續派之兵，所贖者與華兵現駐之數相同，此中或撤或留，兩國同辦。然後再商議別的事，方為公平。答以此法却好，但須先將漢城之兵撤盡，以免朝鮮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六月十日

驚擾。歐云：此係我揣度本國之意，日本允否未可知。答以中國辦理此事，總要辦得到的辦法，纔能商議，因中國雖無議院，說話之人亦多。歐云：日本現在已與朝鮮商改內政，中國此時若不出頭，則撫馭朝鮮權柄恐日減了。答以中國原可勸令朝鮮酌改內政，但不能逼勒。刻下日本以重兵壓漢城，勒令朝鮮改革內政，中國何能與之同議？還是方纔所說，先令日本將續派之兵撤去，騰留之兵，與中國兵數相埒，然後開議，最爲公平。歐云：此係我窺政府之意，辦到與否，未定。惟此事不宜多請別國說合，並不宜多處商量。答以前日小村曾願中日兩國對商，不願他人干預，只須小村在本署商量，亦無多處。昨與小村訂明候彼回信再說，請問日本和商之說，究竟是真是假？歐云：日本現出多兵，恐所求不遂，不能和商了。此事須早定主意，若再遲延，實在無益。答以我們與小村商量撤兵，原說是撤兵後還有商議，並不是撤兵後便不商量，小村何以不給我們回信？總而言之，此刻以撤兵爲第一要端，必須明定日期，使各國周知，餘事乃能定議。歐云：我欲電知本國四端：一、改朝鮮內政允否？答以此事只能勸他，不能逼勒他。一、派大員赴朝鮮商辦允否？答以此係各事商定後的話，此刻不必先提，將來自有辦事之人去。一、兩國共保朝鮮不許他國佔其土地允否？答以中國之保護朝鮮無須再說合，日本允不令人占其土地，中國豈有不允之理？歐云：我係詢問貴衙門的意思，好電本國，並可會同歐洲各國，以催日本撤兵。如貴衙門以我所說爲然，我即可發電。答以撤兵後可以商量，此一句話可以說定，此外一概不能預定，因將來議論時，可允則允，萬不能允者自不能答應。歐云：派大員赴朝鮮商量，係要緊之事，答以如電歷次調停之說，小村奉有商議之權，由小村在本署商量，或如光緒十一年樣子，日本派大員來華，我們請旨在天津與李中堂商量皆可，中國斷不能派大員至朝鮮商議此事。歐云：尚有一款，日本商民在朝鮮與中國商民一律看待，貴衙門允否？答以日本與朝鮮立約，聲明平等之國，豈能與中國一律？此條無須商量，朝鮮自有向來辦法。爾既爲好，此可不說。歐云：如此說貴衙門即係不願商量，我算白費話了。答以我們並非不願商量，但須視事之可否。歐云：貴衙門若不答應這一條，我想小村必無回信。答以小村若無回覆，我們即電日本外部問去，總須候其回信我方定議。又略談數語遂去。（註一）

由此一談話中，可知總理衙門諸大臣之不諳外交，致使英使難堪，且資日人促成破裂之藉口。

註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頁二八—三十。

十二日（七月十四日）日使小村壽太郎照會總署，拒絕撤兵，並謂兩國如起不測之變，日不任其責（此即所謂第二次絕交書）。

先是，本月十日，英使調停未成，日本遂趁此機會促成破裂之局，陸奧宗光經與閣僚議妥後，即電令小村向中國政府提出第二次絕交書，小村遂于本日致送照會與總署曰：

「爲照會事：明治二十七年七月九日在貴衙門晤談時，貴大臣所述關於朝鮮事件之意見，已即日電告我國外務大臣。頃接我政府電開：朝鮮屢有變亂，實內政紊亂之故。我政府以爲中日兩國對於該國之關係，均甚緊要，今莫若使該國釐革內政，以絕變亂於未萌。曾以此意告中國政府，詎料中國政府拒絕此議，唯望以撤兵一事，是實我政府所深爲驚訝者。其後英國駐華公使願慮友誼，爲使中日兩國妥協，盡力調停。然中國政府依然主張撤兵，毫無傾聽我政府意見之意。由是觀之，非中國政府有意滋事而何？今後倘生不測之變，我政府不負其責等語。相應照會貴大臣，請煩查照，須至照會者。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日本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註一）

按：此一照會，即日人所謂最後通牒，亦即所謂第二次絕交書。隨後，陸奧即訓令該國駐韓公使大島圭介，謂「英國之調停已失敗，現在有斷然處置之必要」。（註二）至是，釁端以成。

清廷以中日勢將決裂，嚴旨命李鴻章速籌戰守事宜。

本日清廷密諭李鴻章迅速調派水陸各軍增援朝鮮，不得諉卸遷延，致干咎戾。略曰：

「日人以重兵脅制朝鮮，雖與商議撤兵，久未就緒，和議恐不足恃，亟應速籌戰備，以杜陰謀。前經疊諭李鴻章先事豫籌，毋致落人後著，現在事機緊迫，著李鴻章速爲籌備，先派一軍由陸路前往邊境駐紮，以待進發。宋慶所部素稱得力，東三省練軍及左寶貴所帶兵勇亦皆可用，應如何抽撥之處，著分別咨商，速籌調派。水路葉志超一軍兵力尙單，須有繼進之軍以資接應，沿海各口如旅順、大連灣、威海等處，皆關重要，如何布置，均應逐一妥籌，其軍火器械糧餉一切，均應剋日辦齊，先期給發，方不至倉猝誤事。該督奉到此次密諭，立即妥籌趕辦，水陸各口現擬派何人前往？統帶幾營？駐紮何處？及一切辦理情形，迅即詳細覆奏，慎勿諉卸遷延，致干咎戾，將此由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六月十三日

100

四百里審諭知之。」(註三)

鴻章旋於同月十四日致電總理衙門，述其佈置之情形曰：

「昨欽奉十二審諭，速爲籌備等因。查漢城、仁川附近一帶日兵，水陸分佈嚴密。歷來中國進兵朝鮮，皆由平壤北路進發。現派總兵衛汝貴統盛軍馬兵六千餘人，進平壤；宋慶所部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千進義州，均屬商局輪船分起由海道至大東溝登岸，節節前進，相機妥辦，所需軍火器械糧餉轉運各事，均剋日辦齊，俾無缺誤。並電商盛京將軍，派左寶貴統馬步八營進平壤，會合各軍，圖援漢城；至葉志超一軍，昨已電商該提督，移紮平壤，厚集其勢，俟其覆准。即派丁汝昌酌帶海軍能戰之船往朝鮮海面巡護游突，以資策應，此目前佈置大略情形。」(註四)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一四一—一四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四二，頁三〇五〇(原頁十二)。

註四：「李文忠公全集」(內)，頁四五三。

十三日(七月十五日) 李鴻章以事態緊迫，電令葉志超自牙山移軍平壤。

先是，鴻章預知日人難以理喻，即奏請速撥軍餉，派駐津之盛、銘二馬隊，與旅順之毅軍炮隊，共十營，飭招商局輪船，載軍東渡，並租外國商船數艘輔之；又派北洋海軍戰艦八艘，護送兵士軍械糧食。另飭南洋、廣東兩處兵輪，分赴韓都，所聘之德員漢納根(C. Von Hanneken)，率兵士千二百名，同乘英商輪高陞號，齊赴牙山，此由海道增援之軍，擬與先至之葉軍會合。至是，復令葉軍先行移軍平壤，另奏派左寶貴統奉字馬步練軍，與北洋之盛、毅、銘三軍，從吉林、山海關、黑龍江、奉天等處，檄調齊集，渡鴨綠江，入義州，至平壤，向漢城，此大軍由陸路進。(註一)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內)，頁四五二；「甲午中日戰輯」，頁四七。

十四日(七月十六日) 駐京英使歐格訥又訪奕劻，謂如能改革韓政，各國可促日撤兵。奕劻仍堅持先行撤兵，再議整頓各節。

本日，英使再訪奕劻，勸先改革韓政，再促日撤兵。茲錄歐格訥與奕劻問答如左：

歐云：我日前來此之後，小村便可有照會來否？答以接到小村照會一件，惟其照會內所稱各節，殊多不情，與前日本署與爾所談，諸多不符。如共保朝鮮土地，派員會議各節，曾言均可商量，並無他說，何以小村照會內有中國仍是僅請撤兵，於日本所請各節毫無可依等語。並說中國有意滋事，是何道理？中國於此事皆按條約而行，一步不錯，日本違約妄行，處處皆不按理滋事，曲皆在彼，何反以此語相加？歐云：或係小村聽錯，亦未可知。答以我們對小村所說與對爾所談之話，皆是一樣，何謂聽錯？歐云：漢城來電報，請貴衙門不可盡信。即如英國前有水師人員爲朝鮮所僱，近聞大島所開條款內，令朝鮮將此人辭去，又朝鮮各海關皆要撤去等事，英國外部已詰問日本，日本回稱並無其事。答以日本曾開二十餘條，令朝鮮照辦，該國答以王已另開條款，須將該王所命各條先辦，然後方能議日本所開各節。歐云：現在情事緊急，然歐洲各國擬問中國是否願意保護朝鮮整理內政？如此層層願意，各國仍可向日本說明，催其撤兵，諒無不行。答以若論整理朝鮮內政，這是勸其往好上去做，中國有何不願意處？前歷次與汝及小村均言明，必須先行撤兵，以後即開議整頓各節，即係指此而言，何須再說？歐云：日本商民在朝鮮須與中國人一樣優待，此中國允否？答以日本前以屬邦二字多煩辯論，若與中國人一律優待，即係分去屬邦一半之意，故不能允。歐云：朝貢等事仍照舊章，亦不能分去屬國？問：若然，則何不說與各國一律優待，必要說與中國一律優待？歐云：因向中國商辦，故以中國爲言。答以此節中國公議斷不答應，既不能分去屬邦，則朝鮮之待日本，可與各國一律，又何必再列入條款之內？歐云：貴國駐朝鮮之袁大人，在彼辦事甚好，然一人局勢甚孤，又極勞累，聞袁大人年三十餘，近已髮白；若能再添派一人幫辦，較爲得力。答以該國兩次定亂，袁皆身親其事，故該國王極爲敬重，本是得力之員。歐問：前日小村所覆照會，如何說法？請一看。遂將照會交閱。歐云：照會內毫無可依之情形云云，所說非是。中國始終並無不可商量之話，貴衙門何不將此意回覆他？答以我們以渠所說太重，並非真心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六月十四日

二〇一

和商，意在激怒開釁，又因未晤汝面，故先未覆他。歐云：他的話太過了，我想他並無不願和商之意，我明日前往問明，再給貴衙門送信。答以我們正擬將其照會內所說滋事好事之語駁覆，汝既以彼所說爲錯，我們且候汝回信再回覆他。歐云：現在朝鮮邊界圖們江地方，現有俄國兵甚多，貴衙門知之否？答以未聞此說。我們前與小村言，須趕緊撤兵，即可接洽善後之事；否則恐有他國藉口派兵，出來干預。已言在先，今據汝所說，果有此事，可見不撤兵之非矣。歐云：歐洲各國勸和之意，明日我國家當有電來，我明日去問小村，渠如何回覆，皆當赴署面談。答以如明日來談，仍在下午三點鐘相候。歐唯唯，遂辭去。（註一）

美駐東京公使譚恩 (Edwin Dunn) 奉美政府訓令，向日本政府提出勸告。

當英、俄二國奔走調停中日兩國朝鮮撤兵之爭時，本日美亦出面勸告息爭。其駐東京公使譚恩所致日本外務省之照會曰：

「朝鮮之變亂，雖已鎮定，然日本政府與中國，同一拒絕由該國撤回其軍隊，且對於該國內政，施急激之改革，此美國政府深以爲遺憾者也。美國政府對日本及朝鮮兩國篤抱友誼，故希望日本尊重朝鮮之獨立並主權。若日本與無名之師，使微弱不能防禦之鄰國，化爲兵火修羅場，則合衆國大總統當痛爲惋惜。」（註二）

惟日外相陸奧堅拒美國之勸告，竟對美使答云：

「朝鮮現在之事情，其內亂表面雖似鎮定，禍源則完全存在，尤以思及中國常用譎詐手段，則日本政府若不審視將來之形勢如何，輕易撤退其軍隊，反非保護東洋和平之道。」（註三）

自此以後，美國迄未再作進一步之干涉。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奏請籌款增購鐵甲快船，並請誡李鴻章勿再依信俄人。

是時鴻章不備戰自救，其惟一希望端賴各國之調停，遂使日人得占先着，此爲甲午戰爭中國最大之失機處。當時朝臣中不少遠見之士，乃交章指責。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本日奏陳四端，對於鴻章之倚

賴調停，軍事觀望，指陳頗多。其原奏曰：

「奏爲倭人要挾朝鮮事機危迫謹條陳應辦事宜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中國屏藩之國，莫重於朝鮮，利害相關，形勢相倚，人人所共知也。此次倭人無故忽用重兵，名爲保商，實圖朝鮮，亦人人所共知也。事涉數月，而中國之辦法，尙無定見，北洋之調兵，亦趑趄不前。近聞倭人於朝鮮南五道，已改官制，設砲臺，征商稅，又以四條挾我，必不可行。而議者尙懷觀望，是使中國坐失事機，而以朝鮮昇倭也。夫以西洋強敵，越南之事，中國猶不惜竭兵力以爭之，故能稍安十年。今以區區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數年之後，天下事尙可問乎？臣以爲事無可疑，敵不可縱，謹就愚見所及，酌擬數條，爲我皇上密陳之：

一曰明賞罰 中國練海軍已近十年，糜費至千餘萬，責以一戰，亦復何辭？然臣不能不諒創始之難也。願臣所不可解者，倭人之練海軍，亦不過十年，何此次出兵，北洋即不敢與之較？臣聞丁汝昌本一庸材，法越之役，避敵畏懼，至於流涕，俾以提督重任，實屬輕於擇人。又海軍駕駛，盡用閩人，黨習既深，選才亦隘。查英法水師章程，科條嚴密，人以爲苦；而中國保舉既優，得利尤厚，人每視爲美差，而於測量駕駛砲準陣法，講求之人十無二三。又復賞罰不公，賢愚莫辨，故不待有事而皆知其無用矣。臣又聞葉志超近日亦有退保平壤之議，查牙山僻處一隅，已失地利，然猶足牽掣倭人漢川之師；若退紮平壤，則王京以南，盡爲倭有矣。應請旨切責丁汝昌、葉志超等，務當實力抵禦，以待兵集，如有怯懦退避情節，必用軍法從事，使其畏國法甚於畏倭人，或可以收尺寸之效。其偏僻中有深通兵法，能立功效者，應請不次超擢。從來戰事即練兵之實，此古人經武之大法也。臣檢各國師船表，倭人鐵甲，不過數艘，中國若能實事講求，一轉移間，不難與之折衝海上也。

一曰增海軍 從前因伊犁、越南兩次辦理海防，臣所知者，浙江藩庫三百餘萬，以防俄而盡，江寧藩庫二百餘萬，以防法而盡，由此推之，各省所耗，每次殆過千萬矣。臣以爲與其節節設防，備多力分，款項無著，不如令各省合籌三四百萬金，速購鐵甲船一二號，快船七八號，配足軍械，挑選水師，會同現在南洋閩粵各船，巡梭海道。北則游弋於對馬、長門之濱，南則伺察於長崎、橫濱之口，則倭人亦將多方設備，外足以分其謀略之力，內足以生其下怨之心，而我之定海、臺灣、瓊州等處，皆得互相聯絡。將來南洋水師，即可由此經始，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

一曰審邦交 法越之役，倭人陰以兵助法，故法人德之；英人喜倭之改制，引爲己類；俄人之欲得朝鮮，尤甚於倭。此次三國出而調處，其無實心求益於我，較然可知也。然以各國形勢論之，則朝鮮之在東方，猶土耳其之在西方。土耳其扼黑海之衝，俄不得之不能逞志於西洋；朝鮮扼黃海之衝，俄不得之不能逞志於東洋。故居朝鮮之旁而耽耽虎視者，俄之可畏，較甚於倭。倭人亦知之，故凡其積年籌畫，伺便猝發者，非獨與中國爭一日之長，亦深慮俄人占一着之先也。今者內揆國勢，外察敵情，萬一果開兵釁，中國僅與倭爭難，則各國必袖手旁觀，倭人或陽予我以朝貢之名，而己得取朝鮮之實。若中國意之所在，存朝鮮以拒俄，則英德諸國見我之老謀深算，當無不竭力以維持東方大局者。倭人知中國能見其大，兼隱受拒俄之益，亦必降心回慮，與中國別籌協力之謀。此天下大勢所存，利害非一國受之，權力亦非一國能專之。將來爲戰、爲和、爲迎、爲拒，皆當本此以相衡。此時英人之言，意或在此。近聞北洋大臣頗倚信俄人韋貝（俄國駐韓公使）之說，臣聞韋貝在朝鮮時譟張爲幻，此次急於出京，必將逞其詭謀，自益而損我，應請特諭總署，勿爲所惑。至倭事既定，我之謀朝鮮者，或量爲改制，或特設重兵，當預籌一勞久安之計，是在聖謨之密運耳。

一曰戒觀望 總署之設，原以辦理洋務，而非以遙制兵機。前者法越之役，各省事事奉命於總署，典兵者既預爲卸責之地，總署遂隱竊掌兵之權。顧忌太多，兵家大忌也。且各國之事，如法人方言和，而兵已攻基隆矣，俄人未嘗失和，而兵已襲帕米阿。此時倭兵之在朝鮮，未必不師其故智，以和議欺總署，而伺便一擊。中國前敵諸軍，未接電信，雖有便利，不敢開砲，是常處於後，而讓敵以先，萬無勝理。應請旨飭下北洋，無論舊練新募，速調萬人，或由海道以迫漢川，或行陸路以趨王京，務使力足以敵倭人。如彼有狡然思逞情形，則我輩不妨告發一切，可以便宜從事，惟不得藉口退兵，致干軍法。總署則但司傳電及條款諸事，而不復遙制軍情，似亦補偏救弊之要着也。

以上數條，臣見聞褊隘，不能詳悉。至於奇謀秘計，瞬息千變，亦非紙上所譚。願臣所深慮者，李鴻章立功之始，藉資洋人，故終以洋人爲可恃，而於中國治法本源，軍謀舊法，皆不甚留意。至今日而天下之利權歸於赫德，北洋之兵權制於德璉琳，故一有變端，徬徨而罔知所措，必然之理也。淮軍之駐天津二十餘年，宿將劉兵，十去六七，今所用者，大抵新進未經戰陣之人，雖無倭寇之憂，他日正煩宸慮。臣以爲官令李鴻章慎擇將弁中忠勇樸誠者

，列保一二十人，送部引見，候旨錄用，或即分統各賞，或令身臨前敵，庶使將士皆知共戴天恩，感奮思報，亦馭將之一術也。至朝鮮之事，有爭無讓，事在不疑，尤望宸斷始終堅持，不爲浮議所惑，則各邦不至環而生心，此治亂之大關鍵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四）

註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頁三六—三七。

註二：「甲午中日戰輯」，頁五三。

註三：「蹇蹇錄」，頁九七。

註四：同註一，頁四九—五三。

十五日（七月十七日）駐京英使歐格訥三次與奕劻會談，建議今日兵撤至漢城以南，華兵撤至漢城以北，再商整理朝鮮內政。

鴻章于本日致電總理衙門，報告駐英公使龔照瑗，與英外相接洽情形。略曰：

「英亦知日倡韓詭譎各情，中將大舉。金（按：英外相金伯萊Kimberley Lord）頃云：中要日退兵再議，日要議定再退。欲再作調停法，日駐韓城兵，退紮淺莫坡，中兵請酌駐何處？空韓城，兩兵駐離城遠近相埒，再和商。」

……」（註一）

禮部侍郎志銳，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理衙門大臣奕劻之失機。

志銳奏劾李鴻章、奕劻，語多中肯，其原奏曰：

「奏爲倭人謀佔朝鮮事機危急關係大局利害甚重籲懇天威速決大計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維馭夷之道，專尚平權；應敵之方，宜揣其勢。本年朝鮮東黨亂起，日本假更張朝政爲名，調集重兵，分屯要害，漢城、仁川一帶，日人儼然據爲己有，築臺運械，布置周密。勢將幽置國君，迫脅官民，一切財賦政教，無不唯命是聽。試思政事既易，人民土地有不同歸日人者乎？往者朝鮮之於中國，尚有屬國之名，今恐並其名而失之矣！朝鮮東西南三面瀕海

，處處與日本相接，日人聲勢聯絡，瞬息可通，朝鮮既爲所據，夷情叵測，屢敗盟約。若以鐵艦橫行洋面，我則津滬不通，若以陸師內指邊關，我則奉吉俱震，藩籬盡撤，盜賊縱橫，附背扼吭，將成巨患。此朝鮮得失爲我朝大局所關，不得視爲鄉鄰之鬥者也。奴才近日謹以傳聞，參諸洋報，皆言北洋大臣李鴻章與譯署大臣主持此事，一味因循玩誤，輒藉口於釁端不自我開，希圖敷衍了事。奴才愚見，竊以爲有大謬不然者。何也？釁自我發，則謂之開釁，自人起則謂應戰。今日人之據朝鮮，以四條挾我，儼然有開釁之心。我若急治軍旅，力敵勢均，猶冀彼有所憚，不敢猝發，是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爲弭釁之端；不然，則我退而彼進，只求無釁不可得也。又聞該大臣等，事既急切，專恃外國公使從中調處，藉作說和之客，以圖退兵之計。事起之初，則賴俄使；俄使不成，復望英使；英使不成，又將誰易？無論俄踞海參崴及庫頁各島，英踞巨文島，窺伺東海，與日人交情素睦；即令偏袒向我，既無可恃之勢，又無可假之權，全憑口舌折衝，雖俄英各使逞辯譟張，果能化弱爲強，強日人以就我範圍乎？此又事理之不易也。綜計中日交涉以來，於臺灣則酬以費；於琉球則任其滅；朝鮮壬午之亂，我又代爲調停；甲申之役，我又許以保護。我愈退則彼愈進，我益讓則彼益驕，養癰貽患，以至今日。夷焰鴟張，貪婪無已，一誤再誤，則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可不慮哉？以勢所必爭之日本，與絕不可失之朝鮮，彼則着着佔先，我則面面受制。爲今之計，應請皇上宸衷獨斷，速飭北洋大臣李鴻章，厚集兵力，分駐高境，尅期進發，迅赴事機。甲申和約，既曰公同保護，又曰無事中倭均不駐兵。該國現以平定亂黨，更易朝政。日既聚集重兵，我豈束手坐視？保護爲中日共有之權，進兵乃中日分任之事。舊約是踐，何謂弊端？急難同情，豈云用武？是國理明詞順，皆可向日人反覆詐言，以破開釁之說者。兵齊之後，權勢維均，然後徐議更張，詳訂新約。敵情本有虛實，邊患更有重輕。壯我之氣，而後可以講和；充我之力，乃亦無妨言戰。屆時即意見參差，或者俄英各使出作調人，庶其竭力轉圜，始覺挾持有具也。東渡各營最謬妄者，直隸提臣葉志超，海軍提臣丁汝昌，派赴朝鮮，在日人之先，而鐵艦不扼仁川，陸軍不入漢城，僅駐仁川附近之牙山島，均爲犄角險要之地，拱手而讓之外人。外間輿論，至有敗葉殘丁之語，不孚羣望，可想而知。該統將等首鼠不前，意存觀望，縱敵玩寇，夫復何疑？其謂朝鮮地勢，懸隔海外，欺聖明不及覺察耶？抑苟且偷生以徼倖於無事耶？此皆玩誤之尤，應請嚴旨飭其速扼要地，再敢瞻徇長縮，立予重懲。總之，軍國大計，利害所

關甚重，要藩豈容輕棄，而狡夷非可緩圖，覺端不可妄開，而兵力實宜震懾。勢無可緩，計不必疑。奴才夙夜徬徨，罔知所措，既有所見，敢不專達上聞，謹具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二）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內，頁四五四。

註二：「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頁三七—三九。

十六日（七月十八日） 清廷召袁世凱回國，以知府銜唐紹儀代辦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務。

李鴻章本日奉旨致電袁世凱，准其自韓回國，電曰：「總署午電，本日奉旨，袁世凱著准其調回，欽此。希將經手各事，交唐守紹儀代辦，即回津。」（註一）

李鴻藻、翁同龢、張蔭桓等奏請，令李鴻章即飭所派出各軍迅速前進。

翁、李、張等奏請，對朝鮮事，須一面備戰，一面和商。其原奏曰：

「奏為遵旨會同詳議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本月十三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朝鮮之事，關係重大，著派翁同龢、李鴻藻等會同詳議，等因欽此。倭人以重兵駐韓，日久未撤，和商迄未定議，不得不速籌戰事，此乃一定辦法。奉諭旨令李鴻章派兵進取，妥籌戰事。前據電稱，歷來中國進兵朝鮮，皆由平壤北路進發。現派總兵衛汝貴統盛軍六千餘人進平壤，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千人進義州，均由海道前往。並咨商盛京將軍，派左寶貴馬步八營進平壤。又調提督葉志超一軍移紮平壤。旅順等處海口，亦已整備等語。所籌尚屬周密，應請諭令李鴻章，即飭所出各軍，迅速前往，勿稍延緩。現經厚集兵力，聲勢較壯。中國本有保護朝鮮之權，此次派兵前往，先以護商為名，不明言與倭失和，稍留餘地，以觀動靜。現在倭兵在韓益肆獷狃，而英使在京仍進和商之說，我既預備戰事，如倭人果有悔禍之意，情願就商，但使無碍大局，仍可以予以轉圜，此亦不戰而戢人之術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兵，必須謀出萬全；況與洋人決戰，尤多牽制。刻下各國皆願調停，而英人尤為着力。惟英最忌俄，恐中俄開釁，俄將從事取利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六月十六日

。我若遽行拒絕，恐英將暗助倭人，資以船械，倭鋒益張，且兵端一開，久暫難定，中國沿海地勢遼闊，乘隙肆擾，防不勝防，又當經費支絀之時，籌款殊難爲繼，此皆不可不慮者也。然果事至無可收束，則亦利鈍有所勿計。現察倭人之意，以整頓朝鮮內治保其土地爲主，祇以中國允其商議，不甚切實，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範。此時既派大兵前往，與之相持，則亦可不必催令撤兵。彼如仍請派員與議，則倭人所請各條，亦有不妥，我可議駁。如果有俾政務，亦可由我飭行，既收保護利權，亦不失上國體制。屆時再當請旨遵行。倘仍要求必不可行之事，或竟然抗逆不從，則大張撻伐，聲罪致討，師直爲壯，各國當亦曉然所事矣。謹合詞會奏。」（註二）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內，頁四五五。

註二：「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頁三七—三九。

十七日（七月十九日） 日本通知英國，將以武力解決中日問題。

日本于本日通知英國，日本將以武力解決中日問題。日本大本營熾仁親王、參謀總長，命日海軍截擊半島中國護航艦隊，求速戰。（註一）

註一：「日海軍省征清海戰史」，秘密第三號。

十八日（七月二十日） 英政府命駐東京英使致日外務省覺書，謂日本目前之要求與前允諸事可商之言不符，蔑視天津條約；如必固執己見，中日因而開戰，應由日本負責。

先是，英使歐格訥于本月十四日訪總理衙門大臣奕劻後，認爲和談事仍有可爲，于是電令東京駐日英使巴柴特，向日政府繼續交涉。巴柴特因於本日訪陸奧外相，告之曰：

「中國政府接小村公使之照會，雖甚憤激，若日本政府尙有意于和平，中國非無再開談判之望。請問日本政府之決意如何？」（註一）

是時日本處處已着先機，穩操勝算，故陸奧提出中國不能承認之條件以難之。陸奧告巴柴特曰：

「朝鮮問題，今已大有進展，決非昔比，日本政府已不能依前此與中國政府相約會商之條件。假令中國爲改革朝鮮內政即選派共同委員，而對於日本政府歷來以獨力着手之事項，中國應不容喙。而使朝鮮形勢至如斯切迫，實緣中國政府以陰險手段，因循方法，使諸事遲延所致。故對我國此次提議，非中國政府從本日起，於五日內，以適當方法言明諾否，則日本政府不能與之應酬。且中國此時若增派軍隊於朝鮮，則日本政府即認爲威脅之處置。中國政府若以此意旨與日本會商，日本政府當不拒絕。」（註二）

此種無理要求，不特中國不能接受，即英國亦甚憤怒，英政府遂于本日電令巴柴特，再對日本政府提出一覺書，文曰：

「日本政府此次對中國之要求，與日本曾言明之談判基礎相矛盾，且軼出其範圍之外。日本政府已單獨着手之事項，使中國政府毫不容喙協議云者，實蔑視天津條約之精神。因之，若日本政府固執如斯政略，而致開釁，則日本政府不能不任其責云云。」（註三）

此覺書甚爲嚴厲，日本早料到英人對日本不致有任何堅決之行動，旋覆一覺書與英使，轉電英國政府曰：

「日本政府所要求於中國政府之條件，決非如英國外務大臣所詰問者。此次日本政府之要求，不出曾言明爲談判基礎之範圍。蓋中國之提議，已與日本政府提出之條件大相差異之點不少，且天津條約除規定中日兩國派軍隊於朝鮮之手續外，無何等約束。故英國政府若謂此次糾葛生出之結果，日本政府應獨任其責，日本政府敢信爲不當。蓋若當初中國政府容納日本之提議，或駐華英國公使之仲裁，與日本政府再開會商，事態當不至如此重大云云。」（註四）

英國政府對此答覆，竟無進一步之表示。

註一：「甲午中日戰輯」，頁四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六月二十一、二十三日

一一〇

註二：同註一。

註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頁四五。

註四：同註一，頁四五。

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三日） 日軍包圍朝鮮王宮，擁大院君主政，並攻掠中國駐韓總領公署。

本日晨日使大島圭介，偕其混成旅團長大島義昌，率日兵兩大隊逼王宮，王宮護衛發槍拒之，不敵，日兵遂入宮城，擄韓王，令大院君主國政，中日戰機以開。東方兵事紀略一書記其事云：「二十一日，日本以兵入王宮，擄朝鮮王，盡易朝臣，而以大院君主國政，和議決裂。」（註一）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頁五七。

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五日） 英使歐格訥與總署大臣慶親王奕劻第五次晤談，謂英俄現會同調處，並約德、法、美同辦，合力向日本解說，諒其不敢不從。

日本在韓開釁後，歐格訥仍活動甚力，向中日雙方建議分開朝鮮境內之中日軍隊，各自向後撤退，並運動德、法、義三國公使，合力調停，本日英使至總理衙門，五訪慶親王奕劻。茲錄歐格訥與奕劻問答如左：

歐云：聞貴國因恐與日失和，有堵吳淞口之議，我政府已問過日本，日本說決不犯上海。此言甚確，請飭該地方官，切勿封口。答以貴國既能保其不犯，我們自然相信。歐云：我欲將所聞之事，一一告知貴衙門。現在貴國與日本雖未失和，却不可不先防備。本國前勸日本退兵和商一節，日本非但不聽，且說更緊，我政府甚為不悅，已電日本云：此事太無理，前所說四條，已向中國言之，何又反覆？且與光緒十一年中日條約不符，如此大言欺人，必動公憤云云。日本尚無回信。答以此言甚公道，日本甚負責國好意。歐云：昨晚接俄國喀使電謂，伊奉其政府命令

，伊會同我商量保全和局，先將中日在朝鮮之兵分開，不知貴衙門願照此辦否？答以中日兵原未在一處，要說明日本將漢城兵退出，中國兵亦可不住漢城，自然分開。若仍在漢城，中國兵亦將前進，便不能分開了。祇要公平調處，我們決無不聽勸的。歐云：我所說的，決無令貴國有傷體面處。現在英俄之外，又約德法義三國同辦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講理，諒亦不敢不從。此時說話，總在日本一邊用力。我今日即發電我政府，加力催着日本，並往西山請德國欽差回京，令各電政府，同向日本政府說去。此是好機會，難得五國同心幫助貴國。答以歐大人爲此事始終費心。又同前日所說從前貴國新嘉坡、香港等處不准兵船進口事，我們查光緒十四年貴國給我們照會，但云英國所屬海口，祇准別國帶兵船一隻進口。現在中日尚未失和，我們可否一律照會各國。歐云：祇宜照會日本一國，可引我們照會作例，說話却不可激切。據我看，尚可緩數日，能說和更好，倘真失和，貴國以力阻之，自無不可。又云：我所聽着的話，今日都告之貴衙門了。我恐二十五、六、八、三日換班，不能會晤。答以如有要事，儘可來署，此事亦甚緊要。歐云：貴國添派之兵已上岸否？答以尚未有信。歐云：日本兵在朝鮮聞有一萬九千，貴國兵有多少？答以亦差不多。歐云：前幾日電線中斷，各國皆疑是貴國故意割斷的，殊非貴國之利。答以我們疑是日本所爲。歐云：我回去即給喀使發電。遂辭去。（註一）

隨後英政府果向日本駐倫敦公使青木周藏建議，中日兩國分開在韓軍隊，徐圖二國間之和平協議。（註二）然日本政府對此尚未答覆，中日之戰，已開始矣！

考英國此次調停，純屬善意，且極熱心努力，惜中國政府未善運用，殊堪痛惜。王芸生對此致其確當之評論云：

「中國方面，其始因期待俄國干涉之成功，故對英國之努力，甚爲冷淡，及與英使約定與小村開談判矣，又不
用絲毫外交手腕，一口咬定先撤兵後談判之理論，拒人於千里之外。日本方面之移樽就教，原爲敷衍英國之面子，
在彼毋寧歡迎中國態度強硬，使彼捉得破裂之機會。故此幕交涉，中國既失掉英之同情，復貽日人以口實，可謂拙
劣極矣。」（註三）

中日戰爭爆發，日軍艦擊沉中國運兵船「高陞」號於豐島，傷「濟遠」、「廣乙」艦，俘「操江」砲艇。

先是，袁世凱既離韓歸國，及抵津，謁李鴻章，報告朝鮮之緊迫情形。鴻章知韓事已迫，葉志超軍孤懸牙山，非厚派重兵不足以應變，乃命總兵衛汝貴統盛軍馬步六營進平壤，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千進義州，分起由海道至大東溝登岸。另派軍二千餘，雇英商輪三隻，名愛仁、飛鯨、高陞，分運牙山接應。不意日本間諜在津賄通電報生，將師期洩露，本日晨七、八時間，日本兵艦多艘，集牙山口外，攔阻中國兵船，時高陞號由華艦濟遠、廣乙護衛，駛近牙山口外之豐島，日艦吉野、浪速、秋津洲等橫海襲來，首先開炮，華艦應之，中日戰幕遂自此揭開。廣乙被重創，歪側逃而坐礁，濟遠亦中多砲，惟機器無損，繼遭日砲毀其舵，遂逃。九時頃，高陞號運兵續至，我輔助艦操江隨行。高陞號雖懸英旗，亦遭日艦砲擊，宛轉而沉，船內載華兵九百五十人，全遭滅頂。與高陞號同行之操江，以速力遲緩，武裝亦極薄弱，逃既不可，戰又不能，卒為敵艦秋津洲擄之以去。是役，華軍殉難者七百餘人。此為甲午第一戰，我海軍之脆弱，及將領之無能，已全行暴露。（註四）

註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五，頁二二—二四。

註二：陸奧宗光：「蹇蹇錄」，頁一〇一。

註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頁四七。

註四：「甲午中日戰輯」，卷二，頁四四。

二十五日（七月二十七日） 英輪高陞號被擊沉事，傳至英國，英輿論大譁，咸謂日本軍艦隨意擊 中立國船隻，實違反國際公法。英政府於本日命英駐日公使向日政

府提出抗議，後因日政府詳為辨解，並自認賠償謝罪，始寢其事。

方高陞輪被擊沉時，即由英之駐中國烟台領事，將詳情電告駐東京英公使及英政府，後者命令前者向日本外務省提出抗議。其時，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接到外國電報及英公使抗議，立招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責之曰：

「東鄉艦長（按為浪速艦長，名東鄉平八郎），值此重大危機之時，擅敢將英國商船擊沉，殊屬輕舉妄動，望速將該艦長罷免，以謝英國政府。」（註一）

惟西鄉從道則答稱：

「東鄉艦長擊沉英國商船高陞號之事，茲承示以英公使之抗議，始為聞知。夫以此事之重大，艦隊及該艦長當有詳細報告之電致余，擬請該報告到後，再行討論辦理。」（註二）

伊藤以未得要領而去，心中惟恐引起英國之敵意，惴惴不安。次日伊藤親至西鄉處，以極急促之態度語之曰：

「在此國家重要之時，萬不可在再失機，前方之報告，雖不完備，而英商船之被我擊沉，則確為事實，茲英國輿論，極度惡化，是我不可不于此時執行權宜之處置，有以平英國之怒。」（註三）

西鄉終不以為然。答謂：

「余對於自身所統率之部下，尚未接到其電告，僅憑外國所傳之電，處分該事件之關係者，實為不能，仍請有以稍待。」（註四）

伊藤乃作色曰：

「以一艦長之事，遷延不辦，萬一失去時機，陷國家于危險地位，究竟誰任其責？」（註五）

西鄉則曰：

「此責任全由余任之，公請安心。」（註六）

伊藤乃拂袖而去，已而艦隊及東鄉艦長之報告亦至，日本政府據其報告，發表聲明書，謂擊沉高陞

號，實在中日海軍于豐島交戰之後，且高陞號搭載多數之中國陸軍及武器，東鄉艦長曾施行正式之臨檢，以該船不服從命令，故爾擊沉，並無違反國際公法情事。日政府並官認賠償謝罪，于是英國輿論漸歸沉靜，而該事件遂亦如是了之。（註七）

按：當豐島戰役之時，中日雙方均未宣告戰爭，日本艦隊見我濟遠各艦勢力薄弱，遂先發制人，向我挑戰，其手段已屬卑劣。至高陞號雖搭載中國陸軍，然其由大沽口出發之時，尚在平時狀況，即在豐島附近，與日本軍艦相遇，亦在雙方尚未佈告宣戰之時。嚴格論之，日本軍艦無臨檢之權力。該船既受臨檢後，船長以出發時，尚未宣告戰爭，要求准其駛返大沽口，自屬正當辦法。乃日艦竟不容理論，強行轟擊，橫蠻無理，豈有尚掩飾之餘地？然英國輿論對此，始則譁然，終且默不一語者，蓋以開戰以後，日本陸海軍着着占優勝之勢，英人雅不欲多事開罪于強者耳！而日本政府應付此事，亦極敏捷也。（註八）

德國軍事家論中日戰爭，日本兵少而精，初戰必勝，久戰後中國以衆多優勝之軍隊或可不敗。

德國軍事家易勞德(Der Asiraatische, Lloyd)著文論：「日本常備軍僅四萬六千二百六十八人，預備役合計共十七萬一千六百人，然其裝備組織與訓練遠非中國可比。故初戰則日必勝，久戰則中國之絕對數目優勢可以發揮，未必即敗。」（註九）

註一：「伊藤博文傳」，東京，巖南堂，日本昭和四十五年三版，頁三一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一。

註七：「蹇蹇錄」，頁二二六。

註八：參考「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六八。

註九：「字林西報」頁一五一，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七月二十九日） 中日兩軍戰於成歡，聶士成兵敗。士成自成歡走公州，葉志超自公州趨平壤。

豐島之變既開，我援軍爲日海軍所邀截，駐牙山之衆，乃成孤軍。初葉志超移軍牙山時，聶士成部則拔赴全羅道之全州，以取犄角之勢。其後久候援軍不至，而日軍相逼日急。士成請于志超，以距牙山東北五十里之成歡驛，爲自漢城南來之大道，南通公州，可往扼守。遂率武毅副中營、老前營，及練軍右營，移駐成歡。旋牙山駐軍，聞豐島開戰，高陞失事，知援絕，而日兵大隊已逼振威，去成歡僅四十里。士成請援于志超，二十五日營官江自康、許兆貴自牙山率隊至成歡就士成。廿六日晨，志超亦馳至。士成言于志超曰：

「頃海道已梗，援軍斷，難飛渡，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勢，宜速往據之。幸而勝，公爲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此間戰事當竭力防禦，相機進止也！」（註一）

是日日兵已迫素沙場，去成歡才十餘里，于是志超自率葉玉標營往公州，而士成率五營駐成歡。華軍諸壘，分駐成歡東面山頂，西面山岡，僅立一壘；其砲隊則分駐西南最高山頂，以遏日兵來路。本日黎明，日兵已據成歡西北面山坡，士成自督隊與相持，而清軍左側之東北面山坡，突爲日兵所襲踞，以砲直擊清東面諸壘，清軍發砲還擊，莫能中的，勢不支遂敗。蓋是夜日兵自素沙場分兩道來犯，一從大道綴清軍，而一則繞出東路以襲清軍側面；清軍以全力自大道遏日軍，而不虞東道之敵自側面來犯也！

士成既敗，東南趨公州，就志超，志超已棄公州，乃合軍北走，仍恐與日軍遇，繞王京之東，循清州、鎮州、忠州、槐山、興唐、沙汭江，經堤川、原州、橫川、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至平壤，與大軍合。時值夏秋之交，溽暑甚，途行匝月始達。志超于七月二十一日至，士成率隊于二十八日至。殘軍饑疫，死者相屬。而志超方以成歡之戰，殺敵過夥，並沿途疊敗倭兵，鋪張電告。鴻章據以入奏，且論功行賞，奏保員弁數百人，獲嘉獎，並賞軍餉二萬兩，未幾復拜總統諸軍之命。牙山之戰原與豐島之戰相銜接，因日人預先將由漢城至平壤之電線切斷，致消息阻隔，真相莫明。情勢若此，焉得不敗。迨葉志超捏造獲勝奏報到京，朝野均爲喜慰，意謂失之豐島而收之成歡也。鴻章既據以報捷，清廷乃迭諭獎賞，戰敗而喜，棄地邀賞，誠滑稽之悲劇也！（註二）清帝獎賞之上諭前後有三次之多：即七月初三日、七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八日，或厚賞犒師銀兩，或傳旨嘉勉，或諭命加官進爵，可謂恩賞有加。（註三）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頁五八—五九。

註二：同註一，頁五九—六二。

註三：「東華錄」，光緒朝內，頁三四三—三四四；參考「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七五—七七。

二十八日（七月三十日） 總署照會各國公使，聲述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衅。

先是，豐島之戰發生後，李鴻章于六月二十六日致電總理衙門，主張通知各國，爭取同情，並斷絕對日通商。略曰：

「日先開戰，自應佈告各國，俾衆皆知衅非自我開，似宜將此案先後詳細情節，據實聲敘。……內屬國乙節，朝鮮與各國立約時，均聲明在先，各國雖未明認，實已默許，可否于文內輕筆帶敘，斯我先派兵非無名，後來各國調停議結，亦暗伏其根。汪使應撤回，日駐京使及各口領事，應諷令自去。日貨多賴華銷，應檄行各國，暫停日本通

商，日貨不准進口，是否均乞核辦？」（註一）

總理衙門得電，遂于本日照會各國駐京公使，聲明日人首先開釁，不得不另籌決意辦法。其照會曰：

「爲照會事：茲因朝鮮全羅道有亂民滋事，該國王備文請援，經北洋大臣奏明。我朝廷因該國前兩次變亂，均經中國爲之戡定，故特派兵前往，不入漢城，直赴全城一帶進剿，該匪聞風潰散，我軍撫卹難民，方謀凱撤。詎日本亦派兵赴韓，託名助剿，實則徑入漢城，分據要隘，嗣又屢次添兵，至萬餘不止，竟迫脅朝鮮不認中國藩服，開列多款，逼令該國王一一遵行。查朝鮮爲中國屬邦，歷有年所，天下皆知，即該國與各貴國立約時，均經聲明有案。日本強令不認，於中國體制有碍，已失向來睦誼。至比鄰之國，勸其整理政務，原屬美意，但祇能好言勸勉，豈有以重兵欺壓逼勒強行之理？此非但中國不忍坐視，即各國政府亦皆不以為是。俄英政府屢飭駐紮該國大臣，向其外務省勸阻，並經英國外部勸其將兵撤出漢城，與中國分紮兩處，和平商辦朝鮮事務，此議甚爲公允。乃該國悍然不顧，反更添兵，朝鮮人民及中國在彼商民，日受驚擾。中國念各國共敦和好之意，斷不肯遽與開釁，致生靈塗炭，商務有傷，後雖添兵前往保護，亦距漢城尚遠，不至與日本兵相遇啓釁。何意該國忽逞陰謀，竟於本月二十三日，在牙山海面突遭兵輪多隻，先行開砲，傷我運船，擊沉掛英旗英國高陞輪船一隻。此則釁由彼啓，公論難容，中國雖篤念邦交，再難曲爲遷就，不得不另籌決意辦法。想各國政府，聞此變異之事，亦莫不共相駭詫，以爲責有專歸矣。今特將日本悖理違法首先開釁情事始末，備文照會貴大臣，博達貴國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註二）

周馥勸李鴻章籌足兵餉三年，增練新軍三萬，重借國債，以備久戰。

鴻章幕僚周馥語鴻章曰：「日本蓄謀已久，北洋力不能抗，必籌足兵餉三年，不挑戰而與之久持，得和且和。增練新軍三萬，起用劉銘傳，重借國債。」鴻章云：「不能使國家負重債；劉銘傳不願出，亦不能強。」周言：「如是必敗，一生勛業盡去。」鴻章怫然。（註三）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卷六，頁四九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七月一日

一一八

註二：「甲午中日戰輯」，頁五七—五八。

註三：周馥「負喧問語」，載「周懋慎公全集」，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七月

一日（八月一日） 中日兩國同時宣戰。

先是，中國于六月二十八日照會各國公使，聲明日本首先開釁後，並於同日降旨撤回駐東京使館人員及各地領事，並托美國代為保護僑民。二十九日，總理衙門照會日使小村壽太郎曰：「日先開釁，致廢修好之約，此後與閣下無可商之事，殊為可惜！」（註一）本日遂下宣戰之詔，諭曰：

「朝鮮為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為中外所共知。近十數年，該國時多內亂，朝廷字小為懷，疊次派兵前往戡定，並派員駐紮該國都城，隨時保護。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王請兵援剿，情詞迫切，當即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係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強令革政之理。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砲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疊開自彼，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二）

此詔所以止言海上之事者，蓋以成歡戰敗之消息，尚未暴露故也！同日日皇亦下宣戰之諭。文曰：

「保全天祐幾萬世一系之帝祚大日本帝國皇帝示汝忠實勇武之有衆：朕茲對清國宣戰，百僚有司，宜體朕意，海陸對清交戰，努力以達國家之目的。苟不違反國際公法，即宜各本權能，盡一切之手段，必期萬無遺漏。惟朕即位以來，於茲二十有餘年，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知交鄰失和之不可，努力使各有司常篤友邦之誼。幸列國之交際，逐年益加親善，詎料清國之於朝鮮事件，對我出於殊遠鄰交有失信義之舉。朝鮮乃帝國首先啓發使就與列國爲伍之獨立國，而清國每稱朝鮮爲屬邦，干涉其內政。於其內亂，藉口於拯救屬邦，而出兵於朝鮮。朕依明治十五年條約，出兵備變，更使朝鮮永免禍亂，得保將來治安，欲以維持東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國，以協同從事，清國反設辭拒絕。帝國於是勸朝鮮以釐革其稅政，內堅治安之基，外全獨立國之權義。朝鮮雖已允諾，清國始終暗中百計妨礙，種種託辭，緩其時機，以整飭其水陸之兵備。一旦告成，即欲以武力達其慾望。更派大兵於仁川，要擊我艦於蔚海，狂妄已極。清國之計，惟在使朝鮮治安之基無所歸。查朝鮮因帝國率先使之與諸獨立國爲伍而獲得之地位，與爲此表示之條約，均置諸不顧，以損害帝國之權利利益，使東洋平和永無保障。就其所爲而熟揣之，其計謀所在，實可謂自始即犧牲平和以遂其非望。事既至此，朕雖始終與平和相終始，以宣揚帝國之光榮於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戰，賴汝有衆之忠實勇武，而期速克平和於永遠，以全帝國之光榮。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一日。」（註三）

附錄：王芸生撰「由發端至宣戰之清廷」（註四）

甲午之年，適當慈禧六旬大壽，舉行隆重慶典，誕辰本在十月，正月即開始籌備。自元旦起連日上諭，對親貴暨京內外大小臣工，均晉秩加俸，頒空前之賞，以隆慶典。奕劻即於本年元旦封爲慶親王，初三日賞李鴻章三眼花翎，滿擬是年呈太平景象，而東事發生，對外宣戰，大折甲兵，致使一幕喜劇變成絕大悲劇。甲午之事，李鴻章深知中國海陸軍之脆弱，故一意主和，而清廷則以北洋練兵數十年，戰西方各國或不足，以之敵日本則有餘。故當五六月間，京中主戰之空氣，濃厚一時。李鴻章之持重，固有自知之明，然因無應敵決心，徒恃外交周旋，軍事上着着落後，而強鄰相逼日緊，和未成，戰已不能，乃鴻章之重大失機也。向使鴻章早有禦敵決心，徵調勁旅，預占形勝，雖不必勝，當不至挫敗若斯之迅速而狼狽也。至若京中之主戰，非有知己知彼之勝算，純任虛矯之氣，固猶是尊夏攘夷之客氣也。光緒爲當時主戰之健者，翁同龢、李鴻藻輩復日夕作感慨激昂之詞於帝前，而一般御史言官更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七月一日

一一〇

交章言戰。李鴻章身常外交軍事之衝，因有所顧忌，不能塞言戰者之口，此外則多隨聲附和，不負責任之輩，其所謂戰者，固猶較因循失機更遜一籌也。當時清廷之情形，以禁例森嚴，外間不易得知，既著於文字者，亦因事關機密，多留中不發。茲言當時清廷之情形，左翁同龢日記中尚可窺見一斑。同龢當時爲戶部尚書，參與軍機及各國事務，且爲光緒帝師傅，每日講課帝前，尤爲近水樓臺。其所記當多真相，惟以文網嚴密，兼本人利害關係，當然不能盡所欲言，然僅此已是研究當時之良好資料。茲錄所記與當時清廷意旨有關者如次：

五月二十二日：高麗有叛民占泉州（按：全州之誤。），國王表乞師，我千五百人往，而日本以七百人入其境。方議同撤兵，而日添兵五千人，入其國都，欲變易其政事，練其兵卒，而不認爲中國屬國。朝旨屢飭李相（指李鴻章）添兵，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帶，遲徊不進，嘻！敗矣！

二十七日：樵野（張蔭桓字）信云：韓事無把握，蓋合肥（指鴻章）處處後退也。

二十九日：韓事英願講，責北洋徵兵，欲添募未允。

六月初四日：廷寄一件，北洋謂海軍難調。必別募二三十營，令部籌二三百萬餉，方可戰。旨令海軍戶部會籌。

初五日：慶邸（即慶親王奕劻）使人邀余，商籌款事，定海軍戶部各任一半，共三百萬之數。

十二日：日前文廷式、張仲忻皆有摺論朝鮮事，未見發。葉志超電請添兵，合肥仍持恐開衅之議。

十三日：奉派會議朝鮮事。軍機大臣面奉諭旨：本日據奕劻面奏，朝鮮之事，關係重大，亟須集思廣益，請簡派老成練達之大臣數員會商等語。著派翁同龢、李鴻章，與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同詳議，將如何辦理之處，妥籌具奏，欽此。

十四日：早至吏部朝房，四刻高陽（指李鴻藻）始來，又四刻軍機來請，乃至值房。慶邸及譯署諸君皆集，看電報，看奏摺，主戰者五摺，議無所決。余與高陽皆主添兵，調東三省及旅順兵，速赴朝鮮，余又謂清釐朝鮮內政，不爲失體，此二端皆入覆奏。

是日軍機見起，上（指光緒帝）意一力主戰；並請懿旨亦主戰，不准借洋債。傳知翁同龢、李鴻藻，上次辦理失

當，此番須整頓云。又欲議處北洋（指鴻章），又欲明發佈告天下，此二事未行。聞昨日樞廷亦頗受譴詞。

十五日：上至書房，臣（同蘇自謂）入奏昨日事，大致添兵，仍准講解。上曰：撤兵可講，不撤不講。又曰：皇太后諭不准有示弱語。遂退，偕慶邸至北河沿，高陽、受之亦來，臨河坐待，約六刻鐘軍機始來請。閱志銳摺片各一，北洋撥兵電一，英使歐格調問答一。北洋電：派衛汝貴帶六千人進平壤，馬玉崑帶二千人進義州，左寶貴八營由北路，葉志超移紮平壤。志摺：參總署因循，北洋疲玩，劾葉志超、丁汝昌，保姜桂題、賈起勝、鄭崇義、衛汝成。吉林電：開俄船八只集團們江口，將於二十日與日交戰。

十七日：（疑係十六日）上至書房，今日覆奏摺上，余名首列，北向來所無也。上意似尚合，云已交軍機寫寄北洋矣。

十七日：晨臨慶邸，見電報數件，有英使請令倭兵紮漢城南，華兵紮漢城北語，似撤兵一節，尚易就範。

十八日：上以翰林院代遞曾廣鈞（摺）令閱，所陳七條，大減日本，語殊豪縱。余聯沅摺，三策：上攻東京，次守海口，下與倭戰，請廷議。安維峻片，參軍機總署。

十九日：上以龐鴻書摺令閱，請明宣戰事，並規東京。

二十日：照常入，進講四刻，上以準良摺令閱，四條：宣戰，封港，調遣，籌餉。

二十一日：照常入，上以鍾德祥片一件交閱，並電信八件。北洋電：傳大島下令，種種狂悖，首以韓非屬邦爲言，又稱所出數條不能改，中國若添兵，即以殺倭人論云云。北洋又謂俄有十船可調仁川，我海軍可會辦云云。前電上盛怒，後一電上不爲然，不得倚仗俄人也。擬電旨致北洋，達此意。又擬一奏片，保劉永福、楊政琛渡臺，姜桂題、鄭崇義赴韓。又令袁世凱來京，備詢問倭事。

二十五日：初擬見樞廷，今日必當宣戰及布告各國。見慶邸，所聞不爾。又見北洋數電，以爲稍緩，比歸，得樵野信，始知倭在牙山潛擊我船，有英商船載我兵船一只擊沉，濟遠尙自顧，廣乙則敗矣。

二十六日：（光緒壽辰，此時已聞豐島海戰之敗）辰初升殿，不敢不先入，卯初至東部公所，遂至殿前，升三成階，敬觀御座左右高下之宜，仍下。屆時上升殿，讀表，行慶賀禮畢。辰正聽戲，入座，羣臣聽戲者，皆趨

而東，余與徐李張相國皆未往。是時宴桌始陳設，余與徐孫松諸君先演禮一次，余次在東邊第一列第四。上至立；入坐，三叩；進茶，一叩；賜茶，一叩；賜果，一叩；賜食，一叩；畢。蒙古樂入殿時，兩邊賜酒者起立序進，東出之納陛下，旋魚貫登。東邊人少，余在徐用饒之次。至余而畢，西邊尚未畢也。上地屏，上親賜酒，酒以玉碗盛，受拱舉賜，起立退至地屏旁，一叩，飲訖。侍衛接杯又一叩。從東出之納陛退，仍入座，四刻畢。詣會典館，客陸續來。早間奉旨會商，午初余與蘭翁（李鴻藻）入至軍機房，慶王亦來商量。見北洋兩電，一撤使，禁倭貨入口，一又云不必禁倭貨，恐搜查爲難。未初，多入座聽戲，時監賞早下，甫入，即三叩謝。直至戌初一刻，戲畢，散。是日上御殿時，卿雲繽紛，筵宴之際，風日清朗，傍晚雨數點，即晴。

二十八日：至黃酒館，與高陽劇談，張樵野亦來談，至巳初方散。有頃高陽著力來告，牙山得捷音，午後那琴軒來，君實、樵野先後函告，二十三日牙軍與倭鏖戰，殺倭千餘，我兵亡百餘，而倭添兵五千，又平壤已爲彼踞，得失勝負之數，未可較也。

二十九日：晨入遇慶邸於禮清門外，立談數語。謂平壤未失，昨乃訛傳，衛、馬、左、三人皆抵義州。二十四日牙山又有戰事，未知勝負，消息不通也。

七月初一日：（是日下詔宣戰）北洋電，雇英船探仁川，知二十五六牙軍又捷，殺敵二千餘，進紮距漢城八十里，可喜也。

初二日：是日值日，且軍機處會商也。辰正軍機處來請，入看電報二十餘件，要者只兩三件耳。奏片一件，北洋請購快船，請款，議海軍撥一百萬，戶部一百萬，合購四艘，海軍乃生息之款，一時未能遽提者也。

據以上各條日記，可見光緒之主戰，及一般言官之放言高論，甚謂「進規東京」，其放漫不負責任，可以概見。而竊傳俄人將與日本開戰，李鴻章亦欲與俄艦會辦於仁川，光緒不謂然，以「不得倚仗俄人」，所見極是，鴻章見不及此，致始誤事機，終釀巨禍。一念之微，關係如此重大！北洋請購快船，同縣則以「生息之款」，「未能遽提」，其不能迅赴事機，亦豈偶然哉！而關於成敗戰事之情報，離奇莫測，又安得不敗？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二)，頁五一三，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二：「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四四，頁三〇六一，(原頁一一二)。

註三：「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一五四。

註四：「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八〇—八六；另參考「翁文恭公日記」(四)，頁三〇—五一，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七日(八月七日) 英國首先宣佈嚴守中立，其他各國繼之。

中日開戰後，英國于本日宣佈嚴守中立，發表局外宣言書，俄、德、法等國繼之。

按：英國政府對中日兩國政府調停失敗後，曾致嚴厲照會于日本。其態度若甚積極者，追戰爭開始，乃頒布中立宣言。此種策略，表面若甚矛盾，然自有其理由。緣英使歐格納之開始調停，係因不能忽視俄使喀西尼之運動，蓋英、俄兩國皆因其在華勢力關係而起者。實際則兩者異其利害，一因中日和平之破裂，于其通商有極大關係，一因有領土國境之利害。兩國調停，雖皆無效，然英國政府此時應操之方針，實不宜完全觀望，故不若立于嚴正之中立地位，以待將來之發言，且亦可力避加入交戰漩渦，以保護其自身利益也！俄亦旋告中立，但俄之中立態度，則甚不純。查俄政府對中日戰爭之中立態度，觀于最初駐日俄使奉政府訓令之行動，實不難想像其積極也。若戰局不大，在日軍未渡鴨綠江以前即告終止，則俄國所蒙之利害尚不顯著，若已渡鴨綠江，旅順要塞一經陷落，南滿洲恐非中國所有，影響于俄國之利害甚鉅。以是俄國宣言中立，亦不過如普法戰爭時之中立，即所謂俄國利害，不受影響之中立也！法國追隨俄國，德國注意點頗不可測。奧大利以無慣例之故，無所宣言。他如義大利、葡萄牙、丹麥、瑞典、挪威、美國，則皆先後宣告中立焉！（註一）

附錄：英國中立宣言書（註二）

一、凡英國臣民，不問其在國內與否，未得女皇許可而為交戰國之一方，加入海陸軍役，及不問其是否英國臣民，在英國國內而誘導以上行爲者。

二、英國臣民，以加入交戰國一方之海陸軍役之目的，未得女皇許可離去英國者，及不問是否英國臣民，在英國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七月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七月七日

二二四

內誘導以上行爲者。

三、依虛妄或許僞誘人，以使其加入交戰國海陸軍役之目的，使其離去英國者。

四、船舶所有者或管理者，未得女皇許可，知情而搭載次列之人或約爲搭載者。

第一、英國臣民不問其在英國國內與否，未得女皇許可而加入交戰國軍役者。

第二、英國臣民未得女皇許可，以加入交戰國海陸軍役之目的離去英國者。

第三、爲虛妄或許僞所誘爲加入交戰國海陸軍事而搭船者。

五、在英國國內未得女皇許可而從事下開行爲者：

第一、知係使用於軍事，或在不可不知之地位，而爲交戰國製造船舶及約爲製造者。

第二、知係使用於戰爭，或在不可不知之地位，而爲交戰國船舶從事某種行爲者。

第三、對於前項船舶供給軍需或使其出發者。

六、在開戰以前，曾爲製造船舶或軍需契約者，如依從下開條件時，可免處罰：

第一、將會訂契約之事，呈明國務大臣，依其命令而履行之。

第二、提出保證而後履行，若無國務大臣之命令時，在交戰未終以前，未得女皇許可，即不履行。

七、在英國國內之人，未得女皇許可，而增加交戰國之船舶噸數，或爲供其他戰鬥之用而加工者。

凡違反以上數項者，處以禁錮，或依情形而使服苦役。與犯罪行爲有關係之船舶，得由政府扣押或收沒之。條例並規定凡違反條例製造應用或送遣之船，依海軍裁判所之判決，加以處罰或收沒之。有此情形時，國務大臣行政官，即訓令逮捕搜索此項船隻，在未經依法處罰或赦免以前，得扣留之。逮捕扣留之權，則付與地方官。英國政府曾警告其臣民，嚴守中立義務，並附言云：「如有背中立義務，違反國際法，破壞交戰國一方，依法律用實力所爲之封鎖，或運輸將士訓令軍械子彈軍需糧與國際法及近時國際慣例認定之戰時違禁品，以供交戰國一方之用者，則其人與船艦貨物，均任對方捕獲，並依國際法處罰之。」英政府致通告於中日兩國政府：一、在兩國交戰之時期，禁止交戰國之一切軍艦，使用英國女皇所轄之一切領海港灣，於交戰之目的與便利。

。遇有交戰國之船舶（軍艦或商船）自英國所轄港灣出發時，至少非俟該項船舶出發後，經過二十四小時後，不許他一交戰國之軍艦自該港灣出發。

二、交戰國之一切軍艦，在此項命令業經公布施行於英國及其殖民地轄地後，開入英國所轄領海港灣時，除天氣不佳，或船員須購必需物品，或船須修理外，須於進口後二十四小時以內出發，不問其停留之情事為何，其停泊處或最近停泊地之當局，得在該項軍艦入口經過二十四小時後，命其從速同發，不准其因需要極不要緊之供給而停留。修理完竣後，尤應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出發。且不問其為商船或軍艦，兩交戰國之船舶，同時在英國所轄港灣內時，則其出發須相隔二十四小時。此項時間有必要時，並得延長，俾此種條項可以有效。

三、交戰國之一切軍艦，在女皇陛下所轄港灣內，除船員所必需之物品，及足敷開至該船之本國最近停泊地之煤量外，不許得其他供給。該項軍艦在女皇陛下所轄港灣停泊地得到煤量後，非有特別許可，在三日以內，不能再得煤量之供給。

四、禁止兩交戰國之戰艦運送捕獲之物品至英國及女皇管轄土地。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頁六〇—六四。

註二：「甲午中日戰輯」，頁五九—六二。

十七日（八月十七日） 日外相陸奧宗光在閣議中提出對韓四方案。

日本既發動中日戰爭，復擬以獨力改革朝鮮內政為名，陰圖吞併朝鮮之實，故在外交上自需採取一種步驟，于是日本外相陸奧宗光乃于本日向內閣提出對韓四方案。其提案曰：

朝鮮事件，較大島公使赴任時所籌畫之廟算，外交上軍事上皆屢遭局面之變遷，步步深入，竟成今日之形勢矣。而目下應施行之政略，隨時廟議有所決定。故遵照此成議，以期實行，雖不待論。然至於將來應如何辦理之問題，即本件最後之太目的如何之問題。帝國政府為改革朝鮮內政及永久保全其獨立，竟不能不與中國交戰，現尚在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七月十七日

爭中，非俟中日最後勝負決定，實際無從提及。然今日確定對此問題之一方針，不特與今後帝國政府外交上軍事上之措施，頗有緊切關係，且大島公使亦詢問關於本問題政府之方針。故本大臣茲具如左之考案，期廟議之確定：

(甲)帝國政府已向內外公認朝鮮爲一獨立國，又聲明使改革其內政矣。因之今後與中國勝負相爭，雖如我輩期望，勝利歸之帝國，亦依然以之爲一獨立國，完全任其自主自治，不由我干涉，亦毫不許他國干涉，任彼自決其運命。但關於本方策，發生如左之疑問：(一)朝鮮久爲紀綱廢頹，萎靡不振，官民共乏獨立志尙之國，假令一時因他方之刺激，多少改革其內政，恐其不能永久維持，應時改進。若如此則帝國政府此次派出大兵使用巨額軍費之結果，歸於泡影。(二)若雖知朝鮮難自保持其獨立，仍將其將來之命運，完全任諸彼自身，恐他日中國再伺隙而間接直接干涉朝鮮內政，或顛覆現在之政府，更以事大黨之閥族組織政府，使再現中日交戰前之中國關係。若一旦生此現象，帝國政府在其經歷上，不能袖手傍觀，完全任中國行動，固不待言，故必再行爭論。而如斯爭議，在樽俎之間圓滑結局，極爲難得，故中日兩國間之和平，不得不再行破裂。是不過中日兩國再演關於朝鮮之戰爭歷史，恐使此次盛舉，歸於徒勞，終於兒戲。

(乙)雖名義上公認朝鮮爲獨立國，然由帝國間接直接永久或長期間羽翼扶持其獨立，代禦其他外侮。但此方策發生如左之疑問：(一)朝鮮爲獨立國，日本無侵略其疆土之意，爲帝國政府從來對各政府所公言者，今假令間接使彼半島王國，屈服於帝國勢力之下，不因此招致其他外國之非難猜忌，或生出無數之糾葛乎？(二)帝國政府即不顧上述之困難，能待朝鮮如保護國，他日關於某事變，中國俄國及其他與朝鮮有利害關係之國，侵害朝鮮獨立時，帝國能始終以獨立防禦該國之患而保護之乎？

(丙)朝鮮以自力維持其獨立，我帝國又直接不能單獨任保護之責，故仿英國政府曾勸告中日兩國之法，朝鮮領土之安全，中日兩國共同擔保，但此方策發生如左之疑問：(一)帝國政府以戰勝之勢，與中國政府協議，該國政府當不如開戰前主張頑冥固陋之說，然儀式的宗屬問題，當不能拋棄，而彼雖在開戰前曾向英國政府言明，中國不提屬邦論，日本亦應不提起獨立論，然至戰勝之後，中國在朝鮮之關係，不論實利上、名義上，苟較帝國關係有優越之觀，決非帝國所能姑容忍耐，故爲如斯爭議，致談判破裂乎？或致談判遲延，久繼續交戰國之情形

乎？（二）假令中國政府屈服於我，不提祖宗關係問題，中日兩國爲保全朝鮮疆土，勢必派遣補助朝鮮政務之監督官或委員，或有互相駐兵之必要，然中日兩國對於朝鮮之利害關係常相反，中日兩國政治家之主義常冰炭不相容，兩國政府對於朝鮮之意見，必往往衝突，不歸一致，終不發生第一疑問之結果乎？

（丁）朝鮮到底不能自爲獨立國，帝國保護之又不利，中日兩國擔保其獨立，亦不能協同一致，則以朝鮮爲世界中立國，由帝國招誘歐美諸國及中國，使贊成朝鮮處歐洲比利時、瑞士之地位。關於此方策發生如左之疑問：（一）對於朝鮮利害關係最厚者，爲中日兩國，此次之交戰，亦不過兩國利害之衝突，由此戰爭之結果所生之名譽利益，固無使歐洲各國分享之必要，若分與之，有如俗諺所云『犬費力鷹獲食』，帝國所失，趨過所得，當爲帝國人民所不滿足，況帝國政府出大兵，經巨資，結果無所得，能免輿論之攻擊乎？

如上考察時，甲、乙、丙、丁四問題，皆一利一害，若選擇失當，將遺禍後世。故試考問於朝鮮將來之地位如何，則非中日戰爭最後勝敗決定後不發生之問題。然廟算非確定其一，今日外交上之操縱，及軍事上之行動，頗有緊要之關係，故望預先確定廟議。而上列四方策之外，閱僚諸公若尚有高明之考察，固所願聞也。（註一）

按：是時中日戰事正在進行，勝敗之數，尙不可知，自難決定永久之計劃。故當時內閣討論之結果，決定暫本乙策進行，卽由日本獨霸朝鮮之所謂「獨立」也！大體方針既定，此後乃逐漸實行攫取朝鮮之實權。（註二）

註一：陸奧宗光：「蹇蹇錄」，頁二一三—二一五。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九五。

二十日（八月二十日） 日韓訂立新協約，朝鮮實行政改革內政。

駐韓日使大島圭介強迫朝鮮訂立所謂「暫定合同條款」，既干涉朝鮮之內政，復取得築路及開口通商之特權。其條款如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七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七月二十一、二十四日

一二八

「大日本大朝鮮兩國政府，爲解決明治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鮮開國五百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兩國兵偶然衝突事件，鞏固將來朝鮮自由獨立，且獎勵貿易以益謀兩國親密起見，特暫定合同條約如左：

一、日本政府希望朝鮮政府改革內政，朝鮮政府亦知其爲急務，從其勸告，保證依次施行應爲勵行之各節。
一、內政改革節目中，京釜及京仁間修築鐵路一事，朝鮮政府慮其財政尚未充裕，願與日本政府或與日本某公司訂約，俟有機會，即行起工，惟月下有委曲情節，暫難實行。

一、京釜及京仁間日本政府所架設之軍用電話，應酌量時機，訂立條款，以謀其存在。

一、爲將來兩國交際親密且獎勵貿易起見，朝鮮政府應在全羅道沿岸，開一通商口岸。

一、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王宮附近兩國兵員偶爾衝突事件，彼此均不追究。

一、日本政府希望助成其獨立事業，故關於將來鞏固朝鮮國獨立自主之事宜，應由兩國政府派委員會同議定。

一、以上所開暫定條款，經畫押蓋印後，應酌量時宜，將護衛大關之日本兵員，一律撤退。右暫定合同條款內應永遠遵守者，後日應作爲條約遵行，爲此兩國大臣記名蓋印，以明憑信。

大日本國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特命全權公使大島圭介

大朝鮮國開國五百三年七月二十日 外務大臣金宏集（註一）

註一：陸奧宗光：「蹇蹇錄」，頁二一八；「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一五五。

二十一日（八月二十一日） 俄皇召集御前會議，議決以維持朝鮮現狀為俄國外交政策中心。

俄皇亞歷山大三世召集御前會議，討論中、日戰爭態度，決定以維持朝鮮現狀為俄國外交政策中心。但不積極干涉，不立即採取行動，接受日本退出朝鮮之諾言，注意英國之行動。（註二）

註二：紅檣，一九三一年發表，頁五八，Vladimir the China Japan War.

二十四日（八月二十四日） 宇林西報海軍記者及隨軍記者分別報導中日海陸戰情況。

字林西報海軍記者評豐島海戰曰：

「日本以其艦隊精華，突襲中國二等慢艦濟遠及輔助艦，而最速之吉野竟受重傷。濟遠外竊引擎師言，日炮多不準，實非日本海軍之勝。」（註一）

字林西報隨軍記者報導曰：

「日兵在漢城者士氣極壞，多半無鞋帽，自殺者時有。日人多以小勝爲大勝，故張士氣。韓人愛華軍而鄙恨日軍。北部韓人與華軍以各種援助。公州一地韓人五千，自動參加華軍，請裝備，中國只能給三分之一，若中國能裝備韓人，可爲大助。」（註二）

北洋海軍軍法總監德人漢納根（C. Von Hanneken）電李鴻章，認中國軍艦速率太慢，不利於遊弋洋面。

本月二十三日，鴻章派德人漢納根爲軍法總監，襄助海軍防剿事宜。本日電告鴻章云：「現在不能甚做大事，因無快船可以飛駛，查看敵船游弋何處海面，且不免敵船前來窺伺。」（註三）

註一：「字林西報」，頁三〇五，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十六，頁四七〇。

二十六日（八月二十六日）日韓訂立「攻守同盟條約」。

本日，日本脅迫韓國另訂立「攻守同盟條約」，錄其約文如左：

「大日本大朝鮮兩國政府，於日本曆明治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朝鮮曆開國五百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朝鮮政府委託駐朝鮮日本特命全權公使，辦理清兵撤退以來，兩國政府對於清國已立於攻守相助之地位，爲達兩國共同目的計，下記兩國大臣，各奉全權委任，訂立條款於左：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八月一日

一三〇

第一條：此盟約以使清兵撤退於朝鮮國境外，鞏固朝鮮國獨立自主，增進日韓兩國利益爲目的。

第二條：日本國對清國任攻守之戰，朝鮮國對於日兵之進退及糧食之準備，予以便宜。

第三條：此盟約俟對清國平和條約成立後，即行廢除。兩國大臣記名蓋印，以昭憑信。

大日本國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特命全權公使大島圭介

大朝鮮國開國五百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外務大臣金允植。」（註一）

由上約觀之，日本之于朝鮮，可謂予取予求也。所謂「攻守同盟者」，朝鮮究有何能，以助日人之攻守，而日本之所以出此者，亦純爲掩飾國際之耳目。陸奧宗光記其事曰：

「惟爲表彰朝鮮之獨立，何以有締結日韓攻守同盟之必要？蓋朝鮮政府以獨立國，在平時戰時，立于列強之間，不知其位置。故牙山開戰以來，事實上雖爲我國之同盟，然尙密乞駐漢城歐美強國代表者之周旋，使中日兩國軍隊由其國內撤退，及其他不合調之舉動尙多。將來萬般之障礙，恐由此釀出。故以一國際條約之效力，一面表彰等爲獨立邦國，有公然與任何國家結攻守同盟條約之權利，一面繫留彼等于我手中，使不敢他顧，實一舉兩得之策也！」（註二）

可知日人用心之所在。是以日本除在朝鮮脅迫韓民供其驅使外，所云改革內政，實未作一事。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一五七。

註二：「蹇蹇錄」，頁二一九。

八月

一日（八月三十一日） 西報記者論中國海軍攻守之勢。

西報記者自日本通訊謂：「中國海軍守口不出，似怯弱。吉野受傷之後，任日艦自由來往黃海，實屬不智。然中國艦隊若受挫敗，則京津門戶洞開，局勢更壞。」（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三四九，一八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五日（九月四日） 日軍分四路進逼平壤。

日本以中國四路軍抵朝鮮，朝鮮政府動搖，故決計先敗平壤華軍，分四路進逼。鴻章電葉志超，日軍一萬二千前進，令注意。（註二）

赫德預測，中國若能久戰，則日本可敗。（註二）

註一：寶宗一：「李鴻章年（日）譜」，頁二七二，一九六八年六月，友聯書報發行公司出版。

註二：S. P.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P. 644.

十日（九月九日） 日軍以三萬人攻我平壤守軍一萬人。

日軍在朝鮮者四萬人，以三萬人攻平壤。我軍在朝鮮者二萬人，以一萬人守平壤。（註一）

註一：「李鴻章年（日）譜」，頁二七二。

十五日（九月十四日） 日皇移駐長崎，監督軍事日報。

日皇移駐長崎，監督軍事日報，主攻占北京，徹底使中國屈服。同時日本大本營獲得中國海軍護送陸軍登陸大東溝消息。海軍司令官伊東佑亨決定不待在仁川、平壤之第二、第三游擊艦隊，自率第一游擊艦隊直截與中國海軍作戰。（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四二六，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四日。

十六日（九月十五日） 日軍分四路進攻平壤，清高州鎮總兵左寶貴及補用知府盛星懷戰歿。其第一軍（屬日本山縣有朋所統，即第三、第五兩師團）旋占平壤，葉志超、衛汝貴等敗走，華軍死傷二千餘人（衛部盛字軍全潰）。

日兵之攻平壤，採取包圍形勢，分四大枝以進。一枝由漢城西北出，循開城、金川、瑞興、鳳山、黃州，東北折，歷中和而抵平壤東南，此卽由大道分股來撲之兵，馬玉崑禦之於大同江東岸者也。其主力爲九旅團，司令官則少將大島義昌也！一枝亦由漢城西北出，至黃州，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之甑山，以襲平壤西南面，此枝號稱大軍，由其第三師團司令官中將野津道貫所率。軍隊編制，則雜集第十旅團中之二十三聯隊、十二聯隊，及騎兵工兵砲兵而成者也。一枝由漢城東北出，至朔寧，經新溪、遂安、祥原，至江東縣，渡大同江，以襲平壤北面，此爲第十旅團中第十二聯隊之第一大隊，及第九旅團中二十一聯隊之第二大隊，名曰朔寧枝隊，其司令官乃少將立見尙文也。又一枝爲由日新來之第三師團第五旅團之第十八聯隊，由其大佐佐藤鍊太郎率之，自元山登岸，西行，歷文川、陽德、成川，趨順安，以切平壤西北大道，期欲斷我歸路者也！四枝日兵自本晨起猛撲平壤各門，玄武門先失守，清高州鎮總兵左寶貴、補用知府盛星懷戰歿。及夜，葉志超率諸將弁兵，棄城北走，遂失平壤。

按：甲午之戰，陸戰決於平壤，海戰決於黃海，過此以後之諸役，則望風披靡，益復不堪矣！平壤者，朝鮮之舊京，城垣壯闊，南北綿亘十餘里。凡六門：南曰朱雀，西南曰蔚海，西北曰七星，北曰宣武，東曰長慶，東南曰大同。長慶、大同二門直逼大同江，玄武門跨山爲城，附城一山，曰牡丹臺，爲全城命脈所在。牡丹臺山外，復有三山環抱，迤邐而西，內屏牡丹臺，而外扼往義州通衢，實爲平壤後路孔道。城之東南達漢城，西南至大同江口，東走元山浦，地要而險，最據形勢。牙山敗後，葉志超、聶士成先後抵平壤。旋士成電李鴻章，請赴天津募兵，乃解兵去。是時華軍駐韓境者，有蘆防大營、衛汝貴部盛軍十三營、左寶貴部奉軍六營、豐陞阿部奉天盛軍六營、馬玉崑部毅軍四營，共三十五營，皆駐平壤。葉志超爲各軍總統。及日兵既逼，諸將乃分責守界，城之北面，左寶貴所部奉軍及豐陞阿之盛軍、江自康之仁字營守之；城之西面，葉志超所部蘆榆防軍守之；城之南面及迤西南隅，衛汝貴之盛軍守之；城之東面及大同江東岸，則由馬玉崑之毅軍守之。復以左寶貴部分統聶桂林策應東

南二面，蓋以東南當敵衝，尤爲我兵力所注重也。本日黎明時，城北日軍分兩道來撲。時我玄武門外，營壘分二重，內重兩壘相屬，牡丹臺卽爲其東一座，外以三壘環之。敵之來攻也，寶貴自主城上指揮我軍力禦之。日兵死傷無算，仍猛進。辰刻，破我外重之東壘，而其中一壘猶固守，未幾，日兵昇一大砲至向近山巔，向我迫擊。於是中壘亦不守，而外重之西一壘，及內重之西一壘，皆相繼潰。城北日兵乃萃於牡丹臺，牡丹臺據全城形勝，我軍以全力持之，而日兵砲隊繼至，專注轟擊，其步兵遂乘勢蟻附而上，牡丹臺隨陷。寶貴知事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黃馬褂頂帶，登城指揮，遂連中砲受傷墜地，猶能言，下城始殞。此爲中午之役，中國將領壯烈殉國之第一人。部將死者數人，清軍奪氣，日兵十餘人，潛奔城下，以繩梯操升，守軍驚散，遂踰城入，徑奔宣武門，砍守軍，開城以納日軍。志超乃於城上遍插白旗，乞緩兵，城中擾攘益甚。是時，馬玉崑方與東路日兵相持於大同江東，擊退敵軍，獲大捷。其西路日兵，於本日晨，至城外西南隅，與衛汝貴遇，汝貴邀之，相持至午刻，日兵不得逞，亦退去。而聞北路大挫，玄武門失守，未幾，志超撤兵速退令亦至，於是玉崑、汝貴乃撤隊。是夜，志超率諸將弁兵，棄平壤北走。日兵要於山隘，槍炮拼擊，清潰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彈故，圍聚愈密，死亡愈衆。其受傷未殞之卒，縱橫僵臥，哀號之聲，慘不忍聞。加以人馬騰躐，相蹂死者，至二千餘人。平壤軍儲甚厚，凡有大小砲四十尊，快砲並毛瑟槍萬餘桿，將弁私財暨軍士糧餉不貲。及棄走，所有軍資器具公文密電，一概委之，自是清軍蹙而不振，敵饒益張，遂駁駁有內犯之志矣！是役也，李鴻章二十餘年所練之兵，以勁旅自誇者，略盡矣！中國軍備之弛，固久爲外國所熟知，獨淮軍、奉軍、正定練軍等，素用洋操，鴻章所苦心經營者。故日本懾其名，頗憚之。既戰勝後，其將領猶言非始願所及也！其所致敗之由，一由將帥闕冗非人，其甚者如衛汝貴尅扣軍餉，臨陣先逃，如葉志超飾敗爲勝，欺君邀賞。以此等將才臨前敵，安得不敗？一由統帥諸人，官職權限皆相等，無所統攝，故軍事煥散，呼應不靈。蓋此役爲李鴻章用兵敗績之始，而淮軍聲名亦從此掃地以盡矣！（

註一）

附錄：李鴻章奏報平壤敗退文（註二）

「奏爲倭兵猛撲平壤諸軍退至安州據實奏參並自請嚴議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倭人起兵三四萬，分道來撲平壤，四面環攻，連日力戰危急情形，經臣疊次電達總理衙門代奏在案。茲據葉志超電稱：倭寇自十四日午刻繞竄順安後路，於平壤附近山頭設砲百餘尊，四面來攻，槍砲並發，各將領分道奮力迎剿。該提督重懸賞格，如將倭兵擊退賞銀三萬兩，奪砲一尊賞銀千兩，生擒六十兩，取首級三十兩，槍刀馬匹亦均列賞。兵勇合力血戰，當派衛汝貴、馬玉崑兩軍，將江東之賊擊退七八里，槍斃不計其數。馬玉崑奪砲七尊。又由江東縣北路渡來大股及成川之賊萬餘人，同時來攻江自康營。該提督與左寶貴、豐陞阿親督數千人，設伏夾攻，至晚倭勢始弱。各軍奮力齊上，追至四里外，生擒及割取首級二百餘名，槍斃不計其數，我軍共傷亡三百餘人。倭復由龍岡西北，分道來攻盛軍各營壘，該軍先已調出五成隊過江，倭奸探知實情，即來猛攻數次，不下。該提督恐孫顯寅在外遊擊，不能兼顧，即調衛汝貴整隊回擊，倭始敗退，槍斃千餘，我軍傷數百人。是日，喜獲大勝。十五日丑刻，倭大隊越山而來，各將領分段堅守以待，又挑選精銳兵勇遊剿，倭兵抵死不退。兩軍對施槍砲，連夜達旦。至十六日早，仍四面來攻愈急。平壤城北原有奉軍三營，砲臺連日被其打毀，倭換班三四次，意在直撲北城。左寶貴力疾親督三營並諸將，迎面血戰，倭抵敵不住，始退，左寶貴奮勇前追，忽胸前中槍陣亡。甫收隊回城，而倭漸又逼近。各軍苦戰五晝夜，子盡糧絕，戰死溝壕者，不忍目視。四山大砲，齊向城營施放，兵勇無地立足，祇得且戰且退。經過順安、肅川一帶倭卡數十處，層層打出。文武官兵勇陣亡，倉猝無從確查。十八日早到安州，倭竟敢追出百餘里，始退，仍必跟蹤齊進。若由安州堵擊，無險可扼，且子彈業已打完。該提督會商衛汝貴、豐陞阿等，先拔隊過安州，清川、博川兩江之間，分別整頓休息。該提督督盛軍步隊二營，奉軍馬隊一營，奉天盛字馬步五營，在博川畫江固守，一而調呂本元、劉盛休前來，擇要駐扼，候各軍整頓有緒，再相機進止。此次各軍血戰之苦，數十年所未見，陣亡文武員弁，容查明請卹，請先據電轉奏，並自請嚴議處治等情前來。臣查平壤各軍孤懸危地，原止一萬五千人，內尚有分防後路安州等處。葉志超自牙山退出，僅二千餘人，奏明傷病甚多，器械不全，難遽搏戰。倭人遽以三四萬之衆，猛撲環攻，各將領督率弁勇，連日苦戰，斃倭無算，實屬奮勇出力，不顧身命。記名提督高州鎮總兵左寶貴，久歷戎行，卓著勞

勳，裹創力疾，血戰捐軀，忠勇性成，深堪憫側。應請旨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議卹，並於各省立功地方築立專祠。可否予諡，出自恩施。其餘陣亡文武員弁，應俟查明彙案請卹。總統各軍直隸提督葉志超，力疾督戰，統領盛軍寧夏鎮總兵衛汝貴，統領毅後軍記名提督馬玉崑，統領奉天盛字營御前侍衛副都統豐麟阿，均督軍苦戰數晝夜，因賊愈集愈多，子盡糧絕，退出平壤，究有應得之咎，應請旨分別懲處。至臣忝總師干，深知前路兵力太單，疊經電奏有案，祇以近畿空虛，沿海防軍，難再抽撥，調募各營，路遠又難驟集，竟無餘力派往接援，以致衆寡不敵，實屬調度無方，應請旨嚴加議處。再據馬玉崑續電：該軍槍械無失，須到義州方可收隊整頓。葉志超續電：現守博川江口，僅盛軍步隊兩營、呂本元馬隊兩營，並招集落後勇丁，且戰且行，倭以大隊跟圍，勢難固守。將來若能扼住義州，徐圖厚集兵力，再謀大舉，合併聲明。除先已將平壤戰狀電奏，並以後一切情形仍隨時電陳外，理合繕摺由驛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註一：參照「東方兵事紀略」，頁六二—七四。

註二：「李文忠公全集」(三)，頁六八九—六九〇。

十八日(九月十七日) 中日海軍大戰於黃海，自中午十二時起至下午五時半止，中國大敗，沉四艦，管帶鄧世昌等戰歿，餘艦退旅順。

黃海大戰，日本艦隊司令海軍中將伊東祐亨大敗中國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於大東溝，「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艦沉沒。明日，「廣甲」亦毀，管帶鄧世昌等戰歿，餘艦退旅順。「東方兵事紀略」一書記其事曰：

「當平壤陸戰之時，黃海之海戰，亦在進行。時北洋海軍常自山東之威海衛出發巡弋，八月初九日全軍復出巡海。十三日，丁汝昌率全軍抵旅順。是時，大軍方雲屯平壤，清廷將以總兵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濟師，自鴨綠江口登岸。海軍全隊抵旅順之日，李鴻章即令海軍翼之進。銘軍凡載招商輪船五艘，海軍全隊，計鎮遠(左翼總兵林泰曾管帶)、定遠(右翼總兵劉步蟾管帶)，兩鐵甲，致遠(中軍副將鄧世昌管帶)、靖遠(中軍左營副將葉祖珪管帶)。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八月十八日

一三五

經遠(中軍右營副將林翼升管帶)、來遠(左翼前營副將邱寶仁管帶)、濟遠(右翼前營副將方伯謙管帶)、超勇(左翼後營參將黃炯臣管帶)、揚威(右翼後營參將林履中管帶)、平遠(都司李和管帶)八兵輪，益以廣丙(都司程璧光管帶)、廣甲(都司吳敬榮管帶)兩輔助艦，又蚊炮船鎮南、鎮中兩艘，魚雷艇四艘，翼護以行。十六日午夜發自大連灣，十七日午刻抵大東溝。鎮遠等十艘泊口外，平遠、廣丙泊港口，鎮南、鎮中及四雷艇衛運船五艘入港，徹夜渡兵登岸。十八日辰刻，汝昌促卸兵，並令全軍備午刻起碇，將歸旅順。已刻，突報日艦出現。船中將士或奔赴甲板上，觀地平線上如柱之薄烟。丁汝昌、劉步蟾、漢納根(Major von Hancken)及英員泰萊(W. F. Tyler)皆聚定遠艦之飛橋上，共商應敵之策。議決分段縱列，以待敵艦之來。時南望不僅可見烟氣，且可見煙氣所從發出之戰艦一串。時已至矣，乃起錨，船應機聲而搏躍，發出指揮艦隊排佈之信旗。而信旗所示爲諸艦相並橫列，以主艦居中，並非適所議決之陣勢。時丁汝昌與漢納根立於飛橋之前方，泰萊見陣勢已錯，欲請更改，恐陣勢益亂，至渙散而不可收拾，兩害相權，以保持現狀爲輕。泰萊乃自瞭望塔上躍下，謂劉步蟾曰：『總兵已發錯誤之信號，請視衆艦。然若更改，紛亂益甚。』然即直線之排列，亦未完全，蓋兩翼弱艦，覺其置位之危，逗留於後，艦隊因成半月之形，定遠、鎮遠二主艦自然居於前方。於是兩方艦隊接近，相距約一萬碼。觀日艦之進行，似欲橫攻中國艦隊最弱之右翼。此時中國艦隊所需要之號令，爲全隊向右移四度，或可使主力艦最先與敵艦接觸。劉步蟾怯弱甚，雖知此需要而不爲，丁汝昌及漢納根不習海事，均見不及此。泰萊獻此策，立被採用。漢納根至船後，指揮旗尉，信旗上出，衆艦應之，於是定遠之旗下降，示將移動也。時泰萊立於瞭望塔之入口，候舵機之轉，久不見其動。泰萊顧劉步蟾曰：『總兵，改道之旗已下，君若不向左轉舵，艦隊將愈紛亂。』步蟾乃令曰：『舵左轉！』然復低聲曰：『慢，慢！』結果艦止不動。泰萊大恚，加以詛詰。泰萊自瞭望塔上跳下，奔赴丁汝昌所。此時飛橋上只汝昌一人，言語不通，意不得達。此飛橋年久失修，難當重震。當此之時，劉步蟾突發橋下之砲，轟然一聲，橋爲震斷，丁汝昌與泰萊同自空中墜落，均受重傷。黃海之戰，以是開始。

是時，我戰艦十艘，分五隊：鎮遠、定遠爲第一隊，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日艦十二艘則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快船，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

、比叡、扶桑、西京丸、赤城八兵船也。我國艦隊噸數，較優於日，日艦隊僅得我船隊噸數之七成；然日艦小於我，而速率大於我，大砲少於我，而快砲亦多於我。我最速之船爲致遠、靖遠、濟遠，每四刻行十八海里餘，各艦則或十五六海里或十四海里十海里不等，而超勇、揚威、廣甲最弱小而鈍，鎮遠、定遠最堅大，而每四刻止行十四海里有半。日快船四艘，吉野速率最大，每四刻行二十三海里，餘三船俱行十九海里上下，其兵輪惟比叡、西京丸、赤城爲最鈍弱，餘諸艦速率則皆在十七海里又半以上至十九海里。丁汝昌時雖受傷，仍危坐定遠甲板上督戰。日艦作一字堅陣來撲。快船居前，兵船繼之，其司令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則以松島爲旗艦，自乘以督攻。日艦駛近我鎮遠、定遠兩艦時，忽改爲太極陣，轉道飛駛左行，繞攻我軍右翼，瞬息已過，裏華陣於其中。砲聲未絕，敵船趨至，與鎮遠、定遠相去恒六里許，蓋畏重甲而避重砲，且華砲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彈已可至也。與半月陣末二艦相逼較近，欺砲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頃，日艦圍入半月陣脚，致遠、經遠、濟遠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遠失羣後，船身疊受重傷，勢將及溺，適與日艦吉野相值。致遠管帶粵人鄧世昌，謂大副游擊陳金揆曰：「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足以奪其氣而集事也。」遂鼓快車疾駛，以突吉野，欲撞與同沉。吉野即駛避，而致遠中其魚雷，機器鍋爐迸裂，船遂左傾，須臾沉沒，世昌、金揆同時落水，舟中二百五十人皆溺死。世昌遇救出水，以闖船併命，義不獨生，仍復奮擲自沉。死時已逾申刻。蓋甲午全役死事者，以世昌爲最烈云。其同時被圍出之經遠船，甫離羣，火勢陡發，管帶林永升發砲以攻敵，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條。遙見一日艦，似已受傷，即鼓輪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閃避不及，遽被轟裂，死難者亦二百七十人。至管帶濟遠之方伯謙，即七月間護送高陞至牙山途遇日艦逃回旅順者也。是日兩陣甫交，方伯謙先掛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主將，旋因圖遁之故，亦被日船劃出圈外。致遠、經遠兩船與日苦戰，伯謙置而不顧，急圖逃逸，如喪家狗，遂誤至水淺處。時揚威鐵甲先已擱淺，不能轉動，濟遠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沒。揚威遭此橫逆，死者百五十餘人，伯謙驚駭欲絕，飛遁入旅順口。廿四日，率李鴻章電令，斬伯謙於旅順。同時效方伯謙者，有廣甲一艦，逃出陣外，祇防後追，不顧前路，遂誤撞於島石，爲日軍發水雷轟碎之。陣中自經遠、致遠、揚威、超勇沉，濟遠、廣甲逃，所餘者，僅鎮遠、定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丙七艘耳。是役也，日艦或受重傷，或遭小損，西京丸爲定遠擊沉，而華軍所喪，蓋五艘矣。方諸艦之逃

也，日艦五艘幸於我鎮遠、定遠兩艘，鏖戰一時許，我定遠擊其松島艦幾沉之，而定遠亦重傷，偏船皆火，砲械俱盡。時已日夕，暮色蒼茫，日艦懼我靖遠諸艦合魚雷乘之也，解而南去，我軍亦西歸，翌日卯刻抵旅順。濟遠先已逃歸，泊港內。計此戰我軍將士死者，鄧世昌爲最烈，官弁亡八十七員，水手死一千餘人，傷者四百餘，而定遠洋砲手宜格爾，亦死於砲，洋員受彈傷者十一人。汝昌墜傷後，戰事頗賴漢納根指揮，然漢納根亦陸將，於海事非其所長，旋亦傷股。時戰艦七艘，在旅順，咸入塢修整，至九月十八日始竣工，二十日出口回威海，二十六日日艦已襲據花園港，渡其陸師第二軍登岸矣。蓋自鴨綠江口之戰，我海軍將士膽愈怯，且餘艦七艘，亦實不堪馳逐海上，故雖屢奉巡海截倭之命，而終不遇敵，敵侵威海，亦罔能出擊，由是日艦益縱橫海上無所顧忌矣。」（註一）

附錄：

一、李鴻章奏報黃海戰事之經過（註二）

奏爲海軍在大東溝口外接仗力挫賊鋒並查明兵船管帶各員死事慘烈情形懇恩優卹恭摺仰祈聖鑒事：據海軍提督丁汝昌呈稱，海軍各兵艦奉調護送招商局輪船裝運總兵劉盛休銘軍八營陸兵赴大東溝登岸，於八月十七日丑刻由大連灣開行，午後抵大東溝。即派鎮中、鎮南兩船，魚雷四艇，護送入口，平遠、廣丙兩船在口外下碇，定遠、鎮遠、致遠、經遠、來遠、濟遠、廣甲、超勇、揚威十船，距口外十二海里下碇。十八日午初，遙見西南有烟束來，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剿。我軍以夾縫雁行陣向前急駛，倭人以十二艦魚貫猛撲。相距漸近，我軍開砲轟擊。數隊忽分忽合，船快砲快，子彈紛集。我軍整隊還敵，左一雷艇亦到，各艘循環攻擊，堅忍相持。至未正二刻，平遠、廣丙二船，福龍雷艇續至，定遠猛發右砲攻倭大隊，各船又發左砲攻倭尾隊三船，中其扶桑艦，三船即時離開。旋即回隊，圍繞我軍，夾擊包抄，開花子彈如雨，一排所發，即有百餘子之多。各船均以船頭抵禦，冀以大砲得力。敵忽以魚雷快船直攻定遠，尚未駛到，致遠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即將來船攻沉。倭船以魚雷轟擊，致遠旋亦沉沒。管帶鄧世昌、大副陳金揆，同時落水。經遠先隨致遠駛出，管帶林永升奮勇督戰，突中敵彈，腦裂陣亡。濟遠先被敵船截在陣外，及見致遠沉沒，首先駛逃，廣甲繼退。經遠因管帶既亡，船又失火，亦同退駛。倭始以四船尾追

濟遠、廣甲，因相距過遠，折回，乃聚圍經遠。先以魚雷，繼以發彈，拒戰良久，遂被擊沉。超勇艙內中彈火起，旋即焚沒。揚威艙內亦被彈炸，又爲濟遠當腰觸裂，駛出至淺水而沉。該兩船管帶黃建勳、林履中，隨船焚溺同殞。來遠、靖遠，苦戰多時，來遠艙內中彈過多，延燒房艙數十間，靖遠水線爲彈所傷，進水甚多，均即暫駛離隊，撲救修補。平遠、廣丙，及福龍雷艇，尾追裝兵倭船，爲敵所斷，未及歸隊。此時僅餘定、鎮兩艦，與倭各艦相搏，歷一時許，巨砲均經受傷，定遠祇有三砲，鎮遠祇有兩砲，尙能施放，丁汝昌督同各將弁，誓死抵禦，不稍退避，敵彈叢集，每船致傷千餘處，火焚數次，一面救火，一面抵敵。丁汝昌旋受重傷，總兵劉步蟾代爲督戰，指揮進退，時刻變換，敵砲不能取準。又發砲傷其松島督船，並合擊傷其左側一船，白烟冒起數丈。靖遠、來遠，修竣歸隊，平遠、廣丙、魚雷各艇，亦俱折回，倭船多受重傷，復見諸船並集，當即向西南一帶飛駛遁去。我軍尾追數里，敵船行駛極速，瞬息已遠，然後回隊，駛回旅順。濟遠一船，已先回旅；廣甲一船，在三山島擱礁，拖救不起。該兩船管帶方伯謙、吳敬榮，業經電請分別從嚴參辦。所有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四船管帶鄧世昌等，力戰陣亡，應從優卹請奏前來。臣查大東溝一戰，我以十船當倭十二艦，倭艦雖不及定、鎮兩鐵艦之精堅，而船快砲快，實倍於我。我軍奮力迎擊，血戰逾三時之久，爲地球各國海戰向來罕有之事。各將士効死用命，愈戰愈奮，始終不懈，實屬勇敢可嘉。此次據中外各將弁目擊攻沈倭船三艘，而采諸各國傳聞，則被傷後沉者，尙不止此數。內有一船係裝馬步兵千餘，將由大孤山登岸，襲我陸軍後路，竟令全軍俱覆。而我軍送銘軍八營，駛抵口內，得以乘間陸續起岸，不至被其截奪，關係大局匪細，實賴海戰保全之功。若非濟遠、廣甲相繼遁逃，牽亂船隊，必可大獲全勝。猶幸致遠、經遠衝鋒於先，定遠、鎮遠苦戰於後，故能以寡擊衆，轉敗爲功，此則方伯謙之罪固不容誅，而鄧世昌、劉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沒者也。提督丁汝昌，統率全軍，身當前敵，受創後猶復興疾往來，未嘗少休，激勵將士，同心効命。當時交戰情形，疊經臣電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奏聞在案。八月二十九日欽奉電旨：東溝之戰，倭船傷重，鎮遠、定遠各將士苦戰出力，著李鴻章酌保數員，以作士氣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查照，容俟查明核實奏報，其力戰陣亡之管帶大副等，自應先行奏請恩卹，以慰忠魂。致遠管帶提督銜記名總兵候補中軍中營副將喀爾薩巴圖魯鄧世昌，經遠管帶升用總兵左翼左營副將穆欽巴圖魯林永升，致遠大副升用游擊中軍中營都司陳金揆，爭先猛

進，死事最烈，擬請旨將鄧世昌、林永升照提督例，陳金揆照總兵例，交部從優議卹。鄧世昌首先衝陣，攻毀敵船，被溺後遇救出水，自以闔船俱沒，義不獨生，仍復奮擲自沉，忠勇性成，一時稱歎，殊功奇烈，尤與尋常死事不同，且官階較崇，可否特旨予諡，以示優異，而勸將來，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擬。趙勇管帶副將銜左翼左營參將黃廷勳，揚威管帶副將銜右翼右營參將林履中，力戰捐軀，同堪憫惻，擬請旨各照原官升銜，交部從優議卹。其餘陣亡傷亡受傷員弁，應俟查明，奏請分別照章卹賞。所有海軍接仗及管帶員弁陣亡各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二、中國海軍之敗因（註三）

甲午海戰之敗，統將無能，固爲大因。所吃虧者尤在無快船快砲，故雖有鎮遠、定遠甲堅噸重之鐵艦，終爲日本所扼。當時李鴻章、丁汝昌等非不知之，屢有購船之請，然內扼慈禧之豪奢，極臣之掣肘，外撓於一般御史言官之鼓譟，以致北洋海軍多年無所擴充與改進。日本則以北洋艦隊爲假想敵，購船置械，猛省不已。且日本海軍之成，在中國之後，故彼所購求者，胥爲新式之品，以故北洋海軍在噸數上雖優於日本，在技巧上則瞠乎其後。如中國海軍船大而行遲，砲大而不遠；日本海軍則船快砲快，不待交鋒，利鈍已見。據深知當時情形者言：當甲午四月北洋大閱海軍之時，有參觀會操之英員謂李鴻章曰：中國海軍現狀尚不足以敵日本，必再添購快船兩艘，方可以備日而制勝云。因介紹英廠製造之二艦，擬售於中國。時慈禧太后爲做六十大壽，大建頤和園，撥海軍經費三千餘萬，供建築費，戶部尚書翁同龢亦藉口款絀而加以阻撓，故李鴻章購船之請未得達。而此兩船旋爲日本購去，其中之一，卽甲午海戰中擊沉我艦多艘之「吉野」也。迨甲午戰作，鴻章知弱點所在，一再請求增購快船，一般御史言官，仍相與阻撓。茲錄八月初一日福建監察御史安維峻阻撓購船一摺如次，其奏曰：

奏爲快船訂購宜慎鉅款不可輕擲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聞北洋大臣李鴻章，近因中倭戰事，有添購快船之請，業由戶部及海軍衙門撥銀二百萬兩，交出使英法義比大臣龔照璠訂購阿摩士等船。臣不知李鴻章此舉其意何居也？夫創辦海軍之始，醇賢親王與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等臣會議，中國海軍擬設四大枝或三大枝，每枝用鐵甲二艘，快船四五艘，今北洋有定遠、鎮遠二鐵艦，經遠、來遠、濟遠、致遠、靖遠、平遠、超勇、揚

威八快船，又有鎮中、鎮邊等六蚊船，魚雷艇十餘號，其統論中國全局，海軍誠宜逐漸擴充；如僅練威海、大沽、旅順、大連灣一枝而已，船數實不爲少。所患者該將不得人，有船與無船等耳。提督丁汝昌本係陸將，於海軍之奧妙，全然不知，總兵林泰曾、劉步蟾，皆船政學生，風濤沙淺，粗能通曉，兩人分帶二鐵艦，安富魯榮，擁以自衛，其昏庸畏葸，更甚於丁汝昌。故北洋雖有鐵快各船，遠不能攻倭奴之三島，近亦不敢遊弋仁川、牙山諸口也。南洋船少人所共知，然本年李鴻章巡閱海軍，南洋廣乙等三船，操練精純，砲無虛發，出北洋海軍之上。此外牙山開仗，廣乙血戰，壞日本快船，西人亦極稱歎，彼國至登之日報。情所帶砲彈太少，又孤軍無援，遂致全船覆沒，定遠、鎮遠，製做甚精，在西洋亦爲上等鐵艦。濟遠船身笨重，機器太多，容量甚少。牙山之役，管駕方伯謙，藏匿艙內，不敢交鋒。倭人知其易與，奮力窮追，倭船與濟遠相距祇數丈，事機危迫，有水手山東人，突開尾砲，擊中倭船要害，連開三砲，而倭船傷重不能行駛，濟遠得以逃歸。是役微山東水手，則濟遠必爲倭虜，而方伯謙亦將爲操江管駕王榮發之續矣。夫廣乙造自閩廠，船身雖小，竟敢猛戰；濟遠船砲俱笨，以一水手之力，竟能擊傷倭船。可見船無論大小利鈍，能戰與否，仍視乎駕船之弁兵。設使山東水手而管駕濟遠，必不止擊壞倭船一二艘。勇猛精練如廣乙管駕，而濟以定、鎮諸艦，豈不可以奪對馬據釜山哉？故北洋海軍如果能戰，則現在非無可戰之船，船數亦不見少；儼海軍將弁皆如丁汝昌輩之恒怯，則即廣購戰船，竊寇兵而資盜糧，其害甚於無船者。操江之事，可爲寒心。夫李鴻章之欲添船，意在與日本交接耳。然如丁汝昌、林泰曾、劉步蟾等，李鴻章明知其畏縮，尙且以無人更換，一味縱容；試問阿摩士等船如果來華，更派何人管駕？此次海上角逐，李鴻章不歸咎於海軍將弁之不得力，而亟亟焉僉添購快船是請，臣誠不解其何心也。且查西洋各國，凡向船廠訂購鐵快各船，必先商定船圖，令其如法製造；造成之後，將機器砲位安置妥貼，下水行駛，必船行之速率，入水之深淺，砲位之準頭，與原圖一一符合，再將全船拆卸，驗其各項機器，而無絲毫弊病，然後將船價交清。蓋一船之價，多則百餘萬，少亦數十萬，不能不慎之又慎也。外國造船，限期遲者二十一個月，至速須九個月。日本近在英廠定造鐵艦，英使歐格訥告總理衙門，謂須一二年造成，此其明證。西洋購船，均須定造，廠船無製造現成者；倘一有之，必非上等船，或配製不如式，別國所退，或係舊船改造

。如日本之龍驤、筑紫二艦，本英之舊船，其艦則美之舊船，皆但取價廉，不能適用。今中國既費二百數十萬金，不向外洋定造，而僅買現成之三艦，非朝廷爲龔照璦所欺，即龔照璦受洋人之愚耳。中國出使大臣，向以購買船砲爲利藪。前使臣李鳳苞定造濟遠等艦，與洋員金楷理朋比爲奸，侵蝕至百萬上下。濟遠原價三十萬，報銷六十萬。前參贊舒文等致總理衙門章京信函，曾經進呈御覽，可覆按也。龔照璦之船學，不如李鳳苞，而操守未必勝於李鳳苞。爲今之計，如能不添購快船，騰出鉅款二百萬充餉，自是上策。設李鴻章堅持添船之議，惟有請旨飭下龔照璦，不准訂購現成之船，或令電商許景澄，於各國師船圖表中詳細考求，酌定船式砲位，依法製造。艦造成之後，器具一切與原圖不符，或浮開價值，即將該大臣從重治罪。如此嚴旨中儆，庶龔照璦知所畏忌，師船不致無用，而帑項亦不敢虛糜矣。臣所以欲令龔照璦電商許景澄者，蓋當濟遠諸艦回華時，許景澄曾與安徽知府王詠寬，悉心講求，譯成師船圖表，其船學必非龔照璦所能及也。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三、李鴻章之獲譴（註四）

當平壤黃海敗耗傳播之時，責言繁興，羣劾李鴻章貽誤戎機。清廷於八月十八日諭譴鴻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懲。據是日翁同龢日記記此事之經過云：「辰初，上（指光緒帝）至書房，發看昨日三電。戊刻一電，則平壤告不能守，云敵在高山架砲俯擊，人馬糜爛也。旋至樞曹，會看事件。高陽（李鴻藻）抗論，謂合肥（李鴻章）有心貽誤。南皮（張之洞）與爭，衆不謂然。余（同龢自謂）左右其間曰：高陽正論，合肥事事落後，不得謂非貽誤。乃定議兩層：一、嚴議；一、拔三眼花翎，褫黃馬褂，恭候擇定。寫奏片，午正一刻遞，未初二刻發下，李鴻章處分；用拔去花翎，褫黃馬褂一道。遂散。」據此，則李鴻章之獲譴，翁同龢、李鴻藻實力主之也。上諭曰：倭人渝盟聲震，迫脅朝鮮，韓廷眷念藩封，與師致討，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統師干，統籌全局，是其專責，乃未見迅赴戎機，以致日久無功，殊負委任。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薄懲。該大臣務當力圖振作，督催各路將領，實力追剿，以贖前愆，欽此。

四、鴻章之自辯（註五）

奏爲軍情益急臣力難支據實瀝陳仰祈聖鑒事：竊倭人起傾國之兵，進陷平壤，危急萬分。前據葉志超疊次來電，均轉電總理衙門代奏。現接義州來電，安州以北電線亦斷，葉志超自十五日以後並無續電。風聞平壤業已不守，其派護銘軍赴大東溝之海軍各艦，於十八日在大鹿島洋面與倭船黑戰三時之久，互有沉毀，亦經轉電奏聞。並據各國探報，倭人將以大股圖犯北京；又云：謀襲瀋陽。現值水陸兩軍新有挫失，兇鋒日張，臣督率無方，罪戾叢積，謗議咎責，實無可辭。至此事本末及統籌全局情形，有不敢不披瀝直陳於聖主之前者。方倭事初起，中外論者，皆輕視東洋小國，以爲不足深憂；而臣久歷患難，略知時務，夙夜焦思，實慮兵連禍結，一發難收。蓋稔知倭之蓄謀與中國爲難，已非一日，審度彼此利鈍，尤不敢掉以輕心。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礮，陸戰惟恃槍礮，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倭人於近十年來，一意治兵，專師西法，傾其國帑，購製船械，愈出愈精。中國限於財力，拘於部議，未能撒手舉辦，遂覺稍形見絀。海軍快礮太少，僅足守口，實難縱令海戰，臣前奏業已陳明。至陸路交鋒，倭人專用新式快槍快砲，精而且多，較中國數年前所購舊式者，尤能靈捷及遠。此次平壤各軍，倭以數倍之衆，佈滿前後，分道猛撲，遂至不支，固由衆寡之不敵，亦由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也。臣屢電奏前敵兵勢過單，但北洋沿海各要口，關係至重，正議添兵，更無餘力。除盛軍係津沽游擊之師，全隊調往外，復經抽調北塘、蘆臺、山海關、旅順各防隊，已覺處處空虛。昨又撥調大連灣銘軍四千人，移緩就急，實萬不得已之舉。至招募新營，必須數月精練，徵調外省，多屬零星湊集，又難剋期到防。且有兵尤須有械，舊儲鎗械，本屬無多，開戰後設法購運，來華尙需時日，此皆非倉猝所能集事者也。臣忝司軍旅三十餘年，從前勦辦髮捻，薄奏微效；然皆內地賊匪，與外洋情勢迥殊。數月以來，朝作夜思，寢食俱廢，迄無起色，焦憤莫名。仰荷聖慈，不加重論，僅予薄責，策勵將來，感激涕零，罔知所報。際此時艱方亟，斷不敢自請罷斥，致蹈規避之嫌；惟衰病之軀，智力短淺，精神困憊，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自知不逮，若不熟思審處，據實陳明，及至貽誤事機，百死詎足塞責？伏願聖明在上，主持大計，不存輕敵之心，責令諸臣，多籌巨餉，多練精兵，內外同心，南北合勢，全力專注，持之以久，而不責旦夕之功，庶不墮彼速戰速決之詭計。故就日前事務而論，惟有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瀋陽，以顧東省之根本；然後厚集兵力，再圖大舉，以爲規復朝鮮之地。奉天地廣兵單，與臣處相距過遠，且爲將軍及練兵

大臣駐紮處所，一切調度，未便遙制，應請特簡重臣督辦，以便調遣，而專責成。北洋海軍尚有定遠、鎮遠兩鐵艦，輔以快船蚊雷各艇，與陸路砲臺聲勢相倚。各口守臺弁勇，均係訓練有素，合以新募各營，扼要填紮。倭人若以大股來犯，臣當督率各將領，奮力迎擊，斷不敢稍有疏虞，上勞宸慮。至臣前奏所請撥發餉項，一切募軍購械，及水陸轉運各事，支發浩繁，年內外亟須接濟。屆時或請撥部款，或酌借洋債，再行奏明請旨遵行。

註一：參照「東方兵事紀略」，頁一九九—二〇八。

註二：「東華錄」，光緒朝內，頁三四五〇—三四五二。

註三：參照「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頁一二三—一二七。

註四：參照「翁文恭公日記」，(戊)，頁六七；東華錄，光緒朝內，頁三四三九。

註五：「清季外交史料」，(二)，卷九十五，頁五四一—五四二，(原頁二二—二四)，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十九日(九月十八日) 美公使報告光緒帝與京官不惟不助李鴻章抗敵，反與之為難。

美公使報告：「光緒與京官不惟不集中力量，助鴻章戰，而反與之為難，乃最忌之事。若鴻章去，則無人為繼。鴻章為僅有之政治家，尚能以較現代化之海陸軍與日本相抗，若鴻章稍有不遜，則漢人中之反滿者，將藉口起事。」(註一)

註一：美使報告，(Vol. 46 1848-1920)國務院檔。

二十二日(九月二十一日) 海關總稅司赫德對記者稱，中國宜長期抗戰，並贊中國人之勤勞聰慧。

赫德對記者發表談話謂：「中國若進行長期戰，日本必不支。世界各國資本家，請為中國建鐵路遭拒絕，向各國借款以自建，中國亦不願。中國人之心願借短期款而付高利，不願借長期而付低利，然中

國人之耐勞吃苦聰慧勇敢，仍爲最可欽佩之民族。」

註一：「字林西報」，頁五〇，一八九四年九月二一日。

二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 清慈禧太后召見翁同龢、李鴻藻商和議，命翁往天津詢李鴻章能否商請俄使相助，或責李貽誤，此後作何收束。

太后遣翁同龢赴天津見李鴻章，令向俄使詢問有無調停之意，翁以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爲舉世唾罵，但願傳旨責鴻章貽誤之罪，太后勒令前往，限期返京。（註一）

按：甲午之役，中國外交，以聯俄鑄成大錯。聯俄固爲李鴻章之外交政策，而慈禧亦爲聯俄之有力人物。

方戰事進行之際，李氏與俄使喀西尼（Count Cassini）之關係，迄未斷絕，李氏于七月十三日，曾致總理衙門一電云：

「傾俄略使遣巴參贊，持其國家訓條，謂此語須秘密。譯云：朝鮮之事，俄國已有激而起，毫無自利之心，惟有確照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即光緒十二年，拉德仁在津面訂之約辦理。此約，准喀希尼本月十二日來電，李中堂迄今依然承認。即將此意密向中國政府聲明，爲要等語。查拉署使前訂節略，密致總署在案。現朝鮮局勢大變，若能照前樣辦理，於國體舊制尙無大損。看來，俄似有動兵逐倭之意。該使謂如何辦法，該國尙未明諭，而大要必不出此。請先代奏。」

（註二）

電中所云節略者，即光緒十二年巨文島事件時，李氏與俄使拉德仁（Ladysensky）在天津所訂「中國不變更朝鮮政體，俄國亦不侵占朝鮮土地」（註三）之節略。嗣清廷恐因此受俄約束，未簽字，僅由俄方口頭擔保不佔韓國領土。至斯情勢已變，俄方表示願承認此約之有效，以爲置喙韓事地步。觀此，可知俄人之躍躍欲試，在甲午之役，可謂始終如一，總理衙門曾將鴻章此電入奉。迨平壤、大東溝陸海軍相繼敗衄，慈禧遂思與俄尋此舊盟，以制日本，因有本日遣翁氏至津晤李氏探詢俄事之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八月二十八日

據翁同龢日記云：

「八月二十八日：傳慶親王、軍機、翁某、李某，凡三起，在頤年殿東暖閣見起，遂至河沿朝房敬候。申初，慶邸入二刻，軍機一刻。余（同龢自謂）與李公（鴻藻）同入，皇太后上同坐，跪安畢，首言倭事。臣等即言：『平壤既棄，義州已危，鴨綠一水，不過里許，江西無險；若長驅平進，北距與京六百餘里，水陸在焉。雖南面有山，恐兵少難扼。』次及淮軍不振並糧械無繼種種貽誤狀。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此不可書廷寄發電報者也。』臣問：『何事？』曰：『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條同保朝鮮語，今喀使將回津，李某能設法否？』臣對：『此舉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債，將何界之？且臣於此等始末未聞，乞別遣！』叩頭辭者再，不允。最後諭曰：『吾非欲議和也，欲暫緩兵耳。汝既不欲傳此語，則徑宣旨，責李某何以貽誤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後作何收束？且退輟者，淮軍也，李某能置不問乎？』臣敬對曰：『若然，敢不承。』則又諭曰：『傾所言，作為汝意，從容詢之。』臣又對曰：『此節以有李某覆詞，臣為傳述，不加論斷。臣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也。』允之。既又諭：『明日即行，往返不得過七日。』遂退。」（註四）

翁氏旋輕裝至天津，晤鴻章，傳慈福意，其日記記其事云：

「入督署，見李鴻章，傳皇太后皇上諭慰勉，即嚴責之。鴻章惶恐引咎曰：『緩不濟急，寡不敵衆，此八字無可辭。』後責以水陸各軍敗衄情狀，則『唯，唯』而已。余復曰：『陪都重地，陵寢所在，設有震驚，奈何？』則對曰：『奉天兵實不足恃，又鞭長莫及，此事真無把握。』議論反覆數百言，對如前。適接廷寄一道，寄北洋及余云：『聞喀希尼三四日到津，李某如與晤面，可將詳細情形告翁某，回京覆奏』云云。余曰：『出京時，曾奉慈諭，現在斷不講和，亦無可講和；略使既有前說，亦不決絕。今不必顧忌，據實回奏。』李云：『略以病未來，其國參贊巴維福先來云：俄廷深忌倭占朝鮮，中國若守十二年所議之約，俄亦不改前意。第聞中國議論參

差，故竟中止。若能發一專使與商，則中俄之交固，必出爲講說」云云。又云：『喀與外部侍郎不協，故喀無權。』余曰：『回京必照此覆奏。余未到譯署，且此事未知利害所在，故不加論斷。且俄連而英起，奈何？』李云：『無慮也，必能保俄不占東三省』云云。」（註五）

翁晤李既畢，乃于九月初六日返京覆命，據是日翁日記云：

「在儀鸞門跪安，入至書房，述所聞見。遂詣樞直，始與恭邸（指奕訢）相見。旋聞皇太后召見，遂西至河邊朝房待。午初入見於儀鸞殿，皇上亦在坐。詳述情形，並力言：『喀事恐不足恃，以後由北洋奏辦，臣不與聞。』二刻退，汗流沾衣。」（註六）

觀此數則日記，可見慈禧之傾向和議，且期望俄國甚殷；而李鴻章所謂「必能保俄不占東三省」，信俄尤深，固已墜下中俄密約之伏機。至翁同龢之畏葸，不敢與聞俄事，非真知俄之不可親，特恐參與和議而遭輿論之指責！所謂領袖清議者，大率如此。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四)，頁七〇三五—七〇三六。

註二：「李文忠公全集」(四)，頁四六五。

註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民國二十一年，天津大公報館出版部，頁一三〇。

註四：「翁文恭公日記」(四)，頁七〇三四—七〇三六。

註五：同註四，頁七〇三八—七〇三九。

註六：同註四，頁七〇四三。

九月

孫先生文之「上李鴻章書」刊載於上海萬國公報。(註一)

萬國公報係廣學會所出版之月刊，廣學會係上海基督教傳教士之組織，以推動維新思想爲宗旨。先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九月

是同治七年（一八六七），美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英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首創「教會新聞」週刊於上海，報導各地宗教之活動。三百期後，易名萬國公報（Chinese Globe Magazine），每月發行，兼論政情，由林樂知任主筆，美人丁健良（W. A. P. Martin）、李佳白（Gilbert Reid）、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德人化之安（Ernst）等助之。光緒十一年（一八七六），復增刊「益智新錄」（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介紹西方科學為志趣。光緒三年（一八七七），英教士楊格非（G. John）在滬講演，認為西洋文化如政治、文學、哲學等，均為基督教之產物，華人非師法西洋不足以圖強。中法戰後，中國國勢日危，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上海耶穌教士乃組織廣學會以為維新之鼓吹。由英國蘇格蘭長老會教士韋廉臣（A. Williamson）任會長，除繼續發行「萬國公報」、「益智新錄」外，以翻譯編印有關西方政治歷史書籍，以推動維新運動為宗旨。至是刊載孫先生文上李鴻章書於「萬國公報」第六九、七十兩號，以廣傳佈。

註一：羅家倫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五九。

孫先生文第三次赴檀香山。

中日戰爭爆發後，孫先生以為有機可乘，乃再赴檀島。（註一）携農桑會籌款護照前往。（註二）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

註二：見「三民主義半月刊」，第五卷第二期，陸丹林考證。

一日（九月二十九日）清廷起用恭親王奕訢，命在內廷行走，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

恭親王奕訢自咸豐辛酉（一八六二）政變之後，主持總理衙門，領導自強運動，實為當時滿洲親貴中之較有頭腦者。以權重望高，為慈禧所不喜，久思排之以去。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奕訢復忤旨，遂

藉口中法越南交涉失策，突訴久居政府，因循誤公，開去一切差使，改以慶親王奕劻管理總理衙門事務。十年以來，以貪庸無能之奕劻，主持繁瑣艱鉅之外交。固寵保榮，惟以委蛇因循爲能事。迨甲午戰作，軍事外交千頭萬緒，起用奕劻之呼聲因之而起。八月杪，禮部左侍郎李文田等首先聯銜奏請起用奕劻。八月二十八日，摺發軍機處，樞臣當日合詞奏請起用。奏曰：

「臣等伏思，恭親王勳望夙隆，曾膺鉅任，前經獲咎，恩准養病。際此軍務口急，大局可憂，恭親王懿親重臣，豈得置身事外？李文田等所奏各節，不爲無見。謹合詞籲懇天恩，可否恭請懿旨，將恭親王量予應用之處，伏候聖裁。」（註一）

奏上，未初，傳軍機入見，翁同龢、李鴻藻復加面請。翁同龢日記記其事曰：

「與李公合詞籲請派恭親王差使，上執意不同，雖不甚怒，而詞氣決絕，凡數十言，皆如水沃石。」（註二）旋德宗卒以時事所迫，不得已而用之。故本日上諭曰：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日召見恭親王奕訢，見王病體雖未痊癒，精神尚未見衰，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欽此。」（註三）

同日復諭曰：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著在內廷行走，欽此。」（註四）明日再諭曰：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奕訢，病體尚未痊癒，步履未能如常，加恩免其常行入直，遇有應奏事件，呈遞臚牌，一切祭祀差使，毋庸開列。昨派內廷行走，著免其隨扈，以示體恤，欽此。」（註五）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頁三一—一六。

註二：「翁文恭公日記」四，頁七〇—七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九月一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九月七日

一五〇

註三：同註一，頁三一—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頁三一—一——三一—二。

七日（十月五日）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編修張謇等三十五人聯名參劾李鴻章。

中國海陸軍既敗於日本，京中羣言繁興，謗書紛紛，紛謂李鴻章昏庸誤國，其指鴻章媚日賣國。本日，翰林院三十五名翰林聯名摺參李鴻章，其奏曰：

「奏爲特參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大臣請旨罷斥恭摺仰祈聖鑒事：伏惟倭人肇釁，變亂藩封，恭讀七月初一日宣戰詔書，仰見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仁至義盡，薄海同欽。乃者兩月以來，事機屢變，債軍失地，警報疊聞，朝野震驚，人心岌岌。恭讀八月二十六日皇太后懿旨，以下戈未戢，停辦頤和園典禮，深宮焦勞之意，感動中外，普天率土，切齒同仇。而禍變之從來，事機之貽誤，始終本末可得而言，敢爲我皇上披瀝陳之：竊聞倭人國勢兵力，不能與西洋各國同日而語。國債重而民力困，則根本未堅也；有快船而無巨艦，則武備不足也；兵出於猝募，非訓練之師也；權紛於黨論，非畫一之政也。兵事之興，凡曾經戰陣之士，通達夷情之人，莫不以爲螳臂當車，應時立碎，雖西人亦鑿鑿言之。而事竟有大謬不然者，漢城失矣，未幾復敗於牙山；仁川棄矣，未幾復潰於平壤。漢江之沉艦不歸，鹿島之戰船復燬。威旅爲海疆鎖鑰，今則游弋不禁矣；義州爲奉天屏蔽，今則藩籬盡撤矣。用一衛汝貴，而百戰之淮軍化爲敗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枝之鐵甲盡屬漏舟。朝鮮不可復，方且急圖門、鴨綠之防；仁川不可窺，方且憂大沽、北塘之警。誰總師干？誰可進止？以大禦小，以強敵弱，潰敗決裂，一至於此！此不能不太息痛恨於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也。李鴻章受命東援，而陰勸諸將，密爲箝制，既故不爲先事之防，復屢掣其臨時之肘，統計其小浦之戰，牙山之戰，平壤之戰，鹿島之戰，均我軍端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圍攻。其實決不能以此望和，而事機一失，徒以損國威而張敵勢。倭人惟事事先發，故能制我軍之死命；我惟事事後發，故始終爲倭人所制。遷延坐誤，全局瓦解。此天下太息痛恨者一也。兵行千里，轉運爲先，內地尚設糧臺，何況出師疆外？至與外洋各國相

角，尤以槍砲爲急需。李鴻章更歷兵事，三十餘年，豈其慮不及此？而牙山之軍缺軍火缺糧餉於前，平壤之軍缺軍火缺糧餉於後。長夫不備，車馱無資，兵自負糧，槍無餘彈；以致饑軍掠食，結怨韓民，戰士死綏，徒手相搏。以二十年朝廷所注意海內所仰望之重軍，徒以無糧無械，束手就斃，皆李鴻章信任私人，不肯設糧臺之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二也。倭人甘心韓地，誓志有年。今歲春初，萌芽已露，北洋於外事消息最靈，豈竟一無聞見？及乎事之將起，袁世凱深悉倭情，屢騰密報，若使倭韓形勢早達朝廷，則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無如李鴻章始則模糊影響，諱莫如深；繼則揚厲鋪張，肆其恫喝。直至事機決裂，而倭人陰謀之本末，疆臣知之，朝廷仍不盡知。聞朝旨召詢袁世凱，而李鴻章展轉禁錮，不使至京。代呈各路電奏，時時刪改，以就該督意旨。務使真實詳情，不得上聞，廟算指揮，無憑遙度，奸欺蒙蔽，罪不勝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三也。比年以來，天下之利權，李鴻章縮之；天下之兵權，亦李鴻章主之，朝廷倚李鴻章爲長城，李鴻章廣蓄私人，以欺罔朝廷。盛宣懷爲耳目，張士珩爲腹心。丁汝昌、衛汝貴爲爪牙，龔照璥、劉含芳爲羽翼。此數人者，皆天下所姗笑指目，而李鴻章以之分布於海關、糧臺、電報、軍械，各關係軍國重要之區。窟穴深固，牢不可破。平時病民蠹國，事皆墮壞於冥冥之中；暨乎有事之秋，譸張爲幻，不惟助李鴻章以欺罔朝廷，抑且賣李鴻章以邀利；而有所不恤。而李鴻章方且卵翼之，濡沫之，爲之仇詆言官，變亂黑白。甚至奉命撤退之丁汝昌，而抗不遵旨，坐使數千里藩封，斷送於三五小人之手。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四也。尤有甚者，倭米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謀被獲，或明縱則私放。外有海光寺傍居民王姓，經天津縣獲究，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經方，爲之說情。倭奸石川氏，及軍械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經方及軍械所局員，而某觀察述李鴻章之意，勒令天津縣李振鵬改供，爲李振鵬駁斥而止。臺灣拿獲倭船，又爲之請旨釋放，軍械所歷年所儲槍砲，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猶檢出不合用之前膛槍子，賣與日本，得銀十四萬兩，局員朋分，而李鴻章爲之補給領字。外間並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李經方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以致李鴻章利令智昏，爲倭牽鼻，聞敗則喜，聞勝則憂，雖道路之言，而高口流傳，豈得無故？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五也。綜論此次敗剿之故，由海軍之不得力，而海軍則丁汝昌主之。從前避倭不敢當敵，及至渡送銘軍，倉卒接戰，而致遠船衝鋒獨進，無一繼繼之者，則丁汝昌之督率爲有方乎？斬先逃之

濟遠管帶，而獨寬統帥之罰，則於法爲未平，海軍之氣，竊恐斷不能振。陸軍之敗，由衛汝貴望風先逃，而葉志超繼之。聞先敗之數口，左寶貴密電，有如撤回衛汝貴一軍，則諸軍尚可致死，否則同歸於盡之語。蓋以衛軍處遼韓民，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以致韓人視我如仇，大軍無所得食。軍敗之頃，衛汝貴父子，伏叢葦中，幾爲其下所殺，皆平時剋扣糧餉，虐遇軍士所致。種種罪狀，罄竹難書。然而天下之人知朝廷必不能誅此兩人也。李鴻章一日不去北洋，則兩巨奸者一日不能伏法，三軍之氣一日不能振作，潰敗之局一口不能挽回。何也？三軍之氣，視統帥之賞罰爲鼓舞。如海軍，劉步蟾被劾，而李鴻章反使護水師提督；林國祥力戰船沉，而李鴻章反請暫行褫革；甚且以首先潰退貽誤大局之衛汝貴，而李鴻章以爲得力。種種顛倒功罪，務使敢戰之士，人人氣沮，如此三軍之衆有不解體者乎？倭主出居廣島，親自督師，八月初間，即聞有限二十日取平壤之說，而平壤果於十六日失守。今又聞以四禮拜取奉天矣，又聞限九月內破津沽。至敵兵號稱九萬，大舉入寇朝鮮不已，進而盛京津沽不已。則京師重地，所必窺伺，我戰守之備，一無足恃，而專委命一昏庸驕蹇喪心誤國之李鴻章，如此而謂陵寢之必無動，京師之必無警，誰能保之？軍事起初之時，若宋慶，若劉永福，皆忠勇奮發，請赴前敵，而皆阻於李鴻章之壅遏；即淮軍之聶士成，津人之曹克忠，號稱能戰，於諸將中爲優，而李鴻章必黨其私人，以遏抑之。頃聞命宋慶節制前敵諸軍矣，若仍以李鴻章爲後路，恐逞其妒忌之心，行其阻撓之計，文書之呼應不靈，餉械之接濟多缺，平壤覆轍，可爲寒心。天下士民公論，謂李鴻章如不以嚴譴去津，則天下之精兵猛將，必不能得其死力，以挽回既潰之大局。故李鴻章一人之法留，實於宗社安危，民生休戚，大有關係。伏維皇上乾斷，立賜施行。若再囿於庸議，遷就遲誤，則士氣仍前畏葸，而奉天之震動，威旅之不守，皆在意中。萬一陪都有失，近畿告警，變起倉卒，雖食李鴻章之肉，於事奚裨？且恐以罪人不去之故，致朝廷口下急詔，而天下之心，觀望不前，有非臣子所忍言者。此所以同聲痛憤而不得泣陳於我皇上之前者也。如蒙皇上採擇獨言，斷以行之，諸量簡知兵重臣，老成宿望者，星夜往代，速籌戰備。臣等非不知臨敵易帥，兵家所忌；但以李鴻章怙私縱敵，後患孔長，斷難再事姑容，坐使大局糜爛。再本日外間傳聞李鴻章與日本私議，有願棄朝鮮，割臺灣，並賠兵費數千萬，以求和之說。果爾，則棄祖宗之疆宇，竭中國之脂膏，土崩瓦解，可立而待。此雖道路之言，未爲實據，而推李鴻章之居心行事，有不如此之悖謬而不可已者。伏乞

皇上將李鴻章迅賜罷斥，宗社可安，軍氣可振，東藩亦可冀恢復。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註一）

北京紳民奏請速戰。

本日，京官及紳民多人亦同時聯名奏請速戰，勿輕許和，其奏曰：

「近聞日本背約犯順，奪我朝鮮。朝鮮者，我太宗文皇帝艱難底定之藩國也。委身歸命近三百年，列聖相承，以全付於我皇上，豈忍一旦委而棄之？況盛京陵寢重地，屏蔽一撤，在在可危，又非越南緬甸遠在數千里外者可比。故朝鮮之於中國，勢比唇齒，而親同骨肉；今日之事，雖愚懦之人，皆知朝鮮不可棄也。方日煽誘朝鮮亂黨，借名進兵，本屬處心積慮；今且擄脅國王，占據王京，傷我援師船隻，種種違約生靈，猖獗異常。此真天討所必誅，而我率土臣民之所共憤也。皇上天威震怒，前令督臣李鴻章派將東援，近復添益宋、左諸軍，仰惟廟算指揮，豈徒垂亡之朝鮮得有生機，實爲我國家發憤自強懾服海外諸夷之大關鍵。日本外強中乾，兵力財力，舉不足恃，天下所共聞知。今特窺我無必戰之心，而先發以懾我，若不大加懲創，將竟以中國爲無能爲，而歐洲各國亦起而輕中國矣。今日之事，以大舉討逆爲一定不易之策，薄海瞻仰，在此一舉。謹瀝抒管見五條，爲我皇上敬陳之：

一、我軍久頓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敵人得手，肆虐藩畿。李鴻章調度乖方，請旨嚴予處分，即飭其帶罪自効，即日親統大軍，進駐威海，嚴督前派渡海諸軍，約期進戰，攻復漢陽，不得逗留退縮，遠次數百里外，虛爲聲援，自干重戾。一面督飭歷年精練之海軍戰船，進攻仁川口敵艦，以壯聲威。

一、北洋大軍渡海，兵力空虛，請諭飭前撫臣劉錦棠，簡練得力湘軍二三十營，即日帶赴天津，以替代東援淮軍爲名，陰以拱衛京師重地。伏維咸豐庚申之事，至今寒心，近年主和議者，率以前事恫喝朝廷，巧隳戰局，而棄土地，賠兵費，一切虧體辱國之事，得以徑行。今若根本重地鞏固不搖，則壹意進兵，無內顧之慮，即軍事偶有挫衄，亦不至震動大局矣。事定之後，請即以渡海淮軍，駐紮朝鮮保護；而此隊湘軍，留防北洋，以劑湘淮之平，革偏重之勢。

一、朝鮮國王已被擄脅，請明詔立其世子爲王，示天下以興復大義，即令其駐我軍中，以免不虞。萬不可信敵人狡

詐之辭，以送還朝鮮國王，要我退兵，以致重受欺給，事機愈鈍。

一、敵人見我注意朝鮮，難保不分兵內犯，以牽制我東援之師，請飭下南北洋各海口，望見敵船駛近，即行轟擊，不得觀望和局，致誤事機，蹈馬江之覆轍。其臺灣一省，尤爲吃緊，請特簡歷練兵事之疆臣，許以便宜，扼要佈置，並調著名勇練之將，協同防守，以銷敵人窺伺之萌。

一、大學援師，餉源宜裕，請皇上明詔天下，減省服御，發內帑以犒軍，並暫移今年萬壽慶典備用之款，以佐軍興，庶以激勵東征將士之心，振興海內臣民踴躍輸將之氣。

以上五條，管窺愚慮所及，伏乞皇上採擇施行。抑更有慮者，軍事遲速，難以預期。自古用兵之主，往往勇於始事，而後漸生厭倦之心；伏願皇上，審明利害，始終堅定，毋以小挫而震於敵人恫喝之虛聲，毋至功半而惑於與國調停之謬說。日前法越之事，我兵事甫經得手，輒徇疆臣意，遽准法人和議，海內惜之。今敵人兵力財力，遠不如法，而專務豕突以求逞；如服狂藥，力盡自憊，所謂疾風暴雨不俟終朝者也。我但通籌戰守之策，靜以御之，則彼將有不支之勢。竊料敵人兵力，如與我悉力相持，必不能至四五月之久。此次與我構釁，聞彼國商人悉皆不顧。今斷其各口通商，至四五月之久，則彼上下之心必離，而軍情不固矣。俟彼勢窮力屈，求和於我，則一切就我範圍。從此改定前約，可以盡收保護朝鮮之權，所謂一勞永逸者也。若我不能待，而輕於許和，則必牽就於他國調停之說，所虧者必多。緣歐洲大邦之覬覦中土者，不止一國，專視一國要求之得失，以爲動靜；故於調停中外之事，無不抑中國以伸外國，勢使然也。今英俄如爲中日議和，不日賠日兵費，即曰中國割朝鮮東南之地以與日。不逾年而英人之索西藏，俄人之據外蒙古，皆此例矣。伏惟皇上明燭萬里，斷以行之，今創一實不足畏之日本以立威，則各國咸知震懾。國事幸甚！天下幸甚！伏乞聖鑒，謹奏。」（註二）

註一：「甲午中日戰輯」，頁三〇一—三〇五。

註二：錄自「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一四四—一四七。

十三日（十月十五日） 日本宣佈有條件停戰。

本日，日本宣佈除朝鮮獨立及賠償軍費外，日本不停戰。（註一）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七），頁七〇四七。

十四日（十月十二日） 李鴻章晤俄使喀西尼，請調處中日戰爭。

先是，本月十二日，英使歐格訥至津晤鴻章，勸中國早日議和，其時鴻章正與俄接洽，使之出頭干涉，故對英使之溫和辦法不甚注意。本日俄使喀西尼自烟台至天津，與鴻章談中日兵事，鴻章先責其無信，謂「從前拉署使及貴大臣屢次來稱，俄斷不許他國占朝鮮，今日人盡據朝鮮，俄袖手旁觀，是從前盡在誑我。」喀云：「日侵俄，俄必應戰，否則暫守局外中立，如中日議和後，日仍居朝鮮，俄必不能坐視。」蓋俄國尙有待而發，並非冷淡，然在鴻章可謂失望。茲錄本日鴻章與喀西尼問答如次：

「光緒二十年九月十四日上午十點鐘俄使喀希尼帶同參贊巴福祿來見，寒暄畢，喀云：歐洲近多霍亂之證，比得堡居民死得甚衆。李云：歐洲患霍亂，東方患倭亂，各害各禍，其證相似。從前拉署使德仁暨貴大臣巴參贊，屢次來稱，俄國斷不許他國占據朝鮮土地。現倭已盡據韓地，俄人袖手旁觀，是從前所說，盡屬誑我之虛談。喀云：俄國政府尙未明言作何主意。現值中日用兵之際，局面未定；如中日和議成後，倭久踞韓，俄國必照前議，出來干預，目前宜暫守局外之例。李云：聞倭派兵四千，由溫貴灣至土門江一帶附近地方，將侵俄界，俄豈能坐視耶？喀云：此係傳聞之詞，尙無確報，想倭人必不敢輕犯俄境。且倭之踞韓，不過暫時之計，議和時，各國自有公論。李云：我接韓王及大院君密函，皆謂倭人逼令改用日本衣服正朔，內外官員，任意更換，非占踞而何？倭人奸誘非常，各國公使誤信其不據韓地之說，盡爲所愚，將來彼必不顧公論。喀云：日本係一島國，如踞朝鮮，必當遣重兵戍守，本國必至空虛，視其力量不能久踞。李云：倭之踞韓，已如法之踞越，將來必與中俄兩國權利有礙。喀云：或謂中東有商議停戰之說，據我看來；日本欲窺犯北京，係虛詞恫喝，日下尙無動作。轉瞬卽屆凍河，卽不約停戰，亦必停也。李云：歐洲向來戰事兩國有議停戰者，有何章程？如何辦法？喀云：所謂停戰者，兩國約明，各軍現紮之地，按兵不動，或由兩國自議，或由他國調停，限四五禮拜或一兩月，如屆期和議無成，再行開仗。未審中國有

意議和否？李云：從前貴大臣巴參贊所說之話，皆經我電達總署代奏。今俄國不照前議，我等殊爲疑託，和議似難遽成。喀云：今昔時勢已殊，俄暫難擡越，亦無可如何。倭人以爲水陸之戰，皆甚得手。現時如與議和，中國已須吃虧；然如不趁此了結，將來倭兵再進一步，貪心更大，和局更難。李云：議和亦看條款如何，如吃大虧，不若久戰。卽如停戰一節，喀大人現擬如何商辦？喀云：我係駐京各國公使領袖，擬到京後，與英法德意等使商明，電知本國政府，電令駐紮東京各使，與日本外部商辦。李云：除英國外，其餘各國不甚關切。此事如卽由喀大人電請貴國政府，電令東京俄使，與日本外部商辦，更爲直截。喀云：與各國有約在先，仍應會同商辦，不便獨辦。李云：既與各使會商，卽請喀大人迅速進京；往謁恭邸時，請暢談，與我接談無異。喀云：明晚擬卽起程進京，恭邸雖未見過，素聞大名，極願調談，遂別去。」（註一）

同日，鴻章專函恭親王奕訢，報告與英俄兩使晤談之經過，函曰：

「王爺殿下，敬密覆者：前奉九月初六日鈞示，謹聆一切。喀使因病在烟調理，屢詢巴參贊，謂少愈卽來。適英使歐格訥於十二日到津，是夕過晤，略稱：該國外部以中日戰事，未便持久，兩有傷損，屬相機解勸。已電駐日英使，探詢倭政府，尙未接覆。先以私意詢鴻章如何辦法。告以事已至此，只有一意主戰。歐謂：恐無把握，不如早日議和。歐問：當如何和法？告以汝既係居間好意，據鴻一人私見，惟先勸兩國停戰，再議朝鮮善後事宜。歐謂：此又如從前先令撤兵再議朝鮮辦法，事必無成。今要講和，非允賠兵費不可。鴻謂：與其賠兵費，不如留此費以用兵，斷難依允。歐謂：兩國戰久，不但兩國傷人傷財，亦於各國商務有礙，且看各國主意若何。但可從旁勸說，未使用力強壓。語罷遂去。昨喀使到津，今午來見。迭詢以從前貴國屢言不准他國占據朝鮮土地，今日日本竟全占韓境，貴國應如何辦理？且聞倭分兵四千，由元山至溫貴、土們江一帶，將侵俄界，俄豈坐視？喀謂：久未接俄廷電信，因噶爾斯及外部侍郎患病，似將此事擱起。東海濱總督亦無電至，倭兵東侵，或傳聞未確。揣俄國之意，現當中日用兵之際，朝鮮尙未定局，未便擡越。如倭侵我界，俄兵必力堵剿；否則，暫守局外。如中日議和以後，日人仍久踞朝鮮，俄廷必有辦法，不容伊獨自占據。惟中日戰爭不已，傷損必多，終必議和，不若乘此敵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戰之法。我係駐京各使領袖，明後日進京，當與各使會商。歐使在烟時已曾商及，但日本既肯停戰，必速求議和

，或由兩國自議，或令各國公議，恐要中國吃虧。却未明言要賠兵費。鴻云：若吃虧太多，中必難允。略謂：久仰恭邸名望，此去謁晤，容我盡言，爲幸。鴻云：恭邸閱歷甚深，各國無不佩服，如爾所言當理，不至拒而弗納。所有問答，據實撮要，另摺呈覽。前奉初一日密諭一道，緣事無就緒，未敢瀆奏，可否於奏對時，密爲轉陳。專肅密覆，祇叩鈞福。」（註一）

據此函，可見英俄又復從中調停，京中之和議空氣，因之而濃。英使歐格訥返京後，翌日至總理衙門，晤恭親王奕訢，議由各國保護朝鮮，中國賠償日本兵費。翁同龢日記記其事曰：

「（九月十六日）詣樞曹，始知昨日英使歐格訥到署議各國保護事，限即日定議，飛促恭邸到署，議至亥正散。日本索兵費，至是發露矣！邸既入此言，孫（毓汶）、徐（用儀）洵洵，以爲不如此不能保陪都，護山陵。余與李公（鴻藻）謂：『英使不應如此要挾，何不稱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到，再商。』」午初，恭邸見起，五刻；余與李公同起，二刻五分；軍機起，三刻。余等見皇太后，指陳：『英使可惡，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從，終歸於戰。宜催各路援兵速進，懸爵賞，以勵九連城前敵，催海軍修好六船，嚴扼渤海。』此二條允行。論款事，語極長。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退，再至樞曹，小坐，即散；成均朝房坐，入署；歸而憤慨，求死不得，噫！」（註三）

根據以上所引之資料，可知和議之醞釀，其來有自，然又不卽和者，清議誤國也！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四)，譯署函稿，卷二十，頁五三九。

註二：同註一，頁五三八。

註三：「翁文恭公日記」(七)，頁七〇四九—七〇五〇。

二十四日(十月二十二日) 駐華美使向其本國建議，對調停中日之戰，暫採觀望態度。

美使向本國建議稍待時日，再行調停中日戰事。謂：「此時以中國未全敗，日本不接受，但滿洲政府崩潰，英國爲商業上利益，及懼俄故，必然干涉，俄國爲朝鮮、滿洲之故，亦必然干涉，所以調停是必須的。」（註一）

註一：美使報告，(vol. 46, 1848-1920)。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十月二十四日) 清廷舉行甲午恩科武殿試於北京，錄取武進士一百二十三人，張鳴翥得中式狀元。

本日，賜一甲張鳴翥、杜天麟、岳慶德三人爲武進士及第。二甲王永清等二十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坤濂等一百人，同武進士出身。(註一)

本年之武科，係屬恩科，先於本月十二日，派兵部右侍郎徐樹銘知武舉，以戶部右侍郎陳學棻爲武會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徐致靖爲副考官，舉行武會試(註二)，取中岳慶德等一百二十八名。旋即舉行武殿試，經讀卷官御前大臣奕劻等，校閱中式武舉馬步射技勇完竣，開單進呈，由皇帝親定名次，賜武進士及第，武進士出身，同武進士出身有差。「清史」選舉志其事云：

武科自世祖初元下詔舉行，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如文科制。鄉試以十月，直隸奉天於順天府，各省於布政司，中式者曰武舉人，次年九月，會試於京師，中式者曰武進士，凡鄉會試俱分試內外三場，首場馬射，二場步射，技勇爲外場，三場，策二問，請一篇爲內場，外場考官，順天及會闈，以內大臣大學士都統四人爲之，內場考官順天以翰林官二人，會闈以閣部都察院翰詹堂官二人爲之。同考官順天以科甲出身京員四人，會闈以科甲出身閩科部員四人爲之，會試知武舉，兵部侍郎爲之，各直省以總督巡撫爲監臨主考官，科甲出身。同知知縣四人爲同考官，外場佐以提鎮大員，其餘提調監射監試受卷彈封監門巡綽搜檢供給，俱有定員，大率視文闈減殺，殿試簡朝臣四人爲讀卷官。欽閱騎射技勇，乃試策文，臨軒傳唱狀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初制一甲進士或授副將參將遊擊都司，二三甲進士，授守備署守備，其後一甲一名授一等侍衛，二三名授二等侍衛，二三甲進士授三等及藍翎侍衛衛衛守備有差，凡各省武生綠營兵丁皆得應鄉試。武舉及現任營千把總門衛所千總，年滿千總通曉文義者，皆得應會試，惟年逾六十者不許應試。其後武職會試，以武舉出身者爲限。康熙間欲收文武兼備之材，嘗許文生員應武鄉試，文學人應武會試，頗滋場屋之弊。乾隆七年以御史陳大珩言，停文武互試例，考試初制，首場馬箭射麇毬，二場步箭射布侯，均發九矢，馬射中二，步射中三爲合式，再開刀舞刀撥石試技勇。順治十七年停試技勇，康熙十三年復之，更定馬射樹的距三十五步，中三矢爲合式，不合式不得試二場，步射距八十步，中二矢爲合式，再試以八力十

力十二力之弓，八十斤百斤二百斤之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弓開滿，刀舞花，擲石去地尺，三項能一二者爲合式，不合式不得試三場，合式者即認於類，嗣改印小臂，以杜頂冒。三十二年步射改樹的距五十步，中二矢爲合式，乾隆間復改三十步，射六矢中二爲合式。馬射增地毯，而弓刀石三項，技勇必有一項，係頭號二號者，方准合式，遂爲永制。內場論題向用武經七書，聖祖以其文義駁雜，詔增論語孟子，於是改論題二，首題用論語孟子，次題用孫子吳子。司馬法鄉試中額，康熙二十六年制定，略視各省文闈之半，雍正間小有增減，惟陝甘以人材壯健，弓馬嫺熟，自康熙訖乾隆先後各增中額三十名。咸同間各省輪餉廣額如文闈例。綜計順天中額百十，漢軍四十，奉錦三，江南八十一，福建六十三，浙江四川各六十，陝西五十九，河南五十五，江西廣東甘肅各五十四，山西五十，山東四十八，雲南四十二，廣西三十六，湖北三十五，湖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五，會試中額多或三百名，少亦百名，康熙間內場分南北卷，各中五十名，五十二年始分省取中，臨期以外場合式人數，請旨裁定。嘉慶六年仁宗以科目文武並重，文闈條例綦嚴，防弊周密，步闈考官面定去取尤易滋弊。命比照文闈磨勘例，鄉試題名錄將中式武生馬步射技勇一一詳註進呈，各省交兵部，順天另簡磨勘官覈對，濫中及浮報者，懲不貸，覆試始乾隆時初制從嚴，俾會闈行之，不符者罰停科，考官議處，三次覆試不合式除名，道光十五年始覆試順天武舉如會試例，咸豐七年覆試各省武舉如順天例，然稍從寬典矣，初制外場但有合式一格，其中弓馬優劣，技勇強弱，無所軒輊，內場但憑文取中，致嫺騎射習場藝者，或遭遺棄。康熙五十二年令會試外場擇馬步射技勇人材可觀者，編好字號，密送內場，內場試官先於好字卷內擇文理通曉者取中，不足始於合式卷內選取。雍正二年，從侍郎史貽直言，各省鄉試外場一體別編好字號，嗣於好字號再分雙好單好，內場先中雙好，次中單好，而合式卷往往下餘人，僅中數人，因之內場，槍冒頂替諸弊並作。乾隆二十四年，御史戈濤奏革其弊，於是外場嚴合式之格，內場罷四書論文理，但取粗通者，而文字漸輕。嘉慶十二年鄉會試內場策論。改默寫武經百餘字，無錯誤者爲合式，罷同考官，遂專重騎射技勇，內場爲虛設矣，歷代踵行，莫之或易。（註三）

按：清代考試，文武分科，關於文科考試規定，前已言之，文科所試科目爲硬弓、刀、石、馬步射諸事，如在火器未使用於軍事之時，固亦未可厚非。及至有清中葉，西洋各國軍隊所用之槍炮，攻堅毀遠，效績昭彰，而我國之文科考試，猶復以拉弓、舞刀、擲石、騎射、步射，論其高低，以定取舍，不合時宜，莫此爲甚，要皆墨守成規，有以致之。溯自鴉片戰爭以來，英法聯軍之役，中法之役，我國皆

以武備不修，致遭敗北，於是海禁大開，西洋文明，灌輸我國。軍備、實業、交通等項，多以效法歐美，逐漸改進。即已施行五百餘年之八股取士，亦已漸改制藝而試策論，獨武科仍以落伍之武術，作為掄才之標準，朝廷之頑固，臣工之顛預，實難辭其咎責，議者大加詬病。迨至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內外諸臣，一再籲請變更武科舊制，廢止弓矢刀石，改試槍炮，猶未得獲允准。二十七年（一九〇一）間，始以武科所習硬弓、刀、石、馬步射，無與兵事，予以廢除。清政之腐敗，於此可見矣。

日皇對國會演說謂，中國不全敗，和平無望。

日皇在長崎對國會演說：「日本之所以向中國宣戰，為中國不合作以謀遠東和平之故，若中國不全敗，則和平無望。」日國會通過信任政府，繼續作戰決議。（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〇，頁三一一三（原頁九）。

註二：同前書，卷三四九，頁三一二二（原頁四）。

註三：「清史」，國防研究院印行，卷一〇九，選舉志三，頁一三一六——一三一八。

註四：「字林西報」，頁六八〇，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五日） 日軍第一軍敗宋慶、劉盛休軍，占安東、九連城。日第二軍襲登花園港。

日第一軍主力以大砲掩護，自義州渡鴨綠江，向虎耳山中國陣地總攻，劉盛休軍潰退，聶士成堅守未果，亦繼之。宋慶救援不得利，退鳳凰城，日軍遂入占九連城、安東。豐陞阿等奔岫巖，日軍獲重砲三十四門。另日軍第二軍三萬人，在遼東半島貔子窩登岸，金州、大連守軍徐邦道新募兵五營，總兵趙懷益統六營，副都統連順統一營，共五千人，兵力單薄，不知日軍動向，不敢輕動，實則日兵已襲登花園港矣。東方兵事紀略一書記其事曰：

「方我軍屯平壤時，政府慮諸將孤懸無繼，命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五營自旅順，提督劉盛休以銘軍十二營自大

連濟，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十二營自黑龍江，皆赴東邊九連城，爲諸將後援。師未集，我駐朝鮮諸軍已敗績於平壤，逃亡將士皆奔安州。安州南去平壤百八十里，北倚青川江，南則羣山環繞，爲平壤北第一巨鎮。城垣高大，足資守禦，且爲日兵北犯孔道。過安州西北百六十里至定州，亦稱險要。是時，我軍尙及萬數千衆，日兵踞平壤，兼旬始進；苟我將領簡料軍實，爲死守計，日兵豈得長驅渡江，臨我邊境？乃諸將自平壤北潰，過安州、定州，皆棄不守，奔五百餘里，八月二十二日先後渡鴨綠江，入邊止焉。

鴨綠江界中國朝鮮間，江以北，我之九連城；江以南，韓之義州。兩城隔水相望，實爲中韓孔道。諸軍奔潰入邊，清廷命宋慶總統諸軍，奪葉志超職，逮問衛汝貴。時我軍駐鴨綠江北者，爲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所部鎮邊等軍十二營，總統宋慶所部毅軍九營，聶士成所部蘆榆防軍四營，呂本先、孫顯寅等所部盛軍十八營，（即衛汝貴舊部）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江自巖所部虎字淮勇五營，耿鳳鳴等所部奉軍各營（即左寶貴舊部），豐隆阿、聶桂林所部奉天盛軍練軍十二營，新舊約計七十餘營，兵力甚厚。自依克唐阿一軍以外，諸軍皆歸宋慶節制。宋慶武人，能戰，無調度，非大將材。且諸將驟稟節度，多不悅，故諸軍畢集，仍散漫無紀。於時我軍皆歛屯江北，日兵遂平行至義州，去我渡江時已一月。我將帥仍蹈平壤覆轍，罔及時布置，遂縱日兵飛渡，敵蹤遂不可遏矣。

時我軍以九連城爲扼要。九連城南係鴨綠江，東枕鏗河，渡河而東，有山如蹲虎，號虎山，爲九連城險塞。再東至安平河口。踰河而東，爲蘇甸；再東爲長甸。其九連城以西爲安東縣；再西則爲大東溝，爲鴨江口；再西則大孤山。是時，宋慶駐中路九連城，以聶士成所部守虎山，銘軍等營守江岸。東路則依克唐阿所部，分守安平河口長甸各隘，西路則豐隆阿、聶桂林等，分守安東、大東溝、大孤山諸城邑。是爲我東邊鴨綠江之防。

九月二十二日，日陸兵第一軍，畢集於義州，作欲渡狀，我諸軍嚴防中路九連城江面，而口兵乃潛襲上下游，將以全力萃於中路爲扼吭擣虛計，我諸將竟不察。二十六日，日兵梯隊，由其大佐佐藤彌太郎率之，出東路鴨綠江上游，從安平河口對岸之水口鎮，徒涉而渡，初僅二三十名擊槍探水徐渡，守口依軍見之，舉槍追擊，砲臺亦發砲助威。日兵回擊一排槍，依軍遂紛擾逃潰，砲臺守兵亦委而走。於是日枝隊數百人遂得畢渡。而依軍退入一山溝內，無出路復南旋拾出山溝，日兵攔山口截擊，死者百餘人。依克唐阿乃東北奔寬甸。時正日兵第二軍襲登花園港之日也。

日枝隊既渡東路上游，其義州大隊，遂經虎山對岸，乘夜燒木測量。驤河口有沙淤壅成二小渚，日兵乃藉渚架橋，從南岸越兩小渚至北岸，跨架浮橋三座，終夜而成，而我軍竟不覺。二十七日侵曉，日兵先列砲隊於南岸，隔江轟擊，護其軍渡橋。於是渡者數千人，砲隊繼進，我守岸及守砲臺之銘軍先潰，諸軍從之。倭轟土成所部，尙保虎山不去。日兵環攻虎山，上成兵單，勢不支，戰一小時許，亦退渡驤河而西，日兵遂踞虎山。宋慶遣軍來爭，日兵已畢渡退我，乃還軍，渡驤河，多擠溺；其踞於虎山側者，相枕藉。於是我驤河以東各壘，皆爲口據。宋慶懼，北走退保鳳凰城。二十八日日兵遂入九連城。

日兵之未渡也，則遣少佐奧山所領枝隊，循鴨綠江而西，屯麻出浦（在安東對岸朝鮮境），以砲擊我安東諸壘。至是九連城日兵亦分枝東下，豐陞阿、聶桂林不虞日兵夾江下，亦棄安東，奔岫巖州，日兵遂入安東，於是東起安平河口，西至安東，沿鴨綠江境，皆爲口有。宋慶所部諸軍，既潰而北，依克唐阿一軍潰而東，奔寬甸縣，豐陞阿聶桂林所部亦西奔岫巖州，口兵益逼矣。」（註一）

註一：參考「東方兵事紀略」奉東篇、金旅篇。

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六日） 前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John Young）著文稱，日本之勝固足驕喜，但因此使中國覺醒，則後患更大。

前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著文曰：「日本侵華理由，不值一讀，日本今日之勝，固足驕喜，然因此而覺醒中國，則後患更大，日本之行動與世界和平有關，請各國干涉。」（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六八二，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十月

三日（十月三十一日） 俄皇亞歷山大三世死，尼古拉二世繼位。

五日（十一月二日） 清廷召劉坤一入京，調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

清廷命兩江總督劉坤一來京陛見，以湖廣總督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湖北巡撫譚繼洵護理湖廣總督。
(註一)

華人致書西報，述平壤戰敗情形。

華人之隨軍入朝者致書西報，述平壤情形。謂：「衛汝貴扣餉，士兵不服，豐陞阿無餉半年，與衛汝貴軍沿途搶掠。朝人初甚歡迎，旋逃避一空，糧餉不繼。平壤戰事緊急時，豐陞阿棄陣地先逃，衛汝貴幾為部下索餉者所殺，旋亦離陣地而逃，惟左寶貴、馬玉崑、聶士成苦戰，而死傷亦最少。」(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一，頁三一五〇（原頁十二）。

註二：「字林西報」，頁七四一，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日。

七日(十一月四日) 恭親王奕訢訪英、美、德、法、俄公使，請調停中、日戰事，

允朝鮮自主與賠償軍費。

本日，恭親王奕訢分訪英、美、德、法、俄諸國公使，允賠軍費，令朝鮮自主。美公使請美總統調停，謂：「如此可維持中國之完整。」駐德英使馬來特(Malet)照會德外相馬歇爾(Marshall)：「願在恭親王所提條件下，與美、法、俄聯合干涉中、日戰爭。」(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四九三，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

九日(十一月六日) 日第二軍陷金州，副都統連順走旅順，總兵趙懷益援軍不戰而

潰。

日第二軍占金州，總兵徐邦道奮戰，死六百人，退旅順。宋慶恐日軍由金州乘後路，移往海城指揮，留聶士成守摩天嶺。大連守將趙懷益放棄大連灣，攜餉逃煙台，日軍遂加占領。砲百二十門及彈藥軍資盡委于敵。旅順港務局長洋員哥得(Galder)，以大連不守赴天津謁鴻章，請以丁汝昌為防守旅順主將。

。鴻章初不料大連已失，及得報，以派汝昌遲不濟事，命哥得、馬格里撤出駐泊旅順之來遠艦。旅順防務總辦龔照璦潛逃煙台，旋赴津謁鴻章，謂諸將不相上下，請任其總統旅順守軍，鴻章斥之歸，龔復歸旅順。（註一）

註一：參照國史館審校檔，及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載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臺灣中華書局出版。

十日（十一月七日） 清慈禧太后六旬慶辰，在宮中受賀。

本日，爲慈禧太后六旬慶辰，原擬于頤和園受賀，現以對日戰事失利，乃改在北京之大內皇極殿舉行慶典。先是，本年春初，所有慶祝六旬萬壽之各項慶典之部署，均已接近完成，清廷曾詔命各省將軍督撫副都統提鎮藩臬內，每省酌派二、三員，均于本月初一日以前到京祝嘏。詎料本年七月中日宣戰，清廷不得已于八月二十六日頒旨停止在頤和園受賀。及至九月，因清陸、海軍先後大敗于平壤、大東溝，日軍屢屢大舉，有侵入遼東半島之勢，而慈禧太后之六旬慶典仍復規定屆期在大內皇極殿舉行。至是，由清德宗率領王公百官，皇后率領妃嬪公主福晉命婦等，分別親詣皇極殿筵宴進舞。其時各省疆吏以及所派司道大員，紛紛入覲祝嘏，所携進奉禮品，無不爭妍鬥巧，以相諛媚。此時西太后對于京外臣工所進奉之貢品，極爲賞心悅目，遂一改以往之「毋庸進獻」，而爲「照單全收」。據張文襄公年譜載：「皇太后六旬萬壽，頒賞大壽字一張、大緞二匣、帽緯一匣。又因進呈貢品，頒賞壽字一方，蟒袍一件、活計一匣、福壽字各一方，三鑲如意一柄、八絲綢兩匹。」而翁文恭公日記中，亦有購買貢品及賞賜各物之記載，均可參證。故慶典用費雖至七百萬兩，然若合內外大吏各項貢品計之，爲數當在千萬以上矣！耗四海臣民之膏血，而奉一老婦之娛樂，且前方吃緊，大敵當前，而後方竟麻木不仁，窮極奢侈，清之覆亡，早已伏機于此矣！（註二）

日軍陷大連灣，守軍潰退旅順。

先是日軍既襲登花園港，購鄉民衣服，使日人能操華語者服之入內地，窺探我軍虛實，利用浮碼頭搬運砲械車輛馬匹上岸。凡十二日始登岸，我海陸軍無阻之者。十月一日日先鋒至魏子窩，旅順傳警，總兵徐邦道恐金州失旅順不可守，與諸將議商分兵往逆之，諸將不相統屬，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行，固請於大連守將銘軍分統趙懷益，懷益僅派步隊兩哨往。初九日，日軍大隊攻金州，邦道以兵單不能敵，遂大潰敗。再乞援於懷益，懷益方督所部還輯遼渡海作逃計，不應，金州遂陷。本日，日軍分三路攻大連灣，守礮臺兵先一日逃亡，餘兵放排槍數響，隨懷益遽奔旅順。明日日海軍至大連灣，將進攻，見礮臺已立日兵矣！（註二）

註一：參閱沈雲龍：「慈禧六旬萬壽慶典之奢糜」，近代政治人物論叢（一），臺北，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民五四年八月出版，頁一一——一二。

註二：參照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金旅篇，頁一一六——一一九，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 美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函前國務卿福士德（J. W. Foster），言總署大臣之腐敗、無能與無知。

駐華美公使田貝函前國務卿福士德，言總署大臣之乞援，有如兒童之乞饒教師，願無代價和平，多問日本是否囚皇帝？彼等是否送家眷他往？從未見有如此腐敗，如此無能而無希望之官吏。（註一）

註一：J. W. Foster Memoirs.

十八日（十一月十五日） 英文打字機發明，並經大量使用。（註一）

註一：寶宗一：「李鴻章年（日）譜」，頁二八七。

二十日（十一月十七日） 美使報告，請美總統同情中國出而調停，並言中國之一般現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四日

一六六

狀。

美使秘密請美總統同情中國，出而調停中日戰事，謂：

「中國完全以無準備狀態而捲入戰爭，乃史無前例，其主要原因爲統治者之無知及與人民脫節，……使最可敬愛之中國人中之最無知識而最愚笨者成爲統治者。中國政府幾于無官不貪，無事不賄，……然中國商人之守信，尤爲世界商場中所無。……中國軍隊中貪污吃空額營私，盜換公物，扣餉以爲常，鴻章之名譽爲虛傳，……鴻章之所以有名者，爲鴻章善待外人，注意物質進步而已。……人人譽慈禧爲聖明，然以其之主戰，即足證明其不聰明不偉大。……然中國之唯一出路，爲無代價求和，希望總統出而主持」。〔註一〕

註一：美使報告，二〇二七號。

二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日第二軍陷旅順，大肆殺掠。

旅順形勢險要，爲海疆之門戶，自光緒六年（一八八〇），經營船塢，築炮台，凡十六年，置重兵守焉。東事起，旅順守將宋慶，大連灣守將劉盛休，並率所部防九連城；鴻章別命提督姜桂題、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順，總兵徐邦道以馬炮隊協守。銘軍分統趙懷益，募新兵守大連灣。日軍襲據花園港，餌土人導至貔子窩，還馬炮上岸，閱十二日，中國海陸軍無阻者。徐邦道謂金州失，則旅順不可守，請分兵逆之；諸將各不相統，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行，懷益部將請往備戰，懷益不許，曰：「吾奉命守台，不聞赴後路備敵也！」邦道至，固請兵，乃分步隊兩哨隨邦道行，扼守金州東道。日軍大隊至，兵單將不守，邦道電懷益告急；懷益方督所部還輜重渡海作逃計，弗之應。日軍遂陷金州，進逼大連灣，懷益逃奔旅順。大連險隘蔽旅順後路，軍儲最厚，盡資於敵。日軍駐大連灣十日，始向旅順；旅順諸將皆倉皇備逃計，懲大連軍儲之資敵，乃先輦糧餉還烟台，不復作守備矣！

自龔照璣之逃，旅順軍民皇擾，船塢工匠，奪庫款大掠而行，軍中勿問也。旅順六統領不相轄，乃

共推姜桂題主之；桂題聞于調度，相顧無措。及照嶼歸，威令仍不行。徐邦道率殘卒歸旅順，憤痛思自効，請增兵，不許，請械，許之；乃率所部拒戰于土城子，大挫日軍。及日大軍繼至，邦道軍飢疲無援，乃退兵。照嶼先一日，乘魚雷艇遁于烟台，趙懷益、衛汝成先後逃；其部卒肆掠，奪民船而渡；日軍未至，而旅順墟矣！徐邦道孤軍再拒戰，傷殘幾盡，日海軍艦隊十三隻橫列海面，聯合陸軍，以重砲猛轟旅順各砲台，日步兵復陷椅子山要塞，砲台守軍譁潰。徐邦道、張光前、程允和、姜桂題等，雜亂軍中出走，旅順遂陷焉！（註一）日軍入旅順後，大肆屠殺，市民生者僅三十六人。（註二）

附錄：

一、旅順之陷落（註三）

八月黃海之戰，我海軍喪失過當，不復能軍，日本觀我海軍之隙，乃于廣島集其陸軍之第二軍，將以兵艦護至皮子窩（即貔子窩，一作鼻子窩）登岸，以襲我旅順。蓋日本自平壤之大東溝獲勝後，即編飛軍以逼我。第一軍以陸軍大將山縣有朋爲司令官，由義州渡鴨綠江，直犯遼東。第二軍則取海道窺大連灣、旅順港，其司令官乃陸軍大將大山巖也！旅順者，北洋之重鎮，與山東之威海相望，爲畿疆門戶。先是，光緒六年冬，首築旅順黃金山砲臺，實爲旅防經始。十一年，中法和議成，造大船塢於旅順口內，爲海軍分泊修理之所，就建海軍提督署焉。其地自金州斜伸入海，形如卷心荷葉，偃臥波上，金州角則荷蒂也。從金州向西南，愈趨愈狹，至南關嶺而極，中寬不過六里，有若荷莖，爲旅順後路要隘。隴南關嶺而西南，則地勢漸張，亘西南而東北，作三角形，山海依倚，磴道回旋，乃天然形勝。隴南關嶺又西南，行二十五里曰雙臺溝，亦入旅孔道。再西南行三十餘里，至水師營。水師營迤西曰椅子山，爲旅順後路砲臺之一。山之東南曰大操場。自場折東南行而元寶房藥庫，而白玉山，而旅順市，而船塢。循船塢石隄直南行，至黃金山海岸砲臺，是爲旅順口東岸。若自大操場折而南行，稍西至大醫藥房，再南至洋沱凹，爲旅順口西北海岸。循洋沱凹海岸南行而西至老鐵山。自老鐵山角折而東轉，即餒頭山諸砲臺，是爲旅順口岸。

旅順口門，寬僅九丈，由船塢石隄橫量至老虎尾砲臺，徑十一丈七尺，水面形如撲滿，而水深二丈以外。內澳

約周十四里，可容鐵甲巨艦。澳之東岸，建大船塢爲海軍根本。澳之西岸斜伸一沙舌，自南而北插入澳內，分澳爲內外兩塘。澳之南岸即白玉山，適與口門相值。口門兩岸建立砲臺；口西曰威遠，有十五口徑砲二；口東曰黃金山，有二十四生的口徑輕砲二，二十四生的口徑重砲一；十二生的口徑圍城砲四，滬局仿造格林砲四，並十五生的口徑田雞砲四。兩臺夾口而峙，有如鎖鑰。威遠砲臺之西迤南曰蠻子營砲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砲四，再西迤南曰饒頭山砲臺，爲口西最當要衝地，有二十四生的口徑輕砲二，二十四生的口徑重砲一，十二生的口徑砲二，德國水師砲四。而威遠砲臺之北循沙舌行，至盡頭處曰老虎尾砲臺，有德國二十一生的口徑老砲二，是爲口西海岸砲臺。黃金山砲臺之東曰摸珠礁砲臺，有二十生的口徑砲二，十五生的口徑砲二，德國八生的水師砲四。再東曰老蠟嘴後臺，有十二生的口徑砲二，又同口徑較長砲二。再東曰老蠟嘴後砲臺，有十二生的口徑砲二，是爲口東海岸砲臺。東西砲臺凡九座，經始於光緒六年，成於十二年。十二年以後，仍歲增砲位。及甲午兵事起，復於口西威遠、老虎尾兩砲臺相近，增新臺二，於城頭山砲臺之西增一蘭臺砲臺，又於口東老蠟嘴砲臺之東增一番島砲臺；而各舊臺復各增砲數尊。通增大小砲十數處。海岸之防務綦密。

其陸路砲臺則自椅子山迤而東，又南折，屬至老蠟嘴後砲臺，環旅順後路作半月形。椅子山有砲臺三座，曰椅子山，曰案子山，曰測望臺，此三砲臺居高臨下，爲旅順口後路全防關鍵。椅子山之東，曰松樹山砲臺，再東迤南，則二龍山大坡山等砲臺也，凡九座，是爲旅順口陸路砲臺。陸路砲臺建於光緒十五年，以後大半爲宋慶部殺軍所築，亦有因此次軍興臨時添設者。其砲位設備，與海岸砲臺相亞，足資掎扼。其後路南關嶺左側之大海灣曰大連灣，亦於光緒十四年建砲臺六座，以固旅順後路，兼防金州，此旅順海陸兩路之布防大略也。

旅大經營就緒之始，即以總兵張光前統親慶副營、左營、右營，駐西砲臺，（兵事起後，增副後營，共四營，）總兵董士林統親慶前營、中營、正營、駐砲臺，（兵事起後，增副前營，共四營，）四川提督宋慶，統毅軍九營一哨，專防旅順陸路，提督劉盛休統銘軍十二營，駐守大連灣，皆轄於北洋大臣。然恐倉卒不及稟節度，乃設北洋前敵營務處兼船塢工程總辦，以護諸將，官階雖止道員，而總帥旅順，實重任也。前將是選者，爲候補道劉含芳，繼之者則龔照瑛。照瑛貧鄙庸劣，不足當方面，頗失人望，旅防危機，蓋伏於是矣。

甲午夏六月，宋慶部分統馬玉崑率毅軍四營會天津盛字等軍，從陸路援朝鮮，由旅順出金州赴之。八月十三日，我海軍全隊十二艘至旅順。十五日，赴大連灣。十六日夜，翼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赴大東溝，（其守臺六哨仍留）以接應平壤大軍。十八日，遇日艦於鴨綠江口外，大戰敗績；翌日，回泊旅順，存者僅七艘，入臨修理。九月初二日，清廷命宋慶赴九連城，守鴨綠江，越日，慶以所部行。李鴻章遂令提督姜桂題，募桂字軍四營，提督程允和募三營，以實旅順。又令提督衛汝成募成字六營，並所部馬隊營；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募拱軍三營，並所部馬隊兩營，砲隊一營，渡旅順協守；而以銘軍分統趙懷益募懷字六營，以彌大連灣銘軍之隙。時廷旨屢促海軍出洋偵敵，九月二十日始出旅順旋威海。而日軍第二軍已自廣島北渡，歷大同江，以兵輪十四艘護之。二十六日，襲據我花園港。花園港西距金州約二百八十里，距皮子窩約一百五十餘里。日兵初擬從皮子窩登岸，以傍岸水淺，不利渡軍，乃東移花園港。港口居民見日兵至，駭奔。日兵飭居民四人登船，購鄉民衣服，使日人能華語者服之以入內地，探我軍虛實。十月初旬，日兵遂至皮子窩。

方日兵之至花園港也，以浮碼頭運砲馬登岸，以其艱阻，凡閱十二日始畢登，我海陸軍無過問者。及日鋒抵皮子窩，旅順聞警，徐邦道謂金州失則旅順不可守，諸連分兵往逆之，顧旅順後路。時駐旅順凡六統領，新舊三十餘營，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行。

日兵前鋒薄皮子窩，趙懷益部將數人請往禦，懷益不許，云：『我奉中堂令，守砲臺，不與後路戰事，汝輩欲往皮子窩拒敵，須請令方可。』及邦道至金州，固請於懷益，始派哨官某率步隊兩哨隨邦道，邦道乃令駐金州之練兵一營，扼金州東道，分建砲壘於夾道兩山頂，每壘有砲四尊，倚以爲固，而壘右遙傍海岸有歧路可繞我後軍，乃令懷益部兩哨填守之。

十月初七日，日軍以馬兵一隊潛斷我復州電線，我探馬至劉家墩，與日兵前鋒遇，失利。明日，日兵至東邊山隘，見我兵勢盛，少却，午後以大隊至。初九日黎明，越嶺來犯，猛攻我壘右海岸歧路。懷益部止兩哨，兵單不能支。壘兵愕顧，日兵遂乘勢撲壘，蟻附而上，遂奪山隘。我兵大潰，軍士喪亡者衆。邦道乞援於懷益，不可得，而懷益乃於大連灣碼頭自督勇丁，運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計。須臾，日兵已薄金州，攻東北兩門，以行營小砲與我城上

大砲互轟擊，分道犯東北門。有日卒負炸彈藥一箱，冒死昇置北門洞，燃之，城門裂。我守城兵奔駭散，日兵遂擁入，轉趨東門，開城納其衆，我兵由西門逃，死傷枕藉，殘卒走旅順，金州遂陷。初十日黎明，日兵分三路攻大連灣，我守臺諸營先一日多已逃亡。是日，餘兵遙放排槍數次，趙懷益遽奔旅順。十一日，日海軍至大連灣，將施攻奪，而見砲臺已立黑衣日兵，無復中國旗矣。

我海疆砲臺，大連灣式最新，砲亦最利，創建於光緒十四年，竣工於十九年，以屏蔽南關嶺，爲旅順口後路局鑰。山形左右拱抱，面東南作大海灣。灣之右岬曰黃山，迤左曰老龍頭，左岬曰和尚山，建砲臺五座；曰黃山砲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砲二，十五生的口徑砲二；曰老龍頭砲臺，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砲四；曰和尚山西砲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砲二，曰和尚山東砲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砲二，是爲海岸砲臺。陸路則徐家山砲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砲四，專顧後路。經營布置，凡歷六載，最稱鞏固。

方日兵將至時，我金州大連灣，儲備軍械，自勇丁配執槍枝外，有海岸、行營兩種之砲，凡一百二十餘尊，大小砲彈二百四十六萬數千粒，而自滬局運至行營快砲，封尚未啓。此外華廠自製槍，並德國槍六百數十桿，槍彈三千三百八十一萬數千顆，及馬匹行帳諸式軍備，所蓄甚厚。惟餉銀則爲趙懷益運去，且先已令人至煙臺售其所存軍米焉。如此嚴城巨防，不兩日間，竟委之去，懷益之罪誠不容誅矣。蓋大連灣有海軍碼頭，日兵據之。其大小軍資，從此得登岸地，轉輸前敵，遼東之禍，遂因以愈烈也。

日兵駐大連十日，始向旅順。我旅順諸將，本亟以全力守南關嶺，扼旅順咽喉，乃曦魚舟海曲，作逃計，而各以糧臺饌銀移烟臺，其餘邦道之拱衛軍糧臺，亦移遷劉公島，士氣大沮。營務處龔照瑛，以金州陷，旅順陸道絕，大懼，逃渡烟臺，赴天津，鴻章斥之，復旋旅順。自照瑛之逃，旅順軍民益滋惶惑，船塢工匠羣搶庫銀，分黨道掠，旅順大擾。二十一日，日兵向旅順，踞南關嶺，過雙臺溝抵北城子。

時旅順諸統領不相繫屬，共推姜桂題爲主。桂題庸才，無能爲；諸將互觀望，莫敢前擊敵。金州之陷也，徐邦道率殘卒奔回旅順，至是憤甚，以部衆新創，寡弱不足用，固請於桂題，欲增兵爭後路，不許。乃請給槍械，桂題

許之，令至軍庫自擇。邦道率其殘卒行，而慙思衛汝成並進，汝成爲所動，從之。二十二日，邦道乃北拒日兵，遇其前鋒馬兵於土城子南水師營北。邦道奮擊，截敵爲數段，俄有日步兵來援，邦道亦麾兵包之，日兵大窘。未幾，復有其馬隊來援，邦道分兵擊之，而受圍之馬步隊，得乘間逸去。邦道躡之，並運砲四尊於山頂，施要截焉。日兵以是大挫，斬其兵官一，我兵追奔過雙臺溝，是爲旅順第一轉機。乃日兵砲隊繼至，而邦道兵亦饑疲已甚。蓋諸將不相顧，日兵益增，而我無接應，且邦道新敗，無行帳，其步卒非回旅順不能得一飽，遂棄險要不守，仍退歸，而旅順事乃不可爲矣。

是日，駐旅之魚雷艇八艘，渡威海；而龔照瑛已先一日乘魚雷艇逃烟臺，於是黃仕林，趙懷益，衛汝成三統領，陸續潛逃內渡，其部下游兵公掠玉成官銀號。船塢工程局大小員司各挾庫儲貴重材料，爭雇民船逃內渡，倉皇擾攘，即非日兵之來，而旅順固已不可守矣。二十四日，日兵大進，邦道仍往拒之。將爭日兵所據山頂，徑進入伏中，日砲隊自兩路出截，邦道不得前，且逼於日兵砲火，部卒死者百餘人，乃退。日兵於是逼旅順而進。

方旅順兵事之棘也，諸將不布遠勢，而踞於自守。當十月初旬，即經營扼後山之計，循老嶠嘴後砲臺之北，沿山北趨，順山勢折而西，又稍北，屬於元寶房藥庫之東，水師營之南，踰椅子山砲臺再西，而南抵洋沱凹，直走黑沙溝之北，迤邐包三面若半環，依陸路砲臺嚴軍自守，其無砲臺之處，彌以行營砲，行營砲之際，護以槍隊；循山高下，補以土壘。當日兵據南關嶺後，旅順諸營，自留守海岸砲臺勇丁外，盡數分布後山，即支行帳以宿。而備多力分，敵人轉得蹈瑕隙以求逞矣。

二十五日黎明，日人以兵輪橫排一字陣於旅順海面，包我東西各砲臺之外，而距岸甚遠。蓋以眩我將士耳目，牽我兵力，俾得專注陸路盡力來攻也。是日天甫曙，陸路日兵已分布於後山一帶，西北兩面之外，大小砲約百尊，分排轟擊，而我西北角椅子山陸路砲臺，尤爲日兵所注意。砲來愈猛，我椅子山以砲還擊，東路之松樹山陸路砲臺開砲助之，而東南面之黃金山，南面之饅頭山兩海岸砲臺，亦皆發砲遙擊，相持及一小時。是時，日兵步隊自西包而南，及於洋沱凹，死力猛攻。我分守西面步兵不能敵，日兵乘勢衝入，蟻附而登，我椅子山砲臺遂陷，是臺託地最高，可俯瞰各臺掩擊後路，一有蹉失，則旅順全局隳矣。

椅子山砲臺失守，我案子山測望臺兩砲臺，皆不戰而潰。日兵乃東攻松樹山砲臺，臺上之兵亦相繼潰。其大隊乃乘勢而東，合力攻我二龍山、大坡山之九砲臺，諸臺亦陷。於是旅順陸防悉壞，日兵遂入旅順市，循船隔石堤，直指黃金山砲臺，守軍奔潰，日兵竟得安步以登。其口東摸珠礁、老蠣嘴兩海岸砲臺，及口西各海岸砲臺守兵，均駭而奔。

當日兵入椅子山時，我陸路守界兵已紛逃不可遏，各臺砲勇見之，奔潰相屬。其在口東者，潰而東，從東大道循海北去；其在口西者，潰而西，循西面海邊北去。復扼於海面日艦之砲火，避入老鐵山石洞，及夜，乃出南關嶺，越金州，奔復州。徐邦道，張光前，姜桂題，程允和四統領，皆雜亂軍中而奔。

旅順之防，我經營之，凡十有六年，糜鉅金數千萬，船陽，砲臺，軍儲，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門戶洞開，竟以資敵。自是，畿疆震驚，陪都撼擾，而復州、蓋平以南，遂遍罹鋒鏑而無由自拔焉。

二、日軍在旅順之虐殺（註四）

日軍既入旅順，乃竟大舉虐殺華人，見人即殺，雖婦孺亦不免。全市得免於殺戮者，僅三十六人。其滅絕人理，舉世爲之震動。此事騰載於世界報章，無不同切義憤。十二月十六日，李鴻章電總理衙門云：

倫敦電，英國泰晤士新聞紙刊有報章云：日本攻取旅順時，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殺伐，甚爲慘傷。又有中兵數羣，被其執縛，先用洋槍擊死，然後用刀肢解。據云日兵亦有數人被中兵所殺；惟日本士卒行徑殘暴若此，督兵之員，不能臨時禁止，恐爲終身之玷云。

美國報紙，尤痛攻日本軍隊之暴行，謂：「日本國爲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又謂：「日本人今脫掉文明之假面具，顯露野蠻之本體矣。」其時日本正在對美交涉修約，請美國放棄領事裁判權，因是痛遭美國參議院之反感，交涉爲之擱淺。此事之真相，因旅順陷於日手，華人全滅，中國文書中甚少記載。當時英國國際公法學者胡蘭德博士，著有「中日戰爭之國際公法」一書，其述日軍之暴行云：

當時日本將卒之行爲，實逸出常度之外。彼等假令發見旅順口之墨外，有被割斷之日人死屍，謂華軍先有如斯之殘忍行爲，然尚不足爲彼暴行之辯解。彼等除戰勝之初日，從其翌日起，殘殺四日，非戰鬥者之婦女幼

童亦不免。從軍歐洲軍人及特約通信員，目擊此殘虐之狀況，然亦無法制止。此時得兇戮殺之華人，全市中僅三十六人耳！然此三十六名華人，爲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屍而被救殘留者。其帽子上，有「此人不可殺戮」之標記而保護之也！

此爲第三者之記述，及今讀之，猶爲毛戴！

三、李鴻章奏報旅順失守之經過（註五）

奏爲查明旅順失守詳細情形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據登萊青道劉含芳自烟臺來電，知旅順於二十四日失守，當即轉電總理衙門代奏，自請從重治罪，仰荷聖恩，不加重譴，僅予薄懲，感愧悚惶，罔知所措。欽奉諭旨，飭將詳細情形迅即查明覆奏。茲於二十七日亥刻，復據劉含芳電稟，由民船救出溺水之記名提督黃仕林，水雷營幫帶官孔玉祥、何青雲及雷兵七人，送至烟臺。詢悉，所言與前電相同，而情事較爲詳晰。據稱：二十四日辰初，賊由水師營後路山溝，繞至韓家溝衛汝成陸路行營砲臺，未及開砲，賊即闖進；次至程允和砲臺，開二十餘砲，賊已攻入。徐邦道在操場接戰，放三排槍，亦退；戰至教場溝，被圍。趙懷益見三砲臺已失，發號出隊，人未及齊，即向東行，各敗隊皆向東山衝打。未正，棉藥被砲擊燃；申初，軍械庫，水師營藥庫，毅軍坐營，及附近砲臺，營盤，村莊，舊水師營，皆起火，賊遇人即殺。東岸各臺午前放砲不斷，西岸各臺，申初猶有砲聲等語。二十八日子刻，又接劉含芳電：北河船主古巴白旅回，稱：二十六日午後三點鐘，遠望小平島，尚在鏖戰。又有弁兵稱：徐邦道教場溝被圍，皆老隊，死剩十餘人，猶戰不已等語。丑刻，又接宋慶電稱：徐邦道及桂軍營官胡永清，慶軍營官吳長純，馬步兵勇約二三百人，零星闖出，面稱：敗退隊伍共約萬衆，賊重重設防，遍布雷砲，盡被擊散。又值海潮驟漲，北風凜冽，得脫者百不及一等語。臣查旅順一島，孤懸海中，所築砲臺，專爲備擊洋面敵船而設，若論防守周密，必須於後路金州一帶設立重兵。當無事時，莫不以爲過計，且實無此財力。此次倭兵於金州東北之皮子窩登岸，本非旅順海口守臺兵將所能遠防。賊已襲據金州，則大連灣、旅順俱成絕地。前因平壤事急，無兵可調，又將久駐該兩處銘軍、毅軍，相繼調出。其墳紮者，除旅順守臺之親襲六營外，餘皆新募，所用毛瑟槍及舊槍，不及倭兵小口徑快槍及連珠快炮子路遠而且速。又操練未熟，心志不固，大遼灣既失，旅順更不可支。而諸將以新軍當巨寇，

猶能堅守旬餘，屢戰屢勝，終以宋慶、程之偉等援師懸遠，賊來愈多。推原其故，實由衆寡不敵，精械懸殊，傷亡枕藉，尙非戰陣不力。現各將領，惟黃仕林業經救出，徐邦道業已衝出，餘尙不知下落。據孔玉祥等稱：敗退後，俱向東山衝打。英船主稱：二十六日猶見小平島鏖戰。該島正在旅順之東，應俟查明，再行續報。現在岫巖、旅順，相繼不守，北而遼瀋，東而山海關，內外沿海一帶防軍，均甚單寒。臣昨電請飭宋慶部速即拔隊，由熊岳海蓋一路，會合章高元等，迎剿岫巖股匪，截其北竄；是晚，接奉電旨，當即恭錄轉電欽遵。臣當督飭榆關蘆臺以東各營將弁，嚴密守禦，冀固畿防。臣於拜摺後，即親赴大沽北塘各處察看，妥籌布置，不敢稍涉疏虞，仍隨時電達總理衙門轉奏。所有查明旅順失守詳細情形，理合繕摺由驛五百里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頁一六——二八。

註二：陸奧宗光：「蹇蹇錄」，頁三一二，謂旅順大屠殺消息發出，美國輿論譁然。

註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頁一四七——一五六；參考自「東方兵事紀略」頁一〇七——一二八。

註四：同註三，頁一五七——一五八。

註五：「李文忠公全集」(三)，頁七〇八——七〇九。

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孫先生文創立興中會于檀香山，召開第一次會議，發表宣言，訂定會章，並開始徵收會銀。

先是，孫先生文于本月自上海重抵檀香山，乘清廷對日海陸軍戰敗人心激憤之時，以組織革命團體商之於故舊親友。其兄眉(號德彰)，早歲在檀香山所屬茂宜島(Maui)經營農牧，資財甚豐，爲人慷慨好施，傾全力以助之。另並獲得鄧蔭南、何寬、劉祥、黃華恢、李昌等二十餘人之贊助，及至本日，興中會遂得成立于檀香山。(註二)

是日興中會之成立會，係假卑沙銀行華籍經理何寬寓所開會，列席者有何寬、李昌、黃華恢、劉祥、劉壽、劉卓、曹彩、黃亮、鄧蔭南、鄭金、程蔚南、鍾木賢、李祿、宋居仁等十餘人，即由孫先生提

議，定名曰興中會，（註二）規定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爲宗旨，並通過章程九條；公推劉祥爲主席，何寬爲副主席，黃華恢爲管庫、程蔚南、許直臣爲正副文案，李昌、鄭金、鄧蔭南、李祿、李多馬、鍾宇、林鑑泉等爲值理。會畢，由各會員填寫盟書，由李昌宣讀，各以左手置聖經上，高舉右手，向天次第讀之，如儀而散。

同日開始徵收會銀（稱「會底銀」），每人五元，何寬、李昌首先繳納，衛積盛、李光輝、黃綿鳳、何旱、宋居仁等繼于二十八、九兩日繳納，其餘諸同志亦相繼送繳，共得會銀二百八十八元，另決議發起募集革命軍債，規定成功之日，以千還百，約得款數百元。

第一次會議後，相繼入會者，有孫德彰、楊納、李杞、侯艾泉等九十餘人，會員總數已達一百二十六人。

其時，孫先生以事機日迫，急于返國，而所集之款數甚少（前項合計僅有美金一千三百八十八元），不敷大舉之需，焦急異常。德彰公聞之，乃賤賣其畜牛之一部，以充義餉。鄧蔭南盡變賣其農場，表示參加革命，一去不返之決心。至十二月上旬，所收經費，約合港幣一萬三千元。（註三）

興中會成立後，孫先生手訂會章九條，全文如下：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厦之將傾！用特集會衆以興中，協賢豪以共濟，抒此時艱，負我中夏，仰諸同志，盡自勉旃！謹訂規條，臚列如左：

一、是會之設，專爲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七六

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爲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

一、凡入會之人每名捐會底銀五元；另有義捐以助經費，隨人能力是視，務宜踴躍赴義。

一、本會公舉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庫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專司理會中事務。

一、每逢禮拜四晚，本會會議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會，方能開議。

一、凡會中所收會底各銀，必要由管庫存貯妥當，或貯銀行，以備有事調用；惟管庫須有殷商二名擔保，以昭鄭重。

一、凡會中捐助各銀，皆爲幫助國家之用，在此外不得動支，以省浮費。如或會中偶遇別事要用小費者，可由會友集議妥當，然後支給。

一、凡新入會者，須要會友一位引薦擔保，方得准他入會。

一、凡會內所議各事，當照捨少從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一、凡以上所定規條，各友須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隨時當衆議訂加增，以臻完美。（註四）

孫先生復以革命事業，應立志犧牲，非尋常會社署名附和可比。故須鄭重宣誓，失信矢忠，有始有卒，方克濟事，故本日入會者一律宣誓。誓詞由李昌宣讀，孫先生文首先行之，其法在開卷聖經上置其左手，右手向上高舉，懇切求上帝監察，然後照誓詞宣誓，誓詞曰：

「聯盟人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察。」（註五）

按：因本日正式發佈與中會宣言，開始徵收會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乃明令確定本日爲建黨紀念日。

附錄：

一、孫總理革命立黨之動機（註六）

中華民國之產生，由於中國同盟會之艱難締造；而中國同盟會之前身則爲孫逸仙先生（以下概稱總理）所手創之興中會，此凡讀革命史者無不知之也。考孫總理最初手創興中會於檀香山，係在民國前十八年甲午十月，而其革

命立黨之動機，則遠在民國前二十六年丙戌。其動機可分三期：一爲丙戌肄業廣州博濟醫學院時期，其同學有惠州人鄭士良者，自少投入洪門三合會，頗得衆心，總理知其有志革命，因與深相結納，以備後用，是爲聯絡會黨共謀國是之開始。二爲丁亥（民前二十五年）肄業香港雅麗士醫學院時期，在學時獲識同志陳少白、楊鶴齡、尤列三人，恆假歌賦街楊耀記商店爲政治聚談所，時人以其高談迭反覆滿，故以「四大寇」三字稱之。總理於將畢業醫校之前一年，更結交輔仁文社社員楊衢雲、謝纘泰二人，相與志同道合，爲他日擴大興中會之張本。三爲壬辰（民前二十年）廣州行醫時期，時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質甫、程耀宸諸人。遂假雙門底聖教書樓後進禮拜堂，及廣雅書局內南園抗風軒爲密談時政之俱樂部，舊友尤列、陸皓東、區鳳墀等與焉，是爲乙未（民前十七年）九月廣州第一次革命運動之導火線。上述三期爲總理革命立黨之動機，亦即甲午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之前奏也。

二、馮自由撰「興中會始創于檀香山之鐵證」（註七）

孫總理於民元前十八年甲午冬手創興中會於檀香山，爲當年興中會員及今日一般國民黨員周知之事實。而總理遺教中且有「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之自述，則是檀香山之爲興中會發源地，可謂毫無疑義。余於民元前十七年乙未九月興中會第一次在廣州舉義時，方十四歲。是年秋冬間，總理偕陳少白、鄭士良兩先生亡命至橫濱，與吾父鏡如公組織駐日興中分會，且同下榻於余家所設之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經印刷店。余因是得與總理及陳、鄭兩先生朝夕親炙，並熟聆興中會先後創設於檀島香港之故事，獲益良多。民國十七年及二十五年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相繼出版。二書均敘檀香山爲興中會發源地，蓋紀實也。近閱中央週刊第五卷第三十四期，始知有人主張「興中會於民國前二十年創於澳門」之新說，尤以吾友鄒君海濱爲持之最力。是說倘能成立，誠不失爲黨史上之新發見。然而事實具在，無可移易。余爲興中會員目前生存十數人中之一人，存貞守璞，實無旁貸，謹紆管見，並提出物證、人證，爲發生異議者一解釋之。

考鄒君海濱所主張「興中會於民國前二十年創於澳門」。其唯一之論據，爲在倫敦出版之總理自著「倫敦蒙難記」一書，是書原本爲英文。上海民智書局及其他書局多譯印售。惟譯文各有不同。鄒君所根據者大概爲民智書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七八

或三民書局譯本，其譯文爲：「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進中國，故名之曰興中會」云云。然細觀英文原文，則譯文與原文意義相差太遠，且有畫蛇添足之嫌。茲錄載英文原句如下：

It was in Macao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

此段英文原意，應譯作「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此種政治運動，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之形成」，方不失真。補原文祇稱「少年中國黨」，而並無「興中會」三字。「少年中國黨」與「興中會」有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興中會」始終未聞有「少年中國黨」之英文名稱，固不得武斷謂「興中會」，即「倫敦蒙難記」所謂「少年中國黨」也。又英文原本並無「其宗旨在改造中國」一句，譯本故意添入此語，尤爲畫蛇添足。各書局之譯者，以不解英文原意，勉強附會爲「興中會」，以迎合潮流，可謂大誤。而讀譯本者不知譯本誤譯，竟從而錯認「少年中國黨」一語之普通名辭，爲後二年產生之「興中會」，則尤大誤特誤矣。故主張「興中會」於民前二十年創於澳門」之說者，如不能證明「興中會」附有英語「少年中國黨」之名稱，及提出「少年中國黨」即是「興中會」之相當考證，則其說可謂根本不能成立，應自宣佈取消其主張可也。

考蒙難記所述：「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之形成」一語，實爲總理當日對英人之外交措辭。蓋香港乃清末「四大寇」多年放言無忌之政談所，亦爲興中會本部之策源地。乙未九月，廣州一役雖經營失敗，然黨中潛勢力猶密佈於廣惠所屬。仍恃香港爲捲土重來之出發點。香港既爲英人殖民地，其官吏時有壓迫黨人以交歡清政府情事，總理爲未來策動起見，不得不諱言香港二字，而以澳門代之。實則蒙難記所述「早年余在澳門」一段文字，澳門二字，當作香港讀之，始無悖於事實。在孫文學說第八章亦有「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之自述。可知總理當日不便直承爲興中會首領，且諱香港爲澳門，固別有苦衷也。

或疑蒙難記所稱「少年中國黨」爲當時一種政治運動之固有團體，亦屬大誤。蓋「少年某國某政團」一語乃東西各國維新黨之普通名辭。自瑪志尼創設「少年意大利」之後，他國改革政治之團體以少年某國自稱者，不一而足，「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我國志士之自稱「少年中國」者，尚在土耳其志士之先。民前十年壬寅，秦毓鎰、程

家裡、葉瀾，及余等在東京發起中國青年會，（與耶教青年會性質不同），其英文名字即為Young China Association。同時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之筆名，自號少年中國之新民。民前二三年已酉、庚戌間，旅美同盟會員李是男等組織少年學社及少年中國報於舊金山，其英文名字均稱“Young China”，此足證明「少年中國」之一名辭，實為我國維新黨之通稱。且在民前十七八年以前，我國稍具政治性質之團體，尙無革命、立憲、排滿、保皇，及急激、和平之分。康有為所設南學會、強學會、揚衡雲、謝讚泰等所設輔仁文社；尤列所設興利蠶子公司；總理所設農學會，皆可以維新黨稱之，即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人之組織，亦無不可。就中總理之組織農學會於廣州，其目的在於交結官紳之進行革命工作。時在澳門行醫後二年，及檀香山與中會成立後一年，實為與中會之別動隊。由上所述，可知總理所稱「少年中國黨」，乃當日一般維新志士之通稱。在民前十八年甲午以前，吾國持激烈主義之志士，尙無此種團體之結合。康有為所設之南學會、強學會，公然以請願變法為號召，旗幟似較鮮明。特總理以康有為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勢難與之合作耳。（事詳余著「革命逸史」第一集第七十二頁。）

關於與中會始創之地點及時期問題，當以民二十一年陳君少白答復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一書為最有力之文證。在總理肄業香港雅麗士醫院時期，及與中會成立以前，諸同志中與總理關係密切者，以陳君為最。總理實不啻倚之為左右手，其言至有價值。今錄原書如下，以供考證：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先生鑒：來示敬悉。承問與中會創立年期。查逸公係於甲午夏赴夏威夷島（檀香山）吹倡革命。此會實創於是時。是年年底，由檀返香港，翌年乙未正月，做屋士丹頓街，係繼續開會而已。漢民君王寅之說，去事實略遠。逸公畢業於壬辰之秋。旋問世於澳門。癸巳，創東西藥局於羊城。甲午，去羊城而之上海。稍作逗留，遂往檀山。壬、癸兩年，並無開會立黨之事。馮自由君乙未之說，應係指回國後而言，乃非事實也。（自由按黨史會去函似有誤會。蓋余所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係於民十七年出版，已明載與中會於甲午多創設於檀香山，而與中會本部則於翌年乙未正月成立於香港）。肅此敬復著祺！」

陳少白拜啓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

吾人祇據陳君函中「壬、癸兩年並無開會立黨之事」一語，便足以打消「民元前二十年與中會創設於澳門」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異說而有餘。其他之研討，特無關宏旨之枝節問題耳！陳君謂總理於甲午夏從上海赴夏威夷一節，中間尚漏去「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條陳變法無效」等事。據陳君以前告余，謂「總理於甲午春，因在廣州藥房營業虧折，失意歸鄉。十餘日後，忽來香港，持所撰上李鴻章書草稿相商。旋偕陸皓東赴上海，復北上至天津，由羅豐祿介紹，求謁李鴻章條陳改革。以李拒絕延見，遂失望而至檀島」云云。（事詳余著開國前革命史。）證以陳君此函，則總理是歲之旅程可分五期：即春間從香港至上海；夏間從上海至天津；秋間從上海至檀島；而抵達檀島則已為秋冬間矣。嗣與中會成立，遂於年底首途回香港，組織乾亨行為實行機關，故與中會於甲午冬始創於檀島之事實，洵為確鑿不磨，毫無疑義。

此外尚有二種理由，足以證明與中會創於澳門一說為不足信。與中會為反清復漢之革命團體，總理既聯合同志，聯盟組黨，其誓辭曰：「驅逐鞑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則是從與中會成立之日起，便與滿清勢無兩立，決無轉向滿清督撫上書請願改革朝政之理。由此可知總理北上求謁李鴻章之前，尚未有與中會之組織。彰彰明甚。

又考總理在澳門行醫時期，為民前二十年壬辰。主張與中會創於澳門之說者，殆謂與中會之創設，即在總理行醫於澳門時期。其理由亦至薄弱。蓋開會立黨，必須聯合生平志同道合之密友，而後可以成立具體之組織。今乃並生平密友如所謂「四大寇」者，亦未參預。則此種團體之有無產生，更可知矣。以余所知，當日總理在澳門所結交者，僅有鏡湖醫院之少數紳商何穗田、吳節微、陳庚如等。此輩徒知利祿，毫無國家思想，豈可與言排滿復國。故主張與中會創於澳門一說，即無異謂總理於民元前二十年脫離舊日同志，一人自創設與中會於澳門。此必不可能之事也！稍明與中會掌故者。當無不洞察其說之無以自圓矣。

要而言之，欲探求與中會之掌故，首宜向舊日之與中會員詳徵博引，乃可得其真相。若徒恃誤釋原文之譯本，而遽下斷語，則猶隔靴搔癢耳。查現在生存之與中會員，尚有十餘人。請試舉其姓名地址，以供發生異議者之諮詢可乎。計在檀香山入會者：有鄭照、許直臣、鍾宇、曾長福四人。鄭、許、鍾三君均於甲午秋加盟；曾君則於民前九年癸丑加盟。鄭、鍾、曾三君現在檀島。許君則於前歲香港淪陷後，由港移居澳門。在香港入會者：有余育之、李紀堂二人。余君係在乙未春加盟；現在某某冠生園供職。李君則於民前十二年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加盟，現居重慶

。在日本橫濱入會者：有溫炳臣、黃焯民及余三人。均於乙未冬加盟。溫君現居某某。黃君於抗戰後歸國，現居澳門。在南非洲尊尼士堡埠入會者：有霍勝剛一人。現仍在某某經營萃文書店。其他碩果僅存可屈指數者，寥寥無幾。則是目前生存之興中會員，至多不過十數人而已。吾願今之發生異議者，更向目前生存之興中會員一一請益，自可獲得無數與中會成立前後之新資料，當較誤讀錯譯之「倫敦蒙難記」爲優勝萬萬也。

此文乃應中央黨史會之諮詢而作，蓋自鄒君海濱對於總理所述「赴檀島創立興中會」之遺教發生異議後，黨史會因之開會研討多次。對於興中會首創之地點問題。迄未解決，迨余於去冬自香港脫險來渝，張君溥泉特訪余徵取意見，余即以上述理由分別答之。張君頗以爲然。最近黨史會爲此問題先後召集委員會及小組會討論此事，聞列席諸同志鮮有贊同興中會創於澳門之主張者。足見此種異議已無成立之餘地。余於黨史會爲纂修，於鄒君爲良友，抱殘守缺，固屬義不容辭；辯惑釋義，亦爲勢非得已。用是不得不根據事實，以闡明一切。倘鄒君及二三發生異議者，更能提供別項新證件。以自圖其說，則余極願相與再事研討，以重史信，是亦吾輩應有之責也。

三、陳少白爲說明興中會成立時間地點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函（註八）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先生鑒：來示敬悉。承問興中會創立年期。查逸公係於甲午夏赴檀香山夏威夷島，吹唱革命，此會實創於此時。是年年底由檀返香港，翌年乙未正月嶺屋士丹頓街，係繼續開會而已，漢民君壬辰之說，去事實略遠。逸公畢業於壬辰之秋，旋問世於澳門。癸巳創東西藥局於羊城，甲午春去羊城而之上海，稍作逗遛，遂往檀香山。壬、癸兩年並無開會立黨之事，馮自由君乙未之說，應係指回國後而言，仍非事實也。肅此敬復。即頌
著祺

四、興中會創立之時地考證（註九）

興中會是總理所手創的，其於何時在何地創立，應以總理自己所說爲確實。查總理於民國八年所著「孫文學說」，在第八章「有志竟成」（見總理全書）之二之第一五八頁（這一章內說是甲午年（民國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的。其原文：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八二

「及子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

後來總理再於民國十二年一月再發表其所著之「中國革命史」一文，仍說是甲午赴檀創立興中會，並說明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其原文：

「（一）立黨 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亡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紳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

以上兩件總理親自著作之敘述革命史之遺教，將興中會創立之時地，已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訴我們說是甲午年（清光緒二十年，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創立的，毫無問題。但有以總理「倫敦被難記」譯文中有「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興中會」等語。因總理於壬辰年（清光緒十八年，民國紀元前二十年、公元一八九二年）曾有一短短期間在澳門開設中西藥局，就認爲興中會就是在這時候在澳門創立的了。其實，「倫敦被難記」原著爲英文，其英文原文：

It was in Macao that I first learned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

這段英文，若按原字義很正確的譯出來，當爲：「我在澳門的時候，才開始知道有一個政治運動的存在，這個運動我最好可以形容他是青年中國黨的形成。」這話當然是總理在倫敦蒙難以後，爲爭取英國人的同情，掩飾自己革命的行動而發的。因爲英國人在政治上是富於保守性而反對所謂暴烈行動的，所以故作和緩漸進的論調，避免「革命」的名詞，以避免英國人心理上的疑慮。而且自己也不肯以領袖自居，以避免過於被人注目，於行動有所不便。總理祇認爲是一個「政治運動」而不稱爲「革命運動」，就是這個道理。若是嚴格的抓住這個話的字面來講，則

總理祇說是這政治運動的存在，當他到澳門以後才知道。更未承認這是他自己發動或組織的。

況「倫敦被難記」中還說：「興中會總部設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廣州。」若是有人以此為據說興中會成立於上海的，則又將何以辯證。總而言之，「倫敦被難記」是以當時帶政治宣傳性的作品，自不能與總理自著的「孫文學說」與「中國革命史」同日而語。

所以總理自著「中國革命史」一文中之「甲午以後，赴檀創立興中會，此為革命主義立黨之始。」這幾句遺教，就是興中會創立時地之權威。絕不是「倫敦被難記」譯文、或其他人有所異說而可以加以懷疑的，甚至欲推翻它的。本會於民國二十一年間為興中會成立之時地問題，曾函詢總理最早期革命老友（總理讀書香港時，曾與總理等同被稱為「四大寇」之一的興中會會員）陳少白先生，陳先生復函說：「查逸仙孫公於甲午夏赴夏威夷島吹倡革命，此會實創於是時。」陳先生所說的當最為可信。

又甲午春，總理曾赴京津，並上李鴻章書，絕無在興中會成立後之第二年仍有此等事。

又總理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頒布中國國民黨宣言，亦有「溯自興中會以至於今垂三十年」一語，按民國前十八年至民國十二年恰為三十年。再民國三十二年中央常會決議於是年舉行本黨成立五十週年紀念。從民國前十八年至民國三十二年適屆五十年，此中央常會已認定興中會是民國前十八年成立是正確的。

綜合以上所考訂興中會創立之時地，應定為民國紀元前十八年（甲午）在檀香山當為定案。至於日期，尚無確切的史料記載，當在是年陰曆的十月間。因為十月二十七日（陽曆十一月二十四日）發佈宣言，開始徵收會費。就以這天為成立的日期，不至於有多大問題。

五、羅家倫撰「興中會成立日期之史的考訂」（註一〇）

興中會成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歷史是「無微不信」的。考定這件大事發生的日期，自然要憑可靠的證據。歷史的證據首先應當注重當時的原始資料。當事人的記載，常常可以和原始資料同樣的看待，但常視其記載者與該事件的關係如何？對於該事件說話的權威如何？至於記載中詞句的肯定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據以上的條件來做考訂工作，大致已經不差，若再加以佐證，自然結論可以更為正確。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八四

(一)與中會成立的年代，自當以甲午年(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即前清光緒二十年，亦即西元一八九四年)爲正確。與中會是國父手創的，關於與中會成立的記錄，自然應該以國父在重要著作裏自己所敘述的，爲最有權威。他在民國八年發表的「孫文學說」第八章，即「有志竟成」那章裏，肯定的說是甲午年他赴檀香山創立與中會。其原文是：

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與中會。」

後來國父又在民國十二年一月發表其所著的「中國革命史」一文，仍說他是於甲午赴檀香山創立與中會，並說明「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原文如下：

「立黨。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與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

以上兩段記錄，是出自國父審慎而嚴正的著作之中，說得明白而確定，本不應當對於與中會成立的年代再有疑問。可是後來仍有與中會成立於壬辰年(民元前二十年，西元一八九二年)的說法，這是如何的呢？這個主要的來源是由於國父「倫敦被難記」的譯本中有過「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與中會」這幾句話，於是引起過一段誤會和爭執。其實「倫敦被難記」原著爲英文，於民國元年由他人翻成中文的。此段英文原文爲：

"It was in Macao that I first learned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ese Party"

這段英文，若按原字義很正確的譯出來，當爲：「我在澳門的時候，才開始知道有一個政治運動的存在，這個

運動我最好可以形容他是青年中國黨的形成。」這話當然是國父在倫敦蒙難以後，爲爭取英國人的同情，掩飾自己革命的行動而發的。因爲英國人在政治上是富於保守性而反對所謂激烈行動的，所以故作和緩漸進的論調，避羣革命的名詞以減除英國人心理上的疑慮。而且自己也不肯以領袖自居，以避免過份被人注目，於行動有所不便。國父祇認爲是一個「政治運動」而不稱爲「革命運動」，就是這個道理。若是嚴格的抓住這個話的字面來講，則國父祇說是這政治運動的存在，當他到澳門以後才知道，更未承認這是他自己發動或組織的。

況「倫敦被難記」中還說：「與中會總部設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廣州」。若是有人以此爲據說與中會成立於上海的，則又將何以辯正？總而言之「倫敦被難記」是以當時帶政治宣傳性的作品，自不能與國父嚴正的著作「孫文學說」與「中國革命史」同日而語。國父所以故意閃爍其詞，還有一個最重大的理由，就是一位革命黨的領袖，在那時候決不願意暴露其組織的真相及其所在地。

但是爲了力求真確起見，我們還得力求佐證。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文件中，發現最初創黨革命元老陳少白先生答覆該會詢問與中會成立年代一函，原文已以照片印入革命文獻第三輯，其中重要的話如下：

「承問與中會創立年期。查逸公係於甲午夏赴夏哇夷島（檀香山）吹唱革命，此會實創於此時。是年年底由檀返香港，翌年己未正月就屋士丹頓街繼續開會而已。……」

陳先生是國父革命老友。當國父在香港就學期間，陳先生常與一道鼓吹革命，被世俗稱爲「四大寇」之一，也是與中會創始人之一。關於這件事，自然他的話具有非常之大的權威。這是堅強的佐證，也是當事人直接的證詞。何況國父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公布的中國國民黨宣言中，更有「溯自與中會以至於今，垂三十年」這句話。從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到民國十二年恰好是三十年！這個建黨的年代自爲定論。地點是在檀香山，這問題在上列證據中，也自可一同解決。

（二）與中會成立的月日當然是隨着要確定的問題。可是過去的黨史記載裏，都不曾提到。因爲這日期關係重要，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近兩年來以鍥而不捨的精神，於整理史料時尤其密切注意。這個問題最後果然不負心願，發現了最早的原始材料。這就是檀香山所保存的當年與中會會員及收入會銀時日清冊上的記錄。據該清冊所列最早交

納會銀的日子爲西元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是日交費者爲何寬、李昌兩位。

則與中會成立的日期不能遲於該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爲明顯。又查記載「何寬，香山，檀埠美商卑涉銀行華經理，與中會第一次開會即假何宅爲會場，被舉爲副主席。與中會創辦時文件由其保存，嘗任隆記報協理」。「李昌，香山，任檀政府衙署通譯員，與總理友誼最篤，與中會成立時奔走最力。」根據前項記載，可見何寬、李昌兩位均爲協助國父成立與中會最熱心的主要人物，而且最可注意的就是「與中會第一次開會即假何宅爲會場。」何、李兩位既同爲發動組黨最爲熱心者，而第一次開會又在何宅，則以何、李兩位交費之日，即爲第一次開會之時，亦爲近情合理的推斷。黨史會當將此項重要材料的發現及其所研究所得，報告中央，但聲明這還祇是推斷，而不能作爲定論。要得定論，必須另外獲有可靠的佐證，這種佐證最好是出自獨立而有權威的來源，同時又能與這種從原始材料的紀錄相吻合。果然經過若干時日之後，在「張溥泉（繼）先生全集補篇」中「札記」一類裏得到了慎重的記載和確實的證明。在該類「關於革命史」部份第五條項下，（第二三七頁）有以下的紀錄：「陳少白先生云：總理由華到檀，在甲午年秋間，甲午年十月廿七日，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滿清光緒二十年）第一次革命起義之前，在檀島同志約一百十二人，在卑涉（印本誤作沙字）銀行經理何寬家正式成立與中會。」

這段記錄有價值極了。第一、材料是出自獨立的來源，而所述的開會地點與時間，與原始材料完全吻合。第二、確實提出了「正式成立與中會」的日期，而且其對中西歷的推算，經複查無誤，可見這是慎重的記載；第三、陳少白先生，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是國父的革命老友，與中會創辦人之一，而是一位文采斐然有學術修養的人；至於張溥泉先生是一位最注意黨史資料而主管黨史的先進，其對黨證嚴的態度是大家所知道的。從原始資料和最有力的佐證兩方面所得到的「殊途同歸」的結論，自屬正確。

這個建黨紀念日期的考定，經過了相當的長期工作，工作者完全以虛心研究的態度和史學的方法山之。中央委員會對於這個決定也是非常慎重的，先後經過三次會議的審核，最後於中國國民黨第一二四中央常會在總裁親白主持之下核定。當這六十周年的紀念，大家都以極愉快的心情，願意這日期永久在中國歷史上放出無限的光芒。四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臺北。

六、中國國民黨中央明令確定創黨紀念日案（註一一）

一、提案

擬訂十一月二十四日爲本黨創黨紀念日，以激發全黨同志愛黨熱忱。當否？提請核議案。

第 一 組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提

說明：據小組建議：「請中央明令確定本黨創黨紀念日，以便黨員年年舉行紀念，毋忘總理締造本黨之偉大精神。」等語。當由第一組轉商黨史會詳細研究，將審議結果會提常會請予察核審定。查本黨最初之組織爲興中會，係總理於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所手創，至今恰爲六十週年。爲使全黨同志認識本黨締造之艱難，並尊重其光榮之歷史起見，似應確定本黨成立紀念日，以鼓舞黨員愛黨之熱忱。興中會成立之年份，雖經確定，惟成立之月日，向無記載，本會因職責所在，歷年均不斷注意，查考所有關係本問題之史料。據查考所得，發現最初之原始材料爲檀香山所保存之當年興中會會員及收入會銀時口之清冊。據該清冊所列最早交納會銀之日，爲公元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交費者爲何寬、李昌兩同志。則興中會成立之日不能遲於該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爲明顯。又查記載：「何寬、香山、檀埠美商卑涉銀行華經理，與中會第一次開會即假何宅爲會場，被舉爲副主席，與中會創辦時文件由其保存，曾任隆記報協理。」「李昌、香山，任檀政府衙署通譯員，與總理友誼最篤，與中會成立時奔走最力。」根據前項記載，可見何寬、李昌兩同志均爲協助總理成立興中會最熱心之主要人物，而最可注意者，即「興中會第一次開會即假何宅爲會場。」何、李兩同志既同爲發動組織最熱心者，而第一次開會又在何家，則以何、李兩同志交費之日，即第一次開會之時，亦爲近情合理之推斷。故本會意見，以爲根據前項史料，似當定十一月二十四日爲本黨建黨紀念日，以資慶祝。但此事關係重大，非本組與本會所敢決定，爲此，根據考查黨史史料之所得，謹提請核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八八

決議：由黨史會、第一組繼續搜集有關資料，再行提會核議。

二、討論

遵照第八十次工作會議，續輯有關史料，擬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爲本黨創黨紀念日，是否有當，提請

核議案。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第一組提

說明：一、關於擬定十一月二十四日爲本黨創黨紀念日一案，經提奉第八十次工作會議決議，由黨史會、第一組繼

續搜集有關資料，再行提會核議。等因。

二、此案經繼續搜集有關資料，有新發現足以證明十一月二十四日爲興中會成立日期之非誤，此種發現，在張溥泉先生全集補編中，其札記篇關於革命史（五）（第二三七頁）載有：「陳少白先生云：總理由華到檀，在甲午年秋間，甲午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滿清光緒二十年）第一次起義之前，在檀島同志約一百十二人，在卑涉（印本誤爲沙字）銀行經理何寬家，正式成立興中會」一段札記。查陳少白先生係總理最早期之發動革命組織之同志，與中會會員，當時與總理關係最爲密切，陳先生所說，當屬可信。至於張溥泉先生是本黨前輩，與陳少白先生過從甚密。其札記中，記載陳少白先生所云，當係親聞之於陳先生者。此段記載與檀香山記載可以吻合，於此可證明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是興中會正式成立之日期，是日爲本黨創黨紀念日，當可成爲定論。

三、謹提請

核議。

決議：通過。並報中央常務委員會鑒核。

（錄自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八七次會議紀錄）

三、決定

秘書處報告：查關於擬定十一月二十四日爲本黨創黨紀念日一案，前經第八十次工作會議決議，交由黨史會、

第一組繼續搜集有關資料，再行提會核議。茲准黨史會及第一組會函略稱：「此案經繼續搜集有關資料，有新發現足以證明十一月二十四日爲興中會成立日期之非誤，此種發現在張溥泉先生全集補編中，其札記篇關於革命史函（第二三七頁）載有：『陳少白先生云總理由華到檀，在甲午年秋間，甲午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滿清光緒二十年）第一次起義之前，在檀島同志約一百二十人，在卑涉（印本誤爲沙字）銀行經理何寬家，正式成立興中會。』一段札記。查陳少白先生係總理最早期之發動革命組織之同志，與中會會員，當時與總理關係最爲密切，陳先生所說，當屬可信。至於張溥泉先生，是本黨前輩，與陳少白先生過從甚密，其札記中，記載陳少白先生所云，當係親聞之於陳先生者。此段記載與檀香山記載可以吻合，於此可證明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是興中會正式成立之日期，是日爲本黨創黨紀念日，當可成爲定論」等由，復經提奉第八十七次工作會議討論，決議：「通過。並報請中常會鑒核」。謹報請

鑒核

決定：准予備案。

七、馮自由撰「興中會組織史」（註一二）

（一）檀香山興中會之起源

孫總理始創興中會實錄 檀香山爲興中會最初之發源地，亦爲孫總理幼年之讀書所。甲午年（民前十八年）夏秋間，中、日兩國以朝鮮東學黨事件勢將拂畔，時局嚴重，總理因至天津上書直督李鴻章，條陳改革，爲鴻章所拒，知滿清政府積弊重重，無可救藥，非徹底改造，決不足以救亡。遂於是歲秋自上海重遊檀島，擬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復漢之義舉。

總理少在檀島耶教學校肄業，同學及故舊至衆，其兄德彰（原名眉字壽屏）爲茂宜島大畜牧家，交遊至廣。總理蒞檀後，先赴茂宜牧場就商於乃兄，德彰首贊成之，且願割撥財產一部爲助，更移書檀埠各親友爲總理先容。其時華僑風氣尚極閉塞，聞總理有作亂謀反言論，咸謂足以破家滅族，雖親戚故舊亦多掩耳却走。經總理多方遊說，奔走逾月，僅得同志數十人。

多十月間，假卑涉銀行華經理何寬宅開第一次成立會，列席者有何寬、李昌、劉祥、程蔚南、鄧蔭南（原名松）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 一 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九〇

盛)、鄭金、黃亮、黃華恢、鍾木賢、許直臣、卓海、李祿、李多馬、林鑑泉、鄭熙、劉壽、鍾宇、曹采、劉卓、宋居仁、陳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等二十餘人。

總理爲主席，即由主席提議定名曰「興中會」，規定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爲宗旨，並宣佈所起草章程九條，衆無異議。旋公舉永和泰商號司事劉祥及何寬爲正副主席，永和泰號司賬黃華恢爲值理。章程內載每會員須納會底銀五元。另設銀會集股舉辦公家事業，每股科銀十元，成功後收回本利百元。文中尚不使明言籌餉起兵字樣，以免會員有所戒懼，蓋其時華僑尙多不脫故鄉廬墓思想，惴惴于公使領事之齟齬構陷也。會畢，總理令各會員填寫盟書，由李昌宣讀，各以左手置耶教聖經上，高舉右手，向天次第讀之，如儀而散。自是相繼入會者，尙有楊納、李杞、侯艾泉、衛積盛、李光輝、孫德彰、楊德初、陸燦、葉桂芳、尹煜傳、鄭德明、容吉兆、簡永照等九十餘人，會員總數約一百三十人。是月二十七日（即陽曆十一月二十四日）開始收取會員會底銀及會股銀，兩項所得不滿美金二千元。總理以事機口迫，急於返國，而所集義之數，殊不敷大學之需，於是異常焦灼。德彰聞之，乃更以每頭六七元之價，賤售其牛牲一部，以充義餉。鄧蔭南亦盡變賣其農場，表示一去不返之決心。同時總理復假其師美蘭諦文牧師所設學校，延一丹麥國人前曾充當中國南洋練兵教習名柏者，教授各同志兵操，每星期操練二次，同志中受教者，有侯艾泉、李杞、鄭金、鄭熙、許直臣、杜守傳、程展臣、陸燦等二十餘人。至十二月初旬，總理核算所得，約合港幣一萬三千元，遂即東裝歸國。同志先後返香港參加義舉者，有鄧蔭南、宋居仁、夏百子、陳南、李杞、侯艾泉諸人，是爲乙未（民國前十七年）九月廣州首義之導火線。惟檀島各黨員資產多非富裕，或經營小商店，或開設小農場，實力殊不充厚，於總理歸國後，即不能有所接濟。總理於乙未秋失敗後，是多重渡檀島計劃再舉，居檀多月，諸同志皆無以應之，故總理不得已而有美洲之遊。

（二）檀埠興中會會費收支表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後，從甲午十月二十七日起（即陽曆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號）開收會底銀及銀會股份銀，前後收入美金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此項收支表由副主席何寬保全三十年，題曰「興中會會員及收入會銀時日與進支數」。表內時日概用陽曆，所載第一日開收會費之日，查當年陰陽歷對照表爲甲午十月二十七日，故檀埠興中會

成立之第一日雖不能確實證明爲何日，然以總理當日籌款之迫切情形推斷之，當不出開成立會後之十日以內，殆無疑義。又上表所記會員人數共一百十二人，惟其中有一人二名者，有祇付銀會股份銀而未交會底者，有直接付總理收者，故會員人數實祇此數，以代遠年湮，無從查考，大概細數不滿一百三十人。茲照錄何寬所保全之進支表如下。此表曾載檀山「自由新報」某年（編者按：爲民國十八年）編印特刊之「檀山華僑」號。

(三) 與中會會員及收入會銀時日與進支數列左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何寬、李昌，二十八日衛積盛，二十九日李光輝、黃綿鳳、何早、宋居仁，十二月六日劉卓、林鑑泉、李多馬、程恆心、曾勝、陳孟謙，七日葉桂芳，十日黃亮，十一日鍾宇，十三日程蔚南，二十日尹煜傳、許直亞、夏百子、黃慶培。一八九五年正月三日胡味、李月、陸望華、楊納、巫恩福，十日鄭發、古義，十七日梁賓，二十一日鄭仲昭、歐陽晃、許振、黃二、譚弼、容天照、楊德初、鄭全、譚瑞、容吉兆、孫眉、陸檀生、劉登，黃卓山。

鄧松盛介紹來支會友十五名列下：陳天養、馮明、鄧顯德、鄧松盛、鄧合、伍于治、伍亞來、吳俊德、吳元德、黃保、劉宗、鄭子見、林培、鄧貴德、鄧華彩，二月二十八日楊伯貴、劉耀發，四月十七日賴養、鄒德明、馮永明、李潤貴、黃木、張丁、李六、鍾木賢、劉祥、張福如、卓海、李照、許進、鄭金、許帝有，二十日陳南，二十二日陳五和、黎顯祥、黃純、李超、吳桓、卓海、陳樞君、戴貴、李林、簡永照、蕭義勝，五月二日程祖安、劉森，五月八日梁澤袍、林輝、陳帝榮、程道、駱盡、曹彩、李露雲、林德珠、何義、黃後、陳炳階、程雨亭。六月二日伍雲生、鄔秀、胡廷、張丁貴、伍珍、李綸、黃秋、曾維高、葉金、李杞、侯艾泉。上列各會員每名捐入會底銀五元，獨宋居仁則三元，共進會員銀二百八十八元。又進鄧松盛股份銀三百元，進士人股銀二百元，古同股份銀一百元，鄭仲股份銀一百元，容吉兆股份銀一百元，孫伯股份銀二百元，李多馬股份銀一百元。（孫自帶）

進各會友底銀二百八十八元，進各股份銀一千一百元。

共進銀一千三百八十八元。

支孫逸仙滙單通用銀二千元（五二算）一千零四元。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

支孫逸仙自帶一百元，支付電信回上海電資二十元〇八毛。

共支銀一千一百六十元〇八毛，除支存銀二百二十七元二毛。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支宋居仁回唐水腳銀二十五元。

八、張繼撰「興中會之政綱政策」（註一三）

（一）興中會之政綱

第一、興中會章程：（民國紀元前十八年）

1. 設報館以開風氣；
2. 立學校以育人才；
3. 興大利以厚民生；
4. 除積弊以培國脈。

按：是時革命方開端，事實上雖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爲目的，尙難公開揭櫫標榜革命；故標榜之本旨，爲富國強兵，化民成俗。

（二）興中會之政策

是時興中會所採取之政策，並無文字上之規定，即事實上分析之，即立黨、宣傳、起義三者：「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見國父著「中國之革命」一文。

九、鄒魯撰「興中會之組織紀律與財政」（註一四）

（一）本期組織

檀香山興中會與香港興中會之組織，大同而小異。檀香山之組織，見於章程第三條云：「本會公舉正副會長各一位，管庫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專司理會中事務。」（編者按：本條與原文頗有出入，請參閱本書「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爲作圖如左：



興中會

會長

副會長

差委

值理

管庫

正副文案

(二) 本期之紀律

興中會時，無紀律專章與專條，茲就散見於各款者言之。

(一) 入會務由舊會友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爲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親填名冊，並即繳會底金銀五元。

(二) 倘有藉端舞弊，結黨營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

(三) 在公所不得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

由「一」言之，可謂入黨者，須遵守黨章，服從黨義。蓋「愛戴中國」，「爲父母邦竭力」，「挽中國危局」，服從黨義也。「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遵守黨章也。「二」、「三」則處分與禁止。處分雖未規定何種辦法，然觀「宜痛絕之」之句，其嚴厲可見一斑。而受此嚴厲之處分者，爲「藉端舞弊，結黨營私」，足見天下爲公之義。其禁止「畛域互分，彼此歧視」，足見民胞物與之懷。而本黨當時注重情誼，亦可於此見之。其禁止博奕遊戲，及一切無益之事，一則不欲黨員紛心；一則欲崇黨員之道德也。

(四) 本期之財政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

興中會時入黨者，須繳金五元，謂之會底，此例費也。另設銀會，以集銀資，每股十元。認一股至萬股，皆隨所便。所科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爲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即彙寄至總會收入，發銀會股票，此特費也。國父當甲午中日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銅壑，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國父胞兄眉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贊同而已。由興中會至同盟會成立之前，其出資助義軍者，不過國父親友中少數人耳。此外則無人敢助，亦無人肯助也。

十、檀香山革命組織之創建與發展（註一五）

興中會成立於民前十八年（一八九四）夏曆十月二十七日（公元十一月廿四日），第一次會議，假何寬的寓所舉行。與會者有何寬、李昌、劉祥、黃華恢、程蔭南、鄭金、鄭照、鄧蔭南、黃亮、鍾木賢、許直臣、李多馬、李祿、卓海、林鑑泉、鍾宇、劉壽、曹彩、劉卓、宋居仁、夏古子、侯艾泉、李杞、伍來等二十餘人，會議由總理主持，通過創立興中會，公舉劉祥（永和泰商號司理）及何寬（卑涉銀行華經理）二人爲檀埠興中會正副主席，程蔭南、許直臣爲正副文案，黃華恢（永和泰商號司賬）爲管庫，李昌、鄭金、鄧蔭南、李祿、李多馬、鍾宇、林鑑泉等八人爲值理。並擬訂規條九款，凡入會者每名要捐會底銀五元。又發表成立宣言，號召僑衆，有「集會衆以興中，協賢豪以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之語。

興中會成立後，即發起籌款，俾供革命起義之需，時總理之兄德彰及鄧蔭南二人，均抱獻產救國決心，捐助特多，同時又倡議組織華僑兵操隊，使各會員同受軍事訓練，以便回國起義，參加革命。他們延聘了一位曾到過中國充當南洋練兵教習的丹麥國人柏先生爲兵操教師，訓練地點，則由總理向母校阿湖高等學校的教師英蘭諦文先生（Rev. Frank Damon，網紀慎會的美籍牧師）商借他所設立尋眞書院校外操場，每星期操二次。參加訓練的興中會會員有鄧蔭南、夏百子、宋居仁、李杞、侯艾泉、葉桂芳、鄭照、鄭金、杜守傳、許直臣、程展臣、陸燦等，後來其中有先後回國，參加學義。乙未廣州之役失敗後，在清吏對革命黨通緝的名單中，他們差不多都「榜上有名」，足見本黨最初期的組織，啼聲初試，便完全是一個革命政黨的雛型，不同凡響；尤其總理那種高瞻遠矚，躬行實踐

的精神，值得我們效法。

民前九年（一九〇三）總理第四次重蒞檀島，時爲乙未廣州起義之役失敗後的第八年，庚子惠州起義之役失敗後的第三年，總理愈挫愈奮，力圖再舉。他抵檀後即發行革命公債（由總理親筆以英文署名）以應革命軍舉義之需，同志僑胞，認購者極爲踴躍。民前八年（一九〇四年）他又重整檀島興中會的組織，集會於檀山正埠溫逸街三樓，即四大都會館舊址，成立革命軍。改易過去誓詞中「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三句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革命目標，益爲明顯。他積極吸收新會員，黃旭昇、曾長福等多人聞風入會，黨勢大振。民前七年（一九〇五年）他又親赴希爐（Hilo）埠演講，鼓吹革命，僑胞贊同者極多，因此在該埠組織興中分會，願加盟爲國犧牲者有毛文明、黎協、鄭鑾、黃炫、黃賜、鄭爵、林弼南、林翰南、鄭益、鄭義、唐長、鄭豪、鄭仲、黃根、鄭成功、劉安、楊吉、李華根、唐安、黃義、盧球、胡錦等數十人。總理離檀前以該地致公堂（即洪門三合會總團體國安會館）有悠久歷史，會員衆多，爲增厚革命勢力計，特由洪門前輩鍾水養介紹「入闈」，受封爲「洪棍」。（洪門稱主持軍事之元帥爲「洪棍」）嗣後洪門人士，均稱總理爲大哥，革命聲勢，較前益壯。

初，康有爲及其徒衆，因爲戊戌政變失敗，逃竄海外，盛倡保皇之說，排斥革命，歌頌君憲，以取媚廣廷。海外各地，且先後有保皇會的組織，成爲總理領導革命進程中的一顆絆腳石。民前十二年三月（一九〇〇）梁啟超由日持總理介紹書抵檀，一部同志爲梁所惑，遂成立保皇會並創辦新中國報，以爲保皇會的喉舌，散播邪說，反對革命，僑胞中亦多有受其蛊惑。總理此次來檀，鑒於革命宣傳的重要，特改組興中會會員程蔚南所辦之檀山新報（又名隆記報）爲黨報，並親撰論文，與保皇報大開筆戰，又發表告同鄉書（檀島僑胞，十九爲廣東中山縣人），對革命與保皇之性質與意義，分析詳盡，一般僑胞過去之誤信保皇謬說者，至是幡然覺悟，革命空氣，日趨濃厚。

民前六年（一九〇六）檀山新報主持人程蔚南，因年老體衰，不能主持報務，遂由僑商興中會會員曾長福等另集資改組爲民生日報，總理派留口學生盧信赴檀，任該報編輯。保皇會陰圖破壞，特勾結當地移民局，控告盧信觸犯「報館主筆，不得入境」的禁例，嗣經盧等向美京抗爭得直，自後中國主筆，遂可援學校教員到美的慣例，同樣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

入境。民前四年（一九〇八）盧信辭民生日報職，由會長福、黃昆、程就、謝萬寬、謝銳明、阮渭潮、譚達、黃時初、譚亮等，醴資與盧信創辦自由新報，於是年夏曆八月三十日出版，盧自任社長，執筆者先後有盧信、溫雄飛、孫科、謝英伯、吳榮新、吳鐵城、林日強、鄭東夢、梁楚三、李公武、古石雲、譚宗濤等多人，革命言論，蜚聲海外，清廷震恐，下令禁止該報進口。盧信又與孫科、許棠等創辦大聲報，裝釘成冊，鼓吹革命，聲勢益壯。那時清廷駐檀香山領事爲梁國英，他鑒於檀島革命思潮澎湃，便密告清廷，通緝革命黨人。後因他勒索華僑每人納稅一元二角五分，盧信著論抨擊，全僑嘩然，檀島華僑遂集會於亞鴉刺公園，主席爲鄭友，議決驅逐梁氏出境。僑胞對清廷的反抗行動，由於革命輿論的鼓吹，日見積極。

十一、孫公中山在檀事略（註一六）

孫公譚文，原諱帝象，字德明，號中山，一號逸仙，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陰曆十月初六日寅時，即陽曆十一月十二日，籍廣東省香山縣翠亨鄉，在新改中山縣東鎮第四區，距縣城約六十里。孫公未降生前一月，其母楊氏太夫人夜夢鄉廟之所謂北帝者，披髮現形，驚醒後，誕公於翠亨鄉之里第，故以「帝象」名公也。

公祖字敬賢，父譚林，字達成，號道川，業農，爲村中忠厚長者，母楊氏，皆享高壽，終時俱在八旬外。公兄譚眉，字德彰，號壽屏，前在檀香山茂宜島姑刺埠置有山地約千英畝，種植畜牧，積資數萬，前後盡交其弟經營國事，幾至破產，乃回中國，在九龍再業畜牧，藉此聯絡黨員，運動新軍起義。辛亥三月廿九日黃花岡先烈舉義失敗，被解出境，遂往廣州灣從事商業，召集舊黨員。迨武漢革命成功，公被選爲臨時大總統，眉公又回澳門，組織衛隊，隨行就任。民元回鄉，民四在澳門棄世。

孫公幼時在鄉馮家祠書塾讀書，其師爲賴桂山及程直生諸先生。館規甚嚴，循循善誘。其中學童性好動，公其一也，常與同學列鬥，故綽號爲「石頭仔」。遇不平事，如鄉人之畏盜、畏差，常挺身出而干涉。由檀香山回鄉後，凡鄉政如教育、防盜、街燈、清道、防病，皆爲籌辦。及學醫後回鄉，凡來求診治者，皆不受醫金，活人無算。

孫公居鄉，書席前中西文咸備，醫科格致遊戲，每日均以時間表定之；餘暇則從鄉中宿儒陸星甫、楊漢川潛修

國學。父常帶青年到山門溪作泅水種種遊戲，及學槍法、習體操等事。公與鄉人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常談革命，出入與偕，鄉親目之爲「四大寇」。

初孫公在鄉間，見鄉人由廣州、香港、澳門、金山、檀香山而回者，經濟豐裕，並談洋務，故有出洋之志。其兄在檀香山衣華位孖爐地方業農，已有積蓄，回鄉携弟來檀，公遂於一八七九年夏抵檀香山，寄宿於卑沙書館，即今之意奧蘭尼學校。時年十四，與殷商鍾宇、唐雄等同學，向學極勤。當時每學生學費約一百五十元，便足一年之用，因其時檀島生活程度甚低故也，別校所收學費更有廉於此者；惟其兄愛弟心切，不吝資助，故始終無轉校。土人罵夏烏刺初教英文字母，校長威利士牧師，乃由英國派來檀治理校務者。學生朝晚須到教堂祈禱，並令在校長住所用餐，拜上帝，讀聖經，同學之華童概爲信徒。公意欲洗禮，以告其兄。不料兄聞之怒甚，且悔令入該校，大有用夷變夏之憂，責罵備至。時有翠亨鄉人楊鯤池者，晤其兄曰：「此子有大志，信外教何害？不可過於束縛。」其兄怒仍未已，暗稟太公，促他回鄉，加以嚴訓。公以有志未遂，旋下埠，求助於同學鍾宇，且留居其府上。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舉行畢業禮式，來賓甚衆，在座有檀香山國王架刺鳩、王后奄麻、宮主利奧架蘭尼。英文文法科由國王親自獎賞，公爲第二名。公於三年前英文未識一字，竟列第二名，足徵其敏而好學也。畢業後，決意回國，未有旅費，同學華生每人助數金，以成其行；教士化冷爹文及西商波雲士及亞打頓等，亦有捐助；鍾宇僱艇送公開船，緣當時檀港尚淺，輪船寄碇海心故也。一八八三年公回抵鄉間，具有中外學識、文明思想。其後來成就偉大之事業，即基於此矣。

公由檀抵鄉，受父母所責，依然不易其志。嘗與其友陸皓東等巡視廟宇，將北帝廟神像手指折斷，後過左廊，將金花夫人神像面皮刮破，一耳墜下，獨留石廊天后，未受損傷。鄉人見之，大爲鼓譟，謂將一鄉所敬奉之神像毀辱，必罹大禍，召集鄉老會議，訴諸太公，謂其子如此舉動，大違鄉規，若神降災，惟伊是問。當時太公當衆認錯，並允從新再塑神像，衆怒始息。公有此出人意外之舉動，其趨羣之志向，改革之思想，乃革命之起點也。

公以故鄉父老迷信神權，驟難改革，遂往廣州英美教會之醫院幫工。此院乃嘉醫生主任。後嘉醫生見公非常勤學，略授以醫術。當時教會正擬開設醫科學校，以爲教授華生學術之所。後公在香港皇家書院畢業，乃立志學醫。

行年二十，奉父母命與本邑外學鄉盧耀顯公女公子慕貞結婚，生一子名科，即哲生，前任廣州市政廳長，現任中央委員兼鐵道部長。又生二女，次女於民國二年離世；三女琬，配戴恩賽博士，現奉派駐巴西公使。盧夫人稅居澳門，宣傳基督道理。公在香港時，與唐雄等洗禮入教，入香港雅利士醫院（按一作西醫書院）學醫。此醫院乃何啓博士所設立者，博士前在蘇格蘭得醫學博士銜，及在英京再得大律師銜，與英婦雅利士結婚，夫人旋在港棄世，故何博士創辦該醫院，以紀念其夫人雅利士，今已歸併香港大學矣。公從學康德黎博士五年，一八九二年始在醫學堂畢業，所領憑照，予權用內外科行世，公即往澳門設醫館。埠中華商設有醫院，乃用中藥治病。該院請公用西法行醫，常有剖割大症，即請其師康德黎由港過澳，同施剖割，公因是救活多人，口碑載道。乘間招集黨人，圖謀革命。旋葡人忌公醫術，謂未有葡國醫照，不准在澳門行醫，遂往廣州博濟醫院懸壺。常有政界踵門求治，藉此知官場內容腐敗，遂撰革舊維新一書上李鴻章，署名「孫文上書記」。李相見書不納。一八九四年重遊檀島，始創興中會，應者寥寥，惟眉公、鄧松盛（即鄧三伯）及數十親友耳。一八九六年再到檀島，謀推廣興中會。當時中西擴論會為請名人演說，歡迎之登岸，在隆記報館設立機關，招集黨員，共商大計，設法整理黨務，從此黨員日見增加，革命之風，一時澎湃，因此引起保守黨之反對，孫公即在隆記報館發抒意見，遂起筆戰。隆記報館乃檀香山中文報館之第一家，創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是由本埠殷商程蔚南所創辦，編輯員為林鑑泉，訪員何寬，繙譯員李昌。李解職後，由陸燦主理。該報館後因轉手，改名民生日報，原有之宗旨全失，遂有一九〇八年八月三十日自由新報之產生，以為革命機關。及去年又有中華公報之設立，以宣傳革命，發揚黨務為宗旨。

當時公為推廣興中會，在隆記報館招集同志開會於何寬府上，主席乃劉祥，理財黃華恢，書記程蔚南，顧問李昌。李昌乃前在香港皇后書院畢業，與僑商程蔚南同學。李學貫中西，檀山政府聘其來檀，充當衙署通譯，乃革命黨中之重要人物也。入會誓詞，由他宣讀，孫公首先行之，其法在開卷聖經上置其左手，右手向上高舉，懇切求上帝鑒察，然後照誓詞宣誓。會員大都青年有志之士，後有遯孫公號召回國，如鄭照、夏百子、李杞等。或尚留檀者，皆名望商家及辦理耶穌教會事業，素孚衆望，或在銀行及大商店當職者，或自營商業亦有之。該會第二次開會則有百人，三次則更多矣。衆以將來或須回國作戰，乃選出會員一班，請一丹麥人曾當中國南洋練兵教習隊長名柏者

，在化冷爹文先生之書院教以兵操。當時葉桂芳、鄭熙、鄭金、杜守傳、許直臣、程展臣、陸燦等，皆在與操之列，每星期操二次，係用木槍。爹文先生於檀島學成，往中國傳教多年，是時同檳，設立學校，名「尋眞書室」，教授華童，故到場習操者，先生多相識之。其時華僑尚垂辮髮，惟留學生短髮易服。孫公在檀時募會款美金六千元，當時已算爲巨數，因華僑財政非豐厚，惟恪守黨綱，盡其能力以助之耳。

公到埠未久，適英人康德黎醫生回國，道經檳埠。常例過往乘客，必登岸遊覽一天。康醫生夫婦帶一日本女傭同乘馬車遊埠，公遇於途，上前招呼。康醫生錯認爲日本人，令口婦爲之傳譯。公以英語向康醫生回答，說及姓名方能認識。及暢譚已畢，握手言別，康醫生謂公曰：「若到英國，請在我家住。」公諾之。一八九六年六月，孫公以檀山華僑贊成革命者頗衆，遂決計赴美一行。舊金山埠華僑亦多，大開歡迎會，慷慨捐資，由金山通往有華僑居留之各埠，招集黨員。公謂欲改造中國，非實行革命不可，美國亦然，方能脫離英國之羈絆，聽者皆心悅誠服焉。

一九〇三年，孫公籌款定有一種發行金幣辦法，票額爲中國銀十元，乃中華民國所發，印有青天白日旗，一面謂民國成立後，由國庫還銀百元，署名總理孫文，財政司李公俠，凡有華僑所到之處，無不踴躍出資購此金幣，足見當日華僑渴望革命之成功也。

一九〇三年十月，公在檀時，西字早報云：「一千九百年九月，孫博士欲造成一新中國，由南省起義，傾覆專制政府，先生所統帶不過六百人，先在香港附近地方發難，意欲攻佔惠州，並約別處齊舉，取福建省爲根據地，以數百民軍與四千滿洲兵對敵，初獲勝利，後因所約之黨人同時在別處起事，不果，遂令先生之計劃不成，殊可惜也。」

一九〇三年十月七號檀埠西字早報云：「著名中國革命家孫逸仙博士由橫濱乘西伯里亞船於五號到埠，在本埠秘密或公開運動，華僑深信革命真理，多趨向之。」十一月十四日該報又云：「昨日下午著名革命家在荷梯厘街戲院演說，勇敢而言曰：革命爲唯一法門，可以拯救中國出於國際交涉之現時危慘地位，其望華僑贊助革命黨。聽者接納，表示熱誠。先生身穿白麻衣服，頭上短髮，恰似小呂宋人，其言論舉動，顯出有感人羣之力；加以態度溫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二〇〇

，秩序整肅，真乃天生領袖。彼謂首事革命者，如湯武之伐罪弔民，故今人稱之爲聖人。今日之中國何以必須革命？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於義和團一役，二萬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輩四萬萬人一齊奮起，其將奈我何？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又在利利霞街華人戲院演說，聽者亦座爲之滿，無容足地。何寬爲主席，公演說，雄辯滔滔，徵引歷史，由古及今，謂：漢人之失國，乃由不肖漢奸助滿人入關，征服全國，他深信不久漢人即能驅逐滿人，恢復河山云。」孫公留檀，至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一號，搭高麗船往金山，擬遊美國各埠，由東取道回國。公之往來，皆守秘密；惟此次對西報訪員，說及行程，謂他希望於夏間可到中國，大起義舉，傾覆滿洲；惟在何地點，他則謹慎不言。訪員祝之曰：「我望有口得了消息，汝被舉爲中華民國大總統。」公莞爾而笑。

一九〇四年，以爲時機已至，再起推翻清廷，乃創立中華革命軍於檀山正埠溫逸街三樓，即今日之四大都會館舊址。晚間招人報名入會，開會爲之主盟，誓詞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如有反悔，任衆處罰！」日間來訪求醫治者，隨即診視施術；患大症者如楊鯉池酒醉脫腸，楊暢文妻譚氏脫腸四次，陳大茂長女產後，萬分危險，奄奄待斃，皆爲救活，不受謝金，其他患症遇救者，尚不勝其數。本埠老藥房尚存有孫公經驗良方多紙。是時入會絡繹而至，約有千人之衆。

一九一〇年，堀貞一牧師（現在檀埠督理口人基督教堂）聞公在科街福音堂聽書，特往訪問。後到牧師家中暢談，問及革命事業，答云：「遞年則可起義，一切計劃均已籌備，此次自信成功。」又云：「前次回國，西部可以自由行動，因軍隊均已疏通，準備聯合革命黨起事，故往來皆得彼等之護衛也。」是年公將近離埠之時，華僑開歡送會，化冷爹文牧師爲主席，因牧師佩服公之主義，又知中國人有此毅力也。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三號，檀香山西字早報訪員見孫科君後，登諸該報云：「江蘇都督程德全已電促其父回國。」訪員問曰：「乃父將有中國總統之望乎？」答曰：「未知。」並謂：「民國旗式非新製成者，十六年前首義，已在國內飛揚。此旗乃陸皓東所定，青天白日，所以表示自由日光照耀環球。」是時孫君尚未畢業，謂意欲再往美國加州求學。後在加州大學畢業，再入哥林比亞大學，得碩士銜。

公生平不吸煙，不飲酒，廉潔儉樸，忠厚和藹，寬容大度，誠不愧古今中外一大英雄也。

十二、孫眉公事略（註一七）

孫德彰，原名眉，字壽屏，廣東香山縣翠亨鄉人，孫總理（以下簡稱總理）之長兄也。居檀香山時，中外人士皆稱之曰阿眉，鮮有知其名德彰者。眉公二字，則於丁未年（一九〇七）自檀香山歸國後，同志以其年高德劭，始尊稱之。父名達成，早歲業農，娶同邑隔田鄉楊氏女爲室，閱十載而生德彰，德彰幼聰敏好動，讀書鄉塾時，性頗強悍不羈。稍長，達成公以鄉人多赴夏威夷羣島營工商業，楊夫人之弟文納適由檀島返粵，乃使德彰從其舅舅赴檀謀生，藉諧世故。時夏威夷尙係獨立國，爲土人君主制，各島之農工墾植貿易事業，大部由中日二國人經營之。德彰至檀，初爲鄉人傭作，旋以舅氏楊文納之助，自向當地政府領地開墾。數年後更租得茂宜島荒地千數百畝，廣事畜牧墾植，又在茄荷舊埠設一商肆，爲銷售農牧出產品機關，因而漸致富厚。丁丑年（一八七七）夏威夷政府以德彰經營農牧，成效卓著，特許以多招華人來檀，大興墾務之權利。德彰遂於回粵娶婦之便，在翠亨鄉招徠鄉人赴檀工作，一時應者甚衆，同時更租一大帆船，載此項移民數百人以往，在檀之老華僑莫不驚其魄力之偉大焉。次年戊寅（一八七八）德彰以所業口進，乃函請達成公挈楊太夫人及幼弟赴檀就養，達成公無意遠遊，祇命總理隨楊太夫人前往，時總理年僅十三而已。德彰初命總理在茄荷舊埠商肆習懋遷術，旋知總理有志求學，乃遣赴檀山正埠教會學校習英文。癸未年（一八八三）總理以受耶穌教薰陶多載，漸篤信教義，毅然欲受洗禮。德彰聞之，恐總理日趨洋化，遂使回粵專攻國學，以補不足，且分授財產一部以策勵之。總理回粵後，與邑人陸皓東同致力國學，日有進益；尤於鄉人迷信偶像事，攻擊不遺餘力。某日，鄉中北帝廟及天后廟之偶像先後被毀，鄉人指爲總理及皓東所爲，羣向達成公責難，達成公乃遣總理至香港就學以避之。德彰得父書，遂召總理赴檀免禍，並令退還所給財產以示懲戒，總理無異言。居久之，以屈處茄荷舊小肆，其志不伸，遂自赴檀山正埠，擬取道歸國，德彰親往慰留，且以不給旅費難之。總理乃求助於授業師美教士芙蘭諦文，芙教士慨然贈以美金三百，總理始獲成行。既而德彰深悔督責總理過嚴，即以鉅資寄達成公助總理向學。戊子年（一八八八）春達成公病故，德彰於數月前聞父病重，已回粵奉侍湯藥，至是對於總理愛護備至，凡總理所需學資，均允源源供給，故總理在粵港肄業醫學多年，用度寬裕，皆德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二〇二

彰所給予者也。

癸巳年（一八九三）夏威夷羣島土人大舉革命，上王拒戰不利，被迫退位，遂改君主制爲共和。德彰往日思想頑固，側重保守，至是耳濡目染，心理爲之一變。每聞鄉人自祖國來，報告總理時作歌頌太平天國及反清復國言論，咸不以爲異。戚族中有恫以抄滅家族等辭，促其勸阻總理行動者，概一笑置之。甲午（一八九四）中日開戰，清軍連戰俱敗，總理以國勢岌危，非傾覆異族政府，收組民主政治，不足以圖匡救，遂於是年秋冬間赴夏威夷，向舊日親友募集義款，企圖大學。抵檀後先蒞茂宜牧場就商於乃兄，德彰嘉其志大言大，首贊成之，且劃撥財產一部爲助。復致書檀山正埠親友爲總理先容。於是正埠有志僑商何寬、鄧蔭南、李昌、鄭金、鄭照、李祿、劉壽、劉祥、程蔚南、黃亮、鍾木賢、曹采、劉卓、陳南、許直臣、宋居仁諸人，遂先後加入總理所倡設之興中會，並募得義捐數萬元。總理得款後，乃於是年十一月歸香港大舉進行，旅檀同志鄧蔭南、陳南、宋居仁等亦先後回國參與義舉，德彰大力焉。乙未（一八九五）九月，廣州第一次革命之雄圖，既以事前失敗。總理初亡命日本，組織橫濱興中會。旋赴檀島晤德彰商再舉計劃，德彰慰勉有加，且屬勿餒初志。未幾楊太夫人偕總理盧夫人及其子科亦由鄉入陸文燦護送至檀，均居茂宜牧場。德彰語總理，謂在檀同志新遭失敗，人懷懷喪，籌款宜徐圖機會，此時應先向他處發展，乃易爲力。總理深以爲然，因有美洲及英國之行。至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總理遂有被囚倫敦清使館之一幕。

十三、鄧蔭南傳（註一八）

鄧公蔭南，廣東開平人也。諱松盛，字有相，爾時清廷嚴緝黨人，故諱其名字曰三，非行三也。公考字善崑，業農，家雖貧猶教之讀，勉以遠大。公賦性正直廉毅，少有異志，善槍術，壯遊美洲檀島，經營大糖搾於茂宜山，容納華工數千人，獲資頗豐。自光緒甲午中東戰起，公感于祖國危亡，知非驅除滿虜，無以刷新國治，適是時孫中山先生抵是島倡革命，公心折之，願傾家相助，遂訂生死交焉。

嗣是創立興中會，公任副席，宣傳主義，鼓吹入會，藉收海外華僑爲臂助。乙未雖孫先生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爲根據地，遂開乾亨行於香江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公爲主幹員之一，乃

出其巨資購置軍械，運赴省會，與陸皓東謀絕大之舉，詎天未造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陸皓東殉焉，此雖失敗，然公猶不懈其志也。

戊戌捲土重來，約日人宮崎寅藏假設東亞同文會於羊城西關寶慶街爲機關，於是有蘇焯南、黃大漢等查探軍情，測繪險要，擬乘其無備而攻之，卒以時機未熟，徒呼奈何。己亥公與陳少白、李紀堂創設「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吾黨有日報者自此始。

庚子聯軍入京，清帝出走，公以爲有機可乘，遂與李紀堂等接濟鄭士良惠州起義，自與史堅如入羊城以謀響應，特聘英官麼近爲顧問，蕭勵初爲通譯，潛入沙面三板廠側租紫洞艇商議大計，與蘇焯南、黃大漢等慘淡經營，屢謀不得要領，遂轉而爲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之舉。當時公爲總司令，慨然犧牲多金，爲孤注之一擲，令蘇焯南、黎禮暗運炸藥，並購鐵桶三個，一交旗人黃福令炸將軍署，一交李植生令炸陸提鄭潤材，一交史堅如令炸督署。史君覓得後樓房民屋，着宋少東夫妻駐守，隨令溫玉山自乘肩輿運藥入屋，是晚開掘地道十數丈以通督署，埋藏炸藥，由史堅如導火，遂於九月初八日燃放德壽不中，越日公買棹向陳村逃險，史君則乘輿往附澳輪，詎甫抵碼頭即被郭元佳串同史氏園丁陳某及軍隊，將史君逮捕，交南海縣裴景福審訊，定以死刑，遂於九月十八日被害于天字碼頭，年才十九歲耳，公聞耗爲之痛哭流涕者久之。

壬寅復與李紀堂、洪全福謀，擬趁元旦省會文武官員致祭萬壽宮時一網而擒之，李紀堂乃毅然捐貲，購藥械、置較剪、辦紅巾，指揮梁慕光、蘇焯南、黃大漢於除夕舉事，不料爲奸人告密，謀不得手，然其功雖不成，其事已轟傳全國。公遂退居於英界青山，借名種樹，伺隙徐動。時有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黃克強諸公集議於此，商權密勿，故辛亥三月廿九之役，公與有力焉。

八月武昌起義，公率黃大漢、江恭喜克復新安。民國改元任新安民軍總監督，旋任開平民團總長。七年奉孫先生命，設機關於羊城珠光北約，緝義軍討逆，譚思義、司徒不偏、旗人黃福，向華寧里裝置藥彈，謀擊當道，事洩三人被害，而蘇焯南、黃大漢等幸免於難，公乃厚恤譚等遺族，聞者敬之。九年粵軍返旆，公又緝義勇隊響應，大局既定，任石龍釐廠總辦、總統府諮議、內政部農務局局長。到官以還，卓著政聲，而盜風斂戢，今猶稱道弗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二〇四

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政變，孫先年蒙慶兵艦時，餉盡援絕，公獨以萬金濟焉，並率兵開平以爲聲援，尤爲難能可貴。尋與黃大漢赴滬，晉謁孫先生面授機宜，奉命回澳組織軍事機關，令黃大漢爲華僑炸彈決死隊謀炸逆黨，以致省城一夜七炸彈。十二年春廣州江防司令部會議，無何議場變起，得黃大漢走報，公聞訊痛憤不欲生，嗣是抑鬱不寧，病遂不起，是年二月五日告終於澳門住所。溯生于道光丙午年八月初四日，積聞春秋八十有一。彌留時猶諄諄誨諸公子以努力革命，未嘗有一語及家事焉。蓋其熱心黨國之精神，貫徹始終，故臨易簣之頃，顛沛不忘，有如此者。孫先生誄曰：「愛國以命，愛黨以誠，家不遑顧，老而彌貞，非過譽也。特令追贈陸軍上將，葬以國禮，豈足以報公子萬一哉？嗚呼可以風矣。先夫人譚氏暨陳氏、韋氏均賢淑，內助有聲，韋氏生存，政府令恤，公子植鄉、啓祥、信貞皆能繼志述事，女月棠、月梅、月霞、月祝，孫景坦等八人，葬公於廣州東郊大寶崗，余與公共事有年，知之深，敬之篤，謹揭其懿行銘諸貞石，以示天下後世焉。」

清廷以旅順失守，李鴻章調度乖方，革職留任，摘去頂戴，命即赴大沽、北塘巡閱布置，並命宋慶回顧後路。

李鴻章於昨日得威海衛營務處劉含芳電告，知旅順已於二十四日失守，乃自請從重治罪。（註一九）本日，清廷著鴻章革職留任，摘去頂戴。並命渠親赴大沽、北塘佈置。宋慶一軍，迅拔隊由熊岳、海、蓋迎岫巖敵，防遼、瀋，以回顧後路。章高元、李光久、聶士成、呂本元等軍，駐大高嶺，與唐仁廉、吳鳳柱軍合，悉歸宋慶節制。（註二〇）

清德宗與慈禧太后召集御前會議，商討攻守大計，君臣均束手無策。（註二一）

註 一：參照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四，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世界書局影印版。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二二至二三，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商務印書館初版。

註 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四。

註 三：參照「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六〇——六一；「革命文獻」第三輯；馮自由：「興中會組織史」，頁

註四：「國父全集」，第四集，頁五五——五六，民國三十九年九月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註五：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二六，民國四十二年八月，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六：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一一——一二，民國五十四年十月，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版。

註七：原文見組織旬刊，第一卷第十四期，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出版；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四九二——四九八。

註八：原文係中國國民黨史會庫藏原件，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四九八。

註九：原文見民國四十三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向中常會提案確定與中會成立時地問題之考證；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四九八——五〇〇。

註一〇：原文係中國國民黨史會庫藏資料，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五〇一——五〇四。

註一一：民四十四年五月七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八〇次會議紀錄，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

第一編第九冊，頁五〇四——五〇五；民四十四年七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二四次會議紀錄，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五〇六——五〇七。

註一二：「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二——八。

註一三：錄自「張溥泉先生全集」第一編，頁二——三，民國四十年十月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註一四：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篇，民國三十三年增訂本，頁二三——二六。

註一五：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中國國民黨在海外」，民國五十年十一月，中央文物供應社。

註一六：革命文獻第三輯（總頁二七八——二八四）。

註一七：「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一一——一二，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商務印書館影印版。

註一八：引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一)，頁四五九——四六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九日

二〇六

註一九：「李文忠公全集」(三)，奏稿七十九，頁七〇八—七〇九。

註二〇：「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二，頁三一七二(原頁二三)。

註二一：「翁文恭公日記」(四)，頁七〇九。

二十九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清廷議和代表德瑾琳(Herr Gustav Detring)抵神戶，日首相伊藤博文以其非全權，拒與相會。

德瑾琳偕英人米契(A. Michi)于本日晨抵神戶，日相伊藤博文以其非全權，拒與相會。時外交界謂德瑾琳實質上為鴻章之個人代表。

方東事初起，李鴻章已主和議，及諸城邑相繼陷，朝旨亦思言和。十月，侍郎張蔭桓至津，就鴻章議，未決。鴻章旋命稅務司德瑾琳東渡，齎鴻章致日相伊藤博文書，抵神戶；日官電達內閣，內閣謂私函非國書，德瑾琳非中國大員，非欽派不能與議。(註二)

附錄：

一、美國之居間調停(註一)

甲午戰役進行中，迭有和議之醞釀。九月間英俄二使嘗致力於此，然其時旅順未陷，遼瀋無驚，議款之說，格於清議，勢難成爲事實。迨遼東、山東同時告警，和議趨向，漸形有力。而啓議和之端緒且始終居間者，厥爲美國，駐北京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與駐東京美國公使譚恩，爲最有力之人物也。譚恩於十月初九日(西曆十一月六日)以美國政府之訓令，轉達於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其概要曰：

深堪痛惜之中日兩國戰爭，毫未危及美國亞細亞之政略。美國對兩交戰國之意圖，在不偏不黨，重視友誼，守中立之義，希望兩國之安好而已。然戰鬥彌久，若無限制日本軍海陸進攻之法，則與東方局面有利害關係之歐洲強國，難免對日本將來之安固幸福，爲不利之要求，以促戰爭之終局。美國大總統從來對於日本國懷深

篤之好意，若爲東方和平，當於不損中日兩國名譽之範圍內，盡力仲裁。可探問日本政府承諾與否。

美國此舉，純出善意。然當時日本狂於戰勝，氣燄甚熾，對於調停仲裁，當然不能承受。日政府經審議後，於十月二十日（西曆十一月十七日），以覺書答覆譚恩，略曰：

日本政府對於欲爲中日兩國和睦盡力調停之美國政府之厚意，深爲感謝。惟交戰以來，帝國之軍隊，到處獲勝，今爲息止戰爭，以爲無乞助友國之必要。然帝國政府非欲乘勝超越此次戰爭之正當結果之定限外，逞其慾望。但在中國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國政府乞和前，帝國政府不能認爲已達上述定限之時機。

蓋當時歐美各國，深抱日本若獲全勝，將陷中國於土崩瓦解之疑慮，故此覺書中特著不超越定限以外之語，以事緩和。然日政府雖於表面上如此答復，陸奧宗光則私語美使譚恩曰：「日本政府現在若公然請美國政府爲中日間之仲裁者，或不免招致其他第三國之干涉，故不能不避免此事。異日若由中國開講和之端緒時，美國居間交換彼此之意見，則我政府當深倚賴美國政府之厚誼」云云。譚恩當將此意電達華盛頓及北京美使田貝。田貝旋於十月二十五日（西曆十一月二十二日）電譚恩曰：

中國將直接開講和談判之事，委託本使，講和條件爲承認朝鮮之獨立及賠償軍費二件。乞將此旨遞達日本外務大臣。

譚恩因將此意轉達於陸奧。蓋此時中國已決意款和，並派德璀琳東渡也。

二、德璀琳之東渡（註三）

十月中旬，戶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軍務督辦處文案景星，奉密命至天津，與李鴻章商和議之事。鴻章以爲日方志得氣盈，若遽派大員赴日，慮爲所輕，因決定派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Herr Gustav Dettling）前往，而開中日議和非驢非馬之一幕。李鴻章於十月十六日致函恭親王奕訢陳述此事曰：

王爺鈞鑒：敬肅者，十三日欽奉寄諭，謹於寒已電內先行覆陳大略。樵野侍郎、月汀（景星字）觀察來津，奉到賜臧，祇聆一是，藉得詳詢起居。敬悉軫念時艱，焦勞備至，下懷馳結，匪可言宣。鴻章籌備倭事，將及半年，毫無寸效，上廑宵旰之憂，下叢中外之謗，困心衡慮，踴躍難名。當此咎愆山積之餘，本不敢再參末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月二十九日

二〇八

。惟既仰蒙垂問，伏念王爺慨然出身，力任天下之重，鴻章受恩深重，誼同休戚，但有所見，何敢稍存引避之私。竊意此時事機，十分緊迫，誠如聖諭，須亟籌救急之方。現各國雖允出爲調停，深恐遠不濟急。六七月間，曾聞倭人之意，非不願款，但欲中國自與商辦，而不願西人干預。目下彼方志得氣盈，若遽由我特派大員往商，轉慮爲彼輕視。鴻章與樵野等再三斟酌，惟有揀擇洋員之忠實可信者前往，既易得彼中情僞，又無形迹之疑。查有津海稅務司德璉琳，在京供差二十餘年，忠於爲我。六年俄事，十年法事，彼皆暗中襄助。十一年伊藤來津與鴻章訂約，該洋員與伊藤幕友某英員相識，從傍贊導，頗爲得力，若令其前往察酌辦理，或能相機轉圜。否則，暫令停戰，以待徐商，亦解目前之急。如以爲可，由鈞處迅速請旨派往，以重事權。該洋員到倭後，一切籌議情形，隨時電商，即轉達鈞署裁奪。是否有當，懇候主持。未盡之言，均由樵野兩君面陳。專肅密復，祇叩鈞福，諸祈崇鑒。

清廷因決定使德璉琳赴日，德璉琳請以頭品頂戴往，鴻章權宜授之。於十月二十二日賚李鴻章致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函東渡，鴻章之函曰：

大清國欽命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伯李，致書大日本國總理大臣伊藤伯閣下：我大清成例，與各國交際，素尚平和。現與貴國小有齟齬，以干戈易玉帛，不免生靈塗炭，今欲與貴國商議暫飭海陸兩路罷戰。本大臣奏奉諭旨，德璉琳久居中國，忠實可靠，著李鴻章密速電聞，欽此。即飭頭品頂戴德璉琳馳赴東京，賚送照會。應如何調停復我平和舊例之處，應請貴總理大臣與德璉琳籌商，爲荷。（此函譯自日文）德璉琳以十月杪抵神戶，日本兵庫縣知事周布公平詰之，爲電達於內閣。日政府謂：鴻章牘，非國書也；德璉琳西人，非中國大員也。苟非中國著望大員，且欽派東來，不與議也。斥德璉琳歸，德璉琳以十一月初一日啓旋回華。

英國泰晤士報社論，以旅順不戰而失，主張英應主動承認日在遠東之優勢，以示親日。

倫敦泰晤士報 (Times) 以旅順未戰而失，建議英政府承認日本在遠東之優勢，主親日，不反對日本占臺灣。英國應考慮，若日本占北京，英國是否占華南？（註四）

註一：國史館審校檔。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頁二二六——二二七。

註三：同註二，頁二二八——二三〇。

註四：「字林西報」，頁九一九，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

十一月

八日(十二月四日) 清廷命恭親王奕訢為軍機大臣。

本日，清慈禧太后命恭親王奕訢補授軍機大臣。（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三，頁三一八三（原頁十三—十四）。

十一日(十二月七日) 四川舉人張羅證上書切責李鴻章。

四川舉人張羅證上書切責鴻章，謂「人不怕倭寇，只怕中堂反；見公家眷于永和棧門前過，乘輿數十百號，公以五百萬兩買倭茶商開設；公子又為倭駙馬，故人謂公一日不死，天下一日不平，證謂公一日不私，則天下一日不亂」。（註一）

按：甲午戰爭失敗後，時人集矢于李鴻章者比比皆是，其中以責鴻章之因斂財而富甲天下者尤夥，梁啟超氏亦曾言：「……而鴻章以豪富聞于天下，……世人競傳李鴻章富甲天下，……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當舖銀號，多屬其管業云。」（註二）可見鴻章之富于資產，殆為不爭之事實。關於「公子又為倭駙馬」一語，想係指李經方于任駐日公使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一月十七日

一一〇

曾納日女印中桂子爲妾一事而言。(註三)。

註一：孔廣德：「普天忠憤集」，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二：梁啓超：「論李鴻章」，中華書局，民國四十七年六月臺一版，頁八〇—八五。

註三：石河幹明：「福澤諭吉傳」，卷三，頁二八六，昭和七年東京岩波書店出版。

十七日(十二月十三日) 日第一軍陷海城。

初日軍陷安東後分兵兩大枝，謀窺奉天。一以鳳城爲根據，日與在大高嶺中國防兵崎嶇角戰；一謀從安東岫巖西犯析木城、海城。宋慶與日軍相持于海城，日軍攻缸瓦寨破之，宋軍退守田莊台。及旅順陷後，諸軍均奔復州依宋慶，宋慶命章高元、徐邦道、張光前諸軍守蓋州，自率諸軍北援。日軍撲蓋平，與章高元相持蓋平河上，高元鏖戰甚烈；日軍乃繞攻鳳凰山，張光前聞敵至先潰，日軍遂占蓋平，分軍夾攻高元。徐邦道方自牛莊移師還，合高元拒敵，不敵，敗退。姜桂題率銘軍來援，邦道請夜搗蓋平，謀克復，桂題辭焉！諸軍皆退營口。宋慶自率徐邦道、馬玉崑兵萬二千人屯太平山，日軍猛攻之，邦道、玉崑等力戰却之；及日大軍大集，邦道等遂敗退；日軍乃據太平山。依克唐阿、長順，以兵三萬人，圖收復海城，屢戰不利；李光久率湘軍至，會邦道攻海城，亦不克。踞海城日軍僅六千人，而宋慶所部四萬人，益以提督唐仁兼駐奉兵萬六千人，凡五次猛攻，竟不能拔。日軍堅守海城，綴中國大軍，以便海道擾山東也！自平壤敗後，朝廷慮淮軍不可恃，乃思用湘軍，故湘軍舊將魏光燾、陳湜、李光久等，皆令募軍北援。召兩江總督劉坤一至，授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湖南巡撫吳大澂及宋慶副之，大澂已先駐山海關也。大澂率軍圍海城，環海城而軍者六萬餘人，日軍逼遼陽，依克唐阿託詞援遼東，移軍遁，長順隨之；魏光燾敗于牛莊，李光久棄軍逃，死二千餘人，被虜八百餘人，喪失軍械甚富；吳大澂棄田莊台，夜奔入關，將士從風而靡。宋慶方以三萬人屯營口，而軍資皆在田莊台，及大澂

逃，宋慶回軍援之，留蔣希夷守營口，希夷遽棄營口遁去。宋慶扼遼河北岸，日軍盡以所獲砲列遼河南岸，猛攻之，守岸兵不支；日軍踏冰渡河，宋軍潰而西，于是遼河以東，盡爲日有矣。（註一）

附錄：遼東之敗（註二）

自日軍渡鴨綠江，連陷九連、安東、鳳凰諸城，我軍遂扼大高嶺，以固遼陽之防。遼陽者盛京之南屏，遼東之重地也。九連、安東之日軍，分枝西陷岫巖，入海城，日將東窺遼陽，西瞰營口、牛莊，於是關外寧遠、錦州諸城大震。四川提督宋慶聞警，率所部自蓋平北援，以護營口、牛莊。將軍依克唐阿、長順各率所部西援，以護遼陽。是時踞海城之日兵，以孤軍懸入，糧械不繼，宋慶不能乘其負隅未固，以全力進攻，速除心腹之患；乃以全軍二十餘營，屯距海城二十餘里之缸瓦寨，有似養癰。坐是海城之敵，轉得伺便先發。十一月二十三日遲明，日兵二千餘人至蓋家屯。時我軍有數營分駐馬圈子西，與缸瓦寨屯軍犄角。日兵由蓋家屯前犯，歷上加河、下加河，將攻缸瓦寨，而恐我馬圈子之兵橫出，以襲其後，乃暫駐下加河，分兵先犯馬圈子。宋慶株守缸瓦寨大營，不能乘機夾擊，坐待其擊敗我馬圈子兵，以全力攻缸瓦寨大營，於是大營不能守，日晡，敗至高杆，保營口大道。自是宋軍遂屯印莊臺，而以爲根本地矣。

方日兵之陷海城也，我蓋平尚未失守，惟析木城一線爲其後路。日兵入海城者，僅六千人，大小砲才二十門，城外險要，尚未繕守，而宋慶所部倍之。苟宋慶能以全力分布，奇正互用，固可聚而殲焉。乃缸瓦寨敗後，日兵得乘勢將城西之晾甲山，城西南之唐王山，城北之歡喜山，城東北之雙龍山，建築砲臺，爲死守計。於是海城不可拔，而其第二軍之在旅順者，復以十二月十四日北陷蓋平，與海城相倚，遼東兵事愈棘矣。

蓋平東南去金州二百七十里，東北距海城約百里。自旅順陷落，日兵遲回於金旅者及四十日。至是月初四日，始分兵北犯，歷熊岳城，十四日抵距蓋平迤北八里之地。先是，宋慶自高嶺回旅順，十月中旬至復州，時金州已失，日兵將南向攻旅順，宋慶不能力攻金州，以紓旅順之急，而回翔復州間，遣偏師向金州，屢爲踞敵所截。又旅順既陷，其殘卒悉奔復州依宋慶。於是自本部毅軍以外，益以徐邦道之拱衛軍十三營，姜桂題之銘軍六營，（時撤劉

盛休統領易以姜桂題）張光前之親慶軍四營，而章高元所部嵩武軍八營，亦自山東渡海來會。雖創敗之餘，而兵勢尙盛。至海城陷，乃留章高元、徐邦道、張光前守蓋平，自率所部及銘軍，並統領劉世俊所部汝南嵩武軍四營北援。十二月初十日，宋慶令徐邦道自蓋平東移軍守牛莊。邦道行抵高杆，宋慶以高元告急，令回援蓋平，乃折而南行。十一日抵距蓋平二十餘里之藍旗廠，宋慶又令歸田莊臺，復折而北行。十二日行抵營口東十五里之侯家油房，宋慶仍令援蓋平，十三日又折而南行。邦道奔馳於田莊臺、營口、蓋平者四日，夜不頓舍，軍士饑懣。十三日夜，其前鋒四營甫抵前敵，未及食，而日兵已至，撲章高元軍。時高元守南門外，扼蓋平河列隊；光前列兵東門外鳳凰山上。日兵亦分兩枝來犯，其由南進者，與章高元相持於蓋平河上，高元鏖戰甚猛，敵不得逞。其別隊繞南而東，徑渡蓋平河，爭鳳凰山，光前見敵即潰，日兵爭佔鳳凰山，遂犯東門，入城，出南門，繞至高元軍後，拊背夾攻。時徐邦道大隊方自西至，不及成列，入日兵圍中，乃與高元同時敗潰。嵩武軍分統楊壽山、李仁黨皆死之，蓋平乃陷，高元、邦道既敗，退賀家屯南，距蓋平十餘里。會姜桂題率銘軍來援，邦道請桂題出敵不意，乘銳夜搗蓋平；桂題辭以翌日並進，而乘夜拔隊遁去，於是諸軍皆退營口。日軍自踞蓋平，遂與海城聲援相接，兵勢乃益厲。

蓋、海之間，以大石橋爲孔道。大石橋之東南，山嶺絡繹，其西北則平原彌衍，一望無際，惟蓋平迤北有山曰太平山，爲赴營口衝要。我蓋平之失，諸將不以兵急塞大石橋，斷敵海、蓋相通之路，又不卽扼太平山，以固營口外戶。及二十一年正月，日兵於蓋平屯已堅，師集復衆，宋慶率徐邦道、馬玉崑，始發營口，往爭太平山。既至，不能力扼山頂，或踰山屯紮，以固險塞，而駐軍山陰。宋慶自駐二道河，其稍東之西七里溝一帶，分統馬玉崑駐之，再東之姜家房、老爺廟，則徐邦道駐焉。計我兵萬二千餘人，有大砲十門。正月三十日黎明，日兵從東南兩方來，卽由太平山東南麓之太子窩搶登，我山頂勇隊力單，當與小桂山頂駐勇同卻，兩山頂遂爲敵據。日軍乃昇砲登山，高下排列，向七里溝擊馬玉崑軍，其小桂山砲則正擊徐邦道軍。日兵步騎之從東來者，直薄老爺廟，邦道以馬隊蹂之，馬上發槍，頗有殺傷。而我東七里溝之兵，爲南來之敵所乘，遂潰敗。於是中左右三面，日兵屢聚於西七里溝，玉崑力戰，相持及申，日兵子彈已罄，而抵死不退，伏地避彈，其援兵兩隊馳至，徑上槍刃衝鋒，冒死突進，我兵時已饑疲甚，無後繼，乃退姜家房、白廟子諸處，日兵遂據太平山，而營口東道門戶洞開矣。

自宋慶缸瓦寨之敗，我諸將無向海城者，十二月十六日，海城踞敵，布置已嚴，蓋平繼陷，依克唐阿、長順乃與遼陽州徐慶璋會兵三萬餘人，漸次西上。二十二抵甘泉堡（遼陽赴海城大道必經之路）、雙廟子、普賴屯（此二處爲遼陽赴牛莊大道必經之路），分南折而南行。蓋從遼陽西南行，不及百里至鞍山站，起鞍山站南行迤西，歷新臺子、湯河、甘泉堡、東烟臺、西烟臺、頭家堡、二臺子（此海城東之二臺子）、雙龍山、甜水溝、羅和堡子諸村邑，而至海城，爲赴海城大道。若自鞍山站西行迤南，歷後雙臺子、雙廟子、普賴屯、丁家園、卜城子、紫方屯諸村邑，而至牛莊，爲赴牛莊大道。其牛莊至海城大道，則南行迤東，歷白旗堡、二臺子、三臺子（此兩臺子近牛莊一邊）、四臺子、三臺子、二臺子（此兩臺子近海城西面一邊）、安府堡子、徐家園子、而至海城，此大道三枝相交成三角形。而由鞍山站至牛莊大道間，復橫出數大道，抵海城。一從後雙臺子南折稍西，歷前雙臺子、湯相公屯、小鄭家臺、後柳河子、土城子、前柳河子、西土城子、三道河子、三里橋，經羅和堡子而至海城。一從普賴屯南折，歷脫龍寨、牛屯、平二房、長虎臺、沙河子、揀金堡（歡喜山北麓），經大教場，而至海城。一從卜城子南折稍東，歷耿莊子、張相屯、二道梗子、大王屯、波羅堡子，經大教場，而至海城。一從紫方屯南折迤東，歷唐家凹子、新河屯、仙女村、小干戈屯、大干戈屯、大莫屯、小莫屯、田瓢子、大贊屯，仍經波羅堡子大教場，而至海城。此爲橫路四道，自甲午十二月迄乙未二月，海城、牛莊等處戰爭，不出此數道間。

當依克唐阿、長順諸軍分道南折，二十一日，分布柳河子、平二房、長虎臺、沙河子、交界臺、小王屯、大營屯，佔海城北面，陸續前進。明日，距日兵約二里許，以長虎臺爲中樞，東路包至頭家堡，西路包至二臺子，陣勢長三里，曲若弓形。而日兵扼城北雙龍、歡喜兩山，復彌以步騎砲隊。未刻，日之雙龍山砲隊，先馳下，轟我東路軍；別有砲隊一枝，從徐家園子，轟我西路軍，其步騎兵則相繼來犯。時我軍所用器械，大半土槍，不能速發及遠；且旗漢兵團，心志不齊。持至申刻，我西路兵先退，東路繼之，依克唐阿遂駐海城西北三十里之耿莊子，長順駐東北二十里之柳河子。二十六日，依、長兩軍復分道進。明日，我大隊仍迤邐包海城北面。西至大小費屯，而中權自長虎臺搗雙龍歡喜兩山間之三里橋；阻於歡喜山砲火，乃折而北繞沙河園，出歡喜山之西，仍由波羅堡子前進，將攻海城之西北角。我東路軍亦自頭家堡向二臺子，以綴雙龍山之敵。自辰至午，終拒於兩山砲臺，不得進。未刻

，日兵仍以砲隊出徐家園子，犯我西路軍，瞭甲山日兵馳助之，我兵死傷枕藉，依克唐阿部分統榮和受傷，自大賀屯退，而西北東路長軍亦不支，同時東走。三十日長順復退閱家山，去海城愈遠，與依克唐阿遂有違言。

是時道員李光久，率湖南巡撫吳大澂部老湘軍五營，抵牛莊方面之二臺子三臺子。二十一年正月，徐邦道亦進駐海城西之小馬頭，與爲援應，勢頗相屬。二十二日，復進攻海城。依克唐阿所部分統烏勒興額等出中路，自正北長虎臺進驗軍堡，西折至波羅堡子、布橫陣，而於驗軍波羅兩堡，各置快砲二門，以擊歡喜山砲壘，步兵直逼大教場。分統壽山等出東北，進二臺子，東跨齊籐堡子，以馬隊擠西北城子一帶，通中東兩路之勢，於二臺子齊籐堡子，各置快砲二尊，以擊雙龍山砲壘，凡馬步隊萬二千餘人。長順所部東出玉皇山作聲援。徐邦道出西路，從營口大道柳公屯坡廠，至八里河子，前鋒千餘人，直進距唐王山西里許山坡，逼日軍而陣，李光久助之。是日我軍東西進逼俱緊，日兵先伏不動，及巳刻，乃自雙龍山北犯，約步隊四五百人，作橫陣猛進，入齊籐堡子。我東路兵聚攻是堡，其馬隊來助，相持至午，而其砲隊至堡內，日兵遂突出作橫陣。砲彈橫飛，槍彈繼之，我東路兵死傷甚衆，遂退二臺子。中路兵阻於歡喜山砲火亦退，邦道光久則先已西走。

是役，我諸軍志在必得，徐慶璋遣團勇三千餘人，砲八門，繞道攻析木城，期繼海城後路，且南北並舉，以拔其勢。乃攻海城諸軍，已先期敗退，二十三日慶璋團勇始至析木城，亦敗於敵。二十八日，諸軍仍分道圍海城，合兩將軍並邦道、光久兵二萬餘人，東西並舉，有砲二十尊，分布安村及雙龍山迤東唐王山迤西，排轟敵壘。然銳氣已喪，各軍未交綏，已先後退却。自海城之陷，日兵深入腹地踞守者，不過六千人，而我全局爲之牽掣。當時依克唐阿、長順屯海城北，宋慶屯營口東，幾四萬人，益以駐奉天之提督唐仁廉，並奉天練軍，不下萬六千人。然我軍凡五攻海城，一攻於宋慶，即缸瓦寨之退，四攻於依克唐阿、長順，皆不能拔。至乙未春，日兵駐海城者歷七旬有五口，皆作守局，蓋以綴我兵力，待其第二軍之赴援合進耳。蓋平之陷，其聲勢已壯，犄角已成，而仍遲回不遽進者，則謀分兵擾我山東也。故蓋平、海城之日兵，皆堅持以待，而我奉天諸將，擁重兵，據要害，徘徊觀望，乍却乍前，不能出死力，以決一勝。乙未正月，我海軍殲於威海（詳見下節），敵鋒益張，其勝兵復北渡，由旅順進，增軍於海城、蓋平。且見我諸將屢攻海城無功也，益易我。正月三十日，宋慶復有太平山之敗，失營口屏障，於是

海城、岫巖、蓋平諸敵，遂羣焉思逞矣。

初我軍敗於平壤，清廷以淮軍控剿，欲倚用湘中故將，如藩司魏光燾、臬司陳提、道員李光久等，皆令募軍北援，並召兩江總督劉坤一去京師。十二月詔以坤一爲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湖南巡撫吳大澂、四川提督宋慶副之。自陳提一軍防守大高嶺以外，其山海關內外湘軍、楚軍、皖軍，共八十餘營，其隸吳大澂部下者，爲李光久所統湘軍五營，魏光燾統武威六營，署永州鎮劉樹元統親兵六營，吳元凱統楚軍砲隊四營，譚表忠統護軍一營，郭長雲統衛隊一營，均從大澂出關，其餘湘皖諸軍尚五十餘營，（淮軍豫軍各營非坤一部者不在內）仍從坤一分駐山海關內外。

正月初二日大澂出山海關，十七日抵田莊臺，其所部李光久已先於甲午冬出關，十二月過牛莊，駐近牛莊之二臺子、三臺子，漸次進，正月已移駐近海城之三臺子。劉樹元親兵六營，於正月杪始畢至，駐四臺子，魏光燾率武威六營，最後至，留三營守牛莊，自率三營進駐牛莊之三臺子。是時環海城而軍者，有兩將軍（依克唐阿、長順），一巡撫（吳大澂），一提督（宋慶），一藩司（魏光燾），共百餘營，六萬餘人（時宋部毅軍已增至三十營）。政府方日盼捷音，乃海城卒不可拔，而牛莊、營口、田莊臺，不旬日且相繼失守矣。

二月初二，光久、邦道合軍，樹元助之，進攻唐王山，已奪據八里河，而唐王山之敵拒守甚嚴，竟不克，初四日，光久、邦道、樹元，復攻瞭甲山，亦奪據徐家園子，而瞭甲山終不能得。是時湘軍分布海城西北，扼赴牛莊大道，長順部分布海城東北，扼赴遼陽大道，依克唐阿部則分布海城正北，扼牛莊、遼陽間相通之衝衢。而蓋平、海城、岫巖之日兵，將分道北犯。一由蓋平南向而趨營口，一由岫巖北出黃花甸，繞三家子、吉洞岑、廣岑而折向鞍山站。一出海城，攻依克唐阿、長順兩軍，北向，由甘泉堡而至鞍山站。鞍山站者，山勢蜿蜒橫亘，中有缺口，形如馬鞍，雙嶺夾峙，中通一線，實爲牛莊至遼陽孔道，最稱險塞。我諸將不知屯扼，以固牛莊、遼陽兩地之聯絡。日兵乃爲此狡計，思驕其脊，而左右顧示，形若逼遼陽，實將襲我牛莊。蓋牛莊有警，則前敵湘軍將不戰自潰也。初四日天未明，日兵自海城出，分道先犯長虎臺、沙河園，截我依軍右臂，而別隊由西路犯大小費屯諸處。於是邦道、光久各出兵，戰於城西北，以殺敵勢。自寅及巳，戰歷三時，而中路依軍敗，分統壽山受彈傷，遽退，諸軍亦

退。會遼陽南九十里之吉洞峪，爲岫巖日兵所襲踞，遼陽大震。知州徐慶璋請援於依克唐阿，依克唐阿乃託援東走，長順隨之。時湘軍諸營偏駐海城西南，依軍去，北面空，海城日兵遂躡依軍而東。初五日，日兵過甘泉堡，我守兵以將軍既去，望風潰。依克唐阿、長順張皇走，道經鞍山站，棄險不顧，窮口東奔，牛莊勢益孤。

海城日兵既據鞍山站，而其岫巖北出之股，亦問道來會，於是稍稍留軍踞守，遂悉銳折而西行，軍行迅疾，蓋出我不意，以襲牛莊矣。魏光燾聞警，率其部下三營回援，初六日回牛莊，又分兵扼守要隘，初八日李光久部衆五營亦至，均入市，擇居民舍。時光燾、光久所部，共十一營，屯聚市內，而日兵分三道來包，一由東道向頭臺直進，一由紫方屯繞而北，一渡遼河繞而西，包其南，且截後路，齊壓牛莊而陣。我軍束於市內，逼不得出。

方日兵之將至也，光久部下某以告，請速出隊，光久吸鴉片烟未已，復待畢早餐，而敵已入市。武威左營營官提督余壽武，緊扼市口，死之，弁勇殉者三百餘人。光燾逃而免，光久衝圍出走。於是弁勇駐近西市者，得乘間出，其駐東南北三面者，爲敵所圍，不得出，乃據民舍鑿門。日兵自未刻畢入牛莊，夜半巷戰猶未息。我軍肝腦塗地，慘酷萬狀。而從西路逃山之兵，復截於敵軍砲火，死者亦衆。是役也，兵士傷亡幾二千人，虜於敵者七八百人，軍資自配執兵槍外，尙儲毛瑟快槍一千五百餘枝，槍彈一百五十一萬餘顆，大小砲十九門，火藥一千六百四十八箱，馬匹衣糧稱是，皆委之去。

牛莊既失，大瀝自田莊臺夜奔石山站，而營口、田莊臺遂從風而靡。蓋牛莊南迤西距田莊臺九十里，西南稍北，距雙臺子九十里，而田莊臺、雙臺子，南北相距亦九十里，適成一等邊三角形。是時，宋慶以五十餘營（本部毅軍已募足三十營，益以銘軍、嵩武軍、親慶軍諸營），幾三萬人，戍營口，方與蓋平之敵爭太平山，而田莊臺爲營口後路，軍資咸在。及牛莊陷，大瀝西走，宋慶乃夜挈全軍回田莊臺，委營口不顧。惟蔣希夷一軍，及率錦道標兵三營駐營口砲臺。希夷貪怯不任戰，蓋平日兵，步入營口，十一日入砲臺，希夷先逃，我營口守口大砲四十五尊，及封凍口內之湄雲兵輪一艘，大小輪船兩艘，並軍械彈藥，皆委敵手。

方牛莊之陷，大瀝所部劉樹元統親軍七營，自前敵繞道至田莊臺，知大瀝去，追從於雙臺子。其中營營官洪貞祥，諳於大瀝，謂：「倭人得牛莊，必不守，當徑撲宋慶軍，且計海城之倭，當已巢出，今夜乘虛返搗牛莊，必得

手。誠能奪歸牛莊，可長驅搗海城。縱未必克，倭必返顧，可紓宋慶之急，所謂出不意攻必救也。」大澈不許。而牛莊之日兵，實於是夜盡赴營口，與蓋平之股會（日兵第一軍自朝鮮渡鴨綠江來者，止於海城，第二軍白皮子窩登岸入犯者，止於蓋平，至是兩軍始會於營口。），其牛莊海城留兵甚寡，聞者惜之。

遼東東路之山，盡於海城，南路之山，盡於蓋平，田莊臺四面皆平原，無山險可扼，惟倚遼河以爲固。時值水堅，策馬可渡，其南通營口大道，凡遼河三曲。宋慶之退田莊臺，既不西南扼河曲，東北扼赴牛莊大道，以截日兵前後來路，又不北顧石山站大道，以通後路聲援，而擺數十營，盡屯田莊臺附近民舍，且無斥候。十三日未曉，日兵別隊先從田莊臺迤西踏水渡河，扼我退路，我兵尚酣眠罔覺。黎明，日兵分三大枝來犯，已密布於遼河南岸，宋慶禦之，扼遼河以爲守，開砲互擊。而是時海城、牛莊、營口諸敵皆會，且我海蓋間歷戰所失行營大小砲，無慮百尊，盡爲日兵攻具，列遼河西岸，數倍我砲，我沿岸守兵不能支，日兵遂作橫陣，從上下游踏水渡河，我軍大潰西奔。復見截於西面先渡之敵，彈如雨下，死傷枕藉。而我田莊臺內留兵，不慮前之易敗而日兵之速來也，踉蹌不得出。日兵縱火焚之，燒殺甚慘。我弁兵死二千餘人，砲械軍糧，亦舉爲敵有。於是宋慶、吳大澂潰而西，從雙臺子復走石山站，依克唐阿、長順已先潰而東，依克唐阿直奔遼陽西八里之八里橋。此役之後，自田莊臺沿遼河而東，白鞍山站，迤邐而西，皆爲日兵所踞。遼陽、錦州，聲援便阻，必出石山站，繞奉天，崎嶇始達。於是遼陽斗絕，根本動搖，海陸交乘，畿疆危逼，而求和議款，乃益亟已。

註一：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載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頁三七九—三八一。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一七二—一八四，參考日「東方兵事紀略」卷三「遼東編」。

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日） 清總署通知美使田貝（Charles Denby），決以戶部左侍郎

張蔭桓，署湖南巡撫邵友濂往日本議和，並以美前國務卿福士德（John W. Foster）為顧問。

先是，德璀琳被拒而歸時，日人謂議和須割地，並償兵費四萬萬元；其後由美國公使田貝居間調停

，清廷乃命侍郎張蔭桓、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赴日本會議，瑞良、顧肇新、伍廷芳、梁誠等從之。日人規定以廣島爲中日全權會議之地，命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正月七日雙方互校勅書于廣島縣廳，翌日日人謂中國全權之勅書，非全權通例，以覺書宣言拒絕；蔭桓等力爭不得，遂歸國。日人旋致書美公使田貝，謂中國如誠意求和，當派位望素隆之大員，畀以全權，仍可隨時開議，蓋陰指恭親王奕訢或直督李鴻章也！（註一）

附錄：廣島拒使（註二）

第一節 日本迫中國正式派使

日政府於德璫琳離日之日（十一月初一日，西歷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覺書於美使譚恩，使轉達中國政府，其概要曰：

中國政府經北京及東京美國代表所提出之媾和條件，日本政府不能承諾。以現在之清狀而論，中國政府尙未有同意於滿足媾和基礎之誠意。若中國誠實希望和睦，任命具有正式資格之全權委員，則日本政府當於兩國全權委員會合後，宣言日本政府之罷戰條件。

清廷得此電，因請美使田貝於十一月初四日電達東京曰：

日本政府不明言以何種條件爲媾和基礎，中國政府難推知日本政府意見之所在。故爲商議媾和，中國礙難任命使節。特此通告日本政府，因使中國容易處理此事，仍望日本政府提出兩國將來應議問題之概要。請將此旨轉達日本國外務大臣。

中國政府蓋欲先知日本之要價如何也。日本政府以如此往返傳詢，優游不斷，徒惹各國注目，而啓干涉之漸，遂以決絕態度，於十一月初六日（西曆十二月二日）經美使轉電北京曰：

據駐北京美國公使所轉來之電報，中國政府似尙未決定有媾和之必要。蓋此次要求罷戰者，係中國，非日本；故日本政府祇得重述前電所云，非具有正當資格之全權委員相會後，不能宣告媾和條件。若中國政府對此

不能滿足，則此次之商議，則可中止。

日政府此項覺書，蓋欲促中國政府之決心也。

第二節 中國決定派使

時德璀琳已返津，鴻章知非正式遣使不可，又恐派員赴日，爲所要挾，因擬以煙臺或上海爲議和地點。鴻章於十一月十一日函恭親王奕訢曰：

王爺殿下：敬肅者，張侍郎來津，恭傳懿旨，仰荷皇太后逾格矜全，優加策勵，跪聆之下，感激涕零。現值事機棘手萬分，和議不易就範，頃稅司德璀琳自倭回津，鴻章與張侍郎面加詢問。據稱：從旁詢探，所慾甚奢，略如赫德所云，即派員會議，勢不能一一曲從。惟既經美使居間，請兩國派員商辦，此係歐洲通行之例，業與張侍郎商酌，電達總署矣。但此時赴倭，實多不便，如於上海、煙臺兩處，擇一地以候晤，庶不致爲所要挾。聞西例會議即須停戰，除戰地外，仍可自運兵械。而停戰久暫，其權不能全自我操，須至臨時再議。一切因應事宜，只可隨機應變，若事有轉圜，可期結束。兩害相形取其輕，亦萬不得已之所爲，仍賴聖明主持於上，臣下方有所稟承。鴻章久離闕廷，況當時事艱棘，宵旰焦勞，受恩逾深，圖報愈切，若得瞻仰天顏，願求聖訓，誠爲厚幸。俟河水堅結，防務稍靖，即當輕裝進京，叩謁愚悃。不盡之言，已屬張侍郎代陳。手肅齊佈，祇頌鈞福。

清廷因於十一月十六日（西曆十二月十二日）請美使出貝轉電東京曰：

日本政府拒絕中國政府前電所提議，此中國政府所以爲遺憾者也。中國政府茲依日本政府之意見，任命全權委員，與日本全權委員會合，商議媾和。中國政府欲以上海爲委員會合地。又兩國委員何時可以會合，中國政府希望先期告知。請將此旨轉達日本國外務大臣。

至是中國已公然屈服，日本政府復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西曆十二月十八日）請美使譚恩電北京曰：

若中國政府任命媾和全權委員，日本政府不論何時，可任命同資格之委員。但日本政府任命該全權委員之前，須中國政府先將彼國全權委員之人名官位，通知日本政府。全權委員會合地，必須在日本國內選定。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二〇

勢逼處此，惟有繼續屈服。清廷乃決定派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及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爲議和代表，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西曆十二月二十日）請田貝電告日政府曰：

中國爲商訂和議，任命尚書銜總理衙門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及頭品頂戴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委員，派往日本國，與日本國全權委員會商。中國爲往復便利，希望日本國在上海近傍選定會合地點，並願日本國即任命全權委員，速定會商日期。俟日本國任命全權委員後，決定兩國間開始休戰期日。日本政府得報，決定以廣島爲議和地點，於十一月三十日（西曆十二月二十六日）經美使電北京曰：

本政府當任命有全權與中國政府所任命之全權委員締結和議之全權委員，日本政府選定廣島爲全權委員會合地。中國全權委員到廣島後，四十八小時內，當由兩國全權委員會合。又會合之時口及處所，俟中國全權委員到廣島後，當速行通知。中國政府須將其全權委員由本國出發日期及預定到廣島之日期，速行電告日本政府。惟日本政府縱令可承諾休戰，然休戰條件，非兩國全權委員會合後不能明言。

日政府既指定會商地點，復明言休戰條件非兩國全權會合後不能明言，以絕中國政府之觀望，張、邵廣島之行，由是決矣。

第三節 日政府決定媾和方針

時日人因屢戰屢勝之故，朝野間之氣餒極高。和議既將舉行，關於媾和條件，議論紛紛，主張極不一致，各存一種狂熱的憧憬。對於中國之侵奪唯欲其大，對於日本之氣勢唯欲其揚。而沈醉於百戰百勝之浮誇，胸中各作如意打算之徒，尤有種種不同之慾望。故日政府於此種熱狂狀態下決定一媾和方針，既符國內之望，復避列國疑忌，亦正不易。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迭與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協議，設爲以下二前提：第一、日政府公表或暗示對中國之要求條件，使歐洲各國預先默認，以防止他日之誤解乎？第二、迄中國切實希望和平止，日政府深密其條件，限事局於中日之間，使第三國無事前行何等交涉之餘地乎？陸奧最初主張第一說，伊藤則主第二說。以爲媾和條件一旦發表於世，絕難免外國之干涉。今若先向各強國開示要求之條件，欲得其默認，反予各國以事前容喙之機，故以秘密爲是。伊藤此意，經陸奧及閣僚重臣之同意，因此日政府遂常防事前暴露其要求，使中國及其他各國不能窺測其

真正希望。因之陸奧業已起草之媾和條約案，亦深藏固緘，不使人知。故外間所傳之日方條件如何如何者，胥出於揣摩附會者也。時日皇明治在廣島大本營，十二月十六日（西曆一月十一日）陸奧携其條件草案，與伊藤由東京出發廣島。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正月初二日（西曆一月二十七日），在廣島開御前會議。是日出席會議者，計爲彭仁親王、總理大臣伊藤、外務大臣陸奧、陸軍大臣山縣、海軍大臣西鄉、海軍軍令部長樺山、參謀本部次長川上。陸奧當提出媾和條約草案，奏明該案起草之要領曰：

本條約案大體分爲三段：第一段規定，使中國確認爲此次戰爭原因之朝鮮獨立；第二段規定，我國因戰勝之結果，由中國讓受土地及償金二件；第三段確定中日兩國之交換利益，與我國之利益及特權，使將來我國與中國之關係，一如歐美各國與中國之關係，更進一步設置數處新開商埠，並擴張江河通航權利，以規定我國永遠在中國之通商航海諸權利。而此三大要件之外，尙規定中日兩軍之擄虜交換事件，使中國對於曾降服我國之將卒人民，不爲過酷之處置。又規定中日戰爭中，中國領土內之人民與我軍有某種關係者，中國政府日後不施責罰，以斷將來中日兩國人民間怨恨之痕，廣布我國一視同仁之義於世界。

馬關條約之內容，於此已其見體要。陸奧奏畢，伊藤起奏關於媾和應取之主要方針，其奏言之概要曰：

博文今欲謹達聖聽並陳述於參與帷幕之文武各官者：此次中國政府爲媾和派遣使節於我國，其來朝之期將近，因之於會見該使節之先，與外務大臣協議從事種種之審查，草出另冊之媾和條約案，提付閣議，經協同一致矣。惟此次中日事件，爲我朝開闢以來未曾有之大事，幸以陛下之神威，開戰以來，迄今日止，海陸到處奏捷，以輝揚我國之武威。雖由第三國開干涉之端，然隨時擺脫，未至太甚，以至今日。然本件之結果如何，實關我國將來之隆替，故收拾此變異之局，宜慎重熟籌，鑑時察機，以講求適應之策，固不待言。惟宣戰媾和之大權，雖爲陛下所掌握，而確定廟議，則須閣臣先悉心妥籌，同時亦不能不期待參與帷幕諸臣之協同一致。而宸斷一下，當局者宜任奉行之責，帷幕臣僚他日亦不可挾絲毫異議。蓋閣臣幕臣，皆夾輔陛下，領袖百僚，猶如車有兩輪，鳥有兩翼，應各相輔而行，聽頭腦之指揮，以運行人身之肢體。苟籌劃廟謨之閣幕兩臣，意思歸一，縱令世上有如何異議，皆不足顧慮者也。此媾和條約中之條項，以此次中日兩國開戰主因之朝鮮獨立，割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二二

讓土地，賠償軍費，及將來帝國臣民在中國通商航海之便宜等件爲主眼，其他重要數件次之，共爲十條。惟關於此次來朝之中國媾和使之會見，雖信十中八九不能妥當了局，然彼等荷邊萬國普通之慣例來朝，我國亦依國際法常規應之，固不待言。今假定爲中國計，與其此後尙屢戰屢敗，竟爲城下之盟，不如此時行豫期外之讓步，收拾此變局，較爲得計。然以博文所知，不信彼等爲避將來之危難，今日有斷然之決心。若果如此，則此次雙方全權委員，假令會合，終當一議不成而別也。若萬一與豫期相反，中國竟有大決心，則以此次之會合，此事難斷其不告終局。不論與中國媾和使之談判成立與否，若一旦明言媾和條件，難保不招第三國之容喙干涉，或係不能免者也。至其干涉之性質如何，程度如何，雖以如何賢明之政治家，固不能預料；尤以使他國毫不干涉，更屬不能保證。若假定此種干涉爲早晚不可免者，則觀察時機，外交上之手段，盡力操縱，固不待言；然當此局面，各強國所取之政略方針，往往不能於樽俎之間使之轉換。故萬一此種干涉到來，則斟酌該第三國之意嚮，或致不能不變更我對中國之條件，或寧可增加其他之強敵，始終維持我廟議，則屬未來之問題，彼時當更討論。要之，今日收拾此局，須文武兩臣各一其心，鞏守成算，嚴保秘密，使外間毫不窺知，始終一轍，以期貫徹。至當談判之衝者，應任奉行廟議之人，選擇其人，下令任命，則悉仰陛下之聖裁。以上奏陳之梗概，謹仰陛下之聖鑒，同時並乞列席文武兩臣深加省察。

伊藤此奏，明慎周詳，而對中國之估量，及料他國干涉之不免，尤爲聰敏。對伊藤之奏言，及陸奧之草案，列席文武各臣均無異議，日皇遂予裁可，而爲媾和條約之基礎。正月初六日（西曆一月三十一日）伊藤與陸奧皆被任命爲全權辦理大臣，以與中國使臣會商。

第四節 張邵東渡

中國既以張蔭桓、邵友濂爲議和全權，甲午十二月初十日蔭桓陛辭，清廷特降黃紙諭旨，飭其一切請旨再辦，如割地及力所不逮者，萬勿擅許。諭曰：

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張蔭桓、邵友濂現已派爲全權大臣，前往日本會商事件，所有應議各節，凡日本所請各節，均著隨時電奏，候旨遵行。其與國體有礙，及中國力有未逮之事，該大臣不得擅行允許。懍之！慎之！

即此可見清廷對媾和之決心，尙極薄弱也。十一日蔭桓發北京，十六日出塘沽，乘輪赴上海，十八日晚到達，與友謙會晤。專使既遣，清廷之意猶遲回不決，蔭桓、友謙復在上海逗留久之。二十四日得總理衙門傳電旨，著尅日出洋。乙未元旦發上海，正月初四日抵長崎，初六日（西曆一月三十一日）至廣島，分駝春和園及洗心亭。時從行者，爲內閣侍讀瑞良、郎中顧肇新、錢紹楨、道員伍廷芳、梁誠、黃承乙、知府沈鐸、張桐華、知州羅庚齡、知縣盧永銘、張佐興、招汝濟、布理問、徐超鹽、大使趙世廉、縣丞徐銘、訓導沈功璋，學生三名，差弁四名，僕役二十四名。蔭桓、友謙既抵廣島，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即以全權辦理大臣之名義，通告於正月初六日（西曆二月一日），在廣島縣廳內會合。此時伊藤與陸奧，觀張、邵兩使之貧望地位，不信其有折衝樽俎結束事局之膽識權力。於張、邵抵廣島之前數日，伊藤竊招陸奧曰：「今熟察內外之情勢，媾和之時機，尙未成熟；且中國之說僞亦甚不可測。若吾儕稍不注意，媾和之目的未達，而我國要求中國之條件，先傳播於世，有惹起內外物議之虞。故吾儕與中國使臣會合之口，非明察彼輩之材能及權限後，不可輕易開媾和之端。且中國從前付與其使臣之全權，往往不合國際法上之規則，是亦吾儕不可不深加考察者也。」陸奧亦同此意，密議結果，遂決定第一先考察中國使臣之全權證書，如發見罅隙，即行拒絕談判，不開示媾和談判，即使之破裂。故廣島拒使之一幕，不待張、邵之至，已在伊藤、陸奧之老謀深算中矣。蔭桓、友謙離滬之頃，曾上摺主和戰並行，頗足見一般對和議之空氣。其奏曰：

奏爲和戰相爲表裏訪旨飭下關內外統隊大員實力防剿以冀事易就範恭摺密陳仰請聖鑒事：竊臣蔭桓初十日陛辭，仰蒙訓誨周詳，莫銘欽感。十六日冒險出塘沽發舟，十八日抵滬。晤臣友謙，謹將密旨暨國書敕書及口貝往來函電公閱，隨即電達總理衙門。二十四日欽奉電旨，前據張蔭桓電奏，業經抵滬，諒已與邵友謙會商一切，即著該侍郎等尅日出洋，勿庸另候諭旨，並將起程日期電覆，欽此。卽於是晚覆奏，電請總理衙門代遞，各在案。臣蔭桓出京，行抵通縣，接翰林院學士準良書。謂臣以一身任天下之怨，到滬後宜疏陳敵情貪狡，不可以和，兵氣轉圜，可以一戰，請命同京等語。迨行抵滬上，匿名揭帖，徧布通衢，肆口詆謔，互相傳播。雖於審度利害，衡量短長，漫無一當，而人心思奮，具見同仇敵愾之誠。溯查同治十年，日本遣其大藏卿伊達宗城來求立約，逾年又遣其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華換約，十三年臺灣生番之役，兩軍相持，日本則有參議大久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二四

利通之使。光緒十一年朝鮮之役，又有伊藤博文之使。二十餘年間，中日訂約重事，日本悉派其大臣前來，陰以有禮自處。此次中國派員前往，授公法報施之義，亦交際之常，尚非刻意牽就；特人情狃於習見，輒以臣等之行，妄生訾議。臣等仰體皇上維持國本不忍生靈塗炭之意，人言在所不恤。惟是禦侮之策，能戰而後能和。當此敵氛方張，邊城屢陷，凶鋒曾未一挫，且自中外通好以來，日本每以所訂約章不得施於泰西，積怨已非一日，度此次多方要挾，早在聖明洞鑒之中。臣等恪守訓諭，力持大體，非特牽及疆土，固當正言堅拒，即准韓自主，償倭兵費，曾經各國使臣居間，而索費過鉅，臣等亦萬難與商。停戰之說，更不敢輕發，縱彼舉以爲言，仍當電候聖裁。總之和議之難易，必視戰事之利鈍爲轉移。現在各路大軍雲集，一聞和議，恐將士爲之遲疑。臣蔭桓行抵津沽，晤吳大澂，囑展緩行期，以俟捷音。如果連獲勝戰，直可坐待彼來，所言不爲無見。茲奉命尅日起程，臣等訂定船期，束裝東渡。惟有籲懇聖明，飭下關內外統兵大員，一意籌戰，力求實效，勿以臣等之行，意存觀望。他日和議可成，彼國不敢別有覬覦，即和議不成，我亦不至漫無準備，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除將書函揭帖鈔呈軍機處外，謹繕摺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第五節 廣島縣廳之首次會晤

正月初七日（西歷二月一日）午前十一時，中日兩國全權大臣會晤於廣島縣廳。迎頭第一着，即爲查閱全權證書。日廷之敕書曰：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現將此書宣示於有衆：朕帝國爲與大清國回復和好，得以維持東洋全局，茲以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材能敏達，特簡爲全權辦理大臣。委以各別或共同與大清國欽差大臣襄同商議，便宜行事，締結媾和預定各條欽署名畫押之全權。然其議定各條款，朕須親加查閱，果爲妥善，便行批准。

中國之國書曰：

大清國大皇帝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我兩國同屬同洲，素無嫌怨，近以朝鮮之事，彼此用兵，勞民傷財，誠非得已。現經美國居間調處，由中國派全權大臣與貴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商妥結。茲特派尙書銜總理各國事務

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前往貴國商辦。惟願大皇帝接待，俾該使臣得以盡職，是所望也。

日本全權伊藤、陸奧閱中國國書後，乃曰：「此不過一種信任狀，決非全權委任狀，在兩國交戰平時外交關係已斷絕時，一國君主對於對手國君主，無授受紹介其使臣之信任狀之理。」而將國書退還中國代表。蔭桓等因提出一敕書曰：

派尙書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與日本派出之全權大臣會商事件。爾等仍一面電達總理衙門，請旨遵行。隨行官員，聽爾節制。爾其殫竭精誠，謹慎從事，勿背委任。爾其慎之，特諭。（此諭譯自日文）

日方當然認爲全權不足，陸奧因取其預先草就之覺書，向中國代表宣讀。略謂：「日本全權辦理大臣現在知會中國欽差全權大臣之全權委任狀，關於媾和結約，包含由日本皇帝陛下付與該全權辦理大臣之一切權限。故爲避免他日之誤解，且基於彼此對等主義，日本全權辦理大臣，由中國欽差全權大臣所知照之全權委任狀，雖尚未經充分查閱，然果包含由中國皇帝陛下關於媾和結約付與該欽差全權大臣之一切權限否，望以文書確答。」中國代表答以容日答覆。此第一日之會合，遂告終了。

第六節 廣島縣廳之再度會晤

翌日（正月初八日，西歷二月二日），中國代表答覆日本全權一公文，略謂：

本大臣由本國皇帝賦與爲締結和議會商條款簽名蓋印之全權，所議各條款，因期迅速辦理，以電報奏聞本國，請旨定期簽字，並將所議定之條約書，携歸中國，恭候皇帝親加披閱，果屬妥善，然後批准施行。

伊藤、陸奧遂約中國代表是日下午四時再會於廣島會議廳。屆時兩國代表會聚，伊藤云：「貴國敕書，全權不足，不能開議。」即起立取出預擬之英文說帖，作下列之演說曰：

本大臣今與同僚所將取之處置，出於論理上不得已之結果，其責固不應歸諸本大臣。從來中國與列國，殆全然睽離，有時或列入國際團體享受所生之利益，至隨此而生之責任，則往往不顧。中國常以孤立及猜疑爲政

策，故於外交上之關係，缺乏善鄰上所必須之公明信實，宜矣。中國之欽差使臣，關於外交上之盟約，公然表示合意後，翻然拒絕簽字，或對於儼然締結之條約，無明白之理由，漫然拒否之實蹟，不一而足。徵諸此等實蹟，可見當時清廷之意中，無可信賴之誠心。至當談判之局之欽差使臣，亦復無必要權限。故今日之事，我政府鑒於既往之事實，決意不與未合權定義之清廷使臣談判一切。當開媾和談判之先，曾以清廷之委任者，須有締結和議之全權，爲一先決條件。而清廷保證恪遵此條件，派遣其全權使臣於我國。故我天皇陛下，委任本大臣並同僚，與清廷全權締結媾和條件並簽字之全權。清廷雖予此保證，而兩閣下之委任權，甚不完全，足證清廷之意思，尚未切實求和。昨日在此席上所交換之雙方委任狀，一見即知其軒輊，雖不待批判，然茲稍加指摘，當非徒勞。即一方適用開明國慣用之全權定義，一方缺乏全權委員之必要諸項。加之，兩閣下攜帶之委任狀，閣下等被委任之職權，不過聽受本大臣及同僚之陳述而報告貴政府而已。事已至此，本大臣等此後決不能繼續談判。或曰：此次之事，並非違背中國從來之慣例，本大臣斷不能以此說明爲滿足。中國內地之慣例，本大臣固無容喙之權，至關聯我國之外交上之條件主張，中國特殊之慣例，應受國際法上之制裁。不特爲本大臣之權利，亦本大臣之義務。抑和平之恢復，其事至重至大，今欲再啓輯睦之道，固有締結條約之必要，且其互訂之約，亦必有誠意，期諸實踐。關於媾和之事，我帝國固無向中國請求之理由，然我帝國因尊重其所代表之文明主義，故清廷履至當之軌道而開其端緒時，我有應之之義務。然參與無效之談判，或紙上空文之媾和，則將來必謝絕也。我帝國一旦既締結之條件，必能實踐，同時對清廷亦不能不期其照樣履行。故誠信求和，委其使臣以確實全權，選擇有名望官爵足以擔保實行條約之人員，當此大任，則我帝國當不拒絕再開談判。

伊藤演說畢，蔭桓等云：「中國既派全權，一切權力，包括在內。」伊藤云：「這是中國自己所說，與公法不合。」陸奧當取出豫先草就之節略宣讀曰：

大日本帝國政府曾由駐紮東京及駐紮北京之美國公使，謂媾和必須簡命大臣，帶有全權，足以締結和好之事，屢經聲明。然本月一日，由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所知照之全權字樣憑據，就其所發之趣意，不得不謂爲欠缺妥當之極。何則？以該字樣與委界全權職內不可缺之要素者不完備者耳。至大日本帝國政府之所見，仍與前

經美國公使所申明之處，並無所異。因以帶有日本國皇帝陛下授與適正完全全權敕書之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與單帶有會商事件咨報總理衙門諸旨遵行敕書之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會議敕書不同，不能應諾，是以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謂此回會議不得不於此爲止矣。

蔭桓等云：「貴國初覆叩貝電云：中國派全權大臣，持有國書，本國亦派全權與議，中國即照此辦法。茲貴大臣謂僅有商議之權，定款畫押，乃須電署請旨，其權不足。但前此由田貝電詢貴國欲商何款，貴國未覆；既不知貴國何意，本大臣豈能不請旨遵行？」伊藤云：「本國敕書，悉照公法辦理，兩相比較，自知不同。」蔭桓等云：「貴國敕書，亦有親加檢閱，果能妥善，即使批准之句，是約本必候諭旨校閱，然後批行。兩國所奉全權，多是一樣。若嫌簡略，我可補請電旨。」伊藤云：「總以敕書爲憑，不照公法，斷不能行。貴國不過試探消息，此時既不開議，仍是仇敵。廣島爲屯兵之所，不宜停留。」蔭桓等云：「仍須電告國家，方能回去。」伊藤云：「若尙候敕書，已來不及，發明電則可，不必候回電。」蔭桓等云：「用美文電田使，轉告總署可乎？」伊藤云：「可。」遂將敕書收回而散。

第七節 伊藤與伍廷芳之談話

初八日廣島縣廳第二次會晤後，張蔭桓等既辭出，伊藤獨留伍廷芳談話，蓋光緒十一年伊藤至天津與李鴻章訂約時，伍廷芳即爲中國方面之隨員，故與伊藤爲素識也。初九日廷芳資送公文，與伊藤一度談話。伊藤於談話間暗示，如以恭親王李中堂爲全權，最爲適宜。故李鴻章馬關之行，此幕談話實爲其基也。伊藤與廷芳之談話節略如下：

初八廣島縣廳散議後，伊藤讓廷芳坐云：此次不能開議，甚可惜。如貴國誠意願和，既派員商議，必須給予切實全權字樣。你熟諳公法，你們欽差所帶敕書何以不照公法？答以頒敕書時，芳尙在津。伊云：既欲議和，愈速愈好，如不欲到廣島亦可。廷芳問：在上海何如？伊云：上海非會商之地。又問或在香港？伊云：亦不宜。旅順口或可，俟屆時再定。廷芳云：頃說帖內，中國既派大員，必須位望相埒等語。然則暗指二位欽差位望未足乎？伊云：非也，我不過泛說。於乙酉年因朝鮮事，我往中國，即欲晉京，李中堂得有全權字樣，方允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二八

同津會議。此次中國無論派何員，必須有切實全權便宣行事字樣，方允會商。蓋我所議各事，必定照辦，絕不反覆。初九日午後奉諭往伊處交公文。伊云：你們此次遠來，不能辦事，非我國之過，中國何不頒發全權敕書，似祇欲打聽我國索款，並非真心議和。答以如係假意，何必派兩位大臣，奏帶參隨等員，跋涉重洋，即此具見真心實據，請勿聽外間浮議。伊云：中國既有實心，何以不給實據全權？答以中國給全權，向不多見，今兩欽差帶來國書敕書，在中國觀之，係有全權辦事。伊云：敕書內並未予定約畫押之權，即此可見全權不足。答以既有商議之權，即能定約畫押；如有疑竇，我們欽差可電奏請旨。今貴大臣竟不開議，未免拘泥。伊云：此兩國最大之事，不照公法辦理，恐為各國所笑。咸豐戊午，英國派公使與桂花二大臣訂約後，復又失和。前車可鑒，故不能不格外慎重。譬如一人欲買物，必先備銀兩，方可交易，今全權即銀兩也。無全權豈能開議？答以凡買物亦必先以價值告人，以便議價備銀；今貴國所欲，秘而不論，不知何意？如終不能秘，何不早言以得了結？伊云：此係秘密要事，俟貴國派員果有切實全權，方可說出。貴國何不添派恭親王、李中堂，鄭重其事？答以均有緊要職任，一時恐走不開。兩欽差均係大臣，特派議和，亦是一樣。伊云：我不嫌兩位欽差位低，惟此事最重，更添一爵位最崇之中國大員，會同定約，能負重望，可期速成。然不論添置與否；但最要者，係全權辦理之敕書，切實悉依公法款式。答以照公法給予全權，原欲便宣行事；惟近來各國設有電線，出使西國，有事派全權，與別國會議，亦隨時電達本國政府，中國敕書亦即照貴國敕書式樣可乎？伊云：極合。貴國素以日本窮小，殊不知自開仗以來，並未向外國借貸，兵費均由本國自籌。已與本國商民借一萬萬元，茲又擬借數千萬元。日本所用兵餉，較貴國幾倍。現在兵攻威海，軍情千變，早和為宜。至會議之所，或旅順，或別處，屆時可託美使代商云。

第八節 張邵之臨別贈言

日本政府既拒中國使臣，復不准居留廣島，張蔭桓、邵友濂於二次會晤後，當日貽書伊藤曰：

本日會晤貴大臣，宣讀說帖，並將節略備述不能開議緣由，屬本大臣早日出境，本大臣出境之前，應函達存案。昨互換敕書後，貴大臣屬將所奉全權職任開明備文，本大臣已備漢洋文詳言，又面告如條約議妥，大臣

即可畫押。前日面交國書，實爲確據。此項國書，原應面遞，惟不見允，中國情誼不能據達。至救書所諭，電達請旨，亦與貴大臣畫押之權，毫無出入，但望速辦所畫之約而已。前貴國以此詢駐京美使，總署即言本大臣有商議畫押之權，本日本大臣復面商，加以救書簡略，可電奏補足，貴大臣不見允。查中國救諭往外國議約，其格式向與此同，各國從未挑剔。貴大臣說帖，多有譏訕之詞，本大臣係欲仍復舊好，不煩置辯。本大臣竭誠將事，冀釋兩國之嫌，則我國家美意，乃遽中止，誠爲可惜。議和大臣，向有應得權利，本大臣不能照享，實出意外。貴大臣既不准發中國密電，又據貴外部官員來言，接有中國致本大臣密電，如不以電書送交譯看，此電不能送來。本大臣未出京時，駐京美使謂公法不能阻止往返密電，今情形迥異，惟前荷貴國迎送接待，本大臣現將出境，理當鳴謝。

此書發後，中國代表一行，既被送往長崎，日政府不可謂非失禮也。

第九節 張邵再度被拒

張蔭桓等一行，於正月十一日抵長崎，經電美使田貝，轉告顧末於總理衙門。因擬令蔭桓、友濂等暫留長崎，俟改加全權，再與日方談判。當總理衙門接得田貝轉來之電，即據以奏聞。正月十二日慈禧太后召見軍機大臣於養性殿，首謂：「戰事屢挫，今使臣被逐，勢難遷就，竟撤使歸國，莫得挫折。」於是恭親王奕訢與孫毓汶、徐用儀囑囑委婉言曰：「宜留此線路，不可決絕。」並述美使田貝言，謂若決絕，則居間人亦無體面。慈禧曰：「若爾，中國體面安在？」諸臣略勸慰。翁同龢曰：「定約畫押，既添入國書，則批准一節亦宜敘入，或稍可維持。」慈禧避之，言：「頃間皇帝請安時，亦言若不待批准，則授權一介矣。」於是決定改國書，添定約畫押字樣。正月十三日（西曆二月七日）託駐北京美使田貝經駐東京美使譚恩電達日政府曰：

總理衙門昨日接張邵兩全權大臣之電報，日本政府以委任狀中不明記關於締結及簽署媾和條約之權限，提起異議，不肯與該全權委員等談判，因是張、邵二使被送往長崎。然該全權大臣信任狀中有全權之語，故以爲足以前結條約並簽押。蓋此語包含一切，無另行一一詳記之必要。然日本國關於該信任狀之效力，若抱疑惑，中國不妨更改。惟兩國全權大臣簽押於其所議定之條約，而該條約於批准交換前，須待皇帝之認可，然後始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三〇

效力，此等事項應明記於信任狀，今送已加改訂之信任狀於張、邵二使。使其交予日本國當局。又送該信任狀於日本國，須多少日數，故將上述意旨，委細電知日本政府。張、邵現留長崎，希望由閣下向日本政府請求與該兩使再開談判。

翌日，日政府託美使轉電中國政府曰：

若中國政府果有誠意，派遣攜帶正當全權委任狀之有名爵資望之全權委員來日本時，日本政府不論何時，當再開議和談判。然使談判不調回此次使節，爲待本國政府之訓令，滯居日本，則不能承諾。

張、邵既再度被拒，中國代表一行，乃於正月十八日（西曆二月十二日）由長崎就歸國之途，廣島一幕，於焉告終。

第十節 張邵電奏被拒回國經過

張蔭桓等一行，於正月二十一日歸抵上海，當由蔭桓友濂電奏被拒回國之經過曰：

自抵廣島後，日本不准密電，中國來電，亦留難不交。互換敕書後，又云使權不足，不能開議，應即出境。與商明電請旨，不允。且謂補新敕書，亦來不及，既不開議，不應停頓。又縷述中國立約屢悔，舉不信英約俄約法越中美工約前後反覆情狀爲言。美約係原蔭桓釐，法約嫌臣友濂釐，故於臣等之來，彌觸其忌。日本敕書但云：與中國回復和好，尚非託言中國求和。惟伊藤詞意，中國若復遣使，自非名位極崇能肩重擔者，不足與議；亦可不到廣島，或在旅順，伊藤、陸奧均來就議。屆時仍由田只而定云。業將大概情形，初八晚電田貝，轉達總署在案。應否再派重臣與議，抑飭下統兵大臣，實力籌戰，伏候聖裁。臣等奉使無狀，爲敵所輕，重負朝命，相應請旨罷斥，以存國體。所奉國書，並未呈遞，當與敕書恭繳，僅先將東文日本敕書、節略、會中問答，譯寄呈覽。臣等遵即回華，今日到滬。

註一：羅惇齋：「中日兵事本末」。

註二：「六十年來之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二三〇——二五二。

三十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駐華美使田貝電告本國，中日議和條件之大要。

駐華美使田貝致電本國，言中日議和條件大要爲：「朝鮮自主，賠償巨款，占遼東半島。中國因戰敗之故，大革命爆發將不遠矣！中國非多讓利權，大借外債，不能付賠費，美商應參加貸款以爭取利權。」（註一）

註一：寶宗一（儀）：「李鴻章年（H）譜」，頁二九四，一九六八年六月，香港友聯書報發行公司出版。

十二月

孫先生文自檀香山返香港。

興中會既告成立，匯集捐款，各方資助頗夥。（註二）時孫先生方擬赴美洲，擴張會務，會清兵屢爲日軍所敗，朝鮮失，旅順陷，京津危在旦夕，清廷威信掃地無遺，民心憤激達于極點，革命發難時機，已告成熟。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孫先生速歸，以爲起義之準備，孫先生乃中止美洲之行。偕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註三）舟過日本橫濱，藉船上售物商陳清之介，結識旅日僑商馮鏡如、馮紫珊兄弟，及譚發三人，付與興中會章程一大束，託其廣爲宣傳；馮氏兄弟願設立革命團體于橫濱，以爲祖國革命之聲援。（註三）

註一：中山先生所簽發之李多馬（Lee Toma）第一號股券，日期爲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黨史會影印件）

，當爲離檀香山時所簽發。此處參考羅家倫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民國五十八年，中央文物供應社，頁六二，註十六。

註二：參照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

註三：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四。

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廷革御史安維峻職，命發往軍臺効力贖罪。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二月二日

福建道監察御史安維峻，參奏李鴻章通日主和，跋扈不臣，慈禧太后遇事牽制，太監李蓮英干預政事，清廷以其肆口妄言，命革職遣戍。諭曰：

「近因時事多艱，凡遇言官論奏，無不虛衷容納，卽或措詞失當，亦不加以譴責，其有軍國緊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訓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誠心，天下臣民早應共諒。乃本日御史安維峻呈遞封奏，託諸傳聞，竟有皇太后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肆口妄言，毫無忌憚，若不嚴行懲辦，恐開離間之端，安維峻著卽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以示儆戒。再向來聯銜封奏，必有言責者方准列名，此外部院各官均由堂官代奏，乃近來竟有一二人領銜，糾集不應具摺之員，至數十人之多，殊乖定制，以後再有似此呈遞者，定將列名之員概行懲處。」（註一）

附錄：安維峻參李鴻章摺（註二）

掌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安維峻跪奏：爲強臣跋扈，戲侮朝廷，請明正典刑，以尊主權，而平衆怒，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北洋大臣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濟倭國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于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故意勒掇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卽先逃避，偶遇賊卽遽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參之，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衛汝貴等，均係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爲遁逃藪，人言嘖嘖，非爲無因。而于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能作霧氣者，必須丁汝昌駕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直陳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一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一舉，不可與人言，既不能以死生爭，復不能以去就爭，祇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方乃倭賊之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逆之計。倭賊之諂和，誘我也，彼既外強中乾，我不能激厲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于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

但誤國，而且賣國，國中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議和出自皇太后懿旨，李連英實左右之中，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我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乎？至李連英是何人斯？敢干預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連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鴻章恫喝，不及詳審利害，而樞臣中或係李鴻章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殊不知李鴻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皆貪利小人，無大伎倆，其士卒恆被剋扣，則皆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足以制服李鴻章而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也。若能反則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太后皇上，乃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臣實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即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鑒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膽，冒斧鉞，痛哭直陳，迫切待命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清廷命劉坤一為督師大臣，抗拒日軍。

清廷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節制山海關內外防堵各軍。坤一以年老懇辭，不准。（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五，頁三二一〇（原頁三一四）。

註二：無名氏輯：「中日戰爭資料」，頁四一五，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註三：「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五，頁三二一一，（原頁五）。

十日（一月五日） 清廷議和代表張蔭桓、邵友濂離京赴日。

本日清廷議約大臣張蔭桓、邵友濂離京赴日，清廷諭以議和條件不得超過承認朝鮮獨立，與賠償軍費兩條件。諭曰：

「張蔭桓、邵友濂現已派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會商事件，所有應議各節，凡日本所請，均著隨時電奏，候旨遵行。其與國體有礙及中國力有未逮之事，該大臣不得擅行允諾，懷之！慎之！」（註一）

張蔭桓、邵友濂等旋覆奏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二月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五日

二三四

「臣等恪守訓諭，力持大體，非特牽及疆土，固當正言堅拒，即准韓自主，償倭兵費，曾經各使周旋，而索費過鉅，臣等亦萬難與商，停戰之說更不敢輕發。縱彼舉以爲言，仍當電候聖裁。」（註二）

張蔭桓等行抵通州，接翰林院學士準良書，勸其「勿以一身任天下怨，到滬後宜疏陳敵貪狡，不可以和。」本月二十四日張等抵上海，匿名揭帖遍佈通衢，詆訐和議，粵籍旅滬人士多斥張氏有辱鄉國。

（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五，頁三二一五，（原頁十三）。

註二：同上書卷三五六，頁三二二〇，（原頁八）。

註三：「字林西報」，頁一一五，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二十一日（一月十六日） 清盛軍統領衛汝貴以臨敵敗退，貽誤軍機，奉旨斬決。

本日清廷准刑部奏，斬決前寧夏鎮總兵盛軍統領衛汝貴。諭曰：

「已革總兵衛汝貴，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無約束，此次統帶盛軍，臨敵節節退縮，貽誤大局，並有剋扣軍餉，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重。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軍紀而儆效尤，衛汝貴著即依律論斬，即行處決，派刑部尚書薛允升監視行刑。」（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七，頁三二二七，（原頁二）。

二十五日（一月二十日） 俄廷為中日戰事舉行特別會議，決定加強太平洋艦隊實力，商同歐洲列強，保障朝鮮獨立，及俄國在遠東利益。

本日，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中國戰敗後遠東之新形勢，決定加強遠東艦隊實力，倘中日和約侵犯俄國重要利益，或朝鮮獨立時，則連合歐洲主要列強，尤其是法國，共同對日本施以壓力，是為三國干涉還遼之發端。

附錄：俄廷特別會議（註一）

一八九五年元月二十日，俄廷之特別會議中，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Wannowski）主張：「倘中日間和談基礎破壞俄國遠東利益，俄國應佔領朝鮮半島南端之巨濟島。」海軍代理大臣契哈乞夫（Chibacheff）認為：「旅順口及威海衛一旦落入日軍之手，則俄國遠東之利益將被破壞。」外交臨時代理大臣斯基敬（Shishkin）表示：「渤海灣係俄國之勢力範圍，不容日本在該港灣鞏固其勢力。」海軍代理大臣克來美爾（Cremet）建議：「佔領滿洲一部分，以對抗日本之發展。」亞洲司長克卜尼斯特（Kapnist）之意見：「假使日本要求溫和，俄國應採取不干涉政策。倘若觸犯俄國遠東利益，則必須見機行事。由於俄國無充足資源壓制日本，最好與其他國家尤其英國取得協議。」侍從武官長奧布魯乞夫（Obucheff）指出：「中國愈弱，對俄國愈有力，英國較俄國更需要儘速恢復通商。假使日本想佔領若干中國港口及港口地帶時，則俄國應與其他列強共同反對此種佔領，或者爲自己尋覓獨立之土地保證。」經討論後，接受財政大臣維特（Witte）建議，不作單獨之調停，而採取下列之步驟：（一）增強太平洋艦隊實力，盡可能較日本爲強。（二）與歐洲列強主要法國達成協議，倘中日和約侵犯我國重要利益，或朝鮮獨立時，則對日本施以共同之壓力。（三）如與列強協議失敗，對於遠東新發生事件，當再討論應付辦法。經俄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作爲今後俄國之遠東政策。

日軍第二師團及第十一旅團，于山東榮成灣登岸，陷榮成縣。

本日，日艦二十餘艘自大連運送第二師團及第十一旅團二萬餘人至成山，在大砲掩護下，強行登陸。我守軍退榮城，旋亦失。（註二）

註一：節錄李守孔：「三國干涉還遼之交涉」，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七期。

註二：日海軍省權：「征清海戰史」，D部，頁一三四一。

二十七日（一月二十二日）清廷命廣西按察使胡燏棻訓練新軍十營。

先是本年九月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鑒於北洋海陸軍相繼敗績，召德將漢納根 C. Von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三六

Hanneken) 諮詢戰守事宜。漢納根主張速買智利出售戰船，加練新軍十萬人，除天津召集四萬外，餘自山東、山西、河南招足，六個月訓練完成。(註一) 十月十八日，諭命廣西按察使胡燏棻會同漢納根悉心籌畫，稟明督辦軍務處王大臣，立予實行。(註二) 旋清廷以漢納根練兵之議所費不貲，中止不行。至是命胡燏棻利用天津南小站(亦名新農鎮)盛字營舊壘，籌餉募勇十營，足成五千人之數，徐議擴充。(註三) 是為「定武軍」之由來，亦為清季新建陸軍之發端。

註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三，頁二一三。

註二：「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五二，頁三一六三—三一六四，(原頁六一七)。

註三：同註二，卷三五七，頁三二三二(原頁十一—十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西曆一八九五年）

正月

一日（元月二十六日） 字林西報著論評析中國海軍戰守之策。

西報論中國海軍若不能出洋與日本決戰，亦應夜出自沉，曷能靜留港中以拱敵，誠為世界上之最可痛而最不可解者。（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一八九五年元月二十五日：Cunningham, the Chinese Soldiers, p. 67.

二日（元月二十七日） 日皇在御前會議中，決定對華議和條件。

日皇在廣島舉行御前會議，決定對華議和條件：「朝鮮獨立，中國割地賠款，並連結以免干涉。」

（註一）

註一：陸奧宗光：「蹇蹇錄」，頁一六七。

五日（一月三十日） 日軍陷威海衛南幫砲臺；二日後，再陷北幫砲臺；於是威海衛無險可守，旋即失陷。

日艦隊二十隻猛轟劉公島砲臺，守臺砲手留美學生曹家洋射擊極準，日艦隊不得逞。同時日陸軍攻南砲臺，守將劉佩超奔北砲臺，大炮未毀，死傷二千人。日以南砲臺砲轟港內海軍。北砲臺見南砲臺慘狀，亦譁潰，日軍遂進占北砲臺。丁汝昌以海軍砲毀北砲臺及火藥庫，東口海軍為南砲臺炮擊，移西口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七日

二三八

，日軍遂毀東口封鎖。（註一）

註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頁二一一至二一二；羅惇勳：「中日兵事本末」，頁三一—。

七日（二月一日） 清廷議約代表張蔭桓、邵友濂，與日本議約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於廣島，以無全權被拒。

本日午刻，張蔭桓、邵友濂，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互校勅書於廣島縣廳，是時日本尚無媾和誠意，認為軍事方面必須予中國更嚴重之打擊，始能隨心所欲，而議和代表亦非恭親王交訢或李鴻章不可。乃借口張、邵全權不足，拒絕談判。（註二）

按：陸奧宗光取其預先草就之覺書，致中國代表，詢張、邵所携勅書中曾否載明「便宜行事，全權字樣，貴大臣能否遇事自專，無需電請裁決。」明日，張、邵以實有全權答之。同日下午四時，再會於廣島縣廳，伊藤仍堅持中國代表全權不足，不能開議，隨即取出預擬之說帖，告絕於中國代表。

附錄：

一、日使伊藤博文告中國議約代表全權不足說帖（註二）

貴國從前，祇知閉關自守，近數十年，方與各國通商，凡遇交涉事件，恆存疑忌之心，不憑衆論，時違公法，即如貴國與本國所立之約章，其始亦因使臣不肯畫諾，輾轉電奏，方克成議。竊意如此鄭重，必能歷久不渝矣，乃觀今日，則又不然。是以本國於此，斷難草率從事，必須有便宜行事，實界全權者，方可訂議。初聞貴國簡命貴大臣東來，以為此次定能依照公法，執有全權，是以本國亦派本大臣等為全權大臣，特許便宜行事。及至互閱勅書，載觀手札，始知貴大臣等議立約章之後，仍須請命而行，則是全權兩字，有名而無實也。本大臣等一經畫諾，即可永遠施行，貴大臣等議難自專，尚須電請裁決，其全權之虛實，一望而知矣。況按勅書中，既不確載商議條款，與便宜簽字之權，又不指明所議何事，意存虛飾，語涉渾淪，殊非本國所及料。要之，既訂交涉事件，應照萬國公法，不能但援貴國成例。日下兩國既啓兵端，事務更為鄭重，如必欲言歸於好，務須以誠意相孚，良緣此次和議實出

貴國之自願，非由本國之強求，安得憑一紙空言，虛應故事。本國素敦忠厚，貴國既有願和之意，本國豈存樂戰之心，倘使真心實意，另簡著名大員，實有全權，可與共議者前來商訂，本國無有不從也。此布，順頌日祉。

二、中國議約代表明告日使有便宜全權（註三）

大清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本大臣等於會議時，接得貴大臣陸奧氏親交手函，詢問有無全權字樣等語。本大臣等所奉勅書，已於會議時，互相換閱，其中載有全權字樣，則是已授以商議條款，便宜責諾之權矣。和議一成，即可電請大皇帝俞允，約期簽字，帶歸恭呈御覽，然後再至貴國，互相調換，特此敬覆，即希明察，不宣。

三、日使伊藤博文再告中國議約代表全權不足說帖（註四）

本大臣與陸奧大臣等，所作處置，非過事吹求，實於理上萬不得已所致，不能歸咎於本大臣等也。自來清國情形，於列國勢若冰炭，全然離隙，或有時與列國連和，共享昇平之福。揆其與二國守信之道，往往有不能克全者，蓋清國常以孤立不羈，猜疑刻薄爲政，故其於外洋交涉之端，敦睦隣邦之道，所必需之公明信實二者，其闕如也，宜矣。（清國欽差大臣交涉事宜應立約書之件於公然允准之後却不肯扞名捺印，甚有於已立之約章並不聲明詳細情由竟然中止者，歷來實蹟不一而足。）由此而觀，足徵當時清廷意中，並無誠實修睦之心，所委欽差，又不與以應行之權，歷觀往事，莫不比皆然。我政府有鑑於斯，故與清國欽差，若無定議全權，及一切便宜行事者，決不開議，免勞往返。當聞欲來議和時，已預先聲明，清國所派欽差，不可不加以定議和局扞名捺印之全權一款，而清國已恪遵此款，准派全權大臣，前來我國。我大日本天皇陛下確認無疑，故特派本大臣與陸奧大臣，會同清國欽差全權大臣，共商和局，並賜訂立草約扞名捺印之權。清廷既經允遵，特派全權大臣，而兩閣下委任之權殊不完全者，足見清廷之意，尚未切於求和，觀昨日兩下對調之委任諭旨，殊不待判斷，其懸殊之處，已彰明昭著。竊思今日之事，非泛常可比，我帝國所派全權大臣，係文憲諸邦通用之全權，毫無指疵之處，願清國於全權委任，應有諸項權利，幾乎全無加之。兩閣下攜帶之委任諭旨，與閣下等所應陳應爭之條款，亦不明載。又不與以訂立草約扞名捺印之權，且與閣下議定和局應行事宜，清國皇帝陛下於事後批准，亦未題及一語，然則所委閣下等之職權，不過探聽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七日

二四〇

本大臣與陸奧大臣陳述之言，歸報貴國政府而已。事既如此，本大臣斷不能再行續議也。或云：今番之事，於向來成例，並無不合，本大臣決不能照如此解說，即足以重續前議，至於清國內地之例，本大臣原無密喙之權，然關係我國交涉之件，則清國向來成例，顯違列邦全正交際之義，所有不洽正理之處，非獨本大臣之權利，可以主張裁抑，亦本大臣之所應爲也。況易干戈而爲玉帛，係至重至大之事，今者重啓輯睦，再續邦交，與訂立和約，固有一定不易之意旨，至互相訂立之後，猶期有克踐斯盟之誠衷也。講和之事，我帝國雖無反向清國求就之理，然我帝國重體上天好生之德，免致生靈塗炭之苦，清廷如履至當不道，以與我國言和，則我帝國亦當重修舊好，若徒託空談，止成虛約之議，則本大臣再不敢聞命。至我帝國與所立之約章，必期實踐，斷不食言，故不得不向清國要以確實堅守盟約，永無爽信之據。故清國如果切實求和，其使臣必須委以實在全權，且須擇素有碩望之大員，當斯重任，與所訂立之約章，確能保其實踐無詐，則我帝國自可允其議和，再不堅却也云爾。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卷四，議款篇，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二：王炳耀：「甲午中日戰轉」頁一二八—一二九，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三：同註一，頁一二八。

註四：同註二，頁一二九—一三一。

十七日（二月十一日） 英泰晤士報駐巴黎記者報導：俄、法、德將聯合干涉，不允日本占中國大陸土地。

倫敦泰晤士報駐巴黎記者著文報導：俄、法、德三國將聯合干涉，絕不讓日本占中國大陸一寸土，然此必待中國認敗，求和後始可進行。（註一）

註一：「泰晤士報」，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一日。

十八日（二月十二日） 清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總兵楊用霖等自盡，威海衛海軍及劉公島守軍潰，北洋艦隊覆滅。

日軍既踞南北幫砲臺，以砲臺之巨炮俯擊澳內兵艦，別以魚雷艇入口襲擊，中定遠，傷甚，駛泊劉公島沉焉；復以魚雷襲來遠、威遠，沉之。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啓，方登陸未歸也！魚雷管帶王登雲，率雷艇十二艘，欲逃出口，日艦追之，並擄焉！海軍水手並登岸，噪出，鳴槍過市，劉公島中大擾。諸洋員請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不可。諸洋員與兵輪管帶等已密有成議，欲以衆挾汝昌降。

十五日靖遠爲敵砲擊沉，右翼總兵劉步蟾以手槍自殺。時汝昌駐鎮遠。十六日軍士擁護軍統領張文宣（按：乃鴻章之外甥也）至汝昌所，噪圍之；營務處道員牛昶炳及各管帶續至，相向泣；乃集洋員計事，皆主降。德員瑞乃爾入艙密告汝昌曰：「兵心已變，勢不可爲，不如沉船毀砲臺，徒手降敵，計較得。」汝昌從之。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十七日敵砲攻益急，汝昌復召諸將議，命諸艦突圍出，未果，汝昌乃與張文宣入艙仰藥死，左翼總兵楊用霖口銜手槍自擊而亡。牛昶炳乃集諸將推英員作降書，仍託汝昌語鈴印，命廣丙管帶程璧光，於十八日乘鎮邊艇，懸白旗詣日軍乞降，於是所有艦隻軍資均入敵手，而經營數十年之北洋艦隊，至是全部毀滅。日本既受降，乃以康濟艦載汝昌櫬送至烟臺。（註一）是役，日軍損亡計九千六百七十三人。（註二）

附錄：

一、威海衛師與山東被兵（註三）

當日軍擾我遼東之時，復渡海荼毒我山東。山東爲京師左輔，東北斜伸入海，與遼東半島相值，狀若巨蟹之雙螯。光緒十一年興建北洋海軍，實以遼東金州之旅順，及山東福山縣之烟臺爲遼海關鍵。是爲北洋前敵，皆北洋大巨轄境。烟、旅隔海相望，中羅羣島，亘若戶限。烟臺爲互市地，其西南距一百八十里之威海，卽明威海衛故地，

最據形勝，乃建設軍府，北洋海軍提督駐焉。時海軍北駐旅順，南駐威海，兩處皆有提督署。

威海值烟臺成山之間，其海灣形若箕，張兩臂，斜伸入海，作半環形。口外橫劉公島，有若箕舌。循岸山巔，蜿蜒迴抱，南口水淺最深不過丈八尺，北口則深至三丈外，大兵輪得以暢行其間，海軍全隊即駐泊於此。政府以海軍根本所在，非水陸依倚，不足控馭，遂於灣之南嘴建砲臺三：曰灶北嘴臺，有二十八生的口徑砲二，二十四生的口徑砲三；曰鹿角嘴臺，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砲四；曰龍廟嘴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砲二，十五生的口徑砲二，是爲南幫砲臺。灣之北嘴建砲臺三：曰北山嘴臺（三座合構），有二十生的口徑砲六；曰黃泥溝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砲二；曰祭祀臺臺（亦三座合構），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砲二，二十一生的口徑砲二，十五生的口徑砲二，是爲北幫砲臺。南嘴北嘴，隔海相距約十四里，由南嘴循岸至北嘴，約四十餘里，各臺之砲，皆德國克虜伯廠製，以堅利著稱。守之者爲綏軍統領道員戴宗騫，自率綏軍四營，駐北幫砲臺，而以分統劉超佩統鞏軍四營，駐南幫砲臺。

威海一灣，以劉公島爲屏蔽。其島距威海南嘴約八里，距北嘴約四里，形勢天成，有類扁鍵。故島上防具，亦與威海稱。全島設砲臺二，西曰黃島砲臺，有克虜伯二十四生的口徑砲四，英國阿母斯脫郎地阱砲二，臺左設快砲二。東曰東風掃灘砲臺，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砲二，二十八生的口徑砲一，皆克虜伯製。此外並有零星砲臺數所，是爲劉公島砲臺。守者記名總兵張文宣，統護軍兩營駐焉。及甲午軍興，復增兩營。其劉公島至威海南嘴之間，曰日島，上建砲臺一，有滬造阿母斯脫郎地阱砲二，英國製十二生的快砲二，是爲日島砲臺。其南幫後路曰所前嶺，有十五生的口徑砲二，十二生的口徑砲一。又南曰揚風嶺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砲二，十二生的口徑砲一。又南曰揚風嶺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砲二，十二生的口徑砲二，是爲南幫陸路砲臺，其北幫後路，值北山嘴後，曰合慶灘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砲二，值威海城北曰老姆頂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砲二，十二生的口徑砲二，是爲北幫陸路砲臺。兩幫陸路之砲亦皆克虜伯製。

威海南北幫及劉公島西岸，各設火藥子彈軍械諸庫，而南北幫有水雷營、電燈廠、武備學堂，劉公島有鐵碼頭、製造局、水師公所並學堂，於是威海乃爲我海軍重地。自威海南嘴，循岸迤而西，復折而東南趨，約百四十餘里，直至成山頭，自北嘴循岸西北轉，約及二百里至烟臺，其間駐有漢中鎮總兵孫金彪所部嵩武軍四營，而候補道李

某統嵩武軍五營駐登州，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統嵩武軍兩營駐膠州，經營膠州砲臺，與威海劉公島諸軍同隸北洋大臣。甲午軍興，日艦迭窺威海，均未大逞，及八月中旬我海軍以護銘軍赴大東溝，猝遇日艦隊，戰於鴨綠江口外，喪兵輪五艘，存者多被創駛入旅順船塢修治，於是威海備慮虛。九月初四日，日艦五艘從東南來，我北山嘴臺開砲擊之。第一出中其頭船望樓，並燬其烟囪，逃去。是月之杪，我海軍餘艦歸威海，而口外時有敵艦窺伺，三五日輒至，惟避我砲臺，率距三十里外游弋。十月，巡撫李秉衡來駐烟臺，初六日巡視威海劉公島諸砲臺。秉衡之抵山東也，東北兵事已棘，識者知山東必被禍。武定、萊州、登州諸府，海面遼闊，魯省羣吏有增募三十營以塞登萊諸海口之請，秉衡不許。及駐烟臺，遼東敗耗口聞，且知日兵將圖山東。戴宗騫以威海後路空虛，非守臺勇力所能兼顧，亦請別籌一軍，分屯後路，以固威防，秉衡許之。惟徵調亦微，餉械寡薄，士氣沮退。自入十月以來，海氛愈逼，初七日，日艦二十餘艘來威海，距口約萬餘米達，一艦直犯龍北嘴，我砲臺將開砲擊之，始轉舵逸。將夕，俱駛至北山嘴西北山後下碇，復以魚雷夜襲北口，見有備，乃遁。初八日，往東北駛去。初九日，復來窺測。蓋日艦恒以夜自東來，踰成山頭即去桅燈，候明，假朝曦瞰我臺壘，響晚仍駛往成山海面。初十日，遼東之金州、大連灣，相繼陷，直逼旅順，山東之防益亟。二十日，秉衡調福字一營駐雙島，令嵩武營及後營三哨旋烟臺，而口外有敵艦循環來探。二十五日，或告日人將於龍門港登岸，秉衡復令總兵孫萬齡率嵩武左營往駐之。

及旅順失守，我海軍局於威海，日艦益恣肆。十一月初四日晨，大霧，日艦二十餘艘，駛近北山嘴，我砲臺擊之，未中，日艦即南行，復近南幫砲臺，我龍北嘴鹿角嘴兩砲臺擊之，斷其船桅。初十日，清廷令丁汝昌嚴守鎮遠、定遠兩鐵艦勿損。二十二日，以巡登州洋旋威海時午潮正落，且避水雷浮漂，鎮遠乃誤觸礁石。自船後傷及機器艙，裂口三丈餘，寬五尺，急切無可修治，管帶林泰曾畏罪仰藥死。二十八日，滬局船廠派洋匠六名，就灘修治，八日而竣事。是時，清廷以海軍久無功，命逮汝昌，李鴻章爲之解脫，不卽遣行。

是月海城陷，奉天危亟，秉衡令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率所部嵩武軍北渡，赴營口，援遼東。日人以未能得志於山東也，知威海之防尚嚴，非兵船所能闖入，乃襲其前犯大連旅順之故智，取遠勢登陸，抄我砲台後路。蓋彼已偵知我後路無遊兵援應也。十二月初四日，成山頭右側龍鬚島來敵船一，登岸者八人，中有華人四，在近村購食物，與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

二四四

村民狎，盡得威海成山兵防狀以去。宗憲偵敵自龍鬚島登岸，初九日，抽綏鞏軍四哨往鎮之。初十日，秉衡令嵩武左營官孫萬齡，自龍門港移屯舊館，爲榮成威海聲援，而以襄字左營並新兵一營，自烟臺移駐龍門港，別以新募之福字三隊七百人，益萬齡軍。

是時日人既得志於金旅海蓋諸地，遂必欲躡我威海，盡墮北洋門戶，十二月十五日，其第二軍司令官大將大山巖所部之第二師團第六師團，即自廣島渡海，集於大連灣，合其犯遼數枝隊，幾二萬人，以兵輪二十五艘衛之，將赴山東。日兵之瞰山東，意在成山登岸，而先北擊登州。以綴我師，使我不及南顧。二十三日夕，日艦吉野、浪速、秋津州，突攻登州，甚急。登州瀕海爲城，面臨大洋。夜二更許，有開花彈落城內，居民駭竄。二十四日，日艦駛往成山海面。晚復來犯，逼近海岸，城上舊有明威繼光所鑄防倭銅砲，名曰『鎮海侯』，遽發是砲擊之，中其船面，敵艦亦退，翌晨復移向成山。先是，成山有日本兵艦駐外海，二十五日其兵艦運船載陸軍大至，由龍鬚島用小輪帶舢板渡兵，我駐島之綏鞏軍四哨，發砲擊之，沈其舢板二，其小輪遂折回。而兵艦發大砲向岸轟擊，掩護小輪舢板強渡以登，我軍不支，奔距島三十里之榮成縣。日兵登岸者約千人，亦踵至。是時，榮成國練已逃散，城門大啓，駐榮成閭得勝所部多防河土夫，不任戰，且槍械亦缺，遂狙伏城外東南隅隄下。日兵步隊數十名，入東門，登城垣，繞至東北隅，俯見我兵，發排槍，我兵驚潰，榮成陷。

日兵既踞榮成，其大隊陸軍麇至，將分道西竄以襲威海。蓋自榮成而西，分南北兩道，南道西迤南行六十里至橋頭，橋頭分兩路，一往文登，一至楊亭，而龍鬚島，而舊館，此爲通烟臺大道；北道西行百餘里，至南虎口，再三四里至楓嶺集，此爲赴威海故城大道。東過北虎口，即南幫砲臺後路。秉衡聞龍鬚島警報，令孫萬齡所部嵩武左營並福字三隊，自舊館馳往榮成迎敵。嚮午，即拔隊起，宿楊亭，二十六日從楊亭行十餘里，遇榮成敗卒闖得勝部，遂合軍，返楊亭，自是得勝之部，遂轄於萬齡矣。是日，戴宗騫亦令其分統劉樹德率綏鞏軍兩營至楊亭助戰。二十七日，我軍前鋒與敵探遇，各發槍相持，未幾我大隊至，敵退橋頭，我大隊即途次露宿，時大雪彌日，道途淖淖，軍七艱辛。

明日黎明，敵以大隊來撲，相持一時許，多負創卻走，我軍蹙之，遂奪回橋頭集。秉衡以銀三千兩犒師，且謂

有能奪回楓嶺者，賞當逾格。楓嶺者，東南距橋頭約四十里，東北距南幫砲臺十里而近，爲南幫砲臺後路孔道。方榮成之陷，南幫鞏軍曾派三營迎過三官廟，旋恐南幫空虛，立撤歸。而日兵乃自榮成分兩枝進：一枝西南來，進橋頭，即與萬齡相持者，別一枝西行北轉，連日探路進，已躡楓嶺，斷我南幫砲臺後路，南幫岌岌。故秉衡以逾格賞萬齡。於是連日皆戰，各交綏退，無勝負。

乙未（二十一年）正月元旦，有嵩武軍大旗一名據於敵，萬齡率輕騎追之，直指榮成，行十餘里，遇日兵大隊至，萬齡腿受彈傷退，日兵亦退。初二日嚮午，大戰，萬齡自敵日兵前鋒，令得勝抄後路，得勝反爲敵乘，致掣全局，萬齡不支，敗退，返橋頭。初三日，秉衡令萬齡徑搗楓嶺，而宗憲亦約夾攻，謂俟夜半，鞏軍攻楓嶺北，萬齡所部攻楓嶺東南，並夜往壩營。是夜初更，萬齡自橋頭起隊，行三十餘里，尚未曉，會日兵駐楓嶺者，亦擬東攻橋頭，故大隊東來，適與相遇。日兵以行軍電燈照我軍，畢見，我軍昏黑不見敵，遂匍伏避彈。天既明見敵來甚衆，方期鞏軍之拊其背也，鞏軍迄未至。日兵見我軍單，遂猛攻，愈逼愈近，且分隊抄我軍後路。於是萬齡自督前陣，得勝爲接應。因令得勝率接應隊，旁截來抄之敵，得勝不戰退，我軍大敗，撤歸橋頭。而駐橋頭之綏軍三營，已窄壁去，蓋驟接宗憲令過返威海矣。萬齡以宗憲既負約不至，復驟調綏軍離去，甚怒，亦棄橋頭退。於是楓嶺以東，乃無我軍踪跡。先是，南幫砲臺循外山築長牆一道，截東南南面，外環長濠，曲包甕北嘴鹿角嘴兩砲臺，以遠濶故，棄最西之甕廟嘴臺於外，而簡鞏軍七百人爲選鋒，扼南虎口，正月元旦，楓嶺踞敵進南虎口，初二日夕，復退楓嶺。初三日，我鞏軍戰敵於南虎口。初四日，敵復搶入北虎口，綏軍擊之，斃敵十餘人。有日兵一隊潛入小村狙伏，鞏軍急出二百人圍之，敵竟闖遁，爲我擒者五人。會萬齡棄橋頭退楊亭，於是藩籬盡撤，日兵得以全力攻我南幫矣。

當日兵之襲成山，其兵艦至者，凡二十五艘，爲松島、巖島、橋立、扶桑、千代田、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高雄、筑紫、金剛、比叡、天龍、葛城、太和、武藏、海門、磐城、大島、摩耶、愛嚴、烏海、赤城、八重山，復佐以魚雷艇十六艘，聲勢甚壯，實則任遠之船，不達十艘，餘多木質小船，猥以充數。時我海軍駐威海者，尙存鎮遠、定遠兩鐵艦，靖遠、來遠、濟遠三兵輪，平遠、廣丙兩小鐵甲，凡七艘皆任戰；並威遠、康濟兩練船，鎮中諸蚊砲艇六艘，凡十五艘；益以雷艇十二艘，決命借一，尙堪一戰，乃震於日艦聲勢，竟堅匿，坐以待斃。及

乙未正月，我陸師屢敗，日兵乃漸逼南幫砲臺。初五日，日艦留四艘於成山頭，護其運船，而悉以餘艦二十艘自榮成澳起碇，西撲威海，蓋同時與其陸軍約夾擊南幫砲臺也。但日艦扼於我劉公島砲火，不得逞，而陸路則大挫於敵，馴至無可救藥焉。

初五日黎明，日兵在虎山口外列橫陣，東自竈北灣，西至西海套，截我南幫砲臺於蘭口高山內。日兵猝登山俯瞰，以快槍小砲直擊守牆鞏軍及各砲臺。未幾，日兵畢集，我西路守南虎口選鋒七百人，傷亡略盡，東路守牆兵死亦甚衆，敵遂闖入長牆。先趨楊風嶺陸路砲臺，及各行營小砲臺，前受彈傷，後者繼進，不稍退。我陸路小砲臺哨官勢不敵，棄臺走，武備學生褚修儒等死之。分統劉超佩見勢急，驅弁勇回，與敵搏擊，中山溝伏敵，超佩受傷，以小輪船渡奔北幫，於是鹿角嘴、龍廟嘴臺相繼失守。竈北嘴臺以二十八生的砲，用子母彈旋擊鹿角嘴臺，敵敗之。敵稍却，而我軍死傷既多，逃亡亦衆，不能掃盪，仍爲敵踞。竈北嘴臺亦繼陷。是時，我海軍諸艦，駛至西海套，用過山擊法，向岸射南幫各臺踞敵，敵死甚衆，而我南幫殘卒，亦得藉海軍砲力之遮護，由長峯迤東沙灘衝出數百人，不然悉裹敵隊中，無噍類矣。方日本陸軍未逼南幫也，汝昌慮砲臺不能守，以巨砲資敵，將貽海軍憂。遣弁至臺卸其各砲之鋼底鋼圈以歸，宗憲爭之，復還爲配置，至是，日兵果資之以擊我海軍。

南幫失陷之後，鞏軍陣亡管帶張友志等三員，幫帶楊得林等四員，哨官哨長四十員，勇丁二千餘名。其北幫綏軍前敵兩營，爲劉樹德所統，甫自橋頭調回，見南幫之覆，鞏軍死亡甚慘，遂同時逃潰。宗憲以令箭截之，不可止，樹德委軍去。初六日，綏軍守臺二營亦潰，無一留者。蓋自甲午九月，綏、鞏兩軍勇丁卽索壓餉銀兩大譚，欲潰者屢矣。壓餉者，勇丁初入營，須扣餉三月，存統領糧臺，以爲軍米購價底銀，俟勇丁離營日，始補給令去。於是將領利勇丁逃亡，其壓餉三月可不給，而續補之勇，且可仍扣壓餉也。恆以苦工責勇丁，勇丁怒刺骨，及軍事陸危，南幫鞏軍給壓餉兩月，綏軍亦噪，宗憲終不給。至是相率譁潰，不返顧。宗憲移駐祭祀臺，從者皆散。惟北山嘴臺有學生砲勇二百餘人耳。

初七日，汝昌乘小輪至，挈宗憲往劉公島，（宗憲至島畏罪仰藥死）麾砲勇等去，並以海軍大砲毀北幫砲臺及子藥庫，俾弗資敵。日兵遂平行至北幫，威海陸地，盡爲敵踞，海軍道絕，而澳之東西門外巨敵艦數重，於是

我艦隊陷入重圍矣。蓋是時威海之防，自守口砲臺及陸路砲臺以外，尚有行營砲五十餘尊，其臺砲行營砲大小砲彈猶足一百五十發，其他水雷營電光燈槍彈銀，凡軍資器械，儲蓄甚厚，及是乃悉以予敵也。

南幫砲臺既陷，日兵即以臺之巨砲攻我澳內諸艦，我諸艦駛往西口以避之，由是東口不能守，敵乃得以魚雷艇卸我東口木關，並守口水雷諸物。而我雷艇，遂時得入口狙擊我諸艦矣。初五日之夜，日雷艇先已入口擄奪，我軍覺之，劉公島發砲轟擊，敵未得逞。及初九日，日艦合南幫兩隊，攻我艦隊，與劉公島砲臺相持竟日，而劉公島砲臺兵弁傷亡甚衆。是夜日雷艇復入口襲我，爲我擊沉者五艇，而我定遠平中雷，傷甚，駛泊劉公島岸旁，乃船已傾側，旋擊沉之。日水陸兵復以砲猛攻我，燬我口島火藥庫並地阱砲，而我劉公島砲臺亦擊傷其兩艦。十二日侵曉，日雷艇復入口來襲，我來遠快船，並威遠練船，寶筏差船，皆沉於敵。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啓，方登岸徵逐未歸也。十三日，我管帶魚雷艇王登瀛等，率雷艇十二艘，從西口駛逃，日艦追之，盡擄以去，其傍近淺水，得鳧渡者百餘人，自威海陸路道陷敵，劉公島居民惶懼，兵輪管帶不欲戰者，復交煽其間，兵勇水手和之，益以日雷艇時入東口襲沉我艦隊，而我雷艇全隊且闖口逃。於是兵勇水手，乃糾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乞生路。島中大擾，諸洋員請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曰：「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觀此事也。」乃先出示撫衆，略謂援兵將至，固守待援，衆亦稍定。是時，英水師兵官馬格祿方充海軍副統領官，與我兵輪管帶數人，並洋員浩威，已密有成議，將以衆瓊汝昌。十五日，敵復自水陸以砲攻擊，沉我靖遠艦。是日，右翼總兵劉步蟾，仰藥自殺。時汝昌駐鎮遠。十六日，弁勇擁護軍統領張文宣至汝昌所，合水手圍之。營務處道員牛炳昶，並各艦管帶踵至，相對泣。汝昌乃召洋員議事。以德員瑞乃爾能華語，令出撫衆，曉譬良久，衆喧噪不可解。瑞乃爾入艙密告汝昌曰：「軍心已變，勢不可爲，不若沉船燬臺，徒手降敵，較爲得計。」汝昌沉思良久，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蓋諸將懼敵甚，恐沉船徒降取怒日人也。

十七日，日兵水陸復以砲急攻，島中愈惶急。時島中尚存鎮遠鐵艦一，濟遠、廣丙、平遠兵輪三，鎮中等蚊雷艇六，凡十艘，而彈藥將罄。是日得煙臺密信，知東撫李秉衡已走萊州，援兵絕。汝昌召海軍諸將議，鼓力撞敵船，突圍出，或幸數艘得抵煙臺，愈於盡覆於敵也。諸將不允，散去。旋勇丁水手露刃懼汝昌，汝昌稍慰之，遂即

仰藥，張文宣繼之。十八日未曉，汝昌、文宣相繼死。牛炳昶召諸將並洋員，議降，瑞乃爾請如汝昌前令，沉船毀臺，乃議降事。諸將及洋員皆不許。於是英員浩威作降書，仍託諸汝昌語，管帶閩人某譯爲華文，炳昶即署以海軍提督印。黎明，廣內管帶程璧光乘鎮邊艇，懸白旗，齎書詣日軍降。所有殘餘艦隊十一艘（康濟練艦計入），並劉公島各砲臺軍資器械，遂全納於敵，而我慘淡經營之海軍，至此乃掃地盡矣。

先是，孫萬齡棄橋頭北去，宵宿孫家灘。初五日退楊亭，駐村外，南幫砲臺時已失守，日兵假緩軍衣裝，詐稱我敗兵踵至，適與我探卒遇，遽開槍。萬齡聞變，發隊拒之，敵亦退。初六日，再退舊館，於麓島掘溝設卡以防西路。是夕，口探馬二十騎來窺，我軍槍擊之，傷其三，擒一人，其身畔有中國地圖及駐兵多寡有無處所，分列甚悉。初八日，秉衡令斬閭得勝於舊館。未幾，復令孫萬齡退駐寧海。寧海非要塞，不可駐兵，乃進據孟良口。孟良口左海右山，形勢甚險，亦東道關鍵也。於時孟良口迤東而南，皆委諸敵，任其縱橫出入。敵既進踞威海，攻我海軍益急，砲聲達煙臺，且謂將由海道來襲，官民大恐。十三日未刻，秉衡西走。十五日，至黃縣，是日兵襲入文登。十八日，秉衡退駐萊陽，復令萬齡率所部自寧海移海陽。萬齡誤視電文，拔退萊陽，於是日兵襲入寧海，又西侵二十餘里，至沙鼻窩，大掠而去。蓋日兵之入山東，東至榮成縣之龍鬚島，南及文登迤西，北至寧海之沙鼻窩，而意實在威海。其旁擾各縣邑，乃披枝拔本之狡謀也。迨劉公島陷，海軍全燬，於是榮成、文登、寧海之敵，皆相繼退，別以康濟練船載汝昌櫬還煙臺。縱水陸將士居民西渡，而歟兵居劉公島，與威海相犄角，以扼我要害焉。

二、劉公島潰敗諸文件（註四）

劉公島降敵之先，日海軍中將伊東祐亨，於甲午十二月二十八日（西歷一月二十三日）致書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勸降。其書曰：

大日本國海軍總司令中將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爲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今有人焉，於其進退之間，雖有國計身家兩全之策，而爲目前公私諸務所蔽，惑於所見，則其友人安得不忠言直告，以發其三思乎？僕之預告閣下者，亦

惟出於友誼一片至誠，冀閣下垂諒焉。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覩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陞擢；文藝乃爲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爲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爲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爲邦家致誠者，豈可使向滔滔頽波，委以一身，而卽足云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史冊疆域，炳然龐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夫大厦之將傾，固非一本所能支，苟見勢不可爲，時不云利，卽以全軍船艦，權降與敵，而以國家興廢之端視之，誠爲些些小節，何足掛懷？僕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請閣下暫避日本，切願閣下蓄餘力，以待他日貴國中興之候，宣勞政績，以報國恩，閣下幸垂聽納焉。貴國史冊所載，雪會稽之恥，以成大志之例極多，固不待言。法前總統末古末啞恒，曾降敵國，以待時機，厥後歸助本國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國未嘗加以醜辱，且仍推以爲總統；土耳其之啞司末恒拔香，夫利加那一敗，城陷而身爲囚虜，一朝歸國，卽躋大司馬之高位，以成改革軍制之偉勳，迄未聞有撓其大謀者也。閣下苟來日本，僕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優容。蓋我陛下於其臣民之謀逆者，豈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軍中將，大鳥樞密顧問官等，量其才藝，授職封官，類例殊衆。今者，非其本國之臣民，而顯有威名赫赫之人，其優待之隆，自必更勝數倍耳！第今日閣下之所宜決者，厥有二端：任夫貴國依然不悟，墨守常經，以躋於至否之極而同歸於盡乎？抑或蓄留餘力，以爲他日之計乎？從來貴國軍人與敵軍往返書翰，大都以壯語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強，或蔽其弱，以爲能事。僕之斯書，洵發於友誼之至誠，決非草草，請閣下垂察焉。倘幸容納鄙衷，則待覆書貴臨，於實行方法，再爲詳陳，謹佈上聞。明治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汝昌得書不報，迨後勢益窮蹙，乙未正月十八日汝昌、文宣相繼仰藥死，程璧光遂於翌日賁託名汝昌之乞降書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

二五〇

詣日艦。其書曰：

革職留任北洋水師提督軍門丁，爲咨會事：照得本軍門前奉貴提督來函，祇因兩國交爭，未便具覆。本軍門始意必戰至船沒人盡而後已，今爲保全生靈起見，願停戰事，所有劉公島現存船隻及砲臺軍械，委交貴營，但冀不傷中西水陸官兵勇民人之命，並許其離島還鄉，如荷允許，則請英國水師提督爲證。爲此具文咨會貴軍門，請煩查照，即日見覆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日本海軍提督軍門伊東，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伊東得函，即日覆函納降。覆函曰：

大日本國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爲咨覆事：頃接貴軍門咨開，因欲保全生靈，願停戰事，等因准此。本中將自應遵照辦理，爲此咨覆貴軍門，請於明日將兵船軍械砲臺之屬，悉數交下。本中將當遣一船，護送貴部下將弁兵勇，旋返貴國。至貴軍門如欲前赴本國，並無不可。他日和局既定，貴軍門仍思效力於貴國，亦必惟命是聽。貴軍門素著盛名，本中將早深欽仰，所有咨商各節，一一深信不疑，斷無俟英國水師提督作證。爲此咨覆貴軍門，請爲迅賜查照施行，須至咨覆者。右咨覆大清國北洋海軍提督軍門丁，明治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印。

此函之外，尙有私函一通，香檳酒蠟黃等禮物三種，併交程璧光帶回。海軍將領復託汝昌之名，覆伊東一函，約期於二十二日交割。其函曰：

伊東軍門大人閣下：頃接覆函，深爲生靈感激，承賜珍品，際此兩國交爭，不敢私受，謹以璧還，並道謝忱。來函約以明日，交軍械臺艦等類，因兵勇須卸繳軍裝，收拾行李，爲時過促，恐有不及，請展限至正月十二日起，閣下進口，分日交收各件，決不食言。專此具覆，並請臺安，諸希裁察。丁汝昌頓首。正月十八日。外繳還香檳酒蠟黃等共三件。

正月二十日（西歷二月十四日），道員牛炳昶，在日本松島艦上，與伊東簽降約十一條，是即劉公島降約。約文如下：

一、中西水陸文武各官，須開明職銜姓氏，西人須開明國名姓名，其文案書職及兵勇人等，須開一總數，以便

分別遣還中國。

二、中西水陸文武官員，須各立誓，現時不再預聞戰事。

三、劉公島一切器械，應聚集一處，另開清摺，注明何物在何處，島中兵士，由珠島日兵護送登岸，威海各東兵，自二月十四日（西曆）五點鐘至十五日午正止，陸續遣歸。

四、請牛道臺代承交付兵艦砲臺之任；惟須於十五日正午以前，將艦中軍器，臺上砲位，開一清賬，交入日艦，不可遺漏一件。

五、中國中西水陸各官弁，許於十五日正午以後，乘康濟輪船，照第十款所載，開返華界。

六、中西各官之私物，凡可以移動者，悉許隨帶以去；惟軍器則不論公私，必須交出，或日官欲加以搜查，亦無不可。

七、向居劉公島華人，應勸令安分營生，不必畏懼逃竄。

八、日官之應登劉公島收取各物者，自十六日九點鐘爲始，若伊東提督欲求其速，可先令兵船入灣內等待，彼時中西各官，仍可安居本船，俟至十六日九點鐘爲止，一律遷出，其在船之水師水手人等，願由威海遵陸而歸，可聽其便，其送出之期，則與各兵一律從十五日正午爲始。

九、凡有老幼婦女之流，欲離劉公島者，可自乘中國海船，從十五日正午以後，任便遷去；但日本水師官弁，可在口門內稽查。

十、丁軍門等各官靈柩，可從十六日正午爲始，或遲至二十三日正午以前，任便登康濟兵船離島而去。伊東提督又許康濟不在收降之列，卽由牛道臺代用，以供北洋海軍及威海陸路各官，乘坐回華，此緣深敬丁軍門盡忠報國起見；惟此船未離劉公島之前，日本水師官來拆卸改換，以別於砲船之式。

十一、此約既定，戰事卽屬已畢；惟陸路若欲重戰，日艦必仍開砲，此約卽作廢紙。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卽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國候補道牛，日本水師提督伊東，在松島艦臺押，此約以西文爲正。（此約譯自西文）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

二五二

三、海軍失事人員之查參（註五）

劉公島降敵一幕，海軍全陷，而我將士之怯弱，尤大暴露。後清廷命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查辦，文韶於四月初間奏覆曰：

奏爲北洋海軍失事遵查大概情形先行據實糾參分別查辦以申軍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北洋水師，自旅順、威海、劉公島先後不守，全軍淪陷，所有各營大小官弁，其陣亡傷亡者，自應詳細查明歸案請卹，其失守船艦陸續來歸及在逃未獲者，亦應分別職任之大小，事理之輕重，一體查參。庶幾懲前毖後，軍法不致全廢，若經札飭海防支應局新授天津道李興銳，候補道劉啓彤，會同在津司道詳查稟復，以憑核辦。茲據該司道等會詳稱，北洋海軍員弁，統歸提督節制調遣，本年正月間，倭人攻陷威海，水師全軍艦艇，困守劉公島，一切戰守機宜，原應聽統將指麾調度。惟濟遠等船管帶官林國祥、葉祖珪等，均管帶兵船，有身先士卒之責。該員等或擢自末職，或出自學堂，渥荷天恩，躡躡顯秩，當海島被圍之際，即使矢盡援絕，勢不可爲，同時殉節者，則有戴宗騫、張文宣、劉步蟾、楊用霖等，均能引義自裁，不求苟免。而該員等巨艦十數，同聚一隅，既不爲困獸猶鬥之謀，復不爲鑿船自沉之舉，遂至船亡而人存。律以春秋棄師之義，實屬咎無可辭。其候選道馬復恒、牛炳昶，山東候補道嚴道洪，雖無統轄兵船分司戰守之責，惟或則綜理營務，或則緝轂全營，均未便置之不議，至魚雷各艇管帶官蔡廷幹等駕船先逃，不知去向，情罪尤爲重大，理合分晰開單呈請核辦。除海軍陣亡受傷各員弁，另行詳細查明其詳請卹外，會詳請奏前來。臣維北洋水師上年大東溝之戰，非不衝鋒破浪，人人有同仇敵愾之心，乃自旅順、威海迭經失利，銳氣一挫，遂有不可收拾之勢。蓋兵以氣勝，士氣既散，雖名將無以善其後也。現就單開各員，考其實事，采諸輿論，亦儘有諳習海戰臨敵致果者。兵家勝敗無常，惟功罪有歸，不得不憑勝敗以爲考核。此次事定以後，仍應電整海軍，若失事之員，不先予以應得之咎，則功罪不明，軍律幾同虛設，後此又將何所措手？臣與在津司道，細心核議，謹分別三項，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命下。臣仍當督飭司道等秉公查辦，斷不敢意有重輕，致涉枉縱。除陣亡傷亡各員弁另行詳細查明彙案請卹外，所有遵查海軍失事大概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將海軍失事各員弁開列職任銜名，擬請暫行革職，聽候查辦，及先行革職一體嚴拏，分別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濟遠管帶官代理中軍右營副將曹革守備林國祥、靖遠管帶官中軍右翼左營副將葉祖珪、來遠管帶官右翼左營副將邱寶仁、平遠管帶官後軍前營都司李和、威遠管帶官精練前營遊擊林穎啓、鎮中管帶官管理後軍右營都司右翼左營都司林文彬、鎮邊管帶官署理後軍前營都司黃鳴球、鎮東管帶官代理後軍左營都司精練右營守備陳鎮培、鎮西管帶官代理後軍右營都司補用千總潘兆培、鎮南管帶官代理後軍前營都司原署精練右營遊擊藍建樞、鎮北管帶官代理後軍後營都司補用遊擊呂文經、鎮遠副管駕署左翼中營遊擊左翼中營都司何品璋、定遠副管駕右翼中營遊擊李鼎新，以上十三員，均係管帶兵船，有統率戰守之責。本年正月間海軍全陷後，該員等由劉公島投回烟臺，聽候查辦。其中亦有臨敵力戰，或身受重傷，因本船弁兵傷亡過多，迫於勢窮力竭者，惟均係全船統將，責有攸歸，應請旨一併暫行革職，容再分別詳查奏明辦理。總理海軍營務處會辦魚雷營三品銜候選道馬復恒、威海水陸營務處兼管東口水雷營二品頂戴候選道牛炳昶、備補海軍提標中軍參將山東候補道嚴道洪，以上三員，向係在岸辦理營務，並無統轄兵船之責，惟在水師中職分較大，馬復恒、牛炳昶此次亦由劉公島投回，嚴道洪據稱先期出差在烟臺，是否屬實，應請旨一併暫行革職查辦。雷艇左隊一號管帶官都司蔡廷幹、雷艇左隊二號管帶官守備李士元、雷艇左隊三號管帶官守備鄭得春、雷艇右隊一號管帶官守備徐永泰、雷艇右隊二號管帶官守備劉芳圃、雷艇右隊三號管帶官守備曹保賞，以上雷艇管帶官六員，均有統率戰守之責，本年正月間威海衛失陷後，海軍困守劉公島，正在倉皇禦敵之時，該管帶等輒於十三日駕船先逃，迨被倭艦追急，復相率棄艇登岸逃逸，情罪尤無可逭。蔡廷幹等應請旨一併革職嚴拏，拿獲即行正法。其定遠、鎮遠鐵甲船隨船雷艇，尚有同時先逃者，查明續行參辦。

註一：羅惇誡：「中日兵事本末」，引自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頁三八二，中華書局出版。

註二：「字林西報」，頁六六九，一八九六年五月一日。

註三：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頁一八四—一九七；參考白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

山東篇，及海軍篇。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九日

二五四

註四：同註三，頁一九七—二〇三。

註五：同註三，頁二〇三—二〇六。

十九日（二月十三日） 清廷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訂和約。

本日，清廷以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赴日議和，調雲貴總督王文韶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註一）時駐華美使田貝（Charles Denby）函告鴻章，言日本來電云，除先償兵費，並朝鮮自主外，若無商讓土地及畫押全權，則使臣可無庸前往。鴻章請諸朝，許之。二月九日乃行，十九日自天津東渡，二十三日抵馬關，其子經方，及美員福世德、參贊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等從之。

附錄：

一、清廷任李鴻章為全權（註二）

當張、邵再度被拒遲留長崎之時，正劉公島失陷，海軍覆沒，遼陽敗績，盛京危急，清廷焦急萬狀。因伊藤曾明言須恭親王、李中堂前往，乃有遣派李鴻章之舉。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光緒帝召見軍機大臣翁同龢等，問諸臣時事如此，戰和皆無可恃。言及宗社，聲淚並發。十七日復召軍機議事，即決定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十八日，慈禧后召見樞臣議事，論及美使田貝轉來東京之信。曰：「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開復，即令來京請訓。」恭親王奏訖曰：「上意不令來京，如此恐與早間所奉諭旨不符。」慈禧曰：「我自面商，既請旨，我可作一半主張也。」即退書廷寄。十九日由軍機大臣將廷寄電津，廷寄曰：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上諭：前派張蔭桓、邵友濂為全權大臣，前往日本會議條款。詎日本意存延宕，藉收書有請旨之語，謂非十足分際，不與開議，迭問長崎。迨令田貝再電詢問，乃又答云：無論何時，可以再行開商和議，總須中國改派從前能辦大事位望甚尊聲名素著之員，給與十足責任，仍可開辦等語。現在倭餒鳴張，畿疆危逼，以此權宜一策，但可能解紛紓急，亟謀兩害從輕。李鴻章勳績久著，熟悉中外交涉，為外洋各國所共傾服。今日本來文，隱有所指，朝廷深維至計，此時全權之任，亦更無出該大臣之右者。李鴻章著賞

還翎頂，開復革留處分，並賞還黃馬褂，作爲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定和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著王文韶署理，李鴻章著星速來京請訓，切勿刻遲。一切籌辦事宜，均於召對時詳細面陳。該大臣當念時勢艱危，既受逾格之恩，宜盡匪躬之義，諒不至別存顧慮，稍涉遲回也。起程日期，並著即行電聞，以紓廑注。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同日降旨，以雲貴總督王文韶，調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清廷既決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因託美使出員於正月二十四日（西歷二月十八日）轉電日政府曰：「任命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付與一切全權，因之日本政府選定何地爲兩國全權會見之地，望從速電答。」在此電之前一日（正月二十三日，西歷二月十七日）日政府有一電在途中錯過，後經田貝轉達於中國政府，其電略曰：「日本政府以爲中國於確認朝鮮獨立賠償軍費外，因戰爭之結果，割讓土地，及爲將來之交際，締結確然條約，非再派能談判此等事件之全權使臣，則雖派遣何等媾和使，其使命當全然無效。」迨中國通告派李鴻章爲全權之電報既達，日政府復於正月二十五日（西歷二月十九日）託美使電達清廷曰：「對於本月十八日中國政府電報，日本政府回答之前，希望中國政府確言，果照本月十七日日本政府之電，派遣其全權大臣乎？」迨李鴻章入京，清廷遂於二月初二日（西歷二月二十六日）託美使田貝電告日政府曰：「李鴻章被任爲頭等全權大臣，商議本月十七日日本政府來電中各種問題。李帶有執行此等任務之全權。」割地媾和之局，至斯已定。

二、李鴻章入京請訓（註三）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李鴻章應召至京，當日召見於乾清宮，與軍機同入。鴻章碰頭訖，光緒溫諭，詢途間安穩否，遂及議約事。此時割地之議，已騰於衆口。鴻章奏言：「割地之說，不敢擔承，假如占地索銀，亦殊難措，戶部恐無此款。」翁同龢奏言：「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當努力。」孫毓汶、徐用儀則奏言：「不應割地，便不能開辦。」復問海防，鴻章對以：「實無把握，不敢粉飾。」遂退。鴻章與軍機大臣等集傳心殿議事。鴻章請翁同龢同往議和。同龢曰：「若余曾辦過洋務，此行正不辭。今以生手辦重事，胡可哉？」鴻章云：「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語甚堅決。孫毓汶、徐用儀則以不割地恐難成局。諸人相對默然，同龢仍主前議，謂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九日

二五六

勝於割。鴻章欲使英俄從傍出力，毓汶、用儀以爲難以辦到。當日鴻章偕毓汶、用儀訪美使田貝，以敕書底稿就商，鴻章又獨拜英使歐格訥。二十九日，鴻章與軍機入見，請令其子經方隨往，以通日語且與陸奧有舊也。（經方曾任駐日公使）退集傳心殿議事，鴻章謂昨赴各國使館，意在聯絡，未得要領，計無所出。毓汶以如割地，可了局。同辦力持不可。二月初一日，鴻章等入見，鴻章而奏，略及割地之事，奕訢亦發是說，同辦則力持不可。時慈禧方患肝氣，多日未臨朝召見廷臣，據翁同龢日記，謂慈禧對鴻章、奕訢奏陳割地之說，大不謂然，謂光緒曰：「任汝爲之，毋以啓予也！」初四日，朝見，奕訢奏：「美使田貝云，初二日倭回電，駭敕書稿何以用漢子，因改洋文，再電去。」光緒曰：「此借事生波矣。汝等宜奏東朝（指慈禧），定使臣之權，並命李相速來聽起。」比退，奏事太監傳：「慈禧昨日肝氣發，臂疼腹泄，不能見，一切聽上旨可也。」然迫於事勢，卒予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初六日，李鴻章上摺奏預籌赴東議約情形曰：

奏爲遵旨馳赴日本議約預籌大略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欽奉諭旨，作爲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定和約，當即趨程晉京，仰蒙召見三次，誨示周詳，莫名欽感。連日據美使田貝函稱：日本來電，中國另派大臣議和，除先允償兵費，並朝鮮由其自主外，若無商讓地土及辦理條約書押之全權，即無庸前往等語。迭與王大臣等會議，均以敵愾甚著，注意尤在割地。現在事機緊迫，非此不能開議。當經總理衙門函覆田貝，以日本電內欲商各節，均有此全權責任，尙未接准覆電。頃軍機大臣恭親王等傳奉皇上面諭，予臣以商讓土地之權。聞命之餘，曷勝悚懼。竊以中國壤地，固難輕以與人，至於戎狄窺邊，古所恒有。唐棄河湟之地，而無損於憲武之中興；宋有遼夏之侵，而不失爲仁英之全盛。徵以西國近事，普法之戰，迭爲勝負，即互有割讓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但能力圖自強之計，原不嫌暫屈以求伸。此次日本乘屢勝之勢，逞無厭之求，若竟不與通融，勢難得解紛紜急。詳閱日本致田貝兩電，於兵費及朝鮮自主兩節，均認爲已得之利，而斷斷爭執，尤在讓地一層。惟論形勢則有要散，論方域則有廣狹。有暫可商讓者，即有碍難允許者。臣必當斟酌輕重，力與辨爭。所慮者，會議之初，先議停戰，西例祇有議停數日或一兩旬之案，設磋商未定，而停戰期已滿，彼仍照舊進兵，直犯近畿，又當如何處置？至兵費雖允償還，多寡懸殊，亦須從容商定數目。其所云日後日本想有別事應行整辦，包

藏非止一端，並當相機迎拒。但能爭同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此行，本係萬不得已之舉。皇上軫念生靈，不恤俯從羣議。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利於國家，何暇更避怨謗。惟是事機之迫，關係之重，轉圜之難，均在朝廷洞鑒之中，臣自應竭心力以圖之。倘彼要挾過甚，固不能曲爲遷就，以貽後日之憂；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禍。敵情最爲兇悍，儻於臣將行之時，既往之後，遽以大股北擾，應如何密爲籌備之處。聖明自有權衡，此則區區之愚，尤不敢不預爲顧慮者也。臣俟日本覆電，定在何處會議，即行出都，取道天津，乘輪東渡，再求面聽訓誨，俾有遵循。理合恭摺瀝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奏上，初七日即發廷寄曰：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奉上諭：李鴻章奏遵旨與日本議約預籌大略情形一摺，據稱倭人注意，尤在讓地一層，事機緊迫，非此不能開議，擬就形勢方域，斟酌輕重，力與辨爭，此外所求，非止一端，並當相機迎拒等語。此次特派李鴻章與日本議約，原係萬不爲已之舉，關係之大，轉圜之難，朝廷亦所洞鑒。該大臣膺茲鉅任，惟當權衡於利害之輕重，情勢之緩急，通籌全局，即與議定條約，以紓宵旰之憂，而慰中外之望，實有厚期焉。將此密諭知之，欽此。

三、軍機處公奏與全權敕書（註四）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美使田貝送電，日方定在馬關會議，初七日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等公奏慈禧太后。其奏曰：

奏爲敵情叵測，時勢岌危，皇上特遣重臣，再申和議，而日本屢次延宕，大學士李鴻章尚未成行，誠恐倭人伺河凍一開，分兵衝突畿輔，則可憂者大矣。臣等伏思倭奴乘勝驕恣，其奢望不可億計。現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在讓地一節。若駁斥不允，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爲重，邊徼爲輕，利害相懸，無煩數計。臣等前日懇請召見，旋奉傳諭，命臣等請諭旨遵辦。皇上深維至計，洞燭時宜，令臣等諭知李鴻章，予以商讓土地之權，令其斟酌輕重，與倭磋商定議。昨據田貝送到日本覆電，定於長門會議。李鴻章自應迅速起程，免致另生枝節。所有臣等遵旨辦理緣由，列實瀝陳，伏乞慈鑒，謹奏。

初八日，李鴻章單獨請訓，未與軍機同見，發下全權敕書。敕書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三、二十七日

二五八

大清國大皇帝上諭：現因欲與大日本國重敦睦誼，特授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同商議，便宜行事，定立和約條款，予以署名畫押之全權。該大臣公忠體國，夙著勲勞，定能詳慎將事，締結邦交，不負朕之委任。所定條款，朕親加查閱，果爲妥善，便行批准。特敕。

鴻章請訓既畢，遂於初九日肅然出都。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六〇，頁三二五二—三二五三，（原頁十二—十三）。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二五三—二五五。

註三：同註二，頁二五五—二五八。

註四：同註二，頁二五八—二五九。

二十三日（二月十七日） 日政府託美使告清廷：「非有承認朝鮮獨立，賠償軍費，割讓土地之全權外，拒絕和談」。（註二）

註一：「美使報告」，二二五六號。

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一日） 孫先生文在香港擴大革命組織，原香港輔仁文社併入興中會，設總部於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籌劃革命進行，對外以乾亨行爲掩飾，藉避警探耳目。

孫先生自檀香山返抵香港後，即召集舊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區鳳墀等創設興中會總部，以擴大興中會之組織。孫先生因素知香港之輔仁文社亦以革命爲宗旨，遂與接洽組黨之事，勸將該社併入興中會。該社領袖楊衢雲欣然應諾；於是陸續締盟者更有謝纘泰、黃詠商、周昭岳、余育之、徐善亭、朱貴全、丘四等數十人。籌備既竣，租定香港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爲總會所，託名爲「乾亨行」。

「，藉避警探耳目。本日開成立會，會名仍名興中會。凡入會者須一律舉右手向天宣誓，其辭曰：『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更將檀香山所定章程修正爲十條，規定總會與支會之權限。（註一）並發佈興中會宣言書，因避清廷與英國官吏耳目，僅標救亡宗旨。（註二）」

按：楊衢雲福建海澄人，尚俠好義，少習機械於香港國家船廠，因失慎斷右手中指，乃改治英文。旋充香港灣仔國家書院教員，招商局總書記，及沙宣洋行副總經理等職。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合謝纘泰等發起組織輔仁文社，初僅以開通民智討論時事爲宗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結識孫先生於西醫書院，乃有志於反清復漢之舉。纘泰廣東開平人，其父日生在澳洲經營進出口貿易，屬洪門會籍，故纘泰幼承家訓，以繼承父志爲抱負。後隨日生歸香港，肄業於皇仁書院，聞衢雲有革命計劃，遂訂交焉。

附錄：

一、香港興中會宣言（註三）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盡自勉旃。謹訂章程，臚列如左：

一、會名宜正也 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

二、宗旨宜明也 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鄰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日爲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七日

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奮，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此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舉，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遭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救。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也。

三、志向宜定也 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皆當慥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員宜得也 本會按年公舉辦理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爲總辦，一人爲協辦，一人爲管庫，一人爲華文案，一人爲洋文案，十人爲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

五、交友宜擇也 本會收接會友，務要由舊會員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爲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親填名冊，並即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持執，以昭信守，是爲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交換。

六、支會宜廣也 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依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爲一。又凡每處分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支會，代爲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人才宜集也 本會需才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爲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贊助。故今日廣爲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

八、款項宜籌也 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集鉅資，用濟公家之急，兼爲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每股科銀十元，認一股至萬股，皆隨各便。所收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爲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即彙寄至總會收入，發給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下，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設也 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爲會員辦公之處，及便各友時到敘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

十、變通宜善也 以上各款爲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依照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處支會可隨時變通，別立規條，務臻妥善。

二、馬小進撰「香江之革命樓臺」（註四）

昔亡友潘蘭史先生飛聲，嘗以其所作「香江雜詠」示予，中有句云「樓臺盡是金銀氣。」予甚未以爲然。蓋香江一島，雖是商賈薈萃之區，而此地樓臺，不得謂爲「盡是金銀氣」也。若論書卷氣者，近十年來，於斯始盛，姑勿具論。茲予所欲言者，去今四十載以往，中華民國實孕育於是間而已。故予常言香江樓臺不但有金銀氣，書卷氣，且有革命氣焉，予固能言而足徵也。

百子里一號門牌 亡清光緒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即公元一八九二年三月十四日）開平謝續泰先生聖安，與其摯友楊衢雲、陳芬、周昭岳、黃國瑜、羅文玉、劉燕賓、胡幹芝、溫宗堯、陸敬科等，在百子里一號二樓，正式成立輔仁文社光復會，以密謀革命事業。此屋三樓則爲陸敬科先生，及其硯居俱樂部友人所住也。其社綱爲「盡心愛國」四字。社友以楊烈士衢雲之年爲最長，因舉作社長焉。社中人物，今尚存者僅得謝君續泰、周君昭岳（現在香江）、陸君敬科（現在廣州）、溫君宗堯（現在上海）而已。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七日

二六二

上環壽而康酒樓 此爲尤列先生令季與楊烈士衢雲縱談時務之地也，此樓今已不存，其街名門牌，惜予不獲悉，曾以問諸尤先生，他亦不能憶及。然稍稽時日，當或可於官署中舊檔考得之。蓋光緒十八年壬辰秋，羅君文玉設婚筵於此酒樓，輔仁文社同人咸集，尤列先生繼至，與楊烈士衢雲縱談時務。楊烈士所論者，皆政治革命之事，尤先生異之，叩其家世，楊烈士言「先祖因讀明史，偶有所感，遂棄官去國，故吾（楊烈士自謂）之生也，乃在香港。」尤先生曰：「君適與予所談者，乃政治之革命耳！令祖因讀明史而棄官，蓋不願爲滿清奴隸也，君亦知有種族問題在耶？」楊烈士豁然大悟曰：「我得之矣！」

歌賦街楊耀記 壽而康之宴，酒闌人散，楊烈士問尤先生所寓何在？尤先生告以現住于歌賦街楊君鶴齡處，與孫逸仙先生同居。楊烈士因偕尤先生歸，與孫先生相見，歡甚，由是朝夕過從，至則抵掌縱談，達旦不倦。蓋楊君鶴齡者，乃尤先生在廣州算學館同學，楊耀乃鶴齡之祖父也（楊耀記今已不存，門牌號數待考）。

威靈頓街杏譙樓西菜館（此館今已不存，門牌號數待考）初，逸仙先生學醫于香江雅麗氏醫院時，因與楊君鶴齡爲同邑之誼，故暇日輒至楊耀記相弼，尤列先生一見，即共話革命，極投契。某日，多友在座，尤先生忽曰：「諸君未見洪秀全乎？」隨指孫先生曰：「此人頭腦，即與洪秀全同樣者也。洪秀全以種族革命爲職志，今汝（謂孫先生）頭腦如彼，非完成洪秀全之志不可也。」孫先生曰：「諾。」滿座爲之粲然。然而謂中華民國以此數語爲造端，亦無不可也。翌日，孫先生遇尤先生於途，因邀往威靈頓街杏譙樓小酌，以圖歡敘，酒次，孫先生曰：「昨日之言，我甚贊同。我前在檀香山提倡革命，人皆謂我爲教人作反，遂失敗而回，今幸同志相遇，彼此商酌進行，是。」尤先生曰：「我只望事成，誰居其功，在所不計也。」從此孫、尤二人交誼愈固，有如膠漆焉。

士丹頓街十三號 考與中會之決議成立，是在光緒十八年壬辰冬初（即公元一八九二年），地爲廣州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抗風軒也，光緒二十年甲午（即公元一八九四年），孫先生再至檀香山，組織興中會，與僑胞圖謀革命。翌年（即公元一八九五年），孫先生由檀抵香江，因即與尤列先生及楊烈士衢雲等組織興中會于香江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其時爲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公元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八日）。門外榜名曰「乾亨」，開會時，票舉黃君詠襄爲會長，輔仁文社社員之加入者，有楊烈士衢雲，及謝續泰、周昭岳二君。迨後，黃君詠襄因事辭

職，繼之者爲楊烈士衢雲；但黃、楊二君雖爲會長，而主持會務者，則孫、尤二先生也。

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 亡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即公元一千九百年），史烈士堅如謀炸廣州督署，事敗死之。厥後惠州舉義，又不幸無成。時廣東總督爲巡撫德壽兼任，德壽，滿州人也，剛愎怒甚，必欲得黨要而後甘心，特飭卓勇統帶李家焯，加緊嚴緝，查得楊衢雲潛居香江，因密派狼狽陳林至港謀殺楊君。時楊君已毀家救國，窮極無聊，故賃居中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設校教授英文，賴舌耕所入，以養妻兒。黃君耀庭之鄉人江君恭壽，素慕楊君爲人，最先得此謀殺消息，因亟冒險勸阻陳林，並催促楊君移居避難。但楊君以己身乃革命黨人，死生久已置之度外，婉謝江君，燕居如故。豈料庚子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六時（即公元一九〇一年一月十日），兇手陳林，突然入校，鎗殺楊烈士於教室中耶！

德輔道中某號及荷李活道尾某號 同盟會於亡清三十一年乙巳（即公元一九〇五年），在日本東京成立後，即於香江秘密成立中國南方支部，主其事者爲陳少白（已故）、馮自由（尚存）、陳景華（已故）、盧信公（已故）、黃世仲（已故）、陳樹人（尚存）、謝英伯（尚存）諸位老同志。其先以中國日報爲總機關，後因同志日多，乃賃德輔道中（即今荷江先施公司之斜對門）某號四樓爲集會之地，名曰「中國閱書報社」，以避外人注意。未幾，汪精衛、胡漢民兩先生還自日本，亦常至此與諸同志晤言，予猶記此樓之下，爲販售陽江皮箱店也，未及一載，又遷往荷李活道尾某號三樓，即今日東方日報之社址。當時居于此屋之二樓者，則爲現在上海周先覺律師。此樓地較寬敞，同志暇時，每至此瀏覽革命書報，星期日夜間，復演說革命大義，以鼓勵同志努力奉行，不佞因常奔走於斯，爲會中幹事也。

草此文畢，念及當年之革命同志，死者死而老者老矣，如楊烈士衢雲之墓，至今仍是荒土一坯，未樹碑碣，尤烈先生則年逾古稀，窮居旺角（香江對海地名）一小樓中，衣食不給，藥醫藥以自活。若謝君縉泰、周君昭岳，白髮盈頭，亦清貧似我。舊日之革命同志，已無有過而問之者，復何人知有此當年之革命樓臺哉！嗚呼！

三、馮自由撰「香港輔仁文社」（註五）

輔仁文社者，香港僑商有志者所組織之小俱樂部也，成立於民國二十二年庚寅（一八九〇）。其時去中法甲申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七日

二六四

（民國前二十八年）之役未遠，國人漸知滿清政府之不足恃，及研究新學之必要；港僑中遂有福建海澄縣人楊飛鴻（字衢雲）、廣東開平縣人謝纘泰（字康如）二人，聯絡有志者劉燕賓、陳芬、黃國瑜、羅文玉、胡幹之、周昭岳等十六人，發起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討論時事為宗旨，是為港僑設立新學團體之先河。其開會地點，初假劉燕賓所開之炳記船務公司為之，至壬辰年（民國前二十年）二月十五日，始開設會所於百子里第一號二樓。

此社內容，僅在多購置新學書報，以開通民智，尚未含有政治上之激烈性質。然是時風氣仍極閉塞，聞者僉以洋化二字譏之，且時不免香港警吏之窺伺也。

衢雲為人仁厚和藹，行俠好義，尤富愛國思想，時充任沙宜洋行副經理，於壬辰年始漸與國父相識，一見如故，時為國父在雅麗士醫學校最後修學之一年，故該校時有衢雲之足跡。及乙未正月，國父自檀島歸抵香港，謀擴大與中會之組織，親訪衢雲約其合作，衢雲欣然從之。輔仁文社社員加入興中會者，衢雲以外尚有謝纘泰、周昭岳等數人。

四、馮自由撰「楊衢雲略歷」（註六）

興中會首領楊飛鴻，原名合吉，字肇春，又號衢雲，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三都鄉人也，生於辛酉年，（清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幼從父清水讀於鄉，年十四，投香港國家船廠學習機械，因失慎，斷右手中三指，於是轉習英文，卒業後任香港灣仔國家書院教授，旋充招商局書記長，及新沙宜洋行船務副經理等職。其為人仁厚和藹，急公好義，尤富於愛國思想，以性好任俠，嘗從拳師習技擊術，雅有心得。自甲申中法戰役之敗，即有志於反清復漢，嘗於粵中物色同志，無應之者。庚寅年（清光緒十六年）與友人謝纘泰、劉燕賓、陳芬、黃國瑜、羅文玉、周超岳、溫宗堯、胡幹之等十六人，發起輔仁文社於香港，以開通民智為宗旨。初假劉燕賓所辦之炳記船務公司為會議所，至壬辰年二月二十五日（清光緒十八年）始設機關於百子里第一號二樓，楊被選為會長。此會內容雖未含有政治上激烈之性質，然仍時不免香港警察之窺伺也。謝纘泰字聖安，粵之開平縣人，其父日生為澳洲著名僑商，屬洪門黨籍，時以滿虜吞滅華夏之歷史訓迪其子纘泰、纘葉二人。故纘泰幼承家訓，恆以繼承先志為務，聞楊有志反清，遂與訂交，輔仁文社之成，端賴其力。及乙未春間，中山自檀島返香港，欲聯合各地同志，結合新團體，以經營粵

事，知楊、謝等有輔仁文社之設，因與商議組黨大計，楊、謝亦以勢力薄弱，非開新途徑，無以伸張勢力，遂欣然從之，於是兩派合併，而有擴大興中會之組織。

五、馮自由撰「老興中會員謝纘泰」（註七）

謝纘泰，字日昌，號康如，廣東開平縣人。生長澳洲雪梨埠，其父日生，在澳洲經商數十年，有商店曰泰益號，營出入口貨貿易。少屬洪門黨籍，夙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纘泰幼承家訓，恆以繼述父志爲務。歲丁亥（一八八七年）年十六，隨父歸香港，肄業於皇仁書院，漸結識同志楊衢雲、周超岳、陳芝、羅文玉、黃國瑜、劉燕賓、胡幹芝等十六人。在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役前二年，已設一書報社於香港百子里一號二樓，名曰輔仁文社。以其時風氣開塞，未敢公然造反抗清，僅與少數友好秘密商談而已。乙未（一八九五年）春孫總理自檀香山返國，欲聯合各地同志在粵舉義，纘泰與楊衢雲首贊其議，遂於是歲正月二十七日創設總機關於香港士丹頓街十三號，定名曰興中會。其誓詞曰：「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衆議孫總理駐粵專任策動軍事，楊衢雲留港任計劃餉糈，纘泰與何啓任對外交涉事務，定期九月重陽日發難於廣州，不幸期前事洩，陸皓東等五人死之，孫、楊先後出亡海外，獨纘泰留港辦理善後。庚子（一八九九年）正月，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蓮珊）因與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聯名通電，反對清太后廢立光緒，爲清廷下令通緝。元善逃至澳門，復爲清吏捏以誘逃公帑之罪，下諸葡國監獄。纘泰與元善素不相識，因聞其事於興中會員徐善亭，遂力託香港天足會長英婦黎脫爾設法營救，黎復請香港總督卜力夫人相助，澳門葡督得港督電，立將元善釋放出獄。元善得免於引渡清吏者，纘泰仗義之力也。是歲春夏間，孫總理企圖在惠州起兵，自日本來往河內，道經香港者數次，屢召集重要黨員楊衢雲、陳少白、鄭弼臣等，至舟中會議軍務，纘泰與焉。迨閏八月惠州三洲印之義師轉戰敗退，粵督德壽及所部將弁咸集失於楊衢雲，遂於是年十一月賄買兇徒陳林，刺殺衢雲於香港結志街五十二號英文教書館，纘泰乃募集義捐撫卹衢雲遺族，復助香港警吏搜羅清吏派兇暗殺證據。粵吏李家焯等卒以此事免職。

纘泰有友李紀堂者，香港富商也，從纘泰言加入興中會，庚子惠州之役，及黨中言論機關之中國日報，咸得其贊助。紀堂素有大志，自惠州義師敗挫，久欲再圖大舉，一雪前恥，纘泰父日生有老友洪全福，原名春魁，太平天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七日

二六六

國天王洪秀全之從姪也，幼隨天王於廣西，起義後轉戰湘、鄂、皖、浙諸省，晉封左大將，英王，三千歲。天國敗，逃香港，僱洋船爲庖丁，掛名於香港義和行船館，航海四十載，春秋已高，不克任勞，隱居香港，懸壺自贍。續泰知其不忘天國，雄心猶在，特介紹與紀堂相識，紀堂以全福爲可用，以革命軍大將軍一職畀之，並出巨資助其大舉。全福提議籌措軍餉五十萬元，續泰亦提議推舉老博士容闕爲起兵後臨時政府大總統，紀堂均無異議。旋設總機關於德忌笠街二十號頂樓，顏曰和記棧，復派梁慕光、李楨生等，設辦事處於廣州市同興街信義洋貨店，及河南繼業公司、和記公司、芳村德國教堂等處，定期於壬寅（一九〇二年）十二月除夕佔領省城，宣佈共和政治。詎事機不密，事前爲清吏偵悉，城內各機關悉被查封，黨員梁慕義等就逮者十餘人，全局因而瓦解。同時駐香港黨員被拘者數人。續泰與其友南華早報記者英人克銀漢，力請英政府拒絕粵吏引渡國事犯之請求，卒由倫敦殖民部電令開釋，續泰之力爲多焉。自此役失敗後，續泰父日生憤極成疾，癸卯（一九〇三）逝於香港，年七十二。續泰後助克銀漢任南華早報編輯，專在言論上鼓吹改革，不再與聞軍事。民十三追述其生平，筆之於書，題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於興中會成立始末，紀錄頗詳，刊諸南華早報，惟無中文譯本。晚年銳意經營農礦事業，以紓於資本，無所進展。嘗囑向國民政府建議，請將楊衢雲遺體自香港遷葬國內，以慰忠魂，迄今未償所願。本年四月一日病終於香港灣仔軒離詩道二三九號本宅，年六十六，遺三子二女。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民國四十三年，世界書局出版，頁六一十一；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九。

註二：同註一，頁七十。

註三：「國父全集」第四集，頁五六—五九。

註四：原文見「國聞週報」，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五〇九—五一二。

註五：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民國四十二年，商務臺灣初版，頁二—三。

註六：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五—六。

註七：「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二—二五。

二月

二日(二月二十六日) 李鴻章晤美使田貝，美使忠告鴻章，列強干涉可導致中國之瓜分，恐非中國之福。

鴻章晤美使長談，美使意縱有干涉，必代價甚高，非中國之福；干涉之代價，可能為瓜分中國之開始，勸鴻章斷然議和，與日交好。建議與日本盡力談判不支解中國，希望接受教訓，西化自強。鴻章謂：「此次彼為失敗之罪魁，為萬矢之的。」(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三三五，一八九五年三月八日。

七日(三月三日) 李鴻章再晤美使田貝，美使勸渠向清帝與太后陳明須修鐵路、開礦、辦銀行，始能付賠款，兼可富裕。

鴻章再訪美使，美使勸鴻章向慈禧、德宗陳明，「惟有從修鐵路、開礦、經營企業、辦銀行上着手，中國始能付賠款，而又可富裕。此等經營之權，需由鴻章全權指揮，否則無從籌劃。」(註二)

註二：「美使田貝報告」，二〇四一—二〇四五號。

十六日(三月十二日) 何啓在香港「德臣西報」著文鼓吹革命。

興中會總機關成立時，謝繼泰等常訪律師何啓，何允暗中予以助力。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主筆黎德(Thomas H. Reid)及士蔑西報(Hongkong Telegraph)主筆鄧肯(Chesney Duncan)之助亦多，曾在報上作坦直公開之革命鼓吹。何啓因于是日發表其「改造」一文，由德臣西報發行。(註二) 何啓時在香港議政局議員，常在中西各報發表中國改革之政見，名重一時。對興中會宗旨甚表同情，常參與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十七日

二六八

大計，惟祇允從中暗助，而不願列名黨籍也！（註二）

按：何啓早歲留學英國，娶英女雅麗氏（Alice）爲妻，任香港議政局議員，兼執律師業務，著有「新政眞詮」，有聲於時，一向主張中國變法者也。

附錄：馮自由撰「中外人士之贊助革命」（註三）

與中會之革命計劃，大得香港律師何啓及德臣西報記者黎德 Thomas H. Reid、士蔑西報記者鄧勤 Chesney Duncan 二英人之助，兩報對於清朝政治之抨擊頗爲盡力，鄧勤曾因鼓吹華人反對政府，爲香港民政長官傳往告誡，何啓爲吾國人在英國畢業法律之老前輩，時任香港議政局議員，常在中西各報發表中國改革之政見，名重一時，對於孫、楊等之進行，常參預大計，惟祇允從中暗助，而不願列名黨籍。與中會之英文對外宣言，即推舉英人黎德及高文 J. Cowen 二人起草，而由何啓、謝纘泰修訂之。

註一：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九。

註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十一—十二。

註三：同註二，頁十一—十二。

十七日（三月十三日） 孫先生文與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等籌畫襲取廣州之革命行動。

本日孫先生與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等在香港會議，作襲取廣州之計畫，革命從此進入實行階段。（註一）

按：黃詠商（一稱詠翼）爲港紳黃勝之子。（註二）由何啓介紹入黨，好讀易，嘗言：「物極必反，漢族已有否極泰來之象，清祚覆亡在即，吾人順天應人，此其時也。」爲助革命軍需，鬻其蘇杭街洋房一所，得資八千元。（註三）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十三。

註二：「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九。

註三：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篇，頁一二—二九。

二十日（三月十六日） 孫先生文在香港主持興中會幹部會議，協議攻取廣州軍事策畫，並決定用青天白日革命軍旗。

本日孫先生文與陸皓東、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在香港之「乾亨行」舉行重要幹部會議，決定襲取廣州為根據地。挑選健兒三千人，由香港乘船至廣州起事。（註二）陸皓東提議以其所製之青天白日旗式，作革命軍旗，亦經通過。（註三）由何啟負責起草宣言。德臣西報主筆黎德亦來謁見，願為贊助。（註三）又本次會議並推定孫先生駐廣州專任軍務，鄭士良、陸皓東、鄧蔭南、陳少白等佐之；楊衢雲駐香港專任後方接應及財政事務，黃詠商、謝纘泰等佐之。（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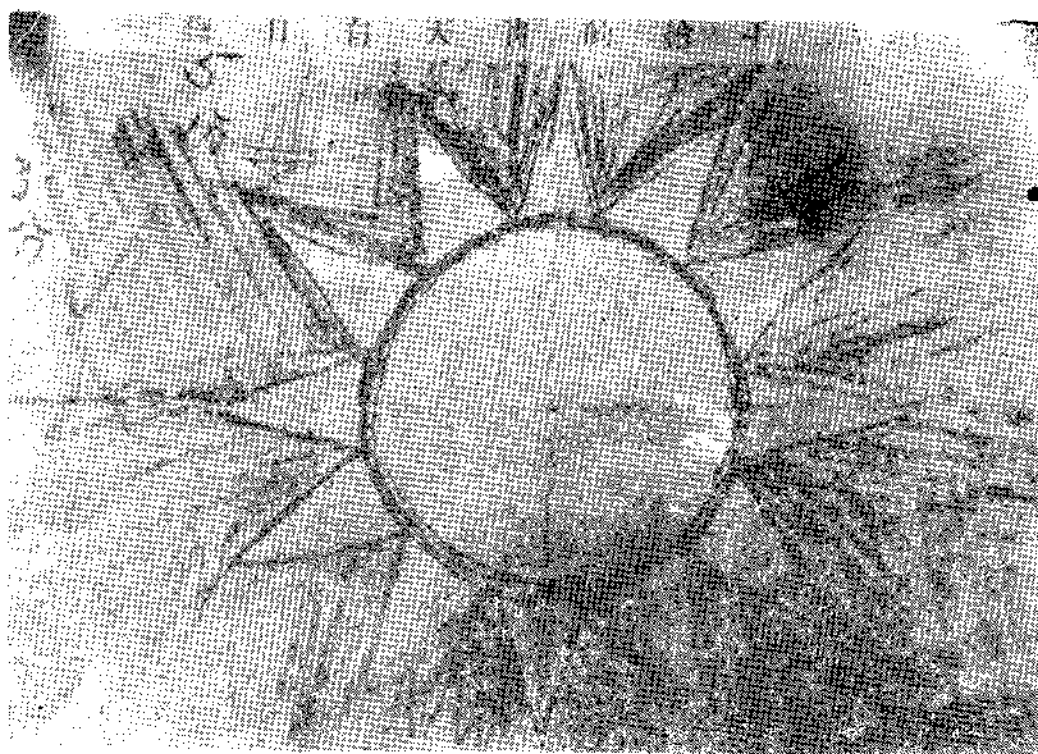
附錄：

一、馮自由撰「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註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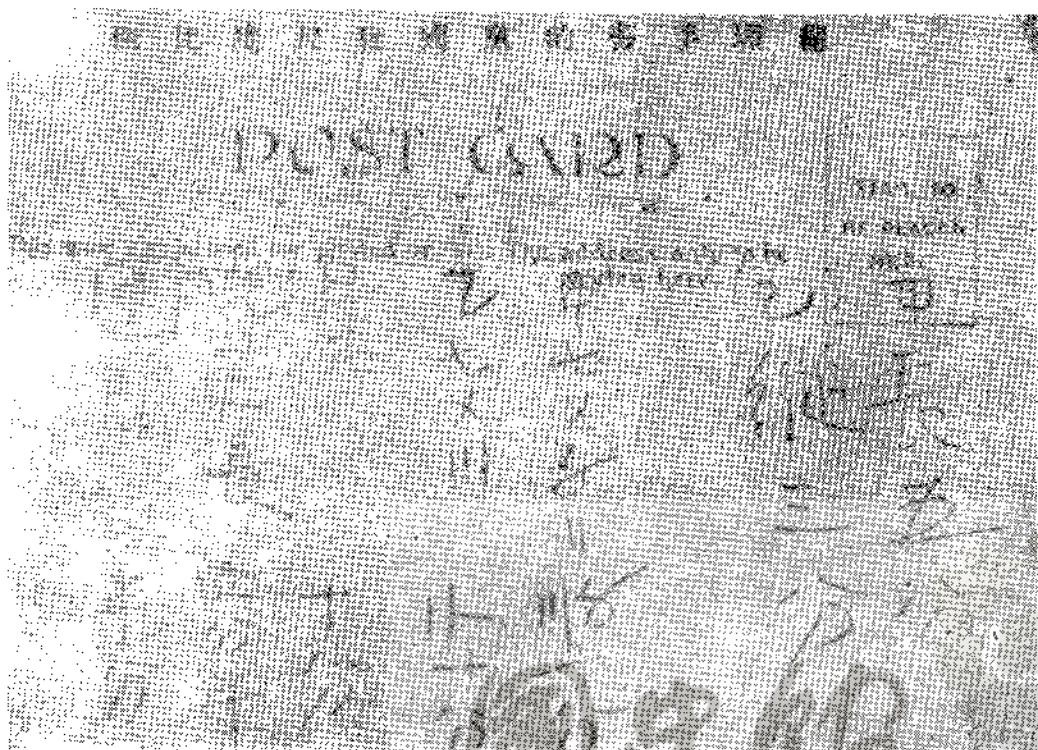
乙未（一八九五年）春，孫總理、楊衢雲等，在興中會香港本部乾亨行商議攻取廣州策略，據興中會員謝纘泰英文筆記所載，是年陽曆三月十六日（舊曆二月二十日）興中會幹部開會，議決挑選健兒三千人由香港襲取廣州之方法，及採用青天白日為國旗之方式，以代滿清之黃龍旗云云。纘泰為衢雲密友，每次會議恆參與機要，其言至有根據。此旗之方式係陸皓東所設計，皓東即殉於是役，為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人。自乙未重陽日廣州失敗後，青天白日旗初用諸軍事者，為庚子（一九〇〇年）閏八月惠州三洲田之革命軍。其後尤列至南洋各埠創立中和堂，令各會所均懸掛青天白日旗，海外華僑團體以革命黨徽號為標幟者自此始。當時旗上所排列叉光，多寡不一，縫製者多莫名其妙，後經總理解釋，謂叉光即代表千文之數，故叉光應排作十二，以代十二時辰，自是旗上叉光之數始確定不易。

二、孫先生文手書的黨國旗尺度（註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二七〇

註一：「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九—十。

註二：同註一，初集，頁二六—二八。

註三：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九。

註四：同註一，四集，頁九—十。

註五：同註一，初集，頁二六—二八。

註六：「革命文獻」，第三輯插圖。

二十三日（三月十九日） 李鴻章抵日本馬關。

李鴻章于本月初九日由北京出發，十七日晚由津搭德輪赴日，本日辰刻始抵馬關。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及外相陸奧宗光，已先一日自廣島至馬關。

附錄：李鴻章馬關乞和（註一）

李鴻章於二月初九日離都，十七日晚自津登輪，十八日晨開駛，所乘為德商禮裕、公義兩船，掛有德國旗，並懸「中國頭等全權大臣」之旗。此亦預與日本商妥，蓋恐途中為日海軍所阻也。所階隨員，計有參議李經方、參贊道員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美員科世達、醫官林聯輝，翻譯盧永銘、羅庚齡，學生六人，供事一名，差弁九名，跟役厨丁三十八名，二十三日（西歷三月十九日）辰刻到馬關。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再奉全權辦理大臣之命，先一日自廣島至馬關。

註一：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初版，頁一五九—二〇〇。

二十四日（三月二十日）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首次會議於馬關春帆樓。

本月二十三日，李鴻章抵馬關，本日下午二時，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會於春帆樓，互閱敕書後開始會議。鴻章要求停戰，伊藤允明日答覆。鴻章發言：「亞洲中日最為鄰近，且同文同種，詎

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爲是。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日亦有益。歐洲各國雖強，不輕起釁，中日亦當效法，庶亞洲黃人，不爲歐洲白人所侵蝕。」伊藤答：「十年前既已言及，何以至今無變更？」鴻章答：「中國囿於習俗，自慚心有餘而力不足。日本兵將照西法訓練，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與京中士大夫談及，亦有深知我國必改變，方能自主者。」伊藤答：「皇天無所偏倚，要在自爲，中國必須將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轉機。」鴻章是其言。

（註一）

附錄：第一次談判（註二）

二十四日（西歷三月二十日）兩國全權會聚於春帆樓。交換全權敕書畢，中國代表以要求停戰之英文節略，面交伊藤。其節略曰：

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現於開議媾和條約之始，請兩國陸海軍一律停戰，以爲商議和約條款之地步。此議已於數月以前，與貴國政府商議，貴國政府覆電云，俟兩國全權大臣會合時，再言明如何休戰媾和。今本大臣奉有締結媾和條約並畫押蓋印之全權，切願不負我朝廷所委之重任，因特重提前議。竊思所請停戰一事，乃成立媾和條約之第一要義，即乞見復。

伊藤約以明日回答而散。是爲第一次談判，其問答節略如次：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後二點半鐘，帶同參議李經方及參贊官三人，乘輪登岸，赴會議公所，與伊藤、陸奧及書記等官六人，坐定，寒暄畢。伊云：中堂此來，一路順風否？李云：一路風順；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兩位在岸上預備公館，謝謝。伊云：此間地僻，並無與頭等欽差相宜之館舍，甚爲抱歉。李云：豈敢。伊云：本日應辦第一要事，係互換全權文憑。當由參議恭奉敕書呈中堂，面遞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書，奉交中堂。伊令書記官閱誦英文，與前電之底稿相較。陸奧令書記官將敕書與前電華文之底稿相較。中堂令東文繙譯與羅道，比較日皇敕書，並所附繙譯英文底稿，畢。陸云：日皇敕書是否妥協？李云：甚妥。我國書是否妥協

？伊云：此次敕書甚妥。中堂復令羅道宣誦擬請停職英文節略，誦畢，將節略面交伊藤。伊藤略思片刻，答曰：此事明日作覆。旋問兩國敕書應否彼此存留？李云：可以照辦。伊云：頃閱敕書，甚屬妥善，惜無御筆簽名耳。李云：此係各國俗尚不同，蓋用御寶，即與御筆簽名無異。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貴國大皇帝既與外國主通好，何不悉照各國通例辦理？李云：我國向來無此辦法，且臣下未便相強。伊云：貴國未派中堂之先固願修好；然前派張、邵大人來此，似未誠心修好。中堂位尊責重，此次奉派為頭等全權大臣，實出至誠。但望貴國既和之後，所有此事前後實在情節，必須明白。李云：我國若非誠心修好，必不派我；我無誠心講和，亦不來此。伊云：中堂奉派之事，責成甚大，兩國停爭，重修睦誼，所繫匪輕。中堂閱歷已久，更事甚多，所議之事，其望有成。將來彼此訂立永好和約，必能有裨兩國。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為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為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試觀歐洲各國，練兵雖強，不輕起釁。我中東既在同洲，亦當效法歐洲。如我兩國使臣，彼此深知此意，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也。伊云：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付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李云：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為變革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當時貴大臣相勸云，中國地廣人眾，變革諸政，應由漸而來。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餘力不足而已！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進京，與士大夫談論，亦有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者。伊云：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願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如願以償。蓋天之待下民也，無所偏倚，要在各國自為耳！李云：貴國經貴大臣如此整頓，十分羨慕。伊云：請問中堂何日移往岸上？便於議事。李云：承備館舍，擬明日午前登岸。陸云：明午後兩點鐘，便否再議？李云：兩點半鐘即來。我與貴大臣交好已久，二位有話，儘可彼此實告，不必客氣。此次責成甚重，本大臣諸多為難，惟望為貴大臣相諒耳！伊云：本大臣責成更重。李云：貴大臣辦事有效，總理一切，足徵才大心細。伊云：此係本國大皇帝治功，本大臣何力之有？李云：貴國大皇帝固然聖明，貴大臣贊助之功為多。又云：兩位同居否？伊云：分居。李云：何日來此？伊云：

二十五日(三月二十一日) 孫先生文與鄧肯會商時局。

孫先生與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等，在香港士丹街十三號與士蔑西報主筆鄧肯(Chesney Duncan)會商時局，鄧允相助。(註二)其後，鄧因鼓吹華人反滿，與德臣西報主筆黎德(Thomas H. Reid)同為香港政府所告誡。(註三)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二次會談，伊藤要求中國交出山海關、天津、大沽口，及該地鐵路軍器，為李鴻章所拒絕。

本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二次談判於馬關春帆樓，鴻章要求雙方先停戰，伊藤要求日軍佔領大沽、天津、山海關，並管理山海關至天津之鐵路，解除上述各地華軍武裝，由中國負擔日本軍費。鴻章要求：「不談停戰，只議和款。」謂：「日軍若至上列三處，則京師震動，且與個人顏面有關。」伊藤限鴻章於三日內答覆停戰要求而散。(註三)

附錄：第二次談判(註四)

二月二十五日(西曆三月二十一日)中日全權，再度會議。伊藤提出對中國停戰節略之覆文，文曰：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雖不能視在距戰地遼遠之此地相約停戰，為成立媾和談判必需之要義，若附以對兩國足擔保均等便利之條件，則亦可允諾停戰。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察目下軍事之形狀，並顧及因彼此中止交戰所生之結果，聲明應附以左列條件：日本軍隊占領大沽、天津、山海關，並該地之城壘；上列各地之清國軍隊，將一切軍器軍需品交與日本軍隊；日本軍務官管理天津山海關之鐵路；休戰期內清國負擔日本國之軍事費用。若以上條件不生異議，即可提出實行停戰之日期期限，日清兩軍之經界線及其他細目。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今茲為此回答，為防將來誤解計，認為有須聲明者。當清國政府提議停戰時，帝國政府之回答，並無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閣下所稱之意義。當時帝國政府所用之言辭如左：假令日本國政府許諾停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五日

二七六

非兩國全權委員會合後，日本國政府不明言關於停戰之條件。

蓋中國所希望者，第一即爲停戰，日本早知其然，故提此苛刻條件，以使中國打消此意。李鴻章得此覆文，甚爲驚詫，經往復辯論，許以容日答覆，是爲第二次談判。其問答節略如次：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後兩點半鐘，仍赴原所與伊藤、陸奧會議。李云：承備館舍甚佳，有賓至如歸之樂，謝甚。陸云：前備行廚相待，乃中堂辭却，只得遵命。伊云：中堂昨交停戰節略，現已備覆，即將英文朗誦，另備文交參議閱後，轉呈。陸云：英文字句較爲明晰。羅道即將英文譯誦一遍。李云：現在日軍並未至大沽、天津、山海關等處，何以所擬停戰條款內，竟欲占據？伊云：凡議停戰，兩國應均沾利益。華軍以停戰爲有益，故我軍應據三處爲質。李云：三處華兵甚多，日軍往據，彼將何往？伊云：任往何處，兩軍惟須先定相距之界。李云：兩軍相近，易生衅端，天津衙門甚多，官又將何爲？伊云：此係停戰之細目，不便先議。試問所開各款可照辦否？李云：雖爲細目，亦須問明，且所關甚重要，話不可不先說。伊云：請中堂仔細推敲，再行見復。李云：天津係通商口岸，日本亦將管轄否？伊云：可暫歸日本管理。李云：口兵到津，將往何處？伊云：俟華兵退出，即在華兵營盤，如不敷，可添蓋兵房。李云：如此，豈非久踞乎？伊云：視停戰之久暫而定。李云：停戰之期誰定？伊云：兩面互商，但不能過久。李云：所據不久，三處何必讓出？且三處皆係險要之地，若停戰期滿，議和不成，則日軍先已據此，豈非反客爲主？伊云：停戰期滿，和議已成，當即退出。李云：中日係兄弟之邦，所開停戰條款，未免陵逼太甚。除所開各款外，尚有別樣辦法否？伊云：別樣辦法現未想及。當此兩國相爭，日兵備攻各處，今若遽爾停戰，實於日本兵力有碍。故議及停戰，必須有險要爲質，方不吃虧。總之，停戰公例，分別兩種：一則各處一律停戰；一則惟讓數處停戰。中堂所擬乃一律停戰也。李云：可否先議那幾處停戰？伊云：可指明幾處否？李云：前承貴國請余來此議和，我之來此，實係誠心講和，我國家亦同此心，乃甫議停戰，貴國先欲踞有三處險要之地，我爲直隸總督，三處皆係直隸所轄，如此於我臉面有關，試問伊藤大人設身處地，將何以爲情？伊云：中堂來此，兩國尚未息兵，中堂爲貴國計，故議停戰，我爲本國計，停戰只有如此辦法。李云：務請再想一辦法，以見貴國真心願和。伊云：我實在別無辦法，兩國相爭，各爲

其主，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停戰係在用兵之時，應照停戰公例。李云：議和則不必用兵，故停戰爲議和第一要義。如兩國尙相戰爭，議和似非誠心。伊云：若論停戰，應有所議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攔起。李云：現如不議停戰，議和條款可出示否？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將停戰節略撤回，再講和款？李云：昨日初次會議已說明，向來說話，不作虛假，所議停戰之款，實難照辦。伊云：中堂先議停戰，故擬此覆款；如不停戰，何妨先議和款？李云：我兩人忠心爲國，亦須籌顧大局，中國素未準備與外國交爭，所招新兵，未經訓練，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係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和好，須爲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即和亦難持久。如天津、山海關係北京門戶，請貴國之兵不必往攻此處；否則，京師震動，我國難堪，本大臣亦難以爲情。且此次爭端，實爲朝鮮起見，今華兵業已退至奉天，貴國之兵惟尙未到直隸耳！如貴國之兵，不即往攻天津、山海關直隸地面，則可不必議及停戰，專議和款。伊云：局面竟至於此，非余之過也。戰端一開，伊於胡底，詎能逆料？此次交戰之始，本大臣無時不願議和，而貴國向無議和之誠心。自今以後，局面又將大變，所以議及停戰，必須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李云：以此三處爲質，日兵不必實據。但立作質名目之條款如何？伊云：設停戰之限已滿，而和局未定，所指三處，又將與日開釁矣。參議云：不必停戰，但議和之時，定一限期，不往攻三處，可否照辦？伊云：如此辦法，與交戰無異。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終常相拒。李云：可否請先示議和條款？伊云：然則，停戰之議如何？李云：停戰暫行攔起。伊云：停戰一節未曾定結，恐議和時又復重提。李云：頃聞貴大臣談及停戰有兩種辦法：一爲一律停戰，一爲指地停戰。今不攻天津、山海關等，即爲指地停戰之辦法。伊云：中堂停戰節略，係指一律停戰，本國之兵散處遼遠，實難一律停戰；而所指數處停戰，本大臣細思，無法可保。且指地停戰，係於戰場上會議而言，此處距交戰之處甚遠，所以不必議及指地停戰。李云：即請貴大臣出示和款。伊云：此事業已說過，宜先將停戰之議攔起。李云：停戰之款，未免過甚，萬做不到。但既請我來，必有議和條款。伊云：議和之款，業經辦好。李云：即請見示。伊云：現在停戰之議不提否？李云：停戰之款，既難應允，且無別種方法，姑講和款！伊云：中堂所交停戰節略，是否撤回？抑或擬復，聲明不能應允？李云：照此辦法之後，又將何爲？伊云：或再行議和。李云：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七日

二七八

此語氣，尚未定準。貴大臣不云和款已備乎？伊云：但看中堂復文如何？李云：本大臣擬復文云：停戰之款，萬難應允，姑且擱起，即請會議和款云云。是否如此辦法？伊云：中堂初見停戰之款，云應先仔細推諉，以後再復；頃則遽云萬難應允，還請中堂再想爲是。李云：遲數日再復。伊云：幾日？李云：一禮拜後。伊云：太久。李云：假如復以不能做到，以後是否即商和款？伊云：應請中堂將所呈停戰之款，仔細商量，或節略抽回不提，然後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願貴大臣已將停戰之議擱起，於議和時又復提及。李云：和款一定，戰即不議自停。伊云：貴大臣究竟幾日答復？李云：四日後答覆。伊云：三日須復，愈速愈妙。李云：議和條款不應如停戰條款之太甚。伊云：我想並不太甚。李云：只恐過甚，難以商辦。伊云：此正兩國所以派使臣會商也。下次會議日期可否先定？李云：且待細想，復文辦妥後，或面交，或差送？伊云：聽便。李云：復文辦好，即遣人定期相會。伊問陸奧答應如此辦理。李云：惟願貴大臣力顧大局，所擬和款，務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辦，則幸矣。伊云：本大臣亦願顧大局，有裨兩國，但不知貴國以爲何如？中堂乃離席，各散。

讀以上節略，可見伊藤之老奸巨猾，既以苛酷條件迫中國放棄停戰之想，同時復對議和條款秘不宜露，鴻章直如在彼掌股之上也。

註一：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九。

註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十二。

註三：「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二〇，頁二三—二四。

註四：「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二六四—二六九；參考自「甲午中日戰輯」卷六，傳相議和。

二十七日（三月二十三日） 日海軍攻澎湖，自文良港登岸，占領尖山、大武山。次日，澎湖陷，再一日，西嶼等地亦陷。

日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率海軍突襲澎湖，先攻馬祖官牽制清軍，守兵擊之，傷日艦二艘，知府朱上泮電臺灣巡撫唐景崧告捷，景崧立保上泮道員，賞銀兩萬犒軍，澎湖兵弁方爭賞銀，而日軍別以小艇從文

良港潛登，占尖山、大武山。二十九日辰刻，日軍遂陷澎湖，朱上泮陣亡，總兵周鎮邦逃臺灣，海道中梗，購自外洋軍械，盡爲日軍所奪，臺灣勢益孤。（註二）

連橫所著「臺灣通史」記其事曰：

「二月十九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率兵艦七艘運船五艘，破浪而來。陸軍大佐比志島義輝亦率步兵三千，自佐世保而南，至澎湖。二十七日早，以第一游擊隊突入猴角，拱北礮台見之，發礮擊，傷兩艦。而日軍則以小艇上岸，遂占尖山，再進太武山，後隊繼至，遂踞焉！朱上泮聞警，率定海營兵五百進戰，至太武社，前隊奮登，日軍以礮禦，不能進，木隊復至，鏖戰數時，乃退。越日黎明，日軍攻大城山，別以一隊擊拱北礮台，清軍退于媽宮城外。先是高千穗艦長海軍少佐丹治寬雄率陸戰隊二百四十名，携機關礮三門，潛入龍門港，據拱北礮台之南，以扼圓頂歸路。既敗清軍，乘勝攻城，城兵潰，及午而陷。二十九日，日軍以礮擊西嶼，都司劉忠良死焉！遂搜猪母水村，守備郭俊山等率所部降。上泮敗後，乘漁舟走臺南，景崧怒，欲斬之。」（註二）

另「臺灣省通志」亦記曰：

「二月二十七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亨率艦十二艘抵澎湖，先以三艦進攻媽祖宮，我軍礮擊之，傷其艦。二十八日黎明，日軍自文良港登陸，我軍應戰不敵，拱北臺陷。旋日軍進占廳城。守將周鎮邦、朱上泮等逃歸臺灣。翌日，日人據澎湖各島。」（註三）

據後二者所引資料言，可知日軍攻澎湖始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占澎湖本島，二十九日占澎湖各島。且朱上泮逃歸臺灣並未陣亡。連氏以臺人治臺史，當有所本；臺灣省通志爲臺人所修之地方志，當亦有所本，或本自連氏？茲從後二者之說。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台灣篇。

註二：連橫：「台灣通史」上冊，卷四，獨立紀，頁六七。

註三：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台灣省通志」卷首下，大事記第二冊，頁一〇五，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七日

二七九

二十八日（三月二十四日） 清廷商訂和約大臣李鴻章在日本馬關遇刺，傷左頰。

本日下午三時，鴻章與日代表伊藤博文第三次會談，要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伊藤允明日提出，並謂日軍將攻臺灣。鴻章謂：「英國將不甘心」。伊藤答：「不損他國」。四時，鴻章談畢返寓所，日人小山豐太郎（即小山六之助）持槍擊鴻章中頰，謂：「不是你招攬，何至起戰爭？」鴻章以和議重要，拒醫生請割取左頰下子彈。照會伊藤，令李經方代表接收議和條款。（註一）翌日，日外相陸奧面告經方：「中堂之不幸乃大清帝國之大幸。」暗示將無條件休戰。（註二）

附錄：

一、第三次談判（註三）

二月二十八日午後，中日全權開第三次談判，鴻章備文撤回停戰之議。其節略曰：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披閱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之欽差全權辦理大臣回答關於停戰之節略，對於所載條件，萬難首肯。本大臣來此以誠意講和，深信商議媾和條約之間，暫行停戰，實於兩國之體面權利上均屬有利，故提出本月二十四日之節略。本大臣所請之事，不僅極為有理，且適合於各國普通之慣例，而貴大臣不以爲然。雖然，本大臣盡心議和之始願，毫無所減，故期望兩國和局之速成。

並索議和條款，伊藤許以翌日告知。其問答節略如次：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在原處會議，坐定，寒暄畢。李云：前次會議停戰要款節略，茲已作覆。即誦英文，由中堂將華英文二分，親送伊藤。伊閱英文，陸閱華文數遍，即指後半篇，交其書記譯出東文。陸復詳閱，又與伊藤對換華英文詳校，復與伊東書記以東語相商甚久，似未能遽決之狀。於是伊乃云：停戰之議，中堂是否攔起不提？李云：暫且攔起，我來時專爲議和起見。伊復將英文反復細看，伊東乃以東語解之。伊復取烟捲，延時細想。乃云：中堂未動身之先，自己與貴國深明辰下戰局情形，誠心講和，重修舊好。李云：我年已邁，從未出外，今本國目睹時艱，且知我與貴大臣有舊，故特派來此，足徵我國誠心議和，我

不能辭。伊云：所議之事，一經議定，必須實力踐行。查貴國與外國交涉以來，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國以此事所關重大，派我來辦，凡已應允者，必能見諸施行。惟望貴國亦然。李云：貴大臣所言，想係道光季年我國與外國初交之時。咸同以後，所定一切約章，皆經批准施行，即十數年前與俄國所辦伊犁之約，稍有齟齬，隨後即派使妥結矣。伊云：額爾金之約，固未批准。我國既派頭等大臣，會商定議，若不施行，有傷國體，而戰端必致復起。且所以議和者，不獨爲息戰，且爲重締舊好耳。我忝爲敝國總理內閣大臣，凡所議定，必能實踐，亦望中堂實能施行議定之事，爲幸。李云：我忝派欽差頭等大臣，此次進京召見數次，實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訓條。前屢與貴大臣言及，日後和款，必須體諒本大臣力所能爲。果可行者，當即應允；其難行者，必須緩商，斷非三數日所可定議。請貴大臣即將和款出示。伊云：請俟明日交閱。李云：明日何時？伊云：請中堂擇定。李云：十點鐘可否？伊問陸奧，首肯。李云：所示和款，若與他國有關涉者，請貴大臣慎酌。伊云：何意？李云：如所示和款或有牽涉他國權利者，必多未便。我兩國相交有素，故預爲提及。伊云：此次議中東兩國之事，他國皆在局外，未便攙越。李云：去年曾請英國從中調處，貴國不以爲然，自無須他國調處，我兩人商議之事，如不能成，恐無人能成矣。伊云：萬一不成，則貴國大皇帝可以親裁。歐洲各國議和，皆由國王親議。李云：中國則不然，即恭親王總理譯署多年，亦未親議條約。兩國暫行相爭，終久必和，不如及早議定爲妥。去歲戰端伊始，本大臣即苦口勸和，今已遲矣。伊云：戰非幸事，亦有時不免。李云：能免不更妙乎？前美國總統格蘭德遊歷過津，與本大臣相好，曾言：當我國南北交爭，傷亡實多，後居總統，總不輕起爭端，後常以此奉勸同志。伊云：中堂剿滅髮捻，卓著戰功，我勸中堂亦不可輕言戰事。李云：本大臣嘗奉此語爲圭臬。此次起釁，貴大臣豈不知非我本意？伊云：兵凶事也，傷人實多。有時兩國事勢交迫，不得已而用之。李云：戰非仁人所爲，況今日器械銳利，殺戮更衆，我年邁矣，不忍見此。貴大臣年歲富強，尚有雄心。伊云：此次爭戰之始，議和甚易。李云：當時我亦願息爭，乃事多拂逆，時會使然。伊云：其時所求於貴國之條約，無甚關係，未蒙應允，大爲可惜。初戰之始，我兩國暨兩人走路，相距數里耳。今則相距數百邁，回首難矣。李云：終須回頭。貴大臣總理國事，何難之有？小走幾邁，不亦可乎？縱令再走數千里，豈能將我國人民滅盡乎？

伊云：我國萬無此心。所謂戰者，乃兩國將一切戰具，如兵船礮臺器械等，彼此攻滅，以相弱耳。與兩國人民，毫無關涉。李云：現國家已願和矣，自可不戰。伊云：我兵現駐金州等處，見所有華民，較朝鮮之民易聽調度，且做工勤苦，中國百姓誠易治也。李云：朝鮮之民，向來懶惰。伊云：朝鮮民招爲長夫，皆不願往。我國之兵，現往攻臺灣，不知臺灣之民如何？李云：臺灣係潮州、漳、泉客民遷往，最爲強悍。伊云：臺灣尚有生番。李云：生番居十之六，餘皆客民。貴大臣提及臺灣，想遂有往觀之心，不願停戰者因此。但英國將不甘心，前所言恐損他國權利，正指此耳。臺灣不守，則又如何？伊云：有損於華者，未必有損於英也。李云：將與英之香港爲鄰。伊云：兩國相敵，無損他國。李云：聞英國有不願他人盤踞臺灣之意。伊云：貴國如將臺灣送與別國，別國必將笑納也。李云：臺灣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給他國。二十一年前，貴國大臣大久保，以臺灣生番殺害日商，動兵後赴都議和，過津和晤云：我兩國比鄰，此事如兩孩相鬥，轉瞬即和，且相好更甚於前。彼時兩國幾乎戰爭，我力主和局，倡議云：生番殺害日商，與我無涉，切不可因之起釁。伊云：我總理庶政，實甚煩冗。李云：我來相擾，有誤貴大臣公務；但此事商辦，恐需時日。伊云：我國一切事務，由皇帝簽名後，本大臣亦須簽名爲證。至一切未經呈奏之件，本大臣亦應過目。我今來此，日行公事，另有大臣代理，惟大事尚須自辦。李云：如是，貴大臣在此可久居相商矣。伊云：各部辦事，仍在東京；惟公文辦成，即寄廣島。本大臣因此事所關至重，故一切國務暫由他人代辦，此地實未便久居。李云：且待貴大臣所議和款如何，倘易於遵行，和議即可速成；否則，仍須細商，需時必多，惟望恕罪。伊云：和款一事，兩國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萬不能如平時議事延宕，且兩軍對壘，多一日則多傷生命矣。李云：聞貴國皇帝將往西京。伊云：尚未定。廣島天氣不甚相宜，或徐往耳。當即起席，各散。

停戰問題，至此本已過去，乃本日散會之後，李鴻章歸途遇刺，轉促成停戰之實現焉。

一一、李鴻章之遇刺（註四）

二月二十八日申刻，中日全權談判已畢，李鴻章自春帆樓言旋，將至行館，忽有日人名小山豐太郎者，自人叢中走出，距輿前五尺許，以手槍擊鴻章，倏逸去。警察追捕之，刺客奔入店中，與捕相拒，旋爲所擒。查驗手槍，

已放槍子一枚，尚餘四枚未放。當鴻章之被刺也，眼鏡帶稍低，槍子擊破左鏡，中左顴，深入左目下。與夫見刺客所爲，駭懼不進，警察促之行。拔劍逐路人，擁輿至行館，昇入寢室，鴻章暈眩，幾不省人事。隨節兩警官奔至，見流血甚多，方取止血藥，而裹創手帕血已滿矣。止血裹創後，日本醫士亦馳至，互商醫策。鴻章謂：「被刺時，惟彷彿見一人持手槍來，距與前數尺，忽聞槍聲，即覺左顴痛甚。以手撫之，知左目下受傷流血，遂以手帕拭之，血灑袍服殆遍。自料必死，幸心神鎮定不亂，惟暈眩難支」云。日官來問病者，絡繹不絕，寢室前後甬道游廊皆滿。當鴻章之離春帆樓也，陸奧宗光因關於明日談判有須預商之事，特留李經方談話。方對坐未及開談，有人排闥而入，報告鴻章中途遇刺，已負重傷。二人大驚，陸奧顧經方曰：「對茲可痛恨之事，吾儕當盡力之所及，講善後之策。足下請速歸館，看護老父。」陸奧即趕赴伊藤寓所，相偕至中國使臣行館。楊前慰問，謝罪甚恭，憂懼之情，見於辭色。地方文武大小官弁，紛至沓來，慰問甚殷。行館外派警察甚衆，四圍防守，出入稽查，兵士巡邏街道，以備非常。境內申行軍律，頒示保安條例，如是者數日。初，衆醫之議取子彈也，請命於鴻章曰：「割取槍子，子出，則創愈，然難保無虞，且取出之後，尚須靜養多日，尤不能稍勞心力。」鴻章慨然曰：「國步艱難，和局之成，刻不容緩，予焉能延宕以誤國乎？我寧死，無割！」遇刺之明日，見血滿袍服，或言曰：「此血所以報國也！」鴻章潛然曰：「舍予命而有益於國，亦所不辭！」其慷慨忠憤之氣，令人起敬。鴻章被刺後，當日由李經方電總理衙門曰：

今申刻會議，已將停戰擱起，向索議和條款，允於明午面交。歸途忽有倭人持手槍對狙擊，中左顴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時暈絕。伊藤、陸奧均來慰問，姑令洋醫調治，此事恐不能終局矣。再伊面稱：現要攻取臺灣，並聞，請代奏。

當鴻章遭難之報達於廣島，日皇甚驚，即派醫至馬關，日后賜御之綢帶，並派遣看護婦二名，予鄭重之待遇。二十九日（西曆三月二十五日）日皇明降詔諭曰：

朕惟中國現在雖與我國兵爭未息，而按照儀節格式，欽派頭等全權大臣，前來締結和局，經朕遣派全權大臣等，前赴馬關會議，我國應有責成，確遵萬國通例，優待中國欽使，方與國家體面相符；並應優予護衛，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八四

資保安。朕業已疊降特旨，飭令文武官員懷遵辦理去後，現查遽有不法凶徒，下賤已極，竟敢傷及中國頭等全權大臣之身，朕心深爲憂愁惋惜。其凶犯，自應飭吏按照國律內最嚴之刑辦理。茲特明降諭旨，通飭官民，欽遵旨意，保我國家榮耀聲名，庶不致再有此等狂悖不法行事，而損我國之光譽也。

是日，清廷電寄諭旨曰：

李鴻章念八未刻電及李經方酉戌兩電均悉，覽奏殊深駭愕。事機不順，竟至於此！李鴻章以逾七之年，遠使異域，受此重傷，醫藥能否應手？甦醒之後，精神脈氣如何？槍子能否取出？軫念之懷，刻不能釋。著李經方即時電覆。和議條款，允於今午面交，若該大臣不克親往，盼其將條款先行送交，即日電達。此節彼已經面允，即封送前來，亦與面交無異。彼正在理曲之時，李鴻章據理與爭，或不至終秘不與。狙擊一事，是否出自黨人，抑別有指使？設法確探以聞，欽此。

三月初一日，李經方電覆總理衙門曰：

欽奉聖電恩旨，垂詢醫藥能否應手？甦醒之後，精神脈氣如何等因。現今各洋醫，藥物應手，精神雖減，脈氣尚平。據洋醫稱：子入二寸餘深，嵌骨縫，非割兩開邊皮肉，不能挖取。高年恐難禁此大痛。日服藥水洗治，皮肉可望補復，堪以仰慰聖鑒。頃日主及小松親王各遣專使自廣島來慰問，是小松尚未出征，乞代奏。李經方稟。

三、日方決行停戰（註五）

當鴻章遭難之報傳出也，日本全國，舉現狼狽之色。各種公私團體之代表及個人，皆奔集馬關，訪中國使臣之行館，致慰問之意。且往遠地者，亦由郵電表示其意，或贈與種種物品，日夜陸續不絕。行館門前，有羣衆如市之觀。當中日開戰以後，日本各報紙以及公私集會，對中國官民，莫不盡情醜詆，對於李鴻章亦有種種不堪之言。今因痛惜鴻章之遭難，又競作諛辭。甚至列舉鴻章既往之功業，謂東方將來之安危，繫於李鴻章之生死。全國到處，與其謂痛惜鴻章之遭難，勿寧謂懼因此所生外來之責難。醉於戰捷而狂喜之日本全國，恰似陷於居喪之苦境。人情反覆，固有如此。據陸奧宗光自述：「余察內外人心所趨向，此際不施善後之策，即發生不測之危害，亦所難料。」

內外之形勢，已不許再交戰矣。若李鴻章辯口負傷，於使事之半途歸國，非難日本國民之行爲，巧誘歐美各國，再使其居中周旋，不難得歐洲二三強國之同情。而於此種機會招歐洲強國之干涉，則我對中國之要求，陷於不得不大行讓步之地位，亦所難料。……然現在兩國交戰中，在勝者之我國內，待遇敵國使臣，應予以相當之保護及敬禮，已成爲國際公法之成例，而如此事變，若一動社會之感情，則以座上之一片理論，不易撲滅，固不待言；而況官高爵尊之李鴻章，以古稀之高齡，始奉使異域與遭此兇難乎？其惹世界之同情，自係易觀。若某強國欲乘此機會干涉，彼固以李之負傷爲最好之口實也。」陸奧有見於此，故即夜訪晤伊藤，商議此事。陸奧謂：「皇室對於中國使臣之優渥待遇，國民一般之親切好意，雖無間然；然日下情勢，儀式的待遇或社交的情誼外，非另行有現實意味之一事，到底不能受彼衷心滿足。故由我無條件允許彼所懇請之停戰，較爲得計。如此，我之誠意對待中國，固不待言，即對於他國，亦經爲事實上之表現。且由我國警察照顧不到，使彼負傷，其結果自當妨礙講和之速結。此時我軍隨意攻擊中國，於道義上亦不能無憾。」伊藤對陸奧之意，固無異議，然因停戰事件，不能不詢軍部之意見；因即發電在廣島之閣員及大本營之重臣，與之協議。旋得大藏大臣松方、海軍大臣西鄉、農商大臣板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參謀本部次長川上之聯名回電，謂：「目下實行停戰，實於我國不利，須再加考慮。」而陸軍大臣山縣之回電，則完全贊同停戰之意見。伊藤與之電報磋商，難達其深意，因於十二月十九日（西曆三月二十五日）晚自往廣島商辦。伊藤到廣島後，與該地之文武重臣會晤，詳議停戰之得失，結果全體贊同伊藤之意見，尋經日皇裁可，停戰之舉，因而確定。

註一：原文見「字林西報」，頁九四九，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此處參考寶宗一：「李鴻章年（日）譜」，頁三四〇，註六〇八。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二八二；參考自「甲午中日戰輯」卷六，傳相議和。

註三：同註二，頁二七一—二七六。

註四：同註二，頁二七六—二七九。

註五：同註二，頁二七九—二八一。

三月

一日(三月二十六日) 美使電告本國政府，俄國決計干涉中日和約。

駐華美使田貝于本日電告本國：「獲得消息，若日本占滿洲之任何一部，俄國決計干涉，英國將與以道義上之援助，惟俄公使仍勸中國議和，中國尚不知俄國干涉之真心。」(註一)

註一：「美使報告」，二一七四號。

六日(三月三十一日) 駐日德使哥屈米德(Baron Von Gutschmid)勸告日本外務次官林董，日本若割中國大陸領土，勢將引起列強之干涉。

駐德日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勸告謂：「日本在大陸要求割讓領土，有引起列強干涉之虞，應先適當解決」。(註一)

註一：Muhlberg Memoranda, April 2, 1895, German State Papers.

七日(四月一日) 日本對德聲明占據遼東半島之理由，表示並不反對俄占北滿，英占舟山，德占東南一省。

日本向德國聲明，「若不占遼東半島，則朝鮮之獨立爲紙面的，日本並不反對俄國與中國單獨談判，由俄占北滿，英占舟山羣島，德占中國東南一省。」(註一)

李鴻章採美顧問福士德建議，將議和條款密告英、法、俄三國。

鴻章採美顧問福士德之建議，密告日約條款割地賠款內容于英、法、俄三國，聲明賠款中國絕不能負擔，遼東半島控制中國命脈，絕不能割讓，只有苦戰到底，以通商條約各國均需，乃暫守秘密，免列

強合而謀華。(註二)

註一：Foster, Memoirs.

註二：「中日議和紀略」。

十二日(四月六日) 英政府為維護遠東之利益，決與日本為友，並通知俄國，英國不再參與中、日調停之會議。

英政府決定與日本為友，認日本將來之強大，對英國在遠東之利益有助，英駐俄使通知俄外部：「英國不再參加對中、日調停之會議。」(註一)

俄外相羅拔諾夫(Lobanow-Rostowski)上書俄皇，請聯盟中國，結好英國以制日。

本日，俄外相羅拔諾夫上書俄皇，請決定在遠東態度，若圖積極發展，則中國為理想之盟國。中、俄大陸可聯結一氣，而中國對俄國之威脅，尚須時日，決非目前，請俄與英合作制日，並占一不凍港及滿洲一部。(註二)

註一：英國藍皮書。

註二：Lobanovs, Memoranda, 紅檔。

十四日(四月八日) 俄再向英、法、德接洽，共同制日。

俄國再向英、法、德接洽，共同制日，聲明日本占領遼東半島及旅順，將使中、日永為世仇，威脅遠東和平，法、德同意。英國旋謝絕俄國之邀請，駐華德使電其外部，建議德國與各國占中國一港口，以膠州灣為對象。(註一)

註一：德國外交文告。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十二、十四日

十六日(四月十日)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於馬關之春帆樓舉行第四次談判，伊藤略讓步，割地劃出遼陽，賠款減至二萬萬兩。

本日下午四時，鴻章與伊藤會議于馬關之春帆樓，繼續談判。是日會議，陸奧因病未參加。伊藤提出一改訂條款節略，賠款減至二萬萬兩，割地劃出遼陽。故談判完全集中賠款、割地兩點，是爲第四次談判。(註一)

附錄：第四次談判(註二)

李鴻章之修正案，既送達日方，因約定於三月十六日(西歷四月十日)繼續談判。是日會議，陸奧以病未參加。此次會議中，伊藤提出一改定條款節略，賠款減至二萬萬兩，割地亦稍有減讓。故談判完全集中賠款割地兩點，是爲第四次談判。其問答節略如下：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午後四點鐘，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伊云：今日復見中堂重臨，傷已平復，不勝幸甚。李云：此皆貴國醫生佐藤之力。伊云：佐藤醫治中堂，其效甚速，可喜。李云：聞佐藤謂，陸奧大臣身熱，是否？伊云：陸奧大臣身子本不甚健，現患春溫，至爲惦念。李云：服藥當可有效。伊云：今日身熱稍平。李云：曾進食否？伊云：無多。一月前本大臣亦患此症，現已愈矣。中堂身子今日好否？李云：甚好；惟兩腿稍軟耳。伊云：我父母年皆八十，尚健旺。李云：何在？伊云：現在東京，我生長此處。李云：是長門否？離山口縣多遠？伊云：約二十英里。李云：長門乃人物薈萃之地。伊云：不比貴國湖南、安徽兩省所出人物。李云：湖南如貴國薩斯馬，最尚武功；長門猶安徽，然不能相比，所遜多矣！伊云：此次敗在中國，非安徽也！李云：我若居貴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貴大臣之辦事著有成效。伊云：若使貴大臣易地而處，則政績當更有可觀。李云：貴大臣之所爲，皆係本大臣所願爲；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爲，有不可勝言者。伊云：要使本大臣在貴國，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難辦之事，忌者甚多，敝國亦何獨不然。李云：貴國上下交孚，易於辦事。伊云：間亦有甚難爲之事。李云：雖有難爲，賴貴皇能聽善言。伊云：皇上聖明，當登極之時

，即將從前習尚，盡行變易，故有今日局面。李云：如是則諸臣之志願得舒矣。伊云：此皆皇上聖明，故有才者得各展所長。現談應辦之事。停戰多日，期限甚促，和款應從速定奪。我已備有改定條款節略，以免彼此辯論，空過時光。中堂兩次節略，一則甚長，一即昨日擬改約本。中國爲難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備節略，將前次所求於中國者，力爲減少。所減有限，我亦有爲難之處。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云：難道不准分辨？伊云：只管辯論，但不能減少。李云：既知我國爲難情形，則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爲。伊云：時限既促，故將我所能做到者，直言無隱，以免多方辯論。否則，照我前開約款所開，必須辯論到十日之久，方能減到如此。李云：節略有無華文？伊云：英文東文已齊，但華文未全。伊交英文，另有要款華文三紙。伊云：只賠款讓地與佔守地方三節，譯有華文。中堂閱後云：即以此已譯三端開議。第一、賠款二萬萬，爲數甚鉅，不能擔當。伊云：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鉅矣。李云：賠款如此，國不能給，更鉅更不能給，還請少減。伊云：萬難再減，此乃戰後之事，不能不如此。李云：前送節略，核計貴國開銷之賬，相離不遠，此次賠款，必借洋債，洋債爲數既多，本息甚鉅，中國將有何法以償之？伊云：前節略云，計二十年還清洋債，何不遠至四十年？爲期愈遠，本息即不見重，此非我事，偶爾言及，切勿見怪。李云：四十年拔還本息，爾願借否？伊云：我借不起。洋人借債，爲期愈遠愈妙。李云：自開戰以來，國帑已空，向洋人商借，皆以二十年爲限。爾所言者，乃本國商民出借耳。伊云：即非本國之民，借債皆願遠期。李云：外國借債，但出利息，有永不還本者。伊云：又此一事也。但看各國信從否？外人借債，皆願長期，銀行皆爭願借。李云：中國戰後，聲名頗減。伊云：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李云：財源雖廣，無法可開。伊云：中國之地，十倍於日本。中國之民四百兆，財源甚廣，開源尚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即可用以開源。李云：中國請爾爲首相何如？伊云：當奏皇上，甚願前往。李云：奏如不允，爾不能去；爾當設身處地，將我爲難光景，細爲體諒。果照此數，寫明約內，外國必知將借洋債，方能賠償，勢必以重息要我。債不能借，款不能還，失信貴國，又將復戰。何苦相逼太甚！伊云：借債還款，此乃中國之責。李云：不能還則如之何？伊云：已深知貴國情形爲難，故減至此數，萬難再減。李云：總請再減。伊云：無可減矣！李云：第一次款交清後，餘款認息五釐。德之於法，固然如此。但中國自道、咸以來，三次償給英法軍費，皆未加息；不過到期未還，始行認息。

貴國豈能以西國之事來比？伊云：如可全還，自不計息。李云：但二萬萬，實償不起。如出息五釐，可允不還本否？伊云：是猶向日本借款，日本無此鉅款。李云：不必貴國出本，但取息耳。伊云：此辦不到。李云：餘款加息，惟有出息不還本，如此辦法，請爲細想。伊云：戰後款應全給，所以分期者，亦以符中國之力也。李云：全行償還，向無此辦法。德之於法亦分期，現在中國先出息銀，待籌到款項，再行還本，可否？伊云：亦辦不到。李云：既辦不到，餘款當不認息。款鉅而又加利，不啻兩次賠款。伊云：償款如不分期，或分期而年限尚短，當可免息。李云：國庫已空，勢必借債，待償借到，再酌減年限，何如？伊云：約內不得定明年限。李云：約內可加活語。如能早交，息當從免。伊云：能交清，息可全免。李云：先期交清，則應免息，自不論先交若干？伊云：初次應交五千萬云云，批准後一年，再交五千萬；如第二年全交，則可免息。李云：如不交，第二年餘款不免息否？伊云：視餘款之多少，少則免息。李云：息不能認，日本雖勝，總不能強於英法。英法之於中國戰後，尚未強以認息，今日認息，華人聞之，必大駭異。且爲數甚鉅，加息不更重乎？伊云：如能全數清償。李云：免息自不煩言而解。伊云：所謂全數清還者，非一時也，乃分兩年之期，期內清還，自可免息。李云：我未能答應，借債之權，在人不在我，能借到自能早還。日雖得勝，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擔當？伊云：不能擔當，是否不允之說？李云：我誠意修和，但辦不到事，不能不直說。伊云：照我節略，已竭力減少矣。李云：再講讓地一節。歷觀泰西各國交兵，未有將已據之地全行請讓者。以德國兵威之盛，直至法國巴黎都城後，將侵地讓出，惟留兩縣之地。今約內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將所據之地全得，豈非已甚？恐爲泰西各國所訾笑。伊云：如論西國戰史，不但德法之戰而已。李云：英法兵亦曾佔據中國城池，但未請割寸土尺地。伊云：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李云：卽如營口者，中國設關收稅，乃餉源所在，貴國又要償款，又要奪關，是何情理？伊云：營口關稅，乃地生之貨所出。李云：既得地稅，尙要賠款，將如之何？伊云：無法。李云：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伊云：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李云：今貧瘠實甚，猶如小孩，日營口貴國得之無益。營口之北，地面甚廣，貨所從出，汝既踞關，將來貨從內地運出，中國必加稅加捐，既到營口，又納關稅，是貨貴必滯銷，關稅必少，且貨在內地，華官或勸商人從他處出口，或重釐稅

，華商斷無不從之理。伊云：是可彼此相商，且中日可與各國商酌。況將來陸路通商章程所當議及者。李云：加捐乃中國自主之權，外人豈能相強？所以據有營口無益。貴國不如退出，再商別處。伊云：營口以北，業經退讓，萬難再讓。李云：臺灣全島，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強讓？伊云：此係彼此定約商讓之事，不論兵力到否。李云：我不肯讓，又將如何？伊云：如所讓之地，必須兵力所到之地，我軍若深入山東省，將如之何？李云：此日本新創辦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國從未全據；日本如此，豈不貽笑西國？伊云：中國吉林、黑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李云：此非因戰而讓者。伊云：臺灣亦然。此理更說得去。李云：中國前讓與俄之地，實係甌脫，荒寒實甚，人烟稀少；臺灣則已立行省，人煙稠密，不能比也。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無分荒涼與繁盛。李云：如此豈非輕我年耄，不知分別？伊云：中堂見問，不能不答。李云：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爲數甚鉅，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臺灣不必提及。伊云：如此，我兩人意見不合，我將改定約款交閱，所減只能如此，爲時太促，不能多辦。照辦固好；不能照辦，即算駁還。李云：不許我駁否？伊云：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貴大臣願速定和約，我亦如此。廣島有六十餘隻運船停泊，計有二萬噸運糧，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所以不即運出者，以有停戰之約故耳。李云：停戰限滿，可請展期。伊云：如和約已簽押，限期可展；否則，不能。李云：德法停戰，曾再展十日。伊云：時勢各別，其時法國無主，因召民選議員，開議院，選總統，派使臣等事，故多需時日。李云：爾所欲者皆已大概允許，意見不合者，惟此數端，如不停戰，何能暢議？伊云：期限惟有十日；今日條款，即請決定可否，三日後四點二刻，當候回信。李云：事有不諧，尚須會議。伊云：三日後如蒙見允，即請復函，尚須預備約章，彼此簽押，又須遲延數日。李云：不必復函，一經面允，自可定議。三日斷來不及。我明說尚須電報請旨，不能限以時日。伊云：接到回旨，即可決斷？李云：請旨後如何，再與貴大臣面議，俟接到回軍，再來相請。伊云：此事重大，必須妥酌，今日所訂各節，皆有訓條，我不能專主。伊云：五天過久，急不能待。李云：停戰之期，尚有十天。伊云：我須早知照前敵。李云：停戰有期，前敵豈有不知？伊云：前敵諸將，隨時探知此地會議之事。李云：尚有十天，再會一次，即可決定。且節略甚多，譯華文者，只有三節，其餘今天譯齊，方可發電，第四日當有覆旨，至遲五天。伊云：北京回電，

我想三天足矣。李云：一有復音，即請相會。是否在此，抑請貴大臣來寓相會？伊云：隨中堂便，來此會議更好。李云：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臺灣不能相讓。伊云：如此，即當遣兵至臺灣。李云：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伊云：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李云：索償太狠，雖和不誠。前送節略，實在句句出於至誠，而貴大臣怪我不應如此說法。我說話甚直，臺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湧太，臺民強悍。伊云：我水師兵弁，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口兵不能吃苦，乃入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李云：臺地瘴氣甚大，從前口兵在臺，傷亡甚多，所以臺民大概吸食鴉片烟，以避瘴氣。伊云：但看我日後據臺，必禁鴉片！李云：臺民吸烟，由來久矣。伊云：鴉片未出，臺灣亦有居民，日本鴉片進口，禁令甚嚴，故無吸烟之人。李云：至為佩服。伊云：禁烟一事，前與閣相國言及，甚以爲然。李云：英人以洋藥進口，我國加稅，豈能再禁？伊云：所加甚少，再加兩倍，亦不爲多。李云：言之屢矣，英人不允。伊云：吸烟者甚懶，兵不能精。李云：此事迫於英人，難以禁止。伊云：當先設自禁之律，洋烟自不進口。中堂起席，與伊藤作別握手時，再請將賠款大減，伊藤笑而搖首云：不能再減，而散。

註一：姚錫光著「東方兵事紀略」，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四，頁三三—三四。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三三—三三〇；參考自「甲午中日戰輯」卷六，傳相議和。

十七日(四月十一日) 俄皇召集緊急會議，討論中日戰爭，俄皇擬與日合作，外相、

財相反對。

俄皇尼古拉二世召集緊急會議，討論中日戰爭，俄皇意與日本合作，外相、財相以爲不可。外相羅拔諾夫發表意見云：「日本之占領滿洲，將在軍事上、經濟上直接威脅俄國在遠東之地位。俄國陸軍在遠東者若增至五萬人，即可敵日。」財相微特(Count Witte)說：「日本對華作戰之目的，在阻遏俄國西伯利亞鐵道建築後之新局勢，若日本不聽勸告，俄艦隊即轟擊日本之港口與船隻，作保全中國之友誼，而中國將會感謝，于邊界問題，自會有利解決。並建議俄國不占領中國領土，以免引起國際糾紛，

俄國可承認日本占領臺灣、澎湖；甚至旅順、南朝鮮，但不能使日本占領滿洲。」俄皇是微特言，決定採取微特策略。（註一）

註一：A. Melozenoff, Russia's Far East Policy.

十九日（四月十三日） 福士德言：李鴻章預料若割遼東，必引起俄之干涉；割臺灣，日、英將發生衝突。

福士德回憶錄言：「鴻章預料若割遼東，必引起俄國干涉，但干涉消息，返天津後始確定。鴻章對割臺灣不甚爭執，鴻章意臺灣對中國並無大利，而日本占領，將與英國發生衝突，遼東半島固威脅京畿，鴻章料俄必不甘坐視，故以之歸日，而使日、俄衝突。」（註一）

按：根據德方紀錄：日本駐德公使青木（Aoki），早于本月八日（四月二日）即曾通告德國國務總理馬沙爾（Marshall）謂：日本擬要求中國割讓遼東半島，並為之解釋云：「為保證高麗獨立，以防中、俄侵略起見，割讓該地之舉，實為軍事上所必需云云！」其後德國決定據此與英、俄、法三國政府互相交換意見，除英國外，其他二國反應俱佳。而俄國之反應尤為激烈，其駐德代辦曾于十四日（四月八日）將俄國條陳遞與德國政府：「日本如併旅順，則將為恢復中、日友善關係之一種障礙，而且東亞和平亦將永受其危。」由俄人所主導之三國干涉遼東于此已見其端倪，日亦不出鴻章之所料。鴻章一生所奉行之「以夷制夷」政策至是略見其效，但中國亦以此險遭瓜分之禍，嚴格說來，可謂得不償失矣。（註二）

註一：Foster, Memoirs.

註二：王光祈譯「三國干涉遼東秘聞」，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二年出版。

二十一日（四月十五日）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會議於馬關之春帆樓，此為最後一次談判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十九、二十一日

二九三

。鴻章已奉到認可諭旨，除遼東割地、劃界、賠款利息，及占地軍費稍有更動外，大抵均承認日本條件。

本日午後，中日全權續會議于馬關之春帆樓，雙方互辯。伊藤于商約內日本人入內地租棧，減去華官不得干預一語，並刪以日本銀圓不得報關一事；而日本人在華製造貨物，限以通商口岸；並言明兵費三年償清停息，遼河口界線以河心爲界，及換約後臺灣兩月交割諸事，遂定議。是爲第五次談判，亦爲最後一次談判。（註一）

附錄：第五次談判（註二）

三月二十一日午後，中日全權會議於春帆樓，此最末一次之談判。李鴻章已奉得最後諭旨，本爭得一分算一分之意，作最後磋商，談判結果，遼東割地劃界賠款利息，及占地軍費，小有更動。其問答節略如次：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兩點半，至春帆樓，與伊藤會議。李云：陸奧大臣今日身子如何？伊云：稍好。本願來此會議，佐藤醫生戒其外出。李云：佐藤今晨言及，陸奧身子尚未全愈，不可以風。昨日我派經方至貴大臣處面談各節，一一回告，貴大臣毫不放鬆，不肯稍讓。伊云：我早已說明，已讓到盡頭地步，主意已定，萬不能改，我亦甚爲可惜。李云：現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辦理。此事難辦已極，還請貴大臣替我酌量，我實在無法酌量。伊云：我處境地，與中堂相似。李云：爾在貴國所論各事，無人敢駁。伊云：亦有被駁之時。李云：總不若我在中國被人駁斥之甚。伊云：我處境地總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國，位高望重，無人可能搖動。本國議院權重，我做事一有錯失，即可被議。李云：去歲滿朝言路，屢次參我。謂我與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參甚是，今與爾議和立約，豈非交好之明證。伊云：彼等不知時勢，故參中堂，現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當日所參之非。李云：如此狼兇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伊云：任彼胡說。如此重任，彼亦擔當不起。中國惟中堂一人，能擔此任。李云：事後又將惹起攻我。伊云：說便宜話的人，到處皆有。我之境地亦然。李云：此固不論，我來議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將原約酌改數處，方可擔此重任，請貴大臣替我細想，何

處可以酌讓。卽如賠款讓地兩端，總請少讓，卽可定議。伊云：初時說明，萬難少讓。昨已告明伯行（經方字）星使，已盡力讓到盡頭，不然必須會議四五次，方能讓到如此。我將中國情形細想，卽減至無可再減地步。蓋議和若市井買賣，彼此爭價，不成事體。李云：日前臨別時，請讓五千萬，當時貴大臣有欲讓之意；如能讓此，全約可定。伊云：如能少讓，不必再提，業已讓矣。李云：五千萬不能讓，二千萬可乎？現在新報一紙，在此內載明貴國兵費，只用八千萬；此說或不足爲憑，然非無因。伊取報紙細看，答云：此新聞所說，全是與國家作對，不可聽。李云：不必深論，但望減去若干亦好。伊云：我國之費多於此數。李云：請讓少許，卽可定議，當電明國家誌感。伊云：如可稍讓，盡已讓出。李云：貴國所得之地甚多，財源甚廣，請從寬處著想，不必專顧目前。伊云：所有財源，皆未來事，不能劃入現在賠款。李云：財源甚長，利益甚溥。伊云：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款。李云：財源不僅如此，必定興旺。伊云：欲開財源，所費必大。李云：卽以臺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有煤油，有金礦，如我爲巡撫，必一一開辦。伊云：礦產一開，必以賤價售諸華人。李云：華商不能自得。伊云：未開之地，必須經營，所費不貲。李云：所費愈大，得利愈溥。何妨賠費略減若干，他日利源所補多矣。卽我中國借債，亦稍容易，我在北京，洋人肯將臺灣押借二千萬金鎊，後我東來，皆知日人強索臺灣，此事卽攔起不提，所押已如此之多，出賣則其價更鉅。伊云：中國財源甚大，借債不難。李云：無論如何，總請再讓數千萬，不必如此口緊。伊云：屢次說明，萬萬不能再讓。李云：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雙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伊云：此戰後之約，非如平常交涉。李云：講和卽當彼此相讓，爾辦事太狠，材幹太大。伊云：此非關辦事之才，戰後之款，不得不爾，如與中堂比才，萬不能及。李云：賠款既不肯減，地可稍減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伊云：兩件皆不能稍減，屢次言明，此係盡頭地步，不能少改。李云：我並非不定約，不過請略減，如能少減，卽可定約。此亦貴大臣留別之情，將來回國，我可時常記及。伊云：所減之數，卽爲留別之情，昨已告明伯行星使，初約本不願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減萬萬。李云：如此口緊手辣，將來必當記及！伊云：我與中堂交情最深，故已多讓。國人必將罵我，我可擔肩，請於停戰期前，速卽定議，不然索款更多，此乃舉國之意。李云：賠款既不肯少減，所出之息，當可免矣。伊云：日前會議

說明，換約後一年內，兩期各還五千萬，又一年將餘款一萬萬還清，息可全免。李云：萬一到期借款不到，但出息可乎？伊云：不能。此與日前所說相同，但認息不還本，只算日本借錢，我國無此力量。李云：中國更無力量。日本開戰以後，未借洋債，中國已借數次，此日本富於中國之明證。伊云：此非日本富於中國，日本稍知理財之法。李云：中國將效日本理財，現在甚貧，借債不易。伊云：我看甚易，斷不爲難。李云：現在毫無頭緒，俟我回國再議。如三年之內，本盡還清，可免息否？伊云：三年內果能清還，息可全免。李云：約內可添明，若三年後清還云云，此乃活語，如此寫法，不過少有體面，所有便宜無多。伊云：約內寫明第一次交清後，餘免息云。如三年不能交清，則以前之息，必須一體加添。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如不還，一併加息。伊云：一併加息，甚爲糾葛。李云：莫若二萬萬內減去二千萬，以抵償息；如此一萬八千萬，即照約內所載辦法更簡捷。伊云：不能。且三年內交清免息，應於約內載明，以免誤會。李云：如此鉅款，豈能預定？伊云：我亦恐兩年內交清，難以預定，故將還期延至七年之久。李云：少去二千萬，中國可少借二千萬。伊云：萬萬不能。李云：三年內清還免息，不必寫入約內，可另立專條。伊云：此事不能另立專條，應於約內寫明。李云：請將第四款翻復觀看，可另有主意。伊云：或三年內還清，免息或否，應寫明一定辦法。李云：無妨加一活語，倘三年內云云。伊云：必須寫出一定辦法。李云：借錢之權在人，借到方可寫明。伊云：只好照原約寫。李云：中國前賠英法兵費，但寫明過期不還，方認利息，今即加息，亦太不情。伊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李云：爾想錢太過，索款又鉅，利息又大。伊云：其時英法之兵，不如日兵之多。李云：英國其時調有印度兵。伊云：所調不多。李云：三年清還免息，可添入原款乎？伊細想多時，乃云：如要停息，只有一樣辦法，三年內照舊認息，若三年之內，果真清還，可將所認之息抵作本款。李云：是否三年將本全還，並認利息，則將已償之息作本？伊云：譬如換約後六個月交五千萬，再六個月又交五千萬，其時應交一萬萬之息，第三第四等期照算，如三年屆滿，將餘款交清，則前二年所認之息，即可劃算應交餘款，惟三年當自換約之日起算。李云：即寫如三年之內，能將全款清還云云，請貴大臣看後，即可添入第四款。伊與屬員互商，即云：添入。李云：尚有數條相商，並非與原約有所增減，不過將約內之意聲明，以免將來誤會。如遼河口界線，該線一到營口

之遼河後，當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爲界，此乃公法，凡以河爲界者，莫不如是。伊云：將來勘界時可定。李云：即可照此添入第二款內之第二條下。伊云：甚是，可照行。李云：第五款，二年後讓地內尚未遷出之華民，可視爲日本臣民，但有產業在讓地內而人遠出者，二年後應請日本保護，視同日本臣民之產業。伊云：此事難允。現在日本與西國所訂條約，不許外人在日本內地置買產業。李云：我所說者，乃原有之產業，與外人所置之產業不同。伊云：此與日本律法有異，不易辦理，外人必將藉口。李云：此乃祖先留傳之產業，可照章納稅，有何難辦？中國人民皆可在別縣置產。伊云：華民在中國隔縣置產，非外人可比。如日本聽華民在內地有產，則外國必將援一體均沾之例以要我。李云：臺灣華人不肯遷出，又不願變賣產業，日後官出告示，恐生事變，當與中國政府無涉。伊云：日後之事，乃我國政府責任。李云：我接臺灣巡撫來電，聞將讓臺灣，臺民鼓譟，誓不肯爲日民。伊云：聽彼鼓譟，我自有法。李云：此話並非相嚇，乃好意，直言相告。伊云：我亦聞此事。李云：臺民戕官聚衆，視爲常事，他日不可怪我。伊云：中國一將治權讓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責。李云：不得不聲明在先。伊云：中國政府只將官調回兵撤回而已。李云：綠營士兵，不可他往，駐防之兵可撤回。伊將所譯免息一條英文閱過，與華文相對不錯，云：即可照此添入。李云：臺灣官紳交涉事件紛繁，應於換約後六個月，方可交割清楚，此節添入約款內。伊云：我意批約後數禮拜，即派兵官赴臺收管。李云：可派人與臺灣巡撫共商，以清經手事件。伊云：換約後，請華官出示臺民，我派兵官前往，將一切軍器暫行收管。李云：所派有文官否？伊云：文官亦派。李云：交割是小事，應先立簡明章程，日後照辦，方免糾葛。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議交割，換約後立即派人前往。李云：約內可改云換約後兩國互訂交接簡明章程。伊云：有一專條在此，專爲臺灣之事。即將東英文交閱。李接看東文，不懂，令譯英文，其略云：一切堡壘槍礮與公家物件，皆交日本武官收管，所有華兵行李私物，准其自携。日官指定一處，令華兵暫駐，直至調回內地，中國政府官員限日撤回。一切費用，中國自認。兵撤回後，日官將洋槍送還，然後派文官治理地方，公家產業，由彼收管，其餘細節，皆由兩國兵官彼此商定等語。中堂聽畢云：此係換約後之事，我無權先定。伊云：中堂改期有權，此條與和約均重，何謂無權？李云：此皆換約後應商之件，與通商水陸章程諸事，皆可同時商酌。

伊云：此乃最要最急之事。李云：換約後方可定，我無權管臺灣巡撫，總理衙門方有此權，應在總理衙門商議，現議之約，不過臺灣讓與日本而已。抑或俟互換本約時，另立讓臺簡明章程。伊云：耽誤時日。李云：約不互換，尚不算准，臺灣仍係中國之地。伊云：是也。李云：可寫明至臺灣一省，俟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再行互議交接章程。伊云：我即派兵前往臺灣，好在停戰約章，臺灣不在其內。李云：本約內可將臺灣刪去，俟貴國自取。伊云：交換之時，何不限定？李云：此事我難專主。伊云：六月爲期太久，換約後總理衙門可否即定簡明章程，蓋約一經互換，臺灣即交日本。李云：雖交日本，交換之時，應另議簡明章程。伊云：無須章程，中國將駐臺之兵撤回而已。李云：如不要章程，何以有此專條？伊云：專條之內，不過數款，單講撤兵之事，惟延至六個月之後，再行交接，未免過遲。李云：何不云換約後，兩國派員議定交接章程？伊云：應否限定日期？李云：不必。伊云：換約後即行交接。李云：不議章程否？伊云：限一月足否？李云：可俟條約批准互換後一月內，兩國派員妥議交換章程。伊云：一月內應即交換，不必議章程。李云：爾說要派文官，何不令文官與臺撫相商？伊云：伊東寫出英文，一俟換約後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辦理臺灣交接。李云：一月之限過促，總署與我遠隔，臺灣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國派臺灣巡撫，與日本大員即在臺灣議明交接章程，其時換約後，兩國和好，何事不可互商？伊云：一月足矣。李云：頭緒紛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妥，貴國何必急急？臺灣已是口中之物。伊云：尚未下咽，饑甚！李云：兩萬萬足可療饑！換約後尚須請旨派員，一月之期甚促。伊云：可寫一月內奉旨派員云云。李云：不必寫明奉旨等語。伊云：一月內可派員否？李云：月內即可派員，至交接一節，應聽臺撫隨時酌定。伊云：當寫明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一月內各派大員，妥議交割，不必限定何時。伊云：當寫明兩月交割，免生枝節。李云：但寫一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議定交割。伊云：月內派員妥議，兩月內交割清楚。李云：兩月內派員交割。伊云：不如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李云：各派大員，限兩月內交接清楚。伊云：何不允一月內派員，再一月交割？李云：不如寫兩國速派大員，限兩月內妥議交割。伊云：可改互換後立即派員云云。李云：可寫又臺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臺灣，限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交接清楚。伊接看云：可照辦。李云：第六款內第三條，日本國臣民租棧一節，末有官員勿得

從中干預字樣。此條本意原爲華官不能強索日商規費等事，但如此寫法太混，假如日商犯案，逃匿所租棧房，本地地方官即無權入棧搜查，所以應請將前項字樣刪去。伊云：可刪去。李云：第四條，中國海關皆用關平約稅，今此條內改用庫平，不能一律，又日本銀元在通商各口，皆與鷹銀照市價通用，此條何必寫明，全條可刪。伊云：可全刪。李云：第五條原文，日本臣民准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等語，意未清楚，如此日商亦可前往內地製造，應寫明日本臣民准在通商口岸城邑製造一切貨物等語，以示限制。伊與其屬員往返細商，方允添入。李云：第八款，威海衛留兵，日本究派多少？伊云：一萬。李云：無處可住。伊云：將添蓋兵房。李云：劉公島無餘地。伊云：在威海衛口左近。我武官初意想派二萬住盛京，二萬住威海。李云：款內各費由中國支辦等語，可將此節刪去，前英法亦曾駐兵我國，皆未償費。伊云：駐兵償費，乃歐洲通例。李云：既已割地，又賠兵費，而且加息，留兵之費，應在賠費內劃出。伊云：賠費乃戰事所用之費，留兵之費，又是一事。李云：中國認不起。伊云：此照歐洲通例。李云：現在亞細亞，何云歐洲？且英法未請支辦，中國約章具在，可查明也。伊云：何時？李云：英國留兵在廣東、舟山、大沽等處。伊云：彼留兵非爲抵押賠款。李云：英法於同治初年留兵大沽、上海，皆爲賠費之質，中國並未給兵費，本約皆已全允，些許小事，何不相讓？伊云：一年之費不貲。李云：已賠兵費，數年之利，又數百萬，何必如此算小？此事甚小。伊云：本約何時簽定？李云：約本鈔齊，即可簽定。伊云：此次英文不必簽押，惟將中東兩文簽押而已。不過英文句意清楚，萬一誤會，可用解明，爲此有一專條，請看。中堂將專條華文閱後，云：此華文可行。伊云：我處各寫本約英東文兩分，請貴處寫華文兩分。李云：貴處英東文何時可齊？伊云：明晨即有。至威海衛駐兵一節，另有華文專條在此，請看。中堂接看，云：皆可照辦；惟須將支辦軍費一條刪去。伊云：自簽約起至換約時，限十五日可否？李云：批准換約，皆係大皇帝之事，本大臣不能專主，必須請旨，可定。伊云：明日簽押時，當定明互換之日。李云：本大臣到津，當專員齎約晉京，送與總理衙門，然後進呈皇上，方可擇日批准，轉折甚多，難以限定日期。伊云：約內必須寫明換約日期。李云：約內可寫定換約之期，皆在簽押後，多則一年，少則六月。伊云：此約簽後十五日換約足矣。李云：前已言明，轉折甚多，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但此係皇上之事，不能預定。伊云：

：兩國大皇上皆應如此。李云：不能寫定。伊云：凡約皆應寫明換約之期，我國主現在廣島，即可批准。李云：此近我遠，不能相比。伊云：換約之地何處？李云：常在北京。伊云：北京我無使臣駐紮，如派人往，當派兵護送，不便。李云：此次我來，所費實多，簽押之後，兩國即係友邦，批約後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換約。我國換約，向在北京、天津兩處。伊云：此非成例。現在亞細亞，何必常以歐洲之事相比？換約之地從爾，期限當從我。伊云：一月究竟太遠。李云：留兵貼費，究竟可去否？伊云：不能。李云：無法？伊云：中國為難情形，無論如何，兵費總須各認一半。李云：二百萬兵費太多，一百萬各半，不問所費若何，每年我淨貼五十萬，一應在內。伊云：此費只可養一營。李云：何必多派留兵，與貴國甚近，萬一有需，即可調來。伊云：留兵為抵押賠款，非為別事。李云：英法留兵，皆無兵費，貴國應寬大辦理。伊云：換約之期，究竟二十天定否？李云：已講明一月。伊云：太遠。簽約應從速，批准互換亦然。李云：轉折甚多。伊云：二十日足矣。烟臺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即准貼費五十萬；不然，必要一百萬。李云：換約之期，總須請旨，每年貼費五十萬，自換約之日起。伊云：如能允二十日。李云：我不能作主。伊云：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李云：寫明一月，我可催及早互換。會議已久，當派參贊將約本校對清楚，後日簽押。伊云：何不明日簽押，我處明早即可寫齊。李云：我回去請旨，換約日期可空起。中堂起席，伊父諄諄以二十日為請，方可允貼費五十萬。中堂答以言定不必多議，而別。時已七點鐘。

註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四，頁三四。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三四三—三四六；參考自「甲午中日戰輯」卷六，傳相議和。

二十二日（四月十六日） 俄皇獲德、法同意，再召集御前會議，決向日本通牒，要求交還遼東半島。

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獲法、德同意後，復秘密召集御前會議，決採納財相徵特策，向日本提出交還遼東半島之最後通牒，並決定武力干涉。德皇立命德國遠東海軍與俄國海軍聯絡，準備採取一致行動。（註一）

按：德國接獲俄國條陳（條陳內容見前）後，即於本月十五日（四月九日）電覆聖彼得堡云：願與俄國方面，共作俄國政府條陳之步驟。並令東京德使，應與俄使齊在彼處發出宣言云云。當時柏林當局所以如此決定者，實有下列三種原因：第一、德國深恐日本之勢力與中國之巨大財源相結合，其結果將損及歐洲利益，而德國利益，當亦在破損之列。第二、德國決計：今後如遇列強再事瓜分海外殖民地之時，德國勢將插手其間。第三、德國政府擬藉此一機會與俄接近，從而鬆懈俄、法間之密切關係。另

外法國亦於本月十八日（四月十二日）法國閣議中決定接受俄國條陳。法外長赫努特士（Hanotaux）

並宣言：「即或英國不與其事，彼亦願與俄、德兩國，對於此事繼續協商、諒解」云云。至是俄、德、法三國干涉遼遼之行動，其勢已成。（註一）

註一：N. V. Burnstein, T.D. Lerne: Letters of the Kaiser to the Tzar, the Willy Nicky Correspondence.
註二：王光祈譯：「三國干涉遼遼秘史」，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民國二十二年。

二十三日（四月十七日）中日馬關條約簽字，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賠款二萬萬兩；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日人得在各通商口岸從事各項工藝製造。

先是，本月二十一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于第五次談判中，所議定之中、日媾和條約，即承認朝鮮獨立，割讓東半島、臺灣、澎湖於日本，賠款二萬萬兩；並依西例議定通商條約，新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軍于條約批准後三月內撤退，日軍占威海衛為質，條約經兩國皇帝批准後，在煙臺互換。（註一）

附錄：媾和條約之簽訂（註二）

三月二十三日（西歷四月十七日）中日兩國全權簽定媾和條約於馬關春帆樓。計馬關新約十一款，議訂專條三款，另約三款，停戰展期專條二款。各約如下：

中日馬關新約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三〇二

第一款 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卽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

第二款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併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

一、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從鳴綠江口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畫成折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劃界線內，該線抵營口之遼河後，卽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爲分界。

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境內。

二、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三、澎湖列島，卽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第三款

前款所載及黏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爲公同劃定疆界委員，就地踏勘，確定劃界；若遇本約所訂疆界，於地形或地理所關有碍難不便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爲參酌更定。

各該委員當從速辦理界務，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該委員等有所更定劃界，兩國政府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劃界爲正。

第四款

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爲賠償軍費。該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互換後六個月交清，第二次五千萬兩，應在本約批准後十二個月內交清。餘款平分六次，遞年交納，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遞年之款，於兩年內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內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內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內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內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內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後，未經交完之款，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無論如何，將應賠之款，或全數或幾分，先期交清，均聽中國之便。如從條約批准互換之日起，三年之內，能全數

第五款

清還，除將已付利息，或兩年半或不及兩年半，於應付本銀扣還外，餘仍全數免息。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又臺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員至臺灣，即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個月內，交接清楚。

第六款

中日兩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訂立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其兩國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本。又本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業工藝行船舶隻陸路通商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禮遇護視，一律無異。

中國約將下開讓與各款，從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日起，六個月後，方可照辦：

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立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

一、湖北省荊州府沙市

二、四川省重慶府

三、江蘇省蘇州府

四、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

第二、日本輪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行客裝運貨物：

一、從湖北省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省重慶府；

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

中日兩國未經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行船，務依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路現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若自生之物，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欣暫行存棧，除勿庸輸納稅鈔派徵一切諸費外，得暫租棧房存貨。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定進口稅。

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切貨物，其於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沽及寄存棧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至應享優例豁免，亦莫不相同。

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行船通商條約內。

第七款 日本軍隊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互換之後三個月內撤回，但須照次款所定辦理。

第八款 中國為保明認真實行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軍隊暫行佔守山東省威海衛。又於中國將本約所訂第一第二兩次賠款交清，通商行船約章亦經批准互換之後，中國與日本政府，確定周全妥善辦法，將通商口岸關稅，作為剩款並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軍隊。倘中國政府不即確定抵押辦法，則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應不允撤回軍隊。但通商行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前，雖交清賠款，日本仍不撤回軍隊。

第九款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應將是時所有俘虜，盡數交還。中國約將由日本所還俘虜，並不加以虐待，若或置於罪戾。

中國約將認為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繫之日本臣民，即行釋放，併約此次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併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

第十款 本約批准互換日起，應按兵息戰。

第十一款 本約奉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後，定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煙臺互換。

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畫押，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訂於下之關，繕寫兩分。

議訂專條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政府，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政府，爲豫防本口署名蓋印之和約日後互有誤會，以生疑義，兩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議訂下開各款：

第一、彼此約明，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添備英文，與該約漢正文日本正文較對無訛。

第二、彼此約明，日後設有兩國各執漢正文或日本正文有所辯論，即以上開英文約本爲憑，以免舛錯，而昭公允。

第三、彼此約明，將該議訂專條，與日本署名蓋印之和約，一齊送交各本國政府。而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請御筆批准，此議訂各款，無須另請御筆批准，亦認爲兩國政府所允准，各無異論。爲此兩國全權大臣欲立文憑，各行署名蓋印，以昭確實。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訂於下之關，繕寫兩分。

另約

第一款 遵和約第八款所訂暫爲駐守威海衛之日本國軍隊，應不越一旅團之多，所有暫行駐守需費，中國自本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每一週年屆滿，貼交四分之一，庫平銀五十萬兩。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三〇六

第二款 在威海衛應將劉公島及威海衛口灣沿岸，照日本國里法，五里以內地方，約合中國四十里以內，爲日本國軍隊駐守之區。

在距上開畫界，照日本國里法，五里以內地方，無論其爲何處中國軍隊，不宜逼近或紮駐，以杜生靈之端。

第三款 日本國軍隊所駐地方，治理之務，仍歸中國官員署理；但遇有日本國軍隊司令官爲軍隊衛養安寧軍紀及分佈管理等事，必須施行之處，一經出示頒行，則於中國官員亦當責守。

在日本國軍隊駐守之地，凡有犯關涉軍務之罪，均歸日本國軍務官審斷辦理。

此另約所定條款，與載入和約，其效悉爲相同。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停戰展期專條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所簡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曾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大日本帝國大皇帝所簡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會同訂立和約，即欲妥行批准互換無礙，爲此議定下開各款：

第一款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訂約停戰，從此約簽定日起，得更展二十一日。

第二款 此約所訂停戰，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夜十二點鐘屆滿，彼此無須知照。如在期內，兩帝國政府，無論彼此不允批准和約，無庸告知，即將此約作爲廢止。

爲此兩帝國全權大臣欲立文據，即行署名蓋印，以昭確實。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理大臣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陸奧宗光，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

十三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訂於下之關，繕寫兩分。

註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八，頁十八、十九。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二，頁三五七—三六四；參考自「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九，頁十一十八。

二十六日（四月二十日） 臺灣巡撫唐景崧電奏清廷，臺民寧願效死而不肯淪為化外。

先是馬關和約棄臺之信傳出，臺人惶懼，三月二十三日臺撫唐景崧奏曰：「紛傳和議已畫押，有割臺一條，臺民洶洶，勢將譁變，恐大亂立起。」（註一）二十四日復奏曰：

「全臺紳民呈稱：和議割臺，全臺震駭，自聞驚以來，臺民慨輸餉械，不顧身家，無負朝廷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所以養人心正士氣，爲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棄之？全臺非澎湖可比，何至不能一戰？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祖宗，下對百姓，如日酋來收臺灣，臺民惟有開仗。」（註二）

二十五日總署電覆曰：

「割臺係萬不得已之舉，臺灣雖重，比之京師則臺灣爲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貴撫前奏，一則曰臺營雖多，分布則少，一二仗後，卽無營接仗。再則曰臺無兵輪，絕地坐困。不可因一時義憤，遂忘以前所陳種種患者於不顧也。」（註三）

並謂：「交割臺灣限兩月，餘限二十日，百姓願內渡者聽，兩年內不內渡者作爲日本人，改衣冠。

」（註四）本日景崧再電總署曰：

「昨電示傳播，臺民不服，紳民擁入署，哭聲震天，二百年文物之邦，忽淪化外，遷徙談何容易？其慘自不待言。土勇數十營誓必與戰，撤時斷不肯繳軍裝。倭人登岸，民必殲之，崧勢不能禁，請設法告倭，不可遽遣人來，來或被弑，官不任咎。」（註五）

臺灣紳民請英領事設法，歸英保護。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二十六日

本日臺北罷市，紳民請英領事設法，擬以該地歸英保護。（註六）

註一：俞明震「臺灣八日記」，引自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三一二。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九，頁五。

註三：同註一，頁三二三。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二，頁七七八。

註六：同註一，頁三一四。

二十八日（四月二十二日） 臺灣李定奎率部拒割臺灣起事，臺北秩序大亂。

先是三月二十七日，臺灣巡撫唐景崧電奏清廷，建議請各國駐京公使從公剖斷，速罷割臺之約。本

日復電奏曰：

「棄臺萬衆咨嗟，亂民已起，本日午刻，省城搶劫，砍斃撫標中軍方元良，鎗斃平民十餘人。現距交割之期尚遠，且未撤營，亂已如此，撤營後必至全省糜爛，官員恐難保全，臣不知所措，恐無死所矣。」（註一）

歐洲報紙發表：俄、德、法三國聯合干涉遼東半島割讓之消息。（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九，頁二三。

註二：「字林西報」，頁六二〇，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三日） 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照會日本外務省，勸告日本放棄遼東半島。

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於本日向日本外務省致送覺書，勸告日本放棄遼東半島，認為：「日本占領遼東對北京爲永久而直接的威脅，使朝鮮之自主爲不可能，如此則有碍遠東和平。」

附錄：三國干涉還遼要求之提出（文中所記年、月、日均爲陽曆）（註一）

（上略）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字之日，俄駐德代辦查爾可夫（Tscharkow）奉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命，通知德外交大臣馬沙爾（Marschall）曰：「日本和平條件之審查，迫使俄國政府得到之信念，即日本佔據遼東對中國首都乃係經常之威脅，同時將使朝鮮之獨立成爲虛影，因此將成爲東亞和平之永久阻礙。俄國在東京代表將以上述意見通知日本政府，勸其肯定放棄該半島之佔領。」同日德國政府致電德國駐日本大使哥屈米德（Baron Gutschmid），等待俄法駐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後，亦作同樣之表示，但措詞應盡量婉轉。理由如下：

顧及日本之友誼，德國政府拒絕去年十月七日英國干涉中日糾紛之提議。今日日本之和平條件顯然過度，它將損害歐洲及德國之利益，雖然後者範圍尙小。因此吾人不得不從事抗爭，如有必要，吾人知道怎樣加以強調，日本必須讓步，因爲與三國爲敵絕無成功之希望。

並告哥屈米德，如果日本政府同意舉行列強會議解決遼東半島問題，應立即覆電告知。四月十九日法駐俄大使蒙得培羅（Count de Montebello）奉法外交部長阿諾托（Gabriel Hanotaux）命，正式通知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Lobanow-Rostowski），表示法國願意參加干涉還遼行動。二十日復將法國之計劃，面告德國駐俄代辦齊爾緒基（Von Tschischky），並決定當天在東京採取行動。後因三國意見未盡協調，聯合行動較預定時間遲緩三日。日外相陸奧宗光於其所著之「蹇蹇錄」中記其事曰：

該三國已約定提携干涉，則駐東京俄德法各公使之運動固應一致。惟彼等之進退頗爲齟齬，甚屬可怪。四月二十日德公使一人來外務省，面晤林次官，謂受本國政府極重要訓令，今雖不能言明其國名，然明日當與其國公使等來訪，欲面晤外務大臣。林次官答稱：「伊藤、陸奧兩大臣皆不在東京，尤其外務大臣現在抱病，有何事件，余當代爲接洽。」該公使已預約明日與他國公使同來。然至翌二十一日則謂發生妨礙，希延期一日，而其翌日又未同他國公使來會。如斯遷延直至二十三日，三國公使始一齊來外務省，蓋因俄法公使接其本國政府訓令過於遲延所致，足察三國政府因事出於急遽，致訓示其代表之手續亦缺一致。

四月二十三日，俄駐日本公使希特羅渥（Xutropo）、德駐日本公使哥屈米德（Baron Von Gutschmid）、法駐日本公使呂班（M. Duhal）聯袂自日本外務省，面晤外務次官林董，各代表本國政府口述覺書。德國公使之覺書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

三一〇

「日本在此次戰爭過程中，屢次獲得德國之同情，爲顧全對日本友誼起見，德國去年十月七日曾拒絕英國提議列強干涉中日之糾紛。又皇帝陛下政府本年三月六日建議日本政府速締和約，並減輕條款。至於中國請求列強干涉一節，德國曾表示，在無居間及合理條件下簽訂和約，將對日本有利。又嘗強調大陸領土割讓之要求，將特別惹起干涉。不幸日本並不考慮這些不自私之建議。」

現在日本之和平條件顯然過度，已損害到歐洲及德國之利益，雖然後者之範圍尙小。」

因此皇帝陛下政府不得不提出抗議，如有必要，將對其抗議予以加強。

俄國公使之覺書曰：

「俄國皇帝陛下之政府，查閱日本國向中國所要求之媾和條件，認爲遼東半島如爲日本所有，不特有常危及中國首都之虞，且同時朝鮮之獨立，亦爲有名無實，實爲將來遠東永久和平之障礙。因此俄國政府向日本政府重表誠實友誼，勸告日本政府放棄領有遼東半島。」

法國公使之覺書略同俄國。由於哥屈米德之覺書措詞強硬，顯然超出四月十七日德外交大臣馬沙爾之電示，因此大召德政府所不滿。同月二十四日馬沙爾報告德皇曰：「吾人應避免露出吾人對日本比俄法還要不能容忍，致兩國懷疑吾人之最後目的，並給彼等以造言機會，謂吾人乃對日本行動之靈魂，德國將來也許需要與日本在一個共同目標上達到諒解。」其欲暗中取悅日本之心可知。故認爲哥屈米德之「粗暴行動」，將給德日關係「留下一個極深之創傷。」

林董初聆三國公使覺書，「顯然露出驚慌之色」，立即表示：「三國對日本暫時佔據遼東半島，例如等到賠款交付時爲止，是否也要抗議。」三國公使聲明：「土地問題祇是決定性佔領。」是晚三國公使在俄國公使館交換意見，研究進一步行動辦法，所得之印象：「此次行動不會受到像從前幾次干涉企圖之同樣命運，反可促成一個對列強能接受之妥協。」固早料定日本必將接受三國要求也。

按：馬沙爾其時爲德國國務員兼外長，地位重要。本月二十三日（四月十七日）德駐俄代辦亦曾致電馬沙爾謂：「羅伯納（Lobnow）時爲俄相（侯爵向余通知如下，英國脫離合作之舉，遂使俄國不能不將

責任擔起，獨立保護俄人東亞利益，以及歐洲方面之東亞利益，俄國政府現已決定，最初先用友誼的態度，請求日本對於永久占據大陸方面中國領土一事，加以放棄。羅伯納侯爵預料德法二國，一定參加此種行動，並已於昨日訓令柏林、巴黎二處俄使。倘若日本不願遵從此種友誼勸告，則俄國預計，即由俄、德、法三國戰艦共向日本開戰云云。」同日，俄駐德代辦亦以上意通知馬沙爾（內容見附錄），於此可見馬沙爾地位之重要。（註二）

註一：節錄李守孔著：「三國干涉還遼之交涉」，「大陸雜誌」，第二九卷八期。

註二：王光祈譯：「三國干涉還遼秘聞」，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二年。

三十日（四月二十四日） 日本舉行御前會議，商討三國干涉還遼對策。

日內閣在廣島舉行緊急會議，決定招請列強會議，處理遼東半島問題。日外相陸奧宗光則自舞子電告伊藤博文，建議暫對三國分別答覆，以便單獨交涉。（註一）伊藤博文記其事曰：

「若不接受，將不辭武力干涉之氣勢，於是迄今醉於戰勝而狂歡無度之國民，矜誇發揚國威國權之功，而揚揚得意之政府當局，遇此青天霹靂，突然失色，幾乎不知所措。此際若拒絕三國之忠言，必須有和彼見諸砲火之決心，而以我國（日本）戰後疲勞之實力，決不可能應付彼等，然而若唯唯諾諾，接受其要求，則戰勝之光榮將突然消逝，對外則貽笑列國，對內則將引起國民之公憤。」（註二）

註一：陸奧宗光：「蹇蹇錄」，頁三二一。

註二：「日本帝國議會誌」，卷三，頁九六九。

四月

一日（四月二十五日） 日本決定對俄、法、德三國讓步，對中國則毫不讓步，並請俄國顧念友誼再加考慮。

昨日廣島日內閣之會議，外相陸奧宗光方養病舞子，未能出席。本日晨伊藤自廣島來訪，大藏大臣松方、內務大臣野村，亦由京都來會，再度磋商，陸奧認爲若招請列國會議，各國爲自身利益，勢必別生枝節，馬關條約終且破滅。爲恐中國利用機會，復決定即令對於三國最後不能完全讓步，對中國則一步不讓。（註一）經日皇裁可，陸奧乃分別電令駐俄德法三國公使，分別向三國進行交涉。以三國干涉還遼係由俄國所領導，故特命西德二郎向俄國外部表示：

「在我皇帝陛下既經批准媾和條約之今日，放棄遼東半島實爲我政府至難辦理之事。……日雖割取遼東半島，但毫不使俄國在遠東之利益受危害。至關於朝鮮獨立問題，日本政府可採取使俄國政府十分滿足之措施。」（註二）

註一：「蹇蹇錄」，頁三一二。

註二：伊藤博文：「秘書類纂」附件第八一號。

二 日（四月二十六日） 清廷電俄、德、法三國致謝，並詢能否展緩換約之期。

清廷旨電駐德大臣許景澄，向俄外部致謝，懇請三國告日展緩停戰換約之期。另命總署大臣分赴各國公使館，囑將展期換約一事，各電本國政府。（註一）

清慈禧太后傳懿旨，命樞臣妥商和戰之策。

本日慈禧太后懿旨，和戰重大，兩者皆有弊，不能斷，命樞臣妥商。翁文恭公（同龢）日記記其事曰：

「（四月二日）是日，先召臣入養心殿，數語即退。軍機見時，傳懿旨，謂和戰重大，兩者皆有弊，不能斷，令樞臣妥商一策以聞。」（註二）

德皇賀俄皇干涉還遼之成功，並表示亦願在中國取得海港。

德皇威廉二世電賀俄皇尼古拉二世干涉遼東之成功，「鼓勵其在遠東之積極行動，並表示在中國亦願取得海港。」希望「減輕俄國在歐洲之活動，使德國有較大自由」。(註三)

註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九，頁一四。

註二：「翁文恭公日記」，第三十四冊，頁三三。

註三：J.D. Lerine, *Letters of the Kaiser to the Tzar*, p. 10.

三 日(四月二十七日) 唐景崧請以臺灣為各國租界，或歸英保護，以拒日本之占領。

本日臺灣巡撫唐景崧電奏曰：

「聞俄德法阻止日本佔華地，臺不在列，三國保護，臺益缺望。臺民曾挽滬尾英領事金璋，轉達駐京公使，稱全臺願歸英保護，懇速派兵輪來，臺土地政令仍歸中國，以金煤兩礦及茶腦礦三項口稅酬之；第非領事所能辦到，請旨飭下總署速商英使，以解倒懸，迫切待命，乞代奏。」(註一)

按：滬尾，即今之淡水鎮，為淡水河河口北岸之一小市街，臺北開拓初期，曾以此港為出口要津，其歷史久于基隆。其後始改今名。

註一：俞明震「臺灣八日記」，引自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三一七。

五 日(四月二十九日) 美使報告，日之占遼東，為獨霸亞洲之始。

美使田貝報告：「日本之佔有遼東，將為日本在亞洲獨霸之開始，于西方國家，毫無利益可言。」

。(註一)

註一：「美使報告」，二二〇六號。

六 日(四月三十日) 總署召福士達商和約，福力陳維新自強，並勸批准和約。

總署召福士達商和約，福向奕劻、翁同龢、李鴻藻等力陳「改革維新以自強」，勸「批准和約，否

則不可收拾。」謂：「此非鴻章之條約，而爲清帝與中國之條約」。(註一)

日本照會俄國，要求保留金州廳，增加賠款。

日外相陸奧宗光電令駐俄公使西德二郎，向俄國提出備忘錄，表示除金州廳外，日本願放棄對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權，但中國應予以相當之償金，在中國未完全履行和約義務前，日本得佔領半島作爲擔保。(註二)

註一：「福七德回憶錄」，頁一四一。

註二：伊藤博文：「秘書類纂」附件第八二號。

七日(五月一日) 北京外報記者報導稱，因京中士民仇視李鴻章，致鴻章不敢至京，中國政府之腐敗仍舊。

北京外報記者報導曰：

「京中士民仇視李鴻章，鴻章不敢至京陳報談判經過，中國政府仍在昏睡狀態，否則上下一心，以遊擊戰對日，則日或能多占領而終不能守，日本最後必敗。此在今日爲不可能，中國皇帝與政府之領導，有同小孩爲大人定其行徑，歐洲各國均不料中國失敗如此之速。」(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六九六，一八九五年五月十日。

八日(五月二日) 清德宗批准中日和約。

先是，自中日和約訂立後，言者紛紛，均以條約非是，然棄約即須再戰，又覺無所把握。清廷不能決，乃于本月初一日，旨令兩江總督劉坤一(時在榆關督師)，及署直隸總督王文韶決和戰。上諭云：

「新定和約條款，劉坤一、王文韶諒皆知悉。讓地兩處，賠款二萬萬，本皆萬難允行之事；而日人恃其屢勝，堅執非此不能罷兵，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連日廷臣章奏，皆以和約爲必不可准，持論頗

正；而於瀋陽、京師兩地重大所關，皆未計及。如果悔約，即將決戰，如戰不可恃，其忠立見，更將不可收拾。劉坤一電奏有云：戰而不勝，尚可設法維持；王文韶亦有聶士成等軍頗有把握，必可一戰之語。惟目前事機至迫，和戰兩事，利害攸關，即應立斷。著劉坤一、王文韶體察現在大局安危所繫，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陳，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辭，敷衍塞責。」（註一）

此諒責以「不得以游移兩可之辭，敷衍塞責」。然坤一、文韶何人，而能決此大策？雖欲不游移兩可，敷衍塞責，亦不可得也！文韶旋于本月初四日電奏曰：

「奉東電諭旨：以和戰兩事，飭臣與劉坤一各抒所見，據實直陳等因。臣維此次議約，倭人要挾狼狽，實為中外臣民所共憤，不獨言事者忠義憤發也。旨意以不和即戰，計及瀋陽、京師兩地重大所關，務籌完全之策，仰見聖慮深遠，急其所急。臣在津言津，如提督聶士成、總兵吳宏洛、章高元、陳鳳樓等，聲氣聯絡，必可一戰。其榆關以迄遼、瀋各路軍營，亦各有可用之將。究竟是否可靠，臣實不敢臆斷？現在戰事可勝不可敗，勢成孤注，與未經議約以前，情形又自不同。傳聞俄、法、德三國頗肯助我，外間未審確實，事關全局安危，應請飭下軍機大臣、督辦軍務處、總理衙門，通盤籌議，請旨定奪。再臣與劉坤一昨在唐山晤商一切，意見大略相同。」（註二）

所謂「必可一戰……亦各有可用之將……究竟是否可靠？臣實不敢臆斷。」固仍似游移兩可之辭也！同日，劉坤一亦有電奏，主張持久之戰，語意亦頗活動。其電文云：

「初一戊刻奉電旨：新定和約條款，讓地多處，賠款二萬萬，皆萬難允行之事，設竟決裂，則北犯遼瀋，西犯京畿，皆在意中。著體察現在大局安危所繫，及各路軍情戰事是否可靠，據實直陳等因，欽此。坤於新定條約，雖未盡悉，要之讓地賠款兩節，目前固難允行，後患更不堪設想。宜戰不宜和，利害輕重，事理顯然，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聖明洞鑒。惟一經決裂，倭必分擾猛攻，自以保京畿遼瀋為第一要義。查遼瀋等軍，依克唐阿、長順、陳湜等，與賊屢戰，甚為得力，唐仁廉亦係宿將，所部槍械已齊，當足以資抵禦。更有宋慶、魏光燾、李光久諸軍，駐紮錦寧一帶，該將領等忠勇過人，屢經大敵，相機戰守，似遼瀋後路可無他慮。倭擬圖犯京畿，則自關至津，沿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八日

三一六

海要口，處處設防，又有各大枝游擊之師，合計不下十餘萬人，倭寇豈易深入？縱或登岸，究屬孤軍，既有程文炳、董福祥兩軍堵禦於前，而津關各軍可以兩面夾擊，即不得手，自可再戰三戰，以期必勝；未必彼即長驅直入，我即一蹶不振。萬一京畿喫緊，坤必拙調勁旅，迅速入衛，以保無虞。前電所陳尚可設法撐持者也。夫利鈍本難逆視，但倭人遠道來寇，主客之形，彼勞我逸。近得探報，倭新卒多以老弱充數，餉亦不繼，在我只須堅忍苦戰，否則高壘深溝，嚴爲守禦，倭人懸師遠門，何能久留？力盡勢窮，彼將自爲轉圜之計。況用兵兩年，需餉不過數千萬，較賠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費愈多，持久二字，實爲現在制倭要着。諸將一聞和約，義憤填胸，皆欲一決死戰。坤職在兵戎，宗社所關，惟有殫竭血誠，力任戰事，此外非所敢知。昨於初三日馳抵津關適中之唐山，與王文韶、聶士成、丁槐等面商，意見相同，謹據實直陳，請代奏。」（註三）

本日，鴻章亦奏云：「緩准日約，各國未明言，難爲確據，仍宜暫行批換。」（註四）

根據上文，可知文韶等所奏與德宗意頗有依違，于是德宗乃於本日批准和約。既批後，與其師翁同龢相顧揮淚。（註五）

御史易順鼎劾李鴻章及其子經方，並建「遷」、「守」二策。

都察院御史易順鼎，有敢言之名，于本日奏請罷和議，認爲割地賠款，于理有不可者三，于勢有不可者六，視李鴻章父子爲權奸，至比之爲蔡京、蔡攸，及嚴嵩、嚴世蕃，主張將鴻章拿交刑部治罪，經方革職嚴辦。並建「遷」、「守」二策，即遷都與拒守是也。洋洋數千言，可謂反對和議者之代表。其原奏曰：

「奏爲醜虜跳梁不宜遷就，權奸誤國，不可姑容，恭瀝愚誠，仰祈聖鑒事：竊臣風聞出使日本全權大臣李鴻章電奏稱，倭船二十餘艘，將出廣島，若不定約，即將犯京，請割遼東、臺灣兩地於倭，並賠兵費二萬萬，爲保京計，不得不然，業經定約畫押等語。此外條款不一而足，人言憤憤，似非無因。微臣迫於杞憂，未敢緘默，謹就見聞

所及，不避斧鉞，披瀝陳之。

溯自咸豐同治以來，中國與外國凡三次用兵：一曰咸豐十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緒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緒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爲我朝中外大向絕要關鍵。其時髮捻縱橫，寰區鼎沸，天下岌岌，不可終口。而海外各國亦復同時生釁，英法合從，兵臨城下。僧格林沁敗於津沽北塘，勝保退於朝陽門八里橋，曾國藩、胡林翼諸人勤王之師，緩不濟急，敵騎長驅直入，京師不守，宗社幾危，時勢艱難，殆有百倍於今日者。假使各國要求土地，恐不能不聽容所爲。乃當日講和，不過立約通商，稍償兵費而已，初未聞割尺寸之土地也。若庚辰之役，俄據伊犁邊境，僅一二百餘里，使臣業已擅許，而疆臣左宗棠，堅欲索還，抗兵相加，大局幾將決裂，然不久即和，僅償款數百萬盧布而已，不惟未割地，且並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寧波，擾臺灣，陷馬江，沿海戒嚴，天下騷動，滇粵邊防戰事之棘，不亞今日，然不過讓以越南而已，未嘗於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試即今日之事，與昔日之事相衡，敵雖強未必出於英法俄之上，事勢雖急，未至於庚申之危。彼不過虛聲恫喝，肆意要求，我即稍緩須臾，與之再戰，或再遲數日，而後定議，未嘗不可。即不然償以兵費數百萬，亦未嘗不可。即不然，許其比照各國在江海各口通商，開設碼頭，亦未嘗不可。而皆不出此，賠款至二千萬，猶以爲未足，竟舉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一二千餘里之地，開門而延寇，拱手以與人。何其畏倭人甚於畏英俄法諸大邦，重遼東、臺灣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粵荒微之地也哉？伏思割地一事，尤爲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

祖宗創業於前，子孫守成於後，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試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之締造遼東，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之經營臺灣，取之如此其難，而棄之何忍如此其易？矧陪京密邇，陵寢攸存，坐使長陵坏土，自我而變爲邊界，皇太后皇上將如列祖列宗何？此理之不可者一。

自有本朝，未聞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國，未聞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島國之事。玉斧劃河，珠崖棄郡，若非甌脫，即係石田，豈有臥榻之旁，供人鼾睡？書於史冊，辱甚燕雲。坐使赤縣神州，自我而淪爲異域，皇太后皇上將如後世史書何？此理之不可者二。

遼東臺灣之民，或本從龍，或由向化，二百餘年，食毛踐土，芸芸赤子，孰非我國家之孝子順孫？今乃屬之他

人，儼成敵國。父母雖窮，尚不忍輕鬻其子；國家未蹙，何忍遽棄其民，坐使海隅蒼生，自我而化爲他族？皇太后皇上將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

遼東者，北洋之藩籬；臺灣者，南洋之門戶。今日無遼東，明日即可無北洋；今日無臺灣，明日即可無南洋。天下畏盜之人，必求遠盜，未有揖盜於門內，而求其不發篋探囊；天下畏虎之人，未有納虎於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行見奉、錦、登、萊一帶，不復能立錐；江、浙、閩、粵各疆，不復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餉械無以接濟，而海運立窮，戰守無能布置，而海防又立窮，中國將來必無可辦之洋務。此勢之不可者一。

英法垂涎臺灣，俄人蓄謀遼東，豈伊朝夕？況各國狡焉思逞之計，貪得無厭之懷，誰不欲拓境開疆，因時取利？今見倭人以一舉手一啓口之勞，而得地如此多，獲利如此厚，雖云無故，亦必生心。倘羣起效尤，則中國雖太，恐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然此猶他國也，卽以倭事驗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難民爲生番所殺，藉端挑釁，兵抵臺灣，當時大吏不能折之以理，怵之以威，反以數十萬金賠款了局。彼見中國易與，始漸輕視中國，而謀益迫，勢亦驕。推其得隴望蜀之情，曾何已極？此日之厲階，皆由於昔；他時之慾壑，恐更甚於今，中國將來必無可存之地。此勢之不可者二。

自軍務平定後，謀臣猛士，多就凋零，千百之中，僅存什一。此次徵求宿將，招集舊部，士馬精壯，已有可觀，乃甫聚集，又將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復聚。且所練之新軍，糜費幾何，練成而不用，待用之時，又將臨時另練；所購之新械，勞費幾何，購齊而不用，待用之時，又須臨時另購。今日尚不能戰，以後豈復有能戰之時？再閱數年，一有緩急，求如今日之將與兵，且不可得，宿將舊部，消磨既盡，新募者未經戰事，雖當大敵，中國將來必無可用之兵。此勢之不可者三。

賠款至二萬萬之多，不知從何搜括，又不知搜括淨盡之後，尚有應辦之務，必需之款，何所取資？夫使賠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猶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務仍不能不辦，兵餉仍不能不需，鐵路仍不能不修，驛軍仍不能不設，入款則有減無增，出款則有增無減。意外之舉，尚不暇論，而彼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後款又來。以斯民有盡之脂膏，填彼族無窮之慾壑。剝肉補瘡，肉將盡而瘡更劇；抱薪救火，薪將竭而火更烈。

，中國將來必無可籌之餉。此勢之不可者四。

長白、鴨綠，爲祖宗發祥鍾靈之地；黑龍江、吉林等省，爲國家植根歸宿之區。地利既多，民氣亦厚，當此強隣環伺，正宜乘時經略，加意保全，較之臺灣，尤關緊要。一旦遼東爲倭人所有，則俄自北侵，倭從南襲，不數年內，其民與地皆將折而入於俄與倭。東三省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人民，既不謀生，又不習鬥，一朝有事，而東三省已不能歸。退則爲倭寇所草菅，進則爲亂民所蹂躪，中國將來必無可保之旗民。此勢之不可者五。

臺灣一省，饒富著稱，近來文化振興，吏已變椎髻爲衣冠，進侏儒於禮樂。其七民皆愛君親上，好義急公。而林維源身爲民望，官列京朝，勢不能以家委敵。況彰義之名，出自純皇帝所賜，臺人固必思義而顧名，皇上又烏可數典而忘祖？至於遼東之爲豐沛鄉里者，更無論矣。民情何常之有，親之則親，疏之則疏，向之則向，背之則背。雖厚澤深仁，已浹於祖宗之世，而先疇舊德，不保於孫子之朝，恐未免兆姓寒心，四方解體。倭既據我內地，且將取我民心，以利誘之，而桀黠者必爲倭爪牙；以威迫之，而羸弱者必爲倭魚肉。行見流民無所依歸，而西晉雄特之禍起，奸民相與勾結，而虜秦勝、廣之變生。毆魚爲淵，瞻烏誰屋？中國將來必無可固之民。此勢之不可者六。

以上各節，不過據臣所私憂竊慮，粗舉大端，而其禍變相尋，尚有不勝枚舉者。以言理之，是非則如彼，以勢言之，利害又如此。大約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肯爲之；稍有知識之人，皆必能見及之。而不謂渥蒙國恩深悉時務之李鴻章，竟悍然不顧，冥然罔覺，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臣前見李鴻章行事，不憚人心，尙疑其別有苦衷，代爲原諒，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術之幻，而得其罪狀之真。所謂臧孫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檜，明臣仇鸞之奸，尙未至此也！且遼東、臺灣並割予倭，臣以爲窮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願，亦未嘗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則何不逕取遼瀋，以索登、萊；逕取臺、澎，以索閩、厦？囊括席卷，彼豈有所恤而不爲？如其始願嘗及此，明知遼東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見。不謂有李鴻章焉，爲虎作倀，教猱升木。於是倭不啻取懷而予，操券以償。蓋倭力不及此，而李鴻章之力能及此；倭願不及此，而李鴻章之願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鴻章之奸尙不及其子李經方之甚。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已資數百萬，借給倭人，購船備餉，其所納外婦，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

許險薄，誠不滅蔡京之有蔡攸，嚴嵩之有嚴世蕃。假使憑依城社，竊據津塗，張邦昌、劉豫之事，不難立見。我朝貽謀之遠，立法之善，爲前古所未有。當此之時，而欲以島夷入主中國，以人臣攘執太阿，蓋亦憂憂乎難之。不圖天地躍金，陰陽鑄錯，於倭生一陸仁，於中國生一李經方。以權奸爲醜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醜虜爲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爲國之漸。俱成頭角，各長羽毛，腐木虫生，履霜冰至。今日此事，尤爲中國汚隆本朝興替一大關鍵。微臣悲江河之日下，痛滄海之橫流，所爲涕泗汎瀾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李鴻章敢於犯天下之不韙，欺朝廷以其方者，窺見皇太后皇上與諸臣畏倭之心，而後藉詞保京，反自託爲忠愛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詐也。在李鴻章固以爲舍己別無他人，舍此別無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竊於此策之外，爲朝廷敬畫二策焉。

伏揣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明爲鑒。不知明之亡，不亡於邊患，而亡於流寇，不亡於諱言和，而亡於諱言遷。夫國君死社稷，乃指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爲家，何代不有遷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昏憤紛呶，以至亡國。如早遷都江南，國尚可存。我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濊，既非明政不綱，加賦召亂者可比；一統金甌，處處完善，既無流寇之禍，僅有海邦之憂，又非明之天下糜爛，無地圖存者可比。惟以海業大開，形勢久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遷，又何所諱？宅中建極，莫若太原五臺。經累朝巡幸，供列聖御容，行營尚存，盛軌可溯，其善一；京師千里之程，十日可達，往來迅速，進止從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馬健，風氣勁強，其善四；河汾太原，表裏山川，其善五；平陽安邑，步趨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來，尤足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曾以此意條陳，未獲上達天聰，若當日早定大計，則此時八方風雨，三晉雲山，業已高屋建瓴，神京鞏石。砥方隅而鏡寰海，礪泰山而帶黃河，何至厪宵旰之焦勞，患畿疆之危偪哉？然投鼠忌器，此後方多；則亡羊補牢，及今未晚。與其以二萬萬資盜齎糧，而利歸海外；何如以二萬萬營都充帑，而利在中國。此微臣所畫一策曰遷者是也。

又揣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犯京爲慮，不知倭力果能犯京，何待今日？豈於去年京師無備之時不敢來犯，而今年於京師有備之時反敢來犯者？且倭人進兵，不外水陸兩途。由遼瀋進兵，則尚有依克唐阿、長順、裕祿、唐仁廉在。由錦州進兵，則尚有宋慶、魏光燾等在。由榆關進兵，則尚有劉坤一及余虎恩、熊鐵生諸將在。由津沽南北進

兵，則尚有王文韶、聶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內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未必盡如神鬼，豈竟不由關津經過，而飛入京師耶？我軍未必盡屬疲驍，豈竟任其飛入京師而毫無聞見耶？微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請略舉近日軍事證之，以釋朝廷疑慮之端。一曰倭人不能攻堅。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堅也。惟旅順、威海可謂之堅，然旅順之失，以守將爭逃，威海之失，以海軍不戰。且一由皮子窩，一由落風港，均係蹈瑕乘虛，抄後而入，不敢直犯當前。蓋其兵餉最重，精銳無多，護惜鋒銳，每虞傷損，肉薄攻堅，決無此事。觀於聶士成之守堅，而彼不敢犯摩天嶺；裕祿、徐慶璋之守堅，而彼不敢犯遼瀋；唐景崧、劉永福之守堅，而彼不敢犯臺灣。況畿輔爲我最堅之地，而彼敢輕於嘗試乎？此其不足慮者一。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國圖遠，糜餉勞師，多一日則多一日之糧，少一兵則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驢之技已窮，騎虎之勢難下，左支右絀，外強中乾久矣。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餉足兵多，尚以曠日持久爲憂；聶爾之倭，更何能堪？試觀其棄威海而不留，攻臺灣而即退，不能持久，亦復可知。此其不足慮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驅。考倭之軍制，皆效德國，陸操步武整齊，紀律嚴肅，誠有足多；而輻裝繁重，行走甚遲，以之持重則有餘，以之疾驅則不足。視中國之卷甲銜枚，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實有長短優劣之殊。觀於此次牛莊之戰，倭由間道甫至牛莊，曾未多時，而李光久聞警後發之兵，亦已踵至。吳大澂由田莊台退至雙台子，親軍僅數十人，距敵僅數十里，若使倭能疾驅，非但我軍唯類無遺，即甯錦亦恐相隨不守，而倭竟不能，豈獨於京師能疾馳數百里。此其不足慮者三。一曰倭人不能深入。夫以無援之軍，不繼之餉，而入最深之地，犯極厚之兵，是必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而後可。抄掠剽忽不顧其後之賊，或能爲之，而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則必用全力擲孤注，行險徼幸。而自津至通，一線長途，兩旁皆水，沿途一帶，皆有重兵。程文炳、董福祥可以抵禦於前，聶士成、曹克忠可以合圍於左右，劉坤一率領諸將可以追躡於後，彼非深入迭死而何？且彼之兵力有限，既以全力犯我，則其後路必虛，獨不畏人取朝鮮而襲廣島耶？觀其得榮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東，得海城、牛莊而不敢深入奉、錦，又何能越關津畿輔而深入京師？此其不足慮者四。又況魏光燾堅固不搖，李光久奮勇敢戰，牛莊雖敗，而殺傷倭人，亦足相當。倭見湘軍人人敢死，竟不敢再過雷池一步。諸將領之最忠勇者，一聞和議，皆痛哭堅臥，不肯起食；可見將士皆有死志，並非軍心瓦解，勢不可爲。且依克唐阿、聶士成、宋慶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九日

三二二

，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軍隊伍已到，唐仁廉一軍槍械已齊，皆可與倭一決。倭人情見勢絀，漸成弩末，我即不與之戰，而但與之堅持，再閱數時，彼力斷難支久。然後再言和議，自必易於轉圜，此又微臣所畫一策曰守者是也。

總之，以遷爲戰之地，能遷則不戰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爲戰之地，能守則不戰而已可制人之命。或遷或守，雖非上策，而不失爲中策。賠款割地，非僅下策，而實無策。伏查光緒六年，即庚辰一役，崇厚亦以頭等全權大臣使俄，與俄國定約畫押，讓地一二百里，尚非割地，且係邊外之地。經廷臣交章論劾，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立將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與俄所定之約，雖已畫押，仍行更改。俄人終亦降心俯首，就我範圍。今昔相衡，以敵言，則俄更強大於倭；以事言，則讓地尚非割地，邊地尚非內地，一二百里之地尚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鴻章之罪尙爲崇厚所無。而以定約言，則一係擅許，一係請旨，擅許者全拙，而請旨者全工。是李鴻章誤國之術與其誤國之心，較崇厚尤爲加倍。惟有仰懇皇上大威獨斷，上思列祖列宗，下念薄海臣民，照崇厚例，將李鴻章拿交刑部治罪，並撤回李經方，革職嚴辦。一面飭王文韶、劉坤一妥備戰守，獎勵裕祿、唐景崧等以安人心。一面明發諭旨，宣示中外，奉皇太后西幸，命恭親王留守京師。如戰而不勝，賠款割地，尙爲未遲。戰而屢款，猶勝於和而賠款；戰而失地，猶勝於和而割地。如其或遷或守，而致貽誤大局，請先誅微臣，以謝天下。皇上爲英主爲萬主，中國爲強國爲弱國，本朝爲大朝爲小朝，諸臣爲貞臣爲邪臣，皆視此一舉。微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祈聖鑒，謹奏。」（註六）

註一：「東華錄」，光緒朝內，頁三五六〇—三五六一。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四，頁一四四。

註三：同註二，頁一四七—一四八。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三六五，頁三三一—三四（原頁七）。

註五：「翁文恭公日記」(七)，頁七二一〇。

註六：佚名：「中日戰爭資料」頁九至十六，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九日(五月三日) 俄、德兩國政府正式拒絕日本保留金州廳要求。

先是，本月一日駐俄日使西德二郎向俄國外務部提出日本保留金州廳覺書後，二日俄國閣議，認為日本之佔領旅順口，實為和平之障礙，決議維持最初之勸告。本日由俄外務大臣羅拔諾夫（Lobanow-Rostowski）面告西德二郎，明言對日本之覺書不能滿足。同時德外交大臣馬沙爾（Baron Von Marschall）亦致電駐日德公使哥屈米德，向日本外務省表示，不滿意日本之答覆。（註一）並將此意親告駐德日使青木周藏。（註二）

英記者名政論家諾曼著論建議締結英、日同盟。

英記者名政論家諾曼（Norman）著論建議英、日同盟，謂日本所需者為英國海軍之保護，英國所需者為日本對英國在遠東之利益與以保護。（註三）

註一：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Vol. 9, Chapter 57, No. 2261.

註二：同上書 No. 2262.

註三：「字林西報」，頁六四六，一八九五年五月三日：Henry Norman, the Awakening East.

十三日（五月七日）日本聲明願放棄遼東半島。

先是，本月初十日（五月四日）經御前大臣會議，日本決定接受三國勸告，放棄遼東半島。至是，日政府正式發表聲明，並分別向德、俄、法三國致送覺書。（註一）十六日，日皇復頒詔曰：

「關於交還遼東半島褻地之一切措施，朕特命政府與清政府商訂。」（註二）預留向中國索取償金之餘地。

附錄：日本同意放棄遼東（文中所記年、月、日均為陽曆）（註三）

先是日本擬定對華議和草約之初，其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亦料及佔據遼東半島勢必引起列強之反對，故陸奧與中國外交顧問科士達（Forst John W.）談話時，曾表示日本之要求「係軍部態度所逼迫而成」。伊藤所上日皇之報告亦稱：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十三日

三二四

不論與中國媾和使節之談判成立與否？若一旦明言媾和條件，難保不招第三國之容喙干涉，或係不能免者也。至其干涉之性質如何？程度如何？雖以如何賢明之政治家，固不能豫料，尤以使他國毫不干涉，更屬不能保證。若假定此種干涉爲早晚不可免者，則觀察時機，以外交上之手段盡力操縱，固不待言。

日本議和草約提出之翌日（一八九五年四月二日），日政府以德國首先反對日本佔領中國大陸土地，特命其駐德大使青木周藏，向德國外交部有所接洽。思以承認英據舟山，俄據北滿，德據中國東南一省爲交換條件，以減少對日之阻礙。茲節錄青木與德國外交部顧問米爾堡（Von Mithlbeg）之秘密談話如下：

青木：日本將要求南滿之一部分，尤其是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在內，使其成爲直隸灣之直布羅陀。無此領土，朝鮮之獨立將祇存在於紙上。爲顧慮到中國皇帝之體面，日本現無奪取瀋陽之意；惟對於俄國地位頗感困難。俄國爲鋪設西伯利亞鐵路，向南接至波西圖海港（Posiet Harbour），已視北滿爲其所有，至於其他之事，與日本無關，俄國可直接與中國解決。

米爾堡：日本之佔領臺灣是值得及最後之時機。

青木：微笑不答。

米爾堡：舟山羣島預定給英國，並無根據。德國完全有權在華南要求一省——此種佔領要比我們所有非滿殖民地還有價值。

青木：日本已向德國陸軍大臣許論道夫（Brons Art Von Schellendorf）作同樣之暗示，並得其回答，將報告德皇作最後之決定。

馬關條約簽字後，翌日（四月十八日）日外相陸奧宗光電令其駐俄公使西德二郎、駐德公使青木周藏，分別以中日定約事通知兩國政府，拒絕泄露其內容，但表示希望與兩國保持友好關係。是時俄德法三國聯合干涉形勢已成，德外交大臣馬沙爾警告青木曰：「吾人去年拒絕干涉而對日本表示之善意，迄今尚未得到一些回答，相反日本却將吾人數月前所提之忠告置之不理，迫使德國不能不採取進一步行動。」於是西德及青木電告陸奧曰：「察知歐洲強國中必有干涉之勢」。陸奧因致電首相伊藤博文曰：

「據青木、西公使來電，歐洲各大國之強力干涉似不能免，是蓋由於最初對於歐洲各大國不言明我要求條件，彼等今日始公然得知，故得提出申明妨礙之機會。……然我政府已成騎虎之勢，雖冒如何危險，除表示維持現今地位一步不讓之決心外，無他法。」

足見日本初尚不願接受三國要求也。是時俄艦分泊中日兩國海面者凡二十九艘，計七萬三千噸，奉令限期退回本港。其東西伯利亞總督統轄之現役兵預備兵咸集中海參威，並通告當地日領事曰：「奉本國政府令，本處為接戰地區。」中國外交顧問科士達在煙台會見，當時「俄國政府在中國海域集中未曾有過之最可怕艦隊，包括十七艘軍艦，數艘水雷艇，及其他俄國海軍船隻。」「俄國為使此一示威給人更深刻印象起見，每艘船到此拋錨，便立刻進行暗灰色『出陣化裝』，並除去索具，作戰鬥準備。」一時傳聞俄國遠東艦隊準備在二十四小時內隨時可以出發作戰。」故四月二十三日三國正式提出抗議後，日本政府感到「非常驚訝與憂慮」。日首相伊藤博文記其事曰：

「若不接受，將不辭武力干涉之氣勢，於是迄今醉於戰勝而狂歡無度之國民，矜誇發揚國威國權之功，而揚揚得意之政府當局，遇此青天霹靂，突然失色，幾乎不知所措。此際若拒絕三國之忠告，必須有和彼等見諸砲火間之決心，而以我國（日本）戰後疲勞之實力，決不可能應付彼等，然而若唯唯諾諾接受其要求，則戰勝之光榮將突然消逝，對外則貽笑列國，對內則將引起國民之公憤。」

四月二十四日，日內閣在廣島舉行緊急會議，討論對策。伊藤提出三案請求討論：

一、即令遭遇新增加敵國之不幸，亦斷然拒絕俄德法之勸告。

二、招請列國會議，處理遼東半島問題。

三、接受三國勸告，將遼東半島交還中國。

經出席各大臣反覆討論後，認為第一案，由於「當時我（日）陸軍悉全國之精銳駐屯遼東半島，我（日）強力之艦隊亦悉派往澎湖島。國內海陸軍備殆已空虛，而去年來繼續長期戰鬥之我（日）軍隊人員，軍需固已皆告疲勞缺乏，令日對於三國聯合之海軍固不待言，即單與俄國艦隊抗戰，亦甚無把握。」故決定不可與第三國破裂，而招請列強會議，處理遼東半島問題。

時日外相陸奧宗光養疴舞子，曾於二十四日電告伊藤博文，建議暫對三國分別答覆，以便單獨交涉。二十五日晨伊藤自廣島來訪，大藏大臣松方、內務大臣野村，亦由京都來會，再度研商。陸奧認為若招請列國會議，各國為自身利益，勢必別生枝節，馬關條約終且破滅。為恐中國利用機會，復決定「即令對於三國最後不能完全讓步，然對於中國則一步不讓。」經日皇裁可，陸奧乃分別電令駐俄德法三國公使，分向三國政府進行交涉。以三國之干涉還遼係由俄國所領導，故特命西德二郎向俄國外部表示：「在我皇帝陛下既經批准媾和條約之今日，放棄遼東半島實為我政府至難辦理之事。」「日雖割取遼東半島，但毫不使俄國在遠東之利益受危害。至關於朝鮮獨立問題，日本政府可採取使俄國政府十分滿足之措施。」

同月二十六日西德二郎與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作長時間之辯論，羅氏則以需請示俄皇後始能有所決定。二十七日俄外交部逕答覆西德二郎曰：「俄國皇帝陛下因俄國之勸告沒有推翻之充分理由，故對日政府之請求，不能允諾。」西德遂電告陸奧曰：「俄國所提出抗議之程度不能確知，但風聞目下俄國政府已派遣運送船隻在敖得薩(Odessa)，正作派出軍隊之準備，故對俄國之干涉，覺悟問題重大庶較安全。」日本政府乃有所驚懼。

四月二十八日，西德二郎再電陸奧宗光曰：「在東洋俄德法同盟艦隊之全力當已為貴大臣所深悉，不願開戰之危險，排斥彼等之提議，果為我國之得計否？本使不能知，是蓋由戰果如何以決其得失故也。然彼我兵力比較上貴大臣若覺到底不能抵抗彼等，則如本使前電拋棄接續朝鮮之上地，了結目下難問題為得計。」因此西德二郎建議：「為圖此事之和平結局，放棄永遠佔有遼東半島，惟作償金之擔保，暫時佔領該半島，而大大增加其金額，使中國永久不能還清為上計。然目下俄國尚恐其勸告不為日本所容，法國亦恐其企圖不能貫徹，故未達最後時機前，盡禮拒絕彼之勸告亦為一策。」陸奧頗為所動。

陸奧宗光復以英國在華商業利益最大，欲離間英俄關係為日之助。四月二十五日電告駐英公使加藤，以下列覺書照會英外部：

「俄國對於滿洲東北部及朝鮮北部之覬覦，因此次俄國之干涉足可推察。日本政府關於此事，認為英國之利害與其他歐洲各國不同，在目前形勢切迫之際，日本政府能希望英國之助力至如何程度乎？」

同月二十七日英外相金姆勒雷 (Lord Kimberley) 面告加藤曰：「英國對日本雖抱友情，而俄德法三國亦係友邦，英國此時除彼此酌量以自己之決斷及責任行動外無他法。」明日再告加藤曰：「英國政府業已決定守局外中立，此次亦欲維持同一之意嚮。英國對於日本雖抱最懇篤友情，同時亦不能不考慮自國之利益，故不能應日本之提議援助日本。」於是加藤致電陸奧，稱：「英國不過於半吞半吐間謝我（日）之請求而已。」謂據德國駐英大使哈慈菲爾德 (Count Von Hatzfeldt) 相告，德國與俄國之對日政策，決不容第三國從中破壞。

當是時，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亦向駐德日使青木周藏表示，希望日本認清此次干涉遼遼之主動乃係德國，而非俄、法，以表示態度之堅決。

陸奧更以美國介成中日馬關和議，而美國在華無領土野心，曾於四月二十六日致電其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命其告美國務院曰：「遼東半島之割地，係中國讓予日本者，其條約已經日皇批准之今日，不特萬難拋棄，且日本政府不認有拋棄之必要。」同月二十九日栗野覆電曰：「美國承認於局外中立不相矛盾之範圍內與日本協力，對於媾和條約之批准，已電訓駐北京美國公使勸告中國從速實行。」陸奧認為美國之答覆，自美國之政綱而言，對日本之友誼已不為薄；惟既云「局外中立範圍內協助」，故不能望其有力相援也。

四月三十日，陸奧被迫，電命西德二卿向俄國外交部提出下列之覺書：

「日本帝國政府業已最慎重查閱俄國德國皇帝陛下，及法國特命全權公使閣下，以其本國政府名義向帝國政府所提出之覺書。日本國皇帝陛下政府，對俄國德國皇帝陛下，法國大總統政府之勸告，已熟加考慮。茲因再度表示重視兩國間所存之親密關係，故對馬關條約在已交換批准因而保全日本帝國名譽與尊嚴之後，同意以另外追加條約方式，作如下之修改：

第一、帝國政府對於放棄除金州廳外全部奉天半島之領土永久佔領權一事，應以相當之金額作為報酬，可與中國直接協議訂定之。

第二、帝國政府在中國對日本完全履行其條約上之義務前，有佔領上述土地作為擔保之權利。」

復命青木周藏、曾根俊虎以同樣覺書照會德法兩國。五月三日西德致電陸奧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十三日

三二八

「本使於本月一日向俄國政府提出我國之覺書，爲求貫徹我國之提議，曾極力加以辯論。本月三日俄國外務大臣言明對我覺書不能滿足，並云：昨日已開內閣會議。在該會議上，因日本國領有旅順口頗有障礙，故閣員一致決議主張維持最初之警告不可動搖，且告以該決議已經俄國皇帝陛下之裁可。」

關於此事，本使雖向俄國外務大臣作盡可能之努力，但仍不能使俄國政府提出另外處理本件之方案，爲本使所最感遺憾者。」

同時德外交大臣馬沙爾亦致電駐日德公使哥屈米德曰：「遼東半島之重要，端在旅順。因爲日本欲永久佔領，吾人認爲其答覆不能滿意。請即與俄法代表聯合作此一意義之聲明，並給日本一個回答期限。」馬氏並告駐德日使青木周藏曰：「德國政府欲保持日本正當之自尊，因此準備忠告中國政府，直接向日本接洽，於和約批准交換後，以一個補充協定及增加賠款爲交換條件，立刻退還遼東半島，使外表上日本之放棄將被視爲對一個戰敗者之慷慨行爲。」

五月四日日本內閣在京都舉行緊急會議，由外相陸奧宗光提議，完全接受三國勸告，放棄遼東半島之所有權，至於馬關條約之批准交換則絕不變更。經與會大臣同意，乃分命駐三國公使照會俄德法三國政府。五月九日三國駐日本公使先後至日本外務省作口頭之通知，對日本之措施表示「祝賀之意」。

五月十日日皇特頒發勅詔曰：「關於交還半島讓地之一切措置，朕特命政府與清政府商訂。」預留向中國索取償金之餘地。

初日本輿論對於割讓遼東半島有贊成與反對兩派。一般國民均熱望遼東半島之佔領，而有識之士鑒於各國情勢，則認爲政府此舉過於鹵莽。及三國干涉發生，口政府被迫接受勸告，兩派對政府措施均表不滿，一時大有舉國鼎沸之勢。六月十五日東京羣衆大會，決議多端，建議政府：（一）爲復興帝國光榮迅速擴張軍備，刷新外交。（二）對遼東半島之交還中國，請內閣究明其責任。（三）扶持朝鮮獨立，維持帝國在該國之地位勢力。陸奧宗光於事後檢討此次日本應付三國之決策曰：「此次三國干涉之突來，在中日媾和條約批准交換期日已迫之時，而政府爲一時處理對三國及中國之問題百計盡後，竟快刀斷亂麻，施彼此不使錯亂之策，對於中國全收戰勝之結果，同時使俄

德法三國干涉不至再擾亂東洋大局之治平，在我已達至能進之地，止於不能不止之處，余信不論以何人當此局面，亦決無他策」。固認為日本政府對於拒還遼東已盡其最大之努力也。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一七一—一七二；陸奧宗光「蹇蹇錄」，頁二六五。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二，頁一九。

註三：節錄李守孔：「三國干涉還遼之交涉」，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九卷第八期。

十四日（五月八日） 伍廷芳、聯芳與日本代表伊東美久治在芝罘互換和約。

本日夜十時，中日雙方代表於芝罘換約，日本退回中國代表所送：「如三國商改中、日條約時，此約仍可隨時修改」之照會。

先是，臺民聞中日和約有割臺之款，羣情悲憤，誓死反對。清廷乃命李鴻章與日本商改割臺之條文。鴻章謂：「改約適促其決裂興兵，爲大局計，不敢孟浪。」復由總理衙門商請美使田貝轉電日本政府，以俄、法、德三國與日本商改中日新約，須俟定議，十四日換約之期太近，擬展緩十數日，再行互換。（註一）李鴻章於四月初九日致電總理衙門，謂初八日夜得伊藤來電，美使代請展期約換一節，已答不能，互換之後，亦可商改云。其電曰：

「夜間接伊藤初八夜初英文電開：中國政府請暫緩批准互換和約一節，當經日本政府答以無論因何情形，互換批准，必不能緩，且因締結兩國和好，互換一節，更不容緩。並經告明如以俄法德三國請改約款爲慮，則互換之後，更易商改。向來辦法，係屬如此。日本全權大臣於限期互換之前，必到煙臺。今爲兩國有益起見，本大臣特此反復丁寧，電告貴大臣，務請將此批准條約於續展停戰限期未滿之前，即行互換，是爲主要。伊藤博文自日本西京發云。田貝想亦接覆電，昨奉庚電，知和約已奉批准。日本即不肯展緩，十四期迫，應由鴻即覆伊藤，已批准派員，如期互換，應請速派全權大臣前來。現飭留公義商輪，在津守候。計由津出沽口須一日，又一日夜至煙臺，必須十二日到煙，布置一切，以便互商互換，庶無貽誤。請代奏。」（註二）

至是，清廷知馬關條約勢必批准互換，乃於初九日旨派伍廷芳、聯芳爲換約大臣，同往煙臺換約。旨曰：

「著派二品頂戴候選道伍廷芳，前往煙臺，與日本使臣換約，俟到煙臺後，前期一日，聽候諭旨，再行互換，欽此。」

「著派三品銜升用道聯芳，與伍廷芳同往煙臺換約。欽此。」（註三）

時日方亦派內閣書記官伊東美久治爲換約全權大臣，與伍廷芳等會於煙臺。伊東於四月十三日抵煙臺，華官往接，不肯登岸，謂：「停戰換約，均於明日期滿，務須今日先行議妥，明日准十二點鐘以前互換和約，方肯登岸。」（註四）伊東當日照會山東海關監督劉含芳云：

「日本帝國欽派全權大臣伊東，爲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膺本國大皇帝簡命，蒙授以全權辦理大臣，爲互換經奉本國大皇帝批准日中兩國全權大臣於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在下之關所訂和約及另約，特派前來。既經本國政府電咨貴國政府，今於五月七日早晨行抵煙臺，應請貴道將本大臣行抵本埠轉行告明貴國政府，併求知照貴國爲互換和約及另約來此之欽差全權大臣，務請遵照約內訂期，與本大臣會晤，以便互換經奉兩國大皇帝批准之和約及另約。如何辦理之處，從速賜覆，本大臣不勝翹望之至。理合照會，請貴道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註五）

含芳接得照會後，當照覆伊東云：

「爲照覆事：案照本月十三日本監督接到貴大臣照會，知貴大臣已經行抵煙臺各等因，即經電李中堂，轉電本國政府。本國欽派全權大臣伍廷芳、聯芳，已於昨日到此，所有貴大臣行館，已經本監督飭屬預備妥當，並派員帶領先鋒輪船，往迎貴大臣登岸。至於訂期會晤各事，自應由伍、聯兩大臣與貴國大臣約訂。相應備文照覆。須至照覆者。」（註六）

伍廷芳旋電李鴻章，速請旨遵行。鴻章電詢總理衙門，答以三國勸還遼東，均請暫緩換約，已請美使田貝轉電日本政府，請將換約停戰日期，另行改訂，以期從容定議。令伍廷芳酌量函商伊東，登岸候信商辦。惟伊東不允，謂至時不換，即當回國云。十四日奉旨：謂已接三國覆信，着伍廷芳、聯芳即與日本使臣換約。十五日得伊藤電，日方允停戰展限五日，限內換約，愈速愈妙云云。而准換約之旨先到，廷芳

卒於十四日晚與伊東換約畢事。但姚錫先所著「東方兵事紀略」則持另一說法，茲錄之如下，供任參考：

「是役也，倭人已允展換約期七日（按：應爲五日之誤），而鴻章轉促之。蓋我使王之春（按：王赴俄弔喪並賀新君即位），自俄歸，道出法京巴黎，法方自憾其阻臺灣之割而不得也，之春乘機說之，以臺灣質諸法，法已許價□萬萬佛郎，其土地財貨歸法，而海關仍歸我。凡質□□年，任我贖還（是議我南洋實主之），議垂成，法人謂其猝不及接受，已自電其駐倭公使，自我諸諸倭展議約限七日，倭人亦允之。而我駐使魏照瑗偵知之，其之春之獨有其功也，遂急電鴻章，鴻章怙其棄臺灣之成議也，遽報毓汶，且急電伊藤博文，故煙臺換約亟以成，法議遂解，聞者惜之。」（註七）

換約之際，廷方面交伊東三件照會如下：

一、爲照會事：本大臣奉中國政府電飭照會貴大臣：前由頭等全權大臣李奏請換約一招，奉旨依議，該衙門知道；惟聞俄法德三國與日本商改中日新約，將來如有與此約情形不同之處，仍須隨時修改，欽此。爲此恭錄知照，請貴大臣轉達貴國政府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二、爲照會事：本大臣奉中國政府電飭照會貴大臣：前接美國田大臣覆述貴國政府云，按期互換和約，最爲緊要。如謂因俄法德三國所商改之事，若係須照辦者，互換以後，較未換之先更爲容易等語，與中國之意相同。屆時如有改易情形，自須另立專條，以資遵守。再在臺灣各色人等，萬分驚擾，勢將變亂，以後應將臺灣一事，重爲慮及，另作辦法。除已由頭等全權大臣專電達知外，特再具照會聲明，惟希貴大臣轉達貴政府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註八）

此二照會，一欲從三國之議以改約，一欲對臺灣另作商量，另一照會，則爲聲明中國已得三國知照，日本允讓遼東，中國即行準備收還也，伊東拒不收，強之携去。換約既畢，伊東於十五日拂曉登舟回國，臨行將中國照會退回，並附照會一件。其照會曰：

「爲照會事：照得現經貴大臣面交照會三件，查本大臣蒙本國大皇帝簡派，來此換約。本大臣相應遵守職分，

辦理換約之外，並不能干涉他事。因此將貴照會三件送回，請貴大臣查收可也。須至照會者。」（註九）

伍廷芳、聯芳乃亦於是日午後登輪回津，晉京銷差，並呈總理衙門一文。其文曰：

「竊職道廷芳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奉鈞署照開：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奉旨，著派二品頂戴候選道伍廷芳，前往煙臺，與日本使臣換約，俟到煙臺後，前期一日，聽候諭旨，再行互換，欽此。四月初九日奉旨，著添派三品銜升用道聯芳，與伍廷芳同往煙臺換約，欽此。除電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照開：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准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咨，換約大臣伍廷芳、聯芳，均應加全權字樣，刊給關防，屆時鈐用，相應照會貴大臣欽遵查照，計關防一顆等因，奉此，當即祇領鈐用，並電稟鈞署在案。十二日酉刻馳抵煙臺，其時日使未到，先由東海關道代備行館，因即登岸居住。十三日辰刻，日使伊東美久治，乘橫濱丸商船到煙，當遣翻譯官往謁登岸，假外國飯店爲款待之所。疊次會晤，均以從速換約爲請，並以十四日申刻爲限，過時即須開船，倘逾停戰之期，彼此開仗，各將安歸等語。職道等駁以停戰至十四夜子刻爲止，以前互換，彼此皆無不合。若申刻以後即行開船，非背約而何？日使詞阻，允俟是日夜半，並言能早爲妙。十四日申刻奉電旨：現接三國復信，著伍廷芳、聯芳即與日本使臣換約，照會二件隨約交付等因，欽此。遵於是晚亥正復往晤日使，先准該使交到奉派敕書一件，並該國主蓋寶親批筆據一件。職道等隨將奉旨批准和約及另約一本，與該國主批准和約及另約一本，逐細校對無誤，與之互換。當即訂立互換文憑，漢文東文各二分，各蓋印後，彼此各執一分，以昭信據。奉旨交照會二件，又鈞署飭備之照會一件，遵於換約時一併面交。日使以此來專爲換約，不便干預他事，堅執不收；經職道等與之辯論，總以不敢越分爲言。並云照會內之事，均已深知，必須換約後與本國所派公使商辦。職道等答以此項照會，係奉旨飭交之件，惟請代達政府，並不必在此決斷。伊意仍似十分爲難，言之再三，允暫留閱。而丑刻展輪後，仍將照會三件交由美領事署送還，並有覆文一件。該使已行，無可遞送，照會內之事，彼既深知，又有照覆，雖不收受轉達，當不能諉爲不知。以上各情，均隨時擇要電稟鈞署在案。換約事畢，職道等即於十五日申刻展輪回津，十七日叩謁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飭

令親賓所換約本等件，赴鈞署銷差。茲於二十一日行抵都門，謹將換到和約及另約一本，該使譯送該國主蓋寶親批筆據一紙，又該使奉派敕書漢文東文二紙。互換和約文憑一件，口使照覆一件，連日問答情形清摺一扣，一併恭呈鈞鑒，伏乞王爺中堂大區分別陳奏，照案辦理。所有電由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代刊關防一顆，應即一併呈繳鈞署銷燬，並懇奏請，准予銷差，實爲公便。專肅具稟，恭叩鈞安，伏乞崇鑒。」（註一〇）

由此可知當時內外諸臣交章反對聲中，清廷卒將馬關條約批准互換，係勢逼處此，良非得已。茲節錄翁同龢日記數則，以見當時清廷對換約之態度：

四月初一日：上命樞臣偕慶邸，請見皇太后，而陳和戰事，並將兩日封事十五件，一併呈遞。內監傳懿旨：「

今日偶感冒，不能見，一切請皇帝旨辦理。」旨飭劉（坤一）、王（文韶）查各軍是否堪戰。

初二日：軍機見時，傳懿旨，謂：「和戰重大，兩者皆有弊，不能斷，令樞臣會商一策以聞。」三國無回信，而言者益多，勸成者益促，噫，難矣！

初四日：召見軍機，上以和約事不能決，天顏憔悴。書齋所論，大抵皆極爲難，臣恨不能碎首以報。

初五日：聞東朝（指慈禧）猶持前說，而指有所歸。

初六日：見起二刻，亦無所可否。命往恭親王邸會商，令定和戰之議。同李公（鴻藻）詣恭王府，同人先後集，邸（指奕訢）疾漸起。孫君（毓汶）以所擬宣示稿就正，邸以爲是。宣示者，俟批准後告羣臣之詞也。大意已偏在和字。未正赴總理衙門，緣科士達（隨鴻章至馬關之洋員）欲見慶邸及李、孫二公及余，故特晤之。科先敘李相（鴻章）之忠，次言國政，首練兵，改西法，次造鐵路，次賦稅。其言反覆悚切，謂：「果實力變更，十年後中國無敵，若因循不改，不可問矣！」未言約宜批准，如是而去。

初七日：孫所擬件，上斥其「奉養有闕，不能稍展微忱」句，又臺灣一段俱刪。劉（坤一）雖電復可戰，而同列頗摘其一二活字，謂非真有把握也。

初八日：（是日批准和約）恭邸力疾銷假，晨入見。北洋報：初四五大津大風雨。初五寅卯海嘯，新河上下各營被沖，水深四五尺，淹斃甚多，計六十餘營被其害。北自秦王島，南至埕子口，皆然。此時值此奇變，豈

非天哉！見起三刻，上意幡然有批准之諭。臣對以三國若有電來，何以處之？上曰：『須加數語於批後，爲將來地步。』於是戰慄哽咽承旨而退。書齋入侍，君臣相顧揮涕，此何景象耶！退擬批，與孫力爭。初九日：聞昨日喀使（俄使喀西尼）致書小雲（徐用儀字），阻用寶批准。今月慶、孫、徐三人往見施使（法使施阿蘭），問之，而仍請今日用寶發下，意恐誤事也。見起二刻，諭旨添派聯芳偕伍廷芳送約。蓋喀謂伍習於倭，而特舉聯以詰也。此未奏明。

十一日：許（駐俄公使許景澄）電，仍無確信，悶極急極。南洋張公（之洞）多奇策，而未盡可用，如何？如何？十二日：見許電，倭覆俄，允還遼。余創議乘此與日本照會，將換約展期。孫、徐堅不可，至於攘袂。見起三刻餘，書房一刻餘，頗有所陳說，退而定隨約照會兩件。

十三日：余力言發電告日本，展期換約，與同列爭論，聲徹戶外。又爭於上前，乃定議。

十四日：徐君（用儀）持德使紳珂函來，謂：『不換約，則德國即不能幫，余笑置之。已而，許景澄電至，謂旅順亦肯還。至換約一節，俄外務云：『已經明告，則中國換約大臣自能辦理。』固未嘗僅令換約也，而同人轟然，謂：『各國均勸換，苦不換，則兵禍立至。』而敬子齋（敬信）特見恭邸，絮語刻餘，恭邸亦爲之動，余力爭不同。見起，則上亦即刻電伍廷芳，如期換約。因令慶王孫、徐先退。余奏：『昨日俄使請已正見總署大臣，此當聽其回信。』三人者謂：『即赴俄館，若俄使語與許電同，當即將電旨譯發；若有違異，則再請旨。』忽忽而去。退後忽思，允讓全遼，三國雖告中國，中國未嘗與日本言明；設換約後，各國瓜分此地，奈何？告恭邸，當以此節飭伍廷芳等備照會聲明。邸不肯。退又致書萊山（孫毓汶字），不答。在督辦處見邸，又力言之，乃肯作札，令總辦回堂速辦；亦未知總署肯發此電否也。覆水難收，聚鐵鑄錯，窮天地不塞此恨矣！（註一一）

此電旨既發，馬關條約遂換。十七日清廷明發硃諭，宣示批准和約之苦衷，此等於清廷之罪已詔也，爲國恥史中之沈痛文字，吾人宜熟讀而深思之也！原諭曰：

「近日和約定議以後，廷臣交章論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行廢約決戰，以期維繫人心，支撐危局。其

言固皆發於忠憤，而於朕辦理此事，兼權審處，萬不獲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徵兵調餉，不遺餘力；而將非宿選，兵非素練，紛紜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陸交綏，戰無一勝。至今日關內外情勢更迫，北則竟逼遼瀋，南則直進京畿，皆現前意中事。陪都爲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二十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一朝徒御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加以天心示警，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衝沒，戰守更難措手。是用宵旰傍徨，臨朝痛哭，將一和一戰，兩害熟權，而後幡然定計。其萬分爲難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及詳，而天下臣民皆應共諒者也。茲批准定約，特將前後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毋存懈怠，毋驚空名，毋忽遠圖，毋沿故習，務期事事覈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內
外臣工，有厚望焉！」（註一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四，頁一五二。

註二：「東華錄」，光緒朝四，頁二五六五。

註三：同註一，頁一五二。

註四：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頁二六四。

註五：王炳耀：「甲午中日戰輯」，頁二三九。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四，頁二六四—二六五。

註八：同註一，頁一六七。

註九：同註一。

註一〇：同註一，頁一七三。

註一一：「翁文恭公日記」四，頁七二〇—四一七—二一六。

註一二：「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六六，頁三三二〇（原頁三一四）。

二十一日（五月十五日） 清廷舉行乙未正科殿試於北京保和殿。

此次殿試爲清代第一百九次殿試，前一日，旨派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徐桐，刑部尚書薛允升，吏部右侍郎廖壽恒，戶部右侍郎陳學棻，禮部右侍郎李文田，兵部右侍郎徐樹銘，工部左侍郎汪鳴鑾，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壽耆爲讀卷官。制曰：

朕寅紹丕基，俯臨寰宇，仰荷昊穹垂佑，列聖謨謀，夙夜孜孜，於今二十有一年矣。惟是時事多艱，人才孔亟，期與海內賢能，力矢自強，單心圖治，上無負慈闈之訓迪，下克措四海於乂安，若涉淵冰，實深祇懼。茲當臨軒策問，用集多士，冀獲嘉謨。兵所以威天下，亦所以安天下，然非勤加訓練，則無以制勝。漢法曰都肄，唐法曰講武，宋法曰大閱，果不失蒐苗獵狩遺意歟？孫子練士，吳子治軍，李靖之問對，所詳手法足法，明王驥、戚繼光所論練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備舉之歟？至於究極精微，諳求韜略，若淮南子兵略訓、杜牧戰論、蘇軾訓兵旅策，見諸施行，果能確有成效否？國用必有會計，禹巡狩會諸侯之計，其說何微？周禮小宰，歲終令羣吏敘事，鄭注若今上計，司會逆羣吏之治，聽其會計，有引伸鄭注，受而鉤考，可知得失多少，見於何書？漢初專命一人領郡國上計，膺選何人？武帝遣使詣京師上計簿，帝都方岳，試悉數之。光武遣吏上計，但言屬郡，不言遠方。唐初猶上計，廢於何時？宋時天下財賦，皆上三司，後選吏專贍文帳，議始何人？會計錄前後凡幾？明代會計，何人編錄？自洪武以來，通爲一書者何人。能計述歟？自古求治之主，每以躬行節儉爲天下先，然覈其心迹，誠僞不同。堯之土階、舜之土簋、禹之惡衣、文之卑服，尙已！漢文帝衣綈履革，蒲席革帶，屏雕文之飾，成富庶之業，享世久長，治猶近古。後世人君，焚覆裘、毀筒布、却珠貢，甚至一冠三載，一衣屢澣，非不慎乃儉德，而究不能廣聲教於寰區，希治功於隆古，豈徒儉不足以爲政歟？抑豈務其名而未求其實歟？夫國奢則示之儉，國儉則示之禮，今欲崇本抑末，易俗移風，士庶無踰制之嫌，閭閻有藏富之實，果何道以致之？民生以農事爲本，農事以水利爲先，周命遂人，齊立水官，秦治涇水，漢穿渭渠，經畫詳至，史冊可徵。自後或修芍陂茹陂，或開利民溫潤，或決三輔，或引滹沱，其經時久暫，因革異宜，試爲條例。虞集請興北方農田，自遼海以迄青齊，因何不行？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

利，可設農師佃種，其法若何？徐有貞所陳路河等處水利，左光斗諸復天津屯田，申用懋請疏濬河諸水，言皆切要，能詳舉之歟？凡此皆宰世之宏綱，濟時之實政也。朕以藐躬膺祖宗付託之重，宵旰憂勤，惟思仰慰慈懷，撫綏兆姓，天人合應，景運常新。爾多士來自田間，夙懷忠諫，其各直言無隱，朕將親覽焉。」（註一）

臺灣紳民留請唐景崧、劉永福主臺。

先是四月十六日（五月十日）清廷旨電唐景崧，謂法國有保臺之意，已派四船由西貢裝煤起程，由景崧出示曉諭全臺軍民，臺灣紳民知法不可恃，本日堅留景崧、劉永福主臺事。二十二日景崧電總署曰：「臺民知法不可恃，願死守危區，爲南洋屏蔽。堅留景崧與劉永福，經反覆開導，再三辭拒，無如衆議甚堅，臣等雖欲求死而不得。至臺能守與否？亦惟盡人力以待轉機。此乃臺民不服屬倭，權能自主，其拒倭與中國無涉。懇旨飭下總署，商倭外部，彼員從緩來臺，則臺與倭尙可從容與議；若即以武相臨，不過兵連禍結，彼斷難馴致全臺。以上各節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請代奏。」（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六六，頁三三三二（原頁七一八）。

註二：俞明震：「臺灣八日記」，引自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三二〇。

二十三日（五月十七日） 日本拘捕所有反日之朝鮮官員，西報譏評日以東方傳統方式統治朝鮮。

日本拘捕所有反日之朝鮮官員，西報論：「日本效法西方自強，而于朝鮮則用東方之武力傳統以統治，不完全尊重朝鮮之自由與獨立，誠所謂東方人與東方人在一起，便相忌不相下」。（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七三三，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九日。

二十四日（五月十八日） 清廷命李經方赴臺灣辦理交割事宜。

清廷派李鴻章之子經方爲割臺灣使，輔以美人福世德，日方以樺山資紀爲臺灣總督，赴臺灣接收。經方於五月七日離上海南下，九日抵臺灣淡水，改乘日艦千代田號至基隆，初十日與樺山議於日艦西京

丸上，簽立交接臺灣文據。(註一)

附錄：姚錫光撰「臺灣篇」(節錄)(註二)

光緒乙酉，中法和議成，建臺灣行省，升淡水廳爲臺北府，作會城，駐巡撫，經營鐵路、商輪、屯墾、開煤礦諸礦，歲入三百數十萬，菁華咸萃臺北；以基隆、滬尾爲臺北門戶，基隆澳設礮臺四，首社寮，次頂石角，次小基隆，次仙人洞；又築陸路礮臺於獅球嶺，以扼基隆、臺北之衝。滬尾礮臺二，曰滬尾，曰關渡。(關渡在滬尾口內十三四里，爲臺北、滬尾水程要路。)基隆值省會東北，山海依倚，最據形勢，商輪、礦務諸局在焉。鐵道六十里至會城，山嶺複沓，迴環拱衛。滬尾值省會北稍西四十里，內港直達臺北，緣港皆坦途，無阻隘。循滬尾稍西而南，爲臺中，再南爲臺南，並沿海岸，港口紛岐，不可枚舉。惟臺南府之安平口(即鹿耳門)有礮臺三，再南打狗港，有礮臺一，打狗港北岸之旗后，有礮臺一。建省之始，經營締造，則巡撫劉銘傳。銘傳宿將，所部淮軍，從駐臺者四十餘營。繼之者邵友濂。友濂撫臺，屢遣撤，存者僅二十餘營。二十年六月倭釁起，海疆戒嚴，臺灣懸海外，爲東南洋屏蔽。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率師渡守。友濂又調南洋之南琛、威靖兩兵輪往護海面，六月十二日抵臺(威靖於甲午九月仍回南洋)。七月，永福率廣勇兩營至臺北，增募六營，成八營，仍稱黑旗。八月，岐珍統所部十營亦至。兵稍集，乃令提督張兆連率十三營守基隆，以扼社寮、頂石角、小基隆礮臺。臺紳道員林朝棟統十營守獅球嶺，築獅球嶺礮臺。提督李本清統所部七營守滬尾。本清固駐中路新竹，而知府朱上泮固駐滬尾，至是移上泮守中路。未幾本清與藩司唐景崧交惡，本清求去，乃以提督蔡高會守滬尾。八月，復以提督廖得勝易高會。特兩月間，滬尾凡三易將。又改令上泮往澎湖偕總兵周鎮邦以守，而以臺紳主事邱逢甲率上勇守彰化、新竹。兵冗將新，人和地利皆失，固窳敝不任戰。友濂旋聞援高諸將，敗潰入邊，鳳凰、九連諸城相繼不守，慮兵禍將及臺灣，大懼，徘徊思去，政府亦諒之。十月，調湖南巡撫，以藩司唐景崧署臺撫。(電諭唐景崧既經署理巡撫，責成甚重，並著與楊岐珍、劉永福妥爲商辦，不得剛愎自用，自以爲足，倘與僚屬動輒齟齬，遺誤事機，恐該署撫不能當此重咎也。)景崧電調刑部主事龔明震(事在甲午十一月)、副將陳季同(事在乙未二月)，禮部主事李秉瑞亦至臺，求自効。(事在乙未三月)三人先後至，二十一年正月，景崧令副將黃義德、督弁吳國華，挈銀二

十萬兩內渡，至廣東募勇。義德粵人，吳國華者，本粵洋盜，知縣唐鏡沅介諸景崧，謂其大俠知兵；景崧昵之。二月，廣勇陸續至，喧擾無紀律，不可統馭。臺灣兵事益壞。初景崧以道員，與永福同軍事於粵西，（永福歸中國乃景崧說之）後積不相能，至是移永福軍於臺南，會臺南鎮總兵萬國不受南路。景崧自任守臺北，自張兆連一軍以外，專倚廣勇。命知縣胡友勝（廣西人）統廣勇守獅球嶺，而移林朝棟（所部皆臺灣土勇）守中路彰化。其南路則責成劉永福云。（是爲三路分守之議）二月二十七日辰刻，倭兵船攻澎湖我媽祖宮礮臺。擊之，傷其兩艘。蓋倭人將於澎湖之文良港（即龍門港）登岸，而先攻媽祖宮礮臺以牽綴我師。統領知府朱上泮等不察，乃電臺灣告捷。景崧立保上泮道員，並以銀二萬兩犒軍。是日澎湖兵弁方爭賞銀，倭已從文良港登岸，我兵不能支。二十八日已刻，澎湖至臺灣電線斷。二十九日辰刻，倭遂入澎湖城。澎湖既失，臺勢益孤，而廣閩蘇浙海道中梗。於是中國凡購外洋軍械，盡截於倭，委輸將斷，而和議益亟矣。上泮、鎮邦逃歸臺灣，（由鹿港登岸）上泮以受傷犯罪，鎮邦得嚴議（尋解福建）。三月，李文奎擊殺中軍方副將於巡撫署，撫署大亂。李文奎者，原直隸保定游匪，從淮軍渡臺，得保外委，充撫轅親兵。時方副將爲武巡捕，文奎犯禁令責革，乃轉事中軍副將黃翼德，充什長。是歲正月，翼德募勇往廣東。以方副將署中軍副將。文奎又以事責革去，遂思亂，其黨布城中及撫署內外。三月二十五日午後，景崧之堵余姓者內渡，令勇丁昇其裝出撫署。將入船，文奎率黨十餘人，持刀劫於道。勇丁逃，文奎令其黨安置掠物關帝廟，而自追勇丁，直入撫署門。方副將自出喝曰：「汝欲反耶？」文奎徑欲其頭。方副將抱頭反奔，入門已踏。中軍護勇，時屯署內，將應文奎，爭出棚放排槍，蓋以爲號也。幫帶某，見事急，自閉營門，並閉撫署門。景崧聞變，不知顛末，先遣差官出詢，甫及儀門，已中刀返奔。文奎從黨追及堂廡，將入殺景崧，時已黃綢帕首矣。適景崧盛服出，遇於堂廡，其徒猝見巡撫，矜持手不能下，謬請安侍立，云：「無事無事」。景崧獎以有膽，命出爲周旋。臺灣知府管元善聞變，奔告楊岐珍。岐珍率一營至，喝開撫署門，與亂黨對施槍礮（勇在門外賊在門內），中傷百姓甚夥，死者十餘人（景崧給死者每人百金）。先是景崧聞文奎徒黨衆，將令充營官以安之，令募緝捕一營，至是卒用文奎，命屯基隆，而方副將之死，僅以一捕賊示了之。於是將領離心，而健兒不可約束矣。四月，景崧分遷尾七營爲兩部，以廖得勝、蔡高會分統，而高會專統礮臺。方鴻章之東渡言款也，停戰之約，載明北洋，而南洋不與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三四〇

焉。意圖專屬臺灣，亦旋有棄臺灣之論。時臺灣舉人方以會試在都，上書力爭，留中不報。三月，棄臺信益急，臺人惶懼，主事邱逢甲首建自主議，登壇誓衆於新竹，出示告臺民，遂議立民主，開議院，製國旗。四月，和議成，卒棄臺灣。朝命率兵民內渡。臺人乃有伺各國保護之議，電告政府。政府諭以既能自立，無庸奏請。十八日，陳季同介法國水師提督見景崧。議保護臺灣，亦卒無成說。二十二日，景崧令臺中官弁以五月初四日爲斷，欲去者聽，留者錄用，薪銀倍給，踰時求去者以軍法論。於是省會道府縣官相繼納印去，提督楊岐珍亦內渡（俱在五月）。斯時臺灣藩庫，尚儲銀四十餘萬（三月間臺灣曾兌銀四十萬至上海，初次二十二萬，二次十八萬，皆善後局提調任某手兌，不知何用。），火藥庫儲砲藥土藥共四萬餘磅，各砲臺儲藥尙資每砲擊三十出，槍彈存者尤多，毛瑟槍彈尙儲二百八十餘萬顆，他子稱是。其訂購械藥未至者，德國大田廠砲藥（合同渾言砲藥未指何名）二十萬磅，槍藥五萬磅，哈乞開司一百磅，快砲（合同內不言砲架）四尊，皆已給價三分之一（後快砲運送南洋，槍砲藥不知究竟）。

註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四，議款篇，頁四一。

註二：同註一，卷五，臺灣篇，頁一一六。

二十五日（五月十九日） 清廷乙未正科殿試放榜（傳臚），錄取進士二百八十二人，駱成驤得中狀元，康有為亦於是科得中進士。

本日授一甲三人駱成驤爲翰林院修撰，喻長霖、王龍文爲編修，賜進士及第。二甲蕭榮爵等一百人賜進士出身，三甲文同書等一百七十九人，賜同進士出身。閏十五日（五月十日），引見新科進士，除一甲駱成驤、喻長霖、王龍文等業經授職外，其餘名單如下：

蕭榮爵、吳緯炳、傅維森、曹汝麟、林開春、雷鎮華、張繼良、齊繼琳、趙炳麟、劉嘉琛、趙增琦、潘齡皋、李瑞清、劉燕翼、葉清棠、彭樹華、陳耕、胡思敬、談國楨、羅長綺、謝馨、朱永觀、劉汝驥、何莘耕、陳望林、聶廷祐、吳鈞、蕭之保、興廉、尹慶寧、戴展誠、徐福田、葛毓芝、成連增、龔心釗、李喻芬、于疏枚、趙鶴齡、胡峻、歐家廉、文林、金鉞、錫嘏、廖基鈺、世榮、胡嗣芬、趙獻鴻、萬本端、李景驥、張世培、雷以勳、林玉銘

、陳恩榮、陳翰聲、章華、余炳文、泰錫圭、江蘊琛、李之釗、石長信、李于鎔、楊錫霖、何業健、謝遠涵、沈同芳、羅經權、林清照、錫鐸、顧祖彭，俱著改爲翰林院庶吉士；卓孝復、劉雲衢、郭燦、許受衡、袁緒欽、秦望瀾、王焯、李長華、孫榮枝、李最高、謝榮熙、康有爲、李國材、吳命新、徐孝豐、寸開泰、呂傳愷、趙世德、趙廷珍、傅蘭泰、汪世杰、王廼繁、張謙、劉明華、王荃善、李增芳、陶榮、孫紹棠、顧壽椿、豐和、吳鴻森、舒鴻儀、汪贊綸、楊惠元、馬汝驥、文同書、張堯榮、魏元曠、陳恩洽、范國良、曲江宴、邢維經、黃維翰、顧光照、葛亮維、金鏡芙、白嘉澍、高祖培、王桐蔭、李步沆、潤芳、蕭架、黃樹榮、慶隆、李若堃、曠子椿、周沅、劉嘉斌、高崧生、蕭樹昇、姚晉埏、榮春暉、呂篤、何重熙、貢士元、王璽臣、張鑑、周之麟、廖鳴韶、王德懋、譚廷颺、謝元洪、景澧、張翰光、王鳳文、徐信善、葉祖修、曹葆珣、迎晉、朱珩、韋錦恩、呂正斯、繼曾、呂咸熙、郭景象、汪春榜、林灝深、魏倬、侯晉康、王伊、劉鎰、雷光甸、劉彤光、海明，俱著分部學習；吳鈺、吳建讓、曹元弼、任錫純、黃秉維、劉蓉第、致善、王恕、梁士選、王寶田、孫秉衡、朱應杓、秦絳卿，俱著以內閣中書用；安文瀾、黃瑞蘭、劉慶祺、曹邦彥、周鳳鳴、方朝治、曹甦孫、黎敬先、劉廷珍、鄭宗卹、李景祥、王繩武、董觀瀛、崔登瀛、彭錫蕃、崔保齡、李樂善、趙家慧、邱炳宣、都守仁、朱遠綬、劉德全、林朝圻、桂福、王從禮、潘宜經、瑞徵、張仲儒、恆善、李發宜、李慶霖、鄒增祐、張存諧、林振光、高如恂、朱遠緒、豫成、劉輝、陳侃、韓克敬、楊瑞鱣、陳楨、楊雲卿、愛興阿、黃葆初、楊道鈞、劉興東、胡鑑瑩、張鳳臺、張致安、何榮烈、孔慶堉、戴光、姜良材、邢驥、馬如鑑、周丙榮、凌洪才、藍鏞、楊書勳、張錫鴻、楊允文、林宗奇、王桂枝、黃世澤、張庚銘、高喧陽、陳繼洋、秦獻祥、王樹人、陳逢源、劉國良、張之銳、李體仁、米植、張志軒、王志昂、張叔蘭、余際春、王曜南、鮑俊卿、邊三益、詹愷、胡調元、丁良佐、呂繼統、周捷三、張受中、趙炳麟、陳展、石長祐、陳永昌、石寅恭、林向滋、文俊、吳江濤、陳樸、張樸、德銳，俱著交吏部掣籤分發各省，以知縣即用；內閣中書沈桐，著仍以內閣中書用；吏部候補主事姚炳熊，戶部候補主事凌福彭，均著以主事即用；候選員外郎寶銘，著仍以員外郎歸原班選用，餘著歸班銓選。（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出，卷三六七，頁三三三—三三五（原頁十二—十四）。

五月

一日（五月二十四日）臺灣紳民將上總統印章於唐景崧，以倭艦來犯，未果。

先是，清廷於上月二十六日曾詔將景崧開缺，召文武各官內渡，以示臺灣已與清政府無關。至是臺灣紳民決定自立爲民主國，劉永福亦願與臺共存亡。本日，原擬上總統印章於景崧，以倭艦來犯，未果。姚錫光記其事曰：

「五月一日，臺灣紳民將上總統印章於景崧，以倭艦來犯，未果。是日，倭兵輪二艘駛近滬尾礮臺（正當我礮彈能及處）下碇時，適統領慕高會去臺以嬉，其文案電告景崧。於時有倭弁下小輪船入口，至英兵輪（有英德兵輪先泊口內）約刻許，旋下輪出口，其大兵輪二，遂亦起碇行。是時景崧電至，令取準開礮。高會亦回營，方據案食，徐令往告臺官曰：「撫臺命放礮」。而倭船已駛，非我戮力所及矣。是夜倭艦即口外游弋，倭弁之至英兵輪也，蓋詢臺中消息。英船主告以臺灣自立事，倭艦乃亟去。」（註一）

註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六。

二日（五月二十五日）臺灣宣佈「獨立」，巡撫唐景崧被推為「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建元「永清」，以示永屬中國。

本日，「臺灣民主國」宣佈成立，唐景崧被推爲總統、劉永福爲民主將軍、丘逢甲爲義勇統領（團練使）、陳季同爲外務大臣、俞明震爲內務大臣、李秉瑞爲軍務大臣、林維源爲議院院長。

先是，煙臺換約後，清廷於四月二十六日，寄電旨曰：

「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景崧，著即開缺，來京陛見，其臺省大小文武各員，並著唐景崧飭令陸續內渡，欽此。」（註一）

臺民知望已絕，乃決自立爲民主之國，遂於本日，蜂擁集於撫署，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綬暨監地黃

虎國旗於景崧。印章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旗藍地黃虎，長方，虎首內向，尾高首下。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謝罪，北面受任，大哭而入，於是臺灣自立，建元「永清」，以擴署爲總統府，改臺灣藩司衙門曰內務部，設內務大臣。籌防局曰外部，設外部大臣。別立軍部，設軍部大臣。府縣等官改署有差。而砲臺升虎旗，鳴砲二十一響以爲慶。是日景崧電總理衙門曰：

「四月二十六日奉電旨，令臣景崧欽遵開缺，應即起程進京陛見。惟臣先行，民斷不容，各官亦無一保全；只可臣暫留此，先令各官陸續內渡，臣當相機自處。臺民前望轉機，未敢妄動，今已絕望，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於五月初二日集衙署，捧送印旗前來，印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旗爲藍地黃虎，強臣暫留，保民理事，臣堅辭不獲。伏思倭人不日到臺，臺民必拒；若砲臺仍用龍旗開仗，恐爲倭人藉口，牽涉中國。不得已允暫視事，將旗發給各砲臺暫換，印暫收存，專爲交涉各國之用。一俟布告各國，並商結外援，嗣後臺灣總統均由民舉，遵奉正朔，遙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脫身，即奔赴宮門，府稟請罪，味死上聞，請代奏。」（註二）

同時，通電各省大吏曰：

「日本索割臺灣，臺民不服，屢經電奏，不允割讓，未能挽回，臺民忠義，誓不服倭。崧奉旨內渡，甫在摒擋之際，忽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至撫署，文曰：『臺灣民主總統之印』，旗藍地黃虎。不得已允暫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朔，遙作屏藩，商結外援，以圖善後，事起倉卒，迫不自由，已電奏並佈告各國。能否持久，尙難預料，惟望憫而助之。景崧。」（註三）

同日，出示曉諭全省人民曰：

「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爲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費之外，復索臺灣一島，臺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署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改約，全臺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以爲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二十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月二十七日相率環顧，五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地黃虎，捧送前來。竊見衆志已堅，羣情難拂，不

得已爲保民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卽口議定改臺灣爲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卽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是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須自立爲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照常嚴備，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名號聚衆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罪。從此臺灣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輪，次第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臺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臺知之。永清元年五月二日。」（註四）

復檄告內外曰：

「竊我臺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乃上年日本肇釁，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口，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卹電奏迭爭，並請代臺紳民兩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不平，爭者甚衆，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英泥局外之例，置之不理。又求唐撫卹電奏，懇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強，臺民亦願全和局，與以利益。惟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衆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才異能，暫快東渡，佐創世界，共立勳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來不能不借資內地。不日卽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臺民不幸至此，義憤之倫，諒必慨爲扶助，洩數天之恨，救孤島之危。並再布告海外各國，如有認臺灣自主，公同衛助，所有臺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霑利益。考公法，讓地爲紳士不允，其約遂廢，海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念鄉誼，富者挾貲渡臺，臺能庇之，絕不欺凌；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生，兼同洩忿。此非臺民無理倔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爲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田里，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搥胸泣血，萬衆一心，誓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

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特此布告中外知之。」（註五）

鎮守臺南之幫辦軍務劉永福，亦於是日布告南部人民曰：

「爲開誠布公激勵軍民共守危疆事：照得倭寇要盟，全臺竟割，此誠亘古變異，爲人所不忍聞，所不忍見，更何怪我臺民髮指皆裂，誓與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詔，而爲自主之國。本幫辦則以越南爲鑒，迄今思之，無日不撫膺痛哭，追悔無窮。不料防守臺民，未嘗建樹，離奇百變，意見兩端。何以天無厭亂之心，而使民遭非常之劫？自閩年將六十，萬死不辭，獨不思蒼生無罪，行將夏變爲夷乎？嗟乎！積怨同深，自可挽回造化；厚德載福，諒能默轉氣機。願合衆志成城，執挺勝敵；在我堅心似石，棄職以爲，所有旗後鳳恒地方，業經布置，倭如有志，任往試之。刻順輿情，移住南郡。查安平海口，天險生成，此外要隘，多可補其罅漏。惟軍民共守，氣味最貴相投；淮楚同仇，援助豈容稍異？本幫辦亦猶人也，無尺寸長，有忠義氣；任勞任怨，無詐無虞。短顧人攻，將弁不妨面告；事如未洽，紳民急宜指陳。切莫以頗有虛聲，便爲足恃；更莫因稍尊官制，遇事推崇。從此有濟時艱，庶可稍舒衆望。若因力微畏怯，語不由衷，在上天斷不佑予；若因餉絀吝籌，頗爲撓阻，本幫辦亦難恕爾。總之，如何戰事，一擔肩膺，凡有軍需，紳民力任。誓師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慘淡經營，何難徐銷倭氛？合應剴切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須知同心戮力，自可轉危爲安；逆變通權，無用專拘小節。不以斯言爲河漢，仰各凜遵而無違！」（註六）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側卷一二，頁十八。

註二：同註一，卷一一三，頁三。

註三：蔡爾康：「中東戰紀本末」卷四，頁五九。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三，頁六〇。

三日（五月二十六日） 福建提督楊岐珍撤兵內渡，於是前敵兵備益單。

先是，日昨，日海軍少將東鄉平八郎率浪速、高千穗二艦偵察淡水港口；將入港，我滬尾礮臺擊之

，乃去基隆海面。本日，日近衛師團長北白川率軍乘艦次琉球中城灣。岐珍兵內渡後，基隆防兵僅紹良所部及土勇四營，其東路三貂嶺、澳底諸處，無兵駐守。景崧乃令提督張兆連布置基隆至澳底水雷。

(註一) 連橫曾述當時全臺之兵備及餉糈曰：

「當是時全臺之兵，土客新舊爲數三百數十營，每營三百六十人。景崧既駐臺北，以逢甲率所部戍附近，備策應，提督張兆連駐基隆，總兵陳永隆駐滬尾，道員林朝棟率練軍駐臺中，幫辦防務總兵劉永福駐臺南，別設團練籌防兩局，以紳士理之。以同知黎景嵩爲臺灣知府，俞鴻爲臺北知府，溫培華爲埔里社通判，史濟道知臺灣縣，羅樹勛知彰化，羅汝澤知雲林，李烜知苗栗，凌汝曾知淡水，王國瑞知新竹，盧白鏐知鳳山，孫育萬知嘉義，歐陽奎知恒春。又以代理安平知縣忠滿兼護府道之印。惟臺東直隸州胡傳、南雅同知宋維釗仍舊。餘悉先去矣。全臺歲入正雜各項，計銀三百七十餘萬兩，而藩庫尙存六十餘萬兩。然自軍興以來，精餉浩大，旋奉部撥五十萬兩，南洋大臣張之洞奏請續撥一百萬兩，劃交駐滬撥臺轉運局，以資接濟，猶恐不足用，林維源首捐一百萬兩，愚借民間公款二十萬兩，而富商巨室傾資助軍者，爲數亦多。蒼頭特起，各備餉械，於是花翎侍衛許肇清起於鹿港，附生吳湯興起於苗栗，徐驤、姜紹祖起於新竹，簡精華起於雲林，所部或千人，或數百人，皆鄉里子弟，慙不畏死者，而粵人吳國華、龐大斌各致其黨，分乘小艇入援，部署甫定，而日軍至矣。」(註二)

註一：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七；「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六。

註二：連橫：「臺灣通史」卷四，獨立紀，頁七〇。

六日(五月二十九日) 日軍近衛師團於臺灣基隆東方之澳底開始登陸。

本日，日軍近衛師團第一旅團長川村景明潛由澳底登陸，總兵曾喜照戍此，不戰而潰。(註一) 姚

錫光敘其經過曰：

「初五日，倭兵輪、運輪二十九艘駛抵臺北海面，分泊基隆口外，澳底、金包里，沿八里坌、大姑坎，迤邐至滬尾，凡可登岸之處，皆有倭輪。初六日，倭兵輪僱力擊我金包里(恒基隆澳西岸)，張聲勢，作欲登狀，以綴我，(我師駐金包里者六營)而潛結敵匪、挖金砂匪、從澳底登岸。澳底本駐有岐珍防營，至是撤兵去，易以曾喜照

(張兆連部分統)。喜照新募土勇兩營，成軍甫三日，遇敵不戰潰。澳底值基隆東稍北當八斗澳西岸，煤廠金沙諸廠環其後。蓋基隆一澳，如獅之張口，仰向西北。澳西爲金包尾，澳東爲平波島(島南與社寮隔一港)。平波島如獅額，其頂爲全臺極東北角。循額而東、折而南，作海灣曰八尺門灣，再循海而南，曰八斗澳。再南迤東曰劈島角(原名鼻頭)，再南迤西至蘇澳，則臺灣全島之東岸矣。八斗澳南隅曰澳底，西去基隆五十里，路崎嶇，中隔三貂嶺。過嶺分大小兩道，大道通瑞芳達基隆，小道則通吳朱埤暖暖街，達八堵，已繞及獅球嶺後(獅球嶺爲臺北省會屏障，光緒十年劉銘傳據此守基隆，拒法人，臺灣卒全。)此由澳底西行山道，若循海岸行，則過庚子寮，踰九芬山，即抵社寮礮臺。於時登岸倭兵才二千人，若以兵嚴扼三貂嶺，可聚而殲也。乃三貂無一兵，瑞芳九芬防兵，亦單薄不足當大敵。倭人留兵稍守澳底，其全隊邊循山路進。」(註二)

註一：連橫：「臺灣通史」，卷四，獨立紀，頁七〇。

註二：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七——八。

七日(五月三十日) 謝纘泰書致清德宗之「公開的函件」一文，發表於香港德臣西報、士蔑西報，及新加坡遠東各報。(註一)

按：謝纘泰字聖安，粵之開平縣人。其父日生爲澳洲著名僑商，屬洪門會籍。時以滿虜吞滅華夏之歷史，訓迪其子纘泰、纘葉二人。故纘泰幼承家訓，恆以繼承先志爲務。聞楊衢雲有志反清，遂與訂交。輔仁文社之成立，端賴其力。及乙未春間，孫先生文自檀島返香港，欲聯絡各地同志，結合新團體，以經營粵事，知楊、謝等有輔仁文社之設，因與商議組黨大計。楊、謝亦以勢力薄弱，非新開途徑，無以伸張勢力，遂欣然從之。於是兩派合併，而有本年春擴大興中會組織之舉，而奠定本年九月廣州之役之基礎。(註二)

註一：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九。該書爲英文本，黨史會藏有該書，可能爲國內孤本。

註二：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六。

九日(六月一日) 日軍陷臺灣瑞芳。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七、九日

先是，前日（七日）日軍陷頂雙溪、三貂大嶺。景崧聞警，急調新募廣勇分赴三貂嶺、基隆增防，派全臺營務處內務督辦大臣俞明震至前敵督戰。八日，日軍不戰而逾三貂之險，廣勇互鬪。延至本日，瑞芳遂告不守。（註一）姚錫光氏敘其經過曰：

「初七日，前鋒過三貂嶺，駐嶺背梁紳莊宅。先是景崧聞倭人登岸警電，令吳國華率廣勇七百人往守三貂嶺。（國華募勇廣東，久乃集。四月，率三千人渡臺，而虛籍復多，實祇及一千人。乘民船渡，遭風，收鹿港。永福載其衆，驅赴臺南，其得抵臺北者乃乘新福建輪船之七百人，仍多虛額。）國華新自廣東至，倉卒部署，初七日已刻，始率四百人先行，初八日未刻，至小楚坑。適倭人探兵從三貂嶺來探瑞芳大道，並繪圖，驟遇國華軍，遽搏戰，團勇來擊，鎗斃三晝倭，酋一；遂反奔。國華追之，鄉民拍手歡呼。是時景崧復令營官胡連勝（廣西人，友勝之弟）等援基隆，且調頂石角營官陳國柱、金包里營官陳柱波、獅球嶺營官知縣包幹臣等，各率廣勇數百人赴前敵助戰。皆稱統領，無所繫屬，前敵兵事益不可爲。國華猝遇倭兵於小楚坑也，幹臣率三百人往助戰，至則倭兵已遁，不繼國華進躡，而與團勇爭倭酋首級，大譁。幹臣縛團勇指爲漢奸，將殺之。時國華追倭已至嶺巔，因雨待棚帳，尙未駐營，聞報，知幹臣將持首級奪其功，大怒，撤隊馳下嶺。幹臣見國華還軍，職首級竹篋中，遽拔隊回。國華尾其後，俱還基隆，遂棄三貂嶺不守。幹臣竟以大捷聞景崧，省會官紳畢賀。是夜，倭土勇一營，紹良部淮軍兩哨，分駐瑞芳。四更時，倭兵冒雨登三貂嶺。於是基隆東道藩籬盡撤。初九日，景崧電令前敵分三路進圖復三貂嶺：一由大路，從相思嶺、龍潭浦、瑞芳過九芬橋、小楚坑，直抵三貂嶺爲正兵，專責國華；一由暖暖街小路，至吳朱埕，繞出三貂嶺之左，爲奇兵，專責游擊楊連珍，（岐珍之弟留臺，充小基隆分統）由海邊社寮砲臺，循八斗口、庚子寮、度九芬山截其歸路，責金包里分統李文忠；期以申初會基隆，齊進。詎我諸營未集，倭兵已分兩隊蹕至，一撲九芬，一直抵瑞芳；別隊扼吳朱埕北，防我軍包抄。九芬近海岸，且兵單，倭人已移快砲登岸猛擊。戰移時，宋營官死焉，哨官喪三人，孫營官受殊傷，九芬遂陷。瑞芳聞之，大震。先是廣東守備劉燕，率砲勇三十人督格林砲五架扼瑞芳西面土山；營務處俞明震以景崧令來觀戰，亦在焉。瑞芳四面皆山，形如釜底。前夕甚雨，適國華率營至，未築壘，入駐金砂局。敵至，乃出隊，逼於地勢，擁遏不成列，而倭人列隊東西兩山頂，每隊八人，甚嚴整（如德國兵制

之散隊小排）東面距三貂嶺四里，倭人先驅教民降霧下嶺，進扼九芬橋，約千餘人。我軍遽開槍，敵伏不動；一時許，俟我槍彈耗，始大呼過九芬橋，而山頂倭人乃發槍彈及金砂局。時已昏暮，倭燃電燈，明如晝，我軍皆驚。國華不得已，率隊進爭九芬橋。倭人先於澗旁伏我奸民，俟國華至，突起來犯，死傷二十餘人，我軍譁潰不能止。倭乘勢薄瑞芳。劉燕督砲隊自西面發砲下擊，彈雨下，敵死十餘人，復退去。是夜，大雨，國華竟拔隊回基隆，棄瑞芳不守；倭亦疑畏未至。四更，張兆連率護衛營冒雨至瑞芳。初十日辰刻，國華、連勝亦來會，兆連立九芬橋吹角列隊。倭人督我奸民三四百人來攻，每十二人一隊，兩倭兵持刀督其後。我軍槍礮並轟，敵頗傷亡，稍退。兆連率隊衝入，國華兵不接應。倭兵自山頂馳下，包抄，斷九芬橋歸路。兆連被圍，受重傷，親兵死亡略盡。陳得勝率八十人，曾喜照率三十餘人，涉溪澗，冒死入救。一卒負兆連潛涉溪澗得脫，得勝竟戰死。喜照受傷，歸路絕，裹創至庚子寮，入李文忠營。（初九日申刻李文忠等俱至前敵，文忠奉檄扼守庚子寮，楊連珍扼守吳朱埕，胡連勝等均來瑞芳助戰）。是時，瑞芳雖敗，而庚子寮（九芬山後）、吳朱埕諸隘，尚未失也。十一日，黎明，倭人分兩路專攻瑞芳西面土山，劉燕被圍，敵勇死八人，傷四人，瑞芳遂陷。」（註二）

按：連氏之臺灣通史，及臺灣省通志均言日人于九日陷瑞芳，而姚錫光氏則言九日吳國華棄瑞芳不守，倭畏未至，直至十一日始陷。前二者均臺人治臺史，當屬可信，故從之，而將瑞芳之陷繫于本日。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七。

註二：「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八——十一。

十日（六月二日） 李經方與日本所派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會於基隆口外，簽訂臺灣交接文據。

先是，上月二十八日，李鴻章接伊藤博文電曰：

「李中堂閣下：西歷本月二十一日，即中歷四月二十七日來電，業經收到，並將其中情節轉電樺山，託其與李經方按照友誼，和衷商辦。日本政府已派水陸各軍，前赴臺灣，中國特派大員，諒必帶有全權，日本特派大員，業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十日

經奉有此等文憑。如中國特派大員先來長崎，帶同日本國家船隻前往，以資護衛，更爲穩妥。至該大員何日可以行抵該處，務乞示知。」（註一）

鴻章乃將此電轉電告于總理衙門，二十九日旨下命轉李經方曰：

「李鴻章電奏已悉，伊藤所稱，李經方先赴長崎，會同前往，諸多窒礙，著李鴻章覆以彼此在臺灣海口會晤，以免周折。文憑著照所請加全權字樣，欽此。」（註二）

鴻章奉旨，于二十九日電伊藤，告以中國特派大員已奉旨加有全權字樣，惟臺民憤慨，無法交接，請另籌善法。旋接伊藤五月初一日覆電，謂：「已轉電樺山，據樺山覆電謂：兩國特派大員應以淡水爲會齊之所。中國特派大員如以該處有礙難之亭，該提督應將中國特派大員安穩護送至澎湖或福州暫住，如有憤亂之事，俟彈壓平靖後，再行前往云。」復經往返電商，李經方一行遂于五月初七日，自滬啓程，初九日寅刻抵淡水。日艦千代田號候于口外，賁有樺山致經方之函。謂：

「本委員曾經如約前往淡水，何計在該處兵丁等，放槍要擊，無由進口，乃取道基隆附近，將入臺北府。因此特派兵船，俟貴委員來，即請轉駕此兵船，或與之同航，速來會。」（註三）

經方即隨千代田號駛往基隆。同日申正抵基隆口外之三雕澳，本日已刻與樺山會晤。錄其問答節略如下：

「樺山云：奉來命臺，以爲和約批准，交接甚易；乃伊藤接中國政府電告，臺事棘手，始帶領水陸各軍。到淡水後，派小兵輪欲進口知照華官，華兵開砲阻擋，故來基隆，又爲華兵槍砲轟擊，不得已暫駐三雕澳，現陸軍一萬已登岸，日內可取基隆云。方答：以奉命來此，專與貴委員商辦事件，臺灣如何交接，望先明告。樺山云：諸事棘手，交接甚難，俟我攻取基隆，到臺北府後，再徐議交接。方云：和約批准，伊藤自認中國已將臺灣治理事權，交與日本，此來照約將臺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交與貴委員。臺民已變，豈能登岸一點交，我日馬聞問，臥病已久，在滬調治，奉旨力疾前來，此處風濤險惡，不能起立，如欲貴委員登岸到臺北府，不知何時？臺地甚大，民變

非一日可平，恐非數年不能交接清楚。今兩國和好，須按照友誼，和衷商辦，不可強我所難。伊云：雖然如此，交接事大，不能遷就。辯論至未初，經方昏眩，坐不能定。樺山云：請回船，我即來商議。經方爲多人扶回。樺山未正來拜，首云：和約批准，願兩國實心和好，永遠不改。答以誠然。伊云：既如此，何以淡水、基隆中國兵丁皆放槍砲襲擊？此處復見有華兵告示，令軍民人等抗拒。答以和約批准後，大皇帝即派我來臺灣，有全權交割臺灣，且特旨令文武各員陸續內渡，此爲兩國實心和好憑據。臺民不服生變，何事不可爲？淡水開槍，我未目見，不知虛實；但據貴委員之言，想必團練士兵所爲。風聞楊提督等已內渡，其餘文武各官，雖爲臺民劫留，未能遵旨一律內渡，民不奉朝命，官久無權，告示皆臺民所爲，官豈能過問？辯詰數時，伊云：但願抗拒各事，如貴委員所說，非官與兵所爲。方復云：交接之事，究竟如何辦理？樺山云：早間所云，即是辦法。方云：固執過甚，似非和衷。樺云：我甚和衷，但辦事不得不然。今見貴委員病狀顯迎，如久留於此，萬有不測，我實疚心。但交接之事，貴委員如何辦法？方答以照約辦理外無他法。樺山云：須有清單。方云：非地方官，何從有清單？此時民變，將來平定後，衙署文卷何從查考？終無清單。且和約內本無清單字樣，何必多立名目，強我所難？伊云：清單上貴委員如何寫法，總須有此名目，方合款式。經方即於清單內寫一臺灣全島、澎湖列島之各海口，並各府廳縣，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伊云：太含糊。方云：強我開清單，祇有如此。不然，即請將清單二字刪去。伊見方詞意甚決，始允照辦。樺山又云：由臺灣至福建之海線，係臺灣屬公物件，須照收。方云：海線非岸上產業，何能交讓？況海線登岸，非兩國政府議明不能。我未奉命商辦此事，無此權力，且和約內未言及。伊云：既然如此，祇好將臺灣至福建海線應如何辦理之處，俟兩國政府隨後商定。彼此辯論，自未至酉正，始定議。樺山即命其參贊先將東文清單交方閱看，措詞尚合和約。因與福士達商酌，福云：此文據但照鈔和約，於和約外不增減一事，實爲簡要妥洽，非意料所及，勸方即刻署名蓋印，恐稍遲即生枝節。亥正，即此署名蓋印，事畢。」（註四）

臺澎遂如此圖圖交割，鴻章爲之代奏，旋奉旨曰：

「李鴻章三電均悉，臺事既經李經方與樺山交割清楚，立有文據，此後臺灣變亂，與中國無涉，應由李鴻章電告伊藤，以爲了結此事之據。至海線如何辦理，應飭電局豫行籌議，以便臨時商定，欽此。」（註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十日

三五二

按：據上電文，可知清廷既割臺灣，猶恐民亂而受牽涉，一副畏首畏尾可憐相，無怪此後日人之更得寸進尺，爲所欲爲也：鴻章時語人，「弱國無外交」，此遁辭耳！實則強國自強，無須外交，即須，亦易辦；而弱國則尤須外交，蓋可藉外交之得，而補其他方面之失也！惟外交之成敗，端視外交家之膽識、氣魄與學養爲如何而定耳！

附錄：割臺文據（註六）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爲照在馬關所定和約第五款第二條交接臺灣一省。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簡派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大日本大皇帝陛下簡派臺灣總督海軍大將從二位勳一等子爵樺山資紀，各爲全權委員，因兩全權委員會同於基隆，所辦事項如左：

中、日兩帝國全權委員交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在馬關兩帝國欽差全權大臣所定和約第五款第二條中國永遠讓與日本之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並澎湖列島，在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之管理主權，並別冊所示各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均皆清楚，爲此兩帝國全權委員願立文據，即行署名蓋印，以昭確實。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日，訂於基隆，繕寫兩份。

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委員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大日本帝國全權委員臺灣總督海軍大將從二位勳一等子爵樺山資紀。

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並澎湖列島，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清單：

一、臺灣全島澎湖列島之各海口及各府縣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屬公物件：

一、臺灣至福建海線應如何辦理之處，俟兩國政府隨後商定。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二〇，頁六七。

註二：「清德宗實錄」，函卷三六六，頁三三七（原頁十七）。

註三：「清季外交史料」光緒朝四，卷一一三，頁八。

註四：清季多交史料四，卷一一三，頁一〇一一二。

註五：「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六七，頁三三三七（原頁十七）。

註六：清季多交史料四，卷一一三，頁十二二十三。

十一日（六月二日） 康有為上書請變法。

康有為原名祖詒，字廣夏，又號長素，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生於廣東南海縣。幼從學於粵儒朱次琦，及長道香港、上海，羨西人殖民政治之進步，而有改革國政之想。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首次布衣伏闕上書，請求變法圖強，書投國子監，不獲代奏，乃還廣東。設「萬木草堂」於廣州長興里，以新學相鼓吹，梁啟超、陳千秋等皆執弟子禮。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有為鄉試中式。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春，偕梁啟超同入京會試，翌年三月馬關和議成，有為合各省舉人之集於北京者一千二百餘人，連署公車上書反對，其大意凡三：曰拒和，曰遷都，曰變法，而其宗旨則以變法為依歸。書遞都察院，拒不接受代奏，然士氣憤湧，徧傳都下。會榜發，有為中進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四月二十八日有為再上書，例舉富國、養民、教士、練兵之策，五月六日書遞都察院，本日德宗覽而喜之，發交軍機處，命即日抄四份，以一呈太后，以一存軍機處，發各省督撫將軍議，以一存乾清宮南窗小簾，以一存勤政殿備覽觀，有為之初獲德宗知遇，實自此始。（註二）是為戊戌變法之張本。茲節錄原摺如下：

「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鑛，曰鑄銀，曰郵政。今奇窮之餘，急籌巨款，而可以聚舉國之財，收舉國之利，莫如鈔法。今天下銀號報明資本，皆存現銀於戶部，及各省藩庫。戶部用精工製鈔，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給現銀之數而加其半，許供賦稅祿餉。其大者戶部皆助資本，其虧者戶部皆代贖償，助其通流，昭彰大信。巨商樂借國力，富戶不思倒虧。以十八行省計之，可得萬萬。既有官銀行，上下相通，若有鐵路船廠大工，可以代籌；軍務賑務要需，可以立辦。國家借款，不須重息中飽；外國匯款，無須關票作押；公票寄存，可有入息；鈔票通行，可擴商務。今各省皆有銀票錢票，而作偽萬種，利不歸公，何如官中為之，驟可富國哉！

此鈔票宜行。

可縮萬里爲咫尺，合旬月於晝夜，便於運兵，便於運械，便於賑荒，便於漕運，便於百司走集，便於庶士通學，便於商賈運貨，便於負擔謀生，便於通言語、一風俗，有此數便，不費國帑而更可得數千萬者，莫如鐵路。鐵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關外，久已興築。今方運兵，其效已見。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費鉅難籌耳！若一付於民，出費給牌，聽其分築，官選通於鐵路工程者，畫定行省郡縣官路，明定章程，爲之彈壓保護；凡軍務運兵運械賑荒，皆歸官用，酌道里遠近，人數繁寡，收其牌費；吾民集款力自能舉，無使外國收我利權。天下鐵路牌費，西人計之，以爲可得七千萬，且可移民出於邊塞，而荒地闢爲腴壤，商貨溢於境外，而窮閭化作富民。俄人運春鐵路將成，邊患更迫，但爲防邊，已若亟築，況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運，而省千萬之需，去驛鋪而益三百萬之項。此鐵路宜行二。

機器廠可興作業，小輪舟可使通達。今各省皆爲厲禁，致吾技藝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綴敗，徒使洋貨流行，而禁吾民製造，是自燬其國也。官中作廠，率多偷減，敷衍欺飾，難望致精，則吾軍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虜伯，英之黎姆斯，著於海內，爲國大用，皆民廠也。宜縱民爲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費領牌，聽其創造。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官民商賈，交收其益，亦宜縱民行之。出費領牌，聽其拖駛，可得巨款。此機器、輪舟宜行三。

周官卬人，漢代鐵官，開鑛之法久矣。美人以開金銀之鑛，富甲四海；英人以開煤鐵之鑛，雄視五洲；其餘各國開鑛均富十倍。而藏富於地，中國爲最；如雲南銅錫，山西、貴州煤鐵，湖廣、江西銅鐵鉛錫煤，山東、湖北鉛，四川銅鉛煤鐵，其最著者。亘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國計日蹙，雖極節儉，豈能濟此艱難哉！家有重寶，而仰屋嗟貧，無策甚矣！山西煤鐵尤盛，星羅棋布，有百三十萬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爲甲於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盡。又外蒙古，阿爾泰山即金山也，長袤數千里，金產最盛，苗亦平衍，有整塊數斤者，俄人並爲察驗繪圖。至滇、粵之礦，尤爲英、法所窺伺。我若不開，他人入室。今雲南已專設鑛務大臣，熱河、開平亦設官局，並著成效；而未見大利者，由礦學之未開，采辦之非人也。礦學以比國爲最，自山色石紋，草木苗脈之色，皆有

專書。宜開礦學，專延比人教之，且爲踏勘。購機器以省人工，築鐵路以省轉運，二十取一而無定額稅，選才督辦而無濫私人，則吾金、銀、煤、鐵之富，可甲地球。此礦務宜開四。

錢幣三品以通有無，其制最古。自濠鏡通商，洋銀流入中國，漸徧內地，及於京師。觀其正朔，則異邦之年號，而非吾之紀元也。是謂無正朔。考其漏卮，則每歲運入約數百萬，進口無稅，八成夾鉛，而換我足銀，市價漲落，七錢二分之重，或有漲至八錢者，多方折耗，是謂大漏卮。名實俱亡，吾政之失，孰大於是。而吾元寶及錢，形體既難握携，分兩又無一定。有加耗、減水、折色、貼費之殊，有庫平、坵平、湘平、漕平之異，輕重難定，虧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體圓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國之銀，如俄用盧布，法用馬克，德奧用福祿林，英用壽林，外國銀錢不許通用。我宜自鑄銀錢，以收利權。今廣東已開局鑄銀，但患經費不敷，未能擴充，以鑄大圓耳。夫金銀質軟，只用九成。查美國鑄銀，每刻可成大圓一千二百，而每圓之利三分，移作製造之費，猶有餘饒，利亦厚矣。請飭下戶部，預籌巨款，並令各行省皆開鑄銀局，其花紋年號，式樣成色，皆照廣東鑄造，增置大圓，由督撫選廉吏精明，專司此局，厚其薪水，嚴其刑罰。督撫以時月抽提戶部，以化學核驗。他日礦產既盛，增鑄金錢，抵禁洋圓，改鑄錢兩。令嚴而民信，可以塞漏卮，而存正朔矣。此鑄銀宜行者五。

我朝公牘文移，諭旨奏摺，皆由塘驛汎鋪傳遞，而軍務加緊，又有驛馬遍布天下。設官數百，養夫數萬，歲費帑三百萬兩，而民間書札不得過問。貲費重厚，猶復遠寄艱難，消息浮沉，不便甚矣！查英國有郵政局，寄帶公私文書，境內之信費錢二十，馬車急遞，應時無失，民咸便之，而歲入一千六百餘萬。我中國人四萬萬，書信更多，若設郵政局以官領之，遞及私書，給以憑樣，與鐵路相輔而行，消息易通，見聞易廣，而進坐收千餘萬之款，退可省三百萬之驛；上之利國，下之便民。此郵政宜行六。

行此六者，國不患貧矣。然百姓匱乏，國無以爲富也。中國生齒，自道光時已四萬萬，今經數十年休養生息，不止此數，而工商不興，生計困蹙。或散之他國，爲人奴隸；或瀟聚草澤；蠹害鄉邑；雖無外患，內憂已亟。夫國以民爲本，不思養之，是自拔其本也。

養民之法：一曰務農，二曰勸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窮。天下百物皆出於農，我皇上躬耕，皇后親蠶，董勸至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十一日

三五六

矣。而田畯之官未立，土化之學不進，北方則苦水利不關，物產無多；南方則患生齒日繁，地勢有限；遇水旱不時，流離溝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國講求樹畜，城邑聚落，皆有農學會，察土質，辨物宜。入會則自百穀花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優劣，而旌其異等。田樣各等，機車各式，農夫人人可以講求。鳥糞可以肥培壅，電氣可以速長成，沸湯可以暖地脈，玻璃可以禦寒氣。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播種則一日可以三百畝。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家。瘠壤變為腴壤，小種變為大種，一熟可為數熟。吾地大物博，但講之未至。宜命使者譯其農書，徧於城鎮設為農會，督以農官，農人力薄，國家助之。比較則棄穉而從良，鼓舞則用新而去舊，農業自盛。若絲茶為中國獨擅，恃為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蘭西、日本皆講蠶桑，印度、錫蘭茶葉與吾敵，奪我之利，致吾衰減至千餘萬。而吾養蠶未善，種茶未廣，再不講求，中國之利源塞矣。宜設絲茶局，開絲茶學會，力求振興，推行各省。其餘東南種棉蔗，西北講牧畜。棉以紡織，蔗以為糖，牛羊之羣，可以織呢絨氈毯，以及沙漠可以開河種樹，海濱可以漁網取魚。種樹之利，俄在西伯利部歲入數百萬；漁人之計，美之沿海可得千餘萬。今材木之運，罐頭之魚，中國銷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國養蜂，西人以爲能盡其利。所入等於舊金山之金礦，宜有以鼓勵之。此務農宜行一也。

周官考工，中庸勸工。諸葛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管仲治齊，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制，指南之車，富強之效也。嘗考歐洲所以驟強之由，自嘉慶十二年英人始製輪船，道光十二年即犯我廣州，遂開諸洲屬地四萬里。自道光二十五年後，鐵路創成。俄人以光緒二年築鐵路於黑海、裏海，開闢基窪、阿爾續等國六千里。其餘電線、顯微鏡、德律風、傳聲筒、留聲筒、輕氣球、電氣燈、農務機器，雖小技奇器，而皆與民生國計相關。若鐵艦砲械之精，更有國者所不能乏。前大學士曾國藩平定大難，考知西人自強之由，創議開機器之局。近者各省漸爲增設，而只守舊式，絕無精思，創爲新製；蓋國家未嘗教之也。宜令各州縣咸設考工院，譯外國製造之書，選通測算學童，分門肄習，入製造廠閱歷數年。工院既多，圖器漸廣，見聞日闊，製造日精。凡有新製繪圖貼說，呈之有司，驗其有用，給以執照，旌以功牌，許其專利；工人自爲身名，必殫精竭慮，以求新製。槍砲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應國家之用者。彼克虜伯砲，毛瑟鎗，爲萬國所必需，皆民造也。查美國歲給新器功牌一萬三千餘，英國

三千餘，法國千餘，德國八百，奧國六百，意國四百，比利時、德國、瑞士皆二百餘，俄國僅百餘，故美之富，冠絕五洲。勸工之法，莫善於此。此勸工宜行二也。

凡一統之世，必以農立國，可靖民心；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可俾敵利；易之則困敝矣。故管仲以輕重強齊國，馬希範以工商立湖南。凡夫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斃，蓋在此也。今外國鴉片之耗我，歲凡三千三百萬，此則人盡痛恨之。豈知洋紗洋布，歲耗凡五千三百萬。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綢、洋緞、洋呢、漳絨、羽紗、絨毯、手巾、花邊、鈕扣、針、線、傘、燈、顏料、箱篋、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呂宋煙、夏灣拿煙、紙捲煙、鼻煙、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餅、洋糖、洋鹽、藥水、丸粉、洋乾果、洋水果，及煤、鐵、鉛、銅、馬口鐵、材料、木器、鐘錶、日規、寒暑針、風雨針、電氣燈、自來水、玻璃鏡、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戶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銷流，耗我以萬萬計。而我自絲茶減色，不敵鴉片，其餘自草帽、駝毛、羊皮、大黃、麝香、藥料、綢緞、磁器、雜貨不啻三千萬，僅得其洋布之半數。而吾民內地則有厘捐，出口則有重稅，彼皆無之。吾物產雖盛，而歲出萬萬，合五十年計之，已耗萬兆，吾商安得不窮。今日日本且欲通及蘇、杭、重慶、梧州，又加二萬萬之償款。吾民精華已竭，膏血俱盡，坐而垂斃。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為盜賊，即無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設通商院，派廉潔大臣長於理財者，經營其事；令各直省設立商會、商學，比較廠，而以商務大臣統之；上下通氣，通同商辦，庶幾振興。商學者何？地球各國貿易條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識，宜譯外國商學之書，選人學習，徧教直省，知識乃開，然後可收外國之利。商會者何？一人之識未周，不若合衆議，一人之力有限，不若何公股。故有大會大公司，國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務乃可遠及四洲。明時葡萄牙之通澳門，荷蘭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時之取印度，道光時之犯廣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權。蓋民力既合，有國助之，不獨可以富國，且可以開地。商會所關，亦不小矣。比較廠者何？泰西賽會，非競遊樂，所以廣見聞，發心思，辨良楮。凡物有比較，優劣易見，則劣者滯銷，而優者必行。彼之貨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並宜設立此廠，於是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上海造紙，關東捲煙，景德製瓷，蘇、杭織造，北地開葡萄酒，山東製野蠶繭以成絲，江北改

土棉而紡紗，南方廣蔗園而製糖，皆與洋貨比較，精妙華彩，務溢其上。又令吾領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製，且以奪其利，非止敵其貨而已。然後蠲釐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此外發金、銀、煤、鐵之利，足以奪五洲，製毫燧、鎗、砲之精，可以橫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

我生齒既繁，鐵路未開，運貨爲難。即以北口之皮，京師之煤，天津之貨，作貨者人四百，而運貨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其餘窮困無業，游散無賴，所在皆是。京師四方觀望，而乞丐偏地。其他孤老殘疾，無人收恤，廢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車聲隆隆，接轡不間，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親見其呼號無訴，癢傷臥道，豈忍日親乎！以一人而養天下，勢所不給，宜設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墾荒。西北諸省，土曠人稀，東三省、蒙古、新疆疏曠益甚，人跡既少，地利益以不開。早謀移徙，可以開利源，可以實邊防，非止養貧民而已。移有三：一曰罪遣。今俄國徙希利尼黨於西伯利部，而西伯利部以開。曰認耕。英之略拿大、新疆般鳥各島，美之密士失必河東南各省，巴西全國是也。曰賃邊。荷蘭南洋諸島，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後，闢地過本國七十倍，民益繁盛，豈有苦其生齒之繁而棄之。今我民窮困，游散最多，爲美人傭奴，然猶不許，且以見逐，澳洲南洋各島效之，數百萬之民失業來歸，何以安置？不及早圖，或爲盜賊，或爲間諜，不可收拾。今鐵路未成，遷民未易，若鐵路成後，專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謀生之路，共有樂上之安。百姓樂生，邊境豐實，一舉數善，莫美於是。

二曰教工。周禮有里布以謂不毛，國土以警游惰。游民無賴，小之作奸，大之爲盜。宜令州縣設立警惰院，選善堂紳董司之。凡無業游民，皆入其中，擇其所能，教以藝業。紳董以其工業賜給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經費，限禁出入，皆有程度。其有大工大役，以軍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過取保乃放，再犯不放。其小過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輕重，以爲歲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殘疾者，咸收於外院，工作如之。窮民得食，而良民賴安，仁政之施，似難緩此。

三曰養窮。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盲聵暗啞，斷考侏儒，民之無告，先王最矜，皆當餼焉。宜令各州縣市鎮聚落，並設諸院，咸爲收養，皆令有司會同善堂，勸籌巨款，妥爲經理。其司事經理有效，窮民樂之，聯名請獎，許

既軍功勞績獎勵，則無一夫之失所，其於皇仁豈爲小補！民心固結，國勢繫於苞桑矣。故恤窮宜行四也。

然富而不教，非爲善經；愚而不學，無以廣才；是在教民。學校之設，選舉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漢、魏以經法舉孝廉，唐、宋以詞賦重進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誦法宋子，講明義理，亦可謂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後世書，則空疏可以成俗，選舉皆限之名額，則高才多老名場。混得之則詞館而躐公卿，偕於旦夕；失之則青瑣不聞徵聘，終老茅肯。題難故少困於搭截，知作法而忘義理；額隘故老遂於科第，求富貴而廢學業。標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鑑於明末，因噎廢食，上以講學爲禁，下以道學爲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無多。乃至略利無恥，蕩成風俗，而國家緩急，無以爲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變矣。若夫小民識字已寡，或有一省而無禮律之書，一縣而無童蒙之館，其爲不教甚矣。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學，則農、工、商賈無才。產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遷善改過，亦難爲治，非覆瓿羣生之意也。故教有及於士，有逮於民，有明其理，有廣其智。能教民則士愈美，能廣志則理愈明。今地球既開，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宋臣姚燮謂：「我之所爲，彼皆知之，彼之所爲，我獨不聞，安得不爲所制乎！」嘗考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砲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彼百七八歲人皆入學，有不學者責其父母，故鄉塾甚多。其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學塾經費，美國乃至八千萬。其大學生徒，英國乃至一萬餘。其每歲著書，美國乃至萬餘種，其屬郡縣，各有書藏，英國乃至百餘萬冊，所以開民之智者亦廣矣。而我中國文物之邦，讀書識字僅百之二十，學塾經費少於兵餉數十倍。士人能通古今達中外者，郡縣乃或無人焉。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知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無爲而見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

武科弓刀步石無用其矣。王制謂：「羸股肱，決射御。」出鄉不與士齒，此武后之謬制，豈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請廢武科，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今宜改武科爲藝科，令各省、州、縣備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仍專一經，以爲根本。延師教習，各有專門。學政有司，會同院師，試之以經題一論及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名額，得薦於省學，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書器益多，見聞益廣。

學政督撫會同其院師，每歲試其專門之業，增以經一、論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選，不限名額，貢於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廣延各學教習，圖器尤盛。每歲總裁禮部會同大教習試之，其法與省學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其進士得還爲州縣藝學總教習，其舉人得爲分教習，並聽人聘用。其諸生得還教其鄉學塾，及充各作廠。其文科童試，即以經古場爲正場，自占經解一，專門之學一。二場試四書文一，中外策一，詩一，亦及格卽取，不限名額。每場考試，人數不得過三百。增設學政，每道一人，可從容盡力矣。其鄉會試，頭場四書義一，五經解一，詩一，縱其才力不限格法，聽其引用，但在講明義理，宗尚孔子；二場掌故策五道；三場問外國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殿試策問，不論楷法，但取直言極諫，條對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藝科願互應者聽。其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其餘州、縣、鄉、鎮，皆設書藏，以廣見聞。若能厚壽經費，廣加勸募，令鄉落咸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通訓詁、名物，習繪圖、算法，識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則人才不可勝用矣。

周官誦方訓方，皆考四方之憲，詩之國風、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開報館，名曰新聞，政俗備存，文學兼述。小之可觀物價，瑣之可見土風。清議時存，等於鄉校，見聞日闢，可通時務。外國農業、商學、天文、地質、教會、政律、格致、武備各有專門，以爲新報，尤足以開拓心思，發越聰明，與鐵路開通，實相表裏；宜縱民開設，並加獎勵，庶裨政教。

然近日風俗人心之壞，更宜講求挽救之方。蓋風俗弊壞，由於無教。士人不勵廉恥，而欺詐巧滑之風成；大臣託於畏謹，而苟且廢弛之弊作。而六經爲有用之書，孔子爲經世之學，鮮有負荷宣揚，於是異教乘虛而來。直省之間，星羅棋布，而吾每縣僅有孔子一廟，豈不可痛哉！今宜亟立道學一科，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並加徵禮，量授國子之官，或備學政之選。其舉人願入道學科者，得爲州縣教官。其諸生願入道學科者爲講學生，皆分到鄉落，講明孔子之道，厚壽經費，且令各善堂助之。並令鄉落淫祠，悉改爲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其道學科，有高才碩學，欲傳孔子之道於外國者，明詔獎勵，賞

給國子監、翰林院官銜，助以經費，令所在使臣領事保護，予以憑照，令資游歷。若在外國建有學堂，聚徒千人，確有明效，給以世爵。餘皆投牒學政，以通語言、文字、測繪、算法爲及格，悉給前列。若南洋一帶吾民數百萬，久隔聖化，徒爲異教誘惑，將淪左衽，皆宜每島派設教官，立孔子廟，多領講學生分爲教化。將來聖教施於蠻貊，用夏變夷，在此一舉。且藉傳教爲游歷，可調外情，可揚國聲，莫不尊親，尤爲大義矣。

夫教養之事，皆由國政。而今官制太冗，俸祿太薄，外之則使才未養，內之則民情不達，若不變通，無以爲教養之本也。天下之治，必自鄉始。而今知縣，選之既不擇人望，任之兼責以六曹，下則巡檢典史一二人，皆出雜流，豈任民牧？上則藩臬道府，徒增冗員，何關吏治？若京官則白晝垣臺諫以外，皆爲閒散，各部則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祿。堂官則每署數四，而兼差反多；文書則每日數尺，而例案繁瑣。至於驛及監司，而吏治壞溢極矣。今請首停捐納，乃改官制，用漢世太守領令長之制，唐代節度兼觀察之條，每道設一巡撫，上通章奏，下領知縣，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縣升爲四品，以給御繡檢郎員及道府之愛民者授之。其巡撫之下，增置參議、參軍、支判，凡道府同通改授此官。其知縣之下，分設功曹、決曹、賊曹、金曹，以州縣進士分補其缺。其餘諸吏，皆聽諸生考充，漸拔曹長，行取郎官。其上總督，皆由巡撫兼管，各因都會，以爲重鎮。使吏胥之積弊，化爲士人，三老之鄉官，各由民舉。整頓疏通，乃可爲治。其京官則太常、光祿、鴻臚，可統於禮部，大理可併於刑部，太僕可併於兵部，通政可併於察院，其餘額外冗官，皆可裁汰。各營一職，不得兼官。章京領天下之事，宜分以諸曹；翰林爲近侍之臣，宜輪班顧問。部吏皆聽舉貢學習，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開言路。駢枝既去，宦途甚清。以彼冗糜，增此廩祿，令其達官有以爲與馬儻從之費，而後可望以任事。其小吏有以爲仰事俯畜之用，而後可責以守廉。若用魏、隋之制，予以世祿之田，既體羣臣，庶多廉吏。

內弊既除，則外交宜講。春秋子羽能知四國之爲，漢武下詔，求通絕域之使。蘇武不屈，富弼能爭，列國交爭，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養，不諳外務，重辱國體，外人嘲笑。今宜立使才館，選舉貢生監之明敏辨才者入館學習，其翰林部曹願入者聽。各國語言文字，政教律法，風俗約章，皆令學習。學成或爲游歷，或充隨員，出爲領事，擢爲公使，庶幾通曉外務，可以折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十一日

三六二

考俄、日之強也，由遺宗室大臣，游歷各國，又遣英俊子弟，詣彼讀書。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習其業，歸而變政，故能驟強。我親藩世爵大臣，與國休戚，啓沃聖聰者也，而不出都城，寡能學問，非特不通外國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爲，一旦執政，豈能有補。大臣固守舊法，習爲因循，雖利國便民，力阻罷議，一誤再誤，國日以替。宜選令游歷三年，講求諸學，歸能著書，始授政事。其餘分遣品官，激勵士庶，出洋學習，或資游歷，並給憑照，能著新書，皆爲優獎，歸授教習，庶開新學。則上之可以贊聖聰，下之可以開風氣矣。

夫中國大病，首在壅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今天下事皆文具而無實，吏皆奸詐而營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同此興作，並爲至法，外邦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撫一、二人僅通章奏。以占僚士庶之衆，而惟樞軸三、五人日見天顏，然且堂廡週隔，大臣長譚而不敢盡言；州縣專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籲。故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戶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夫天下萬物之繁，封圻千里之廣，使督撫樞軸皆是大賢，然是數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運，必有不逮，以之運轡四海，措置百務，已狹隘不廣矣。況知人之哲，自古爲難。唐帝失之於共兇，諸葛失之於馬謖。任用偶誤，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傾，經營八表，豈不難乎！天下人民四萬萬，庶士億萬，情僞百端，才智甚廣，皇上僅寄耳目於數人，而數人者又畏懼保祿，不敢竭盡，甚且煬竈蔽賢，壅塞聖聰。皇上雖欲通中外之故，達小民之阨，其道無由；名雖尊矣，實則獨立於上，遂致有割地棄民之舉。皇上亦何樂此獨尊爲哉！夫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洪範之大疑大事，謀及庶人爲大同。孟子稱進賢殺人，待於國人之皆可。盤庚則命衆至庭，文王則與國人交。尚書之四目四聰，皆由闕門；周禮之詢謀諏遷，皆合大衆。嘗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廣益，通達民情，實以通憂共患，結合民志。昔漢有徵辟有道之制，宋有給事封駁之條。伏乞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皇上開武英殿廣懸圖書，俾輪近入直，以備顧問。並准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於太和門，三占從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爲定例，宣示天下。上廣皇上之聖聰，可坐一室

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憂樂而忘公私。皇上舉此經義，行此曠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紆財，其贊富強，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以之籌餉，何餉不籌？以之練兵，何兵不練？合四萬萬人之心以爲心，天下莫強焉！然後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講鐵艦之精，而海可以戰。於以恢復琉球，掃蕩日本，大雪國恥，耀我威棱。昔德國相臣畢士麻克，嘗以中國之大，冠絕四洲，他日恐爲歐羅之患，思與諸國分之，後以中國因循不足畏，議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產，力圖自強，此眞日本之所大患，畢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歐羅巴洲諸國所竊憂也。以之西撻俄、英，南收海島而有餘，何至忍詭舍恥，割地請款於日本哉！及今爲之，猶可補牢。若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國環伺，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拾，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

且夫天下大器也，難成而易毀；兆民大衆也，難靜而易動。故先王懷朽索之馭馬，慮天命之無常，戰戰兢兢，若履淵水。楚莊王之立國也，無日不訓討軍實，慮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極，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靡厲，乃能自立。稍有因循，即懷、惑、蒙、靡，微、欽、見、虜矣。近者土耳其爲回教大國，不變舊法，遂爲六大國割地廢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島國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爲鑒。自古非常之事，必待人有爲之君。自強爲天行之健，志剛爲人君大德。洪範以弱爲六極，大易以順爲陰德。詩曰：「天之方懣，無爲夸毗。」說者謂夸毗體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寶，下武膺連，歷鑑覆轍，獨奮乾綱，勿搖於左右之言，勿惑於流俗之說，破除舊習，更新大政，宗廟幸甚！天下幸甚！夫無事之時，雖勛舊之言不能入，有事之世，雖匹夫之言或可採。舉人等草茅疏遜，何敢妄陳大計，自取罪戾，但同處一家，深虞胥溺。譬猶父有重病，庶孽知醫，雖不得湯藥親管，亦欲將驗方鈔進。公羊之義，臣子一例，用敢竭盡其愚，惟皇上採擇焉。不勝冒昧隕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聖鑒。謹呈。」（註二）

日軍陷臺灣基隆。

本日，日軍陷基隆，張兆連、俞明震均受傷，衆議守獅球嶺，不決。明日，獅球嶺失守，巡撫衙門被焚。營官李文魁率衆入署，迫唐景崧出戰。景崧微服至滬尾，匿忌利士德商棧，旋乘德輪鴨打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十六日

三六四

(Arthes)內渡焉。(註三) 姚錫光記其經過曰：

「時前敵各軍皆潰，倭尙疑有伏兵，未遽進。初甲申中法之役，臺紳林朝棟從銘傳駐獅球嶺，扼法兵不得前，積功洊保道員；所部土勇，皆勁卒，且訓練有法，頗負時望。景崧用廣勇，而廣勇、土勇積不相能，睚眦尋釁。因移朝棟守中路，以胡友勝統廣勇四營守獅球嶺。廣勇無紀律，友勝非將材，而嶺防爲省會關鍵，於是臺北紳民及英人提理皆言速移朝棟扼獅球嶺，以守爲戰，事猶可爲；因請基隆同知方祖蔭赴臺北告景崧。祖蔭因先移基隆電報局於八堵。(在獅球嶺後，當獅球嶺暖暖街之衝，爲入臺必經之路。)時明震自瑞芳受傷，亦來獅球嶺，因偕祖蔭返省垣，且請景崧駐八堵爲死守計。景崧言，纔午聞敗，已令黃義德率護衛營往紮八堵矣。義德至八堵，卽馳回，詭言：『獅球嶺已失，大雨不能駐營，且倭懸六十萬金購總統(謂景崧)頭，故乘火車馳歸，防內亂。』景崧不敢詰。是夜，義德部勇索饌大譁，徹夜甚雨。十二日辰刻，倭兵登獅球嶺。是日侵曉，景崧嬖人吳觀庭(滬尾守備充武巡捕)已斫斷電線，電報局員盡散。黎明雨稍止，街市寂然。蔣客熊瑞圖(湖南人，充景崧幕。)等爲景崧策，速退新竹就朝棟、永福圖再舉。景崧左右均怒目視，吳觀庭手槍擬瑞圖曰：『大人不寢者五夜矣，諸君亦宜休息。所畫已定，多言者以是擊之。』景崧默然。酉刻，前敵潰兵入城，城中大亂，積尸徧地，有重傷昇回死者。而廣勇土勇復相殘殺，哭聲鼎沸，未幾，撫署火起，景崧微服雜弁勇出亡(後內渡至廈門)，是日，林朝棟率所部至，知獅球嶺失，景崧已去，仍歸臺中。」(註四)

註一：「康南海白編年譜」，頁一一—三二，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註二：楊松編：「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第六輯，戊戌變法史料，三、康有爲上書變法，頁四一二—四二七。

註三：「臺灣省通志」，第三冊，頁一〇七。

註四：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十一—十二。

十六日(六月八日) 日軍陷臺北。

先是，自唐景崧內渡後，臺北混亂，大漢奸辜顯榮及德商奧利(O'ly)、英商湯姆森(Thomson)等往

迎日軍，日軍遂于本日入臺北城。（註一）連橫敘其事曰：

「當是時潰兵四出，覘藩庫，焚撫署，土匪亦乘發，門死者五百餘人，哭聲滿巷，如是兩晝夜。林維源、林朝棟、丘逢甲相率去，軀軀紳士李秉鈞、吳聯元、陳舜臣等議彈壓，而無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請赴日軍求鎮撫，無敢往者。鹿港辜顯榮在臺北，見事急，自赴基隆，謁總督，請定亂，許之，日兵遂進，十四日夜半，至城外，城兵猶守戰，黎明乃陷。」（註二）

姚錫光亦敘其經過曰：

「自景崧去，城中散勇游匪，沿途覘掠，藩庫猶存銀二十四萬，劫奪互鬥，庫中積尸四百餘。時獅球嶺踞倭未得虛實，尙回翔未進。德商畢底蘭以狀馳告倭營，請速派兵來定亂。十五日，倭人始來收城，兵不過八十名，明日來千餘人，臺北亡。」（註三）

按：「東方兵事紀略」及「臺灣省通志」均明言臺北陷于本日，而連橫叙臺北陷落之日，似語焉不詳，茲從「東方兵事紀略」及「臺灣省通志」之說。

附錄：俞明震撰「臺灣八日記」（註四）

五月初五日，倭兵輪二十九艘游弋臺北海面，復分泊各海口外，基隆、滬尾、澳底、金包里、八里坌、大姑坎，凡可登岸之處，皆有兵輪。

初六日，土民勾挖結金砂匪引倭人由澳底登岸。曾喜照新募土勇兩營守澳底，成軍甫三日，遇敵不敢戰，均逃散。澳底在基隆北五十里，路崎嶇，中隔三貂嶺，最險峻；過嶺始有歧路，一通瑞芳，一通吳朱埕。又澳底循海岸可達基隆，中隔九芬山，過山即無路，行亂石中，必由砲臺前經過，防守最易。初，楊西園軍門統十二營專守基隆一帶，故三貂、澳底均有防營。初三日，楊率旨撤營內渡，基隆僅張月樓軍門七營，土勇四營，砲臺分去三營，瑞芳、九芬雖有防營，單薄不能當大敵。四更，城中得基隆警電，維帥命吳國華率七百人守三貂嶺。吳新自廣東來，倉卒部署，諸事不齊備，次日巳刻，始率四百人先行。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十六日

三六六

初七日，維帥調新募廣勇陸續均赴基隆，胡連勝、陳國柱、陳凌、包幹臣等各募數百人，均號統領，無所繫屬；余請維帥自出督師，同事均不謂然。

初八日五更，維帥命余赴前敵督戰兼料理餉械、電報事宜；黎明，撥黃翼德親兵六十人，派委員三人，武弁六人隨往。乘火車，午初到基隆，駐張統領大營。探報昨晚倭前鋒已過三貂嶺，住嶺背榮紳家。余急派弁持令箭命各軍擇山頭要隘紮穩，勿浪戰，待援兵至再進。未刻，倭前鋒至小楚坑探路兼繪圖，驟遇吳國華軍，未及列隊，遽搏戰，土勇從旁夾擊，槍聲三晝倭酋一。寇奔，棄槍械，越嶺遁。吳追及嶺巔，百姓觀戰者均拍手歡呼。先是，探報我軍在小楚坑遇敵，余檄包幹臣率三百人助戰。包至小楚坑，寇已遁，見倭酋斃路旁，割取首級，與土勇爭，大譁。包縛土勇，土勇未著號衣，指爲漢奸，將殺之。時吳國華至嶺巔，因雨待棚帳，尚未紮營，聞報知包將首級赴大營獻功，大怒，撤隊急馳下嶺。包立橋上，望見吳軍還，藏首級竹簾中，遽拔全隊回，吳尾其後，俱還基隆，包先遣人來營報大捷，余迎於營門外，將勞士卒，詢前敵戰守情形，則言已獲大捷，各軍均撤回。余大駭，詰以奉何人令撤兵？何以棄三貂嶺不守？包瞠目不能答。余憤極，電稟維帥，如今夜瑞芳失守，非斬包、吳無以謝百姓；且密電：「基隆四面皆廣勇，統領六、七人各不相下，無所繫屬，必憤事，公宜自駐獅球嶺調度。」時已四更，屢召吳國華，避不敢見。吳初來訴包懷助狀，及聞余詰責包，自慚，旋拔隊赴前敵；包則持有護符，竟以大捷斬首無算赴省城獻功矣。是夜，我軍僅土勇一營，張統領二哨紮瑞芳，三貂嶺竟棄不守。天明，探報回，知四更時倭已冒雨登嶺。（夜間與張統領商議電稟維帥，分三路進攻：一路由大路至相思嶺、龍潭埔、瑞芳，過九芎橋、小楚坑，直抵三貂嶺爲正兵；一路由海邊社寮砲臺至八斗、庚子寮、九芎山直達澳底，截其歸路；一路由暖暖街至吳朱埕，繞出三貂嶺之左，爲奇兵。又密稟各路宜專責一人，免致互推爭功誤罪。）

初九日五更，劉燕運五管格林快砲五架，率砲勇三十人至大營，余急命運至前敵，擇高阜安置。黎明，維帥電諭三路進兵甚善，瑞芳一路專責成吳國華，九芎李文忠、吳朱埕楊連珍，限申初到基隆聽調遣。未刻，陳得勝先到，張統領與定議，各軍酉刻在基隆飽餐，限寅刻抵賊營，合力猛攻；余派員押棚帳、子藥同行。部署甫定，忽報倭兵分兩路來攻，一路撲九芎，一路直抵瑞芳，另一股扼吳朱埕北，防我軍包抄。九芎兵單，且近海，賊移快砲上岸猛

擊，戰未久，宋營官陣亡，哨官死三人，孫營官受重傷，九芬失守。瑞芳尚未開仗，得九芬信，大震。余急率親兵六十人赴前敵督戰，擬憑劉燕砲隊以自固。西初，到瑞芳，扼後街口，令各營退者斬。瑞芳四面皆山，形如鍋底。昨夜大雨，我軍就安逸，住金砂局，敵至始出，前後相擠。倭兵排列東面高山上，每隊八人，極嚴整。北面距三紹嶺四里，倭人驅教民、漢奸下嶺扼九芎橋，約千餘人。劉燕砲隊列西面土山上，稍得地勢。我軍槍聲不絕，敵伏不動。相持一時許，忽橋上呼聲震天，敵已沖過橋，山頭賊始開始，槍彈及金砂局，傷數人，有逃者；余揮親兵追斬二人，手刃一人，勢稍定。時已昏黑，敵燃電燈，明如晝，各軍皆驚。余飛書告吳國華曰：「逃勇已斬三人，今日之戰關全臺存亡，諸公退後一步，弟必開槍轟擊；若弟先回大營，不與諸公同死者，願斬首以謝諸公。」吳得書，率隊進奪九芎橋。敵已約漢奸伏溪澗旁，俟吳國華至，突起截擊，死傷二十餘人，各軍譁潰，大奔不能止。敵乘勢薄瑞芳前街口，劉燕發砲下擊，敵死十餘人，復退去。余扼龍潭埔，豎大旗集潰勇。吳國華二更後始至，營哨官未損一人。是日，我軍棄瑞芳不守，敵不敢至，皆土山頂砲隊之力。若帶兵官能擇地紮營，以守爲戰，決不至此。余移營依砲隊，與劉燕合！無棚帳，著油衣露立達旦，吳國華竟拔營回基隆宿。四更，張統領帶護衛營冒雨至，言明日親打衝鋒，拼死一戰，語憤激，相與泣下。（今日申刻，各援軍陸續至，檄李文忠扼守庚子寮，楊連珍扼守吳朱埕，胡連勝等均來瑞芳助戰。）

初十日天明，張統領欲進戰，待吳國華、胡連勝，辰刻始到，張立九芎橋，吹角列隊。倭人押漢奸約三百人來攻，（每十二人，兩倭兵持刀督其後。），槍砲並轟，敵傷亡較多，敗退。張率隊衝上，吳國華兵疲困不能接應。倭兵從旁面山頂馳下，斷九芎橋歸路，圍裹數重，槍砲兇猛。余急傳令：「能救張統領出圍者賞三千金！」陳得勝率八十人，曾喜照率三十餘人涉溪澗冒死衝入，張已受重傷（右腿被槍子穿過，後在上海醫愈。），親兵搶護，死七人，後一卒負之，潛行溪水中始得脫。曾喜照受傷，歸路阻截，裹創戰至庚子寮，投李文忠營，陳得勝戰死。初，張得小勝，吳軍不能接應，余擬率親兵扼橋爲聲援，營官黃義光有難色，中止，至是，命持令箭調胡友勝赴援，竟出怨言。余憤極，令斬以徇；劉燕爲乞恩，僅摘翎頂示薄懲。午後，忽接維帥電，命黃義光撤親兵速回；各營及局紳均驚駭。余急乘火車入城，面詰維帥。維帥茫然不知，查係某某代黃翼德屬電報房發者，竟私署維帥名。局面

已壞，維帥不敢問，太息而已。張營四次電催赴前敵，辭不赴援。紳士公電云：「俞督辦艱難任事，去後，合廳皇駭，迄速來救我身命。」維帥持電，流涕相示，命速行。余不得已，帶營務處六十四人行（四月二十五日，余派充全臺營務處，即挑選湘勇六十四人作衛隊，自加口糧，每名月三元。初八本擬帶赴前敵，維帥言潘庫最緊要，須派親信得力人護守，前敵督戰，僅帶數十人供驅使足矣。），武弁五人告奮勇亦隨行。傍晚到基隆，即馳赴前敵，仍與劉燕合營北山上，吳國華仍回基隆宿。

十一日天明，敵分兩路大至，專攻北山。余與劉燕被圍，吳國華軍未至，各營亦坐視不能救。槍砲聲如急雨怒潮，相持至已刻，砲勇死八人，重傷四人，砲管太熱，不能放。余親率兵憑土壕用十三響槍抵抗（槍名雲者式，美國造）。差官楊得標、李成德先陣亡。敵用開花彈極猛速，彭發立余後，腰際中彈，呼號甚慘。余回顧，忽開花彈炸銅片嵌入額際，血流不止，腮膀被槍彈擦過，痛極量絕。親兵拾護至社寮，西醫力南加用藥水灌入傷口，取出三角紫銅片一塊，血仍不止，用蠟布裹緊，抬至獅球嶺。時各軍均潰，敵尚疑有伏兵，未敢竟抵基隆。初，臺紳林朝棟駐守獅球嶺。林以擊「生番」功，歷保至道員，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所部皆百戰之卒，且訓練有法，頗負時望。維帥意專重廣勇。廣勇與土人素不睦，因調林守中路，以胡友勝統廣勇四營紮獅球嶺。余至嶺上，與夫均逃散，幸血止神氣稍清，急召胡詢戰守事；胡神色倉皇，唯唯而已。適紳士十四人偕觀戰，英人提理來醫傷，皆言廣勇新募，從未訓練，統領又不得人，基隆一失，人心渙散；法人之變，劉省帥專守獅球嶺，而臺北宴然；乞撫帥速調林朝棟以守為戰，事猶可為。時基隆同知方祖蔭在座，余命移基隆電報局設八堵（堵在獅球嶺後，當獅球嶺暖暖街之衝，為入臺北城必由之路。），將親入城請維帥駐八堵，為死守計，並命紳士寫一公稟。西刻，偕方祖蔭乘火車入城，署中幕友家丁寥寥數人。維帥一見，即言「大事已去，奈何？」余出紳士公稟，且請駐八堵。維帥言：「午刻聞前敵信，即令黃翼德率護營紮八堵。頃黃忽回城，據云獅球嶺已失，大雨不能紮營；且敵懸六十萬金購總統頭（六十萬金購頭之說，亦謠言也，可笑。），故趁火車急馳回城防內亂。」黃至八堵，士卒均未下車。余怒斥其欺罔。維帥知之，而不敢詰問，但言「君無死法，曷自為計？」夜，黃勇索餉大譁，幸盧嘉植率東莞勇百人守庫甚平靜。至落署，遇余親兵自前敵回者共十七人，伏地痛哭，泥污血跡，面目模糊莫辨；差官五人，死三人，尚有宋傳禮

、王朗三不知下落，爲之慘然。夜服藥臥，雨聲甚惡。

十二日黎明，雨稍歇，街市寂然。余偕方越亭、熊瑞圖見維帥，力勸退守新竹就林朝棟、劉永福，圖再舉；左右均怒目相視。王觀庭手六響小槍指熊瑞圖曰：「大人五天不睡，諸君亦宜歇息，誰多言者，手槍擊之！」維帥默然，令暫退。余回臥室，行李已搶掠一空，知事不可爲，取電奏草本藏衣帶中，各處往來密電均焚燬。忽電報房學生來見云：「昨夜電報尚通，三更時王觀廷將線斫斷，局中人已散盡矣。」余急作密函呈維帥曰：「天不佑中國，無可奈何；公心迹可告無罪。惟既不退守新竹，公宜自爲計，不可貽笑天下。電奏本震已帶出，心酸不忍多寫，負公知遇，此恨千古。」午夜，始知署中廚役已散盡，因至藩署設食飽餐。電線已斷，不得前敵消息，創口又時時作痛，焦急，自分必死。酉刻，閩林朝棟、吳光亮均帶兵明日必到，覺有一線生機，急至撫署，則獅球嶺潰兵已入城（今日辰刻失守），城中大亂，黃翼德守儀門，放槍禁人出入，各局所不見一人。時已昏黑，城中積尸徧地（有自前敵受傷拾回者，有廣勇土勇互相殘殺者。），哭聲震耳。余處遑無策，繞至撫署後牆，欲入探維帥消息。署中忽火起，支應局委員周爽（字梅生）帕首腰刀從後牆出，告余維帥剛出城。余追出西門，遇亂兵放槍刦行客，左右走散，僅楊貴、藍玉相從。至大道埕，雇小船乘星光徑渡滬尾，兩岸放槍彈及船舷。四更到海口，上駕時輪船（余隻身出走，用千里鏡皮盒裝洋銀八十枚，幸未刦去，以四十元僱小船，若遲至天明則危矣。）。船上有海關運來銀八箱，兩岸防營大譁，刦銀去。砲臺復開砲轟擊，慘死十六人，余幾不免，因事太不堪，且非兵事所繫，不忍詳記。十五日始脫險到廈門。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七——一〇八。

註二：「臺灣通史」，卷四，獨立紀，頁七一。

註三：「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編，頁十二。

註四：原文見龔明震著：「臺灣八日記」，此處轉引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五冊，頁六一三——六一七。

二十二日（六月十四日） 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至臺北。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二十三日

三七〇

本日，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至臺北，以善後局爲臺灣總督府。遂開府于此，以理軍民之政。（註一）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七。

二十三日（六月十五日） 中日戰後新任日使林董至天津。

馬關條約既經批准交換，中日兩國邦交，宣告恢復，互遣使臣，自爲必然步驟。四月杪，日政府特簡前外務次官男爵林董爲駐華公使，清廷得訊，請駐華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轉電日政府，請暫緩派使，日政府以既復交，應各遣使臣，無庸展緩，田貝乃于本月初九日函告總理衙門曰：

「逕啓者：本日接本國駐日本大臣昨日來電內稱，日本政府請貴大臣轉達中國政府云：田大臣於西曆五月二十七日電請駐日本美國大臣轉達日本政府之電，既已接到，日本意見，兩國最要者，須各派駐紮使臣，況有復和之事，均願辦理，俾全其美。又來電內所云數事，亦須直行商辦完結，無勞轉達。故懇所派之使臣，不必展緩所定前赴天津之期日等因，相應譯錄並照繕原電洋文，一併附送查照可也。」（註二）

清廷知不能阻，而林董即將到津，乃於本月初十日旨派李鴻章、王文韶爲全權大臣，與日本使臣妥議事件。上諭曰：

「寄李鴻章、王文韶：前據美使函，日本已派林董爲使臣，駐紮京師，經總署轉告暫緩前來。據覆稱：兩國須將各事辦完，不必展緩。現日使將抵天津，李鴻章、王文韶俟其到時，即行接待。並派李鴻章、王文韶爲全權大臣，與之妥議事件。欽此。」（註三）

林董于本月十三日自橫濱登輪來華，伊藤電鴻章，希望林董至津時，予以接待。鴻章當電伊藤，謂本人與王文韶奉旨派爲全權大臣，與日使商辦事件，林董自不必進京云。旋得伊藤復電，略謂：「現當此時，以重結邦交爲第一要義，日皇特簡林董委之以此重任，故宜經赴北京，愈速愈妙。」（註三）

本日林董至津，鴻章偕王文韶往晤，商談覲見及交還遼東事。鴻章語林董，彼雖簽字馬關和約，但爲衆論所劾，不能身負責任，俄國已經控制北京，日本應示好于華，聯華爲友。若中、日直接談判，日

本無償還遼，則中國永遠爲日本同盟，允日本建京津路。囑其向伊藤請示。（註四）本日鴻章致電總理衙門，報告與日使晤談之情形。其電曰：

「林董本日已正來謁，會同文韶接晤。寒暄數語後，詢其接伊政府電信否？林云：昨到津始接伊藤等電，稱中堂與王大人已奉派全權大臣會商事件；惟照通例，駐京使臣應先赴京到任，呈遞國書覲見。答以中朝向無一定辦法，有公使到任數年或數月，始覲見者。現值天發炎熱，未知我大皇帝接見方便否？兩國既經和好，早遲必准覲見，何必急急？林云：我奉朝命不敢違，必須先進京，往總署請示，倘令我回津商議公事，我可再來。鴻等詢及遼東何時退還？日兵何時撤盡？林云：我啓程時，三國正議此事，遼東已匯各處之兵，已逐漸撤回，但一時尚難撤完。詢以我前敵各軍探報，海城營口尚添兵。林云：必是各營間有調換，誤報添兵，斷無此事。林又商及，照約兩國俘虜應各送還，廣島、海城有華兵俘虜一千六百人，常即分送；惟照通例，應由華籌給送費。但爲數無多，俟行文到日，分別辦理。問臺灣有信否？林云：久未接樺山信，只知已到基隆。詢其何日進京？云俟酌定水陸路程再告知。以上各節，無甚狡強，鴻等不便強留，致失和氣，俟其抵京，鈞署再妥酌。請先代奏。」（註五）

林董旋自津赴京，親至總理衙門拜訪，王大臣共同接見。閏五月十五日，覲見清帝于文華殿，呈遞國書，蓋自小村壽太郎離華，迄林董至京，北京之無日本使臣足跡者，十一閱月矣！日本國書曰：

「大日本國大皇帝敬白大清國大皇帝：朕欣兩國友誼交情，幸復其舊，寔傳之益臻鞏固親密，茲著朕之正四位勳四等林董，作爲特命全權公使，駐劄闕下。朕素諗董爲人忠誠篤實，勉勉從事，敏達接物，知其必蒙大皇帝寵眷，朕名下董所敷陳，大皇帝善爲信用聽納，實有厚望焉。茲表朕恭敬親愛之衷情，並祈大皇帝康寧。」（註六）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三，頁七。

註二：同註一，頁九。

註三：「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五，頁十九、二十。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五月二十八—三十日

三七二

註四：「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文書，頁一七一—一七二，日使林董報告書。

註五：「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五，頁二三—二四。

註六：同註五，卷四五，頁三四。

二十八日(六月二十日) 慶親王奕劻、吏部侍郎徐用儀與法使施阿蘭(A. Gerand)訂立
中法續議界務專條，允越南鐵路展至中國境內。

恭親王奕訢于本日奏稱：已由慶親王奕劻、吏部侍郎徐用儀，與法使施阿蘭訂立中法續議界務專條
共二十五款，允越南鐵路展延至中國境內。蓋法曾參與三國干涉還遼之事，故不得不允許此項要求，以
示報答也！（註一）

按：當時英使曾表示反對，未果。法人乃得寸進尺，致有日後索取廣州灣之舉。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四，頁一一三。

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一日) 日軍陷臺灣宜蘭。

先是，日軍既得臺北，派軍取宜蘭。二十日，陷南雅，二十一日，至夾圍。本日，入宜蘭縣治，宜
蘭遂陷。（註一）

註一：「臺灣通史」，卷五，頁七二。

三十日(六月二十二日) 日軍陷臺灣新竹。

先是，日軍既占臺北，乃分軍取新竹，旋至鳳山溪，義軍要擊之，戰至暮，新竹遂陷。是時，義軍
四起，富民姜紹祖起北埔，領導所部激烈抗拒，大小凡二十餘戰，紹祖壯烈成仁。（註一）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七。

閏五月

一日（六月二十三日） 劉永福率將士紳民于臺南插血立盟，以甘苦相共，戮力同心相誓，並布告各地，以示決心保臺。

先是，自臺北淪陷後，各地代表雲集臺南，議奉劉永福爲大總統；不從，仍稱幫辦軍務；乃自旗後移住臺南，佈置軍事，舉辦團練保甲，聯絡義民、義軍，以守臺南。本日，躬率將士紳民插血立盟，以不要錢、不要命、不要官，甘苦相共，戮力同心相誓；並布告各地，以示決心。（註一）

附錄：

一、劉永福部署臺南（註二）

光緒二十年秋，南澳鎮總兵劉永福以幫辦臺灣軍務渡臺。二十一年正月，巡撫唐景崧移永福臺南，專防南路，駐營三碗厝，旋移鳳山縣屬之旗后。四月，款議成，棄臺灣，臺人自主。五月中旬，倭人陷基隆，景崧棄臺北遁。時軍備電線鐵路機器局，及茶、糖、鹽、礮、樟腦、茄桐、沈香，與金、煤諸礦大利，皆在臺北，遂舉爲倭有。臺南僻一隅，且海道絕，饌械源已涸，不足守。於是鎮道以下各官，及臺紳丘逢甲、林朝棟等，皆相繼內渡。臺南土匪蜂起，紳民相率至旗后，迎永福，並上民主總統印章，永福不受，仍稱幫辦，入府城議防守。以其子知州成良統福字前軍右軍及中左右各營，守旗後大坪山礮臺；提督陳羅統翔安軍中左右各營，合黃金龍軍防四草湖海口；臺灣鎮標中軍游擊李英，統鎮海中軍前軍（各二營）並道標衛隊，合柏正才、吳錦州軍防白沙墩海口；周明標、張占魁兩營防高樹莊海口；都司柯玉貴統吉林礮隊並安平各臺礮勇，合鄭超英、周得啓、孔憲盈各營，防安平海口。（安平礮臺守將爲蔣國錦、劉立其，小礮臺守將爲張來。）是爲臺南海口之防。以副將袁錫中統領海後軍防後山埤南諸路；空灣城守參將吳世添率右翼練兵駐臺灣府城。是爲臺南內地之防。其勇營則副將楊泗洪所部鎮海中軍（正後兩營）、前軍（右營）、武毅右軍（右營），並吉林礮隊，都司蕭三發所部福軍前敵黑旗各營，守備王德標所部福字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閏五月一日

三七四

七星隊各營，總兵李懋義所部新楚各軍（分統爲副將楊紫雲），知縣忠滿所部忠靖營，鎮海中軍先鋒營，總兵譚少宗所部福字先鋒各營，都司邱啓標所部臺南防軍各營，知縣劉光明所部福字左軍（中營）、右軍（前營）等營，副將吳光忠所部忠字防軍各營。其義兵營則增生、吳湯興之新竹義民各營，林得謙之十八堡義民軍，兵部主事許南英之臺南團練營，生員李清泉、謝鵬翀之五段團練，部署粗備。

二、告示與盟約（註三）

蓋聞天地所存，惟有正氣；鬼神是鑒，亦重同心。去夏中日失和，屈在倭奴，既奪我藩服，復犯我遼東。一任蔓延，實爲李相。澎湖竟失，希圖皇然，聽擺佈於權奸，議賠割以媚敵。永福承天子命，幫辦臺防，聞和議已成，遂終朝隕泣。在皇上苦衷，良非得已；而臣子効力，正在此時。變出非常，改省爲國，民爲自主，仍隸清朝。即各友邦，許爲輔助，何況我輩，敢不維持？嗚呼！爲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內事也，萬死不辭，一時千載，縱使片土之剩，一線之延，亦應保全，不令倭得！雖然，爲大事不拘小節，言戰守須得同心。當此軍需奇絀之時，如有觀望不前之輩，卽未誤事，先用寒心。永福爲倡同人而立大誓，如有公忠體國，卽來歃血聯盟，甘苦勢必同嘗，生死有所不計，諱效桃園結義，愧乏豫州之賢；其執牛耳明心，定託聖朝之福。神明察祭，鑒我隱衷；斧鉞森森，因人發伏。列明誓款，斷不勉強。人爲苦熱心香，惟有開誠告白。凡有同志，繼署芳名。卽卽（卽字疑衍）看滅（滅？）倭，齊抒偉蹟。永福薰沐謹告。

謹將約款列左：

計開

一、臺灣現爲民主之國，凡我同人，代爲固守，雖明爲抗旨，實隱爲遵旨，何以見之？三月間奉電諭：臺宜固守不交，不撤防營，不撤（撤）永福，一也。賠款現尚未交二也，更議之全權大臣，又改放直隸總督王文韶，出使妥議；此公忠盡，非同李比，三也。南北洋大臣，無不允許力助，四也。卽俄國已阻割遼，問永福如果在臺能支持得住，救兵卽到，五也。有此五端，各宜共同戮力，倘有萬一之變，務須堅守下去。

毋以難違君命，而若背盟，天地必誅，神明不祐。

一、永福忝爲盟主，戰事一開，自必甘苦與共，生死與共；惟各統帶、管帶以及哨弁，務須遵約。各營毋得勾（勾？）引漢奸，毋得私通軍情，毋得臨陣退縮，毋得坐視不救。永福既結諸君爲手足，諸君亦宜視各勇如腹心。如有過於苛刻，過於縱容，陽爲公議不直，陰爲神鬼不容。

一、臺灣現爲民主之國，所有軍餉、軍械，臺北已無接濟，孤懸一島，購買亦難。萬一別省之援未到，庫款又絀，必須堅心苦耐，祇求有米可食，亦應同心拒逆，倘有不肖，以此藉口有詞，當伸公議，不與同盟，而嚴辦之。

一、諸君既已聯盟堅誓，如有戰事，務必互相援助，不得避險，不得爭功，而於營勇，尤不得袒庇，各樹門戶；如有稍存意見，難望同心協助，即非同盟之人，人即不責，天決不容。

一、我同人會盟之後，無論官職大小，應如兄弟一樣，經此患難，得保餘生；設有時運不齊，流離困苦，無論遠近，必爲照拂。即重犯身家性命之事，除叛逆違法不便相救，此外亦當盡其心力；而其妻子後人，倘無依靠，尤應顧卹。而是心非，立言不踐，鬼神定殛，厥後不昌。

一、既盟之後，永福布置地段，與夫行事用人，如有不周，各宜明告。緣一己之精神有限，衆人之見解當精，廣益集思，古人且勉；各宜從直，毋有後言。如果確有見聞，而不明告，即非同氣，便屬離心，有負誓言，難邀神祐。

一、如值時事萬難，山窮水盡，各有藏蓄，亟應共用，永福當爲之倡，決不偏累。各人信能同心誓守，皇天應庇，事有轉機。

一、將來乞援別省，勢必專人，責任匪輕，其人難得。應由各盟友共爲保舉，膺茲重託。恐有中途變異，則惟共舉之人是問。

一、臺南道府局三庫存餉，以及發紳生息沙封、學租、魚塢，各書院膏伙額租、沿海埔租、文武墾恩租等款，益以地丁厘金、鹽課、關稅，合計每年能得若干，應用若干，均須涓滴歸公，不容乾沒。卽局員應給薪公

，一併節省，以裕軍需；然不過刻用人，亦令敷衍辦事。如敢故抗多支，即係不顧大局，未便容留，須聽同人，以伸公憤，而予重辦；萬一稍存私見，故事寬容，天必厭之。

一、請託賄賂，承平時已予嚴禁，當此萬難時事，務宜積習盡除，不容稍有。設有故犯，非我同盟之人，應與懲處。至於杯酒羔豚，古人不免，投桃贈李，世道誰無？然不在請託賄賂之條。但軍務甚殷，略而不論，更妙。

一、聯盟之後，凡我同人，籍貫何處，家人若干，須各寫明彙存永福處，以便考。

一、開仗時，或傷或死，在所不免；如有受傷者，無論何人，必調理銀錢，斷不吝惜，照料不可不周；如不顧卹，天必誅之，衆人嚴議。

一、臨陣亡者，必須首先搶尸，暫爲收斂；事平或運或葬，妥爲區處。

一、陣亡者，查明籍貫家人，必爲資送，且卹後人。如無家可歸者，始行擇地安葬，立昭忠祠，春秋祭祀。如因病而故者，不在此例。

一、當此時勢，宜固人心而邀神庇。如果事平，當建大醮酬神，併度忠魂。

一、達人安命，勇將忘生，宜緩預吉而先預凶，先禱（？）一闢大開陽地段，以爲義塚。

一、永福既與各人同盟，即與手足無異，有福則同享，有事則相幫。凡永福不以直心待人，則地滅天誅，遇水則葬魚腹中，上山則爲猛虎食，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各人如有覽望周章，心存叵測，自相殘害者，神明不佑，亦遭天誅地滅，虎食鯨吞。若能衆人一心，兵民一氣，不計生死，共禦倭夷，天地定必鑒觀，鬼神自能呵護，三祖六宗在天之靈爽，當爲默佑。其各勉旃！無負朝廷，恪遵盟誓，同心同德，福有攸歸。

欽命幫辦臺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閩粵南澳總鎮，署福建臺灣總鎮，依博德恩巴圖魯劉永福（廣東欽州直隸州城外人，子成良、成章、成業）。以下蔣國錦、劉立、吳瑞陞等十七名連名。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七。

註二：「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十三—十四。

註三：陳信德譯：「臺灣抗戰日方資料」；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五冊，列強侵略略(三)，頁五九六—五九九。

三日(六月二十五日) 日艦二艘窺安平港，礮臺擊之，乃北去。

本日薄暮，日艦二艘，窺安平口，傍英、德兵船停泊，會劉永福巡礮臺，發二礮，擊斷日船桅桿，日兵落水者十餘人，乃斷鐵索飛駛去。(註一)

註一：「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十四。

六日(六月二十八日) 日總督府頒布臺灣臨時官制，且以臺灣中南部多雨，行軍困難，復囑于劉永福之聲威，日軍暫停進兵。

本日，日本總督府頒布臺灣臨時官制：置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及澎湖廳；惟除臺北外，政令未能推行。當是時，新竹、苗栗、雲林等地義軍，由徐驤、吳湯興、邱國霖、胡嘉猷、簡精華等領導，所在奮起，會同官軍抗敵，以阻日軍南侵。加以中南部多雨，山洪時發，行軍困難；且海上西南風正盛，登陸不便；復因囑于劉永福黑旗軍之聲威，日軍乃暫停進兵。(註二)

註二：「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七。

九日(七月一日) 中國擬向俄、法、德、英四國借款償日賠款，但為俄國反對，故決議向俄借一半，餘向英、德分借。

中國議向俄、法、德、英四國平分借款以償日賠費，俄國反對，故向俄借一半，餘向英、德分借。各國計劃向中國要求政治、經濟及軍事上之特殊權利。(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一〇一，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九日。

十二日(七月四日) 樺山資紀致書劉永福，勸其服從清廷諭旨，停止軍事，當以禮送

歸國，永福覆書拒之。

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由英人介致書劉永福，說以利害，謂大勢已不可爲，勸其服從清廷諭旨，停止軍事，當以禮送歸國。永福復以：「奉命駐守臺灣，義當與臺存亡」，却之。資紀知不可說，遂進兵。是月至六月上旬，義軍數與日軍戰，曾反攻新竹，殲敵騎于大湖口；劉永福亦派吳彭年率黑旗軍北援，與日軍相持于新竹以南達月餘之久。（註一）

附錄：

一、樺山勸降書（註二）

大日本國臺灣總督海軍大將樺山資紀呈書劉君永福足下：自客歲大日本國與清國構難，清國海陸全軍每戰不利。其出外之師，敗於牙山，潰於平壤，覆於黃海；旅順要隘，威海重地，相繼失陷，北洋水師兵輪覆沒全盡。燕遼運命，危在旦夕，於是乎大清國皇帝欽派全權使臣李鴻章、李經方兩員來請媾和。大日本皇帝容其請，派全權使臣於下關會見議和。和議成，定條約數款，臺灣全島並澎湖列島咸爲大清國皇帝所割讓。曩者，欽差全權大臣與本總督相會基隆，完清本島並澎湖列島之授受後，本總督乃開府臺北，綏撫民庶，整理政務，凡古之事，即將就緒。

近聞足下扼守臺南，漫弄干戈，欲回全局。獨以無援孤軍，扼守邊陲城池，大勢之不可爲，不待智者而可知。足下名高才雄，能明事理，精通萬國公法；然而背戾大清國皇帝聖旨，徒學愚頑所爲，本總督竊爲足下惜之。足下若能體大清國皇帝聖旨之所在，速戢干戈，使民庶得以安堵，則本總督將特奏大日本皇帝，以禮送還清國，如部下諸卒，亦當容恕其罪，遣還原籍。已在基隆、臺北、宜蘭及滬尾諸地收容之降附敗殘清兵，或依官船，或付船費，送還原籍者，近八千人。本總督向聞足下姓名，故豫布腹心，告明順逆之理，取捨惟足下自擇，足下請審之。

二、劉永福駁覆書（註三）

劉永福覆書大日本國總督樺山閣下：來書接閱，甚承獎譽，惟所言兩國戰事，語多不悉，今試爲足下陳之。竊

維我大清國皇帝聖祖相承數百年，仁政覃敷，感被中外。當今皇上，尤以柔遠爲懷，故常遣使各國，結聯鄰好。至於貴國，同隸亞洲之土，乃唇齒之邦，講信修睦，載諸盟府，宜守望相承，永遠不渝，庶不爲他國所竊笑。不意貴國背盟背義，棄好尋仇，無端奪我藩封，無端侵我疆土。我中國宿將雄帥，亦昭忠勇，貴國開釁以來，凡我臣民，各懷義憤，無不欲共滅此仇者。適當軸者衰庸誤國，禁止各營接戰，兇傷和局，以致牙山、平壤、威海衛、旅順等處之兵失機，非戰之罪，實當軸者之誤耳！不然，貴國即率傾國之師而來，亦未必得入中國境地也。迨今年四月，我大清國皇帝不忍生靈塗炭，復優容大度，令重修和好。爲貴國計，須念趁此僥倖成功，亟宜知足，統率軍旅回國休息，方爲有識，乃聞佔臺北時，軍律不嚴，殺戮焚擄，無所不至，且有婦女准借之示。嗟嗟！生民何辜，遭此荼毒耶！來書云「開府臺北，撫綏黎庶」，其卽此之謂乎！抑別有所謂善政者耶？自古興國之人，必先被仁布澤，然後民心可得，天下可感。刻下臺北時疫大作，貴國兵勇多病，民情不附，天災流行，已可概見，而足下猶不及時省悟，余甚迷之。

若夫余奉命駐守臺灣，義當與臺灣共存亡。來書謂余背戾大清國皇帝聖旨，甚哉！何見理之不明乎？夫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臺南百姓遮道攀轅，涕泣請命，余既不忘効死，又何忍視黎庶沈淪之慘乎？以是爰整中兵，保此疆土。臺南城池雖屬邊陲，部下共數十營，係久歷戰陣敢死之士，兼有義兵數萬衆，人人飲血枕戈，誓死敵前，糧餉既足，軍械亦精，生熟兩番，聯爲一氣，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天之不亡，雖婦孺亦知之。

足下總督全師，爲一國大將，長才卓識，超邁尋常，何不上體天時，下揆民心？試觀臺北之瘟疫死亡，天時不順，道路怨嗟，民人不歸，足下深明事理，豈見不及此耶？惟足下仰觀俯察，暢然曉悟，卽刻撤回全師，不惟全臺百姓感戴難忘，足下大義昭然，將千秋不朽也。

三、臺灣義軍反攻（註四）

蓋自臺北淪陷，逢甲、朝棟相繼委中路去，永福令楊紫雲率新整軍代之，拒倭於新竹，相持月許。凡大小二十餘戰，互有傷亡。至是奸民導倭，由僻徑抄我，紫雲戰歿。永福令營務處府經歷吳彭年率軍往援，不及，遂據大甲

溪爲守。六月十七日，福字先鋒左營營官湯人貴，福字右營營官袁錦清合隊進攻新竹倭壘，獲勝。十八日，倭人來攻，義民長生員徐驥爲所困，敗退。倭追甚急，驥反關，倭人以路險箝深，敵無所施，退去。驥率健卒由間道繞出其後，突發擡槍，倭驚擾，擒倭兵三人，奪馬三匹，槍械數十桿。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七—一〇八。

註二：原文見陳信德譯：「臺灣抗戰口方資料」，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五冊，頁六〇三—六〇四。

註三：同註二，頁六〇四—六〇五。

註四：「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十四—十五。

十四日（七月六日） 中俄在聖彼得堡訂立四釐借款合同，由俄、法銀行團合借四萬萬法郎於中國，償付對日賠款。

中國奉准全權大臣許景澄于本日奉清德宗諭旨與俄國各銀行會董訂立合同，借款四萬萬法郎（合一萬萬兩，實收九四又八分之一。），由許景澄出給借款總據，與會董收執，年息四釐。實則由俄法會同借與，參加貸款法國銀行六家，共貸二億五千萬法郎，俄國四家，共貸一億五千萬法郎，由俄國政府擔保。此爲中日戰後第一次借款，用以償付對日之賠款，合同中規定自西歷本年七月一日起算，每年還本息二千一百五十餘萬法郎，三十六年還清，十五年後亦可全還，並定在巴黎交款，如交款誤期，並定有罰則。（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頁六一—一四。

十五日（七月七日） 兩江總督劉坤一奏：聯俄拒日，以保東北。旋張之洞亦於同月二十七日奏，請與俄訂立密約，以結強援。

初，中國方敗于日，俄國一言，索還遼東，感德望援，乃咸集目于俄。慈禧與李鴻章固夙主親俄，

迨經三國索還遼東，內而廷臣，外而疆吏，乃無不以聯俄拒日爲言矣！劉坤一、張之洞爲當時疆吏之佼佼者，均主對俄締結密約，以結強援。茲錄其奏摺如下，以見當時輿論之一斑。劉坤一之奏曰：

「奏爲密陳大計聯俄拒倭以鞏陪京而維全局恭摺仰祈聖鑒事：臣維華洋交涉，垂三十年，至今日事益棘手。中國剛柔之用，貴隨時變通；各國向背之機，在因勢利導。自越南之役，中國措施失當，頗爲各國所輕；此次與倭議和，諸多遷就，益啓四夷窺伺之漸。虎視眈眈，皆思擇肥而噬。我自度力不能敵，不可不亟聯邦交，以資將伯之助。以臣愚見，各國之患猶緩，惟日本之患爲急。蓋其國與我偕近，若得臺灣、遼東，則來路益便，直從枕席過師，隨在被其侵軼也。日本之患，沿海猶緩，東三省爲急。蓋知爲我覬覦重地，三陵所在，勢在必爭，動輒覬覦，以圖要挾也。此係切膚之痛，有識者莫不以爲深憂。第倭之強，非俄所願；倭之擾我東三省，尤爲俄所忌。是以中倭和約業經割予遼東，而俄與法德勒令退還，詎專爲我，亦自爲耳。我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爲聲援，並稍予以便宜，俄必樂於從我。縱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東三省與俄毗連之地，倭必不敢生心，則保全之利，較沿海各省奚啻萬倍？倘東三省有失，則我朝何以奠根本？皇上何以對祖宗？此臣每一慮及不禁心驚肉顫也。或謂俄與中國接壤最寬，將來必爲害於中國，臣前此亦以爲然，今則頗知其說之謬，亦視我之撫馭何如？俄疆宇已廣，且信義素敦，與我修好二百數十年，絕無戰事，實爲千古所未有，垂之史冊，可爲美談。前以伊犁還我，此次與法德爭還中國遼東，其爲德於我更大。而顧疑其有他，不復推誠相與，則是合者離之，厚者薄之，將謂中國不足爲緣，我益成孤立之勢。伏乞皇上密飭總理衙門及出使諸臣，凡與俄交涉之事，務須曲爲維持，有時意見參差，亦須設法彌縫，不使起釁，中俄邦交永固，則倭與各國有所顧忌，不至視我蔑如，狡焉思啓矣。國是所係，不敢緘默自甘，敬抒一得之愚，伏候聖明采擇。所有聯俄拒倭以維全局各緣由，謹恭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一）

張之洞之奏曰：

「再今日救急要策，莫如立密約以結強援。從古各國角立之時，大率皆用遠交近攻之道，而於今日中日情勢爲尤切。今日中國之力，斷不能兼與東西洋各國相抗，此時事機甚緊，變故甚多，卽日夜汲汲，籌辦經營，仍恐不及

，若不急謀一紓禍患之方，恐無喘息自強之暇。查外洋近年風氣，於各國泛交之中，必別有獨加親厚之一二國。平日預訂密約，有戰事時，凡兵餉軍火，可以互相援助；若無密約者，有事便守局外，不肯干預。今欲立約結援，自惟有俄國最便。緣英以商腹中國之利，法以教誘中國之民，德不與我接壤，美不肯預人兵事，皆難議此。查俄與中國，乃二百餘年盟聘鄰邦，從未開釁，本與他國之屢次搆兵者不同，且其舉動闊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即如同治庚午天津教堂之事，各國爭鬭，而俄國不與其事。伊犁之約，我國家將十八條全行駁改，而俄國慨然允從。此次爲我索還遼地，雖自爲東方大局計，而中國已實受其益，日人兇鋒，藉此少挫。較之他國袖手旁觀，隱圖商利，相去遠矣！正宜乘此力加聯絡，厚其交誼，與之訂立密約，凡關繫俄國之商務界務，酌與通融。如俄國用兵於東方，水師則助其煤糧，准其兵船入我陽修理；陸路則許其假道，供其資糧車馬一切，視其所資於我者，量爲協濟。而與之約定，若中國有事，則俄須助我以兵，水師尤要，並與議定如何酬報之法。蓋俄深忌英獨擅東方之利，中俄相結，則英勢稍戢，俄必願從。總之，中國惟海軍練成不易，如有俄人之助，將來無論何國尋釁，數旬之後，可以立發兵艦數十艘，游行東方海面，則我得以專備陸路戰守之計，而敵人亦不能爲深入內犯之謀。此尤邦交之微權救急之策也。中國於外洋各國，向皆一例齊觀，此次遂無援助。此等事須平日預籌，及今圖之，萬不可緩。應請旨敕下王大臣，密行籌商妥辦，惟萬不可使赫德聞知，恐其忌阻誤事。謹奏。」（註二）

按：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李鴻章使歐，賀俄皇加冕，締結中俄密約，乃造成固結莫解之滿洲糾紛，此事之發動，固在俄方，而中國方面促成之者，固非鴻章、慈禧一二人之力也。觀七二人之奏章，可見其時主親俄者，疆吏如張、劉二人，亦不例外，可謂舉國上下，咸集目于俄，而李鴻章乃代罪之羔羊耳！後世獨責鴻章，實昧于當時之實情也。

註一：「劉忠誠公遺集」，奏疏，卷二四，頁三二九三—三二九六，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註二：「張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七，頁三十六至三十九，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十八日（七月十日） 清廷派裕庚為駐日公使。

日本既已遣使來華，清廷亦不得不于本日旨派裕庚爲甲午戰後首任駐日公使。上諭曰：「二品銜廣東惠潮嘉道裕庚，着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日本國欽差大臣。欽此。」（註一）

裕庚既奉命，乃至都請訓，六月二十二日陛辭，七月初四日，自津登輪，七日抵上海，二十日登法國郵船東渡，二十五日抵東京。裕庚抵東京之日，東京府知事曾出示曰：

「日、清和好如初，兩國臣民亟宜互相敬禮。現在清使來京，勿論對公使及對參隨僕從人等，皆不得有不敬之舉動，如以戰事之餘響，引兒童在途上嘲弄侮慢，有于懲處，爾市民宜各注意，爲父兄者，督責子弟勿違。」（註二）

由此可見日人曾有狎侮中國使節之舉也！

按：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駐日大使返美後曾語人云：「日本氣小易盈，盈則四鄰不安。」此其一；「日本人之民族性在難以與人爲善。」此其二。（註三）氣小易盈者，則恆表現爲凌弱傲人；難以與人爲善者，則恆表現爲狂妄殘忍，自私吝鄙，證之于上文之告示，及小山豐太郎之行刺李鴻章，益可信上言之不誣也？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頁二一。

註二：陸奧宗光：「蹇蹇錄」，頁二四七。

註三：Joseph Grew, Ten Years in Japa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07.

二十七日（七月十九日） 日本宣佈臺灣海峽爲國際公共航路；並聲明如中國賠款五千萬兩，可贖還遼東半島。

日本政府于本日對外宣言：臺灣海峽爲各國公共之航路；同時其外相亦面致覺書於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要求中國賠款五千萬兩，贖還遼東半島。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閏五月二十七日

三八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六月一日

三八四

俄德法三國之干涉遼遼，至日皇四月十六日頒佈詔書接受勸告，而告一段落。然關於實際交收遼東之事，日本自不允無條件交還中國。故關於此事，俄德法三國與日本迄在交涉之中。日本政府遂于本日宣言臺灣海峽爲各國公共航路，蓋爲減少三國之反感。同日日本政府臨時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約晤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面致一覺書云：

「日本帝國政府在直接與中國開議之前，宣言：

一、日本政府鑒於中國償付與交還地域價值相當之款額，殊屬困難，特將以交還遼東半島爲條件之賠款數目，定爲五千萬兩。

二、日本政府準備於中國償清上項賠款及戰費賠款第一次應付數目後，將軍隊撤至金州，並於中國交清戰費賠款第二次應付數目及交換修訂通商行船條約後，即行退出遼東半島。

三、日本政府認臺灣海峽爲公共航路，並不歸日本管轄，亦非日本所得獨自利用。日本政府宣言，不將臺灣及澎湖列島，讓與他國。」（註一）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文書部份，頁一七一—一七二。

六月

一日（七月二十二日） 清廷命京內外各衙門，嗣後一切公文，不得以「島夷」稱日本。

日使林董覲見後之第一次交涉，即請中國勿以「島夷」二字稱日本，蓋以京報摺內指稱島夷也；渠與總理衙門辯論再四，總理衙門遂于本日奏曰：

「奏爲請旨申明條約以顯邦交恭摺仰祈聖鑒事：臣衙門查咸豐八年英約第五十一款內載，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不得提書夷字，早經通行在案，各國事同一律，現據日本使臣林董函稱：近閱京報摺內，指稱島夷，請速更正，並請旨飭禁等語。臣等以中外既敦睦誼，文字之間，理宜慎重，英約通行已久，豈可視爲具文，相應請旨飭下京外各衙門，嗣後一切公文，仍不得提書夷字，以符成約，恭候命下臣等欽遵，通行各衙門一體照辦。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遵行，謹奏。」（註一）

奏上，當日奉硃批：「依議」，軍機處遂傳知總理衙門轉飭京內外各衙門遵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六，頁一。

五日（七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孫毓汶退出軍機處，並開去兵部尚書缺。

兵部尚書孫毓汶奏：因病懇請解職，允之。蓋孫主持中日和約，爲輿論所不容，早先曾申請開缺，已賞假一月，至是，乃如所請。（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〇，頁三三六三（原頁五）。

十二日（八月二日） 清德宗召見袁世凱。

本日清德宗召見浙江溫處道袁世凱，命交督辦軍務處王大臣差委。（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〇，頁三三六七、三三六八（原頁十四—十五）。

十七日（八月七日） 清廷命徐用儀退出軍機處，並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上行走。

清廷諭內閣：「吏部左侍郎徐用儀，着退出軍機處，並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註二）起因於御史王鵬運參劾其附和孫毓汶，迎合李鴻章。摺爲康有爲代草。（註二）

清廷命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因恭親王奕訢所舉薦，清廷命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註三）
本日翁同龢日記記其事曰：

「恭聞恩命，臣與李鴻藻，均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即叩頭謝訖，前此固嘗一辭，再辭，語已罄竭，固無可說也！」（註四）

清廷命禮部左侍郎錢應溥，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錢應溥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之命，亦因恭親王奕訢所舉薦。（註五）

清廷以麟書為大學士，崑岡協辦大學士。

清廷授協辦大學士麟書為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命禮部尚書崑岡，協辦大學士。（註六）

按：「行走」含有「見習」、「候補」、「幫辦」等意，如在總理衙門「行走」，意指幫同辦理該衙門之事務。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即為「見習」或「候補」軍機大臣。清例對新任命之軍機大臣，均如此稱呼。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頁三三七（原頁一）。

註二：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頁三四，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叢刊本。

註三：同註一，卷三七，頁三三七（原頁一二）。

註四：「翁文恭公日記」，乙未年，六月十七日條，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四)，頁七二六八。

註五：「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頁三三七（原頁一二）。

註六：同註五。

十八日（八月八日） 清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請與俄訂立密約以結強援之摺到京。

先是三國干涉還遼之事發生後，朝野人士多主結強鄰以爲外援，聯俄之議因之大起，疆吏張之洞、劉坤一等持之尤力。本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之洞於「籲請修備儲才摺」中（共分九事：練陸軍、治海軍、造鐵路、設槍砲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多派游歷人員、預備巡幸之所。）附有「密陳結援要策」片。（已詳閏五月十五日條）（註一）

註一：「張文襄公全集」，卷二十七，頁三六—三九。

二十一日（八月十一日） 清廷以榮祿爲兵部尚書。

清廷授榮祿爲兵部尚書，蓋西太后之意也！（註二）

註二：「翁文恭公日記」（戊），頁七二七—。

二十三日（八月十五日） 日軍陷苗栗，吳彭年、吳湯興、徐驤力戰失利，退大甲、彰化。

日本近衛師團于本日繼陷苗栗，吳彭年、吳湯興、徐驤力戰失利，退大甲、彰化。大甲、臺灣府（今臺中）旋亦失陷。（註一）連橫敘其經過曰：

「初吳湯興起兵苗栗，因餉事，與知縣李烱齟齬，飛電告急，彼此各執一辭，永福惶恐，令幕僚吳彭年率七星旗兵七百往，李維義副之，至彰化，臺灣府知府黎景嵩請以維義援頭份，彭年亦趣赴苗栗。六月二十日，日軍攻頭份，新楚軍副將楊紫雲戰歿，維義敗回。日軍攻苗栗，前敵諸軍請濟師，永福苦無以應。初臺南獨立之時，道庫僅存銀七萬餘兩，府庫亦六萬餘兩，乃設官票局，權發鈔票，以莊明德理之。一時占上流術，南北洋大臣各派員視師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七月一日

三八八

，謀接濟，且有俄人願任保護之語。四川舉人張羅澄寓書永福，請力守，將借藩外兵以援。然迫於盟約不成，而餉匱械絀，唯閩粵總督各貽舊槍一二千桿彈藥數萬粒而已。稅務司麥嘉林請設郵政局，未旬日而徵銀五千餘兩。二十日，貴議院籌餉，咸束手無策，而前敵乞援急，乃搜括八千兩與之，再令幕僚羅綺章渡廈，籲援各省。辭甚哀痛。」（註一）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八。

註二：連橫：「臺灣通史」，卷五，獨立紀，頁七三。

二十九日（八月十九日） 德外相馬沙爾贊同俄建議。由中國以三千萬兩贖還遼東半島。

德國外相馬沙爾（Marshall）致電俄國政府，贊同俄國建議，由中國償款三千萬兩贖還遼東，不再附任何條件。（註一）

註一：王光祈譯：「三國干涉還遼秘聞」，民國二十二年，中華再版本。

七月

一日（八月二十日） 清廷命翁同龢管理同文館事務。

翁同龢之管理同文館，出自徐用儀之舉薦，其日記記其事曰：「上派管理同文館事，同文館統于譯署，而專派兩人管理，必徐用儀薦也。」（註一）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七），頁七二七九。

八日(八月二十七日) 香港英政府下令封閉興中會機關「乾亨行」。(註一)

按：據馮自由所記：「是秋七月各方運動將次成熟，衆以乾亨行漸有暗探窺伺，遂于是月初八日撤消之。」

「(註二)是則「乾亨行」之關閉乃由於黨人自行關閉，而非香港政府下令關閉也！並存此說以供參證。

註一：謝讚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九。

註二：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四；「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一三，亦有同樣記載。

九日(八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李鴻章入閣辦事，調王文韶為直隸總督，兼充辦理通商務北洋大臣。

本日，鴻章至京陛見，清德宗先慰問血傷癒否，後詰責云：「汝身為重臣，兩萬萬款，從何而來？如何籌措？臺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

詞甚駭厲，鴻章亦引咎唯唯。旋命入閣辦事，調王文韶為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帝並誓言再不與鴻章實權任事。(註一)

日軍陷臺灣彰化。

本日，彰化繼陷，吳彭年、吳湯興俱以苦戰身殉，同死者五百人。連橫詳述其事曰：

「二十八日，日艦三艦窺臺南，嚮午一艦近安平，開兩礮而去。七月朔，復窺枋寮，已而至布袋嘴，以斥候上陸，詰永福所在。總兵譚少宗戍此，未敢戰。旬日以來，遊弋臺南，沿海戒備，蓋欲以牽制永福而力撲大甲溪也。先是彭年援苗，急就地召募，未成。二十日，日軍破苗栗，李焯奔枋棲港，走福州，維義敗回，猝率所部拒戰，吳湯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七月八、九日

三八九

與、徐驥助之，稍勝。初四日，日軍以山根支隊進攻，大隊繼之，管帶袁錦清、林鴻貴皆戰死。吳、徐退守府治，彭年駐兵牛鵝頭，將扼大甲溪，而募勇夜譁，撤回彰化，電告永福濟師。彰化爲中路重邑，舉人施葵、貢生吳德功設籌防局，謀戰事，永福檄安平知縣忠滿援之，滿不可。遣人說永福出戰，而己居守。永福怒，以鄭文海知縣事，乃率四營往，逗留不進。吳湯與所部索餉，環府門而譁。知府黎景嵩不能制，請彭年兼統之。再電濟師，永福疑其規避，不聽，而日軍已迫大肚溪矣。城僚議棄城，彭年止之，再電聞。令曰，兵來禦之，死守無恐，乃移駐城外。次日，遇日軍結筏渡溪，徐驥拒之，伏叢莽中狙擊，日軍將濟，而李邦華亦率鄉勇數千至。然日軍野礮甚厲，死者千餘人，吳湯與、沈仲安來援，截日軍爲二，擊退之。次日，再戰於李厝莊，小勝。將奪大甲，而諜報葫蘆墩危，提督陳尙志戰死。彭年調彰化知縣羅樹勛援之，會於頭家厝莊，莊豪林大春、賴寬預設國姓會，連絡數十社，率子弟千人助戰，相持一日夜，終不敵。初五日，府城陷，樹勛收兵回，而日軍亦繞過北投，分兩隊，以川村爲左翼，山根爲右翼，進攻彰化。彰城小如斗，八卦山在其東，俯瞰城中，山破即城亦破，故建壘其上，晚早雷兵二百自南至，欲布雷於溪畔，而早雷自海運跑港，緩且不及，翌日，彭年誓師，以王得標率七星旗兵三百守中寮，劉得勝率先鋒營守中莊，孔憲盈守茄荖脚，李士炳、沈福山各率所部守八卦山。初九日黎明，日軍以一中隊涉溪，迫黑旗營，又以一中隊擊其背。彭年聞壁出，而別隊已直搗八卦山，吳湯與、徐驥拒戰，力竭殫罄，湯與死焉，彭年回軍救。率衆奪山，中彈死，李士炳、沈福山、湯人貴皆歿，死者幾五百人，景嵩、樹勛各微服逃，日軍入城。」（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二頁，三三八〇（原頁八）；「翁文恭公日記」四，頁七二八三—七二八四。

註二：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五，獨立紀，頁七三—七四。

十日（八月二十九日） 孫先生文在香港與同志會議，商攻取廣州方略。

孫先生、楊衢雲、何啓等在香港商攻取廣州方略。由德臣西報記者黎德(Thomas H. Haid)擔任運動英國承認將來之中國革命政府。馮自由記其事曰：

「孫、楊諸人假西營盤杏花樓開會。何啓及西報記者黎德亦在座。衆推何啓主席。是日議決攻取方略甚詳。黎

德允擔任運動英國政府承認中國革命政府，不加干涉。」（註一）

按：馮自由云此事發生于九日，而國父年譜列爲十日，或有所本，故從之。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一三一—一四。

十三日（九月一日） 康有為在北京成立強學會，陳熾、袁世凱等均與聞，梁啓超為書

記。

康有為、陳熾、沈曾植、袁世凱、張孝謙、文廷式、楊銳、徐世昌、丁立鈞、王鵬運等創立「強學會」於北京，推梁啓超為書記，惟正式開辦約在同年十一月間。梁啓超曾記其事曰：

「其年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之者爲南海先生，贊之者爲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蓋鄙人與諸先輩感國事之危殆，非興學不足以救亡，乃共謀設立學校，以輸入歐美之學術于國中，惟當時社會嫉新學如仇，一言辦學，即視同叛逆，迫害無所不至，是以諸先輩不能公然設立正式之學校，而組織一強學會，備置圖書儀器，邀人來觀，冀輸入世界之知識于我國民，且于講學之外謀政治之改革。蓋強學會之性質，實兼學校與政黨而一之焉！……然在當時風氣未開之際，有聞強學會之名者，莫不驚駭而疑有非常之舉，此幼稚之強學會，遂能戰勝數千年舊習慣，而一新當時耳目，具革新中國社會之功，實亦不可輕視之也。……迨乙未之末，爲步軍統領所封禁，所有書籍儀器盡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爲一世界地圖。蓋常購此圖時，曾在京師費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復輾轉托人，始從上海購來，圖至之後，會中人視同拱璧，日出求人來觀，偶得一人來觀，即欣喜無量，乃此圖當時封禁，亦被步軍統領衙門抄去，今不知輾轉落在何處矣。及至戊戌之歲，朝廷大有革新之望，孫壽彬先生本強學會會長，與同人謀，請之樞府，將所查抄強學會之書籍儀器發出，改爲官書局，嗣後此官書局，即改爲北京大學堂，故言及鄙人與大學校之關係，則以大學校之前身為官書局，官書局之前身為強學會，則鄙人固可爲有關係之人也？」（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七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七月十四、二十日

三九二

按：強學會又名強學書局，以鼓吹改革，激勵士氣為宗旨，每十日一集會，每次有人演說。梁啟超所著「戊戌政變記」，謂此會所辦之事有五：（一）譯東西文書籍，（二）刊布新聞，（三）開大圖書館，四設博物儀器院，四建立政治學院。（註二）康有為捐資創「萬國公報」（一名中外紀聞），由梁啟超、麥孟華等任編輯，日印二千份，備送親貴士大夫。

俄國派員在東三省擅自查勘路線。

俄國派員在東三省私自查勘路線，不聽地方官約束，本日吉林將軍恩澤致總署電曰：

「據琿春電稱：俄官帶人十數名，持俄國護照，擬取道南崗赴長白山奉天游歷，請飭保護等語。當告以地屬荒山，礙難保護，俄照行於內地，與定章不符，囑令來臺換照，竟不允從，業已逕行矣。」（註三）

註一：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上，頁二五——二六，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世界書局初版；民國元年十月卅一日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原文載「梁任公先生演說集」，第一輯，頁六七。

註二：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頁一二六，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中華書局初版。

註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頁一一。

十四日（九月二日） 日軍進攻臺灣中南部之他里霧、雲林，我軍抗戰至烈，死六百餘人。

日軍進攻他里霧、雲林，我軍激烈抵抗，死六百餘人。是月下旬，日軍疾疫大作，死者頗夥，日近衛師團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亦以傷歿。（註一）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八。

二十日（九月八日） 津海關道盛宣懷在天津開辦中西學堂，以伍廷芳為頭等學堂總辦

；蔡紹基為二等學堂總辦；美國副領事丁家立(Charese D. Tenney)為總教習。

盛宣懷自敘其事曰：

「臣上年在津海關道任內籌款設立學堂，招選生徒，延訂華、洋教習，分教天算、輿地、格致、製造汽機、化學諸學。」(註一)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一，頁十一，民國五十二年六月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二十四日(九月十二日) 清廷調德壽為江西巡撫，胡聘之為陝西巡撫，陳寶箴為湖南巡撫。

(註一)

江西巡撫德馨以貪婪荒縱，革職。調湖南巡撫德壽為江西巡撫，升直隸布政使陳寶箴為湖南巡撫。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三，頁三三九〇(原頁十一—十二)。

八月

五日(九月二十三日) 翁同龢與自俄回京之王之春商聯俄事。

翁文恭公日記詳記此事曰：「王爵棠方伯之春來長談，奉使俄國以頭等欽差優待，並有肺腑語，言及機不可失。」(註一)

按：王之春於去歲以專使銜赴俄吊俄皇亞歷山大之喪，後滯巴黎甚久，與法政府交涉收回臺灣。王氏在清季為聯俄派之重要份子，著有「國朝柔遠記」，以通達洋務見稱。後人皆誤以中俄密約為李鴻章所首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七日

三九四

倡，實則觀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之奏議，及此處翁氏之日記，可見當時之元老重臣，幾無不以聯俄爲職志也！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他)，頁七二九九。

七日(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與西班牙，在東京舉行談判，商定以巴士海峽(Bashi Chan)為二國之境界線，峽以北屬日本(臺灣)，峽以南屬西班牙、菲律賓。

臺灣在太平洋上，與菲律賓羣島鄰接，臺灣既歸日本領有，乃有確定疆界之舉。菲律賓羣島當時爲西班牙之領土，經日本臨時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與西班牙駐日全權公使加尼沃，在東京談判，商定以巴士海峽爲兩國之境界線。峽以北屬日本，峽以南屬西班牙。于本日簽定日西兩國境條約三條，以宣言形式發表。其文如次：

「日本國皇帝陛下之政府及西班牙皇帝陛下之政府，均希望增進兩國間現存之友誼，並信明確認清太平洋西部兩國版圖之所領權，實爲求達此項希望之一助。爲此兩國政府所委全權，即日本國皇帝陛下之文部大臣臨時代理外務大臣侯爵西園寺公望，及西班牙皇帝陛下之特命全權公使加尼沃，協議並決定左列宣言：

第一、以通過巴士海峽可以航行海面中央之緯度併行線，爲太平洋西部日本及西班牙兩國版圖之境界線。

第二、西班牙宣言不以該境界線之北方及東北方之島嶼爲其所有領土。

第三、日本政府宣言，不以該境界線之南方及東南方之島嶼爲其所有領土。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即西元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東京作成宣言書二份。侯爵西園寺公望、全權公使加尼沃。」(註一)

越三年(一八九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美國與西班牙爲古巴問題開戰，西班牙戰敗，依是年十二月十日(十月二十七日)之巴黎條約，西班牙將菲律賓羣島割讓與美國，美國在太平洋上之勢力自此

東漸。然自美國領有菲律賓後，對上記之日西國境條約，並無否認之表示，故日本認此條約在日美之間亦尙有效也。（註二）

註一：日本東亞同文會編：「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頁二六，日本昭和四年，東京丸善株式會社本。

註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頁七一——七三。

八日（九月二十三日） 清廷新任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呈遞國書。

本日清廷新任駐日公使裕庚覲見日皇，呈遞國書，而完和好之禮。國書曰：

「大清國大皇帝敬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我兩國同洲鄰近，素敦和好，茲幸友誼如初，尤望益臻妥善。特命二品銜候補四品京堂裕庚，爲出使駐劄貴國都城欽差大臣，並令親齎國書，以表真心和好之據。朕知該大臣和平通達，才識素優，辦理兩國交涉事件，必能愜當，務望大皇帝推誠相待，俾盡厥職，以永敦友睦，共享昇平，朕有厚望焉。」（註一）

註一：「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五，頁四五。

十一日（九月二十九日） 清廷以成都教堂被毀，外省教案疊出，各國要求懲辦官吏，革四川總督劉秉璋職，永不敘用。

清廷諭內閣曰：

「前因四川省有疊毀教堂之案，茲特降旨，將辦理不善之總督劉秉璋革職，從重懲處。茲據恭壽、鹿傳霖奏稱：現經切實查辦，肇獲首從各犯王睡亭等二十三名，內訊明就地正法者六名，擬軍流、枷杖者十七名，自足以昭炯戒而儆將來。所有辦理不善之邛州知州周鳳藻、署大邑縣知縣沈圻、署冕寧縣知縣信元良、新津縣知縣栗東、灌縣知縣范萬選，業經先後參撤外；辦理保甲局候補道周振瓊，著撤去差使，交部議處。署成都府知府唐承烈、署華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八、十一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十二、十八日

三九六

陽縣兼署成都縣候補知縣黃道榮、署城守營遊擊向慈、樂山縣知縣洪祖年、署樂山汎千總黃承烈，均著交部議處。

「（註一）」

按：自英、法聯軍後，教案迭起，外人常切責其故在清廷官吏之故意縱容所致也；然觀此諭旨及所引之奏文，可見清廷督責之嚴厲，下屬查辦之切實，外人之議論，大抵皆屬不明真象之論也！

袁世凱謁見翁同龢，大得同龢激賞。

本日，袁世凱謁見督辦軍務處大臣翁同龢，談洋務。同龢以世凱「家世將才，嫻習兵略，如能特練一軍，必能矯中國綠防各營之弊。」囑世凱於暇時擬步兵訓練章程。（註二）翁文恭公日記記其事曰：

「袁慰亭來辭，談洋務事，點心去，此人不滑，可任也。」（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五，頁三四〇七（原頁九一十）。

註二：沈祖憲、吳闔生「容庵弟子記」卷二，頁五，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文星書店影印版。

註三：「翁文恭公日記」，乙未年，頁八十二。

十二日（九月三十日） 李鴻章與日使林董談判中、日商約，日方提出依泰西各國往例，擬訂約稿四十款。

本日，鴻章與日使林董在總署談判中、日商約，日方提出依泰西各國例通商約稿四十款。要求派駐領事，內地遊歷，日商運往中國或中國運往日本，均得視為進出口貨，稅則與泰西各國一律。日本在中國製造之貨物，除納值百抽二外，餘一概豁免，日本享受領事裁判權與西洋同。（註一）

註一：林董報告。

十八日（十月六日） 孫先生文創設農學會於廣州，以為策進革命之外圍團體，撰刊緣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起書，廣徵同志。

時興中會軍事發動計劃已定，由黨人分別認定任務，分途進行。孫先生與楊衢雲擔任尤多，當時劃分任務爲二：一、香港後防由楊衢雲、陳少白、黃詠商、鄧蔭南任之；二、廣州發難，由孫先生親率鄭士良、陸皓東任之。孫先生既至廣州，以醫術結交于當時之達官顯宦，頗受推垂。孫先生經常高談時政，放言無忌，雖語及排滿，聞者僅以狂士目之，絕未介意。本日乃假創設農學會爲起義機關，撰刊緣起書，廣徵同志。粵紳不知底細者，亦多列名贊助，劉學詢、潘寶璜等皆資助署名爲發起人。旋設分機關二處：一爲城內雙門底上街王家祠之「雲崗別墅」，一爲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其餘儲物及招待之所，省河南北共約數十處，另購備小輪二艘。東、西、北江同志往來如織，孫先生與尤列長駐「雲崗別墅」，諸事悉由孫先生指揮之。（註一）

按：孫先生所撰之農學會緣起書，乃其觀察西方各國之經驗以求救正中國教育之缺失。此一思想與往年五月上李鴻章書中所提出之「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之四大綱，可謂一脈相承。近代經濟學家所提出之「教育、人力資源與經濟成長」(Education, Manpower and Economic Growth)，殊亦不出孫先生之觀點與原則也。（註二）孫先生所主張之「無民非士，無士非民」之教育理想，亦即今日普及教育與專業教育所追求之目的也。（註三）

附錄：國父創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註四）

間嘗綜覽古今，曠觀世宙，國家得臻隆盛，人民克享雍熙者，無非上賴君相之經綸，下藉師儒之學術，有以陶鎔鼓舞之而已。是一國之興衰，繫夫上下之責任：師儒不以獨善自諉，君相不以福威自雄，然後朝野交孚，君民一體，國於是始得長治久安。我中國衰敗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經年，全軍幾至覆沒，喪師賠款，蒙恥辱羞，割地求和，損威失體，外洋傳播，編成談笑之資，雖欲諱之，而無可諱也。追求積弱之故，不得盡歸咎於廊廟之上，即舉國之士農工商，亦當自任其過焉。蓋觀泰西上庶，忠君愛國，好義急公，無論一技之能，皆獻於朝而公於衆，

以立民生富強之基；故民間講求學問之會，無地不有，智者出其才能，愚者遵其指授，羣策羣力，精益求精，物產於以豐盈，國脈因之鞏固。說者徒羨其國多善政，吾則謂其國多士人；蓋中華以士爲四民之首，此外則不列於儒林矣，而泰西諸國則不然，以士類而貫四民，農夫也有講求耕植之會，工匠也有講求製器之會，商賈也有講求貿易之會，皆能闡明新法，著書立說，各擅專門，則稱之曰農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詞。以視我國之農僅爲農，工僅爲工，商僅爲商者，相去奚啻霄壤哉？故欲我國轉弱爲強，反衰爲盛，必俟學校振興，家絃戶誦，無民非士，無士非民，而後可與泰西諸國並駕齊驅，馳騁於地球之上。若沾沾焉以練兵製械爲自強計，是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也，惡可乎？意者當國諸公以爲君子惟大者遠者之是務，一意整軍經武，不屑問及細事耶？果爾則我儕小民，正宜籌更小者近者以稱小人之分量矣。某也、農家子也，生於畎畝，早知稼穡之艱難，弱冠負笈外洋，洞悉西歐政教，近世新學，靡不博覽研求。至於耕植一門，更爲致力，誠以中華自古養成之政，首重農桑，非如邊外以游牧，及西歐以商賈強國可比。且國中戶口甲於五洲，倘不於農務大加整頓，舉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艱，哀鴻遍野，其弊可預決也。故於去春，孑身數萬里，重歷各國，親察治田墾地新法，以增識見，決意出己所學，以提倡斯民。伏念我粵東一省，於泰西各種新學，聞之最先，縉紳先生不少留心當世之務，同志者定不乏人，今特創立農學會於省城，以收集思廣益之實效。首以繙譯爲本，搜羅各國農桑新書，譯成漢文，俾開風氣之先。卽於會中設立學堂，以教授優秀，造就其爲農學之師；且以化學詳覈各處土產物質，闡明相生相剋之理，著成專書，以教農民，照之耕植。再開設博覽會，出重賞以勵農民。又勸糾集資本，以開墾荒地，此皆本會之要舉也。至於上懇國家立局設官，以維持農務，是在當道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文正抱此志於未達之時，千載下猶令人神往；今值國家多難，受侮強隣，有志之士正當惟力是視，以分君上之憂，安可自外生成，無關痛癢，爲西歐士民所恥笑哉。古有童子，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曾見許於聖門，某竊師此義，將躬操耒耜，以農桑新法啓吾民矣。世之同情者，諒不以狂妄見擯，而將有以匡其不逮也歟！如有同志，請以芳名住址，開列函寄雙門聖教書樓，或府學官步蟾書屋代收，以便屆期恭請會議開辦事宜。是爲言。香山孫文上言。十月六日。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一四。

註二：參考「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六八。

註三：參閱黃季陸：「一項珍貴的增與」——蔣廷黻先生對教育與國力的看法，「傳記文學」，八卷五期，民國五十五年五月號。

註四：「國父全集」，第五集，頁一三——一四。

十九日（十月七日） 日軍陷臺灣雲林，義軍英勇抵抗，傷亡五百餘人。

先是，七月初十日，日軍曾一度攻陷雲林，十三日由我軍克之，至是復陷。連橫詳載其經過曰：

「初十日，日軍陷雲林，進據大莆林，別以一軍略埔里社，鋒銳甚，永福赴曾文溪籌防，黃榮邦、林義成、簡成功及子精華均受撫，願效死。十一日，副將楊泗洪率鎮海中軍及吉林礮隊取大莆林，義成、精華各以所部數千助戰，日軍北，泗洪追之，中礮死，管帶朱乃昌力戰，奪屍歸，反身再鬥，而日軍山礮隊至，聲震山谷，臺軍伏蔗林中以戰，左右奮擊，日軍退，乃昌麾兵逐取大莆林，遙見火光燭天，聲喧甚，詢之，則榮邦、義成來援也，乘勢入大莆林，殺傷過當，乃昌亦血戰死，永福令都司蕭三發率福軍前敵代泗洪，以銀三千兩犒軍。十三日，檄成功統義軍，守備王得標、嘉義知縣孫育萬會師，與精華之兵合克雲林，日軍入山，遇覆殲焉，又敗之於蘆竹塘。十六日，三發趣諸軍取彰化，自辰戰至日中，阻於日礮不能進，據險以守。當是時軍聲頗起，中北各路約期俱舉，而臺南餉械已絕，永福又命吳桐林渡廈乞助，遍走沿海，無一應者。二十五日，精華、榮邦連戰俱捷，獻誠請餉。八月初二日，再電請，語悲痛，僅括千五百兩以濟之，附近莊民多稚牛食軍，故不餒。方彰化之陷，徐驤率二十人走後山，問道至南，永福慰之，令入卑南募悍卒，得七百人，皆矯健有力者，馳赴前敵，彰化諸軍攻圍久，彈藥將罄，初六日，榮邦誓師決戰，中彈死。初七日，義成再攻城，亦殊傷。十三日，日軍大舉猛撲三發之營，徐驤、精華援之，相戰數日，驤死，諸將皆受傷莫能起，雲林復陷。永福歎曰：內地諸公誤我，我誤臺人。」（註一）

註一：連橫：「臺灣通史」，卷五，頁七四——七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十九日

二十日(十月八日) 日外相西園寺公望與俄、德、法三使商定交還遼東，由中國增付賠款三千萬兩。

俄、德、法三國駐東京公使與日本政府三月交涉之結果，日本承認由中國賠償三千萬兩，而交還遼東半島，在交款三個月內實行撤兵，並不以締結商約爲撤兵條件。本日，日本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與三國公使會議，並代表日本政府宣言如下：

日本政府爲迅速並確實解決遼東問題起見，已決定：

一、將交還遼東半島之賠款，減至三千萬兩。

二、不以締結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爲半島撤兵條件；並於交清三千萬兩賠款後三個月以內實行撤兵。(註一)

西園寺同時對三公使各致一覺書，聲述日本政府之宣言，三國公使各轉達其政府後，旋同至日本外務省面遞一覺書，德國覺書曰：

敝大臣德皇陛下欽命駐日全權公使男爵哥屈米德，業將貴大臣日本外務大臣侯爵西園寺閣下以貴政府名義見告之下開兩宣言，轉達敝政府：

(甲)七月十九日宣言：日本帝國政府承認臺灣海峽爲各國公共航路，因此該海峽不歸日本管轄，亦非日本所得獨自利用，日本政府保證決不將臺灣及澎湖列島讓與他國。

(乙)十月七日宣言：日本帝國政府決定：(一)削減以退還遼東半島爲交換之賠款總額至三千萬兩。(二)不以中日締結通商航行條約爲退出上述半島之條件；並自中國償清上項賠款三千萬兩之日起，在三個月以內，實行撤兵。

敝大臣接奉敝政府覆文稱：敝國政府接閱上述宣言，對於日本政府聲明謙和此種新證明，唯有深致讚美之意而已。奉令將此令奉達，相應照會貴大臣，即乞查照見復，爲荷。敝大臣藉此機會對貴大臣重申其尊重之意。」(註二)

俄、法二國之覺書，與上文措詞略同。此蓋三國要求日本承認其宣言也。日政府得三國覺書後，即

行對三國答覆一覽書曰：

「敝外務大臣接奉貴大臣德皇陛下欽命駐日全權公使男爵哥屈米德十月十八日照會內稱：貴國政府對於敝大臣前此以敝政府名義奉告之下開兩項宣言，深致讚美之意。

(甲)七月十九日宣言：日本帝國政府承認臺灣海峽爲各國公共航路，因此該海峽不歸日本管轄，亦非日本所得獨自利用，日本政府保證決不將臺灣及澎湖列島讓與他國。

(乙)十月七日宣言：日本帝國政府決定：(一)削減以退還遼東半島爲交換之賠款總額至三千萬兩。(二)不以中日締結通商航行條約爲退出上述半島之條件；並自中國償清上項賠款三千萬兩之日起，在三個月以內，實行撤兵。

敝大臣藉此機會，對於貴大臣重申其尊重之意。」(註三)

至是，還遼問題，全告解決，惟待中日兩國形式上之直接交涉矣！

附錄：三國代還遼東贖價之聲明。(註四)

俄法德三國之干涉，至日皇宣詔交還遼東，告一段落。然關於實際交收遼東之事，日本自不肯無條件交還中國。故關於此事，俄法德三國與日本迄在交涉中。日本政府於七月十九日(中曆閏五月二十七日)宣言臺灣海峽爲各國公共航路，即爲減少三國之反感。同日日本臨時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約晤俄法德三國駐日公使，關於遼東問題面致一覽書曰：

日本帝國政府在直接與中國開議之前，宣言：

一、日本政府鑒於中國償付與交還地域價值相當之款額，殊屬困難，特將以交還遼東半島爲條件之賠款數目，定爲五千萬兩。

二、日本政府準備於中國償清上項賠款及戰費賠款第一次應付數目後，將軍隊撤至金州，並於中國交清戰費賠款第二次應付數目及交換修訂通商行船條約後，即行退出遼東半島。

三、日本政府認臺灣海峽爲公共航路，並不歸日本管轄，亦非日本所得獨自利用，日本政府宣言，不將臺灣及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二十日

四〇二

澎湖列島讓與他國。

三國公使將日本覺書轉電各該國政府後，俄國方面認日本之償款要求爲過當，德法兩方則頗同情日本之要求。德國外交次長羅登漢(Rotenhan)於接到日本覺書後，曾對駐柏林俄國公使奧斯登沙亨伯爵(Osten-Sacken)表示，認日本之要求爲合理。俄使將德方態度轉電與俄政府，俄政府頗不謂然。據七月二十四日(中曆六月初三日)德外次羅登漢與俄使晤談之記錄曰：

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俄使今日告余，業將余七月十九日關於日本最後提議所述意見，報告羅拔諾夫外長。按吾德認日本提議爲合理適當，該外長囑彼向德國聲明，渠認日本要求五千萬兩爲交還遼東半島之報價，實屬過當。並以吾人應迫使日本半減其要求數目。奧斯登沙亨伯爵又云：與亞洲政府議事，要價還價，既屬風習。日本自己殆亦不信已說出最後之一語。總之，試使減低其要求，自爲可採之辦法。余答俄使云：余始終以爲要求五千萬兩作爲交還如此廣大而又重要地區之報價，實爲適當。日本關於款項之要求，均在適當範圍之內。余且懷疑日本能否以賠款補償其作戰所耗之實費。吾人調停目的，既在促成雙方可以接受之永久妥協，據吾人意見，承諾日本提議，最符此項目的。余將奏明皇帝，聽候裁奪。(羅登漢記於柏林外交部)

據此記錄，可見德國頗以日本對退還遼東之補償要求爲然。八月三日(中曆六月十二日)德國政府致俄一覺書，認爲可以容納日方之要求。八月六日(中曆六月十六日)法國駐德公使海貝特(Heibet)與羅登漢晤談，亦似同意日方所要求之代價。惟對以遼東駐兵爲他項條件之擔保，則不謂然。其晤談記錄曰：

海貝特今日詢余東亞問題情形，並謂其政府已將交涉動議權畀諸俄國。余旋以八月二日德政府覺書示彼，彼對日本放棄遼東之代價，似與吾人意見相同。彼個人認五千萬兩之要求，並非難以容納，惟對日本不僅對於交還遼東要求賠款，並且欲在交清此項賠款後仍然占領半島，作爲他項戰事賠款之保障，則認爲不當。據彼意見則日本收到第一次賠款約一萬萬兩後，即應立時交還半島全部。並謂日本之放棄遼東半島，非對中國讓步，而爲對三大國讓步，故日本不能因此而對中國有所要求。(羅登漢記於柏林外交部)

德法兩國既均相當同情日本之要求，則遼東之不能無條件收回，已無疑義。嗣經聖彼得堡、巴黎、柏林間之往

返磋商，卒從俄國方面之意見，由中國償銀三千萬兩，而收回遼東，惟對馬關條約規定之賠款，德國不願再強日本延展。據八月十九日（中曆六月二十九日）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電訓該國駐俄公使拉都林（Cathelin）曰：

爲竭力迎合俄方意見，皇帝陛下昨日已對日本交還遼東之賠款減至三千萬兩一節，表示同意。惟是中國之無政府情形，尤其臺灣屢次發生驅逐教士事，顯見中國政府之無能，致吾人礙難聲明該政府之可靠，再強日本將其償還賠款期限，更行延長。吾等認爲應付數目須在完全自半島撤退以前交清，此層似難再事通融，至其數目最好自一萬五千萬減至一萬三千萬兩。

關於在上述範圍內之撤兵詳細規定，可由駐日公使商得法俄兩使同意，予以決定。

俄國則主張除三千萬兩之補償外，日本不應再有要求。法國意見亦同。德國雖不願過爲已甚，然日本若能接受此議，自亦贊同。九月四日（中曆七月十六日）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電訓駐日公使哥屈米德曰：

俄法代表接到其本國政府同樣訓令後，貴使即有權與各代表共同開始交涉，通知日本政府，說明依據三國之一致意見，交還遼東而賠償三千萬兩，認爲已足，不應再以締結交涉無期之商約爲撤兵之條件。

關於撤兵期限，應仍候日本自行提議。如仍以償清第一二次應付賠款數目爲撤兵條件，閣下不必強人所難，唯將其意見留作參考可也。

馬沙爾同時將此訓令電知駐俄公使拉都林，電末附加數語曰：

請將此意轉達羅拔諾夫外長，告以吾人殊無意較日人尤愛日本，倘如俄國所料，日本欣然自行取銷其以交清第一二次應付賠款數目爲完全自半島撤退條件之議，固吾人所樂聞者也。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文書部份，頁一七二。

註二：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Berlin, p. 325. 1924.

註三：同註二，頁三二七。

註四：「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頁七九——八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二十日

四〇三

二十一日(十月九日) 黨人朱淇撰寫討滿檄文，英人黎德(Thomas H. Reid)與高文(J. Cowen)起草英文對外宣言，復由何啓及謝讚泰修訂之。

與中會之革命計劃，甚得香港律師何啓，及德臣西報記者黎德之助，該報對於清廷政治之抨擊，頗爲盡力。何啓等對孫先生進行之大計，常參與其事。與中會之英文對外宣言，即由英人黎德及高文二人起草，而由何啓、謝讚泰修訂之，以便屆時應用。(註二)

附錄：

一、楊衢雲致謝讚泰英文函譯文(註二)

謝讚泰仁兄鑒：吾等擬今日往訪何啓博士及德臣西報記者黎德君。黎德君當能與吾等以良好之指導，請兄于赴杏花樓以前先到弟之事務所，何啓博士已語吾等同訪黎德君矣。弟楊衢雲。

二、與中會之討滿檄文(註三)

乙未與中會曾預印討滿檄文及英文對外宣言，準備於發難時頒佈中外。檄文由朱淇起草，對外宣言則由何啓及英人鄧勤(Chesney Duncan)、黎德(Thomas H. Reid)等任之。此項印刷品，於此役事洩時，已爲黨人毀棄無餘。檄文底稿藏於雙門底王家福雲崗別墅之石壁內，後竟失之；尚有黨人名冊及他種文告，儲雙門底聖教書樓後之福音堂，亦爲耶穌教徒左斗山等投諸井中。朱淇字菴孫，粵之南海人，長於文學，故總理以草檄事屬之。朱之兄誕生向任西關清平局書記，知乃弟名列黨籍，慮覆其家，乃使其所屬勇目向粵吏告密，期將功贖罪，是爲此役事洩原因之一。事後黨人咸集矢於朱，指爲變節賣友；獨區鳳霖力代申辯，謂於失敗之日，曾與朱父子同舟赴香港避難，足證其冤云。朱後於光宣間，至青島創辦膠州報，黨人避難青島者，多倚爲東道主；辛亥復移至北京，改名北京日報，因持論不務新穎，殆無人知其爲革命先覺也。鄧勤時任香港上茂英文報記者，黎德則任德臣英文報記者，當日兩報均抨擊滿清政府，不遺餘力，與中會於外交事件頗得其助。

日軍陷臺灣嘉義，總兵柏正才及徐驤死之。打狗（高雄）、鳳山旋亦均陷，于是臺南陷重圍。

日軍陷嘉義，總兵柏正才及徐驤死之；臺南震動。而日軍混成第四旅團及第二師團亦于翌日自布袋嘴、枋寮上岸，近衛師團亦進至曾文溪，海軍礮轟打狗。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打狗、鳳山均陷敵，臺南陷重圍。（註四）連橫記其事曰：

「十九日，日軍攻嘉義，王德標初營郊外，至是走入城，日軍駐營，夜半地雷發，轟死者七百餘人。翌日，以礮攻城，陷東門，總兵柏正才營官陳開燦、同知馮練芳、武舉劉步陞、生員楊文豹等皆死，德標隨精華奔後山。二十一日，略鹽水港，別以一軍由海道至布袋嘴，譚少宗之兵與戰，敗，至鐵線橋，沿途莊民持械拒戰，相持數日，生員林崑岡死焉，殺傷大當，以故不能越曾文溪而南。二十三日黎明，日軍登枋寮，入恒春，遂略東港，以取鳳山。」（註五）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十一——十二。

註二：同註一，頁十二——十三。

註三：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二〇。

註四：「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八。

註五：「臺灣通史」，卷五，頁七五。

二十二日（十月十日）興中會選舉總辦（即會長），孫先生文獲選，以不欲引起黨內糾紛，旋以此職讓楊衢雲。

本日，因廣州運動成熟，將次發難，衆議投票選舉會長，名之曰「伯里璽天德」（即 President 之譯音），以資統率，此職即起事後合衆政府之大總統。輔仁文社新進份子楊衢雲對此職位頗具野心，孫

先生雖先獲選，然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楊衢雲。至廣州軍事，仍由孫先生主持一切；而楊則在香港擔任募集同志及接濟餉械等事。（註一）陳少白記其經過如下：

「（上略）這樣辦了幾個月，孫先生天天在香港廣州間來往計劃，並在廣州雙門底，租了一間王氏家祠，假託開一個農學會，預備在九月初九就發動。爲什麼要定九月初九發動呢？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們以爲那一天是粵俗掃墓之期，無論什麼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時來往的人很多，我們預備起事的，香港方面有三點會會員幾千人，如果在那天混到省城去，人家就不易注意了。」

九月初，我們在香港開一次會議，人數很少，只有七八人；這是最後一次會議。爲什麼開這次會議呢？當時廣州和香港兩方面的事情完全預備好了，孫先生意思開這次會議，就是要公舉一個總統出來，可以由他發號施令。一開會議，當然一致通過舉孫逸仙當總統；通過之後，大家就同孫先生拉手，恭賀道喜。這件事情辦好，孫先生就想先到廣州，預備不再到香港來了，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隊等等交楊衢雲負責處理，我們也就預備都離開香港，到廣州去。當時，楊衢雲膽很小，不肯到省城來冒險，最後他也答應在九月初八晚上，由他帶了三點會三千人，搭夜船到省城，天亮到岸，我們就馬上動手。這樣當然算是很妥貼了，孫先生就把銀行裏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軍械統交給楊衢雲，預備他最後到省城帶來，他到了省城，就可舉事了。

隔了一天，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可否把總統的地位讓給他，以後到省城，事情辦好了，再還給孫先生。孫先生聽到這幾句話，覺得事情還沒有開始，同志間就發生地位之爭，非常痛心，精神上也就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個人，開一個會議。鄭士良聽到孫先生說明上面的事情，他就說：「這是不能答應的，我一個人去對付他，我去殺他，非殺他不可。」當時我就說：「這是不對的，殺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們還能起事嗎？照我的意思，我們先去省城辦事。辦成功那就没有問題了；辦不成功，隨便什麼人做總統是沒有關係的。」孫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當天晚上，再開一次聯席會議，出席的人中，還有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係化學師），是孫先生由檀香山約來的。在會議席上，孫先生就自己提出來，把總統的名義讓給楊衢雲。在事前我們既然說妥了，會議表決，也是無理由的讓給楊衢雲做總統。第二天，孫先生就到廣州去，我們幾個人過了兩天也

去了，只留楊衢雲一個人在香港。（註二）

在同盟會時期孫先生與胡漢民閒談時，曾評論楊衢雲之為人。孫先生云：「至于楊衢雲，却十分不行，因為往往到了重要關頭，他便要爭做領袖了。所以後來一度曾變節為人誘惑。」（註三）孫先生之評論何以如是？黃季陸氏曾對此事解釋云：

「因為革命志業是一種救人救世，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為着理想而奮鬥犧牲的志業，既不是功利，更不是名利，一有了功利與名利慾，革命便要走入歧途，個人便要喪失其所志而變節。這樣，縱然一個人能在革命的進程中建立了個人的權力和不可一世的權威，而在本質上便早已背叛革命了。其結果不是革命的失敗，便是個人的毀滅。因此，革命的志業，必須建築在革命的人格，或一種崇高的道德基礎之上。這種革命人格的修養，必須具有誠於中，形於外的道德精神，因為惟有誠於中的人格，才有形於外的革命志業，亦即是要有形於外的志業，才看得出誠於中的革命人格。中山先生之所以鄙棄楊衢雲，而欣賞稱頌黃克強先生之為人，其區別即在此一革命的人格與道德上的默契而有所不同。」（註四）

黃氏更進一步敘述楊衢雲爭作「總辦」之一段經過，以佐其說：

「關於楊衢雲在乙未，一八九五，跟現在已經快八十年前，籌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的時候，爭做領袖的一段故事，我在此有加以補充說明之必要。據革命初期所稱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先生事後的追憶，他說，第一次廣州起義，原定在是年九月初九，舊習的重陽節那天在廣州發動。在此以前的幾天，特別在香港召集了一次會議，人數很少，只有七、八人，這是最後一次會議。因為當時香港廣州兩方面的事情都準備好了，孫先生的意思，這次會議的召開，是要公舉一個總統出來，主持一切，那時『總統』兩個字還沒有通用，所要推舉的是『伯里璽天德』亦即英文的President的譯音。一開會，當然一致通過孫先生為總統，通過之後，大家就向孫先生握手道賀。這件事辦好，孫先生就想先到廣州，預備不到香港來了。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事等等都交楊衢雲負責處理，大家也就預備到廣州去。當時楊衢雲因為膽小，不肯前去冒險，最後答應在九月初八晚上，由他率領在香港預備好的大批會黨份子，搭

夜船到廣州，天亮時船到廣州登岸，大家就馬上動手，把廣州占領。這樣當然算是很妥貼了，於是孫先生便把銀行裏的存款，及在香港所有軍械都交給了楊衢雲，由他帶到廣州去，一齊舉事。

不料到開會的第二天，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請把伯里璽天德，即總統的地位讓給他，以後事情辦妥了，再還給孫先生。中山先生聽了這幾句話，覺得事情還沒有開始，同志間便發生地位、權利、領袖之爭，將來革命成功以後，不知要鬧到如何的地步？不是自相互相殘殺，便會演成天下大亂，生靈塗炭的慘劇！於是乃約了陳少白、鄭士良和孫先生自己三人開了一個會議。鄭士良是一個爽直義俠型的會黨領袖，他聽了孫先生說明的情形之後，大為憤慨，於是他說：「這萬萬不能答應，讓我先把楊衢雲那傢伙殺掉，除掉這一個革命的禍害後，再來進行我們的革命！」據陳少白先生自己所說，他當時對鄭士良的意見是不表同意的。他說這樣做是不對的，殺了楊衢雲，在香港就先演成人命案，如此我們還能照計劃起義嗎？照中山先生和陳先生的意見，還是去廣州，實行起義，等到成功，那就沒有問題了。成功之後，隨便何人做總統都是沒關係的。於是在當天晚上又召開一個聯席會議，出席的人中，還有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係化學師），是孫先生由檀香山請來的。在會議席上孫先生就自己提出，把總統的名義讓給楊衢雲。事前大家既有諒解，自然就通過楊衢雲為伯里璽天德。為了成全大體，於是總統或首領的名義便讓楊衢雲如願以償了。第二天孫先生就到廣州去行動，陳先生和鄭士良諸革命同志過了兩天，也便前去廣州共同行動，留下楊衢雲坐鎮香港辦理接應。

治中國革命史的人，我們都知道，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時，曾一度讓總統名位給袁世凱，以結束中國數千年的專制政體，以促進南北統一，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而不知他薄民國總統而不為，這是第二次，第一次還是要算在此十八年前，乙未第一次廣州起義運動時，他為了顧全大局，曾經把總統或領袖的地位讓給楊衢雲呢！在名義上初期最早革命的團體興中會的領袖，是楊衢雲而不是孫中山先生。

可歎的是，楊衢雲當時不獨未能身先發難，而且連事前分擔的軍械、人員等重要工作直到危急之時都不能接應，致使乙未年九月初九的首次起義，遂不幸而告失敗。」（註五）

附錄：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補述（註六）

楊飛鴻，諱兆春，字合吉，號衢雲，福建海澄縣人，世居英字社。祖考諱福康，號錫九，清廩生，由軍功議敘，授廣東肇慶府經歷，署理新興縣知縣，並加五品銜，及讀荊駝逸史，有所覺悟，棄官出洋，居南洋英屬檳榔嶼。考諱清河，號伯澄，即誕生於檳榔嶼，習法虛文字，年十六歲，回本籍，補習英文者五年；自闕至香港，先後充巡理廳暨輔政司通事，嗣又先後執教鞭於各書院以畢其生。公從父讀，自少任俠好義，尤關心時事。至年十四歲，投香港海軍船廠，學習機械，未幾，失慎，斷右手中三指，於是輟學，轉習英文。每考試魁冠其儕，年二十歲畢業。因目視國人備受異族欺侮，遂萌種族思想。公精技擊之術，偶遊太平山，有勞働者百數十人互相械鬥，公上前勸解，不聽；其一部轉欲擊公以洩憤，公適衣長衣，不暇捨，張空拳以應之，手足稍動，而衆皆披靡，一時歎爲神奇。未幾，辭聖約翰書院英文教員職，改就招商局書記長；又轉就沙宜洋行副經理，時年三十有四矣。先是港中學友，如何汝明、溫德、謝纘泰、劉燕賓、周昭岳、胡幹之等，公與之最交稔，因與謝、劉數人同組織輔仁文社，以爲交換智識研究學術之所。社員十六人，公齒長，被舉爲社長。社員中有羅文玉者，與順德尤列善，嘗介紹之於文社，屢至談學，因得與諸人游。是時尤列與其友香山孫君逸仙（以下稱總理），密謀民族革命，有四大寇之稱，初識公即有相見恨晚之感。公氣宇軒昂，推誠接物，一見知爲長者，每談論國家大計，恒義形於色。清光緒壬辰（民前二十一年）秋，羅文玉設婚筵於上環壽而康酒樓，文社同人畢至，尤列繼至，與公倚欄縱談時務。公所論著，政治改革之事，偶叩其家世，則先世讀史棄官出洋，因而本身出生於香港之說，侃侃道之，尤曰：「得之矣！君所嘗發揮者，政治之改革耳！」此即令先祖讀史棄官之意。君知之乎？公曰：「何如？」尤君曰：「不有種族問題在耶？棄官者，不爲滿清奴也。」公點首者再。次日即造尤寓，同詣歌賦街楊耀記楊鶴齡寓，訪孫總理暢談救國大計，一見如故。由是朝夕常至，至則抵掌而談，達旦不倦。公主張先在廣州組織團體以共策進行，總理避之。翌年，總理先後設藥局於澳門及廣州二地，外觀則以醫學問世，而實則口聚同志，相與計劃革命進行之方略。冬初，開會議於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抗風軒，蓋尤列嘗爲附設書局內廣東輿圖局之測繪生，與局員習熟，因得借用之。時到會者，有總理及程耀宸、奎光、璧光、陸皓東、魏友琴、鄭士良、尤列諸人。總理提議宜先成立團體，以驅除癱瘓恢復華夏爲宗旨，衆贊成之，而不及制定會名。公居港，弗克來會，次日尤列適往港，爲公道之，公大稱善。歲甲午（民前十八年），總理以清日交涉破

裂，國勢瀕危，乃漫遊津滬暨大江南北希圖匡救，數月無所成，於是直往檀香山乃兄德彰所。時方清日開戰，國人漸有國家思想，而居留外國之華僑，時受壓迫，多悟國威不振，實基於祖國政權操諸異族之手，是以總理甫提議設立反清復國之興中會，而檀島華僑，如何寬、鄭金、程蔚南、鄧蔭南、夏柏子、宋居仁、劉祥、鄭照、鍾宇、丘四、陳楚楠、許直臣等百數十人，陸續締盟。其中先後歸國，以從事革命工作者，亦不乏人。乙未（民前十七年）正月初旬，總理自檀抵港，與公商談設會事。復至廣州，與尤列晤；時尤寄於海關外寓寄別墅，則留總理同處，盤桓數日。翌日晨興，關員何某，對總理以西語呼早晨，相距稍遠，總理不聞，未及答；何以爲慢已，因孫及尤，並下逐客之令，總理卽於是日浩然赴港矣，總理到港不數日，卽與公等組織興中會於士丹頓街十三號屋，門外榜乾亨二字。開會時衆推黃詠襄爲臨時主席，輔仁文社社員之加入者，有謝纘泰、周昭岳二人。此爲中國革命事業由游說而至實行之起點，其時則亡清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也。自是籌措經費，招羅人材，購運器械，種種動作，公與總理擔任爲最多。廣州設機關二，一城內雙門底上街黃家祠內雲崗別墅，一東門外咸蝦欄張公館。其餘儲物及招待之所，省河南北，不下數十處。小輪船亦購置二艘應用。東西北江會黨及軍隊同志，往來如織，總理與尤列、陳少白等，長駐雲崗別墅，而諸事則總理總指揮之。七月中旬公自港至，亦駐其間，數日復至港。八月十二日，衆在港開會，以發難在即，議學會長職，以總其成。公友謝纘泰力主舉公爲會長，持之甚堅；鄭士良、陳少白等，則屬意總理；總理深恐惹起內部糾紛，故力勸鄭陳等勿爭此虛名，結果會長一席卒爲公得。此時布置綦備，太學有日，而器械之購自外洋者，仍源源而來，賴公駐港爲之轉運，數月來未之或失。預約九月初九日各路同時攻城，先有退伍軍士二百名，散處於新安屬之深圳、鹽田、沙頭各地者，全數加入興中會，公令同志朱貴全統率之，集中於九龍，定以初八日下午，並軍械七箱同附保安輪船赴省。公所以使人械同船之計劃，實預使衆於初九日晨船到埠時，二百人開箱持械，登陸成隊，四城響應，卽可以握全城之命脈而無難；孰知該船自港動輪後，偶因他故，船中貨物須易位置，以多數雜貨移諸七箱之上，到時無法開箱取用，所謂成事在天者非耶。且初八日省中消息，兩廣總督譚鍾麟、廣東巡撫馬丕瑤，已徵聞黨人有此舉動，密令卓勇統領李家焯在全城戒備。總理聆此，卽令同人暫且勿動，再待時機。因思二百人自港而來，大爲可慮，故以「止辦」二字通電於公；迨至將夕，得接「太遲貨已下船請接」八字之覆電。斯時省垣同人，

狼狽可知。於是初九日晨，二百人者於船到羊城時同時被捕。因此官廳遂有「今日匪首名曰孫文，結有匪黨，以楊衢雲」之韻語告示，遍貼於城廂內外及省河南北；而同志之跟蹤避免者，皆亡命於外矣。假使消息知早數時，必不至此，蓋二百人尚未下船也。所謂謀事在人者之有時無效，竟如是也。是役就義者，朱、丘、陸、程四烈士：朱貴全被副，丘四被殺，陸皓東被殺，程奎光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死，程耀宸長禁人有倉後死。此三十年前，我國為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壯舉也。總理既幸脫險而遠行，而公則偵知李家焯派人來港，密行暗殺，公無懼色，乃家人及戚友苦勸離境，不得已奔赴南洋。未幾，遊印度，又至南非洲，轉而倫敦，復返印度，往菲律賓，又轉星加坡，所至皆專向華僑為我們民族革命之鼓吹。戊戌（民前十四年）二日乘日輪若狹丸東渡，過港不登陸，謝續泰訪於舟中，止彌日，多所商榷。公之友，為其一身一家而助力，所謂情至義盡者，厥為何汝明、溫德二人；而助其為國宣勞，從事於報紙文字之間，及介紹之於當世之通人達士者，莫謝續泰者，是以若斯之勤也。至日本橫濱，與總理會，舊事重提，悲喜交集，有無量之感慨，遂籌商辦法，為共趨一致計，研究方略，晨夕相依。己亥（民前十三年）十二月，公以長江沿岸及閩粵各省秘密會黨羣眾擁戴總理為首領，遂提議讓與中會長於總理，同志皆一致贊成之；總理既就職，而公則昂然乘鎌倉丸自日返港，布置一切，又將有事於廣東矣。踰年，庚子（民前十二年）三月，應總理之請，復往橫濱。五月，又偕總理同返香港。總理以港探窺伺嚴密，不得登陸，折回上海。公登陸，乃粵督李鴻章早已特派狼奔下港，密行其攜公上省之謀，詎奔之居停，於與中會略有同情，稍有疏通，使其計不得逞。六月，總理又復至港，亦不登陸，與公定策而去。至閏八月十二日，同志黃遠香、鄭士良、黃耀庭等，不禁清軍之壓迫，突然高揭革命旗於惠州之三洲田，連戰俱捷；而史堅如復轟炸廣州巡撫署以應之。詎總理所預備價值二十餘萬圓之軍用品，留滯臺灣，因其他障得不得運粵。雖革命軍黃鄭部隊，一路出井龍墟，而預備直撲惠城；一路出平山墟，過佛祖坳，過淡水而抵汕尾，皆如入無人之境。而汕尾望船不至，不得已宣布解散。而公之心血，亦耗盡矣！當時李鴻章已去，督粵者為巡撫滿人德壽兼任，自炸彈案發現，極其震怒，恨公甚，必欲得公而甘心。是時李家焯尚為卓勇統領，奉德壽命，仍用李鴻章之故智，派狼奔陳林下港以謀刺公。有黃耀庭之鄉人江恭喜，偵悉其謀，即往陳林寓所，戒之曰：楊公為民族革命而興義舉，我輩同是漢人，有力者宜協助之，今其失敗閑居，即不助之，亦不應謀加害；假

令汝事成就，須知港政府法律之下，斷不許汝自由殺人；縱汝幸逃回廣州，領賞升官，不過幾時，彼德壽李家焯者，勢必借端殺汝以滅口。天下無益之事，孰有過此者哉？陳林不以爲然。時公方設校於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教授英文以養妻子。恭喜即日轉詣公校相告，促公急出洋，勿取其禍，公應之曰：人之死者，天命也。抑吾人行革命，亦久置死生於度外矣！昔李鴻章不嘗有是舉耶，何能爲。恭喜再三相勸，公意仍不動。恭喜曰：然則恭喜即日行矣，不然知其事者，恭喜外無多人，果有發作之日，有不連累者哉！雖然，恭喜貧士也，舟車之費無着，惟公憐之。公曰：欲何適？曰今日下午，輪船出口，獨逼羅一路耳，即往此。公贈以五十金，恭喜遂丁寧珍重以行。十一月二十日午后六時，即陽歷一千九百零一年一月十日，兇手陳林突然入校，鎗擊公於教授室。兇逃；公家人見公乘十字車往國家醫院，翌晨，傷重逝世。臨喪者中外男女五百餘人。求仁得仁，公之謂矣。滿探陳林返廣州報命，德壽賞銀三萬兩，官之以千總，委守南石頭砲臺。迨港政府偵騎四出，必破此案而後已；李家焯聞之，惶恐失色，潛遣人揮一盜賊私書於陳林枕畔，出其不意，親往搜捕之，謂爲通匪，即在他家門外斬之。自肇事至此，先後不一月耳。公逝之日，總理與尤列同寓橫濱山下町前田橋第百二十一番館，午后得接港電，痛公之亡，晚膳皆不能下咽。總理出名主喪，制爲訃音，發寄中外，以表其哀忱。尤提議召集旅日興中會及中和堂同志，即夕開會追悼於永樂樓，並即席提議暗慰，得捐款一千二百餘元，寄香港陳少白、何汝明代交與公家收用。並向各埠發起募捐，以恤其遺族。公生於辛酉年十一月十八日未時，終於庚子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時，享年四十歲。淑配潘氏，民國三年卒。子佐治，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與母同年卒。女三，長錦霞，適周氏。次麗霞，適李氏。再次秀霞，爲尼，號觀願。公終於香港，而其家亦寓港，故於終之次日，葬於香港跑馬地英國墳場之陽。民國十六年六月同志尤列爲作贊曰：嗚呼！公身其永別耶！公靈其不滅耶！紀公者赤道之陽光，而地極之冰雪也。民國基礎，乃公之骨。民國犧牲，乃公之血。於是公殺身成仁以去，猶起世人之悲切。而或經數十險而仍生，又安有一日之愉悅！公何易而彼何難？公何巧而彼何拙？公何逸而彼何勞？公何優而彼何劣？豈不以公之遺志，必賴多數人而後成；而多數人之事功，又必藉公而點綴之哉！適登公墓，古木蒼蒼，時有行人，來弔先烈。自來之歸咎，復有何言，吾又不能禁後人之嗚咽者也。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一三；謝繼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九。

註二：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九——十一，民國四十五年六月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註三：胡漢民：「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第三冊；「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及其教訓」。

註四：黃季陸：「國父與黃克強先生之關係與情義」，傳記文學第一三七號，頁二九。

註五：同註四，頁三〇——三一。

註六：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頁八——一四。

二十六日（十月十四日） 清廷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日本使臣林董會商交還遼東事宜。

俄、法、德三國對日本之交涉既定，中日之直接交涉乃告開始，本日，清廷特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日使林董會議還遼事宜，時鴻章已銷假入京，清帝頒上諭曰：「著仍派大華殿大學士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將歸還遼、旅事宜，與日本使臣林董開議。欽此。」（註一）

是日，鴻章亦得許景澄、慶常電，知減款無望；劉坤一、王文韶亦主從速照案了結，翁同龢意主觀望，然亦無善法足以保證遷延有益也！（註二）

俄使喀希尼照會總署，已派員往東三省查勘修接鐵路事宜。

俄國既聯德、法，代中國索還遼東，又復貸予巨款，以償日本軍費，其處心積慮，一在阻止日本勢力在大陸之發展；一在乘機向中國索償，以達其開拓領土之野心。俄固如此，德、法亦然。方遼事將了之際，俄即要求取道東北接修西伯利亞鐵路；德國要求畫得津、漢租界，並索山東海口；法國亦要求西南利權。而俄國在東北之經營鐵路，尤為數十年來東亞大局之禍源。此事之形成，固種因于李鴻章使俄之行，而在三國交涉還遼之時，已見其端，此可特紀者也。時俄之西伯利亞鐵路，方修至外貝加爾湖（Lake Baikal）。

nsbaikalia)附近，前進之路線，忽發生問題。據俄財政大臣微德之意見，擬通過中國之東蒙、北滿，而直抵海參崴。據其估計，依此方向，可縮短路程七百俄里，減少費用三千五百萬盧布，且建築上亦較便利。蓋所經過各地之土質，既甚肥沃，氣候亦較適宜。微德對此問題，極為重視，而思乘機促起俄皇之注意。時御臣巴德馬耶夫(Badmayev)，頗為俄皇所信任，惟彼對於西伯利亞鐵道問題之意見，適與微德相反，彼則主張取道恰克圖至北京之路線。微德則反對此一意見，其理由有二：其一，海參崴為西伯利亞鐵路最適宜之終點；其二，如將鐵路修至北京，必將引起歐洲各國之反對。西伯利亞鐵路之建築，本前皇亞歷山大三世之計劃，渠希望以最短之路程，完成濱海省至俄國中部之交通。及尼古拉二世繼位，對此路之建築，亦極注意，然關於東方之路線，當然以至海參崴為合理易行，故微德之主張，終獲俄皇採納。所成問題者，即如何取得中國之同意耳！適中日戰後，俄代中國索還遼東，挾德索報，不患無辭，于是借地修路之議遂起。本年五月間，借地築路議論喧騰于俄國報章，駐俄公使許景澄致電總理衙門，述俄報之記載，促清廷之注意曰：

「近日俄報，述有日本人遊學在英，今來俄，往晤伯爵伊格那替業福，並至報館與主筆談論。大略謂日本無意與俄爭遼，願與俄國聯結一氣，並勸俄假滿洲之地，開造鐵路，兩國互通商利，一障一海，同霸東方，俟歸國陳請施行云云。此殆遊說之術，其勸策西伯利亞鐵路，心計尤不可測。伊格曾與我議立北京條約，素習東方事。其人往晤，亦可窺其用意，惜與伊格談論，無由可悉，茲就俄報所登譯出，藉備憲察閱。西伯利亞鐵路之取道我境，彼報言之不已，必將有向我明商之舉。此正關係東方大局要鍵，應請憲憲密豫講求，以酌後來進止，不審有當否。……」

其譯俄報曰：

「照譯俄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俄曆，即中曆五月十三、十四日)時報：俄報述奧國時報聖彼得堡信云：俄國欲與中國商假滿洲地，為接造西伯利亞鐵路以達黃海之議，日多一日。不獨報館私論，即俄執政大臣，亦有此意，想遲早終當與中國商議開辦云。近日俄都官報，疊登西伯利亞鐵路會各大臣會議節略，皆以為按照日前情形。此

路早成一日，早得一日之利。前皇亞歷山大第三，早知俄欲增強于東方，非于西伯利亞開造鐵路不可。當時論者以俄國國帑支絀，從何籌此鉅款？以造荒遠無用之鐵路；且其獲利亦尚在渺茫之中，前皇不爲浮言所動，即行開工。此次中、日構釁，邊防加嚴，論者又以爲西伯利亞鐵路之不可少，轉惜其與辦稍晚。足見前皇深謀遠略，早有以見及之矣。此會既係俄皇親總其事，各議紳又復力催加工，當不至作爲空論也。」（註三）

其後，俄國財政大臣微德，屢與許景澄面述接修西伯利亞鐵路，以便同力拒日之意，蓋俄國自是已志在必行矣！

其時，各國報章，亦多傳中國已允俄國借地修路，署兩江總督張之洞于七月初八日曾電總理衙門，謂俄造西伯利亞鐵路，意在網羅亞洲東方一帶貿易，爲防後患，華境之鐵路，應由中國自造；與俄路相接，渠之主張，僅注重于商利，雖有「根本重地，後患甚大」之語，而于國防上之利害，殆未注意，且爲防俄權利，又主借俄款築路，其見解亦殊矛盾。此電雖據傳聞而發，然對清廷之影響甚大，蓋此後清廷對俄表示願與接修鐵路，即本張之洞此電之主張也！（註四）

俄既有意借地修路，其後不待徵求中國同意，即行派員至東三省查勘路線，自由行動，不聽地方官吏之干涉。據吉林將軍恩澤于七月十三日致電總理衙門報告俄人已硬行闖進內地曰：

「據珲春電報稱：俄官帶人十數名，持俄國護照，擬取道南崗赴長白山奉天遊歷，請飭保護等語。當告以地屬荒山，碍難保護。俄照行于內地，與定章不符，囑令來吉換照。竟不允從，業已逕行矣。」（註五）

此爲甲午戰後俄人在東省逾規行動之另一種表現。迨至本日（八月二十六日），駐北京俄國公使喀西尼照會總理衙門，謂該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將來或與中國在滿洲地方興造鐵路相接，須預先查明路徑，故派員四起，分道赴東三省內地查勘，因時間迫促，不能等待北京護照，業已動身前往云云，此爲東北鐵路交涉之第一件公文書，在歷史上甚有價值，亦極有其意義在。其照會云：

「爲照會事：今准本國知會，茲因本國在中國東三省毗連地方興造西伯利亞鐵路，又因此鐵路將來或可與貴國在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八月二十九日

四一六

滿洲地方日後興造各鐵路，舉辦相接；自應將滿洲鐵路所能經過各地情節數端，預先查勘。是以現擬派往滿洲地方學士等數起，查勘各該處地勢，便可照該學士等所得各情形，決定本國鄰貴國疆界已開工西伯利亞鐵路各段之所向，以免再移之難。茲據百里總督咨稱：該遊歷人共四起，現今備裝成行，二起應由烏蘇里交界三岔口，即俄稱伯陸塔伏斯齊村起程，又二起由黑龍江省交界粗魯海關卡起程。其初二起內，一起計二十八人，以色威靖公率領，前往查勘交界寧古塔之間地方，一起三十六人，以蘭魯勒克威楚率領，前往齊齊哈爾、海蘭泡等處。其次二起，由粗魯海關前往者，各計十二人，內一起以墨勒則克伏斯齊率領，亦往齊齊哈爾。一起經過大興安嶺向南至遼東灣。惟時已晚，將屆嚴寒，該學士等或不稍失時動身，故不能待北京發來護照，因此之故，又加以固知貴國于游藝人士前往，本為推廣兩國鄰疆往來起見，兩國均有利益，深為關切。特請貴王大臣刻即電行黑龍江、吉林將軍等，轉飭所屬，將該游歷學士等放行無阻，隨時量力照料。其如何電行之處，務祈刻即見覆，以便電覆伯里總督可也。」（註六）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頁三四。

註二：「翁文恭公日記」(乙)，頁七三二—七三三。

註三：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卷八，頁四四—四五，文海出版社影印版。另參考「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第三冊，頁九八—一〇〇。

註四：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電稿，卷二四，頁一一二。

註五：同註一，卷一一七，頁一一。

註六：同註一，卷一一八，頁三—四。

二十九日(十月十七日) 日軍攻臺灣臺南城外礮臺，劉永福親自發礮擊之，斃數十人。

先是，自二十七日起，臺南戒嚴，永福移駐安平礮台。本日，日軍攻城外礮台，永福自發礮擊之，斃日軍數十人。時，永福集眾議，紛紜不一；知事不可為；乃託英領事，向日方請和，不成。（註二）連

橫敘其事曰：

「當嘉義之陷，永福知事不可爲，二十一日，介英領事歐思納致書樺山資紀求成，於時日艦大集澎湖，歐思納乘英艦披古至。副總督高島樞之助見之，書曰：查本年四月間，兩軍戰事已畢，海宇共慶昇平，惟和約中有臺灣全島割讓貴國一節，臺民以久隸大清國版圖，世受皇恩，不願反顏東向，是時我國遣官到臺，密行慰諭，而民心匪石可轉，公舉本總兵爲兼辦臺事大臣，本總兵以未奉明諭，無奈徇其所請，即以力保臺民爲己任，然非有自私自利於其間也，及見臺民自遭戰禍以來，其苦反難言喻，爲此咨請貴督，願以全島相交，惟尙有二事相求者，貴部兵既至臺南，不論何等民人宜悉優待，而不加以懲罰，一也。本總兵部下弁兵急須內渡，乞速撥船安送同陸，不論閩浙粵東，或南洋大臣處，皆隨尊意，二也。此二者度貴督亦必視爲要圖，故敢以爲請，如別無指駁，即當迅備交臺事宜，立候咨復。輒之助復書拒絕。二十四日，永福又委弁至披古，求見英、荷兩領事，邀往吉野，兩領事却之，以永福不至，雖往無益也。是日吉野至安平，以書與永福，約明日辰刻，至艦議款，否則開戰，兩領事亦力勸，終不敢行，而日軍已海陸併進矣。二十六日，日艦七連船二攻旗後礮臺，守將劉成良，永福義子也，互擊兩時許，臺陷，逃歸臺南，永福怒，欲斬之，翌日入鳳山，二十八日略舊城，以騎兵追臺南，鄭青拒之於二層行溪，郡中大震，爭舟走廈門。」（註二）

另姚錫光亦敘其事曰：

「嘉義去府城百二十里，嘉義陷而臺南不可守。先是，七月初旬，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自英兵輪致永福書，說其率所部去臺，謂將以禮送之內渡。永福復書却之，辭甚峻。八月，倭人渡兵澎湖。二十三日，其戰艦運船三十餘艘，載兵械，將以全力攻臺南，直指安平海口。時陸路前敵諸軍已饑潰不支，嘉義將陷。英駐臺領事歐思納，復爲永福與倭約和，讓臺南，聽永福內渡，已成言簽名矣。會嘉義復陷，倭責永福徒手歸命。永福怒，約乃絕。二十五日，倭艦攻旗後礮臺，永福之子成良登臺拒守。奸民夜引倭由僻徑登岸，突入大營，陷之，進圍礮臺。臺兵持兩日，死傷枕藉，饑不能戰。成良乘間衝出。二十六日，倭進攻鳳山，義民拒戰，大敗，倭遂入鳳山，屠戮甚慘。進犯臺南府城。二十七日，臺南戒嚴，永福移駐安平礮臺。二十八日，各軍飢譁，徐散去。二十九日，倭攻城外礮臺，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二日

四一八

永福自發礮擊之，斃倭數十人。」（註三）

註一：「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八。

註二：「臺灣通史」，卷四，獨立紀，頁七五—七六。

註三：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二五—二六。

九月

二日（十月十九日） 清廷以俄國派員四起，赴東三省勘查，已有借地修路之勢，命許景澄告俄外部，中國擬自造鐵路，在中俄交界相接。

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駐京俄使照會（八月二十六日）後，由總署大臣恭親王奕訢等據以上奏。略曰：

「奏爲俄國派員分路前往東三省查勘修築鐵路事宜恭摺密陳請旨遵行事：竊臣衙門于本年五、六兩月間，迭接出使大臣許景澄函述，俄戶部大臣威特所言，俄國防日甚亟；現已趕造西伯利亞鐵路，勸我造路與彼接連，兩收通商調兵之利。述之再四，但僅作爲私論，未有明文。又俄國新報，論及西伯利亞之鐵路取道東三省以達黃海，言之不已，必將有向我明商之舉，此正中俄邦交關繫要鍵等語。臣等以未見該國明文，新報不能爲據，茲于八月二十六日接准俄國駐京使臣喀希尼照會，以該國與造西伯利亞鐵路，將來或與我國在滿洲地方與造鐵路相接，須預先查明路徑所過；以擇趨向，擬派遊歷人四起，由烏蘇里、黑龍江等處交界起，分道前來內地查勘，並請電飭照料等語。臣等查該使所稱各節，證之許景澄來函，適相符合，詳釋該使照會，以將來或與中國在滿洲地方與造鐵路相接爲詞，是刻下竟有借地修路之勢，中國于東方鐵路豈能置爲緩圖。查邊界鐵路，兩國接連，西國習爲恒蹊，中土尙爲創舉。其中利弊，亟宜預爲詳細考究，許景澄與該國大臣尙能聯絡通洽，相應請旨飭下該大臣，與俄外部詳探確情，速

籌辦法，據實密陳，以定進止。茲特鈔錄俄使照會（見前頁），恭呈御覽，謹奏。」（註一）
另附摺片，主張自造鐵路與俄路相接。清廷從之，故本日旨電許景澄曰：

「俄派員四起，分赴東三省勘路，雖以與我接路爲辭，實有借地修路之勢。此事源委，許景澄曾經函達，諒已瞭然。現在俄外部何以不與該大臣面商，遽欲興辦？至中國辦法，惟有自造鐵路，在中、俄交界，與彼相接，方無流弊，著許景澄即將此意與俄外部說明，總期勿損己權，勿傷交誼，方爲兩得。欽此。」（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頁一。

註二：同上，頁三。

三日（十月二十日） 日軍陷臺灣臺南府，劉永福內渡，全臺有組織之抵抗漸消失。

先是，本月朔，臺南城中無糧，飢軍悉潰。次日，永福駐礮台（一說于二日永福率子成良等喬裝走安平），城中混亂，日兵亦集。永福不支，登英船參利士號（Thales）去廈門，日兵登輪大索四次不得。從行者其子成良與陳樹南、柯壬貴諸部將，及幕客數人。是時，臺南秩序大亂，英教士埃羅生（Eeruyson）及巴克來（Barclay）迎日軍入城，于是臺南陷。（註一）

按：日軍之來，初以垂手可獲，及遭臺民不屈不撓，前仆後繼之喋血抵抗，遂一露其狰狞面目，任意屠戮，縱兵搜括，姦淫擄掠，無所不至，致使臺民，人亡家破，食居蕩然，觸目蕭條。然臺民亦索獲相當之代價，夫以一島而抗日本，其勢至不相侔，此乃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正顯示吾華族傳統不易屈服之民族精神。「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成仁」、「取義」之舉，于臺民抗日期間，可謂俯拾皆是。綜計作戰以來，日軍死亡達四千八百餘人，高級將領除少將山根信成外，近衛師團長亦于本月十一日（十月二十八日）斃命臺南，使日本天皇爲之震悼，朝野爲之痛惜，日人所付之代價可謂鉅矣。尤有進者，由于臺灣人民英勇而可歌可泣之抗日行爲，促使日人其後不得不稍改其統治朝鮮之高壓政策，而以較為和緩之手段治臺也。

劉永福本廣西天地會起義軍之殘部，其後由于清軍壓迫，率部逃入滇越邊境，成立黑旗軍，其部屬多天地會人士。及中法衝突發生，清廷以之抵抗法軍，頗具功績。甲午戰爭起，臺海吃緊，臺灣地位日形重要，清廷調永福及其所部之黑旗軍渡海防臺南。馬關條約訂定後，臺灣割與日本，臺民立「臺灣民主國」拒不讓日，永福激于義憤，協守臺南。自臺北淪亡後，永福獨力支持大局達四月之久，至是以餉械兩乏，無法支撐，乃內渡焉。是時黑旗軍被俘者達五千人，旋由日方分批遣返廈門、廣州一帶。

附錄：

一、劉永福在臺南戰守情形（註二）

公（劉永福）在臺灣之臺南爲欽差幫辦全臺軍務事宜，並於該處起築泥營、礮壘駐紮。冬十二月，御賜壽字。其時日本畏公如虎，由日本大將致函與公，以百萬利誘；請公內渡，公不允。

光緒二十一年，日本遣各兵艦陸續進臺，旋又增進巨艦。時臺撫兼督辦軍務在臺北，乃爲邵友濂，緣唐景崧奏邵辦理不善，奉上諭：「邵友濂撤任，臺灣巡撫着唐景崧署理兼督辦軍務事宜。」接篆後，公往臺北與薇卿會商，（香林按，唐景崧字維卿，又書薇卿）並偕往踏看營盤人馬，所布置各項，諸與公意見不合。回署譚論，公曰：「中丞這個駐所，建築不妥，凡人馬多有懦弱，何不我亦過來與中丞同住，更改營盤，裁去老弱，添補精壯，且得近與商量辦理，豈不兩有裨益耶？」且中丞辦理民政，日不暇給，其軍政事宜，千頭萬緒，如絲之亂，鄙意過來相幫，尤爲妥善。不知公意以爲然否？」唐曰：「老兄在臺南獨當一面，節制南方各統領，任便行事，已成專閥，弟雖督辦之名，亦不爲遙制，且鞭長莫及。臺南地方實爲扼要，非有威望大員不足以資鎮攝；老兄既住臺南，毋庸再多一樣思想。又況老兄顧臺南，弟顧臺北，南北兩處皆有備敵之對付，聲勢大壯，諺云：『先聲奪人』，日本豈無聞風而生畏乎？弟意已決，兄勿多疑爲是。」於是公回臺南。

後唐中丞又令公往臺南所屬地方恆春縣紮守（由臺南府落恆春縣八日路程）。該地方荒坡野嶺，一望無際，如深入不毛之處，其土饒極，種菜不生；土人四圍用石圍牆，高三四尺，乃可種菜，即菜蔬極小之葱，每一條亦賣十幾

文。公到時，毫無告警風聲。住七日，出外踏看地方，方知地點路線以爲戰地之預備。後回到阿公店地方，已行踏六七日之間，忽在中途接唐電云：「某日已與日本在三雕嶺開仗，我軍大獲勝仗，請公速回」等語。公即趕程回到恆春，又接唐電云：「臺南鎮總兵文國本辭職，已照准，其臺南鎮篆務着劉永福兼署，」等因。公接電即發電與唐云：「承委兼署臺南鎮印務，祇可擔任權理數日，實緣軍隊事繁，萬不能兼顧此缺，希即委員到接鎮篆，切盼！」唐不復電。過數天，唐自出銀一百鑄造大總統印，製黃旗兩枝，寫民主國字樣，概轉旗號，不用龍旗，唐又遣人鑄造大將軍鐵印，派新放臺南道進士區鴻基往赴新任，順道寶印送與公。區送到彰化，因聞臺北大敗消息，連印帶回，不到臺南，時間五月也。

先是，日本各兵輪陸續駐進臺北港，唐軍爲之震恐，已無心戀戰；唐景崧特派戰事臨時督令官廣西賓州黃某拈大令督戰。五月初前後，統兵大員屢派人旋告勝仗。唐得了此個消息，喜出望外，其於大將軍印時，先拍一電與公云：「景崧被百姓強立民主爲大總統，已送印民國旗等件，崧爲萬民付託，迫得權理。現送大將軍印與公，希收啓用。公卽爲臺灣民國大將軍，統轄水陸諸軍務。至大總統一職，崧暫時權篆，事平當讓公」云云。此電最末發，唐雖飭詞爲民所強，其實自爲之事，蓋唐心專制帝王已非一日，其前在越南屢勸公篡越王位，彼之意思亦料公可爲大將，其文才不及他，將來一定爲其所得耳。

閒說休敘。且言唐特派戰事臨時督令官，於唐既送大將軍印與公後，旋回到衙署。時當晚膳後，唐、黃兩相見面，唐一見之，卽滿面欣喜，謂曰：「用過晚膳否？如未，卽著廚弄飯菜。」黃曰：「未曾。」唐卽令廚再弄飯菜，加添珍味。席間唐與黃對約「酌？」，斯時唐卽欲飽聞戰事，以得詳悉勝仗情形，擊杯大飲。唐撫正欲啓口問黃，而黃則慨歎一聲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耳！」唐驚曰：「今日既打勝仗，爾何爲出此不祥之言耶？」黃對曰：「大人有所未知，前各報勝仗者，皆僞言耳，其實敗也！」唐時手方拈箸，卽氣激心慌，連箸拋棄，卽回房，百事不理，左思右想，無一佳計，總之無可如何。古云：「六六三十六著，走爲上著，」遂決計假扮商民，不動聲色，僅帶心腹隨行數人逃走。其去了並無知覺，蓋唐自連動與及逃走皆可行動自由者。

先是，清國與日本和議成了，已割臺灣一島，早奉密電，別人不知。唐去後，上諭始到，云：「所有全臺大小文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三日

四二二

武各官內渡」等語。彼時唐已逃了十餘天矣。斯時，衆商民百姓始知唐之實去確耗，如是衆紳耆百姓大集會議。臺北唐欽益已內渡，現在無主，不足統治萬民，總轄軍務，紛繁待理，正如亂蘭一團，萬緒千頭。衆議決云舉公爲臺灣民主，所有全臺兵民責任均爲公所負擔等議，全臺人士代表各皆簽字承認。公被強舉，斯時本無寄心於其間，惟有欲保護萬民，保守疆圉兩事爲念，以爲在臺一日，則常盡一日之心，其於帝王、總統思想，全無一些，惟承萬民請命，欲副本心保人民，全領土兩事，是以不得不暫時理事而已，其他非分之榮，不敢望也。

公由旗后上臺南府。自唐景崧潛行走後，日兵知覺，遂進臺北如入無人之境。尚有臺南一帶，公扼守之。時日本各兵艦紛紛駛落各處港口，預備戰爭。臺南各處分紮軍隊處所：恆春統領五營區聲；旗后統領二營劉成良，管帶一營楊德興；鳳山管帶一營樂某；東港統領三營吳光宗；白沙墩統領五營張占魁；布袋嘴統領三營某，又分統兩營李章義；宥隆圩五營，四草湖五營，另民國二十餘處分駐各要塞地方，各統駐紮軍隊各領各管帶等，見日人駛兵艦到各處，惟有告急文書報知。時所有大小文武各官員，不論遠近，皆送印與公，由公主裁辦理；其既繳印各官，亦多過海。至今臺各軍兵百數十營，又比人義勇團數十營，爲公節制調度，各統督、管帶均換給關防，各印官文武分別陸續委置篆務，視地方繁簡，以爲任命之遲速。軍政既歸統轄，餉糈尤當籌畫，不可視爲緩圖。公即在支應善後各財政處所查核，共計尚存二十萬幾千銀毫之數，即提此款暫發各營火食。

時雖奉旨將全臺割與日本，但接兩江總督張密函，囑請仍相機扼守，餉項後定滙接濟，幸勿爲慮；並接兩廣總督譚密函，與張函大致相同。公見有此兩處援應，亦可扼守，至臺一日，惟有竭盡一口之心，其他事之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也。公發令懸賞，每斬老番首級一顆賞銀二百兩。自此令出後，陸續亦多斬獲，隨時報功，隨時給領賞號，惟因張、譚兩督滙款未到，每一功暫發三十兩，後乃給足云云。

至六月間，臺南各界大集公民大會，到會者數千人，集議公推公爲臺灣民主大總統，衆皆贊成。議決，即鑄銀印一顆，文曰「臺灣民國總統之印」八字，鑄就，各界代表邀集三千餘人，將印送與公。各代表先見公，說明全臺各界數百萬生命，公意舉公爲民主，並說理論甚多。公曰：「爾等衆百姓公舉我做總統，送印而來，可以不必多此一舉！此印不能打得的，無論如何，均要打贏，方可完全領土。今日之事，軍事也，土地之存亡，人民之關繫，千

鈞一髮，甚宜注意。其實事在將兵互相得力，咸皆用命，或者易亡而存，轉危爲安，從此上國衣冠不淪夷狄耳！區區此印，無能爲力。蓋有在此不在彼之故，諸君以爲然否？請將印帶回銷之可也。」

越一、二日，第二次各界祇派代表耆老等又將印送來，並又陳說理由甚長。公曰：「前次送來吾已不受，今何又勞諸君耶？夫勢處如斯，情同騎虎，朝廷忍舍錦繡山河，又不願置數百萬生民於不理。今諸君送此印來，無非欲保身家，固土地，不甘爲蠻夷牛馬而已。誠宜決意抵敵，務須互相協力，籌軍餉，爲第一著緊要之事。蓋軍餉足用，士肥馬騰，日本雖然厲害，吾豈懼哉！吾在越國時，三次與法逆交兵，一戰而法駙馬安鄴授首，再戰而李威呂分屍，三戰而法全軍焚滅，共計法兵死者不下萬人，其一二三四五等畫將官不計其數。彼時並無總統印綬，不過奉命討逆，將士用命而已，印何爲哉！諸君如能移送印踴躍之心籌餉，則自有所措置矣。否則，雖十百千萬之印綬，又何用耶？印吾不受，諸君贊回爲是。」各又唯唯而退。

越三日，又送印來。公曰：「你送印交我，更不能做事矣。爾們回去，那係有銀幫銀，有錢幫錢，無錢幫米，無論多少均善；至其無錢米之人，則要幫力，我須用人出力，則相幫之至。籌餉一節，我設局收之，爾各俱給軍糧可也。」後各回去籌釐軍糧，有捐十餘斤，二、三十斤者不等。公見無濟於事，又在各海關卡厘金各項雜捐收入共得銀五萬兩足數，用至六月底充各軍營勇火食。六七月交界之期，正是青黃不接，張、譚兩處接濟音信杳然。查得張滙銀百萬到上海，事爲李鴻章查悉，阻撓折回。公異常焦急，迫得印造銀票，聲明全臺軍事救平，一元連本還五元；且發銀票不過千數百元。時因各財主僥倖被英、法諸國恫嚇，渡過廈門，所有全臺資本家幾去一空，是以財政萬分困難，杯水車薪，無從救濟。六月後，初則千兩發四百現銀，六百銀票，旬間則千銀發現二百，票八百，又旬間現銀一百，票九百，又旬日全發銀票，初時，全使銀票，臺南城內外鄰近各處尙覺行，到九月中，城內外亦無人肯用了。

先是，月間日本兵輪愈來愈多，四處要險水口陸續繼進，到則放開花礮打燬各營，因險要駐勇處所，有設在海旁，無論何處，陸續聞報被其擊敗佔踞。日本兵登岸，義勇隊與他攻擊，隨時亦斬獲日兵甚多，奪獲槍械無算。連打十餘仗，每仗打勝，斬首解送，隨時報功，並奪番馬亦多。因各海傍險要各營失守後，退回離海二十餘里駐紮。

各縣義勇軍互爲聲援，是以義勇膽壯，與其對敵。況日本陸戰不甚厲害，非海軍火輪瞬息不定之故。自經義勇隊戰勝各仗，日本兵士稍爲畏怯。公在臺南府平安縣，乃正海邊之地，日本兵輪不敢駛入。

時有部下統帶李、章二人求公允准伊帶二營人往離布袋嘴二里險要扼守抵敵，公未允，且以礮火艱難爲詞。章云：「土人有軍火，儘可足用。」力求再四，公迫得允准，並發餉銀四千兩，令其帶人前往，相機抵禦，勿稍鬆懈，詎李心懷叵測，領了餉銀，一溜煙跑回布袋嘴，將銀席捲，並連各槍枝變賣而逃，公偵知其事。即挑衛隊百名星火往追。各衛隊兵領到命令趕程而去，去到芳崗尾地方，瞭見李、章二人尚有數百人跟隨逃去，不敢下手，各即馳回，見公說明緣由。公再飭數百人追趕去，到安平時，李、章二人與彰化府知府某先已僱舟渡廈門去了。各兵遂間復命，公聞知亦無如何。

公在臺南坐鎮，原期力保領土，護衛人民。無如財政困難，日迫一日，四處之羅掘俱窮，百般之設法亦盡，張、譚之接濟已成畫餅，番奴之進逼急若燃眉。蓋未動兵先籌糧，兵家爲第一要。今日睹此情形，糧餉必定涸罄，土崩瓦解，勢所必然，自念焦灼，言之激昂。

先是，一月之間，予成良揣度情勢，預知不久，密說公內渡。公曰：「雖無糧，何以對百姓？」後有英國胡領事官入見公，謂曰：「打得久矣，各商民亦甚辛苦，究不如大家和好，方爲上策。」公曰：「如何和法？講和之事，不是金銀講的。如果和了，百姓得安和亦好；但恐和後，我去了遭殘百姓，我心何忍？」胡曰：「和了，公內渡後，臺之百姓即日百姓，焉有遭殘乎？」公曰：「不知他如此否？他如果得安百姓，亦未嘗不可。」言畢，胡領事見公如此說，遂辭曰去與日本說，如何明日再來相商云云。次日，下後四點鐘，英國胡領事復來見公。胡曰：「日本全權官鳳山（羅香林案：鳳山似「樺山」之誤）云，要公落去見他，彼此面議妥善，方可成議云。」公曰：「如去，若得麥家林與我同去，我便去就是。」（洋人麥家林乃臺灣海關官，是公放的。）胡曰：「要他去做甚麼？他乃小國人物，事不干他，何必與他同去呢？」公曰：「不與他去，我實不去。」公如此說畢，胡辭回。胡往見麥家林，不知如何說通，次日胡即放使小火輪船來，預備搭舢舨來見公，請公去，云「現在預備船隻，公即與麥家林同去可也。」公正在猶豫未決，即與胡領事落安平會晤麥家林坐談。公說：「由胡領事介紹議和情形，及要親見日本全

權官鳳山，特來商酌如何」云云。麥曰：「公不來，某亦往，去與公同去也。某出去看火輪船在何處。」麥舉步而出，適小火輪使「駛」？至劉處，麥瞭望不見而回。時有胡領事伴僑華人蕭某在傍，胡領事囑曰：「爾在聽候，我搭舢板過去，看如何？」正喚火輪來接，胡卻落舢板去了。時有博白武進士劉斯榮及上思劉崇義由府城起二十里追到安平見公，謂公曰：「不去得！不去得？」蕭某曰：「不怕的！不怕的，胡領事交替某聽候兩公，胡乃正當行爲的人，何妨？」斯榮曰：「我大人肯去，我兄弟不肯與他去；爾乃何人，想唆擺舞弄使我大人去耶？」蕭曰：「我們大家都是有辯的，他們豈不要我有辯之人？難道反要無辯之人耶？何以如此講法！」兩家爭鬧，致起衝突。時有英國的厘士大商輪渡火船，可坐一、二千人的，其買辦胡仰山聞得公要落日本船消息，即火速跑來見公，謂曰：「不可！不可！老番心狠毒如蛇。口雖有蜜，而腹有劍，萬勿輕信。況胡領事心事不好，我盡知，我打老番工數十年，何樣不知也！」蕭頂曰：「我伺候胡領事十餘年，良心甚好，我盡識，難道你知得過我乎？」仰山曰：「縱使他心好，臺南百數十萬兵民皆望公一人而已；倘公落去，總不殺公，他駛公回日本，此時百數十萬兵民望何人耶？」仰山大破蕭說。公見仰山說得確有理由，決意不落，即回府城。蕭某無可奈何，自此落日本船事已作冰消。

二、劉永福小傳（註三）

劉永福：字淵亭，廣東欽州人，家素貧，幼隨父徙居廣西。咸豐七年，石達開西入湘、桂，劉永福從之。及太平軍亡，劉永福率領其部衆敗逃越南，以七星黑旗作標幟，黑旗軍之名由此而起。當中法爲越南問題初起爭執時，劉坤一便建議要越南招撫劉永福，用黑旗軍作抵抗法人的準備。事實上黑旗軍的力量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強大，人數不過二千，亦無新式槍礮。及中法衝突起，劉永福與法兵戰，大勝於諒山，越南王封義勇男，授三宣提督，威名大震。時唐景崧奉命出師救越，往說永福，永福許之。光緒十一年中法和議成，入京，清廷嘉慰，授南澳鎮總兵。二十年，清廷命其入臺，幫辦軍務。二十一年日軍入臺，劉永福在臺南率領官紳義民登臺挿血，立盟書以示死守，苦撐四個月後始登英輪內渡。

三、晨風撰「一八九五年臺灣抗日運動失敗之原因」（註四）

引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三日

四二六

乙未臺灣淪日史實，我國史籍，以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敘述最詳。然只根據一方面材料，紀事頗多疏舛，□□之「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臚列外交文件，於甲午戰後張之洞等欲運動俄、法等國出阻割臺本末，陳述甚悉；唯搜索史料，尚多遺漏。久欲鳩集中、日、英各國史料與是役有關者，加以整理，試補此臺灣史中重要之一頁，顧學力既有未逮，而若干重要書籍，如美國外交關係（一八九四年度）及連雅堂臺灣通史等，迄未有寓目機會，遂不敢率爾執筆，茲篇就臺灣民主運動失敗之原因，略抒鄙見，不敢自謂有所創獲，亦欲以供學界參考之資，並爲他日增補之底稿而已，方聞君子，幸垂教之。

一

臺灣民主國成立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日（六月四日）唐景崧出走歸於崩潰，前後只十一日。梁任公詩有「曾聞民主國，奄忽落人間」之句，即指此也，臺灣民主國之覆亡，何以如此迅速？此爲深可注意之問題。

江山淵丘逢甲傳云：

「兵事將起，清廷以景崧知兵，特命代（邵）友濂爲巡撫，然景崧既與（劉）永福共事於越南意見不同，怨仇日深，既爲臺撫，遂自守臺北，移永福軍於臺南，逢甲以景崧雖號知兵，而防禦敵寇遠不逮永福，全臺形勢盡集於臺北，臺南非其比。……景崧一人守臺北，無永福以助之，恐守之非易。臺北破，臺南將孤守無能爲矣。乃急詣二人，許爲之調停意見，思所以阻永福之軍勿使行，焦唇敝舌，繼之以泣。景崧卒堅持不爲動。二軍遂分……厥後景崧坐誤事機，臺北失守，永福孤守臺南，相持數月，卒無以救臺灣之亡」。

唐景崧調永福一軍赴臺南之紀事，首見於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姚著繫福軍抵臺北於甲午七月，又謂次年二月移永福於臺南，割臺記、清史稿俱從其說。惟考之當日文獻，則永福一軍，奉命渡臺係逕調臺南，並未先至臺北，其調臺南，爲邵友濂之命令。甲午八月初一日，邵致樞垣電：

「基隆滬尾，爲臺北最要海口，計舊有新增共四十營，楊岐珍淮軍宿將，如今其總統各軍，呼應較靈。臺南兵力尙單……劉永福已行抵汕頭，如先到臺北再到臺南，頗多周折，已囑其徑赴臺南，與鎮道妥商佈置。」

事皆施行。當時邵與唐景崧暗鬥，永福之歸清，與唐關係甚切，故邵目劉爲唐派，因調之往臺南，而以軍權付之出身淮軍之楊岐珍也。其後景崧疏許邵氏，其藉口之一，卽爲邵之調劉，事先未與己洽商。由是爲見劉調臺南，非但不出於唐，唐事前並未知也。

至唐、劉交惡，事誠有之。景崧接署臺撫後，永福曾往臺北，與之協商，意見不合。其後惡感漸深，張之洞於甲午十一月電唐云：

「劉鎮永福在臺得力否？現帶幾營？有舊部否？如無大益，擬調來上海帶粵勇。……滬上粵人甚贊劉，其性情長短久已知，不過取其虛聲，號召粵人耳！……如承允許速示覆。」

唐卽日回電贊同。時劉軍兩營，舊部以吳鳳典二百餘人，新募四營未到。其後因臺防緊急，調滬事遂作罷論。乙未一月，張知唐、劉不睦，電李秉衡云：

「煙臺已危，若我軍能攻煙臺之賊，彼攻榆關，……之力自分，擬調劉永福赴東助剿。劉在臺鬱鬱不得志，與唐微卿有意見，極願內渡。」

並同時電唐促劉成行。惟不久李秉衡覆電謝絕，而澎湖防急，事又中止。張之洞乃分電唐、劉爲之調解。對唐則望「略（劉）所短。曲意聯絡……當能效臂指之力，」對劉則謂「切盼兩軍同心，必能破賊成功。」結果唐、劉感情維持，無大破裂。

從上足見唐、劉情感問題，對臺事無大影響。黑旗軍自始卽駐臺南，無轉調事。且臺北守軍由楊岐珍指揮，兵力雄厚，共達七十餘營，在勢亦無待永福區區六營之助。故江山淵之論，實未諦也。

臺北失陷之主因，鄙見以爲在當時政治舞台上兩大派之傾軋。

甲午戰爭中，清政府中有后派與帝派之對立。后派以李鴻章爲中心，傾向慈禧；帝派傾向光緒，以翁同龢、李鴻藻爲中心，而復有疆吏張之洞等之聲援。戰事過程中，翁派叫囂主戰，而陰掣鴻章之肘，中國戰敗，此亦一因。日本陸奧宗光曾痛論之，指爲中國人之自殺。（蹇蹇錄）事爲治中國近代史者所共許，可勿深論。當時之暗鬥，不僅限於京師，抑且及於邊省。戰事初啓時，臺灣文武官吏，如巡撫邵友濂，提督楊岐珍，俱屬李派。而唐景崧則屬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三日

四二八

翁派。清軍既屢戰皆北，李鴻章失勢，得詔申斥。景崧乃乘機排斥邵友濂，於九月十二日致電樞垣云：

「景崧奉命幫辦臺防，而撫臣邵友濂以楊岐珍統基滬各軍。劉永福赴臺南，……一切軍務不令與聞，伏懇天恩銷去幫辦臺防差使，情願帶營北上，效命何恨！乞代奏。」

清廷旋下令責問邵，詞頗切峻，又命閩督譚鍾麟察視邵，唐二人，孰為得力。譚於十五日電覆樞垣，指責邵「本不知兵，師心自用」，亦謂唐之計奏為不顧大體，語尚持平。然邵已不安於位，請另簡大員接任。邵遂調任湘撫，臺撫由景崧署理，此翁、李兩派之小鬥爭也。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李鴻章奉命赴馬關與日本作議和談判。時已風傳有割臺之說，張之洞於二月初七日電鴻章查詢情況，未得要領。俄接汪喬年密電，知清廷決意割臺，之洞乃發起保臺運動。首奏請向英借款，以臺作押。總理衙門詢之赫德，赫德以各國俱守局外，勢不能行。清廷乃詔詢之洞有無確實辦法。之洞遽分電倫敦龔照璦，俄京許景澄，請進行藉外力商阻割臺。龔、許均覆電，謂無辦法。

迨馬關條約簽字，（三月二十三日，西四月十七日）中有割臺之款。張之洞進行益亟，與唐景崧函電往來，密商阻止之法。一面出張、唐分電總理衙門，阻割臺灣，以民不服日為理由。一面則經俄使王之春在巴黎向法求援。然之春與龔照璦（駐英法二國公使）不和，遷延無所成就。四月十七日（西五月十一日）法以三國既干涉還遼，不願再與聞臺事，其駐清公使施阿蘭遂通知總理衙門，拒絕對清援助，並要求王之春速離法京，赴俄就任。張之洞之企圖歸於失敗，主戰派受一打擊。

煙臺換約後，日本任命樺山資紀為臺灣總督，全權接收臺灣。並照會清廷，限於兩週內實行交割。時清廷清議，反對言和，集中攻擊李鴻章。清政府竟從刑科給事中謝雋抗議，派李經方為全權委員，赴臺交割。此舉顯在羞辱李父子。鴻章在衆口詆毀下，處境困難。李經方時在上海，稱病不肯赴任，鴻章於四月二十六日電促成行，並囑囑為之畫策。乃經方向未啓程，而臺灣忽有民主之局，使李父子處境更難，處此情境，李對臺灣民主國自將極力破壞矣。

臺灣民主國之成立，其近因固為臺省紳民之憤激，而背後實有張之洞一派之鼓動與支持。四月底民主之計劃已將成熟，景崧曾與之洞電商，欲清廷與以事後不加責問之密據。並求之洞助餉，之洞對民主大體贊同，但謂唐稱總

統，名目太大，朝廷必不肯予以密據。張對臺灣曾預款三十萬相助，至臺北敗潰時尙電致唐景崧云：

「臺地廣，倭兵少，但存一府一縣，即有生發，相持三月，各國必有出頭者，僕當力籌，即臺北府爲倭占，仍可自存。」

亦可見張之勇於自信矣。

至唐景崧當時之接受臺灣民主國總統職任，依其事後自述，亦由於深信但能堅守，外交局面必有轉機，景崧內渡後上李鴻藻書有云：

「亦知萬衆之情，事成則堅，事敗則解，然睹臺民遭茲慘變，不忍遽舍，……凝望爲一線之延，以待轉機，而一身禍根，即伏於此，當日只知爲國謀，爲民謀，而絕不爲身謀……自立必有名目，必須布告，待外洋各國認臺自主，始能商結外援，此西例也，……臺民所送旗印，因爲民劫制，無計擺脫，不得不從所請，原未嘗即以非分自居。……」

雖爲事後彌縫之語，而期盼外國援助之情，則可信也。

李經方於五月初七日自滬啓程赴臺，李鴻章已開始破壞臺灣民主。四月二十七日李軍告經方云：

「……又電楊提督歧珍云：「經方至臺、澎，弟奉旨撤回，何日料理內渡，屆時探明行轅，晤商一切爲要，西園係舊部，誠篤勇敢，現會辦臺防」。

楊歧珍得李電後當即服從。臺灣紳民留之不得。初八日（五月）歧珍帶兵四營返廈門，餘亦陸續內渡。楊電李報告，李又覆以電云：

「電悉，吾非忍棄臺，議約時，日言必發大隊攻奪，請早讓以全民命，今竟欲自立，恐爲地方造劫，且連累國家，弟遵旨內渡，極合正理。林時甫現在何處？勸其早退，留安人照料田莊，依例辦理」。

按林時甫即林維源，乃臺灣首富。是年二月初十日，唐景崧曾致電軍務處，請旨飭令林氏個人籌借軍餉百萬兩。其財力可以概見。林氏之內渡，對臺灣民主運動爲經濟上之重大打擊。

臺北守軍，原以淮軍爲主力，所守如滬尾、澳底，皆爲天險，歧珍撤兵後，澳底兵備甚單，由曾臺照所部新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三日

四三〇

士勇，「連勝軍」三營駐守。五月初六至初七日（西五月二十九至三十）日軍近衛師團於澳底登陸。曾軍甫戰即潰。臺灣民主國迅速覆亡，實以淮軍內渡爲主因。故民主國諸人物內渡後，其切齒者亦爲鴻章。如丘滄海春感（次許蘊伯韻）十首中之二首云。

「一夜東風滿鳳城，春愁黯黯共愁生，新年鵬燕他鄉感，落日鯨鯢故國情，款局有人通秀吉，殘疆無計守延平，天涯何限哀時淚，洒向花前月不明。」（其一）

「誰遣風雷起蟄龍，冥冥愁夜遞秋冬，夢回香國春三月，月極蓬山海萬重，置酒未聞平壽勃，牽書還見卓徵邕，欲將筆削修花史，墜溷飄茵聽所逢。」（其五）

即皆指斥鴻章之作。當時對臺北淪陷，主因在淮軍內渡，知者尙多。

以上爲甲午戰役中翁、李二派相傾之一幕。吾人今日縱按史實，殊不欲於兩者之是非曲直，更置一詞。顧一國之中，而有對立之二派，各作外交活動，則必授人以隙。甲午我國之敗，未必不由於此。清季自太平天國亂後，大權旁落督撫，有此怪現象發生，原不足異。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讀史至此，亦宜有所警勉也。

二

雖然，臺灣民主運動之失敗，固尙有內在的原因，如守備之廢弛，抗日情緒之低落，均足使自主運動，絕無成功之希望。

淮軍內渡後，臺灣守備兵力約三萬三千餘，槍枝配備，爲式樣不一之毛瑟、黎逸、雲者斯達步槍。用黑色火藥。以視日方士兵之配有村田式槍，用無烟火藥者，遠爲不及。然作戰勝敗，非盡決於武裝；臺軍之致命傷，尤在其軍隊組成分子之複雜及作戰情緒之低落。臺軍包含粵勇、土勇、客民等。當時臺灣人民，除蕃族外，多爲閩、粵二省移民。閩人抵臺開墾，其事在先，故多占居沿海區域。粵人移居臺灣土著也，以作戰情緒論，廣東最爲低落。土勇與客軍因保衛鄉土，精神較佳，但景崧未知加以利用。任用粵勇，本爲景崧一貫之方略。彼任藩司幫辦軍務，即首定增募粵勇五十營之計畫。既爲巡撫，從唐鏡沅議，使吳國華掣銀二十萬兩內渡募勇。吳本質庸無賴子，後爲盜，有司出花紅緝捕，景崧竟誤信爲大俠。授以事權，欲使之遠襲日本，初議募粵勇萬數千人，用民船襲日，後因和

遣散。乙未四月，景崧決意守臺，始再招集。四月，吳國華率三千人渡臺，而虛籍復多，實只二千人。途中遇風收鹿港，一部分爲劉永福截阻，其抵臺北者，只乘新福建輪船之數百人。景崧乃深倚重，調守臺北門戶之獅球嶺。結果日軍登陸後，吳國華與士勇爭功，竟棄三貂嶺不守。其後兩次接仗，均失期不能接應。臺北因之不守。景崧內渡後，吳與吳友勝率所部千餘向新竹方面退却，沿途剽掠，結果爲中壢一帶臺民圍擊，卒被殲滅。

臺北軍備之脆弱如此，故日軍登陸甫四日，而局面已土崩瓦解。景崧以外援不至，而素所倚重之粵勇又不堪一擊。加以惑於日人重賞購頭之謠言，遂倉皇乘漁舟內渡，遙赴上海。雖經張之洞電勸繼續抵抗，俞明震、高爾伊代劃退守新竹，就林朝棟圖再舉之策，而景崧已成驚弓之鳥，認定事無可爲，放棄作戰矣。

綜上所述，則臺北之亡，景崧應負極大之責任，其中道逃去，尤無以取諒於臺民。景崧事後解釋其不退守新竹之原因：

「雖以夫基隆一隅，而已經割棄之區，一割則人心瓦解，與昔年法人之役失基隆後尚能守臺北者，情形迥殊，意欲退守新竹，而餉械本屬無多，並此而不能運，精華既竭，縱欲支持，數月終歸於盡。……」

其言固亦洞中時勢，然苟早料及此，何勿率先內渡，「早讓以全民命」。（李鴻章語）至此而始舍去，爲一己計則巧，然於臺局則無補矣。許南英「窺園留草」有云：「請纓日記筆如椽，紙上談兵是汝賢」。即爲景崧而發，語雖尖刻，然實可代表臺民對景崧之不滿也。

三

臺北雖告覆亡，而劉永福仍守臺南，臺南紳民迎劉至安平鎮主持。雖仍稱幫辦不用總統之稱，至議院組織猶存，且選出七人委員會主持政務。則民主國之局面仍部分存在，吾人對其興亡，亦不可不略爲述及。

臺南局面之維持，當時急待解決者爲軍事問題及財政問題。其後之崩潰，亦即由於軍事崩潰及財政竭蹶，茲依次述之。

乙未五月，臺北覆亡時，臺南財政處，存款僅廿萬左右。此數實不敷應用，乃由議院集議發行紙幣，通常現銀，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軍餉及政府支出悉用之。前後所發，凡二十五萬數千兩，同時又印行印花，除增加收

入外，並可杜絕私函。前後印行三次，第一次五千份，第二次八千份，當銀三分、五分、十分不等，上皆有臺灣民主國並蹲虎章，一時通行。此外，鳳山鹽商，又集餉十一萬兩。有此數項收入，臺南政府，乃得暫時維持。此臺南政權初期財政之大概也。

黑旗軍之再渡臺，實力已非越南之舊。暮氣已深，不勝一般期望。前敵戰事，皆委之臺中義民。義民中一部分爲丘逢甲舊部，一部分則爲民勇。蓋日軍既占臺北，暴行漸彰，臺民不堪壓迫，多結隊苦戰。憑籍竹園掩蔽，施行游擊戰術，日軍每爲所苦。其著者如西七月十三日，日櫻井小隊遇伏於三角湧，三十二人中只四人生還。另一部分亦於二甲莊陷圍，日兵四人化裝上人回新竹求救。日軍以主力援救，經四日苦戰，並施用火攻，始得解圍。共耗子彈六萬二千餘發，死傷百餘人，爲日軍在臺作戰最劇烈之一役。至今日軍歌有「三角湧三十士」，即述是役之經過也。臺中義民苦戰，爲臺南屏蔽。加以臺灣在雨季中，西南季候風甚烈，日海軍進攻不便，臺南在軍事上遂亦得勉強渡過。

臺南議院所發紙幣，其始可在官銀票局紳莊序端兌現，故得通用。其兌銀則仰望內地督撫之資助。閏五月間，張之洞尚使人通知劉永福，謂固守兩月，必有俄援。其後所言不讐，屢奉清廷命中止援臺，亦知劉永福兵力不足，不能成功，遂拒絕援助，僅閩督譚鍾麟按月發給若干款項。永福其始恃有內援，日樺山總督馳書勸以內渡，永福使文書吳桐林却之。及後餉源漸竭，分遣桐林及猶子禹卿等至內地乞援，又親電之洞求助，詞甚卑切。至八月八日轉到張之洞覆電云：

「守臺之舉，出自閣下義勇，鄙人並未置詞。至守臺二月，俄即來援之說，實係訛傳，俄國在北，如何能顧及臺灣？鄙人並未發此電，或去或留，仍請閣下自酌，鄙人不與聞。自協濟餉械，屢奉諭旨嚴禁，萬不敢違，愧歉萬分，務期原諒。」

此電斬釘截鐵，且推卸一切責任。此電一傳，臺南銀票信用暴落。中外商人均持票兌銀，金融混亂，議院乃更發債票，約事平後每一元還金五元。同時爲防止人心散渙，施行離境稅則，凡離臺境者依其財產額，分別徵收二元至六元之稅額。此等臨時辦法，對財政自不能有根本之解決。

同時軍事方面，黑旗軍亦潰敗相尋。六月底日軍進迫彰化，初與黑旗軍接觸。永福欲遣軍北援，諸將無可恃者，文案吳彭年毅然請行。領數營馳救，與丘逢甲舊部吳湯興共守彰化東之八卦山。其地素稱天險，堡壘有克廣伯式後膛十二生的砲四門，其他各式山砲共四百一十門。乃七月初九日晨，日軍進攻時，黑旗軍竟不戰自潰。僅二小時，堡即陷落，吳彭年與吳湯興力戰而死。日軍傷亡九名，黑旗軍損失六百。自此前軍銳氣益挫。日軍旋以天氣好轉，組成南進軍進攻臺南。近衛師團由彰化南下，第四混成旅團及第二師團，則由海軍掩護登陸。八月二十一日（西十月九日）嘉義陷落，永福乃決心放棄抵抗。

八月二十三日，永福託英領事向樺山致書求和，英領事乘彼克號代送與日艦隊。同日永福又託英僑二名，携另一請和書交嘉義日軍司令，請求日軍優待其部下，並以船送之內渡。日軍司令拒絕其請求，惟指定於二十四日正午在安平口日艦上會見永福，蓋日方之意，不願探議和方式，而欲使永福投降降也。永福得覆，爲自身安全計，不敢往登日艦，遂變計潛逃返國。八月二十七日，打狗砲臺陷落。永福假巡視爲名，移駐安平砲臺。九月初二日晨，由英輪爹利士號內渡。日海軍司令有地覺之，命八重山艦追及，搜索二次，均不得永福。永福遂返抵廈門。當日任浪速艦長發出追踪命令者，即日後名聞天下之東鄉平八郎也。

永福既去，次日黑旗譁潰，相率逃入洋界，委棄軍械於關鑾鴉片煙倉。九月初四日，長老會教士花格臣等二人受臺民之託，出城致降書於日將乃木，黑旗軍降者五千人。日軍待之甚酷，降卒糧食固無，食水亦缺乏，日軍且有殘殺俘虜者。由初五日起俘虜分批送返廈門，餓均垂斃，其覆舟淹斃者亦多。臺灣民主國之痕跡，自是盡掃無餘。然地下志士五十年之艱苦鬥爭，則方從茲開始也。

綜上所述，則臺灣民主運動之所以失敗，其故至爲明瞭。運動不植基於民心，而欲借助外力，根本已屬錯誤。領導方面，文武官吏俱陷動搖。對軍事之廢弛，財政之混亂，絕無補救。紳士方面有持觀望態度之一派如林維源等，後卒與日本合作。其能如丘逢甲、許南英等之始終表示反抗者，已十無二、三。唯農民方面，雖土客間有爭執，尚能同仇敵愾，憑據地利，稍與日軍以創傷，不致如正規軍之甫戰即潰耳！歷來中國統治階級，於外侮之來，非俯首屈辱，則務爲大言，侈稱抵抗，真正抗敵，則委之人民，幸而獲濟，則恬不知恥，攫取民衆鮮血換來之果實。亦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四日

四三四

非僅乙未臺灣一役爲然者矣。

註一：參考「東方兵事紀略」，卷五，臺灣篇，頁二六；「臺灣省通志」，第二冊，頁一〇八；「臺灣通史」，卷四，獨立篇，頁七六。

註二：原文見羅香林：「劉永福歷史草」，此處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五冊，頁六〇六——六二三。原書民國二十四年正中書局出版。

註三：同註二。

註四：原文見廣州私立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出版「嶺南學報」第七卷第一期，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印行，此處轉錄自「開國文獻」，第一編第五冊，頁六二四——六三三。

四 日(十月二十一日) 清駐俄公使許景澄電告總理衙門，擬與俄外部洽商東三省築路辦法。

許景澄接奉本月二日清廷電旨後，即于本日覆電總理衙門曰：

「多電奉旨等因，俄謀借地修路，舉動漸著，若先言自造，而彼乘此請借，轉少退步。查此事由俄戶部主議，當時商答，但勸接路，未言借地。擬先向探總，現得政府復，深以中、俄同心拒倭爲然，繼以後俄國議及接路，願妥商辦法，俟所答如何，再與外部啓談，是否候酌示，俟晤商後再請奏。」（註一）

此係許氏恐先言自造，而少退步，擬先設詞探詢俄財政大臣威特之意，而後再與俄外部開談。旋接總理衙門覆電，仍令與俄外部說明，景澄遂晤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聲明中國願自造鐵路，與俄路相接。羅拔諾夫對此聲明，深表謝意，景澄旋於十四日電總理衙門云：

「遵旨晤羅拔，說明中國願自造鐵路，與俄路在交界處相接，並引俄戶部前說相證。據稱深謝中國相告。現俟鐵路會工勘定何地分路至界，再行通知。語氣似無他意，請代奏。」（註二）

按：此爲俄人借地築路之公開表現，亦爲中俄密約之伏機。

註一：「清季多交史料」卷一一八，頁四。

註二：同註一，頁十三。

五日（十月二十二日） 俄艦駛朝鮮濟物浦，並通牒朝鮮，要求朝鮮自主。

俄艦隊駛朝鮮濟物浦，並繼續增援。俄國通牒朝鮮，請韓王自主，不受大院君干涉。（註一）

註一：J.O.P. Bland, China, Japan and Korea.

六日（十月二十三日） 德首相何倫洛熙（Prince Von Hohenlohe）建議德皇佔領中國港口或島嶼。

德國早欲在中國沿海攫取一島嶼或港灣，作為遠東商務及軍事之根據地。中日戰爭發生後，德皇威廉二世主張乘機佔領臺灣，其駐北京公使紳珂（Baron Schenck Zu Schweinsberg）則主張佔領膠州灣或澎湖列島，其外交大臣馬沙爾（Baron Von Marschall）建議德皇，應先英人佔領舟山羣島。至是德首相何倫洛熙建議德皇，以新得之漢口、天津租界，尚不敷用，主不顧一切，于中國取得港口或島嶼，以舟山羣島為目的。（註二）德皇乃命其駐華公使紳珂向總理衙門提出交涉。本日，紳珂偕前使巴蘭德（Von Brandt）至總署，總署大臣宴之，翁文恭公日記記其事曰：

「巴所談皆寒溫，微露德色。巴退，紳留談，所要求者四事：一海澳泊舟，一專使，一其外部宰相寶星，一買船。」（註三）

四者之中，自以租借海港最為重要。總署大臣以為若允許德國，各國援例，將起無窮之禍，拒其請，電命駐德公使許景澄向其外部說明。

按：此為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之伏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五—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八日

四三六

註1：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德國外交部檔案) Vol. 9. Chapter 57. No. 2219-

2225.

註2：「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六日條。

八日(十月二十五日) 李鴻章奏報與日使林董交涉歸還遼東半島情形。

先是，鴻章自本月三日起，與日使林董會議于總理衙門，鴻章擬將償款減少，林董堅拒之，鴻章乃于本日奏報交涉情形曰：

「奏爲與日本使臣會商歸還遼旅因三國定議在先償款未能減少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八月二十六日奉旨諭派爲全權大臣，與日使商辦歸還遼旅事宜，等因欽此。伏查日本佔據奉天遼旅一帶，臣前在馬關，迭與爭辯，除減去原索遼城三分之一外，其餘日兵已據各處，堅不允退；並謂已讓至盡頭，無可減改。當以停戰期迫，事機萬緊，電奏奉旨允准，實屬萬不得已之舉。議約之口，臣曾告知日本使臣伊藤等，將來歐西必出而干預，該使悍然不顧。及定約後，俄法德三國果有違言，當經總理衙門王大臣，相機力勸三國駐京使臣，出爲挽回。臣在津時，亦疊次電商各使，冀收轉圜之效，三國方允力任此事。而日人意存要挾，索望甚奢，聞其國中妄議，須得償款一萬萬兩，後減至五千萬兩。經三國磋商五月有餘，始說定三千萬兩。迭蒙電飭許景澄、慶常，向各國外部商減。旋接許景澄電，據俄外部稱：三國公議，減定此數目，既允覆，難與商減。如再有異議，即啓嫌隙，遼事必至決裂，請照議了結，於大局有益。又據慶常電，法外部稱：日恃援延宕，法俄約德方逼定議，如再商減，日必翻議，有誤大局，祈慎之，各等語。疊經總理衙門先後奏聞在案。臣現奉派商辦歸還事宜，自應以償款爲大端，再與辯論。當即恭錄諭旨，知照日使林董，訂期會議，並晤商俄法德使臣，從中助力。一面電致許景澄、慶常，屬其轉向各外部商減。臣於本月初三日奉旨參隨繙譯各員赴總理衙門公所，與林董晤面。臣以償款數目係三國所許，中國初未預議，現派臣面商，自須另行議減。而林董以此係三國定議之數，斷難再減分釐。臣與往復辯駁竟日，唇焦舌敝，林董固執成說，毫不放

鬆，日人始散。旋接許景澄、慶常先後覆電，以此事三國稱係自行公辦，一經議定，不肯再商，難再議減。若撇開三國，又恐不易收束。復由總理衙門鈔送俄使喀希尼法使施阿蘭照會內稱：已將中國允如三國所訂辦理之處，報明本國。又接裕庚、許景澄電：俄法德三國已在日本將遼議償款定數彙押互換各等因。竊維日本允還遼南，全恃三國維持之力，償款數目已由彼定議彙押，即爲憑據，無可更改。此時再以減少相商，必不肯協從，日本更無所畏忌，殊於邦交國體有礙。且恐耽延日久，另生枝節，如許景澄等電所言，尤不可不慮。臣仰蒙特簡，際此財力艱難，原冀爭回一分即有一分之益；乃徒勞唇舌，無補纖毫，瞻顧徬徨，莫名憤疚。事關大局，既不敢拘執貽誤，亦不敢專擅允行，自應據實上陳，伏候聖明裁奪。如蒙俞允，再由臣將撤兵交收各事宜節目，妥爲商訂條款，務期早日辦結，不令再有延宕，謹奏。（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頁五一六。

九日（十月二十六日）孫先生文發動第一次起義于廣州，揭開中國近代革命之序幕，事洩失敗。

先是，中日戰起時，粵督李瀚章募兵甚衆，及和議成，悉行解散，不給資用，遣返原籍。彼輩羣集廣州，憤恨不平。繼督譚鍾麟不籌妥善之策，黨人乃乘勢收爲己用。另巡防營勇，往往滋擾民間，受害者含怨難伸，對清吏恨之入骨，更予黨人以可乘之機。孫先生默察形勢，深知民氣可用，遂積極佈置。時城中防營及水師亦泰半聯絡就緒。附近北江、西江、汕頭、香山、三元里、順德各處之會黨、綠林、如大砲梁棠、檀香山歸國華僑如李杞、侯艾泉等皆矢志服從，願效前驅。部署既定，香港總部遂定于重陽日（九月初九日）在廣州起義，蓋粵俗定是日爲秋祭掃墓，便于來往人衆內，混入城中。原計劃在港召集會黨三千人，由朱貴全等率領，集中九龍，初八日晚附保安輪船赴省，並用木桶裝載短槍，充作膠泥，瞞報稅關。待初九日晨抵省城時，劈開木桶，取出槍械，然後分兵四隊，齊向城內各重要衙署進攻；同時埋

伏水上及附近各處會黨，則分爲北江、順德、香山、潮州、惠州數大隊，分路響應。更由陳清帶領炸彈隊，在各地區，不時施放炸彈，以壯聲勢。並約定各以臂纏紅帶爲標幟，以「除暴安良」爲口號，以青天白日旗爲旗幟。一切佈置周密，預料一舉可取廣州。詎料事前一、二日，有朱湘（廕生）者，以其弟朱洪列名黨籍，且作討滿檄文，恐被株連，竟假洪名向緝捕委員李家焯自首，以期將功贖罪。李得報一面派兵監視孫先生行動，一面親自赴署稟報。時孫先生方赴省河南王紳宅婚禮宴會，見有兵警偵伺左右，乃笑語座客云：「此輩豈來捕余者乎？」放言驚座，旁若無人，隨即從容離去。粵督譚鍾麟聞家焯報告有人謀反，急問何人？李以孫某對，譚大笑曰：「孫文一狂士耳！其創農學會，李少帥且贊助之，焉敢造反？」李廢然而退。然省城清吏，已嚴加戒備。初八日，楊衢雲在港以分配槍枝失當，致各同志不服，佈置無法如期完備，逐電告在粵機關謂須延期至初十日晚，然後丘四、朱貴所率之會黨先鋒隊三百多人，始能乘輪赴省。在此猶豫期間，已爲粵吏派駐香港密探草寶珊所偵知，急電粵吏防範，事機遂洩。（註一）

按：本次起義，參加者多會黨人士，致會黨（天地會）之成立約在清初康熙間，由陳永華氏創于臺灣，其宗旨爲「反清復明」。其後傳入國內閩、粵、湘一帶，而尤以南洋各地之華僑社會尤盛，迄今猶然。孫先生之重視華僑，言「華僑爲革命之母」除指其以經濟襄助革命外，殆亦指其「反清復明」思想之可貴也；其次初期之革命起義均局限于華南一隅者，利用南方之會黨當亦爲主因之一。復次，事緣之湊巧有如此者：方「臺灣民主國」敗亡之際，正第一次廣州起義之時，當孫先生成立第一個革命團體於檀香山，其時正爲甲午年多，中日戰事清廷節節失敗之時，而第一次廣州起義之策劃，乃由於馬關條約之簽訂，與黨澎之割讓，而加速其進行，固史實昭然。臺灣與國民革命之息息相關固亦來之有自矣！（註二）

附錄：

一、陳少白撰「第一次之廣州起義及其失敗之經過」

(九月)初八晚上，我們在廣州，什麼事都須備好了，只要等天亮，就可動手。那時，孫先生住在河南尹姓的朋友家裏，陸皓東住在南關「鹹蝦欄」，我就住在雙門底總機關附近一個親戚開的舖子裏。到初九日，天還沒有亮，我就起來，馬上跑到農學會，等了好久，並沒有消息。綠林首領，軍隊首領，民團首領等都來討口號，等命令，而孫先生却還沒有來。本來香港船在早晨六點鐘就應該靠岸了，我們一直等到八點鐘，才見孫先生形色匆匆的拿了一個電報來，一看是楊衢雲打來的，電報上說：「貨不能來」，我就同孫先生商量這事怎樣辦呢？我說：「凡事過期了，風聲必然走漏，再要發動一定要失敗的。我們還是把事情壓下去，以後再說吧！」孫先生也以爲然。一方面就把領來的錢，發給綠林中人，叫他們回去再聽命令；同時馬上打電報給楊衢雲，叫他「貨不要來，以待後命。」諸事辦妥以後，孫先生就同我想方法，覺得現在處境很危險，不走開，恐怕過了期不能動身，還是離開廣州。孫先生說自己有事要辦，叫我先走，我就在當晚乘「泰安」夜航船回到香港去。

第二天，是星期日，孫先生租到一隻小輪船，駛到香山唐家灣，坐轎子到澳門，再從澳門搭船到香港。他這樣兜了一個圈子，費了兩天工夫。我在香港，却焦急得了不得。因爲我到了香港，廣州的事情已鬧出來了，人也捉去了，機關也封了，花紅單也貼出來了。鄧三伯亦回到香港找着我說：「傳說孫博士也捉去了。」我覺得事情不好，孫先生遲遲不到，恐真有不測。這樣疑疑惑惑的着了兩天，才見孫先生到我家裏來。他來了，就說：「現在我們究竟怎麼樣辦呢？」兩個人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方法。本來我們有一個英國律師顧問在香港，他就坐了轎子去問那顧問：「我們住在香港能否不發生危險？」這位英國顧問雖是當律師的，對於這件事在香港却是初見，並不知道政治犯有沒有特別規定。所以他說：「這是沒有辦法，不要吃他們的虧，還是離開香港最好。」孫先生回來對我說：「顧問已叫我們離開香港，較爲妥當。我們還是跑吧！」就找到了一張報看看，今天有什麼船離港，看了報，知道有一隻到安南去的船，當晚就開，就派人去買船票。豈知這艘船，是貨船，不乘客人的。後來打聽到還有一艘船，船名「廣島丸」的，明早到日本去，雖然也是貨船，却有四個艙位；孫先生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人，乘這隻船到日本去。船一出口便遭大風，經過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戶。到了神戶就買份日報來看看。我們那時，雖然不認識日文，看了幾個中國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見「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躍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爲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四〇

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動只算造反而已。自從見了這張報紙以後，就有「革命黨」三字的印象印在腦中了。

一一、鄒魯撰「乙未廣州之役」（註四）

紀元前十七年九月九日，總理舉義廣州，事敗，陸皓東等死焉，是爲乙未廣州之役。

前此一年，中日戰事發生，總理以時勢可乘，赴檀香山、美洲創立興中會。時總理有兄德彰，在檀島經營牧畜業，總理往依之，以光復號召於僑民，並籌募舉義兵債。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順、威海衛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腐敗漸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兩促總理歸，總理乃偕鄧蔭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早、陳南及歐美技師將校數人歸國。於己未孟春抵香港，與陸皓東、鄧士良、陳少白、黃詠觴、楊衢雲、謝纘泰諸人，策劃進行，欲襲廣州以爲根據。先組乾亨行於香港士丹頓街，以爲幹部。助之者有香港議政局員何啓、德臣西報記者黎德，士蔑西報記者鄧勳。除黨人鄧蔭南、楊衢雲、黃詠觴、陳少白等留港贊襄幹部事務外；陸皓東、鄧士良、並歐美技師將校數人，則來粵組農學會於雙門底之王氏書舍，爲革命機關；總理則往來於粵、港之間，籌劃大計。時清廷戰敗，割地賠款，弱點暴露，民憤日興，因亟謀聯絡會黨軍隊以舉事。

當中日戰起，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招軍隊，戰停，乃遣散四分之三，此等遣散軍隊，多流爲盜賊，即留者亦憤懣不平，咸謂欲解散則全體解散，欲留用則全體留用，惟當局充耳不聞；吾黨於是起而運動，冀收爲己用，各軍士皆欣然聽命，願效死力，由是吾黨之武力略具矣。

時正巡防隊肇事，棄其軍服，四出劫掠，百姓憤極，起而合捕之，囚其爲首若干人於某會館；豈知巡防局員，率衆而出，撲攻某會館，即將被囚諸人一律釋放，並將某會館劫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以代表一千人赴訴於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爲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於是民怨日深，而投身於興中會者日衆。時兩廣總督李瀚章，爲李鴻章之弟（按：翰章係鴻章之兄，此誤。），在粵桂兩省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贖若干於督署，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是又一剝奪民脂民膏之事。且中國官場，每逢誕辰，其僚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釀金至一百萬兩以充壽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於人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賣科第，私通關節等事，每名定費

二千兩；因此而富者怨，貧者憤，學者尤不能平。凡此諸種，皆足以增進興中會勢力，而促吾黨之起事者矣。興中會於廣州突舉義旗，佔據省城之計劃，由是而決定。

初，總理之意，以爲克復廣州，發難之人，貴精而不貴多，昔太平天國劉麗川以七人而取上海，今廣州雖不能與昔之上海比，然若得敢死者百人，則事便可濟。蓋當日城中重要衙署，實僅都統、總督、巡撫、水提等數處，雖皆各有武備，第以承平日久，防衛早弛，擬以五人爲一隊，配備槍械炸彈，由府署後攻入官眷住房，將其長官或誅或執，使全城無發號施令之人；更以同志預伏城中衝要處，倘城外兵隊聞變入援，卽於要路截擊之，援軍不知虛實，必不敢前；更將橫街小巷舖尾轟塌，使諸援軍通行不便。如是，以二十人任進攻衙署，二三十人伏衝要以禦援軍，二三十人圍攻旗界，任務已完之隊，則分頭放火，以壯聲勢，事無不成者。惟諸同志均以爲人少力薄，冒險太甚，結果乃將「外起內應」之計，改爲「分道攻城」之策，約定日期，使各地民團會黨，分順德、香山、北江三路，會集羊城，同時舉事。惟有可慮者，則以人數衆多，驟集城中，不僅住地難覓，且難保不招防營緝捕者之疑，倘稍有不慎，消息外泄，則事敗矣。爲策萬全計，乃選定於重陽日舉事，蓋粵有重陽掃墓之俗，四鄉大族子孫千數百人多有遠道結隊來省拜掃祖塋者，此日聚各地黨人於城中，可不致招府署之疑。舉事之際不特須極秘密，使倉卒不及備，且須力主鎮靜，因於汕頭及西江沿岸，招募兩軍，同時向廣州進逼，蓋以汕頭及沿江之人，與廣州有主客之分，汕頭在廣州之東，雖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然語言不同，與土人不相習，用以進取，無牽率之慮，可一意以爭勝利；萬一他軍中途變計，相率潰散，此軍因來自外縣，踪跡易顯，不能存身廣州，凡此皆所以逼其進取，爲戰略上不得已之作用。

斯時，駐紮粵垣之八旗綠營及各營勇，其數在萬人以上，倘出而抗拒，死傷自然難免，乃復運動軍紀素嚴而善戰之安勇一部，使屆時反正。時省河兵艦中最巨者爲鎮濤、安瀾二艦，鎮濤管帶程奎光，卽程璧光之胞弟，係本黨黨員，響應自不成問題。其時於舊有之農學會外，更於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設一分機關，專爲接洽各部及貯藏軍械之所。於河南頭咀，設製造炸彈處，由美化學師奇列負責製出炸彈不少。其旗幟則由陸皓東擬定爲青天白日旗，並以「除暴安良」爲口號，以紅帶纏臂爲暗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四二

部署既定，乃派劉裕統率北江一路，陳錦順統率順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統率香山一路，麥某（佚名）統率龍眼洞一路，楊衢雲統率香港一路，吳子才則擔任潮汕方面響應，以牽制嶺東清兵。除潮汕一路外，各路均定九日晨集中粵垣候命。總理以布置已定，乃親上省調度，將香港之軍械、財政人員，一切交楊衢雲處理，詎楊已得權，既懷私意，又不公平，以致內部發生問題，軍械人員不能依期到省。

八日，除香港一路外，餘各路人員均已集中粵垣，九日黎明，軍隊首領，民團首領，會黨首領，均集中總機關討取命令口號，準備大舉進攻，惟香港一路終未到，正詫異間，總理持楊衢雲電來，謂港部須改遲二日，方能出發，衆大驚怪，乃即聚議辦法。陳少白以爲期屆而事不能舉，事必外泄，而二日後港部能否即來尚未可知，冒昧發動，恐遭失敗，不如暫將各部遣回，俟再調度方行發動。於是乃安整各部，並電楊衢雲阻港部勿來。

時有黨員朱淇，本清諸生，慕義入興中會，工作頗爲努力，乃得參預機要。其兄湘，清舉人，主持西關清平局事，九日學義不成，朱湘恐爲其弟株累，乃迫使自首於省河緝捕統帶李家焯前，將總理率黨人學義情形，盡爲陳報。先是，香港總督以吳子才等運械入粵事，微有所聞，電知粵督譚鍾麟，請爲戒備，譚以電文未明指何人，無從查辦；而李家焯亦以道路傳聞總理舉事之言稟譚，譚初以總理爲教會中人，倘貿然拘捕而無憑證，將反爲所噬，故僅由李家焯派人監視總理行動；及得朱淇自首，乃大驚，派李率千總鄧惠良大搜黨人於雙門底王家祠，並鹹魚欄張公館各機關，先後捕去陸皓東等五人。

楊衢雲雖接總理阻止來省電，然以軍械七箱，已裝泰安輪運省，若起回又恐敗露，仍使朱貴全、丘四等於初十晚帶數百人附泰安輪入粵，李家焯早派人預伏，抵岸，先登者四十餘人被捕去，後登諸人盡將符號毀棄，始得免。當陸皓東被捕提訊時，直認革命不諱，雖疊受非刑，亦不供出同黨，以索紙筆書供詞曰：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廢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眞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

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醜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尤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當事敗時，李家焯遣人嚴搜赴香港澳門之各輪碼頭，伺捕總理，而總理乃乘所備拖帶軍隊來省之小輪，由廣州經順德至香山之唐家灣，行前，司機不諳水道，有難色，總理乃親自指引航線，卒能安抵目的地。當總理未離廣州時，李家焯遣人偵其行跡，至其所寓之河南岐興里，詢街口輿夫，孫醫士是否寓此？輿夫平素受總理惠，且知問者來意不善，乃詭言，此間只有尹醫士，偵者乃去。初九日總理與區鳳輝、黃毓初牧師宴，途遇李家焯所遣探勇，鳳輝詫曰：「何今日所遇營勇之多耶？」總理曰：「來偵吾行跡也。」鳳輝曰：「何故？」總理曰：「道路皆云孫文舉事，汝未知耶？」李部探勇以未得捕人之命，又爲總理所道破，相顧而去。總理談笑自若，旁若無人，亦可見總理膽略之過人也。總理抵唐家灣後，乘肩輿赴澳門，再搭輪往香港，時鄭士良、鄧蔭南、陳少白諸人，已先行抵港，共商後事，然香港能否居留，實爲先決要件。總理乃詣英國顧問律師達尼師處，以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爲問，律師謂此事在香港尙屬創見，能否容留，當依港督之意辦理。但以先行離去爲宜，免致被其驅逐。總理乃與士良少白同乘日輪廣島丸赴橫濱。

總理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易裝，重遊檀島，推廣黨務，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再舉，少白則留日本，以考察日本國情。

三、馮自由撰「乙未廣州之役」（註五）

起事之籌備 興中會既成立，孫中山、楊衢雲、鄭士良、黃詠襄、陳少白、陸皓東、謝讚泰、尤烈諸人遂決議着手革命運動，謀先襲取廣州爲根據地。由各人認定任務，分途進行。中山至羊城，初以醫術納交於軍政各界，督撫司道以其學術優越，咸器重之，中山因是得以高談時政，放言無忌，雖語涉排滿，而聞者僅目爲瘋狂，不以爲意。繼復

假振興農務爲名，創設農學會爲起事機關，並設分機關於雙門底王家祠雲崗別墅及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二處，政界要人不知底蘊，亦多列名贊助焉，籌備半載，漸臻成熟，遂定期九月重陽日發難，先由朱淇撰討滿檄文，何啓及英人鄧勳起草對外宣言，城中防營及水師泰半聯絡就範，附城各處綠林，如北江之大砲梁、香山、隆都之李杞、侯艾泉等，均預約屆時集合，省河南北分設小機關數十處，並購小火輪二艘爲運輸用，其計畫擬在香港招集會黨三千人，初八晚乘河南輪船進省，並用木桶裝載短鎗，充作士敏土，購報稅關，初九早抵省垣時，齊用刀斧劈開木桶，取出鎗械，首先向城內各重要衙署進攻，同時埋伏水上及附城各處之會黨，則分爲北江、順德、香山、潮州、惠州數大隊，分路響應，更由陳清率領炸彈隊在各要區施放炸彈，以壯聲勢，預定以紅帶爲號，口號爲「除暴安良」四字，一切計畫，頗爲周密。

失敗之原因 時黨員朱淇之兄陸生向辦清平局事務，知其弟列名黨籍，恐彼牽累，竟用朱淇名義，託該局勇目某將黨人舉動密稟緝捕委員李家焯，以期將功贖罪。李得報，一面派兵士監視中山行動，一面親赴督署稟報，是日中山方赴某大紳宴會，見有兵勇守伺左右，知事不妙，乃笑語座客曰：「此輩其來捕余者乎？」放言驚座，旁若無人，宴後歸寓，兵士皆熟視無覩焉，粵督譚鍾麟聞李家焯報告有人造反，急問何人，李以孫文對，譚大笑曰：「孫乃狂士，焉能造反？」堅不肯信，李失意而退，及初八日，楊衢雲在港以佈置尙未完備，遽通告延期二日，而初十晚派丘四、朱貴全率領散處新安屬深圳、鹽田、沙頭各地集中九龍之會黨二百餘人，搭保安輪船晉省，然在此延豫期間，已爲駐港偵探韋寶珊所偵知，遂電告粵吏，使爲戒備，同時黨軍所私運短鎗六百餘桿亦爲海關發覺，譚督於初十日聞報，極形恐慌，急調駐長洲之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衛，並令李家焯率兵至王家祠、鹹蝦欄等處搜獲黨人陸皓東、程耀臣、程懷、劉次、樂榮等五人，及軍器軍衣鐵釜等物。又命營官親捧王令，督同弁勇四出兜拿，就地斬首，中山于是晨聞報事洩，即急電香港楊衢雲以「止辦」二字，令阻止所派之二百人勿來，詎此電到達時，人及槍枝均已下船，無從阻截，楊祇得復電以：「得接太遲，貨已下船，請接。」之十字。詎保安輪船由香港動輪後，黨人所備用之洋鎗七箱，偶因他故，船中貨物移易位置，七箱之上忽爲多數雜貨所積壓，臨時無法取用，黨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及該輪抵廣州時，南海縣令李徵庸已率兵在碼頭嚴密截緝，捕獲丘四、朱貴全等四十餘人，餘黨知大事已去，一聞而散，譚督以事關重大，特令南海番禺兩縣嚴刑審訊，欲藉此大興黨獄。

黨人之就義 黨人就逮後，均視死如歸，直認殺滿與漢不諱，尤以陸皓東供詞爲慷慨激昂，李令提訊時，叱陸使跪，陸不爲屈，慨然索紙筆認供，振筆直書，其辭曰：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偕行排滿之始。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視顏辭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主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李令以陸措辭激烈，且不肯供開同黨，遂以非刑研訊，凡釘插手足、鑿齒等刑次第施之，慘不忍言，死而復甦者數次，仍堅不肯供及黨人，且曰：「汝雖嚴刑加諸我，但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旋有美國領事親訪南海縣署，謂陸某乃電報繙譯生，絕非亂黨，伊可爲之保證，李令以供辭示之，美領無言而退。至九月二十一日譚督遂令營務處鐵提陸皓東、朱貴全、丘四三人至校場加害，李令頗敬陸爲人，特飭人衣以長衣，其曾任廣東水師統帶之程奎光一人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死，程耀宸禁大有倉後死，餘外六十餘人，一律指爲愚民被惑，每名發給川資一元，分別遣散，另懸重賞購拿黨首孫文、楊衢雲等，其告示照錄如下：

乙未九月南、番兩縣告示

現有黨匪 名曰孫文 結有匪黨 曰楊衢雲 起義謀叛 擾亂省城 分遣黨羽 到處誘人 借口招勇
煽惑愚民 每人每日 十塊洋錢 鄉愚貪利 應募紛紛 數日之前 聽得風聲 嚴密查訪 派撥防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四六

果獲匪犯 朱丘陸程 經衆指證 供出反情 紅帶爲記 口號分明 鎗械旗幟 搜出爲憑 謀反叛逆
律有明刑 甘心從賊 厥罪維均 嚴拿重辦 決不從輕 城廂內外 兵勇如林 搜捕亂黨 決不饒人
惟彼鄉愚 想充勇丁 不知禍害 貪利忘身 一時迷惑 慨予施恩 丟去紅帶 急早逃奔 回歸鄉里
安分偷生 免遭擒獲 身首兩分 特此告示 剴切簡明 去逆效順 其各凜遵
乙未十月廣東按察使告示及賞格

欽命廣東等處提刑司按察使兼管全省驛傳事務加三級紀錄十次張爲懸賞購拿事：照得土匪孫文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滋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東等多名審辦，惟尚有首要各匪孫文等在逃未獲，亟應懸賞緝拿，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如有拿獲後開賞格有名匪犯解案，一經訊明，定即如數給予花紅銀兩，銀封存庫，犯到即給，慎勿懷疑觀望。至此外案內被誘匪徒，准其改過自新，免予深究，如能拿獲後開首要各匪犯解案，仍一律給賞，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計開 賞格

孫文即逸仙香山縣人花紅銀一千元

楊衢雲香山縣人本籍福建花紅銀一千元

朱浩、清遠人，湯亞才、花縣人；以上三百元

王賓甫、江西人，陳煥淵、南海縣人，侯艾泉、香山縣人，劉秉祥、清遠縣人，李亞舉、香山縣人，吳子材、潮州人，魏友琴、歸善縣人，李芝、南海縣人；以上二百元

夏亞伯、新會縣人，陳少白、即礮石新會縣人，莫亨、順德縣人，黃麗彬、清遠縣人；以上一百元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 日示

黨人之出險 先是 中山與鄭士良、陳少白、區鳳墀、尤烈、侯艾泉等知事已洩，遂即先後離省，其存在羊城雙門底聖教書樓後福音堂之各種黨冊檄文及刀剪短鎗等物，概已投諸井中；鄭、陳等同抵香港，以中山未到，疑爲被逮。中山於敗後三日，尙匿跡廣州城內，因搜索嚴密，未敢外出。十餘日後，始僱小火輪從間道赴澳門，區鳳墀、朱

滇同舟至港。時黨人多疑是役失敗由於朱洪告密所致，咸爲切齒，區鳳墀乃舉朱兄陸生冒名變發始末，代爲刀辯，然黨人對朱終不能釋然。未幾，粵吏派遺委員赴香港要求英官引渡革黨，洪督乃判令孫文、楊衢雲、陳少白三人出境五年，於是中山偕陳少白、鄧士良東渡日本，楊衢雲則南遊印度及非洲各地，餘人皆匿居香港澳門，暫停活動。

朱洪賣黨問題 朱洪賣黨告密一事，黨人恨之徹骨。至民國元年香港中國日報已遷館廣州，嘗著有紀念九月九日一文，仍指朱爲賣黨罪魁，攻擊甚力，區鳳墀時居香港，乃投書爲朱辯白，題曰「乙未年廣州革命失敗說」，中國報按語謂區君力代其友辯白，洵不愧忠厚遺風，但朱洪既爲革命同志，而不能大義滅親，徇兄之志，而冒賣黨之大不韙，此心究何以大白于天下乎云云。朱于乙未後以爲黨人所不容，乃赴北京創設報館，即北方著名之北京日報是也，照錄區函全文如下：

天下有蒙不白之冤，欲辯之既無可辯，忍受之又不甘受，惟有負責引愿，任人吐罵者，其爲乙未年九月九日將革軍黨情密報前清兩廣總督之朱洪乎？蓋是役革軍之失敗也，莫不衆口一辭曰：西關清平局勇日某出朱洪親筆賣友書信，稟報緝捕委員李家焯，故初十日偽督譚鍾麟方下捕拿黨人之令，是以功敗垂成，陸君皓東等就義，程君曜臣瘐死獄中，黨人遠竄，波及妻孥，凡屬同志，皆切齒朱洪，以其甘爲漢奸，眞狗彘不食其餘矣！此就事實上表面而觀，證據確鑿，朱洪縱有蘇秦之舌，亦不能自脫罪名，而孰知其中鈎心鬥角，有非外人所能洞悉者，余當日耳聞目見，知之獨詳，倘仍效金人之三緘，將無以大白於天下也，用敢和盤托出，以待秉持公道者之評議焉。

溯是年九月初十日午刻，羊城內機關部黨人被拿數名之凶耗甫傳至河南，余驚聞之下，卽離寓所，偕尹增文楷僱艇渡河，奔投博濟醫局，藉爲遁逃之藪，幸蒙嘉約翰先生念舊情殷，容余二人在局藏匿，終宵不能成寐，詰朝不敢步出局門，正在籌畫如何搬遷尹家巷口及二子一女前往香港避禍之際，忽見朱洪携同一幼子踉蹌而來，備述昨日在城內機關部逃出情形，並謂於急遽中，僅將自撰討滿清檄文底稿焚毀，其餘黨人名冊無暇顧及，想此時已入清官手中，則彼此均大不了等語，談次，知余有香港之行，甚爲許可，匆匆別去，是晚余携老少男女數口經附夜輪離鄉，獨留尹婿未行耳！翌日抵港，行裝甫卸，卽探訪老友王君煜初於道濟會堂，瞥見座中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四八

有朱淇父子先在，因知其昨夜同船來港者，未幾聞港官有驅逐孫君逸仙、陳君少白、楊君衢雲出境之說，急偕朱淇馳赴孫君寓所，已不及見，蓋早經附火船往東洋而去矣。此後港中同志僅有朱淇一人，與余朝夕過從，遙探省城研訊黨人消息而已。望後數日，朱淇手持一信來告余曰：此胞兄自省寄來之家書也，其內容當爲先生陳之：緣家兄誕生向辦清平局事務，局內有勇目某素日遇事生風，不安本分，此次清官能知革命起事，皆由該勇目稟報者，家兄知我名列黨籍，舉家徬徨，將有封產業拘親屬之恐慌，故家兄窮思極想，設法解救，不得已僞托我名，致該勇目一信，係將革軍舉勳機關部住址開出，着密稟緝捕局委員者，隨請其到家，許以厚謝，囑將此信補呈到官，並須稟稱若無朱淇此信通知在先，則大局不堪設想，朱淇雖屬黨人，不啻自行檢舉，亦可以將功贖罪等語。該勇目因貪重賄，一一照行，而李家焯竟一時被其瞞過，已將我名從黨冊剔除，且令我即日回省，不致令人疑及在逃，是爲至要云云。朱淇言竟，復對余曰：此計不過家兄爲身命起見，於同志絕無妨害，問心本無不安，但恐他日孫君等徒聽一方面之詞，直以此信爲實有之事，則雖剖心明志，亦不能邀見諒於吾黨矣，奈何！奈何！久仰先生素見重於人，遇有機會，盡爲我證明之，感且不朽矣。余思其兄誕生平日於官場最工運動，今爲營救骨肉之故，出此手段，當在意料之中，且木已成舟，不便多議，惟有唯唯諾諾，應允其所付託而已。以上所述情形，一字不虛，可知朱淇所作所爲，不特在可疑之列，且居然有墨信爲憑，又何怪人言嘖嘖，謂其爲賣友圖功，破敗大事哉？然其鑄成此大錯者，本出自其兄誕生之詭謀，先在省組織完全，然後函使朱淇由港返省，面見李家焯，以實其事也，朱淇之罪在此，朱淇之冤亦在此矣。自是十餘年來，曾舉此事向同志屢次力代申辯，無如聽者均以先入爲主，反有笑余受朱淇所愚者。噫！如果朱淇於初十之前已將黨情稟報清官，何必十一日挈子到警局見訪？又何必乘夜赴港避禍？更何必在港淹留數天？後至乃兄信來，始回省耶？明理君子，誠平心思之，當不至人云亦云，其置朱淇於無以自容之地也。昨閱中國報，有春醒先生所著紀念九月九日論說一段，痛擊朱淇，幾無完膚，余甚惜之，故追述當年真情，以代面告，至於能取信與否？非余所敢知，不過勉盡久要不忘之友道耳！

譚鍾麟之奏摺 是役也，粵督譚鍾麟以所轄省會地方發生重大變故，恐受清廷嚴厲處分，故案發多日，仍匿不

上聞，詎粵籍京官聞之，竟據以入奏，清廷于十月十六日嚴諭譚督，令將首犯迅速捕拿，譚周章狼狽，乃謊稱黨人目的在規奪閩姓餉銀，並無大志，而將陸皓東等倒滿與漢之供詞，一字不載，茲併照錄譚督覆奏廣州拿獲黨人情形摺原文如下：

奉爲覆陳九月間廣州拿獲土匪情形奏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有人奏廣東盜風口熾，請飭嚴緝一摺。據稱九月間香港保安輪船抵省，附有土匪四百餘名，潛謀不軌，經千總鄧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僅獲四十餘人，訊據供稱爲首孫文、楊衢雲，共約有四五萬人潛來省城，剋期起事，現在孫楊首逆遠颺，黨類尚多，竊恐釀成巨患等語，著嚴密訪查，務將首犯迅速捕拿，以期消患未萌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查粵俗好謠，每因小故，轉相附會，張大其詞，以搖惑人心，羣不逞之徒，乘機煽動掠奪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本年九月初，廣州謠傳高州、惠州匪徒擊散後咸集香港，衆四五萬，將攻省城，人言藉藉，府縣營弁紛紛面稟，臣謂此等匪徒一擊即散，首匪已誅，尚何能爲？高州距香港千里，惠州亦數百里，萬衆持械經過，各州縣關卡無一見者，香港一隅驟增數萬人，何處棲止？每日需米數百石，何人供給？鄉州又不聞有搶掠者，食從何來？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遷徙，乘機搶奪之事，切宜鎮定，勿涉張皇，但嚴查保甲，稽查奸宄，多購眼線密訪，匪蹤終當敗露。省城巡防勇丁及城外兵丁，五六千人，尚復何慮？旋據管帶巡勇知縣李家焯率千總鄧惠良等，於初十日在雙門底王家祠拿獲匪夥陸皓東、程懷、程次三名，又於鹹蝦欄屋內拿獲程耀臣、梁榮二名，搜出洋斧一箱，共十五柄。十一日香港保安輪船搭載四百餘人抵省登岸，李家焯率把總曾璠等往查，獲朱貴全、丘四等四十五名，餘匪聞拿奔竄，經海關稅務司與釐廠委員於輪船起獲紅毛泥桶，內裝小洋鎗二百零五枝，子藥八十餘匣，當飭府縣提招隔別研訊。據陸皓東供稱香山縣人，與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雜之楊衢雲交好，因聞閩姓廠在省城西關收武會試，閩姓費數百萬，該處爲殷富聚居之區，欲謀劫搶，令楊衢雲在港招五百人乘輪來省，孫文在城賃屋三處，分住陸皓東等，經理分給紅帶洋槍等事，所購洋斧因西關柵欄堅固，用以劈開柵欄，即派人把守街口兩頭，拒絕兵勇，先雇商船在河邊等候，搶得洋銀，即上輪船駛赴香港，本定初九動手，因招人未齊，改爲十二。不料初十日巡勇訪拏破案，孫文即已潛逃。又提截獲之四十餘名分別審訊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五〇

，據供皆在香港備工度日，聞楊衢雲言省城現有招募，每月給餉十圓，先給盤費附輪到省，各給紅帶一條為號，不忘上岸即被截住，實係為招募而來，並不知別事，反覆推詰，各供如前，復飭營務處覆審無異。臣查此案係孫文、楊衢雲為首，陸皓東、丘四、朱貴全知情同謀，潛備軍械，分給紅帶，煽惑愚民，罪無可逭，當於九月二十一日將陸皓東三犯即行正法，以定人心，仍嚴密購拿孫文、楊衢雲，務獲到案，其不知情各犯，飭府縣分別辦理，謠風頓息，四境晏然，所有辦理此案情形，遵旨據實陳覆，伏乞皇上閱鑒，謹奏。

四、蕭一山撰「天地會起源考」（註六）

在中國歷史上，似乎看不出我們的先民有像西洋人那樣狹義的種族思想。受了異族的壓迫，不用武力去抵抗，反欲「以德懷之」，鹽鐵論中賢良文學的對策，可以代表一般，所謂「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見和親第四十八）就是這種議論的精神。受了異族的統制，不以為民族的恥辱，翻說是天命的定數。如明太祖檄諭齊魯河洛燕趙之人說：「自宋祚傾移，元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又祭元順帝文云：「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弓矢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夷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此！」這又何怪六朝有數鮮卑語以媚外人的士大夫。（見顏氏家訓）五代有「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見司空表聖詩集）的「胡奴」呢？因為中國人已往沒有種族觀念，所以才能融合四夷以成今日五族共和之盛；因為中國人已往沒有種族觀念，所以才能被制異族，以迄於現在的國運之衰，此話說來太長，姑且不論。

有清末葉以來，民族主義是我們迫切需要的東西，尤其在近幾年，幾乎是家喻戶曉了。這民族主義的傳播者，自然屬於國民黨，而創始者，則是總理孫中山先生。然而一個人的思想主義，總不免受歷史和時代的影響，孫先生也不能例外，他所受的影響是什麼？我們且看他自己說：「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見自傳革命之主義）孫先生所謂先民，並不是我上文所說的那些沒有種族思想的先民，而是抱有民族思想的少數先民。可惜這少數先民的行為，被一般歷史埋沒了，我們竟無從舉出他們的名字。只有這可貴的思想，在流傳着、散佈着，開了許多的燦爛之花，結了一顆「碩大無朋」的果。因為中國人已往沒有民族思想，所以這少數先民的遺志，不被一般人重視，甚至於加以詆毀，使牠不得不含孕在下級社會

人的口語裏，而其花其果，也若隱若現，又因為中國人已往沒有民族思想，所以才能源流不紊，系統分明，在中國近代史上或中國民族史上形成了一件奇異偉大的革命史蹟。

無疑的孫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受了這少數先民思想影響的，——雖然這少數先民的思想，只是一種民族意識，或革命的行動，而孫先生更能發揮光大成一種主義。但這些先民究竟是誰呢？孫先生說：「中國民族有獨立之性與能力，其在政治不修及軍事廢弛之時，雖不免暫受他民族之蹂躪與宰制，然卒能以力勝之。觀於蒙古宰制中國垂一百年，明太祖終能率天下豪傑以光復宗國。」是明太祖嗎？明太祖的討元，只是弔民伐罪，並非完全基於民族意識，觀上所引檄文可知。不過明太祖又用「中國居內以制夷狄，未聞夷狄居中國而治」（見討元檄文）等語來號召中國人，事實上更推翻了異族的宰制，的確為中國民族思想佈下了一顆種子。所以元末有「一致殺韃子」的民衆情緒，而在唐宋以前是沒有的。這思想到明朝滅亡以後，才遇見了發揮的機會，因為代明而興者，偏巧是所謂異族的滿洲。我們且看，清世宗有一段話說：

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指不勝屈，近日尚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以此希冀蠱惑愚民，見被拏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見雍正朝東華

錄）

清世宗所說指不勝屈的奸徒，也許就是我們所尋求不得嚮往不已的少數先民，「前朝宗姓臣服後代，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託朱姓如此之衆者」，正可見從前中國人沒有民族思想，到了清朝，才發生一顆萌芽來。這種子雖然可以說是明太祖播的，但明太祖不能直接影響到近代的民族主義。為近代民族主義之開山者，當然另外有人，中山先生所說遺留民族思想的先民，恐怕就是「假託朱姓蠱惑愚民」的所謂「奸徒」。因為「假託朱姓」是要「光復宗國」，「蠱惑愚民」是要向下級社會宣傳。明朝遺民之抱有種族思想者，當亡國之後，正利用「愚民」以傳播主義，借此演出一番又悲又壯可歌可泣的史實來。

他們演出的思想和行動，是不是如螢火之光，旋起旋滅的？不是，他們不僅有壯烈的思想，更有堅強偉大的組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五二

織。這組織爲二三百年來一個民族革命的集團，其名稱就是有一貫系統的「洪門」或「天地會」。所謂遺留民族思想的先民，正是這天地會的創始者。孫中山先生說：

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結成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合羣衆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觀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無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見建國方略有志竟成）

孫先生是最能了解天地會的，他在民族主義講演中所說洪門的源流尤詳，我們不能繁引。他說：「明朝遺民有一派富有民族思想的，覺得大事去矣，就想出方法來結合會黨，他們的眼光是很遠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觀察情形也是很清楚的。」（見民族主義第三講）這可以見出我們少數先民的思想是如何的細密而壯烈，把民族思想寄託在一般下級社會和江湖豪傑的手裏，正是他們不得已的用心。孫先生有一個「強盜入室，藏寶污穢之中」的好比喻。但因爲是極秘密的行動，又況在江湖上流傳，歷史的演變，和內部的實情，總不免被忽視或湮沒了。孫先生說：「在滿洲專制之下，保存民族主義，是不筆文字來傳，筆口頭來傳的。所以我們今天要把會黨源原本本講起來，很爲困難，因爲他們祇有口頭傳下來的片段故事，就是當時有文字傳下來的，到了乾隆時候也被銷毀了。」（見同上）孫先生最了解會黨，而尚不免如此說，一般人更可想見了。我們在異代以後，怎麼可以使這樣偉大的史蹟湮沒下去，以後的會黨，誤入歧途，爲何不叫他們明瞭先民的深心，現在的國勢又到晚明時候了，我們能不能「捨生赴義

，與虜拼命」；或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結為團體？」這都是我要作本文的動機。

天地會的名稱不一，普通所稱之三合會、三點會都是牠的別名。後來的清水會、匕首會、雙刀會、鉢子會、告化會、小紅旗會、小刀會、劍仔會、致公堂，以及哥老會、青紅幫等都是牠的分派。但牠原來的總名，對外則稱天地會，對內則自稱洪門，因為恐怕外人識破，又把天地會三字改寫為「神龍岩」。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藏天地會文件抄本 Oriental 8207E(1) 有道：「自入洪門之後，手足相顧，設立忠義堂，拜為神龍岩，敵血聯盟」。(見史料卷二「洪門小引」)，可見洪門天地會是他們原來的名稱了。為什麼叫天地會呢？倫敦博物院所藏抄本 Oriental 8207D 有八拜之用說：「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見史料卷二「西魯序」)中國秘密社會史述入會式的誓辭也說「今夜拜天為父，地為母，日為兄，月為姊妹，復拜五祖及始祖，萬雲龍等，與夫洪家家存神靈。」這或許是由於水滸傳「合異姓為一家，指天地作父母」的思想而來的。因為拜天地作父母，所以變異姓為同姓，而「四海九洲盡姓洪」「一滴血盟心本姓洪」和「朋友相交盡姓洪」(倫敦抄本 Oriental B(1) of D 史料卷五詩句)的「洪門」就出來了。為什麼姓洪呢？西魯序說：「小主朱洪竹來投，眾兄弟拜他為主。蘇洪光來投，立為創令先鋒，不覺東邊紅氣一陣，以洪為姓，以義為主，將蘇洪光改名天祐洪」。(見史料卷二)「紅氣一陣，這是附會的話不可信，若說是為小主名朱洪竹，或者還有些道理。朱洪竹和清初起義者所奉戴中朱三太子一樣，均是黨人理想中的典型人物，天地會的宗旨是「反清復明」，復明必定要假託明朝後裔。如前引清世宗之上諭所謂「假稱朱姓」，即是一例。咸豐元年賽尚阿、鄭鳴鶴奏云：「洪秀全又一姓朱，則向有此說，乃其詭託前朝後裔，洪字即假洪武字樣，以為煽惑之由。此等充邪姓名，本無一定。」(原奏存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孫中山先生也說：「洪門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稱，當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康熙時有人奉朱洪祝起義)而得此稱。」(見民族主義第三講)孫先生的話是不錯的，取姓洪者，大約係暗示洪武或紀念洪祝(祝竹竺均同音字，或作英)而來的。為什麼叫三點會呢？因為始祖萬雲龍的墓碑上有十六個字，各有三點水，共成四十八點水，(倫敦藏本 Oriental 2639 四魯敘事見史料卷二)意義是：「暗藏三點革命，誓滅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榮華，同樂太平天下」。(見貴縣通志局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抄本，載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四號)為什麼叫三合會呢？因為三合河是傳說拜盟結會的地方。先鋒對答有道：「問天地會有大小，

爾豈知否？答小會在三河，大會在天津。問小會有何爲證？容有詩爲證。詩曰：『小會創始在三河，結義會盟兄弟多正是天本團圓日，大家齊唱太平歌』。（見史料卷四）所以洪門對聯有「三河合水萬年流」之句。始祖朱洪英姚金氏九娘，以及鄭君達之妻，與妹鄭秀英、鄭玉蓮也都是葬在三合河旁邊。（史料卷四詩句中，及中國秘密社會史第二章）三合河三字在洪門詩句中甚多，不必備舉。普通都寫作三合會。但洪門 The Hung Society 書中，附有一張請帖，作三河會。（見該書第六頁後掉圖上云：「證曆本月初八日桃園結義三河會訓金蘭郡，被髮陳廣才，東主羅玉甫，合掌八拜。」）可見三河和三合兩名是通用的。至於清水會等，皆是隨意命名，大概係自取一種公共用物的徵象。哥老會則是「都一般兒哥弟稱呼」（見百回本忠義水滸傳）的意思。紅幫是哥老會的正統，由於洪家一名轉來的，洪家當然就是洪門了。青幫是乾隆時代漕運上的結合，由潘德林等竊洪門之餘緒組織的也叫潘門或潘家，其徒王伊傳道，以安清二字作自己宗族同氣連枝（見臨濟正宗），後遂由安清幫訛作青幫。

天地會創始的年代，據倫敦所藏抄本西魯敘事說：「時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時歃血立誓。」（見史料卷二）西魯序雖未說雍正甲寅年，但也說：「七月二十五日歃血會盟」。又有「雍正十二年萬大哥故後，又有桃必達聯盟五虎大將改立天地……爲記。」等話，而西魯犯界的年代，則同說康熙甲午年，可見七月二十五日仍是指雍正甲寅無疑。康熙甲午是五十三年，雍正甲寅是十二年。這兩種原抄本的時代都比較早，似乎應該可信。但據一般的傳說，和清稗類鈔、中國秘密社會史、南洋華僑通史，及貴縣修志局抄本等，都說創始在康熙甲寅即十三年。羅爾綱先生據大清律例康熙時有處罰「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的條文，遂說這條文爲對付天地會而發的。但「復興天地會」的名稱，始見於乾隆五十九年的律條，大概經過了林爽文之役才知道的。既冠以「復興」兩字，可見天地會由來的久遠。因從洪門傳說謂起於康熙十三年（見廿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史地周刊水滸傳與天地會），溫雄飛先生說：「天地會起源之時代，自當以康熙甲寅年爲可信。查康熙甲寅即康熙十三年，上距其入據北京之年，共三十一年，其醞釀時代未必有三十一年之久，大抵醞釀於永歷帝及鄭成功既死之後，即康熙元年，而成立於康熙十三年者也。」（見華僑通史第十四章）羅、溫兩先生都是根據洪門傳說中較晚的記載而斷定的，他們不知道較早的抄本中尚有雍正十一年甲寅之說。（倫敦博物院所藏抄本 Or. 333 是 1881 年即光緒七年收入的，荷人施利高氏 Schlegel

之天地會一書出版於一八六六年，即同治五年。英人活特（H. T. T.）之洪門一書出版較晚，但皆根據洪門秘書，說起源於雍正十二年七月廿五日）。我想康熙甲寅，恐是傳抄上的錯誤。因為說西魯入寇，是康熙年間的事，以後說火燒少林寺，拜盟結會，也許忘記寫雍正的年號了，只書甲寅。後來的人就不須抄成康熙甲寅了。要不然，何以較早的抄本，都作雍正呢？但天地會是否起於雍正末年，在康熙時代絕對沒有？這又不盡然。我們只看前引雍正諭旨就知康熙年間所謂：「動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張玉」等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和天地會的思想行爲一樣的。所謂朱三太子與天地會傳說中的小主朱洪竹同是理想中假託的人物。雍正帝既說：「假託朱姓，愚惑愚民」者指不勝屈，又可知起事的決不只一念和尚幾位。他們不用拜盟結會的方法，怎樣可以「招集忠心義氣」呢？況在康熙朝既訂禁止敵血訂盟焚表結拜兄弟的條文，必然有這類的事實。羅爾綱先生認做「最重要的一條證明天地會起源於康熙年間證據」，（見同上文附注）是有道理的。溫雄飛先生以爲「康熙之末，朱一貴起義，七日即佔領全島，天地會之力也。」遂說天地會成立於康熙十三年。假如朱一貴真是藉天地會的力量而起來的，這却是極有力的證據。如此看來，康熙年間，已有此種秘密會社，起於雍正甲寅之說，又有些靠不住了。然而這是洪門舊說，豈能毫無根據？我想暫不必考證年代，須得先研究牠本身的起源和背景。

關於天地會本身的起源，據我所知，到現在沒有人能說出來。不但牠本身起源的真相和創始者是誰不得而知，就連牠傳說的神話的背影，也是「莫明其妙」。會內的抄本，因爲下級社會的文字不高明，都「以訛傳訛」，錯謬百出。會外的人們，因爲這會社是秘密的，更無從考查了。甚至於連他們的名稱，和究竟怎麼一回事完全都不明白。最早研究天地會內容的，要說荷蘭人施利高氏（Schlegel）。原來天地會在閩粵南洋一帶是有特殊勢力的，南洋一帶的華僑，大半都是天地會會員。婆羅泥的砂朥越（Sarawak），英屬的新加坡，馬來的霹靂，秘密會黨時常發生械鬥和暴動，使當地的治安，幾乎無法維持。英荷的殖民政府，遂注意研究天地會。在巴達維亞有一次警察去搜捕華僑的賭場，無意中搜得了一份拜盟結會的秘書，遂送與政府翻譯施利高去研究。其時英人因爲要對付天地會，也有七八人正在研究，但均得之傳說。後來施利高根據秘書和英人研究的結果，寫了一本書出版，名叫「天地會」，（*Thian Ti Ilwui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Earth League*，這是一八六六年的事，就是我國同治五年。從此以後，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五六

英人更注意研究，並派人加入會黨，以調查其內幕，新加坡的華民政務司司長畢麒麟 Pickering 及其助手士多令 Stirling 所知最多。結果遂有英人活特 Ward 及士多令合著的洪門 The Hung Society 一書出版。在中國方面，只有清末革命黨人鞠成章所著的教會源流考一書較早，陶氏是國結五省哥老會改爲龍華會而加入革命黨的，但該書材料不多。較後就是日本人平山周所作的中國秘密社會史，民國元年五月由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這本書系統尚好，但材料也不多，文字又未能保存洪門傳抄的真象。前年我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發見天地會文件的抄本不下十種，我都抄了回來，材料不僅比秘密社會史要多十餘倍，就是比英人的書也多了好幾倍，且都是直接史料，我打算把牠的原來面目保存着，略爲編次，印出來獻給專家。去年貴縣修志局也發現了一種抄本，現由北平圖書館刊登載出來。從以上的史料來看，似乎已經不少，但只能明瞭天地會的內容，而沒有一種書曾告訴我們關於牠本身的歷史。神話的背影，更不用說了。洪門一書中，說牠的歷史，只謂在康熙以前，無此名稱，且難述白蓮教事。清代述異上也把清代的秘密社會和白蓮教混爲一譚。如說：清代秘密社會多出於明季遺民。三祖教者，俗傳謂白蓮教之支流，又有無爲教、檀香教諸色目，老儒施星渚先生曾入其教年餘而出；或問其內容，答云：「明季遺民之所爲，傳者失其意耳！」殊不知白蓮教和天地會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秘密結社。陶成章的教會源流考說：

南方之人智而巧，少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權迷信，何以知之？曰凡山東、山西、河南一帶，無不尊信封神之傳，凡江浙閩廣一帶，無不崇拜水滸之書。故白蓮教之盛於北，而洪門之會遍於南。

這一段話說的很明白：白蓮教起於元末，是北方一個帶有宗教性的秘密會社，他們只有「彼可取而代之」的用心；天地會起於清初，是南方一個帶有政治性的秘密會社，他們並有「民族革命」的意味。所以南方的天地會支流，與北方的白蓮教支流，在清代雖然一樣的活動，而意義顯然不同。最後天地會變成了革命黨，白蓮教則變成了義和團，所以章炳麟先生也說：「哥老、三合專務攘除胡貉，而與宗教分離，扶義倜儻，不依物怪，視白蓮諸教爲近正。」（見中國秘密社會史敘言）天地會既不由於白蓮教，究竟怎樣來的？其必爲明朝遺民所組織，以圖光復宗國者無疑。可惜洪門文獻，不能告訴我們牠的來源，那只好就當時的情形來推證了。溫雄飛先生在南洋華僑通史裏說：

延平王鄭成功據臺灣，民事則委之陳永華，永華策劃各事，均饒有開國氣象，設置六官，……又設儲賢館，招致四方忠義之士，挾有一材一藝者，又有育賢館，錄養死事諸將侯伯之子弟及明宗室，以故人才濟濟，忠貞之士，奉以爲宗。……鄭氏三世，均奉永歷年號，延明祚於一線，其實，桂王已被弑，鄭氏不忘故主，仍奉其年號，而陳永華尤爲苦心孤詣，矢志光復。自入臺灣後，卽知虜運尙強，難與力取。又慮日久人心渙散，無復知有茹荼之痛，蓄謀復九世之仇者，乃創立秘密團體天地會於臺灣，四出傳播反清復明思想，喚起人心。臺灣在鄭氏勢力之下，雖名秘密結社，實則公開演說。故現在會黨拜盟，其香主陳近南者，卽陳永華之自託也。

（見該書第十二章第二節）

他又說：

天地會本有一段遺傳之神話故事，大意謂康王時，西魯入寇，屢戰失利，少林寺僧人，挺身救國，戰勝西魯，不受爵賞，復歸少林。時有奸臣，進讒康王，謂西魯入寇，舉國不敵，少林僧人，力能却之，是其力可覆國，請圖之。康王乃遣人賜毒酒於少林寺僧人，並圍少林而焚之，衆僧慘遭焚死，逃出生存者，祇有五人。乃四處訪尋英雄復仇，曾與兵一次失敗，知胡運未窮，於是四散向各處運動，以待時機。其第一次之拜會結盟，爲康熙甲寅年，其口號標語爲「反清復明」。傳說之神話，大略如此，其起源之時代，自當以康熙甲寅年爲可信。滿虜入據北京時，南都新立，人心未死，義聲一播，前仆後繼，志士遺民，未必捨目前有可復仇之機而不復，反從事於秘密結社，以待百數十年後中之興。此殆當時各路義師失敗淨盡之後，一籌莫展，後死者不甘虛生，一息尙存，仍思奮鬥，乃汲汲爲秘密會社之組織，以待來哲。查當時繫海內人望者，惟永歷帝與鄭成功二人，二人均於清康熙元年死，光復之業，失其重心，有識者知事不可爲，權隱草澤，物色英豪，以待時機。大抵天地會者醞釀於永歷帝及鄭成功既死之後，卽康熙元年，而成立於康熙十三年者也。

查天地會之組織頗饒心思，其人殆智識階級，而又沉痛於亡國者也。明季人物，眼光學識。足當此鉅任者，惟始終輔佐鄭成功之陳永華足以當之。然該會所遺傳之神話故事，荒誕不經，俚俗粗鄙，又不類爲有智識者所創造，以陳永華之精密週詳何不逕將滿虜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歷史，演爲故事，直接宣傳，然吾人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五八

爲陳永華造此段神話故事，殆有深意。蓋其着眼在於下層社會，利用神話，使其留極深之印象於腦海中。且其創造此會時，乃利用鄭氏部曲爲之奔走宣傳，鄭芝龍蓋曾撤仙霞關之守備使清兵入福建者，其後又爲清兵挾之至北京，以鄭成功故，全家鄭氏被戮，故其創造該段神話故事，若逕陳歷史，激勵忠貞，則於鄭芝龍之身分有關，且其部曲聞之亦爲刺耳。乃婉曲其意，敍少林僧人，拒退西魯，有功於清，無辜被害，妙在不即不離，若有若無隱繪一鄭芝龍降清被害之影子，先團結鄭氏部曲，表鄭氏復仇之心理，然爲鄭氏復仇之心理，又不能明白寫出，乃虛擬少林僧人一段故事，以激忿其非屬鄭氏部曲者，是以該會少林征西魯一段神話故事，謂爲憑空虛構，絕非事實，一筆抹殺，似過武斷，然謂爲實有其事其人，則緣迹求履，亦近拘泥。況當史地昌明之世，西魯在於何地，何時入寇中國，史無明文，虛擬可知，故此段神話故事，乃以神話之體裁方式，描寫當時鄭氏之歷史，相連而及於爲明室中興者，其事其人，均有寄託影射，得不以真姓名出之耳！所謂少林寺者指鄭芝龍一系與其部曲，征西魯有功滿清，是指鄭氏撤去仙霞關守備，令滿兵長驅直入福建，火焚少林寺，是指鄭芝龍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殺之慘史。五祖者，與鄭芝龍歃血結盟之異姓兄弟，或其同姓兄弟而與芝龍謀復仇者也。萬雲龍者鄭成功也，明太子朱洪竺，乃指桂王永歷或唐王隆武，番主陳近南者即陳永華自謂也。故此段神話故事，分析之共爲兩部分，前段少林慘史，即鄭芝龍大小全家在北京被戮之慘史，因復仇四訪英雄。後段乃生出明太子朱洪竺來會，由鄭氏私仇轉而爲國家公仇，生出反清復明之四字口號。循此脈路線索而研究，系統極爲分明，是天地會者，陳永華與鄭芝龍之部曲組織者也。陳永華本爲愛國君子，雖始終輔佐鄭氏，然其目的在驅除韃虜。略如張良爲韓復仇，乃輔漢高滅秦之志趣。而鄭氏部曲則不然，國家公仇，斷不如其鄭氏私仇之切，苟天地會而不提出爲鄭芝龍復仇之宗旨，則難得其奔走號召之死力。且鄭芝龍曾爲海盜魁首數十年，海盜中本有歃血拜盟之制度，同生死，共患難，故能勒其黨徒，出生入死。是以天地會提出爲鄭芝龍復仇之宗旨，其部曲顧念舊盟，必敵愾同仇。然而陳永華關於此中利弊，籌之稔矣，蓋爲明復仇，事之公者也，可提出與天下人共討論之，爲鄭氏復仇，事之私者也，祇能與鄭氏部曲提之，鄭氏部曲以外之人，不能提也。況鄭氏先隱助清，後被慘殺，事不雅馴，不能得愛國君子之信仰，乃創造此段神話故事，爲鄭氏復仇，則隱託之少林被焚，爲

明復仇，則明示之朱洪竺來會。一方吸收鄭氏舊部，使供奔走，四出秘密傳播，一方博有明遺老忠貞人民之同情，使之聚集於秘密團體之下。龍吟輟耕之徒，與指天畫地之書生相合，時若可爲，斬木揭竿，蜂擁而起，此陳永華規畫天地會時，容納兩重復仇論之隱意也。一明示，一暗寄，雙方兼顧，融滲爲一，陳氏之心苦矣。

溫先生這種推論，非常重要，的確是研究天地會起源的一件有價值的貢獻。所以我不憚煩將全文錄出，以作我們研究的藍本。他在附注裏，更說：「近人按其事跡考證，渺無實際，此實爲研究方法錯誤，如確爲事實，自當用考史之法證之，若爲神話，則不能不向其背景及影射之處推求。」他就是用這種方法，認爲神話而推求的。他自信「雖無確證，總比穿鑿事實以緣附之者爲近，陳氏若生，當謂爲知己」。我們相信溫先生的方法是不錯的，但在推論方面，或者還須加以補充。我想與其說少林寺僧人有助於清而被焚是影射鄭芝龍一系及全家被戮，寧說洪門傳說中的鄭君遠是影射鄭芝龍的。因爲：（一）姓名相近。（二）里居相近，芝龍是福建南安人；（清史列傳本傳）鄭君遠說是福建廈門大感美之地人。（史料卷二桃李劍敘）（三）出處相近；芝龍起家海上，積功至總兵，因撤仙霞關守備降清，封三等子；（清史蒙鄭成功傳）君遠則說是身居水軍都督之職，（桃李劍敘）以解餉功封爲分州總鎮。（見史料卷二西魯序）（四）結局相近。芝龍是鯢鼎孳劾他：「家僕往來海上，信息頻通，請早除禍根。」遂全家被戮；（見清史列傳本傳）而君遠也以「與少林寺僧人結拜有謀反之意」的罪名，賜紅羅而死的。（見西魯序）有這種種的近似之點，已經不少了，但還有一條重要的證明：就是鄭君遠的妻郭秀英，被所謂游方和尚亞七者，迫姦不從，投水身亡，謝邦行捉拿到君遠處取治，君遠不敢行刑，判斷事屬無定。郭恆往報衆兄弟將亞七斬首。（見桃李劍敘）這傳說在洪門中雖不盡相同，但郭秀英之死，是會內最重要的故事。而鄭芝龍的妻（即鄭成功之母）不也是被清兵淫辱而自縊身死的麼？（事見黃宗義賜姓本末）芝龍也一樣的奈何不了清兵。小說中影射故事，必有許多的近似之點，令人模糊揣測，若隱若見。如果天地會的組織，係鄭氏的部曲爲芝龍復仇，則萬不能不影射一個人。我覺得拿鄭君遠來比附，再恰當沒有了。溫先生又說以萬雲龍影鄭成功，朱洪竺影明桂王或唐王，都未必然。鄭成功縱橫海上垂十餘年，得臺灣爲根據地，師入長江，聲威尤壯，絕不像神話中的萬雲龍大哥，一出戰就失利敗敵陣亡了。天地會中的小主朱洪竺是假託一個十餘歲的童子，爲崇禎帝之裔孫，（見西魯敘事）更不像國破被殺的南明兩王永歷帝或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六〇

隆武了。所謂朱洪竺無疑的是指清初到處假託的朱三太子，或其後裔。而萬雲龍亦當別有寄託。我以為少林寺被毀和五祖逃脫及萬雲龍復仇事，應該與鄭君達的冤死和郭秀英的清節分開來看。或者是兩種不同的來源，而強合到一處的。我大體上承認溫先生的推求說：天地會是陳永華和鄭氏舊部組織的，香主陳近南就是陳永華的自喻，但我只能贊成這一點。因為第一，天地會的發源地，確乎是在福建或臺灣。章炳麟先生說：

訖明之亡，予遺黃髮，謀所以光復者。是時鄭成功在臺灣，閩海之濱，聲氣相應，熊開元、汝應元皆以明室遺臣，祝髮入道，故天地會自福建來。（中國秘密社會史敘言）

洪門的長房是在福建，少林寺也是在福建，鄭君達又是福建人，而大清律例中明明有「閩省民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的禁律。乾隆十九年福建布政使德舒的收輯技勇疏中也有「往往創立會名，聯合聲勢，刊偽印，散偽劄，妄悖猖狂，蠱惑人心」，（見經世文編卷七十一）的話。朱一貴最初在臺灣起義，到林爽文之役，更標有天地會名目。（見聖武記）天地會起於閩海一帶，已可無疑了。第二、閩海之間，謀圖恢復者，多係鄭氏勢力，陳永華又為鄭氏的唯一謀主，則陳氏之託為香主陳近南先生，似屬可能。否則他人皆不足以當之。第三、鄭君達的假託，與鄭芝龍的事情太相似了。替芝龍謀復仇的人，又必為鄭氏的忠臣或舊部。所以溫先生說不是沒有相當的理由。不過要把洪門傳說的故事和人物，都依附到鄭氏一系身上，那又未免太穿鑿了。我的推想，不僅萬雲龍不是鄭成功，尤其五祖更不是鄭芝龍歃血結盟的兄弟，因為五祖和萬雲龍都是最重要的開山者，以身分論，鄭成功還有點像，鄭芝龍歃血結盟的兄弟，既無姓名，更不知是否有此五人，直無從懸揣，那嗎，他們影射的是誰呢？我總以為影射應該有相類的謎底的，五祖和萬雲龍既都是和尚，就該從和尚方面着想。查清史中與此種類似的事跡有兩回：

一事：東華錄載康熙四十七年，以前二三年，張念一牽朱三太子起義於浙江大嵐山，稱大明天德年號，是年均被俘獲處死。或以朱三即王士元，伊子朱統，朱崇、朱壬、朱在、朱坤，伊孫朱鉅寶，等三十餘人均正法。內有姓名可考者：為董克昌、董春園、張念二、朱兆琦、董綏奇等，還有一位和尚名僧洞然。

張念一就是雍正諭旨中所稱的一念和尚。這件事有幾點和天地會的傳說相近：（甲）康熙處決朱三的諭旨，雖說朱三即王士元，但同時下大學士的諭旨，又說：「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歲，伊父子游行教書，寄食人

家。」可見朱三並非完全假冒。年歲也和明史皇子傳所說的崇禎三太子差不多。（明史卷百二十云定王慈烺莊烈帝第三子，崇禎十四年已十齡）朱三和他的兒子都被殺了，圖光復者不得不屬望於其孫，或假想有一幼子，而神話中朱洪竺是崇禎帝的孫子，頗有相同。（乙）一念和尚是大嵐山的首領，扶朱三太子起義而被捕，和嵩雲龍是大普庵的和滿長老，聞火燒少林寺而有仗義之心，衆遂拜爲大哥，出與清兵交戰，失馬陣亡的事蹟相髣。（丙）西魯序上說五僧五將祭旗興兵，經過浙江省，遇見嵩雲龍。天地會的故事都在福建，獨嵩雲龍說在浙江，恰和一念和尚的根據地相合。（丁）洪門五祖是和尙，張念一也是和尙，他的同志，更有個僧洞然。（戊）洪三太子的年號稱天德，天地會的文件祝文均稱天運，後來道光末咸豐初天地會起事的黨人都稱天德年號，又稱大明天德皇帝，（見拙輯太平天國詔諭漢大明天統兵大元帥告示）洪秀全且尊洪大全爲天德王，（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檔案洪大全口供）這似乎不是偶然的事。以上五事，都可以證明天地會和張念一之役，不是毫無關係也許有相當的淵源。不過火燒少林寺的事情，尙不能解釋。我們再看第二回相類似的史蹟。

二事：清史要略上說：「雍正平日多養俠士，於是各藩黨羽，亦大半多俠士之流。雍正誅鋤諸王殆盡，恐其黨羽爲之復讐，凡天下劍客不爲所用者，皆欲殺之，有『某僧』者，即雍正少時所結兄弟十三人之第一人，也其術尤高，不肯爲所用，亡走山澤間。雍正深患之。一日偵知在某所，命結義兄弟三人易服往，密布精兵以爲後援，圍守要隘。僧視三人至，笑曰：『若輩受主命來捕我耶，汝主多行不義，屢以私憾殺人，吾即死，汝主亦必不能苟免，月餘必有爲我報仇者。汝等誌之，吾今不死，不足以爲大丈夫！』言訖，仗劍自殺。三人者，攜其首復命，並以其語聞。雍正大懼，防衛綦嚴，寢食爲之不寧，月餘，因無故暴死於內寢。宮庭秘密，諱爲病沒，實則爲某女俠所刺也。某女俠者，即呂留良之女孫，爲某僧之女弟子也。」（亦見清代通史卷上）又清代述異說「康熙雍正間大江南北以拳勇名鳴者有八俠焉，首僧了因，次呂四娘，曹仁父，路民瞻，周潯，呂元，白泰官，甘鳳池，各精一藝，誓不越禮，犯者殺毋赦。了因無行，淫暴日著，七人惡之，誓苦不敵，相約以六人圍擊，使泰官從空而下，疾擊其首，如此者三，僧殲焉。衆遂散去，各以技雄一方，誓不作非禮事，有犯者，六人共誅之。七人半出鄉延平門下，抱種族主義。時雍正以殘賊居天位，尤惡俠，列名嚴捕。四娘本晚村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六二

先生孫女，國仇家難，刻不去懷，其浪跡江湖，蓋將以結納豪俊，共圖大事，非徒博俠客之名而已。或謂聊齋誌異俠女一則，即隱指呂四娘，鬚髮交而血模糊之頭顱，即當時某貴人（此指雍正），證以中外記載，蛛絲馬跡，未盡誣也。」

這兩事雖不見於正史的記載，但甘鳳池輩本是當時的大俠，清史稿卷五百一十有甘鳳池傳，說他「少以勇聞，手能破堅，握鉛錫化爲水，喜任俠，接人和易。江寧顧雲如邪術不軌獄，亦被牽連，擬大辟，世宗未盡駢誅」，呂四娘諸人，當然也是有的。江湖間的傳說很多，我們不能盡信，但此事與天地會的神話，有相似之處，恐怕就是影射俠僧復仇的。（一）某僧，是雍正的結義兄弟，一定幫助過他去制伏異黨。因不爲所用，遂遭圍捕而自殺，和少林寺僧人征西魯有功，橫被火燬的事跡相當。（二）有結義兄弟三人去搜捕，和貴縣本天地會文件引言中所說的少林寺第七條好漢馬二福（西魯序作馬甯兒）作奸細一樣。（三）甘鳳池等之鋤除了因，頗像少林寺僧人之斬亞七。（四）十三兄弟和八俠，也近於洪門中的五祖。（五）七人殲僧以後皆散去，各以技雄一方，誓不爲非禮事，和五祖分散各省，隱藏埋名，留下旗號，詩句，口白差不多。（六）呂四娘也鬚髯像用桃李劍却敵的郭秀英或鄭玉蓮。（見西魯序）（七）甘鳳池等抱種族思想，呂四娘有殺祖之仇，又多半出於鄭成功的門下，所以國仇家難交迫，正合於洪門的傳說，借復仇以宣傳民族革命了。（八）呂四娘等浪跡江湖，結納豪傑，共圖大事，也同天地會黨人「隨至各省招集忠心義氣，暗藏三點革命，誓滅清朝，扶回大明江山」，（見貴縣抄本天地會文件反清復明根苗第一）是一樣的舉動。（九）圍殺某僧，當在雍正末年，而洪門傳說係在雍正十二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成立的，時間殊爲相合。

據我推想：一件故事或神話的流傳，直至二百多年，其間必定有演化增改地方，絕不是一成不變的，天地會的傳說，始終未形成一種有系統的歷史，當然更容易隨時摻進去一些資料，「十口相傳」，也就「水乳混融」了。天地會神話的背影，至少應該分成三個階段，或方面看。

（1）鄭君達的冤死，是影射鄭芝龍的。陳永華是鄭氏的謀主，因利用鄭氏的舊部，使團結以復仇。

（2）萬雲龍的起義是影射張念一的，這純粹是光復宗國的大義，所以天地會有小主朱洪竺，以寄託朱三太子的後裔。

(3) 少林寺被燬是影射某俠僧的，江湖豪俠的行爲，正是天地會所假借以組織而擴大宣傳的動力。

三種故事，大約是三個時期發生的，然而最後發生的一個，反到變成了洪門傳說的中心，這也不是偶然的事。陳永華等組織天地會，最初並沒有一定的故事作歷史根據，只有形式上的歃血拜盟，以寄託他「反清復明」的宗旨而已。張念一當然也是受了這種秘密會社的影響，才奉戴朱三太子起義。功既不成，傳說遂也就增多了。等到雍正帝以滿漢的防閑興起了文字之獄，「於是漢人之義憤大起，甘鳳池輩日夜從事於陪殺，清廷雖極力搜捕，不能止。」（見滿清外史）又以私憾殺人，圍逼某僧，於是引起了江湖豪俠的整個反響。呂四娘之刺死雍正雖不盡可信，但秘密會社之加緊組織，恐怕是必然的了。天地會到這時才有一種強固的組織，和零星湊成的神話。因為他們的勢力在江湖上，所以把最後的仇恨，變成了故事的中心，也就是所謂「後來居上」。萬雲龍、鄭君達都是依舊說添附的，總不免有些痕迹。我們在天地會文件中更有一個最重要的證明，就是他們說成立於雍正十二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這決不是想像出來的，必定有一件事在那個時節發生。我們再看歷史上的證明，乾隆以前，尚未有天地會的名稱，更可知起於雍正甲寅之說爲可信。不過說「起」者，正是「復興」，或「改立」的意思，未必就起源於此時罷了。我再引一條有力的證據。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抄本 Or. 8207 D 裏有一段說：

雍正十二年萬大哥故後，又有桃必達聯盟五虎大將，改立天地日月分派，父母兄嫂，別名叫姓，與旺孫唐，記號控土，築城名穆楊城，留傳日後招集英雄，以印信圖書爲記。

所謂又有桃必達聯盟五虎大將改立天地等事，已可見天地會有改組的事實，並非一氣呵成的。乾隆大清律例有「復興天地會」字樣，洪門傳說中有「後五虎」（吳天成、洪太歲、李識弟、桃必達、林永昭）的繼起。就知道我的推論是不錯的。大約天地會在康熙時已竟有了，不過沒有像後來那樣嚴嚴的組織，有之，則是從雍正末年起就像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一樣。如此講來，洪門傳說的故事，並非無線索可尋，而神話的演成，正是歷史過程中必然的步驟。謂天地會起於雍正末年，固然不錯，謂天地會起於康熙時代，亦無不可。但如謂起於康熙甲寅十三年，則係顯然的錯誤，當康熙十三年時候，鄭氏還據有臺灣，「志士遺民，未必捨目前有可復仇之機而不復，反從事於秘密結社，以待百數十年後之中興。」溫先生說：「天地會成立距臺灣陷落尚有七年，此七年中雖名秘密拜盟，實則公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九日

四六四

演講」，恐也是想像之辭。

假如我上文的推論不謬，則溫先生所謂「陳氏容納兩重復仇論之隱意」，更變成了「四重復仇論」了。爲什麼明朝遺民，不公然的把民族主義表示出來，而偏用些荒誕不經的神話？我看這正是他們的深心。前人的解釋，都以爲他們要利用下級社會的無知愚民，固然不錯，但還不够。我以爲讀者要注意起首的一段，……才是他們假借神話的原因哩！因爲中國人根本沒有國家民族觀念，拿國家的公仇，民族的大義，是掀不動他們的熱情的。即今能掀動，也不過是片時頃刻。「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引頸就戮，無異犬羊，都可以見出毫無抵抗的民族精神。上下江的民兵四起，不過爲了「一束頭髮」。明朝遺老，看透了中國人的特性，是不講民族而講家族的，是不講國家而講君上的，是不講後世而講祖宗的，是不講先民而講宗派的，於是利用鄭氏部曲的心理，下級社會的弱點，江湖豪傑的義氣，造出爲宗派、祖宗、君上、家族的復仇說，民族國家的大義，自然寄託在裏邊了。中山先生稱贊他們的「眼光遠大，思想透澈，觀察清楚」，真正不是虛譽。我們應該膜拜頂禮這些先民，我們就應該研究他們的起源和又悲又壯的偉業，假如我們不「數典忘祖」的話。最後我再引一段洪門詩歌來作結束：

道袍血染泪痕颺，事因西魯起根苗，辭官不做修行善，韃子胡人用火燒。

山門千古昏王滅，暗地奔逃至北寮，汨兵蜂擁難堪敵，中途幸遇郭英嬌。

姑嫂桃劍兵殺敗，得脫束來廣惠潮，雲霄寄跡高溪寺，此仇時刻在心苗。

少林冤仇何日了，長沙灣口雪零颺，烏龍渡江洪福見，月照波心水伏潮。

蒼松上立洪英叫，聲聲語叫滅明朝，舉頭不覺帝星照，吉兆英雄護明朝。

五人結拜靈王廟，揮草爲香把兵招，五色綵旂金鼓振，十面埋伏在東橋。

兄弟聯盟同肝膽，斬草除根把恨消，替天行道神共鑒，誅滅汨賊轉明朝。

英教士李提摩太訪翁同龢及汪鳴鑾于總署，談耶穌教及變法問題。

本日，翁氏日記記其事曰：

「英教士李提摩太豪傑也……云堯舜周孔之道，環地球無以易，中土儒者，歐洲敬之。獨養民之政衰，聖人之道將不行。五國以中國不能養民，遂欲進而代謀，所以養情已見矣，勢已成矣，故中國養民之政不可不亟講也。政有四大端：曰教民，曰養民，曰安民，曰新民。教之之術，以五常之法，可行于萬國；養則與萬國通其利，獲利大；安者弭兵，新者變法也，變法以與鐵路為第一義，練兵次之。中國須參用西員，兼設西學科，西人在中國者四種：一公使，爭權力者也！一商人，一工藝，斯兩者，牟利者也！惟教士自食其力，不務功名，故心頗平。中國待西人，以稅務交一人，則太過；以直履工匠，則不及云。」（註七）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一四——一六；及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一二。

註二：蕭一山：「清代秘密社會史料」，頁十——十二，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三：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十——十二。

註四：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六五六——六六〇。

註五：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十七——二九。

註六：同註二，頁一——十七，「天地會起源考」。

註七：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初)，頁七三三——七三三三。

十日(十月二十七日) 陸皓東、程耀宸、程奎光等在廣州被捕。

粵督譚鍾麟初接朱湘告密，尚未深信。及至本日，得港探急報，大驚，急調駐長洲之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衛；正午命兵警搜查農學會及鹹蝦欄革命機關，捕去陸皓東、程奎光、程耀宸等六人。孫先生于九日接楊衢雲電謂「貨不能來」。以當時風聲已緊，乃覆電云：「貨不要來，以待後命」。(註一)詎料此電到時，所運軍械七大箱，業已下船，衢雲未加阻止，亦不親自參加，並命丘四、朱貴全等率領四百餘人于九日搭船去廣州，並覆電云：「接電太遲，貨已下船，請接。」(註二)

註一：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十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十日

註一：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十二。

十一日(十月二十八日) 丘四、朱貴全等四十餘人被捕於廣州碼頭。

黨人所搭之保安輪由港啓碇後，所備之洋槍七箱，爲多數雜貨所積壓，臨時無法取用，黨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本日黎明，該輪抵埠時，南海縣令李徽庸及緝捕委員李家焯已率兵在碼頭嚴密截緝，丘、朱二人率部剛上岸，即被捕去四十餘人；後登岸者，急將符號燬去，始免于難。(註一)

註一：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一四——一六；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頁六五七——

六五九。

十二日(十月二十九日) 孫先生自廣州脫險至香港，旋偕鄭士良、陳少白赴日本。

廣州事敗後，孫先生仍留廣州，時清吏偵騎四出，並曾懸賞花紅銀一千元緝之。孫先生賴鎮靜機智，始化險爲夷。初避居王煜初牧師家，繼雇小汽船一艘，赴唐家灣，改乘肩輿潛至澳門，轉達香港。鄭士良、陳少白、區鳳墀、侯艾泉、李杞等則先期離粵脫險。孫先生抵港後，往訪其師康德黎，商以後行止。康介紹其往訪達尼思(Dennis)律師，詢以在港居住有無危險，律師答以遷居爲佳。孫先生遂偕陳少白、鄭士良搭日輪「廣島丸」東渡。(註一)

附錄：傳啓學撰「孫先生被迫離港赴日」(註二)

起義前一日，國父已被兵警跟蹤，清廷緝捕委員李家焯除派人跟蹤之外，並遣人嚴搜赴香港、澳門之輪船碼頭，伺機予以逮捕。他明知已受兵警注意，起義之日不能舉事，即遣陳少白等先行，自己布置善後各事，將各機關內各種黨冊、檄文、手槍等物，投於井內。次日，他不搭普通客輪，另僱小火輪由間道至澳門，再由澳門轉赴香港。所以逮捕他的兵警，徒勞無功。

他遲遲未返香港，陳少白、鄧蔭南等非常焦急，以爲已被逮捕。他到香港，找着陳少白，商量應付辦法。他們

知道廣州官吏必向香港政府交涉引渡；香港政府將如何處置，值得研究。他遂走訪康德黎請教，康德黎叫他找達尼思律師（Mr. Dennis）商量：他們住在香港有無危險？達尼思答復：這種事件在香港還是初見，對政治犯向沒有特別規定；最好還是離開香港，比較安全。他經律師勸告後，遂同鄭士良、陳少白同搭一條日本貨船去日本。

楊衢雲沒有親自率領港部到廣州，聽到失敗消息後，馬上搭船到印度加爾各達。他回香港後，衢雲也沒有和他見面。後來兩廣總督派遣委員赴香港，要求引渡革命黨；香港政府判令孫文、楊衢雲、陳少白三人出境五年。

註一：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十三；羅香林「國父與歐美之友好」，第三章，頁七九。

註二：傅啓學：「國父孫中山先生傳」，頁五一，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

十三日（十月三十日） 李鴻章與日使林董會議交收遼南各款。

鴻章與日使林董在總署談判中、日商約，日方提出依泰西各國例通商約稿四十款。要求派領事，內地遊歷，日商運貨往中國或自中國運貨往日本，均得視為進、出口貨，稅則與西洋各國一律。日本在中國製造之貨，除納值百抽二稅外，其餘一概豁免，日本享受領事裁判權與西洋各國同。（註一）

西報載稱已由總署官員購得俄使與總署所簽之中東鐵路密約。

上海字林西報發表消息，謂由總署華人翻譯處購得俄使喀西尼與總署所簽之中東鐵路密約。中國允德人租膠州，俄人暫租旅順、大連，並延長南滿支線。（註二）

註一：「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文書部份，頁一七〇——一七二，日使林董報告書。

註二：H. Norman, *Asiatic Quain Review*, Feb. 1897.

二十一日（十一月七日） 陸皓東、丘四、朱貴全等革命志士在廣州殉難。

陸皓東等被捕後，粵督以案情重大，特令番禺、南海兩縣嚴刑審訊，企圖追供出同黨，藉興大獄，一網打盡。皓東不為所屈，僅索紙筆，慷慨陳辭，中有：「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

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人廢滅滿清。」「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起者不可盡殺。」等豪邁之語。（註一）其慷慨激昂之情，躍然紙上矣，旋與丘四、朱貴全等同時就義。朱被副，陸與丘均被斬首，程奎光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死，程耀宸長禁「大有倉」（穀倉改監，倉在城內），後亦瘐死獄中。（註二）

按：讀陸烈士之供詞，而想見其為人，慷慨激昂，義正詞嚴，使獄卒亦爲之心折，誠豪傑也！以如此英傑而爲革命流百次之血，宜其激勵人心，前仆後繼，使革命之火種迅即散佈全國，而終底于成矣！

附錄：

一、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陸皓東傳」（註三）

國父孫中山先生生前追述他親身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史，對於爲革命犧牲的許多同志，都寄予無限的懷想和敬意，而對於陸皓東、史堅如兩烈士，緬懷尤深，他嘗論二人說：「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每一中國國民黨黨員，讀了這一段沉痛的文字，都應該永遠追念兩烈士對民族對國家的功勞，更要鼓舞奮發，效法他們的犧牲的精神！兩烈士都是最先爲革命而犧牲的人，史烈士堅如之死又在陸烈士皓東後，所以陸皓東實爲中國革命流血第一人！

皓東，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清同治七年、西曆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鄉。那天正是中秋節，所以家裏給他取個名叫中桂，字獻香。父親曉帆先生，向在上海經商，積產頗豐，可是皓東九歲時，他便死去了！母親王太夫人，直到民國成立後還活著，年紀很高。

皓東是國父的小同鄉，兩家相距不遠，兩人年齡又相近（皓東小國父二歲），所以從少便時常玩在一起，而且很快便成爲很要好的小朋友。兩人的性情又相似：他和國父一樣的聰明，一樣的好對世俗表示反抗。八歲時，他開始入鄉塾讀書，在塾中最歡喜畫圖畫，爲塾師責備，罵他不專心讀書，他反駁說：「圖畫也是讀書的事，爲何禁止

？」使塾師無詞以對。

在他十七歲那一年，國父正在檀香山，因受耶穌教洗禮被他的哥哥德彰迫令回國。兩人久別乍聚，倍覺親密。在別離的這幾年內，他仍在鄉間讀書，進步很快，學問已有了很好的基礎。國父則與西洋環境接觸，知識日廣，尤富於新思想，所以兩人一談起來，便非常投機，而彼此間的友誼，顯然是超過童年時代的階段了。有一天，兩人相偕外出遊玩，經過一座北帝廟時，看見鄉人向神像叩頭，狀至誠虔，他倆以其愚昧可笑，乃向鄉人演說開導。鄉人不聽，仍然叩頭如故，他倆便把神像毀壞，鄉人大譁，羣向兩家家長提出嚴重交涉，要求懲治。國父的父親，執着手杖去追尋國父，國父因避去香港，他跑到上海。這可說是兩人之合作革命的開始，却也是象徵着亡命生活的開始了！

他到了上海，便選定學習電報。畢業後，被派到蕪湖電報局去工作，積功升到領班。二十三歲，他同廣東來和黎女士結婚，這又給他和國父湊好了共事革命的機緣。

先是，國父自從離鄉到香港後，便投入拔萃書院和皇仁書院讀書。中法越南戰役中，清廷所表現的庸懦無能，給他很大的刺激，因此孕育了他的革命思想。在香港不能滿意他的志願，便到廣州去，肄業於博濟醫院。在學校裏和鄭士良等相結識，天天談論革命，因感到廣州清吏耳目太多，言論不自由，又轉學到香港的西醫書院。於是結交同志更多，革命思想更成熟。當時和國父過從最密的，是陳少白、尤列和楊鶴齡三人，被人家稱為「四大寇」。廣東這時剛好從上海回來，也參加了他們的活動。民國紀元前二十年（清光緒十八年、西曆一八九二年），國父在西醫書院畢了業，到澳門去行醫，旋又在廣州開設藥房，名為行醫，實則是暗中進行革命。時尤列正擔任廣雅書局內之廣東輿圖局的測繪生，便利局內抗風軒作為同志的聚集場所。國父和皓東及程耀臣、程奎光、魏友琴、尤列、鄭士良等時常在這裏談話，對於革命進行，已有了初步的具體計劃。經大家的推舉，皓東和國父便從廣州北上，先到北京、天津去窺察清廷的虛實，後來又轉到武漢，瀏覽長江的形勢，作為將來起事的根據。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國父到檀香山去組織興中會，聯絡華僑革命，他和其他同志仍然在港粵暗中進行。他父親死後遺留下的財產頗豐富，他毫不吝嗇地提取出來作為運動費。

這一年七月，因朝鮮事件引起中日戰爭，在戰事進行中，滿清陸海軍節節潰敗，人心惶惶，國內同志認為是加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

四七〇

緊革命活動的大好機會，便拍電去請國父回國來主持。十二月國父偕鄧蔭南等從檀香山到香港，立刻召集皓東和尤列、鄭士良等會議，決定擴大興中會組織，聯合全國志士共策進行。結果於第二年（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正月成立了香港興中會幹部，楊衢雲、謝纘泰等都加入。

這年二月，中日戰爭結束，清廷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舉國沸騰，黨人暗中進行愈急。這時廣東剛發生了幾樁有利於革命的事件：

一、中日戰爭初起時，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招軍隊，戰停乃遣散四分之三。這些遣散軍隊，多流入山澤，即留者也憤懣不平。革命黨從中運動，盡收爲己用。

二、廣州的巡防隊四出劫掠，與百姓發生衝突，百姓派代表訴於巡撫衙門，當事者反斥爲犯上作亂，下代表於獄，百姓憤怒，多願投身革命。

三、李瀚章是一個貪官污吏，只知斂錢積財，其屬吏也羣起效尤，剝削百姓，無所不用其極，民怨日深，對黨人革命宣傳，多表同情。

這種種客觀情勢，給黨人活動以莫大便利。於是香港幹部召集會議，議決襲取廣州，做革命的根據地。皓東當時特創一種青天白日的旗幟，提請作爲起事之用，經會議採納。他如果現在還活着，看見這面旗子飄揚於全國，他的心裏該是怎樣高興呢？

起事計劃既定，國父使率皓東和鄭士良等到廣州來籌備，留楊衢雲、陳少白、黃詠商、鄧蔭南等在香港主持幹部事務。國父仍然掛牌行醫，優良的醫術，取得了軍政各界的信仰，得以恣行無忌。革命機關設在雙門底的王家祠，爲掩避外人耳目，假名爲農學會。農學會初創立時，居然得到許多要人的列名贊助，因此準備工作進行得非常嚴密而順利。

過了半年，聯絡工作已大體就緒，如城外三元里的團防；北江、西江、汕頭、香山、順德的綠林，都矢志歸服，願做革命前驅。即城內外的防營及水師，也已多半聯絡就範。於是擇定九月初九日實行起事，因爲粵俗於重陽節舉行秋祭掃墓，四鄉大族子孫常千數百人結隊來省拜掃祖塋，黨人容易乘機混入，不致發覺。當時的計劃：是由香

港方面招集會黨三千人，初八晚乘輪到廣州，並用木桶裝載短鎗，充作土敏土，瞞報稅關。初九日早抵廣州時，齊用刀斧劈開木桶，取出鎗械，先向城內各重要衙門進攻；同時以附城各處的會黨，防軍及團練爲中軍，汕頭的綠林爲左翼軍，西江北江的綠林爲右翼軍，分途會攻廣州，以爲響應。又由陳清率炸彈隊，在各要區施放炸彈，以壯聲勢。正在秘密進行中，不料有黨員朱淇之兄陸生，向辦清平局事務，知其弟列名黨籍，恐將來事發時被牽累，便用朱淇名義向緝捕委員李家焯告密。李一面派兵監視國父行動，一面又轉向督署報告。幸國父平日處事機警縝密，不漏半點痕跡。李到督署報告有人造反，粵督譚鍾麟急問何人？李以「孫文」對。譚大笑說：「孫乃狂士，安能造反？」堅不肯信。機密幸未洩漏。

到了初八日，各路部隊都已集中候命。九日黎明，軍隊、民團及會黨各首領都到總機關來領取命令口號，準備大舉進攻，惟香港一路始終未到。正詫異間，國父拿來了楊衢雲的電報，通知港部須改遲二天，方能出發。就在這延宕的時間內，被清吏探破了秘密，譚鍾麟急調駐長河的營勇千餘人回省防衛，並令李家焯派兵搜索黨人，雙門底的機關本來由皓東主持，他最先得到消息，便即刻通知各同志散開，自己也和國父等避往別處。一會兒，他忽然想起遺下黨員名冊在機關裏，沒有拿出來，想冒險去取。大家都勸阻說，機關最爲清吏注目，必先被搜查，回去危險實多，徒犧牲無益。他說：「黨員名冊最重要，倘被搜去，清吏按着名冊株連，我黨豈尚有餘類。我個人冒生命危險，去保全多數同志，實分內事」。就不顧而行，大家欲阻止已來不及。他到了機關，暗探已隨其後，密密地把機關包圍起來。他知道已難倖免，便把門緊緊閉上，取出黨員名冊放火燒掉。毀滅清楚，警探破門而入，然後就捕。同時在各處被捕的，還有程耀臣、程懷、程次、梁榮等四人。

機關被破後，國父急電香港阻止楊衢雲等勿來。但此電到達時，人和軍械都已登船，無法退回。十一日晨，船到廣州，黨人登陸，岸上伏兵突起截緝，捕去丘四、朱貴全等四十餘人，餘衆不得不逃散。

皓東和諸同志既被捕，清吏嚴刑訊問，使供出同黨，藉興大獄，他寧死不供。叱他使跪，也不爲屈。只索取紙筆，慷慨直書說：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亨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

四七二

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視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吾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清吏以其措辭激烈，且不肯供出同黨，更施以釘插手足和鑿齒的種種毒刑，慘不忍言，死而復甦者數次。他仍抗聲詞斥說：「你們雖以嚴刑加我，但我肉痛而心不痛，其奈我何？」至二十一日遂和朱貴全、丘四二人同時就義。南海縣令李徵庸對他甚表敬重，臨刑時，特飭人給他穿上長衫。其餘同志被殺被禁的尚有數人。

這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次起義，也是第一次犧牲，皓東和其他被難同志便首先以他們的頭顱來喚醒民族的覺悟，以他們的鮮血來灌溉主義之花！

二、陸烈士皓東軼事（註四）

烈士生於戊辰（清同治七年，西曆一八六八年）八月十五日辰時，按烈士生於中秋節，所以名中桂，字獻香。而史烈士堅如亦於蒲節五月五日生，豈仁人義士多誕生於良辰佳節歟？

八歲出外就傅，喜圖畫，一日正從事於畫，爲師所責，烈士答曰：「圖畫亦學問之一種，何責爲」？師無以難。

烈士畢業於上海電報學堂，後調蕪湖電報局領班。

廿三歲返粵後，與黎吉卿之女結婚。

烈士自失侍後，商業收束，即奔走革命，盡將田畝變賣，家遂以傾。（民國成立後，總理憐其家族困苦，贈貲爲之復置，以養贍焉。）

廿六歲與總理提倡革命，並在順德設立中興蠶紙公司，以便從事革命工作。

廿七歲與總理北遊長江京津。

烈士於乙未九月九日，廣州革命失敗之翌日，總理以各路軍隊經已遣散不得不暫離廣州。約烈士同乘豫備小輪而去，總理囑其勿往別處，烈士言有機密要件在農學會，須取回免落清吏之手以遺患，總理不得已，乃約以如逾時不返，則輪便開，詎烈士抵農學會而吏適來捕人，遂及於難。（又陳少白亦云，是日烈士入城曾與伊相遇於途。）

烈士遇害，其忠骸，不知被清吏棄在何處，後人無從尋覓，只在翠亨故鄉將其遺齒二枚及衣冠而葬之，以留紀念。

三、國父批陸皓東之弟望華函牘（註五）

孫中山先生大鑒：敬啓者，共和再造，大總統得人，民國幸甚。弟閱報所載廣東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追悼大會，以及省議會議決撥款十萬元，建築公園，留爲紀念等事，竟將朱、丘、陸、程置之以外，先生共同四烈士前在廣州共謀起義事前敗露，四烈士爲清所慘害，惟先生得幸身免，實民國之福，茲四先烈含冤二十多年，今共和再造，目的已達矣！查先兄陸皓東犧牲生命財產，以求共和，置家以不顧，及熱心共和，可至以極點，惟皓東之老母妻子，貧苦之狀，不堪所言，終日以淚洗面，家貧如洗，度日如年，依賴何人？聞大總統早有明文撫恤先烈之家屬，伏乞先生念諸同志呈請中央維持，以安死者之魂，○○恩感賜幸甚！民國幸甚！並候○○，弟陸望華鞠躬。

國父批：答以已電省城同時追悼，政府若有撫恤到，當力言之，至其妻母，俟不日回鄉時，當另設法妥恤之。

四、馮自由撰「程奎光事略」（註六）

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興中會廣州之失敗，黨人殉義者四人，世稱朱、丘、陸、程四烈士。程，即香山程奎光也。奎光，字恆敦，號星堂。有昆弟四，伯早歿，仲恆徵，叔恆啓，名壁光。奎光其季也。壁光少入福建馬江水

師學堂，既畢業，派赴英國充海軍學生，歸國後遷廣丙艦管帶，屬廣東水師。奎光賴乃兄提挈，亦入馬江學堂習為駛術，隨擢鎮濤艦管帶。時清政不綱，南洋水師自甲申（一八八四年）敗沒於法艦隊，當局不思振拔，腐敗如故。璧光、奎光咸忿然憂之。奎光尤義憤填膺，隱然有脫離異族政府之志。歲癸巳（一八九三年）孫總理在粵開設東西藥房，嘗假城南廣雅書局內抗風軒為同志聚談所，同志左列、鄭士良、陸皓東、魏友琴諸人常蒞其間，議論時政得失，璧光兄弟與總理有鄉誼，且同主張改革，遂亦引為同調。及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啓衅，璧光奉調率廣東水師北上，仍任廣丙兵艦管帶。大東溝之戰，清軍敗績，廣丙亦沉沒，璧光緣是落職歸粵。時總理方從檀香山回國，發起興中會以從事革命活動，奎光亦得力黨員之一。及聞璧光鬱鬱居鄉，乃使奎光力勸其兄參加義舉，璧光意甚猶豫，乃弟勸以利害，璧光知不能卻，始簽署誓約而出，其意未釋然也。是歲秋，黨人決於九月重陽日大舉；奎光任運動水師之責，其坐駕艦鎮濤與安瀾同稱粵海水師之巨擘，故水師大部兵弁多帖然就範。詎是役以前前事洩失敗，清吏得間謀密報，先後捕獲陸皓東、朱貴全、丘四、程耀辰、程懷、程次、梁榮等五十餘人，繼又圍搜奎光寓所。奎光時患痔疾甚劇，兵警以其供職水師，許其乘肩輿坐馬桶而行。及抵營務處時，痔瘡潰裂，腸出四五寸，血流被體，見者莫不酸鼻。清吏以其身任職官，令以軍棍嚴刑逼供，奎光大罵滿奴可殺不絕，笞至軍棍六百，卒氣絕而死。事後粵督譚鍾麟奏報拿獲黨人一摺，僅言擒斬陸皓東等三人，獨於杖斃奎光事，無一字及之，殆以軍棍斃人為私刑，故諱言之也。奎光死時，璧光已避地南洋檳榔嶼，得免株連。然由是怨總理頗深，久久不與總理生關係。至民七，海軍南下護法，始消釋前嫌，相好如初。奎光婦何姓，於其夫殉難時，慷慨自經以從。無子，以仲兄恆徵之五子耀椿為嗣。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一九—二十。

註二：同註一，頁二一，及「程奎光事略」（載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一二三〇—一二三一，均謂受軍棍六百死；中山先生自著「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則謂程奎光病死獄中，此處從前二者之說。

註三：「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五，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

註四：同註三，頁五十六。

註五：同註三，頁六。

註六：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二六—二七，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十二日（十一月八日） 中日簽定「日本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

中日遼南條約訂立，共六款，另專約一項，中國增加賠款三千萬，由李鴻章與林董代表中、日雙方在北京簽字。（註一）

附錄：

一、中日遼南條約（註二）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欲締結條約，由日本國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一切仍歸中國管理。大清國大皇帝陛下特簡欽差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特簡欽差駐劄北京全權大臣正四位勳一等男爵林董，均作為全權大臣，互示所奉文憑妥當，議定各條開列如左：

第一款 日本國將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訂立之下關條約第二款，中國讓與日本國管理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即從鴨綠江口抵安平河口，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以南各城市邑，以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奉天所屬諸島嶼，併照本約第三款所定，日本國軍隊一律撤回之時，該地方內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交還中國，因此下之關條約第三款，並擬訂立陸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為罷論。

第二款 中國約為酬報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將庫平銀三千萬兩，迨於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交與日本國政府。

第三款 中國將本約第二款所定之酬款庫平銀三千萬兩，交與日本國政府，自是日起三個月以內，日本國軍隊從該交還地方一律撤回。

第四款 中國約日本國軍隊占踞之間，所有關涉該國軍隊之中國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不得擅為逮繫。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二日

四七六

第五款 本約繕寫漢文、日本文及英文各二分，校對無謬，署名蓋印，漢文與日本文遇有解釋字義不同之處，以英文爲憑。

第六款 本約欽奉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大皇帝陛下批准，自署名蓋印之日起二十一日內，在北京互換。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日本帝國欽差駐劄北京全權大臣正四位勳一等男爵林董。

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訂於北京。

議訂專條

本日蓋印之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中日條約內，其爲遵行條款所訂定期以前，慮或未克依期互換，大清國大皇帝陛下政府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政府爲豫防前開條約內各條款失誤遵行之期起見，由其全權大臣協同公議如左：

中日兩國政府應自訂立本專條之日起，限五日內，由其全權大臣，將前開條約已奉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允准等因，互相達知，嗣後前條約一切均各照辦，即與互換相同無異。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確實。

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日本帝國欽差駐劄北京全權大臣正四位勳一等男爵林董，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訂於北京。

二、李鴻章奏報簽換條約經過（註三）

奏爲與日本使臣會商交收遼南各款擬定條約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奉派與日本使臣會議收還遼旅事宜，當將初次會議，償款數目由俄德法三國議定，未能減少各情，於本月初八日具奏，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由總理衙門恭錄知照到臣，即函約日使林董，於十二日至總理衙門會議。臣先將該使交來條約稿本逐細改訂，屆期攜往，仍將償款數目，與該使婉商。謂三國雖經議定銀數，並未議定平色，現應就平酌改。該使謂改平即是減數，與三國定議不符，堅執不允。復查原開條約共八款，除第四、五、七、八各款均可照辦外，其第二款云：中國約不將此

地讓與他國，殊於中國自主之權有碍。第六款云：中國若不將償款如期交付，須按日給算軍費。於中國信義之名有碍，此二款均應刪去。其第一款內，應將退還地方疆界海面，詳細載明，并申明將前擬訂立陸路通商章程，作為罷論。第三款內，應添入撤兵之先，不得將臺壘廢署及屬公物件毀壞搬遷。反復辯論，自未至西，該使請將約稿帶回細酌，再訂會期。旋即函約十八日會議。是日該使交山另繕約稿及代擬照會稿，據稱如刪第二款，須將此意另備照會為據。臣即正言斥駁，該使雖以請示本國為辭，可置勿論。先將應列各款商明定議，當將約稿詳細對勘。原開之第二款第五款均已刪去，第一款內應增各節，均已列入，並將擬添入第三款內各語，附載第一款中，其餘詞句，尚無歧異。臣與該使當面審定，分為六款，惟條約互換，往返需時，慮撤兵日期，因此延緩；即與該使籌定通融辦法，於定議五日內，奏奉允准，互相達知，即與互換無異，俾應辦各事早得遵行。另立專條，附載約後。伏查此次議約，日本自以退還已據之地，索望頗奢，所擬條約，皆偏執一面之詞。經臣迭次據理折辯，始肯降心相從。惟償款數目，由俄德法三國與日本定議責押在先，無可更改；此外各款，悉心酌核，大加增刪，斟酌再四，然後定稿，尚不失交際之平，於中國體制權利，並無虧損。全遼收回以後，撤減防遼營隊，既可稍節餉需，其停止日本陸路通商，尤為隱杜後患，於大局不無裨益。茲將條約全分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知照該使，會同署名蓋印。訂明十日內中國將酬款在倫敦合鑄價交付，其交款三個月以內，日本將軍隊一律撤完，所有遼東各廳州縣，由盛京將軍派員屆期收回，旅順口、大連灣兩處，應由北洋大臣收回。並請敕下調任將軍裕祿，新授將軍依克唐阿，北洋大臣王文韶，分別派員前往辦理。金州為遼旅要衝，幫辦軍務大臣宋慶，現駐錦州，迨遼南收回，該處無須重兵，應否飭令移駐金州，以資鎮撫。除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摺詳晰具陳。再條約內未寫交款月日，應俟署名蓋印之日商定填寫，合併聲明，謹奏。

三、中日返還遼南地方條約之交涉（文中年、月、日係陽曆）（註四）

（上略）日本既接受三國勸告歸還遼東半島，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一日，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電命駐德大使查雷可夫(Charikoff)通知德外交大臣馬沙爾曰：「日本不能通過對中國過度金錢之要求，或無限期撤退遼東半島佔領時間，使其已作之諾言或多或少成為幻影。」旋由俄外部代擬還遼辦法大綱三端：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二日

四七八

一、日本不應向中國要求還遼賠償，如日本堅持，則設法減低至適度數目。
二、決定半島撤退之時間，最好在支付第一期賠款之後。
三、臺灣海峽自由通航，保證澎湖列島不設新防務，並不割讓該島於第三國。
五月十七日，羅拔諾夫將該辦法分告德、法駐俄大使。第三項辦法原為法國所提出，法外部之用意在滿足本國之輿論，同時使國際間咸知此次干涉還遼之成功，歸於法國之主動。德國最初極不同意第三項辦法，後經協商，始於五月二十三日分由三國駐日公使，向日外務省提出下列四點要求：

- 一、日本依三國忠告，放棄中國大陸領土，為此可能要求之賠款必須作適度之調整。
- 二、部分之金錢義務償付後。儘可能從速自中國大陸撤退。
- 三、日本尊重通過臺灣海峽航行之完全自由，並不轉讓該島給任何第三國。
- 四、達成諒解後，將由日本政府與三國間換文解決。

清廷初聞日本欲中國以鉅款贖回遼東，五月十日旨電駐俄德大臣許景澄，駐英法大臣龔照瑗，分向三國外部表示：「償費一事係兵費外添出之款，中國力量萬難措辦。」另命景澄諄托巴蘭德代為力爭。五月十六日，復電景澄曰：「此事既藉三國之力始允歸地，若中國自與相商，恐難就範，仍須三國始終相助，較易結束。」是中國仍欲依外力制日苛索也。

五月二十三日，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以三國致日本照會副本遞交許景澄。景澄請求將來議交遼東仍由三國派員參預，羅拔諾稱：「德法不願」，況「與公勸初意不符」，拒之。五月二十四日，總署再電景澄，向俄外部表示：「中國負累已重，力難再加價款。」請其代中國竭力駁阻。俄國仍無積極援助意。

是時日本「意存要挾，索望甚奢」，初議贖遼代價一萬萬兩，恐三國不允，自動減低至五千萬兩。七月十九日，日代理外相西園寺公望約晤三國駐日公使，對於交還遼東半島提出備忘錄如下：

一、日本政府鑒於中國償付交還遼東半島價值相當之款額殊屬困難，特將交還遼東半島之賠款數目，定為五千

萬兩。

二、日本政府準備於中國償清上項賠款及戰費賠款第一次應付數目後，將軍隊撤至金州，並於中國交付第二次戰費賠款，及交換修訂通商航行條約後，全部退出遼東半島。

三、日本政府宣佈，承認臺灣海峽爲公共航路，並不歸日本管轄，亦非日本獨自利用，且不將臺灣及澎湖列島讓與他國。

俄國僅同意日本第三項聲明，認爲第一、二兩點過於苛刻。七月二十三日，羅拔諾夫以日方所擬辦法通知許景澄，二十五日復告景澄曰：「日本索賠過多，退期遷延，意頗不善，不給費斷不能辦，現惟核減賠數，撤去商約，冀早結局。」商德法，如所覆意同，即電駐使商辦。「另電俄國駐德大使奧斯登根(Count Osten-Sacken)，照會德外部曰：「日本要求五千萬兩作爲放棄遼東半島之賠償，似乎過度，故必須運用壓力使日本將其要求減低至一半之數。」德國則認爲日本之要求並不過份，主張立予接受。其外交副大臣羅登漢(Baron von Rottmann)告奧斯登根曰：「五千萬兩作爲贖還這樣一個大而重要地方，余認爲寬和而合理。一般而論，日本之金錢要求係圍繞着合理之範圍。余甚惑疑日本是否能將中國賠款償付其戰爭費用，依余個人意見，作爲調停人，吾等活動之目的，乃促成對雙方能接受之永久協定。爲達成此目的，接受日本之提案乃最佳之途徑。」七月三十日，羅氏爲遼東情勢報告德皇曰：「爲對歐洲日後之影響，應阻止特別是法俄兩國之共同反日，甚至作戰之行動。陛下相信日俄均欲戰爭，只等待雙方準備之完成。」是德國爲謀本國之利益不肯結怨日本也。

法國之態度，則介乎俄德之間。八月六日，法駐德大使歐培脫(Otto), 率其外交部長阿諾托命，通知德外交副大臣羅登漢曰：

法政府將把交涉之主動交給俄國。法國同意德國對於日本放棄遼東索償之意見，認爲五千萬兩之要求並非不能接受。另一方面日本不但要求退還遼東之賠款，並要在該款償付後，保留該半島作爲日後其他支付之擔保，法國認爲似乎並不合理。因此法國主張當日本已經收到一個確數——約一千萬兩作爲第一期償款時，應即撤出遼東半島。

於是俄德乃直接進行交涉。德國駐俄大使拉德林(Prince Von Radolin)於八月上旬屢次與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會

談。羅拔以中國財政困難，贖遼代價應以二千五百萬兩爲限；拉氏則認爲日本因遼重三國要求，已作極大之犧牲；況遼東半島戰略價值甚高，所索贖款並不爲多。羅登漢甚至主張馬關條約第八條中規定日軍自威海衛撤退辦法，應適用於遼東半島。惟其爲表示對俄讓步起見，特於八月十二日電令駐俄大使拉度林，向羅拔諸夫作如下之聲明：

吾人贊同日本必須放棄中日商約之簽訂作爲撤退遼東之先決條件，吾人更進一步贊同，必須誘說日本，使其遷就一個可能最短之撤退期限，並必須在中國支付一億五千萬兩賠款後，立刻離開半島。此一億五千萬兩，是由五千萬兩退還遼東之賠款，及戰爭賠款第一、二期一億萬兩所組成。

八月十三日，羅拔諸夫通知拉度林，聲稱：中國無力量立刻支付一億五千萬兩賠款。建議遼東日軍之撤退，應在第一期戰費一億兩支付後立刻實行。至於贖還遼東之五千萬兩，希望仍能減少。果難實現，主張中國分六期同時與馬關條約規定之最後一億兩繳納。

八月十九日，德外交大臣馬沙爾特致電拉度林曰：「爲儘量迎合俄國意旨，皇帝陛下昨日宣佈，同意日本退還遼東之賠款要求，應減至三千萬兩。」但主張：「在遼東半島完全撤退前，由一億五千萬兩減低至一億三千萬兩，必須全部支付。」故八月二十一日羅拔諸夫通知中國駐俄德大臣許景澄曰：「德廷不願減日本索費，本部力主核減。近日德稍鬆口，又議交賠費即退遼，不牽首二期兵費，德謂須并付，故尚未決。」以表示對華之關切。

八月二十二日，羅拔諸夫卒接受德國建議，命俄國駐德大使查雷可夫(Charykow)，照會德外交大臣馬沙爾曰：「俄國皇帝深感德國皇帝減少日本要求退還遼東賠款之動機，以日本於此款支付後立刻撤出遼東爲條件，吾人接受此三千萬兩以代替五千萬兩之數目，吾人同意放棄依照戰爭賠款支付條件分期支付之原意。」法國外長阿諾托亦於八月三十日通知駐巴黎德國代辦許恩(Von Schoen)，表示在賠款分期數目上，與德國意見相同。但「爲一切有關方面利益計，應儘速促成遼東之全部撤退，不應使之依靠第二期賠款之及時支付。」於是三國意見乃遂一致。

九月四日，德外交大臣馬沙爾致電駐日德公使哥屈米德曰：「等俄法代表接到類似訓令後，汝受權與彼等立刻恢復談判，並通知日本政府，根據三國一致之意見，三千萬兩足爲退還遼東之賠款。」並告哥屈米德曰：「關於

撤退時期，汝應等候日本之提議，如果日本政府將撤退依靠於第一二期賠款之支付，汝祇將其建議作為參考，不可使用壓力。」其用意在暗中取悅日政府，以圖減少日後德國在華索取利權之阻力。

九月十一日，俄駐日公使希特羅渥(Xutpob)，德駐日公使哥爾米德(Baron Von Gutschmid)，法駐日公使呂班(Dubail)，同至日外務省，面致日代理外相西園寺公望備忘錄，建議遼東半島之贖款應減少至三千萬兩，一俟該款付清，日軍即行撤出遼東半島。西園寺當允待日政府內閣會議後再予答覆。

當是時日政府因不明瞭三國原意之不同，震於聲勢卒接受三國之要求。十月七日，西園寺邀三國公使至日本外務省，以下列之備忘錄交付三國公使：

日本政府為迅速確實解決遼東問題起見，已決定：

(一) 將遼東半島之賠款減至三千萬兩。

(二) 不以簽訂中日通商航行條約為半島撤兵條件，並願於三千萬兩賠款交清後，三個月以內實行撤兵。

十月十八日，三國公使同至日外務省，對日政府「賢明謙和」之態度，「深致讚美之意」。於是遼東之歸還，有待於中日兩國之直接交涉。

中國聞三國已協議贖還價款定為三千萬兩，內外大臣意見頗不一致。有認三國已爭持在先，若再有異議徒敗大局。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此致書總署大臣翁同龢曰：「還我遼東，實得西人之力，如加款未能全數，似不可強人所難。」而反對者頗不乏人。八月二十四日，吏科掌印給事中余聯沅奏稱：「倘倭不交地，我即不交此先約五千萬之款，請俄為我居間以轉圜，而倭亦斷不敢因我以開衅於俄，未嘗不可就我範圍，而速藏歸還之局。」九月二十五日，戶科掌印給事中洪良品奏稱：「以勦回需餉為詞，擅自留用三千萬，以五百萬剿回逆，以五百萬練禁兵，以二千萬營一陪都，照熱河例以備巡幸。」固皆憤懣之辭也。

總署欲循外交途徑，不付贖還價款。以俄國助我最力，八月二十三日，致電駐俄德大臣許景澄曰：「歸遼之議發自俄廷，若仍賠費，則於俄之初意未合，且於中國交誼亦未為完足。現在德既鬆口，即當趁此定議，一面令日本將遼地交還，一面由中國將首二兩期兵費一併交付，如此則於日有益，於中無損，而俄國從中說合亦易於帶詞。」

欲以首二期兵費一次還清爲條件，以省去贖遼之代價。景澄屢向羅拔諸夫交涉，八月二十八日，羅拔告景澄曰：「不賠償辦不到，現三國公議減去二十萬兩，此乃與德再四爭執，纔無異議。」並云：「俄已盡力商辦兩月之久，尚無成說，可見事極費手。」八月三十一日，總署再電景澄曰：「賠償減去二十萬，在俄雖極費力，而中國實不能照辦，現日使在京，儼彼允減讓，豈非轉虛俄廷美意。」命景澄切實與羅拔磋商。九月四日，景澄復與羅拔晤談，羅拔一則云：「商減費手情形，前已密達，此時萬難想法。」再則云：「三國公議已定，惟請中國體察實情，免再耽延。」

十月九日，俄外交副大臣基斯敬 (Giers) 正式以三國協議之還遼辦法通知中國駐俄德大臣許景澄，並稱已得日政府之承認。同時戰後日本首任駐北京公使林董亦正式向總署要求簽訂還遼專約。翁文恭日記記其事曰：

(十月九日) 申正，林與鄭永昌來，面交知會一件，謂：「奉天南邊交還中國，請派全權會議。」余答：「此事貴大臣從未提及，曾經三國說合，當知照三國。」彼唯唯而去。

同日旨電許景澄，以該約關係重大，「拒之則事機恐誤，允之則三國失歡。」命景澄再告俄外部，還遼之議既創自俄廷，中國斷無撤三國與日開議之理。十月十一日，復電景澄曰：「遼費三千萬兩，雖經三國定議，並無明文告知中國，中國亦並未允許，必應切商俄外部，如再減讓，中國方可照辦。」十二日另電駐法大臣慶常（按：是時慶常專任駐法大臣）切告法外部，贖遼償款非再商減，中國斷不能定議。

十月十二日 許景澄約晤俄外交副大臣基斯敬，研商贖遼償款，基斯敬堅稱：「此數業經三國公議減定，日既覆允，礙難再與商減。」景澄告以中國力疊難辦。基斯敬則云：「俄德爭論賠數幾致不合，再有異議，恐啓嫌隙，即法國亦不謂然。今早已電駐使與日外部互換照會，事已定局，實非本部推諉。」景澄以三國定議中國不能照允反爲不美動之，基斯敬竟謂：「如此則遼事必至決裂，還請中國照議了結，於大局有益。」景澄又述中國是否即與駐北京日使商訂還遼條約，基斯敬答曰：「付款收地等事中國可與商辦。」同日法外交部長阿諾托亦告慶常曰：「倭恃緩延宕，法俄約德力逼定議，如再商減，倭必翻議誤大局。」於是中國削減贖遼償款之努力乃告失敗。

十月十四日，旨派李鴻章爲歸還遼旅全權大臣，與駐京日本公使林董議而還遼事宜。同日鴻章分電駐俄德大臣

許景澄、駐法大臣慶常曰：「日昨已與三國駐京公使商妥，均允致電本國商減遼費，請即切商三國外務部，格外相助，力勸再減一半。」十月十七日，復電駐日大臣裕庚，探詢日本對遼事態度，能否再爲少減。

十月十六日，許景澄致電李鴻章，謂俄外部云：「俄國不能允助西減遼費，略（西尼）使亦無來電。」明日再電鴻章曰：「德外部不允助力，亦未接紳（珂）使電，詳情已由參贊電署，此事三國係稱自行公辦，故一經定議，不肯再商，若撤三國，又恐不易收束。」十月十八日，駐日大臣裕庚電亦至，謂日代理外相西園寺公望堅稱：「歸還價款三千萬絕不能減。」鴻章失望之餘，致電景澄曰：「遵旨商減，亦知無益，四國謀合，何從撤開？以後交涉煩難，愈多棘手，雖欲變法自強，無人無財無主持者，奈何！」乃係有感所發也。

十月二十日，鴻章與日使林董會於總署，鴻章藉口「償款數目係三國所許，中國初未預議，現派臣（鴻章）面商，自須另行議減。」林董則稱：「此係三國定議之數，斷難再減分釐。」十月二十五日，鴻章奏報連日與日使會議經過曰：「臣與日使辯駁竟日，唇焦舌敝，林董固執成說，毫不放鬆。……徒勞唇舌，無補纖毫，瞻顧徬徨，莫名憤疚。」鴻章之意「原冀爭回一分即有一分之益」，至此乃請旨裁奪。會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屢催許景澄，請中國「早付遼費，早退日兵。」清廷不得已，卒從三國所議。

十月二十九日，鴻章函致林董至總署，於詳閱日使交來約稿後，仍懇減低贖遼代價。林董不允，乃欲減低紋銀成色。」聲稱：「三國雖經議定銀數，並未議定平色，現應就平酌改。」林董認爲「改平即是減數，與三國定數不符。」堅不承認。其他約稿八款中，第二款：「中國不將此地讓於別國」，於中國自主權有礙。第六款：「中國若不將償款如期交付，須按日給算軍費。」於中國信義之名有礙，鴻章要求刪去。並要求在第一款內將退還地方疆界海面詳細載明，而將前擬訂之陸路通商章程作爲罷論。第三款內應添入：「撤兵之前不得將臺嶼廠署及屬公物件毀壞搬遷。」反覆辯論，至十一月四日再度會商，始成定案。十一月八日兩國簽訂「日本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六款，及專條一款。十一月二十九日，雙方在北京互換生效。明日遼東日軍開始撤退，清廷命盛京將軍裕祿、幫辦軍務伊克唐阿、宋慶等接收遼南地方。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頁一三一一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三、二十六日

四八四

註二：同註一，頁一五一—一七。

註三：同註一。

註四：節錄李守孔：「三國干涉遼遼之交涉」，載「大陸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九期。

二十三日（十一月九日） 清廷命許景澄、龔照瑗將遼東賠款交付駐英日使。

本日，清德宗電諭駐德公使許景澄，駐英公使龔照瑗曰：

「電寄龔照瑗：歸遼庫平銀三千萬兩，着龔照瑗于本月三十日交日本駐英使臣接收清楚。又電寄許景澄：歸遼費三千萬兩，著許景澄于倫敦存款內，撥交龔照瑗，轉付日本駐英使臣接收。」（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六，頁三四一八（原頁九）。

二十六日（十一月十二日） 孫先生文自香港抵日本神戶，旋赴橫濱。

孫先生文於廣州起義失敗後，逃亡至香港，以清廷懸賞緝拿，在香港知勢難居留，乃偕陳少白、鄭士良乘日本貨船自香港赴日本。船出港口，即遇大風，越十四日，于本日始抵神戶。時廣州義舉，已喧騰日本朝野，孫先生閱報見「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因語少白、士良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此與吾輩排滿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稱吾黨可也，」孫先生等留船上，翌日即開往橫濱。（註二）

按：凡中國革命、保皇人士亡命日本者，所到之處，各地方官，逐日均有詳盡報告于日外務省者。本日日本兵庫縣知事（兵庫屬神戶傍海岸之地區也）報告外務省云：「中國革命黨人孫逸仙等數名，今搭船至神戶，動向未明，疑似前往橫濱，或東京。」（註二）由此可知日政府對中國革命志士在日本活動之注意。故測其動向，探其內情。

註一：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一。

註二：「日本外務省密檔」，電受第四三二號，日本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十一時十分收。

二十七日(十一月十三日) 楊衢雲經新加坡等地轉赴南非洲。

衢雲依謝續泰意，離港赴越南西貢，旋由西貢往新加坡、麻加拉斯、哥倫坡，暫抵南非洲，遂設興中會分會于南非尊尼士堡、彼得尼士堡等處。(註一)

註一：謝續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一〇。

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五日) 許景澄函總署請派使致賀俄皇加冕。

本日，景澄致函總理衙門曰：

「俄主加冕日期，傳稱在明年俄曆五月初旬(即中曆四月初旬)，歐洲各國或其主自至，或遣親藩暨大臣爲專使，如期咸往致賀，中國雖已派使行聘，而此舉爲彼國大典，仍應宣揚詔敕，藉輯邦交，惟另簡專使，或即派駐使，商著俄禮官，據稱向無一定，宜請中國在二三月前定辦知照，俾早接洽。」(註一)

按：景澄之請，乃受俄財政大臣徵德之暗示，其後，清首委派王之春，俄以其位望太輕，辭不接受，暗示非派李鴻章前往不可，蓋俄人早有預謀，非鴻章前往，實不足以完成中俄密約之簽訂也！

註一：「許文肅公遺稿」，卷八，頁五一。

十月

一日(十一月十七日) 孫先生文至橫濱，旋于該地組織興中會分會。

孫先生于本日至橫濱，下船後，舉目無親，茫然不知何所適，突憶起去年冬由檀香山返國時，船停橫濱，有華僑譚發曾偕陳清往訪于船中，並云今後若有事須渠協助時，皆可出力。乃往訪譚發，言明來意，發代爲租一六席樓面房間，暫行住下。未幾，經由譚發之介紹，得識馮鏡如，接談投機，歡若平生。時馮住橫濱山下町五十二番地，經營文經印刷店。鏡如旋邀孫先生等下榻該店二樓，並邀馮紫珊、譚

發、黎達卿、黎炳垣（煥堉）、趙明樂、趙嶧琴、溫遇貴等十餘人在文經二樓會商組織與中會分會，衆舉馮鏡如爲會長，趙明樂爲管庫，趙嶧琴爲書記，馮紫珊、譚發、黎炳垣等爲幹事。半月後，復設會所于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繼續加入者有溫芬（炳臣）、鄭曉初、陳才、陳和、黃焯文、黎簡卿、陳植雲、馮懋龍（官由）等十餘人，以懋龍爲最年少。懋龍爲鏡如之子，時年僅十四歲耳！是時，旅日華僑思想保守，風氣閉塞，故大部份均視革命排滿爲大逆不道，而會員均有戒心，每次開會通知書，均不假手于日本下女，而由懋龍親自派送。（註一）

附錄：

一、陳少白撰「孫先生之抵日本」（註二）

（上叙廣州之役失敗）孫先生遲遲不到恐真有不測，這樣疑疑惑惑的着急了兩天，才見孫先生到我家裏來，他來了，就說：「現在我們究竟怎麼辦呢？」兩個人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方法，本來我們有一個英國律師顧問在香港，他就坐了轎子去問那顧問：「我們住在香港能否不發生危險？」這位英國顧問，雖然當律師的，對於這件事在香港却是初見，並不知道政治犯有沒有特別規定，所以他說：「這是沒有辦法，不要吃他們的虧，還是離開香港最好。」孫先生回來對我說：「顧問已叫我們離開香港較爲妥當。我們還是跑吧！」就找到一張報看看，今天有什麼船離港，看了報，知道有一隻到安南去的船當晚就開，就派人去買船票，豈知這艘船，是貨船，不乘客人的，後來打聽到還有一艘船，船名「廣島丸」的，明早到日本去，雖然也是貨船，却有四個艙位，孫先生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人，乘這隻船到日本去。船一出口便遭大風，經過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戶，到了神戶，就買份日報來看看，我們那時雖然不識日文，看了幾個中國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到「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赫然躍在眼前，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爲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動只算造反而已，自從見了這張報紙以後，就有「革命黨」三個字影像印在腦中。

我們在神戶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到橫濱。但是在橫濱，一個人都不認識，所以我們在船上，想到住居問題，倒

很不安起來，湊巧孫先生想起，從前最後一次從美國回來，經過橫濱的時候，有一個中國廣東人陳清，到船上來兜賣東西，孫先生那時候，革命思想很厲害，碰到一個人，就要說這些話：就是和一個買賣的人，也會說到革命，所以孫先生看見陳清是廣東人，也同他說起革命來了，陳清聽了孫先生的話，回去就對他的同鄉說：「今天船上有一個人，很奇怪，他說要在中國造反呢！」這個同鄉，好奇心起，就跑到船上去見孫先生。孫先生見他，問起他的姓名，知道他姓譚名發，在橫濱開一間洋服店，兩個人就談了一會，最後，譚發還答應以後有什麼事，他可以幫幫忙。這一次我們到橫濱，孫先生就想起這個人來了，所以叫我們留在船上，他一人登岸據着地址，去找譚發。找到了，說了來意，商量居留問題，譚發就替我們租了一個樓面，這個樓面很小，只有六席的一個房間，孫先生看定了，倒也很滿意，就回到船上來。當孫先生登岸之後，我們整候了半天，不見回來，心裏很爲着急，以爲出了什麼意外，好容易等他回來了，才安心的跟他到那新樓面住下。那時候，心裏倒舒服起來，因爲到了這裏，中國政府已追究不來，而且這個地方，又有了住宿的場所，現在我回想起來，總覺得那時候的舒服，真非言語所能形容了。

我們在橫濱也沒有什麼事做，大家出去逛逛市面，在家看看書。一二日後，譚發介紹給我們幾個人，其中有一位馮鏡如，就是馮自由的父親，當時馮鏡如在橫濱開了一間外國文具店，又有一位馮紫珊，乃鏡如之弟，也是開文具店的，孫先生就在那一天晚上，開起會來；派馮鏡如爲與中會橫濱分會會長，他的兄弟馮紫珊派爲司庫（那時候馮自由祇十三四歲）。這樣過了幾天，孫先生就剪去頭髮，換了西裝，預備叫我一同到美國去；其時，美國對於中國人，已有禁止進口的命令，所以美國領事，面告我們，不宜冒險前去。孫先生先說明他是檀香山出生，領事才給他護照，而我那時因爲沒有辦法，就在日本耽擱下來。過了幾天，鄭士良也回到香港去，所以這時候在橫濱只有我一個人了。

二、馮自由撰「籌組橫濱與中會分會」（註三）

吾國清代之有革命黨，以興中會爲嚆矢。在興中會以前，非無革命黨也。如：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臺灣朱一貴之中興會，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臺灣林爽文之天地會，嘉慶元年（一七九六）鄂、皖、豫、湘各省劉松、聶傑人、齊王氏等之白蓮教，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燕、魯、晉、豫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之天理教，道光三十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月一日

四八八

年（一八五〇）洪秀全之太平天國，皆可謂之革命黨。然其宗旨止限於反清復明之單純的民族主義。而所企圖，所建樹，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統，於近代進化之民權主義無與焉。是祇可謂之狹義的及私人的革命黨而已。若夫揭發民族、民權兩大主義，而開吾國歷史之先河者，厥惟興中會。

興中會之發起，在於甲午（一八九四）秋冬間，及乙未（一八九五）九月重陽廣東之失敗。發起人孫中山先生偕陳少白、鄭士良二君於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訪余父鏡如於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經商店，商榷組織興中分會事宜；時中山先生固與余父尚無一面之識也。溯余父之早年經商橫濱，亦有故焉。余祖展揚世業儒醫，清咸豐初年太平天國洪秀全遣部將陳金剛等謀在粵舉兵響應，各府縣從之者大不乏人。各以頭裹紅布為識，時人以「紅頭賊」三字稱之。余祖即以交結「紅頭賊」嫌疑被清吏逮捕繫獄，瘐死南海縣獄。余父以是抱恨終天，憤然間關走日本謀生活，居橫濱數十年。甲午中日構釁，清軍敗績，余父益憤清政不綱，毅然剪除辮髮。時旅日華僑無去辮易服者，有之獨余父一人耳；故同國人咸稱余父為「無辮仔」焉。是歲多，中山先生自檀香山歸國，舟過橫濱，嘗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輪僑胞演講逐漸救國。中有販賣雜貨商陳清者，聽演說後異常驚奇，亟趨告余父。余父大為傾倒，立使陳清邀請中山先生登陸，共商國是。中山先生客謂該輪輪啟碇在即，未便登陸，囑陳清携興中會章程及討虜檄文一大束，交余父代為派送，藉廣宣傳。且謂廣東不日可以大舉，約陳清回粵相助。是即余父與中山先生互訂神交之經過。厥後陳清卒回粵參加乙未九月廣州之役，其旅費即由余父所贈予者也。余父既接見中山先生，對於組織興中分會事，極表同情。即召集余叔紫珊及有志僑商譚發、黎炳垣、溫遇貴、陳才、黎簡卿、趙明樂、趙嘯琴、溫炳臣等十餘人，在文經商店二樓討論立會事。旋設會所於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衆舉余父為會長，趙明樂為司庫。趙力辭，乃改推余叔紫珊。分會成立後一月，中山先生向各會員籌措赴檀香山旅費。各會員多以無力對，余父兄弟二人乃合籌五百元應之。中山先生得資，即與陳少白同時剪髮易服，以百元贈鄭士良，使回香港預備再舉。另以百元給陳少白充用度。少白於中山先生離日後，即從余父言移居文經商店，其下榻之室，即余幼時所居者也。

當橫濱興中會成立時，余年甫十四耳。是歲夏余以母疾自粵蒞日，余父命余夜習英文，日中無事讀小說消遣，於國事實毫無所知。一日，有久未剃頭髮長逾寸之長衫客二人來訪余父，余父引之至樓上客室，密談多時乃去。余

後始知來客姓名爲孫逸仙、陳少白。嗣與中會成立後約一星期，某日中山、少白、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詢余好讀何書。余曰：「好讀小說」。中山先生曰：「好讀那部小說？」余曰：「三國演義」。中山先生曰：「三國演義人物汝最喜歡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歡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順逆之理。我等之興中會便是漢朝之劉備、諸葛亮。今之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等之起兵驅逐滿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謂余父曰：「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令其入會？」余父遂命余填寫誓約。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黨之原因也。時與中會之宣傳品僅有二種：一爲揚州十日記，篇末附以清攝政王多爾袞及明閣部史可法來復二書；二爲黃梨洲明夷待訪錄選本之原君、原臣篇。均由余店代爲印刷。余初讀原君、原臣，不甚了解，至揚州十日記則作小說讀之，篇末之多爾袞、史可法二書，更能背誦不遺一字。此外足以增余知識之報章，僅有上海時務報及澳門知新報兩種，然亦止倡導維新變法之論，於革命保種之真諦，固無關係。至己亥（一八九九）秋，余始遊學東京，漸博覽東華錄、明季稗史、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盧騷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諸書。遂於平等自由天賦人權之學說，及世界革命民族自決之源流，豁然貫通，更印證以興中會宣誓之宗旨，若合符節，益覺實行本會宗旨之職責爲刻不容緩矣。自庚子至壬寅（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之三年間，余在日嘗發起四事：一爲與鄭貫公等創刊之開智錄；二爲與李自重、王寵惠等組織之廣東獨立協會；三爲與沈雲翔、戴元丞、秦力山等合辦之國民報；四爲與章太炎、秦力山等召集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此四事，均得中山先生爲贊成人。於海內外之宣傳，收效至鉅。及壬寅以後，陳少白更聘余任香港中國日報駐東記者，美洲致公堂機關之大同日報，亦以該報駐東通訊員見委，此外東京之革命軍事學校，及檀香山之檀香山新報，新加坡之中和堂與閩南日報，概由余傳遞消息，聯絡黨誼。在同盟會成立以前，余之橫濱寓所，不啻爲革命黨各方交通線之樞紐焉。

余父鏡如少經商日本橫濱，營出版業，有商店在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曰文經活版所。甲午之戰，旅日華僑多避難返國，及馬關和議既成，僑商漸次東渡，余父仍有戒心，以生長香港，遂剪辮易服，求英國領事保護營業。旅日僑商之解除辮髮者，實以余父爲嚆矢。乙未余隨父居橫濱，時年十四。一日，見有久未剃頭之長衫客二人來訪余父，謂有密事相談，良久始出。後乃知來客爲孫總理、陳少白。蓋余父素以任俠好義聞於時，總理初識船上行商陳

清，及洋服商均呂號主人譚發，復由陳、譚介紹來見余父。不數日，總理、少白同在余店解除辮髮，衣服由譚發代製，與總理同行之鄭弼臣，則因被派回國辦事，暫未易服。

三、馮官由撰「橫濱興中會及中和堂」（註四）

中山到日情形 乙未廣州一役敗後，中山偕鄭士長、陳少白二人至日本橫濱，時該處已有革命團體之組織。馮鏡如、馮紫珊、譚奮初等遂召集同志僑商二十餘人開會歡迎，共商善後方法，決議正式成立興中分會，設會所於濱橫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並選舉馮鏡如爲會長，趙明樂爲司庫，趙煒琴爲書記，馮紫珊、溫溫貴、溫炳臣、陳才、鄭曉初、陳和、梁達卿、黎煥輝等爲幹事，規模粗具，會務日有起色。是時中日和議告成，清政府新派公使領事將次入境，外間遂有日政府允許引渡革命黨之謠傳。中山亦以一時未能活動，乃與陳少白同斷髮改裝，決意遠遊美洲，向華僑籌募鉅資，爲捲土重來之計。因向華僑同志商借五百元充旅費，詎各同志多以有心無力對，僅由馮氏兄弟捐助五百元爲贈。中山得資，乃以百元給鄭士長回國，使收拾餘衆備圖再舉，另以百元給陳少白作易服費。然後隻身再渡檀島。關於中山初到日本情形，民國九年馮紫珊曾致函其姪自由，敘述其事頗詳。茲附錄如左，以資考證。

（前略）再者賢侄前與愚叔甚爲親愛，凡有要事亦到致生商酌。叔自有生以來，於兄弟叔侄之情最愛，或者因黨見爲嫌疑而間疎，未可料也。愚叔雖蠢，祇知有國恥，絕不知黨見爲何物。叔因在橫濱被日人投石，親受其辱，迫得聞中山由檀歸國，道經橫濱，託陳清帶許多傳單埋街，聲明華九月起旗作反，殺滿清佬，復明之江山。愚叔得聞之下，即使陳清請孫先生埋街一會，以敘同志之情。後陳清回話，孫先生云：船期出帆在即，不能久留，囑各同志立即組織會所，取名義興會，以作後援云云。不料九月事敗，中山、少白、弼臣三人逃往橫濱，寓五十二番，叔與奮初同去相見。斯時方運動同志二十餘人，趙明樂管財政，嶧琴爲書記，叔爲幹事，叔父爲議長，其餘爲鄭曉初、溫溫貴、溫分煥、嶧達卿、陳才、陳和等。此會成立，設在一百七十五番，不料日清戰後，馬關和約已成，欽差領事再派，中山向叔陳及，他三人在日本不便。因他係國犯，倘欽差到任後，有權運動日政府將三人引渡，更有連累各會友不便之處，務須各同志籌五百元，俾他三人探路而逃云云。叔斯時請各同志商量辦法，不料各人講到簽銀兩字，無一人答應，叔再三問之，各人面面相向。斯時激到愚叔大憤，用大義責彼云，今日孫先生滿腔熱血，救同胞於水火，國家

將亡，匹夫有責，應該自己挺身去辦，況今日孫先生因事不成，仍望再接再厲乎！若先生有差池，誰能繼之？將此言遍告一番，亦無動聽。迨不得已，叔憤極出言大責，若各位不允集腋成裘，以救三先生出關者，就算我一人出之便是，即答應孫先生云，該五百元準明日十二點鐘送上，決不食言，以此語散會。叔初時以此五百元作國恥犧牲，不料中山迨後寄回，此乃中山之忠厚處也。在後楊衢雲被人行刺，孫先生念他剩落孤兒寡婦，養口無靠，開束簽題，先生着陳才拈束到叔處簽捐，各人所簽不過三五元八元十元而已。叔見他係爲國身亡，落筆簽八十元，後爲先生贊羨，吩咐陳才叫我時常去傾談。自始以來，凡在火車與路上見面，無一不握手爲歡，絕無意見也。孫先生得五百元，一百交少白製衣轉裝，叔薦他在文經代汝父編輯字典，一百交弼臣回港，三百中山回檀使用，此事是否，問先生料必記憶矣！叔時常欲見先生一面，以全友道，多年舊雨。曾共一方，憶他現爲總統之貴。未知念及故友否？欲去而不敢，便中望賢姪代爲致候可也，不妨言及叔之現況。（下略）叔紫珊十二月十三。

興中會與中和堂 中山離日後，陳少白乃移居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經商店，助馮鏡如編輯華英字典，由馮月酬筆資六十元。未幾楊衢雲、尤列先後東渡，中山在倫敦使館脫險，亦即來日，於是會務日盛，黨員漸衆。陳少白曾一度渡臺灣，得同志馬文秀、趙瀚潮等數人；楊衢雲設帳授徒，藉資糊口；尤列發起中和堂，專聯絡工界，從之者頗不乏人。丁酉清光緒二十三年秋間，僑商集議於中華會館，提議組織學校，以振興華僑子弟教育。中山薦梁啓超爲掌教，康有爲以梁不能來，改薦徐勤承乏。徐勤既至，日爲康黨培植勢力，所聘教員如梁啓田、湯覺頓、陳蔭農、盧湘父、陳默庵、鍾卓京、林奎諸人，皆康門徒侶，大都出身科舉，長於文學，其交際手段遠在革命黨之上。大同學校董事原以興中會員居多數，至是日與徐勤等往還，耳濡目染，輒爲所化。及戊戌七月，清帝厲行變法，召用康梁，橫濱康徒莫不彈冠相慶，而僑商亦多趨炎附勢，漸與興中會脫離關係，於是橫濱之興中會遂有江河日下之勢矣！惟中和堂以工界爲本會，位員多宗旨純一，淡于權勢，雖非興中會嫡系，而能屹然與保皇會相對抗。至民國成立後，猶持久弗衰，有足多者。其後尤烈在南洋新嘉坡、檳榔嶼、吉隆坡、檳羅、怡保、芙蓉各埠，組織中和堂分部。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南洋之革命團體當以中和堂爲最早。

大同學校與華僑學校 大同學校於戊戌後，已成保皇會機關學校，華僑子弟非隸保皇會籍者，輒被排擠，因是橫濱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月一日

四九二

之興中會員及耶穌教徒三江幫各團體，乃合組一學校，顏曰華僑學校，先後延趙嘯琴、郭外峯、翟美徒、廖卓庵、胡毅生等充校長教員等職，隱然與大同學校各樹一幟。此外神戶華僑所立學校，亦分兩派，此種界限至今日猶未能消除。

四、馮自由撰「橫濱興中會」（註五）

橫濱華僑在早午冬 孫總理自檀島返香港過境時，已發生關係，蓋 總理於船泊橫濱期間，曾在舟中向歸國僑胞演講逐漸救國，為該埠售物行商陳清所聞，陳以報告僑商馮境如、馮紫珊、譚發等，馮等即派陳重登該輪，邀總理登陸商談國事。總理謂該船開行在即，不便登陸，授陳以興中會章程及討論檄文一大束，令轉交馮等照章設立分會，且謂廣州不日起義，陳若有意參加，可到香港投效等語。馮等得陳歸報，遂召集少數同志為組織之預備。乙未九月廣州之役既敗，總理偕陳少白、鄭士良二人亡命至橫濱，首訪鏡如於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經活版所。文經為經營外國文具及印刷業之商店，馮氏開設三十餘年，在僑商中藉藉有名者也。孫、馮相見，有同舊識，遂由鏡如約其弟紫珊及譚發（奮初）、梁達卿、黎炳垣（煥堉）、趙明樂、趙嘯琴、溫遇貴等十餘人，在文經號二樓會商組織興中會事。衆舉鏡如為會長，趙明樂為司庫，趙嘯琴為書記，紫珊、炳垣、譚發等為幹事。半月後復設會所於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繼續加入者尚有溫芬（炳臣）、鄭曉初、陳才、陳和、黃焯文、陳植垣、馮懋龍（後易名自由）等十餘人，以懋龍為年最少，時僅十四歲耳。是時旅日華僑尚多日革命排滿為大逆不道，故會員咸有戒心。每次開會通知書皆不欲假手於日本下女，概由小會員馮懋龍分別派送。冬十二月 總理決意遠遊美洲，擬向華僑籌集巨資，為捲土重來之計。因向各同志商借五百元充旅費。詎各同志多以有心無力對。趙明樂且辭退司庫一職，鏡如、紫珊兄弟二人乃合籌五百元以應之。總理乃以此款百元供少白斷髮改裝之需，另以百元給鄭士良，使回港收拾餘衆，以備再舉，然後隻身再渡檀島。迨 總理離東後數日，少白乃遷寓文經商店，佐鏡如編輯華英字典。已而各會員供給月費者漸少，鏡如、少白等以經費無着，乃將會所取消。凡有會務均假文經商店二樓開會決之。越三年戊戌（民國前十四年）春，總理自歐洲東歸，時會員寥寥，黨勢毫無進展。先是丁酉（民國前十五年）秋間，僑商鄭汝碧、馮鏡如等大集會於中華會館，建議設立學校，以教育華僑子弟，公請興中會推薦校長。陳少白特薦上海時務報主筆梁啟超任之。其後康有為以啟超有事不能兼顧，改薦徐勤承乏，並代改校名曰大同學校。徐勤既至橫濱，日為康黨培植勢

力，所聘教員皆屬康門徒侶，大都出長科舉，長于文學，其交際手段，遠在革命黨之上。故自大同學校成立之後，與中會勢力漸衰退。會員中能宗旨一貫歷久不變者，寥寥數人而已！

五、馮自由撰「橫濱兩俱樂部」（註六）

當橫濱與中會成立後之二三年，即乙未年冬至丁酉年止，華僑工商界有兩小俱樂部，與與中會略有關係。一名三餘軒，乃商人馮鏡如、馮紫珊、盧桂園、黎炳垣、梁達卿等數人所組織，會員僅十餘人。孫總理、陳少白、楊衢雲等居東時，每晚恒至軒中聚談，或瀏覽書報，此為僑商團體中之比較開通者。丁酉年秋，橫濱華僑發起募款建立學校以教育子弟，即由三數人在三餘軒開談中決定者也。一名修竹寄廬，會員數十人，多屬洋行書記職員。其主要人為梁麒麟（文經商店書記）、關谷聲（某洋行買辦）、溫芬（某洋行職員）、梁樹南（某英人飯店買辦）等，分子雖較複雜，但服務洋行者性多豪爽，放言高論，毫無拘束，故總理等尤樂與親暱。戊戌年春，楊衢雲自南非洲抵日本。及總理從倫敦東歸，以衢雲於乙未九月廣州一役貽誤機要致敗，特約至某密所面責其罪，衢雲俯首無辭，當日所約會之某密所，即修竹寄廬也。其後梁麒麟等返粵，每過香港時，陳少白常招待之。

六、馮自由撰「橫濱文經商店」（註七）

文經商店又名文經活版所，開設於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地，專營外國文具及印刷事業，在乙未十月總理蒞日時已開設三十餘年。店為廣東南海人馮鏡如所創立，鏡如誕生地在香港，故有英名曰 James，譯音曰經塞爾，此字實由鏡如之「鏡」字粵音轉變而成，在英文本無意義，惟分拆解之，則為售王，似可解作出售帝王之義。外人過者見其門首高懸經塞爾公司之金字大招牌，引為奇特，多注目視之。鏡如祖先在粵世業儒醫，至其父展揚，始之香港，改業慇懃，旋以結識太平天國駐港將士，同粵策勳軍事，被清吏以「紅頭賊」罪案逮捕，下南海縣獄年餘，卒瘐死獄中。鏡如自是抱恨終天，隻身東渡求活，生平疏財仗義，排難解紛，頗得僑衆信仰。甲午中日構衅，清廷喪師辱國。鏡如積憤填膺，毅然剪除髮辮以示決絕。時旅日華僑無去辮者，有之自鏡如始。故華僑咸以「無辮仔」稱之。是年多總理自檀香山返國，船過橫濱時，向同舟華僑演講逐滿救國，鏡如據售物商陳清報告，即派陳轉請總理登陸共商國事。總理謂舟行在即，無暇赴會，即交陳與中會章程一大束，使馮等在日設會進行。乙未九月廣州一役失敗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月三日

四九四

後，總理亡命日本，首訪鏡如於文經商店，即以此爲因緣也。嗣興中分會成立，總理携來宣傳品二種，一爲揚州十日記，未附史可法及多爾袞二人往還書札；一爲原君、原臣篇，即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之選本，均由文經商店代印萬卷，分送海外各埠。及總理赴檀，陳少白移寓文經二樓，助鏡如編輯華英字典，即三十年前盛行海內外之馮鏡如華英大字典是也。及戊戌年大同學校成立，鏡如爲協理，屢約總理、陳少白、楊衢雲、梁啓超、韓文舉、徐勤諸人在文經二樓密商兩黨合作救國問題，頗具端倪。以康有爲從中作梗而止，鏡如每引爲憾事。辛丑年，留東學生沈翔雲、戴元丞、秦力山、馮自由、王寵惠等發刊國民報於東京。時日人對於留學界出版品取締頗嚴，故發起人欲得外商保證，藉免檢查。鏡如生長香港，掛名英商，故由馮自由商取乃父鏡如同意，即以「經塞爾」名義登記爲國民報之編輯兼發行人。國民報爲留學界提倡革命之第一種刊物，文經商店更爲積極與中會之出生地，是皆不可以不紀。（馮自由按：文經商店亦爲筆者呱呱之出生地）是店於甲辰年（民前八年）遭祝融之劫歇業。

註一：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十四——十五。

註二：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十二——十四。

註三：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自序及頁二。

註四：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三〇——三五。

註五：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三九——四一，民四十二年八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六：同註五，頁四一。

註七：同註五，頁四二——四三。

三 日（十一月十九日） 清督辦軍務處恭親王奕訢、翁同龢、李鴻藻等商定以胡燏棻督造蘆漢鐵路，袁世凱練洋隊，蔭昌挑八旗兵入武備學堂。

本日午前，奕訢、翁同龢、李鴻藻三人集會于督辦軍務處，決定三事：一、胡燏棻造鐵路，二、袁世凱練洋隊，三、蔭昌挑選旗兵入武備學堂。（註一）於是奕訢乃上奏曰：

「奏爲變通兵制，擬在天津新建陸軍，並請簡員督練，期收實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歐洲各國，專以兵事爲重，逐年整治，精益求精，水師固其所長，陸軍亦稱驍勇。中國自粵捻削平以後，相沿舊法，習氣漸深，百弊叢生，多難得力，現欲講求自強之道，固必首重練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強，尤必更革舊制。臣等於去歲冬月，軍事方殷之際，曾請速練洋隊，仰蒙簡派廣西臬司胡燏棻，會同洋員漢納根，在津招募開辦，嗣以該洋員擬辦各節，事多窒礙，旋即中止；另由胡燏棻請練定武十營，參用西法，步伐號令，均極整齊，雖未盡西國之長，實足爲前路之導。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蘆鐵路，而定武一軍，接統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軍務處差委、浙江溫處道袁世凱，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前住朝鮮，頗有聲望，因令詳擬改練洋隊辦法，旋據擬呈聘請洋員合同，及新建陸軍營制餉章，臣等覆加詳核，甚屬周妥，相應請旨飭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假以事權，俾專責任。現在先就定武十營，步隊三千人，砲隊一千人，馬隊二百五十人，工程隊五百人以爲根本，並加募步隊二千人，馬隊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數。卽照該道所擬營制、餉章，編伍辦理，每月約支正餉銀七萬數千兩，至應用教習、洋員，最關緊要，應由臣等咨會出使德國大臣與德國外部，選商聘訂，其人數、銀數，均按該道所擬合同辦理，一切軍械卽在去歲漢納根購到大批軍火內撥給，月支餉銀及新軍應用製辦各件價值，均由戶部籌定核發，果能著有成效，尙擬逐漸擴充，悉裁無用之勇營，以供新軍之餉糈，務期養一兵得一兵之力，庶足以裨時局而振頹風，所有請旨派員督練天津新建陸軍各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施行，謹奏。」（註二）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四），頁七三三九——七三四〇。

註二：袁世凱：「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一，頁十九——二〇。

四日（十一月二十日） 清廷命楊昌濬開缺，以陶模署陝甘總督，饒應祺署新疆巡撫，成允署廣東巡撫。

清廷命陝甘總督楊昌濬開缺回籍，以甘肅新疆巡撫陶模署陝甘總督。甘肅新疆布政使饒應祺署甘肅新疆巡撫。以廣東布政使成允，署廣東巡撫。（註一）

清廷舉行乙未正科武殿試於北京。

先是九月十五日，清廷先派兵部右侍郎徐樹銘知武舉，以刑部左侍郎李瑞榮爲武會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馮文義爲副考官，會試天下武舉。本日舉行武殿試，先一日，帝御紫光閣，閱中試武舉馬步射，斯日復御箭亭，閱視中式武舉技勇，再御乾清宮，引見中式武舉，親定甲乙。並諭知本日殿試中式武舉弓刀石內刀方不符之河南常鳴春，廣西王辰山，江西李鶴林，均着罰停殿試一科（即本科不錄取，於下科錄取之意。）所有原圍監射之大臣，著交部議處，覆試之王大臣，著交部察議。（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七，頁三四二四（原頁七一八）。

註二：同註一。

五日（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乙未正科武殿試放榜，潘濤得中武狀元。

本日武殿試傳臚放榜，授一甲潘濤、武國棟、王烽燁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鄒榮標等武進士出身，三甲毛連彩等同進士出身。（註一）

按：二、三甲名額實錄未載，待查。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七，頁三四二四（原頁八）。

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日互換交還遼南條約。

中日歸還遼南條約，本日在北京互換生效，李鴻章奏報換約之經過曰：

「奏爲與日本使臣互換歸還條約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日本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第六款內開，本約欽奉批准，自署名蓋印之日起，二十一日內在北京互換；又慮互換逾期，復訂立專條，由兩國全權大臣將條約奏奉允准互相達知各等因，前於九月二十二日將劃押日期及議辦情形，具摺奏奉，諭旨依議欽此。茲據日使林董函稱：該國批

准條約，業已寄到，訂期互換。臣係原派全權大臣，自應一手經理，即與該使訂明換約憑單，定於十月十三日在總理衙門，敬將奉頒批准條約全分，與該使復加校對，一同互換訖，當將憑單及該國批准約本，交總理衙門轉送軍機處存備查核。並據該使函稱：該國軍隊在海城及鳳凰廳者，准於十四日起撤退。臣已電知裕祿、依克唐阿、王文韶、宋慶等，分別派員前往各處接收，不至遲誤。除分咨查照外，理合具奏，謹奏。」（註一）

按：中日甲午之戰，至是始可謂完全結束。由甲午之戰而及于三國交涉還遼，由交涉還遼而及于中俄密約，而日俄戰爭，而東北問題，而九一八事變，而中日第二次大戰，而雅爾達密約，此皆一脈相承，層層相應。士大夫之好戰于先，促成甲午之兵燹；鴻章言以夷制夷于后，締訂中俄密約，使我民族遭此亙古未有之變局，貽患無窮，後之當政者應引以為戒也。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頁二四。

十六日（十二月二日） 清廷諭命兩廣總督譚鍾麟捕拏廣州起義首要孫先生文，及楊衢雲等。

時盛傳孫先生有革命部衆四、五萬人，清廷頗以為慮，乃降諭旨，嚴密購拏，務獲到案，其餘逸犯，亦著嚴緝，以定人心。原諭曰：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盜風日熾，請飭嚴辦一摺。據稱九月間香港保安輪船抵省，附有匪徒四百餘名，潛謀不軌。經千總鄧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僅獲四十餘人。訊據供稱爲首孫文、楊衢雲，共約有四、五萬人，潛來省城，剋期起事。現在孫文首逆遠颺，黨類尚多，竊恐釀成巨患等語。廣東惠州、高州等處土匪，甫據該督奏報，首要悉數駢誅，地方安謐如常，何以盜風並未稍戢，竟有潛來省城之事。若如所奏，該匪首孫文、楊衢雲糾約黨類，竟至四、五萬人之多，在省城租定民房，潛謀不軌，該督等豈僅毫無見聞？著譚鍾麟、成允嚴密訪查，務將首犯迅速捕拏，以期消患未萌。至所稱省城外添紮安勇，及附近各鄉一律舉辦多團之處，並著該督及該署撫，體

察情形，妥籌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諭知譚鍾麟，並傳諭成允知之。」尋兩廣總督譚鍾麟奏拏獲匪夥陸皓東等三犯，即行正法，以定人心。仍嚴密購拏孫文、楊衢雲，務獲到案。得旨：此案逸犯仍著嚴緝。粵省盜風日熾，該督當防患未然，切勿大意。」（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八，頁三四二九（原頁一）。

十九日（十二月五日） 英泰晤士報評：李鴻章之允割遼東，料俄必干涉；而俄自中日戰爭時，即不斷增強其在遠東海陸軍力，顯早有干涉之心。

倫敦泰晤士報評：「鴻章之割遼東，必預期俄國之干涉。中、日戰時，俄國不斷增強陸海軍力于遠東，而世界目光多未注意。直到俄遠東陸軍集中八萬人，隨時可以應戰時，乃開始向日談判，一若置中國于其保護下。」（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

二十一日（十二月七日） 清廷再命兩廣總督譚鍾麟嚴緝香港革命黨人及領袖孫先生文等。

清廷諭曰：

「廣東會匪，在澳門、香港等處聚衆滋事，有草鞋、紅棍、白扇等名目。本年九月間，潛圖叛逆，至今首犯未獲，恐釀成大患……著譚鍾麟、成允督飭員弁，嚴密緝拿，毋任漏網。」（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七八，頁三四三二（原頁七八）。

二十二日（十二月八日） 清廷從督辦軍務王大臣奏，命溫處道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

本日，清廷諭軍機大臣等曰：

「據督辦軍務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陸軍請派員督練一摺，中國試練洋隊，大抵參用西法，此次所練係專仿德國章程，需款浩繁，若無實際，將成虛擲，溫處道袁世凱既經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創辦，一切餉章著照擬支發。該道當思籌餉甚難，變法匪易，其嚴加訓練，事事覈實；儻仍踏勇營習氣，惟該道是問。」（註一）

附錄：袁世凱上督辦軍務處原稟（註二）

竊查：比次軍興，往往易爲敵乘，迭見挫敗者，雖由調度之無方，實亦軍制之未善。若不權時度勢，掃除更張，參用西法，認真訓練，則前車之鑒，殊足寒心！誠如憲台原奏：「不得不爲易轍之圖，作補牢之計」也。按：泰西操法，每營分爲四隊，每隊分爲三大排，每大排分爲二小排，均有弁目，層層節制。又節節策應，故戰每制勝，即敗亦不潰。向來湘淮營制，以五哨爲一營，若照西人操法，分爲四隊，遞分大小排，官弁頭目，各失其伍，平時僅可節觀，臨陣最易潰亂，似必須參用泰西軍制，始可照西法操練。然全用西制，以步隊一萬二千人爲一分軍，礮隊馬隊工程隊均在外，恐人數過多，需餉太鉅，勢亦有所難行。茲謹參酌時宜並遵鈞諭，簡練一萬二千人爲一分軍之數，擬分練步隊八營，計八千人；礮隊兩營，計兩千人；馬隊兩營，每營五百人，計一千人；工程隊一營，計一千人；共計一萬二千人；步隊爲主，礮隊輔之，馬隊巡護，工程隊供雜役；似部署可期周密，臨敵亦鮮貽誤。又擬將一軍分爲兩翼，設統領二人管轄；每步隊兩千，礮隊兩千，馬隊一千，更各設分統一人，分領訓練。每步礮工程隊一千，——馬隊五百，——各設統帶一人，專轄約束。統領以各分統兼充，分統以各營統帶兼充，冀可省官節費。俟訓練有成，再加總統一人，以資督率。晚近將才甚少，簡練甚難，總統統領之任，倍宜慎選，未得其人，無妨暫缺其額。至所擬餉數，例之湘淮餉制，未免嫌優；但餉薄則衆各懷私，叢生弊竇，餉厚則人無紛念，悉力從公；且威著於知恩，罰行於信賞，每屆關餉，並簡派委員，核實點發，營員不得經手；則上無侵蝕，下免紛紜，積習頗風，可冀力挽。惟現值庫帑支絀，似難驟擴規模，擬先就定武軍步隊三千，礮隊一千，馬隊二百五十，工程隊五百，照新軍章制，歸併編伍，並加募步隊二千，馬隊二百五十，合爲步隊五千，礮隊一千，馬隊五百，工程兵五百，先行

試練。俟訓練就緒，簡拔多材，再隨時添募擴充，增足一萬二千之數。務期練一兵必得一兵之用，庶足仰副憲台委任之至意。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七八，頁三四三三（原頁九）。

註二：「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一，頁一一二。

二十三日（十二月九日） 總理衙門大臣奕訢等，奏報接收遼東各地情形，並請賞給俄、德、法三國使臣以寶星。

中日遼南條約既簽，中國據約賠償三千萬兩。恭親王奕訢等乃于本日奏報接收遼東各地之詳情；旋並奏請賞給俄、德、法三國使臣寶星。

附錄：

一、奕訢等奏報接收遼地並營口開關情形（註一）

奏為接收遼地並營口開關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日本退遼一事，自九月二十二日兩國全權大臣畫押後，聲明彼此達知，即行照約開辦。前後欽奉諭旨，飭下該將軍等，派員接收，由臣衙門電寄在案。旋准裕祿、依克唐阿電，據駐紮岫巖廳、鳳凰城、海城、營口等處日官照稱：十月中旬准行撤退，十四日撤起等語。當經裕祿選派東邊道張錫鑾，山海關道廷雍，候補道余濬等，前往接收。依克唐阿派出壽昌等各軍，分為四路，與地方官協力，備接收後彈壓之用。其南路金、旅、大連灣一帶，則北洋大臣王文韶，會同幫辦軍務提督宋慶，派委候補直隸州顧元勳、游擊龍殿揚等，與日員商議接收辦法。旋於十月十六日准劉坤一電，接宋慶等電稱：營口及海城、蓋平、鳳凰城、岫巖各處地方，均於十四日收回等因。臣等以營口為通商要埠，經李鴻章與林董議明先行交還，現既接收，應即料理開關事宜，臣等當即分咨裕祿、王文韶，割行山海關道廷雍，速往營口，並割總稅務司赫德，派定山海關稅司同往助理。據廷雍報，初八日啓行兼程前進，惟恐十四日以前不及趕到，已飭署營口海防同知范樹升等，先往接收。據赫德

報稱：新派稅司哈巴安，業經前往，一俟交收事竣，即行開關徵稅。至開關結報日期，已飭赫德查明申報臣衙門備案。遼南兵燹之後，生民蕩析離居，亟應緩撫安集，俟該將軍等查悉，再當奏明請旨。所有接收遼地並營口開關情形，謹繕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二、奕訢等奏報續行接收遼旅地方情形並請賞給俄德法三國使臣寶星以示嘉獎（註二）

奏爲續陳接收遼旅地方情形並請賞給俄德法三國使臣寶星以示嘉獎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日本歸還一事，自本年九月二十二日兩國全權大臣畫押後，聲明彼此達知，即以照約開辦。當經臣等將收回營口、海城、蓋平、鳳凰城、岫巖日期，於十月二十三日具摺陳奏在案，嗣疊據調任盛京將軍裕祿、北洋大臣王文韶、提督宋慶，先後電報，十月二十四日收回復州，十一月初六日收回旅順，其金州、大連灣等處，十一月初九、初十等日一律收回。隨經宋慶派令馬玉崑十營移駐大連灣、金州一帶，邱明禮三營、毅軍二營移駐旅順。宋慶即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旅順，周歷察看，妥籌布置，並經署理南洋大臣張之洞，遵旨揀派鏡清、南瑞、福靖、開濟、寰泰兵輪五艘，於十月十六、二十四等日駛赴旅順填紮。至應修砲台船塢營壘等項，應由宋慶會商王文韶，隨時奏明辦理，冀復舊觀。溯查本年三月馬關立約，日本要求遼地，事機迫切，疊奉電旨，飭令出使大臣許景澄、龔照瑗切商俄法德三國，實力相助。臣等亦遵旨疊與三國駐京使臣會晤熟商。旋由俄國外部商同法德兩國，各電其駐紮日本公使，照會日本政府，不允日本割據中國遼地，並各調兵輪，駐泊日本海口，隱相脅制。日本初允歸還之半，繼請加賠費五千萬兩，並俟首二兩期兵費交清，通商行船約章定妥，再行歸地。經三國堅持原議，約定加費三千萬兩，限立約三個月內歸還全遼，堅持不懈，日本始俯首就讓。此皆仰賴宸謨，友邦効力，俾遼旅重地得以早日歸復，實於大局有裨。俄國使臣喀希呢，法國使臣施阿蘭，德國使臣紳珂，各與其本國往復電商，始終勤摯，自應仰懇恩施，以酬勞勩。查光緒七年臣衙門寶星章程，各國二等公使應給二等第一寶星；惟此次爭回要地，非尋常交涉可比，臣等公同商酌，擬請聖恩，賞給俄國使臣喀希呢，法國使臣施阿蘭，德國使臣紳珂，頭等第三寶星各一座，以示嘉獎，而聯邦交。惟俄使喀希呢，本係世爵，前年中俄接洽恰克圖電線，曾經奏蒙賞給頭等第三寶星，該使續有勩勤，照章無可再加，而此舉倡義自俄，自不能略俄使而不賞。臣等悉心籌酌，只可准頭等第三寶星略爲區別，原頭等第三寶星，照章中嵌光面珊瑚，此次擬就賞給該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月二十五日

五〇二

使寶星，中嵌珊瑚，環以眞珠寶石，華瞻飾觀，特示優異。訪之各國遺例，亦復相符，如蒙俞允，卽由臣等如式製造，備文送交，命該使臣祇領。是否有當，伏候聖裁。所有續收遼旅地方情形，並請賞給俄法德三國使臣寶星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祈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微德向俄皇建議華俄道勝銀行之初步行動應為取中東路建築權。

微德（俄國財相）建議，華、俄道勝銀行之初步行動為指撥固定基金，由俄使喀西尼循行中國官場習氣，賄得建築中東路權，俄皇允之。（註三）

註一：原文見軍機處檔案，此處轉錄自「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頁九三——九五。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頁二二——二三。

註三：「美使報告」，Romanov 書。

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一日） 清廷駐德公使許景澄函總署：「德人謀在中國得一商港」。

。（註一）前駐華德使巴蘭德來京活動貸款，與李鴻章接觸甚密。

先是，當三國干涉之後，德國挾德索報，要求設立天津、漢口兩處租界，清廷允之。嗣聞俄國欲攫得東北路權，乃謀在中國取得一海口，以擴張其勢力，德國推廣土地會曾于本年九月初六日（十月二十三日）上書德國首相何倫洛熙（Hohenlohe）云：

「德國近在中國天津、漢口新設租界二處，情尚不能副本國臣民所望得推廣本國利權之益。德國應在中國得一合宜可靠地方，或一海口，或數島，專為保護本國商務，特請宰相設法商辦此事，並須不顧他國嫉忌之心。會中人據上海德商來信稱，如德國不得上海地方通商，德國商務從此無興旺之日。」（註二）

此爲德國謀攫取中國土地之始。德國軍艦旋即出現于廈門，遂傳將索金門島，作爲海軍儲煤之地，駐德公使許景澄于本日函總署曰：

「再密啓者：月初路透局自上海來電稱，德國兵船集泊廈門，將在金門島商立煤棧爲接濟水師之備。數日後未有續音，想與上月電傳中國與俄以旅順，同一子虛，差以爲慰。然德人向時議論東方情形，每謂德國但事通商，不求他利。交秋以來，各報頗言德國須在中國海岸得一船埠，方能保護商務。金門之語，大率緣是而起，近日俄報譯述德報，謂此舉尙無明文，並因前立購煤合同年限未滿，故衆意亦未盡合等語，所述似有邊際，茲特飭譯奉覽。」

（註三）

其後德擬借地泊船之說益盛，總署特電許景澄，即向德外部解釋中國之苦衷。景澄因晤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Marshall)，陳說此事之礙難許可，馬沙爾則謂中國仇人現在門內，不可將朋友關在門外，而仍請借地。景澄旋函覆總署略曰：

「德外部借地泊船一說，奉衙門多電後，于臘月十八日便晤馬沙爾，告以中國如允德國，則在東方有權之數大國，必援照要索。若不見允，必致與我爲難，德國有何良策能代中國彌杜後患？馬云：英有香港，法有西貢，無須再在東方添埠。俄已有海參崴，且新允海澳過多，想不更有所求，此外諸國，更可無慮。弟謂：總署電云，當德使談及，英法使屢來探詢，即可見其注意。馬云：彼若知德國所商僅止借地泊船，當即釋然。弟謂：中國總覺爲難。馬云：德國此事極願與中國情商，既慮他國口實，但請暫數年。若中國果有爲難，德國或亦可設法，煩代達總署爲託。又云：中國仇人現在門內，將朋友關在門外，恐亦無益等語，制氣雖尙和平，却無鬆意，所即代籌一層，亦確實擔承。謹據傳聞。迨弟于臘月杪馳回俄館，晤及德使拉度林，據云：現在東方情形，英日爲一局，俄法爲一局，相爭不能相合。然俄法之力，僅能抗英日，不能駕其上，須視德國所向，爲兩局之強弱。故俄自爭遼後，仍約德國合力，德因亦願俄合。然非開埠屯船，不足聯絡，大約俄、法二國決不因中國允德，別生爲難之端。德國既須預聞東事，借地一節，早晚決要辦成，此非我職，聊爲私告。其言似有意聳動，而于各大國離合近狀，却非師言，特附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一月一日

五〇四

陳之。洋員漢納根現住柏林，弟移德時，來見數次，去臘初旬，德主召令入見，詢問中日海戰情形，近日外部令其查南澳地方情形，俟馬沙爾定期邀晤。弟以臘杪來俄，知馬尚未見漢，容再探詢續聞。德兵艦前赴金門島山岸測量，近又詢察南澳，不知其用意何居耳。」（註四）

按：德國之野心，至是已全行暴露矣！然觀馬沙爾與拉度林二者之措詞，深知乃利用中國依賴強援之弱點也！李鴻章一生之外交策略在以夷制夷，德人反利用之，坐收漁利，對中國而言，此正所謂未見其利，先受其害也！

維也納報傳俄將向華要求建築滿洲鐵路。

維也納報載：俄將向中國要求建築滿洲鐵路。干涉還遼非白盡義務，所以不立刻發動者，以西伯利鐵路尚未完成，時間尚未成熟耳！（註五）

註一：許景澄：「許文肅公遺稿」，卷八，頁五五。

註二：同註一，頁五一。

註三：同註一，頁五五。

註四：同註一，卷九，頁八。

註五：B.S. Glinzky, G.S. Witte.

十一月

一日（十二月十六日） 德、俄艦隊測量膠州灣。

德、俄艦隊測量膠州灣，俄艦隊擬在旅順過冬，日本積極破壞旅順港設備。（註一）

註一：「字林西報」，頁一〇〇八，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俄皇批准微德之建議：建築中東路以控制中、日。

俄皇批准微德建議，築中東路以控制中、日，主用外交手段取得，不致引起重大國際干涉，謂各國欲侵占中國，俄國豈能落後。(註一)

註一：St. Petersburg News, Le Prospect; 「字林西報」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湖北布政使王之春為專使，往賀俄皇尼古拉斯二世之加冕。

俄皇尼古拉二世，定于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舉行加冕典禮，各國均將派重臣往賀。中國于俄有索遼之惠，誼當遣使前往。駐俄公使許景澄曾先後于本年八月初十日、九月二十九日致函總署，要求簡派大員，循例參加慶典，以睦情誼。清廷遂于本日旨派王之春為祝賀專使，旨曰：

「電王之春：明年四月為俄君加冕之期，著派王之春為專使，齎奉國書，前往致賀，迅速起程，所有致贈俄皇寶星，已飭許景澄在洋置備，欽此。」(註一)

按：王之春去歲奉派為弔唁俄皇亞力山大三世專使。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九，頁四。

十八日(一八九六年一月二日) 清廷命張之洞、劉坤一各回本任，分別認真舉辦鍊鋼軌、製快槍，及鐵路、商務、陸軍諸事。

清廷諭曰：

「令劉坤一回兩江總督本任，兩江地方緊要，所有張之洞辦理鐵路、整頓商務、簡練陸軍諸大端，均經創始，尚未就緒，該督回任後，務當振刷精神，實力籌辦，俾諸務日有起色，方為不負委任，特此諭令知之。」(註一)

又諭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五〇五

「令張之洞回湖廣總督本任，湖廣地方緊要，鐵廠、槍廠、甫經告成，現當開辦鐵路，整頓陸軍之際，需用甚繁；鍊鋼軌、製快槍，實爲當務之急。銀圓鑄成後，能否流通各省。該督回任後，均當加意舉辦，以立富強之本。現在關內外散勇絡繹回籍，尤慮滋生事端，並著通飭所屬，豫籌防範，銷患未萌。江南防營太多，前經諭令酌量裁減，該督務于未經交卸以前，妥爲遣撤，以節餉需，特此諭令知之。」（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八〇，頁三四四九（原頁二）。

註二：同註一，頁三四四九——三四五〇（原頁三）。

十二月

孫先生文離日赴檀香山，留陳少白於日本，主持革命運動，命鄭士良回國辦理善後，收拾餘衆，謀再舉革命。

是時，以中日甲午之戰告終，而中日邦交業已恢復，清廷所派駐日公使，即將入境，遂有日本政府將循清政府之請而引渡革命黨人之傳聞。且孫先生以日本革命基礎薄弱，不易發展，乃決定往檀香山，以謀再舉。然以廣州之役，港督曾判令孫、楊（衢雲）、陳（少白）三人于五年內不得返香港居留，（註一）于是孫先生決定留少白在日活動，遣鄭士良返香港，收拾遺衆，而已則獨赴檀島。

其時，孫先生經濟窘困，族資無着，迫不得已，乃向同志商借五百元。各同志多以心餘力絀爲辭，表示愛莫能助；趙明樂同志甚且藉機辭退司庫一職。馮紫珊同志目睹各同志吝鄙自私，昧于大義，激于義憤，遂獨自捐款五百元。孫先生獲此款後，予士良百元，作返港用費；予少白百元，作易裝費用，留居日本；餘款自用，作爲斷髮易服及赴檀島之旅費。（註二）

附錄：

陳少白撰「聯絡留日華僑及日本志士」（註三）

乙未年秋天，廣州事情失敗，我和孫先生鄭士良三個人到了日本橫濱，不上一個星期，孫先生就斷髮改裝到美國去了，鄭士良也回香港去，只留我一個人在那裡住下，好在還有幾個會員來談談話，倒也不覺寂寞。當時馮鏡如甚覺高興，請我遷到他所開的文具店內。這時候中日戰爭已告結束，邦交恢復，滿清政府又派領事來駐橫濱了。等到領事將到之時，與中會的會員却都害怕起來，尤其是馮鏡如、馮紫珊等，以為我在橫濱，如果領事有什麼舉動，恐要連累他們，都急急忙忙的來請我避開，以免意外；我在當時雖並不怕什麼領事，但事到如今，知道不能再留，好在有一兩個日本朋友，還能關切我，替我設法，因此就搬到東京本鄉一個日本朋友家裏去住了。

上一年（甲午年）孫先生在檀香山的時候，結識得一個日本人，姓菅名原傳 Sugawara Den。這一次，我們來到日本橫濱，孫先生就去找他，果然菅原傳已回到日本，家在東京，我們就到他家裏去，相見甚歡，殷勤款待。孫先生離開日本之後，他還請我到東京紅葉館，大排筵宴的食過一頓飯，又介紹給我一個日本人姓曾根名俊虎 Sonel，這曾根俊虎原是一個日本海軍大尉，因事去職，曾在中國北方多年，很留心中國的時事，頗能說幾句中國普通話，也很喜歡中國書，做幾首中國詩，所以見了我，甚是投機，時常到我家談天。他家住東京橫濱中間的大森地方，只須三五十分鐘火車就可以到了，所以我在無聊的時候，就到他家裏去談談，或是約他出去逛逛名勝，倒也可以消遣我那客中寂寞。

我住在橫濱時，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一個日本牧師，這個牧師很和氣，有一天，他對我說：「這裏有一個老朋友，名島津彌藏，他很留心中國事情，有事時，也很願意幫忙的，你願意去見見他，我可以介紹。」我自然是說好。當天就隨着這個牧師，到那朋友的家裏，誰知這位有心幫助的朋友，正是病在垂危，臥床不起之時，因為他染着癆病，已經奄奄一息了。牧師就在他的床前，把我的經歷情形大略告訴他，並且對他說：『因為你很注意中國時事，所以我介紹這位陳先生來見你。』島津彌藏那時候，病勢已沉重，不能多講話，惟有點頭會意，露出一片欣悅之色，又很像很覺抱歉之意。我們不好久留，就告辭出來。往後，因為並沒有繼續來往，我也逐漸把他忘掉了。

數月之後，橫濱會員見空氣緩和，心神略定，又要我搬回橫濱來。有一天，有一個日本人拿了一封曾根俊虎的

介紹信來見我，我把他請進來，再把信拆開一看，知道來的日本人是宮崎寅藏，談了半天，遂知道宮崎寅藏是島津彌藏兄弟，島津彌藏本來叫宮崎彌藏，因為自幼出繼在外，所以用承繼人家的島津二字為姓。

當島津彌藏見着我的時候，宮崎寅藏正在暹羅，有一天，接到他哥哥的信，說有一個中國革命黨重要人物留寓日本橫濱，時不可失，你須趕快回來，宮崎得信，就從暹羅回到日本，來見他哥哥。那知道生癆病的島津彌藏已等不到宮崎回來，在前幾天死去了，當時島津寄宮崎的信，並未註明中國革命黨重要人物是誰。家在那裏，宮崎摸不着頭腦，雖然不時探聽，總沒有方法可以探聽出來。

數月之後，有一天曾根俊虎的母親做壽，宮崎和曾根都是注意中國時事的人，所以本來就有一點相熟，這一天曾根請客，宮崎亦在被請之列。其時他也請我，不過因事未往。在曾根的意思，很想趁這個機會，介紹我認識宮崎，後來見我不到，他就在席上把我的大略告訴了宮崎。宮崎聽得，回想到他哥哥信上的話，不勝之喜，就說：「好極了，我正在要找這個人。」隨將以前的經過說明，向曾根要了介紹信，問明住址，他就即日找到我家裏來。

宮崎見了我，如獲珍寶，暢談了一兩點鐘。他說：「我已和人約定，馬上要到香港去，所以不能多談，等到回到日本來，再圖快敘罷。」我當時聽見他談到香港去，就寫了幾封信給他，介紹他幾個在香港、澳門、廣州的革命同志。我為什麼要寫這幾封介紹信呢？我想我們的革命黨，預備把中國大事負擔起來的，如果在國內竟沒有共談的人，豈不是被人起疑嗎？但是話雖如此，當時在國內實在沒有幾個人，所以我那時介紹的，只是略能談談革命的人罷了。

我當口由東京還回橫濱，其中還有一個緣因要略為敘述：因那時馮鏡如在橫濱和一家日本印刷店，訂了一張合同，要他代印一部英華字典。但是馮鏡如是一個普通商人，不說他中英文字的根底如何，又那裏有工夫編輯什麼書籍，但是合同已訂好，書又編不出來，印刷人日日來催稿，所以纔想到我來，就請譚發到東京來找我替他幫忙。起初還託言橫濱朋友因老遠不見要請我到橫濱敘敘，如是者接二連三的要求了三四次，我不好推却，就答應了他，實則我心裏亦很願意見他們的風色如何，好再着手進行我的事，因此就同譚發再回橫濱去。（我遷居東京之後，那稍為關切的會員中間也曾到東京見面談談；惟馮氏弟兄，似未嘗到過。）

我到馮鏡如店裏，他已經辦好了酒筵相待，我心裏很爲高興，亦甚感激。席半他方才講出同日本人訂約的情形，最後說這件工作，非得我答應不可。我聽了他話，才明白今日的來意，心裏本不願意擔任這項工作，但想到前途的生活很爲可危，我家裏本來並不寬裕，自從做了革命黨之後，家裏受累不淺，更是不能不理我了，而那時我在日本，手上已空，本來有爲外人傭書覓食之意，現在馮鏡如如此着急，誠意求我幫助，答應下來，亦算是一舉兩得，因此就在席上應允了。數日後遷回橫濱，日間替他消磨了幾點鐘工夫，每個月底得他幾十塊錢，應付我的開銷。

當時，馮鏡如因欲便於編纂，還要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店內，在那裏食宿。前後大約費了十個月的工夫，英華字典就脫稿。這稿既係馮鏡如出錢編纂，自然是用馮鏡如的名義出版，出版後銷路還好。但此書未脫稿之前，馮鏡如的文具店失火，全間燒燬，我已另外租了一間小房子，一人住下來了。

不久，孫先生從倫敦脫險出來，離開英國，經美國加拿大，乘皇后船來日本，到橫濱登岸。天還沒有亮，他到我家裏來，我還沒有起來，我在報上和孫先生的信中，知道他避難的詳情，又早已接到他的信，要來日本。見面之後，真覺得異樣快樂，他從死裏逃生，今日能再相見，豈是偶然的嗎？

孫先生到日本之時，我正想整裝南下，到臺灣一行，把我的意思同孫先生商量。我說：「我兩人困守一方，無從發展，不是一個辦法。現在你既然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事情就可由你管理，我想趁此時機，到臺灣去一次。自從甲午戰敗，滿清政府把臺灣割給日本之後，年來不知攪到怎樣一個地步，我沒有到過臺灣，我倒要前去觀察觀察，那裏我有一個日本朋友約我去看他，我能够在那裏活動活動，或者可以把那裏的中國人聯絡起來，發展我們的勢力，豈不較勝呆住在這裏。」孫先生深以爲然，從此我就別了孫先生一人南去。

孫先生住在我的房子內，倒也很好，又因當時駐橫濱的中國領事，是一個自了漢，不會與我們爲難，所以馮鏡如幾個人，也就依舊高興幫同孫先生重新活動起來。

有一天，宮崎把香港的事情辦妥，再來橫濱，到我家裏來（那時我已到臺灣去了）。當時時光很早，孫先生還沒有起來，聽得有人叩門，就披衣出來相見。宮崎見了，說明來意，孫先生說陳某已往臺灣，宮崎大爲失望。及問孫先生姓名，孫先生對他說了，他眼前見面的人，就是革命黨的大首領孫逸仙，又高興得了不得，當面說明一向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二月二、三日

五一〇

慕的話，並把從前訪我的事實來意，詳細說出。孫先生早從我這裏知道這般事由，知道他就是宮崎寅藏，也非常快樂。就請他坐下，自己進房盥洗，重新出來，同他談了半天。從此以後，宮崎就不絕的到橫濱來見孫先生，又請孫先生同到東京去，介紹他生平最佩服的一個前輩犬養毅。

後來犬養毅又介紹孫先生認識一個進步黨員平岡浩太郎。平岡是九州福岡煤礦的主人，家裏很有幾個錢，甚愛慕孫先生之為人，遂請孫先生到東京居住，好多認識幾個政客偉人，所謀更加活動。並且知道孫先生境況不佳，所有房飯各費，悉由他一人負擔。又因為孫先生一個人在東京起居不便，就請宮崎的朋友平山周作伴，照料一切，兩個人住在一起，門上的名稱，也就用平山周三字。孫先生不懂日本話，平山周能略解英文，還可靠他當翻譯。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二三。

註二：同註一，頁三〇。

註三：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十八——二三。

二 日（一月十六日） 清廷以許振禕為廣東巡撫。

清廷調河東河道總督許振禕為廣東巡撫；以河南巡撫劉樹堂兼署河東河道總督。（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八一，頁三四五九（原頁二）。

三 日（一月十七日） 清廷從張之洞請，在南洋創辦自強新軍，及興辦金陵、上海、蘇州、杭州鐵路，並辦理郵政。並命劉坤一廣續成之。

先是，之洞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奏陳南洋現創辦之自強新軍共二千餘人，由德人管帶操練；並陳請興辦金陵至上海，蘇州至杭州之鐵路，及辦理郵政。清廷乃於本日諭曰：

「電寄張之洞：據奏南洋創辦新軍，責成洋將操練；並金陵、上海興辦鐵路各摺，均照所請行。惟洋將是否上等之材，薪水尚宜斟酌。張之洞既經創辦，條理秩然，即交劉坤一廣續成之，以為補牢之計。至郵政一節，業經總

署籌議，確有頭緒矣。」（註一）

附錄：

一、張之洞撰「選募新軍創練洋操摺」（註二）

竊臣前因海氛粗定，憤兵事之不振，由錮習之太深，非認真仿照西法，急練勁旅，不足以爲禦侮之資；擬在江南練陸軍萬人，而以洋將管帶操練，其經費在江南自借洋款項下撥用，於本年閏五月二十七日具奏，經部議復准咨行在案。查自津調來之北洋原訂德國將弁，並由臣商託出使大臣許景澄代訂之德國將弁，共三十五員，自夏秋至今，均已先後到齊，臣於夏間，令先就衛隊、護軍等營內，選擇操練，以試其材，數月以來，頗有成效可觀，亟宜選募新軍，刻期訓練。查今日練兵，必須改用洋操者，其故有七：承平之時，綠營有積習；軍興以後，勇營亦有積習。人皆烏合，來去無恒，不練固無用，練成亦不能禁其四散，徒勞無功，一也。星居不確，良莠難分，二也。無論征軍、防軍，從無不缺額之事，即其實有之勇，亦多係安置閒人，令當雜差，則雖不缺額，亦與缺額同，三也。層層刻扣，種種攤派，長夫視爲津貼，營官皆有例獻，將擁厚賞，上不宿飽，四也。外洋新式快槍、快礮，精巧非常，舊日將領，大率不解，亦不愛惜，粗疎者任意拋擲，動致損壞；謹慎者收藏不用，聽其鏽涇，其於擦拭、拆卸、裝配、修理、測準諸事，全不講求。將弁不知，何論兵勇？操練不能，何論臨陣？五也。營壘器用，但守舊法，繪圖、測量、行軍、水陸工程諸事，尤所不習，討內匪則可，禦外侮則不能，六也。營官統領專講應酬、奢華、佚情，用費繁多，營謀詭託，無所不有；既視爲營私謀利之路，豈尚有練兵報國之心，七也。惟有改以洋將帶之，則諸弊悉除，無論將來臨敵之效若何？總之額必足，人必壯，餉必裕，軍火必多，技藝必嫺熟，勇丁必不當難差，將領必不能濫充，此七者軍之體也。至於臨陣調度運用之妙，賞罰激勵之力，軍之用也。凡事必其體先立，然後其用可得而言。夫中國豈無智勇之將，敢戰之兵，臨戰運用，又豈能拘守繩墨，特以各營積習錮弊，深入膏肓，若不捐棄舊法，別開局面，雖事前日加申儆，終無大益；事後加以誅戮，已難補救。此一軍練成，則此項洋將弁移以教第二軍，而此軍漸令華官將弁帶之，規矩既定，數年以後，相沿成例，將弁兵勇，皆視爲固然，則短扣廢弛之弊，無白而萌；即他營將弁，或亦可觀感愧厲，舍舊圖新，此微臣必改用洋將練洋操之微意也。臣詳加籌畫，現擬先練二千數百人爲一軍

，照洋法分爲三十營，即名爲自強軍。俟成軍半年以後，操練已有規模，即行推廣加練，酌增人數一倍，統以增至萬人爲止。如屆時餉鉅難籌，則至少亦必須增至五千人。茲就江蘇之淮、徐、邳、海四府州，安徽之鳳、泗、滁、和、太平五府州，及江甯府屬之六合、江浦兩縣，常州府屬之宜興、荆溪、江陰、靖江四縣，鎮江府屬之丹徒、丹陽兩縣，民氣較爲強壯者，每府州各募一營，取其距金陵皆不甚遠，年籍身家易於清查，以杜遠省招募淆雜、勞費、遣散、流落之弊，而各處分練，冀以廣開風氣，此即略寓西洋、東洋，舉國之民，人人皆可爲兵之意。各營皆選擇土著鄉民，年在十六歲以上，二十歲以下，體氣精壯，向不爲非者，取具族鄰團董甘結，聲明情願效力十年，只准開革，不准辭退，凡城市油滑向充營勇者，一概不收。更用西醫驗其身軀，壯健並無隱疾，目光及遠者，厚給餉糈，編爲新軍；至一切飯食肉食，冬夏衣履，居住房屋，西法均由官爲籌備。蓋洋操勤苦嚴肅，毫無通融，若非飽暖強健，斷不能勝此勞苦。夏間初派營勇練洋操時，不過旬日，即以畏勞紛紛辭退，後允以加給餉費乃止。若照舊日餉章，必無肯應募者，自不能一律仿照辦理。委派洋員德國遊擊來春石泰爲全軍統帶，其營官、哨官均以洋將弁爲之，別設副營官、副哨官名目，選武職中壯健有志，不染習氣者爲副營官，選天津、廣東兩處武備學堂出身之學生爲副哨官，其帶兵操練之權，悉以委之洋將弁，而約束懲責之權，則專歸華官，一以通新募勇丁之情，二以事權互相維繫，三以逐漸觀摩，俾華弁儲營官統領之材，若洋弁不敷派充哨官，則選學生中之出色者補之。並派候補知府沈敦和，奏調差委知府錢恂爲自強軍洋操提調，爲之經理各事，一切仍歸營務處考核約束，其部伍人數，俱照德國營制計：現設步隊八營，營二百五十人，分爲五哨；馬隊二營，營一百八十騎，分爲三哨；礮隊二營，營二百人，分爲四哨；工程隊一營，營一百人。西例隨營有醫官、槍匠、獸醫等項，俟次第添設。現除雜役人等不計外，共馬隊、步隊、礮隊十二營，工程隊一營，江北人較強健，練爲馬步各隊，江南人較聰穎，練爲礮法、工程各隊。實數勇丁二千八百六十名，大約此係德國軍制，每一軍人數四分之一正勇餉銀，每名每月給官鑄銀元五元，合庫平銀三兩六錢，勇目遞加，其官給飯食衣履等費在外。洋員薪水，外洋訂有合同，華官副營、副哨既無絲毫濡潤，亦無公費名目，酌量優給薪水，俾足自瞻效力，計長年額支華洋兵將餉薪衣食等項約須四十四萬兩有奇。餉數雖多，洋將弁薪水雖鉅，然數足而藝精，一人必可抵舊日營勇兩人之用，其發餉以洋將會同另派之委員當場給發，不歸該

營華將華弁，專用銀元，永無平色參差分兩短少之弊，其詳細餉費章程另行咨部立案。若建造營房、馬棚、操場等項，動用一次者，尚不在內。方今財用支絀，諸事自必力求撙節，惟既仿外洋營制，自必處處得其精意之所在，又不敢稍事刻鵠，徒貽訕詆適履之譏，以致辦理棘手，有名無實。至於應敵攻守之方，圖繪測量之學，悉令詳教熟練，不准徒襲口號步伐之皮毛，致蹈向來洋操陋習。臣當督率華洋官弁，認真訓練，隨時親往考察校閱，俾成有用勁旅，以仰副聖主奮武自強之至意。

一、張之洞撰「籌辦江浙鐵路摺」（註三）

竊惟外洋鐵路要義，利兵利商，兩端並重。盧漢幹路南北貫通，兵商兼利，此中國鐵路之大綱，現已奉旨定計興造，招商承辦，此外尚有上海分走江浙，直達金陵一路，關繫重而利益多，自亦以亟籌興造爲宜。查此路由吳淞口起，以達上海縣，由上海縣以達蘇州，由蘇州以達鎮江，由鎮江以達江甯；另於蘇州，橫接一枝，以達杭州。所歷皆富庶之區，貨物本蕃，行旅本多；加以內地新准通商，凡機器生料之運載以入，要夫製成貨物之運載以出者，皆將絡繹不絕，悉心核計，獲利必豐。或謂內河既准行輪船，則傍河建路，恐無大利，不知貿易日盛，則行人之往來亦日多，重大貨物宜水，輕貨與行客宜陸，固有並行不悖者。即如德國來因河，大川千里，輪船暢行，然河之東西兩岸，火車來往如織，晝夜不絕，可爲明證。況滬、蘇、杭一路，河輪之利，各國共之，鐵路之利，中國專之，尤可隱杜外國小輪之害，此利於商者也。自去年東洋有事以來，蘇、杭、松、滬，處處皆距海不遠，處處皆係精華，不能不力籌保衛，兩省增營增械，繁費實多，設一旦有警，將欲調兵運械，亟謀援應，而海道梗阻，不能出口，內河民船，行走紆遲，必致貽誤事機；若各處皆宿重兵，斷斷無此兵力財力，儼鐵路既通，則金陵、蘇杭、上海聯爲一氣，外遠內近，可以隨方策應，互爲聲援，省兵省餉，赴機迅速，此利於兵者也。不惟此也，金陵平定已經三十餘年，元氣至今未復，民生蕭索，城市空曠，毫無振興之機，此地乃東南都會，長江門庭，豈可任其頹廢貧耗，不加振作，鐵路一通，則商賈走集，民物繁滋，三年必然改觀，十年可臻富庶；且江甯爲南洋大臣所駐，交涉之日多，加以蘇杭通商，事皆創始，而距滬、蘇頗遠，距杭尤遠，消息不靈，遙度豈能中肯，因應尤難應機，況南洋大臣以商務爲職，而金陵城內，但有仕宦之家，絕無大宗貿易，以致商情隔閡，振興無由，鐵路成則耳目既廣，盈

處易知，掣引既便，因應尤速，可以開無數之利源，弭無窮之嫌舛，此尤有利於民生、洋務者也。此路道途平坦，並無高山大河，既無鑿山踰嶺之艱，亦少橋梁衝激之患，成功較易，見效較速；數月來，洋商勸開此路，情願借款，營謀代造者甚多，其有利益可知。現擬分五段籌辦：以吳淞至上海三十餘里爲一段，上海至蘇州將近二百里爲一段，蘇州至鎮江約三百里爲一段，鎮江至金陵一百八十里爲一段，而由蘇至杭約三百里另爲一段。鐵路必取直線，較水路紆折爲近，統計江浙，此路不及千里。地平河通，施工運料，皆不甚難，約略估計，每里當在萬金以內。此路既分段辦理，籌款尚不爲難，東南商富，熟悉洋情，習知鐵路利益，一聞江浙定議造路，明知工省利鉅，聞風踴躍，其擬請集資承辦者頗多。現擬吳淞至上海三十餘里，歸官創辦，以開其端。查吳淞口沙線膠舟，必須乘潮出入，海輪剝載進口，甚爲不便，故近年來洋人屢有疏濬吳淞之請，此次日本議約時，日本人亦曾議及。此市情瞬息變易，商賈意在從速，若自馬頭上鐵路，即可徑達內地各要區，其旺可知。其自上海以內之路，現擬通盤籌議，將由滬至蘇一段，及由蘇至鎮一段，一歸官辦，一歸商辦，或官商合辦，統俟籌款確實後，妥酌辦理。其自鎮至甯，自蘇至杭兩路，或官辦，或商辦，續行籌議，此時籌一段之款，先造一段之路，成一段之路，先收一段之利，不比他路，必須全局修成，始見利益也。臣自疊次電奏後，即經派委江蘇候補知府沈桓，知縣沈翹清，會同洋工師錫樂、巴克勤博等，測勘蘇滬一路；候補直隸州汪喬年，會同洋工師馬悅、戴維禮等，測勘甯鎮一路，分頭並舉，刻下蘇滬一路業已勘畢，甯鎮一路，初勘已畢，仍令覆勘，現正繪畫蘇滬細圖，細圖一成，便可估價動工。總之鐵路一開，百廢俱興，人貨運載爲有形之利；風氣開通，才智增長，工商奮興，窮民有業，上下情通，百事迅速，爲無形之利。其收運費，有形之利者猶小；而收振作，無形之利者乃大。故無論官辦、商辦，均屬有裨大局，其官路、商路互相銜接，將來如何計里分利之法，當俟定議後妥爲籌計。

三、請辦郵政片（註四）

再泰西各國，視郵政一端，重同鐵路，特設郵政大臣，比於各部尚書，以綜厥事，遞送官民往來文函，取費甚微，獲利甚鉅，日盛一日；即以英國而論，一歲所收之費，當中國銀三四千萬兩，各國通行，莫不視爲巨帑，且權操於上，有所統一，利商利民，而即以利國。中外通商以來，英、法、美、德、日本五國，先後在上海設立彼國郵

局，其餘各口岸，亦於領事署內，兼設郵局，侵我大權，攘我大利，實有背於萬國通例。光緒十一年間，前升任浙江甯紹臺道薛福成，據委員李圭條陳，譯有章程，稟請中國自行設局，以挽利權，並經稅務司葛顯禮前往香港、日本向彼中商議收回上海所設英、日兩國郵局，已有端倪，事屬可行。原任南洋大臣曾國荃，曾據咨總理衙門，飭令總稅務司赫德，議復辦法；赫德亦謂此舉裕國便民，並係辦得到之事，陳有要端七層，均甚詳晰；並稱須有奏准飭辦之明文，使各國知係中國國家所設之郵政，即可商令各國將在中國所設之郵局撤回，並可商入萬國信會之舉各等語。查各關試辦郵遞有年，未見大有起色，推行亦未及遠，外國在各口所設信局並未裁撤，良由稅關所設之郵遞，與國家所設之郵政，體制不同，外人有所藉口而不撤局，故推廣辦法每多窒礙。現經臣飭調葛顯禮來江甯與之面加籌議，該稅務司力申前請。查此事該總稅務司考究有年，情形熟悉，且各關稅務司熟諳郵政辦法如葛顯禮者當不乏人。相應請旨飭下總理衙門，轉飭赫德妥議章程，大舉開辦，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兼及內地水陸各路。務令各國將所設信局，全行撤去，並與各國入會，彼此傳遞文函，互相聯絡。如果中國郵政認真舉行，各國在華所設信局，必肯裁撤，此本各國通行之辦法，實屬有利無弊之勝算，誠理財之大端，便民之要政也。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八一，頁三四六〇（原頁四）。

註二：張文襄公全集，卷四十，頁一一五。

註三：同註二，頁五一八。

註四：同註二，頁八一十。

四 日(二月十八日) 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面告恭親王奕訢、翁同龢，謂清廷派王之春為加冕賀使不稱，請改派宗室王公或大學士前往。

翁同龢日記記其事曰：

「午正，俄館拜年，余與恭邸同往。……喀希尼言加冕賀使之不稱，請以宗室王公或大學士往，余與恭邸權詞答之。彼云：實無他意，不過欲尊中國朝廷耳！……」（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二月四日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90，頁七三八三、七三八四。

十六日（元月三十日） 李鴻章與日使談判由中國政府派留學生赴日留學。（註一）

王文韶及督辦軍務處擬招琅威理再度來華服務，琅以中國無擴軍之需意，辭不來。

王文韶及軍務處有復召琅威理來華意，琅任職清廷駐英使館參贊，語英人馬格里：「往年鴻章對彼之擴軍計劃以化錢太多予以擱置。鴻章並謂：『中國是一個保守國家，所以計劃亦須保守。』今中國願付賠款，而更無誠意擴軍」。辭不來，琅威理請英人對中國多加探究。（註二）

註一：「字林西報」，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註二：Life of me Cartney D. C. Boulger, p. 451.

二十五日（二月十日） 清廷命赴俄專使王之春暫緩起程，仍在鄂候旨。（註一）

先是清廷既派王之春為專使，致賀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俄使喀西尼「以王之春位望未隆，於各國遣使相形，難於接待。」（註二）其意在李鴻章。蓋非鴻章不能辦理機密事件，擔當交涉重任也。本月二十四日，御史胡孚宸之上奏，亦認為王之春「資望太輕，似宜派李鴻章前往致賀。」（註三）故本日乃有是命。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八二，頁三四七五，（原頁一四）。

註二：「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九，頁五一。

註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九，頁二五。

二十七日（二月十日） 清命改派李鴻章為正使，邵友濂為副使，往賀俄皇加冕。

清廷諭曰：

「明年四月爲俄君加冕之期，著派一等肅毅伯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前往俄國致賀，以重邦交。」（註一）

又諭曰：

「明年四月初，爲俄君加冕之期，已派李鴻章爲正使，前往致賀。前任巡撫邵友濂，熟于俄事，著即授爲副使，以輔其行。該前撫接奉此旨，即日馳赴上海，俟李鴻章到後，一同啓輪。途長期迫，不可就延。其由籍啓程日期，並即迅速電覆。」（註二）

清廷命張蔭桓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日使林董繼續妥議通商事宜。

中日雙方自本年七月間會商中日通商行船約章以來，瞬屆半載，迄無結果。至是，因李鴻章已奉使俄之命，清廷乃改派張蔭桓爲全權大臣，繼續議商，諭曰：

「大學士李鴻章現在出差，尚書銜戶部左侍郎張蔭桓，著作爲全權大臣，與日本使臣林董，妥議通商事宜。」

（註三）

按：日方曾于七月間提出約稿共四十款，（註四）細察其內容，可謂不平等條約之標本。其後雖再經中日雙方全權多次會議，但于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簽定之正式商約，（註五）與原約稿並無太大出入，此後將近四十年之中日商務關係，悉依該約辦理，迄未修改。中國人民之受其毒害，亦云深矣。

註一：「清德宗實錄」四，卷三八二，頁三四七七（原頁十七）。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原約稿條文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一，頁一九。

註五：正式商約條文見同上書，卷一三一，頁二一。

二十八日（二月十一日）韓王以不堪日本之威脅，潛奔俄使館，謀斥親日大臣。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五一八

先是，自本年八月間，閔妃被弒之後，外戚之患雖去，而親日派氣勢轉強。是後舉凡政令，盡出親日派之手。本月初，且有新黨將謀篡弒之傳說，韓王不能自安，乃潛通俄使，遂于本日率世子出宮，潛奔俄使館，揭開日俄爭韓之序幕。（註一）

註一：蔡爾康：「中東戰紀本末」，卷四，頁七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西曆一八九六年）

正月

春 孫先生文在檀香山，加強「中西擴論會」，舉辦練兵會，並以隆記報為機關，擴充革命組織。

孫先生抵檀香山後，與其長兄德彰傾談廣州首義失敗經過，德彰勗先生不必氣餒，應再接再勵，奮鬥到底。先生旋赴檀島正埠整理黨務，蓋廣州起義新敗，舊日同志，多有灰心者，是以會務遲滯。所幸者，同志何寬等，前於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發起「中西擴論會」藉以研究學術，交換知識，會員衆多，且多兼為興中會會員，曾舉先生為名譽會長。此次先生來檀，「中西擴論會」會員極表歡迎，且邀請演說，先生為之振奮，因決定擴組「中西擴論會」，並以隆記報為機關，招納同志，擴大組織，革命風氣為之復振。先生並為訓練革命幹部，以便將來回國參加革命，乃假 Camplain Lane 一六〇號，芙蘭諦文之尋眞書院操場，舉辦軍事訓練，每週操練二次，同志中參加操練者有數十人。先生同時並發動募集軍費，得美金六千元。蘇德用「國父革命運動在檀島」一文記其事云：

「國父到了檀香山，立刻去謁德彰公，告以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的經過，德彰公毫不遲疑的加以溫慰：『這算不得一回事，不要氣餒，還應繼續幹下去！』此時楊太夫人盧夫人與孫科得翌亨鄉人陸燦（又名文燦）護送至檀，居茂宜，一家團聚，尚足自慰，但國父大部份時間還是在檀正埠，以便聯絡同志，所以國父在倫敦蒙難記中有云：『由橫濱乘輪赴哈威夷羣島，就寓於火納魯魯，火納魯魯多予之親故及同志，相處甚歡。……』」

時以新敗，檀島僑胞雖有聞道而赴義者，但舊日同志，多表灰心，進行頗為困難。幸而當時有兩個團體，給革

命帶來了轉機：一爲中西擴論會，一爲隆記報館。中西擴論會成立於光緒十九年，爲何寬、鄭金、程雨亭、黃慶培、藍從真、程官有、何福、陸燦、葉桂芳、程禹臣等所發起，設於隆記報館內，何寬爲隆記報記者，報館爲華僑文化的中心，以是有志的青年皆集中於隆記，工餘之暇，或採訪新聞，或高談雄辯，一片朝氣，於是組織團體，取名『中西擴論會』，藉以研究學術，交換智識，一時參加者甚衆。後來大多加入興中會爲會員，國父曾被舉爲名譽會長。國父再來檀島，中西擴論會歡迎登岸，且邀請演說，在精神上給予國父極大之鼓舞，國父曾在該會報告國情及革命宗旨，故檀島贊助革命事業者，以中西擴論會員最爲熱心，捐輸軍餉者，亦以該會人士出力最多。

隆記報館爲檀香山第一家中文報館，一千八百八十一年程蔚南所創辦，初期之編輯爲林鑑泉，記者何寬，繙譯李昌，此皆爲興中會員。國父遂以隆記報館爲本黨機關，招納黨員，籌商進行，以謀推廣興中會，從此黨員日見增加，革命之風，爲之一振，曾在該報館舉行會議多次。李昌學貫中西，爲當時中堅份子，協助國父尤多。

興中會會員都是青年有志之士，熱血滿胸，衆以將來回國參加革命，或須實際參加作戰，乃假 Campain Lane 一六〇號美蘭諦文之尋眞書院操場，舉辦軍事訓練。聘一丹麥人曾任中國南洋練兵教習隊長名柏 (vicior Bache) 者，義務任教，每星期操練二次，兵操時間均係於早晨及晚上，以木棍代槍，每次會操，步伐整齊，one two, one two 之聲不絕。會員中受訓者，有葉桂芳、鄭金、鄭照、許直臣、杜守傳、程展臣、陸燦、何早等，均在操練之列。

國父同時發動募集革命軍費，數月之間，得美金六千元，這個數目，在當時已屬驚人，因爲華僑一般的經濟狀況，並非特別富厚，而此次革命挫折之餘，居然於短期間募得巨款，足見僑胞贊助革命之熱忱。」（註一）

註一：蘇德用：「國父革命運動在檀島」，載「國父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

二 日(二月十四日) 清廷命邵友濂、王之春毋庸前往俄國。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四月十四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駐俄公使許景澄先於二十一年八月十日函告總署，以中國誼尚睦鄰，自當循案致賀。清廷乃於十一月十三日電派前所派弔唁俄皇

亞力山大三世專使王之春爲專使，就近前往致賀。駐京俄使喀西尼以「王之春位望未隆，與各國遣使相形，難於接待」爲詞，加以拒絕，（註一）其意在李鴻章，蓋非李鴻章之威望權位，不能擔當其所希望之交涉重任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改派李鴻章爲正使，邵友濂爲副使，前往致賀。邵友濂不欲往，求南洋大臣張之洞代爲懇辭。本日，清廷乃電諭曰：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王之春，現派李鴻章出使俄國，王之春毋庸前往，著即回任。」（註二）

「電寄張之洞，電悉。邵友濂病既未痊，即著毋庸赴俄，著張之洞傳諭知之。」（註三）

註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九，頁五十一，李鴻章懇辭使俄摺。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三八三，頁二。

註三：同註二。

四日（二月十六日） 翁同龢訪晤李鴻章，請藉使俄之機，密結外援。

本日，翁同龢與李鴻章密談，翁主朝鮮自主，趁鴻章赴俄之便，密結外援。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丙申年，頁二。

九日（二月二十一日） 謝讚泰在香港與康廣仁商洽合作。

本日，興中會會員謝讚泰應維新派陳錦濤、梁瀾芬之宴，初識康有爲之弟廣仁於香港品芳酒樓。席間，謝痛言兩黨必須聯合救國之道，廣仁極首肯。（註一）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四三。

十日（二月二十二日） 清廷派李鴻章出使俄、英、法、德、美五國親遞國書大臣，並命其子李經述隨侍前往。

李鴻章自甲午戰後，歸居京師，爲言官交論之對象，鬱鬱不得志。本年（一八九六）四月十四日俄

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清廷乃於去年（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電派王之春爲專使，但爲俄國所拒，其意蓋在李鴻章。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改派李鴻章爲正使，鴻章當日上摺懇辭，朝廷未准。本日，諭派李鴻章爲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致賀，並順道往英、法、德、美四國親遞國書，聯絡邦交。且以鴻章年逾七旬，特命其子李經述以三品銜隨侍前往。諭曰：

「一等肅毅伯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著授爲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致賀俄君加冕，典禮隆重，故特命爾遠行，爾其仰體朕意，聯絡邦交，敬慎行事，參隨各員聽爾酌調，以期辦理妥協，毋負委任。特諭！」（註一）

「一等肅毅伯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著授爲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英法德美四國，親遞國書，奉宣德意，皇華遣使，責任綦嚴，爾其善體朕意，聯絡邦交，毋負委任。特諭！」（註二）

「旨大學士李鴻章奉使過行，精神穩固，惟年逾七旬，遠涉重洋，朝廷良深慮系，伊子李經述著賞給三品銜，隨侍前往，以示優眷。」（註三）

李鴻章受命後，以其長子李經方「幼曾兼習西國語言文字，嗣充駐英參贊，游歷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於各國風土人物往來道里，均所熟習」，奏請加派前往，旋奉旨一並隨侍。（註四）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〇，頁一一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九，頁五十五，李經方隨行片。

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 劉坤一回兩江總督本任，張之洞交卸。

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諭劉坤一著回兩江總督本任，張之洞著回湖廣總督本任。本日，張之洞將兩江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暨通商欽差大臣關防等，齎送劉坤一接收。（註一）張之洞旋於一月二十八日回湖廣總督本任。

註一：「張文襄公全集」，卷四三，頁三〇。

二十一日(三月四日) 香港政府頒令禁止孫先生文在港居留，為期五年。

香港政府以孫先生與其黨人在港組織革命團體，有反對滿清政府之行爲，藉口對於香港地方治安與秩序均有妨害，乃依據一八八二年第八號放逐出境條例第三條規定，下令放逐出境，自本日起，以五年爲期，禁止孫先生在香港居留。(註二)

清廷從總理衙門奏，就強學會改設官書局，選刻中西各種圖籍，並選譯外報印行，以增新知。

先是強學會遭封禁後，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御史胡孚宸以書局有益人才，奏請解禁。其原奏曰：

「京師近日設有強學書局，經御史楊崇伊奏請封禁，在朝廷預防流弊，立意至爲深遠。惟局中所儲藏講習者，首在列聖聖訓及各種政書，兼售同文館、上海製造局所刻西學諸書，繪印輿圖，置備儀器，意在流通秘要圖書，考驗格致精蘊。所需費用，皆係捐貲集股，絕無迫索情事。所刻章程，尚無疵謬。此次封禁，不過防其流弊，並非禁其嚮學，倘能廣選才賢，觀摩取善，此日多一讀書之上，他日即多一報國之人，收效似非淺鮮。請旨飭下總署及禮部各衙門，悉心籌議官立書局，選刻中西各種圖籍，任人縱觀，隨時購買，並將總署所購洋報選譯印行，以擴見聞，或在海軍舊署開辦，經理既善，流弊自除，庶於國家作育人材挽回時局之本心不相刺謬。」(註二)

此奏呈上後，經總理衙門大臣議奏，援照八旗官學成例，就強學會改建官立書局，延聘通曉中西學問之西人爲教習，常川駐局，專司選譯書籍、報紙，並指授各種西學，其所需經費，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出使經費項下，每月提撥銀一千兩，以備購置圖書、儀器，各國新聞紙及教習、司事、繙譯薪水等用。其原奏曰：

「維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繫乎學校。古者家塾黨庠州序國學，自諸侯以達王畿，莫不建學。大

而德行道藝，細而名物象數，綜貫靡遺，是以人才日盛。近世學者，往往避實就虛，舍難就易，視西人一技之長，一能之擅，或斥爲異學，或詭爲新奇，不知西人之學無不以算學爲隱括，西算之三角與中算之勾股理無異同。周髀經曰：圓出於方。又曰：方數爲典，以方出國。言國之不可御而馭之以方，西人三角八線之法實基於此。餘若天學化學氣學光學電學重學礦學兵學法學聲學醫學文字製造等學，皆見中國載籍。試取管墨關列淮南諸書以類求之，根原具在，可知西學者，中國固有之學，西人踵而行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耳！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計有三事：曰學校，曰新聞報館，曰書籍館，英、德、法、俄各國學校之盛，或二三萬所，或六七萬所，生徒率皆二三十萬人，美國學校多至十七萬餘所，生徒幾及千萬人。學校費用，自三四千萬以至八千餘萬不等，率由國家及生徒各出其半，各國富強之基資本於是。是庶政由人才而理，人才由學術而成，固有明效大驗。該御史請將強學書局改歸官辦，自係爲講求實學培養人才起見。臣等公同商酌，擬援照八旗官學之例，建立官書局，欽派大臣一二員管理，聘訂通曉中西學問之洋人爲教習，常川住局，專司選譯書籍各國新報及指授各種西學，並酌派司事譯官，收掌書籍，印售各國新報，統由管理大臣總其成，司事專司稽察。所需經費，由總理衙門於出使經費項下每月提撥銀一千兩以備購置圖籍儀器各國新聞紙及教習司事繙譯薪水等用，核實散放。年終由臣衙門奏銷，毋庸招股集貲。設不敷用，再由臣衙門設法籌措。如有慕義之士，願借鉅款或捐書籍，准由司事呈明管理大臣酌定核收。至建設學舍地方，或假官房，或租民宅，取足教習各官起居之地，衆爲士大夫入觀羣書之所，因地制宜，妥籌布置。該御史所請就海軍舊署開辦之處，應毋庸議。如蒙俞允，再由管理大臣詳定章程，定期開設。」（註三）

本日，清廷依總理衙門奏，設官書局，派工部尚書孫家鼐爲管理書局大臣。孫家鼐督辦官書局後，卽與原辦書局諸人，悉心籌劃，草擬開辦章程。

註一：陸丹林：「孫總理在香港」，載「大風月刊」第八十八期。

註二：光緒朝「東華續錄」(四)，頁三七二〇，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三：同註二。

二月

七日(三月二十日) 清廷開辦郵政，以總稅務司赫德(Hart)管理之。

中國創辦新式郵政之動機，遠在清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其時因天津條約規定，駐京各公使館之信使往返，由中國政府代為負責。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起，改由總稅務司署辦理。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後，始收寄普通人民信件。初僅往來京、滬之間，二年後，復開設北京、天津、煙臺、牛莊、上海五處送信官局，辦法仿效歐西，是為我國郵政試辦之始。惟自試辦以來，既未經明文奏准，又無確定章程，不能謂正式郵局，而外人初藉口我無郵政，私設郵局於通商口岸，繼我試辦郵政後，又復謂我郵政制度不善，仍增設不已，故不能不設法抵制。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候補同知李圭，條陳浙江寧紹臺道薛福成，請創辦郵政，福成據以商之寧海關稅務司葛顯禮，葛氏深表贊同，並擬具郵政辦法十五條申復，福成乃據以呈兩江總督曾國荃，請轉咨總理衙門核議。十八年冬，總稅務司赫德致函總理衙門，亦謂數年來創辦艱難，若不奏請設立官郵政局，恐將另生枝節，並呈遞郵政章程十三條，備資參考。十九年，總理衙門又迭接南北洋大臣劉坤一、李鴻章咨呈，略謂上海英美工部局有增設各口信局之議，揆諸情勢，正式設局，不宜再緩。於是總理衙門令飭赫德討論郵政之正式成立。二十一年，南洋大臣張之洞亦亟請設立郵局。(註二) 本日，總理衙門始議定推廣海關現設郵遞，與各國聯郵，並據赫德所擬之章程由戶部入奏，奉旨依議，我國郵政遂正式成立。錄其奏文如下：

「臣衙門准署南洋大臣張之洞咨鈔擬請設立郵政請飭議章程一片。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欽奉電傳諭旨，郵政一節，業經總署籌議，粗有頭緒矣。欽此！欽遵。仰見聖上周卹商旅通志類情之至意。查原奏內稱：泰西各國郵政，重同鐵路，特設大臣綜理，取資甚微，獲利甚鉅，權有統一，商民並和。近來英、法、美、德、日本在上

海及各口設局，實背萬國通例。曾經前南洋大臣曾國荃據道員薛福成、委員李圭、稅務司葛顯禮等往復條議，咨由總理衙門飭總稅務司赫德詳議，謂此舉裕國便民，爲辦得到之事。至稅關所辦郵遞，因與國家所設體制不同，故推廣每多窒礙。現復與葛顯禮面加籌議，知其情形熟悉，各關稅務司熟諳辦法者當亦不乏，請飭總理衙門轉飭赫德妥議章程開辦，即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及內地水陸各路，務令各國將所設信局全撤，並與各國聯會，彼此傳遞文函等語。臣等查光緒二年間，赫德因議滇案，請設送信官局，爲郵政發端之始。經臣衙門函商北洋大臣李鴻章，於四年間覆稱：擬開設京城、天津、煙臺、牛莊、上海五處，略仿泰西郵政辦法，交赫德管理。嗣因各國紛紛在上海暨各口設立郵局，慮佔華民生計。九年間，德國使臣巴蘭德來請派員赴會。十一年，曾國荃咨稱：州同李圭條陳郵政利益各節，並據寧海關稅務司葛顯禮申稱，香港英監督有願將上海英局改歸華關自辦之語。經臣衙門先後飭據江海關道總稅務司籌議，咨行南北洋大臣查核。十六年三月，劉行赫德，以所擬辦法既於民局無損，即就通商各口推廣辦理，擬俟辦有規模，再行請旨定設。此該大臣張之洞所稱各稅關試辦郵遞之權輿也。臣等復查寧海、江海各關道來稟，每謂稅關郵局未經奏定，外人得以藉口。十八年冬，赫德亦以數年來創辦艱難，若再不奏請設立官郵政局，恐將另生枝節。十九年五月，迭接李鴻章、劉坤一咨，據江海關道聶緝縵稟稱：上海英、美工部局現議增設各口信局，異日中國再議推廣，必更維艱各等語。是原奏所稱體制不同，推廣每虞窒礙，誠爲洞見縝結之論。至各國通行歲收鉅帑一節，考泰西郵政，自乾隆初年，普國始議代民經理，統以大臣，位齊卿貳，各國以爲上下交便，仿而效之。光緒十九年，葛顯禮呈送萬國郵政條例，聯約者六十餘國，大端以先購圖記紙黏貼信函送局以抵信資，其費每封口信重五錢者，取銀四分；道遠酌加，其取資既微，又有定期而無遺拆，百貨騰跌，萬里起居，隨時徑達，至有事時，並可查禁敵國私函。誠如原奏所稱，權有統一，爲利商利民即以利國之要政也。又查十八年以來美國一國郵局清單一紙，所收銀圓至六十四兆二十萬九千四百九十圓之多。張之洞所舉英國收數，當中銀三四千萬兩，尚係約略之辭，利俾鐵路，誠爲不虛。且西國郵政與電局相輔，以火車輪船爲遞送。近年法國設立公司輪船十艘，通名曰信船，遇口停泊，信包未到不得開碇，其鄭重如此。中國工商，旅居新舊金山、檀香山、新嘉坡、檳榔嶼、古巴、秘魯者，不下數百萬人。據李圭稟稱，該工等有一紙家書十年不達者，緣郵會有扣阻無約國文函之例也。中國郵政若行

，即以獲資置備輪船出洋，藉遞信以流通商貨，其挽回利權，所關尤鉅。臣等博訪周諮，知爲當務之急，爰於十九年割飭赫德詳加討論，是否確於小民生計無礙。上年六月至十二月，復與該總稅務司面商屢屢，先後據其遞到四項章程，計四十四款。臣等詳加披閱，大致釐然，自應及時開辦，應請旨勅下臣衙門，轉飭總統稅務司赫德專司其事，仍由臣衙門總其成，略如各口新關規制，即照赫德現擬章程定期開辦，應裝單紙，亦由赫德一手經理，遇有應行酌改增添之處，隨時呈由臣衙門核定，務期有利無弊。至赫德呈內稱萬國聯約郵政公會，係在瑞士國，應備照會寄由出使大臣轉交該國執政大臣爲入會之據，自可援萬國通例轉告各國，將在華所設信局一律撤回。按咸豐八年俄約光緒十三年法約，本載明兩國公文信件互相遞送，中國既經入會，各國當無從藉口，以上所議，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門欽遵分別咨照割飭辦理，俟辦有頭緒，即推行內地水陸各路，尅期興辦，一面咨行沿江沿海及內地各省將軍督撫知照，屆期即將簡要辦法飭地方州縣曉諭商民，咸知利便。凡有民局，仍舊開設，不奪小民之利，並准赴官局報明領單，照章幫同遞送，期與各電局相爲表裏。其江海輪船及將來鐵路所通處所應如何交寄文信，由該總稅務司與各該局員會商辦理，官郵政局歲入暨開支款目，由總稅務司按結申報臣衙門彙核奏報。」（註二）

附錄：葉恭綽撰「中國郵政之起源」（註三）

未設郵局以前，我國通信辦法，原有驛站之制，但專爲官文書而設，民間不能享用，雖間有交由驛吏附寄者，究係較有權勢，而且爲數不多，仍非一般平民所能。於是始有私設之信局，初不過設於沿江沿海各省，同光之際乃漸及於內地，尤以大江江西兩流域爲最多。北方又有鑛局信差，亦以送物遞信爲業，此等信局鑛局取資頗廉，而寄遞穩速，故民間甚信任之。光緒年間，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建官立郵局之議，而未實行。及李鴻章爲直隸總督，始於北京、天津、芝罘、牛莊等處設立郵政局，即命赫德管理，轉遞甚靈，商民稱便。嗣後九江、鎮江兩關道又有設郵局於通商口岸之請，於是政府始決定舉辦郵政。但開辦之初，不惟所需經費不易籌撥，而辦事人員亦無從選任。後經再三議，始決定經費由海關提用，人員亦由海關徵集，於是所謂大清郵政局乃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正式成立矣。當是時郵政局雖已開辦，而所有員司每日上午八時起下午八時止，終日營營，勞苦特甚，加以經費維艱，薪資菲薄，故招募用人應者甚渺。且各處分局領袖職員必先行訓練，俾有郵務知識，始不至於貽誤，而此項訓練事務，

亦須由赫氏兼辦，因是種種，開辦之始進步甚遲。且是時驛站仍隸兵部，雖議裁撤，尚未實行，信局分布尤多，僻遠省分亦所在皆有，甚為推行郵政之障礙。赫氏憂之，乃呈請政府飭下各省，凡通商口岸之公文函件歸郵局管理，其他各處則以曾經海關註冊之信局暫行代理，亦不得已之辦法也。

郵政局設立之始，隸於總理衙門，因其為稅務處所倡辦，故即歸稅務處管理，直至三十二年更定官制，特設一郵傳部以管理交通事務，郵政當然亦在管轄之列，要亦僅有虛名，實權仍歸總理衙門掌管，迨宣統二年陸軍部（兵部所改設）始將驛站移交郵傳部接管理，於是外交部（總理衙門所改設）亦於宣統三年將郵政局移交郵傳部直轄。時郵政已甚發達，各省總局支局共得六百餘處，又代辦局四千二百餘所，且曾與數國訂立往來互寄合同。

註一：參閱張樑任：「中國郵政」，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三七三〇。

註三：節自葉恭綽：「五十年來中國之交通」，原載民國十一年上海申報館出版「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

十日（三月二十三日） 清廷與英德銀行訂立借款一千六百萬鎊合同，作甲午賠款之用。

先是清廷俄法借款一萬萬兩合同簽訂後，賠償第一次甲午賠款及還遼代價用去八千萬兩，餘款無幾。而第二次賠款五千萬兩須在十二月內交出，清廷無法籌款，仍出於借貸之一途。英德駐京公使乘機大肆活動，俄法亦向總署交涉，後經總務司赫德奔走慫恿，總署卒接受英德請求，於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與英國滙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議定借款合同二十款。本日，總署與滙豐銀行暨德華銀行正式簽定「中國五厘利金借款合同」十八款，借款總數一千六百萬鎊（合中國銀一萬萬兩），年利五厘，實收九四，期限三十六年，以海關收入為擔保。由此，英德兩國在中國增加其政治勢力，阻撓俄法對中國財政控制之企圖，英國且從此更抓緊中國之海關行政權。茲錄其合同全文如下：

「欽命總理衙門代中國國家向滙豐銀行暨德華銀行代德英銀行總會定立借款合同。（後凡用德英銀行總會名目

俱書銀行等字樣)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國與銀行等將中國五釐利金借款合同簽字蓋印。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准西國電稱，銀行等允按草合同章程辦此借款。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按草合同第十三款之意，奉旨允准照草合同章程所擬辦理，由總理衙門將此允准之上諭，業經照會德國駐京欽差大臣暨英國駐京欽差署大臣悉知。

現將定立正合同章程開列於後：

第一款 中國國家准銀行等辦中國五釐利借款，數目係英金一千六百萬鎊。

第二款 此借款自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即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起算，名爲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中國五釐利英金借款。此項售賣股票二次，數目一千萬鎊。其第一次股票售於正合同簽字後，愈速愈佳，下餘之款，應賣股票，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爲止，清還借款，無論二次，均一律照算。

第三款 此借款常年利息按本銀虛數係五釐，合每年八十萬鎊，此利息由中國按月交付，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四月初一日起算，應付還之數目日期，按另備單內所開辦理。

第四款 此借款定爲三十六年。清還其本銀每年付還十六萬六千九百五十二鎊，亦應由中國按月付還之數目日期，按另備單內所開辦理三十六年內，中國不得或加項歸還，或清還，或更章還。

第五款 每月應還之本銀及利息統計，係八萬零五百七十九鎊六西林八本士，由中國國家付還與匯豐銀行暨德華銀行之上海分行等均分各半，付還之數目日期，按另備單內所開辦理，按此單日期付還之項，照上海銀兩合算，以便該銀行等預備金錢，按期在泰西交還，每一鎊合銀兩若干，應與該兩銀行等同日商辦，利息及本銀應如何付還於買股票之人，由銀行等隨時自定。

第六款 此借款全數，准銀行等出股票，以英金鎊爲價。此股票係何式樣及何文字並數目若干，均由銀行等隨時自定。此股票由中國或駐德國或駐英國出使大臣加蓋關防，以昭信守。

第七款

此一千六百萬鎊之借款，全以中國通商各關之稅銀抵還。除以前抵稅所借未還之款，仍應先爲償還外，此後若有抵稅款目總以此次借款本銀利息儘先償還。此款或全未還，或未還清，以先倘有用稅借抵他款用付本利一切事宜不得訂明，在此次借款之前亦不得訂明，與此借款平行辦理，並總不得令此借款以關稅逐年抵還之質保有所窒礙減色，將來若再訂立抵稅借款，務於合同內載明，所有付還本利等事，俱在此次借款之後辦理等語。如有中國海關稅銀付還此款本利不敷，中國國家應另外設法付還。至此次借款未付還時，中國總理海關事務應照現今辦理之法辦理。

第八款

此借款應由總理衙門會同戶部，按所借金鎊本利之全數發給關票，均須蓋有總理衙門暨戶部印信，並由總稅務司簽字，以該票聯環作保。此項關票每張應載明第七款所列儘先償還字樣，于代中國所借款項交付，以先應將此項關票交與德國欽差公署及英國滙豐分行均分各半收執爲憑。

第九款

通商各關應另備金鎊關票合借款本利全數，此項關票由江海關監督，並兩江總督蓋印，由上海稅務司簽字。此項關票應至本年三月初三日，即西曆四月十五日交付德華銀行，及滙豐銀行之上海分行等，各半收存，以便聯環作保。如中國或本銀或利息一次不按照所訂之期，付與滙豐及德華之上海分行等，此項關票應可一律抵完中國所有通商各口稅餉，此節應請旨諭飭各該口官員遵照辦理。

第十款

此借款全數自賣股票之期起，六個月內，中國不得另借他款。

第十一款

此借款股票息票及付還收還之款，此時及以後均不納中國各稅。

第十二款

此借款賣股票交銀收銀等事，出招帖所有詳細各節凡此章程內尚未言明者，由銀行等隨時自定。此合同簽字蓋印後，即准銀行等權衡出此借款招帖，中國國家應飭駐德英兩國出使大臣等，並飭駐倫敦中國海關稅務司遇有會商等事，同銀行等商董商辦此款招帖，按照柏林銀行章程，應由中國駐柏林大臣簽字。

第十三款

銀行等允辦此款，交付中國按本銀虛數每一百合九十四鎊，係統計一千五百零四萬鎊。此項正合

同簽字後，即存於倫敦，聽中國國家提用，至每一次提若干？何日提用等事，應按照招帖定准所存八百萬鎊之款，至遲以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初六日係中國本年三月二十四日爲期。

第十四款 如六個月內，有在泰西或關繫大局或關係銀行格外之事於各國股票價銀妨礙甚重，此借款下餘之項，未能按以上各節實票，則銀行等可以辭辦此事，於合同內下餘未辦之項作爲罷論。

第十五款 此合同章程簽字蓋印後，未出招帖之先，當應請旨允准按照辦理。此旨由總理衙門照會德國駐京大臣暨英國駐京署大臣悉知。

第十六款 德英銀行等辦此借款各分一半，彼此不相牽連。

第十七款 此合同應繕英華文各三分，以便兩面收存各一分，遇有可疑不符之處，以英文爲準。

第十八款 此合同由兩面於光緒二月初十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簽字畫押。」（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〇，頁十二—十七。

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 清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呈奏官書局章程七條。

本日，孫家鼐議定官書局章程七條，奉旨遵辦。此七條章程實爲其後創辦京師大學堂之藍圖，其要點如下：

第一條 藏書籍。擬設藏書院，尊藏列朝聖訓，欽定諸書及各衙門現行則例，各省通志，河漕鹽釐各項政書，並請准其各取儲存皮列，其古今經史子集有關政學術業者，一切購置院中，用備留心時事，講求學問者，入院借觀，恢廣學識。

第二條 刊書籍。擬設刊書處，譯刻各國書籍。舉凡律例、公法、商務、農務、製造、測算之學，及武備、工程諸書，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與交涉事件者皆譯成中國文字，廣爲流布。

第三條 備儀器。擬設游藝院，廣購化學、電學、光學諸新機，礦質、地質、動物、植物各異產，分別部居，逐門陳列，俾學者心摹手試，考驗研究。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二月十四日

五三二

第四條 廣教肆。擬設學堂一所，延精通中外文理者一人爲教習，凡京官年力富強者，子弟之資性聰穎，安祥

端正者，如願學語言文字及製造諸法，聽其酌出學資，入館肄習。

第五條 籌經費。原辦零星招股，過於冗碎，遵照原奏，概行停止。其慕義樂輸捐助鉅款者，按例酌核收納，並就現有經費，次第興辦。

第六條 分職掌。庶心志專一，可期日起有功，所有在局辦事諸臣職名，另行開呈御覽。

第七條 刊印信。擬刻一本質關防，文曰管理官書局大臣之關防，凡向總理衙門領取經費，及有行文事件，卽以此爲憑信。（註一）

官書局開辦後，卽積極向各處咨徵書籍，譯印報章，惟其苦於經費短絀，租賃民房，諸多不便，規模未備，成效不著，開辦經年，僅能「略添儀器，訂購鉛機，蒐求圖書，採撫郵電而已。」（註二）

註一：沈桐生編：「光緒政要」，卷二二，頁一，官書局「奏開辦章程摺」。

註二：「時務報」第二十冊，頁五，官書局「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摺」。

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 李鴻章離上海赴俄國。

李鴻章奉命爲致賀俄皇尼古拉二世專使後，正月十六日，慈禧太后召見於頤和園，十八日請訓陞辭，二十日出京，二十二日抵天津，二月一日抵上海。隨帶人員計文職十式枚、羅豐祿等十八人，武員八人，另自海關總稅務司調用英美德法俄籍各一人隨行。時英法德奧諸國紛電李鴻章前往，俄恐其抵俄前經過他國，而他國乘機擾亂中俄交涉，故由俄使喀西尼代擬一西行路線，先乘法船由滬至紅海口，再改乘俄船至敖得薩，轉乘火車至莫斯科。二月三日喀西尼自北京致電鴻章曰：

俄廷已照本大臣之請，一切預備必使貴爵相一路舒服，不致稍受辛苦，並另備中堂伙食輪車一輛，在阿疊薩恭

候，本國輪船亦奉諭在波賽專候。倘因改道，致戕延所發許多之諭必須一概注銷，殊屬無謂，俄廷必以為非計。本大臣致力勸貴爵相仍照我們在北京商定之路程辦理。如貴爵相因有別故必須改道，又不便告知本大臣，即請先期逕電貴國駐俄公使轉達。（註一）

二月四日鴻章覆電喀西尼，絕不「另議改道，務請貴大臣放心。」（註二）遂於本日登法輪愛納司脫西蒙號放洋。

註一：光緒中俄密約全卷，附密約未刊電稿，頁七八，民國五十四年九月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出版，以下簡稱「開國文獻」。

註二：同註一。

十六日（三月二十九日） 清廷殺內監寇萬才。

寇萬才（一名連材）為親近清德宗之內監，寇之被殺為慈禧翦除德宗羽翼之舉。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記其事曰：

「有義烈宦官寇連材者，奏事處之太監也。初為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皇上，蓋欲其窺皇上之密事也。寇連材深明大義，竊憂時局，一日忽涕泣長跪於西后之前，極言皇上英明，請太后勿掣其肘。又言國帑空虛，請太后勿縱流連之樂，停止園工，並參劾西太后信用之大臣，西太后大怒，即日交內務府慎刑司下獄。翌日不待訊鞫，即行處斬。皇上聞之，為之掩淚，北京志士，莫不太息。」（註一）

復據「翁文恭公日記」記曰：

「聞昨日有內監寇萬才者戮於市，或曰盜庫，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詳。」（註二）是知寇以清帝黨而獲罪，當非虛有也。

註一：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頁六〇，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註二：「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二月十六日

十七日（三月三十日） 御史楊崇伊奏參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清廷旋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驅逐回籍。

初，御史楊崇伊奏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遇事生風，常於松筠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聯名執奏，並且與太監文姓（按：即閻得興）結爲兄弟。」（註一）本日，清廷以文廷式「與內監往來，雖無實據，事出有因；且該員於每次召見時，語多狂妄，其平日不知謹慎，已可概見」，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註二）黃濬「花隨人聖齋摭憶」記云：

「文道希革職驅逐一事，實爲戊戌政變之先聲，當時帝后齟齬中一大公案也。由今觀之，德宗必挫，事機之危，瞭然可數，惜當時袞袞諸公，熟視無覩耳！」（註三）

附錄：文廷式事略（註四）

文廷式江西萍鄉人，字芸閣，號道希，咸豐六年生，光緒十六年庚寅殿試一甲二名，授編修。先以舉人於十五年考中書，獲第一。及殿試，閱卷進呈，名列第二。德宗曰：此人有名，作得好。十九年六月，爲江南鄉試副考官，旋遷侍讀。二十年，大考翰詹，名列一名，超擢侍讀學士。六月，疏言捐納非經久之制，請概行停止，得旨，先行停止道府。嘗劾孫毓汶，詆訾過當，德宗予以寬容；但慈禧惡其逆己意，以其語涉荒誕，欲加整飭。二十一年四月，賞假三月回籍修墓。二十二年二月，奏言各省開辦礦務，疆臣任意遷延，或藉端阻撓，推原其故，皆由畏蒞。旋爲揚崇伊參劾；當以廷式不孚衆望，遇事生風，並與文姓太監結爲兄弟，奏對狂妄，不知謹慎，革職永不敘用，並予驅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二十四年八月，慈禧再垂簾，電飭劉督坤一密飭訪拿未獲。二十六年九月，又著湘撫俞廉三嚴拿，務獲即行正法。於是流徙江湖，賁志以歿。廷式才華邁羣，工駢體，文詞挺拔有偉氣，意境尤高，詩備各體，勸帝變法維新圖強，頗爲慈禧及守舊派所痛惡。斥革後，遂致潦倒而終，三十年卒，年四十有九。時人惜之，有雲起軒詩文錄，詞鈔。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八六，頁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錢萼、孫仲聯輯：「文芸閣先生年譜」，頁四二。

註四：朱沛蓮：「清代鼎甲錄」，轉見文廷式全集（一），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八年十月版。

二十六日（四月八日） 清廷命出使美國大臣楊儒確查孫先生文行蹤。

自廣州起義失敗，孫先生即被清吏懸賞緝拿。孫先生未去檀香山時，清廷接兩廣總督譚鍾麟電，報告緝捕孫先生情形，並謂其已逃新加坡，擬年底回港再行舉事。總理衙門根據此一報告，乃分電駐外使館，嚴密注意孫先生行踪。未幾，駐日公使裕庚報告，謂孫先生已由橫濱赴檀香山。總理衙門得此電告後，原擬俟孫先生抵檀香山時設法逮捕，嗣因檀香山與中國無條約關係，中美之間亦乏交犯專約，乃於本日電令駐美使臣楊儒確查孫先生行蹤。（註一）

註一：參照吳相湘「中華民國國父——孫逸仙先生」（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八年）。許師慎「國父革命緣起詳注」（正中書局，民國五十四年）。

三月

二日（四月十四日） 清慈禧太后偕清德宗蒞圓明園，決加以重修。

圓明園自英法聯軍之役中焚毀後，重修之議屢起，尤以西太后主張最力。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同治帝以頤養太后為詞，頒諭重修圓明園。御史屢次諫阻無效，圓明園各處工程終於同治十三年正月十九日正式開工。然開工後未久，發生李光昭貪污案，恭親王奕訢等歷舉開園以來，諸帝創業艱難，堅請速停園工。八月一日，上諭暫停重建。

甲午戰爭前後，慈禧太后對修園事仍甚熱衷，擬先修復圓明園北路之「慎修思永」、「課農軒」、「魚躍鸞飛」、「文源閣」，及中路之「天地一家春」等處。本日乃偕清德宗至圓明園巡視，於是重修

之議復起。九月，開始修理「雙鶴齋」、「環秀山房」、「課農軒」等處，次年竣工。據內務府文件載：共支出工程費九萬六千餘兩。（註一）

註一：劉鳳翰：「圓明園興亡史」（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臺北文星書店初版）。

十八日（四月三十日） 李鴻章抵俄京聖彼得堡。

李鴻章一行自上海啓程後，於三月十日抵馬賽，俄王派王爵奧克托本斯基（Oukhtomsky）隨船來迎，乃從其戶部大臣微德建議，恐鴻章道經西歐他國，先取得權益故也。微德「回憶錄」記其事曰：

當李鴻章往俄途中，行抵蘇彝士運河之際，他將遇見吳王，吳王乃彼時皇上親信之一，這事亦有我而發生，因余曾經聞知，英國德國與國意欲截取李氏，希望李氏先取道西歐前往聖彼得堡，至於我則恰相反，意欲阻止他來俄之前訪問歐洲其他國家。蓋余明知彼若先赴歐洲，則彼勢將成為歐洲各國政治家種種陰謀之中心人物。吳王遇見這位中國貴臣以後，頗能與他發生親熱的關係。雖有無量請帖，請他往歐洲各埠，但他竟登上羅希亞輪（Rossiya），俄國商航公司的輪船，專派迎接他去的，遂偕其屬從及吳王，直往阿墨薩。在這城內，一隊我國兵士派充作他的衛隊。由於我的建議，就請他直往聖彼得堡，雖然羅拔欲令他在阿墨薩直候至加冕時節。我們的外交大臣，既完全不清楚我對遠東的情事，我就受皇帝給我必要的權力，辦理與這位客人的交涉。（註二）

微德並告吳王曰：「與中國特使談判之要點，應付以金錢，不妨以若干金錢賄買特使隨員中之重要人物。」（註三）以達成借地築路之目的。

三月十五日鴻章抵敖得薩，俄國陸軍元帥及文武官員列隊出迎，導以中俄旗幟，佐以亞歐音樂，張燈結彩，禮儀隆重，又依俄例送饅頭及鹽，尊為上客，從碼頭至行館，肅靜無譁。（註三）同日鴻章致電總署曰：「頃抵敖得薩，俄水陸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沿途托庇平順，鴻體氣如常。」（註四）俄人見好鴻章之用心可知。本日鴻章抵俄國行都聖彼得堡，俄人別有一番盛大招待。「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記其事曰：

車甫停站，駐俄華官已迎候道左，站中懸國旗，樂工兵士立候，導衛下車，兵官迎之。駐俄欽使許竹賓少司馬景澄繼至，節相詢俄皇安畢，即乘俄皇所遣之御車入大客館。使節之至也，俄皇早爲之潔治館舍，有巨商巴勞輔者，以質素致富，商業半在華，故力邀節相駐節其家，不費有司供應，節相鑒其誠而許之。巴以舫車來迎，門前高搭牌樓一座，樓額嵌節相像，示尊敬也。四壁高懸中國旗，窗門屏幃皆有中華文字，悉吉羊頌禱語。入門，懸氍毹地，盆花紛如，其子出迎，行金盤獻饌餅禮。俄禮以饌及餅乾置金盤，捧而獻，敬君父也。今以施之節相，其敬愛爲已極。旋奏中國樂，續奏俄樂，衣紅黃緞童子二十四人，各捧盤花，節相下車，雁行前導，散花布地，爲節相墊靴，巴之少女獻花球爲壽，其子弟四人，導入精舍，其中器具皆華物，飲食亦中華烹飪，巴之言語起居，儼一中華人。(註五)

俄廷之命巴勞輔負責接待鴻章，以其能華語，深通中國人情世故，使鴻章有賓至如歸之感，便於達成願望也。

註一：微德著，王光祈譯：「李鴻章遊俄紀事」第一章，頁十二—十三。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中華書局影印版。

註二：羅曼諾夫原著，民耿譯：「帝俄侵略滿洲史」頁八五，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三：「李傅相游歷各國日記」，引自左舜生：「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三九〇。

註四：密約交涉未刊電稿，引自光緒中俄密約全卷頁八〇。

註五：引自「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三九〇。

二十六日(五月八日) 李鴻章與俄外務大臣羅拔諾夫(Loðanow)及財政大臣微德(Wi)會談東三省鐵路及同盟密約。

初，俄廷聞李鴻章奉使俄之命，大稱所願。乃派王爵吳克托穆斯基(Oukhtomsky)迎於馬賽，及抵敖得薩，俄國予以隆重歡迎。俄之遣親王迎接鴻章，乃恐其道經西歐他國，各國先俄取得權益故也。及李鴻章抵俄京，俄財政大臣微德於三月二十一日向鴻章提出西伯利亞鐵路穿過滿蒙要求。二十二日，鴻

章覲見俄皇。二十四日，俄皇接受徵德建議，「藉回宮驗收禮物爲名」，再度接見鴻章，並提出滿洲鐵路問題。鴻章電總署謂：

「（俄皇）令帶經方傳話，不使他人聞知。……即行至便殿，賜坐暢談。彼謂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佔人尺寸土，中俄交情最密，東省接路實爲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惟華自辦恐力不足，或令在滬俄華洋行承辦，妥立章程，由華節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英日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云。較徵德前議加厚，未便壅於上聞。」（註一）

中俄密約之機已伏於此矣。本日，羅拔諾夫邀鴻章至外部晚餐時，復提出密約原則。事後李鴻章電告總署曰：

「昨羅拔諾夫赴外部晚飯，與徵德會議，該大臣皆以東省接路爲急。徵德謂：『二年必成』。鴻云：『赤塔至三岔口向多山險，我辦漠河礦久，知漠河至齊齊哈爾，高山叢莽，人迹不通，必強穿過，亦甚難辦。』彼謂：『多費工而直捷合算，中國自辦，無款無期，不如俄華銀行承辦較速。』姑囑妥議章程送核。鴻云：『此須請旨定奪』。至俄皇所稱援助，羅謂尚未奉諭，容二十九日請示後再面商。大意以若請派兵，須代辦糧餉，華有事俄助，俄有事華助，路接成乃便，俟呈准後另訂密約。」（註二）

總署接鴻章電後，由慶親王奕劻、翁同龢、張蔭桓等議定密約三原則，於四月二日電告鴻章：（一）如有兵事，俄與中國彼此援助。（二）松花、混同兩江彼此行船。（三）中國合資本五百萬附入俄華銀行。總署終不願允俄接路，然俄方堅拒甚力。據徵德所記密約從醞釀迄簽字之過程如下：

「李鴻章首先前來財部，向余正式拜謁一次。隨後余即向彼回拜一次。自此以後，我們又復見面數次；於是開始協商中、俄兩國關係之彼此諒解問題。」

自始即嘗有人告我，若與中國大臣接洽，千萬不要着忙，因彼等對於此種着忙舉動，認爲不是良好現象故也。因此，必須十分緩慢進行，並用各樣中國禮節，加以點綴。

因此，當其李鴻章前來訪余，走入客廳之時，余乃身着禮服，上前迎接。我們互相問候，極爲繁重，彼此鞠躬，極爲深低。於是余遂導彼來到第二客廳之內，並命人擺上茶來。余與李氏係坐着，而彼之隨員以及余之屬吏則皆站立。余乃詢問李氏，是否願意抽煙。彼於此時，遂發出一種聲音，有如駒嘶；立刻即有兩位華人，由旁室之中跑來，其一手携烟筒，其一則持烟草。於是開始抽煙之禮；其儀式乃係李氏靜坐於此，只是一呼一吸；而用火點煙，掌握煙筒，取筒出口，送筒入口，諸事，則皆由旁立左右之華人，敬謹爲之。李鴻章之意，實欲用此抽煙之禮，使余深得一種印象；但余之態度，却故爲沉靜，一若對於種種舉動，全未加以注意也者。

當然，值此初次拜謁之際，余無一語及於政治事件；我們不過互相問候數十次，彼問詢皇上健康情形，皇后健康情形，以及每個皇子的健康情形。余亦探詢 Bogdychan（滿洲皇上）之起居，以及一切皇室近親之安康。此即第一次見面時節談話內容之全部。

在第二次會面之時，李氏對余，即已較爲熟識。因彼現在察知，一切儀式皆不足使余得着特別印象之故，彼遂不復爲此，而且忽然開始縱談不已。尤其是後來在莫斯科之時，彼此漸爲親近，於是我們之交際情形，極爲簡單與自然。

余之職位關係，嘗使余得與許多大政治家相識，而且其中並有數人乃係歷史上之不朽人物。在此一切大政治家之中，李鴻章之風度，却使余所得印象特深。此次真可稱爲一位大政治家，當然是一位中國人，絲毫未受歐式教育，但在他方面却深具中國學識，尤其是具有一個極爲健全明白之頭腦。彼在中國歷史及政府之中，關係極爲重大，蓋在實際上，彼可算是真正統治中國者也。

現在余遂動手，向李游說，我們對於中國如何十分盡力，得使中國整個存在；蓋因我們會將中國不可侵害之原則，向衆宣布故也。我們並將永久堅守此項原則。只是我們必須得有相當機會地位，如遇必要情形之時，始能實力幫助中國。但在我們未有一條鐵路備此需用以前，則我們其勢無從幫助；蓋我們所有兵力，皆在歐俄方面，而且必須常駐該處故也。

因此之故，如遇必要之時，我們軍隊必須一面能由歐俄方面，一面能由海參威方面，出發前往。當其中日戰爭

之際，我們曾調遣軍隊由海參威方面開往吉林方面；但是此項軍隊尚未行抵吉林之時，而中日戰事業已終了；此無他，缺乏交通大道，故也。此外，因為我們編製 *Annuaire* 境內軍隊之故，所有新兵必須由彼運來，然後又運回去。因此爲保護中國安全計，我們第一必須先有一條鐵路；而且該路必須最爲直捷以達海參威方面，如此則非穿過蒙古北部以及滿洲境內不可。並且該路對於經濟方面，亦復極感必要，蓋中、俄兩國產品，由此可以增進。最末又言，——其後此言果爲事實所證明，——該路當可不會引起日本猜疑；蓋因此路在實際上，確使日本由此得與全部西歐聯絡，故也。更因日本著名的效法歐洲文化，至少對於文化外表與其一切工藝盡力吸收，則該國對於此路勢當甚爲歡迎無疑。

李鴻章當然安排着種種困難；不過余就談話情形觀之，覺得彼固具有允許之意，若彼看見我們皇上果有希望此事之心。因此，余乃奏明皇上，若能接見李氏當極有益。

皇上於是接見李鴻章，但含若干私人性質；各種公家機關報報紙，對於此種接見之舉，從未有提及；此次接見之事，遂無何等聲張，安然過去。

余記得十分清楚，在加冕以前，曾因某事舉行朝賀，而且在 *Zarsk oje Selo* 宮中，恭向皇上敬致慶意。每有敬致慶意之舉，則列席諸人，照例當作鵝式魚貫前行，直向皇上而進。當余接近皇上之時，皇上遂向余握手，天顏爲之開展，更以細語向余言曰：『李鴻章曾來朕處，朕已將此事告彼。』

於是，余與李氏晤談，我們對於所有各點，皆歸一致，乃將中俄密約各項原則規定如下：

- (1) 中國方面允許我們建築一條鐵路，經過彼之領土，由赤塔筆直到海參威。但該路建築必須屬於私人會社經營。李鴻章對於余之主張該路由國家建築，或者該路屬於皇室與國家一事，絕對不能同意。因此之故，乃特組織『中東鐵路公司』一所。此項公司無論從前與現在，均是完全惟政府之命是聽；但因彼係私人公司性质，更因一切私人公司向來僅受財部監視之故，所以該路職員，均非國家官吏；乃係或與私人鐵路公司職員相等，或者奉命派往該處，其性質略似交部所屬道路技士之服務於歐俄方面各種私人鐵路公司者。
- (2) 所有沿路地帶，應由我們獲得，其寬窄以鐵路交通所需爲限。換言之，便是一種沒收。我們在此沒收地帶

之上，具有主人資格，土地亦復屬於我們，我們可以隨意處置管理，我們可以派遣本國警察保護，此即所謂『中東鐵路警衛隊』，是也。

該項沒收地帶，應以鐵路必需者爲限，而視爲俄國之所有權，說對一點，而視爲中東鐵路之所有權。至於鐵道路線尙待確定，但無論如何必須多多少少筆直的由赤塔以達海參威。中國方面對於鐵路建築及使用，均不擔任任何危險責任。

(8) 他方面我們負責抵抗日本一切侵略中國土地之行動。因此，我們遂與中國方面結成一種對日防守同盟。上述種種，即爲我們與李鴻章方面協商一致之重要原則。

其時前赴莫斯科舉行加冕大禮之期，日益接近。

李鴻章隨帶全體侍從，以及奉命護彼之俄吏，前往莫斯科。

余乃將與李會議之結果情形，奏陳皇上。皇上隨即授余全權，命與外交大臣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接洽。余遂往晤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告彼余已奉委全權之事。並言余與李氏已將所有各點，協商一致；但是僅係口頭約束，現在須將此種口頭約束，應用書面確定。

此際 Lobanow-Rostowski 侯爵，遂以其天生材幹，使余不勝驚訝。於是彼乃向余言曰：『請將君所辦到之事，詳細依次見告。』

余乃將我們約中各點，詳細的，有統系的，一一告彼。

當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既聞余言以後，彼乃提筆盡將全約各點，一一寫就。迨余誦讀之下，見其所書之詳細有序，實使余驚訝不已。蓋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將余所言一切，皆用極爲超卓適當之詞記下，故也。當彼將其所書，給余觀看之時，乃謂余曰：『請君誦讀一遍，是否已經很好，或者君尙欲改正一二。』余遂答以毫無可加改正之處。蓋彼將一切寫得如此超妙，彷彿彼曾親自與李接洽一樣，余並謂倘使余自行書此，則所需時間，必將較彼爲多，或者尙不能寫得如此簡要云云。其後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向余言曰：『明日彼將往謁皇上，並將此項草案進呈；倘若皇上允准，彼即將該項草案寄余。』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三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五四二

次日，余從侯爵處得到草案，其間使余大爲驚詫者，即其中有一條已經更改。按：該條原來係謂我們與中國結成一種對日防守同盟；倘若日本攻擊中國地方或我們海疆，則我們及中國當負共同抵禦之責云云。現在此條業已成爲普通化，不復專指日本，乃係泛言，倘中國領土或我們 Annur 區域，如被任何一國攻擊之時，則我們及中國當負共同抵禦之責。

該條如此措詞，乃使余陷於不勝驚駭之境。蓋我們與中國結成防守同盟，究係僅僅對待日本，抑係對待一切國家，實有天犬區別故也。中國與英，以其彼此相隣之故，亦有種種交涉；該兩國間時常發生意見，並有永久爭端。其次，中國對於我們盟國法蘭西亦有種種交涉；蓋法蘭西據有安南東京故也。此外尚有其他歐洲各國，據有租界以及其他權利等等。因此之故，我們擔任保護中國以抗列強襲擊一事，不僅是勢有不能，而且是倘若該約訂成之後，爲任何一國探知，則許多歐洲國家，勢將羣起反對我們。

因是，余立刻往謁皇上。並曰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既聞余述與李交涉的結果以後，曾草成條約一件，並給余誦閱；當余閱後，隨即加以贊成。但是現在此約之中，已有一條，加以變更，而且變更的十分危險。

皇上已領解此意，並謂余曰：『君可往見 Lobanow-Rostowski，向彼告知此事，並令彼依照前此所書者書之』。余乃向陛下言曰：余對此舉，頗有難行之處。蓋以 Lobanow-Rostowski 之年紀而論，可以當作我的父親；以其在職年限而論，亦遠較余爲久；更加以此次一切與李會議之事，又皆係余擔任；倘若現在余將該侯爵所辦理者加以改正，則將謂余有意侮彼，並使彼對余仇視。余對彼當然無所用其恐懼，但終覺此舉，十分爲難。倘若陛下一願屈尊，自向侯爵言之，則實較妥善多矣云云。

皇上遂言：『朕將自行向彼言之。』

未幾，我們全體均赴莫斯科，舉行加冕之禮。

余在陛下之前，先到莫斯科，而李鴻章則更是在余之前，已到該處。余之全部時間，皆爲關於加冕事件之種種公宴所佔去，但余對於李鴻章，却未嘗加以怠慢。因余以爲自我作始之談判，必須令其妥爲結束，實屬非常重要，故也。

當其等后車駕既入莫斯科以後，聖眷依照舊俗遷居Neskuchny Park宮中。隨後，余即往謁陛下，有所陳奏。當余方正上前啓奏之際，而皇上已屈尊語余：『朕曾與Lobanow-Rostowski侯爵晤談，已將朕意告彼；謂與華同盟抵禦外來攻擊一事，若不限於日本，兼及其他各國，則實對於我們，甚爲不便云云。該侯爵於是完全贊成，並允將草約中之此條，由彼自行更改，換言之，該約將照君之原案，加以改正。』

皇上向余言得如此確切，使余深信不疑。自與皇上談話之後，余曾數次遇着Lobanow-Rostowski侯爵，但余二人對於茲事彼此均未談及。

余與李鴻章繼續往下談判。並欲與彼除了此項重要條約，我們獲得建築鐵路，直達海參威的權利之外，再行結成一種中俄友誼與防守條約。因爲中國係將築路權利給與私人公司之故，余遂決計，此項權利應行給與俄華銀行；蓋該行此時業已成立營業故也。因此，現在所應設法者，即一方面由李鴻章代表中國允許建築中東鐵路之權利，並將此項權利授與俄華銀行。他方面同時俄華銀行又用特別手續，將此權利移交中東鐵路公司。此事之所以如此辦理者，因爲在中國皇帝批准中東鐵路權利之前，中東鐵路公司尚不能組成，則李鴻章當然亦不能將此築路權利授與尚未成立之中東鐵路公司。而中東鐵路公司之組織，又必須待至此項權利完全有效之時方可。但是現在此項權利尚未完全議定，而且與李鴻章方面磋商，亦不能十分迅速議定；蓋其中已有種種細目問題，須加以多少仔細整理。不過余之手中甚欲執有兩項文件：其一，爲中俄密約，依照該約，中國方面應允給與一家俄國公司，建築中東鐵路，經過蒙古、滿洲之機會。其二，則爲中國政府與任何一家俄國公司所結關於建築鐵路之合同。於此最爲適當者，自然首推俄華銀行。但是僅僅如此，該行尚不能利用此種極有價值之權利。余乃同時準備一種草約，以與該行相訂。按照該約，所有全部事宜，應由該行移交中東鐵路公司。而且此項公司之組織，應由俄國政府任之。於是首應從事者，即係先與中華帝國主要大臣全權代表李鴻章訂立一種密約。因此先行定下一個訂約日期。俄國方面全權代表則爲Lobanow-Rostowski侯爵與余兩人；中國方面全權代表則爲李鴻章，蓋彼其間已奉北京來電授與全權；屆時同到外交大臣寓所，依照普通習慣儀節，採用一切正式手續，專約畫押。此種條約照例畫在特種紙上，格外小心美麗抄寫。其次即由各位全體代表畫押，簽名之下，更附以全體代表圖章。」（註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一日

五四四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一，頁五。

註二：李玄伯：「李文忠使俄與光緒中俄密約」一文所引電稿，「大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

註三：微德著，王光祈譯：「李鴻章遊俄記事」第一章。

四月

孫先生文與康德黎夫婦相遇於檀香山。

本月某日，孫先生偶遊檀島市廛，忽有馬車迎面馳來，諦視之，則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夫婦也。孫先生客地遇舊，不勝喜悅，乃一躍登車，時已斷髮易服，康氏夫婦驟不相識，其同行之日本乳媼以爲日人，以日語問之，孫先生乃曰：「我孫逸仙也」。康驚喜，稱返國道經此間，登岸流覽風光。孫先生亦告以不日赴美轉英，因約在倫敦會晤。遂導遊檀市，送康夫婦登輪，殷殷握別。（註一）此次邂逅相逢，實天緣也。本年九月，孫先生倫敦蒙難，卒以康氏之力脫險，亦幸有此一晤耳。

註一：孫先生「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第六集，頁一七三—一七四。

一日（五月十三日） 清新建陸軍督練大臣袁世凱創設德文、砲兵、步兵、騎兵各種隨營軍事學校於天津。並以砲兵營管帶段祺瑞為砲兵學堂監督兼總教習。

先是，袁世凱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奉命督練新建陸軍。本日，新建陸軍開辦行營兵官學堂，共分四部：（一）德文學堂，學生五十人，由督操營務處德文學生縣丞景啓為監督，洋員魏貝爾為總教習。（二）砲兵學堂，學生八十人，由砲兵營統帶出洋武備學生段祺瑞為監督兼總教習。（三）步兵學堂，學生八十人，由右翼步兵第三營幫統武備優等學生梁華殿任監督兼總教習。（四）騎兵學堂，學生二十四人，由騎兵營統帶任永清任監督，洋員曼德加為總教習。世凱於請設學堂稟中，詳列各學堂學生之選拔情形，以

及監督、總教習之派定，與將來派往國外游歷之計劃。最後亦談及經費問題。其原稟稱：

「竊照各國將弁，率皆幼習武備，由學堂考升職任，故於行軍兵法，運用槍礮，及繪算測量各法，均能通其奧妙，又多習解他國語言文字，分出遊歷，或借補他國兵弁，或肄業他國學校，各國互相取法，悉力精求，靡不日新月異。中國舊有將弁，多以壯年奮勇，薦擢職銜，至暮年精力就衰，勇氣消磨，僅以舊有虛名，分任兵事，不但於各國兵學毫無領略，即中土古今名將治軍之道，亦屬茫然，以之捍禦外侮，恐必無制勝之道。章京擬呈練兵要則第四條，曾有亟設學堂，造就將才，分班出洋游歷各語，到營後查看情形，尤覺設立學堂為練兵第一要義。現必須趕為作養，多多益善，近在正兵內考選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餘人，分擇年幼伶俐，文字較優者，限五十人，作為德文官弁學生，派管帶工程營洋員魏貝爾為總教習，督操營務處德文學生縣丞景啓充當監督，考選北洋武備優等學生分充內堂外場幫教習，並派文理素優各員分教漢文，令各生先習德國語言文字，次學武備各學，兼習漢文，迨數年有成，資送外洋游歷肄學，務期能解德國文言，始能領略德人兵法之妙。又擇其年力強壯，文字稍次者，限八十人，作為礮隊官弁學生，派統帶礮隊營出洋武備學生段祺瑞充當監督兼代理總教習，選派武備優等學生及漢文教習，分教以測算輿圖壘臺礮法漢文各學。復擇限八十人作為步隊官弁學生，派幫統右翼步隊第三營武備優等學生梁華殿充當監督兼代理總教習，其幫教習及漢文教習，亦分別選派，令諸生專習行軍兵法，並測算繪圖槍礮隊攻守各法。該兩堂姑無洋員教習，俟新聘德員到營，當再考查派充，以期逐漸精進。其馬隊學生亦擬選考二十四人，令馬隊教習洋員曼德加，教以測繪武備各學。以上四項學生，惟德文學生造就較難，然業成後實較他項學生為得用，至礮步馬各學生，擬令其先將武備應用實學，切實講習，計兩年後即可選充官弁。日前擬訂試辦條規二十二款，刊發各學堂，限自四月初一日開辦。其學生肄業居住各處，先在各營內，勻擇房屋。修葺棲止，除正餉仍由各本營照發不另請支外，每月按名津貼菜蔬制錢一千文，其習課應用圖書紙筆油炭器具等物，及各項教習薪資，按學生二百數十人核計，需費甚鉅。現值庫帑支絀，自應格外撙節，擬自四月初一日起，每月統共限支經費銀六百兩，其照章按月按季考試獎賞及考優學生加薪等項，均由章京在新公內，每月捐銀二百兩，隨時發給，不再另請開支。至周年請給功牌二年彙請保獎，係援照天津武備學堂奏定章程辦理。謹將新建陸軍行營武備學堂試辦條規，除繕繕清摺恭呈鑒核外，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十六日

五四六

所有擬設各項學堂月支經費，並捐薪作賞各緣由，理合具稟，恭請憲台批示」（註一）

按：段祺瑞在民國史上居重要地位，本名樸瑞，字芝泉，安徽合肥縣人，生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二月初九日。父從文，早喪。祖佩，字韞山，清咸豐間從鄉人劉銘傳創團練，後任銘軍第三營統領，隨平太平軍，追剿捻匪，以功保提督銜，記名總兵。祺瑞自八歲至十五歲（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五年）讀書段佩宿遷任所，十七歲得堂叔從德之介，往補山東威海軍營哨書。（註二）

光緒十一年（一八九五），直隸總督李鴻章設立武備學堂於天津，由淮軍各營將領挑選兵弁子弟一百數十名為學員，以二年為期，（註三）祺瑞得入堂肄讀，學習砲科。光緒十三年畢業後，奉命至旅順監修砲台。明年選派赴德國柏林軍校深造，繼入克虜伯砲廠實習砲工。光緒十六年歸國，初任北洋軍械局委員，繼任威海衛營武備學堂教習。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十月，清廷既命袁世凱以浙江溫處道銜接統定武軍，練兵小站，袁囑旗籍道員天津武備學堂總辦蔭昌推薦新軍幹部，蔭昌乃介紹武備學堂出身之祺瑞及馮國璋、王士珍、梁華殿等應徵（梁因某次夜操溺斃，故無聞。）是為袁、段建立關係之始。袁氏練兵合統率訓練而為一，對三人採取平衡發展手法，委馮國璋為步兵學堂總辦兼步兵統領，段祺瑞為砲兵學堂總辦兼砲兵統領，王士珍為工兵學堂總辦兼工兵統領，因而其後有北洋三傑之稱，且有「王龍、段虎、馮狗」之綽號。

註一：袁世凱輯：「新建陸軍兵略輯存」，卷一，頁二〇——二三，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二：吳廷燮：「合肥執政年譜」頁一至三，民國五十一年六月文星書店影印。

註三：「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〇，頁四八—四九。

十六日（五月二十八日） 臺灣抗日民軍與日軍戰於鶯歌石山下，各有死傷。

先是本年三月，臺灣抗日民軍首領詹振、林李成、陳捷陞等，率義民二百餘人，攻松山庄日本憲兵

屯所，交戰於松山土地公廟前，各有死傷。抗日軍因子彈不足，退入山中。日本軍憲警混成隊，於四月四日從頭圍出發，經福德庄，進圍福德坑，抗日軍百餘名，敗後分散各處。本日抗日軍千餘名集於鶯歌，擬分兩路：一北上攻淡水，一南下攻桃仔園。日軍接獲情報，立派大隊來攻，戰於鶯歌石山下，各有死傷。抗日軍敗後分散，此後遂不再有此多數集合機會。（註一）

註一：「臺灣省通志」，卷九革命志，抗日篇，頁十六。

二十二日（六月三日） 李鴻章與俄外務大臣羅拔諾夫、財政大臣微德，在莫斯科簽訂中俄同盟密約六條，兩國協力防禦日本，俄於黑龍江、吉林接造鐵路，條約有效期為十五年。

自俄提出滿洲鐵路問題後，李鴻章日與總署電報磋商，而俄方威脅利誘，駐京俄使喀西尼且至總署威迫。四月十五日，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翁同龢、李鴻藻、榮祿、張蔭桓、吳廷芬等會商中俄同盟密約，卒定議照辦，次日請旨寄鴻章定約。（註二）本日，鴻章與俄國外務大臣羅拔諾夫、財政大臣微德在莫斯科俄外務部官邸簽訂中俄同盟密約六條，中俄兩國協力防禦日本，中國允俄於黑龍江、吉林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威，條約以十五年為限。密約全文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暨大俄國大皇帝陛下因欲保守東方現在和局，不使日後別國再有侵佔亞洲土地之事，決計訂立禦敵互相援助條約。是以大清國大皇帝特派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俄國大皇帝特派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外部尚書內閣大臣上議院大臣實任樞密院大臣王爵羅拔諾甫、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戶部尚書內閣大臣樞密院大臣微德為全權大臣，即將全權文憑互換校閱，均屬如式，立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日本國如侵佔俄國亞洲東方土地，或中國土地，或朝鮮土地，即牽礙此約，應立即照約辦理。如有此事，兩國約明應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

盡力互相接濟。

第二款 中、俄兩國既經協力禦敵，非由兩國公商，一國不能獨自與敵議立和約。

第三款 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事，中國所有口岸，均准俄國兵船駛入，如有所需，地方官應盡力幫助。

第四款 今俄國為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軍火糧食，以期妥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惟此項接造鐵路之事，不得藉端侵佔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礙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國國家交華俄銀行承辦經理，至合同條款，由中國駐俄使臣與銀行就近商訂。

第五款 俄國於第一款禦敵時，可用第四款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平常無事，俄國亦可在鐵路運過境之兵糧，除因轉運暫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第六款 此約由第四款合同批准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五年為限，屆期六個月以前由兩國再行商辦展限。

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外部尚書內閣大臣上議院大臣實任樞密院大臣王爵羅拔諾甫（簽名）

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簽名）

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戶部尚書內閣大臣樞密院大臣微德（簽名）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俄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訂於莫斯科。（註二）

專條

兩國全權大臣議定本日中俄兩國所訂之約，應備漢文、法文約本兩分，畫押蓋印為憑，所有漢文、法文校對無訛，遇有講論，以法文為證。

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外部尚書內閣大臣上議院大臣實任樞密院大臣王爵羅拔諾甫（簽名）

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簽名）

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戶部尚書內閣大臣樞密院大臣微德（簽名）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俄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訂於莫斯科。（註三）

據微德所記，雙方簽字之情形如下：

「到了預定日期，我們齊到莫斯科外交大臣寓所；該寓所係在加冕期間，特為外交大臣租賃者也。一方面為俄國全權代表與其屬吏，他方面則為李鴻章與其全部侍從。

當其我們彼此聚首，圍坐棹旁之時，Lobanow-Kostowski 侯爵乃向我們言曰：此項行將簽押之約，非常重要。此約內容，所有全權代表，換言之，即是彼與我以及李鴻章三人均已深悉，所以無須再行誦讀。並曾交給李鴻章之同事諸人閱看，彼等當已向李稟明。其中各條皆係精確按照約定所書，並經書記審查，我們只須畫押簽名而已。又李鴻章之同事（諸君），或欲再行審讀一遍，亦未可知。

照例，此種條約共應簽押兩份；其一為我們方面保存，其一則為對方保存。因此，其中一份交與李鴻章之同事，以便其審閱；其他一份則由余加以審查。蓋余欲藉此察驗，究竟關於我們負責捍衛中國一條，是否一如初次草稿所擬，換言之，我們負責捍衛中國，只以日本攻擊為限。

余忽然看見該條，使余驚駭萬分；蓋其中詞意，非如初次草稿所擬，乃係按照後來 Lobanow-Kostowski 侯爵所改擬者。

因此，余乃走近 Lobanow-Kostowski 侯爵身旁，請其暫到側邊，低聲向彼耳語：「侯爵，該條並未修正，一如皇上所希望者。」蓋余以為該侯爵乃係故意如此為之。但其間使余不勝驚訝者，忽見該侯爵以手摸額，並且言曰：「啊呀，上帝！余忘去吩咐書記應將該條依照初草稿所擬改寫。」但是彼却未絲毫狼狽失措，彼只將時計一看，業已十二點一刻。於是彼乃拍掌數下，立刻即有侍從上前，彼遂言曰：「擺上早餐」。蓋原來預擬簽押完竣之後，即在彼處早餐，故也。

於是該侯爵乃向著李鴻章以及其餘在場人員，言曰：「現在已是十二點以後，我們先吃早餐，否則食品將寒；一俟吃完之後，再行簽押。」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五四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五五〇

因此，我們全體前去早餐，以留書記二人，利用我們飲食期間，重將條約改寫一遍，而且按照前在聖彼得堡時，該侯爵依據余之報告所草成者。是以吃完早餐之後，棹上所放之條約，已改寫完畢，但在實際上却是最初所擬詞義之下，加以簽押。

該項條約實係一種極為重要之事件。假使我們能始終守約不渝，則我們俄國可以省去一場十分可恥的對日本戰爭，我們至今猶能穩立在遠東方面。

惟此後余將尚有機會再行紀述者，即我們自己將此條約違背。一半出於惡意，一半由於輕率。因而竟使我們在遠東方面，陷於如此地位，直至今日未變。

條約既結以後，遂由中國皇帝與俄國皇帝批准。該約實應作為所有我們對華關係，所有我們遠東地位之基礎看待。」（註四）

附錄：

一、裘毓慶撰「中俄密約之真相」（註五）

中俄密約者，瓜分中國之先鋒也，而其機實自中東之役啓之。當軍書旁午，風聲鶴唳之時，當局者旁皇無所措，輒欲借他國之力以洩一時之忿，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爭和議曰：「若以賂倭者轉而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敗為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曾倭盡廢全約，即酌量畫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許以推廣商務」云云。是中俄密約最初發議之人也。當時盈廷諸臣，倚俄之心甚熱，而西后尤為主持，雖此策未實行，然王之春使俄時，已有所商訂。而俄人亦居為奇貨，將借此市恩，而求大欲於中國。俄使喀希尼頻露意於當道，以結其僥心，遂有脅日本還我遼東之事。

乙未二月，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議和於日本，於事前先有所商於各國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國之疆土，清國則當以軍防上及鐵路交通上之利便，以為報酬。」李鴻章與喀希尼私相約束，既成於此時矣。既而馬關條約既發布，而俄人有聯合德、法迫還遼東之事，喀希尼即將舉前者與李鴻章私約提作正文，以要求於總署。適值和議成後，德宗大怒，李鴻章罷職入閤閒居，於是俄使暫緩其請，以待時機。

喀希尼知中國實權在於西后，而李鴻章爲帝所嫉，爲后所庇也，乃密賄通內監，以游說西后，且與李鴻章約，設法復其權力，而借其力以達俄國之希望。於是時機適到，有丙申春間俄皇加冕之事，各國皆派頭等公使往賀，中國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管充陪使，故賀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國最重之禮也，故參列其間，必一國之名士，聞於列國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輕，不足當此責，可勝任者獨李中堂耳！」於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復一面賄通西后，甘誘威迫，謂還遼之義舉，必須報酬，請假李中堂鴻章以全權，議論此事，而李鴻章請訓時，西后召見至半日之久，一切聯俄密謀，遂以大定。

李鴻章抵聖彼得堡，遂與俄政府開議喀希尼所擬草約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舊都莫斯科，遂將議定畫押。當其開議也，俄人避外國之注目，乃假託籌借國債之名，不與外務大臣開議，而使戶部大臣當其衝，遂於煌煌鉅典萬賓齊集之時，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之計，而此關係地球全局絕大之事，遂不數日而取決於樽俎之間矣！時丙申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鴻章尚游歷歐洲，其議定畫押之草約，達於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於總署，全署皆爲之驚愕。德宗觀而大怒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一舉而賣與俄人也！」堅持不肯畫押，喀希尼乃復通西后，加甜誘之言，與恐嚇之語，西后乃嚴責皇上，直命交軍機處開議，不經由總理衙門。

至八月間，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勢益急，故爲束裝就道驪駒在門之狀，雇運搬行李車數輛，置於俄使館門前以示意，乃告總署云：「若此約不批准，則即日下旗回國。」西后爲所惑，日日敦迫皇上，命即畫押。皇上之實權，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鱗哉！於是以西曆九月三十日，批准此密約，俄使喀希尼即日攜約而歸於俄，即爲釀成日俄戰爭之原因，而近日東三省外交困難之所由來也。

二、徐夢熊撰「中俄同盟密約與租借旅大」（註六）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俄皇尼古拉舉行加冕典禮，清廷以「中俄交睦」，宜命李鴻章前往，「方昭重典」。李本擬聯俄制日，在四月三十日便乘法艦經蘇彝士運河及黑海抵俄京，俄國知李鴻章前來，必有利於俄國，故特派烏克托木斯基親王 Prince Ukhtomsky 到蘇彝士運河迎接，予以隆重招待，由實際主持亞洲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五五二

外交的威特擔任談判。威特深明李的心理，首謂俄國會如何幫助中國，希望永久保持中國領土的完整，俄重兵在西方，必須以鐵路將歐洲、海參威與中國聯為一起。中日交戰之時，俄雖曾調軍隊，因交通不便，未能及時，所以必須由俄築成經過滿蒙北部的鐵路；即就經濟上看，對中國亦屬必要。並向其子經方行賄。第二天俄皇直接與李面談，說俄國地廣人稀，斷不侵佔他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最密，築路實為將來軍運，中國有事，也便幫助。至是李深感厚誼，致電於清廷，主張接受。此後與威特續議，由鐵路問題及於同盟條約。五月十四日條件商定，二十七日北京定議照辦，六月三日（農曆四月二十二日）——俄曆五月二十二日，「中俄同盟密約」在莫斯科簽字，這個條約，中國認為是對日防禦同盟條約，禦敵互助，俄國則志在築路，設成騙局，以侵略中國。這個條約種下了瓜分中國之禍，釀成了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及七七抗日戰爭的不幸後果。

俄國築路的願望是達到了。但是「東方找水」的「暖水港」尚未解決，到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強佔膠州灣時，俄皇便召開了一個御前會議，討論結果，令駐北京代辦巴布羅夫（A. Babrov）通告清廷總理衙門說，俄國已決定派兵船由海參威赴旅順，助我抗德，因為中俄是「同盟」國。於十二月十五日（農曆十一月二十二日）自行駛入旅順，事初清廷亦望俄國援助，後知德、俄早已取得協議，德國承認華北為俄國的勢力範圍，贊助俄在黃海取得不凍港口及其歐亞政策為交換條件，悔之已不及也。俄國海軍登陸後，就瘋狂的姦淫掠殺，這是旅大遭受到了第二次為帝國主義屠殺的記憶。俄國更逼迫中國於旅順、大連之外，並要求南滿鐵路的建築權（由旅順至長春）。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三月，俄使兩次限期答覆，條件不能改變，並聲言「過期自行辦理，不能顧全同盟交誼。」清廷知道如許俄之要求，外患即在目前，但又怕俄國侵擾，祇有揮淚應允了。三月二十七日（農曆三月初六日——俄曆二月十五日），由李鴻章與俄使訂立「旅順大連租借地條約」並於五月十日（農曆閏三月十七日），再訂旅大租借地續約六款，其重要內容是：

一、旅大租借限期為二十五年。

二、旅順為軍港，只准中、俄使用，大連除口內一港外，餘為商港。

三、建築南滿鐵路。

俄國一面用欺騙陰謀，一面用武力脅迫，達到了他築路、佔港、割宰東北、控制太平洋的迷夢。便馬上進行勘分租界。於同年八月，以旅、大租借地改建爲關東省，以亞勒克塞夫(Alexev)爲總督管治，以旅順爲首府。

帝俄「東方找水」，尋覓不凍港的政策是實現了。把旅、大帶進了黑暗的深淵，受了帝國主義者五十餘年的壓迫，宰割與剝削，將中國也帶入了瓜分共管的地步。

三、李玄伯撰「李文忠使俄與光緒中俄密約」(註七)

光緒中俄密約討論及修訂皆極秘密，與聞者甚少。電碼皆由軍機大臣手譯，與尋常之由章京譯者不同；且進呈以後亦非若慣例之列入檔冊，多只記件數而不載全文。李文忠全集之編纂出自吳肇甫先生手，以爲密約尚未公布，不敢遽將電稿登載，故今集中此卷遂缺。常璿璋先生，吳門高弟，實佐編纂之役。此編所附電稿即由其傳鈔。民國二十一年以校軍機處檔案，所缺甚多，知其係孤本矣。後更加以他材料，至二十九年遂成此編。國際形勢今昔雖異，清人言論雖已陳舊，然其歷史價值仍舊存在，或亦近代俄史研究者所不廢歟？

(一) 奉使經過

俄皇尼古拉第二于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加冕，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國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爲俄皇加冕賀使。既而「俄人以王之春位望未隆，與各國遣使相形，難於接待。」(李鴻章籲辭使俄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九)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改派李鴻章爲正使，邵友濂副之。文忠于當日會上疏懇辭，但清廷未准，遂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謝恩摺。(兩摺皆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十九。)

邵友濂既奉派任賀俄皇副使，不欲往，當轉求南洋大臣張之洞代爲懇辭。張文襄遂于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電軍機處，電曰：

前巡撫邵現在上海，當將二十一日諭旨電知。茲接邵電稱：「頃奉尊處傳電，敬悉。各國從不派副使，恐入宮班次反居小國之下，殊傷國體；且賤軀患病未痊，萬難就道。乞代電奏，懇請收回成命，不勝惶悚感禱之至，友濂儉。」等語，請酌核代奏之。洞儉。(電報檔，十二月二十九日，署南洋大臣電)

清廷既接此電，遂于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下諭：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五五四

張之洞電悉，邵友濂病既未痊，即著勿庸赴俄，著張之洞傳諭知之，欽此。（電寄檔，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並同時諭：

現派李鴻章出使俄國，王之春毋庸前往，著即回任，欽此。（同上，隨手檔，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亦記有以上兩電旨略文。）

是時政界人士頗反對李經方隨李文忠往俄，正月初九日有翰林院代遞編修丁立鈞奏李經方、羅豐祿不宜隨同李鴻章赴俄摺，（奉旨存），（洋務檔，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即代表此類意見也。茲錄如下：

翰林院摺編修丁立鈞呈稱李經方等不宜隨同李鴻章赴俄由。

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宗室麟書等跪奏為據情代奏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據臣衙門編修丁立鈞呈稱：「伏惟去年馬關之約，倭所要挾割地償費各節，既已無可復言，猶賴俄人助我以全力爭還遼南失地，於是北洋東三省門戶形勢尚完，差堪自守。皇上鑒俄誠愛，今過俄皇加冕典禮，特遣重臣前往致賀，此誠審固邦交安定國本第一至計也。前聞有旨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嗣以各國賀使率皆宗親高位大員，於是有改派李鴻章之命。在朝廷權衡輕重自具苦心；且敕命已頒，勢難中止。惟是里巷憂疑之意，有不得不直陳於皇上之前者。去年馬關議約之事，天下臣庶痛心疾首，憤鬱之氣至今未平。其不知者惟恨李鴻章之誤國辜恩，其知者則疾其所用隨員之逞私煽毒。今李鴻章使俄命下，即電召其子李經方刻日來京。道員羅豐祿新在天津，因人言嘖嘖，乞假南歸。一聞此信，更欲同往。是馬關憤事諸姦，又盡隸隨員之列，為朝野之所指目，中外姍笑。前事伊邇，情何以堪！夫此尋常通質之使，即使所任非才，亦何至盡人疑慮？誠以中俄之交新附未固，傾心聯合，通意需人。李鴻章辦理洋務，素善英倭，其黨李經方羅豐祿以及駐英使臣龔照瑗輩，多與英倭陰相結納。平日既情存偏袒，臨事遂私以廢公。即如此俄助還遼，視英人坐觀成敗，情形顯分厚薄；而李鴻章之黨人則反為俄騰謗，謂俄將不利中國。此其順英倭之意以拒俄人，實與朝廷厚聯與國之本，心大相刺謬。是非顛倒如此，而資以通情好，可不為寒心乎？聚羣心術難信之徒以適異國，輕則虧國體，重則敗邦交。竊料此輩果行，必將於去年中俄交際之好

，陰圖翻局反報之日。非謂俄勢中乾，萬不可恃，即虛言囑喝，謂實有圖我之意，極宜聯英合倭以爲之備。皆情事所必至者耳。夫中俄之親，英倭所大忌也。現日本通商新約未定，未必不窺爲我與俄之交親與否以爲進退。苟中俄睽隔，則倭益無顧忌，議約章程，變本加厲，勢所必然。且英盤踞中國，歲佔利益，根柢至深。嘗恐中國之強，而彼失其利；又恐中國之弱，而利將爲各國所分。伺隙覬覦，匪伊朝夕。今幸俄人助我，故不敢明附於倭。相連爲難，然意實未已。若中俄既離，英必乘之。各國生心，禍至無日，豈細故哉！李鴻章受恩深重，此次奉使，未必詎喪心昧良，敢於逞私意以敗國家之大計。特其人暮氣已深，如無李經方輩爲之左右，而更簡廉明疆毅顧全大局之員爲之參贊，亦尚可補救萬一，消弭禍患於隱微之中。伏乞聖明再加審酌，即未能另遣賢員，收回成命，亦請嚴飭該大臣不得仍將萬衆指目之李經方、羅豐祿各員，率行帶往。聯交睦鄰，事體至重。竊願皇上宸斷，與樞臣密議圖之，天下大計幸甚。」等語。恭請代奏前來。臣等公同閱看，關係時務重要，不敢壅於上聞，謹照錄原呈恭呈御覽，所有據情代奏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大學士翰林院掌院臣宗室麟書，協辦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臣徐桐。（光緒二十二年正月月份摺包）

所以有人擬以其子經述隨行，以免文忠再携帶經方者，遂有派經述隨行之舉。正月初九日上諭：

大學士李鴻章奉使過行，精神疆固，惟年逾七旬，遠涉重洋，朝廷良深廕系。伊子李經述着賞給一品銜，隨侍前往，以示優眷，欽此。（洋務檔，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雖然若此，文忠終欲携帶經方。正月十三日奏請擬帶人員，附有「帶李經方片」（隨手檔，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並附有「員名片，禮物片，帶稅務司片，開用關防片。」清廷礙于文忠之堅請，不得不「依議」。（洋務檔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李文忠全集奏稿七十九，李經方隨行片列于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而隨帶人員摺及洋員參贊片皆列於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但隨手檔將帶李經方片與摺同列入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與洋務檔同。隨手檔係隨按日登載，故名之曰隨手檔，決不至將前一年之奏片誤入於次年。且片中明言「特命臣子李經述隨侍前往，體恤周至，感戴莫名。」李經述隨侍之諭，發於正月初九日，帶李經方片必在其後。且請代習慣，奏片必隨奏摺，所以謂之爲夾片。彼時輿論反對李經方，文忠將片附入隨帶人員摺內，正使人不甚注意也。若謂係附於十二月二

十九日使俄謝恩摺內者，則李經述云云，又與事實不符。顯係編全集者誤編也。）

文忠攜帶李經方的理由是：「臣子李經方幼曾兼習西國語文字，嗣充駐英參贊，游歷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於各國風土人物往來道理均所熟諳。臣年逾七十，精神步履日見衰頹，所有沿途舟車館舍及隨從僕役約束指揮，勢不能周到，而所至之地，各國官商士庶，必多聞風來謁，不勝接待之煩。若得李經方同行，則程途之照料，賓客之酬應，均可分勞。」所以懇准隨行，「俾臣不至以瑣務逐細分心，庶得專力於重要各端。」並且他為李經方辯護，說以前辦理各事，皆他「相機酌奪，」並且「請旨遵行，實非李經方所能為力。」（奏稿卷七十九，李經方隨行片。）但言界仍不以為然。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讀張百熙參李鴻章「堅請其子李經方為隨員，請嚴旨切責。」（隨手檔，正月十八日）其摺若下：

臣張百熙跪奏，為奉使大學士臣李鴻章挾夷自重，堅請其子經方為隨員，圖託外交，用情叵測，特摘發密陳，仰祈聖鑒事。竊以人臣外交，罪在不赦；況於交通外國竊弄朝權包攬把持如李鴻章者，心迹深險尤異尋常，臣請為皇上切言之。自海禁既開，各國通商，歷年既久，交涉事多，於是派直隸兩江督臣為南北洋大臣，隨時派出使各國大臣，國家添設總理衙門以總其事。諸臣受任者與各國駐京公使及國外部大臣並通商各口領事，文移照會，語言接見，在事之常，數十年來無一人敢與外國有香火之盟，自使其子為壟斷之事。蓋人之存心，苟非藏奸以背君，何利挾夷以自重？而李鴻章自北洋解任入閣以來，除與倭使林董集議商務外，無日不與諸酋往來，諸酋亦貌與款洽。夫李鴻章竟決無禦侮於樽俎之心，諸酋亦決無修好公卿之雅，其情易見，路人能知。前此李鴻章所與外酋密交，如倭相伊藤，比於諸國似尤加厚，宜其敵情易得，先事能防。卒以無備喪師，奉使辱國，調度乖方，議款卑屈。覆按前事，謂其實有無君鬻國之心，本非才力不逮之罪，固非微臣一人之私言也。且當使倭，屢奏盛稱其子經方之才。此次使俄，必欲改派經方為隨員，尚復誦言使倭款議，全得其子經方之力，要挾朝廷允許。聞李經方私取倭女，所得贓款巨萬，盡連入倭。前臺灣交割，派李經方迅往，奉旨嚴促，遷延畏禍，隱避倭船，及今託疾，抗不復命。而李鴻章公然保奏，同往使俄，云可帶疾前往。千里復命則辭以疾，遠涉重洋則力疾可行，李鴻章父子跋扈無狀，全無顧忌至此，匪曰濟惡，夫誰信之？查李鴻章與各國私交皆固，而英倭尤親，獨於俄國未即聯結。今知俄勢日強，英倭

畏忌，暫睦於我，觀釁東方。乃因朝廷擇使，承乏爲出使大臣，必欲派其子爲隨員，顯肆其要求挾制之情，巧售其私結外援之計。臣竊料李鴻章此行，必陰託於俄矣。將逞其媚術，挾其詭謀，不忠於君，何交不固？且欲使事竣後，遊歷各國，此何意乎？臣竊觀自古權奸，皆知審勢。漢之勢重於丞相大將軍，唐之勢重於節度使。勢所趨重，權即在焉，奸人遂以亂國。我朝官制，殷鑒前代，輕重維，永無流弊。然而中外交通，五洲一家，權勢所重，莫如外交。臣奸苟圖固位，深結外援，彼族利其邪謀，狼狽相倚，要脅欺罔，何所不爲？臣讀宋史，見秦檜、劉豫、張邦昌交結金人，釀禍無極，嘗所痛心。不圖今值聖明之朝，乃有李鴻章父子之深邪隱慝？恣其所欲，將不忍言！且自古奸權自立世子，權勢相承，不欲稍奪。今李鴻章疊經參劾之後，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權。圖度數月，乘此事機，臣恐李鴻章父子此行，必於朝不利，爲中國無窮之憂。臣維唐貞元以後，藩鎮跋扈，凡所陳請，朝廷必委曲以從。渾瑊一鐵勒渾部人耳，以高勳達官爲唐宗所信。待有所奏論不盡從可減，輒私喜曰：上不疑我也。今聖明在上，方將嚴法紀以飭朝綱，何所顧忌於李鴻章，而必委曲以從其強請？該大學士而稍有人臣之心，亦何能無愧於渾瑊一武臣乎？臣竊聞外間藉藉，頗激愚慮，不揣冒昧，輒以上聞。李鴻章既經奉命，行期甚迫，得難追改。可否乞下嚴旨，切責李鴻章，不准攜帶其子經方爲隨員。庶可稍戢邪心，俾知敬懼。於國家禮使大臣之體，亦無所損。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二十二年正月摺包）

文忠於正月十六日蒙慈禧皇太后在頤和園召見（翁文恭日記，以下簡稱翁記，正月十六日），于十八日請訓，（翁記，正月十八日）於正月二十日出京（見電七）。出京以前曾奉到赴俄致賀敕諭，及往英法德美敕諭，其文若下：

皇帝敕諭：一等肅毅伯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授著爲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致賀俄君加冕。典禮隆重，故特命爾遠行。爾其仰體朕意，聯絡邦交，敬謹將事，參隨各員，聽爾酌調，以期辦理妥協，毋負委任。特諭皇帝敕諭。皇帝敕諭：一等肅毅伯文華大學士李鴻章著授爲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英法德美四國，親遞國書，奉宣德意。皇華遣使，責任綦嚴，爾其善體朕意，聯絡邦交。無負委任。特諭。（洋務檔，二十二年正月無日）

並携有瓷銅玉器各禮物，計俄國八色十件，德國五色七件，法國七色九件，英國七色八件。（據光緒二十二年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五五八

九月初一日，總理衙門片。摺包九月份上。）

所帶隨員計：

兵部候補主事于式枚，

分省補用道塔克什訥，

記名海關道羅豐祿，

升用道分省補用知府聯芳，

候選如府林怡游，

浙江試用同知薛邦彞，

升用直隸州補用知縣柏斌，

直隸試用縣丞麥信堅，

河北試用縣丞張柳，

分省試用縣丞洪冀昌，（據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隨帶人員摺，奏議，卷七十九；及九月二十五酌保

隨帶出洋員弁摺，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份摺包。）

二品銜江蘇存記道李經方，

三品銜刑部員外郎李經述，

翰林院庶吉士龔心釗，

分省補用同知黃家璋，

候選同知史雲龍，

補用同知直隸候補知縣黃正，

縣丞謝起源，

典史羅忠彤（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酌保隨帶出洋弁摺，二十二年九月份摺包）。

共文職十八人，以外尚有武員八人。另有外國隨員六人，計：



俄人柯樂德，

德人德瑾琳，

法人穆意索，

英人赫政，

美人杜德維，（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洋員參贊片，奏議卷七十九，及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李鴻章片，二十二年九月份摺包。）

英人伊爾文，（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片，二十二年九月份摺包）

前五名素任稅務司，伊爾文則隨行醫生也。文忠告許景澄謂「隨員十七，供事武弁十八，僕役十」。除僕役外，以上共計隨員供事武弁三十二人，較之電文，當尚有學生三人也。

（二）由滬往俄

文忠抵滬似在二月初三日，（據電十四）十五日乘法船由滬起程。（據電十五、十六）俄甚懼文忠在抵俄以前，經過他國，而他國乘機擾亂中俄交涉，所以正月以前就由喀使與文忠商妥路線，電一云：

現與喀使商定，乘法公司船由滬至紅海口阿列克三德里，改乘俄公司船至額疊薩，乘輪車至莫斯科。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鴻江。

當時西比利亞鐵路尚未完成，不能由陸路，只能由水路往俄。俄又無直達滬之郵船，不得不乘他國船至紅海口，再換俄國船也。法俄是時早已同盟，乘法公司船而不乘其餘國船者，當即以此。這些皆徵帝俄政府對文忠往俄前之深思熟慮也。並對文忠極盡招待，正月十五日許景澄電：

俄外部稱奉國主諭：李相及從僚在俄境內，一切概由俄國供給，以表格外交誼。澄。鹽。（電五，亦見電報檔，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並使之「一切舒服，不至稍受辛苦。」（電十三，喀使來電）

但文忠後又因往阿疊薩 Odessa 之俄輪過小，「恐難禁黑海風浪，故令柯樂德電商」喀使改道。（電十四柯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德係俄人，五品銜副稅司，現充文忠出使參贊）略得電後甚驚，一面「另備中堂伙食輪車一輛，在阿疊薩恭候，本國輪船亦奉諭在波塞 Fort-Said 專候。倘因改道致俄廷所已發許多之諭必須一概注銷，殊屬無謂。」（電十三）將路線做成已成之局，使文忠不便更改，另方面「力勸貴爵相仍照我們在北京商定之路程辦理。」（同上）他並疑心文忠到滬後受他國人搖惑，遂欲改道，所以他又說「如貴爵相因有別故，必須改道，又不便告知本大臣，」以他文忠知道他疑心，反不便改道也。他並疑心伊爾文醫生，所以文忠回電說：「伊爾文在敝處多年，於本大臣起居服食，一切熟悉。過津時伊求令隨行，以備醫藥，不令預聞他事。聞貴大臣不甚謂然，擬令乘法船到馬賽吳，逕赴倫敦靜候也。」（電十四，伊爾文係英人。）

二月二十五日文忠過新加坡（電十七。）三月初十日抵馬賽，俄派王爵吳克德托賓斯（Oukhtomsky）（電十八）隨船來接。遂乘俄船於三月十五日阿疊薩（電二十四）。次日往彼得堡 St. Petersburg，於十八日抵彼。（電二十四，二十六）

據微德回憶錄，則吳王之往馬賽迎接，亦俄國防文忠受西歐他國引誘先道經他處也。茲譯回憶錄所記若下：

當李鴻章往俄途中，行抵蘇彝士運河之際，他將遇見吳王 Oukhtomsky，吳王乃彼時皇上親信左右之一。這事亦由我而發生。因余曾經聞知，英國、德國、奧國，意欲截取李氏，希望李氏先取道西歐，前往聖彼得堡。至於我則恰相反，意欲阻他來俄以前，訪問歐洲其他國家。蓋余明知，若彼先赴歐洲，則彼勢將成為歐洲各國政治家種種陰謀之中心物。吳王遇見這位中國貴臣以後，頗能與他發生親熱的關係。雖有無量請帖請他往歐洲各埠，但他竟登上羅希亞輪 Rossiya，俄國商航公司的輪船，專派迎接他去的。遂偕其屬從及吳王，直往阿疊薩。在這城內，一隊我國兵士派充作他的衛隊。由於我的建議，就請他直往聖彼得堡，雖然羅拔欲令他在阿疊薩直候至加冕時節。我們的外交大臣既完全不清楚我對遠東的情事，我就受皇帝令給我必要的權力，辦理與這位中國客人的交涉。（法譯本，第四章，七十四至七十五頁）

許景澄當時亦曾報告總理衙門說：「並聞先至俄都一層，為戶部大臣威特贊成。」（許文肅公遺稿，函牘五，十四頁）足證微德所述不誣也。

(三) 密約之提出

文忠離國以前，初擬逕莫斯科，似未有先往聖彼得堡之議。至阿墨薩後，俄外部方說奉俄皇諭「電催趁此暇日，先赴聖彼得堡遞國書接見。」（電二十四）據微德 Witte 在其回憶錄中所記，俄外長羅拔（Lobanow-Rostowsky）初擬請文忠暫居阿，候至加冕禮近再逕往莫斯科。微德極反對這辦法，乃請文忠先往聖彼得堡。（見前，微德回憶錄，第四章，七十五頁）

抵聖彼得堡後，遂於三月二十日進見俄皇（電二十六，二十八），這次只作呈國書寶星等官樣文章，並未談及路事。但微德於前一日則與文忠談話時已提及。（電二十七）至二十五，俄皇更「藉回宮驗收禮物爲名，」再接見文忠，只「令帶經方傳話，不使他人聞知。」「即引至便殿，賜坐暢談，謂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佔人尺寸地。中俄交情，更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爲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電二十九）這即微德回憶錄中所說請俄皇接見李氏之事也。（法譯本，七十七頁）末又謂「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密約之機，蓋已伏於此矣。中俄兩方，對此進見皆關防嚴密，「李文忠游歐記」對此事毫未提及，蓋當時除文忠一二親密外，即隨員亦不之知；微德回憶錄亦謂俄報紙亦從未提及此次之會談。（法譯本，七七頁）

蜜約於三月二十六日羅拔約文忠外部晚餐時，方初次提及。文忠於次日致電總署，報告此事：

昨羅拔邀赴外部晚飯，與微德會議。該君臣皆以東省接路爲急，微謂三年必成。鴻以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險，我辦漠河曠久，知漠至齊齊哈省，高山叢莽，人跡不通，必須穿過，亦甚難辦。彼謂多費工而直捷合算，中朝自辦，無款無期，不如令華俄銀行承辦較速。姑屬妥議章程送核。鴻答此須請旨定奪。至俄皇所稱援助，羅謂尚未奉諭，容二十九請示後再面商。大意以若請派兵，須代辦糧餉；華有事俄助，俄有事華助，路接成乃便。俟成准後另訂密約。（電三十一）

可見彼時文忠已與俄政府談及互助條約，但這次似只原則，而未及具體條文。至於條文則四月初一日俄人始正式提出，即（電三十四）所謂「頃羅拔奉俄主命擬具密約稿面交轉奏」者。

文忠未往俄以前，在北京曾否與俄使商及密約，現在文獻無徵。雖據史料，彼時重要疆吏，如劉坤一張之洞皆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五六二

嘗建議聯俄。劉忠誠摺謂：「各國之患猶緩，惟日本之患爲急。」「第倭之強，非俄所願，倭之擾我東三省，尤爲俄所忌。」若「我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爲聲援，並稍予以便宜，俄必樂於從我。」（劉忠誠公遺書，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五日奏摺。）張文襄所奏闡解尤詳，故抄錄其全文若下：

密陳結援要策片（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再今日救急要策尤莫如立密約以結強援之一端。從古各國角立之時，大率皆用遠交近攻之道，而於今日中國情勢爲尤切。今日中國之力斷不能兼與東洋各國相抗。此時事機甚緊，變故甚多，即日夜汲汲征繕經營，仍恐不及；若不急謀一紓禍之方，恐無喘息自強之暇。查外洋近年風氣，於各國泛交之中，必別有獨加親厚之一二國，平日豫訂密約，有戰事時，凡兵餉軍火可以互助援助。若無密約者，有事便守局外，不肯干預。今欲立約結援，自惟有俄國最便。緣英以兩腋中國之利，法以教誘中國之民，德不與我接壤，美不肯與人兵事，皆難議此。查俄國與中國乃百餘年交聘鄰邦，從未開衅，本與他國之屢次構兵者不同；且其舉動闊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即如同治庚午天津教案之案，各國爭門而俄國不與其事；伊犁之約，我國家將十八條全行駁改而俄國慨然允從；此次爲我索還遼地，雖自爲東方大局計，而中國實受其益，倭人凶鋒藉此稍挫，較之他國袖手旁觀，隱圖商利，相去遠矣。正宜乘此力加聯絡，厚其交誼，與之訂立密約。凡關係俄國之商務界務酌與通融，如俄國用兵於東方，水師則助其煤糧，其兵船可入我船塢修理，陸路則許其假道，供其資糧車馬，一切視其所資於我者，量爲協濟。面與之約定，若中國有事，則俄須助我以兵，水師尤要。並與議定若何酬報之法。蓋俄深忌英獨擅東方之利，中俄相結，則英勢稍戢。俄必願從。總之，中國惟海軍練成不易，若有俄相助，將來無論何國尋衅，數旬之內可以立發兵艦數十艘，遊行東方海面，則我得以專備陸路戰守之計，而敵人亦斷不能爲深入內犯之謀矣。此尤交鄰之微權，救急之要策也。中國於外洋各國向皆一例齊觀，此次遂無援助，此等事須平日豫籌，及今圖之，萬不可緩。應請旨敕下王大臣密行籌議，並電出使大臣密速籌商妥辦。惟萬不可使赫德聞知，恐其忌阻誤事。謹附片密陳，不勝急切屏營之至。（張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七，頁三十六—三十八）

但這只能代表一部分大臣的意見，而不能認作清廷的共策。我意派王之春以前，文忠有否聯俄具體方策，雖不

可知，清廷縱有結外援之意，但對聯俄則並未具體化。否則賀加冕原係商談的極良機會，足可利用，何以不派重臣而派王之春？觀俄人借口王之春位望未隆，其欲乘此機會與我做重要商談之意至顯，愈足見清廷初無與俄結密約之意。但文忠既受使俄之任後，文忠及許多大臣則確曾論及結援，若翁記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拜李合肥，晤談。一關朝鮮自主，一密結外援。此語尚結實。』即此類也。

中俄交往最早，邊境毗聯又最廣，雖失地最多，但未發生戰爭，未被注意。且最近又主動還遼，中俄交誼愈較他邦爲近，屬意於俄以抵日，乃自然之舉。但喀使所商談者，只及鐵路而未及具體的密約。電二十五謂『羅云：喀電不擬覆。此議出則喀前議當作廢，乞暫勿告喀。』（四月初二日電）足見接鐵路者喀之前議，密約一事，則非喀所知也。若文忠在平時已與喀有防禦同盟之商洽，則羅不當作此語矣。

（四）密約的交涉

密約既由俄方提出，交涉樞紐在予我方頗欲訂立禦倭互助條約，而不欲允俄辦接鐵路；俄人則以俄人接鐵路爲訂立條約之交換條件。三月二十五日文忠電告再進謁俄皇，俄皇謂「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電二十九）；二十七日報告羅拔、德德提及援助密約（電三十一）；但尚未有具體條件。於是清廷提出密約三條：（1）如有兵事，俄與中國彼此援助；（2）松花、混同兩江彼此行船；（3）中國以資本五百萬附入俄華銀行。內中完全不提接路事。俄人當然不能答應。是電發于四月初二日，于初四日始到莫斯科。（文忠于初四日由聖彼得堡往莫斯科）但俄人于四月初一日提出防禦同盟密約初稿，文忠轉電北京（電三十四），于初二日方達。（據翁記）兩電相左，清廷所提之密約三條，俄人所提之六項，並非互商互添改者。俄人既謂第一條即俄稿之一二兩項，俄稿足包中方所擬者，遂以俄稿爲商討依據。但清廷終不欲允接路。于是又提出省去末兩條只簽訂前四條之辦法。（電四十一）若是則俄國既失其第五項所舉之利用鐵路運兵運軍火權，且將密約與接路之連鎖失去。俄人所以堅拒，所以一則云：「鐵路無成，另約即無庸議」；（電三十八）再則云：「六款通篇結穴，一字不能改動；否則此約作罷論」（電四十三，第六條係聲明讓造鐵路舉行之日起，此約方能生效）。（下略）

（五）密約之簽訂

密約簽訂係在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頃率同李經方、李經述、羅豐祿、林怡游赴俄外部，與羅拔、德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五六四

德互看彼此全權諭旨，覆校中法約文無訛，因各畫押蓋印」。(電五十一) 德德回憶錄對此所記較詳，他說：

最後，我們約定簽密約日期。簽約者俄方爲羅拔及子，中方爲李鴻章，他已由北京直接獲得訓令。我們約定在外交大臣辦公室中會齊，依法並依照一切儀式，簽定約章。到了預定日期，俄國全權代表及其屬吏，李鴻章及其侍從，皆聚集于外交大臣辦公室內，圍坐棹旁，由羅拔宣佈開議，宣稱此約條文兩方全權代表均已深悉，現秘書已照底稿精審謄清，我們只須畫押，不必再行誦讀。(但中國代表若欲再行審讀一遍，我們當亦同意。) 此種條約共應簽押兩份，於是其中一份交與李鴻章之屬員。我就拿起其他一份，開始審查，但初未懷疑其有錯誤。忽然看出關於我們與中國防禦同盟一條，雖然曾經皇帝擔保，雖然曾經我抗議，並未照改，將使我們爲中國抵禦任何列強。我遂走近羅拔身旁，請其暫到側邊，低聲向彼耳語，說防禦同盟條並未修正，一如皇上所希望者。他開言以手摸額，說：「呀！上帝！我完全忘記吩咐秘書將該條依照初稿所擬改寫」。但是他却未管絲毫失措。他將時計一看，業已十二點一刻。於是他連喚侍役上前。他便轉身向大家說：「正午已過，先去吃飯罷，餐畢再來簽字」。

我們全體前去早餐，只留秘書二人，在我們食飯期間，重改寫一遍，加以必要的修正。新抄件遂鎮靜的替換了飯前所提出者。於是一方面由李鴻章，一方面由羅拔及子簽字其上。(德德回憶錄，法譯本，七十九至八十頁)

蓋德德既與文忠商妥中俄密約條款後，由羅拔起草約稿。但當約稿由羅拔進呈俄皇，重交到德德之時，德德看見約稿內遺忘「對日本」字樣，變成普遍的中俄防禦同盟，他又重請俄皇令羅拔增上。所以他在簽約之日，驚其並未照增而對羅拔云云也。

清末有種種謠傳，說文忠上了俄人的當，俄人在簽字時，曾抽換約本而文忠不知，當即指此。實在說起，同盟兼對英日，或係帝俄最初的意思，所以俄皇二次接見時，曾面對文忠說「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電二十九) 條約初稿亦說「日本國或與日本同盟之國如侵奪俄國屬地或中國土地，或朝鮮土地，即牽礙此約，立即照約辦理」。(電三十四) 日本同盟之國顯指英而言。但幾天以後，俄即謂當刪此數字，以免人猜疑。(電三十九)

（徵德之建議耶？現雖無證據能確知，蓋恐密約若有洩露，必生不便，則其實情也。但中國方面似欲簽訂普遍的防守同盟，所以四月初九日電旨謂：「倘中國西南水陸有事，俄國如何援助之處，亦應於約內敘明，以期周密」。〔電四十一〕西南水路有事，意當在英法。俄人明知其意，所以說：「第一言中國土地，係包西南在內，日本有事可商辦。若英法啓衅，俄不便明幫，牽動歐亞大局，應勿添絀」。〔電四十三〕徵德對此說的尤明顯：

歐洲幾個強國，我們同盟的法國以及英國亦在其內，皆在中國有利利益，我們須爲中國抵禦這些國，必使他們全反對我們，立即激出衝突。（法譯本，七十八頁）

中俄共敵是日本，專對日防禦同盟而不能普遍的敵對其餘各國，亦當然之事。普遍的防禦同盟，雖爲清廷之所極希望，但明悉歐局的俄國外交家決難應允，況亦俄國國力之所難辦到者耶！所以亦不能責徵德謂抽換約稿爲欺騙文忠也。

（六）密約定本及其訛傳

據電稿並參以外交部中外約章彙編所發表，密約定本若下：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暨大俄國大皇帝陛下，因欲保守東方現在和局，不使日後別國再有侵佔亞洲土地之事，決計訂立禦敵互相援助條約。是以大清國大皇帝特派大清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爵李鴻章；大俄國大皇帝特派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外部尚書內閣大臣上議院大臣責任樞密院大臣王爵羅拔諾甫，大俄國欽差全權大臣戶部尚書內閣大臣樞密院大臣徵德，爲全權大臣，即將全權文憑互換校閱，均屬如式，立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日本國如侵佔俄國亞洲東方土地，或中國土地，及朝鮮土地，即牽礙此約，應立即照約辦理。

如有此事，兩國約明，應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

第二款 中俄兩國既經協力禦敵，非由兩國公商，一國不能獨自與敵議立和約。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五六六

第三款 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事，中國所有口岸，均准俄國兵船馳入，如有所需，地方官應盡力幫助。

第四款 今俄國爲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軍火糧食，以期妥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威。惟此項接造鐵路之事，不得藉端侵佔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礙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國國家交華俄銀行承辦經理；至合同條款，由中國駐俄使臣與銀行就近商訂。

第五款 俄國於第一款禦敵時，可用第四條所開之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平常無事，俄國亦可在鐵路運過境之兵糧，除因轉運暫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第六款 此約由第四款合同批准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五年爲限，屆期六個月以前，由兩國再行商辦展限。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俄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訂於莫斯科。

既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簽訂後，更于五月十一日上諭批准（電二十六）。約本由塔克什訥齋回（補電四），于七月十五日抵平。更于八月二十日在北京換約。任換約者，俄方爲喀使，中方則慶王、翁同龢、張蔭桓。翁文恭日記對約本抵京，用寶，換約等事，所記尚細，茲錄于後，以見當時實情。

七月十五日：塔克什訥（同文館翻譯，道員用，李相隨員。）從俄國由德國歸，齋約本來。酷暑走紅海，同舟爲日本王爵某，極費周防也。約本有匣，匣匙由函中來。函匙交樵野，樵野仍交余。約本則令姑持歸，俟商定遞法再給信。

十七日：道員塔克什訥兩次來見，以箱一件面交，略檢點一過，付收據予之，明日携入。

十八日：是日以李相寄到之密約本呈遞，其管鑰面呈，諸皆慎密。派慶邸二十日携至懋勤殿用寶。不知照內閣，不令章京伺候。

十九日：約本批准發下。

二十日：約本派慶邸用寶訖，仍由軍機帶上，請留中。

八月二十二日：發下密約要件……午正偕樵野，開看要件，遂歸。檢磁器爲喀使贖：龍泉大盤一枚，江西新製瓷燈二，極華藻。樵野來，未正二刻同詣俄館，以酒果款我。慶邸於申刻到，始就坐。談數刻，始以要件互看，以一本交之，留一本（畫押者）爲據。以漢文憑單二件，三人銜名下各畫押，各用名印訖，因不用總署印也。法文二件，照樣畫押用名印，遂各留一件。遞時各言兩國邦交日密，永敦和好，又就坐舉酒互祝而罷，約一時許也。喀觀所送物，喜溢於面。又見其女，能華言。樵野來齋，飯而去。夜檢要物入匣。

二十三日：卯正三刻見起，奏明昨日互換事，將管鑰及兩要件繳上，垂詢頗詳。

密約交涉及其簽訂既極秘密，然接路一事又不能秘密，於是外人遂有種種揣測。簽約後不久，文忠已謂「英使探詢，並謂北京駐使電告立約」之事（電五十九）。當時各國對此約必甚留意。後上海字林西報更發表一偽造密約全文，當時頗爲人所信，西人且採入中外交涉書中，至今尚有人信之者。但現既能在電稿內看見當時交涉之各種真確電文，字林西報發表之約之爲偽造，自能不待深論而自明。茲爲比較起見，特錄於下，以免其久作魚目之混珠。

偽造之密約

大清國大皇帝於中日肇釁之後，因奉大俄羅斯國大皇帝仗義各節，並願將兩國邊疆及通商等事於兩國互有益者，商定妥協，以國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國欽命督辦軍務處王大臣爲全權大臣，會同大俄羅斯國欽差出使中國全權大臣一等伯爵喀，在北京商定，將中國之東三省火車道，接連俄國西卑利亞省之火車道，以冀兩國通商往來迅速，沿海邊防堅固，並議專條，以答代索遼東等處之義。

第一條 近因俄國之西卑利亞火車道竣工在即，中國允准俄國，將該火車道，一由俄國海參威埠，續造至中國吉林琿春城，又向西北續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國境某城之火車站，續造至中國黑龍江之璦琿城，又向西北續至齊齊哈爾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訥地方，又向東南續造至吉林省城止。

第二條 凡續造進中國境內黑龍江及吉林各火車道，均由俄國自行籌備資本，其鐵道一切章程，亦均

依俄國火車章程，中國不得與聞。至其管理之權，亦暫行均歸俄國，以三十年爲期，過期後，准由中國籌備資本，估價將該火車道並一切火車機器廠房屋等贖回，唯如何贖法，容後再行妥酌。中國現有火車路，擬自山海關續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城接續至吉林，倘中國日後不便即時造此鐵路者，准由俄國備資，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爲期贖回。至鐵路應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

第三條

第四條 中國所擬續造之火軍道，自奉天至山海關，至牛莊，至蓋平，至金州，至旅順口，以及至大連灣等處地方，均應仿照俄國火車道，以期中俄彼此來往通商之便。

第五條

以上俄國自造之火車道，所經各地方，應得中國官員照常保護，並應優待火車道各站之俄國文武各官及一切工匠人等。惟由該火車道所經之地，大半荒僻，猶恐中國官員不能隨時保護周詳，應准俄國專派馬步各兵數隊，駐紮各要站，以期妥護商務。

第六條

自造成各火車道後，兩國彼此運進之貨，其納稅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陸路通商條約完納。

第七條

黑龍江及吉林長白山等處地方所產五金之礦，向有禁例，不准開挖。自此約定後，准俄國以及本國商民隨時開採。惟須先行稟報中國地方官，具領護照，並按中國內地礦務條程，方准開挖。

第八條

東三省雖有練軍，惟大半軍營仍係照古制辦理，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國借請熟悉營務之武員，來中國整理一切。其章程則與兩江所請德國武員條程辦理無異。

第九條

俄國向來在亞細亞洲無周年不凍之海口，一時該洲若有軍務，俄國東海以及太平洋水師，諸多不便，不得隨時駛行。今中國因鑒於此，是以情願將山東省之膠州地方暫行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爲限，其俄國所造之營房棧房機器廠船塢等類，准中國於期滿後，估價備資買入。但如無軍務之危，俄國不得即時屯兵據要，以免他國嫌疑。其貨稅之款，應得如何辦理，日後

另有附條酌議。

第十條

遼東之旅順口以及大連灣等處地方，原係險要之處，中國極應速爲整頓各事，以及修理各炮臺等諸要務，以備不虞。既立此約，則俄國允准將此二處相爲保護，不准他國侵犯。中國則允准將來永不能讓與他國占踞。惟日後如俄國忽有軍務，中國准將旅順口及大連灣等處地方，暫行讓與俄國水陸軍營屯於此，以期俄國攻守之便。

第十一條

旅順口、大連灣等處地方，若俄國無軍務之需，則中國自行管理，與俄國無涉。惟東三省火車道，以及開挖五金礦諸務，准於換約後即時便宜施行。俄國文武官員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處，中國官員應格外優待保護，不得阻滯遊歷各處地方。

第十二條

此約奉兩國御筆批准後，各將條約照行，除旅順口、大連灣及膠州諸款外，全行曉諭各地方官遵照，將來換約應在何處，再行酌議，自畫押之日起，以六個月爲期。

此僞約歐美人稱爲喀西尼條約 *Cassini Convention* 謂爲俄使喀西尼與督辦軍務王大臣所訂者。予意此僞約必

非字林西報記者所完全自造，而是出于當時交民巷外交界之所僞傳。換密約時，慶邸及翁同龢曾往俄使館，慶、翁皆爲督辦軍務處王大臣，此事當爲交民巷外交界之所知，遂謂喀使與督辦軍務處王大臣議訂密約；不知當時皆慶、翁同往者尚有張蔭桓，則非督辦軍務處王大臣也。並且喀使對密約事，最初並無所知，交涉中心先在聖彼得堡，後在莫斯科，而非北京，交涉中心人物爲文忠及徵德而非喀使及在京諸王大臣也。初提交涉時，羅拔且告文忠，暫勿告喀矣（電三十五）；密約甫成，俄人已有換喀使之意（電五十六），俄人始終未以密約交涉重任加諸喀也。僞約之爲十二條當亦出于鐵路合同十二條之所訛傳，其實既與真密約條文不同，與鐵路合同亦不完全相似，閱者試將之與以上真約文及下章所載之鐵路合同相比較，自能確悉其皆不同，僞約內只提起接修鐵路而未及互助防禦同盟，愈足證密約之秘密未爲當時他國外交界所能窺探，外人所能探知者只片斷的鐵路合同而已。

（七）中東鐵路之交涉（略）

（八）結語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五七〇

李文忠使俄及簽訂中俄密約，中國外交史上一至爲重要之事也。蓋自道光以後，中外諸役，造成清廷對外採取一體敵視的態度，可謂爲一體拒外的外交。於是中外分成兩個分明的壁壘。動一國則諸國齊怒，憲一國則餘國亦要求利益均沾，其政策之結果若此。及帝俄首倡干涉遼遠，於是始悟對於各國不妨有聯有拒，但以護持國家利益爲標準，遂由一體拒外的外交變爲有聯有拒的外交，中俄密約即其嘗試也。不幸帝俄之目的只在接路，而防禦問題不過魚餌，原無誠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不悟及此。故密約甫簽而俄皇已以膠州面許德皇矣（見德德回憶錄及俄皇德皇往來函簡）；德佔膠澳而帝俄之軍隊且侵入旅順大連矣。於是更悟俄之干涉遼遠原爲俄而非爲中國也。有聯有拒之外交嘗試遂告失敗，其反動不只一體拒外，且一體仇外而釀成庚子之拳禍。嘗試雖未成，然俄人遂建鐵路於東北，勢力亦由之而漸入於東三省。及庚子俄人更佔東北，於以發生日俄戰爭，馴至於九一八，下至於雅爾達協定，以造成大陸之淪陷，幕幕層層，莫不導源於中俄密約，則其重要蓋可見矣。

註一：「翁文恭日記」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條。

註二：外交部藏「中俄密約」原件。

註三：同註二。

註四：徵德著、王光祈譯：「李鴻章遊俄記事」第一章，民國五十一年三月，臺灣中華書局影印版。

註五：錄自裘毓慶：「清代軼聞」卷四。

註六：節自徐夢熊：「旅大之命運與革命運動」第三章。

註七：本文連載於「大陸雜誌」第一卷、第一、三、四、六、八等期。

二十四日（六月五日） 清廷與法國訂立廣西龍州至越南同登鐵路合同，允越南鐵路築至龍州。

初，清廷於本年二月初一日允法國承辦龍州鐵路，二月初十日，清廷派廣西提督蘇元春爲龍州鐵路官局督辦。本日，總理衙門總辦章京舒文，與法國費務林公司在北京訂立廣西龍州至越南同登鐵路合同八條，允越南鐵路築至龍州。合同全文如下：

第一條 中國予令費務林公司承辦廣西龍州至鎮南關鐵路，官局稽察其辦法各款開列於後：

第二條 費務林公司因此專爲無名貿易公司，承受中國官局令，於官局名下築造鐵路，由官局稽察其造路，並預先勘路，均係包辦。凡築造及傢伙機器房屋物料車輛等件，應於勘路後，由官局公司會商包估價值，造路須佔之地，均由官局自公司呈交鐵路佔地各圖式之日起，至多六個月限內，交清公司修造，官局即將費用與工程節次隨成隨還，每月底由公司計開費用，呈報官局，自呈報日起至多三個月限內，飭令付價，倘有限內未付之款，按每年七厘（即百分之七）行息，至付清日止息。至所開賬目均用法銀法郎計算，俟付還銀兩時，均按呈交賬目日期前三個月內，兌換中法兩國銀行市折中算結。至造路工程除遇有意外事故外，均限自將地交與公司日後計，至多三年內造成。

第三條 費務林公司照以上所載，專爲無名貿易公司，承受中國官局令，於官局名下經理鐵路，由官局稽察。如此經理均係包辦，由官局與公司勘估後會商統計，特開酌算款式內以補還經理實在用費若干，並貼與總用雜項若干，及經理進項實存項下酬賞令公司花紅若干包，還公司至經理進項內所有搭客運貨係自龍州至鎮南關，並自鎮南關至諒山以次各處，由中國往越南或越南往中國，即仿照各電報局之例，互相較對分歸清算。

第四條 中國鐵路搭客運貨及越南之法國鐵路搭客運貨，均由公司酌擬價目，中國則請中國官局定準，越南則請法官定準，總宜一律相同。

第五條 龍州越南各路相接爲經理鐵路之用，須設沿路電線，自應照通例任各鐵路局自用，不納電費，或有轉送電報與經營鐵路無涉者，應照各電報局價目納費如常。

第六條 凡築造經理鐵路之材料什物機器車輛器具傢伙等件，無論何項關稅，運費一概豁免。至鐵路所用華洋人員，中國自設公法，令其相安如命工作無滯。

第七條 龍州至中國邊界鐵路，其經理辦法，由中國官局與越南法官會商章程，總期與經理越南之鎮南關至諒山等鐵路不致斷絕。其鐵軌寬窄，履勘後酌量情形，由中國官局自定。此次合同以三十六年爲期，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四月二十八日

五七二

滿亦准會商展久新立。

第八條 中國官局與此章程訂明如何承辦築造經理之公司，遇因事故參差，應由官局公司各擇一人，此二人復公擇其一，以便三者會議公斷。惟三者必須法國或中國之人。此次合同繕就漢文法文各二分，彼此各存一分，遇有可疑不符之處，以法文爲準。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在中國京郡立。（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二，頁七。

二十八日（六月九日） 日俄簽訂朝鮮議定書。

本日，致賀俄皇加冕之日使山縣有朋與俄外務大臣羅拔諾夫簽訂朝鮮議定書，日俄合募朝鮮外債，互不干涉其軍警，彼此均得架設電線。錄其內容如下：

議定書

日本國皇帝陛下ノ特命全權大使陸軍大將山縣侯爵及露西亞國外務大臣ル、スクレテール、デター、プランス、ロバノフ、ロストウスキーハ朝鮮國ノ形勢ニ關シ其ノ意見ヲ交換シ左ノ諸條ヲ協議決定セリ。

第一條 日露兩國政府ハ朝鮮國ノ財政困難ヲ救済スルノ目的ヲ以テ朝鮮國政府ニ向テ一切ノ冗費ヲ省キ且其ノ歲出入ノ平衡ヲ保ツコトヲ勸告スヘシ若シ萬止ヲ得ザルモノト認メタル改革ノ結果トシテ外債ヲ仰クコト必要トナルニ到レバ兩國政府ハ其ノ合意ヲ以テ朝鮮國ニ對シ其ノ援助ヲ與フヘシ。

第二條 日露兩國政府ハ朝鮮國財政上及經濟上ノ狀況ノ許ス跟リハ外撥ニ藉ラスシテ內國ノ秩序ヲ保ツニ足ルベキ內國人ヲ以テ組織スル軍隊及警察ヲ創設シ且ツ之ヲ維持スルコトヲ朝鮮國ニ一任スルコトトスベシ。

第三條 朝鮮國トノ通信ヲ容易ナラシムル爲メ日本國政府ハ其ノ現ニ占有スル所ノ電信線ヲ引續キ管理スヘシ。

露國カ京城ヨリ其ノ國境ニ至ル電信ヲ架設スルノ權利ヲ留保ス

右諸電信線ハ朝鮮國政府ニ於テ之ヲ買收スベキ手段附キ次第之ヲ買收スルコトヲ得ルモノトス。

第四條

前記ノ原則ニシテ尙ホ一層精確且詳細一層精確且詳細ノ定義ヲ要スルカ又ハ後日ニ至リ商議ヲ要ス

ヘキ他ノ事項生シタルトキハ兩國政府ノ代表者ハ友誼的ニ妥協スルコトヲ委任セラルヘシ

第一條

原因ノ内外タルヲ問ハズ若シ朝鮮國ノ安寧秩序亂レ若クハ將ニ亂レントスルノ危懼アリテ若シ日露兩國政府ニ於テ兩國臣民ノ安寧ヲ保護シ及電信線ヲ維持スルノ任務ヲ有スル軍隊ノ外其ノ合意ヲ以テ更ニ軍隊ヲ派遣シ内國官憲ヲ援助スルヲ必要ト認メタルトキハ兩帝國政府ハ其ノ軍隊間ニ總テノ衝突ヲ豫防スル爲メ兩國政府ノ軍隊ノ間ニ全ク占領セサル空地ヲ存スル様各軍隊ノ用兵地域ヲ確定スヘシ

第二條

朝鮮國ニ於テ本議定書ノ公開條款第二條ニ掲クル内國人ノ軍隊ヲ組織スルニ至ル迄ハ朝鮮國ニ於テ日露兩國同數ノ軍隊ヲ置クコトノ權利ニ關シ小村氏ト「ルコンセイエーデター、アクチユエル、ド、ウエバー」氏ノ記名シタル假取極ハ其ノ効力ヲ有スヘシ朝鮮國大君主ノ護身上ニ關シ現ニ存在スル狀態モ亦特ニ此ノ任務ヲ有スル内國人ヲ以テ紙織セル一隊創設セラルニ至ル迄ハ均シク之ヲ繼續スヘシ

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九日「モスクウ」府ニ於テ之ヲ書ス
五月廿八日

山 縣 手 署

ロパノフ 手署 (註一)

註一：錄自日本外交文書，明治二十九年，頁八一七——八一八。

五月

二日(六月十二日) 清禮部侍郎李端芬奏請自強育才，於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設大學堂。

甲午喪師後，朝野深慨時事多艱，人才凋乏，紛主興學育才。本日，禮部侍郎李端芬於「推廣學校以勵人才摺」中，奏請在京師建立大學，自京師以下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並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游歷。其原奏曰：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言人材之多寡繫國勢之強弱也。去歲軍事既定，皇上順窮變通久之義，將新庶政以圖自強，恐辦理無人，百廢莫舉，特降明詔，求通達內外能周時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薦以備擢用。綸綍一下，海內想望，以爲豪傑雲集，富強立致。然數月以來，應者寥寥，即有一二，或僅束身自好之輩，罕有濟難瑰偉之才，於側席盛懷，未能盡副。夫以中國民衆數萬萬，其爲士者十數萬，而人才乏絕至於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盡也。夫二十年來，都中設同文館，各省立實學館、廣方言館、水師武備學堂、自強學堂，皆合中外學術相與講習，所在皆有。而臣願誦教之道未盡，何也？諸學皆徒習西學西語西文，而於治國之道，富強之原，一切要書多未肄及，其未盡一也。格致製造諸學，非終身執業，聚衆講求，不能致精，除湖北學堂外，其餘諸館，學業不分齋院，生徒不重專門，其未盡二也。諸學或非試驗測繪不能精，或非游歷考察不能確，今之諸館，未備器圖，未遣游歷，則日求之於故紙堆中，終成空談，自無實用，其未盡三也。利祿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從事帖括以取富貴，及既得科第，遂與學絕，終爲棄才。今諸館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雖或向學，欲從末由，其未盡四也。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橫流非獨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變之亟，必求多士，始濟艱難。今十八行省祇有數館，每館生徒祇有數十，士之欲學者，或以地僻而不能達，或以額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館學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於治天下之才萬不足一，況於功課不精，成就無幾，其未盡五也。此諸館所以設立二十餘年而國家不一收奇才

異能之用者。惟此之故，曰：然則巖穴之間，好學之士，豈無自績學以待驅策者，曰：格致製造農商兵礦諸學，非若考據詞章帖括之可以閉戶翫祭而得也。書必待繙譯而後得讀，一人之學能繙羣籍之業，必待測驗而後致精。一人之力能購群器乎？學必待游歷而後徵實。一人之身能履羣地乎？此所以雖有一二個儻有志之士，或學焉而不能成，或成矣而不能大也。乃者欽奉明詔設官書局於都畿，領以大匠以重其事，伏讀之下，仰見聖神措施，洞見本原。臣於局中一切章程雖未具悉，然知必有良法美意，以宜達聖意闡揚風化者，他日奇才異能由斯而出，不可勝數也。惟育才之法，匪限於一途，作人之風，當偏於率土，臣請推廣此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學皆設學堂，府州縣學，選民間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學，其諸生以上欲學者聽之，學中課程，誦四書、通鑑、小學等書，而輔之以各國語言文字及算學、天文、地理之粗淺者，萬國古史近事之簡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爲期。省學選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學，其舉人以上欲學者聽之，學中課程，誦經史子及國朝掌故諸書，而輔之以天文、輿地、算學、格致、製造、農桑、兵礦、時事、交涉等書，以三年爲期。京師大學，選舉貢監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願學者聽之，學中課程一如省學，惟益加專精，各執一門，不遷其業，以三年爲期。其省學大學所課，門目繁多，可做宋胡瑗經義治事之例，分齋講習，等其榮途，一歸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則人爭濯磨，士知嚮往，風氣自開，技能自成，才不可勝用矣。或疑似此興作，所費必多，今國家正值患貧，何處籌此巨款？臣查各省及府州縣率有書院，歲調生徒入院肄業，聘師講授，意美法良，惟奉行既久，積習日深，多課帖括，難育異才。今可令每省每縣各改其一院，增廣功課，變通章程，以爲學堂，書院舊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撥官款補之。因舊增廣，則事順而易行，就近分籌，則需少而易集。惟京師爲首善之區，不宜因陋就簡，示天下以模，似當酌動帑藏以崇體制，每歲得十餘萬，規模已可大成。中國之大，豈以此十餘萬爲貧富哉？或又疑所立學堂既多，所需教習亦衆，竊恐乏人堪任此職。臣以爲事屬創始，學者當起於淺近，教者亦無取精深。今宜令中外大吏各舉才任教習之士，悉以名聞，或就地聘延，或考試選補，海內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學堂既立，遠之得三代庠序之意，近之采西人廠院之長，興賢教能之道，思過半矣。然勸其記誦而不廓其見聞，非所以造異才也。就學者有日進之功，其不能就學者無講習之助，非所以廣風氣也。今推而廣之，厥有與學校之益相須而成者蓋數端焉。一曰設藏書樓，好學之士，半屬寒賤

購書既苦無力，借書又難其人，坐此孤陋寡聞無所成就者，不知凡幾。高宗純皇帝知其然也，特於江南設文宗、文匯、文瀾三閣，備庋秘籍，恣人借觀。嘉慶間，大學士阮元推廣此意，在焦山、靈隱起立書藏，津逮後學，自此以往，江浙文風甲於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諸國頗得此道，都會之地皆有藏書，其尤富者至千萬卷，許人入觀，成學之衆，自由於此。今請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廣，自京師及十八行省省會，咸設大書樓，調殿板及各官書局所刻書籍暨同文館製造局所譯西法，按部分送各省以賞之，其或有切用之書爲民間刻本官局所無者，開列清單，訪明價值，徐行購補。其西學陸續譯出者，譯局隨時咨送，妥定章程，許人入樓看讀，由地方公擇好學解事之人經理其事。如此，則向之無書可讀者，皆得以自勉於學，無爲棄才矣。古今中外有用之書，官書局有刻本者居十之七八，每局酌提數部分送各省，其費至省，其事至順，一奉明詔，事即立辦，而餉遺學者，增益人才，其益蓋非淺鮮也。二曰創儀器院也，格致實學，咸藉試驗，無遠視之鏡，不足言大學，無測繪之儀，不足言地學；不多見礦質，不足言礦學；不習觀汽機，不足言工程之學，其餘諸學，率皆類是。然此等新器，所費不貲，家即素封，亦難備購。學何從進，業焉能成？今請於所立諸學堂咸別設一院，購藏儀器，令諸學徒皆就試習，則實事求是，自易專精，各器擇要而購，每省撥萬金以上，已可粗備。此後陸續添置，漸成大觀，則其費尙易措籌，而學徒所成，視昔日紙上空談，相去遠矣。三曰開譯書局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與西人交涉而不能盡知其情偽，此見弱之道也。欲求知彼，首在譯書。近年以來，製造局、同文館等處譯出刻成已百餘種，可謂知所務矣。然所譯之書，詳於術藝而略於政事，於彼中治國之本末，時局之變遷，言之未盡，至於學校、農政、商務、鐵路、郵政諸事，今日所亟宜講求者，一切章程條理，彼國咸有專書，詳哉言之。今此等書悉無譯本，又泰西格致新學，製造新法，月異歲殊，後來居上，今所已譯出者，率十年以前之書，且數亦甚少，未能盡其所長，今請於京師設大譯書館，廣集西書之言政治者，論時局者，言學校農商工礦者，及新法新學近年所增者，分類譯出，不厭詳博，隨時刻布，廉值發售，則可以增益見聞，開廣才智矣。四曰廣立報館也，知今而不知古，則爲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則爲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讀書，欲通今者莫若閱報；二者相須而成，缺一不可。泰西每國，報館多至數百所，每館每日出報多至數萬張，凡時局、政要、商務、兵機、新藝、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閱報之人，上自君后，下自婦孺，皆足

不出戶而於天下事瞭然也。故在上者能審辦庶務而無壅蔽，在下者能通達政體以待上之用，富強之原，厥由於是。今中國邸鈔之外，其報館祇有上海、漢口、廣州、香港十餘所，主筆之人，不學無術，所言率皆淺陋不足省覽，總署海關近譯西報，然所譯甚少，又未經印行，外間未由得見。今請於京師及各省會並通商口岸繁盛鎮埠成立大報館，擇購西報之尤善者，分而譯之，譯成除恭繕進呈御覽並咨送京外大小衙門外，即廣印廉售，布之海內，其各省政俗土宜，亦由各館派人查驗，隨時報聞，則識時之俊日多，幹國之才日出矣。五口選派游歷也，學徒既受學數年考試及格者，當選高才以充游歷。游歷之道有二：一游歷各國，肄業於彼之學校，縱覽乎彼之工廠，精益求精，以期大成；一游歷各省，察驗礦質，鉤核商務，測繪輿地，查閱物宜，皆限以年期，厚給薪俸，隨時著書歸早有司，察其切實有用者，爲之刊布，優加獎勵，其游惰而無狀者，官則立予黜退，士則奪其出身。數年之後，則輟軒絕域之士，斐然成章，郡國利病之書，備載繁爛矣。或疑近年兩次所派游歷學生未收大效，不知前者所派游歷，乃職官而非學童，在中國既未經講求，至外洋亦未嘗受學，故事涉窄狹，寡有所成。其所派學生，又血氣未定，讀中國書太少，游歷絕域，易染洋風，雖薄有技能，亦不適於用。今若由學堂選充，兩弊具免，其所成就，必非前此之所能例也。夫既有官書局、大學堂以爲之經，復有此五者以爲之緯，則中人以上，皆可自勵於學，而奇才異能之士，其所成就益遠且大，十年以後，賢俊盈廷，不可勝用矣。以修內政，何政不舉？以雪舊恥，何恥不除？上以恢列聖之遠猷，下以懾強鄰之狡啓，道未有急於是者。若仰蒙采擇，乞飭下中外大臣妥議章程，遵旨施行。」（註一）

相傳此摺係由梁啟超代擬，奏上後，旋經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度察情形，妥籌辦理。其於後來教育系統之創擬，京師大學堂之設立，中國新式教育之建立，俱有密切關係。當時各省之紛紛自動設學，如湖南巡撫陳寶箴所創之時務學堂，安徽鄧莘熙之請建二等學堂等，均受此奏之影響。（註二）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三七七三。

註二：陳登原：「中國教育史」頁四八二，商務印書館出版。

三日(六月十三日) 李鴻章抵德國柏林，次日覲見德皇威廉二世。

李鴻章此次出使，另負有改訂中國海關稅則之使命，在俄交涉未獲結果，其他歐美各國多採取拖延態度，德國反欲實現借港泊船之野心。本日，鴻章自俄抵柏林，次日德皇接見，禮遇甚隆。「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記曰：

「初四日，(西六月十四號)午正二刻，德皇升耐芝堂(譯言官中馬兵廠，昔普魯士王行大禮處也)。召見節相，遣皇車四輛來迓，公子伯行觀察、羅稷臣觀察、德弁李袁德偕，登第一車；節相與奉迓之鴻臚寺卿男爵游司登君及隨使譯員登第二車；餘登第三四車，馬兵前導後擁，肅穆無譁。抵外庭，鑾儀衛容兵宿衛，森然植立。游卿導下車，偕各官趨入紅樓門，兩翼御林，立無隙地。既抵大門，遙見德皇南面坐，親王貴戚及百官各序侍，將近階，隨員止步，節相獨捧國書而入，向上三揖，敬呈德皇，致頌詞，並頌及德先皇。大意謂中德邦交，逾於諸國，仗義索遼，實銘厚德。語至此，隨員遂將所齎珍物數品，陳之御座。節相又謝曾遣武員教練華兵，並款待使臣至優極渥之厚誼，代皇上敬謝德皇，申致皇上與德皇互相欽愛之意。頌畢，譯員操德語覆述，德皇領點數四，取案頭預製答詞，親誦一過，德瑾琳樞使操華語述之節相，頌節相以大才能，大名望，老大臣，意謂中德從此益敦親睦，並祝中國金甌永固，長享太平。又謝我皇上致書盛意，並勞節相遠來，大賓辱光，無限欣忭之語，言形於色，意餘於言，節相復向上三揖辭出，乘車回館。」(註一)

註一：「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引自「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三九三。

四日(六月十四日) 臺灣雲林簡義、柯鐵舉兵抗日。

臺灣陷日後，抗日行動風起雲湧，數年之間，北自基隆，南至恆春，大小戰役不下數十次，日人窮於應付。初期以北部為烈，蓋因北部淪陷較早，受日人荼毒最甚，且臺北為日人軍政中心。其領導人物有陳秋菊、胡嘉猷、林大北、簡大獅等。

本日，簡義、柯鐵所領導之中部義軍在雲林大坪頂舉義。簡義原為抗拒南侵日軍之雲林義軍首領，

柯鐵父子則爲豪俠之士。五月九日，簡義、柯鐵與日軍戰於大坪頂，日軍大規模屠殺、焚燬、姦淫，遇害者甚衆，即所謂「雲林事件」。於是人民怒火高燃，男婦老幼奮起，五月十八至二十日，連下林杞埔、集集、雲林、斗六，大破日軍，日本軍警聞風而逃，鹿港、彰化、嘉義一帶民衆紛起響應，攻臺中，克北斗，消息震動世界。（註一）

註一：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正中書局），頁二三三—二三四。

十六日（六月廿六日） 孫先生文自檀香山抵舊金山，嗣即轉赴紐約。沿途宣傳革命，並聯絡洪門致公堂。

孫先生文居檀香山約半載，雖欲推廣興中會會務，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乃決計赴美，以聯絡當地華僑，蓋其衆較檀島多數倍也。

本日，孫先生抵舊金山，嗣乘火車橫渡美洲大陸，以達大西洋岸之紐約。沿途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華僑中不乏反清團體，其中以洪門致公堂勢力爲最大，會員亦最衆。孫先生以是與之聯絡，勸其贊助革命，共襄大事，終以致公堂會員多已忘却洪門之原來宗旨，而難收速效。此時孫先生所作革命宣傳，雖精義不能爲多數人所理解，惟先生演說常能深入淺出，激發其潛伏之民族意識，影響所及，風氣漸開。據孫先生自述云：

「美國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組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嘗

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枝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合羣衆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佈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後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尚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註一）

另據馮自由記曰：

「美洲華僑風氣之蔽塞，較檀島尤盛。旅檀華僑以香山人爲多，粵人與外人交際，亦以香山人爲接近，故香山人實得外洋風氣之先。中山初次在檀籌款，泰半得自香山人，即因香山人較他處人爲開通也。美洲華僑以新寧、新會、開平、恩平之四邑人佔大多數，其頑固守舊之習慣，及崇拜官僚之思想，遠過於內地。中山初到美時，在舊金山登陸後，乃乘火車橫過美洲大陸，以達太平洋西岸之紐約，沿途經沙加緬度、芝加哥各城市，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向華僑痛言革命救國之真理，欲其熱心時事，合力救亡。然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且以中山爲謀反大逆，視同蛇蝎，其肯與往還者，僅耶穌教徒數人而已。又是時華僑所立會館堂號各種團體，星羅棋布，各以邑界，姓

界爲標幟。就中以洪門致公堂爲團體最大，會員最衆，其宗旨爲反清復明，即閩粵兩省所盛行之三合會支派也。中山以其宗旨相同，在粵時因鄭士良等交遊，於該會內容亦知大概，故對於洪門人士，嘗苦心孤詣，勸其實行革命排滿之主張，與內地革命黨聯合進行，共舉大事。然致公堂對於洪門之本來面目，早不了解，所謂反清復明四字，僅於入闖（洪門稱加盟爲入闖）時循例言之，彼等固亦不知何所取義。故中山叩以宗旨所在，彼等皆瞠然不能置答，惟彼等雖遺忘其政治之意義，而於手足相顧患難相扶之情誼，則敬謹遵守，歷久勿替。此其團體所以能擴大鞏固，屹然爲華僑各團體之冠也。（註二）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載「國父全集」（中央文物供應社）第二集，頁八十二—八十四。
註二：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頁三十七。

十七日（六月二十七日） 清駐舊金山總領事馮詠衡電駐美公使楊儒，報告孫先生文抵埠情事。

先是，清總理衙門聞孫先生自檀香山赴美，即函出使美國大臣楊儒，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希即確查密覆」。（註一）楊儒當即密飭舊金山總領事馮詠衡確查。及孫先生抵美，馮詠衡即將各情電報楊儒曰：

「孫文……身材短小，面黑微鬚，剪髮洋裝，由檀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國金山人，素係檀島銀行副買辦；一名威陸，亦美國人，向在檀島服官，前次創議廢王，因其未盡機籌，所謀不逞。均挾厚資，居檀年久，是否孫文同黨，尙難臆斷，惟見同船偕來，交情甚洽。孫文借寓金山沙加冕街第七〇六號門牌，華商聯勝雜貨舖內，聞不日往施家谷（Chicago）轉紐約，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並聞有沿途聯合各會黨，購買軍火，欲圖報復之說。該犯隨身攜帶私刊書冊兩本，雖無悖逆實蹟，檢其上傳相書，確有該犯之名，顯係孫文無疑。現將原書設法覓取寄呈，俟訪問該犯赴紐行期，再行電稟等語。查閱該犯書冊兩本，一係摘錄明黃黎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稱杞憂公子；一係上李傅相書洋洋萬餘言，自稱文素在香港習西醫，已蒙考取，欲乞

傅相專委籌辦農務，兩種文筆俱暢達，昨已附致總署備核矣。」（註二）

李鴻章晤德國俾斯麥首相，詢以中國復興之道，俾斯麥勸練精兵。

本日，李鴻章造訪俾士麥，兩人相敘甚洽。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曰：

「十七日（西六月二十七號）節相預與俾士麥王約，訪諸其家，即乘火車造王邸，夾道觀者蜂屯蟻聚，車停，俾王聞節相至，盛服俟於門首，相見而揖，皆身長玉立，風采偉然。既近，相與握手立談，譯員旁侍，代傳問答語。俾王曰：『噫！大國位尊望重之名臣，何幸而辱臨敝地！』節相注視而後言曰：『向聞西拉內的（譯言高且靜，如穆然在雲霄之上，蓋尊之也。）之大功德，不解何以達到神妙不測地步，今見西拉內的之目，如見心矣。』俾王曰：『勞黼鐵納絲（譯言高貴勝人氣象，亦尊之也。）已成就奇勳矣。』節相曰：『去西拉內的遠甚。』俾王曰：『大好大好，總之，我等不過自完本分耳。』語次，尚未登堂，見節相有勞色，肅入敝坐，互述老景。節相問王體如何，俾王曰：『夜恆不能熟寐，甚苦之。』節相曰：『僕且常痛。』俾王曰：『僕幸不痛，惟不能終夕睡。』節相以類傷示王曰：『痛尤劇，曾染風疾也。』旋入座，食點，隨員皆在座。節相曰：『僕之來謁，有一事乞清誨也。』俾王曰：『何事？』曰：『欲中國之復興，何道之善？』俾王曰：『惜相去太遠，貴國政事平日未嘗留意，無從懸斷。』節相又問何以圖治？俾王曰：『以練兵立國基，舍此無策。夫兵不貴多，一國兵數不必逾五萬，特年必少，技必精，斯所向無敵。』節相曰：『中國非無人之爲患，無教習亦無兵法之爲患，僕蓄意三十年，終無以變弱而爲強，赧愧滋甚。今五洲精兵，莫貴國若，異日同國，必仿貴國制練新軍，惟教習須貴國是賴。』俾王曰：『練兵更有進者，一國之軍，不必分駐，駐中權，扼要地，無論何時何地，有需兵力，聞令即行，然行軍之路，當先籌焉。』又曰：『敝國王相何恩祿與僕同事三十年，才長幹濟，內治外交皆盡善。』又曰：『中德永睦，僕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與曾侯（曾惠敏公）會議，同懷此意。』筵撤，有人持儀器入，或鏡或筆，爲二公留影。俾王旋出一冊，皆天下名賢翰墨，請節相命筆，節相忻然書之。若曰：『僕聞王盛名三十餘年，不過如空谷應聲，今見之，直如

劍氣珠光，不敢逼視。」譯員譯而述之，俾王謙不敢當，臨別復揖讓久之。是日也，爵相著黃馬褂，德國素無品級服，俾王佩紅鷹大十字寶星，而首冠御賜之玉冕，手執先王之介圭，腰佩登壇之寶劍，之三者，白德先皇威良第一謝世後，無第二人得其賜，俾王亦非遇大典禮大朝會罕有一日而三事具之者，今以之款節相，其敬節相也至矣。」（註三）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八八。

註二：蘇德用：「國父革命運動在檀島」，「國父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頁七四。

註三：「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引自「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三九五—三九六。

十八日（六月二十八日） 清總理衙門電覆駐美公使楊儒，詢問孫先生文行踪。

方孫先生抵舊金山時，清駐美公使楊儒即以銑電報告總署。本日，總署以巧電覆楊儒，詢問並指示各情云：「銑電悉。孫文將往歐洲何國？偕行洋人係何國人？附搭某船？希確查密電襲使酌辦。英能援香港、緬甸交犯約代拏固妙；否則該匪若由新加坡潛結惡黨內渡，應先電粵督預防，新加坡領事亦應飭其認真查訪。」（註一）

山東利津縣黃河決口，達七、八十丈。

本日，山東黃河以大雨日久，伏汛驟漲，下游利津縣北岸趙家菜園，因值風狂浪急，搶護不及，致將堤身刷塌七、八十丈，由東北土塘順流而下，與呂家窪倒漾之水相接，造成大害。（註二）山東巡撫李秉衡因之交部議處。七月，御史宋伯魯上奏治河之弊曰：

「查近年山東河務幾於無年不報決口，甚或一年數報，或一報而三四處。……最可憫者百姓耳！當夫決口之時，水高數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園村舍，當之者立變澤國，浮屍蔽水，順流而下，或掛樹杪，或觸寨樓，其有幸逢漁舟、貨艇他鄉遇救者，百無一二。田廬漂沒，今年之餬口無資，文契蕩然，後日之生理亦盡。推原其故，皆由在工各員不肯實心任事，以至於此。……河工委員以收支總局、外局、料場差使為最優，買稽榷蒜土差使次

之，凡差使未派之時，重賄營謀，巧取豪奪，所以然者，一經派買上料，先與夫頭料販鈎通一氣，講明五成報官或六成報官，然後購買堆置岸上，排架高聳，名曰斜垛，然後稟請收支局委員驗收，委員到岸不過一瞥，即會銜稟報，不知斜垛中皆空也，名爲每梁萬斤或幾千根，實不過四五成也，而以餘款瓜分入己。此等委員每派差一年，私囊可有四五千金之多，然則工程之堅實與否，報銷之虛捏與否，俱可想見。」（註三）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〇。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四)，頁三七八七。

註三：同註二，頁三八一四——三八一五。

六月

一日(七月十一日) 中、丹、英會訂電報合同。

本日，中國電報總局督辦盛宣懷與丹麥大北公司總辦恒寧生、英國大東公司總辦直德會訂電報接線收費合同十六條。（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二一。

三日(七月十三日) 李鴻章抵巴黎，次日覲見法總統。

先是，李鴻章一行於五月二十四日自德抵荷蘭京城，次日夜荷蘭女王及皇太后於海濱之水物凝思堂盛宴款待。二十八日抵比利時。本日，抵巴黎，次日謁見法國總統福兒(Félix Faure)，謝其代還遼東半島之功。鴻章覲見法國總統談話如下：

「初四日(西七月十四號)，法國改立民主節期也，節相踐約來游，藉觀慶典。清晨，先拜外部漢諾多尙書。已初，自行臺乘法御車至一粒西古皇宮，馬兵夾道擁護，端嚴肅靜，既至宮外，小憩朝房，民主福兒傳命延入，節相率隨員歷階而升，鞠躬爲禮，民主中立，法相暨諸大臣雁行旁立，均肅容如禮，節相復鞠躬呈遞國書，操華語致

詞畢，法大臣曼佛禮精於華文，以法語譯告民主，若曰：『使臣聞大民主聰明睿知，深得民心，即位後以利國利民輯睦友邦爲當務之急，伏念法蘭西爲歐羅巴古來名國，聲教覃敷，遠與敵國締交，已歷年所，比自滇桂界址釁若畫一，睦誼益敦。去歲日本奪我遼南，復荷鼎言，光復故物，彌承眷顧友邦之盛意，感佩莫名。重念使臣綜理外交，於今卅載，貴國官商紳士，噬肯適我，多與聯歡，常冀曲達微忱，以睦鄰封，即以盡臣職，勿致邦交稍有嫌隙。今蒙皇上恩命，授爲額外欽差大臣，恭詣貴國，雖日暮途遠，皆所不畏。使臣喜國書之親遞，伏願大民主留盟府冊，永以爲好，從此歐亞兩大邦互慶昇平，同臻隆盛，下懷倦倦，不勝鼓舞頌禱之至。』民主聞之，喜溢眉宇，制詞答謝，略謂：『余甚喜貴大臣之遠來，深願竭誠盡敬以相迓，異日回國，深願代余及敝國轉奏皇上，深冀貴國昇平隆盛之微意。抑貴大臣勞矣，請卽館舍。』節相乃三肅而退，下午，復命駕至演武廳，蓋法將軍正齋閱兵以申慶悃，特請節相憑軾而觀焉。是夕，法京盛設煙火之戲，節相應法大臣之請，乘小輪船緩行於江光如鏡燈火如海之中，但見兩岸花明，萬頭潮湧，益以殷雷之譁噪，頓忘溽暑之熏蒸，自顧扁舟，儼然無與，直至星稀露重，方登岸言歸。

—（註一）

註一：「李傅相遊歷各國日記」，引自「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頁四〇〇—四〇一。

八日（七月十八日） 清駐美公使楊儒函告駐英公使龔照瑗，孫先生文將到歐洲，請設法由英代拏。

本日，清駐美公使楊儒爲設法由英代拏孫先生文事，致清駐英公使龔照瑗函。函曰：

「茲密啓者，前月接准總署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希卽確查密覆等語。弟當卽密飭金山總領事馮守詠密確查去後；嗣據電稱，孫文現偕二洋人到金，日內將赴歐洲，弟遂發銑電迅達總署。旋接總署巧電，詳詢孫文欲往何國？偕行何國人？附搭某船？希查密電台端，接香港、緬甸交犯約代拏，該匪若由新加坡內渡，應電粵督預防」等語。弟因中、美交犯另約，迄無成緒，此間無從措手，總署深知，故有轉電粵督處援約代拏，並飭新加坡領事認真查訪之議。緬甸約章，美署未備，僅見香港解交逃犯例章，諒貴署必備存兩處原約也。刻下孫文雖抵

金山，尙無取道紐約，確搭某輪赴歐洲之信，特將總署巧電鈔陳，並就馮守與函電報撮敘詳細節略，馳寄左右，即迄公餘留意檢查約章，盡算在胸，自臻完密。弟已飭馮守及紐約領事隨時訪探該犯何口抵紐？准搭某輪？定赴歐洲何國？俟得確音，再行電布。除詳覆總署外，用特專函親述，因候金山覆信，是以肅達稍遲，祇請署安，諸維秘照不宣。」（註一）

註一：「總理倫敦叢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八八。

十一日（七月二十一日） 清總署大臣戶部侍郎張蔭桓與日使林董訂立「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日本得與西洋各國在華享受同等權益。

馬關約成後，依該約第六款規定，中、日另訂通商行船條約。中國初以李鴻章當交涉之任，與日使林董商議，迄無結果。會李奉命使俄，乃改命張蔭桓爲全權大臣繼續與日妥議。本日，中日通商行船條約訂立，共二十九款，凡列強在華所得商業利益，日本莫不享有。全文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因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馬關所訂條約第六款聲明商訂通商行船條約，是以大清國大皇帝陛下特派欽差全權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尙書衙戶部左侍郎張，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特派欽差駐劄北京全權大臣正四位勳一等男爵林爲全權大臣，彼此將所奉全權文憑校閱，均屬妥善，會同議定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與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及兩國臣民均永遠和好，友誼敦睦，彼此臣民僑居，其身家財產皆全獲保護，無所稍缺。

第二款 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可任便派一秉權大員駐劄中國北京，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可任便派一秉權大員駐劄日本國東京，兩國所派秉權大員，應照各國公法得享一切權利並優例及應豁免利益，均照相待最優之國所派相等大員一體接待享受，其本員及眷屬隨員人等並公署住處及來往公文書信等件，均不得擾犯攪動。凡欲選用役員使丁通譯人及僕婢隨從等，均准隨意僱募，毫無阻撓。

第三款

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酌視日本國利益相關情形，可設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駐中國已開及日後約開通商各口岸城鎮，各領事等官，中國官員應以相當禮貌接待，並各員應得分位職權裁判管轄權及優例豁免利益，均照現時或日後相待最優之國相等之官一律享受。大清國大皇帝陛下亦可設立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駐割日本國現准及日後准別國領事駐割之處，除管轄在日本之中國人民及財產歸日本衙署審判外，各領事等官應得權利及優例，悉照通例給予相等之官一律享受。

第四款

日本臣民准帶家屬員役僕婢等，在中國已開及日後約開通商各口岸城鎮來往居住，從事商業工藝製作及別項合例事業。又准其於通商各口任意往返，隨帶貨物家具，凡通商各口岸城鎮，無論現在已定及將來所定外國人居住地界之內，均准賃買房屋，租地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其一切優例豁除利益，均照現在及將來給與最優待之國臣民一律無異。

第五款

中國現已准作停泊之港如安慶、大通、湖口、武穴、陸溪口、吳淞等處，及將來所准停泊之港，均准日本船卸載貨物客商，悉照現行各國通商章程辦理。如日本船違章到中國別口非係准停泊之港，亦非准通商口岸，或在沿海沿江各處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由中國罰充入官。

第六款

日本臣民准聽持照前往中國內地各處游歷通商，執照由日本領事發給，由中國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隨時呈驗無訛放行。所有僱用車船人夫牲口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阻。如查無執照或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執照自發給之日起，以華十三箇月為限，若無執照進內地者，罰銀不過三百兩之數，惟在通商各口岸有出外游玩地不過華百里期不過五日者，無庸請照，船上水手不在此列。

第七款

日本臣民在中國通商各口岸，可僱用中國人民辦理合例事務，中國政府及官吏不得阻礙禁止。

第八款

日本臣民任從自僱船隻剝運貨客，不論何項船隻，僱價銀兩聽其與船戶自議，中國政府官吏均無庸干涉，其船不得限定隻數，並不准船戶挑夫及各色人等把持包攬運送等情，儻有走私漏稅情弊

，查出該犯自應照例懲辦。

第九款

凡各貨物，日本臣民運進中國或由日本運進中國者，又日本臣民由中國運出口或由中國運往日本者，均照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各稅則及稅則章程辦理。凡貨物於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稅則及稅則章程之內並無限制禁止進出口明文，亦准任便照運，其運進中國口者，只輸進口稅，運出中國口者，只輸出口稅。至日本臣民在中國所輸進出口稅，比相待最優之國臣民不得加多或有殊異，又凡貨物由日本運進中國或由中國運往日本，其進出口稅亦比相待最優之國人民運進出口相同貨物現時及日後所輸進出口稅，不得加多或有殊異。

第十款

凡貨物照章係日本臣民運進中國或由日本運進中國，在中國照現行章程由此通商口運至彼通商口時，不論貨主及運貨者係何國之人，不論運器船隻係屬何國所有，稅賦鈔課釐金雜派各項，一概豁免。

第十一款

日本臣民有欲將照章運入中國之貨進售內地，懺贖一次納稅以免各子口徵收者，則聽自便，如係應完稅之貨，則應照進口稅一半輸納。如係免稅之貨，則按直每百兩徵收二兩五錢，輸納時領取票據，執持此票，內地各徵一概豁免，惟運進鴉片煙不在此條之內。

第十二款

日本臣民於中國通商各口岸之外購買中國物貨土產爲運出外洋者，除出口時完出口正稅外，如照以上第十一款所列數目，照出口稅則核算完納子口稅以抵各子口稅項，此後不論在中國何處，所有稅賦鈔課釐金雜派，一概豁免，惟完子口稅之日起，限十二箇月內運往外國。又日本臣民在通商各口岸購買中國物貨土產非係禁運出外洋之物，運出口時以完出口正稅，所有內地稅賦鈔課釐金雜派一概豁免。又日本臣民在中國各處購買貨物以備運出外洋，准由此通商口岸，運到彼通商口岸，惟應照現行章程條規辦理。

第十三款

凡貨物如實係洋貨，已完進口稅後，自進口之日起，限三年內，不論何時准日本臣民復運出口俾往外國，毋庸再納出口稅。惟復運出口之貨，須實係原包原貨並未拆動抽換，准將已完之進口稅

由海關給發收稅存票付執，如該臣民願持票赴關領取現銀者聽。

第十四款 中國國家允在通商口岸設立關棧，所有章程日後酌定。

第十五款 日本商船進中國通商各口應納船鈔，按註冊噸數在一百五十噸以上者，每噸納鈔銀四錢，一百五十噸及以下者，每噸納鈔銀一錢，如該船進口後未經開輪欲行他往，限四十八點鐘之內出口，不納船鈔，如已納船鈔之船，自領出口紅票之日起，限四箇月之內可往中國通商各口及准停泊之港，毋庸再納船鈔，凡日本商船在中國修理之時，亦毋庸納船鈔。又日本臣民使用各種小船裝運客商行李書信及應免稅之貨往來中國通商各口，均毋庸納船鈔，惟各種小船及貨艇等運往貨物，其貨於運載時應輸稅課者。該船須按四箇月納船鈔一次，每噸納銀一錢，所有日本大小船隻除納船鈔外，並無別項規費，至所納船鈔，不得過於最優之國各船所納之數。

第十六款 日本商船進中國通商各口，聽其僱覓引水之人，完清應納稅項之後，亦聽僱覓引水之人帶領出口。

第十七款 日本商船遇有損壞或別項事故致通覓避難之處，不論中國何處，准其駛進附近各口暫泊，毋庸納船鈔，其船應修理起卸貨物，報歸海關委員查察，則毋庸納稅。凡日本船在中國沿海地方碰壞擱淺，中國官員須立即設法救護搭客及船上一切人等，並照料船貨，所救之人當加意看待，並隨時察看情形，有須設法護送者，即妥送就近領事官查收，如中國商船遇有損壞或別項事故遁入口本附近海口暫避，日本官員亦照以上所載一律辦理。

第十八款 中國通商各口岸官員，凡有嚴防偷漏之法，任憑相度機宜，設法辦理。

第十九款 日本船隻被中國強盜海賊搶劫者，中國官員即應設法將匪徒拿辦追贓。

第二十款 日本在中國之人民及其所有財產物件，專歸日本委派官吏管轄，凡日本人控告日本人或被別國人控告，均歸日本委派官吏訊斷，與中國官吏無涉。

第二十一款 凡中國官員或人民控告，在中國之日本臣民負欠錢債等項，或爭在中國之財產物件等事，歸日本

官員訊斷。凡在中國日本官員或人民控告中國臣民負欠錢債等項，或爭中國人之財產物件等事，歸中國官員訊斷。

第二十二款

凡日本臣民被控在中國犯法，歸日本官員審理，如果審出眞罪，依照日本法律懲辦。中國臣民被日本人在中國控告犯法，歸中國官員審理，如果審出眞罪，依照中國法律懲辦。

第二十三款

中國人有欠日本人債務不償或詭詐逃避者，中國官務須嚴拿追繳，日本人有欠中國人債務不償或詭詐逃避者，日本官亦應一體辦理。

第二十四款

日本人在中國犯罪或逃亡負債者，潛往中國內地或潛匿中國臣民房屋或船上，一經日本領事照請，即將該犯交出，中國人在中國犯罪或逃亡負債者，潛匿在中國日本臣民所住房屋，或中國水面日本船上，一經中國官照請，日本官即將該犯交出。

第二十五款

按照中國與日本國現行各約章，日本國家及臣民應得優例豁免利益，今特申明存之勿失。又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已經或將來如有給予別國國家或臣民優例豁免利益，日本國家及臣民亦一律享受。

第二十六款

此次所定稅則及此約內關涉通商各條款，日後如有一國再欲重修，由換約之日起，以十年爲限，期滿後須於六箇月之內知照，酌量更改，若兩國彼此均未聲明更改，則條款稅則仍照前辦理，復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後均照此限此式辦理。

第二十七款

今兩國欲照此次所立條約遵行，須商定通商章程條規，惟於未定以前，應照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章程條規與此約所訂不相違背者，兩國一律遵辦。

第二十八款

本條約繕寫漢文、日本文、英文，署名爲定，惟防以後有所辯論，兩國全權大臣訂明，如將來漢文、日本文有參差不符，均以英文爲準。

第二十九款

本條約兩國大皇帝批准後，在北京迅速互換，日期由本日署名起，至遲不逾三箇月，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註一）

註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九，頁二一一—二五；光緒朝東華錄（七），頁三七九六—三七九九。

本月中（七月底至八月初）臺灣抗日軍領袖詹振、簡大獅，分別率部與日軍激戰於松山及淡水金包里。

本年六月中，臺灣抗日軍領袖詹振、林李成率部百餘人，潛入內湖庄，並在松山土地公廟附近，與日軍激戰。發佈檄文如左：

「詹振、林李成告汝人民：開臺灣、助清國，明君有道。正稅律、遵古例，毫無私，實有恩主光緒帝。然而日本不依前例，總督同乞食，警察不公平，盡是貪官與污吏。日本犯有左列十大罪：

第一條大罪：不敬天，不敬神明。

第二條大罪：不敬孔子，不惜字紙。

第三條大罪：貪官污吏輕百姓。

第四條大罪：不重律法私刑罰。

第五條大罪：不顧廉恥同禽獸。

第六條大罪：不分善惡逆天意。

第七條大罪：日本做事同乞食。

第八條大罪：放尿要罰錢。

第九條大罪：買賣要抽稅。

第十條大罪：臺民被迫奮然起義。」（註一）

同時淡水方面簡大獅所部百餘人，在金包里附近與日本憲兵隊遭遇，戰死十餘人，餘衆渡河進入大屯山區。

註一：「臺灣省通志」，卷九，革命志，抗日篇，頁十六—十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六月十一日

二十三日（八月二日） 李鴻章抵倫敦。

本日，李鴻章一行抵英倫。二十六日，謁見英女皇維多利亞（Victoria）。七月六日，偕同駐英大臣龔照瑗赴英外部交涉改訂稅則，要求中國關稅改用金鎊徵收，以增收入。切實辯論二小時，英相堅持應俟修約屆期另議。同日鴻章電告總署與英相沙斯伯里（Salisbury）辯論經過：「

「旨飭商照鑄加稅，二十二日先將赫德節略面交英外部察閱，旋據沙侯稱：須由各總辦核議，約初六日申刻會商。是日同龔照瑗赴外部切實辯論。沙云：應俟修約屆期再議。鴻云：中國喫虧已久，急切難待，且非議改稅則可比。彼以照鑄須加稅一倍，商情不願。鴻謂日本加稅並改訂鎊價英先允行，未便歧視。沙云：前外部舍伯里所允，英商咸怨，我不敢擅許。鴻謂德、法皆允商辦，必俟英定議，中英交情素厚，不應薄待。沙謂：我必盡力，但須確詢香港上海商會衆議。鴻云：啓程在即，請由龔使與商。沙云：可行。沙甚疲滑，德使謂與彼交好，止公事難商，信然。」（註一）

永定河決口百餘丈，大興、宛平、東安、武清、永清等縣被水成災。

本年六月後大雨時行，永定河水勢急漲，險工迭出。本日，武清、霸州永定河決口百餘丈，大興、宛平、東安、武清、永清等縣被水，災民無數。（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二，頁六一七。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四)，頁三八一一。

二十七日（八月六日） 清駐英公使龔照瑗密札飭令駐新加坡總領事籌辦援約引渡孫先生事宜。

本日，駐英公使龔照瑗密札飭令代理新加坡總領事劉玉麟預爲籌備援約引渡孫先生事宜，並密查孫先生有無黨羽熟識之人在新加坡。原函曰：

「照得本大臣於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接准出使美、日、秘國大臣楊密函內開：『前月接准總署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希即確查密覆等語。弟當即密飭金山總領事馮守詠齋確查去後；嗣據電稱，孫文現偕二洋人到金，日內將赴歐洲。弟遂發統電迅速總署，旋接總署巧電，詳詢孫文欲往何國？僭行係何國人？附搭某船？希查密電台端，援香港緬甸交犯約，代拏。該匪若由新加坡內渡，應電粵督預防等語。弟因中美交犯另約，迄無成緒，此間無從措手，總署深知，故有轉電尊處，援約代拏，並飭新加坡領事認真查訪之議。緬甸約章，美署未備，僅見香港解交逃犯例章，諒貴署必備存兩處原約也。刻下孫文雖抵金山，尚無取道紐約，確搭某輪前赴歐之信。特將總署巧電鈔陳，並就馮守稟函電報，撮敘詳細節略，馳寄左右，即乞公餘留意檢查約章，熟算在胸，自臻完密。弟已飭馮守及紐約領事，隨時訪探該犯何日抵紐？准搭某輪？定赴歐洲何國。俟得確音，再行電布。除詳覆總署外；用特專函觀述，因俟金山復信，是以肅達稍遲』等因，並鈔件一扣到，本大臣准此。查咸豐八年，中英條約第二十一款內開：『中國民人因犯法犯在香港，或潛在英國船中者，中國照會英國官訪查嚴拏，查明實係罪犯，即行交出。通商各口，倘有中國犯罪民人，潛匿英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又光緒二十年滇緬條約第十五條內開：『英國之民有犯罪逃至中國地界者，或中國之民有犯罪逃至英國地界者，一經行文請交逃犯，兩國即應設法搜拏，查有可信其為罪犯之據，交與索犯之官。行文請交逃犯之意，係言無論兩國何官，祇要有官印，便可行文請交，此種請交逃犯之文書，亦可行於罪犯逃往之地，最近之邊界官，』各等語。除函覆楊大臣外，計署理總領事張守奉調內渡，業已起程，合函札飭該代理總領事，豫為籌備。並密查孫文有無黨羽暨熟識之人在坡？確切查明，慎密稟候核辦。楊大臣寄到鈔件，一併抄給該員查閱。茲並附札附寄電信新法密碼本一冊，仰即密存領署，以後如有機要事件，須由電傳者，即用此碼本。即通知張守，以後無論實任署理，作為封代。特此密札。」（註一）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八八—一八九。

二十九日（八月八日） 清駐英公使龔照瑗為援約引渡孫先生文事，函覆楊儒。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一日

五九四

龔照璠函曰：

「敬密復者，頃接六月八日密示，並鈔件，具悉一切。查署電所稱，香港緬甸交犯約，係指咸豐八年，在天津議定之中英條約第二十一款，及光緒二十年在倫敦互換之滇緬條約第十五條也；茲一併抄呈台閱。惟查此種罪犯，按西洋章程情形視之，在本國固法無可追；迨逃至他國，他國即視為公犯，向無交出之例。俄之於白彥虎，即其明證也。弟已密飭代理新加坡總領事劉牧玉麟，預為籌備，並密查孫文有無黨羽以及熟識之人在坡，如該犯果來歐洲，俟尊處探確電知後，弟當援約與英廷商辦。若英不能代拏，則惟有窺其動靜，探其逃蹤，遵照署電，電知粵督預防，於其內渡時設法兜拏耳。專此密復。」（註一）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〇。

七月

一日（八月九日） 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鼓吹變法維新。

先是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北京強學會及其上海分會同遭封禁。本年夏，黃遵憲乃利用上海強學會餘款，與汪康年、梁啟超等，在上海籌組時務報。本日，時務報在上海正式發刊，是為維新派之正式言論機關。

時務報為一旬刊，月出三冊，每冊二十餘頁，以連史紙石印，甚清晰美觀。主其事者，俱為知識青年，除汪康年任經理、梁啟超任主筆，及麥孟華、徐勤、歐榘甲先後輔佐外，亦管延章炳麟為編輯，後以與梁啟超議論不合，乃自行告退。其擔任外報譯述者，如李維格等，亦均極一時之選。

就時務報內容而論，所載有論說、諭摺、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欄，「○廣譯五洲近事，（使閱報者知全球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管井以議天地。）○詳錄各省新政，（使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經畫，與其宗旨所在，使阻撓者盡量減少。）○博搜交涉要案，（使

閱者知國體不立，受人媢奪，律法不爲人愚弄，可以奮厲新學，思洗前恥。(四)旁載政治學藝要書，(使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與其日新月異之迹，而不再抱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愕然而自大。)(註二)

方時務報發刊之初，時當甲午中日戰爭挫敗之後，梁啟超首著「變法通議」十餘篇，在報上連續刊登，立論多針對時弊而發，大受時人歡迎。他若汪康年之「中國自強策」、「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嚴復之「關韓論」等，皆積極介紹與探討民主政治與議會政體，實於當日變法維新之思潮，極具傳播與推動作用。

自時務報議論一出，舉國傾靡，以爲得未曾有，每期銷達萬餘份。當時各地對時務報推崇備至，張之洞曾云：

「查上海新設時務報館，每旬出報一本，本部掌披閱之下，具見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志氣，凡所采皆係有關宏綱，無取鎖聞；所採外洋各報，皆係就本文譯出，不比坊間各報訛傳臆造，……實爲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註二)

時四方新學士子喜其議論新穎，羣相呼應，於是維新變法運動，頓呈活躍之觀，各地學會與雜誌報刊亦風起雲湧，盛極一時。

附錄：

一、梁啟超撰「創辦時務報原委記」(註三)

本日在國聞報中見有汪君穰卿告白云：「康年於丙申秋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爲主筆等語。」「閱之，不勝駭詫。現時務報既奉旨改爲官報，又適派吾師南海康先生督辦。局外人見穰卿告白，恐將有謂辟超奪彼所獨創之事業者，故不得不詳細言之。夫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查時務報初起，係用上海強學會餘款。當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倡捐一千五百兩爲開辦經費，滬上諸當道亦有捐助者，遂在王家沙地方開辦。當時康先生以母壽之故，不能久駐上海，因致穰卿一函兩電，屬其來滬接辦。當時穰卿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一日

猶在湖北就館也。既而穰卿到滬，而京師強學會爲言者中止，滬會亦因之停辦。當時尙餘銀七百餘兩，又將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銀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將會中所置器物書籍等項變賣，得二百餘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實爲時務報喘矢。第一期報中所登汪穰卿進士梁卓如李廉捐集銀一千二百兩者；即此項也。第三期以後，改爲張孝達制軍捐銀七百兩，汪梁集捐六百元者，係原存七百兩，乃南皮師原捐，故改登，其追回房租變賣器物等項，無從指名，故仍冒我等二人名也。當時穰卿因欲減康先生舊跡，故不將此款聲明強學會之餘款，而登爲汪某等捐集云云。黃公度京卿改之，使并列兩名，實則啓超何嘗有捐集之功，而冒此稱，實滋不安耳！此時務報最初之起點也。強學會停辦之後，穰卿即在滬度歲（穰卿已移家上海）。時啓超方在京師，康先生並招至滬，改辦報以續會事。同鄉黃公度京卿適適在滬。公度固強學會同事之人，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亦以報館爲倡始。於是與穰卿、啓超三人，日夜謀議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爲開辦費，且語穰卿云：吾輩辦此事，當作爲衆人之事，不可作爲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無所謂集款，不作爲股份，不作爲墊款，務期此事之成而已。此等語固公度屢言之，穰卿屢聞之者也。創辦時所印公啓三十條，係由啓超所擬草稿，而公度大加改定者。（彼時穰卿力主辦日報，欲與天南邇更爭短長，公度及啓超力主旬報之說，乃定議。）其後聘請英文繙譯張少堂，係公度託鄭瀚生司馬代請者。東文繙譯古城貞吉，係由公度託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請者。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其致函各處勸捐，託各處派報，亦均公度之力。當時公度在上海，至九月方北行。數月之中，報館一切事，公度無不與聞。其捐款之獨多也如彼，其開辦之出力也如此。今穰卿自稱時務報爲彼所創辦者，不知置公度於何地也？鄭展書部郎淩瀚，亦強學會同事之人，志願與公度同，故首捐五百金開辦。吳季清大令德綿與公度穰卿啓超皆至交，當時又與啓超同寓京師，故時務報開辦，一切事無不共之。丙申五月，季清先生與其子亡友鐵樵石樵同到滬，即寓在報館，朝夕商榷一切。故時務報公啓，即以公度季清展書穰卿及啓超五人出名，此人人所共見者（當時公啓訂成一小本，自四五月間即分送各處同志，至第一期出報時，用單張夾在報內，想閱報諸君無不共見。四人之名，豈可刪去？）。今穰卿自稱時務報爲彼所創辦，不知置季清展書於何地也？同人既議定此報爲衆人之事，不得作爲一人之事，因得以公議向各同志助捐，而海內君子亦以公議之故而樂助之。二年以來，得款至萬餘金。此實時務報公事而非私事之明證。今穰卿稱時務報爲

彼所創辦者，不知置捐款諸君於何地也？至啓超既爲穰卿雇工之人，亦復何足比較。然自開創辦時，固不無微勞矣。當丙申五六月間，穰卿湖北館地尚未辭去，恐報館之或不能支，住鄂住滬，不能自決，屢商之於啓超。啓超謂報能銷四千份，則此事便可支持，因囑留之。超啓自以不諳會計，憚管雜務，因與穰卿約，彼理事務兼外間應酬，而啓超主報中文字，此總理撰述之名所由分也。當時各因天才，自執一職。天澤之分不甚嚴，總辦之與屬員名分平等，而啓超亦貿貿然自忘其受總辦厚恩爲總辦所請之人也。當時總辦之勤勞固云至矣，然即如啓超者，忝任報中文字，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公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復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啓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六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雖云受總辦厚恩，顧東家生意，然自問亦無負於時務報矣。然猶不止此，計丙申七月初一日爲時務報出報之日，而穰卿於六月前赴湖北，月底始返滬。七月下旬又因祝南皮壽辰，前赴湖北，中秋後始返滬。彼時正當創辦吃緊之時，承乏其間誰乎？雖以啓超之不才，亦只得竭蹶從事，僭行護理總辦而已。此後局面既成矣，捐款既至萬餘金矣，銷報既至萬餘份矣，穰卿之以啓超爲功狗，固其宜也。且穰卿之稱時務報爲彼創辦，不自今日始。當丙申夏秋間，海內鉅公同志提倡斯舉，捐款日多。當時我兩人商議，謂不可無謝啓。啓超謂宜將公啓內之五人作爲公函，凡有捐款者，五人公謝之。穰卿謂何必如斯，只我兩人出名足矣。凡此等館中雜務，向章皆由穰卿主辦，啓超不能爭也。自八月以後，凡有捐款者，皆穰卿一人出名函謝矣。其函中之言，猶夫本日國聞報告白之言也。蓋當初辦之時，早有據爲汪氏產業之計，而天下之人視此局爲汪氏產業也，亦已久矣。穰卿既爲東家，則啓超雖欲辭僱工之名，豈可得哉？當開辦之始，公度恐穰卿應酬太繁，（蓋穰卿宗旨，謂必吃花酒，乃能廣達聲氣，故每日常有半日在應酬中。一面吃酒，一面辦事，因不能兼辦全局之事。）乃議推吳鐵樵。（名樵，四川人，李清先生之子，去年已卽世矣。）又開辦時所出公啓內辦事規條第九款云：在報除住館辦事各人外，另舉總董四人，所有辦事條規，應由總董議定，交館中照行云云。自丙申秋至丁酉夏，公度屢申此議，謂當舉總董。以此兩事之故，穰卿以此深啗公度，在滬日日向同人譏排之。且遍騰書各省同志，攻擊無所不至。以致各同志中，有生平極敬公度轉而爲極惡公度者。至去年六月，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一日

五九八

公度赴湘任，道經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議，幾乎齟齬，始勉強依議舉數人。然此後遇事，未嘗一公商如故也。總董雖有虛名，豈能干預江家產業哉？穰卿嘗謂啓超云：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錢稍多，而撓我權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公度一抗，則莫有毒予者矣。此言，啓超之所熟聞者也。自茲以往正名之論大起。日日自語云：總理之名，不可不正；總理之權利，不可不定。於是東家之架子益出矣。去年一年中，館中凡添請十餘人，時啓超在滬同事也，而所添請之人未有一次與啓超言及者。雖總辦之尊，東家之濶，亦何至如斯乎？啓超性狹隘，誠不能無所芥蒂。自去秋以來，常不免有齟齬總辦之事，此實不容自諱也。至於館中開銷，公度與啓超當開辦時再四熟籌，但能銷報四千份，即可支持。乃此後捐款萬金，銷報萬餘份，而去年年底幾於不能度歲。致使萬國公報，從旁嘲笑。雖曰各處報費難於收齊，然其中曲折，固有非傭工小人所能窺者。穰卿與啓超之有意見，自去年以來矣。同事之難，自古所嘆。以亂易整，旁觀所笑。啓超所以隱忍於心，絕不敢爲我同志一言之也。獨所不解者，穰卿於康先生何怨何仇？以啓超有嫌之故，遷怒於康先生，日日向花酒場中專以詆排爲事。猶以爲未足，又於時務日報中編造謠言，嬉笑怒罵。猶以爲未足，又騰書當道，及各省大府，設法構陷，至誣以不可聽聞之言。夫謗康先生之人亦多矣，誣康先生之言亦種種色色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矣，啓超固不與辯，亦不稍憤。獨怪我穰卿自命維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吾不解其何心也！康先生之待穰卿，自啓超觀之，可謂得朋友之道矣。乙未辦強學會，屢致函請其來接辦，是久以同志可信之人待之也。此次奉旨督辦時務報後，即致一函一電與穰卿，請其仍舊辦理，已不過遙領而已。（電文云：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有爲叩。其函則係六月十二日郵政局寄者，文長不能全錄。）康先生之於穰卿，可謂盡道矣。而穰卿既無覆電，又無回信，既不可同辦，又不肯交出。私衆人所捐之金爲已產，私衆人所出之力爲已功，不顧交情，顯抗聖旨，吾不解其何心也！此後之事，既改歸官辦，則亦非啓超之所敢言。惟於創辦之原委，及啓超之爲傭工與否，不得不嘵嘵一辯白之。漏心之誚，固不敢辭；知我罪我，聽之海內同志而已。六月二十四日新會梁啓超謹白。

時務報爲一旬刊，月出三冊。每冊約三萬字，用連史紙鉛字印成，相當精美。自第二十冊加附英文名 The Chinese Progress，零售每本一角八分（後改一角五分），訂閱全年四元。創刊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七月初一日（八月九日），至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六月二十一日（八月八日）止，共出版六十六冊。該報的創辦，任公與汪康年各持一說。汪康年刊於昌言報的啓事說：

「康年於丙申中秋創辦『時務報』，延諸新會梁卓如孝廉爲主筆，至今二年。現既奉旨改爲官報，則『時務報』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即自七月初一日起，謹遵六月初八日據實昌言之諭，改爲『昌言報』，另延諸番禺梁節庵先生鼎芬爲總董。一切體例，均與從前『時務報』一律。繙譯諸人，亦仍其舊。祈代派賢閱報諸君共鑒之。」

另在國聞報上又有一則啓事：

「……丙申春，康年與諸同人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時梁卓如孝廉留滯京邸，致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當惟命是遵之語。乃發電信，延之來館，專司論說。……辦理兩年未敢謂盡妥善，猶幸上承京外諸大夫之扶掖，中賴同志諸君之輔助，得以漸次推廣，遍及各行省。館中經費，全賴集資，屢計五月開館時，南皮制軍倡捐千元，強學會留存餘款七十餘元，又康年經手拆賣無用器具銀三百數十元，收回多付房租銀一百數十元（以上三款，即首次捐款清單內所列之六百二十元——原注），暨出版後諸同志陸續捐助，計共收銀一萬一千餘元，又二千六百餘兩……」

依照汪氏的說法，時務報似乎是他創辦的。但梁任公在知新報發表的「創辦時務報原委記」駁斥汪氏之說：

「……夫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查時務報初起，係用上海強學會餘款。當乙未九月，康（南海）先生在上海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捐一千五百兩爲開辦費，滬上諸當道亦有捐助者。遂在王家沙地方開辦。當時康先生以母壽之故，不能久駐上海，因致穰卿（汪康年）一函兩電，屬其來滬接辦，當時穰卿猶在湖北就館也。既而穰卿到滬，而京師強學會爲言者中止，滬會亦因之停辦。當時尙餘銀七百餘兩，又將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銀，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將會中所置器物書籍等項變賣，得二百餘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實爲時務報嚆

矢。第一期報中所登汪穰卿進上梁卓如孝廉捐集銀一千二百餘兩者，即此項也。第三期以後，改爲張孝達（之洞）制軍捐銀七百兩，汪梁集捐六百元者，係原存七百兩，乃南皮師原捐，故改登，其追回房租變賣器物等項，無從指名，故仍冒我等二人名也。當時穰卿因欲減康先生舊跡，故不將此款聲明強學會之餘款，而登爲汪某等捐集云云。黃公度京卿改之，使並列四名，實則啓超何嘗有捐集之功，而冒此稱，實滋不安耳！此時務報最初之起點也。強學會停辦之後，穰卿即在滬度歲，（穰卿已移家上海）時啓超方在京師，康先生並招至滬，改辦報以續會事。同鄉黃公度京卿適憲適在滬。公度固強學會同事之人，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亦以報館爲倡始，於是與穰卿啓超三人，日夜謀議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爲開辦費，且語穰卿云，吾輩辦此事，當作爲衆人之事，不可作爲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無所謂集款，不作爲股份，不作爲墊款，務期此事之成而已。」

由汪康年與任公二人的啓事與駁文，可以得知時務報的創辦，係集兩種力量而成：一爲強學會被禁後的餘款，一爲當時對於報業有志者的捐款。翻閱時務報的捐款名冊，除張之洞、汪康年、梁啓超、黃遵憲等名下及強學會的基金不算外，吳彥復等五十一人助銀多者千元，少者十元，將近七千之數，合共初開辦基金在一萬元以上。從捐款的情形看，時務報既非汪康年所投資，也不是梁任公或黃遵憲的創辦，而是他們當時都有以報館鼓吹輿論的志趣合作下的事業。吳季清、鄒殿書等人都曾參與開辦時的籌備工作。惟當時的經營，汪康年是總理，負責業務的發展，梁任公是總撰述，負責報紙的文字。由於職務上的分配如此，所以才有後來的爭論。

無論如何，時務報初辦時，他們都齊心合力，報紙辦得很有生氣，尤其任公主撰，他的一支筆很快就風靡了全國。任公回憶他對於時務報的文字工夫說：「忝任報中文字，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公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複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啓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心。六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時務報的成就，當然應以任公爲首功。

時務報的宗旨爲何？讀任公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便可知他當時抱着相當遠大的目標：「觀國之強弱，則

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粵之與中原邈若異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爲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坐此爲耳。」時務報的宗旨在溝通上下中外的輿情。時務報雖然不是中國最早的報紙，但是能够具有如此遠大的理想，實爲空前。

基於這一遠大的目標，時務報的內容大致是：「○廣譯五洲近事，（使閱報者知全球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習井以議天地。）○詳錄各省新政，（使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經畫，與其宗旨所在，使阻撓者盡量減少。）○博搜交涉要案，（使閱者知國體不立，受人嫚奪；律法不爲人愚弄，可以奮厲新學，思洗前恥。）○旁載政治學藝要書，（使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與其日新月異之迹，而不再抱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愕然而自大。）」時務報希望因這些內容，隨時日之傳播，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十年以後，報館的規模就可以漸漸完備。

時務報是一種綜合性的雜誌，當然任撰述的不止任公一人，如麥夢華、章炳麟、徐勤、歐陽甲等也嘗爲時務報撰文。擔任翻譯的，英文有張坤德、李維格、曾廣銳，法文有郭家驥，日文有日人古城貞吉，俄文有劉崇惠、李家鏊等。

除了任公的政論之外，時務報所重視的項目是各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時務報並注重工商農業方面的鼓吹，故對於各國的造船、鐵路、開礦等多有介紹。對於各種法律時有譯述。

譯述的文字幾佔全報的三分之二。最受人重視的幾篇評述，有鄧廷鑑與楊葆寅的「倫敦鐵路公司章程」，黃致堯的「奧斯馬加國商辦鐵路條例」，齊生的「重譯富國策」，張永鑑的「揚子江籌防弼議」，錢恂的「西畢利鐵路考略」，張坤德的「會審信隆租船全案」。此外如黎汝謙的「華盛頓傳」，朱開第的「紐約講學報」，都是介紹西人而引人入勝的文章。

任公在時務報所發表最重要的論文有以下各篇：

變法通議（計包括：自序——第一冊、論不變法之害——第二冊、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第三、卅九冊、論學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一日

六〇二

校一第五、六、七、八、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三、廿五、廿七、廿九、卅三、卅六册各節
(一)、論報館有益國事(第一册)、論加稅(第五册)、西書提要(第七册)、西學書目表序例(第八册)、論
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第九册)、古議院考(第十册)、治始於道路說(第十五册)、戒纏足會序(第十六册)
、日本國志後序(第二十一册)、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第二十五册)、說羣自序(第二十六册)、記自強
軍(第二十九册)、萃報敘(第三十三册)、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第三十三册)、史記貨殖列傳今義(第卅
四、卅五、卅七册)、春秋中國彝狄辨序(第三十六册)、醫學善會序(第三十八册)、中國工藝商業考提要
(第三十八册)、知恥學會序(第四十册)、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第四十一册)、大同譯書局敘例(第四十
二册)、讀日本書目志後(第四十五册)、倡設女學堂(第四十五册)、日本橫濱中國大同學校緣起(第四十
七册)、湖南時務學堂草約十章(第四十九册)、南學會序(第五十一册)等篇。

這些篇目中，以衆所週知的「變法通議」最爲重要。任公欲以學校代替科學的思想在此中完全表露無遺，這是
他早期的求變思想。其他如西學書目表序例，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權與民權相嬗之理，湖南時務學堂草約十
章等文，於民權民族思想時有流露。

由於「變法通議」提出一種求變的思想，由於若干文章中有民族民權思想的存在，由於對西方富強之道的介紹
，時務報很快便吸引了廣大的讀者。它的發售情形，據第二十六册登載，派報處(代售處)計國內外六十三縣市，
共九十五處。茲依省別排列如下：

直隸：北京四 保定二 天津二

山東：濟南二 烟臺一 濰縣一

山西：省城一

河南：省城一 武陟一

雲南：省城一

貴州：省城一

陝西：省城二

甘肅：蘭州二

四川：成都五 重慶四 夔州一 萬縣一

湖北：武昌二 漢口二 宜昌二 沙市一

湖南：長沙二 常德一

江西：南昌一 九江一

安徽：安慶三 廬州一 蕪湖一

江蘇：南京一 淮安二 清江浦一 揚州一 徐州一 蘇州一 常熟一 常州一 江陰一 無錫二 鎮江一

太倉一

浙江：杭州二 嘉興一 湖州一 寧波一 紹興一 諸暨一 溫州二 瑞安一 台州一 蘭谿一

福建：福州二 泉州一 建寧一

廣東：廣州二 佛山一 潮州二

廣西：省城一

澳門一

香港五

新加坡一

檳榔嶼一

日本：神戶一 大阪一

到了光緒二十三年七月間，代售處增爲七十縣市，一百零九處，直隸保定、河南省城、陝西省城、江蘇清江浦、蘇州、浙江溫州、廣東廣州，均添設分銷處。新增山西太谷、雲南省城、江西秦州、江蘇泰州、浙江硤石、廣東靖海門、廣西梧州等處。（見時務報第三十六冊）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一日

五〇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一日

六〇四

由代售處的分佈看來，全國各地幾乎都有時務報的銷售。其銷售的數字，時務報第三十九冊有一個報告：「報館創設條逾一載，肇始之時，懼恐底滯，賴大府獎許，同志扶掖，傳播至萬二千通。」後來任公回憶時務報，亦曾提到當時的銷售及辦理的情形：「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萬餘份，爲中國報以來所未有。」

時務報銷售的數字，在一萬二千份左右。該報第三十七冊曾列有一詳細之數字，茲將原表簡化更列如下：

時務報銷售地及銷售數

銷 售 數		名 市 城	
年 西 丁	年 申 丙		
17	17	揚泰徐清杭嘉硤湖寧紹諸餘陳溫瑞台蘭	
19		州州	
10	10	江浦州	
117	53	興石	
355	350	州波	
33	13	興暨姚	
13		州州	
30	30	安州	
132	46	谿州	
115	70	應州	
25	14	安州	
10	10	谿州	
	12	州	
114	74	州	
70	60	州	
57	18	州	
14	5	州	
209	159	福建	
11	8	廣潮	
770	631	嘉	
72	41	州	
15	10	應	
40	20	桂梧	
24		雲貴	
70	70	澳香	
340	145	檳上	
25	17	西	
93	24	榔	
25	20	海	
7,837	5,948	安	
100			
10,705	7,875	計 合	

附註：零售本數不計

大致第一年（丙申）所銷在八千份左右，與第十七冊的告白相符。第二年（丁酉）升至一萬一千份，加上少許未能統計的零星數目，總計約在一萬二千份上下，較之當時甚有影響力的萬國公報發行數，遠超過三倍之多。

時務報銷行國內外既如此的廣泛，如每份平均有十人閱看，應擁有十萬人以上以上的讀者。

時務報何以能如此的暢銷？一則由於其內容新穎，再則如該報所說，獲得「大府獎許」之故。當時各地督撫之開明者，多自動向時務報館訂購，鼓勵下屬閱讀。據該報記載：湖廣總督張之洞曾有札飭全省官銷，並另訂了二百八十八份分發各書院（見第六冊），浙撫廖壽豐（見第十八冊）、嶽麓書院院長王先謙（見十八冊）、湘撫陳寶箴（見二十五冊）、廣西洋務局（見二十六冊）、保定太守陳啓泰、清苑縣令勞乃宣（見二十三冊）、江蘇學政龍宗

師（見三十冊）、山西清源局（見三十二冊）、江寧太守劉嘉澍，與化府張太守（見三十三冊）、江西布政司翁會桂（見三十四冊）、皖撫鄧華熙（見三十七冊）、兩江總督劉坤一（見四十二冊）、河南彰、衛、懷三道道尹岑春煊（見四十七冊）、貴州學政嚴雋熙（見第五十冊），都曾飭其所屬訂閱、或分發各書院。所以讀者之中，政府官吏及書院學生確屬不少。

當時各地對於時務報的批評，推崇備至，張之洞說：

「查上海新設時務報館，每旬出報一本，本部堂披閱之下，具見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志氣，凡所采皆係有關宏綱，無取鎖聞，所採外洋各報，皆係就本文譯出，不比坊間各報訛傳臆造，……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

湘撫陳寶箴說：

「上年以來，上海設有時務報館，月出三冊，議論極為明通，所譯西報，尤多關繫，其激發志意，有益於諸生者，誠非淺鮮，湘省人材蔚興，當使不媿通材，周知四國，自應廣為流布，以開風氣而廣見聞。」

浙江巡撫廖壽豐說：

「茲查有上海新出時務報，議論切要，採擇謹嚴，於一切舟車製造之源流，兵農工商政要，旁搜博記，尤足以廣見聞而資治理。」

湖南嶽麓書院院長王先謙說：

「查近今上海刻有時務報，議論精審，體裁雅飭，並隨時恭錄諭旨暨奏疏，西報尤切要者，洵足開廣見聞，啓發志意，為目前不可不看之書。」

保定太守陳啓泰及清苑縣令勞乃宣說：

「光緒初元，滬上製造局專譯洋報，期以通知外事，考求彼己情勢，輯為西國近事彙編。軍事初靖，中外諸公益以選譯西報為由，由是官書局彙報創於京師，而上海時務報館繼之，數月以來，亦已通行各省。查時務報館，每旬出報一本，首論說，次諭摺，次各省新政公牘章程，次譯英法俄文各報，次電音，次東文報，末附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一日

各種新書，識論明通，采撫翔實，有關閭旨，無取瑣聞，一洗從前各報之弊，津保同人，閱者日衆。昨奉藩、臬憲面諭，謂此報切要閭通，有裨時政，現湖北全省，皆奉憲札閱看，直隸邇在京圻，交涉事廣，凡在同志，究心經濟者，皆宜披閱。……藉以增益見聞，擴充學識。」

而以山西清源局對於時務報的批評最爲切要：

「查上海時務報館所刻報章，首論說，次諭摺，次各省新政公牘章程，次譯西報電音，東報各種新論，實足以擴見聞而裨實用。雖間或語涉激切，然閱者當心知其意，自不致以文害辭。本司道查近來各報，如塘報則專刻諭摺，不及洋務各項，西報則多論西事，中滬各報，則多取工商，無關政要。惟現行之時務報，數陳剴切，援據確核，實能補塘報之不及，而兼綜西報之長，實可與彙報相輔而行。」

其他如江西布政司翁會桂謂：「諸報以時務報最佳，知新商務等次之。」江督劉坤一謂：「時務報合數十國之政教，及億萬人之智能彙集成編。」皖撫鄧華熙謂：「現中國關心時勢之人，於上海創立時務報商務報，修辭有要，陳義甚當，並從各國報中，譯登一切新事，慎選博紀，皆關中外機宜，足以濬發靈明，考鏡得失。」彰、衛、懷道尹岑春煊謂：「上海設有時務報館，數陳剴切，採擇謹嚴，……凡地球各國政治之得失，兵機之強弱，學校之興廢，產物之盛衰，以及風土民情，山川險要，無不備載，識華彝之時勢，達中外之情形，間有喻出縱橫，語多憤激，閱者勿以辭而害意，當略迹而原心，洵足以推廣見聞，增長智識也。」凡此都是對時務報推崇的話，有的尚且指出了時務報中有不凡的陳意——民族民權思想，不過沒有明言而已，但是已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好奇心。時務報在這般人的大力提倡下，當然會遍銷各地，風靡一時了。任公說：「時務報起……舉國趨之，如飲狂泉，作者當時承乏斯役，雖然今日檢閱其舊說，輒欲作嘔，寢勘其體例，未嘗不汗流浹背也。……而舉國大夫，乃嘖嘖日之曰：此新說也，此名著也。嗚呼傷哉！吾中國人之文明程度，何底下至於此極也。……爾後一年，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湧，驟十餘家，大率面目體裁，番然時務，若惟恐不肖者然。」實在並不是誇大之詞。

時務報將任公的聲名廣揚了，此後國人幾無不知樂啓超之名者。戊戌之後，任公初到日本，曾有一封信給他的夫人說：「昨日忽接先生（指康南海）來一書，極言美洲各埠同鄉人人忠憤，相待極厚，大有可爲，而金山人人極

仰慕我，過於先生。今爲大局計，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來矣。廣東人在海外者五百餘萬人，人人皆有忠憤之心，視我如同神明，如父母，若能聯絡之，則雖一小國不是過矣。」可見華僑仰慕任公，已非一朝一夕。國外如此，國內亦可想知。任公之赫赫大名，最早實得之時務報。

任公離去時務報的原因，前面已經說及，那是由於後來張之洞不滿意他的激烈言論，說任公的文字，「遠近煽播，必至匪人倡爲亂玠。」多方示意要他引去，任公只得去就湖南時務學堂的教席。到長沙後，時務報仍刊登了幾篇任公的文章，自五十二冊起，始不再見。以後時務報改爲官報，汪康年抗不移交，並改爲「昌言」報。不久戊戌政變發生，康梁亡命，時務報就此終了。

註一：梁啟超：「論報館有益於國事」，「時務報」第一冊。

註二：「鄂督張飭全省官銷時務報札」，「時務報」第六冊。

註三：「知新報」第六十六冊。

註四：節自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二五七—二七二，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十三日（八月二十一日） 官書局管理大臣孫家鼐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辦法六項。

先是，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李端棻奏請在京師設立大學堂。七月十三日，總署議覆李端芬推廣學校摺稱：「該侍郎所請於京師建立大學堂，係爲擴充官書局起見，應請旨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籌辦理。」（註一）

本日，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辦法六項：（一）先定宗旨，（二）速造學堂，（三）學問分科，（四）訪求教習，（五）慎選生徒，（六）推廣出身。（註二）作爲創辦京師大學堂之當前急務。

註一：總理衙門：「議覆李侍郎推廣學校摺」，「時務報」第七冊頁七。

註二：官書局：「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摺」，「時務報」第二十冊頁四—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七月十三日

二十一日（八月二十九日） 李鴻章自英國抵紐約，旋赴華府訪問。

本日，李鴻章抵紐約。二十三日赴華盛頓謁見美國總統克利夫蘭（Cleveland），並親向美國國務院遞交銜價加稅節略。美國表示：「各國若允，美無不從。」（註一）是各國無一肯增加中國關稅者。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二，頁十二。

二十五日（九月二日） 清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與俄國訂立合辦道勝銀行合同。

本日，駐俄公使許景澄與俄國代表羅啓泰（Romanoff）在柏林簽訂「華俄道勝銀行合同」五款，中國政府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夥開。合同全文如下：

「欽差駐俄大臣許景澄，欽奉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諭旨，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入股夥開合同，所有條款開列於後：

第一條 中國政府以庫平銀五百萬兩與華俄道勝銀行，夥作生意，即自給付該行此款之日起，所有賠賺照股攤認。

第二條 每年於俄曆正月初一日該銀行結算大賬時，應將中國政府之股本與該銀行之股本比較核準，至年底，凡中國政府所有賠賺之款，即照此準期，仍以庫平銀核計。

第三條 然該銀行章程，每年所賺利息，先提出若干分，作為各總辦之花紅。於提出花紅之後，所餘利息，中國政府與該銀行按股攤分。惟所分之利，應各提出一成，作為公積。並核計成本，如所剩餘利過於六釐，則於股息六釐之外，將所餘餘銀提出二成，作為辦事各人酬勞。若生意賠累，中國應認賠之款，先由其公積提出彌補。

第四條 該銀行月總年總，由股東總會核准後，即送由該銀行駐華經手人隨時呈交中國所派之東省鐵路總辦查核轉呈。

第五條 若該銀行因事收歇，或因生意賠累收歇，應核明中國政府股本折耗若干外，其餘本銀仍應照數歸還。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俄曆九月初二日。」（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二，頁十一——十二。

八月

二日（九月八日） 清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與華俄道勝銀行訂立東省鐵路公司合同十二款，由該銀行建築經理東省鐵路。

中俄密約締結後，即由俄財政部秘書羅啓泰（Romanoff）與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洽商築路事。本日，許景澄與俄方代表羅啓泰在柏林簽訂「東省鐵路公司合同」十二款，由華俄道勝銀行建築經理東省鐵路，路軌照俄式，鐵路之收益及票價運費由公司自理，俄軍及軍械經鐵路運輸者免其費。此約中國損失權益甚鉅。合同全文如下：

「欽差駐俄大臣許，欽奉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諭旨，允准與華俄道勝銀行訂定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中國政府現以庫平五百萬兩入股，與華俄道勝銀行合夥開設生意，盈虧均照股攤認，其詳細章程，另有合同載明。中國政府現定建造鐵路，與俄之赤塔城及南烏蘇里河之鐵路兩面相接，所有建造經理一切事宜，派委華俄道勝銀行承辦，所有條款列後：

第一款 華俄道勝銀行建造經理此鐵路，另立一公司，名曰中國東省鐵路公司。該公司應用之鈐記，由中國政府刊發；該公司章程，應照俄國鐵路公司成規一律辦理。所有股票祇准華俄商民購買。設公司總辦，由中國政府選派，其公費應由該公司籌給。該總辦可在京都居住，其專責在隨時查察該銀行暨鐵路公司於中國政府所委辦之事，是否實力奉行，至該銀行暨該公司所有與中國政府及京外各官交涉事宜，亦歸該總辦經理。該銀行與中國政府往來賬目，該總辦亦隨時查校。該銀行應專派經手人在京都居住，以期一切事宜就近商辦。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八月二日

六二〇

第二款 凡勘定該鐵路方向之事，應由中國政府所派總辦酌派委員，同該公司之營造公司暨鐵路所經之地方官，和衷辦理，惟勘定之路，所有廬墓村莊城市，皆須設法繞越。

第三款 自此合同奉旨批准之日起，以十二個月爲限，該公司應將鐵路開工，並自鐵路勘定及所需地段給與該公司經理之日起，以六年爲限，所有鐵路應全行告竣。至鐵軌之寬窄，應與俄國鐵軌一律，即俄尺五幅地，約合中國四尺二寸半。

第四款 中國政府諭令該管地方官，凡該公司建造鐵路需用料件，雇覓工人，及水陸轉運之舟車夫馬，並需用糧草等事，皆須盡力相助，各按市價，由該公司自行籌款給發，其轉運隨時由中國政府設法使其便捷。

第五款 凡該鐵路及鐵路所用之人，由中國政府設法保護，至於經理鐵路等事需用華洋人役，皆准該公司因便雇覓，所有鐵路地段命盜詞訟等事，由地方官照約辦理。

第六款 凡該公司之建造經理防護鐵路所必需之地，又於鐵路附近開採沙土石塊石灰等項所需之地，若係官地，由中國政府給與，不納地價；若係民地，按照時價，或一次繳清，或按年向地主納租，由該公司自行籌款付給。凡該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納地稅，由該公司一手經理，准其建造各種房屋工程，並設立電線，自行經理，專爲鐵路之用。除開山礦苗處所另議辦法外，凡該公司之進項，如轉運搭客貨物所得票價，並電報進款等項，俱免納一切稅釐。

第七款 凡該公司建造修理鐵路所需料件，應免納各項稅釐。

第八款 凡俄國水陸各軍械過境，由俄國轉運經此鐵路者，應責成該公司逕行運送出境，除轉運時或必須沿途暫停外，不得藉他故中途逗留。

第九款 凡外國搭客經此鐵路於中途入內地，必須持有中國護照，方准前往；若無中國護照，責成該公司一概不准擅入內地。

第十款 凡有貨物行李由俄國經此鐵路仍入俄國地界者，免納一概稅釐，惟此項貨物除隨身行李外，該公

司應另裝車輛，在入中國邊界之時，由該處稅關封固，至出境時，仍由稅關查明所有封記並未拆動，方准放行，如查出中途私行拆開，應將該貨入官。至貨物由俄國經此鐵路運往中國或由中國經此鐵路運赴俄國者，應照各國通商稅則，分別交納進口出口正稅。惟此稅較之稅則所載之數，減三分之一交納。若運往內地，仍應交納子口稅，即所完正稅之半。子稅完清後，凡過關卡，概不重徵。若不納子稅，則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中國應在此鐵路交界兩處各設稅關。

第十一款

凡搭客票價貨物運費及裝卸貨物之價，概由該公司自行核定，但中國所有因公文書信函，該公司例應運送，不須給費，至運送中國水陸各軍及一切軍械，該公司祇收半價。

第十二款

自該公司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爲限，所有鐵路所得利益，全歸該公司專得，如有虧折，該公司亦應自行彌補，中國政府不准作保。八十年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又從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收回，按計所用本銀，並因此路所欠債項並利息，照數償還。其公司所賺之利，除分給各股人外，如有盈餘，應作爲已歸之本，在收回路價內扣除。中國政府應將價款付存俄國國家銀行，然後收管此路。路成開車之日，由該公司呈繳中國政府庫平銀五百萬兩。」（註一）

附錄：李玄伯撰「中東鐵路之交涉」（註二）

接路之議在俄發源甚早，其輿論界亦已有此說，駐俄欽差許景澄譯寄總理衙門之俄報即其代表也。

照譯俄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時報，即中曆五月十三日十四日俄報述奧國時報得森堡信云：俄國欲與中國商假滿洲地爲接造悉畢利鐵路以達黃海之議，日多一日，不獨報館私論，即俄執政大臣亦有此意，想遲早終當與中國商議開辦云。近日俄都官報登悉畢利鐵路會各大臣會議節略，皆以爲按照目前情形，此路早成一日，早得一日之利。前皇亞歷山德第三早知俄欲增強於東方，非於悉畢利開造鐵路不可。當時論者以俄國國帑支絀，何能籌此鉅款以造荒遠無用之鐵路，且獲利亦尚在渺茫。前皇不爲浮言所動，即行開工。此次中日構釁，邊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八月二日

六一二

防加嚴，論者又以為悉畢利鐵路之不可少，轉惜其興辦稍晚，足見前皇深謀遠略，早有以見及之矣。此會既係俄皇親總其事，各議紳又復力催加工，當不至作為空論也。（許文肅公遺稿，函牘四，頁四十五）

許景澄並加以說明曰：「悉畢利（西北利亞）之路取道我境，彼報言之不已，必將有向我明商之舉。」此光緒二十一年五月間語也。至九月間果如許氏所料，接路議遂由俄使喀西尼來北京向總理衙門提出，總理衙門遂電許使與俄外部商自辦接起，不由俄辦。許氏在其致總理衙門總辦函中所述若下：

（九）月之初二日奉電發與俄外部說明中國自造鐵路與彼相接。欽譯聖意，正以借地修路為慮，並及俄外部不問遽辦等因。弟以外部未言，則派員勘路之舉，諒據邊吏所報，非有彼國明告。我先允其自造，疑於步驟稍速。因擬探商戶部，將接路前說再與中證，俾借地之說愈得杜絕。旋接衙門佳電，始悉為喀使來文所述。凡駐使之言即為交涉明文，理應與外部公言，故商探又作罷論。所有晤告羅拔情形，業由元電請奏。惟此役繁重，果能辦到自造，而議接事宜恐亦周折不少，大約總須兩國派員在交界商辦矣。自俄戶部經辦借款訂定後，各國新報皆謂中國已允俄國在滿洲通造鐵路以為報酬，俄將于預海關等語。大抵發端於英，而德附和之。（函牘四，頁五十一，致總理衙門總辦函）

此許氏與羅拔所談接路經過也。接路之事實由徽德堅持，故九月底徽德又邀許氏商談，許氏對總署之報告若下：又上月下旬俄戶部大臣威特邀晤，據稱中國現擬自造鐵路，與鐵路相接，已經外部告知。但本部為中國代謀計，目前未必有款，又無熟悉工程之人，辦理恐難迅速。俄國鐵路至九十八年即可造至中國黑龍江省邊界，若華路稽延不成，鐵路仍不能通車至海參崴，於俄國頗有不便。莫如准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與中國訂立合同，祇要所訂章程無礙主國事權，在中國可無他慮。請由貴使先行電請國家，准由本部商擬合同草稿，送呈中國核辦，並聲明此稿准否仍聽中國，並不作為議定等語。弟告以公司辦法與前奉本國訓條自造之說不同，遽爾電請擬稿殊有不便。威特謂此亦有理，姑俟備稿奉閱再商。迨數日前威特來館，謂公司之議已經外部電飭喀使在北京商辦，日內本部將所擬章程繕竣，一併由外部寄遞喀使，順便奉告云云。竊查俄之瓦爾肖鐵路，義大利之生郭塔山鐵路，係德奧等國公司承造，其主國或納其稅賦，訂若干年後購為本國之產，泰西諸邦原有此

例。惟俄商物力未必能舉此巨役，且議出威特，明係託名商辦，實則俄廷自爲。蓋即借地修路之謀，變通其策，以免諸國之忌，而釋我之疑。既曰公司，則如何議訂合同，收益防損，在我得操其權，與借地之授權於人，譬之兩害，相權自覺較輕。未審喀使已來提及否？（同上，函牘四，頁五十四—五十五）

至光緒二十二年二月許氏更有報告若下：

中俄接造鐵路，承鈔寄衙門摺片及各件，彌佩堂憲維持邊計之至意。其路如何取道，上年五月間曾於俄報譯件附述大概。（在八十二號函）今據喀使照會，證以游歷各俄員行程，正與相合。大約俄之悉畢爾幹道造至斯特列田斯克城，（在嫩嫩河西岸，俄曰什勒喀河。）分支轉東至粗魯海圖俄卡，（俄游歷西二起所經）逾額爾古納河入中國界；過內興安嶺至齊齊哈爾省城，沿嫩江松花江出吉林省城之北，經寧古塔至三岔口出中國界，而與海參崴至雙城子（俄稱尼果賴斯關業）幹路連接。此蓋經由我之陸地以達彼之海口。推原取道之故，自俄斯列田城以北，兩國以黑龍江爲界，江水北行轉東，復折而南，三面廻環。俄若循此江左岸築路，須增二千餘里，多費五六千萬盧布，自海參崴抵俄京須遲四五日。避迂趨捷，乃有接路之圖，所謂弓弦弓彎之別也。李家驤條陳謂造路至營口旅順，張香帥電奏謂至鴨綠江口。皆誤以俄路歸宿在中國海口，情形隔膜，可以無煩置論。茲就拙印簡明俄圖，摘要貼注，截客參閱。凡原估現擬弧直之形，我界彼境出入之迹，不難了然矣。惟俄廷現今喀使在京別商公司辦法，情事又稍不同。去臘抄羅拔諾夫面稱現接喀使來電，本部所寄擬公司函件已到，不久可與貴政府晤談云云。計此時喀已開談。此事重要，想非一時可了，以後有須與外部辯論之處，再候堂憲訓條辦理。（函牘五，頁九—十）

足證由光緒二十一年九月至二十二年文忠抵俄以前，俄京與北京兩處常在辦理接路交涉中也。

此文忠往俄前中鐵接路交涉之大略情形。

中俄交涉起自接路問題，文忠抵俄後始發生防禦同盟密約之討論，於是接路似變爲次要，文忠所謂「先訂援助，後議公司」也。但兩事始終相因，防禦同盟者，接路之交換條件，密約第四條特別聲明議造鐵路，第六條且明白規定「此約應由第四款合同批准舉行之日算起照辦」，合同實等于密約之附件。在俄人實將密約與合同看成一個，

所以俄德回憶錄謂密約共三項，即(1)讓造鐵路，(2)公司在鐵路地帶內有警權，(3)對日防禦同盟，(法譯本，七十七—七十八頁)并未分密約與合同也。

密約之生效既視合同之批准，而修路又交由華俄銀行承辦經理，因此而有入股五百萬兩于華俄銀行之事，簽訂密約後自應商訂鐵路及銀行兩合同。文忠即往德法後，任其事者，中方為駐俄欽差許景澄，俄方為財政部秘書羅啓泰 Romanoff，但事實上仍為文忠及俄德。羅啓泰為俄德秘書，凡事皆俄德訓令；許則時常請示文忠，觀電稿中各電可知。許兼駐德欽差，故鐵路交涉多由羅啓泰來德商議。文忠隨員之稅務司柯樂德亦常參與。

文忠與俄議鐵路合同開始于密約簽訂後，(合同初稿係由文忠電達北京者)後更由許景澄接商議，至八月初二始畫押。(據電八十六，光緒條約無月日)當時許與軍機處往來電報亦極秘密，洋務檔只記有電碼幾件，而未載電文，當亦似文忠往來電報之由大臣親譯而不經章京之手者。(其詳見第九章軍機處檔案)，檔案既不能供吾人以當時交涉狀況，賴有電稿，由李許來往電報中，尚能略窺其一二。

據翁記，則鐵路及銀行合同原稿，皆曾電達軍機處，而於五月初五日進呈。電稿則未錄此電，但由電稿中各電尚能約略窺見初稿之面目，至其修改處不甚重也。茲為便利閱者起見，特錄光緒條約所載之東省鐵路合同及銀行合同若下：

據電六五，總署于五月二十四日電許商應添改者四項，即(一)路軌應照中國式四尺八寸五分，交界換車；(二)開出礦苗另議辦法；(三)俄貨經此路仍入俄境者徵半稅；(四)三十六年後將路歸還中國。由此可知合同初稿當係(一)用俄路軌尺寸，不換車；(二)未提礦苗，當與公司所有他項進款一律不納稅；(三)俄貨仍入俄境者免稅；(四)八十年後將路歸還。翁記二十一日「商鐵路合同事」，此當即所商者。

經許派柯樂德往俄商議，俄人允(一)礦苗另議；(二)俄貨入界，另車封記，出界查明放行備稽考；(三)仍八十年後歸還，但增三十六年後可議價收回；但俄堅持第一項，即軌須用俄軌尺寸。(電六七)

俄人對軌式持之甚堅，謂若「駁此條，不如并密約俱廢。」然中方亦堅持須照中國路軌。兩方各有其理由。中方為將來國內各路能聯絡通車，故欲劃一路軌，且為國防起見，不欲與俄同軌，使之便利；俄方則為鐵路能直達海

參議，亦不欲中間用中國軌式，須兩次換車。俄人既堅持，文忠似亦偏袒俄方，商議結果，中方讓步採用俄軌。德又欲改三十六年後議價收回爲五十年後，礦苗辦法須將煤礦除外，皆經中方拒絕。

此外中方更聲明電線專爲鐵路之用。

總觀以上各節，吾人當能明悉鐵路合同之初稿及其添改。

第一款至第五款 未改。

第六款 「並設立電線，自行經理」下，初稿無「專爲鐵路之用」字句；「凡該公司之進項」上，初稿無「除開出礦苗處所另議辦法外」字句。

第七款至第九款 未改。

第十款 「免納一切稅釐」下，初稿無「惟此項貨物除隨身行李外，該公司應另裝車輛，在入中國邊界之時，由該處稅關封固，至出境時，仍由稅關查明所有封記並未拆動，方准放行，如查出中途私行拆開，應將該貨入官」字句。

第十一款 未改。

第十二款 「毋庸給價」下，初稿無「又從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收回，按計所用本銀，並因此路所欠債項並利息，照數償還。其公司所賺之利，除分給各股人外，如有盈餘，應作爲已歸之本，在收回路價內扣除。中國政府應將價款付存俄國國家集行，然後收管此路」字句。

至于銀行合同則李許往來電報皆未提及，對初稿並無添改也。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頁七——十一。

註二：節自李玄伯「李文忠使俄與光緒中俄密約」，載「大陸雜誌」，第一卷第八期。

九日（九月十五日）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王文韶，請設蘆漢鐵路公司摺到京，並保薦津海關道盛宣懷督辦其事。

先是，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張之洞、王文韶會銜保薦盛宣懷組織公司，督辦蘆漢鐵路。（註一）本
日清廷諭命宣懷著即來京，以備諮詢。（註二）九月十三日宣懷奉旨覲見，十四日乃以四品京堂候補，
督辦鐵路公司事務。（註三）

註一：「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四四，頁十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三九四，頁七。

註三：同註二，卷三九五，頁六。

十七日（九月二十三日） 孫先生文由紐約乘麥竭斯底輪赴英。

孫先生居美三月，行止漸爲駐美清使館及各地領事館所悉，友人咸相戒曰：「中國駐美公使爲滿洲
人，其與漢人本無感情，而惡新黨尤甚，故必宜小心謹慎。」（註一）孫先生以清廷偵緝甚嚴，且留美
多時，無可活動，決計赴英。本日，遂乘麥竭斯底輪（White Star Line S.S. Majestic）赴英國利物浦。

註一：「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中央文物供應社）第六集，頁一七四。

二十四日（九月三十日） 孫先生文抵英國利物浦。

孫先生自紐約啓程赴英後，清廷駐美出使大臣楊儒即於八月十九日將孫先生所乘船名及登陸港口，
電告駐英出使大臣龔照瑗。電云：

「現據紐約總領事施肇曾探悉：孫文於九月十三號，禮拜三，搭 White Star Line Majestic 輪船至英國黎花
埠登岸。」（註一）

龔照瑗旋命使館英籍二等參贊馬格里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馬格里係據使館檔中呈報之
正式譯名，「倫敦被難記」中作馬凱尼），委託司賴特偵探社（Slaters Detective Association）派偵探
密伺孫先生蹤跡。據偵探社致馬格里報告，謂孫先生乘二等艙，在利物浦登岸後即乘火車赴倫敦。

(註一)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五。

註二：同註一，頁一九五—一九六。

二十五日(十月一日) 孫先生文抵倫敦。

本日晚間十二時左右，孫先生抵達倫敦，投宿於斯屈朗路(Strand) 赫胥旅館(Haxelles Hotel)

(註一)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六。

二十六日(十月二日) 孫先生文晤康德黎夫婦。

本晨，孫先生文至波德蘭場(Portland Place)之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四十六號康德黎寓所相訪。康夫婦招待甚殷，並為覓居附近之葛蘭法學協會場(Gray's Inn Place)八號寶勒特小姐(Miss

Pollard)開設之私人公寓(Boarding)。翌日偕孫先生遷往。(註一)

清駐英出使龔照璠電總署，謂孫先生到英，已派人密尾行踪。

本日，龔照璠電總署云：

「接楊使函電悉，飭拿粵犯孫文，該犯現由美到英，改洋裝無辨，外部以無在英交犯約，不能代拏，現派人密尾行蹤。」(註一)

據此可知清廷英公使已向英政府交涉引渡，但為英外部所拒絕。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七十八。

註二：「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一。

二十七日(十月三日) 李鴻章自美國返天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八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先是，鴻章於辦妥中俄密約後，往聘歐美諸國。其行程由俄而德，經荷比至法，再由法而英，由英而美。其目的並非普通聘問，而重在加稅問題。當時清廷經濟狀況甚惡，故擬要求各國將關稅改用金鎊徵收，以增收入。時增稅交涉總署令由俄發端，但鴻章對此未作答覆，似交涉未有結果。至於英國方面，則切實辯論兩小時後，沙侯(Salisbury)謂「應俟修約屆期再議」，採取拖延態度。而德國則反更進一步要求增開口岸為交換條件。至於美國則稱「各國如允，美無不從」。蓋各國無一肯加關稅者，並均對其採取狡猾之態度。(註一)本日，鴻章自美國返抵國門。

註一：李玄伯「李文忠使俄與光緒中俄密約」，「大陸雜誌」，第一卷第八期。

二十八日(十月四日) 孫先生文於康德黎寓進餐，談中國使館事。

數日來，孫先生每日必至康德黎寓，每至必取其藏書，讀而消遣。亦時訪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孟先生亦為孫先生就讀香港西醫書院時舊識，曾授孫先生醫學者。本日，孫先生於康寓進餐，康氏戲謂中國使館即在比鄰，盍過訪之，因相視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館中人觀子之面，行當出而相捕，解送回國耳。」孫先生聞言，益相與大笑。一夕，孫先生餐於孟生家，孟生亦戒曰：「慎勿行中國使館，致墮陷阱。」惟孫先生初至倫敦，途徑未熟，仍不知中國使館之所在也。

(註一)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七九。

九月

四日(十月十日) 孫先生文赴英國國會上下兩院參觀，龔照璠密電楊儒謂：以與英無交犯條約，引渡無效。

孫先生抵倫敦後，除逐日往康德黎及孟生寓所外，輒往倫敦大英博物院遊覽，或訪各處古蹟，觀其車馬之盛，貿易之繁，而來往道途，絕不若東方之喧嘩紛擾，且譽其警察敏活，人民和易，使人悠然嚮往。（註一）本日，孫先生赴英國國會上下兩院參觀，逾二小時。（註二）並往 Regent's Park 及動物園、植物園參觀，下午四時回旅館，即未再他往。（註三）而駐英清使則於本日密電楊儒云：

「孫文已到英，外部以此間無交犯約，不能代拏。聞將往法，現派人密尾。」（註四）

註一：「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中央文物供應社）第六集，頁一七四。

註二：羅家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頁一一五。

註三：「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七九。

註四：「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一。

五日（十一月十一日）孫先生文被清吏誘禁於倫敦清使館。

本日為星期日，孫先生約於八時起床，早餐後，於十時半自葛蘭旅店場赴賈文省街，欲偕康德黎等赴禮拜堂祈禱。甫經波德蘭場，一華人悄然身後至，此為先生至倫敦後首次遇見同胞，甚驚異。彼走近先生旁，操英語問先生曰：「君為日本人歟？抑為中國人歟？」先生曰：「予中國人也」。渠又問先生屬何省籍，先生答以「廣東」。遂互通姓名，先生告以「予姓孫」，彼云姓鄧（Tang）。先生並詢以倫敦有華人若干，鄧答甚多。先生復問其居所，鄧指以對面，並謂「彼處即予住所也」。且行且語，步履頗舒緩。俄而又一華人來，鄧為先生介紹，並與握手，二人堅請先生過其居，謂當烹茶進點，略敘鄉誼，先生婉却之，遂相與踰立道旁石階。未幾，又一華人至，加入交談，鄧即迤邐去，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或挽，必欲強先生過從，意頗誠摯，是時已及於階砌傍屋之側，彼等曰：「噢！讓我們進去。」遂拉先生入室。既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然先生尚未知此屋為中國使館也，故心中無所疑懼。初，先生

之所以猶豫不即入者，欲急往訪康德黎等同往禮拜堂，恐中途誤時而不及耳。迨既入室，此二人邀先生登樓，及見閉門始有所疑懼，乃問鄧何往，此二人則迫先生上樓，其態度亦變，先生乃知已入陷阱矣。彼等厲聲曰：「走！上樓。」先生問以何事，彼等僅促先生上樓，此時約爲上午十一時。先生被引至一室，有一二華人，自相磋商數語，遂遣二人挾先生登樓，先生亦不之抗。既登樓，復入一室，令坐候。未幾，而二人又至，更挾先生上，仍令入一室。須臾，來一英國人，即馬格里也，一入室即謂先生曰：「汝即孫文乎？」先生曰：「余姓孫」。馬曰：「予得中國使臣自華盛頓來電，謂有孫文乘麥竭斯底輪來英。」馬並問先生是否亦有其他中國人搭乘該輪。先生告以除其本人外，並無其他華人。馬並謂：「汝前上策於總理衙門，其策至佳，惟今者總理衙門急須得汝，汝須在此等候，以待吾人獲得命令。」先生聞須幾久，答須十八小時。彼復要先生致函旅館，以爲提取行李。先生云：「予非住於旅館，孟生博士知予住處，汝能爲予投函孟生博士，彼將爲予提取行李。」馬格里允之，乃命人給以紙墨，先生遂書一函，其中有云：「予被監禁於中國使館。」馬閱竟曰：「吾不願君使用監禁 (Confined) 一詞。」先生曰：「然則何所云？」馬曰：「僅謂送來行李可矣。」先生乃另書一函云：「予現於中國使館，請將予之行李送來。」馬云：「予須問公使後，始能投此函。」遂將先生函携之去。在先生離使館前，不復見此人矣。而先生初亦不識之爲何許人，厥後始知其即聲名鼎盛之馬格里也。馬臨去時，即闖先生室之門，並下鍵焉。自是遂遭幽禁矣。未幾，聞門外有匠人施斧鑿之聲，則於原鍵外更加一鍵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監守門外，有時或更添一人監守之。(註二)

孫先生所著「倫敦被難記」記其經過：

「是年十月十一日，適值星期，予於上午十點半鐘時，自葛蘭旅店 (葛蘭旅店在倫敦霍爾龐 Holborn 之葛蘭旅店街。霍爾龐區名) 赴華文省街，意欲詣康德黎君等赴禮拜堂祈禱。正躑躅間，一華人悄然自後至，操英語問予曰：『君爲日本人歟？抑中國人歟？』予答曰：『予中國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籍，予答曰：『廣東』。其人仍

操英語曰：『然則我與君爲同鄉，我亦來自廣州者也。』夫中國盛行不規則之英語，名曰 Pigeon 英語，意即商業英語也。華人雖同隸一國，而言語多相扞格。譬如汕頭之與廣州，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視倫敦之與利物浦猶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語，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藉商業英語相通款。彼汕頭人與廣州人之商於香港者，多以英語相接，此足以見我國言語之歧雜矣。

予途遇之華人，既知予爲粵產，始以粵語相談，且行且語，步履頗舒緩。俄而又一華人來，與予輩交談，於是予之左右，乃有二人相並而行矣。二人且堅請予過其所居，謂當烹茶進點，略敘鄉誼，予婉却之，遂相與竚立於道旁階砌。未幾，又有一華人至，其最先與予相遇者，即迤邐去。於是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強予過從，其情意誠摯非常，予是時已至於階砌傍屋之側。正趨趨間，忽聞鄰近之屋門嗒然而闕，左右二人挾予而入，其形容態度又似諧謔，又似周旋。一紛擾間，而予已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然予尚未知此屋爲誰之所居，故中心無所疑懼。初予之所以猶豫不即入者，蓋急欲往訪康德黎君及孟博士冀同往禮拜堂，恐中途遲回而不及耳。迨予既入門，視其急遽之狀，且屋宇若是寬廣，公服之華人若是衆多，因陡然動念曰：是殆即中國使館乎？又憶中國使館在單文省街之鄰，意者予向時躑躅之所，必中國使館左右之道途也。

予入門後，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二人與予接談數語，又自相磋商數語，遂遣二人挾予登樓，予亦不之抗。既登樓，復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幾，而二人又至，更挾予上，是爲第三層樓，仍令入一室中，其室有窗，護以鐵柵，窗外即使館之屋後也。須臾來一鬚髮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饒有官氣，一入室即謂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國，此間即中國也。』

言已就坐，徐徐詢予曰：『汝即孫文乎？』予曰：『然。』

其人曰：『實告汝，予得駐美使臣來電，謂汝乘麥竭斯的號輪船游歷至英，故令我拘汝於此。』

予問曰：『拘予何爲耶？』

其人曰：『汝前曾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汝，因令余暫相羈留，以待朝廷之命。』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五日

六二二

予曰：『然則予之留此，可告吾友乎？』

曰：『否！是不能。惟旅館中之行李，汝可草一函，此間人當爲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書於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給予紙筆，予書中大意謂此身已被禁於中國使館，請轉告康德黎君，俾取予之行李帶下云云。其人閱竟。曰：『函中何能書及被禁二字，汝可別繕一函。』予乃另繕曰：『頃予在中國使館，乞告康德黎君，爲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知爲何許人，厥後而始知其即聲名鼎盛之馬凱尼 Sir Halliday Marcartney 也。

馬凱尼君一轉念間，忽又謂予可逕函告旅館，不必託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並非旅館，除康德黎君外無知者，因以改繕之函授之。馬凱尼唯唯，許爲代寄。馬凱尼之所以忽然轉念者，蓋欲藉是以搜予行篋，或能得吾同黨之姓名及往來之函耳。計誠狡哉。

馬凱尼君臨去時，即闔予室之門，並下鍵焉；自是予遂遭幽禁矣。未幾，聞門外有匠人施斧鑿之聲，則於原鍵外更增一鍵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監守門外，有時或於二監者之外更添一人。當最初之二十四小時內，其中國監守二人，時或入室與予相語。其於被禁之原因，雖無一語宣洩，予亦不之問。然曾告予以頃者相見之老人即馬太爺，予審爲馬凱尼也。大爺者官場通俗之尊稱，猶當時駐英公使龔某之稱龔大人也。使臣與外人酬酢不用眞名，遂使外國人人稱之曰大人。時不知英政府公牘上之往還，亦稱龔大人否耳？中國官場及外交禮節，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爲侮慢者。西人之於中國文學風俗未經殫心研究者，實難明瞭。故彼外交官輒喜於管接之間，以言語文字愚弄外國人，偶或佔勝，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被屈於我矣』。其可笑一至於此。

予被禁後數小時，忽有一監守者入，謂奉馬凱尼君之命，搜檢予身，因探取予鑰匙、鉛筆、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鈔票數紙，未被檢取，故彼所挈以去者，僅無重大關係之文件數紙而已。監守者復詢予需何飲食，予僅令取牛乳少許而已。

是日，有英國僕役二人，入室燃火爐，除灑掃外，並置煤於室，以供燃火之用。予授書於先至之英僕，令爲寓書於覃文省街四十六號康德黎家，僕唯唯。迨後至之英僕來，予亦託之如前。此二僕者厥後並稱已將予信遞寄，然

所言殊未足信也。是晚，有一英婦入，爲了設臥具，予未與語，及夜和衣而臥，然中心愁悵，徹旦不能入夢。」（註二）

另據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記其事云：

「當時孫先生怎樣會被公使館拘留起來呢？照孫先生自己作的『倫敦被難記』所說，是道遇公使隨員鄧廷鏗（號琴齋），自言是香山同鄉，他鄉遇故，就拉到鄧家內談天，原來他的家就是中國公使館。以後先生又遇到好幾次，即被挾持登樓，禁諸室中。但是實際並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時孫先生對我說：他早已知道公使館，他故意改換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館去宣傳革命。後來公使館的人疑惑起來，因爲當時廣州起義之事，傳聞還盛，以爲這人或者就是孫逸仙。公使隨員鄧廷鏗因爲是同鄉，就認出他的確是孫逸仙。於是孫先生就被他們拘禁起來了。」（註三）

龔照璠電報總署，當相機設法解送孫先生回國。

孫先生文被誘禁於清使館後，當日清駐英公使龔照璠即致電總署曰：

「密。孫文到英，前已電達，頃該犯來使館，洋裝，改姓陳，按使館即中國地，應即扣留，惟何時解回，約頗不易，當相機設法辦理。祈速示復。勿令竇使知，並請電粵督。」（註四）

註一：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八〇——八一。

註二：「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內（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頁一七八——一八〇。

註三：「興中會革命史要」頁一四——一五。

註四：「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一。

六日（十月十二日）清總署電命龔照璠詳慎處理孫先生文被禁清使館事。

本日，孫先生在幽禁中。二英僕於清晨至禁室，持食物、煤料、清水等以進。一僕誑告名片已遞康；一僕名柯爾（George Cole）者逕告孫先生謂未能得開出使館，故未遞。次日，孫先生再囑英僕致書，復爲所紿。（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八日

六二四

清總署於接龔照瑗「歌」電後，知孫先生已爲駐英使館所扣，本日覆電龔照瑗曰：

「能按公法扣留，英不問，固好。解粵應設何法？能免英阻。且必到粵，望詳商律師。謀定後動，無令援英例反噬，英又從而庇之，爲害滋大，切望詳慎。」（註二）

註一：「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內（中央文物供應社）頁一七八。

註二：「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一。

八日（十月十四日）龔照瑗致電總署，擬雇商船將孫先生文密解廣州。

本日，龔照瑗以「庚」電致總署，建議雇商船將孫先生解廣州，否則釋放，仍派人密尾。電曰：

「孫無忌憚，自來使館，勢應扣留。據問看管之鄧翻譯言，欲謀大事，惟時未至等語。有西人知粵督幾爲所害，是反形已露。外部既以香港、緬甸約不能施之於英京，現籌購商船，徑送粵，不泊英埠，可無他虞。船價煤工，約需七千鎊，得載二千餘噸船一隻，不用，變價亦可。否則釋放，仍派人密尾，窮其所往，亦不露痕跡。統乞速示遵行。」（註一）

鄧廷鏗告孫先生，將押運回國，明正典刑。

本日，鄧廷鏗入禁室與孫先生接談，語帶威脅。並逕告孫先生，使館正雇專船載其回國就刑計畫，其意甚自得。孫先生告以國際法上使館無權出此。「倫敦被難記」曰：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稱唐（鄧）先生者來視予，彼蓋誘予入使館之人也。唐（鄧）先生就坐，傲然曰：『前日之強君至此，乃公事公辦，義不容辭，今日之來，則所以盡一己之私情。我意君不如直認爲孫文，諱亦無益。蓋此間均已定奪一切，且君在中國卓有聲望，皇上及總理衙門，均稔知汝之爲人，君姓名已震鐫寰球，即死亦可以無憾。總之，君在此間實生死所關，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間爲英國轄境，非中國之屬地，公等將何以處余？按諸國際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將拘予之事聞於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隨意處置也。』

唐（鄧）答曰：『吾儕不顧更與英政府爲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輪舟亦已僱定，屆時當籍君口，束君肢

體，昇赴舟上，而置於嚴密之所，及輪抵香港，當有中國戰艦泊於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艦，載往廣州，聽官吏鞫審，並明正典刑。」

子曰：『公等此舉，未免草率過甚。蓋予在舟中，或得乘機與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鄧）微笑曰：「否否，君雖萬能，亦難出此。蓋君登舟之後，即有人嚴密監視，與在此無異。苟有可與外人通消息之處，吾等必先事杜絕，決不使君有絲毫間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員司，未必與使館沆瀣一氣，其中安知無矜憫我而爲我援應者？』

唐（鄧）曰：『愚哉君也。是輪船公司乃馬凱尼君所深識者，該公司人員自當遵馬君之命而行，決不爲吾輩梗。』

唐（鄧）又續曰：『是輪船者，屬於格來公司（Glen），本星期內未必啓程，（按唐（鄧）某與予談話之日爲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蓋公使爲經濟起見，不欲專僱是船，因令其先載貨物，而行旅之費。則由使館全認。迨次星期，裝載貨物既竟，君亦須附載以行矣。』

予謂：『此等計畫，欲見諸實行亦良難。』

唐（鄧）曰：『此着如不果行，則予儕亦不妨戮汝於此，繼免周折。蓋此間即中國，凡使館中所爲之事，決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鄧）言已，又侃侃然學高麗某志士事爲我勸慰，並資啓迪。蓋某志士自高麗出奔至日本，被其同國人誘赴上海，戕斃於英租界內，由華人將志士遺骸運往高麗，高麗政府戮屍示懲，而其戕斃志士之兇徒，則獲重賞並擢高位焉。唐（鄧）口述時，手舞足蹈，意興甚豪。蓋彼以爲此次捕予有功，將來中國政府亦必加以重賞，賜以高位也。

予問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殘忍若是。』

唐（鄧）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當加以不次之賞。』

予又進逼曰：『君須知高麗志士之案，即中日開釁之一因。今公等致予於此，或引起極大之交涉，未可知也，將來英政府對於使館中人，不免要求中國政府，全數懲治。況君爲粵人，吾黨之在粵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爲予復仇，豈第君之一身可慮，甚或累及君之家族，其時君將追悔莫及矣。』

唐（鄧）某聞予言，不覺色變，頓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爲，皆公使之命，我此來不過爲彼此私情計，

俾君知前途之危險耳！」（註二）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一。

註二：「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中央文物供應社），頁一七八——一八〇。

十日（十月十六日） 駐英清使館女管家霍維太太 (Mrs. Howe) 力勸柯耳 (George Cole) 為孫先生傳信。

孫先生被禁室內後，凡覓得片紙，即將被難情形疾書其上，裹以錢幣，屢由窗櫺擲出；然僅及鄰屋，未能外達。且有一紙，誤觸於繩，尋落使館員工之手；由是防範益密，窗上均加螺旋釘，不再能自由啓閉。至此先生捨祈禱外無他策。本日上午，祈禱既畢，頓覺心神一舒，因決再盡人力。適柯耳又至，先生爲述土耳其蘇丹殺害阿美尼亞基督徒故事，反復譬喻曰：「中國皇帝之所嫉視者，爲中國之基督徒，故欲捕殺之。吾即中國基督徒之一，且曾盡力謀政治之改革者；英國人民，咸表同情於阿美尼亞人。故吾之生平及目前狀況，苟爲英國人所知，則其表同情於我，可不言而喻。……吾之生命，實懸君手。君若能以此書聞於外，則吾命獲全。否則予惟有束手受縛，任其殺戮耳。君試思救人之死，與致人之死，其善惡之相去幾何？又試思吾人盡職於上帝爲重乎？抑盡職於雇主爲重乎？」（註一）柯耳即將孫先生被囚事及求援經過告知清使館女管家霍維太太，霍維太太極同情先生之遭遇，乃謂柯耳曰：「喬治，假若我是你，我一定去做。」柯耳云：「致數行與康德黎博士，當無所損害，亦不致爲他人所知。」允俟決定後於公畢告知霍維太太，惟屆時未遇。次日仍未遇。亦未爲先生遞信焉。（註二）

註一：「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中央文物供應社），頁一八三。

註二：「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八三。

十一日(十月十七日)

龔照瑗接獲清總署覆電，准購船將孫先生文選解廣州。

先是，龔照瑗自本月初八日致電總署後，迄未得覆。初十日再電催總署，解送回國，或釋放，速作決定。電曰：

「庚電未奉復，扣留至今，外無知者，釋放亦宜早，免露痕跡。迄速示。」(註一)

本日，龔照瑗接獲總署覆電，電曰：

「購商船解粵，係上策，即照行。七千鎊不足惜，即在滙豐暫撥，本署再與劃扣。惟登舟便應錄，管解亦須加慎，望盡籌周備，起解電聞，以便電粵。」(註二)

康德黎接獲未具名函，孫先生文被禁消息始外洩。

本日夜間十一時，康德黎在其信箱中獲一未具名函，內容如下：

「你有一個朋友，從上星期日起，被囚於中國使館。他們打算把他送回中國；到中國他們一定會把他殺了。這個可憐的人，真是慘極了。除非立刻有辦法，他是要被解，並且不會有人知道的。我不敢簽我自己的名字，但是這件事是真的，請你相信我所說的話。你能盡什麼力就立刻盡，不然來不及了。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孫逸仙(原函拼作(Sin Yen Sen) o)」

蓋此函為清使館女管家霍維太太(Mrs. Howe)所投也。此為先生被禁消息之首次外洩。(註三)

時康德黎正以孫先生失蹤為慮，接書時自驚駭異常。時雖深夜，然恐營救無及，首馳至哈蘭場(Harley Place)三號，訪馬格里，無着；繼赴梅爾蓬巷(Marylebone Lane)訴諸警署；又赴蘇格蘭場晤偵探長，然均未得要領。時已夜半，康乃返寓。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八三——八四。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十一日

十二日（十月十八日） 孫先生文手書求救名片由柯耳遞達康德黎，康德黎與孟生奔走營救。

本日晨，柯耳見霍維太太，告知其決心，願為孫先生遞信於康德黎。霍維太太甚喜，對柯耳力予鼓勵，且言彼已遣人傳遞消息與康德黎。為更求妥善起見，仍要柯耳持孫先生名片往訪康德黎等。柯耳即於是晨為先生取煤炭來，暗指篋中紙片而去，孫先生急取閱之，其詞曰：「吾當為君遞書於君友，惟君書時切勿據案而坐，因監守者伺察極嚴，得於鑰中窺見君之所為，幸君伏於臥榻書之為要。」孫先生即取名片，面壁疾書，致康德黎，書以英文為之，共有二張。嚮午，柯耳復來取函去，孫先生酬以二十鎊。（註一）

康德黎為營救孫先生，於本日晨就商於友，旋赴孟生（Madan）博士處，及門遇柯耳，蓋柯耳先赴康寓，再赴孟生處候康也。柯耳出孫先生手書，康德黎與孟生共閱之，其詞曰：「予於前星期日，被二華人始則使以誘騙，繼復驟加強暴，將予幽禁於清使館中。一二日後，使館將特僱一船解予回國。回國必當斬首，奈何？」康德黎復於柯耳口中，知誘禁事為馬凱尼所為，不禁大為駭愕，知非向政府交涉不可。乃授柯耳名片一紙，歸慰孫先生，即與孟生同赴蘇格蘭場警署，再請警察出面干涉。又同赴外務部，以是日適為星期日，均無結果。深恐孫先生被押解上船，救將無及，乃由孟生赴清使館施以警告，鄧廷鏗出見，竭力否認有此事。孫先生後言其事，幸前公使曾紀澤返國時已將其居宅退賃，否則使館中人必將孫先生改禁於曾宅中，將請英政府赴使館檢查，則全被瞞過矣。康德黎又以清使館將於禮拜二日解孫先生上船，為期甚迫，乃往覓私人偵探偵伺其事，旋又赴太晤士報館，告以孫先生被誘禁事。幾費轉折，終覓得一私人偵探，偕往清使館，時已夜半十二時，見使館中燈火猶明，人影幢幢，是可知孟生日間之警告，已使使館中人驚擾矣。康德黎乃留偵探守候使館之門，以防解走孫先生。（註二）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八四。

註二：「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內，頁一八六——一八八。

十三日（十月十九日） 英政府證實孫先生文被禁及遞解等事，命偵探六人密伺於清使館外。

本日晨，康德黎添雇偵探一人，守候於清使館四周，防其偷運孫先生出館；並備一節略致英外交部。英外交部初以此事純出傳聞，或得諸密訴，尚無確實證據，謂不宜出以正式交涉。迨派人質諸格來輪船公司，始知中國使館確有定雇船艙之事，乃知不特私捕人犯爲非虛，即實行遞解亦屬實，於是英外部決定提出交涉。而康德黎數日來奔走營救，至此乃獲有頭緒。英外交部在未提出交涉前，先派遣偵探六人伺於清使館四周守候。（註一）

中、日訂立通商公約文憑四項。

本日，總署承認日使林董要求，由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敬信與日使林董訂立通商公立文憑四項，主要條款爲：新添蘇、杭、沙市、重慶口岸專設租界；中國可酌課機器製造稅，但須於津、滬、漢、厦設專管租界；山東軍隊不得逼近威海衛四十里以內。全文如下：

第一款 添設通商口岸專爲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權專屬領事。

第二款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江海關所頒示之洋商蘇、杭、滬三處通商試辦章程內，其係輪船以及雇用自置船隻之事當與日本妥商而定，未經商辦之前，務依長江章程照行。

第三款 日本政府允中國政府任使酌量課機器製造貨物稅餉，但其稅餉不得比中國臣民所納加多或有殊異，中國政府亦允一經日本政府咨請即在上海、天津、厦門、漢口等處設日本專管租界。

第四款 電達山東巡撫，凡距日本軍隊駐守區之劃界，日本里法五里約合中國四十里以內，中國軍隊不宜逼近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十四日

六三〇

或駐紮，以符條約。爲此公立文憑須至文憑者。

以上繕寫漢日文各二分，校對無訛，署名蓋印，彼此各執一分，以昭信守。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明治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註二）

註一：「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內，頁一九二。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三，頁十五——十六。

十四日（十月二十日） 清廷設立鐵路總公司，命盛宣懷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

先是同治年間，外人屢謀在中國境內修築鐵路，清廷朝臣與疆臣對興築鐵路贊成與反對者紛辯不已。自光緒二年松滬鐵路拆毀之後，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始有唐、胥連煤鐵路之築成，主其事者爲李鴻章。李氏於此路展通天津之後，更擬接築至通州。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緩造津通，改建腹省鐵路，以期貫通南北，並稱蘆漢路有八利。清廷爲此特調張之洞爲湖廣總督，籌辦蘆漢鐵路事宜，並命戶部歲撥二百萬兩以供路需。不謂事方決定開始，直督李鴻章因東北防務緊急，奏准先辦關東，於是將部款移緩就急，蘆漢路暫歸停頓。

及甲午戰後，朝野均知築路之必要。直督王文韶與鄂督張之洞均奏請速辦蘆漢大幹線。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清廷降旨將籌辦未成之蘆漢鐵路重議興修，並聲明各省富商如集股達千萬兩以上而無洋股者，即准承辦。既而王、張二督查明所謂商股股款多洋股，不得已乃奏請商借洋債俾早動工。適其時盛宣懷以津海關道走謁王、張二督，條陳辦法，謂官辦難，商辦難，招洋股借洋債尤難，擬請設立鐵路總公司，將招股內債外債合而爲一。王、張二氏嘉其議，於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據情奏請設立鐵路總公司，以盛宣懷爲督辦大臣，八月九日奉旨即着盛來京備詢。盛氏遞有一說帖，文長數千言，錄其要點如下：

一、官辦鉅款難籌，將來督率之人志趣各殊，辦理紛歧，以福建船政爲例，勢必相同，此官股之難。

二、華商眼光極近，魄力極微，求利極奢。路工須四五年，全工未完無利可給，聞者莫不爽然而去。華商本無遠識，官紳暗贊恒產，有錢惟恐人知。商股挾贊營運，不能一日無利，此華股之難。

三、與洋人合股之公司事權屬之外人，苟遇緊急，不克運兵饋餉，適與造路本意相左。且恐此例一開，各國相與要求，必將路路被人佔造，此合洋股之難。

四、國債向以海關實款抵質，若由公司出名商借洋債，則祇能以路抵押，而路未造成之際，本利蹈空，洋人勢必多所挾，仍須國家擔保，此借洋債之難。

五、以蘆漢位置論，東南各省客貨，江浙兩省漕糧，由滬至津與由滬至漢輪船運費與時間約相等。由滬運漢之後，再無再轉火車北運之理。是車運僅有雲貴川湘之貨客，路長費繁，本重利輕，華商熟籌已久。沿路所經鄂豫直三省又無甚富商大賈，欲專指蘆漢而招股，恐直無人過問。風氣先開之粵滬商人視蘆漢爲遠，是專藉蘆漢而招股尤難。

六、請特設鐵路總公司，先造蘆漢幹路，其餘蘇滬、粵漢等處亦准該公司次第議請展造，不再另設公司。似此西北造路東南商股方能號召，即使各國來議，亦可飭交公司查照公法處理。

七、請由總公司招集商股四十萬股，每股銀一百兩，共計四千萬兩。自開工起至竣工日止，先收商股七百萬兩，爲公司根基，並請暫入官股三百萬兩爲倡率。官股亦照商股掣發股票，路成後一律收利，將來或永遠列作官股，或俟商股充足隨時歸還。

八、請由公司先借官股一千萬兩，續借洋款二千萬兩，五年之後分作二十五年歸還。因商股必在路成之日有利可收，方能招集，洋債亦須俟路將及半有路可指方能抵借，所以除官商股分一千萬兩之外，必須先借官債一千萬兩，分道開工，俟路成一段，再向洋商借債。

九、鐵路總公司請悉照公司章程辦理，遴選各省公正紳商，舉充總董與幫董，再由總幫董公舉銀錢總管，工程總管，參贊，監察諸執事，按西國規模，盡除官場習氣，並由戶部及直湖兩督隨時到工查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十五日

六三二

十、中國於鐵路工程尚無專門之學，須選頭等洋工程師勘路繪圖。惟擬借何國之款，即募何國之匠。美國未貸官債，並於中國無所覬覦，鐵路工程尤精，如用美債用美匠，各國忌心稍遜。（註一）

盛宣懷所遞說帖極爲總署所贊同，即由總署奏明清廷，謂說帖所論四項籌款之難均屬確有見地，所擬先借用部款一千萬兩自當如數籌濟，南北洋之三百萬兩係現成存款，可就近撥用；先收商股七百萬兩，事權有屬，當可招徠；即擬借洋股二千萬兩亦可歸該道自行籌辦，由公司訂借。惟此公司自必合南北統籌，始能展拓，蘇滬粵漢亦當次第舉辦等語。九月十三日，盛宣懷奉旨覲見。本日，清廷准設鐵路總公司，着盛宣懷開去津海關道原缺，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該公司事務，並命王文韶、張之洞督率興作（註二）。上諭曰：

「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着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公司事務。前據王文韶、張之洞會奏，蘆漢鐵路另籌辦法，請設鐵路招商公司，並保盛宣懷督辦一摺，當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查閱。旋據奏稱，遵旨諮詢盛宣懷，據陳一切辦法，均確有見地。請准設鐵路總公司，令盛宣懷督辦，從蘆漢辦起，蘇滬、粵漢，亦次第擴充。即由公司招商股七百萬兩，借洋款二千萬兩，商借商還，並提撥銀一千萬兩，南北洋存款三百萬兩，以期官商維繫，速成鉅工。並稱蘆漢既爲幹路，非雙軌不足爲各路之倡等語。並將盛宣懷所遞說帖，鈔錄呈覽。昨召見盛宣懷，奏對具有條理，已責成該員實力舉辦，以一事權；仍著王文韶、張之洞，督率興作。」（註三）

註一：凌鴻勛「盛宣懷與中國鐵路」，載「傳記文學」，九卷四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三九五，頁六一——七。

十五日（十月二十一日） 中俄在北京訂立新約十二款，允東三省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連接。

本日，清督辦軍務處大臣王文韶與俄使喀西尼 (A.P. Cassini) 在北京訂立新約十二款，允東三省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連接，另議專條，以答俄國代索遼東之義。條約全文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前於中日肇釁之後，因蒙大俄羅斯國大皇帝仗義各節，並願將兩國邊疆及通商等事於兩國互有益者，商定妥協，以固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國欽命督辦軍務處王大臣爲全權大臣，會同大俄羅斯國大皇帝欽差大臣出使中國全權大臣一等伯爵賈，在北京定將中國之東三省火車道接連俄國西卑里亞省之火車道，以冀兩國通商來往迅速，沿海邊防堅固，並議專條，以答代索遼東等處之義。

一、近因俄國西卑里亞火車道竣工在即，中國允准俄國將該火車道一由俄國海參崴埠續造至中國吉林琿春城，又向西北續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國境之西卑里亞火車站續造至中國黑龍江之愛琿城，向西南至齊齊哈爾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訥地方，又向東南續造至吉林省城止。

二、凡續造進中國境內黑龍江及吉林各火車道，均由俄國自行備籌資本，其車道一切章程，亦均仿俄國火車條程，中國不得與聞，至其管理之權，亦暫行均歸俄國，以三十年爲期，過期後，准由中國籌備資本，估價將該火車道並一切火車機器廠房屋等產贖回，惟如何贖法，容後再行妥議。

三、中國現有火車道，擬自山海關續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續至吉林，倘中國日後有不便即時造此鐵路者，准由俄國備資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爲期贖回，至鐵路應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

四、中國所擬續造之火車道，自奉天山海關至牛莊，至蓋平，至金州，至旅順口，以及至大連灣等處地方，均應仿俄國火車道，以期中俄彼此來往通商之便。

五、以上俄國自造之火車道所經各地方，中國文武官員不能隨時保護周詳，應准俄國專派馬步營兵數隊駐紮各要站，以期妥護商務。

六、自造成各火車道後，兩國彼此運進之貨，其納稅章程，均準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陸路通商條約完納。

七、黑龍江及吉林長白山等處地方所產五金之礦，向有禁例不准開挖，自此約定後，准俄國以及本國商民隨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十六日

六三四

開採，惟須先行稟報中國地方官具領護照，並按中國內地礦務條程，方准開挖。

八、東三省雖有練軍，惟大半軍營係仍照古制辦理，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全行改仿西法，惟向俄國借請熟悉營務之武員來中國整頓一切，其章程則與兩省所請德國武員條程辦理無異。

九、俄國在亞細亞洲無周年不凍之海口，一時該洲若有軍務，俄國東海以及太平洋水師諸多不便，不得隨時駛行，今中國因鑒於此，是以情願將山東省之膠州地方暫行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為限，其俄國所造之營房棧房機器廠船塢等類，准中國於期滿後估價備資購入，但如無軍務之危，俄國不得即時屯兵據要，以免他國嫌疑，惟實租之款應如何辦理，日後另有附條酌議。

十、遼東之旅順口以及大連灣等處地方，原係險要之區，中國極應速為整頓各事，以及修理各礮臺等諸要務，以備不虞。既立此約，則俄國允准將此二處相為保護，不准他國侵犯，中國亦允准將來永不讓與他國占踞，惟日後俄國忽有軍務，中國准將旅順口及大連灣等處地方暫行讓與俄國水陸軍營泊屯於此，以期俄軍攻守之便。

十一、旅順口大連灣等處地方，若俄國無軍務之危，則中國自行管理，與俄國無涉，惟東三省火車道以及開挖五金礦諸務，准於換約後即行便宜施行。俄國文武官員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處，中國官員理應格外優待保護，不得阻滯其游歷各處地方。

十二、此約奉兩國御筆批准後，各將條約照行，除旅順口大連灣及膠州諸款外，全行曉諭各地方官遵照，將來換約應在何處，再行酌議，自畫押之日起，以六箇月為期，兩國全權大臣議定此約，備漢文俄文法文約本各兩分，畫押蓋印為憑，三國文字校對無訛，遇有講論，以法文為準。（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三八五七——三八五八。

十六日（十月二十二日） 英外交部長沙里士堡侯爵(Lord Salisbury)召馬凱尼詢誘禁孫先生文事，馬凱尼據實以告。

本日，英外交部次長山德森(T. H. Sanderson)致函馬凱尼，命其往謁沙侯，報告誘禁孫先生事。

馬凱尼遵命往見，並據實以告。因私自逮捕與囚禁政治人犯，在使館所享外交特權以外，英外交部決取干涉行動。(註二)

康德黎將孫先生文被囚消息向地球報(The Globe)宣佈，英朝野大譁。

本日下午，地球報派特訪員晤康德黎，採訪孫先生被囚消息，康盡舉所知以告。訪員立加筆錄，刊布於晚報上，詳述孫先生被逮情形，標題尤為激烈。如：「可驚可駭之新聞」，「革命家被誘於倫敦」，「公使館之拘囚」，皆足聳動英國朝野。自是英人大譁，康氏寓所，造訪者絡繹不絕。「中央新聞」及「每日郵報」訪員逕往清使館求晤孫先生，鄧廷鏗出見，仍力辯無此人。「中央新聞」訪員正色告之曰：「君無庸諱飾，孫某被囚，若不立即釋放，則明晨將見有數千百市民，圍繞使館，義憤所激，誠不知其所極耳。」鄧為之語塞。

既而訪員等覓求馬凱尼，得諸米狄蘭旅館(Midland Hotel)。馬凱尼承認英外部已照會中國使館釋放拘留之人，惟仍謂「被拘留於本使館之華人，並非孫逸仙，此人抵英國後之一舉一動，本使館洞悉無遺。彼之赴使館，係出自己意，並非由使館之引誘或強迫或拘捕。」仍以巧言自卸誘禁孫先生之責也。

(註二)

註一：「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內頁一九四)。「國父年譜」增訂本(上)，頁八五。

註二：「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內中央文物供應社)，頁一九三——一九四。

十七日(十月二十三日) 孫先生文以英國政府之干涉獲釋出清使館。

英外相沙里士堡侯爵接康德黎呈，又迭聞報載民衆激昂情形，即照會清公使，請速釋放孫先生。本日下午四時半，英外交部特派員暨蘇格蘭場偵探長偕康德黎至清使館。清使不得已，始出孫先生於幽室，還其衣履什物。時使館外市民圍繞，新聞記者叢集。孫先生等自側門出。街頭環待之市民，仍擁擠不散，咸欲瞻仰此中國革命黨首領之豐采。偵探長急擁先生入馬車，與康德黎及外交部人員，同驅至蘇格

蘭場。各記者猶尾追於途，詳詢不已，爭相記載。孫先生既至警署，歷述事由經過，簽名存署，即偕康德黎告辭而出。抵康寓，悲喜交集，康氏夫婦，舉酒相賀。賓朋慰問不絕，深夜始息。「倫敦被難記」自述曰：

「星期五日（即十月二十三日）自朝至午，仍幽居室中，未見有何發動，乃傍晚四點半鐘，彼監守吾之使館衛兵，一中人，一西人，忽發局而入，謂吾曰：『馬凱尼君在樓下待汝。』旋令予進履戴冠。並加外褂，既畢，即導至最下層。予意英政府或將遣一人搜檢，故若輩欲藏吾於地窟中，未可知也。守兵雖告吾省釋在即，然予終未敢遽信。既而忽視吾友康德黎君，又見有與吾友偕至者二人，予心始爲之一舒，方知省釋之言非謬矣。」

與吾友偕至者，一爲蘇格蘭場之偵探長，一則年事已老，則英外部之使者也。馬凱尼當諸人之前，將搜去各物一一還予。並對偵探長外部使者爲簡短之說辭曰：『某今以此人交付君等，某之爲此，期在使本公使館之特別主權及外交權利，兩不受損云云。』吾當時方寸激擾，更不能深辨其言之意味，然在今日觀之，則其所云云，豈非毫無意旨而又童駭之甚者哉。

既而馬凱尼告吾，謂予已恢復自由。遂與吾儕一一握手，將使館之側門，肅吾齊出，吾齊於是出門下階，由使館屋後，而入於回默街中矣。此事雖微，然以英政府之代表，而竟令從後門出，在中國外交家，方且自誇其交涉之間，又得一勝利，其爲有意簡慢，固無可諱言。彼馬凱尼雖非華人，然固同化於華俗，而又於東方風氣之中，深得其江河日下之一部分者也。倘外人以此相責，想馬凱尼又必有隨機應變之詭辭，如謂使館前廳，既爲報館訪員所佔，而使館大門之外，又爲許多市民所圍繞，當時英國外部之意，急欲將此案暗中了結，勿使張揚，則使者雖由後門而出，於英國當道之用心，固不失爲體貼盡致也。

英國人觀念，與中國人不同。在英國人方以爲外交之勝利，而中國使館，祇須於省釋時之舉動間，略加播弄，即不難一變而爲中國外交之勝利。故予之省釋，在中英兩方面，固各有其可慰者在也。

予省釋前，外部使者於衣囊中，探一紙，授馬凱尼。馬凱尼纔一展開，即盡知其內容，是可知此紙所書，僅寥

寥數語，而吾之生死，固繫於是矣。

既出使館門，則回默街中之環而待者，甚見擁擠。彼報館訪員見我，即欲邀予敘話。偵探長急擁吾入一四輪車，與吾友康德黎及外部使者，同驅至蘇格蘭場。偵探長名喬福斯，在車中正色危言，向予詰誠，甚且呼吾爲頑童。謂此後務宜循規蹈矩，不可復入會黨，從事革命。事抵白宮區某館前，忽而停輪，吾輩自車中出，立於道旁，瞬息間，各報訪員已繞吾而立。吾儕自波德蘭區馳騁至此，已半英里有餘，而各訪員又何能突然出現於此？中有一人，予見其曾躍登御人之側，與御人共坐而來，然此外尚有十餘人，豈盤踞於予輩車頂而借來者耶？各報訪員慮吾一入蘇格蘭場警署，或不免有稍久之盤桓，因邀吾於某旅館前，俟吾出，即擁予至旅館之後屋，其爲勢之強，較唐（鄧）某等曳吾入使館時爲尤甚。而各訪員等之渴欲探吾消息，較諸中國使館之渴欲得吾頭顱爲尤甚也。吾既入旅館，被圍於衆人之中，有問即答，各訪員隨答隨寫，其速如飛。予觀其所書，心竊異之，蓋予當時猶未知其所用者，爲速記法也。予言既窮，無可復語，忽聞吾友康德黎君呼曰：『諸君乎，時至矣！』予仍被擁入車，向蘇格蘭場進發。警署之視吾，直同一無知少年，觀於偵探長喬福斯可見。蓋喬福斯誠摯之容色，坦白之言辭，長者之對於卑幼如是也。予既至警署，即將前後所遭，歷述一過。警官錄畢，向吾宣讀，讀畢，命署名紙末，所歷約一小時，乃偕吾友康德黎君告辭而出。

康德黎君挈吾歸，相見之悲喜，接待之殷摯，自不待言。康德黎君夫婦等，咸舉杯爲吾頭顱壽。是晚，求見者弗絕，至深夜始得就寢。此一宵睡夢之酣，實爲予有生以來所罕有。連睡至九小時，忽爲樓上羣兒跳號之聲所警醒。但聞康德黎君之長子名坎斯者，謂其弟妹曰：『柯靈，汝扮作孫逸仙。南兒，汝扮作馬凱尼，我則爲援救孫逸仙者。』未幾。喧嘩雜沓之聲大作。馬凱尼被撲於地矣，孫逸仙被援出險矣，於是笛聲嗚嗚，鼓聲鑼鑼，以示大赦罪之意，而合唱一歌，名曰：『不列顛之先鋒隊。』

星期六（即十月二十四日），來訪者仍終日不絕，吾與康德黎君一一應答，幾舌敝唇焦。且來訪者無不急急問訊康德黎、孟生二博士何以能得此消息？設吾儕漫應曰：『賴使館中人之密爲傳遞。』則使館中人之厚待我者，反不免因是而被嫌疑，遭攔斥，是大不可也。乃英僕柯爾自此案既白，即毅然辭退，不願復役於中國使館，是則以一身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十八日

六三八

之去，恐餘人於嫌疑，而吾儕亦可以道破實情，謂居間通信，乃出於柯爾之力也。至外間謂予厚賂柯爾，因得脫險，實非事實。予以密信授柯爾，並酬以二十鎊，固謂柯爾爲吾效奔走，不得不稍酬其勞。詎知柯爾卽於得金之次日，轉授於吾友康德黎君，謂此係孫某之物，請代爲收貯。及予既歸，始知其事，乃以二十鎊力迫柯爾受之。吾當時財力止此，故所贈亦止此，揆諸衷心，殊覺未甚滿意也。先是，當十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柯爾爲吾投書康德黎家時，既已按鈴入門，達於廳事，知吾友已外出，乃請見康德黎夫人，僕聞言，入白夫人。柯爾獨立廳中，瞥見廳之一隅有一華人竚立而望，因大驚失色，自思此來必已爲使館所知，故遭人尾隨至此。及夫人出，柯爾卽以所疑告，夫人急慰解之，令其無恐。蓋立於室隅者，實一塑成之中國人，其大小與人身相似，康德黎君在香港行道時，賞其塑製之工，遂購歸設於廳事，驟見者往往怪詭，而柯爾心膽既虛，故惶恐更甚也。

予當日遭逢，大略盡是。是時英議院尚未屆召集之期，故不知議院云何，然予自出險後，相識者漸衆，倫敦及倫敦以外之英人，多因此謬相推愛，頗極一時賓朋酬酢之樂云。」（註一）

註一：「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內，頁一九七——二〇〇。

十八日（十月二十四日） 孫先生文投書英報，申謝英國朝野之援救。

本日，來訪者仍絡繹不絕，孫先生與康德黎一一應答，幾舌敝唇焦。孫先生並投書各報，申謝英政府及報界援助之盛情。書曰：

「予此次被幽禁於中國公使館，賴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釋，並承報界共表同情，及時援助。予於英人之崇高公德，力持正義，素所欽仰！身受其惠，益堪徵信。且予從此益知立憲政體及文明國人之真價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謀吾祖國之進步，並謀所以開通吾橫被壓抑之親愛同胞乎？爰馳寸簡，敬鳴謝悃。孫文藏於波德蘭區單文省街之四十六號。」（註一）

荷蘭教授(Prof. Holland)投書倫敦泰晤士報，論清使非法捕人之責任。

英國學術界對孫先生被拘一事，亦極重視。本日，荷蘭教授自奧克斯甫最先投函於倫敦泰晤士報，

，討論孫先生被拘之法律責任，文曰：「孫逸仙案」。錄其全文如下：

「記者足下：因孫逸仙案而發生之問題有二：(一)中國公使之拘留孫某，是否爲違法舉動？(二)設其爲違法舉動，而又不允釋放，則宜用何種適當方法將孫某釋出？」

第一問題之答語。固無庸遠求，蓋自一千六百零三年，法國蘇蘭 *Sully* 爲駐英公使時，雖有將某隨員判定死罪，移請倫敦市尹正法之事。然此後凡公使者罕或行使其國內裁判權。即對於使館中人，亦久不行用此權。惟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葡萄牙駐荷公使藍韜氏 *Leirao* 以見欺於馬販某，將該馬販拘禁於使館，終至激起荷人之暴動，將公使館搜劫一空。當時荷人威寬福氏 *Wicquefort* 對於藍韜此舉，深致評駁。蓋藍韜固嘗在大庭廣衆中，演說萬國公法，非不知法律者也。今孫逸仙既在英國，自當受英國法律之保護，乃公使館忽加拘禁，是其侵犯吾英國之主權者大矣。

第二問題雖不若第一問題簡單，然解決之方，要亦無甚困難。中國公使如不允將孫某釋出，則英國藉此理由，已足否會該公使退出英境。如因事機急迫，恐飭令該公使回國，尚不免遲緩，則以本案情節而論，即令倫敦警察入搜使館，亦不必疑其無正當理由也。或又謂使館應享有治外法權，此治外法權一語，過於簡括。實則其意義不過謂使館之於駐在國，爲某種緣由之故，間有非該駐在國通常法權所能及耳。然此等享有權，歷來相習成風，業已限制甚嚴。且證諸成案，而於通行之享有權外，實不能復有所增益也。證諸一千七百十七年裘倫堡 *Gyllenbourg* 之案，可見使館駐節他國，苟犯有潛謀不利於該國之嫌疑，則該國政府得拘捕其人，搜檢其使館。又證諸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嘉來丁 *Mr. Gallatin* 之御人一案，祇須駐在國之政府，以和平有禮之通牒報告使館之後，即可遣派警察，赴該使館拘逮犯案之僕役。又除西班牙及南美洲各共和國之外，凡使館已不復能藏匿犯人，即政事犯亦不得藉此爲遁逃蔽，是又各國所公許者也。至於公使館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拘禁，則駐在國之地方警察，惟有斟酌情勢所需，爲實力之干涉以資解決而已。

今孫逸仙堅稱被中國公使館誘劫於道途，且將昇赴輪船，以便解送返華，是中國官場對於此案所負之責任，固無庸深詰。中國官場悍然出此，豈尙能有辯護之餘地乎？萬一誘劫之情，果屬非虛，押解之謀，見諸實行，則此案

案情之嚴重，不言可知，而其出於公使館僚屬之急於邀功，尤可洞見。麥博士 Dr. Martin 在北京同文館教授國際法有年，使臣在外，應遵何道以行，中國政府豈猶茫然未之知耶？」（註二）

註一：「倫敦被難記」附錄，「國父全集」內，頁二〇九。

註二：「倫敦被難記」附錄，「國父全集」內，頁二〇〇——二〇二。

二十日（十月二十六日） 清駐英公使龔照瑗請英政府嚴查香港革命黨人。

先是九月十七日，龔照瑗電總署，報告釋放孫先生事。總署至本日覆電曰：

「前電孫文姓陳，又云粵督幾爲所害，即此便爲英例所不直。惟香港交犯約指爲謀反，輒不肯交，具文外部，宜詳商爲要。」

即日龔又致電總署曰：

「據律師云：如以匪人多藉香港爲謀議不法之區，請英飭港官嚴拿，最爲得體，並無礙香港交犯約，且補該約未捕之辭，英不准匪人藉其地謀亂友邦，山侍郎已云然。已按此意具文外部。」（註一）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一。

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七日） 英人胡特氏（Mr. James G. Wood）投函泰晤士報，討論孫先生文中國使館蒙難之法律問題。

繼荷蘭教授（Prof. Holland）之後，有楷文狄希（Mr. Cavendish）者，生平於國際交犯之法律，研究有素。有關孫先生案，其語某君之語曰：

「孫逸仙一案，以予記憶所及，實無其他相同之例案可資引證。昔者柴西巴 Zanzibar（東非洲國名）謀篡君位之人犯，係自行走避於倫敦德國領事署，挾德政府相厚之情，冀爲庇護。既而國際法之問題起，德人不允交出，遂移往歐洲大陸之德屬境內，此與本案截然不同。蓋孫逸仙係中國籍之國民，其所入者係本國之使館，其逮者係本國

之使臣，其罪名則係謀覆本國之政府。凡此所述，如悉係事實，則祇須由英國外務部出而爲外交上之陳辭，而無須爲法律上之辦理。蓋按諸法律，實無可引之條例也。」（註一）

本日，胡特氏爲荷蘭教授所建之議，亦投函泰晤士報爲法律問題之討論。其文曰：

「荷蘭教授所擬第二問題，雖揆諸情勢，幸已無甚重要。然此端實大可研究，竊謂該教授所擬答語，殊不足令人滿意也。」

該教授論及中國公使萬一不肯將人犯釋放條下，有云：以本案情節而論，即令倫敦警察入搜使館，亦不必疑其無正當理由云云。該教授既曰不必疑，則必有其可疑者可知。至於可疑者究竟何在？則該教授未嘗解釋明白也。以該教授之所答，並不能謂爲解決問題，祇可謂之猜測而得一解決法耳。公使館即或違法而拘留人犯，然倫敦警察，並無入公使館釋放人犯之職權，萬一有入公使館而爲此舉動者，公使儘可以強力拒敵之，揆諸法律，無不合也。以吾所聞，公使館果有私拘人犯之事，則揆諸法律所可以行用之手續，惟有頒發交犯審訊之諭 *Habeas Corpus* （即保護人權之令，若拘捕後不即交審，可發此諭交由公堂訊判，如無罪，則二十四小時後即應保釋。）而已。但事實上難行者，則此諭將交諸公使乎？抑交諸公使館中之員役乎？設交諸公使或員役，而彼乃置諸不問，則可施以藐視公堂之處斷乎？以吾所知，實無成案可以援引也。

荷蘭教授又謂公使之所居，應享有治外法權，其實公使館與輪船不同，彼享有此權者，乃公使之本身而非公使館也。相傳公使之本身及其家屬隨員等，於民事訴訟得享有完全豁免權。是以此等問題者，乃個人問題，而非使館問題。乃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諸公使及其家屬隨員等之問題，而非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諸公使館之問題也。惟其然也，故吾所擬頒布交犯審訊令之辦法，似不免牽涉而有礙邦交也。

至引用成案，謂警察得持拘票，入公使館拘捕在他處犯有罪案之人犯，如荷蘭教授所謂：公使館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拘禁，則地方警察惟有爲實力之干涉云云。斯言也，實亦不足爲萬全之計。蓋此等成案與孫逸仙案並無共同之點也。」（註二）

註一：「倫敦被難記」附錄，「國父全集」內，頁二〇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九月二十一日

六四一

註二：同註一，頁二〇二——二〇三。

二十五日（十月三十一日） 清總署電飭龔照瑗，仍派人密查孫先生文。

孫先生於十七日獲釋後，清駐英公使即日電總署，仍派人密跟。本日，總署始就此事覆電曰：

「×號電悉。具文外部甚當；條電（十七日）派人密跟亦要着，兼派洋員，尤不著跡，希酌辦電。」（註一）

龔照瑗當日即覆電曰：「係僱西包探密跟，毫不着跡。」（註二）

思比克報（The Speaker）刊出「波德蘭區之牢獄」，評論馬凱尼。

先是，英國人士討論孫先生文案，多集矢於馬凱尼，泰晤士報首先著論抨擊之，文曰：

「歐洲各國，方以前為邦交和睦彼此相安無事之時，而豈知倫敦中國公使館突然發見一案，其以破壞法律及成例，而足以惹起國際之交涉者，關係至大。孫逸仙被幽禁於中國公使館中，幸其財力猶足以暗通消息。俾其英國友人得施營救之計。英警署既派遣偵探密伺於公使館之外，使該使館無從將孫氏運解至船，而外務大臣薩里斯伯又要求該使館，立即釋放。幸而此案早破，得以無事；否則孫氏既被遞解，就刑戮於中國，英之外務部，必且致責言於中國政府，而勒令將本案有關之人一一懲辦，其損害於邦交為何如耶？孫氏既被誘劫入公使館。即由馬凱尼勸解出見，旋即被錮一室，直至英外部出而干涉，始克見釋，夫馬凱尼英人也，乃亦躬與於此案。此案之失敗，固可預料，即幸而獲免，然他日與於此案者亦必同受巨創。馬凱尼此舉，不亦可異乎？聞中國公使當釋放孫氏之時，諾彼之釋放此人，期無損於使臣應有之權利。噫！此等權利，似決非文明國所欲享有者；設竟或使用此等權利。則其為不可恕，又豈待言！昔者土耳其使臣在倫敦誘亞美尼亞人入使館，意在縛其體柔其口，而昇袂登舟，遞解回國，冀為土耳其皇之犧牲。孫氏之案，毋乃有類於是乎？」（註三）

馬凱尼既覩此論，即覆書該報曰：

「貴報評論向極公正，乃本日社論中，評某華人被誘於中國使館一案，詞連及我，殊失貴報公正之素旨。彼華人之自稱，姓名甚多，而孫逸仙其一也。貴報既歷敘使館與孫逸仙所述之案情。而對於吾之行爲則頗致微辭，是明

明以孫逸仙之所言爲可信，而使館之所言爲不足據也。貴報引上耳其使臣在倫敦誇阿摩尼亞人事爲佐證，殊不知本案並無所謂誘劫，彼原名孫文僞名孫逸仙所供之辭，如謂被捕於道途，被挾入使館等語，皆至不足信也。孫逸仙之至使館，係出己意，且爲使館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來在星期六（十月十日），二次之來在星期日（十月十一日），治國際法學者對於孫逸仙被使館拘留一節，無論作何評論，抱何見解。然必先知本案並無誘騙，即其入使館時亦並未實施以強力或欺詐，此爲本案之事實，而亦至可憑信者也。」（註四）

馬凱尼此書，與事實殊不相符。其後孫先生嘗論其事曰：

「觀馬凱尼此書，其云孫逸仙姓名甚多，是明明將以此肆其誣譏，使外國知予非正人，而不知中國人習俗，多有以一人而兼三四名者，此在馬凱尼要無不知之總也，華人自有生以後，襁褓中父母所呼之名，一也；稍長從師，學塾中師長所授之名，二也；既而身入社會，則有所謂字者，有所謂號者，惟名字屢易，而姓從不變。彼馬凱尼之在中國，有稱爲馬大爺者，有稱爲馬凱尼者，有稱爲馬晉山者，以此相比例，無二理也。」（註五）

本日，英報思比克（Speaker）亦刊一論，其標題爲「波蘭德區之牢獄」，評論馬凱尼。其文曰：

「馬凱尼者，中國公使館之參贊也。彼以不滿意於泰晤士報之評斥，而投函更正，是亦猶土耳其大僚華資氏 Woods Pasha 爲土政府辯護之故，而現身於英國之報紙也，然此事出於真正之東方人，則不特爲情理所宜然，而亦足徵其性質之特別。若出於假託之東方人，則適足以供嘲笑而已。馬凱尼之布告天下，謂孫逸仙醫士之入公使館，並非由於誘劫。然使孫逸仙當時習知彼延接者招待者爲如何人？孫氏固肯步入彼波德蘭區之牢獄（以公使館在倫敦之波德蘭區故名）而絕無越趨縮瑟乎？馬凱尼於此語，乃不置一答辭，何也？況馬凱尼既觀孫氏之被捕，而乃絕不設法以冀省釋，直待外務部出而爲堅毅之要求，始得出獄，抑又何也？夫公使館苟不欲解孫氏回國，何必幽禁於使館中？馬凱尼身在倫敦，且以迫於責任之故，遂不得不陷入此可憐之地位。若此事而發現於中國之廣州。固不失爲循法而行，至正至當也，馬凱尼既遭失敗，將使北京當道者病其無能，固應緘口結舌，自比於中國人之所爲，而乃猶舞弄筆墨，論列是非於倫敦之泰晤士報乎？且使此次被劫者而爲德國人或法國人，則事之嚴重，將不可問？幸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月

六四四

而其人籍隸中國。聞者不過一笑置之，而報紙之對於此事，亦僅如聞李鴻章之忽而昇以相位，忽而以未奉召命擅自入宮，被太后之譴責而已！然而自今以往。凡過波德蘭區之牢獄者。不得不悚然以懼，啞然以笑也。（下略）」（註六）

註一：「總理倫敦蒙難史料」，「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一九三。

註二：同註一。

註三：「倫敦被難記」附錄，「國父全集」（鈔），頁二〇六——二〇七。

註四：同註三，頁二〇七。

註五：同註三，頁二〇七——二〇八。

註六：同註三，頁二〇八。

十月

上旬

孫先生文在倫敦以英文撰述「倫敦被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一書。並應英國漢學家翟爾斯(Herbert Giles)之請，撰簡短自傳。

是月，孫先生以最大部份時間從事於以英文寫作「倫敦被難記」一書。其自序曰：

「近來我在倫敦波德蘭區十九號中國公使館被逮，頗惹起當世之注意，並因此我得結交許多良友，歐西學者借此為法律問題的討論者更多。設我不將本案中的實情宣告當世，那麼我是未能盡職，但對於英文著述，非我所長，惟望諸君恕其譴陋而弗加以督責。書中所述得我友助力不少，否則亦未敢貿然出版問世也。」（註一）

「倫敦被難記」原文係英文，名曰「Kidnapped in London」中文係甘作霖譯，於中華民國元年五月出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以後各處所翻印均本此。當時清海軍衙門派駐使館武官鳳浚日記亦謂「十九日獲孫文一案，反為該人成名。」可見當時孫先生聲名之盛。蓋孫先生在書中對清廷政治，有警

關之批評。因此該書益得當時西方人士之注意與同情，導致西人開始認識孫先生爲中國革命黨之領袖。

「倫敦被難記」除自序及附錄外，分爲八章：一、被難原因；二、被誘狀況；三、被禁詳情；四、幽囚求援；五、師友營救；六、訪求偵探；七、英政府之干涉；八、省釋。在被難原因一章中，曾述及革命之原因。略曰：「至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數語賅括之曰：無論爲朝廷之事，爲國民之事，甚至爲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批評中國官吏之貪黷原因，則曰：「至官場俸額之微，眞非英之所能夢及。如兩廣總督所治區域，人口之衆，過於全英，然其一歲俸祿，合英金六十鎊而已。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爲榮，姓名一登榜上，卽有做官之望，於是納賄當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餐，而每年之貢獻於上官者又至多，安得不貪乎？況有政府以爲其貪黷之後盾，設非癡騷，更安肯清廉？且宦囊既飽，不數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資，以謀高位。爲計之便，無過於此。」係先生爲此慨然長嘆，知改良現狀，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故不得不易以強迫。（註二）

除撰述「倫敦被難記」外，此時孫先生並應英國漢學家翟爾斯(Herbert Giles)之請，撰寫簡短自傳以應之。翟爾斯嘗於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來華任職英使館，漸通中國語言文字，歷任福州羅星塔、上海副領事，及臺灣淡水、寧波領事。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離華後，於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研究中國學術，著作等身。時正編纂中國名人辭典，經康德黎之介，欲將孫先生倡導革命史實，編入書內，孫先生乃作簡明自傳交之。其覆翟爾斯書曰：

「比聞簡師（指康德黎，孫先生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池長老書，稱康曰簡地利）盛稱足下深于中國文學，著述如林。近欲將僕生平事跡，附入大作之內，並轉示瑤函，屬爲布復；拜讀之下，愧不敢當！

夫僕也，半世無成，壯懷未已。生於晚世，目不得觀堯舜之風，先王之化。心傷韓盧苛殘，生民憔悴，遂甘赴湯火，不讓當仁。糾合英雄，建旗倡義，擬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使萬姓超羣，庶物昌運，此則應天順人之作也。乃以人謀未臧，勢偶不利，暫輟光銳，以待異時。來游上邦，以觀隆治。不意清虜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月

六四六

善此陰謀，肆其陷害，日無友邦，顯違公法，暴虐無道，可見一斑。所賴貴國政仁法美，一夫不獲，引以爲辜。奸計不成，僕之幸也，抑亦中國四百兆生民之幸也。

足下昔遊敝邦，潛心經史，當必能恍然於敝國古先聖賢王教化文明之盛也。乃自清虜入寇，明社垢墟，中國文明淪于蠻野，從來生民禍烈，未有若斯之亟也。中華有志之士，無不扼腕椎心。此僕所以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華夏于分崩之際也。獨恐志願宏著，力有不逮耳！故久欲訪求貴國士大夫之諳敝邦文獻者以資教益，並欲羅致貴國賢才奇傑以助宏圖。足下目觀中國之瘡痍，民生之困楚，揆之胞與仁人義士，豈不同情？茲叨雅眷，思切葵傾，熱血滿腔，敢爲一吐。

更有懇者，僕等今欲除虜興治，罰罪救民，步法泰西，輯睦鄰國，通商惠工各等事端，舉措施行，尚無良策，足下高明，當有所見，幸爲賜教，匡我缺失，是所禱冀，至于僕生平事跡，本無足紀，既承明問，用述以聞。

僕姓孫名文，字載之，號逸仙，籍隸廣東廣州府香山縣，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華曆十月十六日。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十三歲隨母往夏威夷島 Hawaiian Islands，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是年母復回華，文遂留島依兄，入英監督所掌之書院 Iolani College, Honolulu 肄業英文。三年後，再入美人所設之書院 Oahu College, Honolulu 肄業，此爲島中最高之書院。初擬在此滿業，即往美國入大書院，肄習專門之學。後兄因其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爲親督責，着令回華，是十八歲時也。抵家後，親亦無所督責，隨其所慕。居鄉數月，即往香港，再習英文，先入拔萃書室 Diaicon Home, Hongkong，數月之後，轉入香港書院 Queen's College。又數月，因家事離院，再往夏島，數月而同。自是停習英文，復治中國經史之學。二十一歲改習西醫，先入廣東省城美教士所設之博濟醫院 Canton Hospital 肄業，次年轉入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六年滿業，考拔前茅，時二十六歲矣，此從師游學之大略也。文早歲志氣遠大，性稟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于西學則雅癖達爾文 Darwinism 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于教則崇耶穌，于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註三）

附錄：孫文撰「倫敦被難記」（註四）

自序

近來我在倫敦波德蘭區四十九號中國公使館被逮，頗惹起當世之注意，並因此我得結交許多良友，歐西學者借此為法律問題的討論者更多。設我不將本案中的實情宣告當世，那麼我是未能盡職，但對於英文著述，非我所長，惟望讀者恕其讕隨而弗加以督責。書中所述得我友助力不少，否則亦未敢貿然出版問世也。西曆一八九七年孫文序於倫敦。

一、被難原因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余居澳門，以醫為業。初不料四年後，竟被幽於倫敦中國使館，更不料因此轟動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面干涉，以要求彼使館之見釋。雖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年，予之以奔走國事，而使姓名喧騰於英人之口，實始於是地。

當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時，予學醫於廣州之英美傳道會。主政者為醫學博士戈爾 Dr. Keu。次年，聞香港創立醫科大學，遂決計赴香港肄業。閱五年而畢業，得醫學博士文憑。

澳門一埠，隸屬於葡萄牙，已三百六十年。政柄雖屬歐人，而居民多為華籍。即其自稱為葡人者，亦大半為本地之歐亞雜種。

予既居澳門，澳門中國醫局之華董，所以提携而驅拂之者無所不至，除給予醫室及病房外，更為予購置藥材及器械於倫敦。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則自中國有醫局以來，其主事官紳，對於西醫從未有正式的提倡，有之，自澳門始。予既任事於醫局，求治者頗衆，而尤以外科為繁。然亞東閉塞，甫見開通，而歐西之妒嫉，已起而相迫。蓋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相難，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因此予之醫業進行，猝遭頓挫，雖極力運動，終歸無效。但予赴澳時，初不料其如是。資本損失不少，乃即遷至廣州。

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興中會」。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

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爲黨員，自信固爲國利民福計耳。

至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數語賅括之曰：無論爲朝廷之事，爲國民之事，甚至爲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爲官吏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枉，無所籲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各飽其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間有一二被政府懲治或斥革者，皆不善自謀者。然經一番之懲治或斥革之後，而其弊害乃尤甚。至官場俸額之微，眞非英人所能夢及，如兩廣總督所治區域，人口之衆，過於全英，然其一歲俸祿，合英金六十鎊而已。所以一行作吏，即以婪索及枉法爲事。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爲榮，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做官之望，於是納賄當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益，而每年之貢獻於上官者又至多，安得不貪乎？況有政府以爲其貪黷之後盾，設非竊賊，更安肯清廉？且宦囊既飽，不數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資，以謀高位。爲計之便，無過於此。此種民賊，即後日最高級上官。而一切社會政治，刑律事件，均彼等所取決。夫滿政府既藉科斂苞苴賣官鬻爵以自存，則正如薑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穢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潛滋而暗長耶？至其堵塞人民之耳目，錮蔽人民之聰明，尤可駭者！凡政治書多不得流覽，報紙尤懸爲厲禁。是以除本國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所知。國家之法律，非人民所能與聞。兵書不特爲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於一死。至於創造新學，發明新學，人民以懼死刑，不敢從事。所以中國人民，無一非被困於黑暗之中。即政府有時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自私自利耳。雖然，華人之被桎梏，雖然酷烈，而其天生之性靈，深沉之智力，到底不可磨滅。凡歐人之熟知華事者，多如此評論，且謂其往往有超出歐人之處。不幸中國政體，專制已久，士人束髮受書後，所誦習者，不外四書五經，及其箋註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於奉令承教一味服從之義者，則任意刪節，或曲爲解說，以養成其盲從之性。學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國之政治，無論仁暴美惡，而國民對於現行法律典章，不敢違反，惟有凜遵而已。近日本提兵調將，侵入國土，除居住戰地之人外，鮮有知中日開釁之舉者。彼內地之民，或並不知世界有日本國，即使微有風傳，得聞一二，亦必曰：「是外夷之犯上國」，斷不信其爲敵國之相侵也。

中國睡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與中會之所由設也。與中會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其於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以是吾黨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日戰事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加以叱責，且云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以後不得擅上云云。

吾黨於是慨然長嘆，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海陸軍人之腐敗貪黷，平時驕奢淫佚，外患既逼，則一敗塗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與中會總部設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廣州。當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北方戰事既息，廣州軍隊被政府遣散者約四分之三，此等軍隊多散而為流氓盜賊，即其未解散者亦多憤懣不平，皆謂欲解散則全體解散，欲留用則全體留用，然當事者充耳弗聞也。吾黨於是急起而運動之，冀收為己用，各軍士皆欣然從命，願効死力，由是而吾黨之武力略具矣。

時正巡防隊肇事，棄其軍服，四出劫掠，百姓憤極，起而合捕之，囚其為首若干人於會館。豈知巡防局員率衆而出，撲攻會館，既將被囚諸人一律釋放，並將館中所有，搜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以代表一千人赴訴於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為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於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與中會者益衆。

當時兩廣總督李瀚章，即李鴻章之兄，在粵桂兩省之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官費若干於督署，是又一間接剝奪民脂民膏。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且中國官場，每逢誕辰，其僚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釀金至一百萬兩以充賀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於人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資科第，私通關節等事，每名定費三千兩。因此而富者怨，貧者亦憤。以上所述，皆足以增與中會勢力而促吾黨起事者也。

於是而與中會起事之計畫定矣。定計於廣州突舉義旗，佔據省城，盡逐官吏。舉事之際，不特須極秘密，使倉

卒不及備，且須力主鎮靜，不以殺戮爲能。因於汕頭及西江沿岸，募集兩軍，同時向廣州進逼。蓋以汕頭及沿江之人，與廣州有主客之分。汕頭在廣州之北，雖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而語言之不同，無異英國之於意大利。所以川客軍進取者，因其與土人不相習，無牽率之慮，可一意以爭勝利。萬一客軍中途變計，相率潰散，則事後蹤跡易顯，斷不能存身於廣州。凡此皆所以逼其進取，而爲戰略上不得已之作用。

兩軍期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東北，同時向廣州進發。吾黨籌備進行甚覺滿意，與中會會員且時時集議，所需軍械藥彈以及炸藥等，隨時屯積於大本營者甚多。除汕頭及西江兩軍外，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馳至。及會兵期已至，各軍與省城之距離，軍行約四小時可達。又有衛隊百名，身藏利器，巡行於與中會之四周。又有急使三十人，奉會員命分赴各邑，令黨人於翌晨同時起事。豈料會員部署略定，忽有密電馳至，謂西南東北兩軍中途被阻。兩軍既不得進，則應援之勢已孤，即起事之謀已敗。然急使既遣，萬難召回。一面又連接警報，謂兩軍萬難進行，幸彼此各自爲謀，幸盡覆沒。於是黨員急起而消滅種種形跡，毀文籍，藏軍械，且連電香港，令緩發師。然香港黨員接電之時，已在港軍盡發之後。港軍乘輪舟赴粵，並挈有大宗槍械，分儲若干箱，黨員接電後，非特不將港軍暫行遣散，且追蹤至粵，於是該黨員及其部衆盡投於羅網。至廣州諸黨魁，亦紛紛四散。予於奔避之際，屢次遇險，後幸得一小汽船，乘之走澳門。在澳門留二十四小時，即赴香港，略訪故人，並投康德黎君 Mr. James Cantlie 之門。康德黎君者，予之師而兼友也。康德黎君聞予出奔之故，即令予往見香港某律師，就商此後之行止。

二、被誘狀況

康德黎所令予就教者爲達尼思律師 Mr. Dennis。達尼思詢悉顛末，即令余速離本地，毋以逗留致禍。時予至香港已一日矣，聞達尼思言，不及與康德黎君握別，即匆匆乘日本汽船赴神戶。居神戶數日，又至橫濱。在橫濱即購日人所製之歐服數襲，盡易舊裝，留鬚割辮。一二日後，由橫濱乘輪赴夏威夷羣島，就寓於火納魯魯。火納魯魯多予之親故及同志，相處甚歡。予生平每經一地如日本、如火納魯魯、如美利堅，與華僑相晉接，覺其中之聰明而有識者，殆無一不抱有維新之志願。且若輩亦深望母國能革除專制，而創行代議政體也。

予在火納魯魯時，偶於道上遇康德黎君及其家屬。康蓋率眷回英國，而道出火納魯魯也。渠等見予已不復識，而其同行之日本乳媼，且以予爲日本人而改易歐裝者，遂以日本語與予道鄉情，此爲予易服後數遇不鮮之事，蓋日本人多以予爲同鄉，必啓口而後始悟其非是也。

予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離火納魯魯赴舊金山。舊金山之華人與予均極融洽，所以相遇者甚厚。閱一月，遊歷至美利堅。在美三月，乘輪船麥竭斯的號 *S. S. Majestic* 東行至英國之利物浦 *Liverpool*。方子在紐約時，友人咸來相戒曰：中國駐美公使爲滿洲人，其與漢人本無感情，而惡新黨尤甚，故必宜小心謹慎云。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倫敦，投宿於斯屈朗 *Strand*（倫敦路名）之赫胥旅館。翌日即至波德蘭 *Portland Place*（倫敦區名）覃文省街 *Devonshire Street* 四十六號康德黎君之寓所相訪。康君夫婦招待甚殷，並爲予覓相近之舍館曰葛蘭旅店 *Gray's Inn* 使徙止焉。予自是即暫居，每日獨處無聊，輒往倫敦博物院遊覽，或訪各處之遺蹟，觀其車馬之盛，貿易之繁，而來往道途，絕不如東方之喧嘩紛擾。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嚮往也。予無日不造訪康德黎君，每至必取其藏書，讀而消遣。一日，予飯於其家，康德黎君戲謂中國使館與伊家爲鄰，盍過訪之，因相視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館中人觀子之面，行當出而相捕，解送回國耳。」予聞夫人言，益相與大笑，初不料後日竟成實事也。一夕，孟生醫學博士 *Dr. Manson* 邀余往餐，孟生君亦予香港舊識，曾授予醫學者。君亦笑謂予曰：「慎勿行近中國使館，致墮陷阱。」予以是於中國使館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遠，歷經良友之告誡，非全無措意者。然予至倫敦，爲日猶淺，途逕未熟，彼良友之告誡，於予初無所濟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適值星期，予於上午十點半鐘時，自葛蘭旅店（葛蘭旅店在倫敦霍爾龐 *Holborn* 之葛蘭旅店街。霍爾龐區名）赴覃文省街，意欲隨康德黎君等赴禮拜堂祈禱。正躡躅間，一華人悄然自後至，操英語問予曰：「君爲日本人歟？抑中國人歟？」予答曰：「予中國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籍，予答曰：「廣東」。其人仍操英語曰：「然則我與君爲同鄉，我亦來自廣州者也。」夫中國盛行不規則之英語，名曰 *Pigeon* 英語，意即商業英語也。華人雖同隸一國，而言語多相扞格。譬如汕頭之與廣州，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視倫敦之與利物浦猶相近，

然其商人之言語，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藉商業英語相通款。彼汕頭人與廣州人之商於香港者，多以英語相接，此足以見我國言語之歧雜矣。

予途遇之華人，既知予爲粵產，始以粵語相談，且行且語，步履頗舒緩。俄而又一華人來，與予輩交談，於是予之左右，乃有二人相並而行矣。二人且堅請予過其所居，謂當烹茶進點，略敘鄉誼，予婉却之，遂相與踰立於道旁階砌。未幾，又有一華人至，其最先與予相遇者，即迤邐去。於是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強予過從，其情意誠摯非常，予是時已至於階砌傍尾之側。正逡遑間，忽聞鄰近之屋門戛然而闔，左右二人挾予而入，其形容態度又似諧謔，又似周旋。一紛擾間，而予已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然予尚未知此屋爲誰之所居，故心中無所疑懼。初予之所以猶豫不即入者，蓋急欲往訪康德黎君及孟博士冀同往禮拜堂，恐中途遲回而不及耳。迨予既入門，覩其急遽之狀，且屋宇若是寬廣，公服之華人若是衆多，因陡然動念曰：是殆卽中國使館乎？又憶中國使館在單文省街之鄰，意者予向時躑躅之所，必中國使館左右之道途也。

予入門後，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與予接談數語，又自相磋商數語，遂遣二人挾予登樓，予亦不之抗。既登樓，復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幾，而二人又至，更挾予上，是爲第三層樓，仍令入一室中，其室有窗，護以鐵柵，窗外即使館之屋後也。須臾來一鬚髮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饒有官氣，一入室卽謂予曰：「汝到此卽到中國，此間卽中國也。」

言已就坐，徐徐詢予曰：「汝卽孫文乎？」予曰：「然。」

其人曰：「實告汝，予得駐美使臣來電，謂汝乘麥竭斯的號輪船遊歷至英，故令我拘汝於此。」

予問曰：「拘予何爲耶？」

其人曰：「汝前嘗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汝，因令余暫相羈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然則予之留此，可告吾友乎？」

曰：「否！是不能。惟旅館中之行李，汝可草一函，此間人當爲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書於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給予紙筆，予書中大意謂此身已被禁於中國使館，請轉告康德黎君，俾取予之行李帶下云云。其人閱竟。曰：「函中何能書及被禁二字，汝可別繕一函。」予乃另繕曰：「頃予在中國使館，乞告康德黎君，爲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知爲何許人，厥後而知其即聲名鼎盛之馬凱尼 Sir Halliday Marcarnet 也。

馬凱尼君一轉念間，忽又謂予可逕函告旅館，不必託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並非旅館，除康德黎君外無知者，因以改繕之函授之。馬凱尼唯唯，許爲代寄。馬凱尼之所以忽然轉念者，蓋欲藉是以搜予行篋，或能得吾同黨之姓名及往來之函耳。計誠狡哉。

三、被禁詳情

馬凱尼君臨去時，即闔予室之門，並下鍵焉；自是予遂遭幽禁矣。未幾，聞門外有匠人施斧鑿之聲，則於原鍵外更增一鍵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監守門外，有時或於二監者之外更添一人。當最初之二十四小時內，其中國監守二人，時或入室與予相語。其於被禁之原因，雖無一語宣洩，予亦不之問。然曾告予以頃者相見之老人即馬大爺，予審爲馬凱尼也。大爺者官場通俗之尊稱，猶當時駐英公使龔某之稱龔大人也。使臣與外人酬酢不用眞名，遂使外國人人稱之曰大人。時不知英政府公牘上之往還，亦稱龔大人否耳？中國官場及外交禮節，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爲侮慢者。西人之於中國文學風俗未經殫心研究者，實難明瞭。故彼外交官輒喜於晉接之間，以言語文字愚弄外國人，偶或佔勝，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被屈於我矣」。其可笑一至於此。

予被禁後數小時，忽有一監守者入，謂奉馬凱尼君之命，搜檢予身，因探取予鑰匙、鉛筆、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鈔票數紙，未被檢取，故彼所挈以去者，僅無重大關係之文件數紙而已。監守者復詢予需何飲食。予僅令取牛乳少許而已。

是日，有英國僕役二人，入室燃火爐，除灑掃外，並置煤於室，以供燃火之用。予授書於先至之英僕，令爲寓書於單文省街四十六號康德黎家，僕唯唯，迨後至之英僕來，予亦託之如前。此二僕者厥後並稱已將予信遞寄，然所言殊未足信也。是晚，有一英婦入，爲予設臥具，予未與語，及夜和衣而臥，然中心愁悵，徹且不能入夢。

翌晨，即星期一，爲十月十二號。二英僕又以煤料、清水、食物等昇余。其一人曰：「君書已代遞矣」。其一人名柯爾 Cole 者則曰：「予不能出公使館，故尙未能爲君寄書也。」

星期二（即十月十三日）予復絮絮以寄書事詢英僕，此幾年齒較少，非柯爾也。答稱確已代遞，且已面晤康德黎君，康德黎君讀後，即遣去之。曰：「是耳」。僕言之鑿鑿，且以天日自矢。予是時已無片紙寸楮在手，遂裂所用手巾，急書數語，乞其再付康德黎君，並以小金錢一枚爲壽，再三期勿相誤，僕雖諾承命，而詎知其一出予室，即馳報於使館中人，盡情宣洩無遺矣。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稱唐先生者來視予，彼蓋誘予入使館之人也。唐先生就坐，愀然曰：「前日之頗君至此，乃公事公辦，義不容辭，今日之來，則所以盡一己之私情。我意君不如直認爲孫文，諱亦無益。蓋此間均已定奪一切，且君在中國卓有聲望，皇上及總理衙門，均稔知汝之爲人，君姓名已震鑠寰球，即死亦可以無憾。總之，君在此間實生死所關，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間爲英國轄境，非中國之屬地，公等將何以處余？按諸國際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將拘予之事聞於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隨意處置也。」

唐答曰：「吾儕不願更與英政府爲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輪舟亦已僱定，屆時當藉君口，束君肢體，昇赴舟上，而置於嚴密之所，及輪抵香港，當有中國鐵艦泊於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艦，載往廣州，聽官吏鞫審，並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舉，未免草率過甚。蓋予在舟中，或得乘機與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微笑曰：「否否，君雖萬能，亦難出此。蓋君登舟之後，即有人嚴密監視，與在此無異。苟有可與外人通消息之處，吾等必先事杜絕，決不使君有絲毫間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員司，未必與使館沆瀣一氣，其中安知無矜憫我而爲我援應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輪船公司乃馬凱尼君所深識者，該公司人員自當遵馬君之命而行，決不爲吾輩梗。」

唐又續曰：「是輪船者，屬於格來公司 Glen，本星期內未必啓程，（按唐某與予談話之日爲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蓋公使爲經濟起見，不欲專僱是船，因令其先載貨物，而行旅之費，則由使館全認。迨次星期，裝載貨物既

竟，君亦須附載以行矣。」

予謂：「此等計畫，欲見諸實行亦良難。」

唐曰：「此着如不果行，則予儕亦不妨戮汝於此，請免周折。蓋此間即中國，凡使館中所爲之事，決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舉高麗某志士事爲我勸慰，並資啓迪。蓋某志士自高麗出奔至日本，被其同國人誘赴上海，戕斃於英租界內，由華人將志士遺骸運往高麗，高麗政府戮屍示懲，而其戕斃志士之兇徒，則獲重賞並擢高位焉。唐口述時，手舞足蹈，意興甚豪，蓋彼以爲此次捕予有功，將來中國政府亦必加以重賞，賜以高位也。

予問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殘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當加以不次之賞。」

予又進逼曰：「君須知高麗志士之案，即中日開釁之一因。今公等致予於此，或招起極大之交涉，未可知也。將來英政府對於使館中人，不免要求中國政府，全數懲治。況君爲粵人，吾黨之在粵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爲予復仇，豈第君之一身可慮，甚或累及君之家族，其時君將追悔莫及矣。」

唐某聞予言，不覺色變，頓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爲，皆公使之命，我此來不過爲彼此私情計，俾君知前途之危險耳。」

四、幽囚求援

是夜十二點鐘時，唐又至吾室，與我談話。

予曰：「君如真爲我友，則將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來也，我當竭盡吾力，希望脫君於厄。吾今方令匠人密製二鑰，一可啓此室之門，一可啓使館之前門，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鑰者係公使之親隨，決不肯授我以鑰也。」

余問以出險當在何時？唐答稱：「必須俟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時已在禮拜三夜十二點鐘以後，已爲星期四，故所謂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點鐘時，我或能乘隙而來，援君出此羅網，未可知也。」

當唐辭出時，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來相援，汝可預備云云。然唐去後，予仍取片紙，書數語，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於英僕，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來云：「此紙已由英僕徑呈使館，馬凱尼君見之，即向我大肆詬訾，謂不應以使館密謀告汝。是在吾雖有援救之心，而汝此舉實足破壞吾計畫，未免自誤。」

予乃問以尙有一線生機否？唐曰：「生機尙未盡絕，但君以後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誤。」

唐乃勸我致書公使，求其相宥。吾從之。唐立命西僕柯爾取紙筆墨水至，吾請換中國文具，因上書公使應用漢文，未便作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間大權均操於馬凱尼之手，公使不過座擁虛名而已。君之此書，宜畀馬凱尼也。」

予問書中宜如何寫法？唐曰：「君必須極力表白，謂身係良民，並非亂黨，祇以華官誣陷至彼嫌疑，因親到使館，意在籲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書成一長函，摺疊既畢，照例應於紙背標明受書人之姓名，唐乃爲予讀馬凱尼姓名之拚法曰：「Sir Malliday Marcartney」。蓋此時予但知其姓氏之音爲馬凱尼，而猶未知其拚法。既而吾授信於唐，唐懷之而去，此後遂不再見此人面矣。

吾此舉實墮入唐某之奸計，可謂愚極。蓋書中有親至使館籲求昭雪等語，豈非授以口實，謂吾之至使館，乃出於自願，而非由誘劫耶！雖然，人當陷入深淵之時，苟有毫髮可以憑藉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遑從容審擇，更何能辨其爲奸僞耶？

唐曾告我，凡我所書各函，均由僕人出首於使館，並未達於諸友。此時吾自思希望已絕，惟有坐以待斃耳。

此星期內，予苟覓得片紙，即以被難情形疾書其上，令英僕爲予擲於窗外，冀有人拾得，或有萬一之望。吾被禁之室，雖有窗，並不臨街，故不得不乞僕代投。既而知僕之愚弄也，遂擬自起爲之。因於幽居室之窗中，一再外擲。一次，幸及於鄰家鉛簷。然紙團力所及不遠，故始則裹以銅幣，銅幣竭則繼之以銀，此錢幣者，乃吾密藏身畔，幸未於搜檢時被獲者也。及所擲之紙及於鄰屋，竊意鄰家或萬一能拾視之矣。然同時另有一紙，擲出時誤觸於繩

，中道被阻，而徑落於室之窗外，因命一西僕往拾之。此西僕即二僕中之少者，非柯爾也。彼聞命後，非特不住拾取，反告監守者。於是監守者往拾，並留心四望，而鉛簷上之紙團纍纍，亦爲所見。彼等攀登鄰屋，取歸呈於使館，自此吾一線僅存之希望亦絕。

於是使館之防我較前更密，窗上均加螺旋釘，不再能自由啓閉。藐茲一身，真墮落於窮谷中而不克自拔矣。惟有一意祈禱，聊以自慰。當時之所以未成狂疾者，賴有此耳。及星期五（十月十六日）上午，予祈禱既畢，起立後，覺心神一舒，一若所禱者已上達天聽，因決計再盡人力，俟英僕柯爾來，又向之哀求脫險。

予向柯爾曰：「君能爲我盡力乎？」

柯爾反詰我曰：「君爲何如人也？」

吾曰：「吾爲中國之國事犯而出亡於海外者。」

柯爾於國事犯之名稱，若未能領會。予乃問其嘗聞阿美尼亞人之歷史否？柯爾點頭。予遂迎機利導，告以中國皇帝之欲殺我，猶土耳其蘇丹之欲殺阿美尼亞人，土耳其蘇丹之所疾視者，乃阿美尼亞之基督徒，故欲聚而殺之。中國皇帝之所疾視者，爲中國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殺之。吾即中國基督徒之一，且曾盡力以謀政治之改革者。凡英國人民，咸表同情於阿美尼亞人，故吾之生平及目前狀況，苟爲英國人所知，則其表同情於我，可不言而喻也。

柯爾云：「不識英政府亦肯援助否？」予曰：「英政府之樂於相助，無待贅言。不然中國使館祇須明告英政府請其捕我，而交與中國可也。又何必幽禁於斯，且恐外人聞之，加以烏鑄耶？」

吾更進迫之曰：「吾之生命，實懸君手。君若能以此事聞於外，則吾命獲全。否則予惟有束手受縛，任其殺戮耳！君試思救人於死，與致人於死，其善惡之相去幾何？又試思吾人盡職於上帝爲重乎？抑盡職於雇主爲重乎？更試思保全正直無私之英政府爲重乎？抑袒助腐敗之中國政府爲重乎？請三思之！並望於下次相見時，以君之決心示我！」

翌晨，柯爾取煤來，投煤爐後，復以手微指煤簍。予見其所指者爲一紙，不覺中心跳盪不已，蓋吾之生死，全賴此片紙所書也。及柯爾既出，急取而讀之，其詞曰：「吾當爲君遞書於君友，惟君書時切勿據案而坐，因監守者

伺察極嚴，得於鑰中窺見君之所爲，幸君伏於臥榻書之爲要。」

予於是臥伏榻上，取出名片一紙，面壁疾書，致康德黎君。晌午，柯爾復來，取是書去，予酬以二十鎊，自此而予囊罄矣。既而柯爾又持煤鑊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後，急搜煤鑊，得一紙，讀之，大喜過望。其詞曰：「勉之！毋自餒！吾政府正爲君盡力，不日即可見釋。」

因此予知祈禱之誠，果能上達於天，而上帝固默加呵護也。計自被逮後，衣未嘗解帶，夜未嘗安睡，至此始得酣眠，及旦而醒。

予之所惴惴以懼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將來之政體事大。萬一吾果被遞解回國，清政府必宣示全國，吾之被速回華，實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後，中國國事犯將永無在英存身之地。吾黨一聞此言，必且回想金田軍起義之後，政府實賴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凱旋。國人又見吾之被逮於英而被戮於華，亦必亞以爲近日革命事業之失敗，仍出英國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華革命主義，永無成功之望矣。且予在旅館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干，如爲中國使館所得，則株連之禍，不知伊於胡底，幸康德黎夫人能爲予預料及此，毅然赴旅館，盡取予書牘之類，捆載而歸，付之一炬。是其識力，誠大有造於吾黨也。

吾被幽使館中，但覺飲食之可厭，而並未念及飲食中可以置毒。故向日食牛乳咖啡少許，或食鷄卵一枚，得以苟延殘喘，以待良友之營救。後接康德黎君來信，於是食量大增，睡眠益過，不覺其身幽禁室矣。

按：上文所指之「唐君」應爲鄧廷鏗，顯係譯文之誤。

五、師友營救

自星期五（即十月十六日）後，英僕柯爾始爲我效奔走，力求脫我於難。柯爾之妻尤爲盡力，彼於星期六（即十月十七日）密告康德黎君之書，即柯爾之妻所寄。康德黎君接書，已在是日夜間十一點鐘時，書曰：

「君有友自前星期以來，被禁於中國使館中，使館即擬將其遞解回華，處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實可憐，如不急起營救，必將罹難。某雖不敢自具真名，然所言均屬實情。君友之名，某知其爲林行仙。『Lin Yin Sen』」

康德黎君得書後之情態若何？可以不言而喻。時雖深夜，然恐營救無及之故，急起而檢查馬凱尼君之住址，住

址既得，即匆匆出門，馳往求見。夫此等不名譽之舉動，馬凱尼實主其謀，而予友不知，反馳往哈蘭區 Harley Place 三號之屋，向之求助。時已禮拜六夜十一點一刻鐘。予友既抵其處。則見重門緊閉，闔若無人。不得已悵然而退至梅爾蓬路 Marylebone Road 中，乃見一值夜之警察。予友因以該屋詢，警察謂：「此屋現係空閑，屋中人均住鄉間，將於六月後返此云云。」予友即以何能詳悉若是？警察倖倖然答曰：「三日前有盜夜破是屋，聞於警署，警署因而查悉屋中人之姓名及其現在之蹤跡。余謂六閱月後始回者，必不汝欺也。」康德黎君聞言，遂驅車直達梅爾蓬巷 Marylebone Lane 警署，以予被拘事呈訴於值日警監。繼復至蘇格蘭場警署，在私室中獲見偵探長，當蒙允其呈訴一切，以便存案。惟此一事，實出常情之外，雖康德黎君言之鑿鑿，殊難令人遽信。偵探長靜聽既畢，即謂：「此事關係重大，非渠所能主持云云。」迨康德黎君別偵探長而出時，已為夜半後一點鐘，然所事則毫無成就也。

翌晨康德黎君早餐後，即馳至甘星敦 Kensington 就商於其友，意欲往見現寓倫敦之中國稅務司某，乞其以私情，往告中國公使，使知私捕人犯之事，必致引起國際交涉，宜三思而行云云。

康德黎君之友頗不以此策為然，於是康君復往哈蘭區三號屋，其意以為屋中人雖往鄉間，必有一二留守之人，或可藉此訪得馬凱尼君之蹤跡及其通信處。不料此行結果，除於盜劫之事更聞一過及親一二斧鑿散棄地上外，更不能別獲絲毫之消息，以蹤跡彼與東亞同化之外交家。

康德黎君無策，乃往訪孟生博士。才及門，見有一人趨趨門外，狀若有所待，詢之則中國使館之西僕柯爾也。蓋柯爾是日決計躬往康德黎君之家，將以中國使館拘予之秘史，盡吐予友之前。康德黎君家人告以予友已往訪孟生博士，柯爾乃復疾趨至孟生博士之門外，意欲俟康德黎之來而並謁孟生博士。

柯爾既隨康德黎君入，即出予函。是函係予以名片二紙繕成者。康德黎君乃與孟生博士同閱之，文曰：

「予於前禮拜日，被二華人始則使以誘騙，繼復驟加強暴，將予幽禁於中國使館中。一二日後，使館將特僱一船，解予回國。回國後必被斬首，奈何？」

孟生博士既備聞斯情，即毅然願助康德黎君從事營救。康德黎君嘆曰：「設馬凱尼君未下鄉，則此事必易為力

。不幸馬凱尼又他出，吾儕當於何處求耶？」

柯爾聞言，卽實告曰：「馬凱尼君近固無日不赴中國使館，遠出者妄耳。幽孫氏於其室中者，馬凱尼實主其謀。以孫氏付於吾，而令吾嚴密防守，勿使鬼脫者，亦卽馬凱尼也。」康、孟二君聞柯爾言，不禁大爲駭愕！且此事既由馬凱尼主謀，則營救自必更難，措置益須加慎，勢非就商於政府中之秉政者不可矣。

柯爾經孟、康二君詰問後，又答稱中國使館將詭稱孫氏爲瘋漢，擬於二日後卽下禮拜二日，雇舟押解回國。雖舟名不得確知，然倫敦城中有名麥奇谷 *Mc Gregor* 者，柯爾知其必嘗與聞斯事也。又謂本星期內，忽有中國兵三四名，來止使館中，使館向無此等人物，是必亦關起解孫氏之事也。

康、孟二君各以名刺一紙，令柯爾歸而轉授於予，蓋一則藉此可以稍慰予心，一則證明柯爾之確已爲予奔走也。柯爾既去，孟、康二博士，復往蘇格蘭場警署，再請警察出而干涉，以維人道。他日之偵探長謂康德黎君曰：「君於昨夜半後十二點半鐘時嘗來此陳訴，今爲時未久而君又來，我輩實不及有所爲也。」

孟、康二博士既出警署，熟籌再三，乃決計姑往外部一試。抵部後，部中人告以可於下午五點鐘時復來，當令值日員司接見。如期復往，書記員招待甚有禮。而於二君陳訴之辭，仍不免疑信參半。既而謂：「本日適值星期，停止辦公，一時無可設法，當於翌日轉達上官云云。」二博士無如何，既思時期已極迫促，設中國使館卽於是夜實行其計畫，予必無救。況更可慮者，彼使館所雇之舟，或係他國商船，則英政府雖欲搜檢，亦非其能力所及。蓋人犯既已被解，輪舟既已開行，設爲英國船，則不及搜索於倫敦，尚可截之於蘇彝士河；若爲外國船，則一去而不可留矣。二君因毅然變計，決先往中國使館，告以孫某被拘事，已爲外人所知，英政府及倫敦警署亦已洞悉。使館擬將孫某遞解，處以死刑云云。俾中國使館聞之，或有所畏憚而不敢遽行。孟生博士以中國使館中人，稔知康德黎君與予相習，故決計隻身前往。

於是孟生博士卽獨赴波德蘭區四十九號，叩中國使館之門。令門外守兵招一能操英語之華人出見。俄而一中國通譯員出，其人卽始則捕予於途，繼則餌予於使館之唐某也。孟生博士啓口第一語，卽曰：「某欲一見孫逸仙」，唐某忸怩半晌，口中喃喃自語曰：「孫……孫……」一若不知斯名之誰屬者？既而答曰：「此間並無此人」。孟生博

士即謂：「余知孫某確在是間，無庸諱飾，今英國外務部已知此事，而蘇格蘭警署且已派員徹查。」然唐某氣不稍沮，竭力剖辨，謂此種消息，純屬子虛，言下態度從容，鎮靜若無事。雖以旅居中國至二十二年，善廈門方言，其熟如流，而於華人之性情習俗又號稱洞悉之孟生博士，亦不覺爲所搖惑，幾疑予被拘之事之全非事實矣。若唐某者，洵不愧爲中國外交界之人材，將來出其善作誑語之才力，何難取卿相而列臺閣哉？孟生博士歸爲康德黎君言，當其辦白之時，形容極坦率，辭氣極質直，甚且謂某被拘之信息，或出孫某之自行捏造，冀以達其不可測度之目的焉。

康、孟二君爲予往來奔走營救，至是晚（即禮拜日）下午七點鐘時，始各分袂。然二君均以所謀無當，意殊鬱鬱。且恐中國使館，既知事爲政府所聞，或卽於是夜實行遞解，否則亦必將移禁他處。果然不出二君所慮，若非常時之所謂曾侯（按卽曾紀澤，龔使之前任也。）者，自倫敦返國時不將居宅退賃者，使館中人，必將予改禁於曾宅中，而反請英政府赴使館檢查，以關外間之流言，而示推誠相與之態度矣。雖然改禁之計，雖可無慮，而遞解之期，既定於禮拜二日，則承載之輪舟，是時必已安泊於船塢可知。彼使館或託詞押解瘋漢，在夜深人靜後，卽約予於船塢，又未可知。此予友之所以惴惴然爲予危也。

六、訪求真探

康德黎君再三思維，終不能釋然於心，計惟有在中國使館之外，遣人密伺，藉以偵探其行動。因急往訪其友某，友卽告以思蘭德號 Slater's Firm 之所在。思蘭德號者，美國私家偵探設於倫敦本區（所謂倫敦本區者，卽倫敦全境若干區分之一，亦名倫敦城。）以待雇者也。願是日爲禮拜日，康德黎君既抵佩星和爾街 Basinghall Street，見有花崗石所建之華屋，審爲思蘭德號，卽按其鈴，不應，過其門，亦無聲，後乃大聲以呼，而屋中終闐然無應者，蓋以禮拜日循例休業。然則英國於禮拜日無應辦之案乎？曰：非也。所謂禮拜星期者。不過藉人爲之力，強分一月爲若干部分，藉以取便於世俗而已。彼犯案者，又何嘗因禮拜日與非禮拜日而分別哉？

康德黎君不得已而與途中之巡警相商，且亦引御者同相研討，此御者已知中國使館之案，而頗欲盡力馳驅者也。既而定計再往最近警署，康德黎君入見，且陳中國使館之事。警官曰：「君必先言所欲偵察之地。」

予友曰：「即西境之波德蘭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月

六六二

警官曰：「嘻！若是則君盍回西境謀之。本署係屬倫敦本區者，不能無端涉及西境事也。」

康德黎君固亦知東境與西境之警署，同一無濟。因復請曰：「可否由貴署遣一偵探，往伺中國使館否？」

警官曰：「是不能。倫敦本區之警察，不能與聞西境之事，此定律也。」

康德黎君曰：「然則貴署可否以更事既久而今已退閒之警察介紹與予？使盡微勞，以邀少許之酬謝者乎？」

警官曰：「可。予當爲君搜索之。」

警署中人乃互相商議，冀以一相當之人充數。既而一人曰：「得之矣。有某某者似可以膺斯任也。」

予友遂欣然叩其人之居址，則曰：「斯人寓藍藤斯敦 Leytonstone，君今夜恐無從訪得之。蓋今爲禮拜日，國君所知也。」

予友聞言，意仍不愜。警署中人因又聚議良久，始又得一相當之人，其所居在伊士林敦 Islington 之吉勃斯屯場 Gibston Square，既以其姓名居址見告，予友乃興辭而出。

予友既出門，思先往報館，以予被逮事告諸新聞記者。請爲宣佈，而後再赴伊士林敦訪偵探。意決，即驅車至太晤士報館，謁其副主筆。館人出會客啓一紙，令予友將請見之緣由填明。予友大書曰：「中國使館之誘捕案」。時已夜九點鐘矣，館人約以十點鐘時再往相見。

於是予友逕赴伊士林敦，訪警署介紹之偵探。既抵其境，又經多時之訪問，始得吉勃斯屯場。其地少燈火，幽暗不易辨字跡。予友按戶檢查，始得警署所示之某號。遂叩關入。所謂某偵探者固自不誤，而其人又以他事不能從請，願轉薦一人爲代。予友不得已諾之，持其所薦者之居址，須求諸其人之名刺。於是傾箱倒篋，並破衣敗絮之中，亦復搜尋殆徧，約一小時許始見一紙，謂予友曰：「得之矣。」雖然，此人現方任倫敦本區某旅館之守護，毋庸至其家相訪之也。

予友躊躇者再，既見偵探室中，有數童子，乃請偵探，速其一函，遣一童徑送其人之家。予友復偕同偵探親訪其人於某旅館，如是兩者必遇其一矣。邵署既定，予友與偵探驅車至某旅館。館在巴畢干（即古堡）鄰近，顧探索良久，迄未見是人蹤影，既而知其人須於十一點鐘旅館閉門時始來服職。康德黎君無奈，因令同行之偵探在旅館

外候其友，而已則復馳赴太晤士報館，盡以予被捕事告記者。記者取筆而記，繕成一紙，而登載與否？則尚須聽報館之主裁。康德黎君是日直至夜間十一點半鐘，始行回寓，及十二點鐘而擬稿之偵探尚未至。康德黎君雖覺事不順利，心甚焦悶，而其一腔熱血，曾不稍減。計惟有親往偵守於中國使館之門外，果有潛解人犯事，可立起而干涉，因以此意告諸康德黎夫人，與夫人握手而出。

康德黎君甫出門，即與一人相值，審知即適間所約守護旅館之偵探。乃偕彼赴中國使館，是時已十二點鐘半。而使館中燈火猶明，人影幢幢，是可知孟生博士實聞一言，實足致個中人之驚擾也。康德黎君令偵探伺於一亭生車內，車在渭墨街 Weymouth Street 街南屋宇下，介於波德蘭區及波德蘭路之間。是夜月明如晝，凡於中國使館二門出入者，車中人並可瞭見。萬一予於深夜被押解出，則車中人可駕車馳逐於後，以蹤跡予之所往，無虞不及也。予友康德黎君之歸寢，已在二點鐘時矣。此一日間先則稟諸政府，訴諸警署，告諸報館，而終則密遣偵探，伺察於使館之外。予友一日之心力竭，而予命亦賴是以獲全。予書至此，不禁感極而泣矣！

七、英政府之干涉

禮拜一之晨（即十月十九日），康德黎君復往恩蘭德號，雇一偵探，令旦夕伺於中國使館之外。及午，康德黎君奉本國外部之命，將此案始末繕成稟牘上諸部。蓋英外部之意，欲籌一非正式之辦法，冀中國使館就此釋予，免致釀成國際上不堪收拾之交涉。況予被逮之消息，純出傳聞，或得諸密訴，尚無確實之證據，故當事者，初皆謂不用正式交涉為宜。迨英政府質諸格來輪船公司，而知中國使館，確曾有定雇船艙之舉，於是始明不特私捕人犯為非虛，且實行遞解亦屬實，於是英政府遂正式從事，而予友之責任始寬。

英政府首遣偵探六人密伺於中國使館之外，並分飭附近警署加意防守。且以予之歐裝小影一幀（係游美時所攝寫者）發交警吏，藉資辨認。蓋外國人未嘗赴華遊歷者，其視華人面目，幾於彼此相同，無甚分別。故予平時所攝之影，殊不足資英警察之用。若此照則不特身服西裝，且有短鬚，即額上髮亦梳成歐式。吾中華雖為早婚之國，而留鬚極遲，其有此資格者，大抵身為人父或為人祖父。若予當時，則行年猶未及三十也。

及星期四（即十月二十二日）英政府繕就保護人權之令，擬飭中國使館或馬凱尼將人犯交出審訊，後以中央刑

事裁判所不允，遂未見實行。

是日（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有地球報 Globe 特派訪員，往見康德黎君，問以中國使館誘捕之某華人，其生平行事及本案情節。康君盡以所知相告。並稱嘗於五日前即星期日（即十月十八日）以孫某事告於泰晤士報館，繼又於星期日（即十月十九日）續往報告。故康君之意，此案宜由泰晤士報首先發表。既而康君又謂地球報訪員曰：「雖然，君試以筆錄者爲吾一誦之，吾當爲君正之。」於是訪員以所草之稿，向康君誦畢。康德黎曰：「甚是，君可卽以此登報，惟稿中不可述康德黎之姓名。」

此案於未經刊布之前，知者已不乏人。當星期二日（即十月二十日），至少已及二三百之數。然彼到處諮詢隨事探訪之報館訪員，則至星期四之下午始有所聞，亦可異也。及報界風聞，則事難更隱。自地球報揭露此可驚可愕之異聞，而波德蘭區覃文省街四十六號康氏之屋，幾乎戶限爲穿，老友康德黎君，遂覺應接不暇矣。

地球報發行後，不及二小時，中央新聞及每日郵報各有訪員一人，登康氏之門，咨訪此事。予友雖力主緘默，然於本案大概情形，仍舉一二以告。兩訪員與辭後，逕往中國使館求晤孫某，其出接者卽彼機變環生之唐某。唐某力稱使館並不知有孫某，於是訪員示以地球報所刊新聞。唐大笑曰：「是皆欺人之談，純係憑空捏造。」中央新聞訪員乃正告之曰：「君無庸諱飾，彼孫某被幽於此，若不立行釋放，則明晨將見有數千百市民，圍繞使館，義憤所發，誠不知其所極耳。」唐某仍聲色不動，且狡獪更甚於前。

既而訪員等四出以求馬凱尼之蹤跡，得諸米狄蘭旅館 Midland Hotel，其與訪員問答之辭，詳見英國各報紙。今轉錄如次：

中國使館參贊馬凱尼勳爵於昨日下午三點半鐘赴外部，面陳一切。

馬凱尼答某報訪員之問曰：「某甲被留於中國使館一事，除報紙已載之消息外，我殊不能更有所陳述。」

訪員曰：「外部刊有布告，謂外部大臣薩里斯倍 Lord Salisbury 已照會中國公使，請其將拘留之人釋放矣。」

馬凱尼曰：「誠然。」

訪員曰：「敢問此照會之結果若何？」

馬凱尼答曰：「某甲自當釋放，然釋放之時，須力顧公使館之權利，勿使稍受侵害。」

厥後又有某報訪員晉謁馬凱尼，馬凱尼謂之曰：「彼拘留於本使館之華人，並非孫逸仙，此人之果爲誰？及其抵英國後之一舉一動，本使館洞悉無遺。彼之赴使館，係出自己意，並非由使館之引誘或強迫或拘捕。蓋華人之來倫敦者，獨居無聊，人地生疎，而至使館問訊，或與使館中人聚語。固屬常有之事，特此人之來，其形跡似有所窺伺，且自恃使館中無識其人者，故敢爲之而無忌。初時由使館某員接見，既而介紹於我（馬凱尼自謂），談言訕訕之中，彼無意傾吐一二語，始疑及此人者殆即本使館所伺其舉動之某某也。及次日又來，而其人之爲某某，確已徵實，遂拘留於此，俟中國政府訓令既至，乃量爲置處。」

馬凱尼之論國際問題，則曰：「某甲華人也，非英人也。中國之公使館，不啻爲中國之領土，其有統治權者，惟中國公使一人而已。華人之赴公使館，既出自其人之本意，而公使館以其罪案嫌疑之故，卽加以拘留，此在外人，實無干涉之權。設其人而在使館門外，則辦法卽從前大異。蓋門外爲英國之領土，公使館非先請拘票，卽不能逮捕也。」

馬凱尼又答曰：「某甲雖被拘留，然使館並不視爲囚犯，起居飲食，均甚優待。外間所稱某甲或受非刑，或遭虐待等語，殊屬可笑。」馬凱尼又謂：「英國外部已來函質問，公使館擬卽備文答覆云云。」

中央新聞曰：「馬凱尼勳爵自外部回中國使館後，卽趨至龔大人（按卽清駐英公使龔照瑗）之寢室，告以外部大臣薩里斯倍必欲將孫逸仙釋出使館之種種理由。」

馬凱尼之所言所行，是否正當？非予所欲言，直宜聽諸公論，並質諸其一己之良心而已。在馬凱尼之意，以爲彼之舉動，亦自具有理由，然在頭腦清醒者當不出此，而況馬凱尼又身爲使館參贊，其職位至爲重要乎？且不特身爲參贊而已，彼唐先生不云乎？中國公使，僅擁虛名，使署大權，則盡操諸其手也。

當時吾友所以營救者，幾於無計不施，錄新聞紙一則，亦足以見其大概也：

「現訪得孫逸仙之友，曾籌備一勇悍之策，以爲援救，後由外部及蘇格蘭警署向某等據保，謂孫某在中國使館決不至受荼毒，其策因以作罷。蓋孫君之友已請於鮑華斯谷子爵 Viscount Powerscourt，擬登彼家之屋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月

六六六

，攀緣以達中國使館，破孫君所居室之窗，挾之而出。子爵家在波德蘭區五十一號，與中國使館比鄰，某等並將此計密達孫君。孫君雖被中國使館加以桎梏，行動不得自由，然仍密報其友，謂如蒙相援，當於室內用力，毀去窗櫺，以期出險等語。其友輩並備一車，候於中國使館側，待孫君既出，即乘車疾馳至其友家。」

報紙所載，雖不盡無因，然與事實略有異同。蓋英僕柯爾於十月十九號致書康德黎君，謂某於今夕當有一絕妙機會，可使孫君攀緣至波德蘭區鄰屋之巔，藉以出險。君如以此計爲可行，則請商准鄰屋主人，遣一人待於其室，藉資援手，並望賜覆以定進止云云。康君既接此書，即持赴蘇格蘭場警署，乞遣一巡警，與彼偕往波德蘭區，用相協助。惟警署中人，以爲此等計畫，未免損失威嚴，殊非正辦。故力勸吾友勿行，並謂孫某必能於一二日後省釋，從容以出中國公使館正門云。

八、省釋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柯爾携煤簍入，略示意於我，待其既出，就簍中檢得一紙，則剪自地球報者。其載予被逮情形，頗稱詳盡，即觀其標題已足駭人心目。如曰：「可驚可駭之新聞」，曰：「革命家被誘於倫敦」。曰：「公使館之拘囚」。予急讀一過，知英國報界既出干涉，則吾之生命，當可無害。當時欣慰之情，真似臨刑者之忽逢大赦也。

星期五日（即十月二十三日）自朝至午，仍幽居室中，未見有何發動，乃傍晚四點半鐘，彼監守吾之使館衛兵，一中人，一西人，忽發局而入，謂吾曰：「馬凱尼君在樓下待汝。」旋令予進履戴冠，並加外褂，既畢，即導至最下層。予意英政府或將遣一人搜檢，故若輩欲藏吾於地窟中，未可知也。守兵雖告吾省釋在即，然予終未敢遽信。既而忽覩吾友康德黎君，又見有與吾友偕至者二人，予心始爲之一舒，方知省釋之言非謬矣。

與吾友偕至者，一爲蘇格蘭場之偵探長，一則年事已老，則英外部之使者也。馬凱尼當諸人之前，將搜去各物一一還予。並對偵探長外部使者爲簡短之說辭曰：「某今以此人交付君等，某之爲此，期在使本公使館之特別主權及外交權利。兩不受損云云。」吾當時方寸激擾，更不能深辨其言之意味，然在今日觀之，則其所云云，豈非毫無意旨而又童駭之甚者哉。

既而馬凱尼告吾，謂予已恢復自由。遂與吾儕一一握手，啓使館之側門，肅吾儕出，吾儕於是出門下階，由使館屋後，而入於回默街中矣。此事雖微，然以英政府之代表，而竟令從後門出，在中國外交家，方且自誇其交涉之間，又得一勝利，其爲有意簡慢，固無可諱言。彼馬凱尼雖非華人，然固同化於華俗，而又於東方風氣之中，深得其江河日下之一部分者也。倘外人以此相責，想馬凱尼又必有隨機應變之詭辭，如謂使館前廳，既爲報館訪員所佔，而使館大門之外，又爲許多市民所圍繞，當時英國外部之意，急欲將此案暗中了結，勿使張揚，則使者雖由後門而出，於英國當道之用心，固不失爲體貼盡致也。

英國人觀念，與中國人不同。在英國人方以爲外交之勝利，而中國使館，祇須於省釋時之舉動間，略加播弄，即不難一變而爲中國外交之勝利。故予之省釋，在中英兩方面，固各有其可慰者在也。

予省釋前，外部使者於衣囊中，探一紙，授馬凱尼。馬凱尼纔一展開，即盡知其內容，是可知此紙所書，僅寥寥數語，而吾之生死，同繫於是矣。

既出使館門，則回默街中之環而待者，甚見擁擠。彼報館訪員見我，即欲邀予敘話。偵探長急擁吾入一四輪車，與吾友康德黎及外部使者，同驅至蘇格蘭場。偵探長名喬福斯，在車中正色危言，向予詰誠，甚且呼吾爲頑童。謂此後務宜循規蹈矩，不可復入會黨，從事革命。車抵白宮區某館前，忽而停輪，吾輩自車中出，立於道旁，瞬息間，各報訪員已繞吾而立。吾儕自波德蘭區馳騁至此，已半英里有餘，而各訪員又怎能突然出現於此？中有一人，予見其曾躍登御人之側，與御人共坐而來，然此外尚有十餘人，豈盤踞於予輩車頂而偕來者耶？各報訪員慮吾一入蘇格蘭場警署，或不免有稍久之盤桓，因邀吾於某旅館前，俟吾出，即擁予至旅館之後屋，其爲勢之強，較唐某等曳吾入使館時爲尤甚。而各訪員等之渴欲探吾消息，較諸中國使館之渴欲得吾頭顱爲尤甚也。吾既入旅館，被圍於衆人之中，有問即答，各訪員隨答隨寫，其速如飛。予觀其所書，心竊異之，蓋予當時猶未知其所用者，爲速記法也。予言既窮，無可復語，忽聞吾友康德黎君呼曰：「諸君乎，時至矣！」予仍被擁入車，向蘇格蘭場進發。警署之視吾，直同一無知少年，觀於偵探長喬福斯可見。蓋喬福斯誠摯之容色，坦白之言辭，長者之對於卑幼如是也。予既至警署，即將前後所遭，歷述一過。警官錄畢，向吾宣讀，讀畢。命署名紙末，所歷約一小時，乃偕吾友康德

黎君告辭而出。

康德黎君挈吾歸，相見之悲喜，接待之殷摯，自不待言。康德黎君夫婦等，咸舉杯爲吾頭顱壽。是晚，求見者弗絕，至深夜始得就寢。此一宵噩夢之酣，實爲予有生以來所罕有。連睡至九小時，忽爲樓上羣兒跳號之聲所警醒。但聞康德黎君之長子名坎斯者，謂其弟妹曰：「柯靈，汝扮作孫逸仙。南兒，汝扮作馬凱尼，我則爲援救孫逸仙者。」未幾。喧嘩雜沓之聲大作。馬凱尼被撲於地矣，孫逸仙被援出險矣，於是笛聲鳴鳴，鼓聲鑼鑼，以示大赦罪之意，而合唱一歌，名曰：「不列顛之先鋒隊。」

星期六（即十月二十四日），來訪者仍終日不絕，吾與康德黎君一一應答，幾舌敝唇焦。且來訪者無不急急問訊康德黎孟生二博士何以能得此消息？設吾儕漫應曰：「賴使館中人之密爲傳遞。」則使館中人之厚待我者，反不免因是而被嫌疑，遭攆斥，是大不可也。乃英僕柯爾自此案既白，即毅然辭退，不願復役於中國使館，是則以一身之去，免餘人於嫌疑，而吾儕亦可以道破實情，謂居間通信，乃出於柯爾之力也。至外間謂予厚賂柯爾，因得脫險，實非事實。予以密信授柯爾，並酬以二十鎊，固謂柯爾爲吾效奔走，不得不稍酬其勞。詎知柯爾卽於得金之次日，轉授於吾友康德黎君，謂此係孫某之物，請代爲收貯。及予既歸，始知其事，乃以二十鎊力迫柯爾受之。吾當時財力止此，故所贈亦止此，揆諸衷心，殊覺未甚滿意也。先是，當十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柯爾爲吾投書康德黎家時，既已按鈴入門，達於廳事，知吾友已外出，乃請見康德黎夫人，僕聞言，入白夫人。柯爾獨立廳中，瞥見廳之一隅有一華人佇立而望，因大驚失色，自思此來必已爲使館所知，故遣人尾隨至此。及夫人出，柯爾卽以所疑告，夫人急慰解之，令其無恐。蓋立於室隅者，實一塑成之中國人，其大小與人身相似，康德黎君在香港行道時，賞其塑製之工，遂購歸設於廳事，驟見者往往怪詬，而柯爾心膽既虛，故惶恐更甚也。

予當日遭逢，大略盡是。是時英議院尚未屆召集之期，故不知議院云何？然予自出險後，相識者漸衆，倫敦及倫敦以外之英人，多因此謬相推愛，頗極一時賓朋酬酢之樂云。

註一：「倫敦被難記」自序，「國父全集」內，頁一六八。

註二：「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八八。

註三：「國父全集」內，頁二〇九——二一一。

註四：同註三，頁一六七——二〇〇。

二十九日（十二月三日） 香港中國郵報論孫先生文為非常人，志在救中國，其革命組織與文明基礎遠勝金田軍。

本日，香港中國郵報就孫先生在倫敦被誘捕一事，論中國革命前途曰：

「孫逸仙者，即近日被逮於倫敦中國公使館，擬置諸典刑，視同叛逆者也。但此人他日似未必不為歷史中之重要人物，然未經正當之法庭，加以審訊，自不得謂為與會黨有關，且不得謂該會黨之舉動，確在傾覆中國朝廷也。彼以孫逸仙為叛逆者，僅出於倫敦中國使館，與夫廣東官場之擬議耳。然孫君固非尋常人物，以開通之智識，而目擊中國數百兆人民之流離困苦，固慷慨然動念，而奮然興起矣。據中國官場宣告，謂此等華人曾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間起而作亂，孫逸仙即其領袖也。中國之不免於變亂，人人能言之，而其變亂期之迫於眉睫，則無論居於外國之外人不能知，即寓於遠東之外人，亦鮮有能知之者也。及廣州之變既作，以事機不密，遽爾傾覆，而當事者仍漠然不動於心，至可哂也。他日變起，其可危當必更甚於昔日之金田軍。蓋其新穎之組織，文明之基礎，較金田軍尤過數倍。總之領袖諸人，以事機未熟，故暫圖偃伏，非以偶然失敗之故，而遂盡棄其革命計畫也。至革命派之緣起，雖無由追溯，而其大致要由不滿意於清廷之行事。近中日一戰，而此派遂嶄然露其頭角。孫逸仙博士輩之初意，原欲以和平手段，要求立憲政體之創行。迨至和平無效，始不得不出於強力。然歷觀中國歷史中之崛起隴畝謀覆舊朝者，其精神意氣，大都豪悍不馴。而孫氏則獨不然，秉其堅毅之心志，不特欲調和中國各黨派，且將使華人與西人，中國與外國，亦得於權利之間悉無衝突焉。然而事有至難解決者，則一舉之後，必有種種繼起之困難，而此等困難最足使任事者窮於應付。孫氏豈不知有大興作，不得不藉外國之國家與個人為之援助。然而中華全國，方無處不為排外之精神所貫徹，是則欲泯除而開導之，固不能不有需乎時日也。總之此等事業，其性質至為宏大，而其舉動又至艱難。惟孫氏則本其信心，謂他日欲救中國，勢不能不出乎此，而目前則惟有勉以圖，冀其終底於成功。」

而已。孫氏誕生於火奴魯魯（按：此有誤，總理實生於廣東翠亨村。），受有英國完美之教育，且於歐美二洲游歷甚廣，其造詣亦至深。昔嘗學醫於天津（按：當作廣州香港），繼復執業於香港（按：當作澳門），其軀幹適中，肌膚瘦挺，容貌秀美，性情伶俐而爽直，舉動毫無矯矜，而言語又極懇摯。至其知覺之敏捷，處事之果敢，尤足使人油然而生信仰之心，是誠不可謂非漢族中傑出者也。中國今日，正與各國在專制時代無異，凡主張創行新政，革除腐敗者，概加以叛逆之名。故有志之士，欲傳播其主義，勢不得不以慎密。孫氏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質之文字，發行於香港，而傳播於中國南省。其於良政府與惡政府，描寫極為盡致，兩者相較，自足使人知所去取。然而措辭至為留意，雖以彼狼若狼虎善於吹求之中國官吏，亦復無從指摘之。中國人士得讀此書，無不慨然動念。未幾，遂有秘密會社之發生，則孫氏與焉。當中日戰事未起以前，中國水陸兩軍，以上官之遏抑，已多懷怨望，即文官亦非無表同意者。況中國伏莽遍地，響應尤易。其初次起事之期，定於本年三月間，時則火奴魯魯、新嘉坡、澳洲等處，紛紛輸資同華。然人才尚缺乏，軍需亦未足，遂改期至十月間。此時軍械彈藥已陸續購備，香港黨人亦赴粵以攻廣州矣。餉糧亦甚富足，外國之諜謀官及軍事家亦已延聘，日本政府雖無明白之答覆，而黨人則已請其援應矣。凡起事之謀，可謂應有盡有，不幸為奸人所算，洩其謀於當事，卒至全功盡覆。蓋當時有僑寓香港之中國某富商，附和新黨，知於集資購械等事，可緣以為利，遂居然以富商而為志士，既而知起事期迫，該商方為中日戰後某財政團之一，經營中國路礦等事，恐干戈一起，則權利將受影響，遂不惜舉黨人之謀盡洩於粵省官廳而仍緣以為利。黨人之計既被所傾覆，孫氏即出奔異國。此次以嫌疑被戮者凡四五十人，並懸賞通緝孫氏。（按：此即總理第一次革命失敗，在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孫氏由香港至火奴魯魯，復由火奴魯魯至美國。駐美中國公使館中人聞孫氏之言論，頗有志於革新。既而赴倫敦，思欲以鼓吹駐美使館者，更鼓吹駐英使館，而不意美使館有陽為贊成革命，陰欲繼發港富商之志，亦思緣以為利者，密白其事於駐英使館，而孫逸仙被使館誘劫之案，遂因以演成矣。此案雖由馬凱尼一再辯護，而孫氏之始則被劫，繼則拘禁，固已無可諱言。至孫氏之得免於禍，實賴友人康德黎博士之力云。」（註一）

註一：「倫敦被難記」附錄，「國父全集」內，頁二〇四——二〇六。

三十日(十二月四日) 孫先生文赴倫敦大英博物院圖書館研讀，自本日起至翌年(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幾每日赴該院閱書，尤留意當時歐洲社會革命運動，其影響於先生民生主義思想之建立極大。

「倫敦被難記」完稿後，孫先生文即赴大英博物院從事閱讀研究，時大英博物館所藏圖書之豐富，幾冠全歐。自本日起，至翌年五月十七日止，孫先生時赴該院潛心研讀，習以爲常。據司賴特偵探社報告提及者凡五十七次，但其報告中數度聲明，謂其「毫無變更的每日赴大英博物院」(二月十六日報告)，與「差不多每日都赴大英博物館」(四月十八日報告)。報告中亦有孫先生赴南肯新登博物院與動物園參觀之紀錄。

孫先生治學甚勤，康德黎在其手著「孫逸仙與中國之更生」中曰：

「孫逸仙在倫敦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他從來沒有耗費過光陰，他時時都在工作。他所讀的書，各方面的都有，如政治、外交、法律、礦物、農業、畜牧、機械、經濟等等，莫不引起他的興趣，而且攻之甚勤。」(註一)

此段記載證之孫先生赴大英博物院一事，益信其勤學之一斑。

孫先生對於英美兩民主國家之政治社會，接觸既久，體驗亦深。值此時期，西方列強之殖民帝國主義，雖仍在方張之際，然受其侵略者之呻吟，以及其本國內部因資本主義發達而產生之社會不安現象，更使感覺銳敏與目光遠矚如孫先生者，益思有以謀挽救及預防之道。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實孫先生之三民主義由醞釀而漸趨形成爲體系之階段也。孫先生自述有曰：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月三十日

六七二

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註二）

附錄：孫先生赴大英博物館圖書館日期表（註三）

年	月	日	到館時間	離館時間	留館時間
一八九六年	十二月	五日			一小時二十分
	十二月	七日	十時二十分	二時三十分	
	十二月	八日		二時	
	十二月	九日	十時四十五分		
	十二月	十日			
	十二月	十一日			
	十二月	十五日		二時十五分	
	十二月	十七日		十二時四十分	
	十二月	廿二日	十一時三十分	三時四十五分	
	十二月	廿七日			
一八九七年	十二月	廿八日			
	十二月	廿九日			
	十二月	三十日			
	十二月	卅一日			
	一月	六日	十一時	二時三十分	
	一月	十一日	一時三十分	三時三十分	
	一月	十四日	十一時三十分	三時	



一月十六日	十時四十五分	三	時
一月十九日	十一時三十分	三	時三十分
一月二十日	十一時四十分	三	時
一月廿一日	十一時三十分	三	時三十分
一月廿六日	十時三十分	三	時
二月六日	十時四十五分	四	時
二月八日	十二時三十分	六	時
二月九日	十一時一刻	六	時
二月十二日	十二時一刻	六	時
二月十三日	十二時一刻	六	時
二月十七日			
二月十八日			
二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日			
二月廿一日			
二月廿二日			
二月廿三日	十時三十五分	六	時四十分
三月四日			
三月六日			
三月七日			
三月八日			

一
小
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月三十日

六七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月三十日

三月九日	十一時四十分	三時十五分
三月十八日	十一時五十五分	七時三十分
三月十九日	十二時	三時二十五分
三月廿二日	三時一刻	八時
三月廿三日	十一時五十分	六時三十分
三月廿四日	十時三十分	四時十五分
三月廿六日		七時二十分
三月廿七日		四時四十五分
三月卅日	十一時四十五分	六時四十分
四月二日	十一時五十分	六時三十分
四月三日	十一時四十分	五時二十五分
四月五日	十一時四十五分	七時十五分
四月六日	十一時三十分	四時三十五分
四月七日	十一時二十分	六時十分
四月九日	十時三十分	七時
四月十日	十一時十五分	七時三十分
四月十四日	十二時十分	七時
六月十日	十一時三十分	六時
六月十六日		
六月十七日	二時	七時

六七四



註一：見張繼：「總理創立三民主義五十週年紀念」，「張溥泉先生全集補編」（民國四十一年六月，中央文物供應社）。

註二：「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國父全集」(一)，頁八四。

註三：同註一。

十一月

二日(十二月六日) 清廷命戶部及各省將練兵、理財、育才三事，實力興辦。

先是，朝廷大臣於甲午戰後，主張變法者頗不乏人。本年九月，督辦鐵路總公司盛宣懷條陳自強大計，以築路與練兵、理財、育才，應相互為用。(註一) 本日，總署奏覆盛宣懷條陳自強大計。詔命戶部及各省將練兵(裁汰勇營、認真訓練新軍、畫一器械)，理財(招股興辦銀行、試行銀元)，育才(添設學堂、各省會議武備學堂、京師上海設大學堂)三事，實力舉辦。(註二)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一，頁三——十，(民國五十二年六月，文海出版社)。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三八八——三八九二。

十日(十二月十四日) 德使海靖向總署提出租借膠州灣五十年要求。

先是，德國自普法戰爭後，亟欲在東方中國海面取得一貿易與海軍根據地。會三國干涉還遼事起，德國即乘機要求租借海港，為儲煤屯船之用。並密遣人員測量中國沿海各口岸，乃發現膠州灣為最有價值之良港。本日，德國新任公使海靖(Heyking)以租借膠州灣向總署提出要求，租期五十年。翁文恭日記記其事曰：

「海靖先談海口泊舟，語含譏切，引歸遼為功，而以加稅為抵。……前使紳珂(Sehenck)以海口未成撤回，故

海靖注重在此。」(註一)

總署恐各國援例，堅持不許。十二月二十七日，海靖再提出同樣要求，仍爲總署所拒。

註一：「翁文恭日記」，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條。

十六日(十二月二十日) 清直隸總督王文韶奏請籌修旅順、大連砲臺。

直隸總督王文韶以旅順、大連爲北洋門戶，外人日有覬覦之心，請飭部先撥款三百萬兩以應急需。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奉旨會奏，略曰：

「現在旅、大礮臺既須修理，擬請先由天津海防支應局所存海軍鉅款內，撥結湘平銀十萬兩，交該大臣先爲扼要佈置。俟覈估確數奏到日，再由戶部如數籌撥。至所稱水陸要隘，安設大小快礮一節，請飭下該大臣，將所訂德廠各種快礮名式價目，詳細開報，並將訂購合同，分咨本衙門及戶工二部考覈。俟覈准後，應需經費，或先行酌撥，或分年歸款，再行奏明辦理。該大臣請先撥銀三百萬兩之處，此時應毋庸籌議。」(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九七，頁三六一——三六一二。

二十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清御史宋伯魯奏請鄉會試策題，宜注重時務。

御史宋伯魯奏請，鄉會試第三場，並各項考試策題，宜專問時務。清廷著禮部議奏，尋被議駁。

(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九七，頁三六一三。

二十八日(一月一日) 清御史孫賦謙奏請，武場考試變通舊制。

御史孫賦謙奏，請自明年始，武試諸場，皆停刀石，改習洋槍礮。清廷著兵部議奏，仍格不行。

(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九七，頁三六一五。

十二月

五日（一月七日） 清廷從四川總督鹿傳霖、駐藏大臣文海奏，收回藏邊瞻對，改設漢官。

清廷從四川總督鹿傳霖、駐藏大臣文海奏，收回瞻對，改設漢官，並通盤籌劃將朱窩、章谷兩土司一併改設漢官，進而經營巴塘、裏塘，展築電線以達前藏。原諭略曰：

「朝廷保護黃教二百餘年，瞻對距藏較遠，鞭長莫及，此次收回內屬，實爲藏中省却無數葛藤，免致瞻民與藏番交怨。……如達賴撤回番官，即可藉此轉圜，是在該督等之相機因應矣！至所請將章谷、朱窩兩土司一併改設漢官，將來次第經營，巴裏塘一帶地方，展築電線，界務亦易就範各節，並著該督等通盤籌劃，妥慎辦理。總之，鹿傳霖身膺疆寄，文海、訥欽統轄全藏，均屬責無旁貸，務須酌度情形，剛柔互用，保藏保川兩無窒礙，方爲不負委任，一切操縱機宜，朝廷不爲遙制也。」（註一）

按：此爲清廷經營川邊，改土歸流之始，亦爲西康設省之肇端。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九八，頁三六一九。

十日（一月十二日） 清山東巡撫李秉衡奏，中俄密約，中國受制太甚，請改議。

先是中俄密約消息傳出，各國紛紛揣測，上海字林西報曾刊登一偽造密約，計十二條，謬稱係本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與總署大臣簽訂者，即歐美人所稱之喀西尼條約（Cossini Convention），哄傳遐邇，人多信之。本日李秉衡之奏請改議，卽以此約爲根據。（已詳本年四月二十二日條附錄三）。

附錄：魯撫李秉衡奏中俄密約中國受制太甚請改議摺（註一）

山東巡撫李秉衡奏：爲中俄新約中國受制太甚，無以自立，謹瀝陳中外大勢，懇敕下王大臣熟權利害，酌中改訂。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二月五、十日

議，以維大局，而固邦基事：竊維遼東之役，俄人以其有德於我，索報甚奢，朝廷息事安人，政策寬大，自當酌予利益，以聯邦交。然區近閱九月所訂新約十二條，皆要挾過甚，許之則無以立國，謹總學全勢爲我皇上披瀝陳之。

俄人蠶食回部，拓土開疆，環中國萬餘里，經營水陸兩軍凡數十年，其囊括席捲之謀蓄志已久，以英法奧義諸國助土耳其遏之於黑海，而不能逞志於西也。於是欲改轍而東，又以東方無不凍之海口，未能遂其志也，於是改轍而修西伯利亞之鐵路，西伯利亞偏俄之東境，西起烏拉嶺，東距大洋海，北距北冰海，南抵外興安嶺，與黑龍江、索倫、喀爾喀、烏梁海諸蒙古，哈薩克回部，均相毗連，其舊有鐵路西自聖彼得堡俄京起，東至琿春海口止，而西伯利亞鐵路橫亘其中，縱橫一萬五千餘里，其枝路復由阿摩斯直達哈密，約計六七千里，聞均限五年告成。夫俄土廣而民貧，度支之絀視我爲甚，而不惜集款至一二萬萬之鉅修路至一二萬里之長，環我東西兩部而籠罩之，其久蓄制我之謀可知。我制而口且隨之，初未嘗謀制日也。遼東一役日人崛起，竟敢與我樹敵，俄遂援制我之術以先制日，然陽爲制日而陰實制我，觀今日所定新約，挾遼事居間之惠，迫之以勢其制我之謀已著矣。

新約第一條允彼之鐵路與中國邊界接連，自琿春築至吉林之恒春，向西北通吉林省城，另一支由西伯利亞築至黑龍江之艾琿，由艾琿向西南築至齊齊哈爾，又由齊齊哈爾至伯都訥，再向東南繞至吉林省城。其第三條中國擬由山海關接至奉天省，由奉天省接至吉林省，准俄國預借銀兩代中國由吉林築起，果爾則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皆爲彼所有矣。雖第二條吉林、黑龍江鐵路允三十年後由中國備價贖回，奉天鐵路允十年後由中國備價贖回，然此二十年中所借俄法英德之款已攤還至三十餘年之後，其能否償清尚不敢必，更從何處籌此鉅款？爲贖回數千里鐵路之資。日買回章程屆時再行商訂，彼必故昂其值以難我，藉遂其久假不歸之私，是俄人以之欺我，我即以之自欺，竊恐贖路之議未成，而制我之害已先見矣。又如第四條中國自山海關至奉天牛莊、開平、金州、旅順、大連灣等處，均須照俄國章程辦理，夫所謂照俄國章程者，照其車輪之廣狹耳！車輪廣狹既從兵制，則彼由俄京調兵轉餉電掣風馳不過七八日可抵山海關，且可由山海關逕達津沽以抵蘆溝橋，彼之來誠便易矣！其如我不能往何？而彼猶虞我之或能往也。於第五條又申之以准俄人派馬步兵隊自行保護之約，查萬國公法未有假道築路之事，更未有准鄰國派兵越境保護之事，如其有之必是彼之屬國，否則歸其保護不能自主之國耳！以堂堂中華大國而彼以此危我，以此辱我，

我詎不能據公法以爭之，況彼族立約，展轉繙譯，文意淆雜，偶一不慎，輒受其欺。如此條許以派兵保護，勢必節節分布，回環數千里，分似無多，合則盈千累萬。鐵路神速，咄嗟可集，設彼一旦與我爲難，其能阻之禦之乎？此害之彰明較著不待智者而知也。又如第九條，將山東膠州灣實與俄人建築營庫船塢，第十條遼東灣旅順口大連灣等處，如俄國別有兵事准其將海陸各軍屯駐，果爾則中國方自顧不暇，更何能爲他人擔當戰事，以樹衆矢之的。且膠州爲東海咽喉；遼東灣、旅順口、大連灣爲北門鎖鑰，彼據而不退，南北洋即梗塞而不通，縱彼第爲齟齬之爭，我能無滅號之懼乎？其他如第七條，准俄人在黑龍江吉林長白山等處開礦，在此十二條中尙非要害，然長白山爲我朝發祥之地，滂薄鬱積以奠我億萬年丕基，乃裂山穿石，陵阜變遷，焚鑿所加，山陵能無震動。我皇上宅中國之大，豐鎬舊治當必有深加護惜之思，亦不忍任他人縱其尋斧也。

臣常學十二條新約反覆觀之，無非彼享其利，我罹其害，假我吉林黑龍江之道接鐵路以運陸兵，而東三省非我有也。假我膠州旅順大連灣之地修船澳以泊水師，而黃海以北遼海以西非我有也。我有地而彼據之，我有礦而彼開之，因我之財，憑我之險，束縛我權力，煽惑我人民，環而蹙我土疆以制我之命，是不但脅我謀我，直從而藐我玩我矣。俄之所謂厚施於我者不過反我遼南數州縣之地耳！而我亦嘗以三千萬贖之於日矣，今復以修鐵路允俄鐵道附於我土地，有土地而後有鐵路，今我之土地而俄修之，是俄之有矣。夫失之於日者不過奉省數州縣，乃德俄之居間排解，不獨酬以奉天全省並吉林黑龍江兩省之地，而附益之，恐未有如此失計之甚者矣。且今之謀危我大局者又不止一俄也，卽以保遼一役言之，俄之外有法有德，酬德者不過擴充天津漢口租界，酬法者不過於潞河、滬江兩國輪船彼此通行，皆不及酬俄遠甚。萬一德、法援俄爲口實，以肆其無厭之求，其徇之乎？否乎？至不與於保遼之役，而與俄爲敵者，則又有英，夫英因陽暱我陰袒日，而實則嫉俄者也。中俄之合，英且以嫉俄者嫉我矣。萬一英以俄爲爭霸而逞其捷足之謀，其徇之乎？否乎？不徇其請，則立開兵釁，徇其請則無以立國，如之何其可也？且英德俄法互謀兼並，皆非有愛於我，而不爲我害也。特彼此牽制顧忌，欲觀釁而動耳！越南入於法，法之鐵路遂由西貢以達東京，今則已抵鎮南關矣。緬甸入於英，英之鐵路遂由印度以達新街，勢將直抵白馬關矣。再過數年，兩關之外胥有英法鐵路，寢寢乎環中國之藩籬無一非外人之軌轍。如以俄約爲先路之導，法必請由鎮南關接路至兩粵以通南

洋，英必請由白馬關接路至滇蜀以通西藏，當是時也其結英法以拒俄乎？仰結俄以拒英法乎？外國與中華交涉，往往先之以恫嚇。恫嚇不已，繼之以誑阻。誑阻不已，繼之以要挾。要挾不已，繼之以保護。保護不已，繼之以攘奪，至攘奪而亦受之，則兼併之志成，而中國無以自立矣。

伏願我皇上聖度如天，馭遠以信，既助我於危急之日，我自當酬其答報之情。方今軍事雖平，敵氛猶惡，既不肯別開邊釁，又何肯輕絕外援，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應爲天下臣民所共諒，然必我自可以立國，而後可厚結於人，不審慎於先機，必貽悔於後日。查西洋各國遣派使臣相與議定條約，均應由各國核准施行，是准駁之權仍操自皇上，此次所定新約係九月定議，距六箇月盡押互換之期尚遠，仰懇飭下總理軍務處暨總理衙門王大臣，會同俄國議約之員另行妥議，於假道修路借地屯兵各條，拒而不許，或以各國牽制爲解，或以公法扞格爲難，彼如不就範圍，再別予以通商優例。如酌訂稅則，擴充商務之類，但擇其害之較輕者予之。並懇聖謨獨斷，明降諭旨，將此各條爲公法所無萬難允許之故，反覆曉諭，推至誠以宣示，杜非分之干求，彼如震懾皇威，庶可挽回大局。說者謂俄人陰鷙非常，彼其蓄志已深，不予悉開邊釁，臣愚以爲予之則腹心之疾，將永不可除，而邊釁亦並不能緩。欲求紓急之方，宜務自強之計，東三省爲根本重地，物產豐饒，風氣剛勁，自古兵馬所萃，爲控制天下之資，應請敕下東三省將軍大臣，於練兵事宜加意講求，認真整頓，將才必須慎選，黜貪詐而拔廢誠；士卒宜予附循，禁剋扣而懲虛額。兼之集流亡以實邊圉，廣屯墾以助軍糈，務使田有餘糧，士懷鬥志，此備邊之切務，即禦侮之要圖。臣尤伏願我皇上聖敬日躋，神謨廣運，法祖宗之成憲，嚴察辯言亂政之非；定中外之大防，仍任用夏變夷之術。黜陟分明以馭羣吏，信賞必罰以勵戎行；節無益之費以裕餉源，求敢死之將以任邊事。君臣交警，上下一心，常矢臥薪嘗膽之忱，力求亡羊補牢之計。外洋之人各有耳目，果使生其敬畏，自不敢肆其欺陵，正不必斬新於鐵路礦產而後爲自強之計也。我能自強即失俄之援，俄亦無如我何？我不能自強俄即援我，我其如英法何？且俄不我援反而謀我，我又其如俄何？縱觀古今得失之林，橫覽中外成敗之迹，未聞有恃人爲援而可以自強者也。請以中國前事證之，韓魏附於秦，假秦以攻齊楚燕趙之道，齊楚燕趙未下，而韓魏先亡於秦。南宋合金以破遼，繼又合金以破金，遼金破而南宋之社稷亦隨之而墟，乞援以攻人者其害固如是也。再請以外洋近事證之，土俄交誼，英人糾德法奧意諸國合力助土以

拒俄，俄雖請和，而諸國於土之險塞名城以保護爲名，豆剖瓜分十之三四。近年英更以兵力箝制之，論者謂不至如印度之盡爲所併不止，乞援以自固者，其害又如是也。古今一轍，中外同揆，圖兼併人國者始以利餌，繼以威脅，終必制其死命而無能救樂，是皆往事之可爲殷鑒者矣。

查此約近尙秘密，外臣不應與聞，然已刊之申報，傳播遠近，閱者咸疾首蹙額，詬爲異聞，臣待罪疆圉，膠州是區守土，況東三省爲我朝龍興舊地，拱衛神京，根本既危，枝柯安附，剝牀有象，切近之災。臣竊隸奉天，先人耕隴之鄉，螻蟻私忱，亦孺結而不能自己。每一念及，輒中夜以興，繞室徬徨，罔知所措。用敢披肝瀝膽，冒死上陳，不勝悚惶屏營之至。謹奏。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四，頁一四至二〇。

十七日（一月十九日） 清廷准御史褚成博奏，命南北洋大臣籌款廣設紗廠，改造土貨，以爲倡導。

先是清御史褚成博以洋商製造土貨，括我利權，請籌抵制之法，事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籌議，恭親王奕訢等乃上奏曰：

「該御史奏請酌度土宜，設廠製造，官助商本，逐漸推廣一節，自足濬利源而杜外溢，應卽照行，並應照原奏所擬各章程辦理。惟各廠中如有弊混，必須附有股本者，始能入廠查詢。原奏所稱無論何人均准赴廠辨詰，恐滋紛擾。至督轄大吏原當竭力護持，若有人舉發弊端，而該管大吏不爲查理，或竟爲廻護，自應量予處分，以警玩泄。請飭各省將軍督撫，認真舉辦，其南北洋大臣能否各籌二三百萬兩，以爲倡導，並請飭下王文韶、劉坤一迅速辦理。

其辦法較褚成博原奏略有變更，本日詔從之。（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三九九，頁三六二五。

二十七日（一月二十九日） 德使海靖再向總署要求租借膠州灣海港。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十二月

六八二

本日，德國駐北京公使海靖，再向總署提出租借膠州灣要求，總署復拒之。（註二）海靖請求俄法二使之助，二使不許，乃報告本國政府，主張以兵力強佔之。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丁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條。

冬 孫先生文在倫敦獲交英國志士摩根（Muller）。

孫先生亡命奔走海外，即欲結納異邦志士能為中國革命助者。其致翟因斯教授書中嘗言：

「自清虜入寇，明社丘墟，中國文明，淪於野蠻，從來生民禍烈，未有若斯之亟也。中華有志之士，無不握腕椎心，此僕所以萬死一生之計，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而扶華夏於分崩之際也。獨恐志願宏奢，力有不逮耳！故久欲訪求貴國士大夫之諳敵邦文獻者，以資教益。遂欲羅致貴國賢才奇傑，以助宏圖。」（註一）

本年冬，孫先生獲交英國志士摩根，摩根為一軍事學家，對於孫先生革命之抱負，深為同情，並願助一臂之力，兩人遂深相結納。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摩根果應約束來，庚子惠州之役時，往來於港、粵間，頗多策劃。（註二）

註一：「國父全集」內，頁二〇九——二一〇。

註二：羅香林：「國父與歐美之友好」（中央文物供應社），頁一四一——一四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西曆一八九七年）

正月

正月至六月 孫先生文繼續留英，潛心於研究工作，創立民生主義，完成三民主義體系。

孫先生文自倫敦中國公使館脫險，至本年六月，時至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從事研究，復考查各國政治情形與社會現狀，接觸既久，體驗亦深，深覺僅靠政治革命猶不足以解決社會問題，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三民主義之思想體系，由是而奠定矣。孫先生自述其事曰：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予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註一）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引自「國父全集」第六集，雜著，頁八四。

初一日（二月二日）清廷興辦各省郵政。

先是，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二月七日，總理衙門議定推廣海關現設郵遞，與各國聯郵，並據赫德（Robert Hart）所擬之章程入奏，奏旨依議。乃欽派總稅務司赫德管理之，以稅務司葛顯禮（H. C. J. Kopsch）爲總辦，中國郵政乃正式成立。開辦之初，規模尙小，先就海關試辦之書信館改爲郵政局，各海關郵務辦事處改爲郵政總局，於是商人稱便。未幾，主事顧厚焜、優貢沈亦燁先後呈請，多設郵政分局於各省，以廣流通。本日，清廷准辦各省郵政，自是內地亦有郵政局之設。（註一）

附錄：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月一日

六八三

一、劉錦藻撰「郵政沿革概略」(註一)

近時世界各國，皆以郵政爲交通行政之一。我國僅有驛站，舊隸兵部，蓋爲軍政而設，日久沿襲，遂成交通行政之基礎。數百年來未嘗變通而推廣之，又祇限寄遞公文，民間往來信件，則惟信局是賴。當輪船、鐵路未興之時，地理遼遠，即欲規仿他人，勢亦有所不行。自外國習於交通便利之人，僑居吾土，既不能求官設之驛站，又不欲委民間之信局，於是各設機關，自爲交通之計。故通商而後，各國皆有外國信局，且紛紛效尤，各自爲政，侵我主權，莫之能阻。方該局之初設也，窒礙甚多，不能悉如其意，屢經更迭，而稅務司管理送信之事，於是乎起。考其大略，以咸豐十年各國派使駐京，條約所載，沿海無論何處使臣，皆可送文，專差與驛站差使，一律相待，嗣因辦理不便，改由總理衙門飭驛代寄，隨文遞送，無定期也。稅務司進京辦公，及各口稅司文件往來，亦由總署代寄。同治五年，始訂有由總稅務司處彙集各駐京使臣文件，按期轉交總署代寄之章，但該章惟限天津封河後照行，至開河即將各信由總稅務司自行飭差遞津，轉爲寄滬。外人駐京者，以信件不能自行由驛往來，遂於光緒五年，除京津送信之常差外，另設封河後由津至牛莊、煙臺、鎮江三路之寄信專差，此外仍照舊章。光緒十一年，天津封河後，駐京使臣並無從京發寄之信，祇有從鎮江由驛遞京之信，其駐京官民所發各信，俱由所設之三路專差分寄，所得力資，足償專差之費，且有餘焉。其時往來之信日增，是以總稅務司，並津、鎮、上海各稅務處，特派幫辦人員，管理送信之事，其餘通商各口，由該口稅司擇人兼辦，此同治五年至光緒十二年，總稅務司所辦寄遞外國文件之情形也。總稅務司兼辦郵遞，雖屬外國文件，然已爲我國暫爲兼辦郵政之始基。光緒二年，英人赫德總司稅務，請設送信官局，中國郵政於是發端。總署函商北洋大臣，四年得復，擬設京城、天津、煙臺、牛莊、上海五處，略仿泰西郵政，交赫德管理。九江、鎮江兩關道亦稟請於通商口岸設局。嗣總署因各國紛在上海設立郵局，慮占國民生計，九年，值德使巴蘭德來請派員赴會，十一年，據南洋大臣咨稱，州同李圭條陳郵政利害，並寧海關稅司葛顯禮稱，香港英監督願將上海英局，改歸華關自辦，爰飭江海關道總稅務司籌議，咨南北洋大臣查核。十六年，札行赫德，以所擬辦法，既於民局無損，即就通商各口，推廣辦理，俟有規模，再行請旨，此各稅關試辦郵遞之權與也。維時未經奉諭，不得爲正辦之郵政官局，而各口所設之外國信局，歷有年所，欲保主權，不能不設法抵制，以期統一。

。故寧海、江海各關道與總署，每謂稅關郵局，未經奏定，外人得以藉口；十八年，赫德亦以創辦艱難，若再不奏請設立郵政官局，以推廣為抵制，恐將另生枝節，函致總署；十九年，總署又接南北洋大臣咨，據江海關道聶緝縻稟稱：上海英美工部局，擬增設各口信局，異日中國再議推廣，必更維艱。乃飭赫德詳加討論，是否確於小民生計無礙。二十一年，南洋大臣片奏設立郵政，請飭議章程，奉旨交總理衙門籌議。二十二年，議由海關見設郵遞推廣，並與各國聯會，據赫德所遞四項章程四十四條入奏，奉硃批依議，於是始得明文開辦，交通機關遂有郵政官局及原有之驛站，與民間之信局，鼎峙而立矣。二十四年，總署以顧厚焜等呈請，復飭總稅務司籌議，覆稱推廣郵政，請剋期六個月，先於各口已設郵局之附近地方，密為布置，以達內地，並就鐵路設站、電報設局處，均添郵政官局，至酌量裁撤驛站，歸併辦法，除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新疆、西北各省郵政，尚無法寄遞外，其餘直省公文，可由郵局遞送。二十五年，設總局於京師，置分局於各處。二十六年，復設分局於山東、河南，由是逐漸推行，而內地亦有郵政局之設矣。惟驛站仍隸陸軍部，而民局則用聯絡之法，在口岸之官局掛號者，允為代遞信包，無庸納費，至今仍之，蓋已消納於郵政中矣。開辦之始，職務由總稅務司兼攝，故隸總理衙門；又改外務部，因而改隸；嗣設稅務處，又隸稅務大臣。三十二年，釐定官制，創立郵傳部，管轄機關基此矣。

二、赫德與中國郵政（註三）

我國郵政，始於海關試辦，嗣由海關兼辦，至宣統三年五月方與海關分離。在試辦與兼辦期間，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親營草創之勞，而於郵政之能成為一全國性之偉大國家事業，尤曾多方努力，不斷促成，故於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奉旨設立國家郵政時，即由其兼任總郵政司（Inspector General of Posts），彼誠可稱為我國現代郵政之首創者。如寫郵人傳記，實應首及斯人。惟以所獲資料無多，爰先根據其自呈之節略與郵政初期之諭令，再參酌史籍，綴成斯篇，以發其端。倘能稍闡其筆路藍縷，艱辛締結之精神於萬一，使我後人，知所效法，則筆者之願遂矣。

一、生平事略

赫德，英人，其原名為 Robert Hart，亦譯哈脫，一八三五年生於愛爾蘭。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來中國，初任寧波英領事署副翻譯官，一八五八年調升廣州英領事署翻譯官，一八五九年六月告退，改任廣州海關副稅務司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月一日

六八六

。此正兩廣總督勞崇光及關督恆祺商請總稅務司李泰國 (Horatio Nelson Lay) 改組廣州海關之時也。

一八六一年 (咸豐十一年) 四月，李泰國返英，赫德與上海稅務司費士來 (M. M. Fitzroy) 同攝總稅務司職，初至北京，一八六三 (同治二年)，李泰國回任，赫德奉派為江海關稅務司，管理長江及寧波各口事宜。十一月，李泰國開缺，即由赫德繼任總稅務司，駐上海，次年復奉令仍駐北京。一八八五年 (光緒十一年)，英政府派其為駐北京使臣，曾請辭總稅務司職，未獲准，即仍繼續服務，以力漸感不支，乃請假回英療養，以是年四月二十日將總稅務司職務全部移交斐式楷 (Robert E. Breton)，二十一日離北京返英。計自入廣州海關起至是凡五十年。一九一一年 (宣統三年) 九月二十日，病逝英國。

赫德精通華語，嫻習華禮，就總稅務司職後，至北京謁親王於總理衙門，言談歡洽。此實為赫德在華建樹事功之一有利條件。其於海關，實心整頓，每年均有詳細報告，用行政，咸立定制，為我國新興事業樹立良好楷模，用能泯除督撫之反對。其建議總理衙門提撥船鈔，設置浮橋，號船，塔表，望樓，以利航行。尤予我江海水運以莫大裨益。及奉命兼辦郵政，即準海關制度，利用海關機構，逐漸推廣，以及全國各地，堅固而廣泛之基礎，於以建立。

然此二者實不可以盡赫德之事功。彼於清咸、同、光朝之內政外交，猶多所贊襄。一八五九年 (咸豐九年) 六月，英使卜魯士偕法使率兵艦北上換約時，彼曾具書勸阻，足見其早在彼時，即已對我國問題有深刻認識。一八六二年 (同治元年)，我國創設同文館於北京，總理衙門交赫德辦理。一八六三年，常勝軍提督戈登以李鴻章殺蘇州太平軍降將，心懷恨意，其部曲且思抗李，赫德奉令從中調和。次年復為常勝軍事，親赴常州，候常勝軍助淮軍攻下常州，乃幫同料理常勝軍遣散事宜。一八六六年 (同治五年)，赫德請假六個月回英，事前曾將所著「旁觀論」呈於總理衙門，切論內外情勢，建議興辦新政，派遣駐外使節。同時並勸恭親王派同文館學生隨之遊歷西方諸國，以長見聞，奏訴許之。明年，美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辭職回國，赫德復勸奏許遣之聘於各國，即經奏訴奏准派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此二事開我國派人遊歷及聘問各國之先河。一八七三年 (同治十二年)，奧京維也那開博覽會，奧政府邀我參加，總理衙門即令赫德備辦物品，並派稅務司參加，自是習以為常。迄一九〇五年 (光

緒三十一年）之比國博覽會，前後凡經大會七次，小會二十次，均由赫德辦理。一九〇六年方明定改歸農工商部專辦。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英公使威妥瑪因議案不協，於六月間忿然離北京南下，意欲報告英政府用兵。赫德初則竭力調解，並建議總理衙門遣使赴英磋商，至是復自請赴滬勸說，威妥瑪始允開會於烟臺。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崇厚至俄議伊犁案還，朝野主戰，赫德深患我國孤注一擲，乃電令戈登來華，向總理衙門詳言不可向俄啓釁之理。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安南交涉，赫德亦受命辦理和議。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爲西藏事，赫德復奉令派稅務司赫政（James Hart）自海道入印，協助駐藏大臣升泰從事交涉。此外，清廷對外借款，亦多委赫德主持，或居間洽商。義和團亂後，各國議賠款數目，赫德始終堅持我方之支付或繳納能力，萬不能超過銀幣三萬萬兩。由此足見赫德事功之廣及爲我謀國之忠。

最後，尙須一述赫德在我國所受榮譽，計同治三年，曾由清廷賞加按察使銜，八年賞加布政使銜，光緒七年賞加頭品頂戴，十一年賞戴花翎，並雙龍二等第一寶星，十五年賞加三代正一品封典，二十七年賞加太子少保銜，三十四年請假返英時賞加尙書銜。宣統三年，其逝世之訊奏報清廷，復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換其子赫承先（Herbert Hart）雙龍二等第三寶星。

二、最先建議我國創設現代郵政

自海通以還，我國郵權受侵，實始於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英國駐廣州商務監督律勞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之組織郵局，此可謂爲客郵之濫觴。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香港割讓英國，香港總督樸鼎查（Henry Pottinger）卽於是年通知開辦郵局於香港，是我國領土，一旦讓人，卽有新式郵政之設。反觀國人之建議設立現代郵政者，竟在香港設立郵局之後四十餘年，而離郵權被侵之始幾五十年，且仍不克正式設立，我國當時朝野之麻木不仁，於此可見。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候選州同李圭始照香港郵政條規，譯擬郵政局寄信條規一百五十三條，呈諸浙江寧紹道臺薛福成，經薛氏商諸寧海關稅務司葛顯禮，葛顯禮詳細申復，薛氏乃據以呈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荃轉咨總理衙門。此事於我國正式設立郵政，影響頗大，故赫德於奉旨正式開辦郵政後所發之郵務通諭內，對此二人曾表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月一日

六八八

示深切之謝意。至我國地方官長之毅然自動辦理郵政者，獨臺灣總督劉銘傳一人而已。彼於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改全臺驛站爲郵站，雖非盡依西法，然實具創見，故淡水稅務幫辦於呈報時譽「具有郵政之真義」，赫德亦通諭各關知曉。

然赫德之建議我國創立現代郵政，則早於李圭二十四年，實爲作此建議之第一人。赫德有言曰：「早在一八六一年六月，余初至北京之時，即已建議仿照西法，創立國家郵政。」一九〇四年之郵政事務報告亦有類似之語，一八六一爲咸豐十一年，赫德攝總稅務司職，初至北京，上已述及。總理衙門奏請正式設立郵政摺內謂：「臣等查光緒二年間，赫德因議演案，請設送信官局，爲郵政發端之始」，如僅就「請設」而言，則赫德早已於咸豐十一年提出，是總理衙門奏語，實與事實不符。

惟赫德於一八六一年所作建議之內容如何，係書面，抑係口頭，現均無可考，可知者，其於一八六六年請假返英前呈送總理衙門之「旁觀論」一書中，曾言及外國有火車、輪船、工廠機器、郵局、電報，……中國宜早興辦，是其興辦郵政之建議，一八六六年前即已見諸著作，其謂曾於一八六一年建議創立國家郵政，當非虛語。且其「旁觀論」，僅謂於一八六六年返英前呈送，不知究著於何年？或即著於一八六一年，亦未可料。惜今原書未見，倘有熱心之士，能搜致之以寄贈於郵政當局，俾可陳列於將來擬設之郵政博物館中，作爲永久紀念，則誠爲無上美舉。蓋是書初雖未爲總理衙門所重視，嗣終由清廷發交湖廣總督官文及曾國藩等大吏籌議，不特爲郵政重要史料，亦爲我國近代史重要資料也。

三、試辦郵政時所持之原則

海關試辦郵政，以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發其端。是年總理衙門始規定於天津封凍後，由總稅務司署彙集各國駐京大臣文件，按定期交總理衙門代寄，至開凍後即由總稅務司署自行飭差遞津轉滬。在是以前，因按中英天津條約，我國有保護各國使臣專差之責，各國使臣文件以及各口稅務司與總稅務司往來文件，均由總理衙門代寄，天津北京用郵差遞運，封凍後另組北京、鎮江間馬差郵班遞運。至是交總稅務司署辦理，總稅務司署即首先於上海鎮江海關，及北京總署內設郵務辦事處（Postal Department）。次年三月，總署郵務辦事處即公佈郵件封發時刻表

。一八六八年一月，並准天津外僑利用各季郵遞便利。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此項試辦郵務方予擴充，他處海關亦設郵務辦事處，並准收遞普通人民寄交各通商口岸之信件。至一八七八年，辦理郵務之海關約為北京、天津、烟台、濟南、牛莊、山海關、上海、鎮江等處。

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十二月，赫德首次發生純屬郵務之通諭，派天津稅務司德理琳為郵政司（Commissioner of Postal Matters），整理各埠郵務辦事處，以天津為總匯機關，海關試辦郵務工作，至是逐漸具體，郵政專帳，亦於是年開始設立。一八八二年，赫德頒定海關郵局（Custom Post Office）規則五條，明定溫州及其以北各海關郵務辦事處，一律設置信箱，接收公衆信件，並出售郵票。溫州以南則暫緩辦理。此項辦法，沿用至奉旨正式由海關兼辦時止，無甚變更。茲將赫德於此期內所抱持之原則與期望，試述如次：

（一）以不增開支，不礙稅務工作為原則：總理衙門規定總稅務司署代寄各國使臣文件，原僅為一時之便利，初無意於由此建立國家郵政之基礎，故既未指定的款，亦未賦以何項權力。蓋當時我國人士，夷夏之別尚嚴，允許各國使臣駐京，亦為屈於英法聯軍之威力，與條約之約束，使領郵件，改歸外人管理之海關辦理，未嘗不含避事之意。惟此赫德，既早建議創立現代郵政於前，一旦受命代轉領郵件，或當另有會意，即由此建立現代郵政之基礎是也。惟當時官廳有驛站可資利用，人民僅對民信局具有信仰，外人則均於各通商口岸紛設郵局，是對海關所辦之郵遞事務，均無需要，海關郵務，欲求發展，實屬匪易。故赫德於初次決定擴展海關郵務時，即通諭籲請所屬人員，一方面應對郵務工作予以熱切之注意，並盡其力之所及以促進之；一方面必須不損稅收工作之效率，及不增現有開支。其要求雖不免過苛，然捨此又焉有其他成功之路？

（二）以工作表現為博取信譽鞏固基礎之手段：赫德於決定擴展試辦之郵務後，即著重工作表現，以博取信譽。其法為第一、使郵件穩妥可靠，不受侵害。上述海關郵局規則五條，規定信箱必須裝置保險鎖鑰，指定專人保管，收寄之郵件，除經辦人外，不得接近，經辦人對於經辦信件所獲悉之情形，如有洩漏，即予開革，其於處理郵件之慎重，可以概見。第二、收遞郵件之時間固定，並迅速處理。第三、於固定資費之外，嚴禁額外需索，此為打擊民局陋習之有力辦法。試辦期中之信件。於投遞前加蓋「信力已付勿索勿給」

之歡記，即在力矯此弊。徵記詞句，今日視之，頗覺有趣。

(三)以努力促成正式開辦郵政爲爭取最後成功之途徑：當赫德於一八七六年協助李鴻章商訂中英烟臺條約時，即經以總理衙門之意通知英使威妥瑪。擬將郵政列入該約範圍之內，以爲創辦全國郵政之張本，惟結果未得如願。由此足見當時環境，對於正式開辦郵政，仍有困難，而欲藉條約以促成之。其終未成功者，以意推之，或係威妥瑪故執異議。因斯時各國客郵正於無條約根據下自由擴展，而約成之前，威妥瑪實思用兵，故態度強橫，赫德則勸我巡派使臣赴英交涉，威妥瑪意不得逞，因是有赫德在烟臺時不爲威妥瑪所禮之說。此事雖失敗，是年總理衙門交總稅務司單內仍有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設立送信官局之議，總理衙門並函南北洋大臣李鴻章。後二年，李鴻章函復擬開設北京、天津、烟臺、牛莊、上海五處，略仿泰西郵政辦法，交赫德管理。嗣即由赫德擬定試辦章程。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赫德復函總理衙門，謂數年來郵政創辦艱難，如再不奏請創設郵政官局，以抵制外人設局，恐生枝節。同時並再擬郵政章程十三條。一八九五年六月至十二月間，總理衙門數與赫德面商，正式創辦郵政之時機方漸成熟。赫德乃擬訂開辦章程四項，計四十四條，翌年（光緒二十二年）即據此奏定，試辦之期始告結束，惟離試辦之初已三十年矣。人生幾何？而赫德於此，迄不少餒，且須更進一步擔任正式兼辦郵政之責，其精神之偉大與意志之堅定，誠足嘆服。民國十年郵政事務總論引其言曰：「如吾人能堅定意志，謀定後動，決可獲勝而無憂。」可謂夫子自道矣！

四、正式兼辦郵政後所採之政策

創辦國家郵政一事，既經正式奏定，即入於海關正式兼辦郵政之時期。赫德於接奉御旨之後，一則曰：「此事雖經皇帝最後核准，惟當其始也仍須極度穩健，並宜溫和推行，緩緩發展；倘於策劃進行步驟之時，能不因予現有民局組織以不必要之干涉，致損素此者之生計，及予官方暨政府以煩擾與困難，從而避免磨擦，則將來必有一日可見國家郵政之廣泛推行，且深爲人所贊許。國人既可於其發展中獲致日常之便利，政府亦可得一有用之僕役，而在此人衆而勤勉與愛好文學之國家，更將得一永不竭蹶之財源也。」再則曰：「過去種種及令人懊喪之不定局面今均

已矣，縱吾人之前途仍充滿各種困難，惟時勢與潮流均利於我，我輩毋庸畏懼失敗與不幸，只須以忍耐爲後盾，以審慎爲指針，而期求鞏固與發展。」三則曰：「倘吾人欲免不幸，獲致成功，或僅圖生存，則必須緩進。」由此足見穩健、緩進，以免引起磨擦，雖可減少阻力，乃赫德於正式兼辦郵政之初所採之一般政策。而一光明宏偉之郵政遠景，實爲赫德所預見。上項政策之運用，則略如次述：

(一)民局：當時反對創辦新式郵政之理由，厥爲足以影響人民生計，蓋鄙俗之見，多以爲從事民信局業務之人民將因郵政之創辦而失業。故正式創辦之初，官方意見，實欲民信局繼續營業。赫德於此，亦極持異，初僅規定通商口岸之民局須赴郵局登記，且非強迫，內地者非特不予管制，且視之爲代辦機構。因初創之時，海關所辦郵局，僅限少數通商口岸及交通便利之處，至於內地，實非利用民局不可。惟有一措施，最關重要，即規定航行我國各口岸之輪船，除我國郵局及該輪船所屬國郵局交運之郵件外，不得帶運其他機關之郵件，而以減半收取該輪船應繳之買關費爲優待條件。如此各通商口岸之民局活動遂受莫大限制，然民局之終被郵政吸收者，雖於以後亦略採政治壓力，但亦爲郵政不斷發展與改良之結果，致使民局歸於自然淘汰也。

(二)客郵：赫德所定對待客郵之辦法，尤極盡含忍之能事。其初，寄國外之信件，已照聯郵資費貼我國郵票者，我國郵政於轉寄時再購貼外國郵票；而外國寄來信件，則由我國郵政免費投遞，惟轉由民局投遞者另准民局收費，是我國郵政徒盡義務而無權利。嗣自一九〇〇年起次第與各國郵政簽訂郵務協定，我國郵票貼於寄外國郵件之上方始有效。惟外國郵局在我國境內所收之郵件，轉由我國郵局投遞者，仍貼該外國郵局之郵票，實屬不平。此種不公平情形，至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與法國修訂郵務協定時方始取消，可謂含忍過甚，惟實亦時勢使然。

(三)驛站：至於驛站，原屬弊竇叢生之官營事業，初無與新式郵政角逐之能力。惟當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都察院優貢沈兆禕呈請推廣郵政，裁撤驛站時，赫德奉令議覆，仍主先將國家一切公文正本交郵局寄遞，其副本則照舊交驛站寄遞，俟試辦一年，再視試辦成績定裁留驛站之法，其態度之慎重可謂極矣。此蓋由於當時郵政基礎，尚未鞏固，國內交通亦頗不便，萬一因延誤公文之故，招致官廳責難，反將於振興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月一日

六九二

之郵政有害，故寧慎重將事之爲愈也。

五、內外反響與自我檢討

由上述穩健謹慎之政策觀之，或以爲一切當可順利推行，然事實上郵政初創之時，外界之惡劣反響，亦仍不免。御史徐道焜有各海關附設郵政局所議章程，須防流弊之奏；兩廣總督譚鍾麟有郵政局瑣碎煩苛，衆怨沸騰，無裨餉需，徒傷政體之奏，並請即將郵政局一體裁撤；閩浙總督邊寶泉更電奏郵政嚴搜重罰，尤爲紛擾，亦有可否奏撤之語。大約此種責難，均係對郵局之檢查私運郵件，科以罰金而起，雖經總理衙門駁斥，亦足見創辦事業之困難。赫德爲此，曾於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四月頒發通諭，禁止搜查人民身體及其行囊，隨身所帶信件，亦不得沒收或處以罰金，以免滋擾，而招民怨。由此亦可推知創辦之初，執行人員對私運郵件之搜查，或不免過於苛細。至於民局方面之反抗運動，更不言而喻。如原定自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起，民局總包改按每磅三角收費，以後逐年遞增一角，至每磅九角爲止，但迄未能實施，至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起竟改爲免費，即知民局之阻力所予郵政之影響爲如何矣。

此外，尚有一堪注目之事，即內部國籍人員所發生之不安現象是也。此事可於一九〇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所發之通諭中窺其端倪。是項通諭對郵政制度曾作詳盡而坦白之檢討。首將郵政喻爲一大建築，謂其基礎已廣泛建立，惟有多處係由趕工而成，工作人員亦非素經訓練者，故於其構造是否適當？材料是否合宜？均須及時檢討，以免將來發生災害。次論郵政創辦，係與海關同仿西法，初以爲二者可以同樣及平行發展。及今由於經驗所得，方知二者之工作與機構均有基本之差異，因海關工作之對象爲少數口岸之中外商人，而郵政之對象則爲廣大之內地民衆，自應儘量向內地發展，並符合中國之需要，需用英語，不如海關之多，故宜多用中國人員。再次，則提出（一）改善國籍人員之任用甄選，（二）組織，及（三）地位等三項辦法，以提高國籍人員之待遇。要而言之，即該通諭坦白承認過去國籍人員待遇過低，及中華郵政今後廣泛發展之責任應付託於多數國籍人員之手。而其有此覺悟者，則由於當時國籍洋文供事三四五人中有五十四人離局，漢文供事七九五人有一九九人離局之事實以啓之也。

此項諭令，爲赫德請假前最末一件，雖非赫德親自署名，但經書明係奉令簽發。嗣竟於是年三月續令暫緩實施

，時赫德已初步移交，而僅留候諮詢；及至八月另訂辦法，並將該件取消時，則赫德早已返英。再就被撤銷之諭令言，此亦爲僅有之件。足證此爲赫德離職前對其手創之郵政制度所作徹底坦率檢討之結果。茲後國籍人員之待遇與地位始逐漸改善，是此項諭令所定之辦法雖未實行，而其影響所及固非淺鮮也。

六、結 論

本文於赫德之武功，不過略示梗概，觀其由海關而郵政而外交而教育，範圍可謂廣矣；清末之稅關行政，賴其整頓，郵政事業，資以建立，而促同文館之創辦，開我國遣使聘問之先河，以及斡旋外交，參贊內政，其功業亦可謂崇矣。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赫德服務我國，垂五十年，壽逾古稀，方克歸休，其勤可知；察其事跡，其志亦可稱忠純無瑕。志忠業勤，而復具遠略，有識度，於郵政之創辦，容忍審慎，更可謂深明「慎厥終，惟其始」之理，用能固其根基，垂諸久遠。以此諸端，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而當帝國主義擴張之際，一介客卿，竟能如斯，實屬難能而可貴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又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其赫德之謂歟。

註一：張樑任：「中國郵政」（上）（商務），頁十九——二十。

註二：劉錦藻：「皇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七七，郵傳十八。

註三：原載民國三十七年一月「現代郵政」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三日（二月四日）李鴻章與英使竇納樂重訂「滇緬界務商務續議附款」十九款，及西江通商專條。

先是，英國於道光初年併吞印度後，垂涎緬甸，時與緬甸衝突。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六月二十三日，清廷與英國訂立中英緬甸條約五款，規定每屆十年，緬甸進貢中國；允英握有緬甸政權；中英會勘中緬邊界，另立通商專約。從此緬甸淪爲英屬，英國迭次派員前往滇緬交界之地，察勘地勢，總理衙門及邊疆大臣皆不知其事。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總署據駐英公使薛福成報告，始知其事，乃着薛

福成與英政府交涉。直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正月二十四日，薛福成始與英國管理外部大臣勞德伯簽訂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

本日，李鴻章與英使寶納樂訂立滇緬界務商務續議附款十九條及西江通商專條一款，工隆全地劃歸英國，開雲南騰越、思茅，廣西梧州，及廣東三水城、江根墟爲通商口岸，連接滇緬鐵路。錄其全文如下：

一、滇緬條約附款

大清國大英國國家爲續議附款事：今因英國不再索問中國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與法國訂立條約所讓江洪界內之地，致與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與英國訂立之中緬條約相違，彼此和商於原訂條約內或增或改，擬立附款如左：

第一條 今議定兩國邊界自北緯一十五度三十五分起，由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京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起，隨山脊而行，向西南至瓦崙山尖（即高良），由此即至薩伯坪，自薩伯坪起，其線順分水山向西而行，稍向南過式脫崙坪，到納門格坪，其線由此分西衣岡、木薩兩處，而盡直至大巴江，然須俟就近查考後再定。自大巴江至南太白江，自南太白江至巴克乃江，自此順巴克乃江到該江源頭大郎坪相近處，由此順大郎坪嶺至畚辣希岡，自畚辣希岡線順西南而行至列塞江，順列塞江至穆雷江分克同村，及列塞村，於兩處線自中畫，自此順穆雷江至該江與既陽江相會處，再順既陽江至愛路坪順南奔江（即紅蚌河）至太平江。

第二條 自太平江及南奔江相會處，此線順太平江到瓦蘭嶺相近處，由此順瓦蘭嶺及瓦蘭江至南碗河，順南碗河至該河與瑞麗江（即龍川江）相會處，南碗河之南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西瀕南莫江之支河及蠻秀嶺之壘周尖高山，從此尖高山邊嶺東北至瑞麗江，此段地英國認爲中國之地，惟是地乃中國永租與英國管轄，其地之權咸歸英國，中國不用過問，其每年租價若干嗣後再議。

第三條 自南碗河瑞麗江相會處線，順今之新威部落北界至薩爾溫江（即潞江），將瑞麗江合流之處及萬定孟

戈孟憂等處，將及全地劃歸中國。

自瑞麗江於南寧相近轉北之處（即瑞麗江與南陽江相會處）線，順南陽江上行至該江源頭孟哥山，約在北緯二十四度七分東經九十八度十五分，自此順叢樹山嶺至潞江與南邁江相會處，由此順潞江上行直到科干西北界，順接科干東界直抵工隆界上，將工隆全地劃歸英國，由此循英國所屬之瓊麥與中國所屬之孟定分界處之江而行，仍隨此兩地土人所熟識之界線至界線離此江登山處，以薩爾溫江及湄江（即瀾滄江）之支江水分流處爲界線，約自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北京西經十七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分，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將耿馬、猛董、猛角歸中國，在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處邊界線，即上一高山嶺，此山名公明山，循山嶺向南而行，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北京西經十七度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以鎮邊廳地方歸中國，然後其線由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即順南卡江而行約過緯度十分之路以孟連歸中國，孟崙歸英國，然後循孟連與康東之界線，此界線亦皆土人所熟悉，由南卡江分開至北緯二十二度稍北處，即離開南卡江向東略南循山脊而行至南壘江，約在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北京西經十六度三十分，由此循康東及江洪之界線，此界線大半係順南壘江而行，惟除屬洪江一小帶之地係在南壘江之西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稍南界線行至江場邊界後，約在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七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十二分，北京西經十六度十八分，即循江場與江洪之界線而至湄江。

第四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五條 今彼此言明日後中國未經先與英國議定不能將現在仍歸中國在湄江左岸之江洪土地，以及孟連與所有在湄江右岸之江洪土地或全地或片土讓與他國。

第六條 今彼此議定將原約第六條擬改如左：現在所定邊界各線應由兩國所派勘界官比較劃定，以免地方官民爭論，如查得無論何處有未甚妥協者，應行更正，兩國勘界官應於此附款畫押後十二箇月之內在兩國

屆時所定之地相會，勘界官自首次相會之日起，應限定不出三年之外將兩國界線一律勘定，如確守附款所定界線必有驗線之鄉村部落地段，勘界官員可量爲遷改互易，倘勘界官有不能商妥之處，應將未妥情形各報明本國國家核辦。

第七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八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九條 凡貨由緬甸入中國，或由中國赴緬甸過邊界之處，按照原約准其由蠻允蓋西兩路行走，茲彼此言定：如將來兩國勘界官員查明另闢他路與貿遷有益，所有查明之路，皆准照原約所載一律開通行走。

第十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一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二條 一英國欲令兩國邊界商務興旺，並使零南及約內中國新得各地之礦務一律興旺，答允中國運貨及連礦產之船隻由中國來或往中國去，任意在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行走，英國待中國之船如稅鈔及一切事例，均與待英國船一律，中國答允將來盡量在雲南修造鐵路與貿易有無裨益，如果修建即允與緬甸鐵路相接。

第十三條 按照原約中國可派領事官一員駐劄緬甸仰光，英國可派領事官一員駐劄蠻允。中國領事官在緬甸，英國領事官在中國，彼此各享權利應與相待最優之國領事官所享權利相同。如將來中緬商務興旺，兩國尚須添設領事官，應由兩國互相商准派設，其領事官駐紮滇緬之地，須視貿易爲定。今言明准將駐劄蠻允之領事官改駐，或騰越或順寧府，一任英國之便擇定一處。並准在思茅設立英國領事官駐劄，所有英國人民及英國所保護之人民，准在以上各處居住貿易，與在中國通商各口無異。英國領事官在以上各處駐劄，與中國官員會晤文移及往來酬應，亦與通商各口領事官無異。

第十四條 原約內載華民欲赴緬甸，可向華官請英國駐劄蠻允之領事官給發護照云云，今既言明將駐劄蠻允之領事官改駐或騰越或順寧，自應將此條內駐劄蠻允之領事官字樣改爲駐劄或騰越或順寧領事官。

第十五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六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七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八條 與原約無所增改。

第十九條 (原約後加增) 通商章程如未能議妥，如何修改則仍應遵守原約所載之章。

二、西江通商專條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經總理衙門照會大英署理欽差大臣，以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衙門具奏西江口岸通商一摺，奉旨知道了，欽此。相應恭錄諭旨照會查照等因，今彼此言明將廣西梧州府廣東三水縣城江根墟開為通商口岸，作為領事官駐劄處所，輪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廣州至三水梧州，往來由海關各約定一路，先期示知，並將江門、甘竹灘、肇慶府，及德慶州城外四處，同日開為停泊上下客商貨物之口，按照長江停泊口岸章程一律辦理。

現在議定以上所定中緬條約附款及專條各節，應於畫押後四箇月之內開辦施行，其批准文據應在中國京城速行互換，為此兩國大臣將此附款專條畫押蓋印以昭信守。

此附款專條在中國京城繕立漢文三分英文三分共六分。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二月初四日。(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頁三一—八。

十二日(二月十三日) 清恭親王奕訢奏請於膠州灣海口建設船塢駐兵，清廷從之。

本日，恭親王奕訢等以山東膠州海口形勢緊要，奏請從速建設船塢，屯駐兵輪，以資扼守，而杜絕外人覬覦。原奏曰：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訢等奏：為山東膠州海口形勢緊要，現擬建設船塢，屯紮兵輪，以資扼守，而杜絕外人覬覦。竊查山東膠州海口，內灣寬深，可容巨艦，外口窄束，易於防守，口門左右依山為險，敵兵不能抄襲，地氣和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月十八日

六九八

暖，嚴冬不凍，實爲海軍天然船澳。是以光緒二十一年十月間，俄國兵船請借該處停泊守凍，欽奉諭旨飭令出使大使許景澄與俄外部訂明暫泊之說，旋屆春融，久已駛回。而德國外部大臣馬沙爾欲向中國借一海口，以爲東方屯泊兵船之地，德國駐京使臣紳珂，海靖亦迭來臣衙門商請，無論何處海島，並未指索。上年十二月間，海靖竟指明膠州澳，懇請借讓，雖經臣等迭次堅拒，而該國借地之謀始終未已，難保日後不更來嘗試。臣等會同商酌，非有先發制人之策，不足以杜外人冀幸之心。上年八月間，臣等奏明訂購德國穹甲快船三艘、英廠鐵甲快船二艘、德廠雷艇三艘，均已開工製造，計期今冬明春可以陸續來華，若即在膠州澳停泊，實足以固吾圉而折敵謀。惟船塢礮台一切工程必須先期經理，方臻妥協，已由臣衙門電商王文韶、李秉衡妥爲籌辦相應，請旨飭下北洋大臣王文韶、山東巡撫李秉衡，迅派大員前往膠州查明該處海口情形，應如何妥爲布置之處，繪具圖說，咨明臣衙門核辦，應需經費亦即確實估計，由臣等商之戶部，陸續籌撥。」（註一）

旋奉旨依議。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頁八——九。

十八日（二月十九日） 德皇威廉二世決定使用武力侵占膠州灣。

德國早欲在中國沿海攫取一島嶼或港灣，作爲遠東商務及軍事之根據地。中日戰爭既起，德皇威廉二世主張乘機佔領臺灣。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十月二十日）（本文說明德國強佔膠州灣背景，一概改用西曆，而於其下括弧內附以中曆。）德國首相何倫洛熙（Prince Von Hohenlohe）接德皇電旨曰：「

英國不久將不與其他列強取得諒解佔據上海及其他要害地點，後一點可由費利曼特爾海軍提督（Freemantle）統領之艦隊集中及準備由印度運輸軍隊證明。此一事件無疑使俄法兩國同樣佔據中國重要地點。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吾人不能因此而受損失，或被入驚駭。吾人在亞洲亦需要一個據點，因爲德國之商業每年達四億馬克。在這方面我提起臺灣，該地在六十年代已爲歐倫堡伯爵（Count Zu Eulenburg）率領之使節被認爲適宜，並推薦於當時之普魯士政府；因此建議密速與日本達成協議，並訓令德國艦隊迅速準備，因爲余已秘密發現法國已想奪取臺灣。」

(註一)

何倫洛熙將德皇意電告外交大臣馬沙爾。馬氏則認為佔領臺灣困難甚多，而欲乘機取得中國他項利權。同日馬氏覆電何倫洛熙曰：

「英國強大艦隊在中國海面出現，其主要理由是在英國在那方面有很多及重要之利益，關於準備由印度運兵至中國事，此間尚無所知。鑒於印度現在局勢，此種意念殊不可能。余不相信行將派兵至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之法國欲準備奪取臺灣，或在東亞作其他軍事行動。臺灣島擁有約三萬八千方里之土地，及三百萬人口，其中大部份之人民從沒有承認中國之統治。……一旦中日間和平成立，歐洲各國將要努力爭取特權，余與陛下意見一致，即當時德國在中國之利益不應一無所得，雖然重要補償如臺灣者不在考慮之列。因此數星期前，余請日本政府注意此一點，並在提到吾人對於干涉問題之友善態度時，表示在適當時候，日本政府能把其他國家在那方面之可能步驟告知德國。……」

照余看來，現在企圖將臺灣割讓給德國和日本達成諒解，似乎已無成功希望。因為日本自己視臺灣為勝利品，德國欲於此時提出此種要求，必引起列強之猜疑勢將損害吾人之外交政策。」(註二)

德國駐北京公使紳珂 (Baron Schenk Zu Schweinsberg) 則主張佔領膠州灣或澎湖列島。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月二十六日) 紳珂致電德首相何倫洛熙曰：

「位於山東海角之膠州灣，帝國駐天津領事在其本年一月十四日之報告中曾經提及。該地中國所計劃之軍事建築尚未達到重要地步，澎湖列島或也可以考慮。」(註三)

馬沙爾建議應先英人佔領舟山羣島。一八九五年二月一日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其所致德國駐英國大使哈慈非爾德 (Count Von Hatzfeldt) 之電曰：

「該公使 (按：指紳珂) 所指出之兩點，似乎並不特別好。膠州海灣之佔據，在目前不能希望有經濟利益，這些利益祇有等待一個中國鐵路網集中於該海灣後始能談到。隨着中國大陸上之佔據，勢必在該地建築軍事設備，此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月十八日

七〇〇

在某種情況下，容易引起軍事行動。澎湖列島完全沒有價值，它沒有內地可提供爲商業之用，是否有滿意之海港殊成疑問。

關於臺灣島幾十年來在德國雖有佔據之言論，但必須仍在吾人考慮之外，因爲征服該島名義上屬於中國之居民，如果與其他垂涎該島之國家如法國發生衝突時，此一可能不能不爲保衛它作必要之犧牲，而在德國現在並不能做到。

趕快佔據位於杭州海灣尾稍及吳淞以南之舟山，那對於吾人是可願望之事。早在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公認爲中國通李希霍芬(Richthofen)教授在其上傳斯麥公爵之詳細報告中，強調建議奪取該島。彼盛讚舟山擁有一個易守及易設防之港口，彼今日仍相信，如果採用適當之措施，如設立自由商埠，該島不難發展成爲商業大都市，不但能吸取鄰居寧波之商業，並能在該方面之交通上起而代替上海之地位，因爲上海海港不易收容大船進出。

最近阿諾托先生(Hanotaux)（按：法國外交部長）談及佔領權，而英國於鴉片戰爭後據說曾和中國秘密協議保留佔有舟山羣島之權。近來報紙傳說，英國即欲佔領舟山，與此一事實相符合。例如新時代報駐倫敦記者於去年十二月末據說已經知道，不但英國海軍方面對軍略佔領舟山有熱烈之興趣，即倫敦商業界參加中國貿易之公司，已預期該島之佔領，計劃在該島上建築工廠與倉庫。……

照目前所見，問題是趕快與中國政府開始秘密談判，無論如何，在中日和平成立前，討論以出賣方式將舟山羣島割讓與德國。」（註四）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二月，李鴻章奉命赴日議和，德國官方宰割中國之目標雖不一致，然爲本身利益著想，自不願日本據有中國大陸土地，因有聯合俄法干涉還遼之舉。迨日本被迫退還遼東半島，德國乃與俄國默契欲圖勒索中國。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四月二日），德皇威廉二世，致函俄皇尼古拉二世，稱頌俄國領導反抗日本之「全歐共同行動，乃一個良好之發端。」並且「熱心」期待「兩國在遠東事業之進一步開展。」甚至表示德國願意幫助俄國，「去解決俄國之土地割讓問題。」同時亦希

望俄國能「善意」看待德國之攫取中國「任何地方於自己方便之海港」。今後德國必可「維持歐洲之安寧，以衛護俄國之後方，使任何歐洲國家均不能擾亂俄國在遠東之行動。」（註五）

同年夏，德國首先向中國要求在天津漢口等處設立租界，作為代索遼東之報酬。總署以方借助於德人，許其請，而德國志仍未足。乃派前駐華公使巴蘭德（Von Brandt）來華，交涉借港泊船事。十二月十四日（十月二十八日），駐中國德公使紳珂（Sehenck）陪巴蘭德至總署，總署大臣宴之，翁文恭日記記其事曰：

「巴蘭德從其國來，因舊人，又遼事曾出力，故兩邸及同人皆集。未初二，巴與紳珂各繫一通事來，巴所談皆寒溫，微露德色。巴退，紳留談，則所求者四事：海澳泊舟，一專使，一其外部宰相寶星，一買船。」（註六）

四者之中自以租借海港最為重要。翁文恭日記十二月十六日（十一月一日）條復記總稅務司赫德曾面告翁同龢曰：「巴蘭德此來欲覘國勢，有所陳說。」（註七）十二月十八日再記曰：「合肥公（按：指李鴻章）來談，巴蘭德此來有事，此人能為禍福，可畏哉。」（註八）是總署大臣亦早逆料德人之野心也。因電駐俄德大臣許景澄，向德國外交部說明中國擬難允許德國要求之故。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四日）景澄致電總署，說明與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交涉之經過曰：

馬沙爾邀晤稱：德助爭遼，現請中國助德商利，德廠造船較美國精良，克膚伯鐵鋼料最佳，現均在華攬售，極盼成訂。又德兵船在華無埠不便，請中國或租或借，允劃一地儲煤屯船，一護商利，一均東方大勢，以後有事德能出理，亦於中國有益，非有佔地之意，請勿疑。」告以：「中國決不疑德國，允借德地，他國亦必倣效，恐致為難。」馬云：「英有香港，法有東京，德無之，且俄艦已有海口度多矣。」告以：「俄係暫泊，在水不在陸，借地則失自主權。」馬謂：「可聲明不礙中國管轄之權，已令紳使商及，恐總署過慮，再請詳達。」事甚棘手，候核示。

（註九）

先是清廷亦慮及三國引代爭遼功，索取中國港灣。同年十一月九日（九月二十三日）旨電署理南洋

大臣兩江總督張之洞曰：「歸遼議定三月退兵，旅順地方雖經殘破，而形勢扼要，頗有他國覬覦，著張之洞將南洋所有各船收集查驗，一俟彼兵將退，調派數艦即日北駛，將船塢填紮。」（註一〇）十一月二十七日（十月十一日）復諭張之洞曰：「牛莊、營口於十四日歸還，旅順支期亦即不遠，若虛而弗守，恐啓眈視之端，況膠澳已准俄泊過多，尤慮各國援爲口實。著張之洞速飭帶輪員弁，整頓北駛，先到烟臺，候信再進旅順，毋得耽延。」（註一一）尙未料及德國即將強據膠澳也。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春，駐京德公使紳珂迭向總署要求借港泊舟，總署仍拒之。會李鴻章出使俄國，遊歷歐美各邦，命隨員德璀琳（Herr Gustav Detring）留德交涉加稅事，德外交大臣馬沙爾向德璀琳表示：「欲中國讓一海島或一口岸與德，爲儲煤屯船之用。」以爲交換條件。並命其新任駐華公使海靖（Heyking）與中國總署直接交涉。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德新任駐華公使海靖至京，以租借膠州灣事向總署提出要求，希望租期五十年。翁文恭日記記其事曰：「海靖先談海口泊船，語含譏切，引歸遼爲功，而以加稅爲抵。前使紳珂以海口未成撤回，故海靖注重在此。噫難矣！」（註一二）總署恐各國援例，堅持不許。本月初，海靖再提出同樣要求，仍爲總署所拒絕。乃報告德國政府，欲以兵力強踞之。本日德皇接受海靖建議，決定使用武力佔領膠州灣。是爲中國港灣被強佔之肇因，亦爲各國在華劃分勢力範圍之開端。

旋總署以膠澳事急，奏請於膠州海口，建設船塢，屯紮兵輪，以資扼守，而杜覬覦。」（註一三）旨命將在德訂購之穹甲快船三艘，雷艇三艘，英廠訂造之鐵甲快船二艘，於今冬明春駛往停泊。事未行，而膠澳已被德軍所侵佔。

註一•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e, Volume 9, Chapter 57.

註二•No. 2220.

註三：No. 2221.

註四：No. 2222.

註五：羅曼諾夫原著·民耿譯：「俄帝侵略滿洲史」頁六二。

註六：「翁文恭日記」冊三四，頁一一〇。

註七：同註六。

註八：同註六，冊三四，頁一一一。

註九：「許文肅公遺集電稿」卷一〇；「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頁五。

註一〇：清德宗實錄卷三七六，頁一八；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八頁九；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頁一七。

註一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八，頁二〇。

註一二：同註六，冊三五，頁一二五。

註一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頁八。

二十一日(三月二十二日) 康廣仁、徐勤、何廷光等發刊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
於澳門。

知新報初名廣時務報，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八月，康有為與僑商何廷光等創設於澳門。至是改稱知新報，梁啟超遙領之，而康廣仁、徐勤等實任其事。仿照英人傅蘭雅主辦格致彙編之例，專譯西洋農礦、工藝、格致等報，而以言政治之報輔之，間亦載重要時事，最初為五日刊，後改為旬刊。

(註一) 吳恒煒「知新報緣起」一文記曰：

「……然中國變法垂三十年，海軍興矣，船廠設矣，電線桿矣，車道築矣，山礦採矣，租界開矣，錢幣鑄矣，圖書譯矣，製造之廠、招商之局、同文之館、格致之院，罔不辦矣。公使之職、繙譯之員、領事之官、教習之聘、罔不舉矣。其做法西法而圖中興，與日本同。然甲午之役，軍師燬，要害失，韓藩亡，臺島棄，巨款償，口岸割

，卒赧然見弱於日本者，何也？日本求通之道勝，中國求通之道失也。處今之時，當今之勢，通之道，將如何？倅今而反古，則有執禮誤民之災，廢中而遵西，則有用彝變夏之謗，開議院則勢渙而滋亂，倡教會則道高而難成，廣學堂則費重而莫舉，擴善社則事龐而效淺，編部曲則謠雜而近俚，演傳奇則意論而惡陳，通繙譯則力薄而緩時，窮游歷則勢孤而傷費，此由後之效，非由今之急也，今雖欲求通，杳不可得也。

報者，天下之樞紐，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故國愈強，其設報之數必愈博，譯報之事必愈詳，傳報之地必愈遠，開報之人必愈衆，治報之學必愈精，保報之力必愈大，掌報之權必愈尊，獲報之益必愈溥。胥天下之心思知慮，眼日口耳，相依與報館爲命，如室家焉。是以英之霸也，太晤士報日五六十萬，甲海外焉。日之新也，朝日報日十五六萬，名亞東焉。中國人數號稱四百兆，非謂不庶矣，出報之處，乃不逾十地；分報之類，多不逾四十；銷報之處不逾十萬，閱報之人不逾百萬。順天爲首善之區，而閱報者寡其人，河洛爲中原之壤，而傳報者窘其步，且旬月之內，從而折閱者有焉，期年之間，從而中止者有焉，且其中十餘種爲教報，閱外國者僅百十耳！比而較之，直百萬倍之二，千人之二，譬猶諸天之微塵，滄海之一滴耳，其去歐美諸邦，何霄壤也？且求足以寓甲午之變，公車上書萬八千言，千三百人，車聲麟麟，震蓋中外，古今諸國所未有也。雖計紬於半途，事遂於不諫，而通塞之運已漸啓矣。

京師士夫，於是有強學會之設，今官書局是也。旬月之間，滬上繼焉，今時務報起重而振之，比及中年，流演海隅，加以江學提倡，湘民於變，鄂省札諭，斯風彌暢，魁哉偉矣。然廣廈萬間，衆繁非一木之任，珍途千里，致遠非跬步宜勞，孤掌不能獨鳴，隻輪未能並發，何則？羣獨之勢殊，南北之情睽也。況鐵路未週，郵政未便乎？夫贈人以言，匪丈夫之登臨，因文見道，喜吾黨之有鄰，此澳門知新報之所以繼上海而應之也。

以中國人民四百兆之衆，內地十八省之大，設報之所，宜有二千，分報之類，宜有二萬，每類之數宜一千，口出之數宜二千萬，比而較之，二十僅有一分，二萬人僅購一種。乃中土之廣，而滬僅一焉，吾粵之庶，而澳僅一焉，維此胥鄭爲依，藉收唇齒之助，知我罪我，分任口舌之謗，其猶一稊之微，一蛟一蠅之勞也。思以二三報館之權力，以變易天下也，吾知勢甚難也，第以孤憤所存，不忘內熱，因其行事，託之空言，不議之議，匪吾所聞，擴

而充之，瞻懷來者，有志之士，同類之倫，其將奮然興起而將伯之乎？中國二千年將墜之聖教，四百兆日蹙之生靈，庶有賴耶，余日望之。嗟乎！後有作者，斯義以明，宜立報科，用光斯道，吾黨之幸，天下之幸也。」（註二）

按：是時維新黨人康廣仁、歐榘甲等，與革命黨人楊衢雲、謝纘泰等多有往還，雙方非無攜手之可能。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正月初九日，謝氏應維新黨人陳錦濤、梁瀾芬之宴，初識康有為弟廣仁於香港品芳酒樓。席間謝氏力陳兩黨聯合救國之必要，廣仁甚表同情。同年九月，謝氏與有為晤於香港惠升茶行，再三懇談，不得要領。本年八月，謝氏復邀廣仁會於香港公園，廣仁告纘泰曰：「有為亦非忠心扶滿者，不過欲以和平方法達成救國之主張耳！各督撫如張之洞等咸贊成其主張，故不便與革命黨公然往還，致遭疑忌。」彼當力勸有為將來與楊聯合救國云。（註三）

註一：參照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册，頁三八。

註二：節自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二月一日，「知新報」第一、二、三冊。

註三：參照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四三。

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三日） 山東歷城、章邱黃河決口。

本日，山東歷城、章邱地方，因冰凌壅塞，水勢陡漲，以致民捻被決，小沙灘口門寬至二十餘丈，胡家岸口門寬至四十餘丈，水由郁宗塞經齊東等縣入海。（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三九二三。

二十八日（三月一日） 張之洞奏請於湖北設立武備學堂。

湖廣總督張之洞以時勢多艱，亟當開設武備學堂，以儲將才而振士氣，本日上「設立武備學堂」摺，文曰：

「竊照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諭，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皆應及時舉辦等因，欽此。又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諭，武備學堂能否於各省會一律添設，著妥籌具奏等因，欽此。亟應欽遵辦理。臣查自強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一月二十二、二十八日

之策，以教育人材爲先；教戰之方，以設立學堂爲本。湖北地據長江上游，南北樞紐，又將來鐵路所發端，尤爲用武之邦，當此時勢多艱，自當開設武備學堂，以儲將材而作士氣。臣於上年回鄂後，卽經欽遵前旨，力籌舉辦，一面電致外洋選募洋員教習，一面規畫籌款建堂招考學生等事。查近年外洋各國講求兵事益爲精密，向來中國學堂所教多係俊秀幼童，及各營兵勇。文理既昧，氣質亦粗，斷難領會精要。且資地寒微，出身尚遠，數年之中，斷不能遽膺文武官職，安望其展轉倡率，廣開風氣。況所教學生，若僅可充末弁兵勇之選，則一堂之經費，數年之功力，止能成就弁勇百餘名。多設則爲數不貲，少設則無裨實濟。大率外洋武備學堂分爲三等，小學堂教弁日，中學堂教武官，大學堂教統領；學術深淺難易以此爲差。今中華爲教時之計，雖不能遽設大學堂，而教武官之學堂，則不可緩，取材精而經費省，用功約而收效多。今擬專儲將領之材，專選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體強健者，考取收入學堂肄業。緣上項諸人皆科名仕宦中人，將來効用國家，引伸會通展轉傳授；上則可任帶兵征戰之事，次亦可充營務幕府軍械局所之官。蓋此輩卽或未能有衝鋒決勝之才，然於考核弁兵，籌備餉械，整飭製造各局，察閱礮臺營壘諸事，則固優爲之矣。裨益多而收效速，似乎無逾於此。嘗惟兵事爲國之大政。古者學校中人，無不先習射御，與我朝八旗文員兼習騎射之意相同。而司馬法一書，列入禮家。故卿士大夫皆爲軍官，伍兩卒旅悉入鄉校。春秋傳云：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此先聖身體力行之效，經義昭然。以至孔門諸賢多能戮力行間，執戈衛國。唐宋以後，文武分趨，殊失古人教士良法。美意泰西諸國，民皆爲兵，將皆入學，頗於古義有合。今擬合文武爲一途，雖云因時制宜，實則反經復古也。查武備學堂功課分講堂，操場兩事。講堂以明其理，操場以盡其用。講堂功課如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戰史營壘、橋道製造之法，營陣攻守轉運之要。操場功課如槍隊、礮隊、馬隊、營壘工程隊、行軍隊、行軍礮臺、行軍鐵路、行軍電線、行軍早雷、演試、測量、演習體操等事。皆須次第講習通曉，始有實用。經臣於上年電致出使德國大臣許景澄向德國兵部商派都司法勒根漢、千總根次二洋員，來鄂教習，曾與德兵部議定到華後，法勒根漢加給副將銜，根次加給遊擊銜，令其體制較優，以資表率、管束，並議定歸總辦道員節制。惟學生百餘人，教習僅止兩人，不敷講授。疊據該洋員堅請添募數人，以資協助。現經電商兩江督臣劉坤一，於江南自強軍諸洋員中調撥洋員三人來鄂。乃法勒根漢挑選甚嚴

，僅留德守備斯志老一員，令入武備學堂隨同教習。尙短一員，允俟隨後再行訪募。其餘何福滿、賽德爾兩員，派人護軍營。洋操隊教練弁勇，其功課章程，令洋教習酌擬，總辦道員核議轉稟，由臣核定飭辦洋教習課程，餘暇即令其誦讀四書，披覽「讀史兵略」，以固中學之根柢，端畢生之趣向。另派華教習經理考選學生百二十名，並選派粵津學堂出身，久充教習者十二員爲領班學生，按照洋教習講說課程，譯成華文華語，轉述指授。諸生入堂以後，無論何項功名，統爲學生，均須恪遵規矩，虛心受教，違章者即行屏除，除伙食操衣均由學堂供給外，每名月給贍銀四兩；分定月課、季課、年終大課，以考其優劣。如果將來學有成效，擬請援照直隸江南奏定學堂年限章程請獎，並擇委差缺，以示破格鼓勵。茲於湖北省城內，東偏黃土坡地方，購地建造武備學堂，該堂未造成之先，暫借鐵政局及該局附近暫賃房屋爲棲止之所。派委署江漢關道湖北候補道蔡錫勇總辦該學堂事宜。令該道督同洋教習妥定課程，認真激勵，並委奏調分省知府錢恂、浙江候補知府聯豫，充學堂提調。令其考核經費，約束學生，整飭一切，責令各該員等，與洋教習商酌協助，隨時維持，以期有實效而無流弊。查武備學堂歲費甚鉅，鄂省之力本難辦此，然當此時艱事急，閒暇不易得，人材不易成，若再一因循，蓄艾已晚，反覆焦思不能不勉力爲之。現擬暫在贍務雜款及銀元局贏餘項下，設法湊撥。惟此係國家經武儲材之要政，儼若零星湊補，勉強支持，亦爲非體。將來尙須籌定常款，奏明辦理，以期經久。」（註一）

按：甲午戰後清廷亟亟編練新軍，胡燏棻練定武軍於天津南之新農鎮（小站）（已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份），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練日強軍於南京（已詳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份），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正月，之洞交卸兩江總督篆務，回任湖廣總督，自強軍之擴充計劃因之擱置。至是，之洞奏請創設武備學堂於武昌，考選學生百二十名，除電請出使德國大臣許景澄向德國陸軍部商派二洋員來鄂教習外，並就江南自強軍調借洋員三人。其後各省之編練常備軍，北洋之外，以湖北最爲積極，皆之洞首倡之功。

註一：「張文襄公全集」（卷四五，頁十三——十六）。

本月（二月） 高鳳池、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在上海創辦商務印書館。

上海原設有專印教會書籍之美華書館一所，高鳳池、夏瑞芳任職員，鮑威恩、鮑威昌任技工領班，經協議集資四千元創辦承攬商業印刷之出版機構，取名商務印書館，於本月開始營業，遲至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一九〇六年四月五日）始正式向政府註冊，於是我國規模最大之文化出版事業機構於焉誕生。

按：自商務印書館成立後，出版品偏重教科書及國學名著。業務之發展早期有賴於張元濟（菊生）累積六十年之規劃，後期得力於王雲五經營之功。而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遂成為商務印書館正式成立紀念日。

附錄：王雲五撰「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註一）

要評論一個人，應把握住他的中心；要看一個人的動向，必須觀察他的朋友。

所謂中心是指大半生所從事的工作。本文的主人翁張菊生（元濟）先生大約生於民國前四十六年，其加入商務印書館約在民國前十年，其去世在民國四十九與五十年之間。自從加入商務印書館以來，沒有脫離過一日，可以說整整一個花甲都集中於商務印書館的事業，縱然大陸陷匪後十多年間，他祇是一個傀儡，未必能發揮自己的意志，畢竟在名義上仍是商務印書館的最高主持人。因此說他的中心事業在商務印書館，當然是無可否認的。

所謂朋友是指彼此平等相待，無話不談的人。以菊老之早年發迹，接觸的人極多，似乎够得上做朋友的不在少數，但是就他以商務印書館為中心的六十年來說，够得上做他的朋友的祇有三人，依時期的順序，第一位是高夢旦先生，第二位是我，第三位即是陳叔通。

由於菊老的上述三位朋友都與他在事業上有密切關係，對於他的中心工作當然都會發生重大影響；因此，在敘述他在中心工作的表現時，自然會涉及他所受這幾位朋友的影響。本文的敘述，所以仍採單線的，就是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而不採取雙線的，或是復線的，就是基於此項理由。

如上文所述，他之加入商務印書館約莫在民國前十年，那時候他大約是三十五六歲。對於他這個在中心工作的前期，有約略敘述之必要。

他的原籍是浙江海鹽縣，出生於真正書香的世家。他在二十多歲，便已連捷成進士，授職翰林院，嗣轉官禮部

他富有新思想，以一位青年清貴之京官，自然而然會參加當時之維新運動，但他所參加的維新運動不是康有為所發動的戊戌維新，而是張香濤等所組織的強學會。可是到了戊戌維新失敗後，他竟誤被牽累，革職永不任用。（可是到了清末，一度任他為學部大臣，他却堅辭不就。）他的原籍離上海不遠，所以在他革職回籍時便留在上海，應聘為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的漢文總教習，和其在該學校任洋文總教習的福開森博士，漸成莫逆之交，並且互相交換語文的知識，福開森跟他學習漢文，他也跟福開森學習西文。據說，那時候正是吳稚暉先生在南洋公學充當師範生之際。戊戌是民國前十四年，他加入商務印書館約在民國前十年，由此可推定他擔任南洋公學漢文總教習至少有四年之久。但是他怎樣和商務印書館發生關係呢？

商務印書館創辦於民國前十五年，發起人是專印教會書籍的美華書館四位職工高鳳池、夏瑞芳、鮑威恩、鮑威昌。高、夏兩先生是職員，威恩、威昌兩先生是技術工人領班。他們對於當時學英文者都採用英政府為印度編著的所謂印度英文讀本 *Indian Readers*，畢竟有新的眼光，能够獨出心裁，認為如能把這套純英文的讀本，譯注中文，印為華英對照的教科書，定然對初學英文者有很多便利，因此也自然有利可圖。於是商請中國籍的一位牧師謝洪賓先把這套印度英文讀本首冊，譯成中文，定名為華英初階。大家集了少少一點資金，以供印刷，聽說初版三千冊，一星期內便銷售罄盡，的確發了一點小財。他們受了此項鼓勵，便決定經營一種新的事業，利用他們對於印刷技術上和營業上的專長，開辦一個小規模的印刷所，而兼營出版事業。這一新事業，定名為商務印書館，從其名稱上，可以想見他們是以承攬商業上的印件為主，而以出版為副。當時所集的資本祇有四千元，由於發起人恰好是四位，可能每人投資一千元。聽說最先向美華書館辭職，以全副時間為商務印書館服務的，祇有夏先生和鮑先生昆季等三人，高先生聞在美華書館任較重要職位，初時祇是投資，却沒有參加實際工作。由於夏先生原在美華書館任承攬外來印件之職；所以兩位鮑先生主持內部的印刷工作，夏先生則專任對外工作。據菊老親自對我說，他認識夏先生是因其向南洋公學承攬印件。經過了數年後，由於商務印書館好景不常，為出版新書發生了挫折。夏先生眼光敏銳，發見了一位可以助他挽回頹勢之人，就是菊老。那時候商務印書館所遭遇的挫折，是在華英初階好的開始以後，繼續託人漢譯全套的印度英文讀本，分別命名為華英進階一二三四集等，銷路也還暢旺。於是夏先生等雄心勃勃，

想從出版方面進展，除英文教科書外，還託人從日本文漢譯了許多當時所謂新學的書籍，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日本法規大全」。這些新書的銷路當然不及英文教科書，尤以「日本法規大全」耗資最多，銷路最滯。從英文教科書所獲得的利潤不足以彌補其他出版物的虧損，甚且資金週轉也漸感困難。這時候另一發起人高先生已辭職參與商務印書館的實際工作。在夏先生和其他發起人詳細檢討之後，認為事業之成功端賴專才，他們對於印刷業雖然有適當的經驗和技術，但對於編譯書籍畢竟是外行，必須有專才為之主持，始能有濟。他們認為菊老不祇在舊學方面是一位太史公，即在新學方面亦多淹通，而且經過幾年間和福開森博士交互教學之後，對於英文也有相當造詣。於是由夏先生代表各發起人和菊老多次商談，菊老卒允投資若干，並邀約若干親友投資，將商務印書館增資改組，並特設一個編譯所，羅致若干學者，首先響應清末新頒的學制，創編全套中小學教科書，有餘力則繼續編印有關舊學新知之佳作。於是從民前十年開始，在商務印書館創辦五年之後，由實際上之印刷業，擴充為名實相符之出版業。

張先生在商務印書館約六十年間之作爲，按其性質，可分為五個時期：

第一，是直接而局部領導的時期，即在民國以前的十年間，擔任編譯所所長之時期；他專力主持商務印書館新成立的編譯所，除延攬學者分任編輯著作外，自己主持計劃，並對中小學教科書親自執筆。在此時期，他在編譯所中的主要協助者爲高夢旦先生。從此時起他與高先生建立深切的友誼，使高先生成爲他的第一位朋友，終高先生的一生，合作無間。

第二，是間接而全面領導的時期，即在民國初年之七八年間，改任商務印書館經理而以高夢旦先生繼任編譯所所長之時期。他把編譯所的責任付託於高先生，而自行擔任全公司的經理。這時期由於商務印書館一位編輯陸費伯鴻先生出而創辦中華書局，對商務印書館競爭甚烈，菊老遂親自主持公司大計。其任經理之後期，因公司改爲總經理制，並設經理二人爲輔，於是轉入第三時期。

第三，是協同四位原始發起人之一高鳳池先生改任督導的時期。即自民國七八年迄民國十九年間之一段時日。其時商務印書館在行政上改取合議制，設總經理一人，經理二人，編譯、印刷、發行三所所長，以及協理一人或二人，組織總務處會議，以總經理爲主席，一切取決於多數；另設監理二人，負督導之責。其人選即以原始發起人之

一鮑咸昌先生爲總經理，李拔可（宣壘）、王顯華（後期改由夏後芳先生繼任）二先生爲經理，高夢旦先生爲編譯所所長（從民國十年起改由我繼任），鮑咸昌先生兼任印刷所所長，王顯華先生兼任發行所所長（後期改由李拔可先生兼任），稍後添聘協理一人，以民初曾任工商部長之金邦平先生擔任。至監理二人，則由菊老與高鳳池先生分任。

第四，是以董事會主席從事贊助之時期。這時期是由我從編譯所所長改任總經理迄於我在民三十五年辭職從政之十六年間，並多少延續至大陸淪陷之三十八年之時期。自我擔任總經理後，原有總務處會議之合議制廢止，改爲總經理獨任制，原監理制亦取消。自抗戰前一年高夢旦先生去世後，菊老在商務印書館中之惟一的朋友，便改由我擔任，甚至在我辭職從政後一二年，還是持續不變。在此時期，我的一切措施，他無不贊助，一方面由於他愛護商務印書館，他方面也因爲我們之間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不管他的年紀比我大了卅多年，而且我在商務印書館各當局中是最後進，他總是把我視爲「平等相待無話不談」的朋友，在高夢旦先生尚健在時，我們三人無話不談，在高先生逝世後，菊老簡直把我視爲惟一可以無話不談之人。商務印書館經理之一李拔可先生入館比我早十多年，年齡比我也大十多年，但菊老還是把他視同高級的僚屬，平時談話雖很客氣，談到公事時，往往不免板着面孔，但他對於我，在我經胡適之先生推薦於高夢旦先生，以代任他的職位之初，菊老祇是因尊重胡、高兩先生而特別對我客氣，彼此遂不能「無所不談」，換句話說，遂不能構成朋友的條件；可是經過幾年以後，尤其是在我再入館，改任總經理的時候開始，他的確把我視爲他的條件下之朋友，遠非他人所及。因此，他對於我的種種措施，無不極力贊助，而絲毫不加以阻撓，所以這一時期，他已從局部領導，全面領導，監督導等，一變而爲贊助。

第五，是他被左傾分子包圍逐漸演變成爲匪傀儡的時期，那是從民國三十七年中期開始以迄於四十九或五十年他逝世之十二三年間。他的這樣重大轉變，主因是由於我從政以來居留南京，初期還不時來上海，仍得時與菊老把晤長談，使他對於國事的關懷獲得安慰。但到了三十七年夏初，我改長財政部以後，由於公務特忙，極鮮來上海，與菊老晤面極疏，加以從彼時起共匪構亂益烈，時事口非，菊老原是一位關心國事之人，在無法解除他的內心煩擾之際，和他居處相近，接觸極易之人，陳叔通（從前也曾服務於商務印書館）便取代了菊老可以「平等相待無話不談」的朋友地位。叔通現在是匪幫政協常務委員，彼時早已傾向共匪，於是利用菊老之內心煩擾，乘虛而入，爲共

匪作種種宣傳。菊老是一位熱心國事，而對政治觀察頗為大真之人，自易爲所蠱惑。於是破例（他向來不肯援引親戚任要職）首先把他的外甥，就是多年來任匪幫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的父親謝仁冰（冰），援引入商務印書館，擔任協理，隨着便有不少新的共匪分子加入商務印書館的各部門，於是不待共匪佔據京滬的時候，菊老的態度已有大轉變。試舉二事爲例：一是我辭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後，曾舉朱經農先生爲代，最初二年和菊老相處得還好。自館中逐漸加入左傾分子後，經農頗不自安，適因政府派他往歐洲出席聯合國文教會，向菊老請假，想不到菊老竟說，屆時如出國，不能不易人，經農遂即請辭，也不加挽留，遽予接受。二是我於三十五年出任經濟部長堅辭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之職，菊老在固留不獲之後，仍懇我繼續擔任董事，甚至每次開董事會，仍先詢我何時得暇來上海，以便預將開會日期調整，其意誠懇，由此可見；但當我於三十七年多解職南還不久，他突然寫信給我，內有「本年股東年會甫於本（十二）月舉行，與同人相酌，謂公此時正宜輟晦，不敢復以董事相溷，想蒙垂察」等語，輕輕把聯任了二十年的老董事革除。我很諒解，這兩事都不是菊老的自由主張，所以這時候，當然是他的傀儡時期的開始。大陸淪陷以後，他的傀儡生活，定然過得很慘，尤其值得他的一位忠實的朋友同情而惋惜了。

現在綜述菊老對於商務印書館，亦即對於文化的貢獻，在五個時期中，自然以第一、二兩時期爲最。在第一時期，他把一個小規模的印刷事業轉變爲一個現代的出版事業，並從他所奠立的基礎，逐漸發展爲中國最大的出版事業，其功實不可沒。他在第一時期，自行擔任極重要的任務，在第二時期，也間接主持了許多極有意義的工作。具體說起來，他是首先編輯我國新式教科書的主持人。據說他在編輯所謂「最新小學校各種教科書」時，對於每一課之內容，無不集合編輯人三數名，有時還加上一位日本顧問，就取材深淺，是否符合兒童了解力，研討固不厭求詳，就文字難易，亦無不字斟句酌，力求穩妥。依我後來的觀察，這一套名爲最新，而在時代上實爲最舊的教科書，由於菊老主持之得當，用心之精勤，比諸後來陸續編輯之同類教科書，在時期上當然較新或最新，而在編輯方法轉多不如這套時期最舊而名義爲最新者之確能符合「新」的意義。

菊老所創編之「辭源」、「中國人名大辭典」等工具書，在今日雖不足爲奇，而在五六十年前竟有此眼光，實屬不可多得。

菊老所編印的「四部叢刊」，使善本孤本得以大衆化，其宏揚舊學之功尤著。

菊老爲商務印書館所搜集的善本孤本及其他國學要籍，逐漸構成著名全國之涵芬樓，後來在我的手上，得據此基礎，建立公開於社會的東方圖書館，菊老不僅爲此舉首倡於前，並以種種努力玉成於後。

菊老在第三第四期，因信任高夢旦先生，轉而信任我，初時雖以彼此生疏而持相當保留態度，後來漸發見我的實際表現，把我視同等於高夢旦先生一樣的朋友，使我得在編譯所中產生我的自發作用，不僅未遭週絲毫阻撓，更獲得其衷誠贊助。到了第四時期，商務印書館，先遭一二八之巨劫，由我艱苦奮鬥，五年之間不僅復興故業，並且發揚光大，社會上對我不無過譽之詞，我雖不敢承認或否認，然菊老支持之功實於我大有補助。假使沒有他的全力支持，在效果未顯明的過渡時日，恐怕我的成就不免要打個折扣。

曾幾何時，八一三全面抗戰起，商務印書館又遭遇更嚴重與廣泛之厄運，我由香港而長沙而重慶，一面建設，一面遭遇破壞。太平洋戰事突發，香港基礎盡壞，我幸留重慶，在極度艱難之下，卒達第三度的復興。上海的後方，賴菊老於不屈不撓之下，維持同人生計與殘餘資產，我輾轉派人返上海提供我對於淪陷地區館廠保持大義之指示原則，亦獲菊老全部贊同與接受，迄於抗戰勝利之時，幸能保持大節，得與我在重慶所發展之聲譽相配合。

惟一的不幸，便是進至第五時期。據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國半月刊」登載同年六月有人帶到香港付郵的一項上海通訊，大意說：「張菊老由於陳叔通的牽線，拉攏和慫恿，好幾年前已與共產黨發生了關係。上海淪陷後，他已登堂入室，成爲饒漱石、陳毅的上賓，迨新政協在北平召開，他以會員資格北上參加，毛匪澤東以其高年，且負時望，頗予敷衍。他又在會議席上聽到毛匪等口口聲聲說是「爲人民服務，向人民學習」一類的話，他天真地誤認可解人民的痛苦。他返滬後，又被任命爲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更覺高興。不料迭接海鹽的家鄉來信，謂族衆多遭清算，甚至他族裏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強奪之威脅；於是在祠堂張貼布告，說明而奉「毛主席」示，下級黨政人員不得擾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謂當葉齊代向有司申訴。稍後他便向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陳說，饒匪當即勸其勿管閒事，因爲他這些親友都是土豪劣紳之流，是應該清算的。他聽到這些話，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寫信給在北平的毛匪澤東。有一天商務印書館職工委員會開會，特地邀請他訓話。他如期前往。正開始發言不久，突

然會場中發生一片喧囂之聲，一排一排的職工，分別起立對他大罵和臭罵，所有滿清餘孽，文化販子，剝削階級，昏庸老朽，老而不死……種種惡名無不加之於他；他如何捱得起此種侮辱，於是忿恨之餘，昏倒在講壇上，不省人事，經送醫院救護，留醫數月，返家後，閉戶幽居，不再聞問外事，只從此以後，足跡也不再出門一步。

註一：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一期。

二月

八日（三月九日） 上海申報刊載：甲午戰後，國人習英語之風大盛，西方作品亦廣為誦讀。（註一）

註一：寶宗一撰「李鴻章年（H）譜」頁三六五。

十三日（三月十五日） 清廷徇法要求，聲明不以海南島讓予他國。

先是，法使施阿蘭（A. Gerard）於本年正月十二日向總署要求龍州鐵路延至百色，開滇越路，粵桂滇三省開礦，並要求瓊州及廣東海岸不得許他國屯煤。二月四日，法使再向總署提出上述要求，總署允其展修龍州鐵路至百色，及開粵桂滇礦，堅拒法使修築滇越路之要求。本日，總署照會法使，聲明不以海南島（瓊州）讓予他國，照會曰：

「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接准照稱：法國與中國既敦友睦鄰邦之誼甚密，甚願中國永不以瓊州島給讓於別國，以作遠久或暫時屬地，或作停船運煤之所等因。本衙門查瓊州係屬中國土地，例有自主之權，豈能讓與各國？現在亦並無暫借與各國之事，相應照復貴大臣可也。」（註一）

按：此為清廷第一次聲明中國國土不割讓他國之宣佈。

註一：外交部藏光緒二十三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

十四日（三月十六日） 孫先生文在英倫結識日本生物學家南方熊楠。

本日孫先生始識日本生物學家南方熊楠於倫敦，意氣投合，深相結納，遂成莫逆之交。（註一）

按：南方熊楠（一八六七——一九四一年）爲日本著名生物學家。二十歲時赴美留學，進密西根州立農業大學。一八九二年赴英，客居倫敦。一年後，發表「遠東的星座」（The Constellations of the Far East）論文於科學雜誌「自然」（Nature）周刊，聲名鵲起。獲前大英博物院院長佛朗克爵士（Sir A. Wollaston Franks）之賞識與關照，得在大英博物院有充分研究之便利，並與東方圖書部主任道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K. Douglas）成爲知交，助其編成大英博物院漢籍目錄及日本書籍目錄。孫先生於去年抵倫敦後，雖未即與南方邂逅，而南方已屢自道格拉斯處得知孫先生一切。本日孫先生與南方在道格拉斯之辦公室會晤。據南方之回憶，當孫先生初晤南方時，問彼一生之所期爲何？「南方答但願我爲東方人，一舉將西方人悉逐於國境之外也」。又述及「應將英國人逐出東方」。孫先生與道格拉斯聞其言均大爲驚訝。此後兩人意氣投合，深相結納。如南方之記述：「常遊於逸仙處，逸仙亦來遊於余家」；又迭次結伴外出，「余在大英博物院讀書之餘，屢次與孫文往巴比倫古物展覽會閒談」。又云：「逸仙始終著西服，戴上如上圖之平凡呢帽（在其記述信中畫有一頂呢帽），與余喜用大禮服及常禮服相應成趣」。又述：「當時孫文落魄於倫敦，至友惟愛爾蘭恢復黨員摩根（Mulken）」。摩根爲軍事學家，在倫敦與孫先生相遇時，聆其革命抱負，大爲同情，決意助孫先生革命。以後庚子惠州之役，往來於香港、廣州間，頗多策劃。時南方雖享大名，其生活之窘困，亦有不堪言狀者。孫先生對生物學亦有研究，均具堅毅之人格，故能意氣相投。孫先生稱道其哲學理學之精深，雖泰西專門名家，每爲驚倒。而於植物學一門，尤有造詣。（註二）

附錄：木下彪撰「孫中山與南方熊楠」（註三）

孫中山先生一生大半在海外渡過，結交外國仁人志士，其中和日本人士的交往最多，這是世所周知的事實。然而在這許多日本人之中，有一位和孫文交誼深厚，而在孫文的傳記、年譜，及全集等，均未曾提及的人物，名叫南方熊楠。（在此，孫中山以及其他過去的人物，均視爲歷史上人物，故敬稱從略。）南方是出現於近代日本的稀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十四日

七一六

的世界大學者，他和世界大偉人孫文訂有莫逆之交的事實，不知何故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中，竟予以忽略，我且就此依據所獲史料，加以敘述。

首先要聲明的就是：陳國亭先生在近著「國父與日本友人」中略有提及南方的事，或許這是唯一的，惟僅係根據刊載於民國四十年十一月的中央日報國父誕辰紀念特刊內所轉載的林氏的文章，而林氏係根據虛構的日本人著書，造成以訛傳訛的結果，乃不得已之事。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孫文經日本到檀香山，翌年經由美國於十月一日抵達英國首都倫敦。然旋於同月十一日被幽禁於清國公使館，幸經英國當局的干涉，十三天後獲得釋放。在孫文傳記以及年譜裏所載者就是：於十一月中撰寫「倫敦被難記」，同時寫了簡單的自傳，自十二月四日起至翌年六月二十四日離開倫敦為止的半年多的時間，幾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館研讀。孫文和南方相見也就在這個期間，當時南方將他和孫文交遊的事跡，一一記錄在日記上，同時以後南方給人的書信中也都詳細提及，然而由於孫文本來就無寫日記的習慣，所以在孫文這方面幾乎找不到其他資料，實屬憾事。

在引用南方的日記之前，必須先就日記以前的南方的略歷稍加敘述。南方於日本慶應三年四月生於日本和歌山的富商之家。明治十六年十七歲時，畢業於和歌山中學，而後入東京的大學預備門，但中途退學，於二十歲時赴美留學，進密西根的州立農業大學。可是平素獨自研究之日多於上學之日，加之從事旅行各地學問上的調查研究，終又在中途退出大學，明治二十五年，亦即西元一八九二年九月，遂赴英國，客居倫敦。

到了倫敦一年多，南方很快就顯露頭角，即他所寫的論文「遠東的星座」被刊登（The Constellations of the Far East）於英國第一的週刊科學雜誌「自然」（Nature）裏，倫敦時報等各報刊載批評，博得甚大的名聲。據南方的記載：前大英博物館館長，年將七十歲的大學者大富翁奧拉斯敦·佛朗克斯爵士，邀請這一既無名氣貧窮的外國書生，並以「煮熟之全鵝，盛於大銀器內端出，親自操刀取出其肝。」盛加款待。又論文發表後次週，「應邀當時剛成立之皇家學會夜宴。」（「內係南方的原文」）

同時也和「自然」雜誌社社長洛加見面，受其賞識，爾後長期間成為該雜誌社的特別投稿者。其後在「自然」雜誌創刊三十年紀念特刊中，列舉該雜誌投稿者中聞名者數百人，再在其中「將各國具有學士會員資格者姓名，列

爲特別投稿者，其中日本僅列有伊藤篤太郎和南方之名。」而南方對於自己和伊藤都沒有日本的官立學校學歷一事，反引以爲榮，其抱負之大由此可見。而向來視南方爲一窮書生不大理睬的日本駐英公使館，獲悉此事後，遂趕緊以川瀨公使的名義，邀請這個窮書生，但却被南方斷然予以拒絕。

那時候，南方的生家道中衰，學資中斷，其潦倒不堪的窘境甚至於租馬廐二樓——不如說是閣樓來得適當——來居住，曾經來此拜訪的福本日南曾批評的說：「他所賃居的房間實值得一看，塌下去的床和破舊的椅子、食器放在溺器旁邊，髒亂的情景，令人有不知幾世紀沒經過打掃之感，但令人可佩服的，却是書籍和植物標本，幾乎塞滿了整個房間。」南方自己也說：「衣服之類均係向別人乞討的舊物，一日進一餐，忍飢讀書。」

於是南方由於佛朗克斯的關照，獲得進出大英博物館，隨心所欲研究的方便。他主要的出入於考古學、人類學以及宗教部，不久一八九五年爲博物館特約人員，並受到種種請他當正式館員的勸說，惟均辭退不受，如斯在此約過了六年，尤其與東洋圖書主管羅拔特·道格拉斯爵士成爲知交，襄助他們編成大英博物館漢籍目錄，及日本書籍目錄。據說如禁止隨意觀覽的古今圖書集成等書，只有南方被允許自由携出。又擔任決定宗教部的佛像和佛具名稱的工作，當時英國第一的日本通，國立倫敦大學校長佛列德立克·威克塔·德京士曾在校長室內接見南方，訂下忘年之交，也是這個時候的事情。

南方自十歲起即入漢學塾，據他自言：「自幼好學，曾讀書甚至不知兄娶婦於鄰室歡呼宴飲之事。讀史記，讀莊子，亦讀法華經、西廂、水滸。」又言：「自幼信心篤厚，諸宗經典無不瀏覽，至對於斷食苦行一事，尤爲得手。」在他給某日本僧侶的信中說：「仁者不採用歐洲的科學、哲學，以輔助佛法，誠屬可惜。所謂內心之妙味者，乃仁者一人之樂，一人之心乃千萬人之心，此可見於杜牧之賦，仁者應推一人之心及於千萬人。」以這種東洋的修養，再修習西洋的科學，特別是以生物學爲主，更涉及歷史、地理、人類、動植物、哲學、文學等各部門。因此屢次投稿於「自然」雜誌之論文，乃在告訴西方人，古時在東方亦有不遜於西方的科學，發現西方學者對於有關東方的說法有所誤謬時，即予以指摘訂正，藉學問爲日本及東方大爲揚眉吐氣。有一趣話謂：曾讀德京士所譯的「竹取物語」，指出其瑕疵而要求修正時，德京士怒而爭吵，彼此無禮相向，結果却較前更爲親密。南方說：「我不只致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十四日

七一八

力於使外國人認識日本的事，同時必定附註：外國比日本更多無聊之事，以為警告。」德京士在「亞細亞協會雜誌」中，稱揚「南方是我所見日本中最為博學而剛直之人」，據說德京士其人，乃係年少渡日，曾在橫濱兼業醫師及律師者，並以各種名譯將日本的文物最早介紹與世界者。又據說荷蘭有名的中國學者考斯道夫·希勒格曾經把「正字通」中的某一動物名稱解釋錯誤，當南方引用南懷仁的「坤輿圖說」予以改正時，亦引起無禮相向的爭論，結果南方獲勝，「使對方屈服，取得道歉書。」

明治二十年，日本剛出現於世界舞臺不久，「在一味向外國人低頭彎腰」居多的日本人當中，這一個窮書生腹藏萬卷書，以熾烈的愛國心和滿腔的正義感，堂堂正正地和西方人相抗衡，而毫不畏懼。

且說，南方和孫文的邂逅，根據南方的日記，是在一八九七年三月十六日，不過在此之前，即前一年的日記裏，已有如下記述：

十一月十日 遇道格拉斯氏於博物館，據聞昨日見支那人孫文，是前日支那公使館所拘禁者也。（以下之

日記只抄出與孫文有關之處。）

十一月十一日 訪道格拉斯於博物館，支那人孫文亦在，吾未遇見。

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博物館訪道格拉斯氏，據聞支那人孫文目下正作其自身之「幽囚錄」。

三月十七日 於道格拉斯之辦公室會晤孫文，昨日之記事也。

時孫文三十二歲，南方三十一歲，以後南方回憶當時的情形，說：「與孫逸仙初次會晤於道格拉斯氏辦公室內時，彼問：『一生之所期為何？』」小生答道：『但願我東方人一舉西方人悉逐於國境之外也。』逸仙大驚失色。」又：「述及應將英國人逐出東方之語，乃道格拉斯男爵，介紹孫文氏與小生之當場所言者，道格拉斯與孫文均大為吃驚。」

經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西方東漸，尤以英國禍害，因孫文在首當其衝的廣東地方，見聞不計其數，難怪為此東方小國一書生的大言壯語，大為驚歎不已，況且又係在英人道格拉斯的面前所說的，從此以後，兩人意氣投合，遽加深款交。後年在南方的信裏說：

「常遊於逸仙處，逸仙亦來遊於余家。」

馬廠的二樓也成為孫文經常拜訪的地方，又迭次結伴外出，「余在大英博物館讀書之餘，屢次與孫文往巴比倫古物展覽室閒談。」

「逸仙始終著西服，戴上如上圖之平凡呢帽，與余書用大禮服及常禮帽相映成趣。」

信上並畫有一頂呢帽，南方的大禮服及帽，亦係由友人所給的故物，由此想像兩位風采迥異的東方人，結伴通過歐洲第一大都市的正當中情景，實是愉快之至。

三月十八日 與孫文氏在博物館館前正面椅子上座談。

三月十九日 下午六時餘離館，與孫文往瑪利亞（海德公園傍的菜館）用餐。然後在海德公園閒談，又乘公共汽車赴其宅，談至十時，辭別返家。

三月二十日 在博物館伊士多像傍的長椅上，與孫文氏坐談。

三月二十六日 夜，在牛津街皮雅納菜館與孫文氏用餐，孫文請客也。其後同往訪問稅所氏，偕同觀覽博物館。（亞西利亞、巴比倫、埃及，以及波利由部。）

三月二十七日 夜，博物館打烊，與孫文氏在特天汗克特街雪拉用餐（下級食堂），然後赴同氏宅，至十時辭歸。

三月二十八日 下午孫文氏來訪，一起等候稅所氏。久候不來，夜同赴瑪利亞用餐，在蘇隆街與孫氏分袂。

三月三十日 下午偕同孫文氏訪問道格拉斯氏。

四月五日 博物館六點鐘打烊，與孫文氏赴餐館（雷額德拉爾）用餐，孫付錢，再至孫宅談至九時。

四月七日 下午至博物館與孫氏小談，搭五時五十分火車返回。即訪孫氏，不在。

坐於長椅上，在廉價食堂用餐，兩人所談何事？不難想像，必定是涉及東亞的覺醒，中國的改造等等。

南方又記述：「當時孫文落魄於倫敦，至友惟愛爾蘭的恢復黨員摩根與小生而已。德川賴倫侯爵與謙出來大英博物館時，小生與孫文二人同坐於長椅等候，將孫文介紹給侯爵，其時不知誰批評說：將如斯亡命之徒介紹於如斯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七一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十四日

七二〇

華族，南方是極危險之人物。」

南方的書信內記載：「有名叫摩根之愛爾蘭陰謀之士，逸仙啓程時，予與此人同送至維多利亞車站。」德川賴倫是南方故鄉紀州藩主之嫡嗣，明治三十年到英國時是二十六歲，比南方小五歲。就當時而言，對一個革命浪人的孫文，可能有人做過如上述的評語。

關於愛爾蘭人摩根(Mulken)，在羅香林所著「國父與歐美之友好」有所提及，此人是軍事學家，和孫文相遇時，聞悉其革命抱負，頗感同情，決意給予協助。以後，果然屢約來到中國、惠州之役前後，在香港、廣州之間，在各種策劃上貢獻不少。惠州事敗後，他即行回國，但九年之後，孫文再度赴歐洲時，寫信問在倫敦的吳稚暉「故人摩根君，亦數年未有通信，彼仍在倫敦否？並近況如何！亦望示知。」結果，似又得在倫敦相會。當時在倫敦沒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只有少數從事工商的華僑，在這裏不能進行任何革命運動，逗留了九個月，終於決定離開該地。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日，孫文乘英國船去加拿大，將要離開倫敦時，南方與孫文的離別之情又是如何呢？今日留存的南方日記裏，有孫文用毛筆所寫的筆蹟：

海外逢知音

南方學長屬書

香山孫文拜言

傍邊南方附註「此六月二十七日孫文親筆也。」

由此可知這是孫文來訪時，南方取出自己的日記簿，要求孫文在空白處題字，留做紀念的。孫文離開倫敦是在六月二十七日以後。又孫文在倫敦將「原君原臣」和「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二書贈送南方。前者署有「南方先生鑒 孫文持贈」，後者則署有「恭呈 南方熊楠先生大人雅政 中原逐鹿士孫文拜言」等字樣。

以上的日記簿和二冊書籍，今日都被收存於玻璃櫃內，陳列在紀州白濱的南方紀念館內，根據該館規則，不但不許觸及實物，就是攝影也在禁止之列。筆者曾遠遠往訪該紀念館，這些書籍雖擺在眼前，却不能披覽，不堪隔靴搔癢之感。

「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是原為醫生的孫文，講解救傷，亦即外科治療之事，所以發行所是倫敦城紅十字會。至於「原君原臣」，本來係「明夷待訪錄」內之一篇，自興中會創立以來，為宣傳革命，秘密出版之刊物之一。因係在中國刊行，故和前者不同，係舊式線裝本。可能是孫文將此携至倫敦，連南方亦予以宣傳所致。

孫文和居於倫敦的恩師康德黎的關係是舉世著聞的，二位親友南方和摩根之中，和摩根的事，已經由一二書可知，唯有和南方的事，久未為世人所知，僅止於最近日本二三書曾提到而已。

因為孫文即時離開英國經加拿大到日本，所以南方想將他介紹自己紀州的同鄉，當時在東亞問題上，非常活躍的岡本柳之助。只因和岡本素昧平生，遂伴同孫文到在英國的同鄉鎌田榮吉的居所去，託他寫介紹信，其用意是想對這位時運不濟，要亡命到自己的祖國的外國革命家，盡可能給以方便。然而，鎌田的介紹信却只「短短地寫了幾句：『持此介紹信之交那人孫文，將赴東京，特予介紹。』實在是不禮貌的寫法。」使南方感到氣憤非常。後來他曾說：「恐怕孫文全然未用此介紹信」，所以，雖然內容如此，總算讓他帶去，却是事實，維多利亞車站之別，冷冷清清，今日從歷史上回想，這世界的大學者和一國國父的大革命家年輕時的交往，真有所謂悲風千里來，內心無限淒涼之感。

八月十六日孫文抵達橫濱，其後直到三十六年九月由橫濱啓程，離開日本為止之六年期間，除了到安南去旅行約七個月之外，始終是以日本為基地，進行革命活動。一方面南方於明治三十三年，即一九〇〇年九月一日離開倫敦，十月十五日到達神戶，自二人在倫敦別後，已經過三年多的歲月了，其間的事情，也得稍加敘述。

和孫文離別那年十一月某日，發生南方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毆打英國館員事件。南方自書：「小生任職於大英博物館時，有德國人佔領膠州灣之事，東亞民族為之氣焰不昂，其時館內有輕侮小生者，小生於約五百人讀書當場，痛毆其鼻。」這個事件倫敦時報及其他各報均有報導，結果僅以兩個月禁止入館處分了事。但在一年後，又發生了同樣事件，所以不得不辭退博物館的職務。道格拉斯男爵千方百計設法挽救，小說家亞瑟·毛里遜向大英博物館的評議員英國皇太子、康達貝利大主教、倫敦市長三人提出請願書，替他奔走。總算收到效果，答應讓他復職。不過附有必須在道格拉斯的室內讀書，不得進入閱覽室之條件。南方以此為侮辱，呈書道格拉斯，永遠離開大英博物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十四日

七二二

館，可以說他是爲東方的精神而犧牲的。然而珍惜南方才幹學識的人並未棄之不顧，將他介紹到博物館分館的自然歷史館，和南坎信頓美術館等處。總算能够勉強餬口，不久經德京士的介紹，大致談妥請其任劍橋大學即將設置的日本學講座副教授時，因南非戰爭爆發而暫時中斷，加上其他種種原因，致使南方被迫不得不歸國。

去國十五年，回到家中，當時情況：「離家期間，兄傾家蕩產，弟營造酒業，頗具規模，然其妻待小生不善。」「不得已只好寄身於和歌浦的某寺院，其後南方寫信給在倫敦結識的福本日南，打聽到孫文的居處，立刻去信聯絡，旋即收到孫文於十二月十一日所寫的回信。

該信是以毛筆寫在日本宣紙上的英文信，大意翻譯如下：「昨日於橫濱接奉大札，敬悉吾兄再歸祖國，不勝愉快。甚欲與兄一晤，暢談數年來所遇之事。弟自臺灣歸來未久，預定再行出發。出發前如吾兄未能上京，則由弟逕赴貴地造訪。」

明治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孫文伴同橫濱華商的革命同志溫炳臣來和歌山，南方在其弟家中迎接。彼時孫文等人與南方一家合攝的紀念照片，至今猶存，當時清廷以孫文爲革命黨魁，迭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所以孫文一到南方家，就有人以爲前來策劃某種大事，向知事密告，遂有刑警到南方家中進行搜查的一幕，幸而平安無事。南方遂請孫文到和歌浦首屈一指的蘆邊屋，「美人酌酒而飲」，以在鄉下而言，堪稱罕有的盛宴款待。後來南方雖然說未能傾懷暢談，但孫文却記之謂「流連忘返縱談」。也就是：南方極欲多談，而孫文受到誠意款待，已心滿意足。

十四日到十六日在和歌山逗留之後，孫文回到橫濱，起程當天寫了一封介紹南方的信給犬養木堂，這封信是用漢文以毛筆寫到卷紙的。信封以正楷寫着：

介紹

南方熊楠君

犬養木堂先生

原文如下：

從和歌山縣 孫文拜識

木堂先生足下：弟嘗與 先生，談及昔年在英京獲交一貴國奇人南方熊楠君，今因聞君返里，特來和歌山

縣訪之，相見甚歡，流連忘返，縱談間，弟道及 先生爲忘形之交，君本熟耳 先生盛名，而以弟之故，更思一識 先生，擬二月後上京拜謁，弟特托寸紙以爲介紹，君遊學歐美將廿年，博通數國語言文字，其哲學理學之精深，雖泰西專門名家，每爲驚倒。而於植物學一門，尤爲造詣，君無心名利，苦志於學，獨立特行，十餘年如一日，誠非人可及也， 先生見之，想必有相見恨晚之慨也，此致，並候大安，不一

弟孫文謹啓 二月十六日

在南方紀念館展覽的孫文的書信，都是加以放大影印者，實物無法看到。這封介紹信以簡潔的文句而將南方的爲人、學問披露無餘，是以知道他們彼此之間互相親愛敬重，這是難能可貴的。

照這封信兩個月後，南方理應上京拜訪木堂，不過由介紹信原封不動保留迄今看來，訪問並未成行，所以事實上對南方而言，訪問犬養木堂並無任何意義。只不過因犬養是有名之士，而且聞知他對孫文的厚誼有所感動，而想和他見見面而已，這可能就是信中所說：「君本熟耳先生盛名，而以弟之故，更思一識先生」的原因。

孫文介紹南方，先以「奇人」一語開頭，實屬確評，他是富於奇言奇行，瑰異絕特的人物。然後，列舉南方的特長，關於其驚人的語學能力，謂「博通數國語言文字。」南方的著述中，引用有古今無數的外國文獻，隨心所欲運用外國語言，南方自己也說，「在倫敦可以自由自在使用辭典和對照本(Polvoron)，所以得以讀並摘錄十八、九個國家的語言。」「有半個月時間即可辨自己所居留國家的日常用語，至事物之名若能語：『汝呼之爲何』則人皆教之。」

據我的友人，和南方一樣在紀州田邊長大的脇田秀太郎教授所說：南方有異常的能力，話一旦入耳，畢生不忘，如聽到不必要的雜言時，祇要口中唸唸有詞，牙齒咬咬作響，就可以立刻消除。同時我曾經聽比叡山的阿闍梨說過：人世間有所謂地獄耳者，就像墮落地獄者始終無法脫離一樣，話一旦進入耳朵裏，即永遠無法消失。並謂幼時在耳朵唸幾萬遍幾十萬遍真言，就會有這種神通，是真是假固不得而知，或許南方就是持有這種地獄耳也未可知。又據說南方具有異常的靈的能力，對其研究大有帮助，惟爲免話題過怪力亂神，僅止於此。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十四日

七二四

「雖泰西名家每爲驚倒」論駁西人之例，孫文曾實地有所見聞。又說：「於植物學一門尤爲造詣」，或許是因爲南方通曉所有的學問，不願被人稱爲雜學，而以植物學者自居之緣故。孫文實在一言一語絲毫不苟，至於「無心名利，苦志於學，獨立特行」也是言之確鑿。南方在倫敦勤學之際，所抄寫的「倫敦拔書帖」，據說張數竟達四萬八百張之多，大概是「十餘年如一日」斫斫不倦而積成的，「誠非人之可及也。」孫文之一語，有千鈞之重，「先生見之，想必有相見恨晚之慨也。」係推稱之極，可知孫文是如何爲南方傾倒之一般。如此周備詳盡，首尾完善之文，無論如何，願能補錄於 國父全集所缺少之部份。

此時，孫文年方三十六，南方三十五，皆爲富春秋之身，但兩人焉知此乃兩人在今生今世最後的會面，實非神莫知者，臨別之際，孫文留做紀念的白盔帽，現尚存於南方紀念館裏。

其後，孫文和南方像是仍繼續通信着。索泰耶底繙的南方熊楠略年譜裏，在明治卅四年的記事內有：「孫文於六月從夏威夷・毛威島送來採集的地衣」，佐藤春夫的「近代神仙譚」內有是年「孫文於四月九日赴夏威夷，六月十七日再來橫濱，這直徑八英寸的地衣，就在這慌忙的旅行中從夏威夷送來者，所以在當時的孫文來信內有一節『在島時，摘得石菌一片，茲用寄贈先生，知無足奇異，聊以誌思慕之忱耳。』」這封孫文的信，且在紀念館裏亦未展示。佐藤究竟在何處見到？想必是收藏在南方家或紀念館者，有待於後日考證。

對於送地衣之事，南方於六月一日立即發出謝信，好像並問及地衣採集地之事，孫文於六月二十六日由橫濱發出一封以英文寫的地衣採集地及採集情形的信。簡譯如下：「地衣採集處是在河谷傍的岩石上，岩石被熱帶植物所掩蔽，河谷的兩側爲危險的斷崖，因淋雨而潮濕，生長有各種植物，各色各樣的大地衣鋪滿地上，雖甚難剝取，仍遴選形狀好而容易取者寄奉。」同時在信的末尾寫道：「何時上京？今後兩個月內能否上京來？如能在東京迎迓則幸甚。寫信給道格拉斯教授請代傳言候安。」此時南方並無上京的形跡。是年四月至六月間，孫文往來於橫濱、夏威夷間之事，有關孫文的傳記年譜等，未曾見過有其記載。佐藤之明確指出日期，必有其依據，筆者猜想如果能看到上項孫文的英漢兩文的原信，定能得到線索。可是紀念館只展示放大影印的英文信而已，連信封及漢文信均未看到，此亦有待以後考證者。

是年，即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南方離開和歌山赴南紀的勝浦，以此為根據地，踏進幾乎還是原始狀態的熊野那智，妙法深山，遠離塵寰，獨自過着極寂寞的生活，而從事於生物的採集研究。如此，繼續三年，自明治三十七年十月起即定居於熊野之田邊，年四十方娶妻成家。

一方面，孫文在東京、橫濱間，向留學生及華僑鼓吹革命機運，明治三十六年八月離開日本再度周遊歐美。三十八年夏，又來日本，以後大約二年，往來於日本及南洋之間，專心致力於革命運動，可是當時由於清政府之要求，日本政府時而禁止孫文的停留及登陸。歲月遷移，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在武昌舉起辛亥革命烽火，快報也傳至偏僻的日本熊野之地，當時南方給人的信裏寫道：「電報看到黃興起兵引起大亂，余與孫文亦有宿願，倘若革命具體化時，即前往軍中慰問。」佐藤說道：「據說倘若孫文平定中國時，將設立一大植物園，聘南方為園長。」此語雖不知其來源，但總不至於是無稽之談。

辛亥革命成功，孫文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不久辭職，翌民國二年即大正二年之二月，此次並非如以前之以亡命之徒，而是以前大總統的身份來日本，逗留月餘，受日本朝野的大歡迎，席不暇暖中，仍不忘舊友南方之事，似欲設法會見。據大正二年二月二十日南方給人的信內有：「前天，孫逸仙透過伊藤知也氏，傳言小生如能去和歌山，孫文即來和歌山相會，因船行危險，故命家弟婉謝之。」當時南方患眼疾，獨自一人由海路往和歌山確有困難。要是常人的話，必將多方設法興高采烈，前往會見，南方畢竟與眾不同，當時和歌山與田邊之間尚無鐵路，來往都是靠船隻，所以即使極欲和他見面，以孫文百忙之身，當然也無暇經由海路到田邊去。僅以孫文願遠行至和歌山相會，即可察見其友情之深。孫文於二月十四日抵東京，三月經大阪神戶到九州，三月二十二日聞宋教仁被殺，隨即由長崎返國。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孫文病逝於北平，是年九月二十一日，南方給人的信裏，說到與孫文三十年來交情之事，兼敘世態炎涼，在短短的文句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慨，使讀者不由得感到人生的虛幻無常。茲將原文抄錄於下：

孫逸仙之事，因係舊事，小生記憶容有不確，在倫敦最有親交者，乃為小生與愛爾蘭人摩根……，在倫敦之時，與孫文最有親交者，雖是小生，惟小生回國後，自於橫濱偕同溫姓商人來訪之後，未再相見，又在夏威夷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十四日

七二六

夷期間，屢次來信，如今尚存有在夏威夷火山搜集寄來之地衣標本，惟嗣後，全無消息，祇因小生流浪於熊野，由於種種不便，以致音信斷絕，每逢孫氏來東京時，均先來信邀往東京，因小生無錢，說也沒用，終於連回信亦懶了。……孫氏得意之時，曾一度來東京，那時和歌山的人們，表示欲以小生為媒介，迎接孫氏來和歌山，但小生回顧上次孫氏來時之和歌山人的作法，答以如和歌山的人們前往，必定會吃閉門羹。小生曾介紹若干人會見孫氏，當時以介紹此奇異浪人而噴有煩言，不屑一顧的就是這些人，其中也有當了大臣者，一旦孫文得意之時，就如同自己親友去拜訪，不知所談何事，好像與孫文做過大議論似地大吹特吹，世態如此。小生對孫氏一無不情不義之處，但人之交往亦有季節，……因此小生雖和孫氏特別親密，但是在自己本身的做法上不得不停止通信。

趨炎赴熱乃俗人之常情，南方以白眼觀看這種世態，南方自然而然地和孫文疏遠，亦出於不得已，「人之交往亦有季節」一句話，意味深長矣。

大正十年，東京方面的有志一同企劃設立「南方植物研究所」，觀看其宗旨書，有一支那南國的統領孫文曾曰：「南方乃天下第一人，一旦得此人，足以兼營文武。」云云，筆者真想查明孫文的這一句話之確實出處。

南方的門人中山太郎氏寫的文上，載有昭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南方去世前數個月寫給中山的信內有：「願一切藏書、雜品一起寄贈中山大學為常備品，以為與故孫文氏間的交誼紀念，供為中日親善之資。」之語未知其真意如何？且未見實現，暫且以此為孫文和南方一文之結束。以下或許屬於閒話，惟從英國回來的南方，在學問上精益求精，將其成果，不斷投稿於「自然」及其他西方一流的學術雜誌，更為世界的學界所重視，但是在日本就異於英國，任何一個雜誌均不予理睬，再三投稿均被束諸高閣，至明治四十一年，始有二三個雜誌刊登。然而偏見且量狹的日本學界，儘說學歷，學位等瑣碎話，繼續輕視這個大學者。不在乎這些的南方，因其人物太過偉大，屬於世界大學者反不容於自己的家國。

焉知同樣對生物學有濃厚興趣和造詣的日本天皇，每繙外國的專門雜誌，屢次看到日本南方之名，久久覺得奇怪，終於機會到來。昭和四年六月，以軍艦長門行幸至紀州，停泊於田邊灣之時，召見南方，特在南方引導之下，

採集生物，更在艦上，聽取南方的生物學上的進講。不過，南方在日本仍然默默無聞，旋於昭和十六年十二月病歿。其後，經過十年，「南方熊楠全集」十二卷被刊行，惟據說這只是南方遺稿的五分之一而已。當時由於戰敗後不久，日本人正喪失國家自信心，所以某報紙寫道：「世界那一個一等強國有像南方熊楠這樣的人物，古今中外僅此一人，日本決不是四等國家。」實際上僅舉出南方，日本人就可向世界誇耀，加強自信心。

昭和三十七年五月，天皇再度行幸紀州，思念南方詠和歌一首。其後經數年，南方紀念館得以建於紀州白濱，不可否認的，也是天皇對南方的優渥心意，影響人心所促成。

中國的國父孫文，日本的大學者南方熊楠。一以革命，一以學問，報其祖國，在其最大的愛國者一點上，兩者相共通的。這兩個人，不期而遇於英京倫敦，肝膽相照以來，雖說對國父的革命事業無直接關係，但是終生互相抱着純粹友情的事實，冀望在國父研究上的遺欠處，予以補充。

後 獻

余昔供職於日本宮內省，由供奉今上陛下行幸紀州的人們聽到南方熊楠之事，始悉日本有此偉人。惟據說是生物學家，所以並不寄予多大關心。其後經過二十年，南方的全集出刊，讀此始知南方和孫文之關係，頗感驚訝。其後，搜集南方的傳記，雖獲數種，但皆為杜撰者，去年秋出版的笠井氏之「南方熊楠」可能為最完善者。余本來對南方的學問毫無所知，是以並無談論南方的資格，僅僅想要將孫文和南方的關係，詳細予以傳達而已。去年曾訪問南方紀念館及南方的故居，雖得會見該地的故老，但仍然未能充分達成目的。如屬可能，將來擬乞求南方的遺族，給予方便。上文僅止於初度報告，如能有再度報告機會，則幸甚矣，請讀者原諒。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九一——九二。

註二：參照木下彪「孫中山與南方熊楠」，「中西文化」第九期，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一日臺北出版。

註三：同註二。

二十二日（三月二十四日） 清河南巡撫劉樹棠密奏反對中俄密約。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清河南巡撫劉樹棠，以中俄密約中國虧損甚鉅，易招列強瓜分之禍，密奏反對該約，主張聯英以制俄，變法以圖強。其原奏曰：

「河南巡撫劉樹棠奏，爲恭摺密陳事：臣聞自強者不改，因人者無成。去歲以來，道路傳聞皆謂與俄羅斯國定有密約歸其保護，臣初不之信，近乃有人以約稿鈔示。中言中國准俄國西伯利亞接築鐵路，由黑龍江以達吉林省城，歸俄國管理，准三十年贖回。復由吉林代築鐵路，經奉天以達牛莊，准十年後贖回，均照俄國章程辦理，並准其自派馬步兵保護。又由東膠州灣賃與停泊兵船，遼東大連灣旅順口歸其保護，並准駐海陸各軍。又黑龍江吉林長白山一帶，准中俄百姓開礦等語，計十二事，事事皆俄人經營西比利亞鐵路求逞之雄心，而鐵路既成以後，必肆之兇餓，此固我國朝野上下及泰西各國所稔知而熟慮者也。臣檢閱之下，既駭且憤且疑，以爲猛虎將噬人，乃惜不能飛又從而傳之翼，此固必無之事。既而詳譯約稿，見有自中日交戰以後俄國助中國索取遼東等語，或者俄挾此以要我亦在意中，不然此十二條皆我所萬不能允准之事，大利彼國，於我有無窮之害，而無毫釐之利者也。臣請爲我上哲披瀝陳之：

俄自窺伺印度之謀不遂，乃改計東封，西比利亞之鐵路命三道並舉，限五年藏事，其急急不遑者，先實注意朝鮮，以爲彼囊中物耳！不圖路未成而日人先之。代索遼東之舉，特其變計所出，非真有愛於我，果如新約所議，准其接築鐵路，由黑龍江而抵吉林，復由吉林而至奉天牛莊，凡此鐵路所經之地，不必三十年，十年之後臣決其必非我有矣。其約文曰：鐵路歸俄國管理，俄制不同於各國，既曰管理，則不得不分段設官。又曰准其派兵保護，既准其保護，則不得復限其兵馬數目。官隨地而可設，兵隨地而可駐，毫無限制，豈復尚有自理之權？其第七條曰：中國黑龍江吉林長白山一帶之礦，從未准人開採，自此約訂後，准中俄百姓開採，向未准開採者且因俄人而弛禁，其他產業蓋已視爲固有之物。三十年十年以後果能不渝此盟，如約贖回，而積重之勢已成難返，我擁其虛名，彼享其實利，抑或屈回贖之時，彼數倍其價值以勒索，如奧人挾持土耳其故智，我亦將舉天下利權歸其會計，若土之聽命於奧乎？此猶患在異日者也。請言其近者，各國深忌俄強，曩僅陸師稱雄，其水師之在波羅的海黑海間者處處受制，近雖能遊弋地中海，而由印度洋以趨南洋，煤水皆仰給於人，殊不便利，若准在膠州灣屯泊兵船，遼東灣、大連

灣、旅順口諸處駐兵，復有自彼得羅堡以達牛莊之鐵路一氣灌輸，其關係歐亞利害尤大，各國不責問於俄，必發難於我，恐俄之保護未成，而各國之責言先至，此猶患之在外者也。請言其在內，東三省之棄置勿論矣，門戶既開，藩籬盡撤，腹心爲所盤據，手足爲其縛繫，一有違言，禍端立見，其陸師循榆關而南，其水師掠直東而北，防不勝防，備不及備，禦敵於閭闔之近，思之寒心。然使有利可圖則猶可說，今我商務未興，土貨無多，鐵路之成祇以暢銷客貨，耗蠹民財，於彼有益，於我則大損。或者謂東三省鐵路之築，諸臣早建此議，然前日之議專爲防俄，今使俄人自爲之，如原議何？或又曰西伯利亞之鐵路綿亘新疆、蒙古、黑龍江、吉林諸省，俄固已視東三省若杞上肉，不若因而與人以圖日前之安，徐爲恢復之計，爲此說者是飲鴆酒以解渴，餐毒脯而療飢，豈謀國之忠哉？至約中開礦一條尤萬萬不能應允，臣決以爲理所必無，未便置議。總之，此項約章，臣固深知其僞而不能無疑者，特疑俄人耳！如果實有此約，不妨請各國使臣按公法評論，事關各國利害，必不至袖手旁觀。即使並無此約，而俄人之交亦萬不足深恃。臣嘗縱觀各國大勢，惟俄國主權獨重，專以開疆拓土爲雄，其餘之國主權皆主於商業，非萬不得已不邊與戎。臣逆料此數十年內俄不生心，可保他國無兵戈之事，若與俄人訂立此約，竊恐合從之師不旋踵而卽至，吳越之人同舟則共濟。臣聞泰西各國本有緩急相救之私約，其共事之國必其利害相同，今各國之中惟英吉利商業在中國居十分之七，俄如得志於東，英之商務必大損，且於印度國勢亦有未利，往年帕米爾定約，英先遣我車里以西之地，意實結我以防俄，迨日韓事起，以我爲不足共事，卒乃毀約敗盟，英人雖嗜利無信，究之利害所在，緩之則離，急之則合，若許以額外利益，如日人待英德故事，彼既悅於害，又動於利，必能爲我外援，上年保護長江之案可以借鑒。蓋保我卽所以自保也，以大勢論自應舍俄而取英，其餘各國與我休戚雖不相關，亦當聯絡羈縻，厚結美德，散其連橫之謀；包容俄法，消其桀驁之氣。徐以修我政令，飭我戎行，中國四萬萬之人材，二十餘省之物產，環地球之所不能及，窮久必變，急則治標，但能改用金幣抵制外洋之盤剝，而財不外溢；廣興工藝供應各國之取求，而逸以待勞。致富之策，一新自強之基，斯立何爲，仰息於人，虧國體而灰士氣，況以包藏禍心之俄，引爲可共患難之助，猶所謂獨坐窮山養虎自衛者也。臣既有所見，不敢不貢其愚忱，以備聖明之採擇，謹恭摺密陳，謹奏。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二十二日

七三〇

按：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一八九八年六月三日）中俄密約簽訂後，各國均不知其詳，報紙所載，均屬揣測之詞。上海字林西報曾刊登一偽造密約，計十二條，謬稱係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由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與總署大臣簽訂者，即歐美人所稱之喀西尼條約（Cassin's Convention），一時哄傳遐邇，人多信之。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山東巡撫李秉衡，首先奏請改議中俄密約，即以此偽約為根據。（註二）本日河南巡撫劉樹棠之摺，亦以此偽約為本，與原約差別甚大。其後美人林樂知（Young J. Allen）所輯「中東戰紀本末」，亦將此偽約錄於其中，梁啟超之「論李鴻章」則誤稱此偽約係鴻章在俄國所簽訂者。（註三）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正月初六日，中俄密約全文首由李經邁揭載於倫敦日報，而中國政府正式公佈此密約，則遲至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華盛頓會議之時。當時由於國聯秘書長休斯（Hughes）之請求，中國北京政府將密約送交國聯登記。俄國方面密約存於外務部，由雅克翰提夫（Yakentoff）負責保管，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正式公佈。（註四）

附錄：王芸生撰「中俄密約辨偽」（註五）

中日甲午戰後，因三國干涉之結果，中國雖將遼東半島收回，竟開列強劇烈角逐之局，幾肇土崩瓦解之禍。而此後之庚子事變，日俄戰爭，歐洲大戰，以至數十年來糾結莫解之滿洲問題之一串悲劇，莫不淵源於是。推原禍始，李鴻章使俄所締結之中俄密約，種下直接的惡因，德國占領膠州灣，則為此一串大悲劇之爆發點，此治近代外交史者所周知者也。而就歷史的演進言，中俄密約為因，膠事件為果，俄占旅大，法租廣州灣，英租威海衛，日劃福建為勢力範圍，又為相聯之果，直至現在之遠東局面，亦基因於是。故即在今日言之，中俄密約之意味猶甚重大也。

中俄密約，係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赴俄賀尼古拉斯二世加冕時在莫斯科所訂。然當時所傳之中俄密約，計三個之多：

一、俄法德三國干涉馬關條約之時，王之春方奉清廷之命赴俄，晤亞力山大三世之喪，兼賀尼古拉斯二世即位

，各國即傳王與俄外部訂有密約，上海字林西報於三月二十七日（西曆）揭載密約之條文。

二、即李鴻章在莫斯科所訂者。

三、喀希尼條約（Cassini Convention）。

上所傳三密約，第一個出於好事者之偽造，當此傳之時，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曾向俄國質問，經俄外部否認。俄國駐英公使同時亦聲明辨誣。當時世人雖不免疑慮，然亦無人能作肯定斷語。近已證明其偽。至第二個，當李鴻章赴俄賀俄皇加冕時，世間頗疑有一幕秘密交涉，然以事極機密，無人知其底蘊，直至華盛頓會議時，始由中國代表節要發表。至所謂喀西尼密約，傳係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Count Cassini）於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與清廷軍機處王大臣簽訂。條文亦係由上海字林西報揭載，計十二條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前於中日肇釁之後，因奉大俄羅斯國大皇帝仗義各節，並願將兩國邊疆及通商等事於兩國互有益者，商定妥協，以固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國欽命督辦軍務處王大臣爲全權大臣，會同大俄羅斯國欽差出使中國全權大臣一等伯爵喀，在北京商定，將中國之東三省火車道，接連俄國西卑利亞省之火車道，以冀兩國通商往來迅速，沿海邊防堅固，並議專條，以答代索遼東等處之義。

第一條 近因俄國之西卑里亞火車道竣工在即，中國允准俄國，將該火車道，一由俄國海參威埠，續造至中國吉林琿春城，又向西北續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國境某城之火車站，續造至中國黑龍江之愛琿城，又向西北續至齊齊哈爾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訥地方，又向東南續造至吉林省城止。

第二條 凡續造進中國境內黑龍江及吉林各火車道，均由俄國自行籌備資本，其車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國火車章程，中國不得與聞，至管理之權，亦暫行均歸俄國，以三十年爲期，過期後，准由中國籌備資本，估價將該火車道並一切火車廠器機房屋等贖回。惟如何贖法，容後再行妥酌。

第三條 中國現有火車路，擬自山海關續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續至吉林，倘中國日後不便即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二十二日

造此鐵路者，准由俄國備資，由吉林代造，以十年爲期贖回，至鐵路應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

第四條 中國所擬續造之火車道，自奉天至山海關，及牛莊，至蓋平，至金州，至旅順口，以及至大連灣等處地方，均應仿照俄國火車道，以期中俄彼此來往通商之便。

第五條 以上俄國自造之火車道，所經各地方，應得中國官員照常保護，並應優待火車道各站之俄國文武各官以及一切工匠人等，惟由該火車道所經之地，大半荒僻，猶恐中國官員不能隨時保護周詳，應准俄國專派馬步各兵數隊，駐紮各要站，以期妥護商務。

第六條 自造成各火車道後，兩國彼此運進之貨，其納稅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陸路通商條約完納。

第七條 黑龍江及吉林長白山等處地方所產五金之礦，向有禁例，不准開挖，自此約定後，准俄國以及本國商民隨時開採，惟須應先行稟報中國地方官，具領護照，並按中國內地礦務條程，方准開挖。

第八條 東三省雖有練軍，惟大半軍營仍係照古制辦理，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國借請熟習營務之武員，來中國整理一切，其章程則與兩江所請德國武員條程辦理無異。

第九條 俄國向來在亞細亞無周年不凍之海口，一時該洲若有軍務，俄國東海以及太平洋水師，諸多不便，不得隨時駛行，今中國因鑒於此，是以情願將山東省之膠州地方暫行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爲限，其俄國所造之營房機器廠船塢等類，准中國於期滿後，佔價備資買入，但如無軍務之危，俄國不得即時屯兵據要，以免他國嫌疑，其賃租之款，應得如何辦理，日後另有附條酌議。

第十條 遼東之旅順口以及大連灣等處地方，原係險要之處，中國極應速爲整頓各事，以及修理各砲臺等諸要務，以備不虞，既立此約，則俄國允准將此二處相爲保護，不准他國侵犯，中國則

允准將來永不能讓與他國占踞，惟日後如俄國忽有軍務，中國准將旅順口及大連灣等處地方，暫行讓與俄國水陸軍營，泊屯於此，以期俄國攻守之便。

第十一條

旅順口大連灣等處地方，若俄國無軍務之危，則中國自行管理，與俄國無涉。惟東三省火車道，以及開挖五金礦諸務，准於換約後即時便宜施行，俄國文武官員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處，中國官員理應格外優待保護，不得阻滯其遊歷各處地方。

第十二條

此約章兩國御筆批准後，各將條約照行，除旅順口、大連灣及膠州諸款外，全行曉諭各地方官遵照，將來換約應在何處再行酌議，自畫押之日起，以六個月為限。（據中東戰紀本末續編卷一頁三十九至四十一）

上列條文經字林西報刊載後，哄傳遐邇，美人林樂知所編之「中東戰紀本末」，為之譯錄，梁任公所著之「李鴻章」，亦將此約文引錄，（見飲冰室文集卷四十四至四十九）惟任公謂此約即李鴻章在俄所訂，顯屬誤會，因李約僅六條，略約則十二條也。東亞同文會編纂之「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輯入此約，並加以圖說。（頁二三四至二四〇）前駐華美國公使馬慕瑞（MacMurray）所纂之中國關係條約集（*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亦將此約輯入。以是此約之存在，儼若世所公認，近人之著作中，尚不少援引者，如雷殷之「中東路問題」，即以此約為中東路之起源。余近纂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至「李鴻章使歐與中俄密約」一章，綜覈羣籍，頗疑此約之非真。其故如下：

第一、當時俄國之東方政策，全操於財政大臣威特（*Count Witte*）之手，中俄密約即係彼與李鴻章所簽訂。彼之自行錄（*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中，述與李鴻章交涉密約及東方諸事甚詳，而獨無一語涉及略約。

第二、「翁文恭公日記」記李鴻章使俄，逐日皆有記載，關於議訂密約之事，皆不諱言，而無與喀西尼立約之記載。翁同龢時為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督辦軍務處會辦，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參與一切軍國機密，李鴻章議約之密電，即翁與張蔭桓經手收發，若有略約，彼豈不知？且翁為人慇直，富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二月二十二日

七三四

血性，對於華俄道勝銀行合同，翁日記中即有『百方飭我，可恨，可歎！』之牢騷語，若略約之大量的喪權辱國，彼更將痛哭流涕，何竟無一語及之？

第三、中東路之路線，與李約第四條「爲使俄國陸軍到受脅迫之地點便易起見，並爲使俄國軍需不受阻礙起見，中國政府允許橫過黑龍江、吉林二省向海參威建築一條鐵路」之文義相符，而略約第一條之路線，則與中東路不同。

第四、據字林西報所載之略約簽字期，爲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據翁同龢日記，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即西曆九月二十八日）翁與慶王奕劻、張蔭桓同至俄使館，互換李鴻章所訂之密約，曾簽換約文憑。是日翁日記云：「發下密約要件，午正詣樵野（張蔭桓字），開看要件。遂歸檢磁器，爲略使驢。樵野來，未正二刻，同詣俄館，以酒果款我。慶邸（指慶王奕劻）於中刻到，始就坐，談數刻，始以要件互看，以一本交之，留一本（畫押者）爲據。以漢文憑單二件，三人銜名下各畫押，各用名印訖，因不用總署印也。法文憑單二件，照樣畫押用名印，遂各留一件。遞時各言兩邦交日密，永敦和好。又就坐舉酒互祝而罷。」或尙誤會此即簽約者，則次日（八月二十三日）日記云：「隨往壽皇殿，同行禮，卯正三刻見起，奏明昨日互換事，將管鑰及兩要件繳上，垂詢頗詳。」可見係換約而非訂約。翁、略等換約之期，距所傳之略約期僅差兩日，所傳之略約，恐即翁、略等換約之誤會。

第五、東西史籍引錄略約者，大多十年前出版者。最近俄人雅康恩達夫（Victor A. Yakheutov）著一書，名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East。書末附錄有帝俄及蘇俄所訂之條約。其中有五個密約，第一個即李鴻章所訂者，其餘四個皆俄國與日本所訂。雅氏所錄諸約，得自俄外部檔冊，若有略約，當不致遺漏。

第六、德國占領膠州灣，當威廉二世訪俄時，與尼古拉斯二世早有夙約，俄國外交大臣穆拉維夫猶對德抗議，以爲破壞此項密約，蓋謂依照略約中國已允將膠州租讓與俄國。此係外交上的一種詐術（bluff），旋即證明其妄。駐德英國公使拉塞爾斯（Lascelles）致英首相沙里斯百瑞（Salisbury）函中即謂：「穆拉維夫迭次

援引之喀西尼條約，已由中國政府方面證明其不確」。(…ascertained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Cassini Convention which Count Muravieff had more than once invoked had no existence in fact. *in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War*, p. 5.)

第七、當字林西報揭布喀約後，山東巡撫李秉衡，曾據所傳，陳奏利害，請敕下王大臣改議。(見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四頁十一至十六)翁文恭公日記丙申十二月初十日云：「李秉衡論中俄條約，語極切直，惟所見者，申報妄傳也。」尤爲一有力之證據。

因以上各點，余頗疑所謂喀約者出於好事者之偽造。然余謙陋，未敢自信，因將上舉意見，質諸蔣廷黻教授，旋得蔣先生覆書，略謂：

「……所謂喀西尼約，當無此事也。但乙未年李與喀使已起始交涉，且有相當諒解。字林西報得知此事，即以所交涉之題目及諒解，擬成條約，足證該報訪員之能探新聞也。……」

此一哄動世界之多年疑案，竟由投機的新聞記者構成，亦足反映十九世紀國際外交之曖昧情形也。

根據上述論據而歸納之，所謂中俄密約，實只有李鴻章所訂之一個，至字林西報前後刊載之兩條約，俱屬廢鼎。此事前人或已先我發見，而尚在暗中摸索者，或亦不乏其人，爰不揣謏陋，敬以質諸研討東方外交史者。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頁十三——十六。

註二：同註一，卷一二四，頁十四——二十。

註三：梁啓超「論李鴻章」頁六一——六三，民國二十五年中華書局出版。

註四：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Chaps. XI, p. 407.

註五：錄自「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二十八期。

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六日） 清廷從總署奏，命各省將軍督撫酌度土宜，集股設廠，官助商本，自濬利源，而杜外溢。

先是，給事中褚成博奏請籌款廣設紗機廠，以抵制洋商在內地設廠，改造土貨。旋總署議奏曰：

「查絲紗爲土貨大宗，欲設廠製造抵制洋商，自非官商合力，廣籌鉅款，不能集事。上年閏五月間欽奉諭旨，令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爲製造，即據署兩江督臣張之洞、江蘇撫臣趙舒翹電稱：將息借商款銀二百二十六萬兩移爲開辦商務局之用，先於無錫設練絲廠，兼開繭行，此外各廠，擬設於上海或蘇州，至織布紡紗機廠，約費銀一百萬兩，籌款另議，各省督撫臣先後陳奏，類能仰稟聖謨，設局招商，各就本省物產之宜，量籌製造，似於向來官商隔膜之弊已漸次消除。惟辦理經年，究竟籌款若何？設廠幾處？有無成效？迄未奏咨。即張之洞趙舒翹擬移息借商款，開辦商務局。究竟已否辦成？亦無續報。該給事中請由各省將軍督撫酌度土宜，集股設廠，官助商本，逐漸推廣，自足濬利源而杜外溢，應照行。原奏所稱，公舉殷實廉幹之人分任廠務，由地方官認真督查，並准官紳量力附股，至年底將章程款目詳刊一節，前年十二月間，臣衙門議覆御史王鵬運設立商務局摺內，擬由各商公舉殷實穩練之紳商派充局董，仿照總稅務司貿易總冊式樣，年終由督撫咨送臣衙門以備參考，業經奏准通行遵照在案，此次絲紗各廠，應仍由各省將軍督撫查照前奏辦理，各廠中如有弊混，自應將經管之人勒賠重處，第須附有股本，始能入廠查詢，原奏所稱不論何人皆准赴廠辯詰，恐滋紛擾，至督轄大吏，原當竭力維護，嚴剔弊端，但祇能握其要領，不能瑣屑躬親，似難深悉廠中有無弊混。若有人舉發而該管大吏不爲查理，或竟迴護，自應如該給事中所奏，量予處分，以儆玩泄。相應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各就本省情形切實籌辦，毋得徒託空言。至南北洋大臣能否各籌二百三十萬兩以爲倡導，應並請旨飭下王文韶、劉坤一迅籌辦理。」（註一）

本日，清廷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奏，命各省將軍督撫，各就本省情形切實籌辦，以抵制洋商在國內地設廠。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三九二六——三九二七。

三月

七日(四月八日) 上海南洋公學成立，是為交通大學之前身。

先是，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冬，清大理寺少卿盛宣懷，奏請籌設南洋公學於上海，以造就新學人材，旋奉旨允准，並派盛宣懷為督辦。本年二月，先設師範院一學堂，考選學生四十名。本日南洋公學假上海徐家匯民房正式開學。宣懷奏派何嗣焜為總理，張煥綸為總教習，並附設譯書院，聘請東西博通之士，翻譯各國新出名著。(註一)

附錄：

一、盛宣懷「籌集商捐開辦南洋公學摺」(光緒二十四年四月)(註二)

奏為籌集商捐開辦南洋公學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世變日棘，庶政維新，自強萬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與夫海內識時務之俊傑，莫不參用西制興學樹人為先務之急。臣於光緒二十二年冬間附奏請設達成館片內，曾經陳明在上海地方籌立南洋公學，嗣以捐款難集，而達成館之請已奉總理衙門王大臣等議覆，應由戶部撥款辦理，欽奉諭旨飭遵。又經臣奏明將原擬捐設達成館之款，還充南洋公學經費在案。臣惟師道立則善人多，故西國學堂必探源於師範，蒙養正則聖功始，故西國學程必植基於小學，中外古今教學宗旨本無異同，特中土文明之化開闢最先，歷世愈遠，尚文勝質，遺實採華。而西人學以致用為本，其學校之制轉與吾三代以前施教之法相闇合。今日禮失而求諸野，講西學，延西師，學堂之規模近似矣。然臣前年創設天津頭二等學堂，旁求教習，招選生徒，大抵通曉西文者多，懵於經史大義之根柢，致力中學者率迷於章句咕嚕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學者亦難精擇。竊喟然於事半功倍之故，蓋不導其源，則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則構不可得而固也。初議籌設南洋公學，擬照天津分設頭二等兩學堂，繼念京師達成館未有開辦之期，滬館雖無所依倣，不可不先行設法籌辦。況師範小學尤為學堂一事先務中之先務，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惟虞弗及。查有奏調三品銜分省補用知府何嗣焜，學術湛深，不求聞達，

臣與縱論，西學爲用必以中學以體，考核程功次序極爲精邃，志氣尤堅卓，不致始勤終惰，當經派委該員總理南洋公學事務，卽於上年二月間考選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設師範院一學堂，延訂華洋教習，課以中西各學，要於明體達用，勤學善誨爲指歸，復倣日本師範學校有附屬小學校之法，別選年十歲內外至十七八歲止聰穎幼童一百二十名，設一外院學堂，令師範生分班教之，比及一年師範諸生且學且誨，頗得知行並進之益，外院生亦多穎異之姿，能志於學，今年復將二等學堂先行開辦，名曰南洋公學中院，以次續開頭等學堂，名曰南洋公學上院，上中兩院之教習皆出於師範院，則駕輕就熟，軌轍不慮其紛歧，外院之幼童漸升於中上兩院，則入室升堂，途徑愈形其直捷。師範院諸生挑充教習，至速以一年後爲準，外院生分四班，滿三年挑升中院之四班，中上兩院各分四班，歲轉一班，閱八年而卒業。夫人才盛衰之機全視在上之取舍，伏查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安徽巡撫邵華熙奏建二等學堂，總理衙門議覆摺內有云：所稱頭等學堂教習誘掖生徒，精益求精，應如何優以仕途各節。查同文館學生每屆三年大考一次，擇其學業精進考取前列者，量予保獎或分部學習，或分發省分，或由出使大臣調充參贊繙譯等官，近且有徑請簡派出使大臣者，仕途不爲不優。又各教習殷勤講授，應照新疆設立俄文館章程，分別有無官職，奏請獎敘各等語，均經核准欽遵。今皇上復准總理衙門禮部議奏定經濟特科歲舉之制，俾天下新設學堂書院所教有用之學皆得學成而各盡其用，宇內學子莫不爭自濯磨。竊惟時事之艱大無窮，君子以致遠爲重，環球各國學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道與藝兼，惟法蘭西之國政學堂專教出使、政治、理財、理藩四門，而四門之中皆可兼學商務經世大端，博通兼綜學堂係士紳所設，然外部爲其教習，國家於是取才。臣今設立南洋公學，竊取國政之義，以行達成之實，於此次欽定專科實居內政、外交、理財三事，嗣後每年年終大考後，當將學生名籍及考定等級詳細造冊咨送各該省學政，存候鄉試年分調取錄送，惟各教習不乏體用兼備之選，職在課徒，調取不及，施教至勞，榮途轉隘，擬請將此項教習內願應經濟科歲舉者，由臣出具切實考語，咨請學政錄送，其本係舉人准與經濟科舉人一體應經濟科會試，此外擬仍請援照新疆設立俄文館章程，暨同文館學生大考前列章程，三年期滿，由臣會同南洋大臣江蘇巡撫，擇教誨有方造就最廣者，分別保獎，以仰副聖主甄陶才俊之至意。至公學四院常年經費，以輪電兩局歲捐銀十萬兩，量入爲出，僅可相當，雖初辦兩年內上院未開，約可卽存銀五六萬兩。惟開辦之費除學堂基地由臣捐購外，其餘建造房屋，置備儀

器圖書以及一切器具共需十數萬金，初擬勸捐辦理，近來商民交困，物力艱難，似茲鉅款未易集腋而成，祇能先將節存餘款動用，計不敷之數尚多，而將來如辦理譯書之費，既在常年經費之外卒業，學生出洋遊學之費亦當預備於八年之內，未有設措之方也。謹將現定公學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所有籌集商捐開辦南洋公學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五月十九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

二、南洋公學章程（註三）

第一章 設學宗旨，共二節。

第一節 西國以學堂經費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為公學，今上海學堂之設，常資皆招商、電報兩局衆商所捐，故定名曰南洋公學。

第二節 公學所教以通達中國經史大義，厚植根柢為基礎，以西國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為指歸，略倣法國國政學堂之意，而工藝機器製造鑲冶諸學，則於公學內已通算化格致諸生中，各就質性相近者，令其各認專門，略通門徑，即挑出歸專門學堂肄習，其在公學始終卒業者，則以專學政治家之學為斷。

第二章 分立四院，共二節。

第一節 一曰師範院，即師範學堂也。二曰外院，即日本師範學校附屬之小學院也。三曰中院，即二等學堂也。四曰上院，即頭等學堂也。

第二節 師範院高才生四十名，外院生三班一百二十名，中院生四班一百二十名，上院生一百二十名。

第三章 四院學生班次等級，共二節。

第一節 師範生分格五層，第一層之格曰學有門徑，材堪造就，質成敦實，趣絕卑陋，志慕遠大，性近和平。第二層之格曰勤學誨勞，撫字耐煩碎，就範圍，通商量，先公後私。第三層之格曰善誘掖，密稽察，有條理，解操縱，能應變。第四層之格曰無畛域計較，無爭，無忌，無驕矜，無吝嗇，無客氣，無火氣。第五層之格曰性厚才精，學廣，識通，行正，度大，心虛，氣靜。外中上三院學生各分四班，每班三十人。

第二節 師範生合第五層格，准充教習，外院生至第一班遞升中院第四班，中院生至第一班遞升上院第四班，上中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三月七日

七四〇

下三院學生皆歲升一班。

第三章 學規學課，一節。

日本學校規則及授讀之書，皆由文部省酌定頒行，但其初亦屢試屢改，然後定爲令式。公學課程參酌東西之法，惟其中層累曲折之利弊，必歷試而後能周而，師範院外院課程一年之內已屢有更定，應由總理與華洋教習逐細再加考核，釐爲定式。

第四章 考試，共三節。

第一節 每三月小試，總理與總教習以所業面試之。

第二節 周年大試，督辦招商、電報兩局之員，會同江海關道員親試之。

第三節 上中外三院學生未卒業之日，均不應學堂外各項考試。惟師範院及上中兩院高等學生，經學政調取錄送經濟科歲舉者不在此例。

第五章 試業給據，共三節。

第一節 師範院生考取後，給試業白據，進院試業兩月，察其合第一層格，換給第一層藍據，第二層綠據，第三層黃據，第四層紫據，第五層紅據，遞進遞給。

第二節 外院生考取，進院試業兩月，去其不可教者，質性可造者，給予外院生肄業據，遞升中院，給予中院生肄業據，遞升上院，給予上院生肄業據。

第三節 上院生四年學成，給予卒業文憑。

第六章 藏書，譯書，共二節。

第一節 公學設一圖書館，調取各省官刻圖籍，其私家所刻及東西各國圖籍，皆分別擇要購置，庋藏學堂，諸生閱看各書，照另定收發章程辦理。

第二節 師範院及中上兩院學生，本有繙譯課程另設譯書院一所，選諸生之有學識而能文者，將圖書院購藏東西各國新出之書，課令擇要繙譯，陸續刊行。

第七章 出洋遊學一節。

上院學生卒業後，擇其尤異者資送出洋，照日本海外留學生之例，就學於各國大學堂，以擴才識而資大用。

第八章 教員人役名額共四節。

第一節 南洋公學總理一員，華總教習一員，洋總教習一員，管圖書院兼備教習二名，醫生一名。

第二節 師範院並外院洋教習二名，華人西文西學教習二名，漢教習二名，司事四名，齋夫雜役二十名。

第三節 中院華人洋文教習四名，洋文幫教習四名，漢教習四名，幫漢教習四名，稽察教習二名，司事二名，齋夫雜役十六名。

第四節 上院專門洋教習四名，華人洋文教習四名，漢教習四名，稽察教習二名，司事二名，齋夫雜役十六名。

三、盛宣懷撰「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片」（光緒二十四年四月）（註四）

時事方殷，需才至亟，學堂造士由童幼之年屑累而進，拔茅連茹，勢當期以十年，欲速副朝廷側席之求，必先取資於成名之人，成材之彥，臣是以有達成館之議也。顧非能讀西國之籍，不能周知西國之爲，而西國語言文字殊非一蹴可幾，壯歲以往，始行學習，豈特不易精嫻，實亦大費歲月。日本維新之後，以繙譯西書爲汲汲，今其國人於泰西各種學問皆貫中有得，頗得力於譯出和文之書。中國三十年來，如京都同文館，上海製造局等處所譯西書，不過千百中之十一，大抵算化工藝諸學居多，而政治之書最少。且西學以新理新法爲貴，舊時譯述半爲陳編，將使成名成才者皆得究極知新之學，不數年而大收其用，非如日本之汲汲於譯書，其道無由矣。現就南洋公學內設立譯書院一所，廣購日本及西國新出之書，延訂東西博通之士，擇與繙譯，令師範院諸生之學識優長者筆述之，他日中上兩院雋才亦可日分晷刻輪遞從事，以當學堂繙譯之課，獲益尤多。譯成之書次第付刻，倘出書日多，即送蘇浙各書居分任刊印，以廣流傳，所需譯書院經費，即在公學捐款內通融撥用，並歸總理公學之員一手經理，以專責成，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五月十九日奉硃批，著照所擬辦理。欽此。

四、凌鴻勳撰「國立交通大學」（註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三月七日

七四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三月七日

七四二

自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我國風氣漸開，當時所謂官立學堂者，即有譯學館（北京大學前身），與北洋大學，在平、津兩地，相繼成立。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盛宣懷氏奏准在上海創立官辦學堂，定名為南洋公學，先招考中院生一百二十名，預定兩年之後，升為上院生。盛氏為當時新政之提倡者，且正在督辦電政及輪船招商局，因奏准由上海電報局及招商局每年撥付銀三十萬兩，為南洋公學經費。盛氏自任該校督辦，聘何嗣焜主持校務，稱為總辦。又聘美人福開森氏（John C. Ferguson）為監院，即教務長，由其規劃學務，延請西學教師，並招考師範生二十名，使之半教半讀，藉儲他日之師資，同時又開辦特班及政治班各一屆，現在臺灣之黨國元老吳敬恆、鈕永建兩氏，皆為當時師範生。而繼何氏為總辦者，有張元濟、勞乃宣、沈曾植、汪鳳藻、張美翊、張鶴齡諸氏。

光緒三十年，招商、電報兩局，移歸新成立之商部管轄，該校亦隨之改隸，改稱高等實業學堂。光緒三十二年，清政府設立郵傳部，綜轄路、電、郵、航四政，於是該校又改隸郵傳部。因經費來源與學校隸屬關係，該校逐漸開辦與交通事業有關之學科，初開辦商務科及鐵路工程科。光緒三十三年添設電機科，繼又增設船政科，以前所辦之中院及高等預科，亦改為附屬中學。宣統末年，商船科移設校外，獨立為商船學堂，為後來吳淞商船學校之前身。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第一屆鐵路科畢業，共有畢業生五名，其中四名，再由官費送往英國深造，中國學校有鐵路工程科畢業者，實以此屆為最早，國內大學辦有電機工程科者，亦以該校為最早。電機工程科第一屆畢業在宣統三年（一九一）。

該校自隸商部後，初由楊士琦為監督。光緒三十二年，唐文治繼任監督，始常川駐校，綜理校政。唐曾隨載振赴歐美考察，於新政多所學劃，在校以求實學，務實業為訓，聘請中外專家任教授，暇則講求國學，提倡體育，實行軍訓，風氣為之一新，學校基礎，實奠於此時。

辛亥革命，該校曾一度改稱南洋大學，民國元年郵傳部改稱交通部，該校仍隸交通部，改稱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仍由唐文治任校長，改鐵路工程科為土木科，中學改為四年制，另設預科一年，嗣增設鐵路管理科，則以其時鐵路展築漸多，而管理權已逐漸收回，劃一會計制度及運輸規章，需才至多也。此時該校共設土木、電機，與鐵路管理三科，及附屬中學。民國九年鐵路管理科第一屆畢業，國內辦理此科者，除當時之北平鐵路管理學校外，此為最

早。(以下略)

廣西桂林開聖學會，以尊孔教、救中國為宗旨。

先是康有為在桂林，與唐景崧、岑春煊等議開聖學會，巡撫史念祖撥銀萬兩作經費，布改使游開智亦捐款千金。本日，聖學會假桂林廣仁堂開會，以尊孔教，救中國為宗旨。士紳雲集，設有書藏、講堂、義學等，風氣大開。(註六) 知新報記其事曰：

「廣西近日風氣大開，皆由該省大吏士紳，踴躍提倡，故一切善舉，次第興辦。現大吏既於經古書院添設算學時務之課，近又於省中廣仁善堂，開設聖學會崇奉孔子，史中丞先撥萬金，以為經費，會中擬購置書籍，刊刻報紙，廣設學塾，翻譯西書各事。凡入會者不論名位學業，皆以尊孔教，救中國為宗旨，隨時捐貲，不計多少。定於三月七日開會，屆期自泉道以下，首府首縣，及各候補人員，闔城士紳，皆集會場，崇祀孔子，鼓樂行禮，極一時之盛，可為中國第一美舉。」(註七)

附錄：蔡希邠撰「聖學會序」(註八)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不然哉。夫孔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以為與人相偶，偶者，會也。天有會，地有會，魯烏有會，珠玉有會，草木有會，鬼神有會，體有會，氣有會，日月有會，聲色有會。天之會，五星集於房；地之會，江河朝宗於海；鬼神之會，黃帝會萬靈於明庭，歲終會聚萬物而蜡饗之；魚會於淵，鳥會於林，玉會於山，珠會於淵，草會於澤，木會於數；質點相會而成體，元氣相會而成化，日月相會而成望，顏色相會而成文，聲音相會而成樂，人類相會而成國，學者相會而成教；學天大之中，物物之內，不能有一而無二也，則不能無會也。有所會而後有所成，不會則散，散則毀矣。其會大者，其成大，其會寡者，毀而不成。是故會無量無算數無思議之空氣，而成爲天，會無量無算數無思議之士，而成爲地。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乾元者，會其有極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名其地曰會稽，此古今莫大莫古之會，而禹爲大會之魁也。武王大會於孟津，諸侯八百，而著王會之圖。周公建都於洛，四方民大和會，宣王大會諸侯於東都，會同有繹

，賦軍攻之詩，大會之次也。齊桓兵車之會六，衣裳之會九，會陽穀，會寧母，會貫澤，葵邱，孔子稱其仁。武王、周公、宣王、齊桓，皆大會魁也。春秋於會無譏，而鄭伯逃會，則惡之爲犇狄，是春秋之義，會爲中國，逃而不會者爲犇狄，記稱樂羣而惡離羣，孔子曰：君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若不會，則孤寡獨夫，爲不祥之實，乃謙遜之詞，冒罵之語。人情所憎惡，故孔子作春秋，以爲犇狄也。孔子弟子三千，爲士人大會之魁祖。墨子徒屬，從死者百八十人。滄臺渡江，弟子三百，孟子從者數百，呂氏春秋，記孔墨之弟子徒屬，彌滿天下，充塞天下。古今會之至大者，後漢張興、蔡宗、鄭元，弟子皆萬人。曹曾、樓望九千人，其餘數千人者不可數，太學生多至四萬，貞觀太學生，亦至萬人。程、朱、陸子講學，皆五六千人，皆自古大會，爲聖學極盛之軌，若博士倚席不講，生徒散匿於山谷，龔舍鞠爲園徙，閔馬父不悅學，則爲聖學最衰之候，而國亦隨之。若夫香山九老會，司馬溫公耆英會，皆爲元夫碩人盛事。王陽明開惜陰會，其弟子傳之，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會，先正羅文恭石蓮洞會，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湛甘泉傳白沙之學，開九十九會，與陽明相埒。其後徐華亭開靈濟宮，會者九千人，爲最大矣。若高忠憲公同善會，劉戢山證人會，湯文正公志學會，皆一時名賢盡簪講學，發揚大道，激厲後士，聖學之光，古今稱盛焉，皆會之爲功也。今小雅廢矣，聖道欲墜，學者自啗唔求爵祿外，無嘉會講學之事，斯仁人君子之所憂也。泰西一切學術庶業，皆由會出，意人以三千金之教會，而徧圖球之大地，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商會，而滅萬里之印度，世俗有文昌會，關帝會，觀音會，乃獨無孔子會，椎埋奸宄之徒，攘竊禹、武、周公、孔子之會名，而士夫乃反遜讓而避之，夫今制大合天下舉人而試之，曰會試，京邑謂之都會，省城謂之省會，凡都會省會郡邑之地，皆有士夫湯沐，商賈輻輳，各大會其鄉人，經營室館，而名爲某省之會，某郡之會，某邑之會，故會館彌滿於天下，其歲時宴集，則會同年，會同門，會同鄉，皆雜沓數百，雲萃鱗集，自京師迤及直省，皆是也。且夫小人有會，而君子無會，間宴有會，而講學無會，外國有會，而中國無會，雜鬼神有會，而孔子無會，此於國勢政教盛衰所關，非細故也。昔京師士夫，開強學會書局，人才萃焉，事既上聞，聖下嘉悅，升爲官局，領以大臣，歲撥巨帑，可謂盛舉矣。今桂之士夫，追同善證人志學之墜緒，發先正涑水陽明念菴之餘風，大陳圖書，廣開學會，庶幾傳孔門大教，而不墜春秋犇狄之貶，其將傳之天

下，吾樂從之遊而觀其成焉。學者其爲不悅學之閔馬父，逃會之犇狄，孤寡獨夫，離羣索居，竅啓之小人耶？抑其從禹、武、周公、孔子、朱子、陸子、陽明、高忠憲、劉蕺山、湯潛庵諸先生後耶！

註一：參照交通部編：「交通史總務編」第三冊，頁三。

註二：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二，奏疏二，頁十八——二三。

註三：同註二，頁二三——二六。

註四：同註二，頁二七。

註五：引自張其均主編：「中華民國大學誌」（二），頁一〇八——一〇九，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中華文化

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註六：「康南海自訂年譜」頁三十八，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七：「聖學開會」，知新報第十八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註八：「時務報」第三十一冊，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十五日（四月十六日） 清廷以廣東洪門會黨嘯聚為患，諭令兩廣總督譚鍾麟嚴加追捕

，留意防範。

廣東向為洪門會黨活躍之地。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孫先生文所領導之第一次廣州起義運動，曾有會黨份子參加，自後清廷乃對兩廣會黨刻意防範。本日，清廷諭軍機大臣著譚鍾麟嚴加追捕，留意防範。諭曰：

「譚鍾麟等奏：廣東石城、遂溪兩縣有三點會匪嘯聚滋事，臣等立派署瓊州鎮總兵武萬才等，統帶營勇馳往拿辦，先後報獲著匪審明正法者一百四十三名，首逆劉芝草在逃，現嚴飭各營四出兜拿。上諭軍機大臣等：匪首劉芝草及著名各匪尚多在逃，著譚鍾麟嚴飭在事各員認真拿辦，以期迅絕根株。粵東寇盜充斥，會匪名目繁多，地方防範稍疏，即虞蠢動，嗣後該督等務當嚴飭地方文武，遇有匪徒竊發，即行迅速捕拿，總期消患於未萌，勿令潛滋暗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三月二十一日

七四六

長，是爲至要。」（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三九三——三九三四。

二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 湘學新報在湖南長沙刊行。

湘學新報一名湘學報，十日一刊，每期殆四十頁；前後共發行四十餘期，係當日湖南新政運動之重要文獻。自清湖南提學史江標到任後，以「湘省報館闕如，非所以開民智而育人才也」。遂與湘紳熊希齡、唐才常等創刊湘學新報，開拓湖南風氣，並標立「端從講求實學起見，不談朝政，不議官常」、「學術爲政治之本，學術明則人才出」之宗旨，內容分史學、掌故、輿地、算學、商學、交涉六類。該報創刊後，由江標擔任發行，唐才常主筆政，撰文獨多，於素王改制及民權學說，時加宣揚。本日，湘學新報第一期刊行，江標序曰：

「嗚呼！變法其宜哉？今策之者，曰通商、興工、採礦、鑄鐵、練水陸之軍，謀舟車之捷，斯固然矣。余惟三代之時，道與器合，選舉與學校合，故人人有干城腹心之寄。漢唐而降，選舉離於學校，上下市以虛文，必待士之卓然樹立於千萬人中，數百年內者，於是始有宋韓、范、明王文成、本朝曾、左諸公，能使人不詬文章經濟爲兩涂；餘則如植鵠於數百步外，雖使后羿關弓，養由穿札，俱在不可知之數。於是反讓西人建學育才諸法，符契罔官，而曰吾華學者，歲外退歸，殆難挽救，嗚呼！存華唏矣。使者奉天子命，視學楚南，丁時局之多難，惘皇輿之失紐，攬衣屑涕，於茲三年，思以體用賅貫之學，導湘人士，懼未有當也。恭值朝廷屢有整頓書院廣求實學之議，勉設輿地、算學、方言學會於校經書院，猶懼鄉曲儒士擯埴於途而不知返，乃取門下諸生纔有所得之危言，分學凡六：曰史、曰掌故、曰輿地、曰算、曰商、曰交涉，每月約得百葉，分三期刊布，藉與海內切劘，顏曰湘學新報。點線相切而成世界，水火電氣相摩盪而成地球，國與國政教相抵逐而成強弱，人與人心力相迸奮而成政教。普之得資賜微俚耳！一憤發而師丹勝敗之機決。美之加利生，豎儒耳，一病斥買奴而南北花旗之局判。然則人患無志，無思弗成，人患無學，無思弗強。才薄力綿，誠不足語涓滴江河之效，然心力所結，毀譽胥忘，言游抑末之譏，老氏貴虛

之論，思矯其失而未能，世之君子幸進而教之。」（註一）

註一：「湘學新報」（臺灣藝文書局影印本）第一冊，頁五。

四月

二十日（五月二十一日） 俄國答聘專使吳克託穆斯基親王（Prince Oukhtomsky，（一作烏和他木斯科）抵北京，受清廷隆重招待。

先是，李鴻章曾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奉派赴俄，賀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俄國乃派吳克託穆斯基親王為答聘專使，本年四月十六日抵上海，本日抵北京。二十八日，俄專使謁見慈禧，送留聲機，慈禧極賞玩。御史丁紅長奏：「俄使心懷叵測」。嚴復則著文論聯俄之利。（註二）五月二十日，俄專使與總署大臣商談興築南滿支路，及東清鐵路與關外鐵路接軌問題，未得要領。二十五日，李鴻章、翁同龢等曾與俄專使及駐京俄使巴布羅福（A. Pavlov）談松花江行船、關稅及鐵路事。（註三）二十九日，俄專使離北京回國。

浙江求是書院成立，講求西文與算學。

本日，浙江巡撫廖壽豐在杭州成立求是書院。據其所奏該書院成立之經過曰：

「臣於上年二月間遵旨議覆臣工條奏時務摺內，陳明設學堂一條當隨時勸導舉行，嗣經中外諸臣將書院變通推廣，先後奉旨通行各省遵辦。竊維居今日而圖治，以培養人材為第一義，居今日而育才，以講求實學為第一義；而講求實學，要必先正其志趣以精其術業，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合古今中外而不易者也。歐美諸邦，學堂各千百計，自髫齡入小學，以次而中學，而大學，猶是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之制也。若船學、若礦務、若種植、若製造，猶是講武訓農通商惠工之政也。苟事事物物務求其實，朝考夕稽，弗得弗措，何學之不成，亦何事之不舉。乃積習

相仍，時變日亟，病詞章帖括之不足恃，而羣慕西學；竊恐規摹形似，剽竊緒餘，借一二西語西文以行其罔利梯榮之故智，不獨西學無成，而我中國聖人之教且變而愈忘其本，此臣之所大懼也。查浙江杭州省城，舊有敷文、崇文、紫陽、學海、詒經、東城書院六所，今方以制藝取士，勢難驟爲更張，另設則無此經費，惟有酌籌改併，因勢倡導，擇庠序有志之士，獎進而培植之，庶趨向端而成就易。泰西各學，門徑甚多，每以兵農工商化驗製造諸務爲切於時用，而算學則其階梯，語言文字乃從入之門，循序以進，漸有心得，非博通格致不得謂之學成。屏一切模糊影響之談而課其實事，庶他日分布，傳習愈精而成材亦愈衆。臣疊與司道籌議，並飭杭州府知府會商紳董，就普慈寺後現有羣屋量加修治，專設一院，名曰求是書院。即委該府知府林啓爲總辦，延一西人爲正教習，教授各種西學，華教習二人副之，一授西文，一授算學，委監院一人管理院中一切事宜。一面購置儀器圖籍，由地方紳士保送年二十以內之舉貢生監，飭據該總辦考取覆試，接見詢問，擇其行誼篤實，文理優長，並平日究心時務而無嗜好習氣者，於本年四月二十日送院肄業，但予獎賞，不給膏火，學以五年爲限，並明定規約，妥立課程，每日肄業之暇，令泛覽經史國朝掌故及中外報紙，務期明體達用，以孔、孟、程、朱爲宗旨，將有得之處撰爲日記，按旬彙送查考，每月教習以朔日課西學，總辦以望日課西學，年終由臣通校各藝，分別等第，勤者獎，惰者誚，不率教者斥，優異者存記。選翻譯之人譯述各種有用之書，爲振興學校之助，所有常年經費並教習翻譯監院及司事人等新修工資並獎賞火食等，每年需銀五千餘兩。此外尚有隨時購置儀器圖籍暨學生紙筆一切雜用不在此數。除將東城書院每年膏火銀一千餘兩全數撥用外，於各書院獎賞存典生息項下歲提息洋三千元有奇，及各局裁省減併共洋四千元有奇，合計尚不及萬，均未動支正項。當此開辦之始，規模不敢過侈，俟經費稍充，再圖展拓，省外各府屬，經臣分札飭辦，如寧波、紹興、金華、湖州、臺州、嚴州、海寧等屬，或就書院加課，或設學堂專課，各視經費多寡，議章開辦，亦均未請動帑項。臣當隨時督察，冀收實效。將來該書院學生學業成就，如有才能超異者，由臣咨送總理衙門考試以備器使，各府屬學生有可用之才，由該府稟請調省考驗，一體咨送，以廣出身，而資鼓勵。」（註三）

註一：寶宗一「李鴻章年（日）譜」，頁三六六。

註二：「翁同龢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條。

二十六日（五月二十七日） 督辦鐵路總公司大臣盛宣懷與比國銀行工廠合股公司代理人在武昌訂立蘆漢鐵路借款合同共十七款，借款四百五十萬鎊，年息四厘，九扣，期限三十年償清。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盛宣懷既拜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之命，既由戶部籌撥官款一千萬兩，另撥南北洋存款三百萬兩，先行動工興築蘆漢路。至原議中另招商股七百萬兩一事，曾派張振勳赴南洋招股，又派許應鏘在國內招股，均無應者。於是直督王文韶、鄂督張之洞，及盛宣懷，聯名奏准暫借洋債，陸續招股分還，以期速成鉅工。借洋債一事，始與美商議借，但美商對中國鐵路興趣冷淡，條件又苛。嗣又與英國及德國洋商商議，條件不合，且慮英德兩大國別有所企圖，正在疑遲之間，比國銀行工廠公司適派人至鄂商議承築，張、盛以比係小國，以鋼鐵起家，重在獲得工作，僅於購料雇工上多所較量，尚無他圖，將來合同內可載明鐵路總公司只認比國公司，不認別人，則自無慮他國干涉。於是盛宣懷即在武昌與比公司代表商議。本日，議定蘆漢鐵路借款合同十七款，此為中國鐵路借用外債之首次，亦為盛宣懷督辦鐵路總公司後所簽訂之第一件築路合約。（註一）錄其合同全文如下：

第一款 中國鐵路總公司奉旨承辦由京城之蘆溝橋以達漢口鐵路，除鐵路公司已有成本一千三百萬兩外，並准總公司籌辦借款四百五十萬金鎊，專為營造鐵路經費。

第二款 比國銀行工廠合股公司允備借款四百五十萬金鎊，九扣，實付四百零五萬鎊，分作四批交付，每批應付實銀一百零五萬二千五百金鎊，其批期列下：定准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正月初三為第一期，西曆七月初三為第二期，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正月初三為第三期，西曆七月初三為第四期，按總期兌於比京銀號，其銀號應由鐵路公司指明何家，聽候總公司自行匯兌。

第三款 比國公司借付之款，按年起息四釐，即每百鎊每年起息四鎊，其息應於遞年西曆正月七日算清。

第四款 中國鐵路總公司可允將本合同所載借款前十年不還本，由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起分作二十年還清，每年正月應還二十二萬五千金鎊，其應還利息並遞年劃還本銀，應兌於在中國之銀行，其銀行由比國公司指明何家，每年應還本利數目，另開清單附於合同之後，按照辦理。

第五款 應還利息暨所借本銀，中國總公司奏請國家批准以蘆漢鐵路及其產業與一切屬於該鐵路之物作為抵押，議定凡已允作本合同所載借款之保者，理應作該款之保，嗣後所有添借別款所允之保，不得有礙於比國公司現在已有之保。

第六款 蘆漢鐵路工程除意外之事外，應於五年內一律告竣，並即開駛運行。

第七款 無論何地有兵爭之事，兩公司均不得藉此推諉，不按合同辦理，抑或中國有戰事，倘中國國家願得在差比員之助者，該員照常供差。

第八款 比國公司派一公正諳練工程之人，代其監察修路工程，並委任籌畫辦理一切工程，惟統須呈由督辦核定施行，此員但聽督辦大臣一人調度節制，所有一切辦理鐵路之權仍歸於總公司，其在本合同期內該監察工程之人，薪水由督辦與比公司商定應給若干，由總公司支給。

第九款 鐵路總公司欲用外國工程人員，或令辦造路之工，或令管車路之事，在合同期內均准由比國公司所派監察之員代為遴薦，仍候督辦大臣核定委派，其合同聽憑督辦酌定，或定長限或訂短限，均聽督辦之便。凡總公司所用人員以及非在路工之人，除監察之員外，俱歸督辦所派之該管委員管制。再督辦所選辦無論何色人員，或華人或他國洋人，均當和衷共濟，如中外人員意見不合，悉聽督辦秉公核定，但准比公司之監察工程人員在旁聽斷。

第十款 倘以上第八款第九款所用之比國人員，無論何職，經總公司查出有粗疏庸劣不能勝任，或酗酒，或失檢誤公，或不遵督辦調度約束等情，督辦大臣可將與該洋人所訂合同作為廢紙，勒令引退，立遣離工。

第十一款 凡造此鐵路應用料件，除中國自行製造以及將來自造之件外，其中國尚未能自造之件欲向外國購辦，

第十二款

由督辦大臣與比國公司所派監察人員酌定，先以若干招商投標，但投標之件至多不過一半，無論何國商人均可得標，其餘准比公司照投標之價值，一律貨色承辦之。後遇有欲購料件曾經投標者，如比公司願照總公司所擇最廉之價值運費貨色，一律應准比公司承辦。如比公司不肯照別處最廉之價值運費，應聽總公司向別處購辦，比公司不得阻撓。如係不能分開投標之料，比公司願照總公司所擇各處最廉價值並一律貨色承辦，仍准比公司承辦，總公司探聽最廉價值運費，無論所用何法，均從總公司之便。如比公司不肯照別處最廉價值運費承辦，亦聽總公司向別處購辦，比公司不得阻撓。

中國總公司於此項鐵路所需向外洋購辦料件應按實在價值，除運費外另給五釐，即百分之五與比國公司以作酬勞之用，蓋溝至保定料件不在其內。

第十三款

凡比國所買料件，由總公司選派一人，比公司選派一人，在比國廠內公同查驗，其兩人酬勞費用各自支給，如兩人意見不合，該兩人另請一人定奪，其另請一人之經費由無理者出。

第十四款

比國公司並公司委派之人，祇認中國鐵路總公司，不認別人，中國鐵路總公司祇認比國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所立之銀行工廠合股公司，不認別人。合同期內比公司不得由他國商民接辦，並不能將此合同轉與他國。

第十五款

倘中國鐵路總公司按照本合同所訂各款妥協辦理，萬一遇有不得已之故，則中國所有應還利息及本銀比國公司當從容妥商展期，辦法利息照本合同算，如中國公司未到之期限，願將所借之款一概還清，利息即以還清本銀之日停止。

第十六款

以上所載各條款，於本日先定草合同，經中國總公司督辦大臣簽押蓋印，比國公使委派各員簽押，並由比國領事代為蓋印，總公司督辦大臣即行會同直隸總督湖廣總督具摺陳奏，候旨批准，並由總理衙門將此合同欽奉諭旨批准日期照錄咨會比國駐京大臣，於兩個月內中比兩公司照前再行畫押，即作為正合同，並由直隸總督湖廣總督蓋印，比國駐京大臣蓋印。

第十七款

此合同照繕漢文法文各二分，經兩公司翻譯校對無訛，如遇查對合同之時，漢文法文皆可為據。（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五月十九日

七五二

註二)

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成立。

先是，盛宣懷鑒於自海防議起，上下競言自強，然國家要政首重理財，西人聚舉國之財爲通商惠工之本，綜其樞紐，皆在銀行，我國亟應仿辦，勿任洋人銀行專我大利，不受重息之挾制，不喫鏹價之虧折，所謂挽外溢以足國也。故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九月二十六日在「條陳自強大計摺」中，附上「請設銀行片」，奏請「先在京都上海設立中國銀行，其餘各省會各口岸，以次添設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經理。」（註三）旋奉准設立中國通商銀行。本日，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成立，在我國銀行史上開創新紀元。同年，相繼於天津、漢口、廣州、汕頭、煙臺、鎮江、北京設立分行。

註一：凌鴻勛：「盛宣懷與中國鐵路」，「傳記文學」第九卷第五期，頁四二。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頁三〇——三四。

註三：盛宣懷：「憲齋存稿」卷一，頁十四。

五 月

十九日（六月十八日） 清廷允法國建築滇越鐵路。

本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駐京法使，允其建築自老開至雲南省城之鐵路，開採滇桂粵礦產。原照會曰：

「照得本衙門會同貴國駐京使署商議，互定中國國家法國國家按照和約條款，並以示和好情意，彼此一願將中國與越南鄰界通商來往便宜興盛，更明白詳細，專訂中國與法國前定約章內載數條辦法，專以爲此本衙門與貴使署互議字樣三節開列如左：一按照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商務專條附章第五條，並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費務林

公司與同登至龍州鐵路官局訂立合同，及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五等日，本衙門與貴使署往返文牘，現即議定，一俟同登至龍州鐵路築竣，如果費務林公司辦理妥當，中國令該公司接造往南寧百色。二按照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商務專條附章第五條，現即議定在廣東、廣西、雲南南邊三省界內礦務，中國國家開採之時，即延用法國礦師廠商商辦。三議定由中國於紅江上游水道礙難行船處所，修理疏通，並於河口至蠻耗、蒙自以達省城各旱路平墊修妥，以利貿易。定允准自越南交界起由百色河一帶或紅河上游一帶修造鐵路以達省城，應由中國漸次籌勘辦理。以上各節現在彼此互照備載作據，本衙門會同貴使署將兩國國家相同之意格遵，當即議明該節為定兩國前訂約章內載數條，並以兩國一律均霑互相信任，彼此欲盡美意用作，俾屬成就可也。五月十九日。」（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六，頁九。

二十一日（六月二十日） 清廷以黃遵憲為湖南鹽法道。

黃遵憲湖南嘉應州人，生於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卒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舉人，納貢捐道員。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以參贊銜隨出使日本公使何汝璋赴東京，居留四載，廣交其朝野賢豪，研究其致強之術，著有「日本國志」一書。旋充任駐舊金山、新嘉坡總領事，並任駐英公使薛福成參贊，見聞既廣，思想日新。回國之後，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八月，加入北京文廷式等所主持之強學會。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七月，創辦「時務報」於上海，以鼓吹變法號召國人。至是清廷任命為湖南鹽法道，乃助湘撫陳寶箴推行新政。迄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四月，因病解職，十月期間，竭全力以赴之。同年六月，奉派為出使日本大臣，滯滬未行，而政變作，得旨放歸，倖免於難。

附錄：

一、左舜生撰「黃遵憲其人及其詩」（1848~1905）（註1）

與其說我如何歡喜人境廬詩，毋寧說我比較更歡喜黃公度這個人。

我有一種自己也認為不太好的習慣：即我平日無論讀前人或同時人一篇文藝作品或一篇普通論文，我總感到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四月二十一日

先知道作者是怎样一種人的必要，假定我對一個人完全不了解，或了解而其人乃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對這個人的任何作品，或他所發表的任何意見，便懶得去理會；即偶然有機會接觸到，也無論如何不會使我對它有親切之感。

公度先生的詩，大致在四十年前，我已經在梁任公的「飲冰室詩話」中讀過一部分，但在當時我對它並沒有怎樣深刻的印象，即在後來讀他全部的詩集亦然，原因很簡單：第一、儘管作者說他所作的詩是一種「新詩」，乃至梁任公和胡適之兩位也對他這一點曾予以高度的評價；可是細細讀他全部的作品，真正能做到如他自己所說「我手寫我口」這一主張的，在他的十一卷「人境廬詩草」中，最多也不過佔十之一二，其餘的則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都還是十足道地的舊詩；甚至從某一觀點上說，他也和中國過去若干舊時代的作家一樣，歡喜在他們的作品中，搬弄許多生僻的典故，如果不加注釋，便是今天在大學研究中國文學的青年，也未必能完全了解。

第二、公度先生的詩，普通被一般的文藝批評者稱為「詩史」。公度先生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卒於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只活了五十八歲。他生存的這個時代，正是中國遭遇內憂外患的一個多事之秋，他的詩篇確實能對這一時代的陰影給以充分的反映；尤其對於甲午中日戰爭，戊戌維新失敗以及庚子拳變的經過，他所留下的鴻篇鉅製和許多慨當以慷的短件，合計起來，何止兩百首以上。這裏面披露了當時許多政治的內幕，對他同時的人物或師友也給了一種很生動的素描，尤其對他自己晚年的身世，更發瀉了不少的牢騷抑鬱。我近年因為曾在幾處學校担任過中國近代史這門課程的講授，對於甲午、戊戌、庚子這幾幕的史料，多少有些接觸；公度先生的朋友如梁任公（啓超）、徐君勉（勳）、狄平子（葆賢）、俞樸士（明震）、熊秉三（希齡）等，我後來也曾在一種偶然的場合見過；加上錢仲聯（專孫）在民國在二十年出版的這部「人境廬詩草箋注」，尤其在卷首所附的一篇公度先生的年譜，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在近來再翻閱這部詩集，覺得比較四十年前要親切得多了。因為讀人境廬詩同時我也想到：我覺得古今為陶潛、為李杜、為韓、柳這班人的作品做箋注的人，往往只是就詩解詩，就文論文，很少有人能就他們所生存的時代以及該一時代所給予他們作品的影響，作出一些條理明晰的敘述；因此大家儘管是一樣的讀陶、讀李、杜、讀韓、柳，所了解的往往只能在他們的技術與意境之間，很少能接觸到每一作家的心靈深處。近年因為多少受了西洋文藝批評和傳記文學的影響，風氣已經漸漸在變，關於這一方面的寫作，

已漸漸有些可看的東西，我覺得這樣一個趨勢很重要，今後要好好的向前發展。

第三、公度先生的少年時代，也和當時一般普通的讀書人一樣，只能埋頭做做八股文，希望從科舉方面找到一條出路。可是他畢竟是一個才氣縱橫的人，對於這類無聊的勾當，內心老大的不願，「謬種千年更國冊，此中埋沒幾英豪？國方年少吾將老，青眼高歌望爾曹。」我們只看他在戊戌後所寫懷念幾個湖南青年（李炳寰，蔡鐸，唐才質）的這首絕句，便可知他對於八股文是何等的厭惡。因此，在他二十歲考得秀才，二十九歲又考得舉人以後，便毅然決然放棄了這種應試生活，而入質捐了一名道員。便在他中舉的這一年（光緒二年），他在烟台認識了當時一位留心洋務的張蔭桓，張和他很談得來，彼此曾有唱和之作。在同年同地，他又第一次會見了李鴻章，（李此時是以和英使威妥瑪會商雲南馬加甲案到烟台來的）李對他也很有賞識，事後對人談起，居然對他以『霸才』見許，像這樣恭維一個初次見面的後進，出之於平日對人相當傲慢的李鴻章，確實是不太容易的。黃後來和李還有過多度的接觸，光緒二十七年李死以後，公度有挽李的四首七律，最後一首有兩句說「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難。」便是由於和李第一度見面而來，黃對李在中日戰後所抱的聯俄政策儘管極端不贊成，但他對李個人，却是不無知己之感的。公度先生何以會從一個做八股文寫試帖詩的舊書生，一變而成爲一個清末外交界錚錚有聲的人物？可能是受了張、李這班人多少的鼓勵，這也是在我知道他畢生經歷以後然後才明白，對於進一步理解公度的詩，這一點不能說沒有相當的關係。

光緒三年（1877），公度隨中國第一任出使日本公使何如璋到日本任了一名參贊，這便是他從事中國初期外交生活的開始。其時公度的年齡剛剛是三十歲。以他汪洋的風度，斐然的文采，在他這一任四年以上的留日時間，（日本的明治十年至十五年）他不僅結交了日本朝野不少的賢豪，（如伊藤博文、榎本武揚、大山巖諸人，都和他有交往。）對明治維新初期的經過有了深刻的認識，即對他作詩的興會，因環境和題材等等的關係，也得了一種新的鼓舞。公度對於歷史本有高度的愛好，這便從他所作的詩裏也可以看得出來；當他留在日本有了相當的時間，他便發願寫一部「日本國志」。後來這一部四十卷的大著，雖一直延到光緒十三年當他留在國內的時候才告完成，但在他留日的期間，早已開始着手。梁啟超說：

「當吾國二十年以前，羣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衝者爲吾中國。及後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見任公所撰嘉應黃先生墓誌銘）

公度在留日期間所作的詩，除「日本雜事詩」兩卷另有單行本外，保留在「人境廬詩草」中的，約有五十首左右。有人說他的「日本雜事詩」是他搜集日本史料的一種副產物，這個話大致是不錯的。就詩論詩，「雜事詩」原不怎樣重要，但從他所加的那些「自註」，却可看出他研究日本歷史和一般社會情況的努力。留在「詩草」中五十首左右的詩，在他這個集子裡，却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其時他初出國門，無論在眼光上或心境上都得了一種新的解放，因而表現於這些作品的氣象，乃自自然然的有了一種異國情調和新的意境。舉例言之，如「西鄉星歌」、「近世愛國志士歌」，這是寫日本維新前後的故事的；如「赤穗四十七義士歌」，是寫日本歷史上那種武士道的精神的；如「不忍池春遊詩」、「櫻花歌」、「都踊歌」，是寫日本一般風土人情的。可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公度所寫這類的詩，總處處表現他對日本歷史知識的豐富。胡適之先生很歡喜他的「都踊歌」，我有同感；但說到用力甚大，而詩也確實寫得不壞的，我却還是要推薦他的這首「赤穗四十七義士歌」。武士道本來是日本封建時代的一種道德，在今天的日本，也沒有什麼人特別去加以提倡，可是以生龍活虎的筆墨，寫這種可歌可泣的故事，詩總不失爲好詩。這好比我們在今天也沒有人提倡遊俠，提倡刺客，但誰說司馬遷寫遊俠寫刺客寫得不好呢？可惜這首詩的前面有一篇一千三四百字的長序，不看這篇序文，詩的好處便不能完全表現，因此不錄。現在還是把「都踊歌」錄在後面，讓大家欣賞欣賞黃公度一派的所謂「新詩」吧。

「長袖飄飄兮髻峨峨，荷荷；

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

分行逐隊兮舞傞傞，荷荷；

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

回黃轉綠兮綏莎，荷荷；

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

貽我釵鸞兮餽我翠螺，荷荷；

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

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

鷄眠貓睡兮犬不呵，荷荷；

待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

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

雙燈照兮量紅渦，荷荷；

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

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

今日夫婦兮明日公婆，荷荷；

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

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

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¹⁰

我想，假如一個人曾看過日本式的舞蹈，能欣賞他們的音樂，和服，同時又能了解他們的男女關係，一定更能懂得這首詩的好處。

胡適之先生爲「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冊寫的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說黃公度「做過三十年的外交官」，這句話是不合事實的。實際公度在日本任參贊只有四年零三個月，接着任舊金山的總領事三年半，回國住了四年多，到光緒十六年（1890），才跟薛福成到英國任駐英使館的參贊，留英不到兩年，又被調到新嘉坡任總領事，留新近三年，因爲中日戰爭爆發，張之洞由湖廣總督移署兩江，便電奏調他回來幫忙，可是他和張處得不怎樣好，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便加入了康有爲等所主持的強學會；二十二年，他和梁啟超、汪康年等，在上海發起「時務報」（旬刊）；從二十三年的六月到次年的四月，他留在我們的湖南，這一段時間，在他的歷史上很重要，我



留到下面詳說。本來在光緒二十二年，清廷曾任命他做出使德國大臣，二十四年又任命他做出使日本大臣，但都沒有成行，而戊戌黨禍已經爆發，他也幾乎不免，因為外面得着伊藤博文，內面得着袁昶等的援救，才得以放歸，而他的政治生涯便也從此結束，其時他的年齡已經五十一歲，他的自然生命也只剩下最後的七年了。綜計他一生的經歷，他正式做外交官的時間總共不過十二年而已。

「我是東西南北人，平生自號風波民，百年過半洲遊四，留得家園五十春。」這是公度先生所作「己亥雜詩」八十九首的第一首。己亥是光緒二十五年，也正是他因戊戌黨禍得罪家居的第二年，其時他已經是五十二歲。這八十九首雜詩歷叙他的生平，故鄉的風土，朋友的交遊，尤其十二年的國外生活，更為他所津津樂道。關於他在日本所作的詩，前面已經提過，至於他在美洲，留英倫，遊歐陸，住南洋，所作的詩也在百首以上，但我在這裏却只想提出他「錫蘭島臥佛」六首五古來談談。梁啟超說：「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公度雖於學術無特殊貢獻，但却是這一時代潮流中感染最深的一個傑出人物，因而他對佛學確也下過一番工夫，這一點，只要我們一讀他這六首五古便可完全明白。「錫蘭島本名楞伽，佛說楞伽經處也。山中拔海三千尺，有勝區曰坎第，有湖作牛角形，周遭可十里，故宮在焉，宮外一寺，人境廬詩所詠臥佛，即供養此中。」（見梁著「歐遊心影錄」）公度從光緒十六年隨薛福成使英，路過錫蘭，曾到此一遊，因而才有這六首長詩的創作。當時他在旅行的途中，不見得携有多種書籍，但他在寫這幾首詩的時候，運用了無數有關佛學和佛教的故事，却如數家珍，隨着他那種悲歌慷慨的心情，一一湧現於筆底。從正面詠臥佛的，僅佔六首中的一首（第二首），其餘各首，則在慨歎佛教的盛衰，印度的滅亡，以及佛教流行於亞洲各國的梗概。從這一角度，他能使我們深切感到西力東漸以後有色人種種遭遇的可悲，而佛教的衰微，又不過是其中的一端而已。假如遇着一個平凡的詩人，碰到這樣一個題目，我想可能只用幾十個幾百個字來抒寫他自己的一點感想，也許還會涉及當地環境的清幽，或進一步頌揚一番佛法的偉大，也就夠對付了。可是公度先生寫這六首長詩，却是以他洋溢的熱情，充沛的精力，夾叙夾議，首尾一氣貫注，一共用了二千五百字左右，這確是道、咸以來數以百計的詩人所絕無僅有的。現在我把這六首中比較短一點的第二首錄在下面，讓一班不曾細讀過人境廬詩的青年朋友們鼎嘗一鱗吧。

「浩浩象口水，流到菴伽山，（案：菴伽卽楞伽）遙望紫堵坡，和約僧隣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羅綿；水田脫淨衣，鬚雲堆華鬘，大青髮屈曲，圍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忉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顛？或言佛涅槃，波羅雙樹間，法即茶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踞兩山巔，至今雙足蹟，尚隔十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賈珠人，漸次成市廛，此亦造妄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貝多樹，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既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眞津梁疲，老矣倦欲眠，如何沉沉睡，竟過三千年？」

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中國人中眞正能了解日本的，殆莫如公度。戰爭爆發的第二年，公度因張之洞的奏調，到了南京，可是當他見着這位名士而兼大官的時候，「昂首足加膝，搖頭而大語，」一反普通屬員拜見上司的常態。（見康有爲「人境廬詩草」序）張之洞本來也自命不凡，同時又最講究官場的「過節」，甚至送客送到何處爲止，也必須隨被送者的官階而定，（此說得之余倦知姑丈）因此對公度並不怎樣重視，而以閒散置之。後來公度在「己亥雜詩」中有一首追述他當時一種鬱鬱不得志的心境說：

「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茫茫人海浮沉處，添得閒鷗又二三。」

他度着這種「閒鷗」似的生活，一直有兩年多，在他的詩集中有關甲午一戰的各篇，如「悲平壤」，寫我陸軍在朝鮮的失敗；「東溝行」，寫海軍的敗績；「哀旅順」，寫旅順要塞的陷落；「哭威海」，寫海軍最後的被殲；「降將軍歌」，寫丁汝昌的自殺與乞降；「臺灣行」，寫臺民的始而反抗終於屈服；大率都成於這一時期，眞可當得起「詩史」兩字而無愧。尤其「度遼將軍歌」一篇，寫一位歡喜搜集金石之湖南巡撫吳大澂，因爲得了一顆偽造的度遼將軍漢印，高興得不得了，以爲是萬里封侯之兆，因而慷慨請纓。其時與日本作戰的大率爲淮軍，既已屢屢挫失，清廷也雅有起用湘軍之意，因而命大澂督率魏光燾、李光久等所帶的二十三營出關，不幸牛莊一戰，魏、李等也依然慘敗，大澂狼狽逃歸。公度寫這首詩，莊諧雜出，把吳大澂形容得淋漓盡致，而一字一句又確係根據當時的事實，在公度寫中日戰爭的各篇中，更允推傑作。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四月二十一日

七六〇

公度到我們湖南去做長寶鹽法道，這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夏天的事。原任鹽道的本來是李經羲，因為升了湖南的按察使，到北京「陛見」去了，因此公度一到長沙，便署理了李這個按察使的職務。其時湖南的巡撫是陳寶箴，他是二十二年到湖南的，年齡已六十六，因感於對日的失敗，求改革之心甚切，他的兒子陳三立，又多方贊助之，更加上兩任以新學課士的學臺，前任江標，後任徐仁鑄，於是湖南的學風乃漸漸起了變化。自從公度到了湖南以後，譚嗣同也回了長沙，同年十月，梁啟超又被聘來湘講學，地方紳士如熊希齡、皮錫瑞、唐才常等，更莫不同心協力以改革湖南為職志。因此，湖南自二十二年以後，所倡辦的新事業，如內河小輪、商辦鑛務、湘粵鐵路、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保衛局、南學會、湘學報、湘報，乃次第出現。其維新的成績，在當時的各個省區中，確實是首屈一指。

所謂「南學會」，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學會，當時主持這件事的人，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擴大，成為地方自治的基礎。他們每七天必開會一次，由公度及梁啟超、譚嗣同、皮錫瑞、唐才常等輪流出席講演，凡國際大勢，中外學術，行政原理，都可作為他們的講題。會議是公開的，白巡撫、學臺，各司道，以及地方人士，均可出席聽講。不過從實際講來，當日南學會這般人，除一個黃公度以外，都不曾讀過外國書，更不曾到過外國，無論他們是怎樣熱心，所提出的主張，終不免支支節節，只有黃公度，他確實在東西洋各國住過一十二年，美、英、法各國政治的精神所在，他確能洞見本源。因此，當光緒二十三年他還留在北京的時候，便對當時日本駐北京的公使矢野文雄說過：「二十世紀的政體，必為英法的民主。」他一到湖南，便極力提倡人民自治。我們現在看他在南學會第一二次的講稿，他曾大聲疾呼對當時到會的聽眾說：「所求於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矣！某利當興，某弊當革，學校當變，水利當籌，商務當興，農業當修，工業當勸，捕盜當講求，……以聯合之力，收羣謀之益，……由一府一縣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到治，臻大同之盛軌。」（這篇講稿，登載當時的「湘報」，後錄入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可看出他對民主政治有何等的篤信。

公度在湖南，不到一年的工夫，光緒二十四年的四月，他便因病解除了他的職務。在這短短的十個月，他所竭

全力以赴的，不外三件事：第一、教育，如辦時務學堂和南學會之類，實際上梁啟超到時務學堂講學，便是由他勉強拉去的；第二、設保衛局，保衛局誠然包括了現在警察所做的事，但是以地方人士為主體，官方僅僅處於輔助的地位，實際乃是一種地方自治的機構；第三、改進裁判，整頓監獄，刪除淫刑，這些不都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最基本的工作嗎？可是公度先生在去今六十年以前，便已抓住了這些要點，不能不說是眼光如炬。我常說：中國最早從事改革運動的，有四個最重要的人物，都是生於廣東：孫中山，廣東香山；康有為，廣東南海；梁啟超，廣東新會；黃遵憲，廣東梅縣；這真是廣東朋友值得誇耀的地方。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公度奉了充任出使日本大臣之命，延至八月政變以後，他還滯留上海，當時有人傳說，康、梁便藏匿在公度的住所，清廷因命兩江總督查看，上海道蔡鈞，張大其事，派兵兩百名圍守，如臨大敵。實際公度當時所住的地方便是上海道公所，而康有為已到香港，梁啟超已去日本，清廷所以要這樣做，因為他們確認公度乃是參與維新運動的一個要角，乃不惜架詞誣陷，想把他逮捕到北京去問罪，幸而得着中外人士的多方援救，才倖免於難。

戊戌政變這一幕，除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康、梁遠逃異國而外，李端棻、張蔭桓則遣戍新疆；徐致靖則下獄永禁；陳寶箴、江標、徐仁鑄、文廷式、陳三立、熊希齡等則革職永不敘用，甚至連一個經師，僅僅在南學會演過幾次說的皮錫瑞，也被革去舉人。這些人大率是公度的好友，有的還在湖南和他共過一時的事，因此，公度儘管得旨放歸，但精神上所遭受的打擊却已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他為這件事，為這些朋友，也寫過不少的詩，有一首題為「仰天」的七律，乃更足以表達他滿腔的孤憤。詩曰：

「仰天擊缶唱烏烏，拍遍闌干碎唾壺。病久忍摩新髀肉，翅餘驚撫好頭顱；篋藏名士株連冊，壁掛羣雄豆剖圖，敢託鴛鴦從鳳駕，自排閭閻撥雲呼！」

公度這種憂國家愛朋友的孤憤，是不是可以到此為止呢？不然：從戊戌的八月，到庚子的七月，不到兩年工夫，慈禧太后和載漪、徐桐、剛毅這般頑固的王公大臣，因為痛恨維新之故，仍在繼續不已的拼命反動。當時他們集矢於光緒帝，決心非把他廢掉不可。可是這一舉既得不到國際的贊同，而康、梁等的保皇運動反得着外人的庇護，

同時地方上有力的總督，（如劉坤一）和民間的知識份子，（如上海的經元善、蔡元培等）也都不以廢立爲然，聯合多人，通電反對，因此頑固派被逼得只好採取緩進步驟，乃有立溥儀爲大阿哥的一幕出現。可是頑固派決不死心，他們既已發覺外國人是使得他們的計劃無法實現的最大障礙，其時對外人的「一種嫉視心理，乃如憤火中燒。拳匪起於山東，不久即蔓延於直隸，以「扶清滅洋」爲稱召，以神權煽惑愚民爲方法，以一種帶有若干宗教色彩的秘密組織作爲他們活動的骨幹，而甲午戰爭以後列強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又確實給予他們一種排外的最好口實。慈禧和載漪、徐桐、剛毅這般人的頭腦，確比拳匪中的「大師兄」如張德成、曹福田之類高明不了多少，因此一拍即合，乃有庚子一幕的悲劇演出，清廷因此而陷於非亡不可，而整個國家也因此幾乎陷於萬劫不復。

其時公度住在他的家鄉，一天天聽到這種來自北方的惡劣消息，只是束手無策，不得已乃把他哀時念亂的悲憤，一一托之於詩。計自拳亂初起，迄次年和約成立及慈禧和光緒帝的重回北京，他爲這件事一共寫了八九十首的古今體詩。儘管措辭相當含蓄，可是對於慈禧及當時的首惡諸人，確曾顯明的加以指斥。他所寫『五禽言』的第四首，便是明指慈禧的專橫誤國，因爲寫得生動有趣，且極合當時的事實，現在我把它錄在下面：

「阿婆餅焦，阿婆餅焦，阿婆年少時，羹湯能手調；今日阿婆昏且驕，汝輩不解事，阿婆手自操。大婦來，口譏謔；小婦來，聲囂囂；都道阿婆太領高！豆其然盡煎太急，炙手手熱驚啼號，阿婆餅焦！」

「婆餅焦」是一種山鳥。「阿婆年少時」兩句，是說慈禧年青時佐咸豐帝平定太平天國是相當能幹的。「今日阿婆昏且驕」以下三句，是說她晚年糊塗而且驕傲，總覺得別人不行，非由她來獨裁不可。「大婦來」以下五句，是說她受着羣小包圍，這般人大抵都向她歌功頌德。「豆其」以下三句，便是說火燒的太大，手燙了，她哭了，餅子也給她燒焦了！

另有一首「京師」，是寫北京亂後一般的景象的。詩曰：

「鬱鬱千年王氣盛，中間鼎盛數乾嘉；可憐一炬成焦土，留與東京說夢華。鸛鳴來巢公在野，鷓鴣毀室我無家，登城不見黃旗影，獨有斜陽咽暮笳。」

羅惇齋在他所寫的「庚子國變記」裏說：「京師盛時，居民殆三百萬，自拳匪暴卒之亂，劫盜乘之，所過一空

，無免者，坊市蕭條，狐狸賣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幾句話，正好引來作公度這首詩的註腳。

庚子這一幕，公度在一方面固然爲着國家的前途感到無限的傷心，但尤其使他痛心的，乃是他的幾個最好的朋友也是在這個混亂的局勢中被犧牲了的。在「人境廬詩草」中，有三首寫得非常沉痛的五古，題曰「三哀詩」，便是爲他的三個好友而作的。第一個是袁爽秋（昶），第二個是吳季清（德瀾），第三個是唐韞臣（才常）。

二、高拜石撰「黃公度才院詩雄」（註二）

黃公度的「人境廬詩草」，用舊詩風格，寫極淺近的新意思，迥別於當時所稱「詩界革命」運動中喜擇摻新名詞以自表異的夏穗卿、譚復生諸人。他怕破壞了詩的表現力量，要在不徹底突破舊詩形式的範圍內，來寫成一首有新鮮生命又通又好的詩，所以大家一致承認他的詩是最成功的「新詩派」。

公度名遵憲，廣東嘉應人，十歲便學做詩，塾師以梅縣神童蔡蒙吉的「一路晚鳩啼落花」句命題，公度略加思索，便寫出「晚從何處去，鳩亦盡情啼。……」老師大爲驚異，第二日又出了「一覽衆山小」的題目，他破題云：「天下猶爲小，何論眼底山！」其詩才可稱天賦。

他生在鴉片戰爭以後，正當太平軍亂事正殷，帝國主義又在加緊侵入的時候，他少時便有了「今昔勢異」的感覺，痛心於當時一般士大夫的迂腐論調，在十八歲時曾在「感懷」詩裡，說：「世儒通詩書，往往矜爪觜。昂首道皇古，抵掌說平治。……古人豈我欺？今昔奈勢異。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識時貴通今，通情貴閱世。」到了卅一歲，他更瞧不起那股「鸚鵡名士」，在「雜感」詩中，便連譏帶罵地寫出：「……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賢？……我筆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莫登簡篇，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對於當時以八股取士的制度，更表不滿，他很大膽地說：「……吁嗟制藝興，今亦五百載。世儒習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鉛，虛榮逐冠蓋。勞勞數行中，鼎鼎百年內，束髮受書始，即已縛紲械。英雄盡入彀，帝王心始快。」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七六四

但他終亦不能避免紐絨的束縛而不入彀，中了同治癸酉的舉人，旋入貲捐了道員，從外交方面，謀有所貢獻。曾隨使節東渡，充參贊。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國勢驟強，中國人徒然歎慕人家的富強，還懵懵地不知日本強盛後的可畏。公度在日，悉心研究他們致強之術，著有「日本國志」十卷，他說：「日本維新成功之後，將霸東亞，而首先當其衝者，則為中國。」他曾任過英之新加坡、美之舊金山的總領事，到過巴黎、錫蘭，以及南洋各島，見聞既廣，思想更新，外交上應付也綽綽有餘，但很多人說他簞簞不飭，一度發表使德，因德國不同意，後以光緒帝激賞他的「日本國志」，命他使日，又因病作罷。

公度任湖南按察使時，贊佐巡撫陳右銘（寶箴）推行新政甚力，他倡導民治，謂「自治其身，自治其鄉，推之而一縣、一府、一省，以至全國，可以成共和之邦治，臻大同之盛軌。」在當時能有此議論，自是難得，但也為一些頑固守舊的大臣所忌。戊戌維新失敗，那拉后怨透了康、梁諸人，把贊成新政，奉行變法的，一律稱為康黨，陳右銘，三立父子受到處分，公度自也不免。當大捕黨人時，不知道那個冒失鬼，混奏說康、梁藏匿在黃遵憲家裡，那拉后便電諭兩江總督查看，上海道蔡鈞，張大其事，竟派兵將他的寓所圍住，如捕江洋大盜，租界裡的外國人，不知道為了何事？大為驚訝。後以搜查無着，只得罷了，但仍是被看管着，伊藤博文時在中國，代他在李鴻章前，請為緩頰，纔獲職放歸廣東故里。

他遭此橫禍，真是感憤萬端，這一時期裡，所作感懷時事的篇什最多，摘抄警句：如「誰知高后垂簾事，又見成王負扆時；」「九鼎齊鳴驚雉雉，千金懸格購龍醫。」「剛聞赤坂連名奏，便召長槍第六郎；珠襦武帳諸臣侍，詔明晨幸未央。」「五百控弦謀刦制，一丸進藥失先嘗，傳書信口訶西母，改制稱尊託素王。」又如「金甌親卜比公卿，領取冰銜十日榮。東市朝衣真不測，南山鐵案竟無名。」「父子相從泣獄扉，老翁七十荷征衣，一家草索看生縛，三寸銅棺待死歸。」「心肝誰奉藏衣詔，骨肉難徵對簿詞。」「柏人誰白屏王罪，改子終傷慈母恩，金珰厖涼含隱痛，杯弓蛇影負奇冤。」都是說戊戌八月間的事，對蔡鈞圍搜的事，也有「案頭英鴉門前戟，豈有籙條覆庚水。」籙條典用來甚趣。

己亥醞釀廢立，十二月二十四詔立大阿哥，以端王載漪子溥儀入嗣，接着謠言紛紜，說光緒帝已被毒害。他也

有詩紀，如：「十世忽遭陽九厄，再傳失紀仲壬年。」「先皇遺怨鼎湖弓，世及家傳總大公，誰誤禮經爭大統，妄拚尸諫效孤忠。」「怪事聞呼奈何帝，僥詩敢唱厲憐王。」之句。以及「承天仰看金輪轉，震地訛傳玉斧聲。漢厄愁看正月卯，代來幾協大橫庚。」都是針對當年時事而發，寫來明白如話。

因為戊戌母子橫決，頑固派擡頭，崇綺、徐桐、啓秀諸人，無時不想定策邀功，載漪更欲他的兒子坐上九龍椅的位子，忌恨外交干涉，不能遂行無忌，恰巧義和拳起，詭言能避火器，以仇外爲名，載漪等遂利用來發難，好嚇「洋鬼子」，那曉得釀成了大禍，庚子聯軍佔北京，清廷紙老虎露了骨，終促於亡。

義和拳的胡鬧，六十年來諸家筆記，紀述頗詳，茲不贅言，公度初聞其事，即斷爲大禍到臨，在他詩裡「對拳民事感賦」句：「說有蒼生不死方，盜泉一飲衆皆狂，鬼吏三官明作賊，神兵六甲解擒王。」「一拳打碎舊山河，兩手居然斗柄撥，火焚祆廟連烽燧，轍澗羈臣乞海波。」以及「自天下降愚黔首，爲帝驅除比赤眉。」「狂喝雉盧天一笑，怒訶狗脚帝三拳。」到了那拉母子倉皇辭廟出京西奔，他又有「掩抑魚軒賦載驅，吞聲在野鴛鴦跡，扈行尙縱花門賊，入衛難徵竹使符。」「夢鸚終悔朝臨武，氏蜚應繙異姓王，賜劍乍悲吳命短，執戈又弔楚詞殤。」紀事用典，何等確切，又何等沉痛！

袁昶、許景澄是庚子拳禍時的犧牲者，公度和袁昶有舊，馬關定約時，兩人煮酒論時事，相對慨嘆，袁對公度的「日本國志」，甚爲推服，許爲國器，贈詩有「孺初伯納兩孤標，說士推君器後凋」之句，及袁被殺，公度有詩述哀，把義和拳所弄狡獪，痛惜那拉聽信羣小，不惜將三百年字社，付之兒戲，更言殺害德使的不當，說是「一客不能容，反縱癡犬噬，」「盲師糊塗相，驕將偃蹇吏；擲國作孤注，作事太憤憤。」全詩五百餘言，寫來明白如話，可以當史詩讀。

公度曾受知於李鴻章，許爲「霸才」，但李的聯俄政策，公度却不贊同。李使俄時，過上海，公度往謁，李告以「連絡西洋牽掣東洋，是此行要策。」歸來後又對公度說：「二十年無事，總可得的。」辛丑李逝於賢良寺，公度挽詩也寫得極好，錄其一以概其餘：「畢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內政各操權，撫心國有興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縣神州紛割地，黑風羅刹任飄船，老來失計親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李鴻章死而有知，當亦領首的。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五月二十五日

七六六

他曾對梁任公說：「四十以前所作詩，多已隨手散佚，庚辛之交，憤時事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會萃成篇，藉以自娛。」他平生不以詩人自居，而所作輒具有詩史的價值。又他的詩，相當散文化，持律不嚴，選韻尤寬，異聲通押也很多，主張用方言俗諺來作，胎息於民歌者甚深，如「山歌」云：「鄰家帶得書信歸，書中何字儂不知，等儂親口問渠去，問他比儂誰瘦肥。」「一家兒女做新郎，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金鼓聲聲打，打着中心只說郎。」詞也填得極有意思，記有菩薩蠻一闕，前闕云：「眉端早識愁滋味，嬌羞未解儂心事，試問憶人不？無言但點頭。」也同樣有一股動人的味道，祇可惜懷才莫展，僅以詩名壽世，豈其始志所及此？殊可惋惜！他於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月二十三日病歿於家，年五十九。（註二）

註一：引自左舜生：「萬竹樓隨筆」頁九四——一三，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註二：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頁四三——四七，民國五十二年六月臺灣新生報印行。

二十五日（六月二十四日）

清駐英公使龔照瑗以孫先生文將離英赴北美，函約司賴特

偵探社派人追蹤。

本日，駐英清使館已得知孫先生將離英赴北美消息，出使大臣龔照瑗乃函約司賴特偵探社派人追蹤，沿途偵察其行動。（註一）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九二。

本月（六月）李鴻章投閑京師，寄位總署大臣，雖仍當交涉之衝，而門庭冷落，地位已大不如前，對時政頗多憤懣之詞。

李鴻章出使歐美歸國後，仍任職總署大臣，門庭冷落，鬱鬱頗不得志，嘗與幕友指論時政之弊，尤憤臺院之誤國，其言頗爲中肯。「庚子西狩叢談」記其事曰：

「公自北洋罷任，以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久居散地，終歲儼居賢良寺，翁常熟當國，尤百計齟齬之，公益不喜

接客，來者十九報謝，因而門戶亦甚冷落，公意殆不能無鬱鬱，然有憤慨而無怨誹，每盱衡時事，撫膺太息，其忠忱悱惻之意，溢於言表。嘗自謂：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蹉扶搖，遭遇不爲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云：「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又曰：功計於預定而上不行，過出於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又曰：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爲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又曰：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即亡於言官，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爲之阻撓不少。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爲得間，則羣起而訐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而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又曰：天下事，爲之而後難，行之而後知，從前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盛名鼎鼎，後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實，從前芒角，立時收斂，一言不敢妄發。迨至升任封疆，則痛恨言官，更甚於人，嘗有極力訐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願臺院現在後來者依然踵其故步，蓋非此不足以自見，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言至此處，以足頓地，若猶有餘怒者。（註一）

註一：吳永口述、劉治襄筆記：「庚子西狩叢談」卷四，頁一二八——一三〇。

六月

三日（七月二日） 孫先生文乘努美丁(S.S. Numidian)號輪船由英啓程赴加拿大。行

前與南方熊楠道別。

倫敦脫險後，孫先生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然歐洲當時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即欲為革命之鼓吹，亦苦無對象。孫先生既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自然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因決定早作歸計。然孫先生自英東歸，何以取道加拿大？據吳相湘「孫逸仙先生」一書曰：

「孫先生自英東歸，取道加拿大是可以注意的。按一般來往歐亞的旅客，經過蘇彝士運河是比較捷便的。何況孫先生上年取道美國赴歐之初，即有回程訪問新加坡之意。如今何以變更初計繞道而行？並且不取道紐約？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有意避開滿清官吏的注意監視。但事實上，這一解釋只能道出問題的一面。」

「其時，西部加拿大施行土地價值課稅法，已逐漸獲得居民擁護。一八九一年溫哥華市推行這一政策後，績效尤昭著。由孫先生對於土地問題的濃厚興趣，他前來作一實地觀察與研究，以尋求實際情況與亨利喬治學說理論的配合，應該是他繞道加拿大東歸的主要原因。」（註一）

孫先生離英前，於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七日）往訪南方熊楠。南方取出日記簿，請孫先生題字留念。孫先生以毛筆留字如下：「海外逢知音 南方學長屬書，香山孫文拜言」。南方在題字旁註有「此六月二十七日孫文親筆也」。在南方珍藏中，復有孫先生所贈「原君原臣」及「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二書。前者署有「南方先生鑒 孫文持贈」，後者署有「恭呈 南方先生大人雅改 中原逐鹿士孫文拜言」等字樣。孫先生是日離倫敦赴加拿大時，南方與摩根同送行至維多利亞車站。（註二）

註一：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記文學社）第一冊頁一九六——七。

註二：木下彪：「孫中山與南方熊楠」，「中西文化」第九期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一日，臺北出版。

十二日（七月十一日） 孫先生文抵加拿大。

本日，孫先生抵加拿大之孟特耳(Montreal)，登岸時有席奔生(H. Hibberson)君來接。旋驅車赴馬吉爾街(McGill Street)愛利碧旅館(Albion Hotel)，入旅館後，即作函致在美國東部波士頓與西部舊金山之同志各一人。(註一)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九三。

十九日(七月十八日) 孫先生文抵溫哥華(Vancouver)。

本日，孫先生乘火車抵溫哥華，有朋友三人上車迎接。次日，乘火車赴附近之南尼亞木(Nanaimo)，四日後(二十五日)復往。據報告謂係在僑胞中從事組織工作。二十一日，抵維多利亞(Victoria)，在此居留達十一日，二十七日至維多利亞博物院參觀。(註一)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頁九三——九四。

二十五日(七月二十四日) 清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卒。

清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因痢疾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附錄：徐世昌撰「李鴻藻傳」(註一)

李鴻藻字寄雲，號蘭孫，高陽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編修。四年，充功臣館纂修，以分錄貞觀政要，賞文綺荷囊。五年，命在上書房行走，充山西鄉試副考官。七年，丁本生父憂，服闋仍入上書房，提督河南學政。十年，上命大臣釋保儒臣堪膺授讀之任者，大學士彭蘊章以鴻藻應，命來京。十一年，特詔充大阿哥師傅。穆宗登極，兩宮太后命鴻藻、前大學士祁寯藻、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均在弘德殿授讀，於是有治平寶鑑之輯。上喜默思，鴻藻每進書，輒教之朗誦。二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京察名列前，擢侍講，轉侍讀，尋授國子監祭酒。二年十月，鴻藻以穆宗釋服，會同祁寯藻、倭仁上書，略曰：「皇上沖齡御極，智慧漸開，當此釋服之初，舉行吉禮，聖心之敬肆於此分，風會之轉移於此始。玩好之漸可慮也，游觀之漸可慮也

；與作之漸可慮也，嗜好之端一開，不惟有以分誦讀之心，而海內之仰窺意旨者，且將從風而靡，安危治亂之機，其端甚微，而所關至鉅，可無慎乎？伏願皇上恪遵慈訓，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事事以逸樂便安爲戒，屏玩好以節嗜欲，慎游觀以定心志，省興作以惜物力，凡內廷服御稍涉浮靡，概從減裁，雖向例所有，亦不妨量爲撙節，如是，則外物之紛華，不接於耳目，詩書之啓迪，益沃於身心，將見聖德日新，聖學日固，而去奢從儉之風，亦不令而行矣。」疏入，上優詔褒答，命將原摺交弘德殿以資省覽。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戶部左侍郎。四年，命入軍機學習，仍兼弘德殿行走。鴻藻疏辭，上不許。尋署戶部右侍郎。鴻藻初入樞廷，遇事持重，不苟爲異同，尤爲大學士文祥所器重。文祥嘗謂之曰：「人才盛衰，國家安危所繫，進賢退不肖，此吾輩職所當爲者。」鴻藻篤守其言，前後在樞府四十年，皆此志也。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兼署戶部。三月，調補工部右侍郎。六月，丁母憂，兩宮太后賜祭一壇，銀二千兩治其喪，又以鴻藻膺文宗特簡授皇帝讀，迄今六年，皇帝春秋鼎盛，正緝熙典學之時，不可或離左右，且軍務未平，兼資羽翼，援雍正、乾隆年間大臣孫嘉淦、朱軾、曾筠、蔣炳、于敏中故事，命鴻藻開缺守孝，百日後以赴弘德殿授讀，仍在軍機處行走，凡遇朝會，不必與列。並諭鴻藻移孝作忠，勿以守禮固辭。鴻藻具疏歷陳哀懇終制，太后不允，命遵照雍正年間世宗諭旨，二十七月內不穿朝服，不與朝會筵宴，遇有祭祀典禮咸集之處，均毋庸與列。並諭鴻藻當深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勉抑哀思，毋得再行陳請。鴻藻復具疏呈，吏部代奏，略曰：「先王制禮，原準人情，典紀之設，非徒以名教具文範圍後世，蓋以人子之心，必如是而後即安。鴻藻雖不才，親喪自致之念，豈獨無之。伏念鴻藻前以翰林院編修在河南學政任內，被先帝特達之知，召還京師，畀以傳儲重任者，蓋以鴻藻恪慎自將，尙能謹守禮法也。若親喪未終，而出入禁闥，則先已違禮忍情，負罪名教，鴻藻一人何足惜，然不亦有傷先帝知人之明乎？今皇上富於春秋，典學正關緊要，使以不祥之身，而日侍經帷，冒不韙之名，而虛言啓沃，在臣心則無以自安，於聖學則何所裨益。見在弘德行走諸臣，如倭人、徐桐、翁同龢等，皆能守道，竭誠盡心輔導，此時雖鴻藻一人暫離左右，似於緝熙進德尙不相妨。至若趨直樞廷，則是三年之喪，儼然從政，尤令鴻藻進退失據，踟躕無以自容。鴻藻夙夜憂思，欲堅持己見，則似朝廷委曲矜恤而臣子冥不知恩；勉承詔命，則疚心實甚，而終身無以自處，煎灼昏迷，惟有號泣。伏惟天地高厚，哀而憐之。」會倭仁等亦代爲陳

諸，太后責倭仁等前後異議，命恭親王奕訢至鴻藻寓次傳旨，令於百日後照常入直。鴻藻疏言：「百日將滿，自揣病軀實難入直。」太后溫語慰勉，至十月，鴻藻復疏陳病勢，賞假調理，仍令病痊時照常入直，鴻藻遂得賜告，卒終制始出。七年二月，捻賊竄畿疆，祁州、饒陽相繼陷，鴻藻方里居，日親各路諸軍近十萬，統兵大員，事權不一，勞師糜餼，日久無功，因上疏亟陳其弊，請特派親王爲大將軍，坐鎮京師，以固北路。左宗棠、李鴻章爲參贊大臣，分紮保定、河間東西兩路，各率所部兵相機剿辦。陳國瑞幫辦軍務，專統一軍爲游擊之師。直隸總督王文韶願省城，籌備諸軍饟需，以資接濟。丁寶楨駐紮直、東交界，防賊東竄。李鶴年駐紮直、豫交界，防賊南竄。直、晉交界，則由左宗棠等分撥勁旅，扼要屯防。並請敕下諸大臣和衷商辦，迅奏膚功。奏入，上遂命各路統兵大臣均歸恭親王奕訢節制。十月服闋，命仍在弘德殿軍機大臣上行走，並署禮部左侍郎，賜紫禁城內騎馬。八年，補戶部左侍郎，兼管錢法堂事，仍兼署禮部。十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尋授工部尚書。九月，穆宗大婚禮成，加太子少保。時有修葺圓明園之旨，鴻藻謂粵捻初平，回氛方熾，宜培養元氣，以固國本，不應虛糜帑帑，爲此不急之務。上大怒，鴻藻始終爭執，事竟得止。十三年，慈禧太后四旬萬壽，特賞鴻藻本生母氏御書「蘭陔春永」匾額。十月，復賞其母御書匾額「福壽」字及如意錦綺。時穆宗有微疾，上疏請修明聖德，以自慎重，復面爲陳說，上嚴憚之。十二月，穆宗崩，鴻藻自以輔導無狀，上疏自咎，太后知其忠諫，倚任益堅，命專理喪儀。光緒元年，充實錄館總裁。二年，命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譯署初設，事皆創始，無成式，鴻藻遇事持平，以存國體爲要，忠信篤敬，中外重之。三年，丁本生母憂。六年服闋，命仍供原職，尋署吏部尚書。時與俄人議還伊犁事，沈桂芬主崇厚議，鴻藻不可，爭於廷，持之甚堅，卒治崇厚罪，遣使改約。七年，授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八年，調吏部尚書。未幾，法人啓釁越南，有忌恭親王奕訢者，嗾言官劾政府諸臣，鴻藻降二級調用。十一年，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尋授吏部右侍郎。十三年，擢禮部尚書。時河決鄭州，上命鴻藻馳往督辦大工，會同河道總督李鶴年、河南巡撫倪文蔚，迅籌堵築。先是，李鶴年、倪文蔚議於西壩興工，十四年正月，續籌東壩，鴻藻以料少時促，變通原議，爲併工省料之計，會伏秋汛至，西壩捆箱船失事，疏請停緩大工，俟秋汛稍平接辦，上以鴻藻督工無效，革職留任，概李鶴年職，命鴻藻暫行署理。八月回京。十月，禮部具奏典禮，以籤改宣示日期，未照繕，再議革職，上特寬

免。十一月，皇上大婚，充大徵副使。明年禮成，復原官，充會試正考官，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八年，兼署刑部尚書。十九年，正月，鴻藻年七十賜壽，賞賚優渥。八月，署刑部尚書。二十年正月，太后六旬萬壽，賜藏雙眼花翎，充會試正考官。八月，署刑部尚書。日本朝鮮構釁，命鴻藻而辦軍務授軍機大臣，每朝入對，恒至日昃，不遑暇食，意所不可，歸寓輒悵悵，或撫膺痛哭，然其事未嘗以告人也。上念其勞，賜西苑門騎馬。二十一年六月，命入總理衙門。鴻藻以外交棘手，設誠致行，凡有益於國者，隨事力爭，以圖補救。朝廷懲前毖後，急於變法，而新進之士，遂欲屏棄古訓，顛覆成法，以求遂其自由無忌之心，鴻藻每痛抑之，且曰：「禍天下者，必此徒也！」故終其世，不得逞。自賠款驟增，度支益絀，有以加賦之說進者，將議行矣，鴻藻謂無濟於國，而有害於民，力阻之，事得寢。二十一年，以病乞假，假滿入對，上派內監扶掖，再賞假一月。十月，命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調吏部，命免帶領引見。頒賞書畫及諸上方珍物甚夥。鴻藻歷充經筵講官，武英殿、玉牒館、會典館正副總裁，管理三庫事務大臣，教習庶吉士，會試知貢舉，凡鄉試、會試、覆試、殿試朝考考試試差，考試漢中書漢廕生庶吉士散館闕卷諸大臣，皆以鴻藻充之。五次京察，均將旨交部議敘。二十三年三月，病篤，賞樂祀賢館，命御醫往視。六月卒，年七十有八。遺疏入，上痛悼，賜祭葬，賜太子太傅，予諡文正，入良祠。鴻藻性至孝，爲學守程、朱，務實踐，不苟言笑，持躬勸約，有若寒素，與倭仁最善，以道義相切劘。其事上以誠，不欺不隱，而造膝密陳之事，雖子弟不以告。傳穆宗十餘年，盡心啓沃，一日穆宗學書，故爲戲筆，鴻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靜，請少息。」穆宗改容謝之。其在樞府，獨守正持大體，平生以汲引正人，護持善類爲心。御史王鵬運諫止修頤和園，幾獲重譴，鴻藻力解之，得免。德宗間日一往頤和園侍起居，且不時駐蹕，言官有言其不便者，太后大怒，欲黜之，鴻藻謂如此必失天下臣民之望，力爲之請，乃止。嘗曰：「臺諫所以輔宰相之不足，可嫉視耶！」所保薦人才，多清廉忠正之士，然往往有未識面者。大學士李鴻章嘗謂：「近年用人多當其選，此中得失惟某深知之，久之當收其效也。」左宗棠與鴻藻同直樞垣，謂其忠誠可格金石。初與奕訢議事，嘗齟齬，繼乃大服，曰李公愛我，故晚年交益篤。一時名士若張之洞、陳寶琛、盛昱諸人，尤倚爲腹心，海內識與不識，皆推爲清澹之首云。

清廷以袁世凱為直隸按察使，仍歸督辦軍務大臣節制，並命王文韶督飭，將練兵事宜認真講求。

清廷諭曰：

「諭軍機大臣等，袁世凱本日已補授直隸按察使，著仍歸督辦軍務王大臣節制，並著王文韶督飭該臬司，將練兵事宜認真講求，隨時指示，務臻妥協。該臬司一時未能到任，即著揀員署理，將此各諭令知之。」（註二）

註一：錄自「碑傳集補」，藝文印書館影印版。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四〇六，頁十六——十七。

二十八日（七月二十七日） 中比續訂蘆漢鐵路借款合同。

蘆漢鐵路借款合同簽訂兩月後，本日，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比國銀行工廠合股公司代理人在上海續訂合同一項，要款如下：

一、訂約後六個月內動工。

二、比公司允將原合同第十二款所載材料酬勞利益刪去。

三、為補此虧，且須彌補比公司派人來華之費，印售股票之費，及三十年中經理借款之費，是以在利息外加收四毫（即借款利息改為四厘四毫）。（註一）

註一：凌鴻勛：「盛宣懷與中國鐵路」，「傳記文學」第九卷第五期，頁四三。

本月（七月） 梁啟超與汪康年、麥孟華在上海創辦不纏足會。

先是，外國教士在華已設有天足會，放足說已萌芽，國人亦有趨其議者，顧咸以舊俗沿習既久，恐女子不纏足，異日或難以擇配。梁啟超等乃創設不纏足會於時務報館內。未幾海內同志入會者衆，各處均紛紛設立分會。（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七七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六月

七七四

附錄：梁啟超撰「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註二）

一、此會之設，原爲纏足之風，本非人情所樂，徒以習俗既久，苟不如此，卽難以擇婚。故特創此會，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廣，革此澆風。

以上立會大意一條。

二、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

三、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

四、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其已經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須於會籍報明，方准其與會中人婚娶。

五、凡入會者，書其姓名年歲籍貫居寓仕履，及妻之姓，子女之名，以備刊登會籍之用。

六、凡人會後，所生子女，當隨時陸續報名，以備續刊會籍。

七、凡入會報名後，由本館贈勸女學歌一本，以爲入會之據。

以上入會章程六條。

八、凡會籍以姓分冊，百人爲一冊，每年刊印一次，分致入會之家。

九、開會之始，由同志各持一篇，勸人入會，謂之草籍，草籍不以姓分冊，歲終將草籍繳至總會，排比族姓，刊定清冊，謂之正籍。

以上會籍章程二條。

十、本會總會，設於上海，暫借時務報館開辦。各省會皆設分會，各州縣市集，就入會人多之處。隨時設小分會。其所在之地，陸續登報佈告。

十一、各總會分會，隨地皆立主會、副主會，以有功德於本會者爲之，或由董事公舉無定員，主釐訂會例，稽查清冊；若不兼辦女學刻書等事，不受薪水。

十二、各總會分會，皆設董事，無定員，主勸人入會，並商略會例，督辦會辦，皆以同志領之，不受薪水。

十三、總會設司事四人，分會設司事二人，小分會設司事一人，主收各處報名單。一排比族姓，刊附會籍。二將會籍分致入會之家。三並登記捐資人姓名。四刊印每年出入清冊。五等事酌給薪水。（若入會人多事繁冗，則隨時議增設司事。）

十四、本會草籍，以五十人爲一冊，凡有在本會領出草籍，勸人入會滿一冊者，即推爲董事，滿十冊者，即設小分會。

十五、各會司事，由主會董事擇人而用。

以上開會章程六條。

十六、本會之設，建會所，請司事，印送會籍，及勸女學歌等事，費頗浩繁，不能不設法攸助，然亦不宜強人捐錢，方准入會。凡入會者，願捐則捐，不拘多少，即少至數百錢亦可，即不捐亦可。

十七、此會若推行日廣，則需費益多，入會之時，收捐甚微，仍恐不敷開銷，海內達人，好行其德，務望慷慨見助，以贊厥成，天下幸甚。

十八、凡助資一百兩以上者，公推爲主會，十兩以上諸公推爲副主會，凡主會副主會每年皆將姓字臺銜登報章。其助資至五百兩以上者，他日在會館中，設立木主祀之，千秋俎豆，以志盛德。

十九、本會每年集費若干，開銷若干，皆列清單，附會籍後，分致入會之家，並登報章，以昭大信。

二十、本會所收入會，及捐助費，除按年實銷，開列清單外，如有餘資，或設女學校，或設婦孺報館，或設婦嬰醫院，或設恤養局，皆由臨時酌議，惟他日所有一切利益，惟會中人乃得均霑。

以上經費章程五條。

註一：參照「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頁三十八；汪詒年編：「汪穉卿先生傳記」頁八八，文海出

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註二：「時務報」第二十五冊。

七月

五日(八月二日) 孫先生文自加拿大赴日本。

初，孫先生抵加拿大時，以其鐵路臥車部副主任古柏爾(Cooper)表兄之函介，得識古，與之談及，不欲乘印度皇后輪(Empress of India)赴日，蓋恐清廷所派賀英皇維多利亞登極六十周年大典之人員，亦乘此輪歸國，而有戒心也。後悉乘此輪者爲日本代表團，遂變更前意。本日，孫先生自加拿大維多利亞乘印度皇后輪赴日本。登輪後，清廷駐英大臣羅豐祿命司賴特偵探社不再派人追蹤。(註一)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九四。

十日(八月七日) 德皇威廉二世與俄皇尼古拉二世協商奪取膠州灣事。

德國久欲以兵力踞膠州灣爲己有，恐俄國反對，俄皇尼古拉二世乃於本年夏訪俄。本日，德皇與俄皇晤談，德皇提出膠州灣問題，詢尼古拉二世曰：「俄國是否有意據有膠州灣？」尼古拉答曰：「俄國正在較北地帶尋覓港口，在未得新港之前，俄仍願保留在膠州灣之地位。」威廉續問：「如果在必要時，德艦經俄海軍同意而在膠州灣停泊，俄皇是否反對？」尼古拉答曰：「否」。德既知俄無久據膠州灣之意，乃決定俟機會以武力攫奪之。(註一)

註一：「德國外交文告」(Bulow to Foreign Office)十六，三六七九號，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一日。

十七日(八月十四日) 清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英商訂立一千六百萬鎊借款草約合同，作為償付對日賠款之用。

本日，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英商呼利詹生公司(Hooley-Jameson & Co.)代表加爾福祿克訂立一千六百萬鎊借款草約八款，九五扣，年息五釐，期限五十一年，以海關作抵押。合同全文如下：

第一款 公司允借與中國國家英金一千六百萬鎊，照九五扣，即每一百鎊交足九十五鎊，准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號或三十一號之前交清。

第二款 此借款以交銀之日起，定五十一年期滿還清，年息五釐，每年付息兩次，隨時應照未還之本核算。

第三款 自交銀之日起，十年爲止，照長年五釐計算，付息不還本，自第十一年止，將借本核定到限之年數分勻攤還，即四十年每年還本四十萬鎊，連五釐年息，每年亦作兩次付給，其息隨時應照未還之本核算。

第四款 中國國家俯允將海關所收之稅，除抵先借別債外，多餘之數並中國所收鹽釐金，此兩宗現今未抵押與他人，作爲抵還此項借款之本息。

第五款 此項借款，公司准交英國總銀行，或交公司擇定之頭等銀行在倫敦者代中國國家收取其借款本息，中國國家准按月付交中國銀行在上海收存，或中國分行在倫敦收存均可，每半年由中國銀行代中國國家付還公司，是以中國銀行亦允保借款本息到期交付，惟到期付還之本息應交何人或何銀行？由公司指定。

第六款 所有此項借款一切開銷費用均歸公司自備。

第七款 下款所指正約一經簽定，中國國家即降諭旨准借此款。

第八款 此草約簽定後，加爾福祿克即行赴京，限二十日內在總理衙門簽定正約，其正約條款意義，即以此草約條款意義爲底稿。（註一）

按：清廷爲籌措馬關條約中國對日之分期賠款，及贖回遼東半島代價，曾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閏五月十四日，由駐俄公使許景澄與俄政府簽訂四釐利金借款合同，共借俄法銀行團四萬萬法郎，（參加貸款法國銀行六家，共貸二億五千萬法郎，俄國四家，共貸一億五千萬法郎。）以關稅爲擔保，實收九四又八分之一，分三十六年還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二月十日，總理衙門復與駐京英使寶納樂（Sir C. Mac Donald）、德使紳珂（Schenk）簽訂五釐利金借款合同，共借英國滙豐銀行、德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七月十九日

七七八

國德華銀行英金一千六百萬鎊（各負擔一半，互不牽連），年利五厘，實收九四，以海關收入為擔保，分三十六年還清。均條件苛刻，頗受要挾。本年五月初二日，清廷鑒於上兩次借款時間倉卒，旨令李鴻章著手進行借款。（甲午戰爭賠款最後一萬萬兩，應於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八日以前交付。）

鴻章恐引起國際糾紛，計劃不與任何國家政府交涉，命盛宣懷在上海與英美商人速議速決。本年夏，宣懷先後與美國德倫公司、英國滙豐銀行、呼利詹悟生公司交涉，最後與呼利詹悟生公司達成協議，本日簽訂草約八款。惟當公司代表到北京與總署商議正式合同時，英使費納樂、總稅務司赫德，及滙豐銀行從中破壞，欲假此機會強索利權。公司代表受其操縱，復提出新條件，先要求承辦粵漢鐵路，為總署所拒，復改索滬寧鐵路建築權，並要求延長與蘆漢鐵路銜接。又要求中英大規模合辦紗廠，增加中佣等。交涉兩月，終告破裂。此次借款交涉，李鴻章、翁同龢經常保持接觸，同龢曾告光緒帝曰：「借款事「彼不得不爾，否則鴻章專之矣。」（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六，頁二十五——二十七。

註二：「翁文恭公日記」，丁酉年，頁六四。

十九日（八月十六日） 孫先生文抵日本橫濱，陳少白往迎，共謀革命之再舉，少白旋奉命赴臺灣活動。

是日，孫先生所乘之印度皇后輪抵橫濱。陳少白接迎登岸，即寄寓橫濱外人居留地一三七番旅館。旋赴陳少白寓所相聚。少白自孫先生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離日後，初受馮鏡如之託，住文經印刷廠樓上，為馮氏編輯英華字典。後文經印刷廠不慎失火，乃另租屋以居。未幾少白欲赴臺灣活動，請於孫先生曰：「吾二人困守一處，應謀發展，臺灣自歸日有，不知景象如何，如有同志可資聯絡，亦可為他日助也。」孫先生然之，少白乃行。少白行後，孫先生即留居少白寓。（註一）吳相湘「孫逸仙先生」一書記曰：

「八月十六日，『印度皇后號』郵輪行抵日本橫濱。孫先生在陳少白迎接下登岸，寄寓外人居留地一三七番旅館。

先是，司賴特偵探社的人員在加拿大維多利亞港埠目送孫先生登輪，就沒有隨行繼續擔負跟蹤任務。但滿清駐英公使館三等書記官曾廣銓仍隨輪同行。『印度皇后號』到達橫濱港埠，滿清駐日公使館復特派一書記官前來辨認——八月十八日，神奈川知事將上述事實繕具機密報告送陳日本外務省。十九日，外務省收到這一報告，列入『機密受第一五二二號』。從此就成為日本外務省檔案中『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革命黨關係）、（含亡命者）』的第一件文獻。

十七日，孫先生由陳少白陪同至橫濱加賀町警察署長公署拜訪，申述：自英國來日本，沿途有滿清官吏一人同行。在此居留時期內，或恐有不法逮捕及自由意思之制限；但自信居留此地，對於日本帝國國權毫無妨害，故要求日本警方給予在英國同樣的直接與間接保護。加賀警長當答語：既有入國特許，清國人當不致濫行逮捕；當注意警戒云。——二十一日，神奈川知事，又將上述事實密報外務省。外務大臣大隈重信批閱後，並立即致電北京，告知在清全權公使。

三十日，神奈川知事向外務省報告：孫先生於二十九日自居留地一三七番遷居同址第一二一番。並且陳明：十餘日來，孫甚少同人外出，『常一室籠居讀書』，亦少來訪者。

這些事實說明：孫先生真是隨時隨地不忘讀書，同時也顯現他對於自身安全的小心謹慎。」（註二）

註一：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二二；日本外務省檔案：『有關清國亡命人之報告』。

註二：吳相湘：『孫逸仙先生』第一冊，頁一九七——八。

八月

一日（八月二十八日） 東清鐵路在吉林省三岔口開工興築。

本日東清鐵路在吉林省三岔口開工，俄國工程人員大批進駐工地。此後時有赴長春一帶探勘路徑，顯有分枝南侵之勢（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頁十四。

十日（九月六日） 中俄訂立陸路電線續約。

本日，中俄在北京訂立陸路電線續約，更改光緒十八年閏六月二十一日（一八九二年八月十三日）

兩國相接陸路電線章程內數條。其全文如下：

一、原約第三條之第三節改作恰克圖相接電線，俟中國電報局由北京至恰克圖電線告竣後，刻即相接。惟相接之事，無論如何不得逾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年底之期安設，此路電線應於本年夏間開工，其由北京至張家口一段電線，應於本年底前完工。

二、因立約兩國至各界應得傳遞電報之資，既在今已更改之第七款內載明，則原約第六款之第一節，本為多贅，應行刪除。

三、原約第七款之第一節直至所有歐洲及歐洲外諸國除俄國外往來電報各等語為止，以上文字改作第二款內指明相接電線之處報資訂列如左：

來往電報俄國應取報資

甲一、凡中國各處並香港與亞細亞之俄國上烏的斯克經度以東各報，每字取價七十生丁。

甲二、凡中國各處並香港與亞細亞之俄國上烏的斯克經度以西各報，每字取價一法郎克。

甲三、凡中國各處並香港與歐洲之俄國格格蘇亦在其內各報，每字取價一個半法郎克。

經過電報俄國應取報資

乙、所有各報，每字取價二法郎克二十五生丁。

來往電報中國應取報資

甲一、凡中國各處並香港與俄全境格格蘇亞細亞之俄國各報，每字取價一法郎克五十生丁。

甲二、凡中國各處並香港與歐洲及歐洲之外各國，俄國不得在此內，每字取價四法郎克七十五生丁。

甲三、其餘各報，每字取價一法郎克五十生丁。

經過電報中國應取報資

乙一、歐洲及歐洲之外各國，俄國不在其內，與他各國來往各報，每字取價四法郎克七十五生丁。

乙二、其餘各報與俄全境格格蘇亞細亞之俄國亦在其內，每字取價二法郎克。

所有應給歐洲各國報資照萬國通行電章及電則內開之數，均由中國甲二乙一兩段所開四法郎克七十五生丁內撥給。

此條內所定報資，應自俄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起舉行，非立約兩國商酌不得更改，惟今兩國政府相訂，中國應取甲一甲三之報資一法郎克五十生丁，應由兩國政府與丹京大北電線公司後定之期施行，而未定之先，上指各報，中國仍取資兩法郎克。所有第八款第二節結還賬目一事，改作其賬目應於每月月底清結，其應付之款在上海每月二十一天內結算清楚。

付款應用鷹圓，照俄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續約，為每年所定行市核給。

所有原約暨俄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續約內各條，在此次所訂續約未經更改者，仍舊遵行。（註

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頁一——三。

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三日） 上海字林西報載：清總署大臣張蔭桓離京赴英後，總理衙門對外交涉端賴李鴻章所支持。

清廷為祝賀本年五月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即位六十週年紀念，早於二月三日派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前往致賀。（註一）五月五日復命張蔭桓與英國商談加稅事。

按：是時總署名義上由奕訢主持，實際知國際事務者僅李鴻章、張蔭桓二人而已。實權則操諸榮祿之手，所請無不准，鴻章次之。（註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七八一

附錄：吳永口述、劉治襄筆記「李鴻章張蔭桓居總署」（註三）

「予生平未見文忠，然無意中却有一面，至今印象猶在腦際，前清同文館即設在總署，予一日偶從館中偕兩教習同過總署訪友，經一客廳後廊，聞人聲囂囂，即從窗隙窺之，見座中有三洋人，華官六七輩，尚有司官、繙譯，皆翎頂輝煌，氣象肅穆，正議一重大交涉。首座一洋人，方滔滔汨汨，大放厥詞，似向我方詰難者，忽起忽坐，矯首頓足，餘兩人更軒眉怒目以助其勢，態度極為凌厲。說畢由繙譯傳述，華官危坐祇聽，面面相覷，支吾許久，始由首座者答一語，聲細如蠅，殆不可聞。繙譯未畢，末座洋人復蹶然起立，詞語稍簡，而神氣尤悍戾，頻頻以手攫拳，如欲推翻几案者，迨繙譯述過，華官又彼此愕顧多時，纔發一言，首座者即截斷指駁，其勢益洶洶，首末兩座，更端往復，似不容華官有置喙餘地。惟中座一洋人，意態稍為沉靜，然偶發一言，則上下座皆注目凝視，若具有發縱能力，而華官之覆答，始終乃只有一二語，面赧顏汗，局促殆不可為地。

予當日見此情狀，血管幾欲沸裂，此時忽聞外間傳呼聲，俄一人至廳事門外，報王爺到，旋聞足音雜沓，王爺服團龍褂，隨從官弁十數，皆行裝冠帶，一擁而入，氣勢殊煊赫，予念此公一來，當可稍張吾軍，既至廊下，則從者悉分列兩旁，昂然而入，華官皆肅立致敬，顧三洋人竟視若無覩，雖勉強起立，意殊不相屬，口中仍念念有詞，王爺先趨至三客座前，一一握手，俯首幾至膝上，而洋人傲岸如故，王爺尚未就座，即已厲色向之噪聒，王爺含笑以聽，意態殊極恭順。

予至此已不能復耐，即扯二人共去，覓所識友人，告以所見。吾友曰：中堂在座否？予曰：吾不識誰為中堂。曰：李中堂也。中堂在此，當不至是。予乃約其同至故處，友逐一指認，告姓名，曰：中堂尚未至也，然今日必來，盍再覘之？予亟盼中堂到。俄頃復聞呼報，予以為中堂至矣，乃另為一人，仍趨與洋人敬謹握手，即逡巡就坐，予乃大失望。

正於此際，續聞呼報，一從者挾衣包，先奮息趨入，置於門外旁几，吾友曰：此必中堂，既而中堂果入門，左右從者只二人，纔入廳數步，即止不前，此時三洋人之態度，不知何故？立時收斂，一一趨就身畔，鞠躬握手，甚謹飭，中堂若為不經意者，舉手一揮，似請其還座，隨即放言高論，手講指畫，兩從人為其御珠鬆扣，遂件解脫，

似從裏面換一衷衣，又從容遂件穿上，公一面更衣，一面數說，時復以手作勢，若爲比喻狀，從人引袖良久，公猶不卽伸臂，神態殊嚴重，而三洋人仰面注視，如聆訓示，竟爾不贊一詞，喧主羣賓，頓時兩方聲勢爲之一變。公又長身玉立，宛然成鶴立鷄羣之象，再觀列坐諸公則皆開顏喜笑，重負都釋，予亦不覺爲之大快，如酷暑內熱，突投一股清涼散，胸間鬱火，立刻消降，旋以促飯引去，始終不知所議何事，所言何詞，但念外交界中，必須有如此資望，方稱得起折衝二字。自公以外，袞袞羣賢，止可謂之仗馬而已。

公此時雖在總署，已無實權，而自外人日中，則獨尊公爲中朝領袖，蓋勛名威望，得之有素，非可以囊取者。昔人謂國家不可無重臣，文富所以鎮外夷，汾陽所以退突厥，亦皆賴此作用。惜清廷不能利用此點，使公得盡其設施。急來佛脚，抱之已遲，然庚子一役，若無公在，更何人足以當此重任耶！

吾友因爲言中堂一到卽更衣，我已見過兩次，或者是外交一種作用，亦未可知，同人皆大笑之。謂：如此則公眞吃飯穿衣，渾身皆經濟矣。語雖近謔，而推想亦不無至理，漢高踞洗而見酈生，亦先有以懾其氣也。庚子難作時，予聞公被召入都，卽向人慶慰，謂決有幹旋之望，當舉此事爲證，果如所料。予於文忠，亦庶幾可謂之類見一斑者矣。」

「張公於予有荐主恩，（按：吳永自稱）予曾從事左右，相處逾歲，其精強敏膽，殊出意表。在總署多年，尤練達外勢，翁常熟當國時，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諮而後行，每日手函往復，動至三五次，翁名輩遠在張上，而函中乃署稱吾兄我兄，有時竟稱吾師，其推崇傾倒，殆已臻於極地，今張氏褻輯此項手札，多至數十巨冊，現尚有八冊存予處，其當時之親密可想。每至晚間，則以專足送一巨封來，凡是日經辦奏疏文牘，均在其內，必一一經其寓目審定，而後發布。張公好爲押寶之戲，每晚間飯罷，則招集親知僚幕，圍坐合局，而自爲囊主，置匣於案，聽人下注，人占一門，視其內之向背以爲勝負。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時送達，有時寶匣已出，則以手作勢令勿開，卽就案角啓封檢閱，封中文件雜沓，或至數十通，一家人秉燭侍其左，一人自右進濡筆，隨閱隨改，塗抹勾勒，有原稿數千字而僅存百餘字者，亦有添改至數十百字者，如疾風掃葉，頃刻都盡，亟推付左右曰，開寶開寶，檢視各注，輸贏出入，仍一一親自核計，錯鉢不爽，於適纔處分如許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謝，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八月

七八四

某事一言破的，某字點鐵成金，感佩之詞，淋漓滿紙，足見其倉猝塗竄，固大有精思偉識，足以決謀定計，絕非草草搪塞者。而當時衆目環視，但見其手揮目送，意到筆隨，毫不覺其有慘淡經營之迹，此真所謂舉重若輕，才大心細者，宜常熟之服膺不置也。」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四一，頁一。

註二：上海「字林西報」，頁三八九，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引自「李鴻章年（日）譜」，頁三六七。

註三：「庚子西狩叢談」卷五，頁一五七——一六一；卷一，頁一六——一八。

本月 孫先生文在橫濱初晤宮崎寅藏及平山周。

宮崎寅藏爲日本熊本人，長兄八郎死於西鄉隆盛之難，次兄彌藏，三兄民藏。兄弟三人皆富有浪漫自由主義之色彩。彌藏與民藏皆關心中國，以日本區區三島，決不能有所作爲，亞洲之命運，實懸於中國，嘗欲入中國物色英雄豪傑而助其革命，繼而彌藏獲識陳少白。初，孫先生於甲午在檀香山得識日人菅原傳，乙未經日時，介紹菅原傳於陳少白，少白又因菅原傳得識曾根俊虎。（註二）曾根爲日人中最有心於中國事者。嘗自稱原籍山東，爲先師曾子後裔，著有太平天國戰記一書，篇末載天王洪秀全遺言，謂余志雖不成，然不出五十年，必有大英雄出自東方，繼吾志而驅逐滿族，恢復故土等語。觀此，亦可知曾根對中國之抱負矣。（註一）旋少白又以日本某牧師之介，得見島津彌藏，時彌藏已臥病垂危，而寅藏方去暹邏事墾殖，彌藏既知陳少白爲中國革命黨，即函告寅藏，及寅藏以墾殖失敗歸日，適彌藏病死，又以曾根俊虎之介，識陳少白，得知與中會內情，於孫先生則心嚮往之。（註三）繼而宮崎以犬養毅之介與平山周、可兒長一被日本外務省派往南中國考察政情，陳少白乃爲之修書港、粵知友。適宮崎病，平山周先行，至滬於書肆中獲見孫先生手著之倫敦被難記，乃走港、粵訪之。旋宮崎踵至，相與赴澳門

見張壽波，張款待之，僅提筆書：內有康有爲，外有孫逸仙，中國之事，未墜於地。詢及秘密會黨事，百探而不得其要領。詢何樹齡，亦僅書往廣州某處。宮崎、平山復赴廣州見何樹齡，且出陳少白之書，何隱讀竊視，旋至宮崎等旅舍相談，樹齡慨弊政，惡專制，以國權民權爲念，與張壽波同，一聞其改善之法，則顧左右而說輔車唇齒之道，辯疏其與孫、陳不相知。(註四)宮崎遂進而說中國之現象，天時人事，相逼而入革命之潮流，有王者起，願奔走於三色之旗下，爲革命軍馬前卒。不應，惟如恐如怖，僅露一香港興中會會員區鳳墀名，請爲介紹，亦以無交誼，不應。又戒之曰：「勿用吾名，唯至道濟會堂，則可見之。」宮崎、平山又返香港，趨道濟會堂，區鳳墀喜而迎之。宮崎等乃曰：「凡禍非迫於眉睫之際，而爲彼此兩不利，一國之人可當，則獨當之，而必提携以互誓者，事有不可已者存，現在之危局是也。雖然，方法亦夥矣！燦陳古方，與夫海外之劑，以疴癢之關。而求道於友邦之士，先生其有以辱教之矣。」鳳墀初未敢深言，亦僅申輔車唇齒之倫。及宮崎等提出中國革命論，鳳墀乃鼓掌曰：「有是乎，若倉海君，而肯助力，豈獨博浪一椎？吾黨之成，實必矣。」乃語以前年之失敗，與首領孫逸仙之近狀。且曰：「如君等志助吾黨，宜急與孫逸仙相見，彼前月已有發倫敦之報，不日當至貴國，彼之所以來，每欲於三島求傑士。」宮崎等心爲之動，乃與平山周略議歸國之事，爲逐孫逸仙之後，以一觀該黨所謂首領，即宮崎輩心中幾務或得之中國大英雄其人者。(註五)

未幾，宮崎寅藏、平山周、可兒長一三人自香港回抵橫濱。宮崎等走訪陳少白，時少白已赴臺灣，不遇。翌晨復往少白寓所，至，孫先生啓門相見，宮崎問及少白，孫先生告以少白已去臺灣；再問知孫文其人否？孫先生因曰：「余即孫文」。宮崎等驚喜非常，遂向孫先生首致傾慕之忱，相與談論天下事。宮崎先問曰：「君以支那革命爲志，愿聞君所謂革命之宗旨，與其手段方法之詳。」

孫先生答曰：

「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但此豈垂手可得？必也革命，余因是負革命之責任。清廢執政，茲三百年矣，以愚弄漢人爲治世第一之要義。吸漢人之膏血，錮漢人之手足，以爲滿人墜運調補之計。認賊作父之既久，舉世皆忘其本來，又經滿政府多方面之摧殘聯絡，致民間無一毫之反動力，釀成今之衰敗。沃野好山，任人割取，靈苗智種，任人殘踏，長陷於悲境而無如何。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進，國皆自主，人盡獨立，獨我漢種，每況愈下，瀕於危亡。於斯時也，苟非涼血動物，安忍坐困此三等奴隸之獄，以與終古！是以不自量力，欲乘變亂，推翻逆朝，力圖自主。徒以時機未至，橫遭蹉跌，以致於是。」

人或云共和政治，不適於中國，此不諒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家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卽此慕古之情，已足爲有理想之證據，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試觀僻地荒村，凡未深浴清虜之惡德而消滅此慕古觀念者，彼等皆能自治也。敬尊長，所以判曲直；置鄉兵，所以禦盜賊，其他一切共同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民者耶？苟有豪傑之士，起而推倒清虜之政府，代敷善政，約法三章，慰其饑渴，庶愛國之志，可以奮興，進取之氣，可以振起矣。且夫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且適合於中國國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觀中國古來之歷史，凡經一次之擾亂，地方豪傑，互爭雄長，亘數十年，不幸無辜之民，因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舉事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爲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法之發布也。故各逞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霸不止。因有此傾向，雖盜賊胡虜，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爲全國之共主，嗚呼！吾同胞之受禍，豈偶然哉！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聯邦共和之名下，夙著聲望者，使爲一部之長，以盡其材，然後建中央政府以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方今公理大明，吾既實行此主義，必不至如前此野蠻，割據紛擾，綿延數紀，而使梟雄有非分之希望，乘機竊發，以殃及無辜。此所謂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者也。

嗚呼！今舉吾國土之大，人民之衆，而乃爲俎上之肉，飢虎得取而食之！當此千鈞一髮之秋，吾乃不得不自進

而爲革命之先驅，以應時勢之要求。若天與我黨，有豪傑之士，慨來相援，余卽讓渠獨步，而自服犬馬之勞。不然，則惟有自奮，以任大事而已。余固信爲中國蒼生，爲亞洲黃種，爲世界人道而興起革命軍，天必助之。君等之來締交於我黨，是其證也，朕兆發於茲矣。夫吾黨所以努力發憤，以期不負同胞之望，諸君又竭盡所能，以援助吾黨，欲救中國四萬萬衆之蒼生，雪東亞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內之人道而擁護之者，惟有成就吾國之革命，卽爲得之。此事成，其餘問題卽迎刃而解矣。」（註六）

如是數千言，滔滔雄辯，氣象軒昂。宮崎等得聆宏論，益爲欽佩，歡洽如舊識。繼談論中國現狀，歐美是，日本政黨，乃至品評人物，旁及宗教哲學，逾時甚久，始握手道別。是爲日本民黨了解中國革命性質之始。宮崎在其所著之「三十三年落花夢」書中描述對孫先生之印象曰：「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懺悔。彼其胸中，且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忤；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又云：「我國島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矣。嗚呼！不愧死，其亦當羞死！」（註七）孫先生爲之序曰：

「世傳隋時有東海俠客號虬髯公者，嘗遊中華，徧訪豪傑，遇李靖於靈石，識世民於太原，相與談天下事，許世民爲天下之資，勗靖助之，以建大業。後世民起義師，除隋亂，果興唐室，稱爲太宗。說者謂初多俠客之功，有以成其志云。宮崎寅藏君者，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遊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勗勵極摯，方之虬髯，誠有過之，惟愧吾人無太宗之資，乏衛公之略，馳驅數載，一事無成，實多負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遊歸國，將其所歷，筆之於書，以爲關心亞局與衰憐保黃種生存者有所取資焉。吾喜其用意之良，爲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揚之。壬寅八月。支那孫文逸仙拜序。」（註八）

註一：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一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八月

七八八

註二：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三〇三。

註三：宮崎寅藏著，金松岑譯：「三十三年落花夢」（帕米爾書店），頁四七。

註四：同註三，頁四八。

註五：同註三，頁四九。

註六：「國父全集」(四)，頁四五——四五三。

註七：同註三，頁五四。

註八：「國父全集」(六)，頁二一八——二一九。

孫先生文赴東京，訪犬養毅，並廣結日本朝野豪賢。

孫先生既識宮崎寅藏等人，復應其邀請，至東京訪晤犬養毅，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至快。

(註一) 犬養毅旋命平山周與曾根俊虎伴孫先生覓居處，途過日比谷公園附近中山侯爵邸前，乃投宿對鶴樓旅店，店主出旅客簿請簽名，平山聯想中山侯爵之邸標，因信筆代書姓「中山」，孫先生旋奮筆續書名樵，謂即「中國山樵」之意，藉掩人耳目。中山之稱自此始。(註二)

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重信爲外相，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孫先生乃因犬養之介，得識日本政界名流，晤大隈與大石正己、尾崎行雄等。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秋山定輔、中野德次郎、鈴木久五郎、安川敬一郎、犬塚信太郎、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菊池良士等。對中國革命事業，資助甚多，而以久原、犬塚爲最。爲中國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副島義一、寺尾亨諸人，皆與孫先生慷慨結納，情好彌篤。(註三)

平岡爲九州福岡礦主，雄於資財，甚敬慕孫先生之爲人，因犬養之介紹，贊助孫先生，爲遷寓麴町區平河町五丁目三十番地，一切旅費胥加供應。因接近清公使館，故不久再遷至早稻田鶴卷町，與平山、

可兒同住，與犬養之來往更為便利。（註四）

附錄：

一、革命黨與日本志士之關係（註五）

吾國革命黨於革命運動時代，得外國志士之助，為力不少。日本志士其最著者也。初中山於乙未前在檀香山納交於日本耶教牧師菅原傳，及廣州失敗東渡，乃介紹菅原於陳少白，陳寓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經商店，取名服部次郎，漸與日人有志者相往還。先由菅原介紹識曾根俊虎，曾根為日人中最有心中國事者，自稱原籍山東，為先儒曾子後裔，著有太平天國戰記一書，篇末載太平天王洪秀全遺言，謂余志雖不成，然不出五十年，必有大英雄出自東方，繼吾志而驅逐滿族，恢復故土等語，觀此可知曾根對中國之抱負矣。陳復由曾根而識宮崎彌藏、寅藏兄弟，未幾中山自倫敦至日本，時宮崎、平山周、可兒長一三人曾於丙申年以犬養毅之推薦，被派赴中國調查各省民黨情形，剛事畢歸國，遂訪中山於橫濱，握手言歡，共商大計。旋約中山同居於東京麴町區，因其時日本尚為租界制度，不許外人雜居內地，三人乃求助於犬養、平岡二氏，以聘用華語教習為名，得免警察干涉。後復遷至早稻田，中山於是漸與彼都人士相結納，如東亞同文會副會長副島種臣，進步黨首領大隈重信、犬養毅、尾崎行雄、大石正巳、及頭山滿、秋山定輔、內田良平、伊東正、基末永節、副島義一、寺尾亨戶、水寬人、福本誠、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原口聞一、遠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島田經一、萱野長知、池亨吉中野、鈴木安川、犬塚久原諸人，均先後訂交，直接間接，頗得其助。宮崎、平山於丁酉秋間，以欲連絡中國各省志士，再遊中國，中山復遷橫濱。

二、王光儀撰「國父署名『中山』之考證」（註六）

國父生平名號最多，連同譜名幼名，共有十四個。今人但知國父名「文」號「逸仙」別號「中山」，其餘多感陌生。

按國父最早名號為：「德明」、「帝象」及「日新」。馮自由革命逸史稱：「孫總理幼名『德明』，字『日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八月

七八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八月

七九〇

『，別號『帝象。』『德明』乃國父之譜名，國父長兄名『德彰』，二兄名『德佑』，德乃字輩，『帝象』乃國父之母楊太夫人所命名，『日新』爲初期學名。』

國父十八歲赴香港就讀，初入「拔萃書室」繼入「皇仁書院」，均用「日新」學名。國父在「皇仁書院」後期，業師區鳳墀爲之改號「逸仙」。二十七歲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時，即用「逸仙」之名。翌年，國父回廣州行醫，正式取名爲「文」，與「逸仙」並用。當時「上李鴻章書」，即以「文」自稱。又一年，國父二十九歲，後自稱「翠溪」，旋改稱「汶」。乙未廣州首次革命失敗後。清廷懸賞捕拿，官書即通作「汶」。

民前十六年，國父三十一歲，廣州起義失敗後，國內及香港追捕至急，乃遠赴英倫。當時爲避人耳目，嘗化名：「陳載之」，其後遂以「載之」爲字。國父於倫敦蒙難被釋後，有致劍橋大學教授翟爾斯一函云：「僕姓孫名文，字載之，號逸仙」。留英期間，除用「載之」外，亦嘗自署「杞憂公子」，惟不多見。

以上乃國父幼年及首次革命失敗前後，署用名號之大略經過。此一時期，國父名號之所以屢更，實因革命基礎未立，爲避免清廷追捕，不得不如此。

至國父署名「中山」，乃離英抵日事，時在丁酉，國父已三十二歲。其經過如左：

民前十五年六月，國父離英，七月抵達日本。當時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因慕國父之名，特派宮崎寅藏及平山周相迎。先居東京之麴町區，後遷至早稻田。

一日國父偕平山周往晤犬養毅，歸途遇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宿對鶴館。館主誤以國父爲日人，出宿帖求署名，平山周聯想中山侯爵之邸標，因信筆書姓「中山」，而未署名，國父忽奪其筆，自署名「樵」。曰：是中國山樵之意也！國父之別號「中山」，乃自此始。（詳見平山周致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函）。

次年，（民前十四年）國父爲聯絡中國居日僑民，及窺伺清政府對革命黨人之意圖，特在橫濱清使館近旁之上町內，僦屋而居；其門首所懸之姓名木牌，即用「中山樵」字樣。此後國父主持革命，對外聯絡，乃正式以「中山」署名。

革命逸史載：「丁酉」（光緒二十三年），總理自歐洲至日，取名中山樵。數年後稱高野長雄，蓋日本維新志

士中，有醫生號高野長英者；總理以中山二字，多爲世人所知，故易新名，以便秘密通信。高野之名稱，是由日友平山周代擬云。甲辰以前通函，署名多用中山，甲辰以後，則改用「高野」。甲辰爲民前八年，時國父三十九歲。

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國人對革命黨人遂漸予以同情合作，革命實力漸次展開。國父居日領導，日方進步黨協助良多。前後十年，國父除對日人使用中山樵及高野長雄外，對黨人及各地僑民，經常使用之名號，惟「文」、「中山」、「逸仙」而已！與志士聯絡尤以「中山」署名爲多，故「中山」之名，最爲人所熟知。國人爲崇敬國父，不欲直稱其名號，（國父名文號逸仙。）故皆以別號「中山」稱之。因此「中山」遂成國父之正式名號。

國父中年偶以「中山」署名，殊不料以此名揚宇內，萬世流芳；國父其他名號十餘，則世人知之者甚鮮。國父名號之顯晦若是，亦云奇矣！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篇，「國父全集」(一)，頁八四。

註二：「平山周與 國父之來往」，「開國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六八，又見附錄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頁十九。

註五：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三〇三——三〇四。

註六：「中央日報」，民國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臺北。

興中會會員謝讚泰復約康廣仁談聯合救國。

先是，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正月初九日，謝讚泰與康廣仁晤於香港品芳酒樓，談革命、維新兩派聯合救國。九月，兩人復晤於香港惠升茶行，然所談均不得要領。本月，謝讚泰又約晤康廣仁於香港公園。康廣仁謂其兄有爲非忠心扶滿，不過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國，現時大臣如張之洞等咸贊成其主張，故不便與革命黨公然往還，致招疑忌。又謂孫先生躁妄無謀，最易僨事，楊衢雲老成持重，大可合作，彼當力勸其兄與楊聯合救國。（註一）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四三。

九月

二日（九月二十七日） 清廷以四川總督鹿傳霖偏執己見，辦理川省邊務土司事宜失當，命開缺來京，改以李秉衡為四川總督。

先是，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九月，四川總督鹿傳霖以瞻對一地為四川門戶，收之不惟為固川之計，亦為固藏之謀，力爭將瞻對改設流官。清廷因慮達賴不服，激勵藏番，不允所請。十二月，鹿傳霖再奏，請於瞻對設定瞻直隸廳，移建昌道於打箭爐，章谷、朱窩改土歸流，設立屯官。詔命派員入藏，必得達賴切實聲覆，並覘其向背之機，再行定議，勿孟浪從事。然朝議終慮藏番生衅，瞻對改流，遂不果行。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五月，清廷從鹿傳霖奏，將德爾格忒土司改設流官。八月，駐藏大臣文海憚於入藏，因奏土司不安，以遂其遷延之計。清廷從之。鹿因與成都將軍恭壽不協，恭壽、文海均偕德爾格忒改土歸流事詆之。本日，清廷諭曰：「命四川總督鹿傳霖開缺來京，以山東巡武李秉衡為四川總督，未到任前，以成都將軍恭壽兼署。」又諭曰：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川省邊務土司各事宜，鹿傳霖辦理失當，業經降旨將其開缺來京，命恭壽兼署四川總督矣。德爾格忒土司改土歸流一節，鹿傳霖輕聽委員張繼一面之詞，輒稱該土司情願獻地，又將其父子解省監禁，前據恭壽將實在情形奏明，亦稱其大有後患，是德爾格忒一事，應如何措置得宜，恭壽自確有見聞。上月十九日二十八等日，疊諭恭壽、鹿傳霖宜布朝廷德意，將該土司父子釋放，改土歸流，著毋庸議。並電諭文海查明張繼有無被圍情事，以憑覈辦。惟是駕馭土司，雖貴結以恩信，權術亦在所不廢，鹿傳霖一味操切，能發而不能收，自屬失之太激，此刻徑行釋放，仍令回寨管事。若該土司冥不知感，貿然而歸，不特無以動其畏服之誠，即其餘各土司，亦

將聞而生玩。恭壽務當剴切宣示，告以前督臣勒令獻地，本非出自朝廷之意。現在大皇帝俯念該土司隸屬中朝，二百年來，恭順無過，不忍因其家歷細故，遽爾瀕以兵威，勒令改土歸流，特命將其釋放，張繼如果尚在彼國，亦應飭其諭令該屬下頭目人等趕緊撤兵，毋得妄動，然後飭該土司速回德爾格志管理事務，將來如何承襲，照例辦理。此事全在恭壽善於操縱，因應得宜，有以激其天良，而生其畏服，亦不僅在慰諭之詞。古人恩孚異域，至有勞面指心，涕泣歸誠者，該署督辦理此事，須得此意。張繼邀功生事，鹿傳霖爲其所誤，其在事始末情形，並著查奏。至鹿傳霖輕聽人言，辦理失當，不獨德爾格志一事爲然，如三嚴之搶案，桑披之命案，皆不免涉於鋪張，亦應酌度機宜，從速了結。其尤關緊要者，尚有瞻對改設漢官一事，日久尚未辦結，此事鹿傳霖始終堅執，力主將該處收回內屬，刻下番官雖經退出，尚在察不多觀望，遂賴因三瞻用兵，亦未能心悅誠服。年來印藏畫界，又須達賴轉飭遵行，瞻對之事，辦理有一不慎，必致牽掣全局，俱形窒礙，所有前後一切情形，悉見於鹿傳霖暨文海、訥欽摺奏電奏，並疊次寄諭電諭，恭壽當向鹿傳霖、索觀全案，細心抽繹，然後將此事徹始徹終，通盤籌畫，應如何保藏保川，兩無窒礙。並著會同文海、訥欽和衷商辦，恭壽現在以將軍兼署總督，責無旁貸。李秉衡到任時，此等事機，皆不容稍涉遲誤，儼或措置乖方，仍蹈鹿傳霖故轍，以致沿邊各土司反側不安，竟成不了之局，仍無以善其後，朕惟該署督是問。勉之慎之，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註一）

按：川督鹿傳霖既內召，川邊經營爲之頓挫。而李秉衡因十月山東教案駐京德使抗議，清廷復罷總督四川之命。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四一〇，頁二——三。

九 日（十月四日） 香港政府拒絕孫先生文入境之請求。

先是，香港政府於去年正月二十一日頒令放逐孫先生出境。孫先生東歸後，亟欲居留香港，就近策動廣東革命運動，途次橫濱時，曾致書香港當局要求取銷放逐前令，許以歸港居留。本日，香港政府輔政司史超活洛克復函拒絕。書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九月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九月九日

七九四

「孫逸仙先生：頃接來書，備悉一是。來函係未註明寄發日期者。茲奉上奉命函覆先生：本政府雅不願容許任何人在英屬香港地方組設策動機關，以爲反叛或謀危害於素具友誼之鄰國。茲因先生行事，誠如來書所云：『弔民伐罪，爲解除國人備受韃虜專制暴虐之羈絆』。凡若所爲，有碍鄰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能容許者。如先生貿然而來，足履斯土，則必遵照一八九六年所頒放逐先生出境命令辦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謹此奉覆。香港輔政司史超活洛克。」（註一）

香港政府拒絕孫先生之入境請求，引起當時報章評論，社會輿論之非議。這後此訊傳至英國，其朝野亦多以國際公法應當遵守而表同情於孫先生者。吳相湘「孫逸仙先生」一書記曰：

「香港政府根據以前發布之放逐令，拒絕孫先生的請求，立場是很不穩固的。因爲其所以發佈放逐令，並非因孫先生行動關係香港本地治安，祇不過是由於他在廣東起義而已。故這一請求被拒絕以後，當地報章評論及社會輿情多不以爲然。消息傳到倫敦，若干英國朝野人士，亦多以國際公法應當遵守而表同情於孫先生。」

一八九八年四月五日，英國下議院開會，南美奧地方選出的議員戴維德特因此事提出質問，要求殖民部大臣加以答覆：

「孫逸仙醫生於一八九六年由香港放逐出境，其理由何在？彼在香港曾否犯案？罪名如何？或曾被當地政府控告否？渠有無顯著犯罪行爲與違反香港法律而經過審判程序否？如有之，其審判紀錄或卷宗有呈報殖民部否？如未嘗經過審判程序，遽下命令，加以放逐出境處分；此項命令，能否撤回？」

殖民部大臣參伯連對於這一質問，逐款答覆云：

「孫逸仙先生於一八九五年離去香港。當是時，香港政府據報：中國發生革命，黨人幾度舉義謀奪廣州，孫均與於其事。嗣據探報：孫將有回港之行，港政府行政委員會遂下令將之放逐出境。彼未嘗違反當地法律，未被控告，亦未被官廳審判成立罪狀。該放逐令現在是否有效，或有無爲之申請撤銷等情事，本席概無所知，容當令行前途查明真相。」

當下議院這一質詢與答覆的消息見諸報紙，滿清駐英公使即於四月二十一日至英外部，表示關切。二十六日英外部報告唐寧街首相官邸，以為讓孫先生返回香港，將使廣州不安；五月三日，首相覆信同意外部的觀點。

按：一八九六年香港政府之對孫先生發佈放逐令，乃適用一八八二年第八號條例第三條規定辦理。這一條例原是香港政府於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五日，當滿清政府與太平天國戰爭時頒布，是年第一號嚴守中立條例，取締當地官民干預中國內戰。翌年一月二日另訂一八五六年第一號條例，以補充前例未盡事宜。嗣以太平軍黨羽混跡香港，藉外力為護符，一方面為謀補充糧精軍械，一方面為便利募兵襲擊九龍；港島治安，至受影響。香港政府遂於一八五七年一月一日頒布是年第九號維護地方治安條例，迄一八八二年重訂，為是年第八號放逐出境條例。凡在境內之外籍人民有擾害人民治安之嫌疑者，得下令驅逐出境，當日政府即根據該例第三條規定將孫先生放逐出境。但這一條例第三條規定：『本港行政委員會得以命令禁止任何人已非在本港出世者，或非屬於英國籍者，在香港地方住居或入境，以不逾五年為限，俾得在所頒布命令或另行頒令明定驅逐出境日期。所有依照本條規定頒發制止入境或住本港之禁令，須併附其理由。』可以說：孫先生就是根據這第三條規定而請求重加考慮他在香港的居留權利。戴維德議員在英國下議院提出的質問，開宗明義即以放逐理由安在為言？很顯明地：殖民部大臣對於這一主題，並沒有能作圓滿答覆。因此七月十八日，戴維德議員又在下議院重申前議，要求殖民部大臣根據查訊結果，說明放逐孫先生出境的理由：

『前次質問：關於香港政府下令放逐孫逸仙先生出境之理由有無詳細查究？結果何如？理由安在？事前中國滿清政府有無照會香港政府，要求驅逐孫氏出境情事？如有之，此照會曾否先行呈達殖民部然後執行辦理？孫先生為現代中國革新人物，其在英屬地方居留未嘗違反或觸犯英國法律，遽被放逐出境，此項命令，能否撤回之？』

殖民部大臣參伯連當即答覆說：

『此事業經查詢，事實與前次答案無出入。孫逸仙醫生非在香港出世，亦非入籍為英國人。係依據一八八二年放逐出境條例第三條規定，禁止其在香港居留，由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起，以五年為期。按據理由，則在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九月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九月十七日

七九六

當地總督與行政委員會之意見，以孫氏於港地治安及秩序均有妨害之故。中國政府未嘗移文照會驅逐孫氏。孫氏離港乃在出境令頒發之前。然孫共同謀叛反對其本國政府，已無疑義。因此之故，乃不欲其寄跡於香港耳！此次暫行禁止其在香港居留，為一地方之行政，似不必遽加干預也。」

戴維德繼續發問曰：「孫逸仙醫生既受嫌疑，顧未予以答辯之機會，請問殖民部大臣知之否乎？」參伯連答曰：「此一問題，現在不能答覆，蓋未蒙貴議員先行通知也。惟據報章所載：孫氏現在中國為領導革命之工作。」戴維德曰：「余亟希望其成功！」參伯連曰：「如事非虛傳，猶足證實香港政府之意見也。」

經過這一番問答以後，戴維德議員旋又向總檢察官李察屈斯特勛爵提出質問，其主旨都是以一八五五年一月，香港政府於滿清政府與太平軍戰爭頒布維護地方治安條例與孫先生進行革命之關係。英外部因有意再由香港政府重申前令。但英國首相決定香港政府對孫先生放逐令五年時限，仍然有效，不必多此一舉。滿清公使羅豐祿聞訊，即致函英外部，感謝英國政府此一「好意」。

由於英國議會這一場激辯，香港政府不以國際政治對待遇孫先生，而適用香港法例執行地方行政措施以逃避國際糾紛的真相，從此暴露無遺。」（註二）

香港居留既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孫先生惟有利用日本作為進行革命之根據地。

註一：陸丹林：「革命史譚」，頁六——七，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獨立出版社出版。

註二：吳相湘：「孫逸仙先生」第一冊，頁一九九——二〇二。

十七日（十月十二日） 日本東京府知事正式發給孫先生文僑居證。

初，平山周向日本外務省報告孫先生暫時居留東京之計劃，外務次官小村壽太郎即表示異議，謂馬關和約初訂，中日正謀恢復親善，清廷如得知日本允准孫先生居留，勢將不利。平山周遂向犬養毅請援，犬養乃往拜訪大隈外相，商議援用外人居留方式辦理。當由外務省勅任參事官尾崎行雄以電話與東京府知事侯爵久我通久商談。嗣因小村外務次官堅持反對態度，經犬養等幾經斡旋，是日，東京府知事乃

正式簽發孫先生僑居證。(註一)

註一：吳相湘：「孫逸仙先生」第一冊，頁二〇九。

本月 清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吉林將軍延茂、黑龍江將軍恩澤，聯銜奏請，速勘定吉奉鐵路，預防俄路分枝南侵。

依克唐阿等奏曰：

「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吉林將軍延茂、黑龍江將軍恩澤等奏：爲敬陳管見擬請勘定吉奉鐵路，預防俄路分枝南侵，以保利權而弭後患事。竊維中俄鐵路之建爲朝廷不得已之舉，飭通輪道橫亘於吉江兩省二千餘里之中，時會所乘閉關無術，惟有別籌抵制以期防患於未然。按鐵路圖說考之新改之線，係由俄界雙城子接入吉界之三岔口，經寧古塔以趨伯都訥，由蒙古郭爾羅斯前旗地抵呼倫貝爾交界處，與該國鐵路相接，猶幸僅屬白西徂東，尙無展修枝路南通奉省之說，是雖撤我藩籬，猶未趨我堂奧也。雖已多有妨我利權之處，亦尙可隨時設法維持補救。惟查自八月初一日在三岔口開工以來，時有俄員赴長春一帶探勘路徑，蓋若由伯都訥南通奉省，以長春地方爲必經之地，則彼族意向之所在，已屬顯而易見。若不趁此尙未向我饒舌之先，早爲籌及，倘一旦公然肆其要求，恐將有許之不可，拒之不能如今日者。臣等待罪邊疆，相與逼處，剝牀噬臍之戒，爲慮滋深，苟爲管蠡所窺，自應勉竭芻蕘，以備聖明採擇。但期言之而不中，萬不容知而不言。現在往返函商，熟籌深計，惟有早將吉奉鐵路定議，自行接修，庶爲先發制人之一策。查此段工程應由伯都訥接修，南趨長春入奉屬之昌圖府界，以達奉天省城，直與榆路相接，計程不過九百里，且地皆平坦，易於施工。查關外鐵路現已奉旨飭交胡燏棻經手接辦，此段工程即請飭令該府尹轉飭所派關外勘路委員先行察看，稟由該府尹覆核奏請聖裁定奪，但此時先將基址勘妥，卽爲已佔先着，使彼族知吉奉鐵路已由中國勘定接修，其覬覦侵越之謀當可喑然內阻。至如何籌集資本，儘可從容謀畫。總之得步進步爲彼族慣技，在我預爭一分利益卽塞一分漏卮，誠辦之不可不早也。謹奏。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奉硃批着照所請，該衙門知道。」(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頁一四——一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九月

孫先生文創設中西學校於橫濱，旋為保皇黨人所奪。

先是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冬，橫濱興中會員法國郵船公司買辦黎煥堦及其友郭雅聲，為學習中文請益於陳少白，少白告以日本各僑校規模既小，教學法又極陳腐，不若另行組織，開辦新學，使僑胞子弟咸能受到適當教育，並可藉作革命之機關，甚得黎、郭二人之贊同。即行召集僑商在中華會館商議設校事，到會者有鄭汝磐、馮鏡如等數十人，討論結果，衆皆同意。遂假會館為校址，以會館之產業為基金，開辦費用，並由華僑分任招募。（註二）

本年秋，孫先生由歐至日，橫濱僑校籌備十九完成。鄭汝磐等乃就商於孫先生，欲自國內延聘新學之士以為師，孫先生以革命黨人從事教育者少，乃薦梁啟超充任，並代定名為「中西學校」。旋親書「致康有為函，命汝磐持往上海，訪康氏於旅次。康氏以啟超方任「時務報」筆政，乃薦徐勤為校長，並介陳默庵、湯覺頓、陳蔭農等任分教，且謂「中西」二字不雅，特為易名「大同」，親提「大同學校」四字門額以為贈。（註三）

徐勤等初抵日本，與革命黨人尚有往還，及握教育權，與僑胞朝夕酬酢，友誼漸深，且有學生教員為之助，社交日廣。及接康有為來書，知不日當有大拜之望，戒徐勤等務宜與革命黨人斷絕關係，庶免受累。徐勤等態度驟變，此後孫先生奔走海外各埠，無暇專注於橫濱一地，康徒乃利用僑校為工具，煽惑旅日僑胞，反客為主，甚至「大同學校」且有拒孫先生到校之標語。（註三）

附錄：

一、陳少白撰「保皇黨竊奪橫濱華僑學校之經過」（註四）

在孫先生沒有回橫濱之前，到我家裏來談天下的人很多，有一個會員黎煥堦，他是做法國郵船公司的買辦，同一個朋友郭雅生，兩人常常對我談起，要我在晚上抽出些時間，教教他們中國文字，因為他們自幼出國，中文的學

問不多，現在很想藉個機會自修自修。我聽到這話，未嘗不贊同他們的誠意，但我以為此種辦法，未為盡善，所以我對他們說，他們的來意甚為可取，但是我本人性情不近於教讀，況且我也不能長久住在橫濱，所以照我的意思，以為不如辦一間合宜的中國學校，（那時候橫濱華僑有一間公立的小學校，規模很小，教法又很腐舊的），使橫濱的中國孩子，一齊得受相當的教育，這樣也可宣傳我們的主張。黎、郭二人覺得很對，同幾個會友商量過，就在中華會館開了一個全體會議，當時到會的也有幾十人，討論結果，就決定以中華會館為校址。學校的經費，一部份由中華會館的產業劃出，一部份由華僑分任到外邊去募捐，這樣一來，果然把開學校的事情，辦得大有眉目了；恰好這時候，孫先生由英國回來，我因為要到臺灣去，就把這件事完全交給孫先生去辦，不過我在臨走的時候，因為學校的教員，還沒有着落，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學校的董事，叫他們到上海去請梁啟超代聘教員。

我為甚麼要托梁啟超替我們聘請教員呢？說來話長，乙未年正月，孫先生叫我到上海來，召集同志，回廣東起事，當時我在上海住在洋涇濱全安棧內，其時適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進京會試，路過上海，也住在全安棧內。住在全安棧的，多半是同去會試的廣東舉人，也有做過康有為的學生的，當時有人對我說：「康聖人到了。」康有為是志大言大的人，我們久欲延攬他同辦大事，我想到在那年的春天，我和孫先生特地到廣州去找他，到他那廣府學宮裏面教學的萬木草堂，剛巧他還沒有開學，沒有見著，這一次我到上海，竟能同他同住一個棧房，我當然要去見見他了，康有為的學生，聽見我要去見他，總不以為然，說：「還是不去見他的好。」我很奇怪，問他們的緣故？他們說：「康聖人的脾氣是很古怪的，見了人，如果說得有不合他意思的，就隨便罵人，所以我們都叫他做『康怪』」。我說：「無論他是怎樣一個人，我一定去見見他，我是不怕的。」

當時，我住在全安棧的十九號房，康有為就住在二十一號，相隔只有幾步，所以我就跑過去，他的房門閉着，敲了許久，才見房門輕輕打開，一個人探頭出來，問道：「你找誰？」我說：「我要見康先生。」他說：「我就是康某，請你進來談罷。」我就走進去，他又馬上把房門關起來了。

在三四十年前，旅館的設備裝置是很簡陋的，全安棧的客房，也很狹仄，所謂光線空氣，當然都不講究，房間內也就髒得很，把門關起來，更是悶氣。而康有為在房間內，還是長袍馬褂，談話的時候，總是正襟危坐，一話一

拱手，我也爲之肅然起來。

不過我同他談話，倒也沒有什麼令人不快：寒暄之後，他問我來意，因何至此？我就同他談革命，我說：「現在中國的情況，已很危急，滿清政府，實在太不行，非改革一下不可。」他也說：「很對的。」然後就問我長江一帶的情形如何？人才多少？我就大概的把局面說了一下，他也點頭稱是。

我們正暢談之間，外邊又有人來敲門，康有爲就去開了門，讓那人進來，康有爲說是他的學生梁卓如，當時亦是很有名的，我就說了幾句仰慕的話，當下三人對話，談了幾個鐘頭，我才告辭而退。

當時康有爲的幾個學生，以爲康有爲是沒有人敢無事去見他的，幾個人在門外，走來走去打聽消息，等到我出來了，他們就圍攏上來問康聖人說甚麼話？神氣如何？我說康先生是很可以談天的。他們倒弄得奇怪起來。我認識康、梁二人，就從那日起。

所以那時在橫濱，覺得學校既然沒有教員，就想起梁啓超來，他那時正在同幾個同志在上海辦時務報，我就寫了一封信，交橫濱學校的董事，請他們派人拿着這封信到上海去見梁啓超，托他代爲聘請教員，交代完妥之後，我就離日到臺灣去了。

橫濱學校，孫先生把他取了個名字，稱爲東西學校。校董派了兩個專員携着我的介紹信，到了上海，果然請得三個教員，一名徐勤，一名林奎，一名陳蔭農，一齊到橫濱來。這三個教員，都是康有爲的高足，衆人見了他們，真是歡喜無限，優禮有加，趕着預備正式開學。

但是三位教員到埠未久，先要把孫先生所定的東西學校名稱，改爲大同學校。孫先生想這個學校，既然交托他們去辦，況且與彼等向無芥蒂，區區一個名稱，隨他們更改去，並不過問。開學之後，彼此往來，異常親熱，真無所謂有彼我之分。……

有一天，孫先生到大同學校去看那教員們，其實，我們會員，與他們來往很密的，那一天孫先生去，也不是偶然的事。當時孫先生進去，房間內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桌上一張條子，上面寫：「不得招待孫逸仙」幾個字，並無下款。孫先生看見很奇怪，並不說什麼就出來，見着幾個興中會的會員，把這一段意料不到的事，告訴他們，大家

聽了，都以爲校裏的人無理，非去嚴重質問不可，一齊到大同學校來，當時校長就是徐勤，他見來勢汹汹，不敢出來，他們吵着要追究桌上字條的來歷，徐勤站在房門口說：「不要誤會，字條不是他寫的。」當時又有幾個董事在座，做好做歹，替他辯護，我們幾個會員，只得斥責幾句，說他們不念木本水源，有性子不好的，要同他們火拼，被孫先生制止，一同出來，從此以後，孫先生亦不再進大同學校了。與中會創辦的學校，到這時候，被康有爲的學生拿去，這邊罷了，以後還成爲與中會敵黨的總機關，這才可嘆！

後來細查這件事的來歷，原來其中大有文章：康有爲自從乙未年在京聯絡一班新進，所謂公車上書之後，聲名漸著，過兩年再到北京，創辦一會，叫強學會，交結日廣，他還私下見過光緒帝，光緒頗爲他所動，他自然興致勃勃，野心亦從茲發動，知道他的學生在橫濱，與革命黨人交遊密邇，與他前途有所不利，就寫信給徐勤等，說不日我有大拜之望，爾等務宜與革命黨人斷絕往來，庶免受他們所累。他們既係他的門生，況且前程如此遠大，因此顧不得其他，演出此齣辜恩負義的戲來。

同時校內董事多人，以及許多商人，聽到康有爲將來要做宰相，也都偏向那邊去，對於孫先生非常冷淡，就是支會會長馮鏡如，與他的兄弟馮紫珊，也改變態度，其餘智識稍差一點的會員自然也漸漸移動腳跟，投降到那邊去，加入中國維新黨 China Reform Party 了。

這事發生未久，我就回到橫濱，馮鏡如把這事來告訴我，說：「孫先生不應該同徐勤鬧意氣，那條子不知是誰弄鬼，怎好就冤枉好人？你回來，正好還是請你調停罷。」我說：「無論如何，這個學校是我們創辦，教員是我們叫他們來的，他們決不應這樣瞎鬧，你這話是不對的。你試想想，這事還有什麼調停的餘地？」於是兩方面就成了水火，成了不解之仇，這時候孫先生早已搬到東京，我也就到東京去。

二、馮自由撰「橫濱大同學校」（註五）

丙申，余年十五，余父遣余偕譚廣（譚發之弟）同肄業於東京曉星學校。校爲法國天主教會所立，以法文爲主，英日文副之，生徒約二百人，旅橫濱歐美兒童佔三之二，餘爲日人，華人則余二人而已。西童因吾國人少，以爲可欺，恒歌中國人污穢 Chinese people, too much dirty. 一語，以示侮辱；且於運動場中屢向余等尋釁毆擊，余不能

堪，爲自衛計，嘗以爪傷西童，致爲校長懲問。因是西童多呼余爲貓，對余等益恣狂毆。余二人不得已每於休息期間，匿於廁所附近之小院避之。西童兇者求余不得，乃揚言華人多患腹瀉。余在此校四月，卒以不堪西童帝國主義之壓迫，退學歸橫濱。余父乃托陳少白力勸余回校，余有苦難言，但云不願習法文而已。丁酉冬，大同學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學，徐勤（號君勉）任校長，專以救國勉勵學生，每演講時事時，恆慷慨激昂，聞者莫不感動。教室上黑板及課本書面皆大書標語曰：「國恥未雪，民生多艱，每飯不忘，勗哉小子」十六字，師徒每日罷課時必大呼此十六字口號始散，又編短歌曰：「亡國際，如何計；願難成，功莫濟。靜言思之，能無慙愧！勗哉小子，萬千奮勵。」使學生逐日誦之。事爲日本報紙所知，乃將大同學校標語揭載報端，謂支那人覺悟國恥，卽於日本不利，喚起彼國人注意。時學生受此興奮教育之薰陶，咸具救國思想。余爲校中高材生，每試均列前茅，因而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傾舍我其誰之概。嘗榜一聯於書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爲余父所見，斥余爲大言不慚。余有和同學方慶周詩云：「漫天陰雨夕陽沉，一片絃歌萬木森。七十門人聞大道，三千諸佛聽梵音。衆生普渡師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學少年多努力，我言時事淚沾襟」。徐勤於講學之暇復承康有爲命，以振興孔教爲務，每星期日，生徒須對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禮。有基督教學生趙子彬因拒絕拜跪，被教員陳蔭農迫令退學，因此與華僑基督教徒大生惡感。徐聞帝國大學文學院長根本通明博士爲日本孔教徒領袖，乃盤髮於頂，易西服，赴東京訪之，使學生方慶周任譯事。根本爲日本第一流漢學家，素蓄長髮，倣漢代裝束，見徐易西服而來，大異；肅然曰：「貴國崇奉孔聖人者，亦倣夷狄之服乎？」徐赧然不能對，遂於此協商中、日共同闡揚儒道之法，橫濱僑商亦多和之。遂於戊戌年（一八九七）孔子誕日，假中華會館大學慶祝，日本名士蒞會者數十人。會場孔子像旁懸一聯曰：「同種同文、復能同教相聯、未許西歐逞虎視。大清大口、從此大成並合、遙看東亞慶麟遊」。自茲而後，康徒在橫濱之勢力益根深蒂固矣。是年夏間，清帝下令變法，康、梁俱特受知遇，言新學者咸以爲中國中興在此一舉。大同學校教師亦沾沾自喜，所出課題，均屬歌頌聖君譽揚新政之作。余早列名興中會籍，居家復飽聆總理、少白、衢雲諸人革命排滿論調，至是乃於論文中痛言非我種類其心必異之理。略謂清主愈英明有爲，則漢族愈不利，彼之厲行新政，實一種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國，應從根本設想云云。徐勤讀余文，深滋不悅，乃傳余大加申斥，並再三

十月

一日(十月二十六日) 嚴復、夏曾佑等創辦之國聞報在天津刊行。

本日，嚴復、夏曾佑、王修植等創刊國聞報於天津，略仿英國太晤士報之例，日報之外，又增出旬報，名國聞彙報。首譯外論，次譯俄、英、法、德、美、日各報中之各國紀聞，乃北方報紙之最佳者，惜發行未久即停耳！嚴復自撰發刊緣起申明其宗旨曰：

「國聞報何爲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爲急。……欲通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此國聞報之所爲起也。」

(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月一日

八〇三

誠余勿爲邪說所惑。無何，清帝變法頓挫，康、梁同亡命日本，校中更採用戊戌政變記、康梁詩集爲教材。己亥（一八九八年）春，康有爲將赴加拿大，徐勤以余略諳英語，爰商諸余父，欲使余隨行。余知康爲人專制怪僻，故謝絕之。是年夏，梁啓超擬向橫濱僑商集款創設高等大同學校於東京，特於大同學校選優級生數人，至其小石川寓所講學，余與馮斯樂、曾廣勳、鄭雲漢預焉。時章炳麟初至東京，亦下榻樂宅，余之識章自此始。九月高等大同學校成立，余遂轉學該校。橫濱大同學校自是永爲康黨根據地，直至民國十二年遭遇大地震之厄，始無形解散。

註一：「興中會革命史要」，頁二三——二四。

註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四一。

註三：同註一，頁三二。

註四：同註一，頁二三——三四。

註五：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頁七六……七八。

其後，嚴復所譯之書，先後在國聞報刊出，尤以所譯天演論一書，闡明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與夫保種保羣自強進化之理，對當時之政治運動，有甚大影響。

附錄：

一、嚴復撰「國聞報緣起」（註二）

光緒二十三年之夏，館之主者議創國聞報於天津，略仿英國太晤士報之例。日報之外，繼以旬報。五月而後事成。報將出，客有造室而問曰：國聞報何爲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如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爲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與，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如各國並立之國，則尤以通外情爲要務。昧於外情，則坐井而以爲天小，捫籥而以爲日圓；若是者，國必危。道光之季，既通道於歐墨各洲；咸同以來，若廣州，若福州，若上海，若天津，各以次設立報館。自上年今大家辛孫公奏設官書局彙報於京師，而黃公度觀察、梁卓如孝廉、汪穉卿進士繼之以時務報，於是海內人士始稍稍明於當世之務，知四國之爲矣。踵事而起者，乃有若知新報、集成報、求是報、經世報、萃報、蘇報、湘報等報；講專門之業者，則有若農學、算學等報。雖復體例各殊，宗旨互異，其於求通之道則一也。雖然，凡此諸報，其撰述事例可略分爲二類：大抵日報則詳於本國之事，而於外國之事則爲旁及。旬報則詳於外國之事，而於本國之事則爲附見。閱報之人亦可分爲二類：大抵閱日報者，則商賈百執事之人爲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陳述之瑣屑。閱旬報者，則士大夫讀書之人爲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艱深。夫若是，則於求通之術，其或有未盡矣乎？抑吾嘗聞之：積人而成羣，合羣而成國。國之興也，必其一羣之人，上日君相，下至齊民，人人皆求所以強而不自甘於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於愚，夫而後士得究古今之變，而不僅以舊德之名氏爲可食也；農得盡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疇之畝畝爲可服也；工得講求藝事探索新理，而不復拘拘於高曾之規矩爲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虛，操計奇贏，而不復斤斤於族世之所嚮爲不可變也。一羣之民智既開，民力既厚，於是其爲君相者，不過綜其大綱，提挈之，宣佈之，上既不勞，下乃大治。泰西各國所以富且強者，豈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羣之各自爲謀也。然則今日

謀吾羣之道將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爲急。何者？今之國，固與各國並立之國，而非一國自立之國也。吾試言吾民不通外情之弊。今歐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險阻，耗資財，勞筋骨，以求其所謂盡人事天之道。此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勸善之書，則以爲收買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藥，則以爲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謂教也。遊歷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學之家，或搜古蹟，考物產，以求其所謂博物窮理之學。此亦不獨在吾中國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視其籌筆之記載，則以爲偵探矣；見其測量之儀器，則以爲魔術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謂學也。心甚者，見其男女之交際，而或疑爲淫亂；見其貴賤之雜坐，而或譏爲野蠻。此不通西人之禮俗也。其諸類乎此者，更僕不可以悉計。坐是不通之弊，於是平居無事，則互相猜忌，積不相能。倉卒之間，毫毛之事，羣然而譁，激爲事變。數十年來，如開教案，殺遊士，不一而足。上煩九重之慮，下竭舉國之力，僅而後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於此，可勝痛哉！可勝悼哉！然則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將奈何？曰，欲通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此國聞報館之所爲繼諸家而起也。本館取報之例，大要有二：一翻譯，一採訪。翻譯之報，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歐墨其餘諸國，萃取各國之報凡百餘種，延聘通曉各國文字之十凡十餘人。採訪之報，如天津本地，如保定省會，如京師，如河南，如山東、山西，如陝、甘、新疆，如奉天、吉林、黑龍江三者，如前後藏，如內外蒙古，外國如倫敦，如巴黎，如柏靈，如森彼得堡，如紐約、華盛頓，訪事之地大小凡百餘處，訪事之人中外凡數十位。本館編報之例，大要亦有二：凡尋常之事，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義取觀覽明曉者，皆登之每日續印之報。至重要之事，亦無論內地邊地，中國外國，苟足備留存考訂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彙編。閱茲報者，觀於一國之事，則足以通上下之情；觀於各國之事，則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後人不白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後國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則積一人之智力以爲一羣之智力，而吾之羣強；國不自私其治，則取各國之政教以爲一國之政教，而吾之國強。此則本館設報區區之心所默爲禱祝者也。

二、國聞報館章程（註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月一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月

八〇六

(一)本館出報兩種：日報每日印一張，計八開，用四號鉛字排印，名曰國聞報。旬報十日印一冊，約計三萬言，用三號鉛字排印，名曰國聞彙編。

(二)日報首登本日電傳上諭，次登路透電報，次登本館主筆人論說，次登天津本地新聞，次登京城新聞，次登保定、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營口、牛莊、旅順、奉天、吉林、黑龍江、青海、前藏、後藏各處新聞；次登外洋新聞，至東南各省新聞，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

(三)日報另出附張，不取分文。先登告白，次登每日上諭，宮門抄，京外各衙門奏摺。其所印奏摺，四圍留空白，以便閱報諸君將來彙齊，裁訂成冊。

(四)毀謗官長，攻訐隱私，不但干國家之律令，亦實非報章之公理。凡有涉於此者，本館概不登載。即有冤抑等情，借報章申訴，至本館登廣告白者，亦必須本人具名，並有妥實保家，本館方許代登。如隱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

(五)日報每月售制錢三百文。旬報每冊售制錢一百五十文，一年計三十三冊，定閱全年者，每分售制錢四千文。外埠寄費，按照路之遠近，酌量加費。凡代本館經售各報者，其報資按八折計算，即以二成作為代售經費。俱各代賣之人，向閱報人取值，不得多於本館所定之數。

註一：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一四七，臺灣學生書局影印版。

註二：同註一，頁一四七—一四九。

註三：同註一，頁一四九。

本月初 湖南設立時務學堂，梁啟超主之。

甲午戰後，湖南風氣大開，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按察使黃遵憲等，咸主維新。湘紳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起而和之。於是各項新政並舉，蔚為全國諸省之冠。

初，江標等於本年三月創刊「湘學新報」（旬刊）於長沙，以開啓民智為宗旨。七月，陳寶箴出示

招考時務學堂學生，以培養學通中外，體用兼賅之人才。本月，時務學堂正式開課，聘梁啟超爲總教習，李維格爲西學教習，韓文舉、歐榘甲、葉覺邁、唐才常、楊自超、譚嗣同等爲分教。梁等依照康有爲在廣州萬木草堂書院所揭櫫之精神，制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學堂課程爲經學、子學、史學，及西學四種，而以公羊、孟子爲主旨。（註一）。學習期限原定五年，學生僅四十人。一時英俊如林圭、李炳寰、蔡鍾浩、田邦璿、秦力山（鼎彝）、蔡良寅（鐸）、范源濂等，皆校內之高材生。遂以排滿思想激勵於國人。梁啟超等嘗謂：「屠城屠邑皆後世賊民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眦裂。」並稱：「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註二）梁氏於所著「清代學術概論」記其事曰：

「已而嗣同與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聘啟超主講席，唐才常等助教。啟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課以割記，學生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鐸稱高材生焉。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割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摭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割記示親友，全湘大譁。先是嗣同，才常等設『南學會』聚講，又設湘報（日刊）、湘學報（旬刊），所言雖不如學堂激烈，實陰相策應。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衆，於是湖南新舊派大鬩。」（註三）

梁氏另在「時務學堂割記殘卷序」中記曰：

「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割記及批語中蓋屢言其微義。湘中一二老宿觀而大譁，羣起擠之，新舊之鬩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御史某刺割記中觸犯清廷忌諱者百餘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註四）

自梁啟超等主講時務學堂後，方針既大變，時務學堂亦因梁啟超而揚名，「開中國近代學校之嚆矢」（註五）。其影響所及，固非僅限於學堂，湖南省內知識青年一唱百和，羣起而要求徹底改革。就學

堂本身而言，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等慷慨就義於自立軍漢口之役，蔡鍔之於護國軍之役、韓文舉、歐榘甲之大作反清文章，咸係深濡時務學堂中革命民權思想之具體表現。

附錄：湖南開辦時務學堂大概章程（註六）

一、學堂地基已購定省城北門外侯家壩高岸田數百畝，前臨大河，後倚岡阜，頗踞湖山之勝；惟建造需時，現已暫租民房，先期開辦。

一、學生定額一百二十人，按府分派，由紳董稟請撫學院會同招考局試，擇取十二歲至十六歲（初定年限係自十四歲起至二十歲止，繼思年愈幼則氣質語言較易更變，故改從此。）聰俊樸實子弟，入堂肄業。其報名投考者，距省近之府縣，由紳士保送，距省遠之府縣，由官紳保送。除第一期考試已取錄學生四十名外，第二期應定正月下旬，第三期應定二月下旬，陸續考取，三期限滿，即行截止，遲到者概不收考。

一、學生投考，距省近者，必須保送紳士帶領同到學堂報名，如係巨紳所保，則須有親筆信爲憑。距省遠者，以府縣官印文爲憑，報名時自行填寫三代籍貫，及平日所讀書籍名目，以便核察，所有甘保各結，均略仿江南儲材學堂章程，列式於後。

一、外府州縣官紳保送之學生，必須確查該生性情資質，果堪造就，方可給予投考文憑，學生來往川資，暫由外府州縣官紳墊發，考試取錄後，即在學堂公款內撥還。惟保送咨文內，必註明平日所讀何書？所長何學？詳加考語，以備查核而杜冒濫。

一、學生考取入堂，試習三月，由總教習會同總理紳董嚴加甄別，以定去留，其有好學深思，通達經史時務，而口齒不合於西文者，姑准留堂肄業，專精中學一門。餘若資質魯鈍，性情執拗，舉動浮薄者，無待三月甄別之期，隨時屏退。

一、學生所學，中西並重，西文由淺及深，按格而習，中文則照總教習所定課程，讀專精之書，及涉獵之書，一年後再分門教授，各隨其性之所近，令治專門學問。

一、學生入堂，以五年學成出堂爲限（初議限以三年，繼思西文頗繁，期迫恐難收效，故改爲五年）倘有畏難逃學，藉故請假，或有意滋事，希冀斥退，別圖生理者，照四川中西學堂例，除將該生屏退外，仍追繳歷年膏火銀兩，有父兄者，惟該父兄是問，無父兄者，惟該保送人是問。

一、學生每月所作日記課文，由總教習分教習評定後，彙交總理紳董詳閱，照單榜示，撫院學院每年年終，定期曠堂，命題考試。

一、學生出路，俟五年期滿，由撫學院會同大考後，果其學有明效，應遵照總理衙門奏定章程，給予科名仕進之階，或作爲生監，一體鄉試，或咨送京師大學堂及出洋學習，或保薦爲使署繙譯隨員，與南北製造等局，差遣委用，以示鼓勵。

一、教習勤懇善誘，學生學業有成，應照總理衙門奏定章程，由撫院奏請獎敘升途，其餘管堂等員，勤於將事，勞而不倦，亦由撫院擇尤保獎。

總理紳董及管堂紳士，各立稽查學生功過冊一本，每日所查學生用功勤怠，筆之於冊，每月月終與總教習所彙分數，比較參觀，再定賞罰。

一、中西課程及堂規章程，別立專條，另有刊本，茲不贅。

註一：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二，中華書局鑄印版。

註二：蘇輿：「翼教叢編」卷五，頁八，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

註三：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頁六二。

註四：同註一，卷七〇，頁七。

註五：同註一。

註六：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湘學報」第二十五冊。

五日（十月三十日） 德人德瑾琳 (Detring) 退休返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月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月七、十三日

八一〇

本日德璀琳退休離北京返德國，頻行上書李鴻章及總署王大臣，請「開礦，派人出洋考察，建鐵路以自強，不致陷溺於永久。」謂「大彼得能強俄，何以中國不可？」（註二）

按：德璀琳德人，光緒初年應聘來華，歷任天津、廣東稅務司，中法、中日戰後之交涉，多有翊贊之功，爲李鴻章之得力助手。

註一：上海「字林西報」，頁五〇一，一八九七年九月十日。

七日（十一月一日） 德教士二人在山東曹州府被殺。

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天主堂德教士二人（Henle, Nies）被游勇所殺，中德交涉起，爲德國強佔膠州灣之藉口。（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三九八〇。

十三日（十一月七日） 德使海靖照會總理衙門，謂德教士在山東被殺害，請嚴懲滋事之人。

原照會曰：

「爲照會事，查在山東南境德國傳教人遭一最兇橫之事，二月初七日，曹州府有德國傳教者二人，一人被殺，一人無下落。又壽張縣德國傳教人房屋皆被劫掠，本大臣請貴大臣急速設法保護往山東德國人性命財產，此事全責之於中國國家，暫且先望設法嚴懲滋事之人，爲德人伸冤，須至照會者」。（註一）

德皇得俄皇允諾，不過問德艦佔領膠州灣。

本月十二日德皇以膠州灣事電詢俄皇意見，本日得俄皇覆電，對德艦開入膠州灣事，無權過問，德皇即令遠東艦隊進佔之。（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頁十六。

註二：「德國外交文告」，十二，七三——七四，三六九三號。

十六日(十一月十日) 清廷命魯撫李秉衡儘速偵破山東教案。

清廷以德教士在山東曹州被戕，命巡撫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員馳往根究起釁情形，務將兇盜拏獲懲辦。諭曰：

「旨：曹州殺斃洋人一案，該撫奏報遲延，着速派司道大員馳往該處根究起釁情形，務將兇盜拏獲懲辦。李秉衡身任地方，總須辦結此案，方准交卸。現在德方圖借海口，此案適可爲藉口之資，恐其肇釁。福建古田案辦理得法，着總署擇要鈔示。十月十六日。」(註一)

李秉衡奉旨後，當日即派臬司毓賢、兗沂道錫良馳往鉅野澈查根底。翌日，秉衡電奏曰：

「十六日電旨，曹州殺斃洋人一案，遵旨即派臬司毓賢、兗沂道錫良馳往鉅野，徹底根究有無起釁別情，並嚴飭督拿兇犯，務獲傷教之案一併飭查妥辦。十月十七日。」(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頁一七。

註二：同註一。

二十日(十一月十四日) 德艦占領膠州灣，奪據青島砲臺。

本日凌晨，德國海軍提督棣德黎(Diederich)率兵登陸膠州灣海岸，佔領各山頭，照會守將總兵章高元，限三小時撤退，軍火砲位概不准攜帶，四十八小時內退盡。章高元致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魯撫李秉衡曰：

「二十日早七鐘時，德國棣提督藉鉅野仇教一案，率領德兵紛紛上案，分布各山頭，後送來照會，內開膠州一地限三點鐘將駐防兵勇全行退出女姑口、勞山以外，只允帶大礮一事，其餘軍火礮位概不准帶，以四十八點鐘退清爲限，過此即當敵軍辦理等語。高元當以未奉本國公文，容即轉電請示口頭答復，查棣提督兵輪暫駐口外，歷奉公文接待保護，現在事變倉猝，我軍兵單，究應如何辦理？請速電示遵行，事機急迫，盼切禱切，高元叩叩印。」(

註一)。

旋章高元與棣德黎交涉無結果，不得已將隊伍撤出青島山後四方村一帶。本日午刻，章再電王、李曰：

「今早德兵突然上岸，已密電稟陳，詎德兵登岸後，立即分駐各要隘，並挖溝架礮，密密布置，頓刻該提督又逼退軍，不容稍緩，高元親往面見該提督，剴切告知未奉本國公文，碍難擅離，反復爭辯，伊堅執不允，併聲稱下午三句鐘率隊進營各等情。元欲戰，恐開兵端；欲退，恐忝職守。再四思維，惟有暫將隊伍拔出青島附近。青島山後四方村一帶扼要整軍據守，以免彼此軍隊見面滋生事端，轉貽德人口實，元仍駐青島。似此強霸不遜情理，全軍公憤，非戰不可，聽候明諭開仗，飛速至盼。高元謹稟。」（註二）

而清廷則不欲訴諸戰爭，希望由外交途徑解決。

註一：「膠澳租借始末電存」，頁一。

註二：同註一，頁二—三。

二十二日（十一月十六日） 清廷諭山東巡撫李秉衡，德占膠澳，惟有鎮靜嚴紮，不可先行開砲，並命許景澄向德外部切實理論。

清廷諭曰：

「電寄李秉衡，膠澳一事，據王文韶、李秉衡先後電奏已悉。德國圖占海口，蓄謀已久，此時將藉鉅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勢，萬無遽行開仗之理，惟有鎮靜嚴紮，任其恫喝，不爲之動，斷不可先行開砲，致礙自我開。」（註一）

又電諭駐德使臣許景澄曰：

「電寄許景澄，鉅野教案，已獲四犯，海靖到京，儘可商辦，乃遽調兵船，入我膠澳，欲斷電線，勒撤守兵，殊違公法。著許景澄即赴外部切實理論，並電覆。」（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四一一，頁十三。

註二：同註一。

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日) 德使海靖 (Heyking) 為曹州教案照會總署，要求六事。

德軍既據膠澳，駐京德使海靖託故至天津，直督王文韶遵旨往晤，拒不肯見。景澄與德外部理論，答以海靖及德提督奉有全權，自可與總署商辦，交涉遂移北京進行。

本日，德使海靖向總督提出要求六項：(一)山東巡撫李秉衡革職。(二)於曹州及鉅野縣張家莊各建教堂一所，由官撥地各十畝，每處各給銀六萬六千兩。(三)於鉅野、荷澤、鄆城、單縣、武城、曹縣、魚臺七處，各建教士住房一所，共銀二萬四千兩，作為償卹之用。(四)保證今後永無此等事件，明發諭旨盡力保護教士。(五)山東如開辦鐵路，及鐵路附近礦務，先令德國人籌辦。並得修築由膠澳至濟南之鐵路。(六)賠償德國辦理此案所費款數百萬元。(註一)此六項要求中，膠州灣雖未列入，德國實無交還之意，而欲另行交涉。

時李鴻章以中俄同盟故，欲請俄國代索膠澳，親至俄使館請求俄代辦巴布羅福援助，俄政府初欲派艦隊監視德艦之行動，命令已發，而忽然中變，反欲乘機租借旅順。(註二)總署知他國援助咸缺乏誠意，乃謝絕各國之調停，直接與德國作和平解決。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頁一三——一六。

註二：「俄使報告」，引自「李鴻章年(日)譜」，頁三六八。

十一月

二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楊衢雲離南非，取道南洋、香港赴日本。

初，與中會第一任會長楊衢雲於乙未廣州之役失敗後，漫遊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各埠，所至皆籌組革命團體，以南非尊尼士堡，及彼得馬尼士堡二處為成績最優。及聞孫先生文自歐洲至日本，乃東歸訪之。本日，自南非都坂(Durban)起程，取道可倫坡、仰光、香港赴日本。(註一)

附錄：馮自由撰「楊衢雲事略」(註二)

與中會最初發起人為孫總理，人皆知之，而其第一任會長則為楊衢雲。楊名飛鴻，原名合吉，字肇春，又號衢雲，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三都鄉人。少在香港國家船廠學習機械，因失慎斷右手中三指，乃改習英文。畢業後任香港灣仔國家書院教員，旋充招商局總書記，及新沙宣洋行副經理等職。其為人仁厚和藹，任俠好義，尤富於國家思想。嘗習拳勇，見國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輒抱不平。初與謝纘泰等創設輔仁文社於香港，以開通民智為務。乙未春孫總理自檀島返，衢雲與之志同道合，遂加入興中會，設總機關於士丹頓街十三號，榜其名曰乾亨行，時為乙未正月二十七日。未幾孫、楊共商起義進行工作，總理任廣州軍事運動，衢雲則駐香港，任募集死士及籌劃餉糈。是年秋，事機漸成熟，衆議選舉會長為建國時合衆政府大總統之預備，衢雲素有大志，堅欲得總統，謝纘泰等復擁戴之，總理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表示謙退，衢雲由是當選。及重陽發難之役既敗，衢雲乃漫遊越南、新嘉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設興中分會。以南非尊尼士堡及彼得馬尼士堡二處為成績最優。丙申(清光緒二十二年)十月，聞總理從歐洲至日本，乃東歸訪之。總理自乙未失敗，頗咎楊當日措置失當之非，及聞衢雲抵橫濱，乃約至山下町修竹寄廬相見。是處為同志溫炳臣、梁麒麟等所設之俱樂部，總理少自常假之作會客所。時總理對楊責難備至，衢雲俯首無辭，遂相好如初。自是衢雲遂挈眷移居橫濱，以教授英文為生活。己亥(清光緒二十五年)，湘人畢永年，與哥老會龍頭李雲彪、楊鴻鈞、辜天祐諸人有聯合全國各秘密會黨，奉總理為首領之議。衢雲於是辭退興中會會長職，並薦總理自代。未幾興中、三合、哥老三會代表在香港開會，同學總理為總會會長。及己亥歲杪，總理謀在廣州、惠州，繼續發難，衢雲亦自告奮勇，歸香港大肆活動。(註二)

註一：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十二。

註二：馮白出：「革命逸史」初集，頁四一五。

三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俄皇召集大臣舉行御前會議，討論佔領中國旅順、大連問題，外相模拉維洛夫（Murawjew）力主出兵奪據，財相微德（Count Witte）反對之，認為經濟侵略所得，遠勝於武力壓迫之要求。

本日，俄皇尼古拉二世為德國佔領中國膠州灣事，召集大臣會議，參加者有陸軍、海軍、外交、財政等大臣。外相力陳俄國在遠東需要良港，而旅順地勢險要，可即踞之。陸相助之，惟財相微德持反對意見，認為經濟侵略所得之代價，遠勝於武力壓迫下之收穫。俄皇初頗贊成其主張，數日後訛傳英國將據旅順，乃改變初議，決定先行租借，乃下令海陸軍準備行動。微得「回憶錄」記其事曰：

「一八九七年，正值防疫委員會某次開會之際，外交部方面忽然送來已經譯出之特別快電一件，並即交與外交大臣Murawjew伯爵。（譯者按，此人與第二章中之司法大臣同名，但非一人。）該伯爵將電讀後，隨即給余，並表現一種頗受刺激之態。該電之內，乃係德國戰艦業已開到青島港內。（原註：膠洲。）

余讀罷之後，乃向Murawjew伯爵言曰：希望此次德人佔領該港一事，或者僅係暫時之舉，不久彼等當仍退去，倘若彼等不去，余相信俄國以及其他列強，必將逼迫彼等退去，云云。

Murawjew伯爵對余此言，並不加以回答；蓋彼既不願說『是』，亦不願說『否』，故也。此外，余對此項消息之來，完全出於意外，而在該伯爵方面，則似乎不然。

數日之後，此項事變消息遂明白披露。德國外交方面聲稱：德國戰艦之所以開到該港者，係欲由此要求中國賠償刺殺德國教士一事，云云。但是此處令人深覺奇怪者，即為此事，竟至於需用如彼重大艦隊；而且該艦隊並派兵登陸，遂將青島佔領。

未幾，（原註：在十一月初旬。）余與其他幾位大臣，接獲Murawjew伯爵來函，係請余等列席御前會議，討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一月三日

八一六

論一種條陳，並由陛下親自主席。

參與此項會議者，計有陸軍大臣 Wannowski，海軍代理大臣 Tyrnow，外交大臣 Murawjew 伯爵，以及余。該條陳之意係謂，因德人佔領青島之故，此際對於我們，恰是一個良好機會，亦復佔領中國一個海港，或是旅順港口，或是附近該處之大連灣云云。

Murawjew 伯爵於是乃發言曰：彼認爲此種佔領，或者說對一點，此種據爲己有，實是恰合時宜。蓋俄國太平洋方面，頗需佔有一個港口，而該處兩個海港，（原註：旅順或大連）照其軍事形勢而論，確是極爲重要故也，云云。

余反對此議，最爲堅決。余謂：我們既已主張中國不應受人侵略；並因保持此項原則之故，乃迫日本退出遼東半島，——而旅順、大連亦即屬於此項半島之中。而且我們既與中國訂結對日防守同盟密約，我們負責代華抗禦一切日本侵略慾望。現在我們此類侵奪行動，實爲違反條約，達到極點。即或我們對於上述各種反對理由，暫行不問，而專從自私論點出發，則我們此項行動，無論從日本或中國方面觀之，均將自行陷入十分危險之境。蓋我們中東鐵路現始着手建築，該地對於我們感情極爲良好，但是假如我們一旦佔領旅順或大連，則勢將引起中國反對我們，盡將彼等前此對俄好感，一變而爲惡感，云云。其後余又謂：我們如欲永將佔領之地保住，則其勢非設法使中東鐵路與該地聯絡不可。此外，我們必須再築一條支路，行經滿洲（原註：該地中國人口極繁。）穿過奉天現代中國皇室發祥之地，所有上述種種，將使我們發生無限糾葛，恐將獲得一個最可悲痛之結果。

陸軍大臣 Wannowski 竭力贊助 Murawjew 伯爵之議。該大臣自謂：彼對於重要外交問題，誠然不能加以評斷；但若外交大臣以爲此項行動毫無危險，則彼以陸軍大臣資格，甚贊成佔領旅順或大連之議，云云。

海軍大臣對此問題，並不表示意見。但云：依照彼之見解，假如俄國海軍能在高麗海岸得一港口，以作根據，直與太平洋方面接近，當較爲便利；至於旅順大連之地勢，並非恰如海軍部所希望者，云云。

因余認爲此項行動，乃係一種極爲不祥之舉，勢將得一可怕結局之故，乃與外交、陸軍兩大臣，數次激烈辯論。余並謂：無論日本與英國方面對於此事，皆將不能袖手旁觀云云。而 Murawjew 伯爵則謂：彼願對此擔負全責。

，而且彼相信無論英國與日本方面，皆將不至因此採取何等對抗行動，云云。

余之竭力抗辯，終使皇上贊成余意。（原註：皇上對於余之抗議，雖然心中似乎不以為然。）於是是日議事記錄之中，乃書陛下對於外交大臣之條陳，未能加以同意，等語。

至於Munawjew伯爵之為人，乃係極為虛浮，總想隨地皆能顯露頭角。彼之心中嘗覺不啻者，即在彼接任外交大臣以前，余與Johanow-Rostowitz侯爵之遠東政策，竟能如此勝利；我們一方面既獲建築中東鐵路之權，他方面我們在韓勢力復極佔優勢。（原註：對於日本而言。）而其間我們却又贏得中國方面之十分友善關係，同時日本方面亦無敵視我們之情形。蓋日本當時竟能因為我們之故，安然自願退出遼東半島；而且日本又因我們西比利亞鐵路直達海參威之故，預計必有大益可得，亦復甚為滿意；蓋該路能使日本更與歐洲列強再為接近一點，故也。

在那日會議之中，余並曾言曰：余實不能了解此種邏輯，假如德軍開到青島之意，係在佔領該地，而我們對於此舉，若是不以為然，則我們儘可迫勸德國取消此意；即或德國行動不合道理，並且我們對於德國佔領該地，又復認為不利；而我們亦不能由此遂下斷案，竟謂我們亦必效尤德國，去作強劫中國之行爲。此外中國與德並非同盟，而與我們却為盟友。我們曾與中國相約，代彼抗禦外敵，而現在我們自己却忽然將彼土地奪去一塊，云云。數日之後，其時前次議事紀錄，業由皇上批准，余當日因有陳奏之事，往謁皇上，頓覺情形有變。皇上乃向余言曰：『Sergei Juljewitsch，君是否知道，朕已決計佔領旅順、大連，並已派遣我們艦隊，隨載陸戰隊伍前往該處，云云。』皇上隨又補言：『朕之所以為此者，蓋因前日會議之後，外交大臣曾來朕處報告：謂英國艦隊現到旅順、大連之前巡游；假如我們不佔上述兩處港口，則英國勢將取去，云云。』

此項由Munawjew伯爵奏報皇上之消息，其後余由英國大使處探悉，並非確實。英國戰艦誠有數隻前往旅順附近巡行，但其性質，只是對於德國佔領青島之舉，作一示威運動而已。英人方面毫無佔領該處任何港口之意。

皇上對余所言，使余不勝苦惱之至。當余退出皇上御齋以後，遂在前廳之內遇着 Alexander Michailowitsch大侯爵，彼對於我們戰艦之計畫，似已知之。彼乃開始向余談及此事；但余却不願與之談論，只是言曰：『請殿下記着今日勿忘！殿下當看見此項不祥舉動，將得何等可怕的結果。』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一月三日

八一八

余從皇上處出來，遂由 Zarskoje Selo 方面，直赴德國代理大使 Tschirschky 處。蓋其時 Radolin 侯爵，正在假期之內故也。

余曾與 Tschirschky 晤談。（原註：此君現任德國駐奧大使，當時則為德國駐俄使館參贊。）余謂彼曰：當德皇從前在此之時，曾向余言道：假如余有事件向彼詢問之處，或者余有意見向彼陳述之處，請余不必羞怯，直由（德國）大使轉達，可也，云云。現在此種機會，可謂業已到臨。所以余甚望彼（譯者按，係指 Tschirschky 大使而言。）轉電德皇：謂余懇切勸彼求彼，（譯者按，均指德皇而言。）無論為余祖國或彼之祖國計，均望對於處辦青島罪犯一事，（譯者按，當係指曹州凶手而言。）或處以死刑，或要求賠償，皆可依照彼意為之，惟望彼之戰艦隨即退開青島而去；否則此種（佔領）行動，勢將引出（他國）其他行動，造成最壞結果，云云。

不到兩日工夫，Tschirschky 遂來余處，並以德皇回電示余。該電係云：『請告 Wile，余從彼之電內看出，彼對於此次事件中之幾項重要情形，尚有未能明悉之處，所以我們不能從彼之勸。』

於是，余乃想起 Aler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向余相告之口：余又想起兩位皇帝在 Peterhof 並駕出遊一事；最後，余更想起 Murawjew 伯爵在防疫委員會開會之時，那樣沉默情形。

後來 Murawjew 伯爵欲替自己辯明，曾向余言曰：『當時閣下之意，以為假如我們對於德國行動不以為然，則儘可迫勸德國取消此舉，而我們自己則不應侵襲中國云云；但是我們對於德國却無從追勸，蓋因我們前此太不小心，對於德國該項行動，早已表示同意，故也。』

雖然，余既預見此種決議將得不祥結局，於是弗敢放任不管，務必設法促其覺悟。其間余與外交大臣，曾有數次甚為激烈之爭辯。因此之故，余與 Murawjew 伯爵之關係，極為緊張寒冷，直至彼死之時。

但是所有一切忠告，結果皆歸無用。蓋外交、陸軍兩位大臣如果竭力主張佔領該處港口，以利俄國，而我們幼主又復好大喜功，當然從其所請，此固極為明顯不待智者而知者也。」（註一）

註一：徵德「回憶錄」，王光祈摘譯改名「李鴻章遊俄紀事」，頁五七一——六六，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中華書局印行。

四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翁同龢張蔭桓訪德使，談山東教案及膠州租借事。

先是本月三日德使照會總署，抗議李鴻章洩漏其六點要求於各國使館，本日翁同龢、張蔭桓乃偕同翻譯梁誠、蔭昌往訪德使，否認其事，並開始討論膠州租界問題。(註一)

註一：「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條。

九日(十二月二日) 清廷詔三瞻地方仍一律賞給達賴喇嘛收受，毋庸改土歸流。

清廷諭曰：

「上年瞻對番官，越界滋事，當諭令鹿傳霖秉公查辦，以息爭端。乃該番官膽敢抗違，經鹿傳霖派兵剿辦，並請收回其地，原屬咎由自取。朝廷因念該僧番等久受國家深仁厚澤，豈竟自外生成，恐鹿傳霖操之過蹙，未足以折服其心，特將鹿傳霖開缺，派恭壽署理督篆，諭令持平辦理。茲據奏稱：當鹿傳霖派兵進剿之時，該番官等並非有意抗拒，因見大兵臨境，疑懼不敢投案，憑寨固守。鹿傳霖誤聽帶兵官一面之詞，遂謂其叛形昭著，是以有改土歸流之議。前據達賴喇嘛在理藩院呈請償還地方，並覽該署督此次所奏各節，是該番官並無叛逆情形，尚屬可信。朝廷軫念僧番，豈肯以迹近疑似，遽行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地方，仍著一律賞給達賴喇嘛收管，毋庸改土歸流。」(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四一二，頁四。

十八日(十二月十一日) 李秉衡因山東教案遭德公使反對，清廷收回四川總督之任命，以裕祿代之。

清廷諭曰：

「四川總督李秉衡因事解職，調福州將軍裕祿爲四川總督。」(註一)

按：清廷於本年九月初二日任命李秉衡爲四川總督，李尚未前往就任。會曹州教案起，清廷命其負責偵破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八二〇

。李秉衡素仇視外人，曹州德教士之被害係大刀會所爲，秉衡心許之，而坐視其發展。德使請毓衡職，清廷不允。德使復向總署爭辯，乃命開缺，秉衡於是益切齒西人，爲以後八國聯軍期間秉衡北上勤王，奉命督師之張本。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四一二，頁一〇。

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五日) 俄軍艦強踞旅順、大連。

方德艦佔領膠州灣後，李鴻章以中俄同盟故，曾請俄國代索膠澳，俄政府初欲派艦隊監視德艦之行動，命令已發，而忽然中變，蓋德俄已有所勾結也。本日，俄艦聲言助中抗德，開始進入旅順、大連過冬，水兵登岸，放恣殺人，而總署猶信俄人履行中俄同盟條約，於二十四日電駐旅順提督宋慶曰：「俄船在旅所有應用物件隨時接濟，勿聽將弁譌言，致啓釁端。」(註一)而李鴻章尙信俄國「斷不占我尺寸土地」也。(註二)未料俄艦占踞旅、大後，竟提出租借要求。國人對俄人之觀念爲之一變，微德「回憶錄」記其事曰：

「當其我們戰艦泊在旅順前面，軍隊猶未上陸之時，余曾與英國大使 O. Connor、德國大使 Radolin 晤談數次。(原註 O. Connor 其後改任君士坦丁方面英國大使，已於數年前死去。Radolin 後來轉任德國駐法大使，現在業已退職。余與 Radolin 個人感情極好。)當 Radolin 假滿歸來之時，特來余處，並詢余，對於此次事變，意見如何。余乃答曰：『余認爲此次全部事變，乃是一場大大兒戲。但是，可惜此項兒戲，勢將得一最壞結果。』」(原註：所謂『兒戲』一語，係指德皇此次行動而言，蓋此次事變，全由德皇引起。)Radolin 竟認此種談話，實有電達柏林之必要。究竟 Radolin 之電報措詞如何？余固一無所知，但其結果何如？

凡有外國公使拍與本國政府之密碼電報，一如其他各國通例，暗由我們外部設法譯出。其時翻譯各種密電，往往只有數個密碼，不能譯出，其餘大部份密碼，則皆容易譯出。於是關於余與 Radolin 談話之電報，亦被翻譯出來，並被 Murawiew 伯爵看見。彼竟認爲此事頗有轉奏陛下之必要。過了數日之後，余到陛下那裏，陛下接見余之

情形甚爲冷淡。當余辭出之時，陛下乃舉身，並向余曰：『Sergei Juljewitsch，朕勸君，如與外國公使談話，稍爲小心一點。』

余當時却未能立刻了悉，究係指着何種談話而言。乃向皇上答曰：『陛下，臣實不知，係指何種談話；臣所知者，只是臣與外國公使談話，實無一次有損陛下或祖國之事。』

皇上對此，未曾加以回答。

當其我們戰艦尚泊旅順前面之時，Murawiew伯爵曾給我們駐華公使訓令，該使須向中國政府安慰；並謂我們之來，係助中國脫離德人壓迫；倘若德人退走之後，我們亦將隨之退去云云。因此之故，中國方面初時對於我們之來，十分欣慰；而且相信我們約言，竟有數星期之久。但是不久，中國政府即得彼之駐德公使報告：謂我們係與德國通同一氣爲之，云云。於是中國政府開始對於我們懷疑。

其間陸軍大臣 Wamowski 於正月一日辭去本職，其後任爲陸軍中將 Kuropatkin。因此，在是役開始之時，Kuropatkin 實未參與。余乃希望，新任陸軍大臣 Kuropatkin 當可與余合作，我們仍將退出旅順而去。

當此之時，此間曾召集一種會議，由 Alex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主席，議定我們對華之要求條件。在此會議之中，Kuropatkin 業已列席。

余對於此項全部計畫，仍是始終加以反對。但是並不能獲得 Kuropatkin 之贊助。不但不得贊助而已，而且恰相反。蓋 Kuropatkin 之意，倘若我們既向中國要求旅順、大連，則我們必須同時盡取遼東半島的關東區域而有之。其論據係以爲：若不如此，則我們倘遇戰爭之時，實無力保衛該項港口，云云。此外，彼並謂：我們必須從速築一中東鐵路支線，直達旅順港口。

Kuropatkin 並不批評我們此項計畫，究竟是好是壞；彼但提出上述（佔領關東全部之）要求條件，認爲一種必然結論而已。後來遂依照此項要求條件，加以議決。

於是余乃利用下次前往冬宮陳奏之機會，特向皇上辭職。至於辭職理由，則係首爲前次皇上向余所下之警告，其次則爲最近各種舉動全與余意相反。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八二一

皇上乃向余答曰：彼實不能離余。彼對於余爲財政大臣一事，實係十分信任，關於此層，余當然無所埋怨。（原註：此語一點不錯。蓋余在財政大臣任內，無時不受陛下十分信任。）若就個人品格而論，彼對余極爲尊敬；因此彼實不能准余辭職。並請余照舊服務。至於旅順、大連問題，現在業經議決，究竟我們舉動是好是壞，將來總可看見。無論如何，此項問題業已了結，彼實不願再行更改。但求余以後對於此事，仍須盡力助彼，使其順利完成，彼願躬自求余爲之，云云。

其時我們駐華公使 Pawlow，爲 Cassini 之繼任者，乃將我們要求條件，遞交中國。其內容係要求中國，將關東區域以及旅順、大連，租與我們，以三十六年爲期。但此種租借實與普通租借不同，蓋無論我們方面或中國方面，均無租金一說，故也。中國政府對於此項要求，係取拒絕態度。

我們戰艦泊於旅順海灣之前，軍隊尚未登陸。初時，中國官廳對待我們水手，極爲客氣；但其後彼等態度漸漸更改，對待我們水手，極爲粗野。」（註三）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七。

註二：「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條。

註三：王光祈譯：「李鴻章遊俄紀事」，頁六六——七一。

二十三日（十二月十六日） 貴州學政嚴修請設經濟特科以收實用，清廷命總署會同禮部妥議具奏。

本日，貴州學政嚴修以時政維新，需才日亟，請破常格，迅設專科，以收實用。並陳辦法數端：一、新科宜設專名。二、去取無限額數。三、考試仍憑保送。四、保送宜嚴責成。五、錄用無拘資格。六、赴試宜籌公費。旋軍機大臣奉旨：著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妥議具奏。其原奏文曰：

「奏爲時政維新，需才日亟，請破常格，迅設專科，以表會歸而收實用，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近日內外臣工，屢以變通書院添設學堂爲請，均已上達俞允，次第施行，欽仰聖明，天網行健，本育才興學之意，爲窮變通久之謀

此誠更化之始基，自強之要義也。而臣竊反復推詳，猶以爲道有未盡，何也？書院學堂，所以教之者至矣，然以二十餘行省之大，四百兆人民之衆，其在書院學堂內者，未必所教皆屬異才，其在書院學堂外者，未必散居遂無英俊，既多方以成就後學，尤必使有志之士，翕然奮興，此非迅設專科，布告海內，恐終無以整齊鼓舞而妙裁成也。

前歲軍事甫定，皇上詔中外舉人材矣，兩年以來，保薦幾人？錄用幾人？臣固無從懸揣，但既無期限，又無責成，設稍存觀望之心，卽難免遺賢之慮，而且擢用者未及徧曉，則風氣仍多未開也；去取者未一章程，則才俊不免淪散也。爲今之計，非有曠出非常之特舉，不能奔走乎羣才；非有家喻戶曉之新章，不能作興乎士氣。伏查康熙、乾隆年間，兩舉鴻詞，一舉經學，得人之盛，曠代所希，恩遇之際，亦從來未有，彼時晏安無事，猶能破常格以搜才，豈今日求治方殷，不能設新科以勸士？臣愚以爲倣詞科之例而變通之，而益推廣之，謹就管見所及，敬陳數端，以備聖明採擇！

一、新科宜設專名也。詞科之日，稽古爲榮，而目前所需，則尤以變今爲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國利病，或熟諳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學律學，擅絕專門，或格致製造，能創新法，或堪遊歷之選，或工測繪之長，統立經濟之專名，以別舊時之科舉，標準一立，趨嚮自專，庶幾古才絕藝，咸入彀中，得一人卽獲一人之用。

一、去取無限額數也。以今要政，在在需人，若果與試多才，雖十拔其五，亦不爲過，卽或中程者少，亦請十拔其一，以樹風聲。前者特達，則後者興起。至於考試年限，或以一、二年爲期，參酌春秋闈之例，昭示大信，永定章程，庶天下爭自濯磨，而人才將不可勝用矣。

一、考試仍憑保送也。不立科目，人終以非正途爲嫌，然使但憑考試，不由薦舉，恐濫竽倖進，復蹈前轍，前此科舉之弊。詞科之例，所爲法良意美也，應請飭下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與夫各省學臣，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無限疆域，凡所保送，悉填註姓名籍貫，已仕未仕，並其人何所專長，按照道里遠近，酌定限期，咨送總理衙門，請旨定期考試。本爵人與共之義，兼考言詢事之謀，如是則人無倖心，而眞才可以立見。

一、保送宜嚴責成也。天下之大，何時無才，若非膜視時難，自必留心蒐訪。凡應保送之大員，或以無才可薦爲詞，卽非蔽賢，亦屬尸位，應請嚴旨懲處，以戒泄沓。如有保者拔十得五，或人數雖少，而實係出類拔萃者，則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八二四

薦賢上賞，自有明徵，應請恩旨優予獎敘，以勵其餘，庶內外諸臣，皆知留意人才，不敢因循諉謝。

一、錄用無拘資格也。詞科之例，不以已仕未仕而拘，故布衣而授檢討，知縣而擢編修，道員而遷翰林院侍讀，其後典試衡文，概與進士出身者同例，有非常之才，即有不次之擢，理固然也。今請參考成案，而略為變通，凡京官自五品以下，外官自四品以下，與夫舉貢生監布衣，均准保送與試，試取優等，已仕者授翰林院侍讀至編修，未仕者授檢討庶吉士，次之授部屬同通，或充出使參贊隨員，或充總署章京，或發往海疆省分差遣，又次之給以五、六品頂戴，令赴各省充當教習，或充各學堂領班學生，數年學如有成，仍歸下屆考試，其最下者黜之。凡錄用由於此科，皆比於正途出身，不得畸輕畸重，如是則人無歧慮，而才自蔚然而興矣。

一、赴試宜籌公費也。寒士或艱於資斧，邊省或憚於跋涉，體恤不至，則難免向隅。應請酌分道里，參仿舉人入京會試之例，量給公車之費，如在遙遠省分，可否仰鑒天恩，俯准給予火牌，馳驛北上，出自逾格鴻慈。以上數端，微臣一得之愚，不敢自謂詳備，如蒙俞允，請飭下部臣，逐加覈議，請旨施行，似於大局不無裨益。

抑臣更有請者，本年安徽撫臣鄧華熙，籌議添設學堂摺內，請四年後，取若干名作為生員，部議以為有妨學額，然則如臣此議，豈不更妨科舉？而臣以為是慮之過也。以為無益，則不如其已，以為有益，豈其處今時勢，猶患才多！方今庠序如林，甲科相望，士如其衆也，然而中外大臣，猶朝夕議儲才者豈非已知其不足恃，將欲更張，尚無善法乎？今不以為舊日之士習，無補時用，轉慮夫新學之位置，有妨舊額，似於目前求材之本意，未能符合。且臣請比類而證之，往者粵逆之亂，綠營兵額徧天下也，以為不可用，則從事於招募，湘淮江楚之間，其自名一軍者，至不可勝紀，彼時固無暇裁改綠營，亦不聞阻止招募，謂其有妨者，勢處其窮，不得不變而出此也。今人材彫乏，患伏無形，而科舉既未能驟變，學額中額，又未能遽裁，暫為並行不悖之謀，徐思整齊畫一之法，以為權宜則有之矣，臣愚誠不見其猶有妨也。伏冀皇上奮獨斷之明，早定宸謨，以宏大業，天下幸甚！微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一）

註一：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知新報」第四十六冊。

二十四日(十二月十七日) 清廷從總署奏，獎勵刑部主事張元濟等所設通藝學堂。

先是，張元濟等於京師設立通藝學堂，學習西國語言文字，並且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將學堂教習酌給獎敘，成業學生則仿照廣方言館學生例，調考錄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乃議奏，獎敘教習，擬三年期滿著有成效者，由該學堂出具考語，稟由總理衙門覆辦，其成業學生情願投效同文館者，准隨時報名，聽候調考。本日，清廷從之。(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四一二，頁十三。

二十五日(十二月十八日) 德皇在漢堡(Hambury)對其海軍演說謂：如有阻撓德國在華利益者，決以實力對付。

先是德軍既據膠州灣，德國記者在膠州向本國報導：「古老的中國文化，已為西方文化所毀滅，新的中國將自此灰燼中重建。德國必予中國以實際援助，中國現政府之死亡乃時間問題。」(註一)至是德皇益表示其對華之野心。

註一：Der Ostasiatischer Lloyd，引自「李鴻章年(日)譜」，頁三七〇——三七一。

十二月

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英第一次會勘滇緬界。

先是，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正月，李鴻章與英使寶納樂訂立中英續議緬甸條約附款後，清廷即派員分路會勘。本日，騰越鎮劉萬勝與英員司格德自騰越南布江起勘，至順寧之耿馬、孟定、上隆渡止一段，計長二千餘里，均列號豎立界椿。此為首次中英會勘滇緬邊界。（註一）

註一：劉伯奎：「中緬界務問題」（正中書局，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頁十九。

十一日（一八九八年一月三日）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由赫德與英使議中英日聯合辦法，以抗俄德。

本日，日本參謀部大佐神尾光臣、大尉宇都宮太郎到武昌，與張之洞談中日聯合，並聯英為助，以抗俄、德。張即三電總署，正式奏請與英日聯合，以為解救當前危機之要務。由赫德探詢英方意旨，然後與英使密商，並授權駐英使臣羅豐祿與英外部逕商。（註一）

按：聯英日以抗德俄，為當時維新派之一貫主張，南湖主辦新政人物，尤切望其實現。日人乘之，乃大展其對華之活動。

附錄：

一、李守孔撰「兩湖維新黨人聯盟英日之外交主張」（註二）

（唐）才常於列強中素仇俄，而主張親善英、日。因英、日不過「眚餘探囊發匱之盜」，而俄人則直欲「宅爾宅，田爾田，僕爾僕，子爾子，孫爾孫，尸爾囊，扇爾篋爾匱。」而無識之輩，竟誤認中俄三百年來未啓兵端，深可倚恃，誠所謂「獨坐窮山放虎以自衛者也。」特指出俄人必欲外侵之原因有四：

俄負北冰洋，而國無議其後者，勝爾勝，敗亦勝，其必出而爭衡者一。天網浮涵，君權肆橫，恒恃武功以

震其國力，其必出而爭衡者二。君權既重，民氣益烈，希利尼人，縱橫輦轂，永思得華實上腴以置黨人，而靖民變，其必出而爭衡者三。打牲舊習，彼得雄心，擇弱而欺，擇肥而噬，螻蟻人命，其何恤焉？其必出而爭衡者四。

才常甚不滿意李鴻章之聯俄策。謂俄人「外餌甘言，內癰腐骨。」「攫我東三省路權，索我旅順大連。」「恨不能起石晉桑維翰（按：影射李鴻章而言）而刃之，而責其託庇牢固矣，以致出帝之詬辱踉蹌也。」觀於日後中俄關係之演變，與俄人侵華之史實，才常對俄人可謂有明確認識者也。

至於英國，才常以其「屬地遍五洲，商埠環瀛海，學事一不當則鞭長莫及，全局瓦解，故持盈而保泰。」日本則「席新勝之威，而購船置械，如囊人入市皇皇，不貲米貫刀。惟敵德則有餘，敵俄則不足，牛瘠債豚，膺亡塞齒。」對我方表友善也。「夫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聯俄則眉睫火燃，即見危亡於旦夕；聯日以聯英，則皮膚癢害，猶可療球於將來。」欲聯英必先聯日，聯日尤在於師法日人富強之道。聯之法：

中國而不欲圖存則已，苟欲圖存，則不如學矣。中國而不求實學則已，苟求實學則不如假途於日矣。且夫兵也、商也、工也、農也、礦也、鐵路也，皆學也。學既可通，則籌款興辦之事亦可通。款既可通，則整軍禦侮之事亦可通。軍既可通，則休戚存亡之理亦可通。故以通學者通口，通口者通英，合中、日、英之力縱橫海上，強俄雖狡，必不敢遽肆其東封之志。

此種見解為當時維新黨人之一致主張，亦為戊戌變法之外交方針。才常等對於聯日，不僅發之議論，且見諸行動。日本政府亦利用機會，策動其政客冒險份子，以達成聯絡中國維新黨人之目的。

先是光緒初年，日人創亞細亞協會於東京，中國駐日公使及旅日人士多有參加。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上海日總領事小田切萬壽，「睹中國民智未開，義關唇齒。」復倡興亞大會於滬上。首次會議假廣福里鄭觀應（陶齋）寓舉行。主席三人，為鄭蘇龍、何梅生、鄭觀應。與會者日人為總領事小田、三井洋行總辦小寶三吉、三麥洋行總辦，及日本領事翻譯官等。華人多滬上名士，若張謇、江標、汪康年、經元善等數十人。依其章程規定，無論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八二八

亞洲大小各國皆准入會，泯畛域之見，共立亞洲富強之本。設亞洲協會公所於上海，發行亞洲協會月報，各國除首都所在地設總會外，各省各府州縣亦廣設分會。

日政府除假藉學會實現共和平侵華之目的外，以湖南爲中國維新黨人之大本營，復遣官員直接與之接觸。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正月，日本參謀部派遣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宮太郎等至漢口，約湖南新政中堅份子譚嗣同前往會晤。神尾等獻計於嗣同曰：

振興中國當於湖南起點，如聯盟計成，吾當爲介於英，而鐵軌資焉，國債資焉，兵輪資焉，一切政學資焉。吾又當與英盡收亞細亞東煤塊，斷絕各國輪船之用，使近無可屯，遠難速運，鐵艦來多則不能持久，少則尾之轟之立碎，此不戰而屈人之兵，而以悉網煤礦制太平洋死命便甚。

又曰：中日唇齒相依，中國若不能存，彼亦必亡，故甚悔從前之交戰，願與中國聯絡，救中國亦以自救也。並聞湖南設立學會，甚是景仰，自強之基當從此起矣。」嗣同頗信之，其於返回長沙後，在南學會發表演說，竟謾認日本政府對於中國變法予以同情與支持。謂「日本席全盛之勢，猶時恐危亡，憂及我國，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才常更主張完全接受神尾等之意見，並譬之曰：「中日構衅如兩臂相逼而爭道不休，兩臂相怒而色然以鬥。伺其旁者或攫取其衣冠去，莫之覺，此可謂大愚不靈者矣。」並提出聯日之策十端：

（一）南學會急派人至日本辦興亞會事，一二年後挈其政學歸，新吾中國。（二）立興亞分會於湖南，與日本時其消息，靈其腦筋。（三）急聘日本人來湘，或武備學堂，或校經書院，或另闢學堂，以收速效。（四）有志遊歷日本者，驗實予以文憑，酌給資斧。（五）設東西文譯局，速譯憲法諸書。（六）煤鐵諸礦廣招日商或南洋大賈合辦，藉通財源。（七）製造機器公之日人。（八）聯橫濱、神戶華商建立孔子教堂。（九）湘報與興亞報彼此分派以拓見聞。（十）官紳子弟自備膏修，多入橫濱大同學校。（撫部現擬招選子弟五十人，分送日本各學堂，不在此內。）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侵華爲其既定政策，觀於民國後日人藉「東亞共榮圈」，「建立東亞新秩序」等口號用作侵華之工具，日人之用心可知。而才常等則視之爲「友邦」，實未能予以苟同也。

二、李國祁撰「張之洞聯盟英日的外交政策」(註三)

甲午戰後中國已陷入瀕臨被瓜分的局面，張之洞對此益感到聯結強援的重要。他此時感到對中國最大威脅的是日本。他認為日本是「以商約困華」，欲中國貧而生亂。日本與中國同文，力能知歐洲列強所不能知，至歐洲列強所不能至。他最初的構想是英國能基於其本身在華的利益，挺身援助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經過多次努力與嘗試，他對英國的遠東政策漸漸有所了解。而三國干涉還遼的成功，使他亦相信俄國在遠東有其實力，最能援助中國。故他的聯結強援由主張聯英而變為主張聯俄。早在光緒二十一年四月間他即主張與俄成立密約，結為強援。故如果張之洞不是首倡與俄訂立密約的人，至少他也是首先贊助中俄密約的重要疆臣。李鴻章當時的聯俄外交政策是充分地得到張之洞支持的。但是曾復幾時，由于遠東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動，他終於又由聯俄的態度而回到他的舊主張，聯結英日，更進而有中英日同盟的構想。

造成張之洞態度改變的主要因素，就是光緒二十三年多德佔膠澳事件。德佔膠澳原是三國干涉還遼的延續。蓋當時俄法各得所酬，各取所需，德人却一無所獲，遂乃挺而走險，借曹州教案為由，武力奪取膠澳，作為其在遠東的海軍根據地。但在遠東的國際局勢上，却因此造成破壞和平，強力奮取的惡例，開列強圖謀瓜分中國的先聲。自中日甲午戰後，國人有識之士已了解及中國局勢的險惡，恐懼於列強的瓜分。李鴻章的聯俄，張之洞的結強援，顯然都是針對此種情勢而發，欲未雨綢繆，借強援之威，抗拒他國的侵入，俾能挽救此種厄運於萬一。而今這種武力瓜分的行為竟先出之於中國所聯結強援俄國的伙伴德國，自是舉國震驚，惶然失措！張之洞對於德佔膠澳最初的看法，認為德國本無用兵強佔的野心，純係誤信主教之言，而德提督藉事邀功，將錯就錯，遂乃佔據膠澳。故他致電許景澄主婉辭勸說德政府。及後德方非僅不予退讓，並進而要求山東路礦權，張之洞乃知此事棘手，主張從速滿足德人願望，俾防事態擴大。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八九七、一二、一四），他致電王文韶說：

「大抵此時求俄助，則俄必有所求，息德畔，則德不肯輕讓。此事甚難處，然雖難亦必設法了之，愈遲則愈難矣！」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八三〇

他已感到中國的強援俄國極不可靠，可能是與德國沆瀣一氣，雖然他此時尚未了解德人的行動事先曾得到俄人的諒解。張之洞所擬的對策是與總署的意見相同，分曹州教案與強佔膠澳爲兩事。在教案方面他主張一切從優，盡量主動地去滿足德人的要求。發巨款十萬，於濟寧城官建新教堂。並仿宣武門教堂故事，敕賜匾額古玩器物。明降諭旨，詳述天主教係勸人爲善，嚴禁虐待教士，俾不德教士之憤，減免德政府的藉口。在膠澳問題方面，他主張以福建一島嶼替代膠澳，讓與德人，酬其干涉遼遼之功。甚至另加他項利益，均無不可。但膠澳必須歸還，歸還後可改爲商埠，多給租界。張之洞之所以如此主張，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藉口教案武力佔地的惡例不可開。當時中外教案糾紛層出不窮，此例一開，中國勢必爲列強所瓜分。一是懼怕他國繼起效尤。他認爲列強一旦效尤，俄佔旅順，倭佔威海，英佔吳淞，法佔琼州，則中國海口盡失，海軍無澳，永無自強之望。在德人所提出的六項要求中，他認爲山東鐵路一條最爲惡毒，意在吞併整個山東，主張以滬寧路的權益相抵換。

膠澳事件發生以後，在對列強的態度上張之洞最感坐臥難安的是英俄繼起效尤，瓜分中國，故主張「無論如何將他事遷就受虧，總須令俄不損北洋之權。」而使英人亦無機可乘。他認爲俄德係通謀，英俄係仇敵，其中他尤注意英俄的利益衝突，過去他堅信可以利用英俄間矛盾，使其爲我所用，目前他已無此種幻想，而認爲列強間雖有矛盾，其圖我則一，中國被瓜分的局面必將因此而形成。顯然地經過甲午戰爭與三國干涉遼遼，張之洞對列強的眞面目有更深一層認識。這一點認識實是經過多少血淚辛酸的教訓而得來，多年的歷練，使張之洞原有的儒家理想主義的精神，已消磨殆盡。此時他所注意的，僅是如何能實際地來解決中國當前的厄運！

張之洞既感到當前中國的安危繫於英俄是否效尤，其時俄艦已入泊旅順，他感到中國被瓜分的局面一觸即發，故主張竭力將英國安頓妥帖，善爲羈縻，不使其繼起效尤。因之他此時聯英的態度，純粹是消極的，安撫多於聯絡，籠絡多於結援。非僅與他甲午戰爭前後結英爲強援干預日本的態度不同，即與當時劉坤一及維新黨人聯英的態度亦不相同。恰當此時英日兩方面在中國南方各重要疆區處皆有活動，倡中英日聯合之說，謀保其自身在華利益，因此張之洞、劉坤一與維新黨人遂有中英日聯交的構想。

英日在中國南方各重要疆區處的活動是同時分頭進行的。根據日本外交文書中上海總領事小田切的報告，最早

是上海清字新聞撰文主張中英日同心協力，共抗俄德法，維持遠東和平。此原是自膠澳事件後的一般看法，故該文刊出後，自引起各方面的響應。首先是上海道蔡鈞於十一月十九日（一一、一二）往訪小田切，提及中英日利害相同，應行動一致，對抗俄德法三國的結盟。小田切深以為然，允報日本政府，並盼蔡氏亦商得劉坤一、張之洞的同意，轉報北京清政府。而另一方面前任日本使館附參謀大佐神尾光臣恰於此時游歷至鄂，往訪張之洞未晤，與漢口道及洋務委員暢談中日同文同種同教，甲午之戰，彼此俱誤，主中國派員赴日學習軍事，並以此為兩國重新聯交之始。神尾光臣的訪鄂顯然不是偶然的，據張之洞向總署的報告，他是奉日本陸軍二等提督川上操六之命前來，當然他的任務小田切必定知情。因事先上海道蔡鈞曾電告張之洞，神尾將往拜訪。張之洞因對神尾來意未明，懼其妄事要脅，故借查勘堤工為由，避而不見。及事後聞悉神尾係為中日聯交而來，遂歎動不已。此時蔡鈞與小田切議商中英日聯交一事張氏亦得知悉，故於十二月四日（一二、二七）致電神尾，邀其再度來鄂商談。

英國方面：聯交之說係由自強軍中英將弁於十一月中旬以後向自強軍總辦沈敦和言及。他主張中英日三國聯盟，在中日則保疆土，在英國則保東方商務，各得其益。蔡鈞與小田切的商談，劉坤一原極支持，並曾電稟總署，及聞知英將弁之言，遂益積極。但劉坤一對中英日聯交的看法與張之洞稍有不同，他認為德法是世仇，在遠東問題上德與俄親，與法疏遠，中國應加以運用，同時並聯法國，使中國與英法倭相與倚角，如此德必不支，故致電榮祿，主張中英法日四國相結合。

然而清廷對於當時英日的說法並不輕於相信，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八九七、一二、一八）旨諭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稱：

「英將之言雖未可輕信，然聯盟分估之說朝廷亦早有所聞。此機括全在膠澳，膠澳不退則各國紛起。現在祇可穩住各國，虛與委蛇，俟海靖回電到後再與商辦。若能將膠澳開作通商口岸，而另給澳中租界與德屯煤泊船之所，或可暫息紛爭。若僅與一二國聯盟，此輕彼重，適辟爭局，恐非長策。」

可知清廷是不相信英日真能援助中國，更由於三國干涉遼遼的經驗，認為英日聯盟之說主要的目的是在分估，而主張乾脆向德人低頭，早日解決膠澳問題，俾免事態擴大，引起他國的覬覦效尤。清廷這種不相信英日真能幫助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八三二

中國的看法，是與張之洞約略相同。祇是張之洞因此而主張對英日實行羈縻政策，泯其瓜分中國的野心，而總署却主張乾脆向德人讓步，早日解決膠澳問題。

此時英艦集中吳淞，有入長江護商之說。英將弁復與沈敦和談及中國應及時絕俄聯英，因此南方疆臣聯英之說再起，劉坤一電請張之洞、盛宣懷同時向總署進言。

在當時主張聯英的諸大臣中盛宣懷實有其特殊的地位，蓋盛氏因督辦中國鐵路公司，修建蘆漢路，與張之洞、劉坤一均有密切聯繫。根據盛宣懷的分析，膠澳事件極可能引起英、俄瓜分中國，屆時「法必附俄，倭必附英。」如果俄人真有誠意援助中國，定可脅迫德人使其歸還膠澳，否則必互相合謀，各取所欲，德踞膠澳，俄竊旅大。因此他主張中國亦當稍事佈置，作適度的聯絡英日，神尾派員赴日學習軍事之說正可加以運用。顯然他的立場是介於張、劉之間，他主張透過日本聯絡英國，此與張之洞的意見相同。他相信英國可援助中國，這與劉坤一的立場相同。而且由於他掌握電報局，與總署大臣中的翁同龢、李鴻章，北洋大臣王文韶均有特殊關係，因此他成為中英日聯交之說的穿線人。

張之洞既邀日本太佐神尾光臣再度赴鄂商談一切，而日本提督川上操六於神尾未來之前，復派參謀部員宇都宮太郎偕贈送日本地圖及政治書為名，赴鄂與張氏聯絡。宇都除向張之洞再度慫恿勸說派員赴日學習軍事外，並齎語委員，英日已結盟，提出三項助華辦法，一、用兵船武力干預，相信日本海軍有力抵抗俄德遠東現有的艦隊，但如俄德增調艦隻東來，則無把握。二、外交調停，懼不生效。三、聯英共同助華。宇都認為第三項辦法最為有效，而且容易實行。故宇都來鄂的目的仍在為中英日同盟作說客。張之洞對此事的看法是，倭人因強敵四逼，故志在聯絡英華，以圖自保，中國正可因而用之。張之洞不相信日本有力量抵抗俄德，但相信英國海軍有此實力。故張之洞此時的聯絡英日仍受其陸權國家當與海權國家相結的思想影響。他認為聯日是以聯英為目的。優點在：「倭肯出力勸英與我聯，則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而且中國如不聯絡日本，日本勢必附英而窺長江。因此他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一八九八、一、二）正式奏請與英日聯交，他認為那是解救當前危機的第一要著。主

張經由赫德探詢英方意旨，然後與英使密商，並授權中國駐英使臣羅豐祿與英外部逕商，俾早日促成其事。

張之洞的聯絡英國雖然意在羈縻，而聯絡日本，又是以能否聯英爲樞紐的，但是在他心中仍多少存有利利用列強間的矛盾，使其互相觀望牽制，故不主張與俄決裂。在電奏中他也說：「然羈縻英倭，則俄德法稍有所忌。結交俄國，則英所求亦不能奢。」顯然他仍不能完全擺脫以夷制夷的舊觀念！另一方面由他此時完成的著作「勸學篇」中看來，他是極端注重種族問題。他的聯結日本，顯然也是受種族思想的影響。在邀神尾再度來鄂的電報中，他就曾說：「貴國與敝國同種同教同文，同處亞洲，必宜交誼遠過他國，方能聯爲一氣。」而當時日本亦是以這種口號向中國表示好感。中日兩國在俄德兵威的壓迫下，已是均願捐棄前隙而重歸於好了！

張之洞在行動上除了奏請清廷與英日聯交外，另一方面並欲按照日本建議，派鄭孝胥等率領學生赴日學習武備農工各科。於是外間盛傳鄭等赴日負有商談聯交的使命。湘撫陳寶箴並電總署，支持此一行動。中英日聯交之說因之謠傳更盛。此時中國償日賠款又將到期，總署與英洽商大借款。報章盛傳英方借此勒索，索舟山與香港對岸之深水埗，造粵漢鐵路，屯兵長江下游及押厘金諸事。張氏認爲如果英志得逞，則實已占有江南十二省，俄法必繼起窺伺南北，中國即被瓜分矣。於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八九八、一、一六）電請總署緩償日債，俾日軍久駐威海衛，使俄日德三國在華北互相牽制，並可免除英人藉借款的勒索。而其主羈縻英日之說也益積極，倡議借英款練海軍，以西南邊地或鑛山作押，准英修建山西、陝西鐵路，與英合開山西煤礦等。他的政策是欲利用英人建立海軍，阻其入據長江之謀，允英修建晉、陝等處鐵路，絕其承造粵漢路的要求。顯然他是意在避重就輕，以利易利，寓防範於羈縻。而他最着重的仍是海權問題，他說：

「中國無海不能立國，無海軍即無海矣。中國無長江，各省立時擾亂。英兵屯金陵、鎮江，中國即無江矣。水師慘英最精，英若偕巨款造戰艦雷艇數十艘，船向英造，將向英借，並派將弁學生數百人赴英學習，船造成，我將弁亦練成矣。募英將如郎威理者統之，管帶用中國人，船上執事參用英人，即與英船在東方者合隊操練。英既得造船之利，又得多用英人之益，又得我海軍爲伊東方兵船助勢。各國洋報皆因中國無自強之實，故啓瓜分之議，今見我大舉經營海軍，氣象頓爲一振，自可息其狡謀。則海面海口可保，商務自亦無碍，彼即不能藉護商之名以入江，是中國已藉此舉而自強矣。」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十三日

八三四

他的這種想法顯是一石兩鳥的如意算盤，希望既能阻英人入據長江，又能達到自強建立海軍的目的。總署對這種羈縻聯交辦法不予贊同，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八九八、一、二一）電張之洞說：

「俄倭日熾，各國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聯我無非藉我為屏蔽，無資於我也。既與聯，則必有締約。日英政出議院，斷難久秘。一經傳播，中俄之交絕，德法乘之，其禍不可思議。俄地接壤，且有歸遼之助，今又聯英日而拒之，前後三年矛盾若此，恐環球各國皆不值也。憶壬辰、癸巳之間，英以帕米爾事密議相聯拒俄，我如其意不遺餘力，詎英自規利益，潛與俄盟，割什克南羅喜兩部落畀俄，而訂界約，曾不告我一言，約成而悉其詐。此聯英之前車也。日本狃於遼役，民志日驕，其二三老臣尚以為懼，其於我誠有唇齒之勢。馬關約定，我亦大度處之。……日英求聯，皆游士兵官之言，該使從不稍露端倪。聯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國風俗迥，政教同，相聯甚便，中外事事隔閡，難為竊謀。祇可遣使各國，商保東方太平之局，則不聯之聯，不致激成東方戰局。」

總署的看法顯然要比張之洞切實得多。甲午戰後聯俄的外交已使中國焦頭爛額，喪失甚多權益，而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如今再回頭聯英日豈不是由一個陷阱跳進另一個陷阱，徒祇損失更多的利益而已。以當時中國的國勢而言，總署實在沒有櫻俄人之怒的勇氣，而況當時聯交之說確僅是英日部份人士的意見，政府並未曾透露過絲毫如此的意旨。即使這一部份人的倡導，也是另有目的。在日本，參謀大佐神尾的言行，或可代表日本陸軍部的意旨，借聯交之說，在擷取中國的軍權。而英將的言論更祇是個人的行為，如將之與日後貝思福建議用英人練兵一事合併觀之，或者其意亦在掌握中國的軍權。

註一：「張文襄公全集」卷七九，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致總署」。

註二：節自李守孔：「唐才常與自立軍」，中國現代史叢刊第六冊，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文星書店出版。

註三：節自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十三日（一月五日） 康有為等在北京組成粵學會。

本日，康有為欲續強學會之舊，在北京南海館創辦粵學會，京友集者二十餘人。又以各會館皆為京官會集，欲因而導之，乃草疏交御史陳其璋上言，請將總署同文館羣書頒發各省會館，以便各京官講求；旋又議創經濟學會。（註一）

註一：「康南海自訂年譜」，頁三九—四〇。

十六日（一月八日） 英使竇納樂要求中國借款一千二百萬鎊，以關稅鹽稅釐金擔保。

本日，英使竇納樂反對俄法借款中國，向總署提出抗議，並迫中國接受英款一千兩百萬鎊，以關稅鹽稅釐金擔保，由英人管理，並允：一、英國建築自緬甸至長江鐵路。二、長江流域不劃讓與他國。三、開南寧、湘潭、大連為口岸。四、開放內河。五、永久任用英人為總稅務司。（註二）

註二：英國藍皮書第五號：Mc Donnal to Salisbury, China, 1897.

十七日（一月九日） 吳敬恆晤康有為於北京，論當除八股、鴉片、小脚三害。

張文伯「吳敬恆先生傳」記曰：

「丁酉冬天，先生在天津北洋學堂教書，放了年假，到北京去看同鄉廉南湖，南湖約了紹興陶杏南，同先生三人，到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去看康有為。大家談到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八股、小脚、鴉片三害。先生說：『八股，我們可以自動不赴考；小脚，可以不纏；鴉片，可以相戒不染。』康聽了，就用兩隻手伸了兩個大拇指，狂喊：『好極了呀！好極了呀！』先生事後回想：『那種氣概，現在是三四等政客都優為之。當時我們却從未見過，不覺驚異是天人。』當天夜間，吾鄉許靜山先生就去告誡我們，這種叛徒，少去親近。」（註三）

註三：張文伯：「吳敬恆先生傳記」（國民黨黨史會出版，民國五十三年）頁四。日期係根據郭廷以「近代中

國史事日誌」。

二十二日（一月十四日） 陝西巡撫魏光燾奏請於省城創設格致學堂。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十六——二十一日

八三五

原奏曰：

「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爲本；求才之要，以整頓學校爲先。近年以來，內外臣工稟承諭旨，莫不以添設學堂儲才製器爲急務。光緒二十二年刑部左侍郎臣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一案內開，各省內地各府廳州縣興格致等學，肄習專門，果使樂有可觀，三年後由督撫奏明請旨考試錄用。本年二月安徽撫臣鄧華熙奏請各省均於省城另設格致學堂，並准奏明指撥的款各等因，均經欽奉硃批允准，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在案。臣查現在京師設立大學堂，天津、上海等處奏設頭等學堂，其東南各省，或另立書院，講求樸學，或就現有書院更變章程，綱舉目張，均有起色。國家需才孔亟，即在偏隅，亦應設法籌辦，以收鼓舞振興之效。陝省爲文獻舊邦，歷代以來，名臣大儒輩出，我朝深仁厚澤，涵濡二百餘年，文物之美，尤稱極盛。近經兵燹，原氣未復，而關中宏道味經各書院肄業諸生，多能研求實學，恪守前賢矩矱。其間忠義勃發，踴躍除銅習之士，亦往往而有，良由氣俗質樸，士氣果毅故也。竊維圖治之本，尤以興學育才爲亟亟，迭經通飭府廳州縣，各就地方書院增設算學格致等課，多已漸次遵辦，其涇陽新建崇實書院，茲已落成，經臣會同前學臣趙惟熙奏陳辦理情形在案。復據督糧道姚協贊轉據舉人薛信等稟請開設格致書院，風氣漸開，士知向學，自應於省城創建學堂，俾得薈萃羣材，益資講習。惟開辦之始，務須先得要領，不可徒託虛名。經費既應妥籌，章程尤須明定，當經檄行司道會商詳覆去後，旋據該司道等稟稱，現在款項未充，難於另建書院，擬暫借省城崇化書院房舍，創設格致學堂一所，名曰游藝學塾，本年由署臬司姚協贊於糧道任內先後捐用經費四千兩，以後常年經費，並議後任糧道每年籌捐銀一千二百兩。又署藩司李有棻詳明由各州縣每年捐銀四千兩，又升任藩司張汝梅籌撥生息銀一萬五千兩，遴派公正官紳經理興辦，延請教習考課生徒，一面於津、滬各處購買圖書儀器以爲講求製造之用，並分立條款，妥定課程，期諸生爭自奮勉，擬俟著有成效，再請指撥的款，三年之後，如果諸生學業成就，再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試錄用等情。詳請奏明立案前來，臣覆查省會建立書院，尤繫人才之消長，學術之純疵，拘守舊章，既滯於通今，末由一發其扁鑰；徒尚西學，又或輕於襲古，不憚自扶其藩籬。欲救二者之偏，惟有尊崇經訓以端其趨，博綜子史以觀其變，由是參考時務，兼習算學，舉凡天文地理農工商，與夫電化聲光重汽一切有用之學，統歸格致之中，分門探討，務臻其奧，而語言文字，尤爲初學階梯，亦應設立教習，

俾知塗徑，然後本末不嫌於倒置，體用亦可以兼賅。至於受益有遲速，所造有深淺，又不外示之升降以寓勸懲，驗之製造以定優劣，該司等設法措籌創辦要舉，實屬先其所急，所擬各條，亦能因地制宜，均臻妥洽，核與京師、津、滬及各省添立學堂辦法尚屬相符。從此實力振作，漸次擴充，知河嶽靈秀之區，必有奇才異能奮發而起，庶幾仰副皇上崇尚實學造就人才之至意。」（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三九九四—三九九五。

二十三日（一月十五日） 清廷以山東曹州教案，詔將李秉衡等交部議處，鉅野知縣許廷瑞革職，並命各省地方官實力保護教堂。

清廷諭曰：

「前因山東鉅野縣地方，有盜匪拒捕傷斃教士之案，業將兇犯分別懲辦矣。開缺四川總督前巡撫李秉衡身任地方，不能先事豫防，以致釀成巨案，著交部議處。兗沂曹濟道錫良、曹州鎮總兵萬本華、曹州府知府邵承熙一併交部議處。鉅野縣知縣許廷瑞緝捕廢弛，稟報遲延，著即革職。壽張縣有教堂被毀之案，該縣知縣莊洪烈著即查參。其餘濟寧、荷澤、單縣、城武等州縣，亦有民教相爭者，該州縣官均著分別撤調。山東為禮樂民邦，士大夫服習儒術，以知自重，至草野愚民，間有不明事理，其或毆辱教士，毀壞教堂，此風斷不可長。著該地方官嚴行禁戢，實力保護，並著通諭各省將軍督撫等，嗣後如有藉鬧教為名，聚眾生事者，即遵光緒十七年六月諭旨辦理，儼再因循怠玩，定行嚴加懲處，決不寬貸。」（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四一三，頁十三—十四。

二十四日（一月十六日） 清德宗與王大臣討論時事。

清德宗與王大臣論時事，詢變法以何為先？恭王不發一言，翁同龢主從內政根本改革起。同日總稅務司赫德訪翁同龢，指出中國之危，及因循不能自強，語極沉痛。（註二）清廷變法之醞釀漸趨成熟。

註二：「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條。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八三八

二十五日（一月十七日） 清兵部尚書榮祿奏：請設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廣練兵團，以資防守。

原奏曰：

「武備之設，原期得折衝禦侮之才，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習非所用，與文科舉時文試帖之弊略同，積習之端，未始不由於此。雖經朝廷屢次條奏，皆以格於成例，難議更張。查應試武童每縣少則百餘人，多或數百人，千人不等，約而計之，縣以二百人為率，合計天下數可三四十萬，教練成其利有五：年富力強無老弱濫竽充數，利一；弓馬嫺習，操練易成，利二；有志上進，與謀衣食者不同，利三；姓名鄉里有籍可稽，無逃亡之弊，利四；有空室有家，敢則歸農，不至流為盜賊，利五。且近在鄉里，養兵之費自輕，此尤勝於招募者。若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於操練教習數十人，就地教練，一歲之後，可成精兵，足以充役二年，作為武生，選其材武聰穎者，每省設一武備學堂，挑入學習重學化學格致輿地諸學，分隊隊馬隊工程隊諸科，限以三年，由各省督撫詳加考試，凡考列優等者，作為武舉人，其名數略參科場舊制，分別大省中省小省，各不得逾本省原額十分之五，此為武備特科。其三年一試之武科，暫准照舊舉行，但須酌減舊額一半，以期相濟為用，試之有效，再將舊制停罷，立將此項特科武舉人，咨送京師大學堂，限以三年，由兵部奏請，欽派王大臣考試，分別優等者作為武進士，其名數與常年會試中額各得其半，仍恭候廷試，各就本科，驗其膂力技藝，詢以方略，以待衛守備分用，屆時並令各路軍營自哨以上，均用此項武舉人武進士人員充補，俾得效力行間，以備干城之選。似此參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材，其用至廣，其效至速。各國聞此舉動，或稍戢其狡焉思啓之心，於國事實有裨益。應請飭下廷臣會議奏請宸斷施行」（註一）。

奏上，清廷諭曰：

「榮祿奏請設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等語，著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註二）

英國宣佈中國門戶開放，不許任何一國獨佔。

英財政大臣（Hicks-Beach）宣稱，不許他國關閉中國門戶。（註三）

註一：光緒朝「東華續錄」卷一四一，頁十九。

註二：同註一。

註三：KALL, 1923 紅檔，引自「李鴻章年（日）譜」，頁三七二。

二十六日（一月十八日） 江蘇補用道容閔建議總署，設立公司，借美款，自修天津至鎮鐵路，以抵制德人在山東造路計劃。

容閔字純甫，廣東香山縣人，生於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早年留學美國，卒業於耶魯大學，雖入美籍，而熱愛祖國。咸豐五年（一八五五）返華，經商上海，曾以茶販身分往來於江湖之間，一度至南京觀察太平天國政情。同治初年，受知於曾國藩，奉派赴美購辦機器，籌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對清廷多有獻替。旋充留美學生副監督，並代表清廷赴秘魯交涉改善華工待遇。甲午戰後歸國，初居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後至北京活動。本年夏因建議總理衙門設立國家銀行遭人破壞，至是再提議修築自天津至鎮江鐵路，復因德國政府抗議未獲實現。戊戌變法期間，容閔頗同情於新黨，政變後潛跡上海租界，再遷香港。曾赴臺灣遊歷，後返美國，著有「西學東漸記」，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病逝，享年八十四歲。（註一）

附錄：黎晉偉撰「容閔傳」（註二）

中國第一個留學生之一生

容閔，字純甫，廣東香山人，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於澳門對岸之南屏鄉，一八三五年隨父至澳門，入英教士古特拉富夫人主辦之西塾就讀，時年七歲，後西塾停辦，古夫人赴美，閔乃還家習漢文。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閔父去世，身後蕭條，閔有一兄一姊一弟，兄業漁，姊在家操井臼，閔亦來往於鄉鎮間販賣糖果以助家計，時年十二歲，為少年最困苦時期。

如是者數月，時值嚴冬，店舖皆停製糖果，憑鄰人之介，復至澳門，於天主教某教士印刷所處作「後生」，其工作為摺疊書頁，月薪四元五角，閔亦安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八四〇

先是，澳門西人籌辦瑪禮遜紀念學校，古夫人於結束西塾赴美時，臨行以一事相託於友人霍醫生，請其訪得閑所在，俟瑪禮遜學校開課時，即送其入校就讀。霍醫生訪閱數月，始悉其受僱於某天主教士家充學徒，乃致函相邀，介紹其往見瑪禮遜學校校長勃朗先生，洽商入學事宜。

勃朗美國人，畢業於耶魯大學，爲一熱心教育家，一八三九年二月偕其夫人抵澳門，瑪禮遜學校即於是年十一月開課，此爲澳門及在地緣上包括香港、南中國第一間創辦之英文小學，當年入學就讀的華人童子有黃勝、黃寬等五人，至一八四一年，容閱始賴霍醫生之介而入學，但華人學生，亦僅此六人而已。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勃朗因病返美，行前向諸生表示，謂彼對瑪禮遜學校感情至深，極願携三、五生徒同赴新大陸，俾能完全接受新教育，諸生中有願同行者可起立，閱及黃勝、黃寬等皆應聲而起，此三人即爲中國最早之第一批留美學生，後黃勝因病歸國，返港後任教於英華英文書院，並爲創辦東華書院之「功臣」。黃寬則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習醫，以第三人畢業，於一八五七年歸國，在廣州開設醫務所，聲譽甚隆，凌駕當時歐美醫生之上。容閱則以受知於曾國藩，創辦中國第一家機器廠「江南製造局」，及經理留美學生事務（選派官費學生赴美留學自此始），爲對近代中國有其不可磨滅影響之一人。

關於瑪禮遜學校之設立，與西方人士來華傳教有重大關係，其事頗堪一紀。瑪禮遜博士英國人，爲一熱心傳道家，奉英國傳道會委派來華傳教，於一八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倫敦出發，經大西洋至紐約，改乘帆船至中國，原擬在澳門登陸，以招天主教士之嫉忌，不果，乃折至廣州，後因中外適起交涉，當時政治空氣對居留廣州西人頗爲不利，乃轉往麻六甲暫駐，於是埋頭從事著述，成第一部「華英字典」，並以耶教聖經譯成漢文，以供華人閱讀，後復來華傳道，於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中國。翌年，旅澳門西人倡議組織瑪禮遜教育會，並籌建學校，以紀念其一生之事蹟。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的結果，香港割讓於英，瑪禮遜學校遂於一八四二年由澳門遷港，建校於港島東區即後來面對跑馬地的一個山崗上，此時學校大加擴充，學生已增至四十餘人，該山崗後來即被稱爲「摩利臣山」，其前面馬路亦被命名爲「摩利臣山道」。（按：瑪禮遜與摩利臣，爲中文譯音之字異）。至一八五〇年，瑪禮遜學校解散

，弦歌之聲中絕，但在一百年後之今日，該山已被港府夷平，成爲一新型學校發展區，此對瑪禮遜博士溝通中西文化之精神，直可謂後來居上矣。

容闕、黃勝等皆爲甯人子，渠等得赴美國接受西方教育，從中予以經濟援助者有數人，蓋闕等遠適異國，其父母皆依依不捨，故皆向勃朗表示，希望對其父母至少予以兩年照顧，俾得安心讀書，據容闕在其自傳中憶述，熱心參與此項援助者，一爲香港英文「中國郵報」(前稱德臣西報)主筆蘇格蘭人楚德魯特君，一爲美國商人李企君，一爲蘇格蘭人塘培爾君。又有一艘爲美國紐約商人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經營之帆船名「亨得利氏」者，專程來華運載茶葉返美，該船方泊黃埔港，勃朗乃決計携闕等乘該船赴新大陸，船主人廉悉闕等爲中國苦學生，亦慨允由香港至紐約全程免收船資，以示優待，其過程曲折，有如是者。

闕等乘船赴美時，蘇彝士運河尚未開闢，船須繞經好望角轉入大西洋，歷時凡九十八日始抵紐約，復由紐約乘舟赴紐海紋，經威哈斯角而至東溫若，在勃朗家小住一星期，乃入麻薩諸塞州聲名卓著之孟荀(Monson Academy)學校肄業。容闕自傳云：「彼時美國尚無高等中學，僅有預備學校，孟荀即預備學校中之最著名者。全國好學之士，莫不負笈遠來，肄業此校，爲入大學之預備。……而斯時中國人入該校者，惟予等三人耳。」

容闕留美最初原以兩年爲期，畢業孟荀學校後尚無升讀大學之經濟能力，會其恩師勃朗於一八五〇夏間赴南部探視其姊，順道訪問喬治亞州薩伐那婦女會，談及容闕升學遭遇困境之事宜，該婦女會表示同情，允予援助，勃朗將此喜訊歸告於闕，闕遂束裝赴紐海紋(New Haven)，投考耶魯大學，於一八五四年畢業，爲中國學生畢業於美國第一流大學之第一人。

容闕留美凡七年，於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乘帆船歸國，以去國日久，而其師友又皆爲美國人，闕在童年時所習之四年漢文，已幾忘記淨盡，當船將航抵香港時，乃發生一語文隔閡之故事，容闕自傳稱：「有領港人至船上，船主見其爲中國人，乃倩予爲舌人，詢其近處有無危險之暗礁與沙灘。予默念此暗礁與沙灘者，中國語不知當作何解，久思不屬，竟莫達其意。幸領港人適解英語，常轉告予以暗礁沙灘之中國名詞。……船主等見予狀，咸笑不可仰，予自念以中國人而不能作中國語，亦無詞以自解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八四二

既登陸，閱即往英文「中國郵報」訪其主筆楚德魯特，謝楚氏當年以膏火相助之意，旋歸澳門省親，母子重逢，有無限天倫之樂。數月後赴廣州，寓於城西鹹蝦欄，專志補習漢文，以爲在國內謀生之用。容閱自傳云：「予之寓此，除補習漢文而外，他無所事。以予久居美洲，於本國語言，幾盡忘之，至是乃漸復其舊。不及六月，竟能重操粵語，惟唇舌間尚覺生硬耳。」

容閱初入世途，廣州有兼任傳道之美國醫生名派克者，時方爲美政府委任爲暫代公使，閱承一美國友人之介，於派克處任書記職，後以無所展布，三月後辭職赴港，由其老友楚德魯特君薦之於高等審判廳（現稱高等法院）任譯員。閱初有意學習法律，以求取得律師資格，不意竟引起全港律師之排斥，其自傳中有云：「若輩以爲予於中西文字，皆所擅長，設於香港律師界得佔一席，則將來凡涉於華人訴訟事件，必爲予個人壟斷，英律師且相將歸國，故對於予之學法律，出全力以拒之。」容閱無奈，乃於一八五六年八月，乘一美國運茶船名佛羅梭司者赴上海。

容閱離港赴滬，爲其一生事業與命運之最大轉捩點，蓋上海五方雜處，爲中西人文薈萃之地，閱因譯書關係，獲識滬上名人曾繼甫，由曾之介，得結交於大算學家李壬叔，而閱之見知於曾國藩，使其長才碩學得以發展，皆出於李壬叔推轂之力也。

容閱未受知曾國藩前，方以茶商身份來往江湖間，在江西九江者三年，時南京、蕪湖等地尚在「太平軍」手中，閱聞衆茶商言，安徽太平縣有綠茶百餘萬擔，已裝箱準備出口，不幸爲太平軍所奪，如有人能冒險向其收購，不難立致鉅富。閱在上海時，曾偕一美國教士及中國友人陳蘭生赴南京視察，得見洪秀全之族弟干王洪仁玕，頗受優渥，洪曾予以四等爵印，不受，惟得其護照，則可在區內通行無阻。故聞茶商所言，不覺怦然心動，曾親入太平軍區採購茶葉六萬五千箱，旋以患病二月，始結束此冒險生涯，轉就九江某茶葉公司之聘爲經理人。與曾國藩素無淵源，亦無關係。

時曾國藩方以兩江總督銜駐節安慶。一日，閱於九江寓所，忽接一前在上海相識而無交誼之曾督下屬名張世貴者來函，略言總督素聞其名，亟欲一見，彼奉命轉達，邀其到安慶一行，故以此書相報云。閱初得書，頗爲疑懼，其自傳中有曰：「私念此大人物（曾國藩）者，初無所需於予，急欲一見胡爲？予前赴南京，識太平軍中渠帥，後

在太平縣，向革軍購茶，豈彼已有所聞歟？憶一年前湘鄉駐徽州，爲太平軍所敗，謠言總督已陣亡（按：曾於是役欲投水自殺，獲救不死），時予身近戰地，彼遂疑予爲奸細，欲置之於法，故以甘言相誘耶？」躊躇再三，乃婉爾謝却。賢豪之士，生逢亂世，其遇合之難，有如是者。

後此二月，張世貴及其摯友李壬叔復相繼來函催促，並詳述曾國藩求才若渴虛心延攬之誠，以釋其慮。容閎遂於一八六三年八月結束九江商務，九月逕赴安慶曾帥大營。此次相見，閱於曾文正有生平知遇之感，在其自傳中記述甚詳：曾國藩爲近代中國歷史有數人物，相傳其善相人，門下號稱多士，茲就容氏自傳中摘錄數節，以與傳聞相印證。

其言曰：「抵安慶之明日，……早起，予往謁總督曾公，刺入不及一分鐘，闢者立即引予入見，寒暄數語後，總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語者約數分鐘，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總督又以銳利之眼光，將予自頂至踵，仔細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異常人否，最後乃雙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別注意於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時雖不至忸怩，然亦頗覺坐立不安。……」

「余見曾文正時，……文正已年逾花甲，精神突然，身長約五尺八九英寸，軀格雄偉，肢體大小咸相稱，方肩闊胸，首大而正，額闊且高，眼三角有稜，目皆平如直線，兩頰平直，鬚髮甚多，鬚髮直連頰下，披覆於其寬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嚴之儀表，目雖不巨，而光極銳利，眸子作櫻色，口潤唇薄，是皆足爲其有宗旨有決斷之表證。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見即識之不忘。」

「……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負有任務）而來，總督幕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等專家，無不畢集，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足以吸引之羅致之也。文正對博學多才之士，尤加敬禮，樂與交遊。……」

容閎之赴安慶也，初欲說曾國藩以振興教育之計劃，惟在召見商談前，曾幕中之舊友四人，在邀閎共進晚餐時，告以創辦新式機器廠之計劃。並謂渠等曾進言於曾督，已獲首肯，獨廠之性質如何未決耳！友等逆料曾督於第二

次接見閻，必垂詢求此，故先徵求其意見，閻於機械雖非所長，乃就其在國外觀感所得，提出設立良好「母廠」，俾可產生更多「子廠」之主張，衆友聞言，咸趨其議。數日後，閻被召見，曾國藩問曰：「若以爲今日欲爲中國謀最有利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處着手？」閻卽以日前與諸友商定之意見對，報曰可，並指定其他機械工程師二人，授予全權，與閻合辦此事。閻則被授予五品軍功銜，撥款銀六萬八千兩，命專程赴美購辦機器，歷二年而成，廠址設於上海西北郊之高呂廟，卽後來所稱之「江南製造局」也。

容閻由美購辦機器歸國時，曾國藩已與弟國荃攻克南京，大局底定，以閻辦事有方，深表嘉許，卽專摺保奏實授五品官銜。其奏章略言：

容閻爲留學西洋之中國學生，精通英文，此行歷途萬里，爲時經年，備歷艱辛，不負委託，庶幾弘毅之選，不僅通譯之才，擬請特授以候補同知，指省江蘇，儘先補用，以示優異，而勵有功。

容閻留學美國七年，因得曾國藩之識拔，至是乃赫然大露頭角。

江南製造局之建立，雖開闢於容閻之手，惟此計劃原出於曾府幕中友人之倡議，閻會逢其適，對其念念不忘之教育大計，仍不能謂爲已獲展布，及閻以候補同知資格，在江蘇省行政署任譯員，得結交於上海道丁日昌，丁之官運甚亨通，未幾已歷鹽運司、藩司，而升至江蘇巡撫。閻於自傳中有曰：「當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與余志同道合者，（除曾文正外）又有老友丁日昌，丁爲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縮。」及丁升任江蘇巡撫，閻卽語以教育計劃，丁大贊許，命其速具詳細說帖，以便上之北京。於是閻乃條陳四事，以爲中國圖強之根本。略謂：

- 一、中國宜組織一合資汽船公司，公司須爲純粹之華股，不許外人爲股東，卽公司中之經理職員，亦概用中國人。（下略）——按：後來中國有招商局輪船，卽係由此觀念所啓發。

- 二、政府宜選派優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爲國家儲蓄人才，選派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此百二十人中，又分爲四批，按年遞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學期限定爲十五年，學生年齡，須以十二歲至十四歲爲度，視第一批第二批學生著有成效，以後卽永定爲例，每年派出此數，派出時並須以漢文教習同往，庶幼年學生在美，仍可兼習漢文，至學生在外國膳宿入學等事宜，當另設留學生監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項留學

經費，可於上海關稅項下，提撥數成以充之。

三、政府宜設法開採礦產，以盡地利。礦產既經開採，則必兼謀運輸之利，凡由內地各處以達通商口岸，不可不建築鐵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開採礦產，即間接以提倡鐵路事業也。

四、宜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訴訟，以防外力之侵入。（下略）——按：容閔之留學美國，原以教會人士之助力爲多，渠於學成返國後有此建議，正可見其愛國精神之爲常人所不及也。

上述四事，性質不一，容閔在其自傳中有所說明曰：「此條陳之第一、三、四、特假以爲陪襯，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條。」初，丁日昌對閔言，新任相國文祥「滿人」，權力極大，由彼代爲入奏，可期激進。不料二月後閱接丁馳函相告，謂文祥適丁內艱，居喪守制，不克批辦此事，未及三月，文祥復以謝世聞，閔之計劃，至此幾成泡影。由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迄無實現之機會。

語謂：「世上無難事，最怕有心人」，會一八七〇年春天發生「教案」，清廷欽派曾國藩、丁日昌及其他兩員大臣會同辦理此事，因須與法國辦交涉，丁即電招閔爲譯員，閔得電稍遲，未及同行，乃兼程赴津，遂得機對丁舊事重提，丁復言其事於曾國藩，曾以爲可行，遂即領銜入奏，數月後奉同治帝硃批照准，閔鑒而不捨之教育儲材計劃遂得實現，中國之有官費選派學生出洋留學亦自此始。

爲求有效執行此計劃，於是特設留學生事務所爲主辦機關，曾國藩以容閔爲此案倡議人，乃委爲監督人之一，經商定，學生須經考試方得入選，考試科目爲漢文之寫讀，其曾入學校已習英文者，則並須試驗其英文，應考及格後，須先入預備學校，學習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得派赴美國。其餘辦法大致與容閔條陳同，此爲當時招考章程之大略也。

一八七一年夏，因所招第一批學生不足額，閔乃親赴香港，於英政府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西文亦略有根柢者數人，以足其數。此第一批學生，大部份爲廣東籍，閔在其自傳中有曰：「時中國尙無報紙以傳播新聞，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計劃，故預備學校招考時，北方人應者極少，來者皆粵人，粵人中又多半爲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費學生中，南人十居八九，職是故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八四六

由一八七〇至一八七八年間，中國留美學生共派出一百二十人，但自曾國藩於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春逝世後，留學生事務所改由直隸總督李鴻章管理，時留學生監督之一名吳子登者，屬守舊派人物，與容閔意見常相左，日進誹語於李鴻章，竟提出撤回學生及解散事務所之議，合肥尚未諮詢閔意見，遽可其請。學生留學期限原定十五年，至是遂中途而廢。一八八一年，因留學事務所之結束，全體學生被撤回中國，容閔一生最大之抱負，亦因此而受沉重之打擊。此一留學計劃，雖出於閔之倡議，唯力促其成者實為曾國藩，合肥乃湘鄉薦以自代之人，竟不思所以維護其所稱「曾師」之手澤，閔於自傳中不惜頌曾貶李至再至三者，其故可知焉。

留學計劃之夭折，雖為當時守舊派之勝利，惟在被撤回之留學生中，有在第一批派出之十人，因志切深造（多已考入大學），不願返國，後皆各至顯達，有聲於時，其中如詹天佑，即於一八八一年畢業耶魯大學工學院，旋回國服務，獻身鐵路事業，以建築京張（家口）鐵路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名出色鐵路工程師。如梁敦彥，清末民初，屢居外交重鎮，皆其著者也。

容閔自少留美，回國後即殷殷以中國圖強為務，其思想意識，殆為晚清維新派前驅，及其晚年，以其留學計劃之橫被摧折，本已絕意於仕途，後因日本侵我藩屬朝鮮與中國開戰，閔復獻策於湖廣總督張之洞，建議向外借貸鉅款購買軍艦及訓練新軍以抗日本，但為張之政敵李鴻章所抑，不果行。旋應張電邀自美歸國，復獻策於總理衙門（即外交部）兼戶部（即財政部）侍郎張蔭桓，建議籌款一千萬兩為建立「國家銀行」之基礎，張納其議，與戶部尚書翁同龢聯銜入奏光緒帝，不料事為上海顯要盛宣懷所聞，竟以鉅金賄賂京中二三親貴從中破壞，此事近垂成之國家銀行計劃，遂亦胎死腹中。

容閔之國家銀行計劃既失敗，有志之士謀所以變革圖強者益亟，康梁維新運動之應運而生，即為此種政治思想之代表，閔居北京時，本與康梁時相過從，但尚未注意到渠等即為維新運動之領袖，及一八九八年四月戊戌維新正式揭幕，閔遂決心居留北京，與康梁等合流，由於志同道合，維新黨領袖之會議，亦常假其寓所中舉行。及九月政變，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閔以素表同情於維新黨，其寓所復有會議場之目，乃急出京赴滬，託跡於上海租界。為避禍之計，然志猶未已，即在上海組織一「中國強學會」，冀作維新運動之延續，閔為該會發起人，被選為第一任

會長。旋有人勸告，謂上海租界亦非樂土，不如遷地爲良，閔乃再遷香港，請英政府保護，居港者二年，寫成英文自傳。一九〇一年春，閔赴臺灣遊歷，得見日本總督兒玉子爵，時清廷閩浙總督已有公文去臺要求對閔緝捕，賴兒玉庇護，未遭毒手。閔以中國不可一朝居，遂浩然返美，於一九一二年病逝美國，享年八十四歲。其美籍夫人於一八八六年先死，長子覲槐，及幼子覲槐，先後皆畢業於耶魯大學。

論曰：璋愈有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容閔以第一名留學生得歐美風氣之先，爲近代中國維新圖強之啓蒙人物，顧歸國之初，蹉蹉靡騁，嗣以受知於曾湘鄉，始得展其抱負，時曾幕下固不乏龍翔鳳舞之士，以其獎掖人才不遺餘力，知人善用而無畛域之見，閔之江南機器廠及留學生計劃，始賴湘鄉一力支持而得實現，非然者，恐長才見屈，以布衣終老矣。以此言之，中國非無才也，惟能以天下之心而用天下之才之政治家則鮮耳。論閔才識。不在康梁之下，顧現代「清史」既無閔傳，而悠悠百年，若曾湘鄉者亦不多見，遂令滄海橫流，更無中流砥柱，言念及此，可勝慨哉！

原文附註

一、容閔自傳係由英文寫成，書名爲 *My Life China and America*，民國四年由徐鳳石、惲鐵樵合譯爲「西學東漸記」，上海商務印書館出過兩版，本文記述即以西學東漸記爲主要之依據。蓋皆爲第一手資料，所以存其真也。

二、中華「辭海」寅集一部「容閔」條，註閔爲「澳門人」，不當，蓋閔已自言出生於「距澳門西南可四英里」之南屏，其地即在澳門對岸「前山」附近，屬香山境，香山易名中山爲民國十五年後之事，近人有稱爲「中山人」者，因與史例不符，故不采。

三、破壞容閔「國家銀行」計劃之某道員，譯者略去其名，以□□□代，想係「西學東漸記」一書出版時，其人在上海之勢力仍在，殊不願以此觸忤權貴，今查出爲盛宣懷。

四、「江南製造局」係采自「西學東漸記」譯名，辭海稱爲「江南機器廠者」，想係後來之「正名」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註一：參照容闕著，徐鳳石、譚鐵樵譯：「西學東漸記」，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二：載「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三期。

本月（一月） 康有為上疏抗論德據膠澳，亟宜變法自強。

膠澳事起，工部主事康有為復至北京，第五次上書清帝，力陳「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並舉三策以建議朝廷。其一策曰：「採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而已。」其二策曰：「大集羣才而謀變政，六部九卿諸司百執自有才賢，咸可咨問。……逐日召見，虛已請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當先，若者當後，謀議既定，次第施行。」其三策曰：「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就該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實政。」末謂：「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則可以強，能行其中，猶可以弱，僅行其下，則不至於盡亡，惟皇上擇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發憤與否？在於此時。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為偏安，無能為計。」（註一）

書上，工部尚書崧澐惡其言直，不肯代奏，然京師一時傳鈔，上海刊刻，諸大臣士人多見之。康有為「欲聯九卿上摺，又無聯名者。」乃謁翁同龢投書告歸。十八日決計南返，會翁同龢來留乃止。次日，給事中高燾乃上疏請召見康有為，翁亦在帝前力稱之，謂有為「才過臣百倍，請皇上舉國以聽。」德宗欲召見，恭王諫阻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今康有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註二）

附錄：康有為「抗論德據膠澳亟宜變法自強摺」（註三）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呈請代奏事：竊自馬江敗後，法人據越南，職於此時隱憂時事，妄有條陳，發俄日之謀，指朝鮮之患，以為若不及時圖治，數年之後，

四鄰交逼，不能立國。已而東師大辱，遂有割臺賠款之事，於是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圖保疆圉，妄謂及今爲之，猶可補牢，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時機，則外患內訌，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之患，且夕可致，後欲悔改，不可收拾，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危言狂論，冒犯刑誅。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俛採芻蕘，下譴臣施行，以圖臥薪嘗膽之治。職誠感激聖明，續有陳論，格未得達，旋即告歸。去國二年，側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上憲撫膺，閉門泣血。頃果有德人強據膠州之事，要索條款，外廷雖不得其詳，職從海上來，閱外國報，有革李秉衡索山東鐵路礦務，傳聞章高元及知縣，已爲所擄，德人修造砲臺兵房，進據即墨，並聞德王胞弟親統兵來，俄日屯買吾米各七百萬，日本議院日日會議，萬國報館議論沸騰，咸以分中國爲言，若箭在弦，省括即發，海內驚惶，亂民蠢動。職誠不料昔時憂危之論，倉猝遽驗於目前，更不料盈廷緘默之風，沈痾更深於昔日，瓜分豆剖，漸露機牙，恐懼回惶，不知死所。用敢萬里浮海，再詣闕廷，竭盡愚誠，惟皇上自垂覽而採擇焉。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蔑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昔視我爲半教之國者，今等我於非洲黑奴矣。昔憎我爲倨傲自尊者，今則侮我爲聾聵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勢保護諸例，祇爲文明之國，不爲野蠻，且謂剪滅無政教之野蠻，爲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無事者，泰西專以分非洲爲事耳！今非洲剖訖，三年來泰西專以分中國爲說，報章論議，公託義聲，其分割之圖，傳徧大地，擘畫詳明，絕無隱諱，此尙虛聲，請言實踐。俄德法何事而訂密約，英日何事而訂深交，土希之役，諸國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戰艦之數，諸國何以競厚兵而相持？號於衆曰保歐洲太平，則其移毒於亞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則其垂涎於地利可想。英國太晤士報論德國膠事，處置中國，極其得宜，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其僭端，德國固其嚆矢耳！二萬萬膏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耽耽，朵頤已久，慢藏誨盜，陳之交衢，主者屢經搶掠，高臥不醒，守者袖手熟視，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蟻暴殄，聞風並至，失鹿共逐，撫掌懽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後老稚亦分杯羹，諸國咸來，並思一轡。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東事，割臺之後，兩載遂有膠州，中間東三省、龍州之鐵路，滇粵之礦，土司野人山之邊疆尚不計矣。自爾之後，赴機愈急，蓄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教堂遍地，無刻不可啓釁；礦產遍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剝削無已。且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絕，疆臣斥逐，

用人之大權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戶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國政，樞垣總署，彼皆可派其國人；公卿督撫，彼且將制其死命。鞭笞親貴，奴隸重臣，囚奴士夫，蹂躪民庶。甚則如土耳其之幽廢國主，如高麗之禍及君后，又甚則如安南之盡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波蘭之宰割均分，而舉其國土。馬達加斯加以挑水起釁而國滅，安南以爭道致命而社墟，蟻穴潰堤，蚌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後此數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無解災，然其他事，職猶可先言之。若變辱非常，則不惟輟簡而不忍著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諸口，處小朝廷而求活，則胡銓所羞；待焚京邑而憂惶，則董遇所鄙，此則職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夫謂皇上無發憤之心，諸臣無憂國之意，坐以待斃，豈不宜然。然伏觀皇上發憤之心，昭於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賢士大夫，憂國之誠，瘡痍黑色，亦且暴著於人，顧日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者何哉？蓋南轅而北轍，永無稅駕之時；緣木而求魚，決無得魚之日。職請質言其病，並粗舉治病之方。仲虺之語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藥雜投；不知變症，而舊方猶守，其加危篤固也。職請以仲虺之說明之，歐洲大國，歲入數千萬萬，練兵數百萬，鐵船數百艘，新藝新器歲出數千，新法新書歲出數萬，農工商兵，士皆專學，婦女童孺，人盡知書。而吾歲入七千萬，償款乃二萬萬，則財弱；練兵鐵艦無一，則兵弱；無新藝新器之出，則藝弱；兵不識字，士不知兵，商無學，農無術，則民智弱；人相偷安，士無俠氣，則民心弱；以當東西十餘新造之強鄰，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勢也。此仲虺兼弱之說可畏也。大地八十萬里，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列國競進，水漲堤高，比較等差，毫釐難隱。故管子曰：「國之存亡，鄰國有焉，衆治而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衆合而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頃聞中朝諸臣，狃承平臺閣之習，襲簿書期會之常，猶復以尊王攘夷，施之敵國，拘文牽例，以應外人，屢開笑資，爲人口實，譬凌寒而衣絺綌，當涉川而策高車，納侮昭尤，莫此爲甚。咸同之時，既以昧不知變而屢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變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陞尊崇，既與臣民隔絕，恭親王以藩邸議政，亦與士夫不親。吾有四萬萬人民，而執政行權，能通於上者，不過公卿臺諫督撫百人而已。自餘百僚萬數，無由上達，等於無有，而公

卿臺諫督撫，皆循資格而致，既已衰足未出外國遊歷，又以貴倨未近通人講求。至西政新書，多出近歲，諸臣類皆咸同舊學，常時未有，年耄精衰，政事叢雜，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萬國情狀，其蔽於耳目，狃於舊說，以同自證，以習自安，故賢者心思智慮，無非一統之舊說，愚者驕倨自喜，實便其尸位之私圖。有以分裂之說來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權之謀密聞者，瞢然不察也。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瞠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強，則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稱歷朝之成法，悚然聽之者，蓋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詡正學之呂言，輒然從之者又十而八九矣。無一事能究其本原，無一法能窮其利弊。卽聲從誅，國皆失明，而各國遊歷之人，傳教之士，察我形勝，測我盈虛，言財政詳於度支之司，談物產精於商局之冊，論內政或較深於朝報，陳民隱或更切於奏章，舉以相質，動形窘屈，鄭昭宋聾，一以免患，一以召禍。況各國競驚於聰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闇，將以求免，不亦難乎。此而望其盡掃舊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積重難返，良有所因，夜行無燭，瞎馬臨池。今日大患，莫大於昧，故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其病皆在於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說可懼也。自臺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國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嘯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衆，伏莽遍於山澤，教民遍於腹省。今歲廣西全州、灌陽、興安、東蘭、那地、泗城、電白已見告矣。匪以教爲仇讎，教以匪爲口實，各連枝黨，發作待時；加以賄賂昏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卽無強敵之而，揭竿斬木，已可憂危，況潢池盜弄之餘，彼西人且將藉口興師，爲我定亂。國初賊流賊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佔踞伊犁，兵家形勢，中外同揆，覆車之轍，可爲殷鑑，此仲虺所謂取亂者可懼也。有亡於一舉之割裂者，各國之於非洲是也。有亡於屢舉之割裂者，俄、德、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盡奪其政權而一旦亡之者，法之於安南是也。有偏據其海陸形勝之地，而漸次亡之者，英之於印度是也。歐洲數強國，默操成算，縱橫寰宇，以取各國，殷鑑具存，覆車可驗，當此主憂臣辱之日，職亦何忍爲傷心刺耳之談？願見舉朝上下，相顧嗟呀，咸識淪亡，不待中智，羣居歎息，束手待斃，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壯出門而狼顧，並至言路結舌，羣臣低首，不惟大異於甲申，亦且迥殊於甲午，無有結纓誓骨，慷慨圖存者，生機已盡，暮色慘悽，氣象如此，可駭可憫，此眞自古所無之事。夫至於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爲歐洲之奴隸，聽其犬羊之封縛，哀莫大於心死，病莫重於瘠癯，欲頽之藥，不假於疾風，將萎之華，不勞於觸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謂侮亡之說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於不畏分割，不憚死亡者，雖出於

昧，亦由誤於有恃焉。夫欲託庇強鄰，藉爲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則倚角成勢，彼乃輔車，若我爲附枝，則臥榻之側，豈容鼯睡。齊王建終傷松柏，李後主終坐牽機。且泰西兵事，決勝乃戰，一旦敗績，國可破滅，俄德力均，豈肯爲我用兵，或敗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難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亞洲，連雞互忌，氣勢甚緩，突厥頻割大藩，尚延殘喘，波斯盡去權利，猶存舊封，中國幅員廣袤，從容分割，緩緩支持，可歷年所，執政之人，皆已耄老，冀幸一身可免，聽其貽禍將來。然突厥之回教，專篤悍強，西人所畏，吾則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國主，紆尊遊歷西國盡徧，吾雖親王宰相，閉戶而潛修，分局早定，民心已變。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國新報之張皇，亞洲舊國，近數年間，歲有剪滅，近且殆盡，何不取鑑之。禍起旦夕，畢命盡喪，而謂可延年載，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盜鈴，至愚自欺之術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竊寶，屋燼身焚，同歸於盡而已。故職竊謂諸臣即不爲忠君愛國計，亦當自爲身謀也。皇上遠觀晉、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廟，孝事皇太后，即不爲天下計，獨不計及宋世謝后簽名降表，徽欽移徙五國之事耶！近者諸臣泄泄，言路鉗口，且默窺朝旨，一切諱言，及事一來，相與惶恐。至於主辱臣死，雖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補於事？不早圖內治，而十數王大臣俛首於外交，豈惟束手，徒增恥辱而已。不豫修於平時，一旦臨警，張皇而求請，豈能彌縫徒增賠割而已。故膠警之來，不在今日之難於對付，而在向者之不發憤自強也。勢弱至此，豈復能進而折衝，惟有急於退而結納。職不避斧鉞，屢有所陳，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圖存而已。亦不敢言圖存，即爲偏安之謀，亦須早定規模已耳。殷憂所以啓聖，外患所以興邦，不勝大願。伏願皇上因膠警之變，下發憤之詔，先罪己以勵人心，次明恥以激士氣，集羣材咨問以廣聖聽，求天下上書以通下情，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自茲國事付國會議行，紆尊降貴，延見臣庶，盡革舊俗，一意維新，大召天下才俊，議籌款變法之方，採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賢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帶退休，分遣親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遊歷外國者，不得當官任政，統算地產人工，以籌歲計豫算；察閱萬國得失，以求進步改良，罷去舊例，以濟時宜，大借洋款，以舉庶政。若詔旨一下，天下雷動，士氣奮躍，海內嚮望，然後破資格以勵人材，厚俸祿以養廉恥，停捐納，汰冗員，專職司，以正官制；變科舉，廣學校，譯西書以成人材。懸清秩功牌，以獎新藝新器之能；創農政商學，以爲阜財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衛生濟貧，潔監獄，

免酷刑，修道路，設巡捕，整市場，鑄鈔幣，創郵船，徙貧民，開礦學，保民險，重煙稅，罷釐征，以鐵路爲通，以兵船爲護。夫如是則庶政盡舉，民心知戴。但天下人心離散，當日有恩意慰撫，以固其情；志士之志氣劣弱，當激以強健豪俠以壯其氣。然後盡變民兵，令每省三萬人，而加之訓練，大購鐵艦，須沿海數十艘，而習以海戰。詔令日下，百舉維新，誠意諄懇，明旨峻切，料所有新政詔書，雖未推行，德人聞之，便當退舍。但各國兵機已動，會議已紛，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辯士，分遊各國，結其議員，自開新報之館，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論議，聳動英日，職以爲用此對付，或可緩兵。然後雷厲風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體略舉，期年而規模有成，海內回首，外國聳聽矣。皇上發奮爲雄，勵精圖治，於中國何有焉。論者謂病入膏肓，雖和緩扁鵲不能救，火燃眉睫，雖焦頭爛額不爲功，天運至此，無可挽回，況普國變法而法人禁之，畢七馬克作內政而後立，美國製造鐵砲，而英人禁之，華盛頓託荒島而後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機器於我之說，俄法欲據我海關鐵路礦務銀行練兵之權，雖欲變法，慮掣我之肘，職竊以爲不然。少康以一成旅而光復舊物，華盛頓無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國，況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哉！願視皇上志願何如耳！若皇上赫然發憤，雖未能遽轉弱而爲強，而倉猝可圖存於亡；雖未能因敗以成功，而俄頃可轉亂爲治。職猶有三策以待皇上決擇焉：夫今日在列大競爭之中，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別無他圖，此談經濟者異口而同詞，亦老於交涉之勢臣所百慮而莫易。顧革故鼎新，事有緩急，因時審勢，道備剛柔，其條目之散見者，當世之士能言之。職前歲已條陳之。今不敢泛舉，請言其要者。第一策曰，採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爲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法而已。昔彼得爲歐洲所擯，易裝游法，變政而遂霸大地；日本爲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絃而雄視東方。此二國者，其始遭削弱與我同，其後底盛強與我異。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條理尤詳，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聞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學，使臣游記，泰西纂述，並經乙覽，不廢芻蕘。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尤爲得要。且於俄日二主之事，頗有發明，皇上若俛採遠人，法此二國，誠令譯署進此書，幾餘披閱，職尚有日本變政之次第，若承垂採，當寫進呈。皇上勞精厲意講之於上，樞譯諸大臣各授一冊講之於下，權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瞶發聵，其舉動非常，更有迥出意外者。風聲所播，海內僇聳，職可保外人改視易聽，必不敢爲無厭之求。蓋遇昧者其膽豪，見明者則氣怯，且慮我

地大人衆，一旦自強，則報復更烈，非皇上洞悉敵情，無以折衝樽俎，然非皇上採法俄日，亦不能爲天下雄也。其第二策曰，大集羣才而謀變政。六部九卿諸司百執，自有才賢，咸可咨問，若內政之樞垣，外政之譯署，司計之戶部，司法之刑曹，議論之臺諫翰林尤爲要劇，宜精選長貳，逐日召見，虛己請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當先，若者當後，謀議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覩。其第三策曰，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夫直省以朝廷爲腹心，朝廷以行省爲手足，同治以前督撫權重，外人猶有忌我之心，近歲督撫權輕，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變，宜通飭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專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實政，目前不妨略異，三年要可大同，寬其文法，嚴爲督厲，守舊而不知變者斥之，習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練兵數千，新法之稅款數萬，製造之局數處，五金之礦數區，學校增設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課程，以爲條格，如此則百廢具舉，萬象更新，銷萌建威，必有所濟。我世宗憲皇帝注意督撫，而政舉兵強。我文宗顯皇帝、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撫，而中興奏績，重內輕外之說，帖括陳言，非救時至論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則可以強；能行其中，則猶可以弱；僅行其下，則不至於盡亡。惟皇上擇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機，在於今日，皇上發憤與否，在於此時。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一切不行，則幅員日割，手足俱縛，腹心已剖，欲爲偏安，無能爲計；圈牢羊豕，宰割隨時，一旦鬻割，亦固其所。職上爲君國，下爲身家，苦心憂思，慮不能免，明知疏遜，豈敢冒越。但棟折榱壞，同受傾壓，心所謂危，急何能擇。若皇上少採其言，發奮維新，或可圖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即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瞻望宮闕，憂思憤盈，淚盡血竭，不復有云。冒犯聖聽，不勝戰栗屏營之至。伏維代奏，皇上聖鑒。謹呈。

註一：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一「改革實情」。

註二：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一，「康南海自訂年譜」，頁四十一—四一。

註三，同註一，頁二十一。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一八九四）至十五年（一八九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電話：九 一 一 六 〇 八

承印者：裕台公司 中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安東街二一六號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